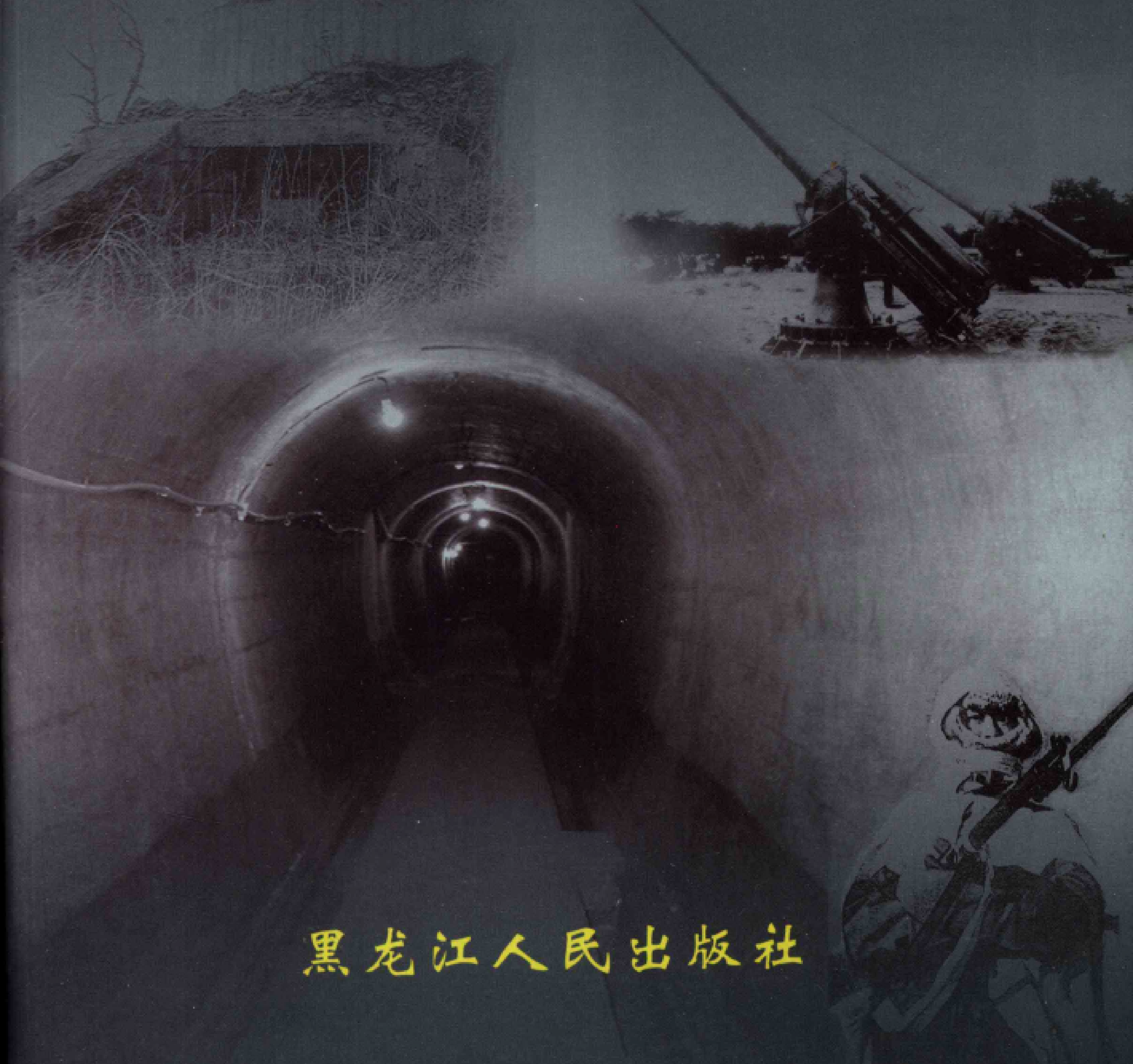
日本关东军要塞

下

徐占江 李茂杰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

责任编辑 韩妙丽
韩 丽
装帧设计 邹玲玲
宁珊珊





ISBN 7-207-06771-2/K 775
定价：398.00元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

日本关东军要塞

RI BEN GUAN DONG JUN YAO SAI

下　徐占江　李茂杰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哈尔滨·2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关东军要塞/徐占江、李茂杰主编.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8

ISBN 7-207-06771-2 Ⅰ.日... Ⅱ.徐... Ⅲ.侵华事件—史料—日本

Ⅳ.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99093号

责任编辑 韩妙丽 韩 丽

装帧设计 邹玲玲 宁珊珊

日本关东军要塞

Ri ben guan dong jun yao sai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E—mail:hljrmcbs@eyah.net

印 刷 北京翰林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毫米 1/16 印张74.5

字 数 2200千

印 数 1000

版 次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207-06771-2/K·775

定价:398.00元

目 录

第二编 日军要塞

第三编 修筑要塞的劳工

第四编 强化要塞区的殖民统治

第五编 日本开拓团与要塞慰安妇

第六编 要塞区的细菌毒气战

第七编 苏联红军攻克关东军要塞

第八编 要塞的调查研究与保护利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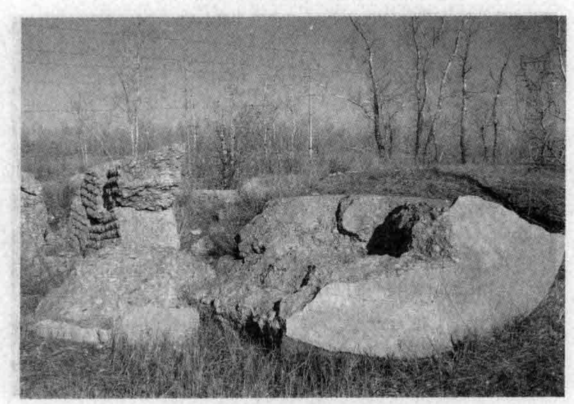
第九编 大事记

附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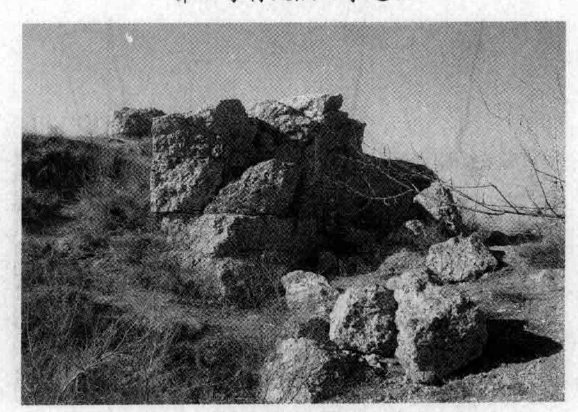

第 4 号特火点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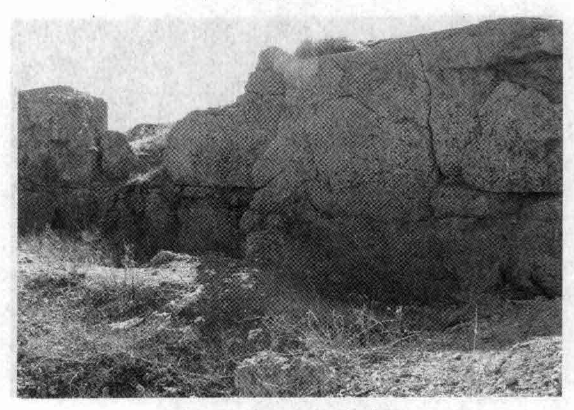

第 4 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第 5 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第 5 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第 6 号特火点远景


第 6 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第 6 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第 7 号特火点远景


第7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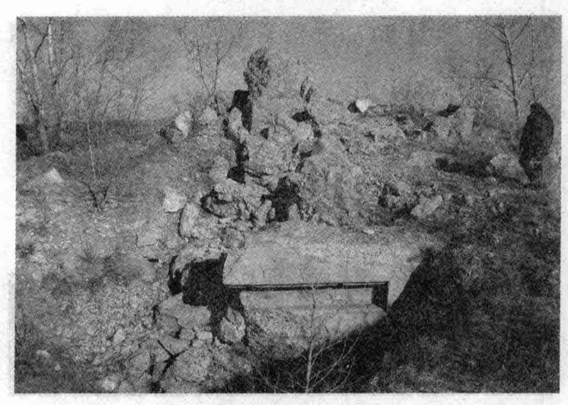

第7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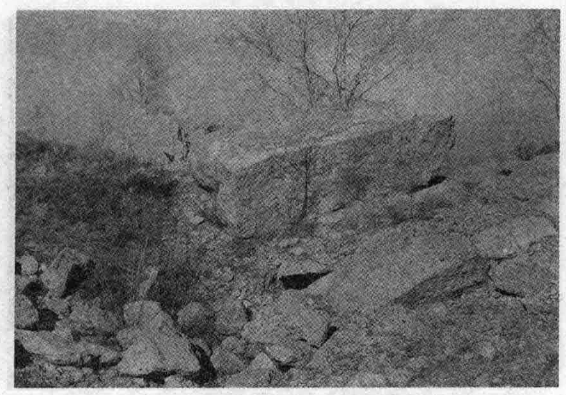

第8号特火点远景


第8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第8号特火点


第9号特火点远景


第9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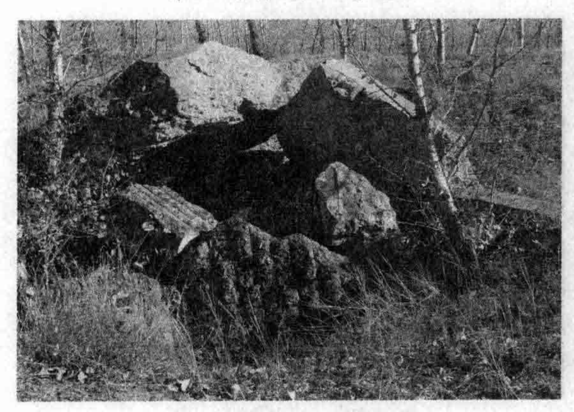

第9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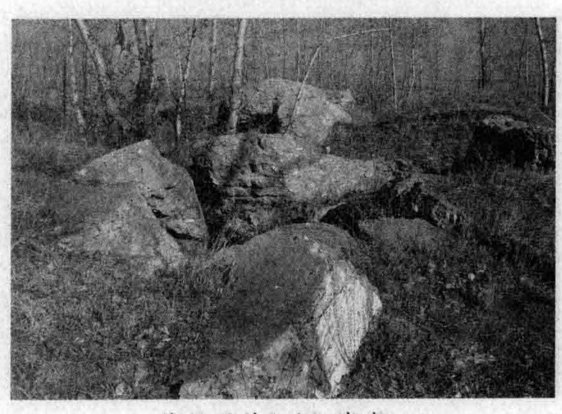

第 10 号特火点远景


第 10 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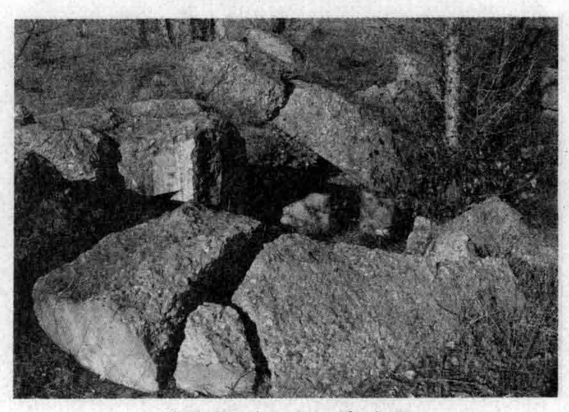

第 10 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第 11 号特火点远景


第 11 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第 11 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第 12 号特火点远景


第 12 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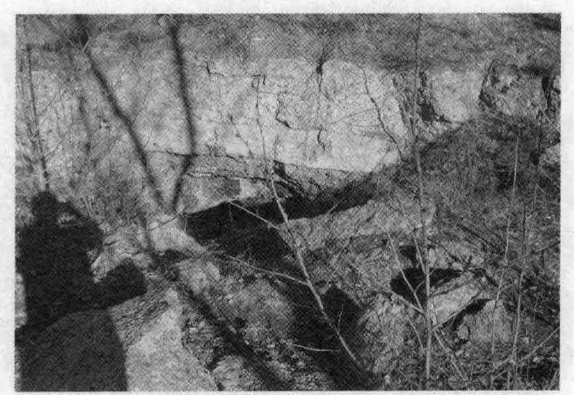
第 13 号特火点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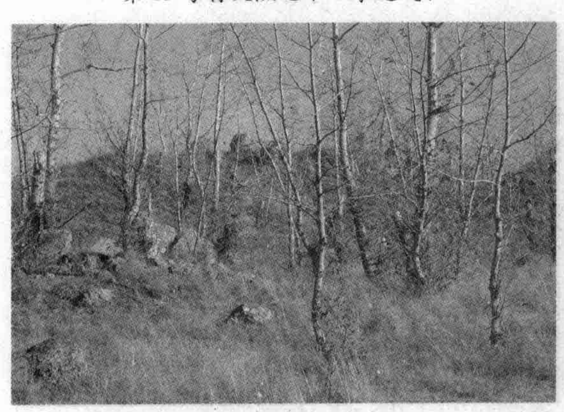
第 13 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第 13 号特火点地下工事通气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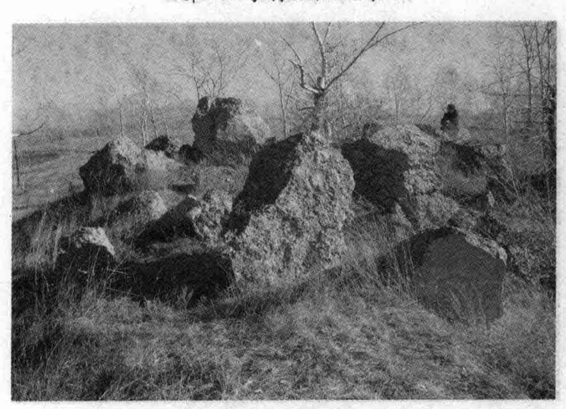
第 13 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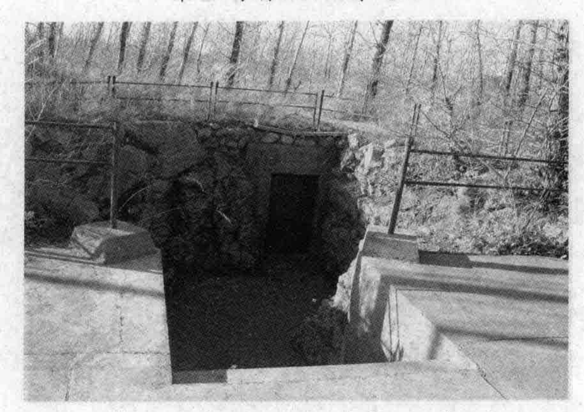
第 14 号特火点远景



第 14 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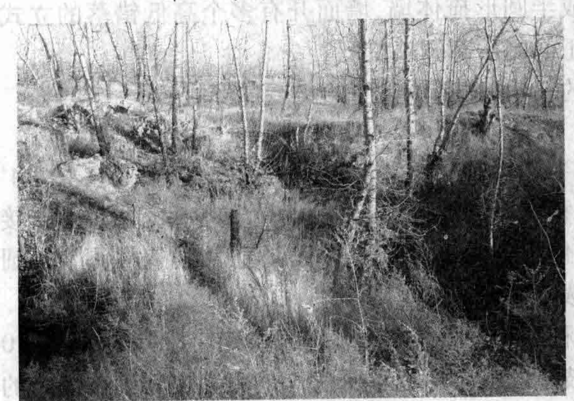
第 14 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第 15 号特火点地下工事出入口遗址


第 15 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第 15 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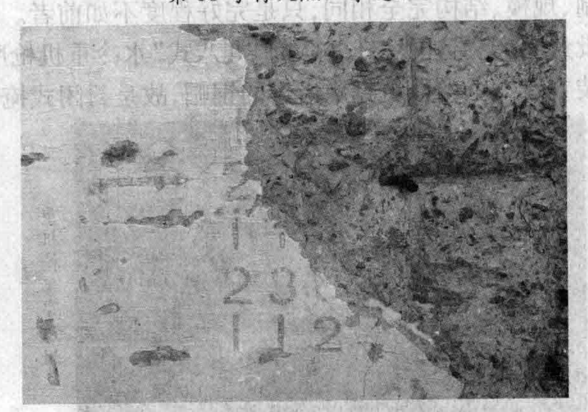

第 15 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第 16 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第 16 号特火点地下工事出入口遗址


第 16 号特火点工事遗址


第 16 号特火点地下工事通气孔遗址



第 16 号特火点工事墙上遗留的地下工事房间号

2. 其他各种碉堡

在日军按墙体厚度和抗弹力程度划分等级的碉堡系列中，在河南台阵地上除前述的特火点外，还有大量从甲级到丁级的各种大小碉堡，其总数约在 50～60 个（含特火点工事群中的小型碉堡）。其中北松山 12 个，东台 7 个，西部独立支撑点 5 个，其余分布在主阵地沿特火点环形防御线边缘空隙或纵深地带的沙丘高地上。这些碉堡因被彻底炸毁，除墙体厚度尚可认定外，其余情况如形状、面积、结构、高度等已均无法准确测量，而只能粗略予以推定。各种碉堡中除少量半地下式“地堡”外，大多为直接建在地表内部净高度为 2 米左右的碉堡。碉堡的基底框架一般为长方形，根据预定的作战方向建起单正面或多正面附有射击孔的环形掩体（作战室）和以间壁墙隔开的掩蔽室、进出通道等。其规格有多种，小的不足 20 平方米，大者则百余平方米。大致上可分为如下几类：

（1）单正面碉堡

这种碉堡多是将其作战正面的整个墙壁全部筑成半圆形掩体墙，墙面开有多个高低错落的立式和跪式双层射击口，也有的只开立式的单层射击口，正面的后部开口是门。

有的碉堡是将半圆形作战正面设在长方形基底的一角，这是单正面的又一种形式。

（2）多正面碉堡

其中一种是在工事基底框架的两角或上部设有半圆形掩体的“双头火力点”，位于北纬 49°14′41″，东经 119°42′22″，海拔 677 米；另一种与上述形式稍有不同的碉堡，其特点是未在基座两角上直接设半圆形掩体，而是从基座的主体部分向作战正面延伸出各为 4.5 米长的两条通道，通道尽头为半圆形火力点。位于北纬 49°14′40″，东经 119°42′24″，海拔 668 米。

在河南台阵地西部的一个独立支撑点，还有另一种结构的此类碉堡。该堡从东门向东通过约 10 米长的交通壕，连接着一个带有顶盖、内部尚未完全破坏的长方形地下厨房。地表上可看到被炸断的外径为 40 厘米的 3 个炉灶烟囱和几个外径 20 厘米的通气孔管道仍埋藏于混凝土平面顶盖下；有一种多正面碉堡称之为“三头火力点”，即在碉堡框架基座的三个角上都设有圆形掩体，位于如北纬 49°14′49″，东经 119°43′22″，海拔 668 米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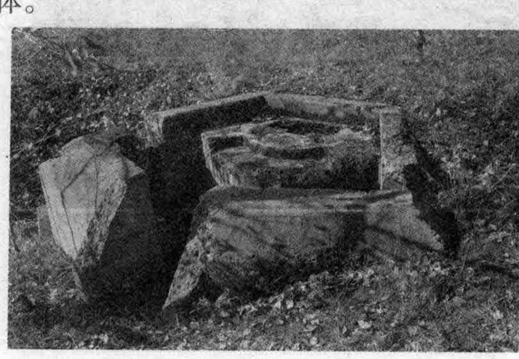
3. 机枪掩体

（1）立式六角形双层结构机枪掩体

日军称之为“隐显式机枪塔”，通常设于交通壕的外缘。其六角形混凝土掩体的一多半嵌在地表以下，其余不到一半即高度在 1.50 米左右立在地表以上，中间以混凝土板作隔层，隔板一侧开有一个升降口，上下靠嵌在掩体环形墙壁里的钢筋把手作扶梯。其所以称“隐显式”就是由于射手可通过上下把手而可隐可显。射手立于掩体的射击台前，只露出颈部以上，头上戴钢盔，颈部以下则藏于掩体内，可以安全隐蔽进行射击作战。具有这种特征的机枪掩体，在河南台阵地发现有 4 个，保存较为完整的只有 3 个，其中 1 个设于主阵地西北部的交通壕外缘。另 1 个位于主阵地东北角，同前者的形制、规模、结构完全相同，只是完好程度不如前者。这种机枪掩体，是当年日本军方专为要塞设计并小批量生产装备国境守备队的“九八式”水冷重机枪所使用的掩体。当年，这些掩体的混凝土基座上还装置有 1 个类似坦克炮塔形的钢帽，故是封闭式掩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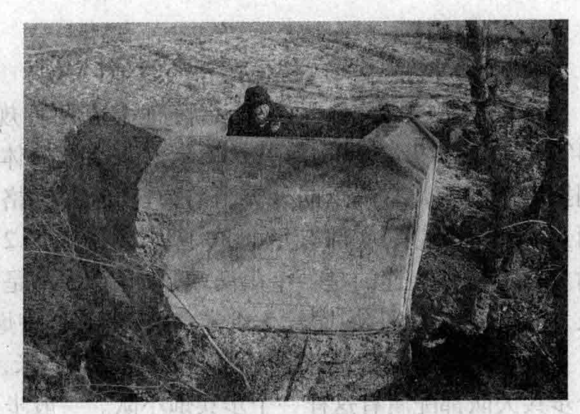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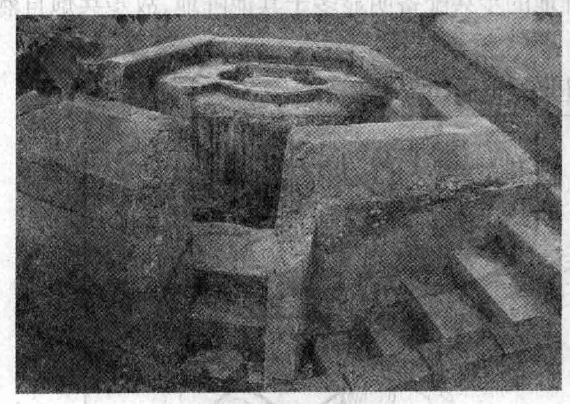
重机枪工事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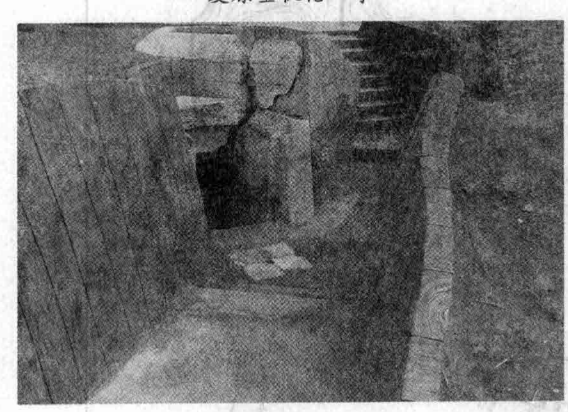
重机枪工事遗址


重机枪工事遗址


重机枪工事遗址


复原重机枪工事


复原重机枪工事


复原重机枪工事


重机枪工事地下掩蔽部遗址

(2)立式半地下露天机枪掩体

这种掩体一般建在由交通壕延伸出去的分支壕体内,壕宽2米。在设置机枪掩体的地段,用30厘米厚的混凝土墙做硬化处理。掩体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作机枪射击台,由壕的正面向前伸出一个边长约50厘米的等腰三角形,台面混凝土上有嵌在基座周围的细钢筋,用以系结固定雨雪、风天用的篷布或伪装网。射击台三角形的右舷在靠近底边处弯成弧形,同壕的内侧墙体相连。射击台内部胸墙高约1.5米,前后宽约2.4米,左侧弹药手位置宽约1.5米。弹药手左侧通过几级台阶可和旁边的地下3×6米掩蔽部相连通,掩蔽部可供16人住宿(在设置双层铺的情况下)。

(3)封闭式长方形机枪掩体

位于北纬49°14′15″,东经119°43′50″,海拔635米。掩体长2米,宽2.5米,距地平面高1米,钢混结构,墙体厚30厘米,正面中央开一个距地面30厘米的宽30厘米、高20厘米的射击口。掩体后部系敞开式,未装门。掩体内可容纳射手和弹药手2人,系轻机枪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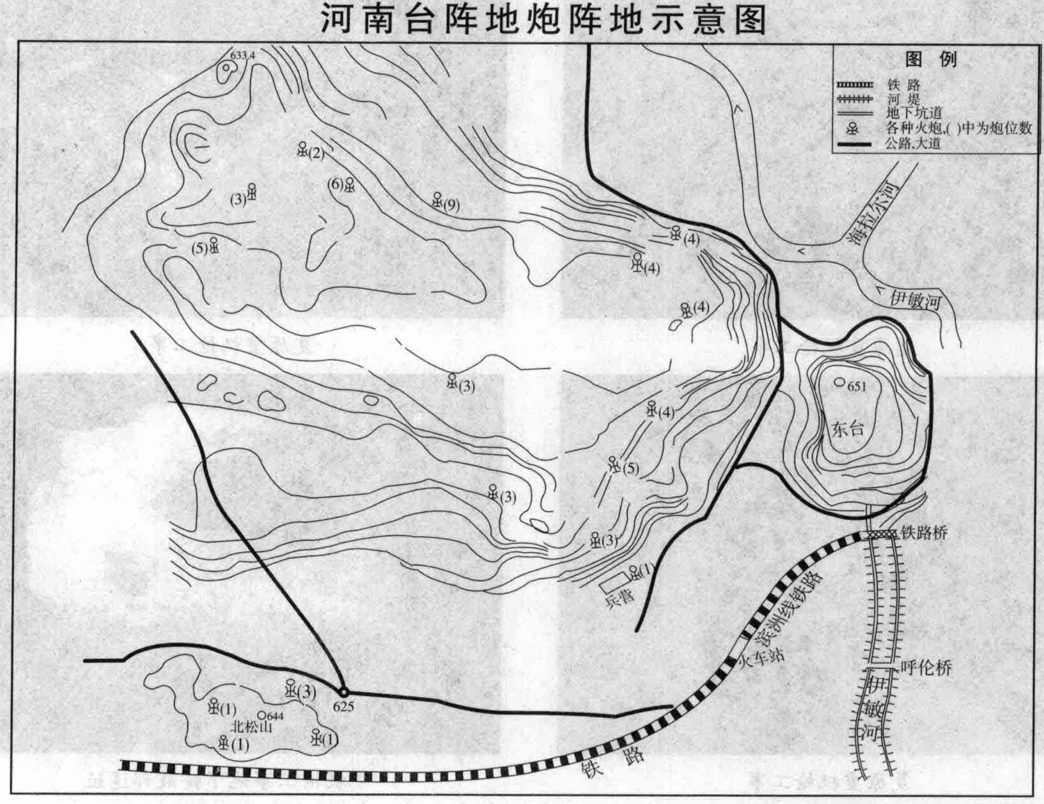
4. 火炮掩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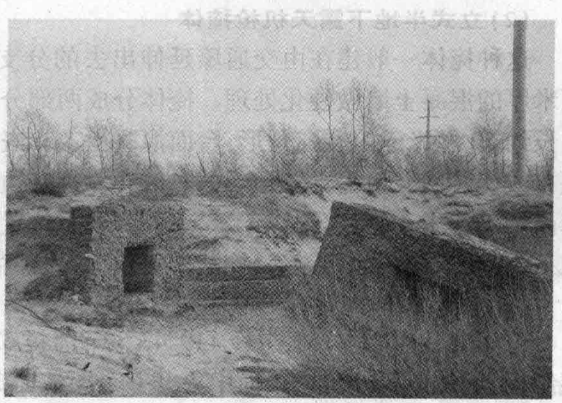
(1)八字形护墙两侧带弹药仓的阵地(A型)

这种类型的炮掩体,在河南台阵地上有两种规格,以A、B型予以区分。A型阵地位于北纬49°14′16″,东经119°43′50″,海拔637米。八字形掩体护墙长3米,高1.3米,墙体混凝土厚30厘米,两侧护墙中部各开有一个向外突出的弹药仓,其规格为60×60×100厘米,护墙后部开口宽3米,其正面开口宽1.25米,底部有一个30厘米高的弧形2阶混凝土台,是用阻挡火炮发射后炮轮跃起前窜的。与炮掩体相连的是一个由两端是通道,中间是炮库的工事。左通道长13.2米,宽1.8米;右通道长12米,宽1.8米;炮库长5.4米,宽3米。这种炮掩体,在河南台阵地发现有10多处,保留完整。

此种炮掩体配备“五七步兵炮”,口径5.7厘米,是步兵大队所属的以反坦克为主的重火器。日军每个步兵大队都配属有这样一个步兵炮小队。一般步兵炮小队配步兵炮2~4门,国境守备队则予加强配备。这种工事还可作为四一式山炮掩体,加上河南台阵地的步兵配备明显多于其他阵地,故步兵炮自然也多。

河南台阵地炮阵地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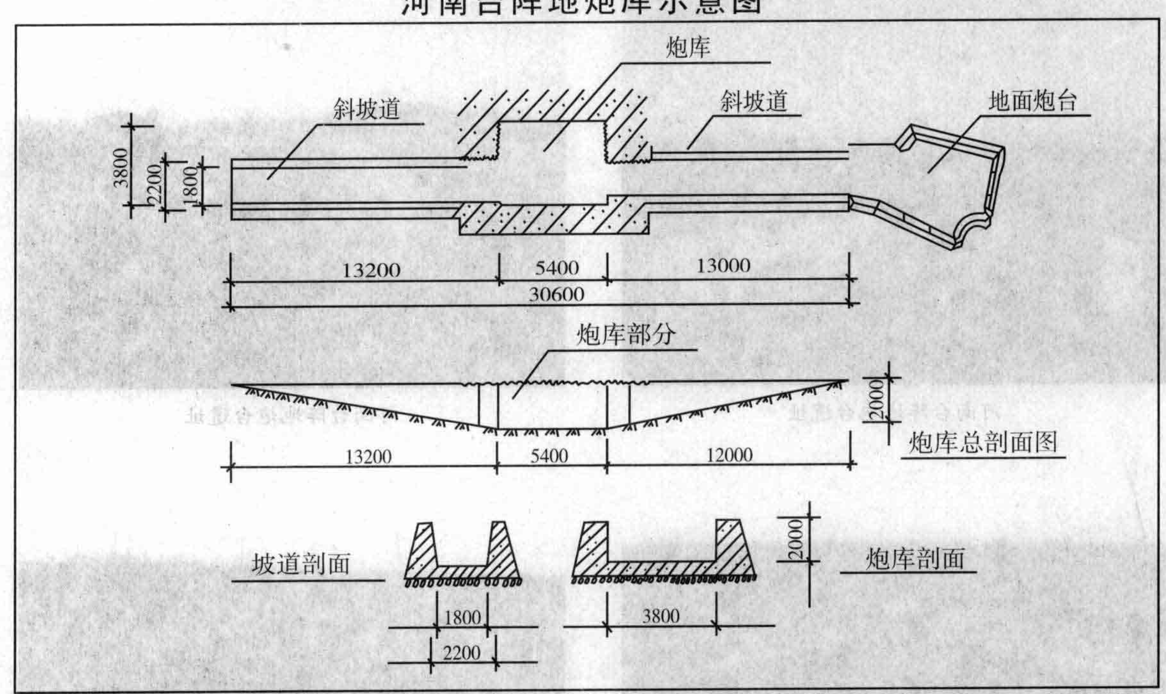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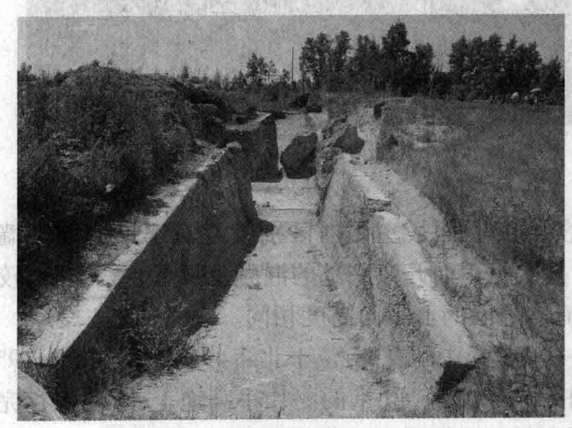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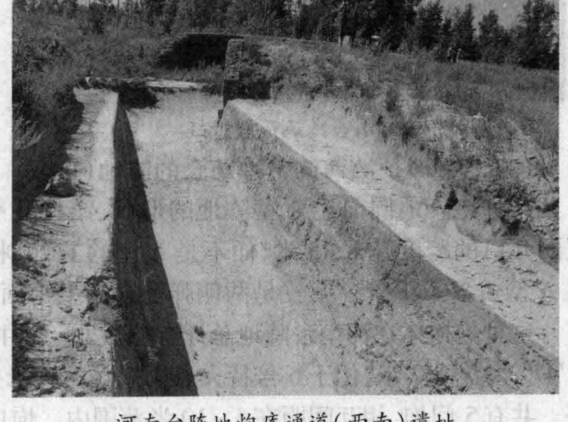


河南台阵地炮台遗址　　河南台阵地炮台遗址

河南台阵地炮库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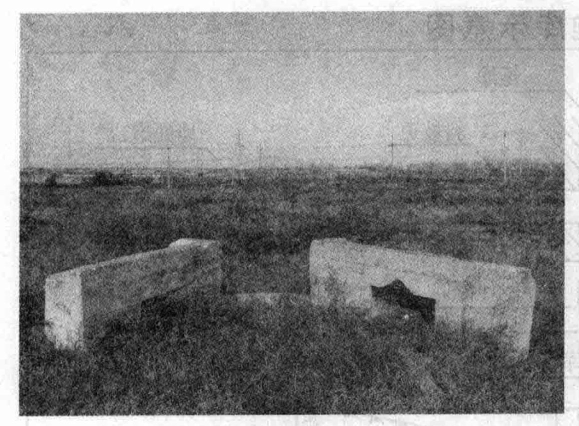



河南台阵地炮库通道(东北)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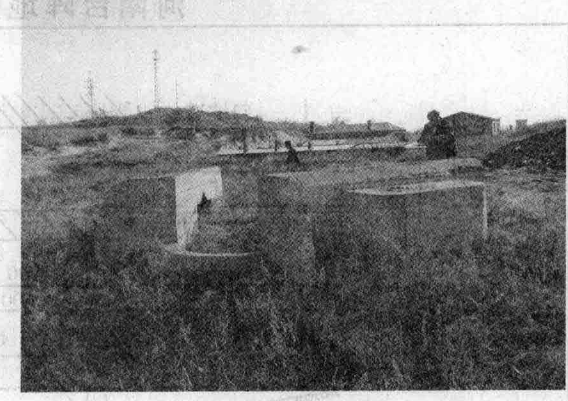

河南台阵地炮库通道(西南)遗址


河南台阵地炮库遗址


河南台阵地炮库通气孔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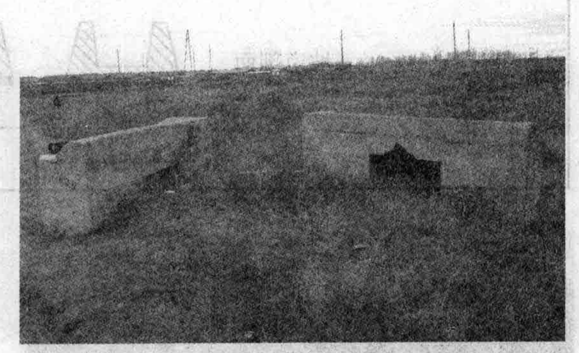
河南台阵地炮台遗址



河南台阵地炮台遗址



河南台阵地炮台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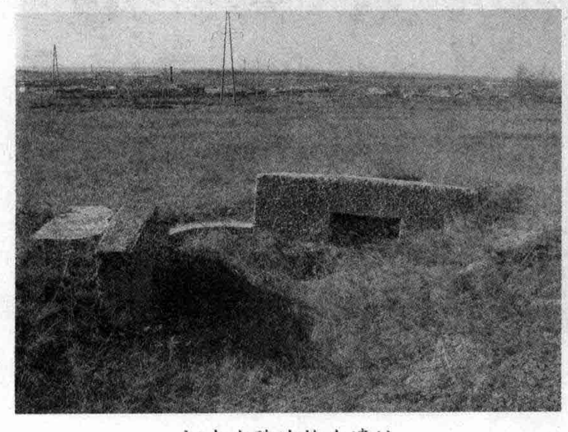


河南台阵地炮台遗址

(2)八字形护墙两侧带弹药仓的阵地(B 型)

这种炮阵地同前述 A 型阵地的形状、结构几乎完全相同,而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八字形掩体护墙正面开口的跨度是 1.45 米,而不是 A 型的 1.25 米。其次是正面开口底部的混凝土弧形台是 3 阶,较之 A 型也多了 1 阶。第三是两侧弹药仓的上平面与掩体护墙的上平面高度相同。

这种炮掩体在河南台阵地总计有七八处。其中有一处是集中配置的,位于北纬 49°14′38″,东经 119°43′47″,海拔 652 米,位于 6 号特火点以东约 500 米处东西长约 35~40 米的一片小高地上,阵地保存完好。共有 5 门炮,相互间距在 5~10 米范围内。炮口指向是 1 门朝西北,两门朝正西,1 门朝西南,1 门朝东南。此炮阵地通过一条约 30 米长的弯曲通道连接着东部的一条交通壕,交通壕内设有 1 个约 5×6 米的钢混结构战地地下厨房,已被炸毁。有一个口径为 20×30 厘米的炉灶烟囱伸出地表。



河南台阵地炮台遗址



河南台阵地炮台遗址



河南台阵地炮台遗址



河南台阵地炮台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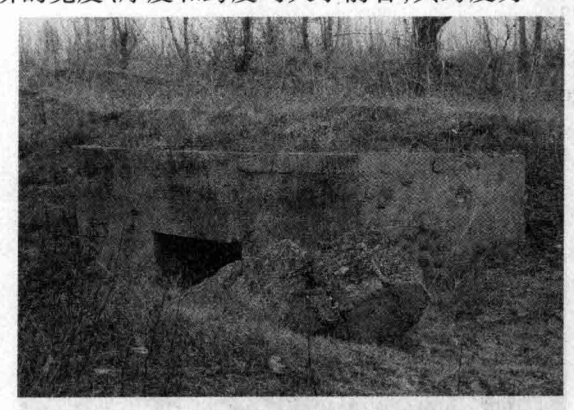
河南台阵地炮台遗址



河南台阵地炮台掩蔽部遗址

(3)单侧设带有弹药仓护墙的掩体

位于北纬19°14′95″,东经119°42′46″,地处河南台主阵地3号特火点的东北部,这种掩体大致类似于上述八字形掩体,其不同处一是掩体护墙只设在一侧,另侧无护墙;二是护墙的高度稍低,只有1.10~1.15米;三是护墙的混凝土厚度达40厘米,稍厚于前者;四是炮阵地正面底部弧形混凝土台阶的宽度、厚度和跨度均大于前者,其跨度为1.5米。这种炮掩体在河南台阵地上有4处。



河南台阵地炮台遗址



河南台阵地炮台遗址

(4)两侧设有方形弹药仓的圆形土筑炮掩体

在河南台阵地共发现3群12个此类掩体,其中有2群9个是完全在地面挖掘而成的土筑掩体。其结构是在地表面挖成一个深约1米的圆形平底土坑,直径约6米,土坑周围堆有1~1.5米高的封土堆,形成一道上窄下宽的圆形土围墙,围墙底部宽约1.5米。在圆坑两侧对应各挖有1个向土坑外侧突出的做弹药仓用的方形土坑,其规格是高2米、宽2.5米,向外伸出约3米。炮阵地唯一硬化部分是在圆坑的后底部筑有一条跨度为4米、宽30厘米,离地表高约10厘米的弧形混凝土带,应是用

于稳定火炮驻脚的。各炮位的相互间隔约在 15 ~ 20 米。

这种炮掩体在河南台主阵地的东北角共有 6 个炮位,其坐标是:

①北纬 49°14′78″,东经 119°42′91″,海拔 661 米;

②北纬 49°14′78″,东经 119°42′91″,海拔 658 米;

③北纬 49°14′78″,东经 119°42′89″,海拔 662 米;

④北纬 49°14′78″,东经 119°42′78″,海拔 666 米;

⑤北纬 49°14′81″,东经 119°42′84″,海拔 667 米;

⑥北纬 49°14′82″,东经 119°42′84″,海拔 666 米。

另一处这种炮掩体在河南台辅助阵地北松山东北部,共设 3 个炮位,各炮位间隔约 15 米。其中心炮位位于北纬 49°13′46″,东经 119°41′91″。



河南台阵地土筑炮掩体遗址



河南台阵地土筑炮掩体遗址

5. 两侧带混凝土弹药仓的土筑炮掩体

这种掩体在形制、结构等方面和前述(4)的完全土筑掩体基本相同,主要区别一是平底圆坑两侧的方形弹药仓是用混凝土浇筑而成。二是弹药仓的规格略小于完全土筑者。混凝土墙体厚 20 厘米,弹药仓向坑外突出约 2 米,内部净高 1.5 米,净宽 2.2 米。三是火炮底座的平底土圆坑直径大,长度达 8.5 米。位于河南台主阵地的东南部,共设 3 个炮位,其坐标是:

①北纬 49°14′19″,东经 119°43′48″,火力指向 313°;

②北纬 49°14′19″,东经 119°43′48″,火力指向 282°;

③北纬 49°14′48″,东经 119°43′48″,火力指向 289°。





河南台阵地土筑炮掩体遗址　　河南台阵地土筑炮掩体遗址

(6) 环状台基式圆井形炮掩体

在河南台主阵地的东部从西到东共 4 处,每个阵地有 4 个炮位,共计 16 个炮位。

这种圆井炮掩体,从井口地平面到井底深约 5.5 米,井口的外径与井底的内径均为 6 米。依据其构

成特点，将全井分解为上、中、下3部分：上部是3个不同直径、不同宽度和不同厚度的混凝土圆圈套叠成的环状台基，最上边一圈宽60厘米、厚50厘米，混凝土圈的内径为4.80米。中部第二圈的内径是3.60米，下部第三圈的内径是3.40米。这些不同高度和宽度的三层台阶构成了阵地上层的环状台基，从第三级台阶到井口平面的总高度约1.70米、井的中部壁厚约40厘米、高度为1.80米的正圆形井筒。它上接上部的第二层混凝土环状台阶，基底则固定在下部一个酷似倒扣在地面的钵形混凝土底座上，底座内部净高2.00米，内径6.00米。倒扣的钵形底座一侧有一个出入口，连通一段长13～15米的混凝土结构地下通道，通道宽2.00米，高1.80米。由地下通道洞口出去即可就近进入浅层地下掩蔽部。

上述4个圆井形炮阵地的具体位置是：

第一群在今铁路战备办西墙外约250米处，共4个炮位，分别位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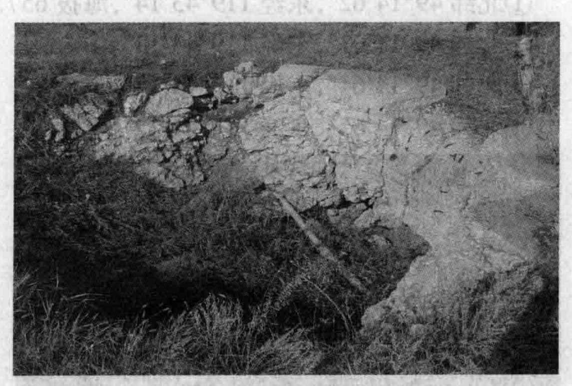
①北纬49°14′72″，东经119°44′81″，海拔655.6米。

②北纬49°14′73″，东经119°44′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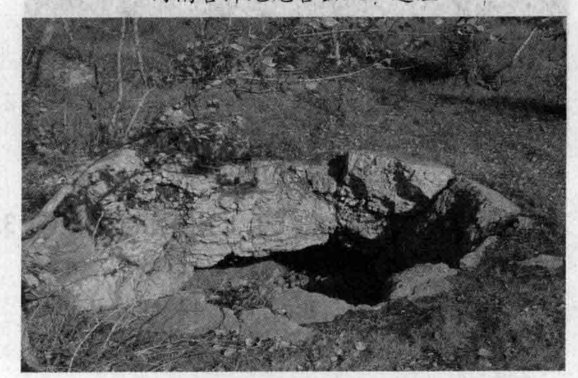
③北纬49°14′75″，东经119°43′80″。

④北纬49°14′76″，东经119°43′78″。


河南台阵地炮台出入口遗址


河南台阵地炮台出入口遗址


河南台阵地炮台出入口遗址


河南台阵地炮台出入口遗址


河南台阵地炮台出入口遗址


河南台阵地炮台遗址


河南台阵地炮台入口遗址


河南台阵地炮台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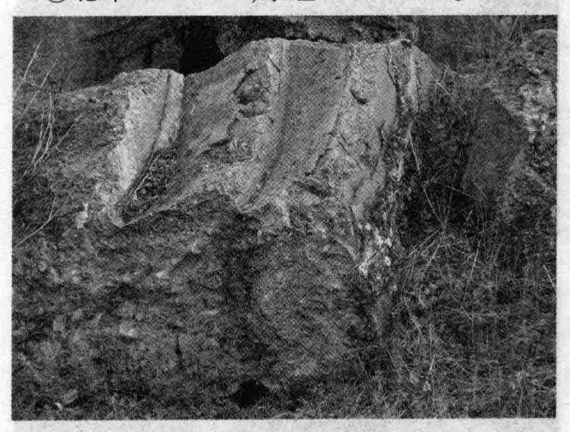
第二群的 4 个炮位，位于今铁路战备办东墙外约 30 米处。

①北纬 49°14′62″，东经 119°43′14″，海拔 657.9 米。

②北纬 49°14′63″，东经 119°43′13″。

③北纬 49°14′64″，东经 119°44′14″。

④北纬 49°14′65″，东经 119°44′12″。


河南台阵地炮台遗址


河南台阵地炮台遗址

第三群的 4 个炮位，位于上述第二群以南约 350 米处。

①北纬 49°11′52″，东经 119°42′98″。

②北纬 49°11′51″，东经 119°42′94″。

③北纬 49°11′47″，东经 119°43′95″。

④北纬 49°11′45″，东经 119°43′95″。

第四群的 4 个炮位，在上述第三群西南约 400 米处，未测定具体坐标。

上述各炮群每个炮位的相互间距均在 18～25 米，炮位同附近的掩蔽部通过地道相连。

5. 掩蔽部

在河南台阵地共有各种不同规模的地下掩蔽部近 30 余个（不含各特火点工事群内的），凡有炮阵地和各种碉堡的地方，其附近均建有钢混结构掩蔽部。大碉堡本身单独拥有 1 个面积较大的掩蔽部，而相互邻近的小碉堡也有 2～3 个碉堡共用一个掩蔽部的。大型掩蔽部为 6×20 米以上的，一般设有两个进出口，混凝土壁厚 40 厘米，而面积为二三十平方米的小型掩蔽部一般只设一个进出口。掩蔽部的内部净高 2 米左右。

河南台阵地掩蔽部遗址

河南台阵地掩蔽部遗址

河南台阵地掩蔽部遗址

河南台阵地掩蔽部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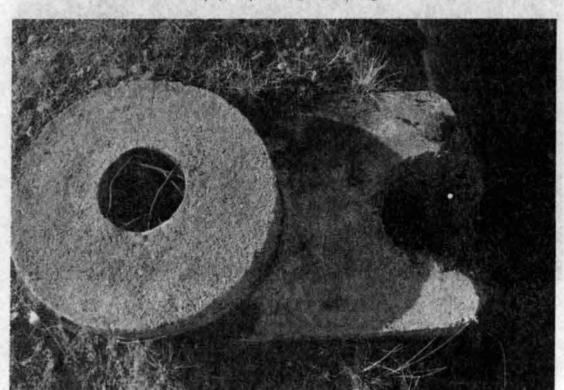
河南台阵地掩蔽部遗址



河南台阵地掩蔽部遗址



河南台阵地掩蔽部顶盖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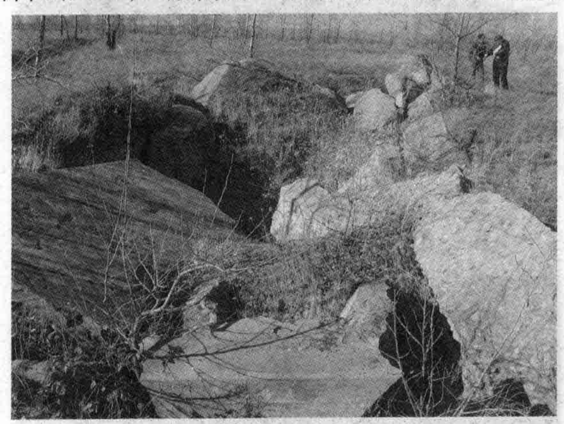
河南台阵地掩蔽部通气孔遗址

6. 观察点、指挥所

河南台阵地观察点、指挥所共有7处,连同地下工事的竖井3处,总计约10处。

地下工事的竖井属于观察点,其内部从下到上都有嵌在混凝土墙体内的爬梯(旅团司令部竖井安装的有可能是电力操纵的)或升降把手。

其他地面工事中的观察点、指挥所,通常是在浅层地下工事后部中央或一角开有1个方形或圆形升降出入口,一般高约3米左右,升降口内壁上嵌有爬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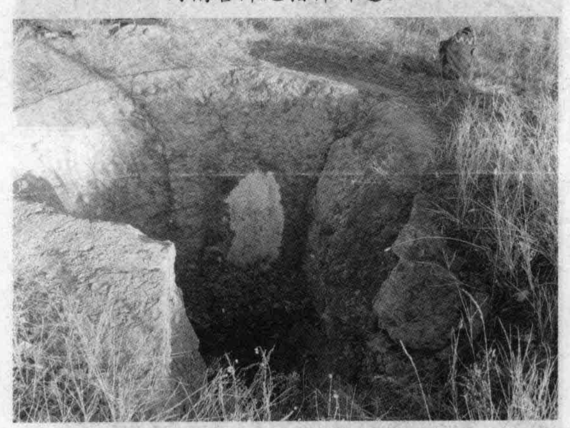
河南台阵地指挥所遗址



河南台阵地指挥所遗址



河南台阵地观察竖井遗址



河南台阵地观察竖井遗址



河南台阵地观察竖井遗址



河南台阵地指挥所遗址

7. 反坦克壕

河南台阵地除东北、东、东南部分陡崖地带外,都设有反坦克壕。

在阵地中部、西北和西南设有内壕,在南、西南、西、西北部设有外壕,壕宽5米,深3米。



河南台阵地反坦克外壕遗址



河南台阵地反坦克内壕遗址



河南台阵地反坦克内壕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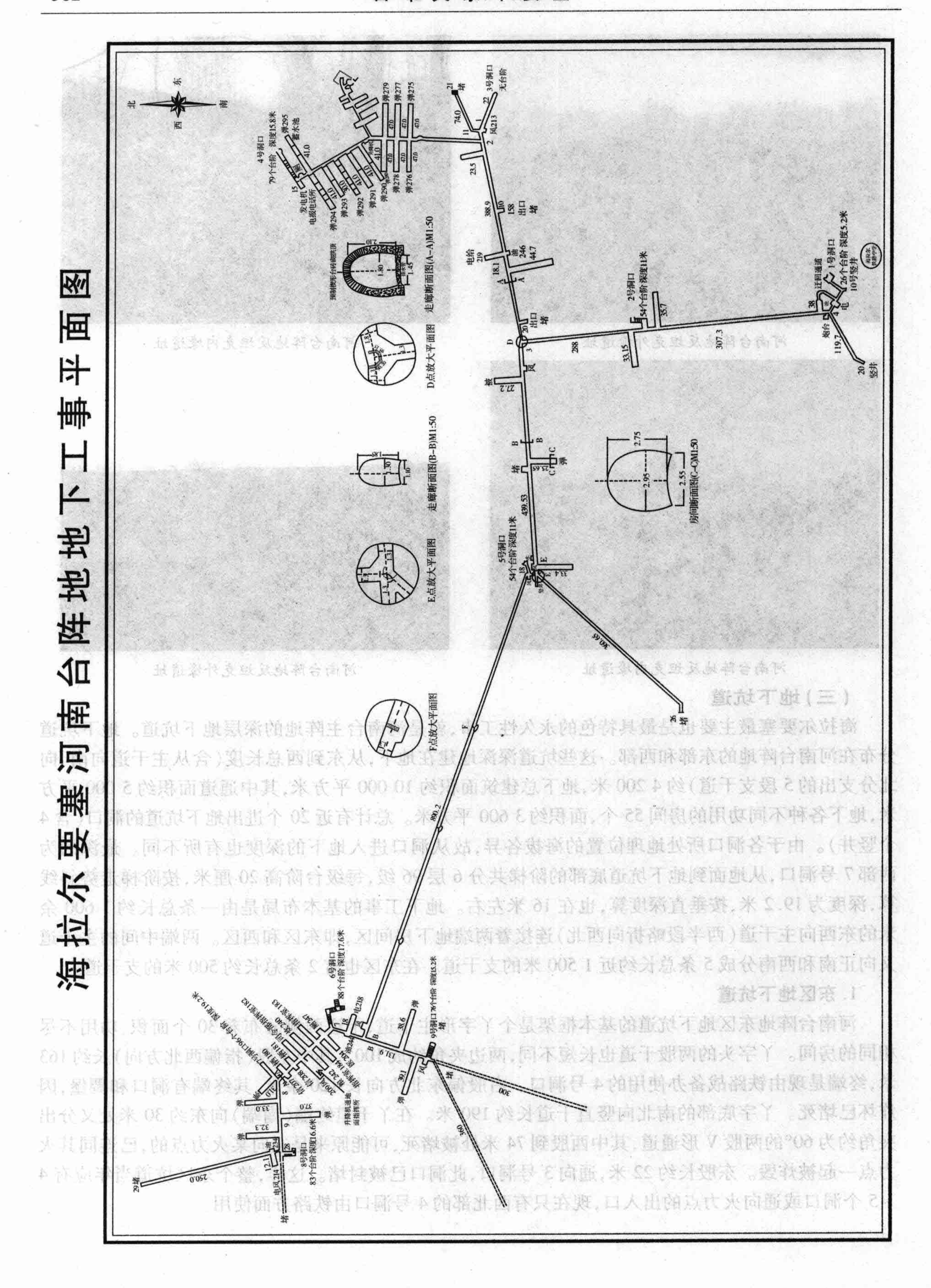
河南台阵地反坦克外壕遗址

(三)地下坑道

海拉尔要塞最主要也是最具特色的永久性工事,就是河南台主阵地的深层地下坑道。地下坑道分布在河南台阵地的东部和西部。这些坑道深深地建在地下,从东到西总长度(含从主干道向南、向北分支出的5段支干道)约4 200米,地下总建筑面积约10 000平方米,其中通道面积约5 000平方米,地下各种不同功用的房间55个,面积约3 600平方米。总计有近20个进出地下坑道的洞口(含4个竖井)。由于各洞口所处地理位置的海拔各异,故从洞口进入地下的深度也有所不同。最深的为西部7号洞口,从地面到地下坑道底部的阶梯共分6层96级,每级台阶高20厘米,按阶梯走势斜线算,深度为19.2米,按垂直深度算,也在16米左右。地下工事的基本布局是由一条总长约1 600余米的东西向主干道(西半段略折向西北)连接着两端地下房间区,即东区和西区。两端中间的主干道又向正南和西南分成5条总长约近1 500米的支干道。在东区也有2条总长约500米的支干道。

1. 东区地下坑道

河南台阵地东区地下坑道的基本框架是个丫字形主干道,干道两侧分布着30个面积、功用不尽相同的房间。丫字头的两股干道也长短不同,两边夹角约成100°,其中左股(指偏西北方向)长约163米,终端是现由铁路战备办使用的4号洞口。右股偏东北方向长120余米,其终端有洞口和碉堡,因炸坏已堵死。丫字底部的南北向竖直干道长约190米。在丫干道终端(南端)向东约30米处又分出夹角约为60°的两股V形通道,其中西股到74米处被堵死,可能原来是通向某火力点的,已连同其火力点一起被炸毁。东股长约22米,通向3号洞口,此洞口已被封堵。这样,整个东区坑道当年应有4~5个洞口或通向火力点的出入口,现在只有西北部的4号洞口由铁路方面使用。


海拉尔要塞河南台阵地地下工事平面图
北
东
南
西
走廊断面图(A—A)M1:50
D点放大平面图
走廊断面图(B—B)M1:50
E点放大平面图
房间断面图(C—C)M1:50
F点放大平面图
1号洞口
2号洞口
3号洞口
4号洞口
5号洞口
6号洞口
8号洞口
9号洞口
10号竖井
出口
电
弹

在上述东区30个房间(其中有6个大房间内部又分别被分割成2个、3个甚至5~6个小套间,这是海拉尔铁路分局在战备期间利用些大房间间壁的,故这类房间均按1个房间算)中,有13个房间的门上部墙面尚清晰地留有当年日军在字模上用黑漆涂写的弹药库标记,如弹247、弹248、弹275、弹294等,而且多数都是大房间,有5个是长40米以上、宽2.6米以上、面积约520平方米;有5个是长38米以上、宽2.6米以上、面积约494平方米。其余的一般为15平方米左右。最小的"发电室"房间是长2.50米、宽2.80米、面积为7平方米。东区的其他功用房间多为小房间。从当年日军在房门上部标明的字迹看,有电251、242、243、252计4间。"电给"219、"电风"340、风213、油246、炊244等。主干道内进口附近折角处共设有3个单个面积不足2平方米的阻击掩体。从总体上看,东区的房间中,除承担服务功能的少数小面积房间外,其余主要是弹药库,还有少部分粮食、服装等仓库。东区是个弹药物品储存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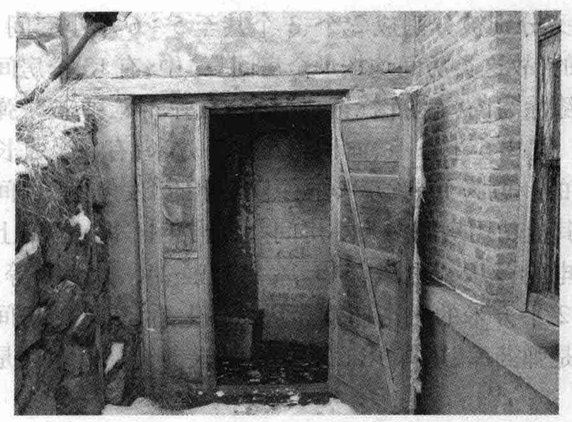
海拉尔要塞河南台阵地地下工事东部区房间情况表

编号	功用	面积(米)			编号	功用	面积(米)		
		长	宽	高			长	宽	高
	发电室	8.80	2.70	2.70	244	炊事房	10.5	2.60	2.80
	厕所	4.40	1.78	2.15	243	发电室	8.15	3.00	2.60
	通风室	3.36	2.70	2.90	280	弹药库	44.8	2.65	2.80
295	弹药库	39.8	2.94	2.75	279	弹药库	13.65	2.60	2.75
294	弹药库	38.6	2.60	2.75	278	弹药库	45.2	2.65	2.75
293	弹药库	32.5	2.60	2.75	277	弹药库	38.6	2.65	2.68
292	弹药库	38.6	2.60	2.77	276	弹药库	44.7	2.60	2.72
291	弹药库	38.6	2.60	2.75	275	弹药库	40.6	2.65	2.75
290	弹药库	31.1	2.60	2.75	213	通风室	3.45	2.72	2.75
245	弹药库	22.8	2.60	2.72	219	发电室	15.0	2.60	2.80
246	油料库	3.0	2.92	2.65		弹药库	41.84	2.66	2.82
	弹药库	35.7	2.60	2.82		仓库	33.15	2.60	2.82
	仓库	33.21	2.60	2.20		发电室	2.50	2.80	2.72
	被服仓库	22.2	2.60	2.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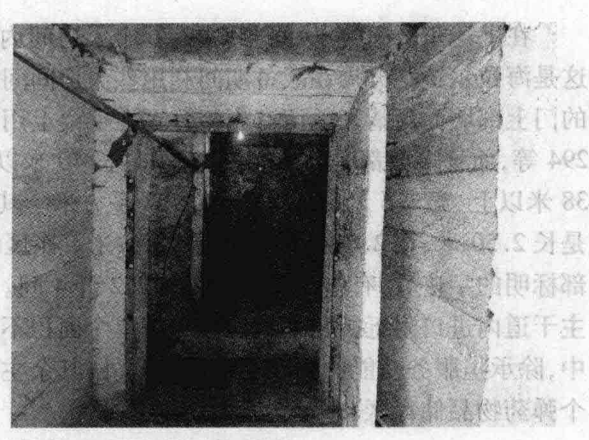
这个由丫字形主干道两侧房间形成的弹药库的洞口、主干道、各类功用不同的典型房间等内部结构大致如下:

(1)4号洞口

位于北纬49°14′45″,东经119°44′08″,海拔661米,洞口航向245°。从外部通过总长约90米,略有曲折水平前进的4段引壕后到达下部建有4段79级台阶的地下坑道。4道引壕共装设4个门,头道门高1.90米,宽1.27米;二道门高1.80米,宽1.18米;三道门高1.80米,宽1.18米;四道门高1.80米,宽1.18米。沿阶梯下行的洞口,从上到下设有3道门:第一道门高1.87米,宽1.36米,进门后向下有38级台阶,每级台阶宽30厘米,高20厘米;台阶通道宽1.52米。沿向下前进方向,在通道左侧距地面80厘米高处装有一条钢管扶栏。在头段台阶的终端有一个长度1.10米的平台,经此平台进入第二道门,门高1.58米,宽0.70米。向下是第2段台阶,共39级,其末端是一段长1.34米的第2个平台。由此进入洞口第3道门,门高1.60米,宽0.70米。再由此前行便进入丫形地下主干道的西北股通道头道门外的前厅。该厅长18.7米,宽2.93米。其西北角距北墙66厘米、南墙45厘米处有1口长和宽各38厘米、深30厘米的积水池,距此池南部约10米处还有1个同样规格的积水池。池底预埋有ψ15厘米的混凝土泄水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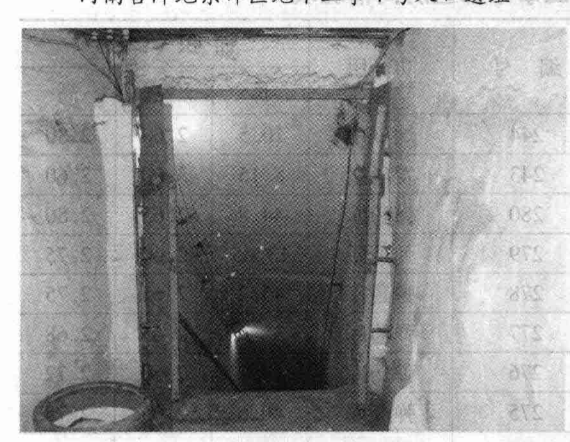


河南台阵地东部区地下工事4号入口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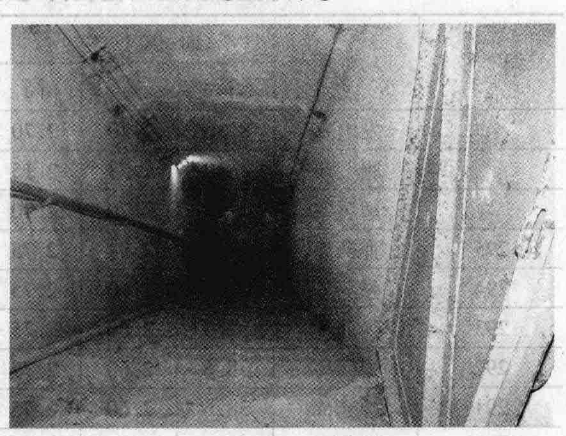


进入门内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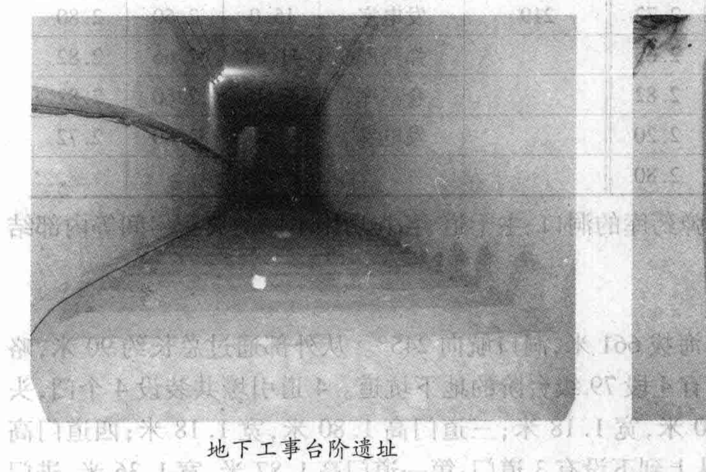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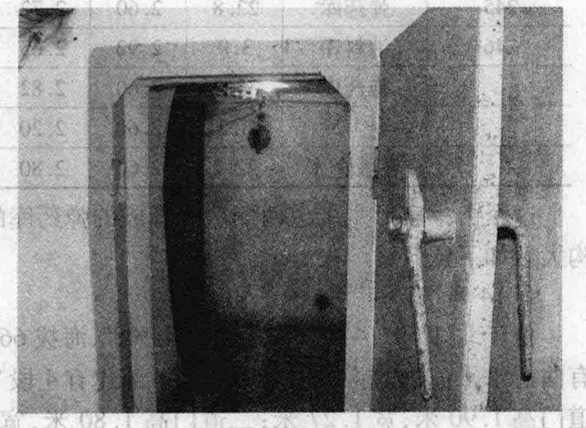
地下工事台阶平台遗址



地下工事台阶遗址



地下工事台阶遗址



地下工事铁门遗址

（2）主干道

主干道结构均呈拱形或蛋壳形，顶高2.2米，腹腔的最大跨度1.80米，基底部宽约1.70米。主干道拱形顶棚的中部，每隔约30米便装有一个照明线路的灯座。同时，在同一间隔附近的拱面上还装有ψ15~20厘米的通风口管座。在墙面距通道高18厘米处，每隔25~30厘米，在墙的两面交错对应的设有1个ψ20厘米的通风孔。走廊地面设单侧排水槽，每隔25米连接一个40×65厘米的积水槽。

主干道西北股入口的头道门高1.90米，宽0.96米。从头道门沿主干道前行到约104米处，是主干道的第二道门，高1.88米，宽0.90米。过二道门再前行约45米，是通道转折点处专设的阻击火力点，在其掩体墙的正面和东北面各设有1个正方形射击孔，距地面高78厘米，射击孔的外径为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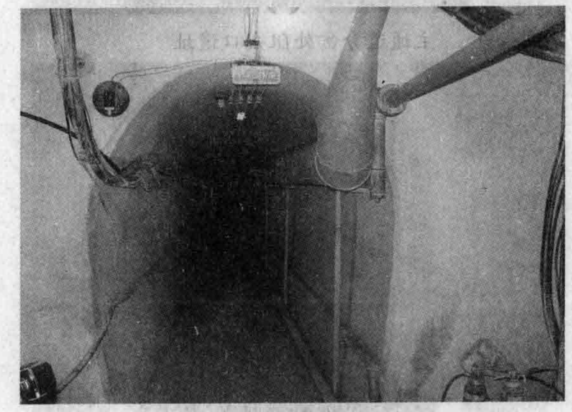
40 厘米,内径为 20 ×20 厘米。掩体平面呈五面六角形,内部净高 2 米,面积约 2.8 平方米,门高1.88 米,宽 0.80 米。

主干道丫字头东北股除长度短于西北股约 40 米外,其他状况均与西北股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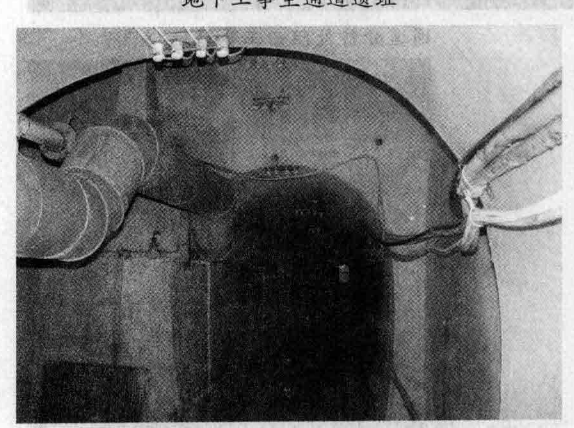
在这条西北股的主干道上,除在刚进入头道门附近处通道两侧设有同等规格即 41 ×2.6 米的对称房间外,再向前行约 120 米长区段上,则只在通道西南单侧设有 4 个弹药库(弹 291 ~294 号)。而在这些库房的通道另侧墙面的对应位置,虽也能看出房间断面的蛋壳形裂纹痕迹和房门的裂纹痕迹,且房门痕迹上方的墙体上也遗留有原日军用黑漆涂写的从“弹 296”到“弹 299”的 4 个房间号,但墙面被全部抹死,是被铁路战备办封堵。下图中的通气管道和房间内的设施或物品均为海拉尔铁路分局战备使用时所遗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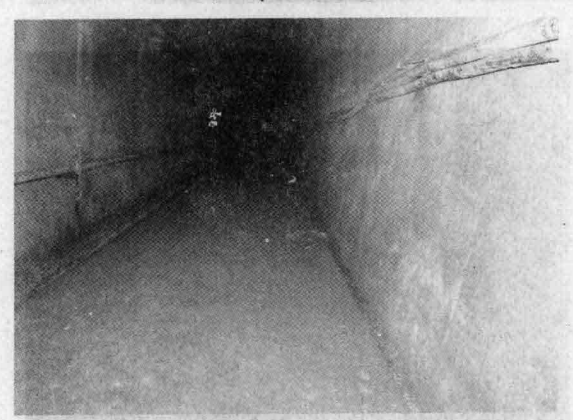
地下工事主通道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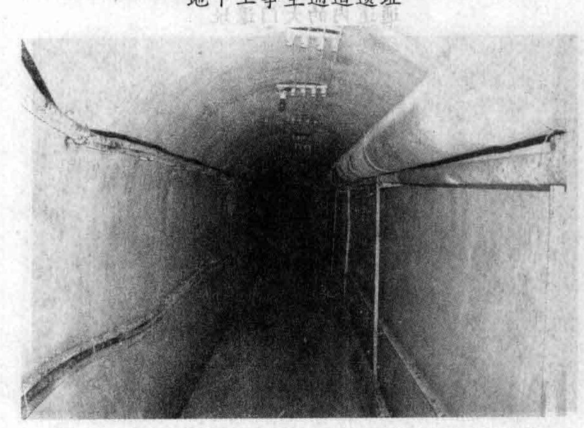
地下工事主通道遗址



地下工事主通道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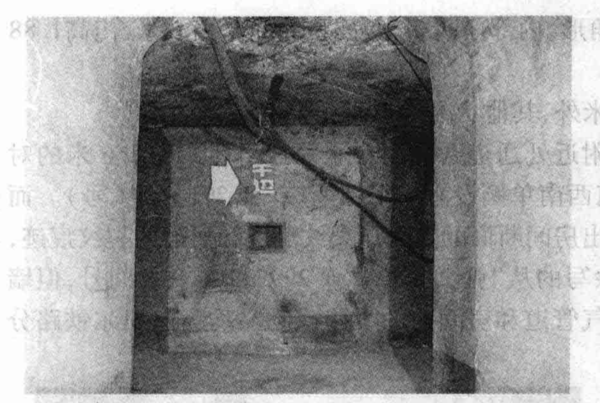
地下工事主通道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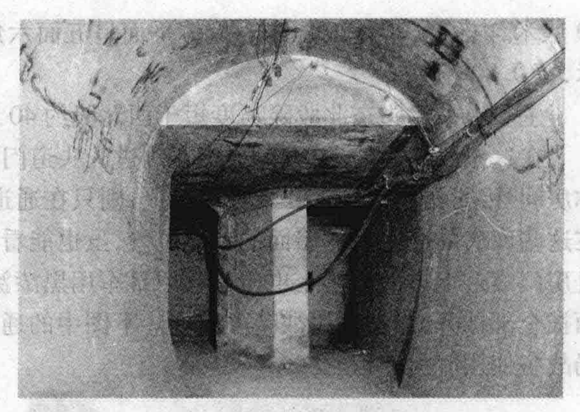
地下工事主通道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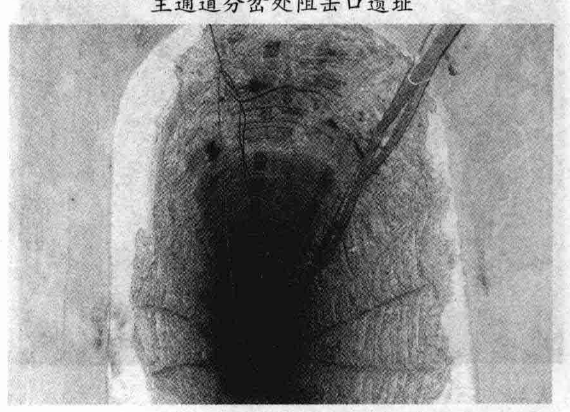
地下通道通向地面火力点的台阶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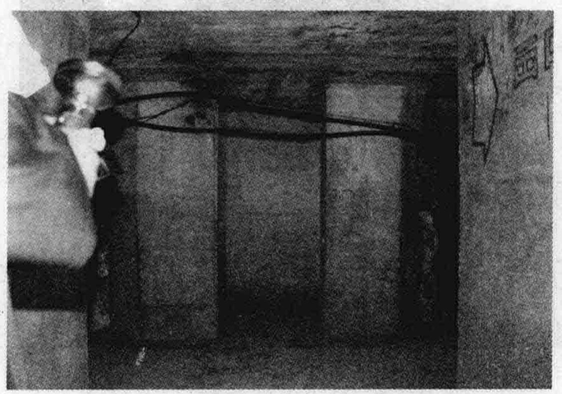
主通道分岔处阻击口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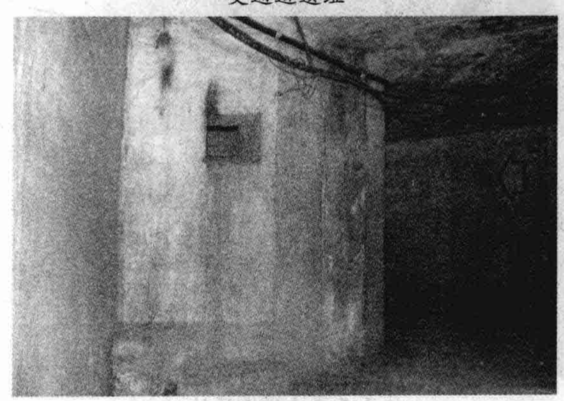
主通道分岔处遗址



支通道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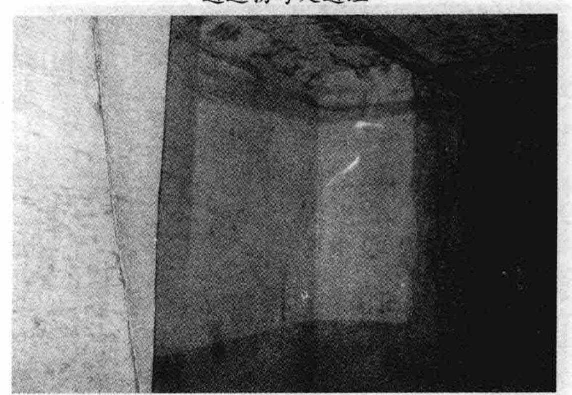
通道分岔处阻击工事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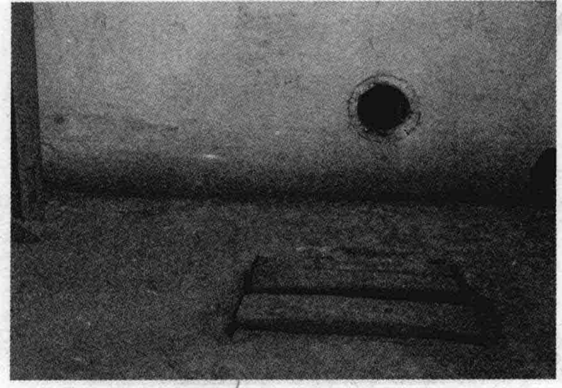
通道拐弯处遗址



通道内的大门遗址



通道内的避让处遗址



通道内的通气设施遗址(地上木板下为通气管道,墙上圆孔为开关阀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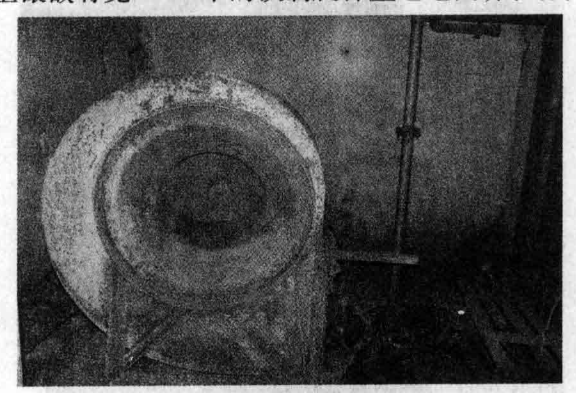
(3)房　间

①弹药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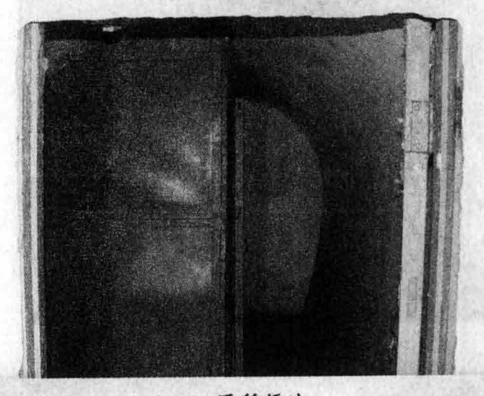
大小共15个,总面积约1 400余平方米。其中最大的规格是44.8×2.6米,共5个,总面积约520平方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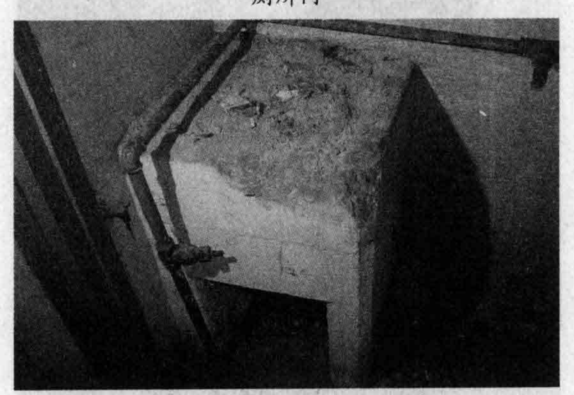
②发电室 厕所 通风观察竖井

房间位于进入主通道后的右侧,宽3.0米,长13.1米,房门位于房间的侧端。房间内共分为大小不等的3个房间。房间内地面上有2个并列的混凝土基座,规格40×60厘米,相距60厘米。第一个房间门高1.70米,宽1.20米,面积1.1×1.7米;第二个房间门高1.75米,宽1.20米,面积1.85×1.27米;第三个房间门高1.80米,宽1.27米,这个房间的屋顶上并列着圆、方不同的3个通风管道,并在房间左角处设有射击口。厕所位于进入主通道的左侧,宽1.78米,长4.40米,门高1.63米,宽0.68米,门左角处设有长0.75米,宽0.38米的洗手池1个。通风机室兼观察竖井位于主通道的左侧,房间长3.56米,宽2.70米,门高1.66米,宽1.20米。室内地面有混凝土基座,与基座相对墙壁上镶嵌有宽0.42米的铁制爬梯直通地面,同时并行安置有铁制圆形管道一根。


通风机房间


厕所门


厕所便池


厕所水泥洗手池遗址

③炊事间

原标记为“炊244”。宽1.95米,长10.5米,分成内外两个套间。外门位于偏东一侧,门高1.95米,宽1.10米,墙垛厚30厘米。在外间进门右角地面处,有1个曲尺形的沟槽,宽30厘米,深5厘米,与西墙并行,长1.40米。伸向外墙的终端连着1个60×60厘米、深70厘米的正方形深池。内套间长4米,间壁墙厚30厘米,在进门左角处的地面有1个0.40×0.40米的方池,深30厘米。

④通风室

原标记为“风213”。宽2.72米,长3.45米。房门开于房间正中,高1.80米,宽1.0米。门上部左右两侧各有1个通气孔。进门有3级台阶。台阶的两侧外墙处各有1个ψ30厘米的风扇孔。在房间纵深约2.9米处,横向并列着2个混凝土基座,规格为40×60厘米,间隔2.4米。2个基座的正中是个30×30厘米的泄水槽,深约40厘米。

2. 中区地下坑道

在河南台阵地地下坑道中，除东西两区主干道两侧分布着密集的各种不同功用的房间外，在联结东西两区的中区地下工事中，基本上是条狭长的通道。北起地下工事东区Y字形主干道东端，向西直达西区主干道，全长约1 718.63米（不包括在南388.9米处向东分出的一条长307.31米的支干道和西828.43米处又向南的一条支干道）。这条沟通东、西两区的大通道的基本结构是：

（1）宽通道

这是指通道的宽度、高度等规格与东、西两区地下主干道完全相同的通道，即蛋壳形断面腹腔的最大跨度为1.80米，内部净高1.80米，底部宽度1.45米。符合此种主干道规格的通道，从东（起点处向南简称A点）向西全长约600米，外加中途在88.9米处（以下简称B点）向南折出通向2号和1号洞口及南端10号、20号竖井的一条长为307.31米的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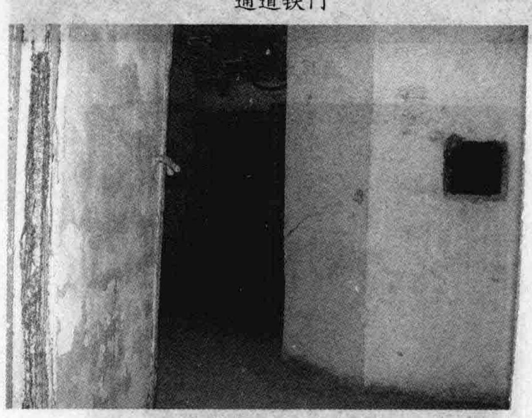


中区地下通道



通道铁门

通道分岔处阻击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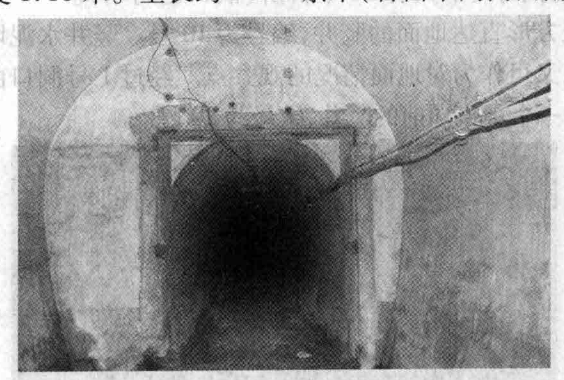
通道分岔处阻击口

中区通道

通道顶部通气孔

(2)窄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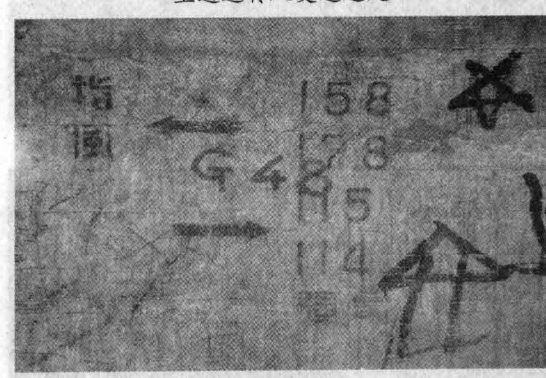
这是指通道断面腹腔跨度和底部宽度都明显小于主干道的狭窄通道。腹腔跨度 1.30 米,底部宽度 1.10 米。全长约 1 500 余米(含由中间向西南方分支出的一段长 360.65 米,以下简称 C 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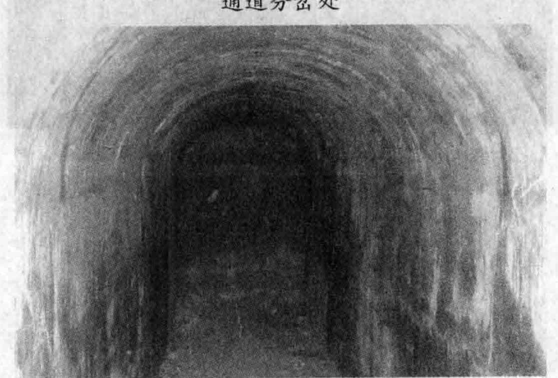
主通道转入支通道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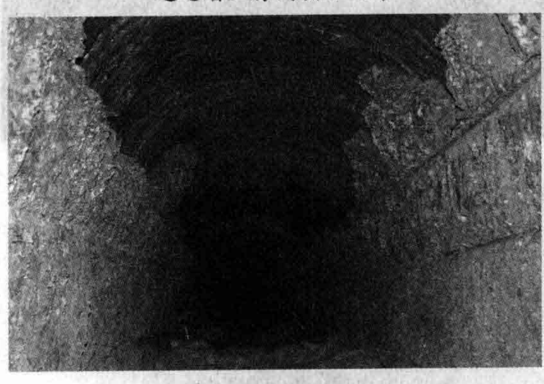
通道分岔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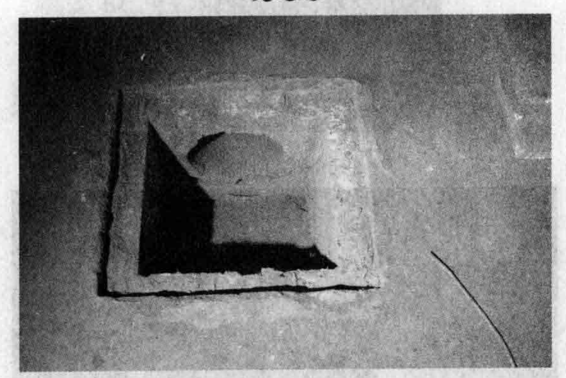
通道墙上房间指示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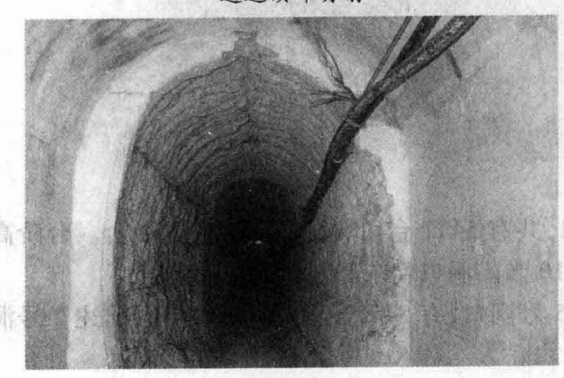
支通道



通道顶部坍塌



通道地面通气孔



支通道的钢筋被砸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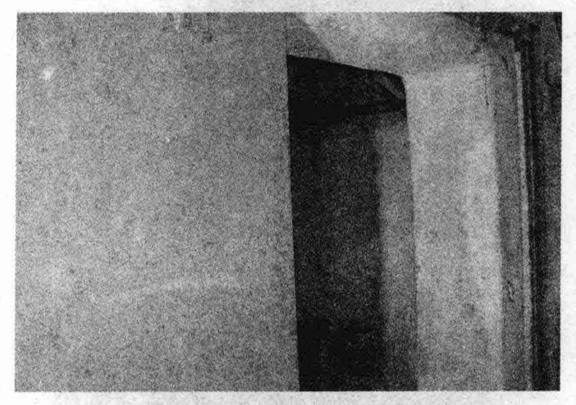


通道墙上房间标志文字

(3)洞口、竖井、出口

在这条东西大通道的沿线,共有3个编号的洞口,3个未编号的出入口,2个竖井。1号洞口位于通道A点向南分支出的307.31米通道最南端,洞口朝东,向下共有26个台阶(洞口已封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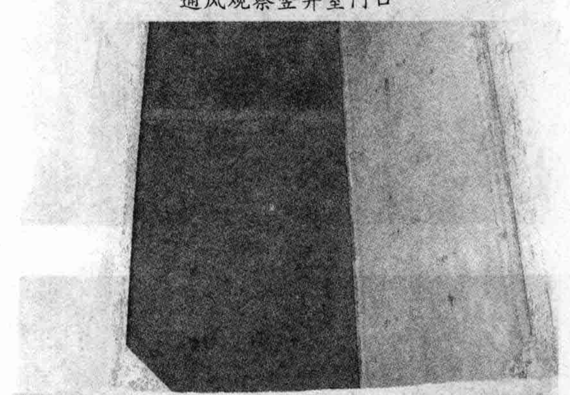
在洞口底部向南2~3米处是一个1×1.2米的长方形直达地面的竖井,编号为10号。竖井水泥墙体的一侧装有钢筋爬梯,这种竖井既可用于洞内通风,又可作为对地面情况的观察点。经过1号洞口由北转西约80余米,遇通道再折向西南119.7米处又是一个规格同前的竖井,编号为20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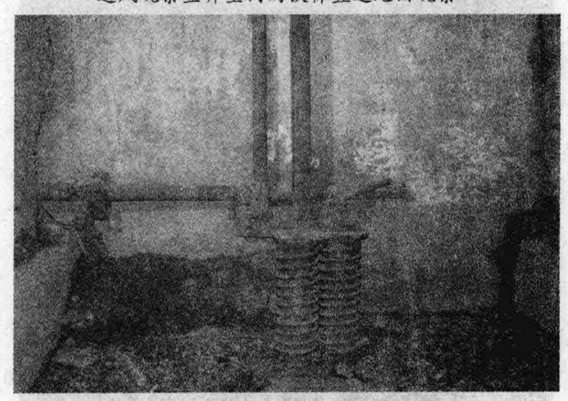
通风观察竖井室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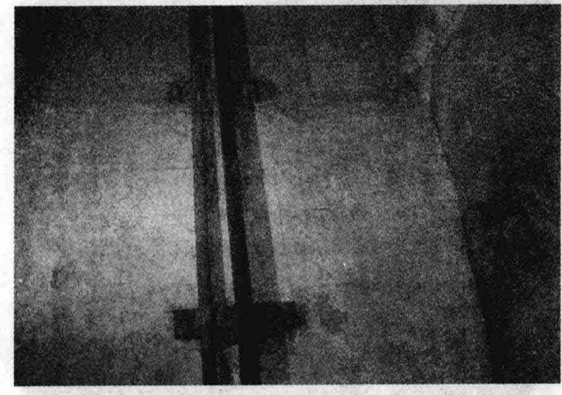
通风观察竖井室内的铁梯直通地面观察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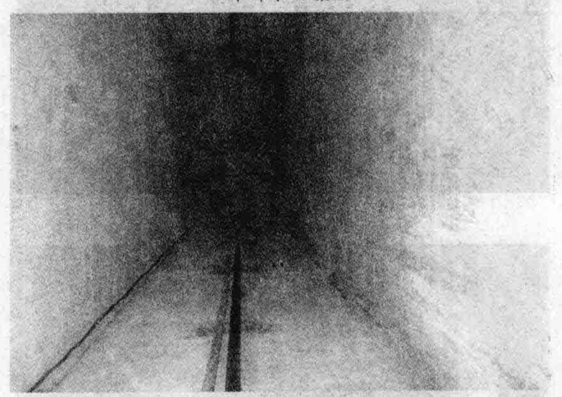
升降机门口



升降机底座



升降机铁滑道



升降机顶部

由1号洞口沿通道西行约300米处,是2号洞口,共有54个台阶,分成3段,2个平台。台阶高20厘米,宽30厘米。两段间的平台长1.52米,宽1.10米。洞口朝东。

从通道的A点到C点,即以西约1 280米处,是5号洞口,有54个台阶,洞口规格同前述2号洞口。洞口朝东,已封堵。

在大通道的A点和C点间,还有4个已被炸毁或封堵的短出口,大多是通向地面阵地火力点的,

其中最东头的1个(距A点约120米处),门口上部的墙面上还留有原日军用黑漆涂写的“158”号编码,但未标注其功用。

(4)各种房间

大通道两侧的各种大小房间,全部集中在东段即从C点到A点区段,而在由C点到终端及C点往西南岔出的支干道两个区间,总计全长1 250余米的通道两侧则未建任何房间,仅在从C点到终端的区间,每隔250～300米,在通道东侧开有一个长2米、宽1米的避让缓冲间。

东段,即通道A～C区间,共有各种不同用途的大小房间11个,由主干道的A点起,向西各主要房间的情况是:

①弹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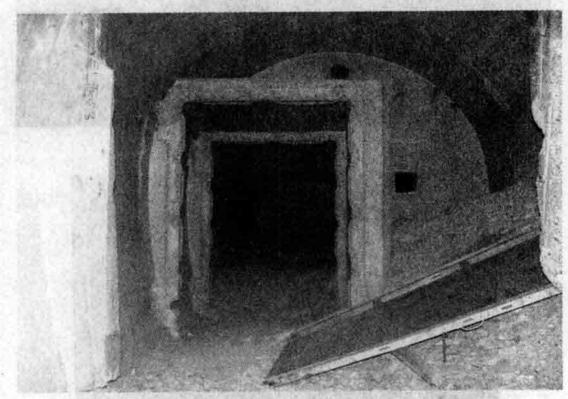
位于A点以西约25米处的通道西侧(按向西前进方向为右侧),房门上的编号为原日军遗留。弹药库全长约22.8米,共设3道门(两段门廊,一间门厅),库房净长22.8米,宽2.6米。头道门是洞库蛋壳形断面上正中部位开的,门框长方形,高1.95米,宽1.4米。墙体厚60厘米。从头道门向内到二道门前有一段宽1.4米,长4.2米,高1.95米的头道门廊。头道门廊的尽头设有第二道门,门的规格较头道门明显偏小,高1.75米,宽1.10米,全墙体却加厚到75厘米,门内连着长3.3米,宽1.10米的第2段小门廊。之后,隔着一个约2×2米的正方形门厅进入第三道门,此门高1.70米,宽1.20米,墙体厚70厘米。从门外层,在门的左上角墙体上开有1个直径15厘米的通风孔。

②电给219

位于A点沿通道西行约170米处的右侧,是个泵水房,房间全长15.0米,宽2.60米。房间共设有两道门:头道门设在洞库蛋壳形断面墙体的左侧,门套的左侧上角和下角紧贴拱形墙体。门高1.80米,宽1.40米。从头道门的内侧看,门的右上角靠近拱形墙体处有1个直径约20厘米的通风口。在拱形断面墙体的右上角相对部位也有2个沿墙体弧线并列的圆孔直径,一个直径为15厘米,另一个为20厘米。在门的左侧约60厘米,距地面高约1.30米处的墙体上开有一个长方形射击孔,其外口宽30厘米,高40厘米,长20厘米。从头道门到二道门走廊长3.80米,宽1.40米。走廊东侧靠门处是一个有宽敞进出口但未装门的小房间,内部净长3.30米,净宽1.20米,其正面是射击孔,这个小房间应该是个值班监视室和射击掩体。二道门高2.1米,宽1.40米。内间面积较大,长15米,宽2.95米。地面没有任何特殊设施,只是拱形棚顶中央有一组相互间隔约30厘米的3个装置,一个是直径20厘米的圆孔,一个是嵌在水泥棚顶的直径为30厘米的水泥套管(管壁厚10厘米),再一个是成菱形排列的嵌在顶棚上的4个螺丝杆。



门上日文标示


219发电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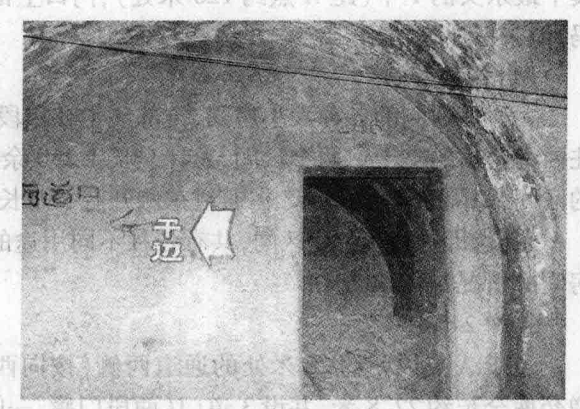
③246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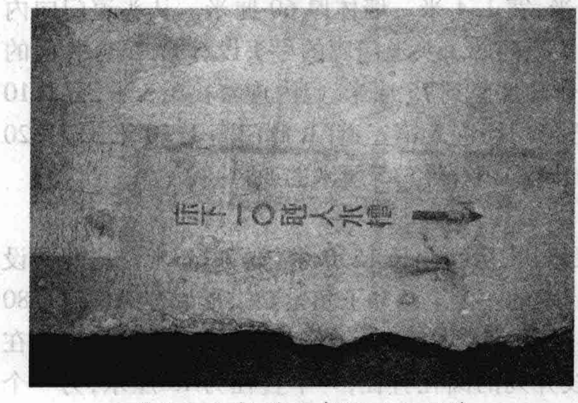
隔通道与上述“219电给”房间相对,是个小房间,是用于储存发电机用燃料柴油和其他电动机械润滑油的。房间长3.0米,宽3.0米,壁厚30厘米。一道门,门上有当年日军标注的“246油”字样。门左侧约20厘米处与门上口平齐处的墙上有日军竖写的“火气严禁”4个字。另在房间入口处标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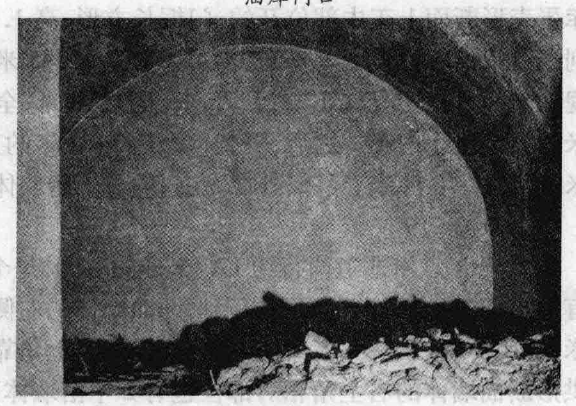
“床下一O吨入水槽”,并在槽字下面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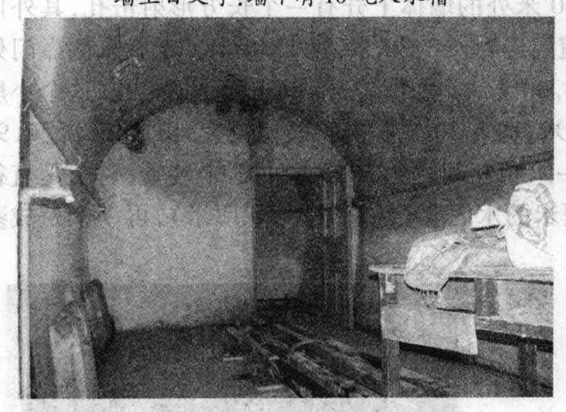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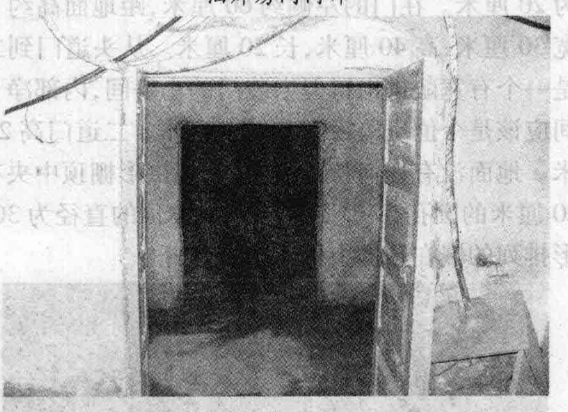
油库日文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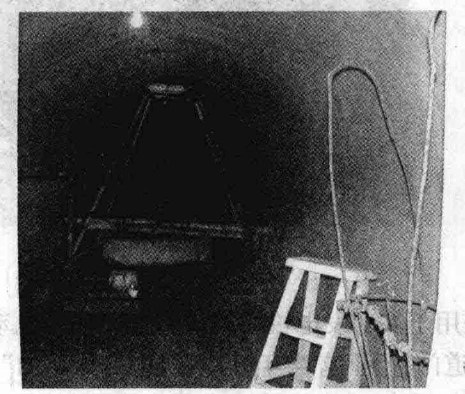

油库门口


墙上日文字:墙下有10吨入水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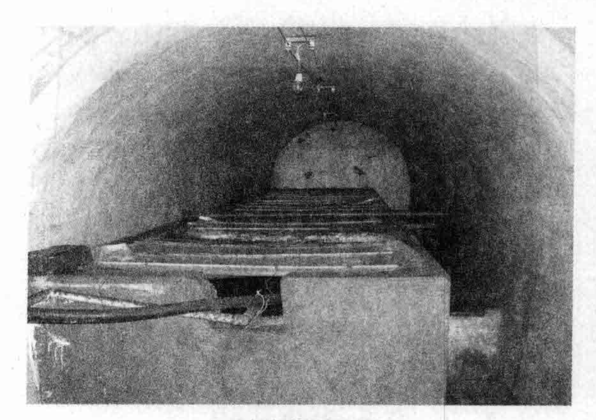

油库房间内部


发电机室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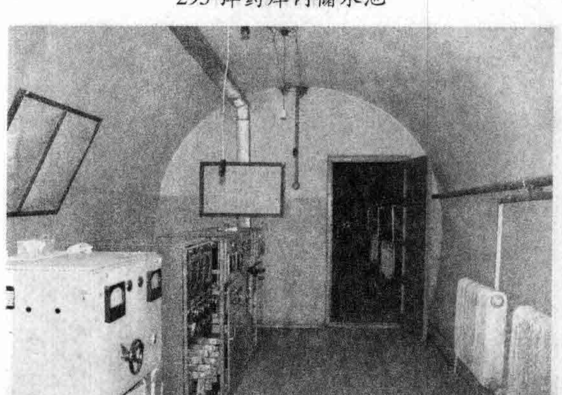

293弹药库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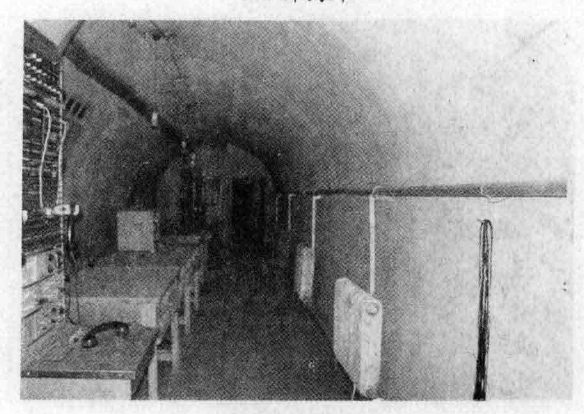

295弹药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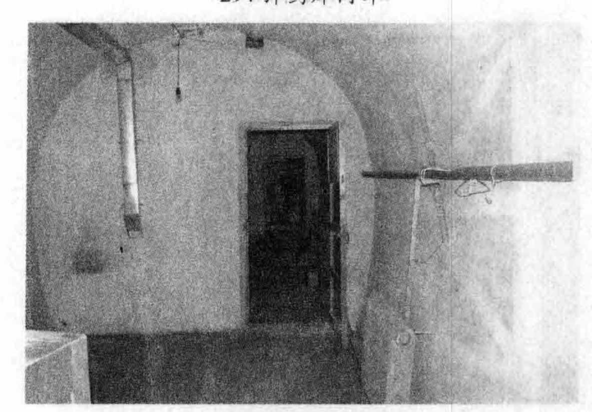

295弹药库内深水井


295 弹药库内储水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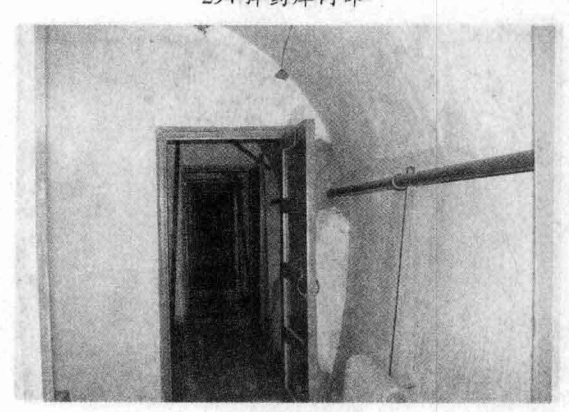

293 弹药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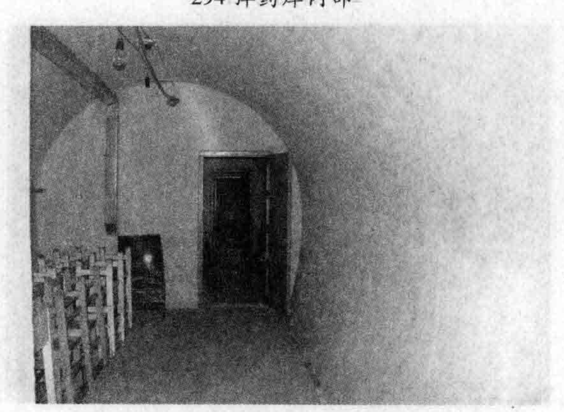

294 弹药库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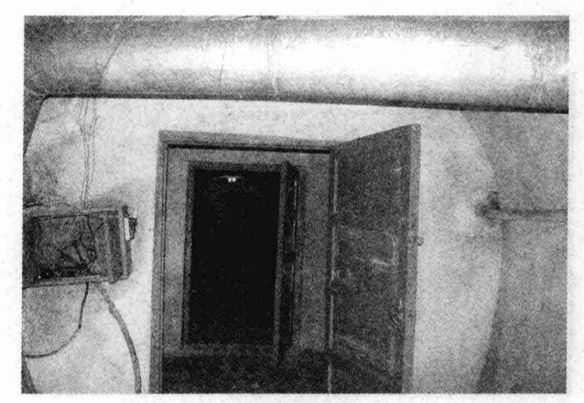

294 弹药库内部


294 弹药库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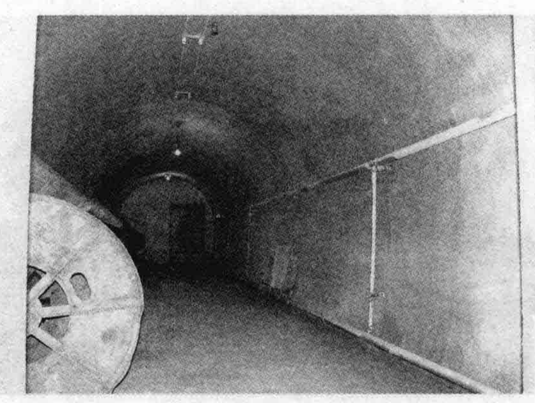

294 弹药库内部


295 弹药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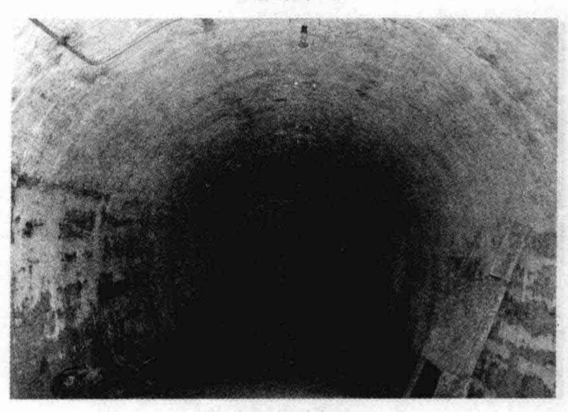

291 弹药库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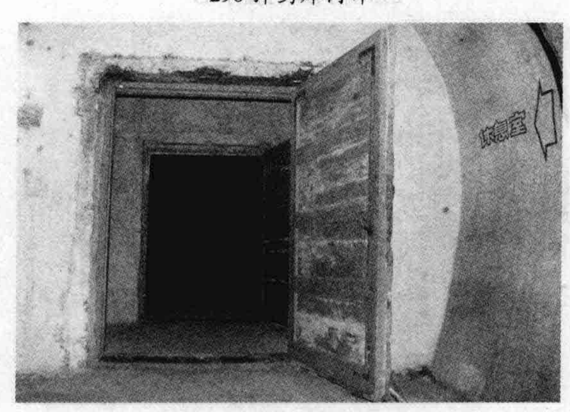
292 弹药库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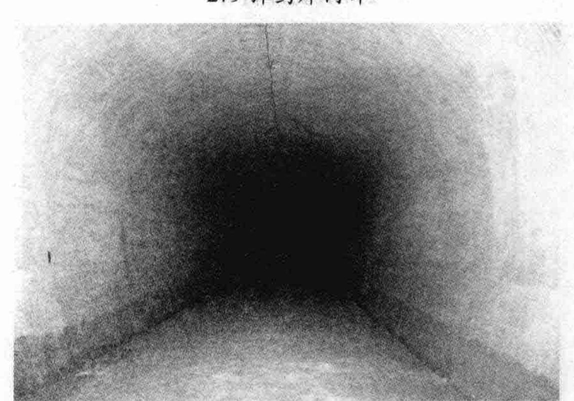
290 弹药库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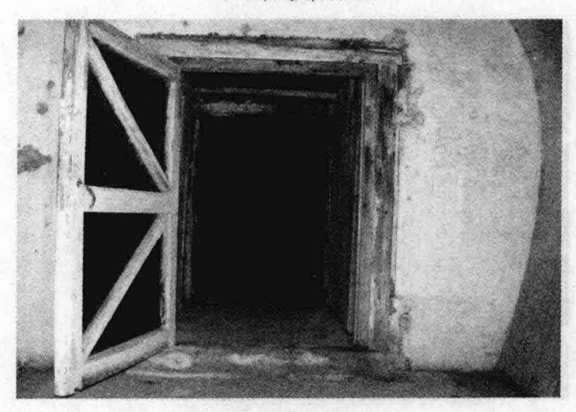
279 弹药库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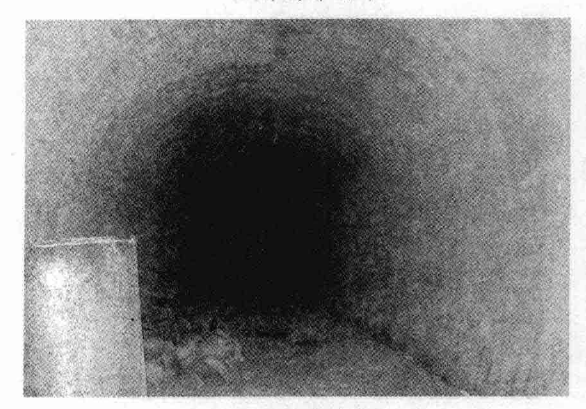
279 弹药库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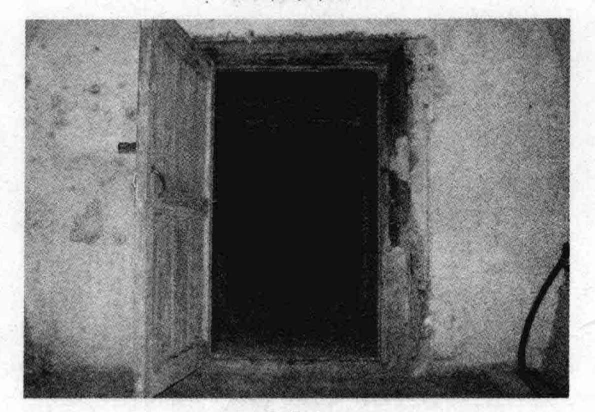
277 弹药库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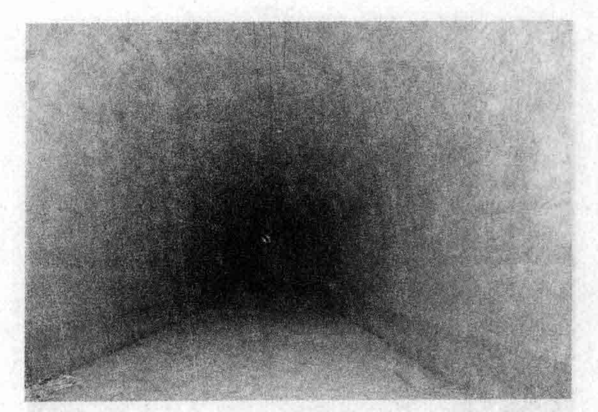
277 弹药库门口



278 弹药库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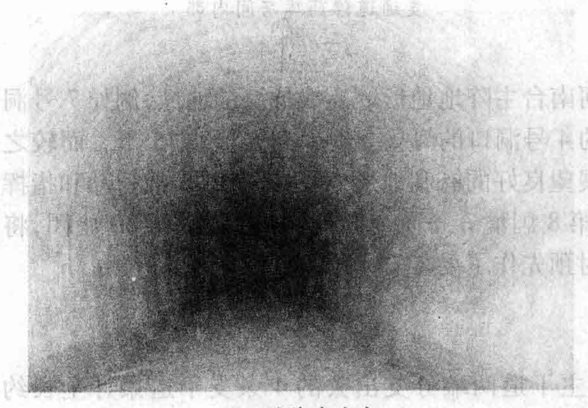
278 弹药库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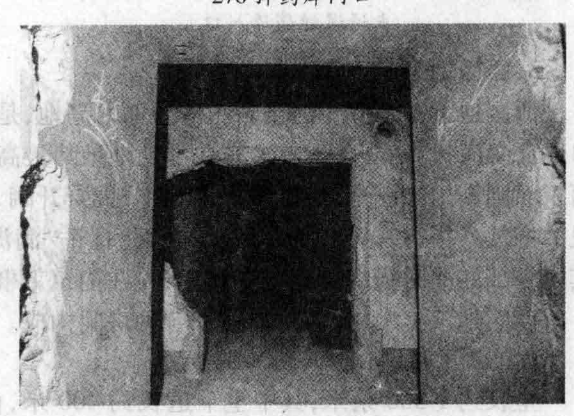
276 弹药库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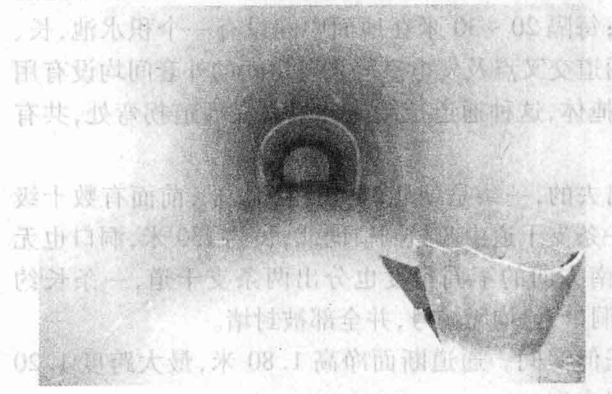
276 弹药库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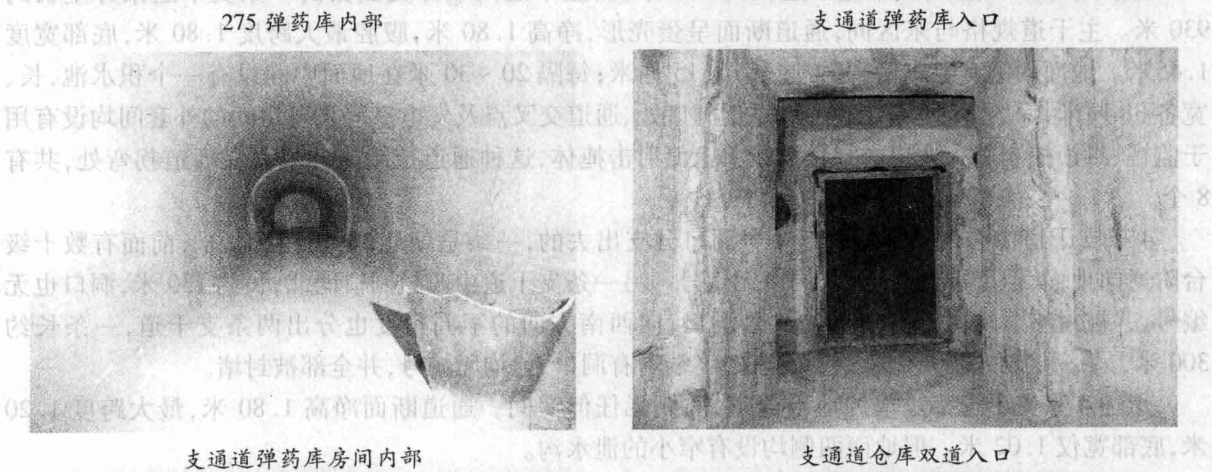


275 弹药库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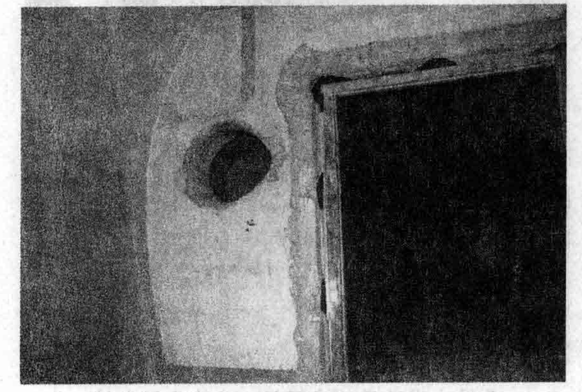
支通道弹药库入口





支通道弹药库房间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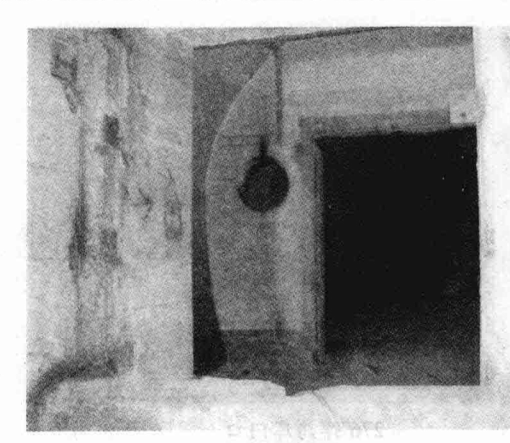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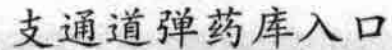
支通道仓库双道入口



支通道仓库入口



支通道仓库房间内部

支通道弹药库入口



支通道弹药库房间内部

3. **西区地下工事**

西区地下工事位于河南台主阵地西北高地，是河南台主阵地地形等高线最高的地域，例如7号洞口地面的海拔为676米，较之东北端高地地势最高的4号洞口的海拔661米高出整整15米。而较之西正面则高出二三十米，这种居高临下、视野开阔、展望良好的有利地形，对于部队的作战行动和指挥机关的观察指挥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日军“满洲第8国境守备队”以及后来的独混第80旅团，将其司令部的战时指挥位置设在这里，并在构筑工事时预先作了妥善安排。

西区地下工事由洞口、通道和各种房间构成。

(1)通　道

全长约1 300余米，其中主干道长约400米，由主干道两端分支出去的4条支干道累计全长约930米。主干道规格与东区同，通道断面呈蛋壳形，净高1.80米，腹腔最大跨度1.80米，底部宽度1.45米。地面两侧有泄水槽，宽4厘米，深15厘米；每隔20～30米在地面中间设有一个积水池，长、宽各38厘米，深约20厘米。主干道靠近洞口处、通道交叉点及发电室等重要房间的外套间均设有用于监视、封锁控制进入通道的双正面或单正面射击掩体，这种通道控制掩体只设在通道拐弯处，共有8个。

4条支干道中有两条是从北部8号洞口分支出去的，一条是朝北，全长约250米，前面有数十级台阶通向地面，但上部被封堵，此洞口无编号。另一条支干道由8号洞口向北，长约130米，洞口也无编号，并被封堵。从主干道南部的9号洞口，向西南方向的不同角度也分出两条支干道，一条长约300米，另一条长约360米，2条支干道的终端均有洞口，但均无编号，并全部被封堵。

上述4条支干道都是单纯地下通道，两侧无任何房间。通道断面净高1.80米，最大跨度1.20米，底部宽仅1.02米。但地面两侧均设有窄小的泄水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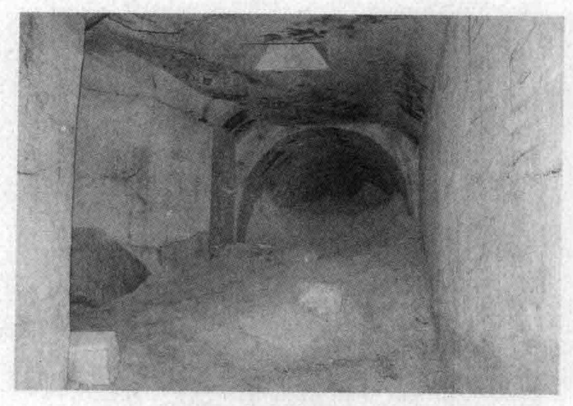
西区主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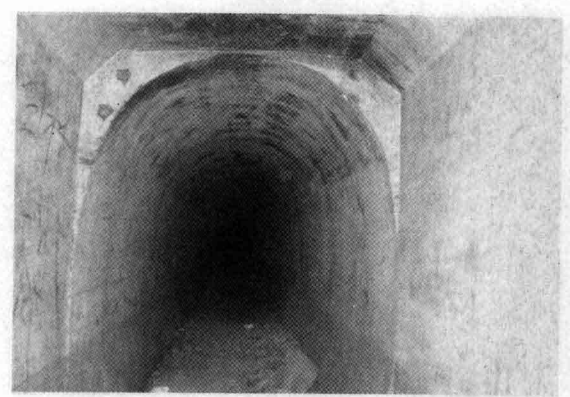
西区主通道两侧房间门口及地面泄水槽



西区支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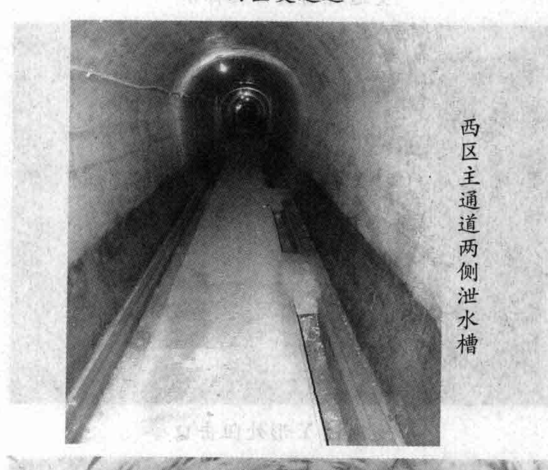
西区支通道堵塞处



西区支通道



西区支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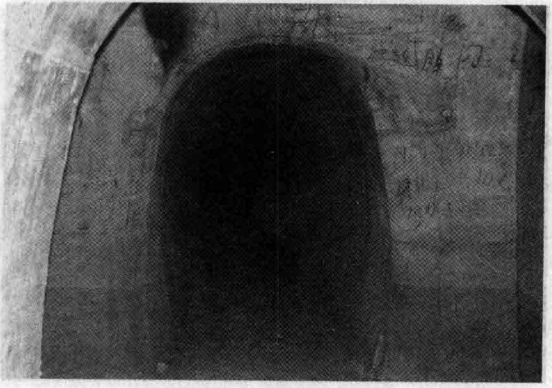
西区主通道两侧泄水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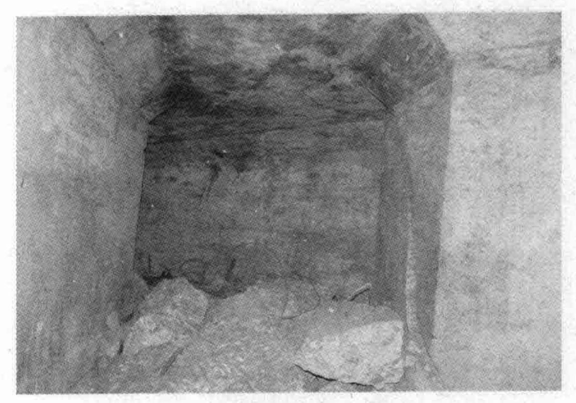
西区主通道右侧弹药库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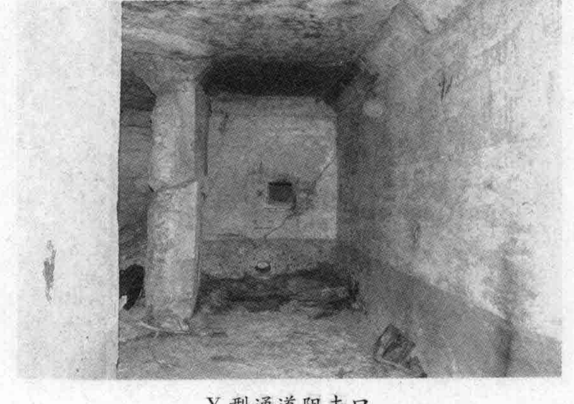
支通道堵塞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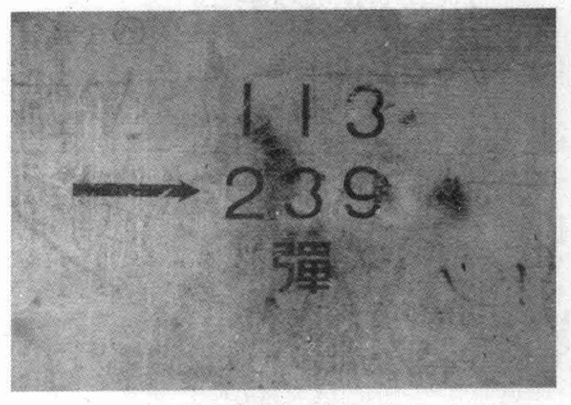
主通道与支通道结合处



支通道Y形通道口左转堵塞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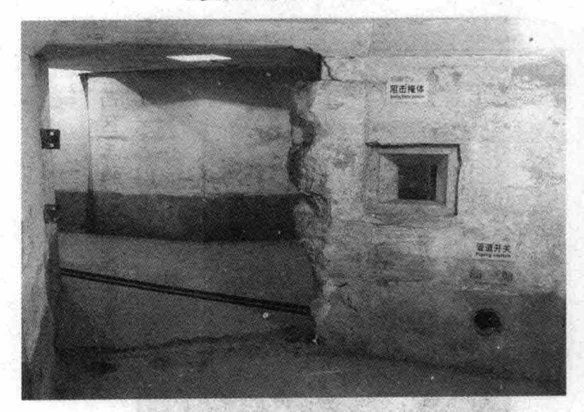
Y型通道阻击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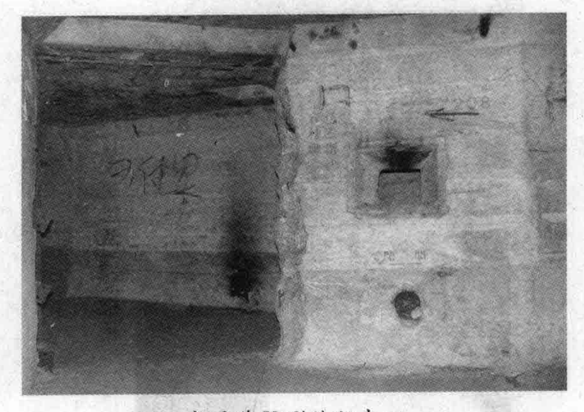
支通道墙上日文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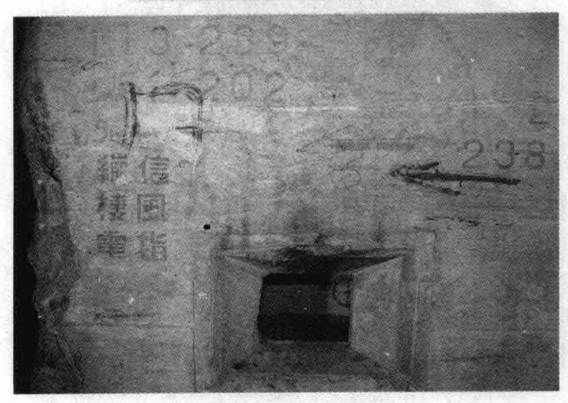
支通道墙壁日文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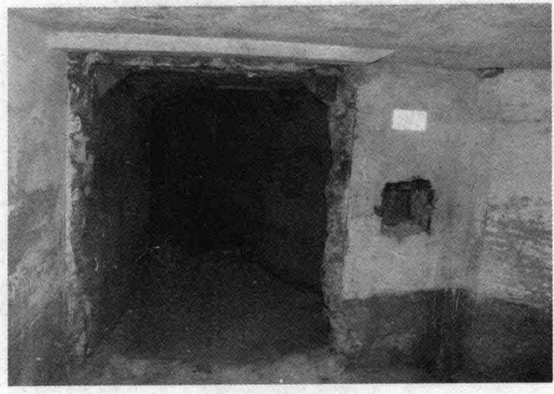
主通道Y形处阻击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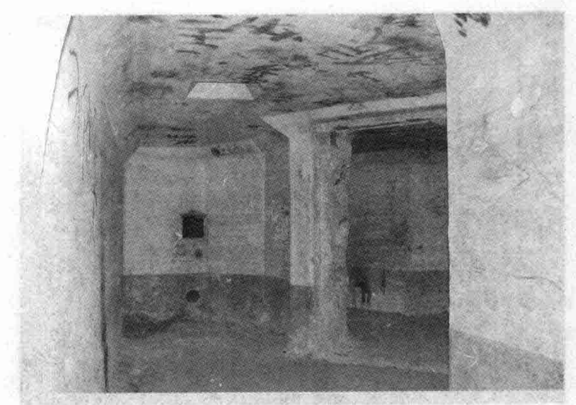
支通道Y形处阻击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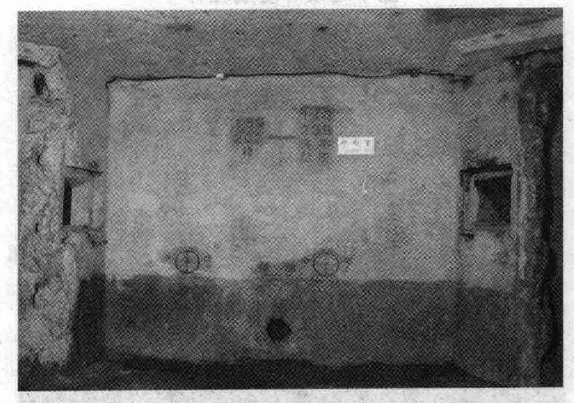
Y形通道阻击口处日文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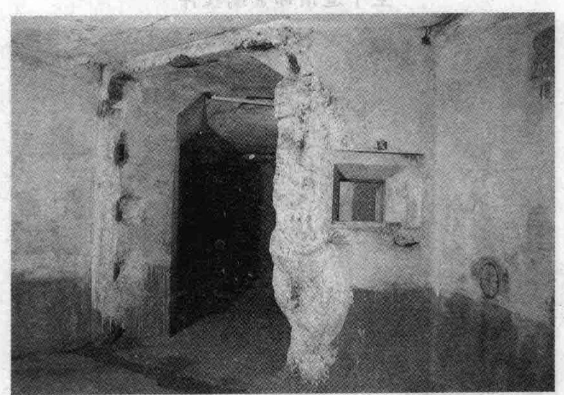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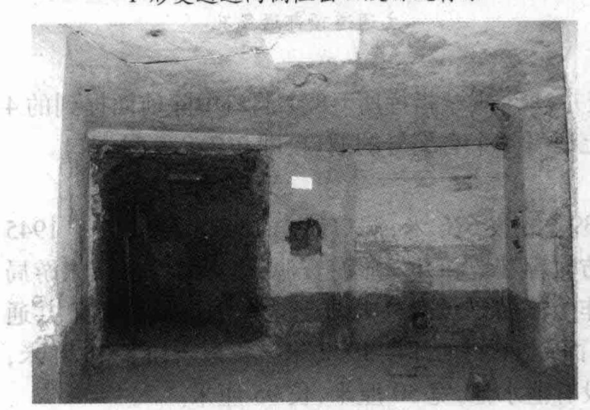
Y形通道左转处


支通道 Y 形连接处


支通道地面通风口与内置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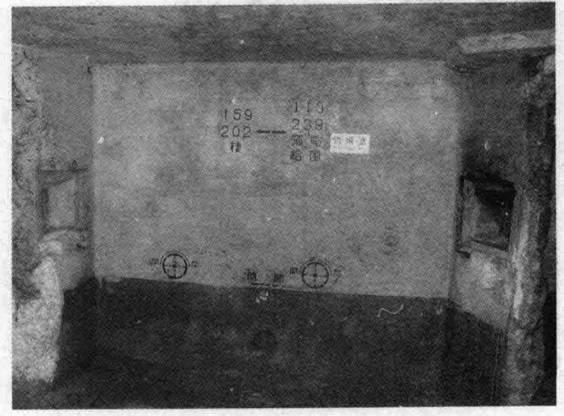

Y 形支通道两侧阻击口及日文标示


Y 形通道侧面阻击口


Y 形通道左侧支通道


Y 形通道右侧支通道


主通道第 1 道铁门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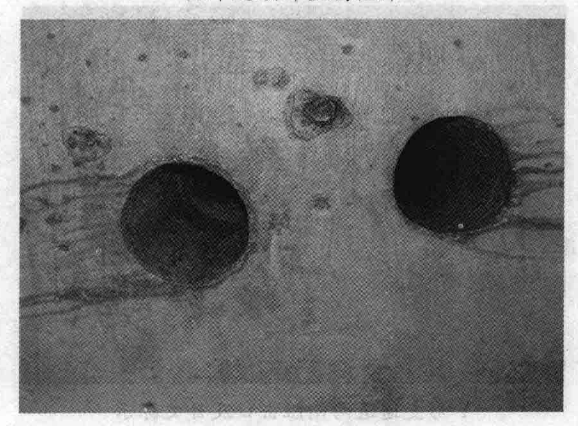


Y 形通道阻击口内部


主干道顶部金属挂件


主干道顶部金属挂件


主干道地面泄水槽


主通道顶部通气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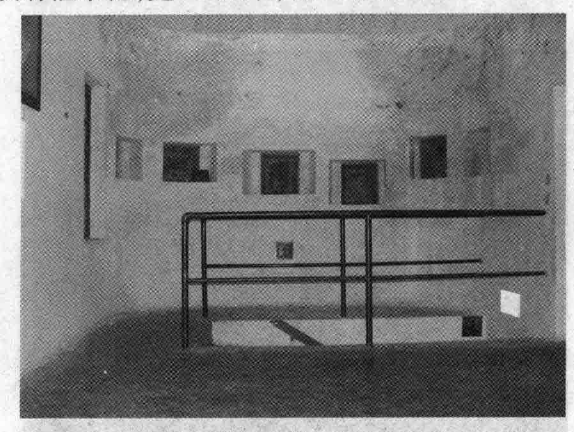
（2）洞口、竖井（观察指挥所）

河南台阵地西区地下工事共有8个洞口，1个竖井，1个观察指挥所。8个洞口中除前面提到的4条支干道终端无编号并已全部被封堵外，在主干道上还有4个有编号的洞口，即6、7、8、9号洞口。

①7号洞口

位于主干道中部，北纬49°14′50″，东经119°42′39″，海拔676米，洞口航向134°。原洞口于1945年被苏军炸毁。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建设全民国防教育基地和开发旅游资源，由原海拉尔市旅游局投资先后修复了洞口并在洞口上仿建了一个碉堡，作为旅游景点对外开放。这个洞口从上到下共通过6段下行通道平台，96个台阶，三道门进入通道平面，上下斜面深度19.2米。每级台阶长1.20米，宽30厘米，高20厘米。每段下行通道平台地面都设有泄水池，宽50厘米，长95厘米。


7号洞口外后修复的碉堡（参观地下工事入口）


游人从碉堡内进入地下工事处


7 号洞出入口台阶


7 号洞出入口台阶


7 号洞出入口台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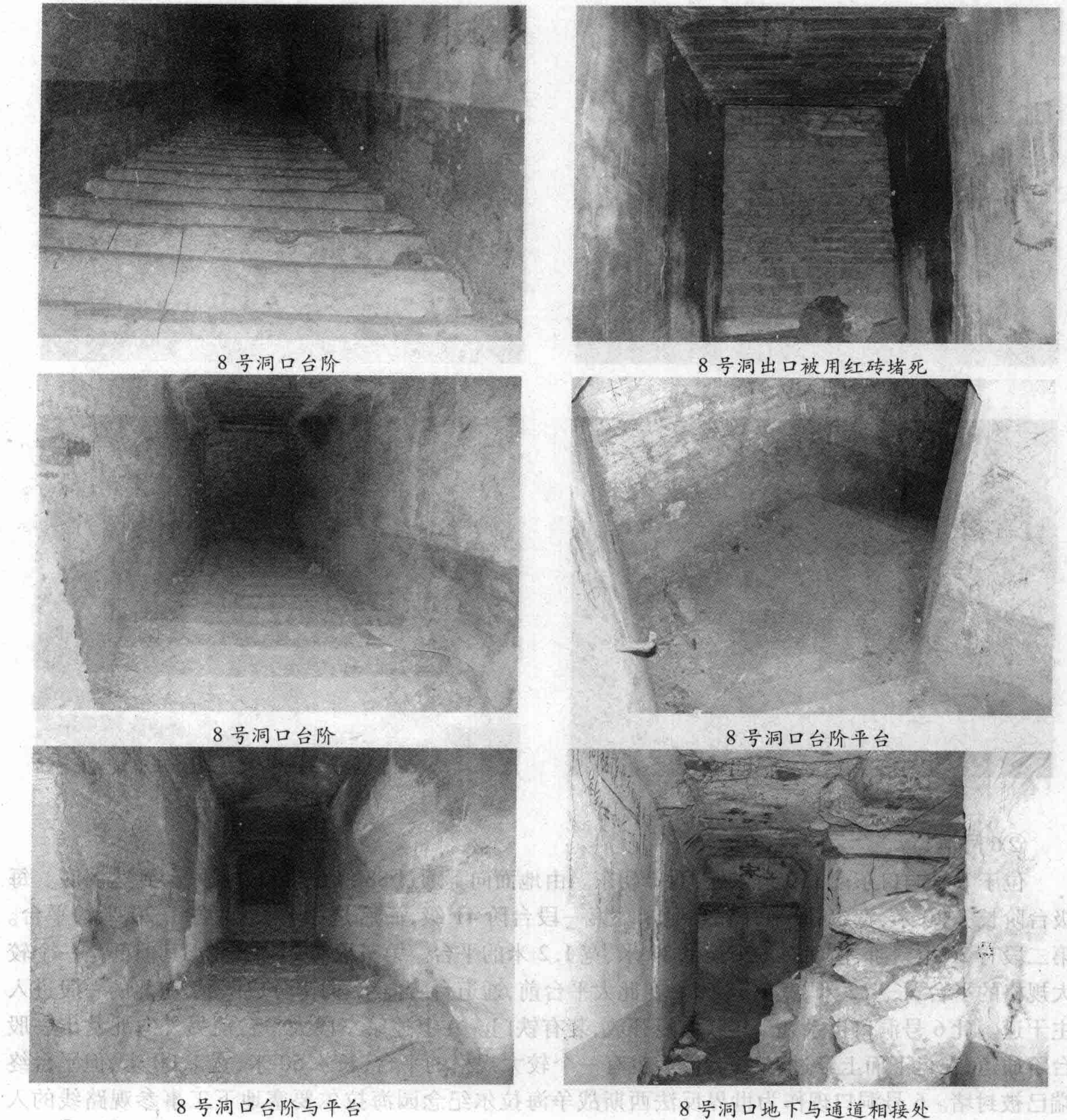

7 号洞出入口台阶平台

②6 号洞口

位于 7 号洞口东南 130 余米处,洞口朝东。由地面向下通过 88 级台阶和 3 段平台到达洞底。每级台阶长 1.20 米,宽 30 厘米,高 20 厘米。第一段台阶 41 级,而后是一个长、宽各 1.20 米的平台。第二段有 26 个台阶,前面有 1 个长 1.80 米、宽 1.2 米的平台。第三段有 21 个台阶,其前部是一个较大规格的平台,长 4.2 米,宽 1.18 米。在此大平台前,通道台阶向东、向南分成两股,向北的一股进入主干道。此 6 号洞口也系九十年代修复开放,装有铁门。在上述第三段大平台前另外向北岔出一股台阶通道,在自下而上经过 12 级台阶后也有一个较大规格的平台,长 4.50 米,宽 1.00 米,但平台终端已被封堵。6 号洞口现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海拉尔要塞地下工事参观路线的入口。

③8 号洞口

位于 7 号洞口西北约 120 米处。自上而下经 5 段平台 83 级台阶到达洞底。第一段平台长 1.72 米,宽 1.46 米,5 级台阶。而后是第二段平台、22 级台阶(每级台阶长 1.20 米,宽 30 厘米,高 20 厘米)。第三段平台长 1.18 米,宽 1.20 米,接下去是 19 级台阶。第四段平台长 1.16 米,宽 1.20 米,而后经 35 级台阶,到达支通道南端,有第五个平台,通过 2 级台阶下到洞底。并由此向南和向西北各分出一条支通道。8 号洞口战时被苏军炸毁,后又经人工封堵。现已开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海拉尔要塞地下工事参观路线的出口。



8号洞口台阶　　8号洞出口被用红砖堵死

8号洞口台阶　　8号洞口台阶平台

8号洞口台阶与平台　　8号洞口地下与通道相接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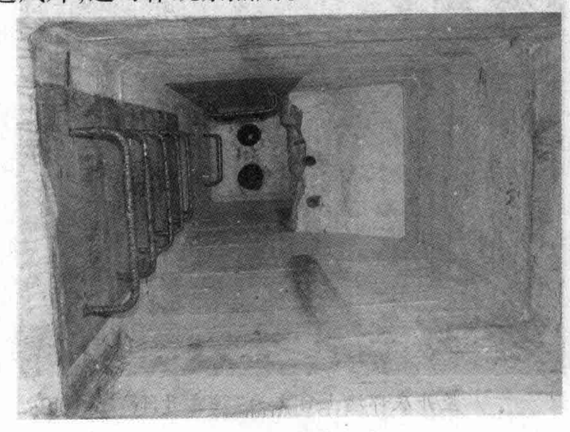
④9号洞口

位于6号洞口西南约130米处。洞口已用铁门封死。从洞口外经过一段长1.68米、宽1.32米的引壕，开始从洞口自上而下地沿台阶进入主干道。第一段台阶是22级（每个台阶长1.20米，宽30厘米，高20厘米），其前端是个长1.45米，宽1.00米的平台，由此平台向下19级台阶，是第二个平台，长2.06米，宽1.20米。再向下35级台阶到达洞底，总计76个台阶。在从引壕终端进入洞口6.7米处，设有一个封锁洞口通道的双正面阻击掩体。此洞口是“三岔口”，下底后向东转是主干道，向北和向西是2条支干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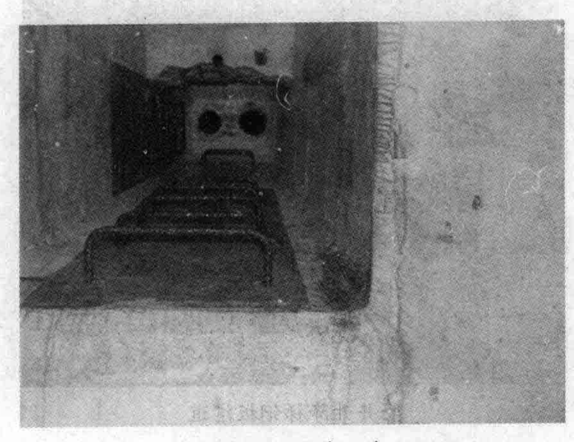
⑤天井（通风口）

由7号洞向东进入主干道约10米后，在第1组对称房间即原日军编号“180栖”和“207信”2个房间与通道交叉口通道拱顶的中央，是个长、宽各1.2米的正方形天井，其上部口径稍向内收缩。天井的一侧墙体上至今仍遗留有长30厘米、宽20厘米、由直径3厘米粗钢筋弯成的爬梯，到地面垂直高度约15～16米，顶部水泥棚板上开有直径为30厘米和20厘米的通风孔各1个。这个天井除用于

通风外，还可作观察点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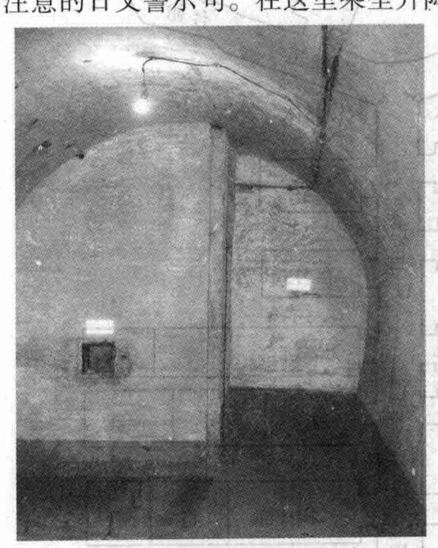
7号洞主通道天井



7号洞主通道天井

⑥竖井（观察指挥所）

在从7号洞口通往6号洞口的主干道第3组对称房间右侧，通过日军原编号“209风”房间右侧约30米的支通道进入一个竖井入口。竖井底部长1.50米，宽1.20米，向上渐行稍加收缩。竖井两侧均设有嵌在墙体中的钢板升降梯。升降梯旁的墙体上还留有当年日军用黑漆涂写的关于升降时应小心注意的日文警示句。在这里乘坐升降梯可直达地面指挥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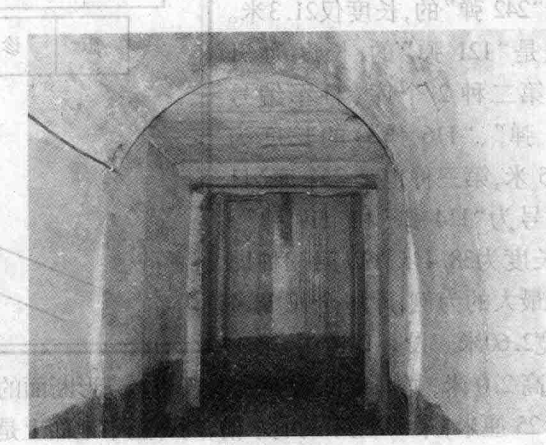
通往竖井的『209风』室阻击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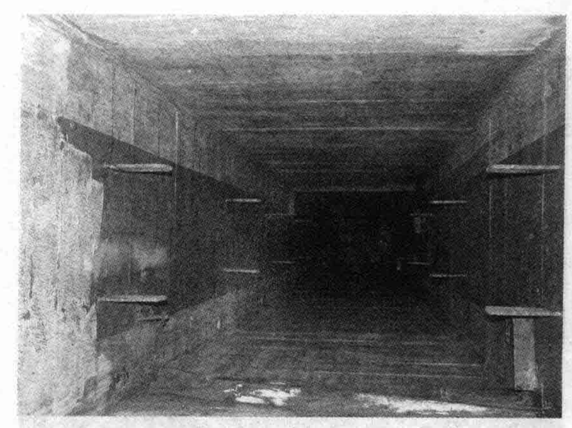
通往竖井“209风”室拐弯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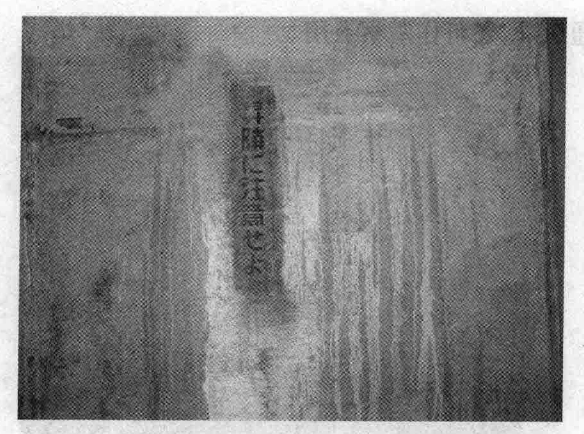
通往竖井的慢坡支通道



竖井升降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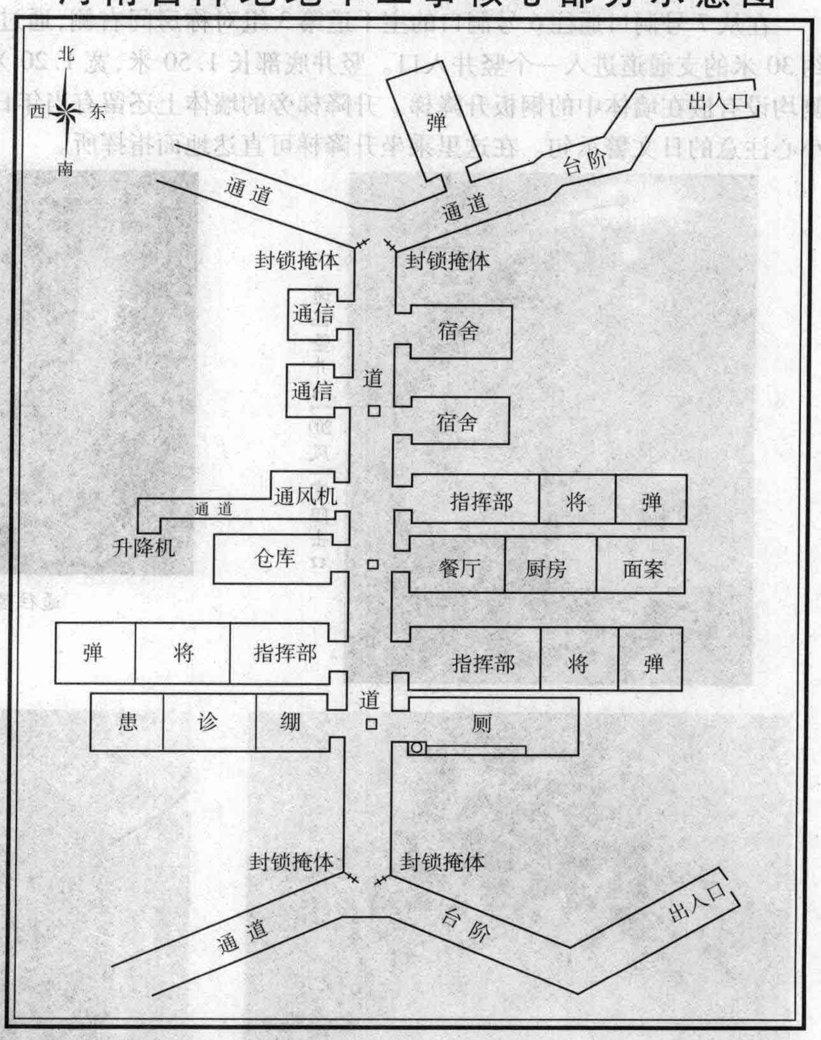
竖井升降梯钢板滑道



竖井底部墙上日文为“注意升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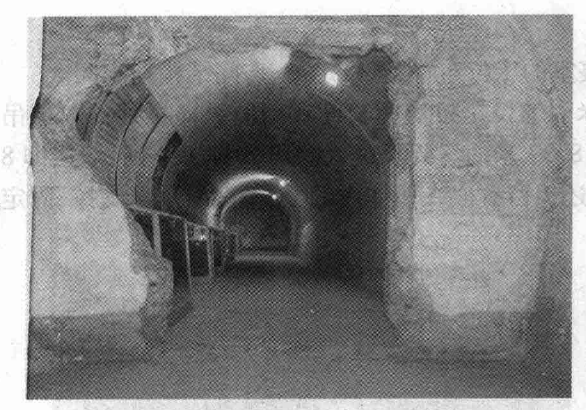
(3)房　间

河南台阵地西区地下工事中共有大小各种房间25个,总建筑面积约1 200余平方米,全部集中在6、7、8、9号洞口下主干道和支干道区间。按房间功用分,有指挥官室、弹药库、寝室、通信室、医务室、发电室、炊事房、粮库、油料库、厕所等12种。最多的是弹药库,共8个,其次是指挥官室3个,官兵寝室有2个,通信室2个,其他功用的则都是每种只设1个房间,但有的内部是三套间。



河南台阵地地下工事核心部分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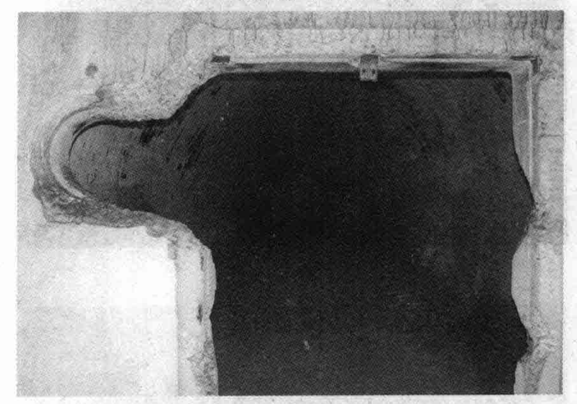
①弹药库共有8个(不含3个指挥官室套间内的3个小弹药室),房间跨度都是2.60米,但长度不尽相同:最短的一种即日军编号“242弹”的,长度仅21.3米。其次是“121弹”的,长度为31米。第二种2个库(日军编号“117弹”、“116弹”)的长度为36.95米,第三种也是2个库(日军编号为“114弹”和“119弹”)的,长度为38.4米。以第三种即面积最大的为例,库房全长38.4米,宽2.60米。设有2道门,第一道门高2.0米,宽1.4米,设在通道东侧蛋壳形断面的左角,门内是一条长2.5米,宽1.3米的门廊,门廊两侧有宽25厘米,深50厘米的泄水槽,门廊正中地面上是个长和宽各40厘米、深50厘米的积水池。第二道门高1.75米,宽1.20米,两道门之间是一个门厅,长2.50米。头道门的左侧墙体距地面1.12米处有一个直径40厘米的通风孔。



7号洞口内弹药库(现为展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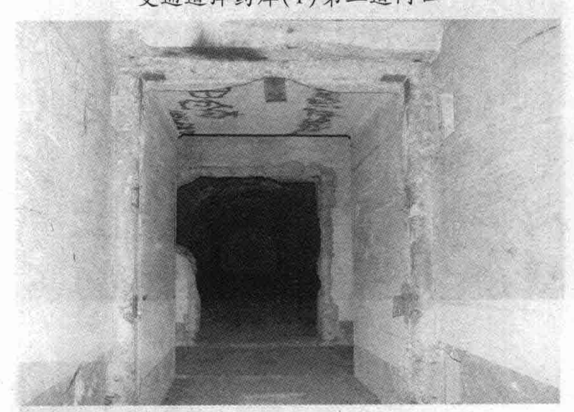
支通道弹药库(1)第一道门口



支通道弹药库(1)第二道门口



支通道弹药库(1)内部



支通道弹药库(2)第一道门



支通道弹药库(2)第二道门



支通道弹药库(2)第一道门



支通道弹药库(2)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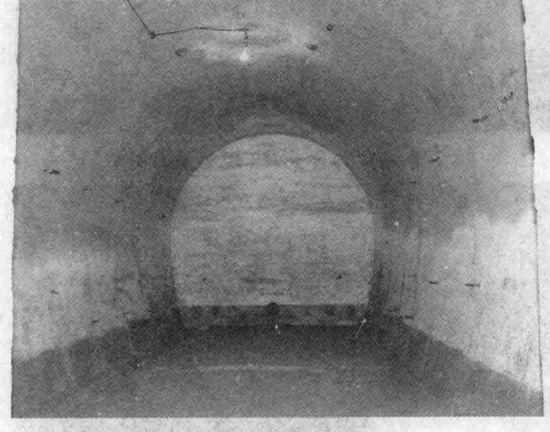
②180、181 栖

寝室共2个,日军原编号为“180 栖”。这2个寝室的床位布置、床位定员、房间结构均相同。

寝室内设16个铺位。房间长8.37米,宽2.6米。铺位是按房间长度在两侧纵向排列的双层吊铺,上层是折叠式的,每个铺位的长度按1.75米,则8.37米的房间长度大致可安排4个铺,双层即8个铺位,两侧合计为16个铺位。现房间两侧墙壁上还遗留有嵌在墙体内的上、下两层用以支撑、固定和悬挂铺面的被锯的钢筋残根和拱顶挂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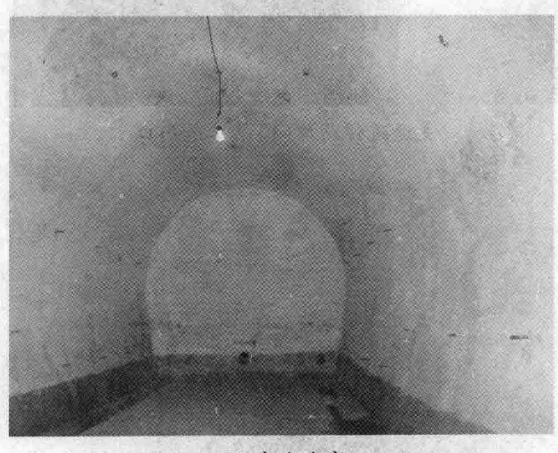
180 寝室门上的日文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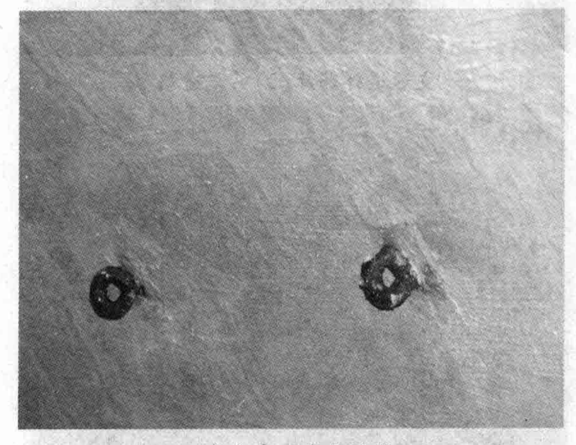
180 寝室内部



181 寝室门上的日文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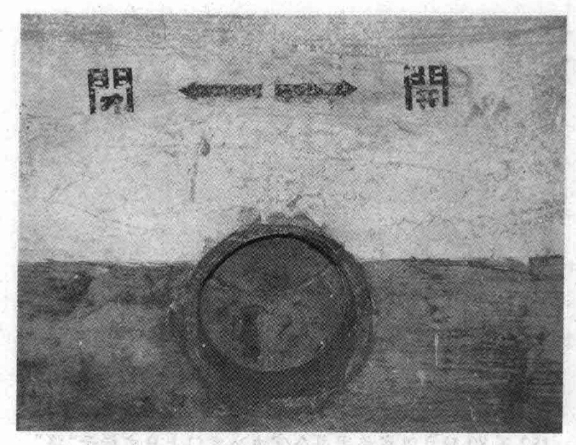
181 寝室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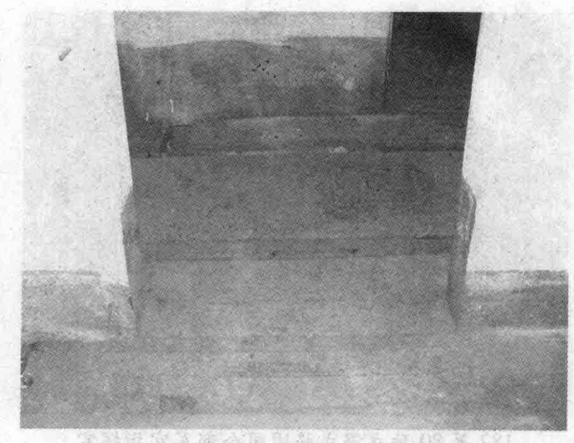
180 寝室房顶挂铺位铁环



180 寝室房顶挂铺位铁钩




180 寝室墙根处通风开关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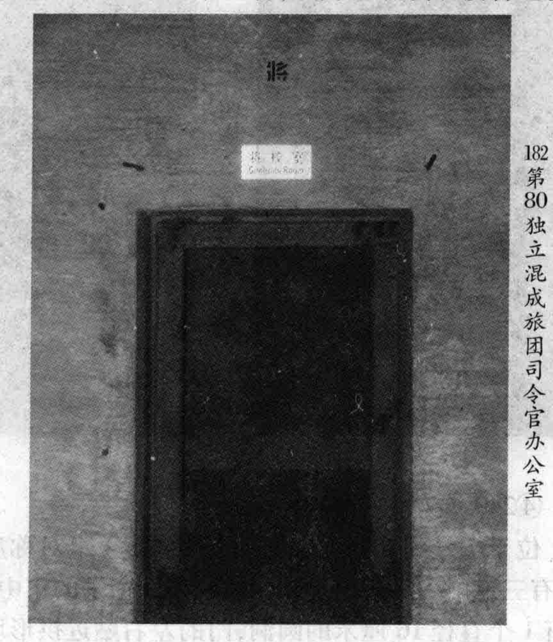

180 寝室拉门滑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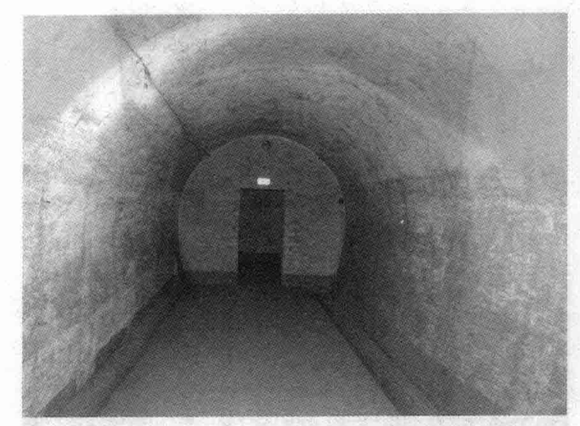
③指挥官室 182、183、184 栖

门上原日军标号为 182、183、184 栖，内部分划为栖、将、弹 3 个大小套间，房间全长为 20.34 米，宽 2.6 米，内部分为 3 个套间。外间是军官指挥室，长 16.1 米，左侧为人行通道，右侧用于摆设桌椅办公。第 2 个小套间的门上漆有“将”字，表示“将校”（日语为军官之意）专用，房间规格为长、宽各 2.2米，是司令官、参谋长等高官办公用房间。再往里是规格与“将”字套间相同的小套间，门上标有“弹”字，平时存放弹药，战时为司令、参谋长等高官休息用房间。通往指挥室的头道门开在蛋壳形断面的中央部位，门高 1.83 米，宽 1.0 米，门上贴顶棚拱顶开有 1 个直径 30 厘米的圆洞。内套间“将”门上也有 1 个这样的圆洞，是用于装置取暖用暖风管的。门的右侧上方沿拱形墙壁开有一个 20×30 厘米的斜长形孔洞，用以通风。在大套间靠近“将”字套间门前约 35 厘米处的地面正中处，有 1 个长、宽各为 40 厘米深约 30 厘米的方形池。房间地面两侧均设排水槽，规格不一：右侧长、宽 20 厘米，深 26 厘米；左侧长、宽各 45 厘米，深 30 厘米。“将”字套间的内门边贴地处有一个直径 30 厘米左右分别写有“开——关”二字的大圆洞，为通风孔的开关阀门。进门后，在左壁向右 1.8 米处的地面上，等距离纵向排列 14 根 15×15 厘米方柱坑，是用来支撑军官指挥台面的。“将”字套间门口地面有一个 60×40 厘米、深 60 厘米的长方形混凝土高，内有直径 16 厘米的水泥管，疑为通风或取暖管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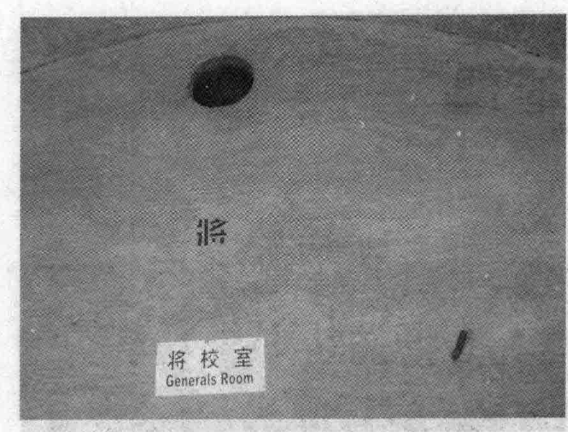


182 第 80 独立混成旅团地下司令部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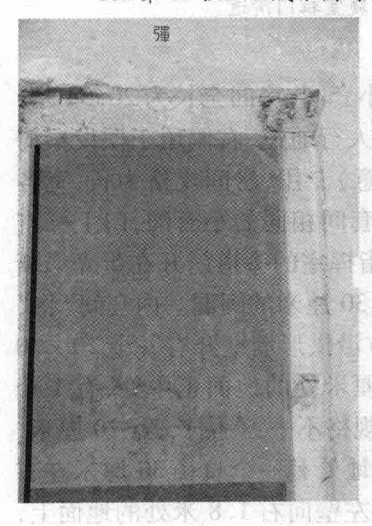

182 第 80 独立混成旅团司令官办公室



182 第 80 独立混成旅团司令部军官指挥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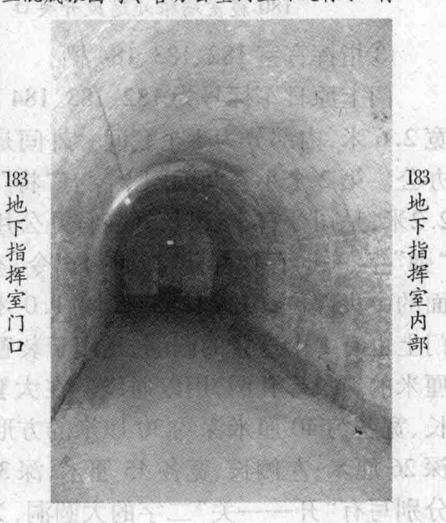


182 第 80 独立混成旅团司令官办公室门上日文标示“将”



182 第 80 独立混成旅团司令官办公室里间

183 地下指挥室门口



183 地下指挥室内部



184 地下指挥室门口



184 地下指挥室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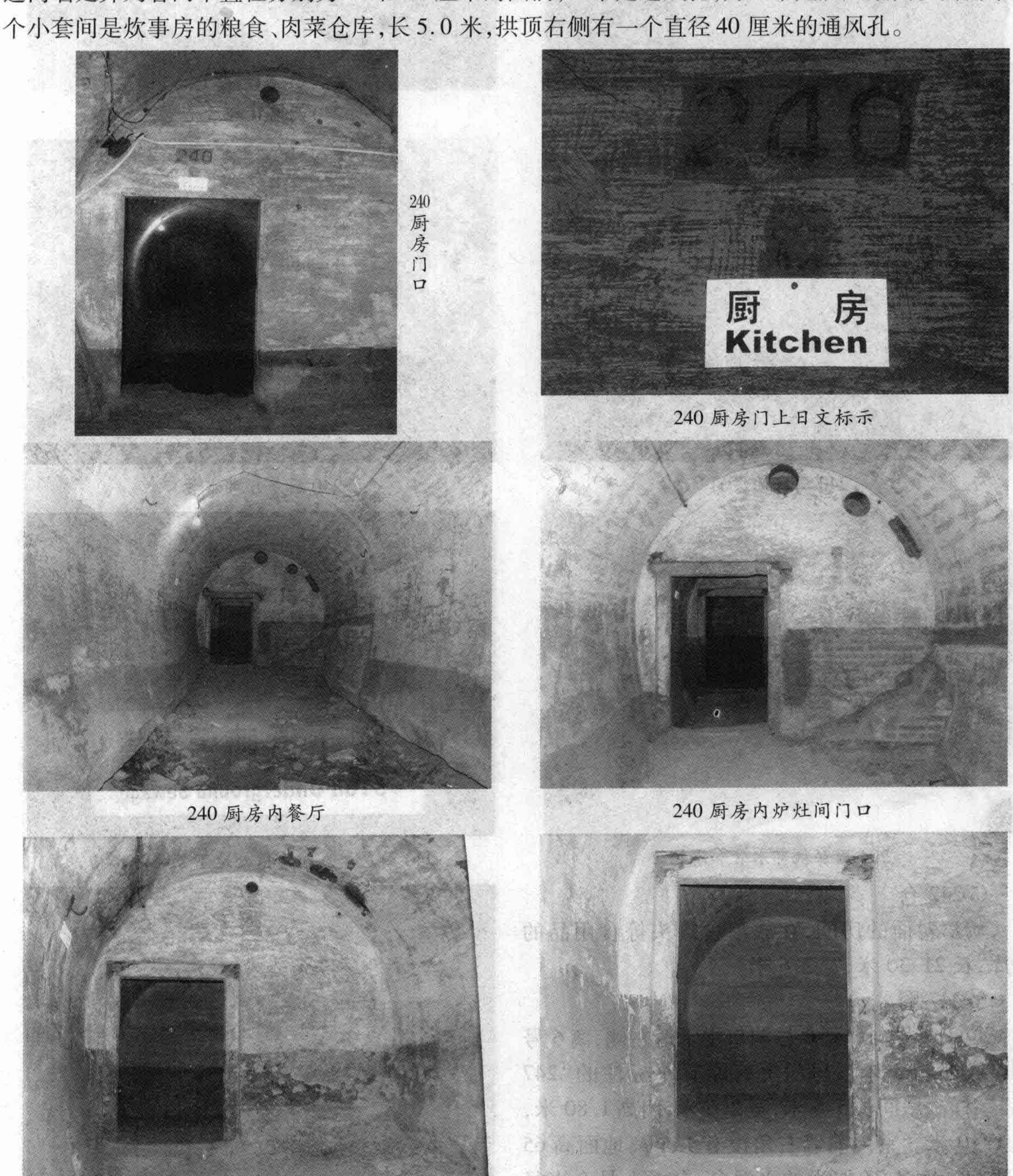


184 地下指挥室套间

④240 炊

位于 7 号到 6 号洞口主干道两侧第 4 组对称房间的左侧，宽 2.6 米，全长 20.60 米，分为 3 个套间，有三道门。头道门设在洞口断面间壁墙的正中，门高 1.66 米，宽 1.0 米。门上部贴近拱顶处墙壁上有 1 个直径 16 厘米的圆洞，门的左右贴近拱形墙体肩部（距地面 1.3 米）各有 1 个 18 × 34 厘米的长方形开口。在门右侧距外墙 1.70 米处、距地面 1.30 米处，在墙体上嵌有上下间隔 26 厘米、宽约

1.0米的 φ20 毫米钢筋 5 对。进门第 1 套间长 11.8 米。在靠近二道门的左侧墙体上标有“床下二〇吨入水槽”的日文标记。右侧从内墙向外有一个 5.15 米长，1.0 米宽的灶台遗迹。二道门高 1.57 米，宽 1.0 米。门的正上方贴拱顶处有 1 直径 30 厘米的圆洞，拱顶右侧壁有 1 直径 26 厘米的圆洞，此洞下又连 1 个 50×15 厘米的长方形开口。第 2 套间长 3.8 米，门开在墙体断面的左侧。套间内左侧靠近墙体处有一个长 1.0 米，宽 0.8 米的水槽，旁边墙壁上标有大意为污水，禁止饮用的日文警示句。在房顶中部至今仍遗留有吊装重物用的两组 4 个直径为 5 厘米的动滑轮，拱形棚顶中线右侧靠近内墙处并列着两个直径分别为 40 和 30 厘米的圆洞，一个是通风孔，另一个是炉灶烟囱。向内第三个小套间是炊事房的粮食、肉菜仓库，长 5.0 米，拱顶右侧有一个直径 40 厘米的通风孔。



240厨房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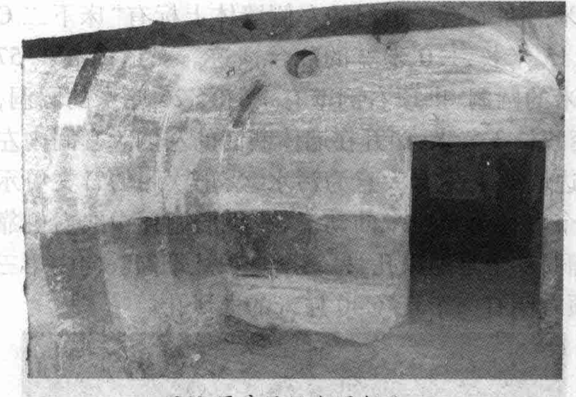
240厨房门上日文标示

240厨房内餐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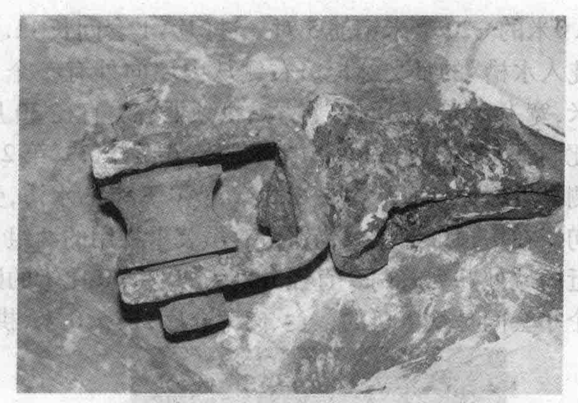
240厨房内炉灶间门口

240厨房内炉灶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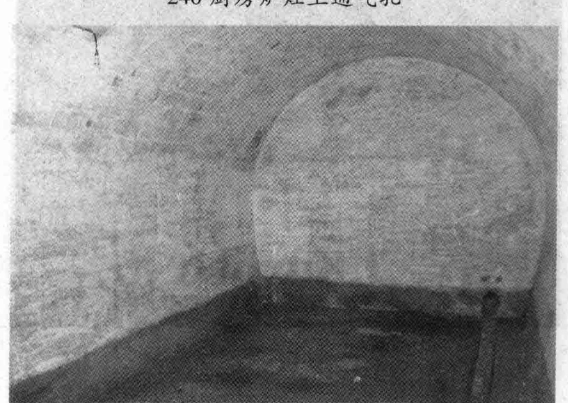
240厨房内面案间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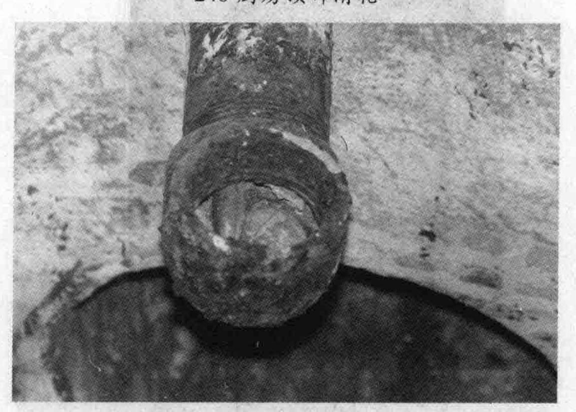
240 厨房炉灶上通气孔



240 厨房顶部滑轮



240 厨房面案间



240 厨房顶部水管



204 厨房机部水管和滑轮



240 厨房炉灶间墙根处地下五吨污水槽

⑤242 仓

厨房对面的房间,存放粮食罐头等食用品的仓库,长 21.30 米,宽 2.6 米。

⑥247 厕

位于 7 号洞口到 6 号洞口主干道左侧,离 6 号洞口底部约 5 米。房门上有原日军标注的“247 厕”字样。房间长 5.6 米,宽 2.6 米,门高 1.80 米,宽 1.10 米。室内前墙右角设有 1 个离地面高 65 厘米,长、宽各 75 厘米的水泥台,台面上是个直径 55 厘米、深约 20 厘米的圆锅形洗手池,池心有个



242 仓库门口

直径约10厘米的泄水孔，底部空心，下连下水道。洗手池水泥台的内侧底部连着一个长3.24米、宽40厘米、深约35厘米的便池。便池脚踏台距地面高20厘米，宽约30厘米，可大小便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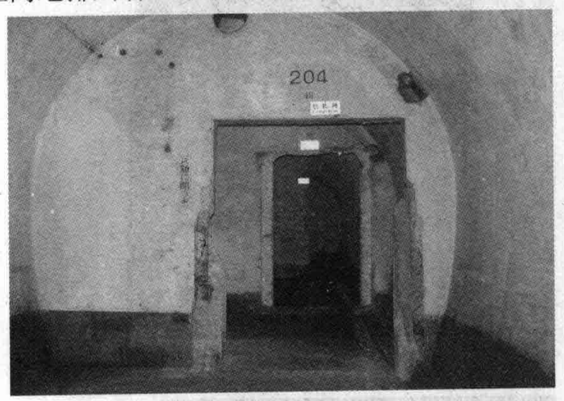


247 厕所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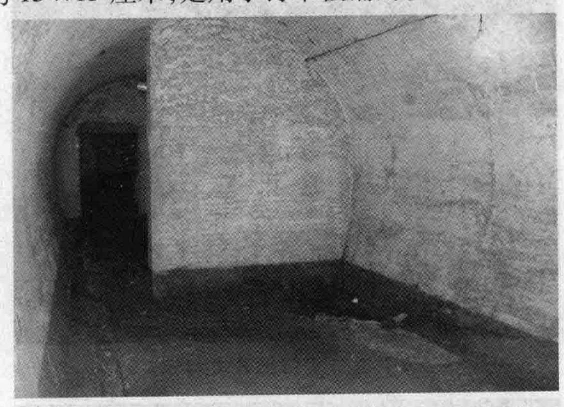

247 厕所便池和洗手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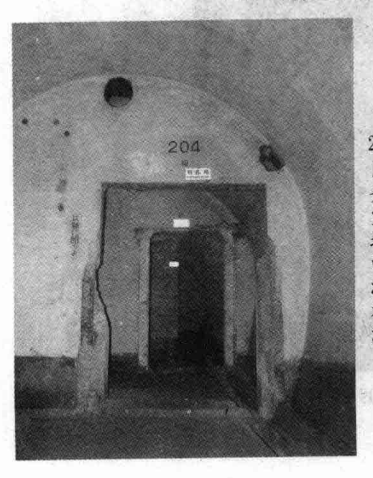
⑦204 绷

是医务室，共三套间。第一套间门在墙体右侧，高1.90米，宽1.2米，门左侧贴拱顶处有直径25厘米的圆孔，二、三套间只有门洞，未装门。全长14.4米，宽2.6米。最外间门上是个“绷”字，用于一般轻伤的消毒和简单包扎。其面积为4.8×2.6米，共12.48平方米。第2个套间的门上是个“诊”字，是医生的检查诊断室，面积约15平方米，其地面中部靠左壁处设有1个1.2×1.2米的水池，深40厘米。另在内墙第三道门左侧地面设有1个80×80厘米的水池，深40厘米。第3套间门上是个“患”字，是用于伤病员住院观察治疗的，面积与第2套间相同。在室内距左壁约1.8米的地面上等距离地排列着3个被从根部锯断的木质方柱，规格为15×15厘米，是用于钉木板铺的。



204 医务室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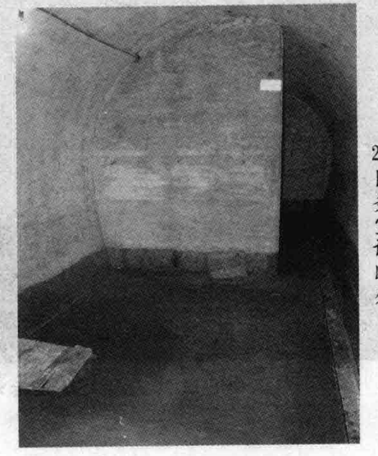

204 医务室住院处




204医务室地面泄水沟



204医务室包扎处


204医务室诊断处

此外,还有10余个不同功用的大小房间,其简要情况见下表。

河南台阵地地下工事西部区房间情况表

编 号	功 用	面积(米)			编 号	功 用	面积(米)		
		长	宽	高			长	宽	高
	弹药库	31.0	2.60	2.80		弹药库	38.40	2.60	2.80
207	通信室(信)	3.72	2.60	2.80	115	通风室(风)	3.80	3.20	2.75
208	通信室(信)	3.72	2.60	2.80		弹药库	36.95	2.80	2.77
180	休息室(栖)	3.37	2.60	2.70		弹药库	36.95	2.60	2.77
181	休息室(栖)	3.37	2.60	2.70		弹药库	30.00	2.60	2.77
182	司令官办公室(栖 将 弹)	20.34	2.60	2.70		弹药库	38.40	2.60	2.80
183	指挥官室(栖 将 弹)	20.34	2.60	2.70	214	发电、通风(电 风)	10.40	2.65	2.70
184	指挥官室(栖 将 弹)	20.34	2.60	2.80	234	油料库	3.65	2.60	2.80
209	通风室(风)	6.60	2.60	2.80	244	油料库	3.65	2.60	2.80
240	厨房(炊)	20.60	2.60	2.80	121	弹药库	31.00	2.60	2.80
242	弹药库	21.30	2.60	2.80	242	粮秣库	21.30	2.60	2.80
204	医院(绷)	14.40	2.60	2.80	218	发电室(电给)	10.40	2.65	2.70
247	厕所(厕)	5.60	2.60	2.80					



207 通信室门上日文标示


207 通信室内部



208 通信室门上日文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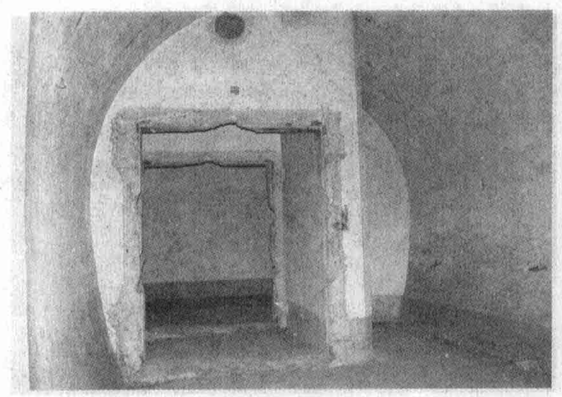
209 通风室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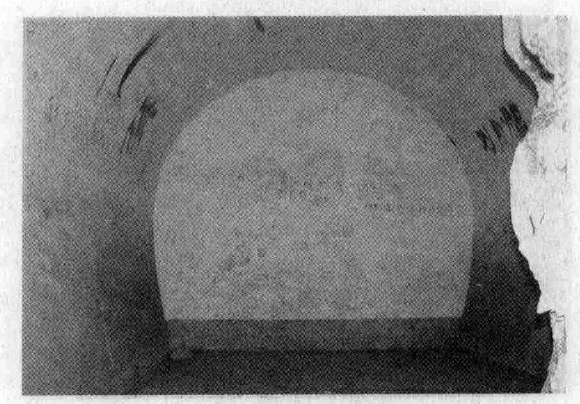
214 电风室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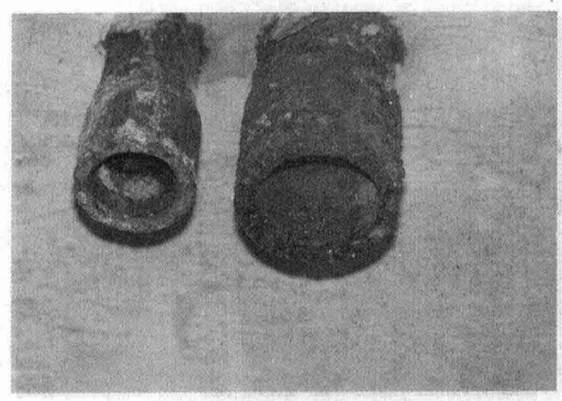
214 电风室门上日文标示



214 电风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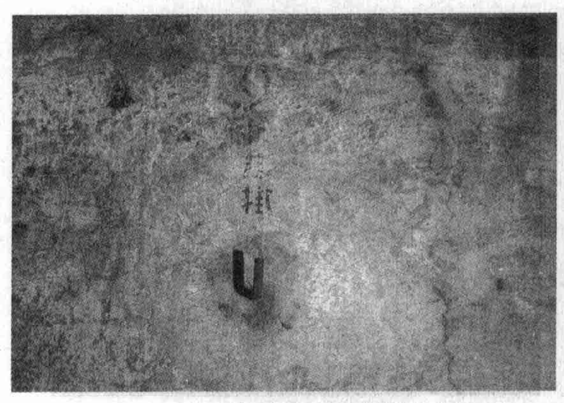
214 电风室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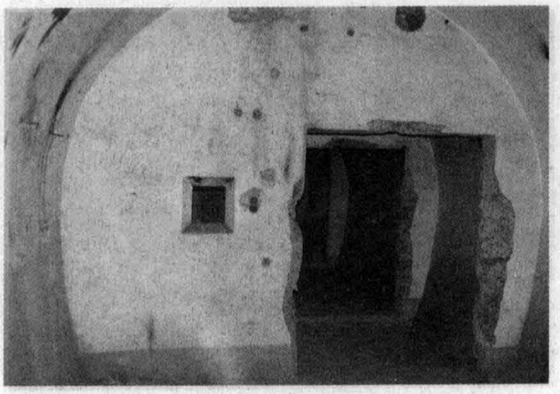
214 电风室房顶水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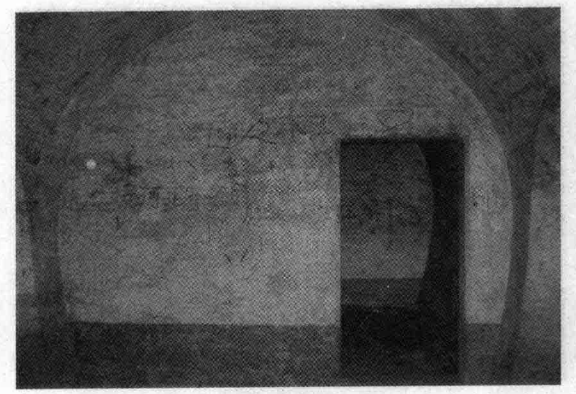
214 电风室房顶通气孔



214 电风室门口墙上铁挂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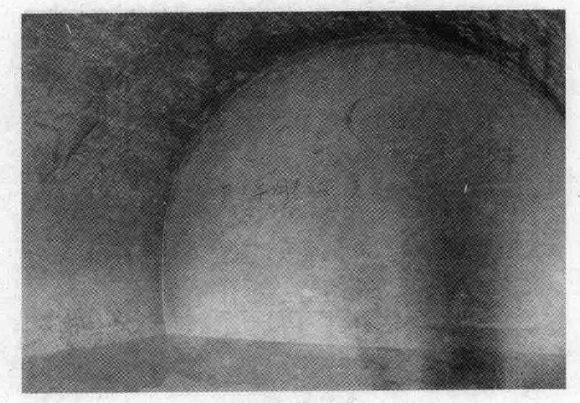
214 电风室内阻击口


214 电风室内部


214 电风室内部



234 油库门上日文标示


234 油库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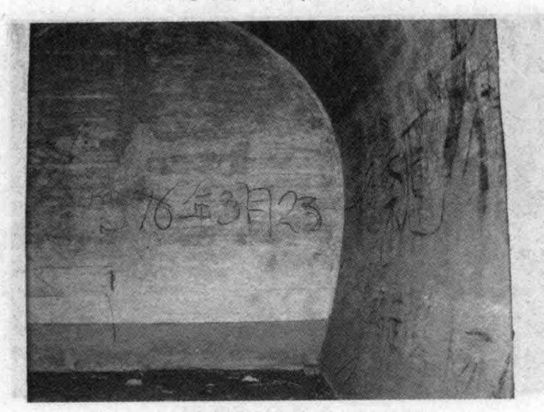


218 发电室门上日文标示



218 发电室门口(室内坍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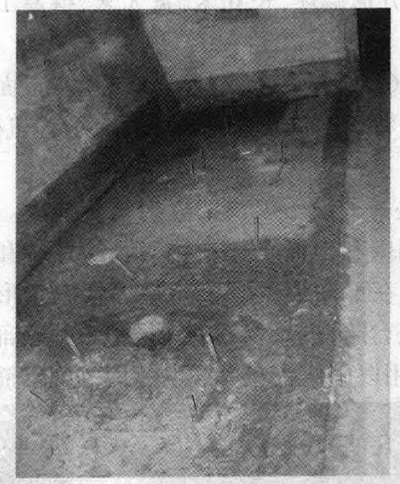

244 油库门上日文标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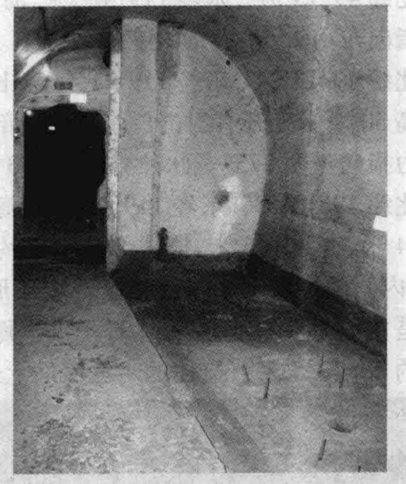

244 油库内部



210 通风室门旁日文标示


210 通风室已堵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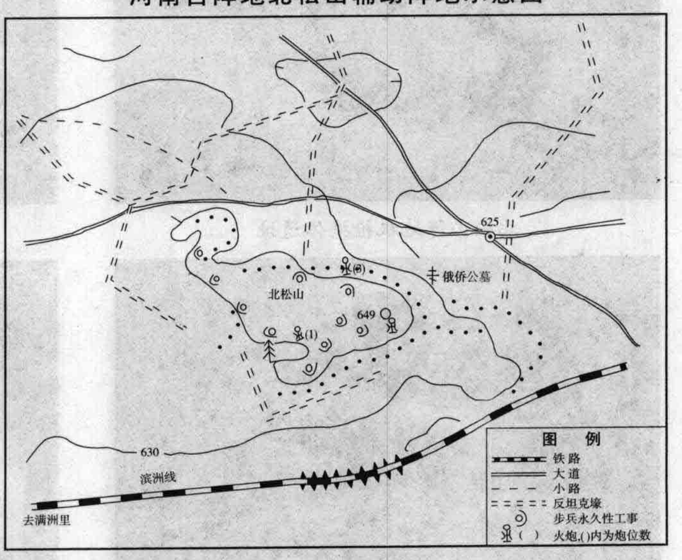

219 通风室通风机座遗址


219 通风室通风机座遗址

(四)辅助阵地

1. 北松山阵地

河南台阵地北松山辅助阵地示意图



北松山阵地是河南台阵地的一个重要辅助阵地。位于河南台阵地西南,今西山铁路客车厂以西、滨洲线铁路以北的一片分布有疏密程度不同的樟松林丘陵地带。南隔滨洲线铁路与松山阵地的辅助阵地南松山的北缘相接,且长满樟子松,故称"北松山"。东西狭长约 2 公里,南北宽约 1 公里。沙丘起伏连绵不断,受地形和地面植被限制,一般可视距离较短。

北松山阵地从西南方掩护河南台主阵地,并与南松山辅助阵地相互配合,对海拉尔西部沿铁路、公路进犯之敌进行封锁、阻击,确保主阵地和要塞西部的安全。

北松山阵地共有各种大小工事 33 个,其中包括各种碉堡、掩蔽部,各种炮掩体、机枪掩体、地下工事入口以及指挥所等。这些工事较多地分布在阵地的西北部一带。

(1)碉堡、火力点

在阵地各种工事中,数量最多的是此类工事,共计 17 个,占全阵地工事总数的 51.5%。碉堡多

为面积仅约10余平方米或不足10平方米的小型碉堡,最小的面积只有4~6平方米。有一、二个面积稍大的也仅为3×6米。

①北纬49°13′32″,东经119°42′29″,海拔641.8米处,是一个主体部分为长方形,长4米,宽2米的碉堡。背面山墙的一角设有进出口和宽约1.5米、长4米的通道,壁厚60厘米。正面火力指向南偏东165°。

②北纬49°13′18″,东经119°42′08″,海拔648米。长方形,主体面积约3×5米。正面火力指向为东略偏南109°。

③北纬49°13′13″,东经119°42′00″,海拔651米。这是一个形制稍显特异的碉堡,主体基底框架约为3×4米,正面山墙两角为环形墙体,其中一角由侧墙与正面墙交叉处起以曲线墙体向正面延伸突出,环绕成一个底边和半径各为2米的半圆形堡。正面火力指向是东偏南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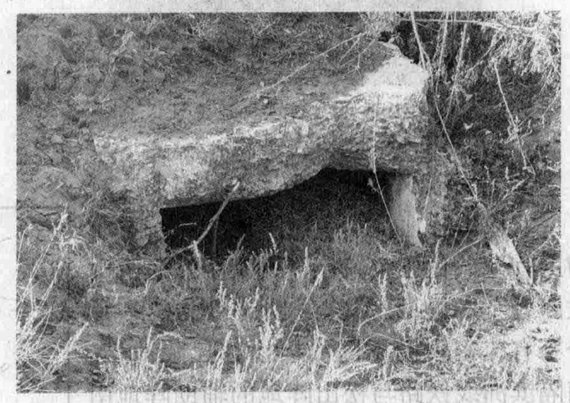
④北纬49°13′37″,东经119°42′25″,海拔663.6米。长方形碉堡,长6米,宽3米,壁厚1米。正面火力指向东南156°,背面设有出入通道。

⑤北纬49°13′24″,东经119°41′44″。长方形,正面宽2.6米,长2米,壁厚30厘米。正面中央部距地面高30厘米处开有射击口。工事内部高1米、宽2米,背面敞口。这是封闭式卧射轻机枪掩体,正面火力指向正西275°。此种掩体共有3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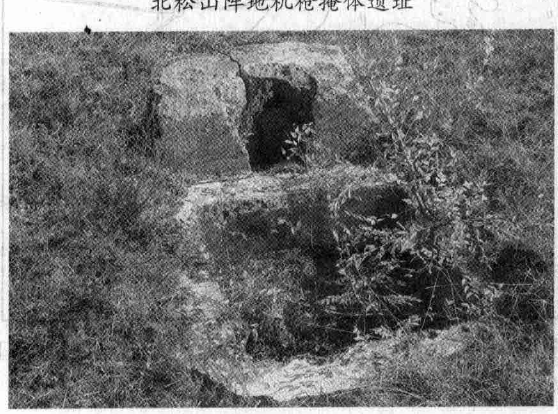
⑥北纬49°13′53″,东经119°41′56″,海拔631米。这是一种设于壕内的立射机枪掩体。壕深约1.3~1.4米,宽约1.5米,掩体部分壕长约2.5米。壕的四壁和地面全部硬化。壕的外端和右正面呈环形,内侧由一道水泥斜壁与壕外端环形壁的内侧相交,在壕面形成一个略呈等腰三角形的机枪座。只是左舷为直斜壁,右舷为环形壁。壕的内端通过几级台阶,进入相邻的浅层地下掩蔽部。掩蔽部面积约2×33.5米。掩体的水泥壕面上还镶嵌着若干个用以固定帆布篷或伪装网的细钢筋挂环。



北松山阵地机枪掩体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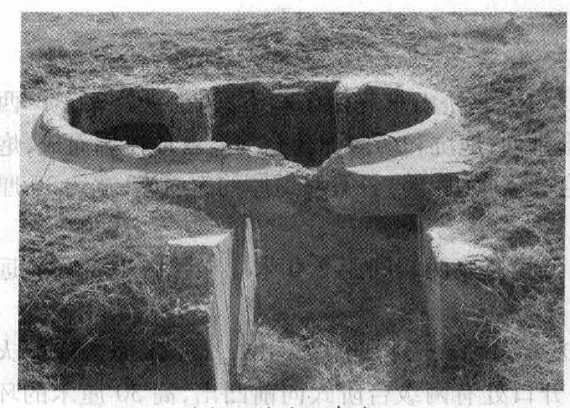
北松山阵地机枪掩体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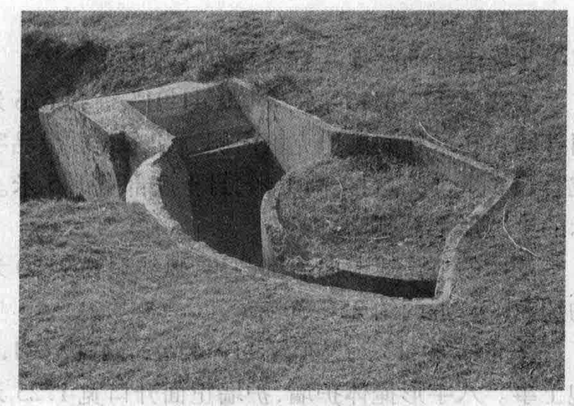


北松山阵地机枪掩体遗址



北松山阵地机枪掩体遗址







北松山阵地工事遗址　　北松山阵地工事遗址

(2)掩蔽部

北松山阵地共有8个大、小掩蔽部,主体面积最大的约60平方米,最小的仅18平方米。中小掩蔽部是单通道,大型的是双通道。

①北纬49°13′20″,东经119°42′02″。主体长6米,宽3米的长方形掩蔽部,出入口开在工事的一角,宽约1.2米。连接在一条曲尺形通道上,通道全长约5米。出口方向东偏南138°。

②北纬49°13′30″,东经119°42′31″,海拔637米。单通道长方形掩蔽部,主体部分长8米,宽3米,内部净高约1.8米。通道开在主体中部,向外弯曲延伸。通道口朝向东偏南137°。

③北纬49°23′13″,东经119°41′51″。大型双通道掩蔽部,主体面积长10米,宽6米。在两个山墙的对角线上各开有1个出入口和通道。

④北纬49°13′24″,东经119°42′39″,海拔634.4米。长方形双通道掩蔽部,主体面积长8米,宽3米。1条通道连接在山墙一角的出入口上,另条通道则连接在背面墙中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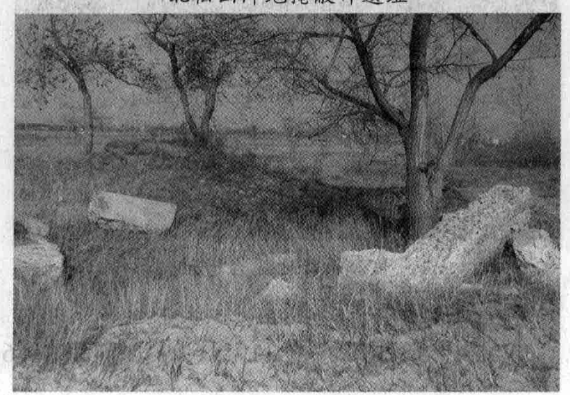
北松山阵地掩蔽部遗址



北松山阵地掩蔽部遗址



北松山阵地掩蔽部遗址



北松山阵地掩蔽部遗址

(3)火炮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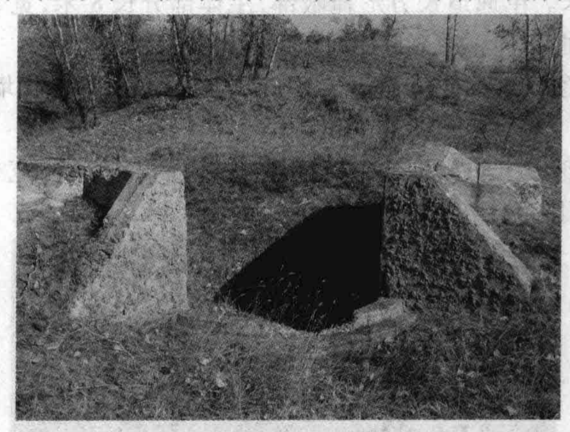
北松山辅助阵地共有各种火炮掩体3个。

①北纬49°13′46″,东经119°41′91″,海拔626米。位于北松山东北侧山脚下,西山铁路客车厂西门外约300米处的反坦克壕内侧。朝东北方呈品字形排列,炮坑和两侧弹药仓均系就地挖掘而成,炮坑直径6米,周边封土高1米,封土底部宽1.5米。炮坑背面(后部)各有一道厚约5厘米,宽约30厘米的半圆形水泥基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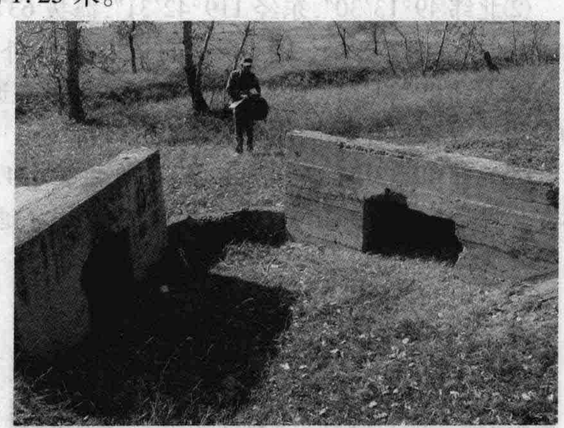
基座的弧形线段向后部凸出,弧线全长2.80米,弧线基底两端间距2.0米。相邻各炮位间隔远的约50米,近的约25~30米。

②北纬49°13′25″,东经119°42′42″,海拔631.5米。正面火力指向正南182°。是水泥构建的火炮工事。八字形掩体护墙,护墙正面开口宽1.25米,开口处有两级台阶式向前凸出,高30厘米的环行水泥箍。护墙高1.30米,厚30厘米,长3.0米。两侧护墙中部距地面约10厘米处各向外凸出1个弹药仓,规格长1.0米,高60厘米,宽60厘米。

③北纬49°13′22″,东经119°41′47″。单侧护墙弹仓式炮位工事。与前述八字形护墙双侧弹仓式炮位工事相比有几点不同:(1)单侧护墙和弹仓;(2)护墙的高度为1.0米,长3.2米,而不是前者的高1.3米,长3.2米;(3)弹仓的规格为1.0米×80×80厘米,高、宽均大于前者;(4)正面开口前的台阶式弧形水泥箍跨度(内经)为2.10米,大于前者的1.25米。



北松山阵地炮台遗址



北松山阵地炮台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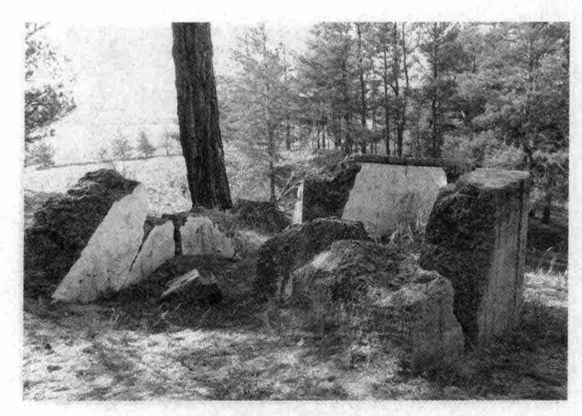
北松山阵地炮台遗址



北松山阵地炮台遗址

(4)指挥所

北纬49°13′36″,东经119°41′99″。面积4×6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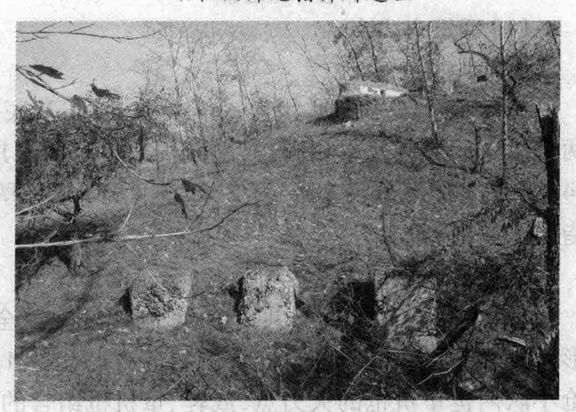
北松山阵地指挥所遗址



北松山阵地指挥所遗址



北松山阵地指挥所遗址



北松山阵地指挥所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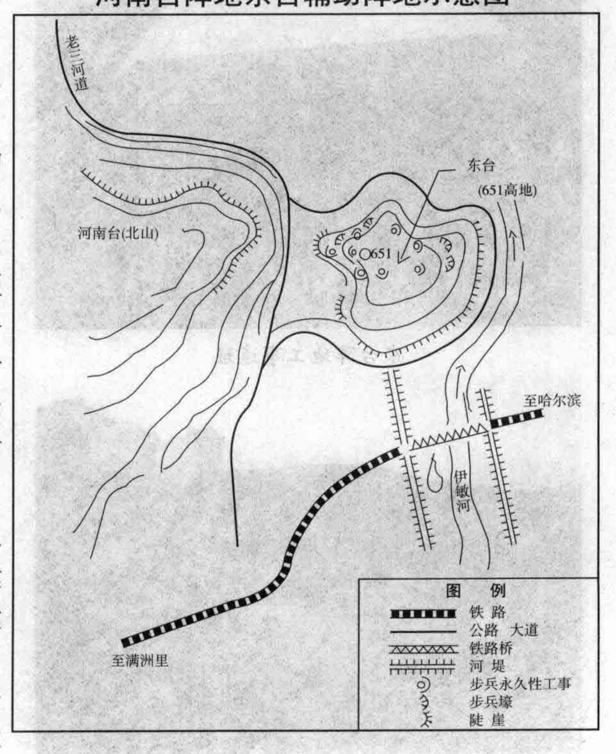
2. 东台阵地

“东台”是日军的称呼，“海拉尔河东岸台地”之意。属于河南台阵地的辅助阵地。位于今301国道海拉尔北出口路东，隔路与河南台阵地相对。地图上无名，按其海拔称之为651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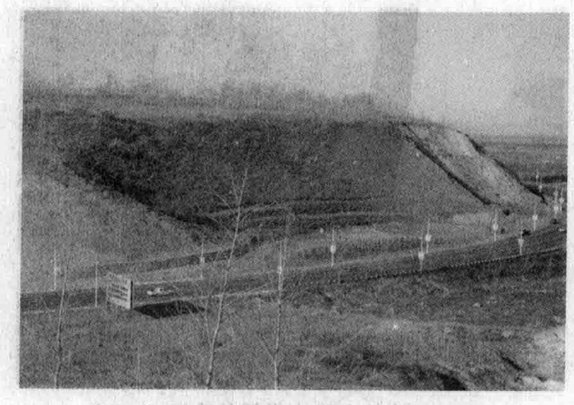
此阵地东西狭长，约1.2公里，南北较短，约0.9公里。山丘呈椭圆形，西北部突起，地势较高。向东渐次平缓下降，直连伊敏河下游接近河口处。西北距“老三河道”海拉尔河大桥约2公里，东距今建设镇以南“新三河道”与铁路交会点也是2公里。此阵地的作用是配合协同河南台阵地东翼钳制封锁海拉尔北出口及其以北到海拉尔河岸边的“老三河道”。向东可配合伊东台阵地封锁伊敏河东岸滨洲线铁路南北两侧的公路。

此阵地东部的平缓地带未建碉堡等永久性工事，只挖有交通壕、步兵壕，在一些制高点上曾建有土木结构的简易火力点工事。高地的西半部建有大小10个钢混结构各种工事，其中靠近西麓山坡断崖处的2个，近年由于施工取土，山体塌陷滑坡，工事残迹已无存，当年工事遗址只剩8个。其中各种碉堡、火力点5个，掩蔽部2个，地下仓库1个。

河南台阵地东台辅助阵地示意图




东台阵地远景


东台阵地下通往额尔古纳河方向的公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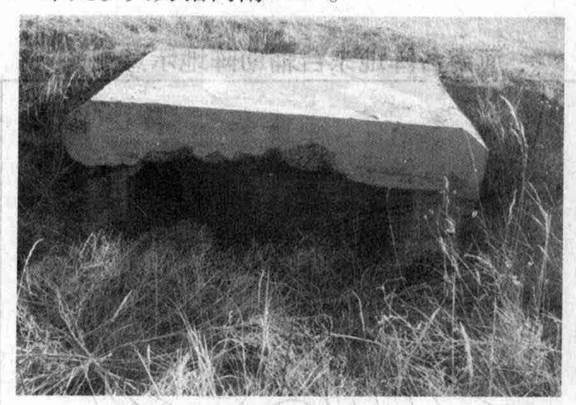
(1)碉堡火力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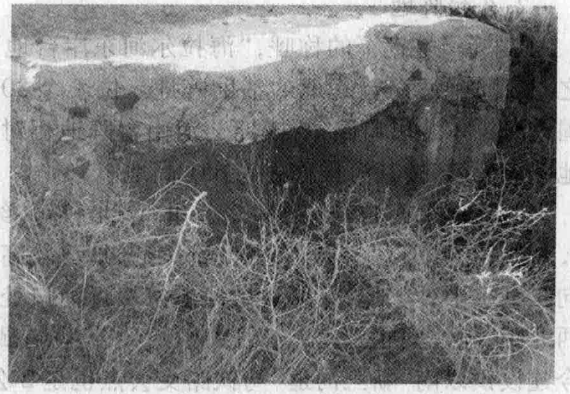
①环形单正面堡

共2个。其平面形状为一端呈椭圆形,基底主体框架是长方形,正面是环形,背面有个短通道。两个工事的形制基本相同,只是面积大小有别。其中1个位于北纬49°14′35″,东经119°44′40″,海拔648米。主体部分长7米,宽5米,正面环形,壁厚40厘米。背面出入口通道长5米,宽1.0米。火力指向东偏南138°。

②环形双正面堡

也称"双头火力点",共2个,形制和规格完全相同。从平面看,基底主体框架是6×6米的正方形,正面两角为环形,各自向外侧斜前方凸出约1.5米。背面通道长4米,3道门,壁厚1米,是重机枪小队两挺重机枪的火力点,或轻、重机枪组合的火力点。位于北纬49°14′29″,东经119°44′38″,海拔651米处。火力指向南173°。


东台阵地工事遗址


东台阵地工事遗址


东台阵地工事遗址


东台阵地工事遗址


东台阵地工事遗址


东台阵地工事遗址

（2）掩蔽部

共2个，都是单通道，但面积较大。

①北纬49°14′34″，东经119°44′35″，海拔651米。主体面积长15米，宽7米，内部有一堵间壁墙沿中线将地下空间一分为二。通道与一侧山墙平行长5.5米，宽2米。壁厚50厘米，顶厚85米。通道口朝向西258°。

②北纬49°14′32″，东经119°44′39″，海拔649米。由2个大小不同的长方形主体连成一体，大的长10.5米，宽6米；小的长8.5米，宽4米。壁厚40厘米。入口开在小房间的山墙上。通道口朝向西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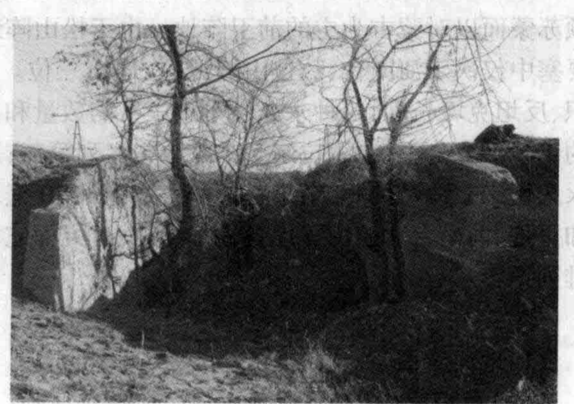

东台阵地掩蔽部遗址


东台阵地掩蔽部遗址

（3）地下仓库

位于北纬49°14′36″，东经119°44′34″，海拔655米处。主体长12米，宽12米，内部沿两个山墙中线用间壁墙一分为二，分出去的一半空间又以水泥墙纵向隔成两个小空间。进出通道在小空间上。内部净高约2米。通道口朝向东偏南134°。


东台阵地地下仓库遗址


东台阵地地下仓库遗址

三、松山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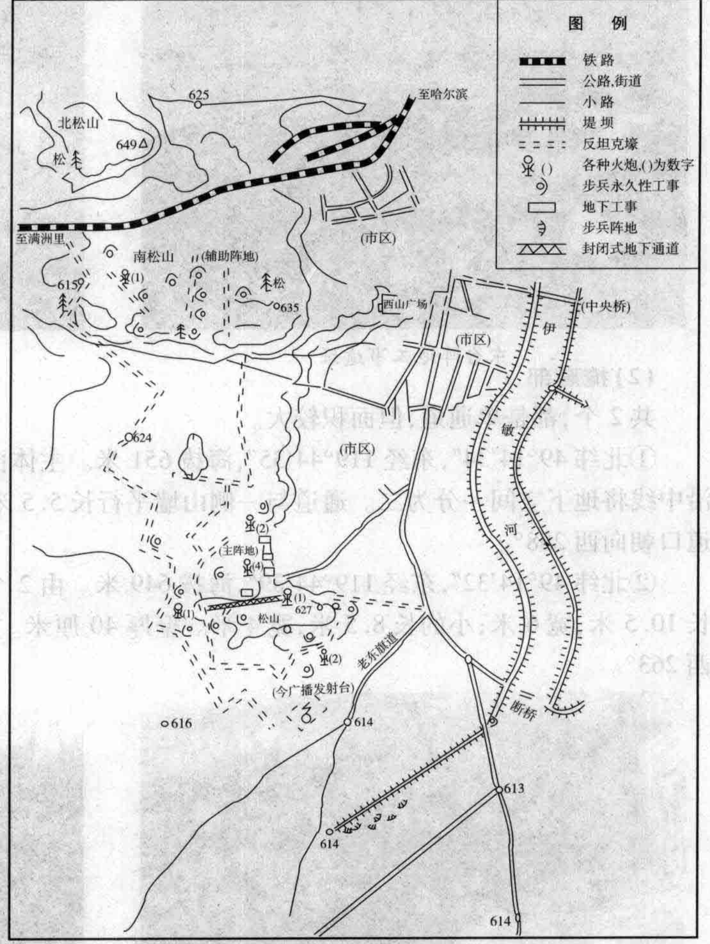
(一)概　貌

松山阵地也被日军称作“三地区”、“3号阵地”。因阵地北部有一条东西向的沙丘樟松林带而得名。

松山阵地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约1.2公里,面积约4.8平方公里。北起滨洲线铁路南侧,南达今贝尔桥(原“断桥”遗址),西及西南至伊敏河西岸,东部则直连山下的河谷市区。

该阵地的核心部分位于阵地的偏南部,地形较高,海拔635~637米,高地以西和以南是平坦的平原,低于高地10米左右。高地展望性好,可视距离向西达10公里,向南达15公里左右。其西北部为松山阵地辅助阵地——南松山阵地,与河南台阵地的辅助阵地北松山阵地隔滨洲铁路线相对。

松山阵地(三地区)示意图



松山阵地的作战正面,虽然包括西部、西南和正南3个方向,但重点作战正面是西南和正南两个方面,可在以少数兵力和工事配合北松山阵地对西部进行防御的同时,以主要兵力向南方进行防御。因为从西南方向经甘珠尔庙和阿木古郎通往海拉尔以及从南方罕达盖、将军庙、诺门罕经红花尔基通向海拉尔的两条古道就在海拉尔南郊伊敏河西岸今贝尔桥(断桥遗址附近)西北约0.6公里处交会“接轨”,监视控制住从中蒙边界通向海拉尔的这两条公路的交会点,便是扼住了这条交通要道的咽喉。从日军松山阵地反坦克壕走向看,其南部外壕的终点恰好顶在当年“老新左旗道”(海拉尔通往甘珠尔庙及新左旗的公路),而偏北约1.5公里处的内壕终点则直接连到两路的交会“接轨”点。同时松山阵地的各种工事也大半集中在南半部,这也进一步证明松山阵地的重点作战正面是西南和南部。

如果说河南台阵地和敖包山阵地是海拉尔要塞对苏防御作战的前卫阵地,那么松山阵地便是兼顾苏蒙而以对蒙古为主的前卫阵地。由于松山阵地所具有的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所以地位在海拉尔要塞中仅次于河南台、敖包山阵地,位居第三位。这从日军第8国境守备队对海拉尔各阵地占地面积、反坦克壕长度、各种永久性军事工事的数量和兵员、火炮的部署就足以看出:松山阵地的占地面积约4.8平方公里,在海拉尔5个阵地中名列第三;反坦克壕总长度约12公里,位居第二;阵地内各种永久性工事总数约80余个,排列第三;配属70毫米以上火炮20门,排列第二(海拉尔要塞的8门10加重炮,河南台和松山阵地各占一半,在这方面它又与河南台并列第一);地区守备队兵力1 111名,排列第二。

(二)主阵地

1.地面工事

(1)反坦克壕

松山阵地的反坦克壕共设外壕、内壕两道,从阵地核心部位偏东北约9.8公里处有一条起点为曲

尺形而后自西向东横穿，从西南和南通向海拉尔的两条公路的交会点。外层的第一道反坦克壕北从滨洲铁路线以南约0.4公里处的615高地东侧的公路起，折向西南约0.5公里后，以100°夹角形成一个锯齿状的外壕突出部，夹角底边向东南延伸约1公里后，又依次向西部伸出3个不同长度、不同齿状间距和不同齿座夹角的大大小小突出部，最后在正南方又形成一个小锯齿形突出部后，径直折向东南，延伸到今548广播发射台稍南的旧"新左旗道"（海拉尔——甘珠尔庙——阿木古郎大道的简称）旁。外壕全长约5.7公里。

内层的第二道反坦克壕的北部起点较外壕的北起点偏南约1公里。北起南松山（今西山公园南大墙外）南麓的一条东西向自然路边。作为重点向西南防御的阵地，背后有东西长约2公里、南北宽约1公里的连绵起伏的沙丘高地和郁闭古老的樟松林带，作为阵地的天然屏障。内壕自起点呈直线状向南延伸约1.2公里，在这条西行直线的终端处，南部和西南角封锁住了一片空地。由此东西向内壕东部向西南方向延伸成2个锯齿形突出部，再向核心阵地南部相继延伸出4个锯齿形突出部，最后从核心阵地东南北上，通往两路交会点与壕西端闭合。

（2）碉　堡

松山阵地的地面永久性工事，共约80余个（已经过测定坐标的有60余个）。在工事总数中，约有40个是各种规模和形制的碉堡。这些碉堡分布在南松山（今西山公园围墙内）及其以北地带8个，南松山以南的沙丘草场地带约32个（未测定坐标的约10个）。从遗址残迹判断，碉堡的形状有数种，例如方形或长方形、椭圆形、菜刀形、单正面环形、多正面环形、六面形、八卦形以及多堡连环的堡群、品字形排列的堡群等。这些碉堡大多数都是建在地面上的，有些是半地下的。

碉堡的面积大小不等，20～30平方米的21个；30～50平方米的9个；20平方米以下的（内有少数不足10平方米的）6个；60～100平方米的2个，1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碉堡2个。

①正方形

位于北纬49°11′16″，东经119°42′54″，海拔629米处，有1个长、宽各5米的正方形碉堡，在一侧的正中部开有一条宽1.5米、长2.5米的进出通道，通道的出口方向是109°，碉堡的北、西、南三面墙上都设有枪眼。

②长方形

位于北纬49°12′81″，东经119°41′99″，海拔632米处。有一个外观似岗亭形碉堡，长3.5米，宽2.2米。

③圆　形

位于北纬49°11′37″，东经119°43′25″，海拔637米处，有1个直径4米的圆形碉堡。

④长方形基底，一端中部为半球形

位于北纬49°12′62″，东经119°42′45″，海拔638米处，基底长8米，宽4米，在墙的一端正中部向外突出1个半径约2米的半球形正面。

⑤三正面六边形

位于北纬49°11′17″，东经119°42′56″，海拔627米处。宽约1.5米，长3米，通道出口朝向东偏南处。六面墙体长度均为5米，壁厚约60厘米，面积约50～60平方米。此堡作战正面为西部、西北和西南部。

⑥菜刀形

这种碉堡从平面上看犹如一把菜刀，长方形框架的基座像是刀身主体，而从基座一角接出的一段通道则像是刀把。这种制式的碉堡比较常见，规模不大。主体长5米，宽4米，通道宽1.5米，长3米左右。位于北纬49°11′29″，东经119°42′46″处。

⑦异形菜刀形

这是在基本保持菜刀形轮廓的基础上，对刀身主体部分作出某种改变，与通常所见的菜刀形碉堡

有所不同。位于北纬49°11′23″,东经119°42′58″,海拔629米处的一个碉堡的基本轮廓就是菜刀形,但刀身主体框架基座的前端,以45°夹角切成斜面,从而使该碉堡至少有了三个防御作战正面。

⑧一端为环状正面的曲尺形碉

位于北纬49°11′42″,东经119°43′29″,海拔637米处。正面主体部分长5.5米,背面端墙宽4.5米,连接主体的通道长2.5米,宽1.5米,壁厚60厘米。

⑨八卦形

这种碉堡的8个边长各为4米。位于北纬49°11′41″,东经119°42′93″,海拔631米处。属较大型,面积约70~80平方米。在松山阵地有2个。

⑩品字形碉堡群

松山阵地共有两个此类碉堡群,一个位于北纬49°13′43″,东经119°42′45″,海拔629米处;另一个位于北纬49°11′16″,东经119°42′43″,海拔627米处。特点是3个相距很近的方形或长方形小碉堡呈品字形排列,中央1个向前突出,后面2个稍向后平行排列,并通过内部通道或交通壕相连接。2个品字形碉堡群均设在阵地西南部反坦克壕外的"老新左旗道"路边约一二百米处。3个小碉堡的面积相同,均为3×3米,中央堡的背部通道宽1.5米,长约3米。从中央通道向左后方15米连接左侧小堡,向右后方12米连接右侧小堡,中央通道为3个碉堡共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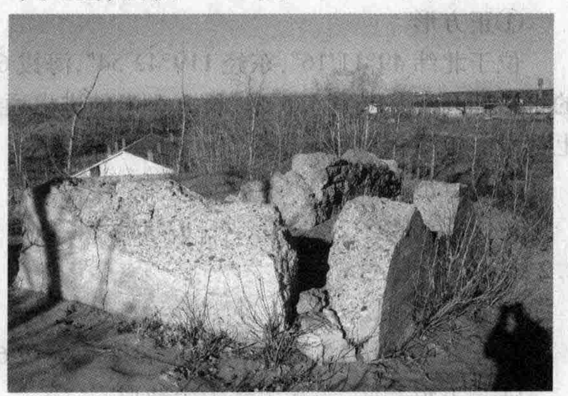
⑪双头环形正面碉堡

是以碉堡的长方形框架基座的某一面墙体为正面,并在两角各设一个环形火力点。共有2个此类碉堡。

A:北纬49°11′52″,东经119°42′98″,海拔637.2米。在正面两角设置了环形火力点。在脊背墙体的两角设置了2个进出通道。通道宽1.5米,长3米。主体面积8×4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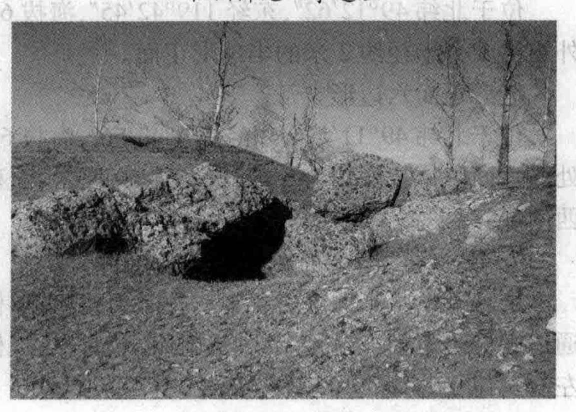
松山阵地工事遗址



松山阵地工事遗址



松山阵地工事遗址



松山阵地工事遗址

B:北纬49°11′51″,东经119°42′94″,海拔634.3米。在正面的两角各设环形火力点,而在背面两

角设有 3×1.5 米通道各 1 个。主体面积 8×4 米。

(3)炮阵地

松山阵地守备队成立当时共配有 70 毫米口径以上各种火炮 20 门(高炮、10 榴、10 加各 4 门、野炮 2 门、迫击炮 6 门)。除迫击炮可不用设永久性阵地外,还应有 14 个炮位的若干处炮掩体。踏查中已发现 5 处炮阵地、13 个炮位,按其编制定额尚缺 1 个炮位。

①台基式圆井形炮掩体

共有一处阵地 4 个炮位。此阵地位于松山阵地的南部偏东邻近沙山断层地带的 637 高地,其 4 个炮位的具体坐标位置是:

A:北纬 49°11′47″,东经 119°4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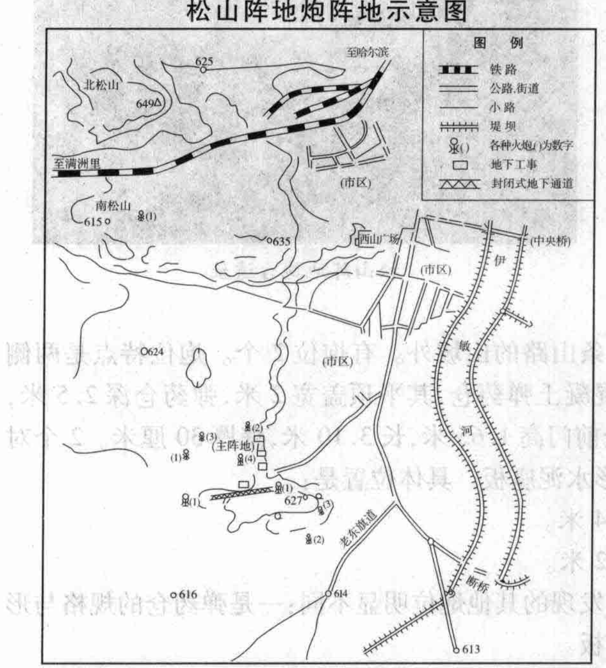
B:北纬 49°11′45″,东经 119°43′65″。

C:北纬 49°11′45″,东经 119°43′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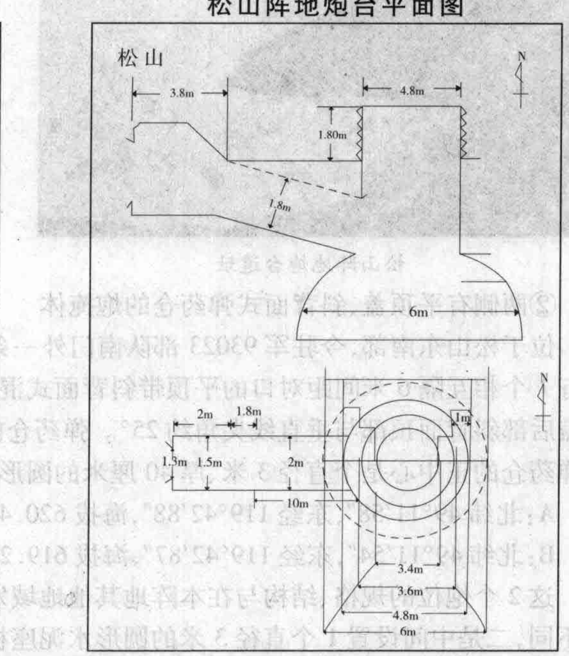
D:北纬 49°11′44″,东经 119°43′08″,海拔 636.6 米。

以上 4 个炮位呈菱形排列,相邻炮位间距 20~25 米。每个炮位都有一条约 15~20 米长、宽 2 米、内部净高 1.8 米的封闭式地下进出通道。通过出口可进入浅层地下掩蔽部。阵地附近有 2 个 6×12 米的掩蔽部。这是 1 个高炮中队,下辖 2 个小队。每个小队 2 门高炮,1 个掩蔽部。

松山阵地炮阵地示意图



松山阵地炮台平面图





松山阵地炮台出入口遗址(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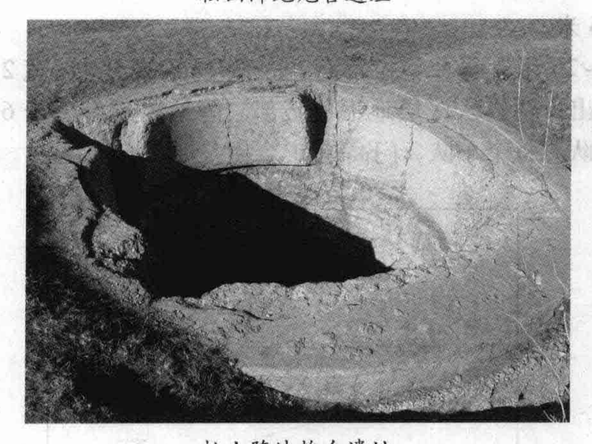
松山阵地炮台出入口遗址(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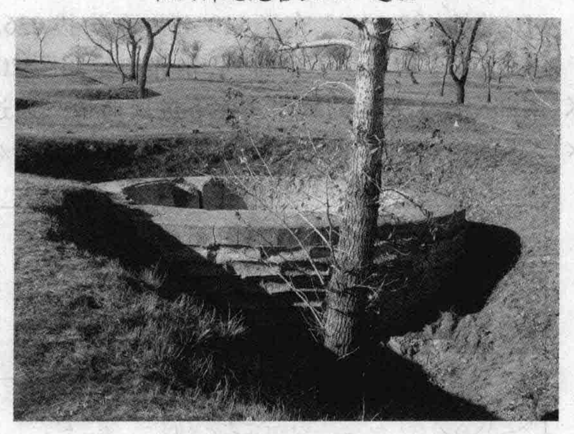
松山阵地炮台遗址



松山阵地炮台出入口遗址



松山阵地炮台遗址



松山阵地炮台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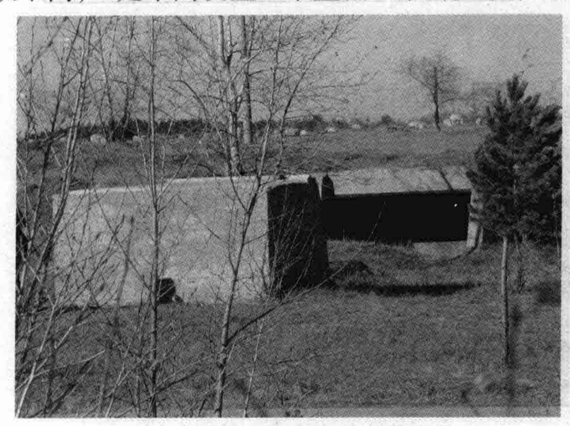
②两侧有平顶盖、斜背面式弹药仓的炮掩体

位于松山东南部,今驻军93023部队南门外一条山路的山坡外。有炮位2个。炮位特点是两侧各有1个相互隔6米间距对口的平顶带斜背面式混凝土弹药仓,其平顶盖宽2米,弹药仓深2.5米,顶盖后部斜背面顶部与垂直线夹角约25°。弹药仓前门高1.65米,长3.10米,壁厚30厘米。2个对口弹药仓的正中心是个直径3米、厚40厘米的圆形水泥座板。具体位置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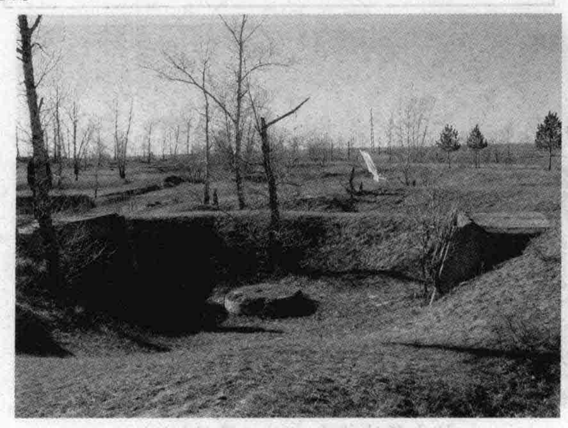
A:北纬49°11′58″,东经119°42′88″,海拔620.4米。

B:北纬49°11′54″,东经119°42′87″,海拔619.2米。

这2个炮位的规格、结构与在本阵地其他地域发现的其他炮位明显不同:一是弹药仓的规格与形状不同,二是中间设置1个直径3米的圆形水泥座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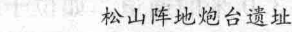


松山阵地炮台遗址



松山阵地炮台遗址





松山阵地炮台遗址



松山阵地炮台遗址

③两侧设有弹药仓的八字形水泥掩体护墙炮掩体

这种阵地共发现2处,4个炮位。一处位于松山阵地东南部山下,今市广播电台548发射台北部约0.7公里处。2个炮位通过间隔2.45米的水泥墙连成一体。八字形护墙中部各向外开有一个长、高各1米、宽80厘米的弹药仓,墙高1.10米,长3.2米,厚40厘米。八字墙的正面(前)开口有一道3级弧形台阶,宽1.50米。墙的后开口约3米。两门炮各自对着不同的方位角:一门朝正南略偏东175°,另一门则指向正西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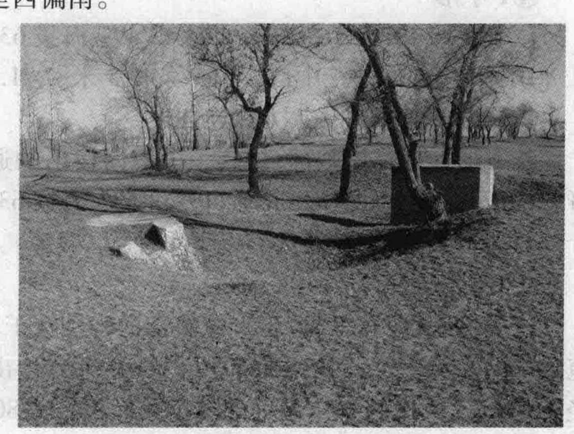
这两个炮位的坐标是:

北纬49°11′,东经119°43′。海拔607米。

另一处在山上,北纬49°11′50″,东经119°42′79″,海拔634米的堡群以南约200余米处,两炮间距8米,但工事封土连为一体,火力指向一是正南,一是西偏南。



松山阵地炮台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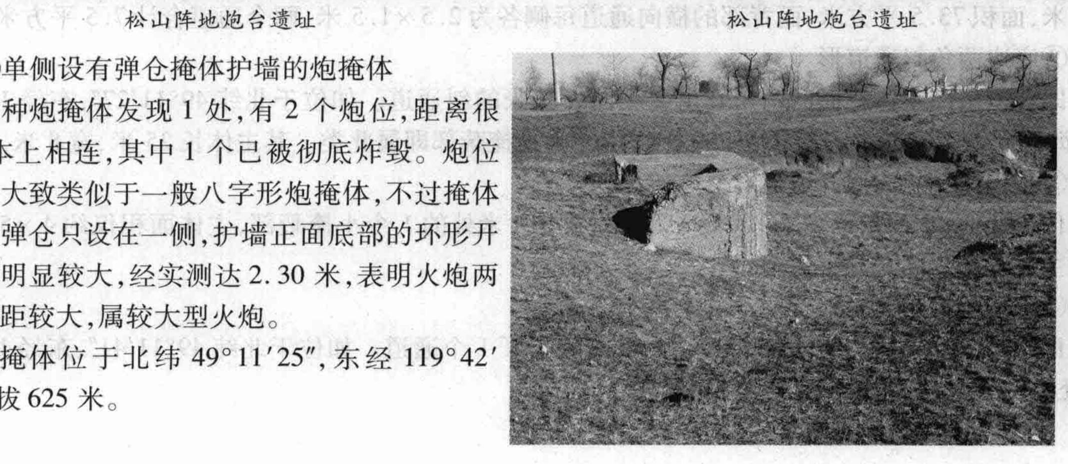


松山阵地炮台遗址

④单侧设有弹仓掩体护墙的炮掩体

这种炮掩体发现1处,有2个炮位,距离很近,基本上相连,其中1个已被彻底炸毁。炮位的制式大致类似于一般八字形炮掩体,不过掩体护墙及弹仓只设在一侧,护墙正面底部的环形开口跨度明显较大,经实测达2.30米,表明火炮两轮的间距较大,属较大型火炮。

炮掩体位于北纬49°11′25″,东经119°42′35″,海拔625米。



松山阵地炮台遗址

(4)掩蔽部

松山阵地共发现大小掩蔽部遗址约20个,其中松山阵地北部有5个,其余在松山阵地的南部。面积10平方米以内的3个,11~20平方米的2个,20~30平方米的8个,60~100平方米的6个,100平方米以上的1个。掩蔽部一般只设1个出入口,而炮兵用掩蔽部是1个小队(2门火炮)使用1个,因小队官兵人数多达六七十人,掩蔽部面积都在60~100平方米。为便于出入,这种大、中型掩蔽部都从不同方向开设2个出入通道。

掩蔽部内部净高1.80~2.0米,壁(顶)厚40厘米,顶面还被覆约1.5米厚的土层。松山阵地的掩蔽部,其形制大致有9种,其中单通道小型掩蔽部5种,双通道大、中型掩蔽部4种。单通道小型掩蔽部的形状有:

①菜刀形

在长方形掩蔽部平面的一侧,接出一个宽约1.5米、长约2.5~3.0米的通道。如位于北纬49°11′23″,东经119°4′00″,海拔631米处的1个主体面积为24平方米的掩蔽部,其主体部分长6米,宽4米,从墙体一侧接出一条1.5×2.5米的通道。

②正曲尺形

是从掩蔽部主体的1个端面上,接出1条与端墙外线相垂直的通道。如位于北纬49°11′53″、东经119°42′98″、海拔614.8米处的1个小掩蔽部,长5米,宽4米,其通道便接在与主体端墙外线相平行的直线上。

③斜通道形

这种掩蔽部的特点是进出通道呈较大角度,从主体背面的一角斜通道进入掩蔽部内。位于北纬49°11′43″、东经119°42′25″、海拔630米处的1个小掩蔽部就是此形状。

④T字形

位于北纬49°11′16″、东经119°42′49″、海拔630米处的1个小掩蔽部,长7米,宽3米,主体面积21平方米,从主体的正中部接出一条长5米、宽1.5米的通道。

⑤掩蔽部经通道与火力点连体形

长方形框架是掩蔽部,从其一个端面接出的通道直通正面的圆形碉堡,形成合二为一的连体工事。位于北纬49°11′16″、东经119°42′53″、海拔631米处的连体掩蔽部即是此形状。

双通道大、中型掩蔽部有以下4种:

①T形

这类掩蔽部与单通道T形掩蔽部的区别在于单通道横为主体,纵为通道。而双通道则是以纵为掩蔽部的宽大主体,而从主体一侧的两角平行伸出两条相对窄小的通道。如位于北纬49°11′13″、东经119°42′52″、海拔624米处的1个总面积约达80余平方米的掩蔽部,其纵向的主体面积长10.5米,宽7米,面积73.5平方米,而背部的横向通道每侧各为2.5×1.5米,两个通道合计7.5平方米。

②底边两角斜通道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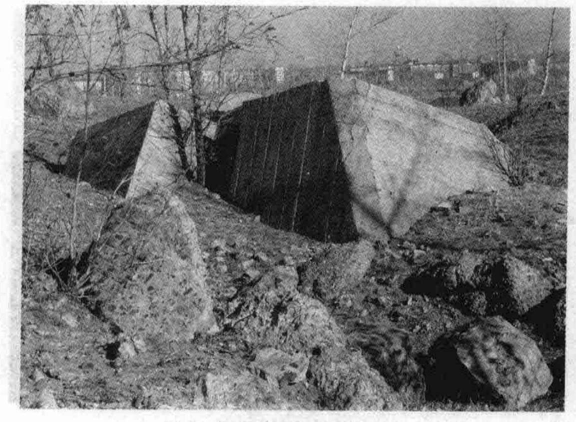
即在掩蔽部主体背面的两角开出2个向外开张的斜通道。如位于北纬49°11′27″,东经119°43′06″,海拔625米处的1个面积为200平方米的大型掩蔽部即属此类。其主体长25米,宽8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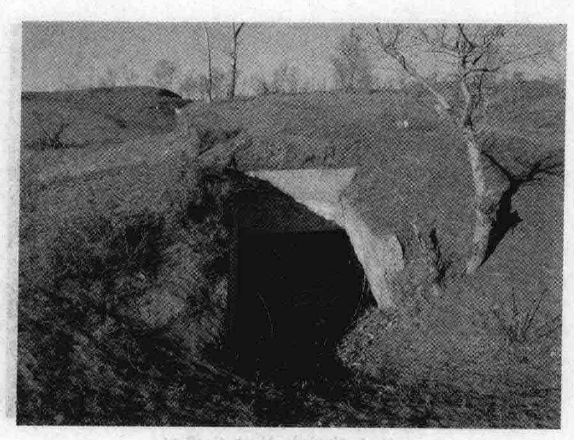
③主体两端斜向对开通道形

位于北纬49°11′21″、东经119°43′21″、海拔619米处的1个小掩蔽部,主体面积仅约4×5米,但却在主体两端斜向对开了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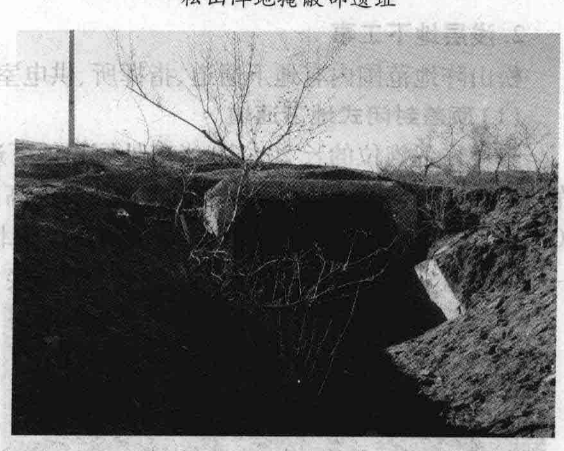
④异形菜刀形

即在菜刀形单通道掩蔽部"刀背"的外端处再开1个通道。如位于北纬49°11′41″、东经119°43′24″处的1个掩蔽部即属此类,面积6×10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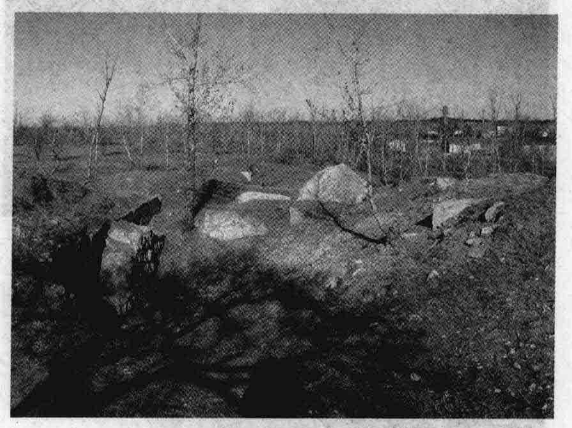

松山阵地掩蔽部遗址


松山阵地掩蔽部遗址


松山阵地掩蔽部遗址


松山阵地掩蔽部遗址


松山阵地掩蔽部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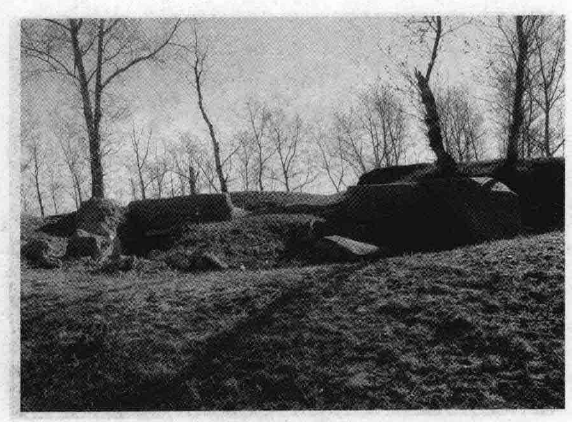

松山阵地掩蔽部遗址

(5)露天立射机枪掩体

只1处,是一个略呈前三角形排列的3个小工事群,相邻两点间距离约20~25米。处于松山阵地西正面一条南北向的交通壕边,其火力指向是西北和西。第一个工事位于北纬49°13′53″、东经119°41′56″、海拔631米的小高地上,是一个半地下露天立射式机枪阵地,有2~3个射击正面,深约1.30米,通道宽约1.5米,射击正面一面为斜边,一面为环形边。通过约2米长的通道连接1个可供机枪射手和弹药手作寝室的浅层地下掩蔽室,由此经交通壕向南约25米处是1个2×2.5米的小型钢混结构房间,深约1.5米。其东南约20米处又是1个露天火力点,位于北纬49°11′42″,东经119°42′25″,海拔631米。



松山阵地机枪掩体遗址



松山阵地机枪掩体遗址

2. 浅层地下工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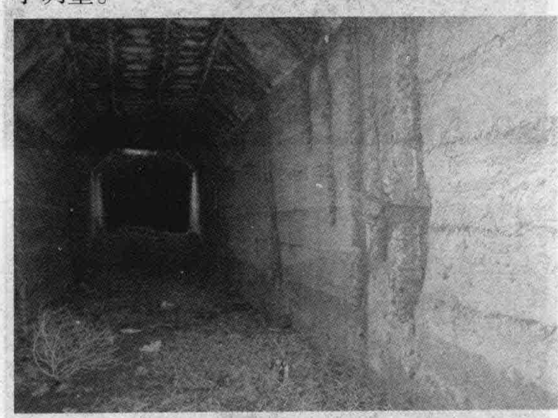
松山阵地范围内有地下通道、指挥所、供电室、泵水房、仓库等地下工事近10处。

(1)顶盖封闭式地下通道

除通往各炮位的长20~30米多处短程地下通道外,还有一条较大的浅层地下通道。它东起松山阵地南部东侧台基式圆井形炮阵地附近,通道高1.80米,宽1.50米,长约280余米,水泥壁(顶)厚60厘米,被覆土层约1~2米。这条通道在位于北纬49°11′19″,东经119°42′57″,海拔629米处分岔,一股向西直达终点,另一股向西南数十米后连接1个小碉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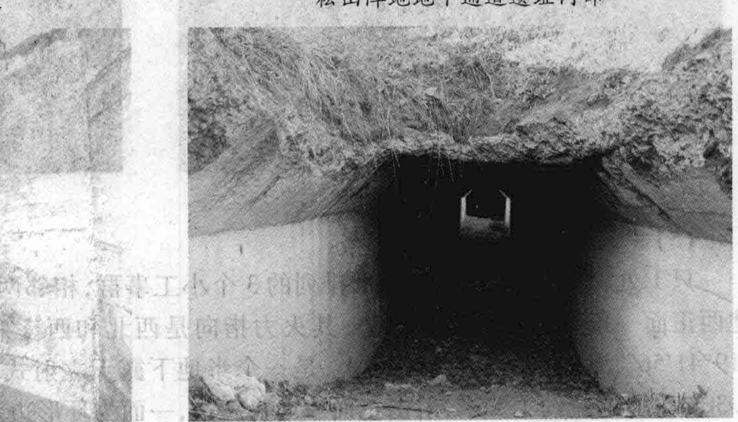
松山阵地地下通道入口遗址



松山阵地地下通道遗址内部



松山阵地地下通道遗址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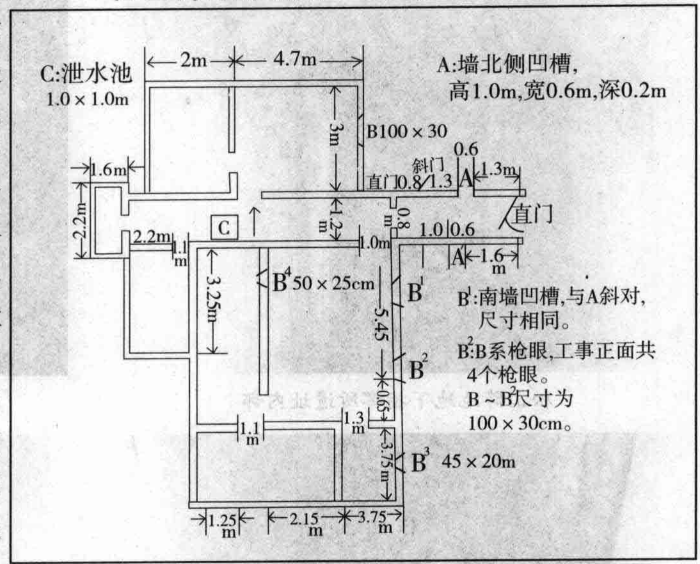


松山阵地地下通道遗址内部

(2)指挥所

松山阵地有地区守备队指挥所和步兵中队指挥所。

松山阵地东部第一地下工事示意图



①今驻军部队南门外西南约 200 米处的东西向上山公路路北,有一个钢混结构作战工事。位于北纬 49°11′35″,东经 119°43′02″,海拔 624 米。洞口方向 49°。结构是在通过向前突出的长 4 米并装有 3 道门的进出通道后,进入宽 1.2 米、长约 13 米的中央走廊。走廊北侧有大、小 2 个房间,南侧有大、小 5 个房间,走廊最西头有 1 个小房间,面积共约 238 平方米(其中走廊南侧房间约 200 平方米,北侧房间 21 平方米,走廊 17.3 平方米)。通道洞口南侧的东正面稍向前突出,北侧的正面则稍向后收缩。南侧的东正面,共有大、小 3 个枪眼,其中宽 1.0 米、高 30 厘米的枪眼 2 个;宽 45 厘米、高 20 厘米的枪眼 1 个。北侧的东正面则只设有宽 1.0 米、高 30 厘米的枪眼 1 个。

工事依山而建,主体深藏山体中。走廊的西尽头的小房间是配电室,也是直通山顶的观察口。该工事是松山地下工事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北、西、南三面靠山体,安全、隐蔽,可免受直接进攻,唯一暴露的东正面朝向市区,对于松山阵地来说,它是后方,且正面设置多个枪眼,防守火力严密,是个重要的指挥所驻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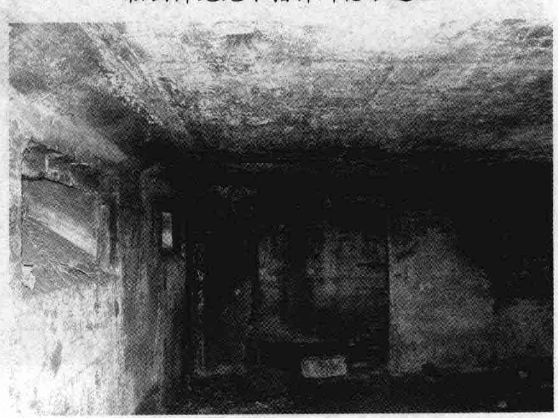
松山阵地地下指挥所出入口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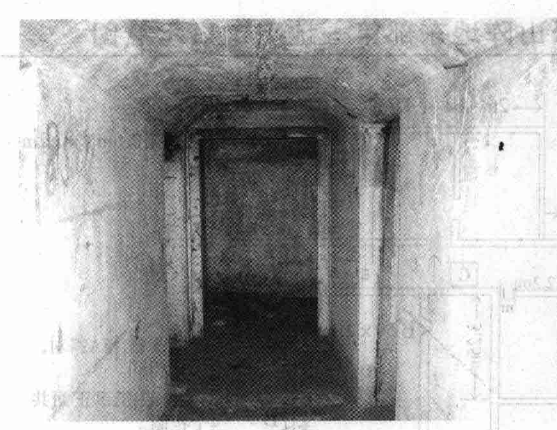
松山阵地地下指挥所枪眼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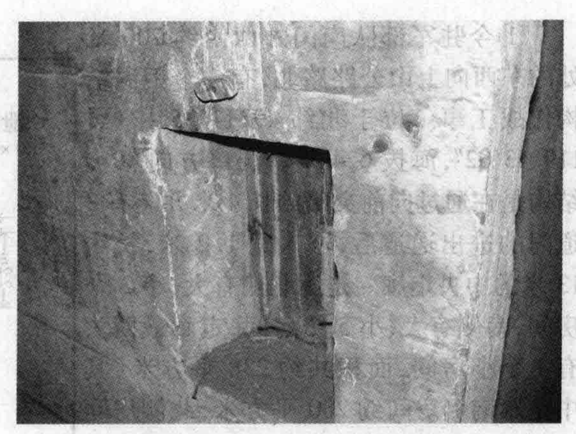


松山阵地地下指挥所遗址内部



松山阵地地下指挥所遗址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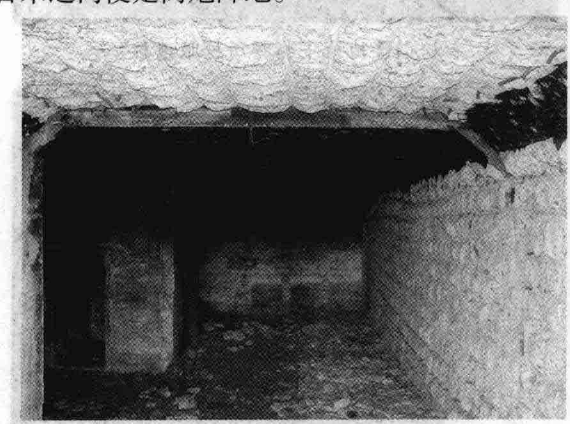

松山阵地地下指挥所遗址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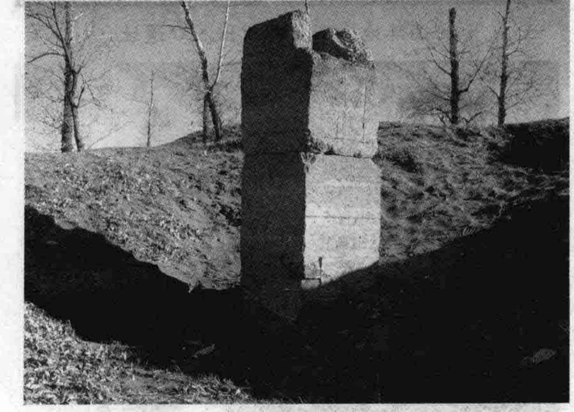

松山阵地地下指挥所灯台遗址


松山阵地地下指挥所走廊泄水池遗址


松山阵地地下指挥所通道遗址

②在北纬49°11′23″、东经119°43′06″、海拔633米处,有一个东西长约15米、南北宽10米的浅层地下大厅,在顶盖上有2个通气孔,西部有3个直径1米,呈品字形排列并有台阶或爬梯的圆形通地下大厅的井口,还有1个直径约1米的半圆形开口,地下总面积约150平方米。东北角紧贴地下通道处从地面伸出1个2米多高的方形烟囱,洞口设在靠近东南角处,方向200°。推测此处是地区守备队(1945年初改编为独立步兵第587大队)的指挥所。因为一是这里位于阵地重点防御正面即西部和西南部、南部的后方,离正面前沿较远;二是地势较高,便于观察了望;三是紧靠地下交通壕;四是北部百米之内便是高炮阵地。


松山阵地地下指挥所遗址内部


松山阵地地下指挥所烟囱遗址

③距上述地下大厅南约30米处,又是1个地下大厅,面积为12×12米,内部净高约1.80米,洞

口朝向 49°。内部用一堵东西向水泥墙将此大厅一分为二。

(3)地下仓库

共 2 个。一个位于阵地南部沙山东麓,另一个位于前者西南部约 400 米的 1 个山谷小高地前,仓库基本完好。洞库的形制、规模、结构完全一致,洞库依山而建,其主体部分深入山丘腹部。洞库的正面有 2 个相距 16 米并平行通向洞库纵深的洞口。洞口前是高 20 厘米、宽 25 厘米的 6 级台阶。下台阶后,通过一段宽 2 米、长 1.5 米的平道,和直、斜、直 3 道宽 1.5 米的门,进入长 5 米,宽2..2 米的进出口通道。由进出口通道终端的门继续向西,是一条 6 米长、2.2 米宽的走廊。走廊一侧是长 6.4 米的东西向间壁,在此间壁正中间又有一条南北向的间壁(壁厚均为 30 厘米),将南北两条走廊夹成的大空间,均匀地分割成 3×12 米的 2 个大库房。库房南北两侧中间部位,各开有 1 个宽 1.2 米、高 1.8 米的房门,在两门靠近间壁墙的门角一侧墙壁上,分别开有 1 个直径 25 厘米的通风孔。两侧走廊地面均设有泄水沟、槽。走廊和房间均有照明线路,顶棚上有 30×30 厘米的方形灯座,灯座两角设有直径 20 厘米的通风孔。

松山阵地地下仓库示意图

这两个地下仓库的坐标是:

①北纬 49°11′26″,东经 119°43′08″,海拔 627 米,洞口朝向 219°。

②北纬 49°11′36″,东经 119°43′28″,海拔 602 米,洞口朝向 61°,在前者山后西南方约 400 米处。仓库基本完好。

(4)地下供电、泵水房

位于松山阵地南部沙山东麓,在第一个地下仓库以北约 150 米处,沿山脚向山体纵深建成,并深藏于山体腹部,洞口紧贴山脚。这是一个由南北相距约 10 米的两条洞口通道相连接的地下供电、泵水房兼小型蓄水库。总建筑面积 167.3 平方米。两条东西通道的西端,连接着一条宽 1.5 米、长12.7 米的南北向走廊。走廊的北部是个 3×4 米的房间,房门设在房间东北角处。房间内东南角地面上有个 0.6×1.2 米、厚 0.37 米有螺栓遗迹的水泥机座,房间北墙中部偏西处有长方形清水井口,60×90 厘米,至今里面盛满清水,水深 2 米以上,井口下水池范围大小不明。此房间是供电和泵水房。与供电和泵水房一墙之隔的走廊南部是个 5.3×10.25 米,总面积约 55 平方米的大房间,其房门也开在其东北角。在房门北侧距南墙 3 米处,用一堵东西向间壁将此大房间南北隔成两半,北半部分成了大小 3 个房间,中间的 1 个是 2.3×2.3 米的小房间,其地面靠西北角紧贴北墙处是个长方形地下水窖口,满窖清水,深不见底,其地下水窖可能连到北端的整个房间。小房间两头的 2 个房间无任何设施遗迹。大房间的南半部是个没有间壁的筒子房,面积是 10.25×3 米。房间内东南侧靠墙角处的地面上,有个 60×90 厘米的东西向长方形水池井口,井口地面以下可看到有直径 2.5 米的大口径水泥管,深约 2~3 米。其上部的长方形池口南端连接着墙下走廊的泄水槽,此处是大型污水井。离此污水井上部的长方形池口西端 5 米处,又是一个 60×90 厘米的长方形井口,井口下部也是一个直径 2.5 米的大水泥管,井深 2 米以上,满是清水。

这个供电、泵水房的坐标是北纬 49°11′43″,东经 119°43′14″,海拔 616 米,洞口朝向 16°。

松山阵地东部地下供电泵水房示意图

B:走廊北侧墙内凹槽断面
0.8 m
1.0m
0.6m
1.75m
1.6m
D:泄水池 0.6 × 0.9m
E:清水池口,其下为圆井φ2.5m,满井清水深2m以上
10.25m
2.2m
1.28m
1.25 m
0.65 m
1.45 m
B
C 泄水漕 0.7 × 0.7
直门
斜门
D
5m
E
3m
1.25m
1.5
1.25m
0.8
门
东
1.5 m
F
2.3m
5.25 m
机座0.60 × 1.2m 厚0.37m
J
A:横廊内侧泄水槽
3.2 m
A
3m
1m
H
直门
4m
1.45m
1.3m
1.6m
H:清水池口,地面以下满室都是清水,深12m以上,长0.9m,宽0.6m

(5)半地下机械检修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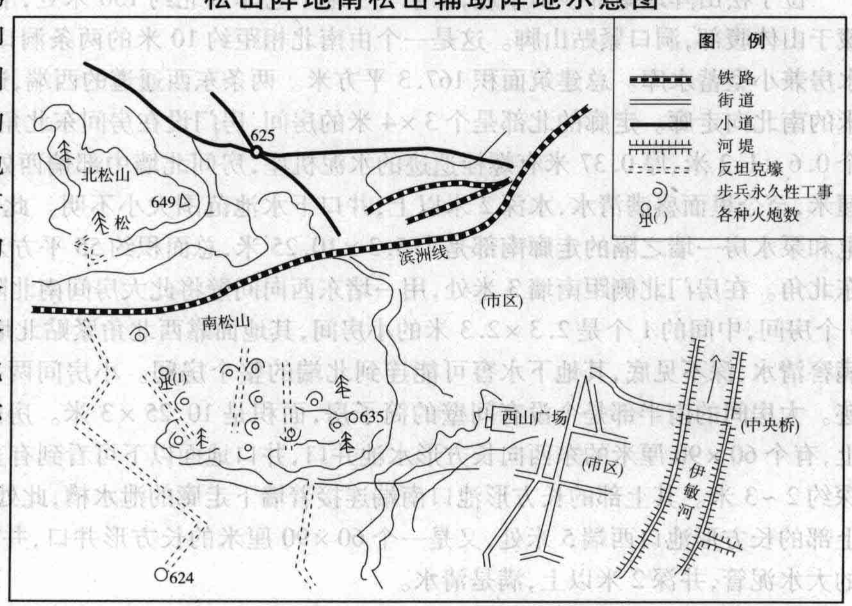
是一个依山而建、藏在山体腹部的钢混结构建筑物,位于供电、泵水房以东约400米处。北纬49°11′23″,东经119°43′24″,海拔617米,洞口朝向226°。形状似两个大小不同的长方块套接成一体,前半部是个3×4米的房间,门开在正中,宽约2.6米,高3米,汽车或其他车辆可直接驶入、驶出。内间或后半部是个6×8米的大房间,房间西南侧又间壁成1个约2×2米的小房间。房间内照明和其他用电线路俱全。房间框架基本完整。

(三)辅助阵地—南松山

1. 概　貌

南松山辅助阵地位于第三地区松山阵地的北半部,即今海拉尔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内,以及公园北大墙以北约0.7公里到滨洲铁路线的地区。阵地的中心部位和工事密集地区,恰在一块东西长约2公里、南北平均宽约0.7公里的狭长松林地带,又隔铁路线与路北的"河南台"阵地北松山辅助阵地相对应,故被称为南松山阵地。

松山阵地南松山辅助阵地示意图



该阵地的地势特点是东高西低,林带西部边缘以西的广阔草原地带,平均海拔在615米左右,而林带中部的偏东丘陵地带,海拔多在630米左右。其中最高的沙丘,今森林公园著名旅游景点"名人峰"的海拔达664米。这比其南部松山主阵地的最高点636.6米还高出约28米。比

起铁路对面北松山阵地的最高海拔649米也高出15米。

日军利用这片松林中间部分的有利地形，沿着蜿蜒起伏的沙丘山脊高地，由西北向东南，再由南部向西北，建成一条略呈U形的作战防御线。这条U形线开口朝向西北，有长约330米正面地域可能由于地形原因而未修建碉堡工事予以闭合。另外，在林带西部边缘山脚下的草原地带修建了一条先是自东北而南，而后又以直角形由西北而向东南转折的阵地西部外线反坦克壕。在松林中部U形防御线内也修建了长短不同的两道反坦克壕。阵地内有碉堡火力点或掩蔽部等永久性工事约20余个，测定坐标的有16个。

2. 反坦克壕

该阵地内共有3道反坦克壕。

(1)林带西部边缘以西约三四百米处的大体呈南北走向的西外壕。这条壕的北端点起于公园北墙西端以东约700米处，坐标为北纬49°12′84″，东经119°41′83″处，紧贴公园北大墙基底(公园大墙系20世纪90年代初所建，原无墙)。此反坦克壕实际上还向墙外西北部延伸约二三百米。从外壕在今北大墙基底的北端点起，壕头向东南约30°方向延伸约250米，到今公园内部连接前后门的东西大道旁，向东约10米，与北偏西25°的一条约80米长通往本阵地最北部的一个独立监视哨所的反坦克壕南壕头交会。由此交会点的公园东西大道以南起，反坦克壕以南偏西约201°向西南延伸约350米，再折向东南约三四百米到619高地附近，便到达南松山阵地的南界。这便是松山阵地北部西正面反坦克壕的第1个锯齿形大折角。

西外壕内侧(东侧)南北约400米内，基本上未设步兵阵地。其壕东的北起第1个火力点是1个步兵炮的炮位，西距壕边约八九十米。第2个火力点位于步兵炮东南约200米，西距反坦克壕约200余米。


南松山阵地反坦克壕遗址


南松山阵地反坦克壕遗址

(2)在公园的松林地带中部东西大道以北约130余米处，是1道大体上呈西北—东南向(东偏南122°)的反坦克壕，全长约800米。其西北部起点的坐标为北纬49°12′65″，东经119°41′96″，海拔620米。此壕断面呈V字形，壕的上口宽虽达到5米标准，但上口两侧斜面直接连向壕底中心线。

(3)在上述第(2)壕的北端点以东约400米处，是本阵地内的第3道标准规格的反坦克壕，其北端起点坐标为北纬49°12′68″，东经119°42′33″，海拔623.8米。北距公园东西大道约500余米。南北走向，长约800～900米，向南连接或靠近松山阵地中部的反坦克内壕。

3. 碉堡火力点

该阵地的各种碉堡火力点遗址尚存16处，其中位于第三道反坦克壕以东地区南北约340米范围内高地群的有12处(碉堡火力点7处，掩蔽部5处)，在第三道反坦克壕以东到外壕以西地域内有4处(火力点3处，掩蔽部1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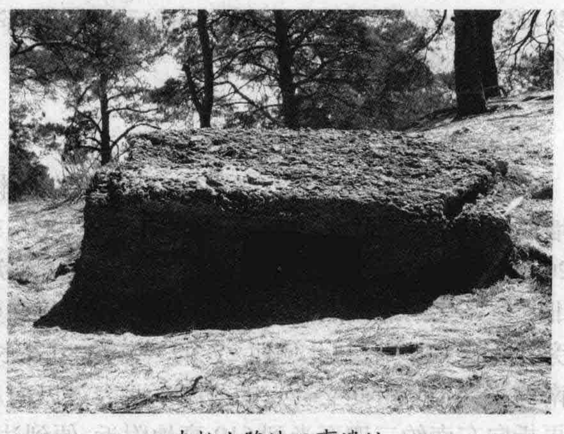
这些永久性工事沿林带中部东西两侧高地，大致形成一个U字形工事分布线，只是西北部开口

较宽，不像U字的两竖那样平行。同时，在距U字形工事分布线上开口的大致中心部位西北约400余米处，有1个远离其他工事而单独设置的小型监视哨所，其面积只有8平方米左右，仅仅能容纳2人。

在十几个碉堡火力点中，除有1个步兵炮炮位和1个面积近40平方米的“三头火力点”外，其他都是面积从十几平方米到二十几平方米不等的较小型碉堡、火力点。

（1）步兵炮

坐标为北纬49°12′63″，东经119°42′05″，海拔603米。火力指向西偏北305°。其两侧带弹仓，八字形掩体护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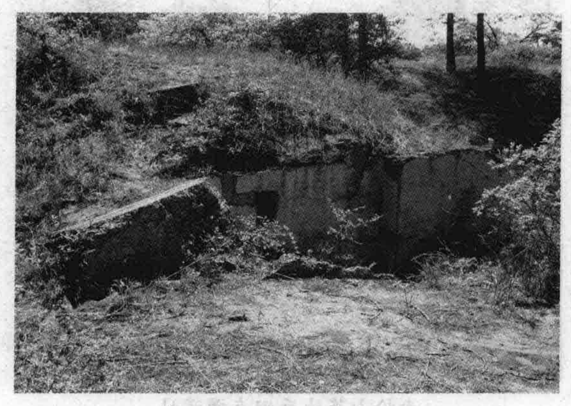
南松山阵地工事遗址

（2）小平房式明碉

本阵地最北部的独立监视哨所。位于北纬49°12′79″，东经119°42′03″，海拔608.4米。此哨所在建筑风格上明显有别于一般碉堡火力点。它是一个用素混凝土直接建在地面上并不加任何伪装和被覆防护土层的小平房式明碉。其建筑面积为3.65平方米，山墙宽2.45米，房脊高2.2米，房底基座高15厘米，壁厚30厘米。在其东侧山墙开有1个小门，宽90厘米，高1.5米。房间内部为拱形，拱顶高1.9米。房间内部净长3.0米，净宽1.2米。房的东北角向正面突出一个长60厘米、宽1米的凸出部，这是值勤监视平台，它从正面房基起向正面斜上方筑起30×30厘米、宽1米的3级台阶，再向上30厘米是一个长60厘米、宽1米的了望平台，平台周围有高约1.3米的掩体墙和枪眼，上部有遮挡风雨的“雨搭”。这个了望平台也是小房间采光、通风的渠道。



南松山阵地工事遗址



南松山阵地工事遗址

（3）三头火力点

位于北纬49°12′59″，东经119°42′49″，海拔662.1米。平面形状是6×6米的正方形框架，基底的背面一角，接出1条1米宽、7米长的通道。从残迹看，在墙体的北面、西面和南面的靠近西侧处曾设有3个卧射或跪射枪眼。壁厚50厘米。

（4）曲尺形火力点

坐标为北纬49°12′53″，东经119°42′51″，海拔618.6米。平面形状是长5米，宽4米的框架，在其背面连接有长4米、宽1米的通道。壁厚50厘米。火力指向西偏北295°。

（5）双头火力点

位于北纬49°12′55″，东经119°42′16″，海拔662.5米。其外表稍显特殊：两个山墙一长一短，长的一面为3.5米，短面为2.5米，长短不对称。工事背面的出入口开在中线的偏长山墙一侧，通道宽1米，长5米。枪眼设在正面两个墙角的“抹斜”方向，构成“双头火力点”。其火力指向一侧为南偏西

200°，另一侧为西偏北 290°。



南松山阵地工事遗址　南松山阵地工事遗址

南松山阵地工事遗址　南松山阵地工事遗址

南松山阵地工事遗址　南松山阵地工事遗址

4. 掩蔽部

阵地内共发现各式大、小掩蔽部 6 处。从其结构形制上看有双通道的 3 个，单通道的 3 个。从面积上看，有 200 平方米以上大型掩蔽部 1 个，40 平方米以上中型掩蔽部 1 个，其余是从 10 余平方米到 30 左右平方米的小型掩蔽部。

6 个大小掩蔽部中，面积在 40 平方米以上的，都设有两个通道。

（1）在两端山墙设置对角式双通道

位于北纬 49°12′70″，东经 119°42′39″，海拔 628. 8 处的 1 个掩蔽部，其形状是长方形，长 8 米，宽 5 米，其两条进出通道分设在两端山墙的对角线上。通道长 3. 5 米，宽 1 米。掩蔽部壁厚 50 厘米。

（2）与两端山墙平行设置双通道

“名人峰”东南约 130 米，位于北纬 49°12′61″，东经 119°42′52″，海拔 635. 5 米处的 1 个大型掩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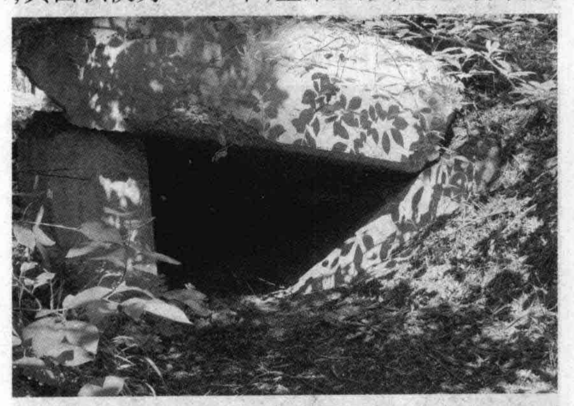
部，其两条通道便与两端山墙平行。这个掩蔽部呈长方形，长约 90 米，宽约 10 米，两条通道各长 8 米，宽 1 米。内部四壁净高 2 米，壁（顶）厚 1 米。

（3）两侧对开式双通道

位于北纬 49°12′58″，东经 119°42′58″，海拔 651.5 米处，有一个通过 1 条封闭式短通道直接和近旁火力点相连的掩蔽部。其平面形状为长方形，长 8 米，宽 4 米，壁厚 50 厘米。通道宽 1.10 米，高 1.30米，通道平行相对设在墙体的两面，在掩蔽部背面只有进出口，未设通道。其正面通向火力点的通道则呈弯曲状。

（4）菜刀形单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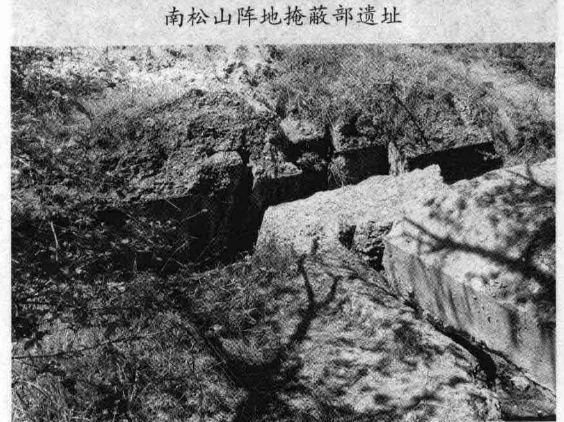
这是小型掩蔽部，面积一般为 10 余平方米。位于北纬 49°12′50″，东经 119°42′21″，海拔 619.5 米，其面积仅为 3×5 米，呈菜刀形，通道与侧墙平行，长 4 米，宽 1 米，壁厚 30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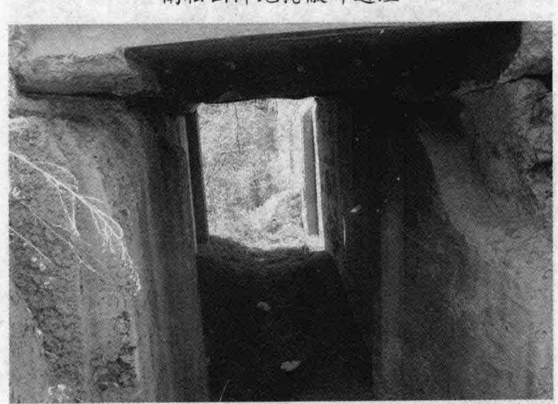
南松山阵地掩蔽部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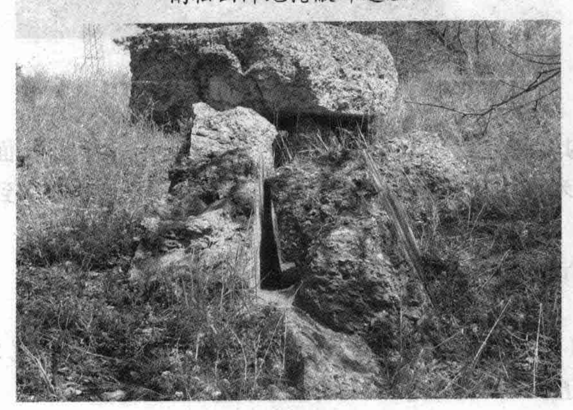
南松山阵地掩蔽部遗址



南松山阵地掩蔽部遗址



南松山阵地掩蔽部遗址



南松山阵地掩蔽部遗址



南松山阵地掩蔽部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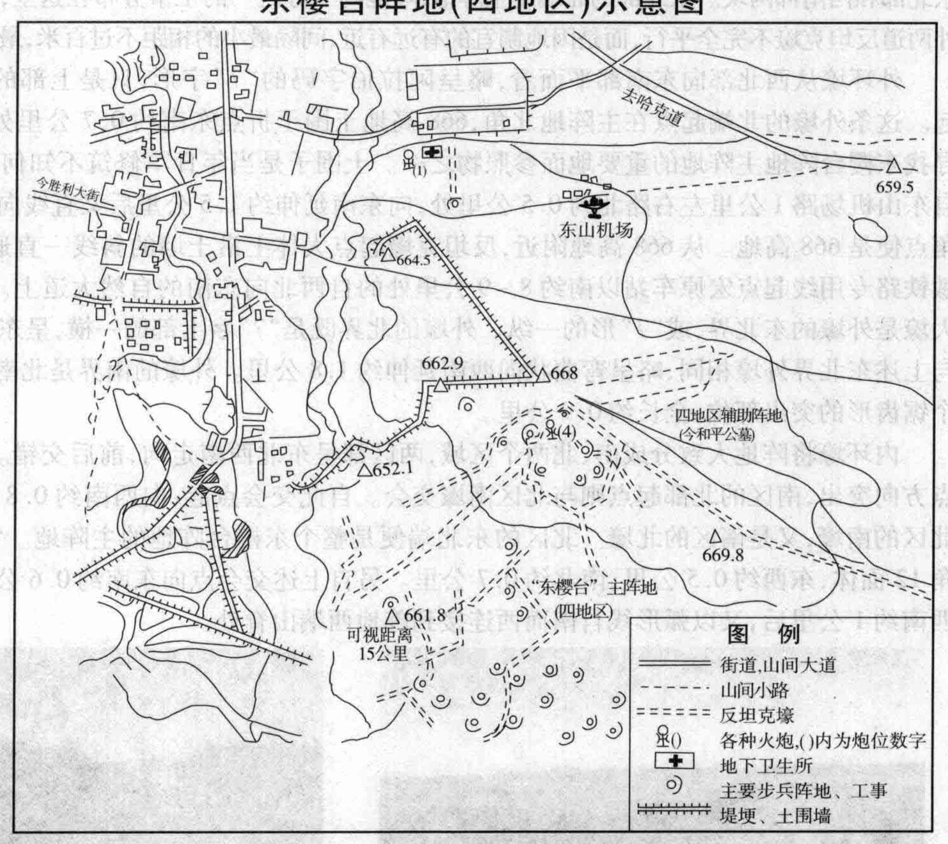
四、东樱台阵地

（一）概　貌

东樱台阵地即四地区。由于该地遍生干枝梅花，形色酷似日本樱花而得名。阵地枢纽部位于东南山，从海拉尔市区河东学府路南行到和平4路向东登山约2公里即到，阵地制高点海拔668米。这个地势在周边15～20公里范围内是屈指可数的。阵地北靠今呼伦大街东端上山后的哈克大道，西临沙山断层崖壁和山下谷地，东部和南部是平坦草原。

阵地占地范围较广：北从哈克道，南至阵地南正面前沿独立支撑点（北纬49°09′87″，东经119°45′30″，海拉尔友联村东南约2公里处）长约7公里；西部从山脊到东部西北东南向反坦克壕的终点，宽约6公里。主阵地位于阵地中部偏北处，南北长约0.5公里，东西宽约0.7公里。主阵地的南、北还各有1个辅助阵地，在南正面前沿还有2个独立支撑点。北部的辅助阵地在主阵地的东北方约1.5公里处，今和平公墓东围栏外以北地区。其范围南北约1.5公里，东西约0.8公里，周围有反坦克壕。南部辅助阵地位于主阵地西部山脊处，其范围东西约1公里，南北约0.8公里。在主阵地南部约3.3公里和最南端约5公里处还有2个独立支撑点（警备哨所），这些支撑点距河西松山阵地防区的两条公路交会点约3.5～4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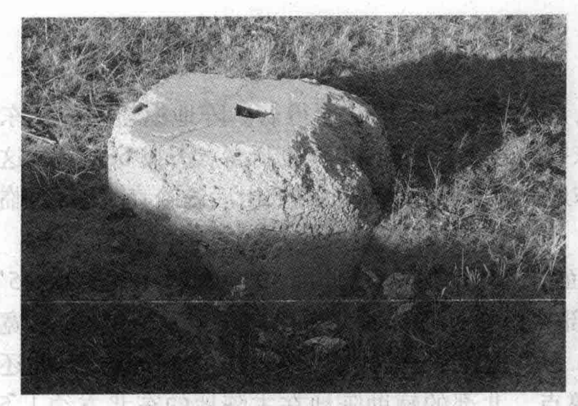
东樱台阵地(四地区)示意图



东樱台阵地主要功能属于海拉尔要塞左侧翼后卫阵地，它主要是从东部掩护配合第三地区（松山阵地）的作战行动，并从东南面警戒防卫海拉尔东山日军各部队的驻地。

1938年，海拉尔要塞建成并进驻日军“满洲第8独立国境守备队”时，这个被称为“第4地区守备队”的东樱台阵地守军仅有850人，是海拉尔要塞各阵地中兵力最少的一个，名列第五。但从防区占地面积、反坦克壕长度看，又可名列第一，从筑成的永久性工事数量和火炮配备数量又位居第四。东樱台阵地在整个海拉尔要塞中的地位，应列第四位。敖包山、河南台、松山阵地是直接面向苏、蒙方向的正面前卫阵地，而东樱台阵地是侧翼后卫阵地。

整个东樱台阵地的大、小永久性工事约有60个左右（其中经测定坐标的有32个）。东樱台阵地的一个特点是除掩蔽部、指挥所及个别工事连接有长40～50米、宽约1米的短距离封闭式地下通道外，尚未发现较大型地下工事。在已测定坐标的32个工事中，大、小碉堡18个，面积不同的掩蔽部9个。炮阵地4个，指挥所1个。阵地的另一个特点，是它在海拉尔要塞各阵地中工事破坏最为严重。



东樱台阵地高射机枪座遗址



东樱台阵地神社遗址



(二)主阵地

1.地面工事

(1)反坦克壕

东樱台阵地反坦克壕总长度约24公里左右,居海拉尔各阵地之首。分外环壕和内环壕。内环壕分为东北部和西南部两块。东北部的北端是主阵地,阵地约三分之一的工事分布在这里,其中有高炮阵地,内、外两道反坦克壕不完全平行,而是因地制宜的有远有近,间隔最小的相距不过百米,最远的约500米。

外环壕从西北部向东南部平面看,略呈阿拉伯字码的"7"字形,只是上部的一横从中间向西翘起。这条外壕的北端起点在主阵地北角,668高地土围子折点东南约0.7公里处。该土围子折点是寻找东樱台阵地主阵地的重要地面参照物之一。土围子是当年日军修筑不知何用的土墙,其西北起自东山机场路1公里左右路北约0.5公里处,向东南延伸约1.5公里后又直线向西折去,此土墙的转角点便是668高地。从668高地附近,反坦克壕起点大体上沿土墙的斜线一直通向东南6公里今伊敏铁路专用线起点宏原车站以南约8~9公里处的自西北向东南的自然大道上。这条长约6公里的大壕是外壕的东北界,或"7"形的一纵。外壕的北界既是"7"字上部的一横,呈东北西南走向,其起点与上述东北界外壕相同,略呈弯曲状向西南延伸约1.8公里。外壕的南界是北南走向,中段向西有一个锯齿形的突出部位,全长约0.9公里。

内环壕将阵地大致分成南、北两个区域,两区都呈东北西南走向,前后交错。北区向东北外壕起点方向突出,南区的北部起点则与北区南壕交会。自此交会点起,向西南约0.8公里处的壕段,既是北区的南壕,又是南区的北壕。北区的东北端便是整个东樱台阵地的主阵地。它的平面形状是个6角12面体,东西约0.5公里,南北约0.7公里。另自上述交会点向东南约0.6公里处,北区外壕折向西南约1公里后,又以弧形线自南而西连接到阵地西端山脊处。



东樱台阵地反坦克壕遗址



东樱台阵地反坦克壕遗址

(2)碉　堡

东樱台阵地的碉堡总数约在30~35个左右,其中已测定坐标的是20个。从测定坐标的20个大、小

碉堡面积看,20 平方米以下甚至不足 10 平方米的有 10 个,20 ~ 40 平方米的有 5 个,40 ~ 80 平方米以下的 5 个。东樱台阵地的碉堡形制不像其他阵地那样种类繁多,在形制种类上以长方形和菜刀形为主,也有少数圆形或长方形基底的一端设环形正面的。从碉堡作战正面的构筑看,以双正面的居多。

①长方形堡

在北纬 49°11′75″、东经 119°47′68″、海拔 665 米处,建有 2 个相距约 15 米的钢混结构长方形兵舍式步兵堡。2 个工事的制式、规格、结构完全相同。现已只剩枪眼(射击口)以下的残垣断壁。工事长 8 米,宽 4 米,壁厚 60 厘米。为了消除射击死角,形成正面交叉火力,两个相距不足 20 米的工事建在了不同走向的建筑轴线上:一个工事的正面枪眼指向南偏西 228°,另一个的正面则朝向正南 180°一带。在工事 8 米长的墙体正面距地面高 1.5 米处,设有两个枪眼,枪眼宽 40 厘米,高 25 厘米,两个枪眼各距山墙 1.8 米,枪眼中轴线间隔 4 米。

②菜刀形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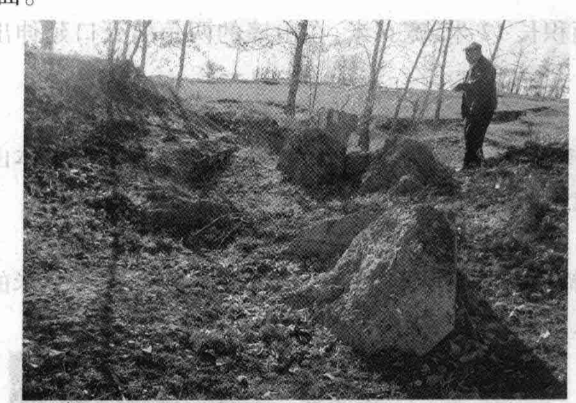
在长方形框架的基底一端延伸出 3 ~ 4 米的地下通道或露天式交通壕,直接通过墙体出入口(房门)出入碉堡。位于北纬 49°10′85″、东经 119°47′44″、海拔 668 米处有个小型碉堡遗址,其残迹即为菜刀形,长方形的基底面积约 4 × 6 米,在长墙的一侧连接一个 1 × 2.5 米的露天小通道。

③正圆形堡

位于北纬 49°10′55″,东经 119°47′00″处的 1 个碉堡,直径 5 米,在圆形一面开有一个长 5 米、宽 2 米的露天通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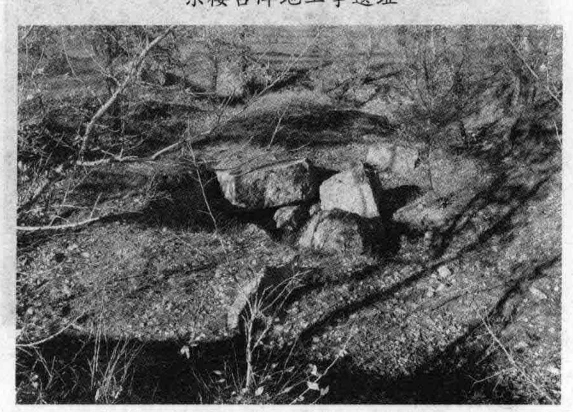
④端面环形堡

位于北纬 49°10′49″,东经 119°46′86″,海拔 668 米处有 1 个碉堡遗址,残迹面积为 6 × 8 米的长方形基底框架,一端的中央部向前突出 1 个半径约 2 米的环形墙基,环形部分是设有枪眼的主要作战正面。


东樱台阵地工事遗址


东樱台阵地工事遗址


东樱台阵地工事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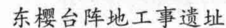

东樱台阵地工事遗址



东樱台阵地工事遗址



东樱台阵地工事遗址



(3)炮阵地

东樱台阵地当年曾配有各种火炮14门,其中迫击炮4门,野炮6门,高炮4门。高炮阵地范围长约25米,宽约20米,位于北纬49°10′51″、东经119°46′57″处。

部分炮掩体分布于邻近的辅助阵地,即今和平公墓地域内。

(4)掩蔽部

东樱台阵地有掩蔽部12个,其中主阵地有6个。面积30平方米的1个,50平方米的2个,60平方米的1个,70~80平方米的2个。掩蔽部主体形状为正方形的1个,另有5个呈长方形。

①正方形单通道

在墙体一面的正中部设出入口连接通道。位于北纬49°10′40″、东经119°47′21″处的1个掩蔽部即属此类。面积7×7米,从墙体中部出入口延伸出1条长5米、宽1米的通道。

②八字形双通道

位于北纬49°10′51″,东经119°47′02″处,主体面积长12米、宽6米,在山墙的两角出入口延伸出长8米、宽1.5米的通道各1条。

③在山墙一角连接单通道

位于北纬49°10′43″,东经119°47′05″处的1个掩蔽部,面积为6×12米,其通道即连接在主体山墙的一角。这个掩蔽部的通道长约60米,而且从残迹看,通道原来全部硬化并有顶盖。

④在侧墙两角连接八字形双通道

位于北纬49°10′41″,东经119°46′54″处的1个掩蔽部,面积5×15米,其两条长5米、宽1.2米的通道呈八字形连接在掩蔽部一侧面墙体的两角出入口上。有2个类似的掩蔽部工事。



东樱台阵地掩蔽部遗址



东樱台阵地掩蔽部遗址

⑤指挥所

位于北纬49°10′34″,东经119°47′14″处。残迹呈长方形,面积4×5.5米,长5米,宽2米的通道

连接在山墙的正中部。从山墙向内 1.5 米处有一道间壁墙，将工事分为内外间。在外间的侧墙中部向外接出 1 个 1 米见方的空间，是向地面了望的观察点。


664.4 高地阵地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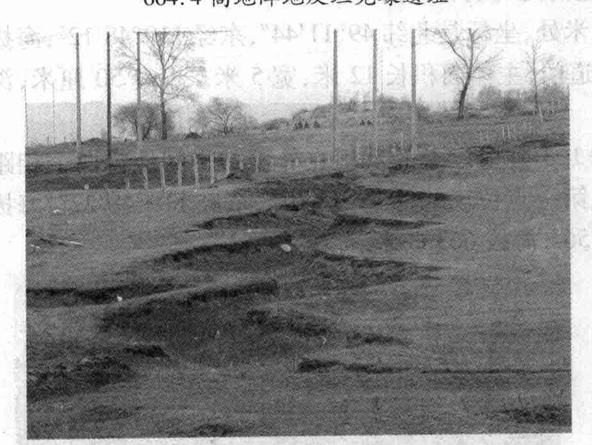
(三)辅助阵地

1.664.4 高地

东樱台主阵地东部有一条西北东南向，长约 6 公里的反坦克外壕，壕起点的东北约 1.2 公里处便是主阵地的辅助阵地 664.4 高地(其南端的一角即为现和平公墓)。这个阵地占地面积较大，东西约 1.3 公里，南北约 0.7 公里，全部由 2 道(个别地域为 3 道)反坦克壕围起，还有许多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交通壕、步兵壕。各种碉堡、掩体等工事相连。两层反坦克壕全长约 6～7 公里。反坦克外壕全部以每隔 50 米左右向外形成 1 个锯齿形突出部的形式向前曲折延伸。内壕则相对较为平直。


664.4 高地阵地反坦克壕遗址


664.4 高地阵地反坦克壕遗址


664.4 高地阵地堑壕遗址


664.4 高地阵地交通壕遗址

占地面积约 1 平方公里的阵地内，共发现各种工事约 26 个，包括各种碉堡、火力点 14 个，掩蔽部 5 个，野炮炮位工事 4 个，迫击炮炮位 2 个。这些工事虽大体上呈环形分布在阵地周边，但并非均匀分布，而是有所侧重地将多数工事设在阵地东北部、西部和西南部。多数是小型工事，应是轻机枪火力点，而少数规格较大的碉堡则应是重机枪或速射迫击炮用碉堡。这个阵地应是一个用重火器加强的步兵中队阵地。

对 644.4 高地的 9 个工事测定了坐标：

(1)北纬49°11′35″,东经119°48′31″,海拔664.4米。炸坑面积约5×5米,是个小型碉堡火力点。位于阵地北部反坦克外壕的第一折点内侧。

(2)北纬49°11′41″,东经119°48′20″,海拔662.2米。碉堡面积约4×4米。火力指向东偏南101°。

(3)北纬49°11′40″,东经119°48′18″,海拔658.1米。是1门迫击炮的阵地。就地挖掘而成,未加硬化。坑底地面深0.5米,坑内径4米,外圈是一道宽约0.8米的土埂。坑西侧连有进出工事的地表通道。工事的火力指向东偏南115°。离此工事以北约15米处还有1个此种工事。

(4)北纬49°11′37″,东经119°48′14″,海拔664.8米。小型碉堡遗址。

(5)北纬49°11′31″,东经119°48′17″,海拔660.6米。小型碉堡,面积约5×5米。

(6)北纬49°11′46″,东经119°48′00″,海拔658.3米。小型碉堡,面积约5×5米。

(7)北纬49°11′47″,东经119°48′04″,海拔662.8米。是个典型的半地下式劳工棚遗址。长20米,宽7米,西侧正中开有1个出入口向外连接长、宽各约4米的通道,通道朝向西偏北288°。工棚内部地面距地表约1.3~1.5米,工棚四壁的地表上还有高约1米、厚1.5米的封土。与其他阵地上发现的此类劳工棚相比,这个劳工工棚的地面是用一层薄薄的水泥作了简单的硬化处理。

(8)由4个炮位组成的1个炮兵中队阵地,全部系就地挖掘而成,未进行任何硬化处理。4个炮位朝北分成前后两列,略呈菱形或平行四边形排列。相邻炮位间隔约20米,两列前后间隔约30米。炮坑直径6米。炮位的火力指向为北偏东23°。

(9)3个与炮阵地相邻近(距离约40~50米)的掩蔽部。其中有两个相邻掩蔽部的间隔仅约10米,且共用一条封闭式地下通道。位于北纬49°11′45″,东经119°48′13″,海拔664.8米。两个掩蔽部的形制、面积稍有不同。其中北侧的一个长12米,宽4米,四壁和顶盖厚50厘米,内部净高约2米。在主体西侧两角斜向开有出入口,出入口通道向西北方斜伸出4米后,又以垂直角度向西延伸约5米,最后通过6级台阶上升到地面。通道宽1.5米。从通道到掩蔽部共设有3道门。南侧通道与相邻的另一个掩蔽部共用,在通道的曲折部分岔,形成丫字形的共用通道。第2个掩蔽部的长度为10米,仅有上述与北邻工事合用的一条出入通道,其他情况与前者相同。

第3个掩蔽部位于前两个掩蔽部的东南约10米处,坐标是北纬49°11′44″,东经119°48′12″,海拔663.5米。呈曲尺形,通道设于北侧,宽1.5米,两道门,主体面积长12米,宽5米。壁厚50厘米,深2米。

另外,对该阵地北侧西北——东南向的全长约1.3公里以上的反坦克外壕的中间地带两个相距约50米的锯齿形突出部折点也进行了坐标测定。第一点位于北纬49°11′68″,东经119°48′22″,海拔657.6米;第二点位于北纬49°11′50″,东经119°48′56″,海拔663.3米。



664.4高地阵地工事遗址



664.4高地阵地工事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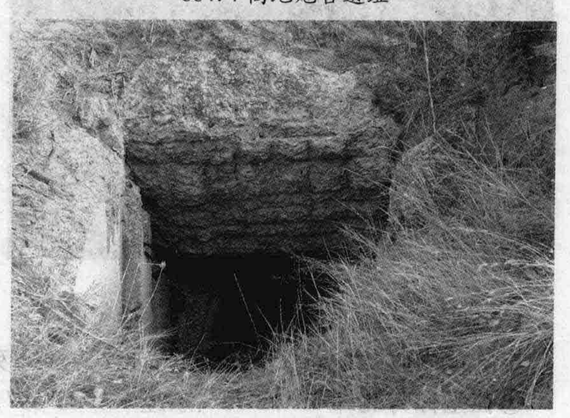

664.4 高地阵地工事遗址


664.4 高地阵地工事遗址


664.4 高地阵地工事遗址


664.4 高地炮台遗址


664.4 高地土筑炮位遗址


664.4 高地阵地地下工事入口遗址

2. 机场北阵地

(1)概　貌

这个阵地是"东樱台"阵地(四地区)守备队的后卫阵地。其地域包括海拉尔区河东今机场大街以北 500 米外的老机场路到今呼伦大街东端登山后的哈克大道以南。对于以西部、西南和南方为重点作战防御正面的东樱台主阵地来说,北部区域固然是它的后方,但由于地区守备队营区的全部设施均设在这一地域,同时这里还设有飞机场、23 师团的第 255、253 和辎重等联队的营舍以及第 600 部队(第 6 军)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营舍等重要目标,故四地区守备队便在这样的后方地域作了相应的防卫部署,并设置了必要的作战阵地和修筑了各种工事。这个辅助阵地是为战时留守在后方营区的人员而设,故阵地规模不大,工事数量也不多。这一带地形起伏不大,工事集中分布在老机场路以北从 659 高地到 652 高地这一地形等高线地域。工事种类主要有反坦克壕,还有若干碉堡、火力点及其他设施。

(2)反坦克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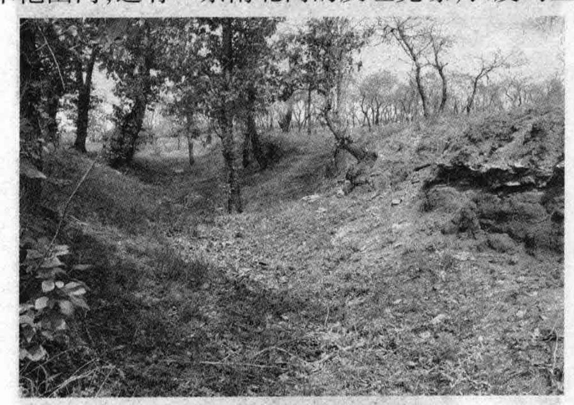
在这个后卫辅助阵地范围内,共挖有3道反坦克壕:

①由今胜利大街东端O公里北折登山后,在老机场路东侧约500米处,有1条日伪时期修筑的大体呈东西向的高2米、底宽约4~5米的不明用途土墙,长约0.7~0.8公里,紧贴其墙北侧便是一道与墙并行的反坦克壕,长度与墙同。壕的东部起点坐标是北纬49°12′,东经119°47′。

②在旧机场路原林航站通信台以北约1公里处,挖有一道东西向,全长约160米的V字形简易反坦克壕。此壕的东部起点坐标是北纬49°12′70″,东经119°47′59″,海拔663.1米。壕的走向由东向西266°。由壕的起点向南还连接1条长约55~60米的带有顶盖的封闭式交通壕,壕深约1.8米,宽2米。此条封闭式交通壕南连一个四角设有火力点的长方形小型工事遗址。

③由旧机场路南侧第一道反坦克壕的东端,向北经一道原日军军用沙石公路长约1.4~1.5公里处,是一道总长近700米、连绵曲折的反坦克壕。此壕南缘坐标为北纬49°13′11″,东经119°47′49″,海拔652.8米。由此起点向北约600米后,大壕向东折出约40米,坐标是北纬49°13′08″,东经119°47′49″,海拔654米。这里是这道反坦克壕的又一转折点:大壕由此分成略呈直角形的两道延伸线。一道是向西延伸约200米,终端坐标为北纬49°16′18″,东经119°49′39″,海拔655.8米。另一道则一直朝北延伸向今海拉尔区民兵训练基地南大墙下,长约60米,估计原来还一直继续向墙北延伸,但长度不明。上述民兵训练基地原为日军23师团步兵第253联队营区。

④在民兵训练基地的东部有一道向南通往机场方向的原日军军用沙石公路,在公路以西约200米范围内,还有1条南北向的反坦克壕,长度约五六百米。



机场北阵地反坦克壕遗址



机场北阵地反坦克壕遗址

(3)碉堡、火力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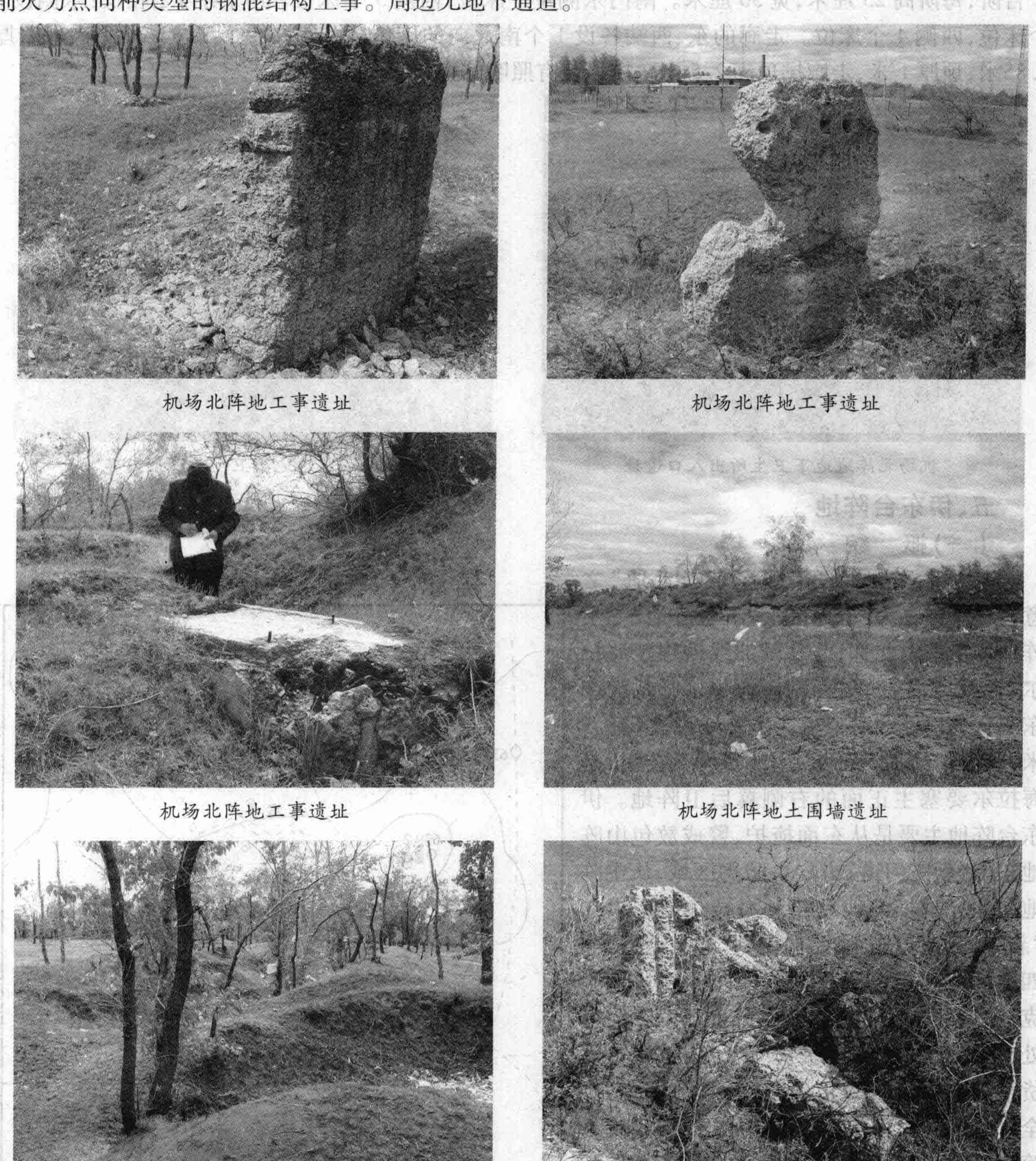
本阵地内有各种碉堡、火力点等永久性工事残址遗迹10余处。

①在坐标为北纬49°12′75″、东经119°47′59″、海拔663.1米处是1个较大型碉堡残址。现原址处基本上只留有2个相毗连、深度达6~7米的大土坑。两坑间距约5~6米,东北部1个面积较大,上口,南北向约10米,东西向约有12米。坑的外围是高高的土岗,高出坑外地面数米。坑中的一块隆起地面上至今仍残留着中部连体、对称设置的水泥座,其尺寸是前后2个纵形座条长2.80米,宽0.9米,厚0.6米。中部连体的横形座条长1.80米,宽、厚与纵形条同。

②在上者东南约80~90米处,位于为北纬49°12′76″、东经119°47′52″、海拔659米处,又是一个此类工事的炸坑,坑底和四周只有碎水泥块,坑的直径约8米。

③在旧机场路原林航站电讯台东北约600米处有一个原日军营房基础,房基的四周用带顶盖的封闭式浅层地下通道相连。地下通道南北宽约30米,东西长约45米。地道四角各设1个钢混结构火力点,这些火力点中现只在东南角处剩下一堵扒掉钢筋的水泥墙。原火力点的面积是长3.8米,宽2.7米,高约2米,壁厚60厘米。在东西向地下通道两侧的中部各设有1个地堡式小火力点,面积约3×3米。西南有一个碉堡,坐标为北纬49°12′67″,东经119°47′65″,海拔660米。

④在前述工事西南约 500 米，位于北纬 49°12′63″、东经 119°47′75″、海拔 658.7 米处，也有 1 个与前火力点同种类型的钢混结构工事。周边无地下通道。



机场北阵地工事遗址　　机场北阵地工事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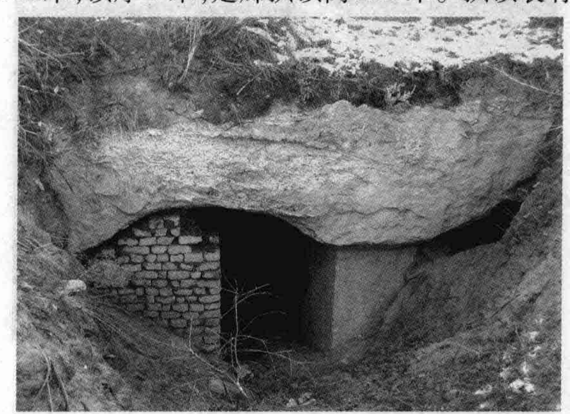
机场北阵地工事遗址　　机场北阵地土围墙遗址

机场北阵地交通壕遗址　　机场北阵地工事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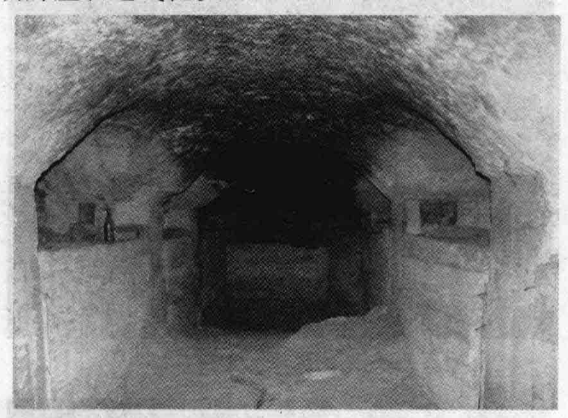
(4)地下卫生所

位于东山机场北偏西约 0.7～0.8 公里处，坐标为北纬 49°12′75″，东经 119°47′59″。这是一个浅层地下工事，顶部与地面基本相平，顶盖上被覆土层约 1.5 米厚。地下房厅呈长方形，东西向，总长 30 米，宽 5.5 米，建筑面积 165 平方米。大厅正中是 1 条走廊，长 28.5 米，宽 2.1 米。走廊两侧是沿东西向长墙建成的纵向水泥卧台，每个床位长 2.1 米，宽 0.85 米，卧台中部到墙体拱顶高 0.8 米。卧台距地面高 1.3 米，卧台间壁厚 0.6 米。地下大厅南、北两侧各开有 1 个隔 1 个床位斜向相对的房

门,门高1.8米,宽1.7米。两门各设一条由地面进出的地下阶梯式通道,长2.5米,宽1.7米,共设8个台阶,每阶高25厘米,宽30厘米。南门东侧4个床位,西侧5个床位,北门则与之相反:东侧设5个床位,西侧4个床位。走廊的东、西端各设1个南北向的床位,总计为20个床位。地下大厅壁厚0.85米,顶厚1米,走廊拱顶高2.5米。拱顶装有照明灯座和通气孔。



机场北阵地地下卫生所出入口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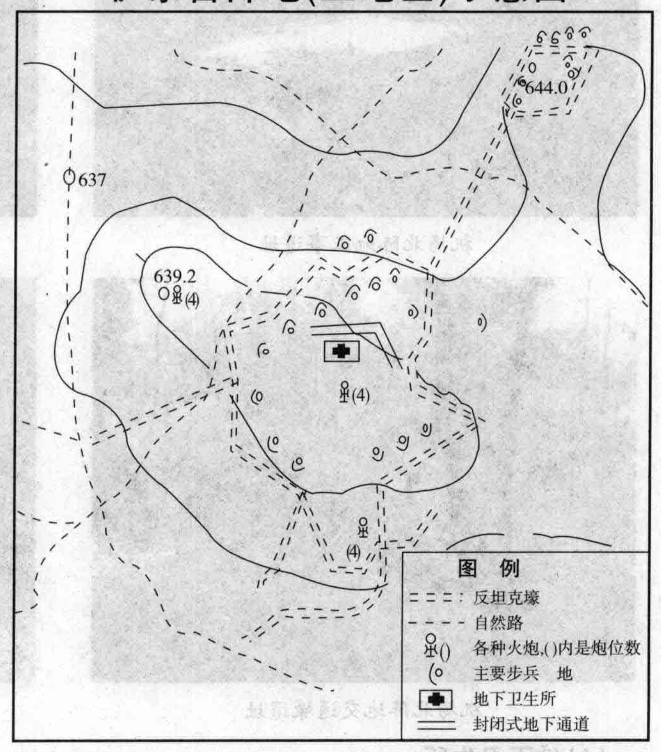
机场北阵地地下卫生所遗址内部

五、伊东台阵地

(一)概　貌

伊东台阵地即“伊敏河东岸台地”之意。日军称之为“五地区”、“五号阵地”。主阵地位于东山北部,北邻滨洲线铁路距海拉尔东站约1.8公里,西南距海拉尔呼伦大街东端0公里处约4公里。主阵地海拔643.9米,东西长约1.5公里,南北宽约2公里,是海拉尔要塞主正面的右侧翼后卫阵地。伊东台阵地主要是从东面掩护、警戒敖包山阵地东南“新三河道”方向。防御区域,从主阵地向北穿越滨洲线铁路到海拉尔河南岸和“新三河道”以东地区,向南到“老哈克道”与四地区防区相接,从海拉尔河南岸到“老哈克道”南北长约7公里。主阵地以西2公里处,是日军第18野战货物场(2646部队),从货物场向南到哈克道约1.5公里范围内,则全部是原日军第23师团(1945年初改编为第119师团)所属部分联队的营区。主阵地以东为平坦草原。主阵地的海拔高出四周20~30米,视野开阔。

伊东台阵地(五地区)示意图



伊东台阵地由主阵地(原山)和2个辅助阵地、3个独立支撑点构成。全阵地共有各种永久性工事约40余个。

主阵地由两道总长约6公里的反坦克壕围起,外壕以不同角度和不同间隔向四周伸出6个锯齿形突出部,内外壕间隔不等,远的约240米,近者约百米左右。主阵地范围内发现包括炮掩体、碉堡、掩蔽部、指挥所、观察点、地下弹药库、地下车库、中央地下室等在内的钢混结构工事28个。其中含“钢帽堡”4个,这些“钢帽堡”之间都有地下通道相连。


伊东台阵地堑壕遗址


伊东台阵地堑壕遗址

（二）主阵地

1. 地面工事

（1）反坦克壕

反坦克壕集中在主阵地周围，并向东北西部和东部等方向共辐射出4道延伸壕。

主阵地外围反坦克壕，大体上从主阵地原山的西北角起，由约2个钝角锯齿形突出部曲折连线将主阵地围起。每个锯齿形突出部的斜边长度50米左右。锯齿的夹角都在100°以上。以主阵地西北为起点，锯齿状的反坦克壕主轴线分别向东部和南部曲折延伸，构成阵地外壕的北段西段。北段东、西长约0.85公里，西段长约1.4公里。由西段南端向东呈弧形延伸0.6公里后直线向北约0.4公里，形成外壕的南段，由此再折向东北约0.5公里处，与北段大壕的东端交会闭合。外壕全长约3.5公里。

外壕向周边辐射出的4道延伸壕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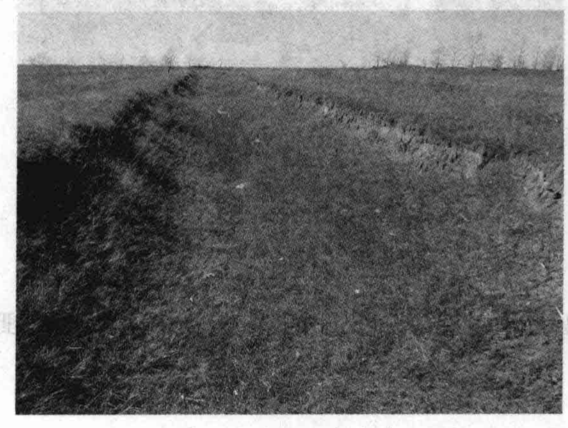
①由北壕和东壕的交会闭合点向东北方延伸到643.9高地，长约1公里，在高地形成1个辅助阵地，用以控制封锁从东胡大罕方向穿越铁路经原山（主阵地）通往海拉尔的大道；

②由外壕西北角稍偏南处，向西方延伸出约0.7公里的大壕，直抵东胡大罕至海拉尔大道道边，将该大道的西南部封死；

③由外壕的西南角向西延伸出约0.6公里的大壕；

④由外壕东南角向东延伸出约0.4公里的大壕；

相对于外壕，主阵地的内壕则走向较直，没有那么多的折角突出部。内壕总长度约2.5公里。西侧内壕的北半部，还有长约50米的一段内斜面土坡被用水泥硬化成人工崖壁，以加固强化大壕的反坦克功能。


伊东台阵地反坦克壕遗址


伊东台阵地反坦克壕遗址

(2)碉　堡

伊东台主阵地占地面积不大,碉堡类工事有 8 个。其中“钢帽堡”3 个,其他碉堡 5 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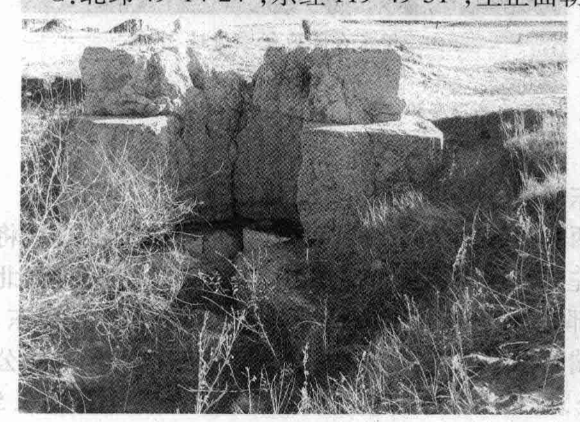
①钢帽堡

伊东台主阵地与其他各阵地相比,钢帽堡在碉堡类工事中所占比例较高。钢帽堡有 2 个特点:一是地面部分主体面积很小,用以固定“钢帽”的圆井口形水泥座外径只有 2.4 米,除去两侧壁厚 90 厘米,内径只有 1.5 米;二是上下一体,地表部分通过井身地下通道与邻近工事相通。这 3 个“钢帽堡”的位置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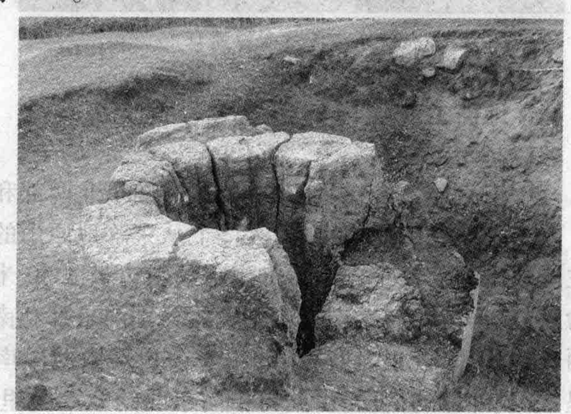
A:北纬 49°1[illegible]31″,东经 119°49′14″,主正面朝向 352°;

B:北纬 49°14′25″,东经 119°49′32″,主正面朝向 60°;

C:北纬 49°14′24″,东经 119°49′31″,主正面朝向 153°。



伊东台阵地“钢帽堡”遗址



伊东台阵地“钢帽堡”遗址

②其他碉堡

共 2 个,其位置是:

A:北纬 49°14′17″,东经 119°49′24″,主正面朝向 352°。是个圆形碉堡,直径 5 米,壁厚 40 厘米,有 1 条长 5 米、宽 1.2 米的通道。

B:北纬 49°14′26″,东经 119°49′10″,长方形,面积 4 × 8 米,在墙体一端的中央开有 1 条长 3 米、宽 1.2 米的通道。



伊东台阵地工事遗址



伊东台阵地工事遗址

(3)炮阵地

伊东台阵地共配有火炮 12 门,其中迫击炮、野炮、高炮各 4 门。除迫击炮一般无固定阵地外,野炮和高炮 2 个中队的阵地共 8 个炮位。

①高炮阵地

表面呈台基式圆井口状,有 9 米长通道与炮位相连。4 个炮位位于:

A:北纬 49°14′27″,东经 119°49′23″;

B:北纬 49°14′27″,东经 119°49′15″;

C:北纬 49°14′27″,东经 119°49′17″;

D:北纬 49°14′28″,东经 119°49′27″。



伊东台阵地炮台遗址



伊东台阵地炮台遗址

②炮掩体

在伊东台主阵地内还有 1 个炮掩体,位于北纬 49°14′26″,东经 119°49′12″,火力指向 16°。炮位周边的圆形封堆只剩下左右侧各半边,封土堆底部约 2 米,高约 1.5 米。封土两端长度约 4.5 米,圆坑内径 5 米。封土的一端开口处地面上有一个环形水泥基座,高 25 厘米,厚 30 厘米,外径2.20米。



伊东台阵地炮台遗址



伊东台阵地炮台遗址

③另在伊东台阵地北侧防坦壕外约 0.5 公里处的 639.2 高地,发现一处炮阵地,共 4 个炮位,相互间距 30 ~40 米,测得其中 1 个的坐标为北纬 49°14′67″,东经 119°48′60″,形制是单侧护墙弹仓式,混凝土结构。弹仓外径 3 米,壁(顶)厚 0.3 米,高 1 米,宽 1 米,已大部淤在沙坑内。估计是 4 门野炮的炮位。

(4)掩蔽部

伊东台主阵地共发现大、小掩蔽部 7 个,多集中在西半部。基本框架都是长方形,深度在地面以下 2 米左右。由于出入口和通道的设置情况不同,而形状略显各异。

①三通道型

在长方形框架的两角和中间各开一出入口连接通道。北纬 49°14′31″、东经 119°49′49″处有一个此种形制的掩蔽部,其主体部分是个长 12 米、宽 8 米的长方形框架,设有 3 条 1.2 ×4 米的通道。

②单通道 A 型

平面呈菜刀形。如北纬 49°14′15″,东经 119°49′31″处的 1 个掩蔽部,长 5 米,宽 2.8 米,其一角的出入口与侧墙平行连接着长 5 米、宽 1 米的通道。

③单通道B型

平面呈L形，与A型形制上的不同处，在于通道与侧墙不是平行，而是呈直角形连接。位于北纬49°14′24″，东经119°49′30″处的掩蔽部即属此类，面积为6×10米，6米长、1.2米宽的通道与山墙平行，而与侧墙垂直。

④单通道C型

在主体山墙的中央部开出入口并连接通道的掩蔽部。位于北纬49°14′25″、东经119°49′12″处的掩蔽部，面积7×4.5米。



伊东台阵地掩蔽部遗址



伊东台阵地掩蔽部遗址

⑤指挥所

位于北纬49°14′25″，东经119°49′21″，火力指向62°。宽1.5米，长3.7米，面积约5.6平方米。在主框架一角与山墙并行向外延伸出一条宽1.6米、长5米的通道，从通道外门到指挥所进出口共设2道门。

⑥观察点

在主阵地的西南角一带，位于北纬49°14′23″、东经119°49′17″处，从交通壕附近的地下向地面突出2个并列的水泥管，外径1米，管壁厚20厘米，露出地面约50厘米，其下部情况已被塌陷的土堆完全埋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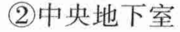
(5)地下工事

①地下通道

伊东台主阵地的地下通道共有3~4段，主要是"钢帽堡"地下通道。"钢帽堡"是重机枪小队(重机枪2挺)的专用堡，中间的突出部是小队长指挥所，两侧则各部署1挺重机枪，下部是通道。它们相互之间可通过地下通道相连，也可能和中队乃至地区守备队(后改独立步兵大队)指挥所有地下通道相连，因坍塌堵塞个别地段无法通行。据已查明的情况，各段地道均为单纯通道，无房间。通道宽1.2米，长的约80~90米，短的约50~60米，总长度约在200~300米之间。



伊东台阵地地下通道遗址



②中央地下室

中央地下室是日军多功能地下掩蔽部。掩蔽部位于主阵地中部，北纬49°14′26″，东经119°49′31″。它是利用1个小山包的地形，由山脚下向山包内挖掘而成的浅层地下工事。东西长约25米，南北宽约8米。其最西端是个8×4.5米的大房间，从大房间南端向北3米处，是1条垂直连通大房间的走廊，长约20.5米，宽约1.8米，走廊北侧是沿走廊并列的4个长约4米、宽约3.5米的房间，走廊南侧则只有1个长3米、宽1.3米的小房间，是个卫生间。各房间和走廊的壁厚都是40厘米。面积

约近130平方米。


伊东台阵地地下通道出入口遗址


伊东台阵地地下通道出入口遗址

(三)辅助阵地

1. 643.9 高地

643.9高地位于伊东台阵地主阵地东北约1.5公里处,是重要辅助阵地之一,日军称其为5阵地的"前进阵地"。从主阵地到643.9高地,由一条反坦克壕相连接。

该高地和其主阵地原山及周边1.5公里以内的645.3、645.6、639.2等3个高地一起构成了这一带以主阵地为核心的小高地群,是伊东台阵地防区内的主要制高点之一。从其地理位置看,它是伊东台阵地东北部的前沿阵地,西距海拉尔东站约1.2公里,西北距河北山下的海拉尔河大桥约5公里,距小孤山约4公里。其作用主要是从东北部掩护主阵地,向北监视海拉尔河方面,同时控制封锁了敖包山阵地河北山下的海拉尔河大桥到小孤山上附近的约2.5公里长的"新三河道"公路。643.9高地的主要防卫正面是敖包山阵地与伊东台阵地防区分界线的东段。其海拔高出于其北部和西北部公路沿线30~40米,居高临下,展望良好。

高地四周由一道总长约2.5公里的反坦克壕围起。壕的西南端通过一道约1.5公里长的反坦克壕与主阵地相连。由此点起,大壕围绕643.9高地的东侧向东北方延伸约0.8公里后略成环形蜿蜒折向西北约0.2公里,又转向西南约0.8公里后折回东南,与通向主阵地的长壕闭合。反坦克壕以直线和斜线交错地环绕高地,形成若干个沿壕的中轴线向前沿突出数十米的钝角锯齿形突出部。大壕的南北向线段长,东西向线段短,故阵地略呈长方形。在高地东北角一带局部地区还设有内壕。高地北部还有多条连接各种工事的交通壕和步兵壕。

643.9高地共有14个各种工事遗址。这些工事大多分布在高地北部东西向的反坦克壕内外,其中壕内有10个,壕外有4个。壕内的10个工事中,有约3~4个分布在高地东侧。相邻各工事间,距离近的仅20~30米,最远的约120~130米。高地的工事是以轻机枪掩体和步兵火力点为主的小型工事,工事壁厚为60厘米,按日军"军事筑城"设计标准,此种厚度属丁级,可抵御7.5厘米口径炮弹的轰击。根据阵地规模、工事数量等情况分析,是1个步兵中队的野战阵地。工事中有二、三个规模稍大些,可能是大队为增强本阵地防御火力而特予增配的重机枪、速射炮等重火器的碉堡。已测定坐标的几个工事状况是:

(1)北纬45°15′06″,东经119°56′16″,海拔632.5米,炸坑面积约5×5米。坑底可看到原墙基的片断,壁厚60厘米,应是1个轻机枪掩体或可容纳4~6人的普通步兵堡。火力指向为东51°。

(2)北纬49°15′03″,东经119°50′16″,海拔634.9米。位于1号坐标以东约50米,炸坑略大于前者,面积约5×6米。土坑中心部露出一条弧形水泥墙,厚约50厘米,长约1.3米,其原直径应在2米以上,应是1个配置重机枪的"钢帽堡"。火力指向正北357°。

(3)北纬49°15′02″,东经119°50′19″,海拔635.8米,东距2号坐标约30米,炸坑面积约4×5米,坑底可看到原墙体残根的片断和一些碎水泥坑。火力指向北偏西325°。

(4)北纬49°15′03″,东经119°50′13″,海拔635.4米。炸坑面积约4×4米。火力指向东81°。


643.9高地阵地反坦克壕遗址


643.9高地阵地堑壕遗址


643.9高地阵地工事遗址


643.9高地阵地工事遗址

2.629 高地

629高地一带有南北相连的大、小2个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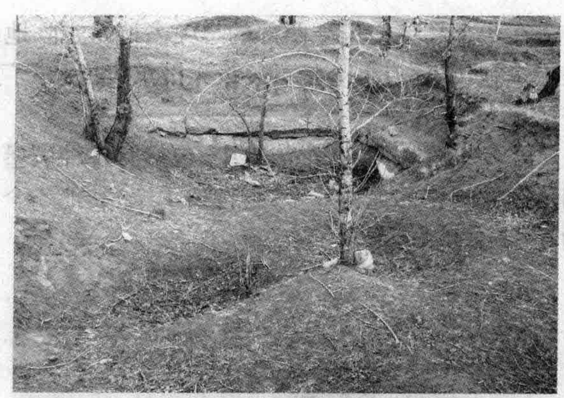
(1)主阵地正西约2.5~3公里,原日军"第18野战货物场"以北约0.7公里处有一条东北西南向全长约1公里的交通壕,壕内便是这个辅助阵地。它背靠一条约1.5公里长的人工筑起的大土墙,高1.5米。正面约1公里处是紧靠山崖的637高地,山脚下是滨洲线铁路。而从敖包山阵地的辅助阵地河北山阵地以东沿"新三河道"穿越海拉尔河大桥南下的公路,正是在这里即今301国道海拉尔东出口附近向西南转弯与铁路平行约1.5公里后,由北向南与铁路交叉进入海拉尔东郊的原日军兵器厂(今尼尔基路东侧)。这个阵地居高临下地直接监视封锁"新三河道"与铁路交会点及其以东约1.5公里的地带。这个阵地呈驼峰状的长千余米的交通壕及与此壕纵横交错的步兵壕、散兵坑,可容纳200余人的步兵中队。阵地范围内发现有小型碉堡、掩蔽部等8个遗址。


629高地阵地远景


629高地阵地土筑炮座遗址



629 高地阵地地下工事出入口遗址



629 高地阵地工事遗址



629 高地阵地工事遗址



629 高地阵地土筑炮位遗址

(2)位于第 1 辅助阵地以南 0.8 ~ 1.3 公里范围内的原日军野战货物场西侧到西南角一带,交通壕长度约 0.5 ~ 0.6 公里,其正面山下兵器厂西墙外长约 1.3 公里的公路线是这个阵地的警戒封锁区域。是步兵小队的野战阵地,有约 5 ~ 6 个小型碉堡等工事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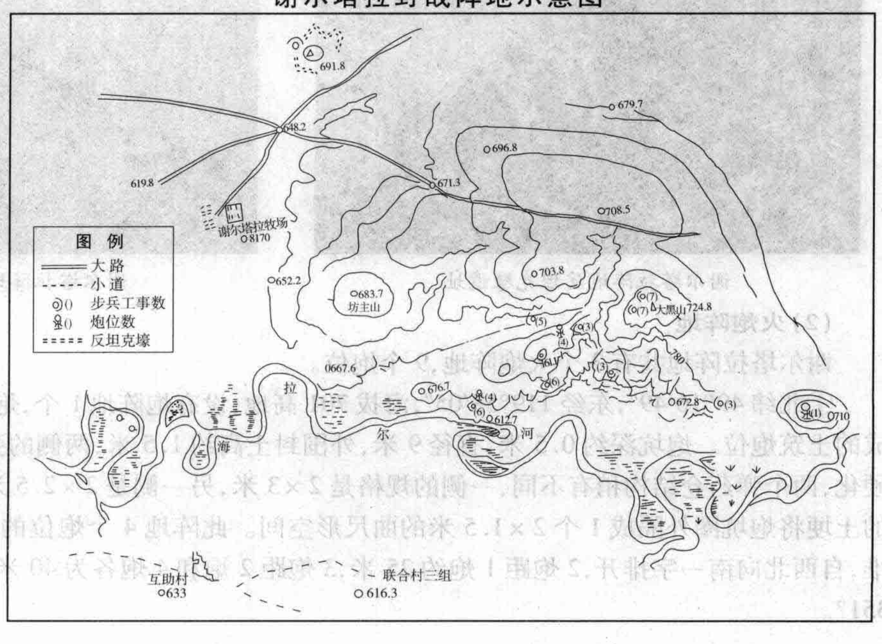
六、野战阵地

(一)谢尔塔拉野战阵地

1. 概 貌

谢尔塔拉野战阵地的 10 余个高地中,两个相邻高地间的距离多在 1 ~ 2 公里内,仅有少数相距在 2 公里以上。这些高地都是相对独立的一个作战阵地。8 个高地共有各种工事遗址 50 个。各高地的工事,最多的筑有 10 个工事,7 个工事的有 3 个,6 个工事的有 1 个,5 个工事的有 1 个,4 个工事的有 1 个。工事最少的 698 高地有 3 个工事。

谢尔塔拉野战阵地示意图



在8个高地中位于西部的701高地是主阵地,该阵地工事有10个,其中4个是轻机枪掩体,4个是土筑炮位,还有1个是可装设2挺重机枪和1门步兵炮的“三头火力点”。此外,这个阵地的周围还有反坦克壕。

在8个阵地的50个工事中,包括有各种碉堡或火力点31个,不同类型火炮的炮位9个,各种不同形制和规格的掩体6个,指挥所1个,其他3个。另外,有3个阵地的周围还有一道反坦克壕,全长约6~8公里。



谢尔塔拉阵地堑壕遗址

谢尔塔拉阵地工事遗址

2.工 事

(1)反坦克壕

共有3个阵地挖掘了反坦克壕:

①北部的691.8高地,位于北纬49°17′23″,东经119°56′32″。反坦克壕长2.8公里,除阵地中部有一段开口外,环绕阵地的反坦克壕是闭合的。

②701高地,位于北纬49°16′53″,东经119°58′17″。周边反坦克壕长度约2.1公里。

③727高地,位于北纬49°17′12″,东经119°59′16″。周边反坦克壕长度约1.8公里。



谢尔塔拉阵地反坦克壕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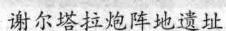
谢尔塔拉阵地反坦克壕遗址

(2)火炮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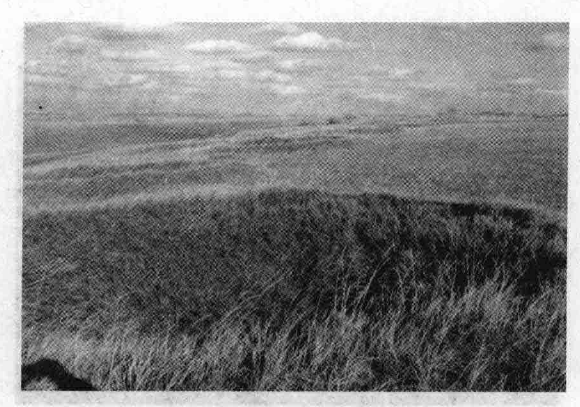
谢尔塔拉阵地共有3个火炮阵地,9个炮位。

①北纬49°16′49″,东经119°58′05″,海拔701高地,设有炮阵地1个,炮位4个。均系就地挖掘而成的土筑炮位。炮坑深约0.5米,直径9米,外围封土高约1.5米,两侧的弹药仓也是挖掘而成,未经硬化,两个弹药仓结构稍有不同,一侧的规格是2×3米,另一侧是2×2.5米,其后部以一道宽0.5米的土埂将炮坑圈外隔成1个2×1.5米的曲尺形空间。此阵地4个炮位的分布情况是以此炮位为基准,自西北向南一字排开,2炮距1炮约25米,3炮距2炮和4炮各为40米。各炮位的火力指向为北351°。





谢尔塔拉炮阵地遗址



谢尔塔拉炮阵地遗址

②北纬49°16′57″,东经119°58′59″,海拔708米,设有挖掘而成的土筑炮位4个,各炮位的炮坑形制、规格一致,炮坑直径8米,两侧弹药仓面积各为3×2.5米。708高地的4个炮位,以北纬49°16′57″,东经119°58′59″的炮位为基准,各炮位呈等腰梯形排列,1、4炮位平行构成梯形的上口,2、3炮位相互平行为下底,各相邻炮位的间隔均为25米左右。炮位的火力指向为西南207°。

③北纬49°16′30″,东经120°01′19″,海拔714米。这里只设了唯一的1个大型半硬化土筑炮阵地。硬化部分主要是炮坑地面用水泥全部硬化。炮坑直径南北向大于东西向,南北向含两侧弹药仓部位宽20米,东西向直径为15米。在经全部硬化的炮坑地面上,距东部边缘7米处的正中部位,设有1个半圆形钢混水泥座,厚0.5米。半圆水泥座的后部环形断面上,至今仍间隔均匀地装设着4个直径5厘米的定滑轮。炮位的火力指向是东偏南134°,大致指向哈克方向。推断这是1个大口径榴弹炮的炮位。



谢尔塔拉炮阵地遗址



谢尔塔拉炮阵地遗址

(3)碉堡火力点

谢尔塔拉阵地共有各种不同形制和规格的碉堡或火力点6种、31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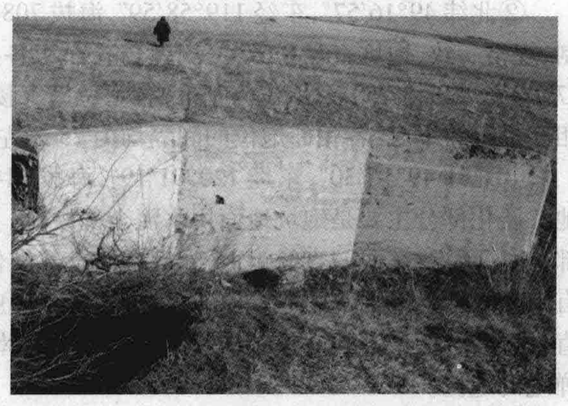
①卧式钢混结构长方形轻机枪掩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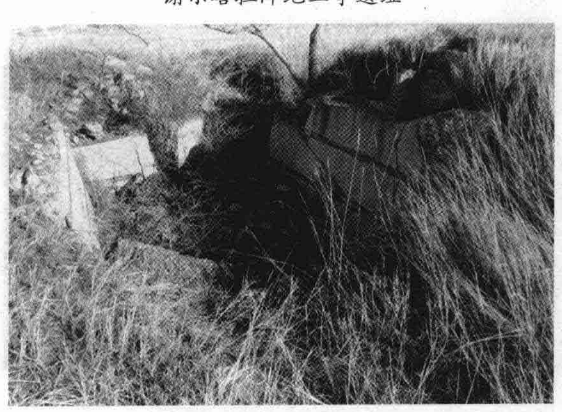
此类工事数量最多,共有24个,占全部碉堡、火力点类工事总数的77.4%。工事的形制、规格全部统一模式。其平面轮廓呈菜刀形,即长方形主体的一角加1个刀把形进出通道。主体长2.5米,宽2米,高1米。进出通道长1.3米,宽1米。钢混结构,墙体厚32厘米。墙体正面中央距地面30厘米处,开有1个宽25厘米、高20厘米的枪眼。在8个高地中的701、719、727高地上,每个高地都建有4个此类工事,而708高地上则设有5个,727高地上有3个,698高地上有2个,723、714高地上只发现1个。这些机枪掩体由于所处阵地的位置各不相同,故火力指向也不同。如700高地上位于北纬49°16′49″、东经119°57′52″处的1个轻机枪掩体,其火力指向是东偏南124°,而与其相邻的697高地上位于北纬119°16′46″、东经119°57′52″处的同样一个掩体,火力指向则西偏北287°。


谢尔塔拉阵地工事遗址


谢尔塔拉阵地工事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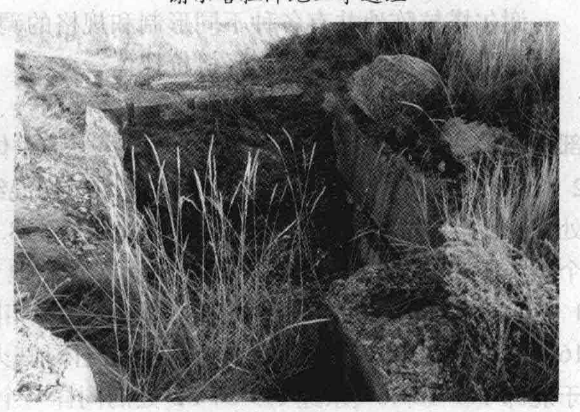

谢尔塔拉阵地工事遗址


谢尔塔拉阵地工事遗址


谢尔塔拉阵地工事遗址


谢尔塔拉阵地工事遗址


谢尔塔拉阵地工事遗址


谢尔塔拉阵地工事遗址



谢尔塔拉阵地工事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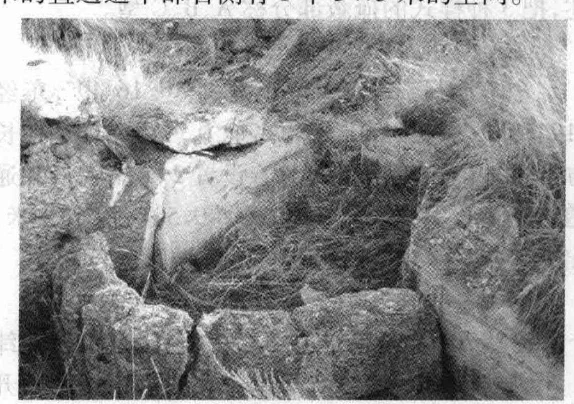
谢尔塔拉阵地工事遗址

②单正面半圆形带折角通道的重机枪掩体

全阵地只有1个这类工事。位于北纬49°16′52″、东经119°56′06″处的696高地。其曲尺形折角通道横的一边长6米，宽1.4米，纵的一边长5米，宽1.2米，通道前端是个半圆形正面，向前突出约1米，横向直径1.5米。

③单正面直通道式重机枪掩体

此型掩体在全阵地也只有1个，位于729高地，北纬49°17′20″，东经119°59′21″。其基本形制与上述第二种相似，不同点一是正面半圆形的横向直径(宽度)稍大，是1.8米；二是在宽1.3米，长8.7米的直通道中部右侧有1个3×3米的空间。



谢尔塔拉阵地机枪掩体遗址



谢尔塔拉阵地机枪掩体遗址

④双半圆形正面重机枪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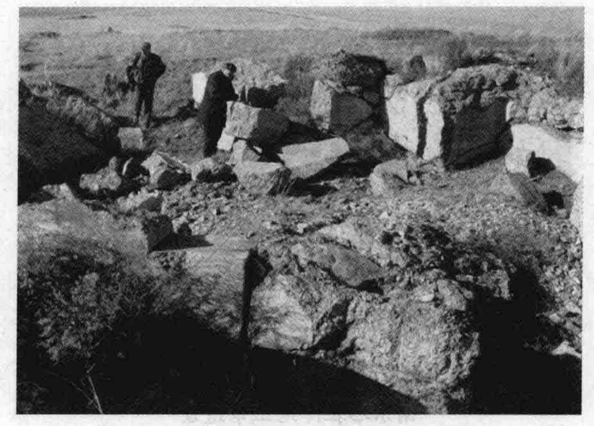
全阵地只有1个，位于北纬49°17′12″、东经119°59′41″处的727高地。此类型堡从平面看，主体框架是1个长11米、宽4米的长方形。1个直径2米的圆堡直接套建在正面墙体的一角。工事壁厚0.5米。正面墙体的另一角与山墙平行，向前延伸出一个宽1.8米、长2.4米的走廊，走廊的前端是1个横向直径2米的半圆形堡，墙角和走廊间有一个宽1米的门。后墙的正中设有1道宽1.5米的进出口和通道。后墙的右角连接着1个2×1.5米的小房间，可能是1个观察点。火力指向南偏西210°。



谢尔塔拉阵地重机枪座遗址

⑤宽正面三头枪炮组合堡

全阵地共有3个这种“枪炮组合堡”或“三头火力点”，分别位于701、723、727高地。现以701高地的“三头火力点”为例，该工事位于北纬49°16′53″，东经119°58′17″。从工事平面看，主体是1个长3.9米，宽2.4米的框架，框架正面是在基底处连为一体的3个跨度不同的半圆形堡：两侧的半圆形横向直径各为2米，中间的是2.5米，主体背面是又1个长5米、宽1.5米的长方形空间，与主体框架相连，在这个长方形空间的后面是1条长3米、宽1.6米的通道。从工事的结构特点看，3个环形正面的中间1个大的，其前端横向直径1.25米，与步兵炮掩体墙正面开口直径相同，而两侧直径为1.20米的小半圆形。正面则与前述单正面半圆形重机枪掩体尺寸相合，据此推断，是1门步兵炮（中间的1个）与2挺重机枪搭配的枪炮组合堡，步兵炮主要用于打坦克，重机枪则用来杀伤在中远程距离伴随坦克进攻的步兵群。



谢尔塔拉阵地枪炮组合堡遗址

(4)掩蔽部

全阵地共发现3种不同样式的6个掩蔽部，分布在701、714和723等3个高地上，为便于叙述，把3种样式的掩蔽部分称A、B、C型。

①A型

全阵地只有1个，位于北纬49°16′49″，东经119°58′06″，海拔691米的高地上。其特点是在长方形主体的山墙两角斜对着设置2个出入口和通道。主体长10米，宽6米，壁厚0.5米，深1.8米，出入口门宽1米，通道宽1.4米，长5米。



谢尔塔拉阵地掩蔽部遗址

②B型

全阵地共有3个，其中701、698、714高地各1个。现以701高地的此种工事为例：工事位于北纬49°16′52″，东经119°58′16″。掩蔽部主体部分长3.1米，宽1.6米，壁厚0.5米。其底边山墙两角开有出入口，并向两侧延伸有通道；一侧是宽0.8米，长1.7米，另侧是宽0.8米，长2.5米。全部钢混结构，深约1.8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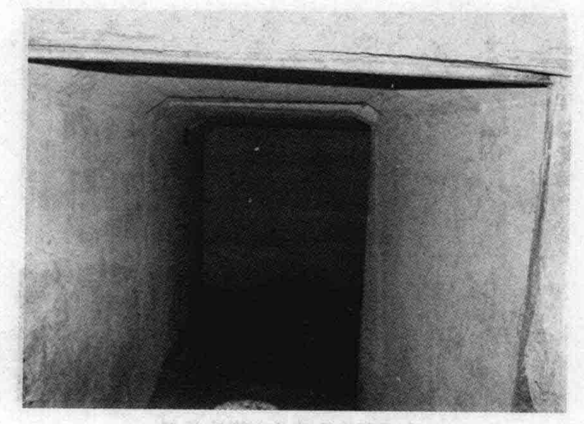
谢尔塔拉阵地掩蔽部遗址



谢尔塔拉阵地掩蔽部出入口遗址



谢尔塔拉阵地掩蔽部出入口遗址



谢尔塔拉阵地掩蔽部遗址内部

③C 型

全阵地共有 2 个，其中 1 个在 701 高地，另一个在 723 高地。725 高地的此型掩蔽部位于北纬 49°17′18″，东经 119°59′36″。特点是出入口及通道设在工事背面墙体中央处。掩蔽部主体框架长 4 米，宽 2.5 米；出入口和通道宽 1.2 米，长 1.5 米。壁厚 0.5 米。深约 1.8 米。

(5) 指挥所

全阵地有 2 个，一个在 725 高地，另一个在 727 高地。它是在普通“菜刀形”掩蔽部的基础上，在正面中央距地面约 20～30 厘米处开有 1 个高 20 厘米、宽 30 厘米的了望兼射击孔，在背面出入口左侧一角设置一个上口为 1.4×1 米的观察点。如位于北纬 49°17′18″、东经 119°59′21″的 727 高地的 1 个指挥所，其主体宽 2.7 米，长 4.3 米，深约 1.8 米，壁厚 0.5 米。正面中央部位距地面高约 20～30 厘米处，设有 30×20 厘米的了望口，背面出入口左侧一角开有 1×1.4 米的观察点。与主体框架相连通的有一条长 2.7 米、宽 1.45 米的通道。



谢尔塔拉阵地指挥所遗址

谢尔塔拉阵地指挥所遗址

(二) 巴彦汗野战阵地

1. 概　貌

巴彦汗野战阵地是 1941 年后关东军在海拉尔要塞周边先后构筑的 13 处国境野战阵地之一。位于海拉尔东南约 20 余公里的塔班陶鲁盖（五头山）以东，以巴彦汗（海拔 841.0 米）为中心的周边 4～6 公里范围内的广阔丘陵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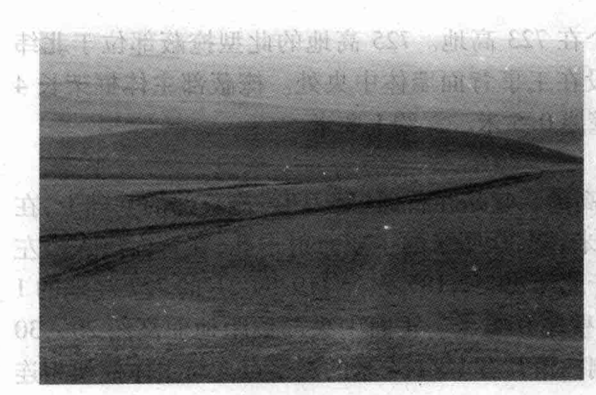
这里有 10 余个海拔在 790 米以上的高地，大都修建了钢混结构的永久性工事，工事附近挖掘有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和步兵壕，而在高地周围地形平缓、易受坦克攻击的正面和侧翼则设置了反坦克壕。在五头山东部，有一道反坦克壕沿着起伏的地势，蜿蜒曲折地把邻近的几个高地全部连接起来，壕长达 3～4 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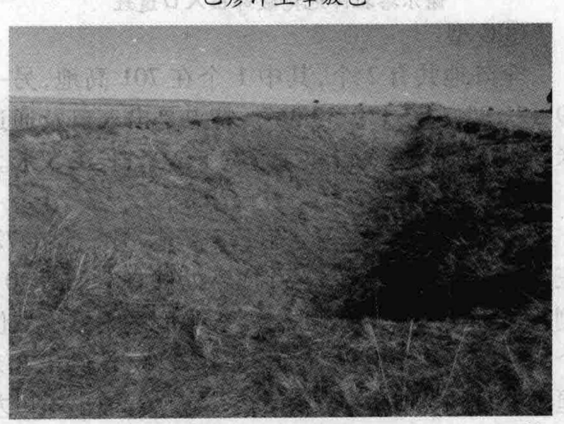
巴彦汗(五头山)阵地远眺



巴彦汗主峰敖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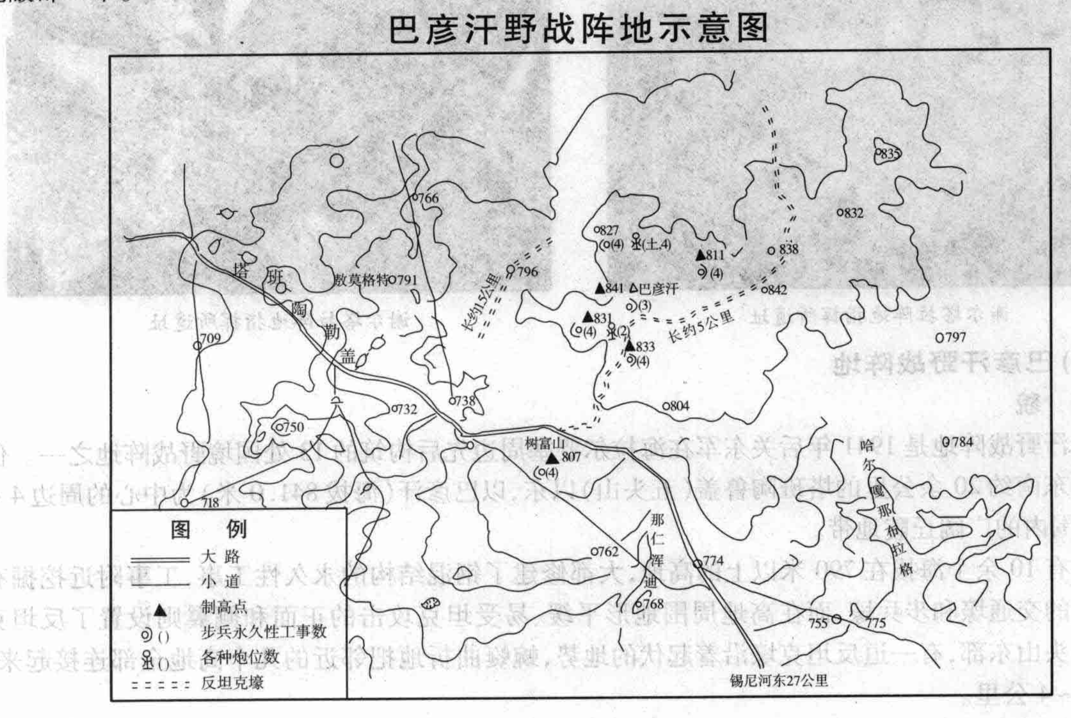
巴彦汗阵地反坦克壕遗址



巴彦汗阵地反坦克壕遗址

巴彦汗野战阵地各山头共筑有各种永久性工事40余个。805、810、820、837、841、845等6个高地便发现有40余个各种工事,其中测定坐标的有30余个,内有各种碉堡、火力点21个,火炮工事6个,掩蔽部3个。

巴彦汗野战阵地示意图



巴彦汗阵地是关东军海拉尔要塞的南部屏障,也可称为海拉尔要塞向南正面延伸的前进阵地。阵地的性质和作用,同海拉尔河北岸的谢尔塔拉野战阵地十分近似。

(1)谢尔塔拉野战阵地西南距海拉尔约 20 公里,作为海拉尔要塞的北部屏障,其防区以海拉尔河北今谢尔塔拉镇附近为中心,西起"新三河道",东南到哈克站附近。东西长约 20 余公里,恰好填补了海拉尔第 8 国境守备队敖包山阵地和伊东台阵地在海拉尔河以北地区防御上的空隙。

而作为海拉尔要塞南部屏障的巴彦汗野战阵地,位于海拉尔东南约 22 公里,其警戒范围在哈克道以南,西起伊敏河东岸东北到哈克附近,距离也是 20 余公里,刚好也填补了东樱台阵地和伊东台阵地在"哈克道"中段东、南防卫上的空隙。

(2)谢尔塔拉野战阵地西北部距黑山头附近的中苏界河额尔古纳河约 120 公里。它把其周边 10 余平方公里内的高地全部纳入其阵地范围。巴彦汗野战阵地南距罕达盖附近的中蒙界河哈拉哈河上游,也只有约 125 公里。它也把其周边的近 10 个高地归入阵地之中。

(3)尽管谢尔塔拉野战阵地与巴彦汗野战阵地南北相隔约 15 ~ 16 公里,但两个阵地的东界与西界,在地形图上几乎分秒不差地重合在同一经度网络纵轴上。

上述这种布局使海拉尔要塞的防线更加严密。

从巴彦汗阵地的规模、阵地上工事的种类和数量分析,这里像谢尔塔拉野战阵地一样,是个由炮兵加强的步兵大队阵地。

2. 碉堡、火力点

在巴彦汗野战阵地的 6 个高地共发现各种碉堡、火力点 21 个工事,其形制与规格有下列 6 种:

(1)菜刀形

这类工事在各山头共发现 11 个。以位于北纬 49°01′31″,东经 120°01′00″,海拔 801 米处的工事为例,主体长 4 米,宽 3 米。工事原高度已无法认定,壁厚 0.4 米。工事背面的通道设在一角,长1.80 米,宽 1.20 米,内、外两道门。火力指向东偏南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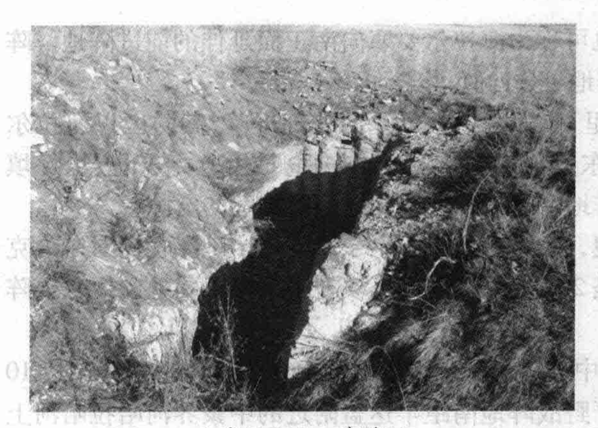
巴彦汗阵地工事遗址



巴彦汗阵地工事遗址

(2)地堡式半地下立射火力点

共发现 5 个,例如位于北纬 49°01′32″、东经 120°01′23″、海拔 817 米处的一个,其主体宽 3 米,长 2.1 米,正面两角向左右伸出两个"闪沿",长、宽各 0.5 米,高(厚)0.7 米。正面的正中位置有个"枪眼",宽 30 厘米,高 25 厘米。"枪眼"下端离地面约 30 厘米。火力指向东 82°。工事背面正中位置开有个宽 1 米的门,并连接一条长 2 米的通道。工事壁厚 30 厘米,钢混结构,地下部分约 1.3 米。工事的四壁和顶部都覆盖有厚厚的土层。



巴彦汗阵地工事遗址



巴彦汗阵地工事遗址

(3)"菜刀形"工事的变体型

其基本框架仍为"菜刀形",但主体形状、规格和通道走向、长度均明显有别于一般"菜刀形"。例如位于北纬49°01′34″,东经120°01′04″,海拔800米处的一个工事,其主体为2×2米的正方形,而不是通常的长方形。其背面通道在以30°斜线向后延伸2米后,又以大于直角的角度水平折向一侧约5米长,而后又以同样角度折回2米,使通道起点和终点线段像梯形的两条斜边一样对称。通道全长9米,宽1米。工事壁厚0.3米,水泥结构。这种工事在巴彦汗整个阵地只发现一处。火力指向西263°。



巴彦汗阵地工事遗址



巴彦汗阵地工事遗址

(4)封闭式卧射轻机枪掩体

位于北纬49°02′11″,东经120°00′38″,海拔795米处。主体部分为正方形,长、宽各2米,钢混结构,壁厚40厘米。其背面通道为长2米,宽1米。火力指向北偏东22°。



封闭式卧式轻机枪掩体遗址



封闭式卧式轻机枪掩体遗址

全阵地共发现2种6个。

(1)土筑炮位

共有2个,其坐标是:

①北纬49°01′48″,东经121°01′41″,海拔835米;

②北纬49°01′48″,东经120°01′39″,海拔833米。

以上两个炮位是一组,相隔仅30余米。其形制与规格完全相同。系就地挖掘土筑而成,未作任何硬化处理。炮坑直径8米,四周封土高约1.5米,封土底宽1.5米。炮坑正面向前突出约1米。炮坑两侧弹药仓,长、宽各2米。火力指向南偏西209°。

(2)两侧配有钢混结构弹仓的炮位

共4个,西南—东北向一字排开。其坐标是:

①北纬49°01′58″,东经120°02′25″,海拔840米;

②北纬49°01′57″,东经120°02′24″,海拔840米;

③北纬49°01′56″,东经120°02′24″,海拔841米;

④北纬49°01′55″,东经120°02′25″,海拔840米。

以上4个炮位工事的形制、规格完全一致,炮坑系就地挖掘土筑而成,直径7米,用炮坑内挖出的土堆成四周的封土墙,封土高约1.5米,其底座宽约2.5米。炮坑两侧正中部位建有两个规格相同的钢混结构弹仓,高1.5米,宽3.5米,四壁(顶)厚30厘米,门宽1.5米,高1.3米。炮口火力指向:1炮位西偏北306°;2炮位西275°;3炮位西偏北282°;4炮位西偏北290°。

4.掩蔽部

在全阵地只发现3个,多在较开阔地带。其坐标是:

①北纬49°01′30″,东经120°01′33″,海拔821米;

②北纬49°01′49″,东经120°01′41″,海拔825米;

③北纬49°02′01″,东经120°01′27″,海拔824米。

以上3个掩蔽部中,前2个都是“菜刀形”,但主体面积和通道构造均有差异。第一个主体长3.5米,宽2米,深2米,壁厚0.4米。通道分为两段,直连主体的一段长1.8米,宽1.2米,外接的一段是1×1米。第二个主体长3.5米,宽2.1米,深2.5米,壁厚0.4米。通道只有一段,长2.5米,宽1.2米。第三个掩蔽部的主体也是长方形,长4.5米,宽3.5米,所不同的是通道设置在主体中央部,长1.5米,宽1米。壁厚0.4米,深2米。



巴彦汗阵地掩蔽部遗址



巴彦汗阵地掩蔽部遗址



巴彦汗阵地掩蔽部遗址



巴彦汗阵地掩蔽部通气孔



巴彦汗阵地掩蔽部遗址



巴彦汗阵地掩蔽部遗址

第五节　要塞设施

一、营　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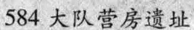
海拉尔是关东军西部防卫地区司令部所在地，长期驻有大批要塞守备部队、野战部队和后勤补给部队等。这些部队的营房遍布市区四周。解放前海拉尔居民习惯上分别称这些日军兵营为东大营、西大营、南大营、北大营。

最早侵驻海拉尔的是关东军第 1 骑兵旅团及其所属的骑兵第 13、第 14 联队，按当时日军骑兵编制，一个旅团配备 1 600 ~ 1 700 匹马，开始是驻在河西今仁德里街针织厂一带和西头道街今海拉尔区看守所一带的原东北军遗留的旧兵营里。1934 年初，这里又开进骑兵第 4 旅团的第 25、第 26 联队，并与原已驻此的骑兵第 1 旅团合编成骑兵集团。不久，海拉尔要塞的各项工程全面展开，其中也包括大量修建兵营。1936 年为骑兵第 1 旅团第 13、第 14 联队在今西大街呼伦贝尔学院小教分院新建了兵营（3 栋二层楼房和部分平房，现还遗留有一栋二层楼房），该旅团即迁来此处。1938 年夏至 1943 年海拉尔要塞兵营基本建成，专门负责要塞守备的关东军第 8 国境守备队（旅团级）和步兵第 23 师团等野战部队及后勤补给部队相继进驻各自预建营区。

第 8 国境守备队下辖 5 个地区部队，到海拉尔后守备队司令部驻入仁德礼街今农垦医院院内（其办公室便是当年日军守备队司令部），各地区部队则分别就近驻在其分担的守备阵地预建的营区。故整个守备队驻得较分散，几乎海拉尔居民所称的东、西、南、北大营基本上都有其部队。如：一地区部队驻海拉尔河北岸敖包山的南坡下，此即所谓“北大营”；二地区部队驻铁道北发电厂对面；三地区

部队驻于今巴彦托海路南郊变电站一带(这里属于南大营),四地区部队驻于东山下今学府路南端市劳教队一带;五地区部队则驻于东山上北部靠近五地区阵地处,以上两处则属“东大营”范围。





584 大队营房遗址



584 大队营房遗址

各地区部队都是独立加强大队(营)级建制,其加强之处在于,一是较一般步兵大队多设一个步兵中队;二是重机枪中队的人员和武器装备也有所加强;三是加强有炮兵和工兵。故地区部队的营区占地面积也较普通步兵大队为大。

在各“大营”中,最大的是“东大营”,其次是今贝尔桥(原断桥)西南的“南大营”。东大营包括山上和山下的两个营区带。山上的营区北从今麦福劳马铃薯淀粉厂一带起南至东山飞机场一带的大约长 5 公里范围内;东山下营区是从今尼尔基路的北端滨洲线铁路南起,沿尼尔基路过今军分区向南再沿学府路直到其南端的市劳教队附近,南北全长约 7 公里。在这个“东大营”范围内的山上部分,到 1945 年 2 月关东军在进行大规模改编调动前,驻有独立野炮第 3 大队、独立野战速射炮大队、特殊情报部(代号 267 部队)。还驻有第 6 军司令部(代号 600 部队)及其直属部队,步兵第 23 师团司令部(代号 703 部队)及其所属的步兵第 64 联队、第 72 联队(代号 283 部队)、野炮兵第 23 联队(代号 737 部队)、辎重第 23 联队(代号 744 部队)、工兵第 23 联队(代号 197 部队)、搜索第 23 联队(代号 837 部队)、制毒队(代号 51 部队)、卫生队、通讯队(代号 226 部队)、兵器勤务队、卫生队、防疫给水班、病马厂。还有关东军直属的特殊情报部、第 18 野战货场(代号 2646 部队)、陆军第二野战医院(代号 321 部队)、航空兵第 24 飞行战队(团)(代号 8893 部队)及第 8 国境守备队所属的第 5、第 4 地区守备队等。

在东山下,从尼尔基路的北端起向南约 1.7 公里长的范围内,是第 6 军直属野战兵器厂和弹药库,山下的军用铁路支线也从这里通过。兵器厂和弹药库有大约 10 余栋大小平房,其南部贴东山根处还有挖进山里的数十米长的地下弹药库约 10 余座。

今呼伦大街南侧曾有一个建筑勤务部队,一个军队制砖厂。沿今加格达奇路东侧有两个番号不明的军事机关和小建制部队。在今军分区以南沿学府路东侧曾驻有四支日军部队,一个是番号不明的旧野战部队(后来有说是改建为被服厂),原址在今军分区教导队附近;二是野战汽车大队和野战汽车厂(代号 204 部队、2641 部队),原址在今呼伦贝尔学院商贸分院附近;三是 543 支队(“防疫给水班”,即细菌部队),原址在贴山根处的今市公安局警犬基地附近;四是 226 部队(原 23 师团通讯队,后为独立迫击炮第 17 大队),原址在今市劳教队一带。

在“南大营”地区,除了第 8 国境守备队第三地区部队外,早期还驻过骑兵第 1 旅团,后来有独立坦克第 16 联队(代号 292 部队)、陆军第二野战医院(代号 110 部队)等。

在整个海拉尔要塞区,日军部队修建有 350~400 栋营房,总建筑面积约 20 万平方米。但现在已很难再找到一栋较完整的原日军营房建筑。

从原日军 23 师团第 254 联队下士官草绘的“关东军步兵第 254 联队示意图”中可看到联队共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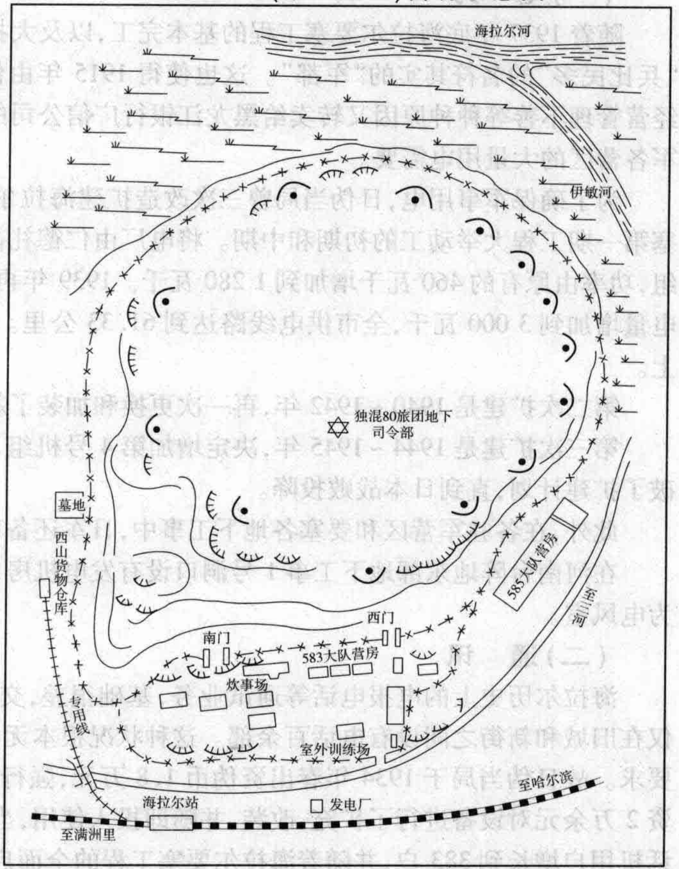
大小40余栋营房(不含营外"官舍"),总建筑面积约8 000平方米。

原日军人员凭回忆草绘的第8国境守备队第二地区部队(1945年2月改编为独立混成第80旅团步兵第584大队)营区示意图。从图上看,该营区内共建有20余栋大小平房,包括4个步兵中队和1个重机枪中队、1个步兵炮小队的兵舍,还有中队部、行李房、酒保、仓库、弹药库、炊事场、冬季室内训练场、医务所、卫兵室、铁木工修配间等。常见的日军步兵中队兵舍面积是9×45米,即405平方米,此部队全营舍面积约4 000平方米。

伊东台阵地700部队营房示意图



河南台阵地(第二地区)营房示意图



从事细菌战的543支队的营舍,1953年8月海拉尔市公安局曾派员对遗址进行勘察,并草绘出示意图,现保存于该局档案卷宗中。原建筑物战时被日军自行焚毁,到1953年时其残垣断壁也大多被夷为平地,但基址仍清晰可辨。从示意图看,该支队营区占地面积约30 000平方米,东贴山根,南、北、西三面挖有深、宽各1.5米的壕沟,壕沟内侧堆起约1米的土埂,土埂上原来架有铁刺线网。营区南北长300米,东西宽100米,院内有8×50米二层楼房基2座,6×30米平房房基2栋,二层小锅炉房一座,面积不明的小平房一栋,3.4×6.7米小池塘一口(用途不明)。还有一口直径2米、上覆有钢筋混凝土盖、用途不明的井状坑。

二、仓 库

海拉尔要塞区的日军仓库较多,除第8国境守备队各地区部队、第23师团各联队和其他相当于大队(营)以上部队都有自己的仓库外,还有作为海拉尔兵站基地的几个大型仓库。其中最大的是第18野战货场(2646部队),位于东山上北头,当年日军用壕沟和铁刺线围成一个很大的院子,四周设警戒哨位,通往飞机场方向的专用铁路从其西侧通过。这是一个大型综合的物资仓库,据当年赶马车给该仓库送过货的老居民回忆,院中大约有8×25米的有取暖设施的砖房约20栋,还有无取暖设施的封闭式板房冷库约20栋,另有些只有防雨雪篷盖而无围墙的简易库房。库内除无枪炮、弹药外,其他战备军用物资如被服、装具、粮食、"慰问袋"、水果、鱼肉罐头、各种干菜、酱菜、饼干、烟、酒、豆油、草料等一应俱全。甚至还存有大批汽车轮胎防滑链、军用自行车、取暖用小铁炉等。

这个仓库长年使用着大量雇佣制中国劳工,1945年8月开战时还有100余名劳工。其库区附近的铁刺网外还有七八个半地下式劳工窝棚,每个可住二三十人。还有一个大厨房,内装大、小锅灶六

七口,战时工人跑散。

另外两个较大型仓库,一是河西今巴尔虎西路西头海拉尔区物资局、木材公司院内;二是西山上今铁路客车车辆整备厂附近,都有铁路专用线通入其中。这两个仓库的具体番号不详,前者可能是2616部队,后者则可能是2636部队。这两个库的规模和存储物资种类不清,其中一个仓库主要是储存药品和医疗器械。

三、电力、通讯与水源

(一)电　力

随着1937年底海拉尔要塞工程的基本完工,以及大批日军部队的进驻,使得海拉尔变成了一个"兵比民多"的名符其实的"军都"。这也使得1915年由俄国资本家斯米尔诺夫投资创建、5年后因经营管理不善等种种原因又转卖给黑龙江银行广信公司的小电厂,根本无法满足各方面,首先是关东军各营区的大量用电需要。

为了确保军事用电,日伪当局曾三次改造扩建海拉尔电厂。第1次扩建是1934~1936年,即要塞第一期工程大举动工的初期和中期。将电厂由仁德礼街原址迁入新址(即现址)新建,新装两个机组,功率由原有的460瓦千增加到1 280瓦千。1939年再次更换大功率机组,增设大型晾水池,使供电量增加到3 000瓦千,全市供电线路达到61.33公里。1940年,军事用电占全厂供电量的65%以上。

第二次扩建是1940~1942年,再一次更换和加装了新机组,使发电功率增加到3 640瓦千。

第三次扩建是1944~1945年,决定增加第4号机组,但即将组装中仓库突然失火,烧坏机器,打破了扩建计划,直到日本战败投降。

此外,在各驻军营区和要塞各地下工事中,日军还备有应急用发电机组,以应付紧急状态。

在河南台阵地东部地下工事1号洞口设有发电机房,219房间为供电所;西部8号洞口214房间为电风室。

(二)通　讯

海拉尔历史上的电报电话等通讯业务,基础很差,交换机装机容量很小。1932年末日军侵驻时仅在旧城和新街之间设有电话百余部。这种状况根本无法满足日伪统治当局、首先是关东军方面的要求。故日伪当局于1934年春出资伪币1.8万元,强行收购了原由民间经营的"呼伦电话局",又投资2万余元对设备进行了扩充、改装,并随即投入使用,当年末电话机即达到275部。1935年城内电话机用户增长到383户,并随着海拉尔要塞工程的全面启动,各方面沟通联系事务迅猛增多,电话用户也呈持续大幅度增长上升之势。

1937年,日伪当局为适应通讯业务不断扩大之势,在中央大街新建电报电话局楼房一座(原址即今电报机房)。当年电话用户又猛增到653户,其中日本用户435户。1938年度城内实装磁石式电话机784部,较之日军侵驻海拉尔当时已增长六七倍。电话用户主要是日本人,共装设电话524部,占全部在装电话约67%,而在日本用户中又主要是日本军方用户。后来,随着要塞工程的竣工和大批日军部队营区的设置,日本驻军、日伪统治机关更成了通讯业的主要服务对象。原来只在市内主要街道装设的为数不多的电话线杆,开始绵延不断地向日军各营区延伸,电话线杆和里程较日军侵驻之初增长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1941年11月,日伪当局又新增建了市内电话机房,开通了自动电话交换机。装机容量达4 000门,到日军投降前实装话机1 700台。此外,还从河西电话局到东山上的第6军司令部与其直属部队和23师团与各联队营区及要塞各阵地都安装了电话用地下电缆,总长度约10余公里。

日军除包揽性地大量使用市政电信工程设施外,还拥有较为完善的军内自备电信手段,如第23师团有专设的通信联队,第8国境守备队也有自己独立的通信队,军内重要情报信息都是由军用专线、无线电话或密码电台发出。在要塞一、二、三地区地下工事内,都有完备的通讯设施。在地面工事

内，都有电话相通。在河南台阵地西部地下工事内的207、208号房即为电信房间；在东部1号洞内设有“电报电话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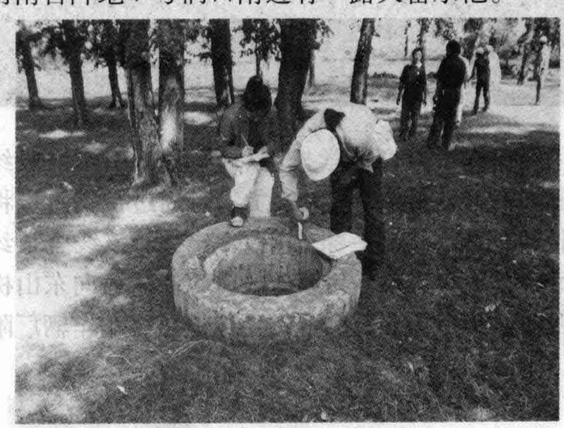
1945年8月9日晚，日军纵火焚毁了电报电话局的两个楼房。

（三）水 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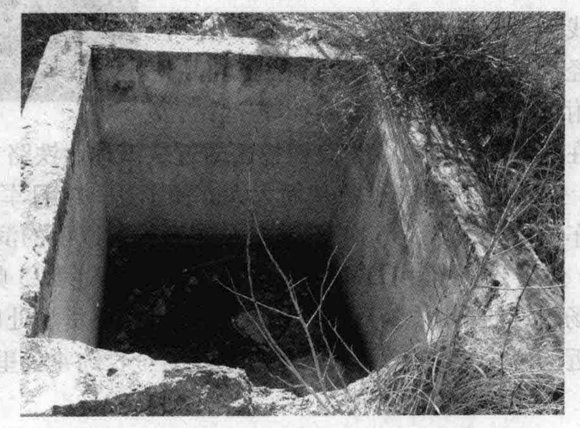
驻海拉尔关东军为解决其数万兵马的人畜饮水和其他方面用水，对水源问题也作了周密部署，对南大营、西大营、北大营和东大营的山下营区，因其驻地地势较低，离河谷近，水位高，水源丰富，水量充沛，故在营区普遍装备了手压“洋井”，也有少量用电泵吸水的机井。

对于驻山上各营区和驻守各阵地的部队，因驻地水位低，水源缺，采取了打深水井的办法，用电泵抽取。东山上日军营区至少建有深水电机井2～3口。在松山、河南台阵地有2口。

另外，在河南台、敖包山的地下工事中，为解决供水问题，洞底挖有水井和蓄水池。在一些阵地上也建有露天式混凝土蓄水池。在河南台阵地东部1号洞口内有一蓄水池，敖包山阵地3号洞口北部地下工事内有深5米的水井。在松山阵地2号洞内有一个深4～5米、宽3米、长5米的蓄水池。在河南台阵地7号洞口附近有一露天蓄水池。



584大队营房前的水井遗址



河南台阵地露天蓄水池遗址

四、交 通

（一）公 路

日伪当局对海拉尔周围的交通问题抓得较早。从1934年初开始，日军修建了几条以军用为主的沙石公路。主要是：

1. 从火车站经夹信子头道街呼伦桥沿今呼伦大街去东大营的沙石路约4.5公里。

2. 经中央大街、桥头街、中央桥和今胜利大街，在东山下向北经由今“望海楼”通往东山机场的沙石路约8公里。

3. 由火车站经东头道街、中央大街、西大街，跨伊敏桥向今市劳教所方向去的沙石公路约8公里。

4. 从今市劳教所向北直达铁路交叉点的东山下南北沙石公路约4公里。

5. 东山上从机场向北到第18野战货场的沙石公路约2.3公里。

6. 北出口过海拉尔桥后从公路干线岔向敖包山南侧日军北大营的沙石路约3公里。此外，零星的沙石路也还有一些，如河南台阵地上的二地区部队到东部“特火点”的小沙石路等。

（二）桥 梁

1934年5月，海拉尔要塞工程正式启动前，由北出口从敖包山下跨海拉尔河通往三河道的海拉尔大铁桥和由南出口跨伊敏河通往中蒙边境阿尔山地区的伊敏桥工程即已开工，并于1935年相继竣工交付使用。这两座桥都是海拉尔历史上最早建成的钢筋混凝土与钢板联合结构大桥，各为7孔，长217米。

此后，又先后修起几座钢筋混凝土的大小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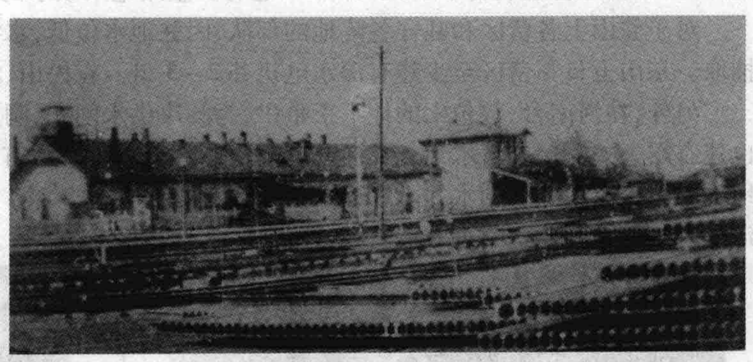
1. 1936～1938 年间建成呼大军桥，这是在海拉尔东郊跨越海拉尔河建成的又一座永久性桥梁。该桥 8 孔，长 129 米，载重标准汽车－13，挂－80。

2. 1937～1939 年建成市内从北部跨越伊敏河直达东山阵地的呼伦桥，桥长 300 米，宽 6 米，11 孔，长宽均超过此前修建的伊敏桥。

3. 1942～1944 年又在拆除原“兴安大木桥”的基础上，建成从市区中部跨越伊敏河直通机场和东山兵营的中央桥（今中央桥），桥长 330 米，宽 7 米。

（三）铁　路

为了强有力地保障要塞的建设和作战防卫的需要，日军还在建设军用铁路支线方面采取了切实有效的措施。首先于 1936 年将原由俄侨资本家沃伦错夫修建经营的从北到南横贯东山下的 15 公里林业铁路专用线强行收归日本人开的“海敏公司”经营。日军利用此铁路在今乳品厂附近设立了铁路物资装卸转运站，又在南部今呼伦贝尔学院西校区附近从该林业铁路专用线向东南今商业学校、原日军营区引出一股约 2 公里长的军用支线，从而大大方便了这一带日军营区的短途运输，一些大宗货物可通过铁路直接将车皮甩进营区。其次，日军还从东海拉尔以西的滨洲铁路干线，接出一条军用铁路支线，该线全长约 8 公里，途中经由日军第 18 野战货场库区、第 23 师团的炮兵联队和步兵第 253、255 联队通向东山机场附近的军用煤场。第三是日军还由铁路货物处以西向西头道街北部和西山上今铁路客车车辆厂附近的两个军用仓库修建了专用铁路，全长约 4 公里。



1945 年海拉尔火车站

（四）机　场

海拉尔在“九一八”前没有军用机场。1932 年日本人的“满洲航空株式会社”在海拉尔开设定期航班，每周两三次航班，在西屯附近设了一个小型机场。这样的机场无法满足作为关东军西部国境要塞的需要，故在要塞工程中即配套安排了军用机场的建设工程，并在 1937 年底按计划建成占地面积近 20 万平方米、足够日军航空兵一个飞行旅团八九十架战斗机使用的机场。今东山民航机场即是当年日军机场原址。1938 年夏关东军航空兵第 24 战斗机飞行战队（团）即进驻此机场。

1939 年夏在诺门罕战争期间，由于空战规模不断扩大，大批轰炸机和战斗机开来海拉尔，日军又在南郊的西屯一带突击建成一个新机场，占地面积 3.7 平方公里。

1939 年海拉尔机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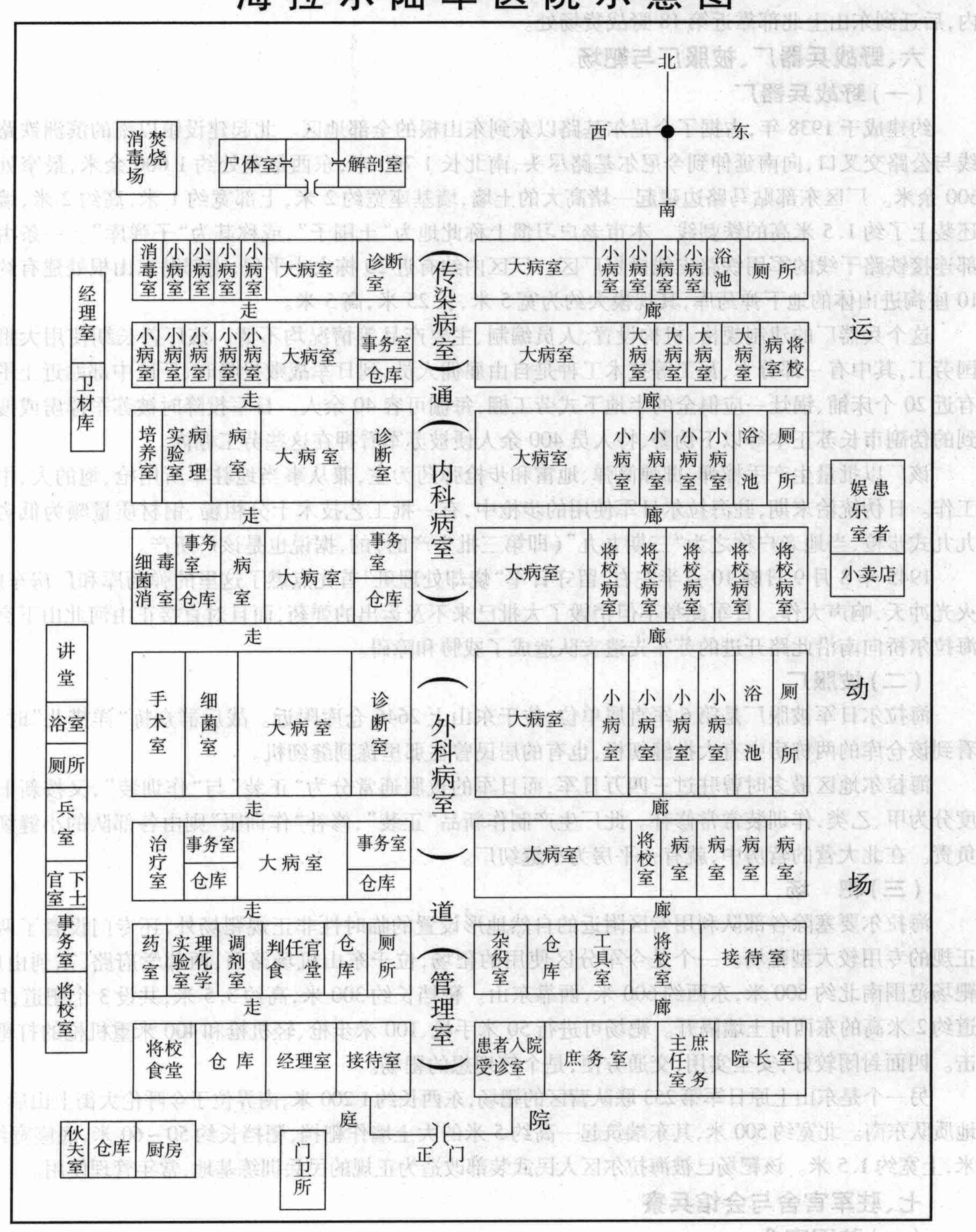
五、医院与病马厂

（一）医　院

关东军在海拉尔共修了 2 个大型兵站医院，即位于东山上的陆军第一医院（代号 321 部队）和位于河西南大营地区今海拉尔区医院住院部一带的陆军第二医院（代号 110 部队），这两个医院规模都相当大。据原驻海拉尔日军军医竹内丰根据个人回忆草绘的原海拉尔陆军医院示意图和一些老居民回忆，东山上那所医院位于哈克道今 109 地质队东北，门朝南开，主体建筑是两栋大约 12×30 米的 3 层楼，还有长、宽规格与前述两楼相同的 2 层楼。另外还有大小不等的大约 10 余栋平房，总建筑面积

约3 000平方米。全院共设内科、外科和传染病科,设有大病室14个,将校小病室36个,约300个床位。考虑两所医院是在兴建要塞过程中同时建成的,其建制序列又紧紧相连,很可能是按同一标准图纸修建的同一建制级别、同一建筑规模的医院,根据竹内丰绘制的东山医院草图即可大致了解河西南大营医院的概要情形。

海拉尔陆军医院示意图



(二)病马厂

驻海拉尔日军部队中配备的马匹数量很大，骑兵全有马匹，炮兵中除少量重炮由牵引车牵引外，师团所属的炮兵联队（团）大多由马匹牵引，联队所属的炮兵中队和大队步兵炮、速射炮以及独立迫击炮联队或大队所装备的火炮全是马匹牵引或驮运；辎重兵部队也都是一半使用汽车，一半使用马车。各部队拥有的成百上千匹军马经常发生疫病或意外事故，病马厂即为诊断和治疗各部队军马的疫病和伤痛而设，实即驻军兽医站。该厂一度设于今军分区招待所以北的一个用铁刺线围起的大院内，后迁到东山上北部靠近第18野战货场处。

六、野战兵器厂、被服厂与靶场

（一）野战兵器厂

约建成于1938年，占据了今尼尔基路以东到东山根的全部地区。北起建设镇以南的滨洲铁路干线与公路交叉口，向南延伸到今尼尔基路尽头，南北长1 700米，东西最宽处约1 000余米，最窄处约600余米。厂区东部贴马路边建起一堵高大的土墙，墙基座宽约2米，上部宽约1米，高约2米，墙顶还装上了约1.5米高的铁刺线。本市老户习惯上称此地为“土围子”，或称其为“子弹库”。一条由北部连接铁路干线的军用铁路支线横贯厂区。厂区内约有近20栋大小平房，南部贴东山根处建有约近10座掏进山体的地下弹药库，其规模大约为宽5米，长25米，高5米。

这个兵器厂的建制规格、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主要产品等情况均不清。该厂曾长期使用大批中国劳工，其中有一部分木、瓦工等技术工种是自由雇佣人员，到日军战败投降时，厂区中部贴近土围墙有近20个床铺、锅灶一应俱全的半地下式劳工棚，每棚可容40余人。日军投降时被苏军俘虏或搜捕到的伪副市长苏正本等以下伪警、特人员400余人便被苏军看押在这些劳工棚内。

该厂以批量生产手榴弹、掷弹筒弹、地雷和步枪弹药为主，兼从事当地驻军所用枪、炮的大、中修工作。日伪统治末期，驻海拉尔日军使用的步枪中，有一批工艺技术十分粗糙、钢材质量颇为低劣的九九式步枪，当地老户称之为“三期九九”（即第三批生产的）的，据说也是该厂所产。

1945年8月9日晚10点半左右，留守日军“烧却处理班”首先点燃了这里的弹药库和厂房车间，火光冲天，响声大作。日军此举不但销毁了大批已来不及运出的弹药，而且对直接正由河北山下突破海拉尔桥向南沿此路开进的苏军先遣支队造成了威胁和障碍。

（二）被服厂

海拉尔日军被服厂是第6军直属单位，位于东山上2646仓库附近。战后群众拣“洋捞儿”时，曾看到该仓库的两栋房中有大批缝纫机，也有的居民曾在那里拣到缝纫机。

海拉尔地区最多时曾驻过三四万日军，而日军的被服通常分为“正装”与“作训装”，又按新旧程度分为甲、乙类，作训装常常修补。此厂生产制作新品“正装”，修补“作训服”则由各部队的小缝纫厂负责。在北大营的营房中，就有一平房为小缝纫厂。

（三）靶　场

海拉尔要塞除各部队利用营区附近的自然地形设置的临时性非正规靶场外，还专门设置了两个正规的专用较大型靶场。一个是今军分区使用的靶场，位于东山机场路西，西邻学府路，东到山底。靶场范围南北约800米，东西约600米，西靠东山。靶挡长约300米，高约3.5米，共设3个靶道，用4道约2米高的东西向土墙隔开。靶场可进行50米手枪、100米步枪、轻机枪和400米重机枪的打靶射击。四面封闭较好，安全实用，交通方便，是个较理想的靶场。

另一个是东山上原日军第253联队营区的靶场，东西长约1 200米，南界位于今呼伦大街上山后109地质队东南。北宽约500米，其东端筑起一高约5米的大土墙作靶挡，靶挡长约50～60米，底座宽约4米，上宽约1.5米。该靶场已被海拉尔区人民武装部改造为正规的民兵训练基地，常年管理使用。

七、驻军官舍与会馆兵寮

（一）驻军官舍

驻军官舍是要塞区驻军部队为随军的军官家属、“军属”（军队文职官员）家属和部分下士官家属

修建的宿舍。海拉尔因驻军多，修建的这种“官舍”也多，呈大集中、小分散状态。大片的官舍有东山下、南大营，今草市街北部一带，河东腰卢子南官舍，今陵园街北部等。总计约600余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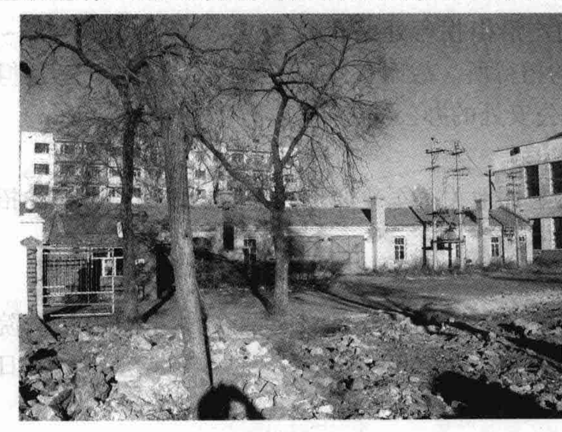
最大的驻军官舍位于东山下的今加格达奇路以东，日伪时期日本人称之为“官舍街”。该街从南到北全长1 500米，往东连到山脚下，形成南北路3条、东西街15条，现在的建设1道街到4道街，当年每条街有9栋房，从5道街到15道街，每条街有7栋房，总共有100余栋房，总建筑面积10余万平方米。这些房中除约20余栋7×45米的大规格房外，可能是某种小建制部队、军事单位或其他公用服务单位，其余都是7×25米的“官舍”，总计约七八十栋。以平均每栋3户计，即有住户200多户。其中从北部起约一半是“将校官舍”（即军官家属），往南的一半是“营外下士官官舍”和“军属官舍”。因此条“官舍街”家属住户多，日本人还特地在该街路西今新华印刷厂建立了“海拉尔东山日本在满国民学校”，1940年还以此校门前为始发站，开设了向北经今呼伦大街和夹信子头道街到今巴尔虎东路陵园站的海拉尔第一条公共汽车线路。

河东腰卢子南官舍建成于1941年，位于中央桥下胜利大街路北从市宾馆门前到胜利一路附近，共有东西向约5条街，每条街约6栋平房，共有30余栋，有日军家属约百余户，但其间夹杂着少量日本人的“非军事户”。

河西今草市街东端一带的日本官舍约有20余栋红砖房，建于1940年，住有约七八十户“营外下士官”家属。

河西靠近原南大营的今环卫处、钢窗厂一带官舍，约有灰砖房20余栋，住第三地区部队和陆军第二医院、独立坦克第16联队等部队的家属七八十户。

此外，在今陵园街以北一带有原第8国境守备队、宪兵队等部队官舍10余栋，共约三四十户。铁道北还有二地区部队官舍约五六栋，共20余户。



日军官舍遗址



日军官舍遗址



日军官舍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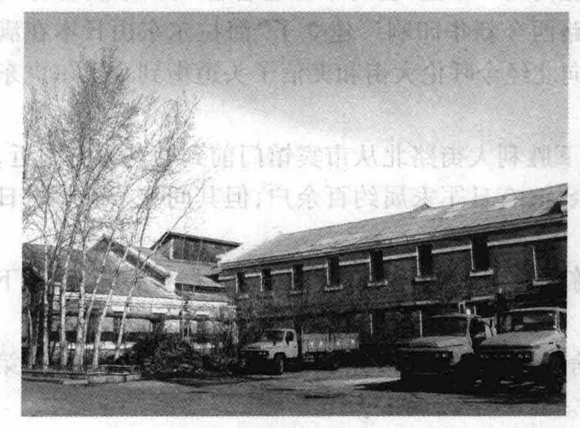
日军官舍遗址

(二)会馆兵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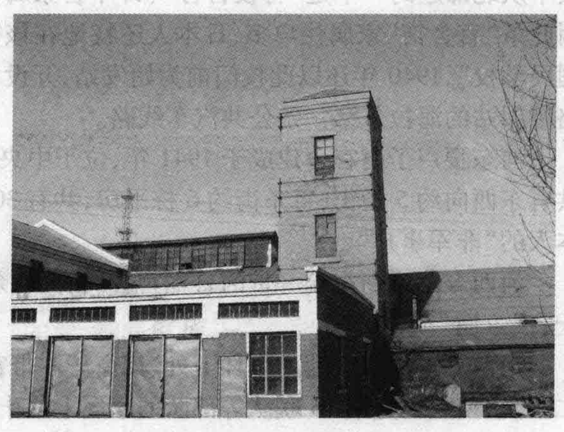
驻海拉尔关东军所属会馆兵寮共建4处。

1. 沟沿街海拉尔将校会馆

该会馆约于1939年建成,位于沟沿街北部,今牧业机械总厂后院附近。主体建筑是个曲尺形2层灰楼,是直属第6军司令部的军官招待所,建筑较豪华,外墙面全部贴有"马赛克"砖。内部设单人、双人或三人等中小规格的房间约三四十个,大小会议室数个,另有餐厅、小卖店、洗衣房、浴池、理发室、电影放映室等,在当时条件下堪称设施齐全,条件舒适。1945年8月9日上午第二次空袭中被炸毁一多半,余一角废墟。



海拉尔将校会馆遗址



会馆楼后水塔遗址

2. 夹信子头道街下士官会馆

该会馆约建于1938年,位于夹信子头道街西头向沟沿街拐弯处路西,2层楼,建筑面积约400~500平方米,是外地关东军下士官来海拉尔出差下榻的招待所。战时被炸起火或被日军自行焚毁,但四壁完好。1950年被铁路局修复,后曾长期作为铁路公安处的办公楼,原楼现仍存。

3. 夹信子头道街兵寮

该兵寮建于夹信子头道街西头路东,是个大平房,是外地关东军普通士兵来海拉尔出差下榻的招待所。原址已拆除。

4. 桥头街兵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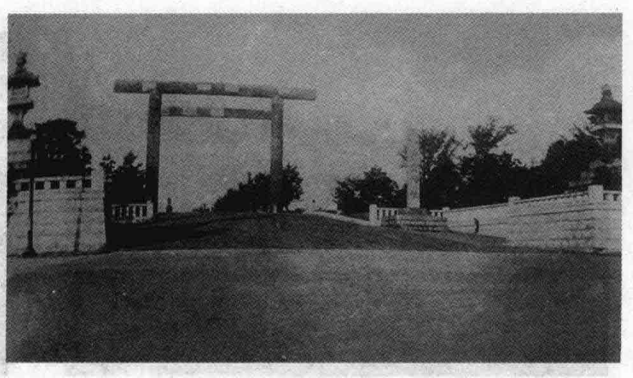
该兵寮建于1940年,原址在今桥头街路南,呼伦饭店路北一带,中间设有两个大门垛的院门,院门两侧各有一座长约30米的洋灰砖大平房,总建筑面积约500~600平方米。建筑较讲究,战时被日军自行焚毁。

八、神社与忠灵塔

(一)神　社

建于1940年,是为祭祀1939年诺门罕战争的日军亡灵而建。原址位于河西文化街南头今民族幼儿园和蒙古族中学院内到西山坡上。其前庭开字形大门、塔形灯座等均在山下,神庙在一块经人工平整的山坡广场上,占地面积约2万余平方米。神庙是个带有典型日本古代风格的木结构建筑物。战时被苏军炸毁。

此外,在河南台阵地上有过小型、微缩景观式的神社建筑。



海拉尔神社

（二）忠灵塔



海拉尔松原公园中的“海拉尔忠灵塔”

1940年建，原址即在今西山广场和区政府办公大楼处。此广场原是长满樟松和其他乔、灌木的丘陵地。日伪当局于1939年征调大批劳工平掉了这一带山丘，在今西山广场下修起一条“轱辘马”轻便铁道，经北大街将平掉丘陵的多余土方，用“轱辘马”运到河堤工地修堤，工程颇为浩大。广场略呈长方形，东西约800米，南北1 000米。从场外进入广场，设置了南路、中路和北路3条各有十几个台阶的进出通道。广场高出平地约近2米，广场的西正面和南、北侧用水泥勾缝的石灰石围成一个城墙垛口式的矮墙。正方形花岗岩塔身建在又高出广场约3~4米的另一个纵深平台上，塔身两侧设有高出广场为两米半和3米的两层观礼台。广场中路两侧进场不远处设有一个水泥大凉亭，亭内有供日本僧侣做法事进香前用的水手舍（净手池），此建筑物至今仍较完好保存。忠灵塔广场是日伪当局举行各种庆典等大型集会的场所，1945年8月空袭中被炸掉一角，但基本上仍完整，战后其内部被捣毁。1954年夏经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塔身后部炸掉，前墙的前部经整修后建起一个集会用主席台，70年代在此建了政府办公大楼。



西山广场上的手水舍（净手池）



海拉尔松原公园中的忠灵塔

九、慰安所与酒保

（一）慰安所

海拉尔正式由日军军方举办并挂有慰安所招牌的有3家。一家在河西今文化活动中心后院，这是最大的一家。院内有一栋洋灰砖大平房约10×40米，还有两栋稍小的平房，有慰安妇四五十人，绝大多数是朝鲜妇女。战时此慰安所连同其近旁的“满映馆”、“兵寮”等一大批建筑物均被日军焚毁。解放后修复作了粮库，后改成第十四粮店，2001年全部拆除。第二家建在河东腰卢子今市直幼儿园和呼伦小学之间一带，也有3栋平房，但规模小于前者，慰安妇不超过20人。这家慰安所的房屋20世纪50年代末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呼伦贝尔盟公安大队占用，70年代后期拆除。第三家在东山下“官舍街”一带，规模也较大。

除直接由军方管理的“慰安所”外，海拉尔还有四五十家日本民间经营的色情娱乐场所，其中有几家规模较大，各自拥有二三十名日本妓女，如北大街的“敷岛”、“东洋馆”，西四道街的“入船”、东大街的“富山楼”、西大街的“松の家”、西交界街的“绿屋”等。这些地方也被日军官兵称为“慰安所”。

(二)酒　保

“酒保”是日军营区军用小卖店的称呼。当年日军各独立或分驻的大队以上营区,一般均设有供应官兵常用日用品和烟、酒、糖、茶、罐头、饼干等食品的小卖店,由本级部队的“经理”(即后勤部门)主管。有的设在营区内,有的在营区外附近地段,规模大小不一。这种设施海拉尔有多处,最大的是东山下“官舍街”路西今乳品厂一带。店面很大,院内有较大型商品库,经营商品种类也较全。1945年8月被日军自行焚毁。

十、农　场

这是由“满洲第840部队”(独立第8国境守备队)主管经营的蔬菜农场,也称840农场。采取二战前一些发达国家已实行的“公司+农户”、“订单农业”、“计划内统购包销”等管理模式,把东山下五间房村(今奋斗镇友好村的一部)的四五十户菜农松散地组织起来,由840部队经理部门实行宏观管理,由部队聘用的日本人专职负责生产规划、技术指导、任务监督、产销协调等事务。村民作为场员,主要依据日军的指导性计划和产销合同,落实生产供应蔬菜和军马饲料(燕麦)等指标。军方按当年市场收购价格统购包销。对村民超额生产的蔬菜、饲料,如军方需要优先供应军方,军方不需要者可自由上市出售。“场员”在农场不享受任何工资或保险待遇。

农场场部设在今贝尔桥东南六二六小河引水闸附近堤南,是个住宅用土平房,其日常工作基本上是由日本人吉中夫妇办理,另有雇员一人。吉中是原海拉尔日本宪兵队的退役曹长(上士),1942年初领了一笔退役金后由市内迁入此处赶车、养牛马。

五间房村是海拉尔市郊的老蔬菜基地。日本军方一是早已垂涎这片优质菜地,二是出于军事保密考虑,曾多次软硬兼施地企图将村民迁走,但始终遭到抵制。最后在1942年决定不再对村民动迁,而将其全部划入新成立的“840农场”。菜农主要为日军供应的秋菜品种有土豆、大葱、大白菜、大萝卜、胡萝卜、大头菜等,也供应部分夏季的青椒、西红柿、豆角、黄瓜等以及部分饲料。

为使日军能得到优质充足的蔬菜供应,农场还在耕作技术品种改良方面给予帮助、指导,如曾推行某些蔬菜间作套种以求增产。他们在引进并推广新品种“地八寸”大白萝卜、胡萝卜、西红柿、白土豆方面下了不少工夫。还曾引进了海拉尔过去从未见过、但日本人喜欢吃的块根蔬菜——“狗宝”。

从1943年春起,菜农为日军生产了三年蔬菜,每年供应日军各种蔬菜数十万到上百万公斤。1945年初夏,农场经营者吉中被重新征召入伍。同年8月日军战败投降,农场也随之解体。

第六节　驻军与武器装备

日本关东军于1932年12月5日下午侵入海拉尔。随着要塞的建成,便有大批兵种繁多、数量庞大、指挥系统不一的部队进驻海拉尔,兵营布满市区四周,是个名符其实的“军都”。

一、要塞建成前的驻防部队

(一)骑兵第1旅团

是日本仅有的四个骑兵旅团中的第一个,组建于明治年间。1932年6月由日军参谋本部调来我国东北,编入关东军序列。同年6月15日由大连登陆后,直接赶到齐齐哈尔一带,配属于关东军第14师团,转战于克山、拜泉、明水、海伦、巴彦、庆安等地对马占山部作战。1932年12月5日和由第7师团临时划归第14师团长松木直亮指挥的混成14旅团(旅团长服部兵次郎少将)部队一起侵入海拉尔。从此,骑兵第1旅团便作为第一支侵入海拉尔的关东军部队,在海拉尔驻防数年。以装甲列车为先导的混成第14旅团步兵第26联队,在海拉尔站稍事休整,便继续乘车西进,于翌日凌晨侵驻满洲里。

骑兵第1旅团长是高波 祐治少将。下辖骑兵第13、14联队(团)和一个骑炮兵联队,一个辎重队

等直属部队。按当年日军骑兵旅团的标准编制定额,其具体编成是:

1. 旅团本部15人(含参谋长、副官、主计、经理等将校、下士官);机要20人,通讯班30人,卫兵中队80人,计145人。

2. 骑兵第13联队本部(含通讯、对空班)60人,4个骑兵中队,各100人、马,共400人、马。重机枪中队80人(8挺重机枪);步兵炮中队100人(山炮2门,速射炮2门),计全联队官兵640人,配有山炮2门,步兵炮2门,重机枪8挺,轻机枪32挺,掷弹筒32门,骑步枪约500余支,马刀500余把,军马约800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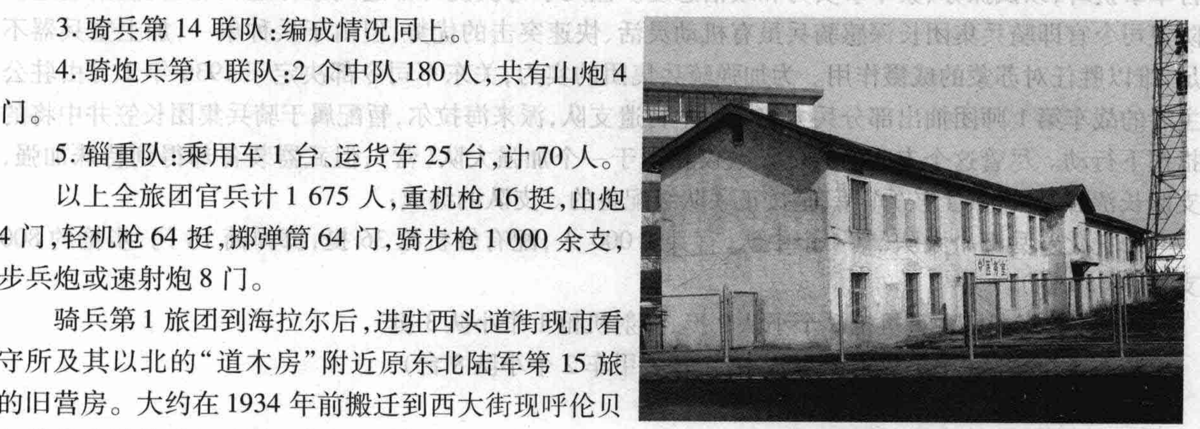
3. 骑兵第14联队:编成情况同上。

4. 骑炮兵第1联队:2个中队180人,共有山炮4门。

5. 辎重队:乘用车1台、运货车25台,计70人。

以上全旅团官兵计1 675人,重机枪16挺,山炮4门,轻机枪64挺,掷弹筒64门,骑步枪1 000余支,步兵炮或速射炮8门。

骑兵第1旅团到海拉尔后,进驻西头道街现市看守所及其以北的"道木房"附近原东北陆军第15旅的旧营房。大约在1934年前搬迁到西大街现呼伦贝尔学院小教分院新建的三栋二层楼内。



日军骑兵第1旅团兵营(原教育学院)

(二)骑兵第4旅团和骑兵集团

约于1933年秋调入海拉尔,旅团长茂木谦之助少将,下辖骑兵第25联队、第26联队,骑兵的编制情况与第1旅团同,但配属的其他兵种有所加强。有1个重炮兵大队(重炮指10.5厘米以上的榴弹炮或加农炮)配有火炮8门,另配属有一个战车中队,装备有轻型坦克和装甲车约12辆。其部队营址暂未查明,可能与第1旅团同驻一营区。

骑兵第4旅团到海拉尔后,连同此前早已驻海的骑兵第1旅团,合编为关东军直辖的骑兵集团。各旅团的内部编成均按原建制序列保持不变。骑兵集团长由笠井中将担任,1937年8月由莲治蕃中将继任。



海拉尔日军旅团司令部

1934年3月3日,关东军司令官菱刈大将发出关于改变军队部署的关作命第575号命令,附件第四条规定,"骑兵集团长任西北地区防卫司令官。主力位于海拉尔附近。除负责维持防区内的治安外,在三河及满洲里部署部分兵力,负责苏、满国境的警备。"命令中还规定"……各防卫司令官,在维持治安工作中,要安排使用非其隶属或指挥部队之日、满军警"。

1934年12月1日,根据关作命第626号命令,关东军又将全伪满原来的5个地区防卫司令部和

新京警备司令部及关东州、旅顺口要塞司令部等4个司令部改划为9个防卫地区，伪兴安北分省即今呼伦贝尔岭西地区改称西北地区防卫司令部，司令官仍由骑兵集团长兼任。

该骑兵集团所属部队自1934年起即轮流抽调赴华北作战，到1938年7月便全部调往察哈尔、绥远和蒙疆地区。

（三）涩谷支队

1935年初关东军在伪满“西北地区”的军事部署基本就绪后，不断在“满、蒙”边界制造摩擦，进行军事挑衅，以试探苏、蒙军事实力和政治态度。但几乎每次挑衅都遭到蒙方迎头痛击，使西北地区防卫司令官即骑兵集团长深感骑兵虽有机动灵活、快速突击的优势，但由于兵种单一，加上重兵器不足，难以胜任对苏蒙的威慑作用。为加强骑兵集团的实力，关东军司令部决定于1936年2月由驻公主岭的战车第1师团抽出部分兵力组成一个特遣支队，派来海拉尔，暂配属于骑兵集团长笠井中将的指挥下行动。尽管这个支队的兵员人数仅相当于一个加强大队（营），但武器装备却得到特殊加强，支队长涩谷是大佐（上校）军衔，是按正联队级配备的。支队的编成：

摩托化步兵1个大队（辖4个中队，官兵1 000人，配有轻机枪36挺，掷弹筒16门，步枪约800支，汽车50辆）。

重机枪1个中队（重机枪3个小队9挺，高射机枪1个小队3挺）

战车1个中队（中坦克1个小队4台，轻装甲车2个小队8台）

联队炮1小队（四一式山炮2门）

大队炮1小队（九二步兵炮3门）

工兵1小队。此外有通讯班、材料厂等部门。官兵总计约1 5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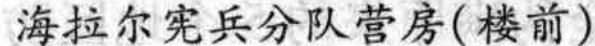
该支队来海拉尔不久便直接开往贝尔湖西岸边地区阿萨尔庙附近集结备战。同年3月末涩谷率支队越过边界深入蒙境阿达格多兰地区，遭到蒙方地面猛烈反击，随后苏蒙空军12架轻型轰炸机也参战，涩谷支队受重创后向北方退却。期间日机7架也前来接应助战，又引起一场激烈空战，涩谷支队这次越境挑衅以惨败告终，兵力受到很大伤亡，装甲车全部被击毁，涩谷率残部逃回休整补充。1939年7月随安岗坦克师团残部撤回驻地公主岭。

（四）宪兵和特务部队

1. 关东军海拉尔宪兵队

始建于1933年末，初为宪兵分队建制，隶属于齐齐哈尔宪兵队本部，分队长是秋筱贯三少佐，分队驻车站街（今铁路列车段劳服公司院内，当年分队的主要建筑物二层灰砖楼现仍完好）。分队还在三河（伪额尔古纳左旗所在地，今额尔古纳市三河镇）派驻了分遣队。1936年关东军宪兵队扩编，海拉尔建立了宪兵队本部（驻地在仁德里街，今农垦医院门诊部二层楼房即其原址），直属关东宪兵司令部。





海拉尔宪兵分队营房（楼前）



海拉尔宪兵分队营房（楼后）

海拉尔宪兵队地区本部的历任队长是：

松尾秀一中佐（1936～1937 年）

久住建三郎中佐（1937～1938 年）

安藤次郎中佐（1939～1940 年）

谷家村雄中佐（1941～194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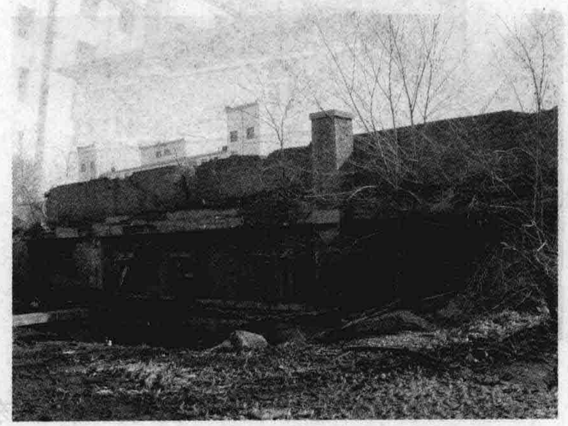
松平满真中佐（1942～1943 年）

志村行雄中佐（1944～1945 年）

本部的编制人数在 160 人左右。其内设机构有副官室、庶务课、经理课、警务课、特高课等部门。在各课又按不同工作任务分设若干班，如特高课下设露（俄）系班、满系班、蒙系班和日、鲜系班及通讯检阅班等。海拉尔宪兵队下辖满洲里宪兵分队和新巴尔虎右翼旗、新巴尔虎左翼旗、三河宪兵分遣队和扎赉诺尔宪兵分驻所。各分队编制人数不等，如满洲里分队 30 人左右，而海拉尔分队则多达七八十人，各分遣队人数是 10～20 人。各级宪兵队中大多数是日本军士或军官，统称为宪兵，也有少数朝鲜人，其身份是“宪兵补”，而所谓“满、蒙系”人员在宪兵队内的正式身份则是“宪补”。各宪兵队中除上述正式在册人员外，还有大量以社会的各种职业场所为掩护的特务接头、联络活动据点和专职或业余特务情报人员，仅据海拉尔宪兵队本部及直属海拉尔分队 1939 年一个年度的资料统计，他们就拥有“联络员”、“秘侦”和“嘱托”等不同层次身份的特务分子 290 多人，有 60 多处特务活动据点。触角遍布全市各行业，如浴池、理发业、旅馆、饭店、赌场、妓院、商场、照相和协和会、劳工协会、马车组合等各种社团中均有宪兵队的活动据点，在当年全市 3 万人口中，几乎每百人就有一个是暗藏的宪兵队密探，造成“谨防隔墙有耳”、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1945 年 6 月初，海拉尔宪兵队奉命撤销，其满洲里分队、博克图分队划归齐齐哈尔宪兵队管辖，海拉尔宪兵本部连同海拉尔分队共约二百五六十人与关东军情报部海拉尔支部（即特务机关）合并，改编为关东军特别警备队（代号特警 606 部队），下设 4 个中队，总计约 360 人。同年 8 月 9 日开战后，他们紧急焚毁了许多重要机密文档，并会同地方保安局系统的“特高”警察逮捕了数十名“战时有害分子”。当日下午将这批临时抓来的“战时有害分子”和此前捕获在押未结的苏联地工人员等苏俄政治犯近 50 人在省警务厅后院砍杀。而后全队进入海拉尔要塞河南台阵地，在独混 80 旅团统一指挥下参加作战，8 月 18 日向苏军缴械投降。







海拉尔宪兵分队本部营房遗址　　海拉尔宪兵分队监狱遗址

2. 海拉尔特务机关

关东军特务机关的正式名称是关东军情报部，总部设哈尔滨，并在全“满洲国”各地设有 14 个支部，海拉尔的特务机关即是其中支部之一。特务机关是个机构庞大密布边境的间谍特务部队，其人员以现役关东军官兵为主，但也有些雇佣的朝鲜人、蒙汉族和白俄分子担任“嘱托”等文职人员。特务机关在各地设有数十个特务活动据点“出张所”（办事处），还有秘密监狱以及若干个“栖林训练所”，

还直接领导指挥设在海拉尔的白俄别石柯夫独立骑兵支队,领导各地的“白俄事务局”。他们以人数不多的机关在编官兵为基础,编织了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庞大情报网。他们所领导掌握的外围情报关系是“嘱托”、“谍者”。特务机关长的官阶一般都是中佐,1941~1943年有一任是大佐。特务机关除全面搜集国内各方面情报外,还重点地直接进行对苏联和蒙古的越境情报派遣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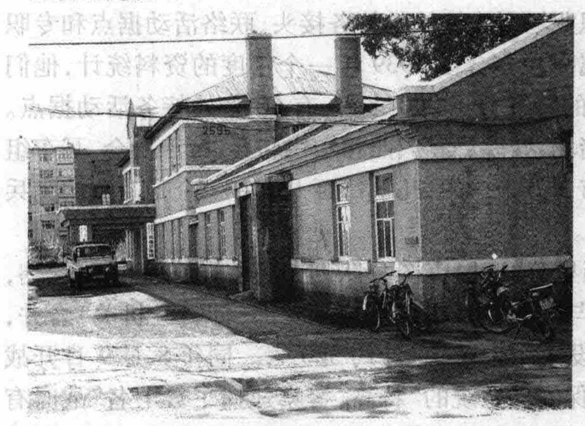
1945年6月与海拉尔宪兵队合并。8月9日进入海拉尔要塞河南台阵地参战,8月18日向苏军缴械投降。

二、要塞“专守防卫部队”

(一)独立第8国境守备队

“专守防卫部队”是专门负责要塞区防御作战的部队。承担海拉尔要塞防卫的部队是第8国境守备队(代号840部队)。该守备队于1938年7月进驻海拉尔,并接管了要塞各阵地的全部防务。该守备队和“全满”各守备队一样,都是由关东军各师团及其在日本国内留守部队人员中抽调编成的。

守备队按独立旅团配备。其司令部(代号611)原址设于海拉尔河西今陵园街农垦医院办公室的二层办公楼。



第8国境守备队(第80独立混成旅团)司令部楼房(东面)



第8国境守备队(第80独立混成旅团)司令部楼房(西面)



第8国境守备队(第80独立混成旅团)司令部楼房(背面)



第8国境守备队司令部楼房(侧面)

守备队首任队长是矢野音三郎少将(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第二任是阿部平辅少将(自1940年起),第三任是千田贞雄少将,第四任是石田保忠少将(自1942年起)。

守备队下辖5个地区队,分别驻守要塞四周的5个阵地。各地区队长都是按联队级主官的最高军衔——“大佐”配备的。第一地区队(681部队敖包山阵地)队长岛本大佐,驻地在海拉尔河北敖包山南坡下。第二地区队(515部队,一度曾因为部队长姓服部而称服部部队,河南台阵地)首任队长服部直臣大佐(后晋少将),二任队长谷部理壑大佐,三任队长浜田十之助大佐,四任队长长仁科大佐,驻地在火车站北的山脚下。第三地区队(490部队,松山阵地)队长仁保进大佐,营区位于靠近松山阵

地的今环卫路、市医院住院部一带。第四地区队（559部队，东樱台阵地）部队长冈明之助。部队营址原在六间房附近今学府路南端路东公安收审站一带，当地居民曾称之为"冈部队"，即来源于部队长冈明的姓氏。第五地区队（551部队，后改700部队，驻伊东台阵地，位于今东山粮库南大墙外）其营区即在东山上阵地附近。首任队长山口正一大佐，二任队长美田千贺藏大佐。

第8国境守备队初始配备编制总兵力为6 201人，后逐步增编扩大到总兵力近万人。

第8国境守备队（840部队）人员、火炮编成表

部队番号	阵地位置	编制兵力	配备大、中口径火炮种类与数量						
			野炮	十榴	中迫	高炮	十加	十五加	小计
一地区队 681	敖包山	939	4		6	4			14
二地区队 551	河南台	5 000	8	4	8	16	4	8	48
三地区队 490	松山	1 111	2	4	6	4	4		20
四地区队 559	东樱台	850	6		4	4			14
五地区队 700	伊东台	939	4		4	4			12
合计		8 839	24	8	28	32	8	8	108

这些数字也不完全，二地区还曾装备过二十四榴（即24厘米口径重榴弹炮）2门，是一个重炮兵中队建制。另外，当时海拉尔要塞各阵地平均每个阵地都有4～6门列入步兵大队装备的小口径轻型火炮，如"三七"速射炮、"五七"步兵炮等。

关东军早期建立的各国境守备队，其建制级别多为旅团级，其兵力配备一般也相当于或少于步兵旅团，但其重火器配备则往往数倍于普通旅团。以火炮为例，普通步兵旅团仅配有山（野）炮12门，一般也不配重炮和高炮，而各国境守备队总计配备口径8厘米以上火炮504门，平均每队36门以上，而且大多配有重炮和高炮。

第8国境守备队始终是关东军所有国境守备队（1938年初建时是8个，到后来增加到14个）中兵力最多、火炮等装备最强的一个。这可以从关东军14个国境守备队中实力较为突出的7个守备队的守备兵力与火炮配置比较表便可明显看出。

关东军7个守备队、兵力、火炮配置表

队别	驻地	兵种（中队）			火炮配置（门）			
		步兵	炮兵	工兵	轻炮	重炮	高炮	小计
第1国境守备队	东宁	14	8	3	52	4	23	79
第2国境守备队	绥芬河	5	2	1	18	4	8	30
第4国境守备队	虎头	12	4	3	41	10	18	69
第6国境守备队	瑷珲	10	4	1	30	4	12	46
第7国境守备队	黑河	5	3	1	26	2	10	38
第8国境守备队	海拉尔	20	9	4	60	16	32	108
第13国境守备队	法别拉	4	3～4	1	68	6		24

表中"轻炮"系指口径10厘米以下的榴弹炮、山（野）炮、迫击炮等，但不含步兵大队装备的"三七"速射炮、"五七"步兵炮和轻迫击炮等小口径火炮。再以重机枪、大队炮等重火器为例，国境守备队各地区队的重机枪和大队炮（指口径在7厘米以下的小口径炮）配备数量更是远远高于一般步兵大队。普通步兵大队的机枪中队一般配有8～12挺重机枪和大体相同数量的掷弹筒，大队还有由2

~3门速射炮或步兵炮编成的小队，而按关东军关于《筑城施设基准》的规定，要塞区步兵一个大队的重火器配备标准是重机枪24挺，步兵炮2门，速射炮8门。

按照关东军的设想，依托附有布雷区、反坦克壕、铁刺线、交通壕、散兵坑、钢筋混凝土的地下通道和地面永备工事，再加上强大的火力配系，要塞守备的每个地区部队（一般为步兵大队，相当于营，但配有较多的火炮和重机枪以及相应数量的工兵）在防御作战中，必定坚不可摧，足以发挥日本人所说的“一人十杀”即“以一抵十”的威慑作用，也就是一个大队抵挡敌一个师团的进攻。而一旦转入进攻，也同样会是一支锐不可当的突击队。

1939年夏的诺门罕战争，给第8国境守备队提供了一试身手的机会。该守备队核心阵地的二地区（河南台）部队长长谷部壑大佐被点将亲率由精选的官兵组成一个支队约2 000兵员（步兵7个中队，配重机枪24挺，轻机枪38挺，掷弹筒56门，速射炮12门，山炮4门，中迫击炮4门，五七步兵炮8门）与关东军第7师团第28联队的一个约1 500人的加强步兵大队（梶川大队）一起固守诺罗高地，并于8月27日被苏军一举歼灭，长谷部壑大佐因战败“自决”。

1944年10月，第8国境守备队和已调任菲律宾的原23师团余部，合编为新组建的第119师团，其原承担的要塞防务随后于1945年2月改由新编成的第80独立混成旅团接防。

（二）独立混成第80旅团（代号：703部队）

这个旅团是在1945年2月下旬刚刚组建的新部队，用以取代此前已改编为第119师团的原第8国境守备队，并接管海拉尔要塞阵地的全部“专守防卫”职能和驻地兵营。第80旅团的兵员是以原第23师团留守官兵为基础，加上新征入伍的“初年兵”和再次征召入伍的老退伍兵组建起来的。第80旅团的总兵力约在9 000人左右。其兵器装备是步枪5 300支左右，轻机枪约300余挺，掷弹筒约300余门，重机枪40~50挺，步兵炮10门，山炮12门，重炮5门，中迫击炮36门，配有军马1 100余匹。

第80旅团的旅团长野村登亀江陆军少将是个老资格职业军人，日本陆军大学第21期毕业生。1939年诺门罕战争时曾任伪满兴安军中将师长，因战败在战后被勒令退出现役，安排在某地“协和会”任职。1945年初被重新征召服现役。旅团参谋长是原博一大佐。

第80旅团的编成是：旅团本部下辖独立步兵第583大队（代号锐峰318部队），第584大队（代号锐峰558部队），第585大队（代号锐峰　　部队），第586大队（代号锐峰283部队），第587大队（代号锐峰700部队）。每个大队辖步兵中队4个（每中队200人左右，配有步枪约150支，轻机枪12挺，掷弹筒12个），重机枪中队1个（配有重机枪8~10挺，官兵约150人），步兵炮1个小队（配五七炮2门，官兵约60人），大队满编时兵员1 000人以上。

旅团挺进大队，下设4个中队，共约900人。其兵器配备同于一般步兵大队。

旅团炮兵大队（代号锐峰737部队），下设山炮兵3个中队，配有山炮12门。另配重炮5门（15厘米加农炮3门，10厘米加农炮2门），全大队兵员约500~600人。

旅团工兵队（代号锐峰197部队）下设3个中队，共约500~600人。

旅团通信队（代号锐峰226部队，驻东山下今学府路南端路东靠近劳教队处）下设2个中队，共约300~400人。

旅团辎重队（代号锐峰744部队）下设3个中队，共约400~500人。

第80混成旅团和原第8国境守备队相比，虽然在部队建制级别上同属旅团级，在兵力编制上也不相上下，但却有一个突出的不同点，那就是两个部队的战斗实力相差较大，尤其是火炮配置方面。如原守备队拥有7.5厘米口径以上火炮108门，而新建第80旅团本身只有此类火炮17门，加上临时配属其指挥的迫击炮第17大队的36门中迫击炮才总共只有53门，比原守备队少一半以上。原守备队有10厘米以上重炮24门，而第80旅团则只剩5门。原守备队有高炮32门，第80旅团的编制中则一门高炮也没有。另一方面，第80旅团是个新建部队，到战争爆发时组建还不到半年，兵员也尚未

配齐,处于缺编待补状态。开战当时第80旅团的全部兵员只有7 000人左右,去掉派驻扎赉诺尔、乌奴耳等地的6个中队,海拉尔的兵力还不到6 000人。

1945年8月9日上午,第80旅团所属各部队首先按预案分别进入各自阵地,随后由第119师团留守人员抽调增援的部队以及紧急征召入伍的“在乡军人”、伪警察等武装人员也相继到达,使要塞区各阵地的总兵力达到约8 000余人,在旅团长野村登龟江的指挥下据险顽抗,垂死挣扎。到8月18日上午,野村少将率敖包山、河南台阵地的残部3 800余人向苏军投降。

三、关东军其他驻防部队

(一)步兵第23师团(代号:旭703部队)

属野战师团,于1938年7月由日本调来海拉尔,师团司令部位于沿今呼伦路上山约1公里处北侧的一所二层楼内。司令部机关的主要成员:

师 团 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
参 谋 长:大内孜少将
作战主任:村田昌夫中佐
情报主任:铃木善康中佐
后方主任:伊藤升大尉
军医部长:村上德治军医大佐
兵器部长:近泽义美大佐
经理部长:汤川正义主计大佐
兽医部长:松尾义夫兽医中佐
通讯队长:松井桂次少佐

其下属各部队的编成是:

步兵团(旅团)长少将　小林恒一　驻海拉尔东山上
第64联队(代号18),联队长大佐　山县武光　驻地同上
第71联队(代号不明),联队长大佐　冈本德三,驻免渡河
第72联队(代号旭283),联队长大佐　酒井美喜雄,驻海拉尔东山上
骑兵联队(代号旭837),联队长中佐　东八百藏,驻地同上
炮兵联队(代号旭737),联队长大佐　伊势高雄,驻地同上
工兵联队(代号旭197),联队长中佐　斋藤勇,驻地同上
辎重联队(代号旭744),联队长中佐　绿川忠治,驻地同上
通讯联队(代号旭226),驻东山下今学府路南端市司法劳教队

另有师团直属的卫生队、野战医院、病马厂、防疫给水部、制毒队、兵器勤务中队等。驻地均在海拉尔东山。

第23师团来海拉尔当时官兵总人数16 000多人,属于日军常备师团的乙级编制。

第23师团来海拉尔第二年即1939年5月,即倾巢出动投入震惊中外的诺门罕战争。共出动官兵15 978人,伤、亡和“失踪”12 230人,全师团平均“损耗率”达76%,损失最重的骑兵联队被全歼,联队长东八百藏本人也被击毙。步兵第71联队伤亡率达94%。师团参谋长大内孜少将战死,步兵第71联队长森田彻大佐被炸死。其代理联队长东宗治中佐抱雷自杀,炮兵联队长伊势高秀大佐、步兵第64联队长山县武光大佐剖腹自杀,搜索联队长井置荣一中佐被俘遣返后被迫以手枪“自决”。另有师团步兵旅团长小林少将腿被炸断,步兵第72联队长酒井美喜雄左臂被打断。第23师团在诺门罕战争中损兵折将,伤亡极其惨重。战后该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因战败责任被勒令退出现役。师团在残留的三千六七百人基础上重新补充整编。

1941年初,日军根据作战地区自然地理和交通条件,把常备师团整编为驮马师团(编制28 200

人),车辆编制师团(24 400 人)和机械化师团(25 970 人)三种类型编制。第 23 师团被整编为机械化师团,其编成是步兵联队 3 个(番号均不变),每联队 4 490 人;野炮联队 3 250 人(辖 1 个野炮大队,2 个 10.5 厘米榴炮大队,1 个 15 厘米榴炮大队);辎重联队 1 810 人,外加人数不详的工兵联队、搜索联队、通讯队、卫生队、野战医院、病马厂等。

1944 年 7 月后,因太平洋前线吃紧,日军总参谋部决定将第 23 师团分批调往菲律宾,留守人员于 1944 年 10 月与第 8 国境守备队合编新成立的第 119 步兵师团,接替原第 23 师团的全部防务。

1944 年 10 月,第 23 师团被整建制调往菲律宾参加太平洋战争,从而结束了在海拉尔的驻军史。

(二)陆军航空兵第 24 飞行战队(代号 8893 部队,1945 年在台北改称 9602 部队)

该飞行战队相当于联队(团)级建制。

二战前日本只有陆海军两个军种,空军不是独立军种,航空兵作为兵种分属于陆、海军。驻海拉尔的是陆军航空兵飞行第 24 战队,于 1938 年 9 月 1 日成立于海拉尔,驻东山现民航机场处。该战队是由日本圈内太田飞行教导队及飞行第 11 联队两部分人员组成。下辖两个飞行中队,配有"九七式"(1936 年造)战斗机 22 架,飞行员 22 人。第 24 飞行战队成立当时隶属于关东军航空兵团(相当于军)第二飞行集团(师)第 12 飞行团(相当于旅团)。第 12 飞行团驻哈尔滨,飞行团长是东荣治少将。第 12 飞行团原辖第 11、第 24 两个飞行战队,诺门罕战争中又增第 10 飞行战队。第 24 飞行战队的首任队长是中村黄次郎中佐。1939 年 5 月诺门罕战争一开始该战队即参战,到 8 月初飞行员已战死 12 人,战伤多人,战队长松村中佐也负伤住院,由寿原秀见少佐继任,飞机几乎全部损失,已到不能再战程度,不得不撤回海拉尔休整。

1940 年第 24 飞行战队整建制由第二飞行集团第 12 飞行团,划给第五飞行集团第 9 飞行团(第五飞行集团驻齐齐哈尔,辖轻轰 45 战队、重轰 61 战队和战斗机 24 战队,集团长小畑英良中将),第 24 飞行战队仍驻海拉尔,其余两个轰炸机战队则驻齐齐哈尔。

1941 年 3 月,第五飞行集团决定由第 24 飞行战队和第 11 飞行战队各抽一个飞行中队新编成一个 87 战队,驻防牡丹江附近的团山子。但 24 战队仍保持原建制、番号等待补充。同年 6 月"关特演"开始后,第 24 飞行战队长由高桥武少佐继任。后该战队改编为独立战斗机飞行中队,约于 1944 年春被调走。

诺门罕战争前夕,关东军在海拉尔又突击抢修了市郊南部的西屯机场(今西山军用机场即其遗址)。同时,将原东山机场扩大为紧紧相邻的两个场地单元,机场北门附近的两处门卫工事(其中一个带地洞)遗址仍在。使海拉尔成了邻近诺门罕前线的最大空军基地。1939 年 6 月 26 日,关东军第一次组织大型机群各种飞机 137 架越境轰炸蒙古塔木察格布拉格时,其中的 80 架战斗机是从海拉尔起飞的。

第 24 飞行战队驻海拉尔当时,机场还驻有一个为飞行战队提供各种地面服务的场站大队和一个"独立航空机械修理整备中队",其被拆毁的修理厂遗址现仍清晰可见。航空兵所属兵力总计约五六百人。

1945 年 3 月,一个日本内地的陆军航空士官学校毕业后的炼成飞行队某中队(具体番号不明)进驻海拉尔,进行训练飞行。8 月 9 日苏军空袭时,该日军航空兵炼成中队的战机中有几架因故障正维修中,不能起飞,只有两架的机械性能处于完好状态,但未敢起飞应战。苏机群首次空袭后,日军飞行中队长率两架完好飞机飞往内地上级单位请示机宜,当日下午残留的航空兵部队空、地勤全部官兵被临时指定参加东山机场到五阵地一带地面作战,后被苏军歼灭。

(三)第 6 军司令部(代号:满洲第 600 部队,守 651 部队)

成立于 1939 年 8 月初。司令部机关驻在海拉尔今呼伦路上东山坡后向南岔路边的一栋三层楼内。

日军大本营之所以决定在此设立军一级的指挥机关,是由于 1939 年 5~6 月间诺门罕战争爆发

后，仗越打越大，因此由内地后方调来前线的各兵种部队也越来越多，参战总兵员已达八万以上，远远超出此前驻海拉尔的第23师团的指挥权限范围，故决定在海拉尔建立第6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在前线参战的各部队。第6军的编成是：

军司令官　荻洲立兵　陆军中将
军参谋长　藤本铁熊　陆军少将
高级参谋　滨田寿荣雄　陆军大佐
高级参谋　田中　陆军中佐
作战主任　岩越申六　陆军少佐
情报主任　平井　陆军少佐

1939年9月诺门罕停战，由内地临时调来参战的各部队相继撤回归还原建制，但仍有些不属第23师团指挥范围的部队继续留驻海拉尔，第6军司令部也继续留驻海拉尔，统一指挥大兴安岭西麓地区的各驻军单位。首任第6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调走后，陆续有安井藤治、喜多成一、石黑贞藏等中将继任。1944年秋，末任司令官十川次郎中将接任。

1945年1月，第6军司令部率直属野炮兵1个大队，速射炮2个中队，汽车1个中队以及通讯队、特工队和2个医院调往上海地区准备抗击美军登陆。

（四）独立战车第16联队（代号292部队）

1942年6月在海拉尔组建，驻地是西大街南头今呼伦贝尔学院小教分院附近原日军骑兵第1旅团第13、14联队所建三栋两层楼房处（今尚有一栋遗存）。在日军战车师团中，一个联队一般编有中战车3个中队，轻战车1个中队，自行炮1个中队，一个维修中队。总计各种战车60余辆，总编制人数约1 070人。但独立战车第16联队还编有搜索队、防空队、工兵队、辎重队等，故编制人数远远多于师团所属联队，约在1 500～2 000人左右。

1943年11月，独立战车第16联队的一部（具体数量不明）被调回日本国内，余部仍驻海拉尔。1945年8月10日凌晨，苏军占领海拉尔火车站后，日军从阵地山上“用接近一个联队的步兵，在坦克协同下”向苏军进行反冲锋，被苏军击退。另据原苏军第36集团军司令员卢钦斯基的回忆录，苏军在博克图受降时曾缴获日军坦克9辆，这可能是原日军独立战车第16联队余部的一部，另一部则留在海拉尔，具体数字不详。

（五）第731部队543支队

建成于1940年12月，对外称“防疫给水班”，代号是543支队。直属于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细菌部队——“731部队”。543支队驻地在东山下今学府路南端路东呼伦贝尔市公安局警犬基地附近，占地约3平方公里。当年四周挖有深约2米，上口宽1.5米的壕沟，壕沟上的土围墙上装有铁刺线高约1.5米。大门在西侧，设有卫兵室。营区中有兵舍、动物舍、材料库、跳蚤室、菌苗地下仓库及后勤服务设施等各种大小房间约300间。

543支队有日军研究人员226人，他们大多是“军属”（即军队所属文职人员，着文职人员专用军服）。首任支队长加藤恒则，后由天野勇接任。支队内设总务部（计划、经理、庶务）、第一部（培养老鼠和跳蚤）、第二部（细菌研究）、供给部（器材保管供应）和训练部（业务教育培训）。

这个支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繁殖致命细菌的传染媒介物——跳蚤，除供本身实验用外，还有向731本部上缴的指标。

任务之二是饲养各种动物，有十几人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动物室中饲养马、羊、兔、鸟、鸽子和数千只老鼠，其中繁殖鼠类是主要工作，培殖设施较为完备齐全。

1941年7月“关特演”期间，543支队奉731本部指令，在3个月内突击完成了3 200公斤跳蚤的繁殖任务。1945年5月，731部队为加紧细菌战召开专门会议进行部署，海拉尔543支队长天野勇由本部开会回海拉尔后，立即组织队内能出动的人员换上便衣，在市区内广泛驱使市民和学生捕鼠，到

有关地区收购鼠类。到1945年7月,除上缴731本部外,支队内存鼠达1.3万只。

任务之三是根据本部下达的指标,培殖炭疽伤寒菌、鼠疫副伤寒菌、赤痢菌、霍乱和结核菌,配备有专业人员和设备,开展细菌的研究实验活动。

543支队建队伊始,便于1940年冬以苏联为假想敌,731部队、100部队以及516化学部队协同,在索伦旗(现鄂温克旗)巴彦汗敖包周围36平方公里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和毒气战“特别演习”,造成当地连续几年发生牛瘟,死了许多牛。

1943年2月,他们与其他4个支队一起配合731部队本部在陈巴尔虎旗境内进行了“冬季消毒法”、“燃料试验”和“野战消毒车试验”等专项演习。

1943~1944年,543支队还曾多次在索伦旗辉河等地进行鼠疫杆菌等细菌实验,造成疫病蔓延,仅南辉等地便死亡320多人,使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厄鲁特蒙古族几乎到濒临灭绝的边缘。

原543支队军官森冈宽介于2001年11月向赴日访问的哈尔滨市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副馆长金成民首次披露,该队还进行人体的活体解剖试验。森冈说:“我们曾用中国‘间谍’进行解剖试验,这个人被伊豆军医用刀从颈部一直剖到腹部。”

1945年8月9日凌晨苏军对日开战后,当晚543支队按731本部命令,将支队所有营房、文档、实验设备连同饲养的各种动物,全部纵火焚烧,而后全体官兵分乘七八辆汽车向大兴安岭方向溃逃。途中曾与穿插迂回的苏军遭遇交火,支队官兵有的战死,有的被俘,也有个别人乘乱突围逃散。

(六)第6军属下的其他部队

1945年1月,第6军司令部调往上海前,在其指挥管辖下的各部队中,除步兵第119师团、独混第80旅团、迫击炮第17大队外,还有不少从独立中队到大队和联队级的战车部队及兵站部队。

第6军指挥管辖的其他部队和军事单位

部队番号	代号	驻地	兵员	主要装备	备注
独立速射炮第3大队			约600人	速射炮18门	1944年夏调冲绳
独立速射炮第7大队			600人	速射炮18门	1944年夏调冲绳
野战机关炮中队			600人	机关炮6门	
独立野炮第13大队			800人左右	野炮12门	
野战情报队	267部队		80人		
独立有线中队			3个中队		
独立无线小队			3个中队 约50人		
固定无线电队			约50人		
无线情报队			约50人		
独立瓦斯中队			180人		
独立野战重炮第17联队	737		4个大队 3 200人 左右	15厘米榴弹炮24门	1942年夏由南方返回,1944年7月调菲律宾,属第7炮兵司令部
兵勤第6中队	光2602		180		
建筑勤务第49中队	猛4015		240		东山下,1944年8月调走
常设陆军医院				4所	
兵站医院	东山上为321 西山下是110		100	2所	1945年1月随第6军司令部调走

部 队 番 号	代 号	驻地	兵 员	主要装备	备 注
野战兵器厂	2636		700		东山下化工厂一带
野战汽车厂	2641		700		东山下化工厂一带 含驻博克图、扎兰屯 150 人
野战货物场	2646 部队				东山上北部
独立汽车第 49 大队	番 6052		700		1944～1945 年调柳州
第 142 铁路停车司令部	路 7116				
关东军化学部海拉尔出张所	269				
野战被服厂					东山上，野战货物厂偏东
将校会馆					位于沟沿街战时被炸
下士官会馆					位于沟沿街战时被炸
兵寮				2 所	夹信子头道街、桥头街各 1
军人俱乐部				1 所	位于东山下今牧管局对过
军人慰安所				3 所	

（七）步兵第 119 师团（代号：403 部队）

此师团系原驻海拉尔步兵第 23 师团于 1944 年夏、秋陆续分批调往太平洋战场后，为填补海拉尔要塞区防务薄弱状态，而于同年 10 月以原第 8 国境守备队的主力为基础，加上原第 23 师团的留守人员合编而成的新师团，不足部分由应属征召入伍新兵补充。但其兵力配备却较之原第 23 师团削减了 40% 多。因为按 1944 年 2 月 15 日日本有关陆军编制的新规定，每个步兵师团的全员编制共有 14 205人，军马 2 908 匹，汽车 113 台。师团下属的 3 个步兵联队由原有的每个联队 5 550 人减为 3 667人，军马也相应减到 608 匹。炮兵联队由原来的下辖 4 个大队减少到 3 个大队，减少 800 余人等。师团长是盐泽清宣中将，师团司令部进驻于原第 6 军（600 部队）司令部的三层楼（位于由今呼伦路上东山坡的路南），并接管了原第 23 师团的全部营房。

第 119 师团下辖第 253（代号 362 部队）、254（代号 515 部队）、255 等 3 个步兵联队，还有炮兵、工兵、辎重联队以及挺进大队等。119 师团的下属部队中，除第 254 联队、挺进大队、病马厂等分驻免渡河、博克图外，其余均驻海拉尔东山上原第 23 师团所属各兵营。原第 23 师团各联队营舍当年都是按标准设计图纸的统一模式、统一施工建设的。

第 119 师团的兵器配备，全师团有步枪 10 000 支左右，轻机枪 360 挺以上，掷弹筒 300 具以上，重机枪 100 挺左右（3 个步兵联队共有 9 个机枪中队，加上挺进大队的 1 个机枪中队共 10 个机枪中队，通常每中队配重机枪 8～12 挺），师团炮兵联队有野炮 3 个大队 36 门，15 厘米榴弹炮 1 个大队 8 门，各联队山炮 3 个中队，共有山炮 18 门，各联队三七速射炮 3 个中队共 18 门速射炮，各步兵大队 9 个五七步兵炮小队有步兵炮 20 余门。另外，还有原独立战车第 16 联队残部的坦克约 20 余辆也配属于该师团。

1945 年 5 月初，即开战前 3 个月，第 119 师团即已根据关东军总部的战备部署，将驻海拉尔部队的大部调往乌奴耳、伊列克得一带突击抢修作战工事，只将少数病弱官兵以及因所承担职能不便离开的人员总计约 2 000 多人留守各部队营房。

1945 年 8 月 9 日凌晨 4 时，师团长接到上级和国境前沿基层军警单位关于苏军突入边界内全面进行猛攻的战斗警报，当即命号兵吹紧急集合号，要师团直属部队官兵立即做好待命参战的各项准备，80 旅团官兵则立即按各自防区进入要塞各阵地。

当日下午，师团从步兵第253、255联队留守人员中抽调700余人增援第80旅团参加要塞守备战斗，于傍晚分别进入阵地。又从各联队的每个中队各抽出5人组成爆破焚烧班，于晚8时苏军先头部队抵进敖包山北麓前将兵器厂、弹药库、兵营等重要目标按预定计划全部点燃后分批撤往大兴安岭西部预设阵地。但其中以第255联队通信队中野大尉为首的600多名官兵，一路上数次与苏军遭遇交火，最后于8月17日在伊列克得、兴安岭以南的笸山地区再度与苏军不期而遇，不到30分钟便被苏军一举全歼，只有十三四名侥幸逃脱。

战前已部署到大兴安岭西麓的第119师团各部队，开战后曾对苏军的进攻进行顽强抵抗，除师团司令部、第253联队、通信辎重部队等因位于战线后方的博克图一带而损失较小外，其余均受到较重大损失，其中炮兵联队受到歼灭性打击。8月18日，师团长盐泽清宣中将奉命率残部8 438名官兵向苏军投降。

（八）独立迫击炮第17大队（代号不明）

该大队是1944年10月和第119师团一起新组建的，驻地在海拉尔东山下今学府路南端市劳教队一带。它不属驻海拉尔的第119师团和独混第80旅团编制序列，另有单独番号，是第四军直辖的独立大队。大队下设4个中队，配有中迫击炮36门，官兵总数在500人左右。

1945年8月开战时，该大队整建制归为独立第80旅团指挥，参加海拉尔要塞作战。后随第80旅团残部一起投降。

四、伪军部队

伪满"建国"伊始同日本签订的《日满议定书》明文规定，所谓"满洲国"的"国防及维持治安"，全部"委诸"日本。一旦发生战争，"满洲国军"不论其原来隶属关系如何，一律须就近听从驻地日军防卫司令官统一指挥。故驻海拉尔的伪军部队，属于关东军的指挥序列。

日伪统治时期，驻海拉尔的伪军部队按平时隶属关系和指挥系统，分为三部分：一是伪第10军管区系统，二是伪宪兵总团第10宪兵团，三是由日本关东军情报部（特务机关）直接领导指挥的白俄军"别石柯夫部队"。

（一）第10军管区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

伪第10军管区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是1940年3月由原伪兴安北警备军改编而成。司令部驻海拉尔今健康街健康小学以南路西。原址战时被焚毁。两个骑兵团和1个山炮营开战当时驻南屯。

原伪兴安北警备军的建制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1. 兴安北省警备军（1933.3～1935.8）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在所谓"蒙古兴安区域"先后成立了兴安各分省警备军。兴安北分省警备军成立于1933年9月，驻海拉尔，直属于伪满洲国国务院的军政部。司令官乌尔金，顾问寺田利光，参谋长福岭。辖骑兵第7、第8团，全部兵员656名。

这支警备军承担的任务是哈满铁路线守备和分省国境与地方防卫、维持治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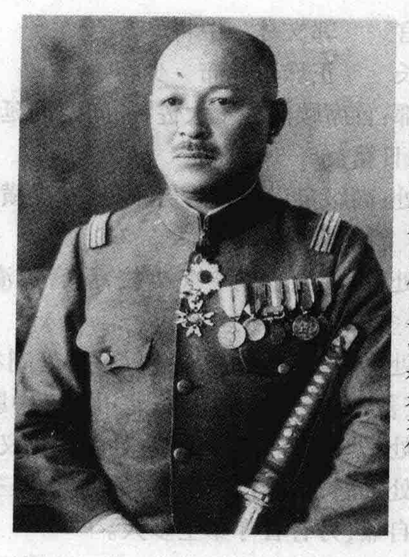
2. 兴安第1警备军（1935.8～1936.5）

1935年，伪满洲国根据关东军总部的命令，为加强日军对伪满部队的全面控制，对伪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和整编。大量淘汰老弱、无能及有反满抗日思想的官兵，要求整编后的伪军部队真正成为"日满亲善"的可靠支柱。据此要求，原伪兴安4个省的警备军，集中改编为兴安第1警备军和第2警备军。

原兴安东警备军和兴安北警备军的全部兵力合编为兴安第1警备军，司令官是乌尔金少将，顾问为寺田利光大佐，司令部设于海拉尔。



兴安第一警备军乌尔金司令官


兴安第一警备军顾问寺田利光大佐

3. 重新恢复的兴安东和兴安北警备军(1936.5～1938.12)

1936年5月,日伪当局决定将驻防兴安东、北两省而此前业已改编为兴安第1警备军的番号撤销,并将其下属部队按当时驻防区域,重新恢复兴安东警备军和兴安北警备军。分设后的两个警备军的领导指挥机构、下属部队建制番号、装备配备基本同前,只是进行了部分人事调整。兴安东警备军司令官仍由绰罗巴图尔复任,参谋长阿勇巴图、曾根崎清臣(后)。兴安北警备军司令官仍为乌尔金,参谋长川崎辰雄。

4. 再次合编的兴安北警备军(1939.1～1940.3)

1939年1月,日伪当局又决定将此前分设的兴安东、北两个警备军合编为一个警备军,撤销东警备军番号,原东警备军整建制编入北警备军,统称兴安北警备军,司令部设于海拉尔。

编成如下:

司令官　　乌尔金中将

顾问　　矢村上校(日)

骑兵第1团长　　敖瑞平　上校

　　郭美郎　中校(1937.12接任)

　　金振吉　少校(1939.5接任)

骑兵第2团长　　何维成　中校

骑兵第7团长　　郭文通　上校

骑兵第8团长　　索德那木　中校

此外,还有警备司令部直属的独立步兵营、卫生队、通信队、汽车队、独立炮兵连等分队。此时,该军总兵力已达约2 500人左右。

5. 第10军管区(1940.3～1945.8)

1940年3月,日伪当局决定撤销全部兴安警备军番号,将所属部队整建制就近编入原有或新设的各军管区。据此海拉尔设立了第10军管区司令部,原兴安北警备军即全部归入第10军管区。第10军管区司令官是乌尔金中将。1944年末乌尔金调往伪兴安军官学校,遗缺由郭文林中将接替。改编不久原骑兵第1团、第2团被撤销,只保留独立步兵营。1944年7～8月间独立步兵营也整建制由驻地博克图调往哈尔滨,列入第4军管区其部队建制。1944年末驻海拉尔和南屯的原骑兵第7团、第8团分别改称骑兵第50团和第51团。1945年8月日伪军覆灭前,第10军管区的全部兵员约1 600人。其编成是:

司令官　　郭文林　中将

参谋长　　正珠尔扎布　少将

顾问部:首席顾问铃木大佐,顾问西冈延治中佐,顾问部附国政五十雄(文职)、松崎丰已中尉等多人,均系日籍。

参谋处:高级参谋今井达男中校,参谋横光一义少校,参谋处附斋藤勇气上尉、中山仪、林绩、川口实、多祯祥上尉等军官20余人。

副官处:高级副官南一义少校,副官川潼干夫上尉,富译吉治上尉,冈本安治、田中义雄、大乐春雄、大野等多人。

军需处:处长宫嶋利男中校,军需处副谷垣长次少校,小岩井、处副稻叶贞次郎少校、佐藤稔中尉,铃木安善中尉,佐藤孝中尉,北川源一中尉,小林实美等军官10余人,外加文职人员20~30人。

军械处:处长松浦宏英中校,处副太田义吉少校等军官数人,另有军士数人。

军法处:处长山崎信义中校,处副佐藤三郎,铃木善吉等多人。军法处还下设陆军监狱,其狱长由军法处长自兼,另有看守军士多人。

军医处:处长熊西利男中校,军医处副松本邦彦少校,处副山际修。由军医处代管的伪军事部第10医院院长由熊西利男兼任,司药官松本军医少校,路庆文军医上尉,院副为伊藤一男中尉,市川仁作、伊藤牙科军医中尉、横尾进见习医官,林善太郎司药上尉等数十名管理和医护军官、军士及文职人员。

兽医处:处长大井敏兽医中校等军官、军士和文职人员10余人。

兵事处:处长宫村铁平少校,处副汤川仙藏少校,益子武雄,藤原义夫,迫田、中尾等约近20人。

兵事处下设征集科、青年训练科、军援科和庶务科等四科。

驻扎兰屯兵事处:处长苍树勋少校,处内机构和编制情况同上。

第10军管区的直属部队有:独立骑兵连(警卫连),编制100人。通信队(无线、有线),队长森三夫少校,队副田井芳信。队副有伊藤敏五郎上尉,田村喜代治、五十岚末治、安井勇、管原一郎、石井源太郎、林虎一等,全队编制人数不详。独立汽车队,队长佐藤周平上尉,队副星铁雄等,配有载重车10余台,小汽车数台,官兵人数约三四十人。

军乐队,队长日本人,名不详。队副藤山重郎,队员约20余人。

第10军管区序列的作战部队有:

骑兵第50团,团长金永福上校,副团长平泽保少校,团副古和口信中尉,内田庆吾上尉,山本良上尉等。团部设有副官室、军需室、军械所、兽医所。团下设4个连,其中骑兵连2个(每连100人),速射炮1个连(炮6门),1个重机枪连(重机枪8挺),全团官兵约600人,驻南屯。

骑兵第51团,团长郭美郎中校,团副伊势荣作少校、佐藤政藏,团副木村三男上尉,铁木梯二中尉,田村保男军医,大山肇中尉。团部的内设机构和下属连队编制与50团同,驻南屯。

第10炮兵营,营长大鸠和夫少校,营副蛟岛淳一郎少校,营副上泽博一上尉,猪股旭少尉,永泽敏夫少尉、队副军官候补生石田种郎、元木勤、牧忠则、尾皤审治、佐佐木博等,配有山炮4门。官兵总数约200人,驻南屯。

1945年8月开战前2个月左右,第50团团长金永福奉命率所属骑1连、速射炮连、机枪连主力,去大兴安岭红花尔基地区构筑防御阵地,还有一部分去林区砍伐木材。第51团团长郭美郎率一个连去莫和尔图一带修筑工事,该团普尔布苏伦连长率1个连去新巴尔虎左翼旗阿木古郎接管一个原为日军防卫的阵地。其他部队留守兵营,日籍军官及文职人员除出差者外,均留营驻守。

以上第10军管区机关及所属部队全体官兵约1 600人,内有日本军官及文职人员共约近60人。

1945年8月9日上午10时,驻海拉尔关东军第119师团盐泽师团长派参谋野村来第10军管区传达紧急命令,要求第10军管区司令官郭文林立即行动,并限于2日内将部队按指定路线带到兴安

岭南麓的一、二防区，阻击入侵苏军。全军部队于当日傍晚前突击做好出发准备并于午夜销毁文件、档案，分发被装、武器、弹药、食品，焚毁兵营、仓库、弹药库后由海拉尔出发，途中在南屯和各骑兵团、炮兵营留守官兵会合经锡尼河向大兴安岭撤去。后在锡尼河杀死日籍军官30余人起义，向苏军投诚。

（二）第10宪兵团

为加强对伪满洲国军的军事司法工作，日伪当局于1934年7月创立了宪兵训练处，积极培训骨干，筹建宪兵。随着1936年第一期宪兵学员的结业，分期分批地开始往各地派驻宪兵。

1937年6月，日伪在"兴安地区"设立了4个宪兵队，其中在现呼伦贝尔市境内设有海拉尔宪兵队（编制15人）和博克图宪兵队（编制20人），他们各自独立并直属于伪军政部宪兵司令部。1938年3月，海拉尔宪兵队由宪兵训练处第3期结业学兵中补入20人，博克图宪兵队则增补10人。

1939年3月，随着伪满全国宪兵机构统一调整，海拉尔宪兵队改称第10宪兵队，本部编制35人。并在博克图设有派出机构的宪兵分驻队，编制25人。

1940年3月，海拉尔成立伪军第10军管区后，海拉尔宪兵队也改编成直属于伪治安部宪兵总团司令部的海拉尔第10宪兵团，原博克图宪兵队改编为第10宪兵团博克图分团。1945年具体的编制序列是：

第10宪兵团编制官兵73人。

顾问——宪兵团长——警务课长、副官室、博克图宪兵分团长。

警务课长：

警务主任，主任军官1名，附军官1名，宪兵军士10名左右。

司法主任，主任军官1名，附军官1名，宪兵军士10名左右。

特务主任，主任军官1名，附军官1名，宪兵军士10名左右。

副官室：副官军官1名。

　　军属（文职）2～3名。

　　宪兵军士10名左右。

博克图分团长：编制39名。充警务班、特务班、庶务班。

（三）白俄别石柯夫部队

日伪统治时期，在驻海拉尔的武装部队中，有一支由清一色白俄哥萨克骑兵编成的别石柯夫部队。其营房设于呼伦桥东侧路北紧靠河堤处。当时中国居民称其为"嘎杂子队"（哥萨克的谐音），是一支直属日本关东军情报部（特务机关）领导的所谓"谋略部队"。这种由白俄哥萨克组成的"谋略部队"，在伪满洲国共有两支：一支驻防"第二松花江"（陶赖召一带），以日本人部队长浅野大佐的姓名命名为"浅野部队"；驻海拉尔这支以部队长伊万·亚历山大罗维奇·别石柯夫上校的姓氏命名为"别石柯夫部队"。

别石柯夫部队大约组建于1939年，始称兴安北省警务厅警察警备队预备队，但不着警服，不佩徽章符号。日本人为他们特制了原沙俄后贝加尔哥萨克式的服装鞋帽。1942年重新改编，改着日军军装、佩伪军徽章。这支特务部队，除进行常规军训外，还进行越境、侦察、绘图、摄影、纵火、爆破、暗杀、颠覆策反、捕俘绑架等特技训练。其班长以上人员基本上都是在册日特或较坚定的亲日分子。部队长别石柯夫及其副部队长勃里斯·吉民则是老牌的反苏反共分子。早在俄国十月革命时期他们是白卫军下级军官，追随白军将领谢苗诺夫、勒梅柯夫等人，与俄国红色游击队拼杀在额尔古纳河、石勒喀河一带，对俄国人民犯下累累罪行。1922年白卫军失败后，他们退入中国境内，纠集部众在三河流域流窜，伺机反扑。1929年发生中苏边境军事冲突时，他们曾被东北军阀招募，后东北军战败，他们又重新溃散为匪，在三河地区抢劫窜扰。日军侵占呼伦贝尔地区后，他们便很快麇集在太阳旗下。

别石柯夫部队在1942年改编为正规的"谋略部队"时，为骑兵独立团建制，但其编制比日伪正规

骑兵团小。起初总编制人数约近300人,后逐渐缩编,至1945年春夏时,只设有骑兵中队2个,加上通讯、辎重、重火器等专业分队,总兵员仅180人左右。早在其称为警察警备队预备队时,便被派遣参与围剿、追击东北抗日联军的作战行动。

1945年8月9日,苏军对日军的进攻开始后,别石柯夫部队按日军命令撤离海拉尔。在撤退途中,那些被强迫征召服役、平时又饱受欺凌虐待的白俄青年士兵,见日军大势已去,不愿再背井离乡为日军当炮灰,遂秘密串联,欲投向苏军。但死心塌地甘当日军鹰犬的别石柯夫,一面虚意应承参与暴动,一面密报日军。8月10日午后,当别石柯夫部队士兵行至莫和尔图(扎罗木得南)附近,奉命架枪原地休息时,早已布置好的日军突然将他们包围,并以密集的火力进行屠杀,就连妄图邀功请赏的别石柯夫本人也未能幸免。日军逐一检查被击者,凡呻吟挣扎者均补枪或刺杀,确认全部杀死后才撤走。只有一名白俄士兵于翌日拂晓带着满身血污和枪伤、刀伤爬出死人堆,被一位老牧民救助下来而幸存,成为该事件的见证人(此人于1954年由牙克石遣返回苏联)。

第十章　阿尔山要塞

概　述

一、关东军阿尔山要塞

阿尔山要塞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兴安盟西北部的阿尔山市境内。西部与蒙古国接壤，国界线长 90 余公里。

阿尔山要塞地处大兴安岭山脉南麓中低山地区，多数要塞阵地修建在大兴安岭主脊线附近，山势陡峻，沟壑纵横，谷底宽大，谷坡陡峭，山高林密。山峰海拔 1 500 ~ 1 700 米，沟谷海拔 1 100 米，相对高度 500 ~ 600 米。

1939 年诺门罕战争结束后，关东军认识到"满"蒙边境的阿尔山—五岔沟一带的极端重要性，遂于 1940 年开始修建要塞阵地，并在阿尔山、五岔沟配备了 2 个守备队，其中阿尔山西侧的罕达盖驻步兵 3 个中队，炮兵 1 个中队；阿尔山驻步兵 5 个大队，炮兵 2 个大队；五岔沟驻步兵 9 个大队，炮兵 4 个大队。后来在这一地区由第 107 师团驻守。

西正面要塞阵地示意图



阿尔山要塞在日本对苏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沿中蒙边境线修筑的永备工事形成了一道防线，当苏军进攻时，将其阻止在大兴安岭的高山密林中，从西面保障"首都"新京（长春）的安全。

西正面（南部）阵地示意图

阿尔山要塞包括阿尔山、白狼、五岔沟 3 个阵地群，西起罕达盖，中经阿尔山—白狼—五岔沟，东至绿水。正面宽 200 公里，纵深 8 ~ 50 公里，3 个阵地群 20 余处主要阵地和其他阵地共计 60 余处，形成了沿边一线边防哨所、主阵地和辅助阵地及屯兵、后勤基地综合作战体系。

阿尔山要塞阵地依山势和防御方向构筑了永备工事碉堡、掩蔽部、机枪阵地、炮阵地、仓库、弹药库、指挥所、观察所及野战掩体、水井、交通壕、堑壕、反坦克壕等。并在一些永备阵地上构筑了

地下永备工事。一些重要永备阵地上有地下通道把地面的碉堡、炮阵地、机枪阵地、指挥所、观察所、掩蔽部等连通起来。

二、阿尔山要塞的战略意义和特点

（一）战略意义

阿尔山要塞位于日军西正面战略方向南部地域，同西部地域的海拉尔要塞、乌奴耳要塞形成了以大兴安岭山脉为依托的防御作战体系。阿尔山要塞沿中蒙边境山脉的制高点上修筑了大量永备工事和野战工事，阻止苏军从阿尔山—五岔沟一线进攻伪满“首都”新京（今长春）。因从此地进攻伪满洲国首都新京比从东、北、西正面战略方向突入都要近许多，战略意义重大。

（二）特　点

1. 阿尔山要塞是17处要塞中唯一一处位于中蒙边境上的要塞。

2. 阿尔山要塞正面宽度和纵深在各要塞中都是较大的一处。

3. 阿尔山要塞阵地山势陡峻，谷底宽大，谷坡陡峭，易守难攻。阵地多依托山势构筑成环形阵地，火力指向明确。

4. 阿尔山要塞是17处要塞中规模较大的一处，规模大于珲春、观月台、鹿鸣台、庙岭、半截河、凤翔、富锦、黑河、法别拉要塞。

5. 阿尔山要塞交通发达，要塞区内有公路直通兴安南省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和兴安北省海拉尔；各阵地都有盘山公路相通。阿尔山要塞区内有五岔沟、好仁、第伯斯等机场。

三、阿尔山要塞在对苏作战中的作用

1945年8月9日零时，苏军向阿尔山要塞的日军发动进攻。当天突破了一线阵地向要塞区各阵地展开进攻。日军虽经抵抗，但仍遭到失败，苏军主力迅速突向白城、新京方向。

第一节　地理历史环境

一、地理环境

（一）位置面积

阿尔山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兴安盟的西北端，地处大兴安岭山脉中段。北纬46°39′～47°39′，东经119°28′～121°23′之间。东西长142公里，南北宽118公里，总面积7 408.7平方公里。东与扎兰屯市、扎赉特旗毗邻，南接科右前旗，西连蒙古国东方省，北与新左旗、鄂温克旗相连，国界线长93.434公里。

（二）地　貌

阿尔山市地处大兴安岭山脉南麓，属中低山地貌，白狼西北地区是典型的中山区，山高谷深，山峰海拔1 500～1 700米，沟谷海拔1 100米左右，相对高度500～600米。伊尔施以北山地平均坡度为12°左右。中山区地处大兴安岭主脊线附近，地面切割强烈，呈现山势陡峻、沟壑纵横、谷底宽大、谷坡陡峭的特点。五岔沟以南及西口、明水地区属于中山区向低山区过渡地带，平均海拔900米左右，地带北部山势险峻，坡陡林密；中南部山顶浑圆，沟谷宽阔，地势平坦，海拔较低。

境内1 000～1 700米以上的主要山峰有20多座。

（三）气　候

阿尔山市属寒带大陆性气候，又处于大陆型高山气候区，地方小气候特征明显。特点是春秋相连，夏季特征不明显，冬季漫长寒冷。光、热、水和风的季节变化明显。降水和高气温出现于7～8月。全年无霜期90天左右。冬季长达7个多月，大寒期达3个多月，极端最低气温为－45.7℃（1966.1.19）。日照时数为2 468小时。年平均温度为－3.1℃，年平均最高气温为16.6℃，最低气温

为-25.6℃。年平均降水量为445.3毫米,多集中在7~8月份。冬季降雪量36.8毫米。季风气候,冬季以西北风和偏西风为主导风向,春秋盛行东南风。

(四)水 文

阿尔山市以大兴安岭主脊为界,分属两个水系,岭南地区属嫩江水系,岭北地区属额尔古纳河水系。境内有大小河流15条。

1.哈拉哈河

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摩天岭北部五道沟东南山,河流全长399公里,流经阿尔山市境内全长135公里,流域面积4 118平方公里,平均年径流量4.32亿立方米,年平均流量13.7立方米/秒,哈拉哈河是一条中蒙边境界河。

2.洮儿河

发源于大兴安岭东麓高岳山,流经阿尔山市境内全长123.2公里,流域面积3 290.7平方公里,年平均径流量3.536亿立方米。

3.湖泊、泉水

阿尔山市境内共有大小湖泊10余处,主要分布在阿尔山天池的中山地带,均是火山喷发、熔岩壅塞河谷切断河流形成的一系列堰塞湖。具有独特性质的泉眼几十眼,形成了几处矿泉群和矿泉区,主要有阿尔山疗养院矿泉群、五里泉区、圣水泉区和金江沟矿泉群。

(五)土壤植被

阿尔山市土壤类型主要由灰色森林土、棕色针叶林土、暗棕壤、黑钙土、草甸土、沼泽土和其他类型土壤组成。

阿尔山市植被主要多由西伯利亚植物区系和蒙古植物区系组成,市境东南间或有疏林草原植被系向南部草甸草原地过渡地带。以木本植物为主体,代表植被类型是以兴安落叶松为主组成的针叶林及针阔叶混交林。另有草甸草原、草甸林缘草场、低地草甸、沼泽草原等植被。

二、历史沿革

春、秋战国时期为东胡属地。秦、汉、三国时期为鲜卑属地。南北朝、隋、唐时期为室韦属地。五代时期为契丹领地,辽代隶属上京路。金代隶属上京道,为蒙古塔塔尔部游牧地。元代,岭南地区为辽阳行省泰宁路辖地,岭北地区为岭北行省齐王部属地。明初,为蒙古部游牧地,后由奴尔干都司哈剌孩卫哈剌哈所管辖。清初,为喀尔喀蒙古部游牧地。清中期,岭北地区划归黑龙江将军辖地呼伦贝尔总管辖区,岭南地区划归吉林将军辖地哲里木盟札萨克图旗。

1912年,岭南地区由吉林划入黑龙江省。1916年2月,岭南地区为黑龙江省索伦山宣抚局管辖。1917年3月5日为黑龙江省索伦山设治局管辖。1932年6月为伪满洲国索伦县管辖,同年8月,改称兴安总署下辖4个兴安分省。岭北地区划入兴安北分省,属新巴尔虎左旗;岭南地区划入兴安东分省,仍属索伦县。1933年2月1日,索伦县改称喜扎嘎尔旗,仍辖岭南地区。

第二节 要塞设施

一、营 房

关东军从1940年起在阿尔山、五岔沟、索伦等地修建了大批兵营。在阿尔山市区西南5公里处有南大营,位于北纬47°08′43″,东经119°56′20″,海拔1 072米。现仅存平整的营区场地和破砖碎瓦,地基有的还依稀可见,每栋营房南北长40.5米,东西宽8米。南大营有100余栋平房。

在阿尔山市区,也有多处日军营房,现温泉附近山岗上,还有完好的兵营平房。

在日军各驻在阵地上,都有大小不等的营房,多为平房,有的用青、红砖砌筑,有的用石头。南兴

安花炮台阵地就存有用石头砌墙的营房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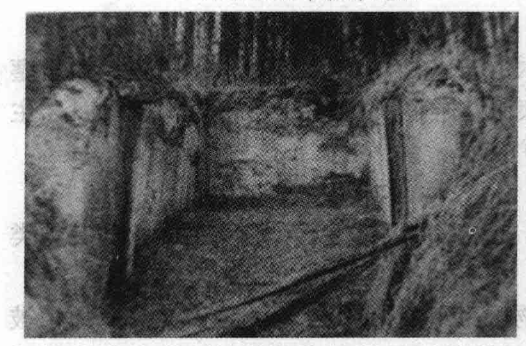
在五岔沟、索伦等地，都有日军的东大营、南大营、北大营之说，营房区域都很大，多为青砖平房。



阿尔山日军营房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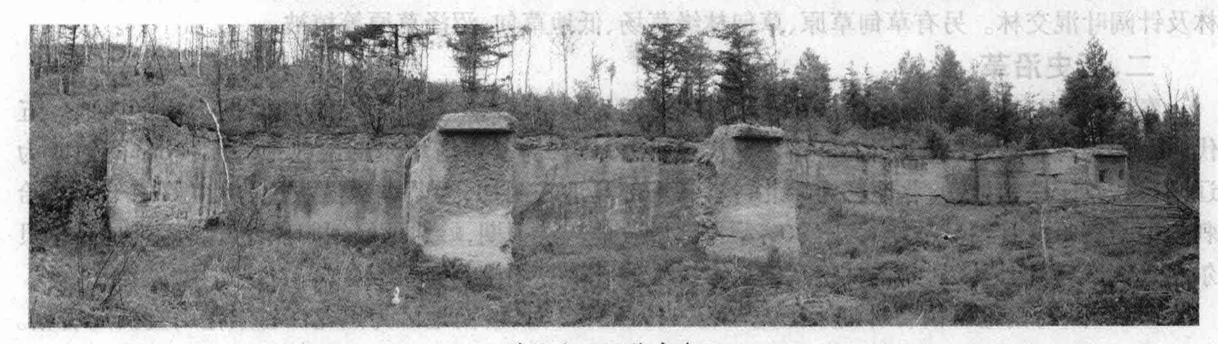
阿尔山日军营房遗址



三广山日军营房遗址



三广山日军营房遗址



花炮台日军营房遗址



花炮台日军营房遗址

二、仓　库

在阿尔山要塞，日军修筑了大量的仓库，包括粮食、军事装备、油料、燃料、武器弹药仓库。在各主

要阵地上都建有大小不等的各类仓库。其中有的仓库修好后暂时不用，进行了密封处理。据幸存劳工回忆，这样的密封仓库有许多。

三、交　通

（一）公　路

1927 年，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拨官银 3 万两，修筑海拉尔至阿尔山的商道。全长 350 公里，阿尔山境内 37 公里，经过伊尔施、杜拉尔两地。此后，阿尔山又陆续修筑了多条道路。

1. 杜—明公路

1934 年修筑，阿尔山境内杜拉尔至明水坝顶段，全长 150.7 公里，沙石路面，路基宽 5 ~ 6 米，路面宽 4.5 米。

2. 明—阿公路

明水至阿尔山公路。全长 113.7 公里，此路山高坡陡，河流众多，桥涵设施不全，关东军驻阿尔山部队曾作为重要军事公路重点修整。

3. 伊—三公路

由伊尔施沿大兴安岭北坡及哈拉哈河南岸直达三角山，全长 27 公里，是通往中蒙边境的主要军用公路。



日军军用公路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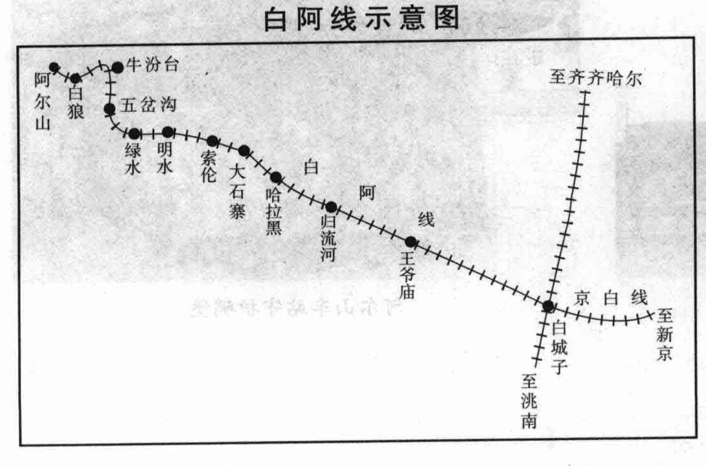
日军军用公路遗址

（二）铁　路

1. 线　路

白阿线东起平齐线上的白城站，向西北经镇面、乌兰浩特、索伦等站到达阿尔山，延伸至伊尔施。故称白阿线，全长 354.708公里。

白阿线示意图



1928 年 11 月，奉系军阀兴安屯垦公署筹建洮安（今白城）至索伦铁路。1929 年设洮索铁路工程局，同年 5 月 25 日进行选线勘测，8 月 15 日动工兴建。1930 年开始铺轨；1931 年 2 月 20 日，洮安至怀远（今乌兰浩特站）段 84.4 公里线路通车运营。怀远至索伦段则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被迫终止。

1933 年 1 月 17 日，日军在阿尔山境内开始实施铺设怀远至索伦的铁路测量勘察，于 1934 年 4 月开工续建。因 71 ~

78 公里处路段被洪水冲毁，故先从 71 公里处折至王爷庙（今乌兰浩特）改线，再续修至索伦。1935 年 1 月完工，同年 10 月怀远至索伦 83.5 公里铁路通车。

1934 年 4 月至 1935 年 11 月，修建索伦至南兴安铁路，全长 130.8 公里。

1935 年 6 月至 1937 年 10 月，修建南兴安至温泉（阿尔山）铁路，全长 15.4 公里（贯穿兴安岭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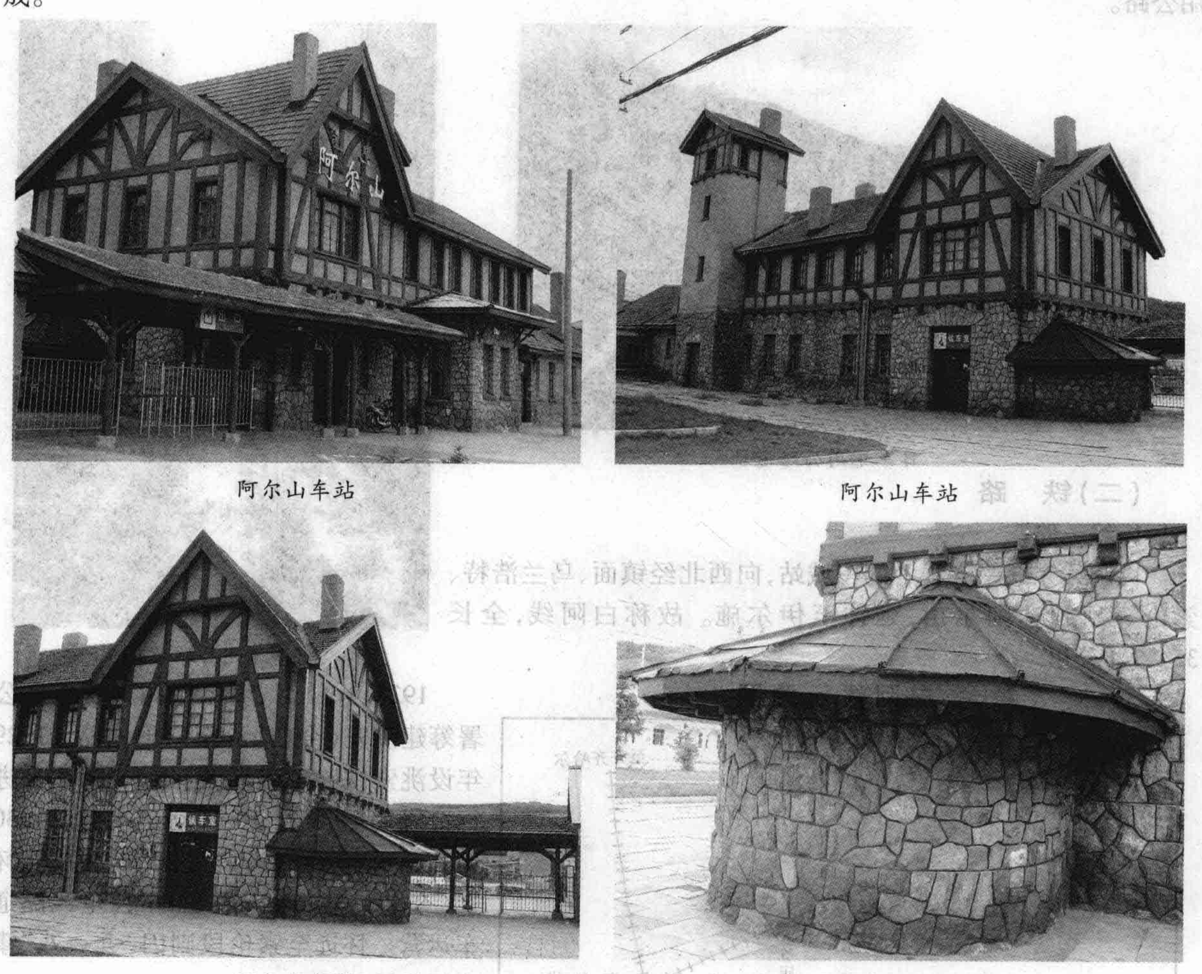
1939 年 8 月至 1941 年 11 月，修建温泉（阿尔山）至杜拉尔铁路，全长 40.3 公里。

1939 年诺门罕战争期间，修建了阿尔山至杜拉尔的轻轨铁路，全长 40.3 公里。后伊尔施至杜拉尔系间线路拆除。阿尔山至伊尔施间不通客车。

2. 车　站

阿尔山车站位于北纬 47°10′11″～47°10′14″，东经 119°56′28″～119°56′28″之间，海拔1 001米。

阿尔山车站建于 1935～1937 年，车站中心位于白阿线 336 公里 400 米处，是一座砖木石结构的日本式建筑，占地面积 925 平方米，主体建筑面积 671.49 平方米，主体高度 13.70 米。建筑呈南北排列，南部的主体建筑和北部的平房建筑由一条木质长廊连接组成。主体面积共三层，一层 414.11 平方米，二层 240.32 平方米，三层 17.06 平方米。平房建筑长 43 米，宽 7 米，由 7 间规格不一的房间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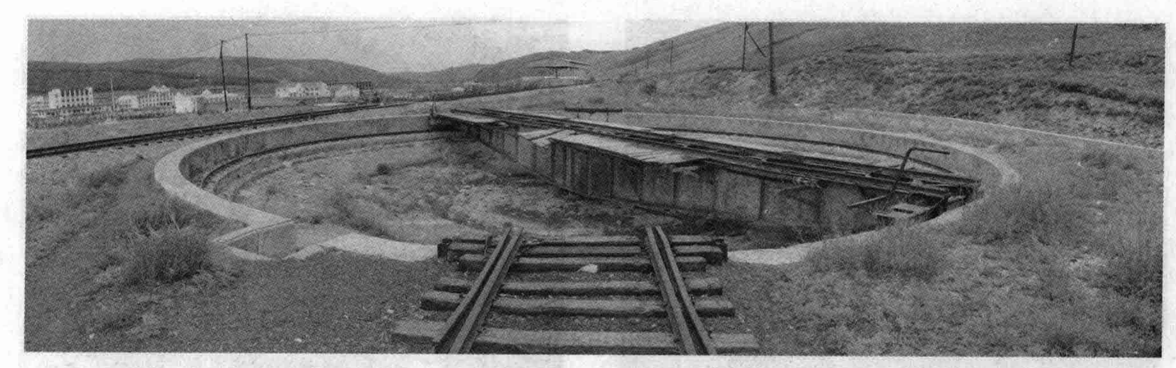


阿尔山车站

阿尔山车站

阿尔山车站

阿尔山车站守护碉堡



阿尔山车站铁路转盘遗址

3. 隧　道

兴安南铁路隧道位于阿尔山市白狼镇、伊尔施镇交汇处，大兴安岭西南麓，北距202省道135米，背靠分水岭，面邻洮儿河、阿尔善河，隧道从岭下岩体中穿过。位于北纬47°06′31″～47°07′16″，东经120°01′48″～120°04′21″之间，海拔1 192～1 231米。

1935年6月，从隧道东、西两边坑道口用手工挖掘。隧道中的岩石多为花岗岩，质地坚硬，施工难度大，东口掘进350米，西口掘进1 471米后，于同年12月改用机械挖掘，1936年12月26日导坑道贯通。同年8月开始衬砌作业，就地灌注混凝土加固。1937年6月11日隧道完工，历时2年。同年10月1日开通，隧道为东南西北走向，呈S型，全长3 218.5米，占地28.8万平方米，隧道为人字坡型顶，高度直线部5.83米，曲线部5.89米，列车进出口均在曲线上，进口半径350米，曲线长152米，出口半径420米，曲线长254.5米，其余在直线长2 812米的轨道上运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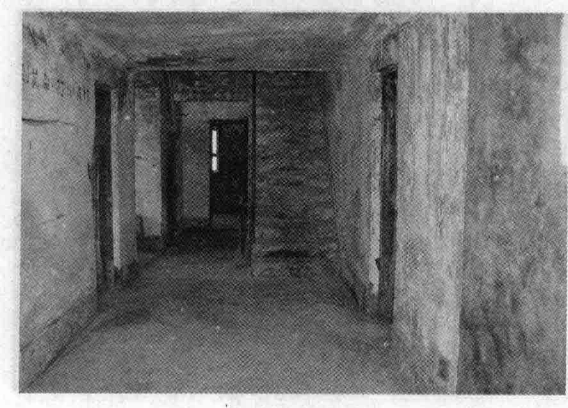


兴安南隧道东入口

隧道东西两端设有守卫碉堡。东侧碉堡位于隧道口左侧，北纬47°07′115″，东经120°04′12″处，海拔1 227米。碉堡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扁圆柱形制式。建筑面积600平方米，堡内结构分为上下6层，地上4层，地下两层，最顶层是一个了望楼，地下两层分别设有厨房、水牢、蓄水池、发电室等。并可通过长11.30米、宽2.50米、高1.75米，设有7个射击孔、6个窗口，两道铁、木门，用石头垒砌和钢筋混凝土为结构的碉堡地下通道直接进入隧道。地上4层都对不同方位设置了窗口射击孔。第一层有10个房间和一个走廊间，房间的用途分别是执勤室、军官休息室、弹药库、宿舍、盥洗室、厕所等。走廊间设有楼梯。除隧道两端出口处各建有碉堡外，在隧道附近的山上还建有十几处规格、制式不同的碉堡。



兴安南隧道守护碉堡遗址



一层走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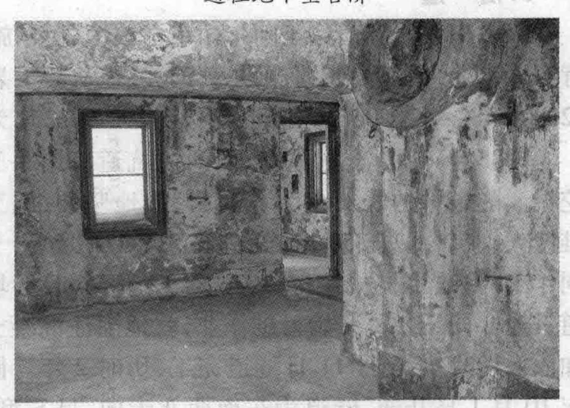
向下通往地下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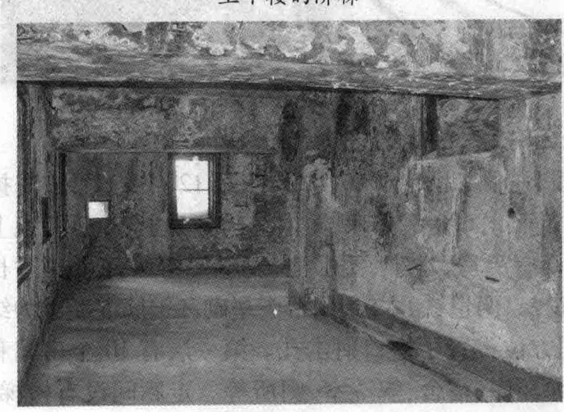
通往地下室台阶



上下楼的阶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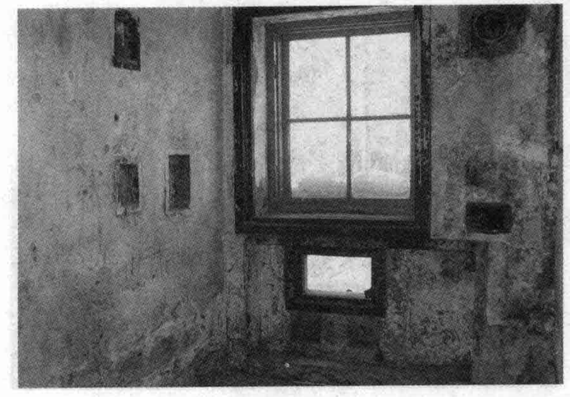
二层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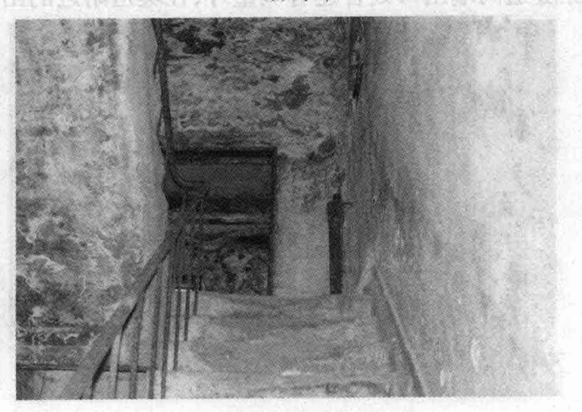
二层内部



二层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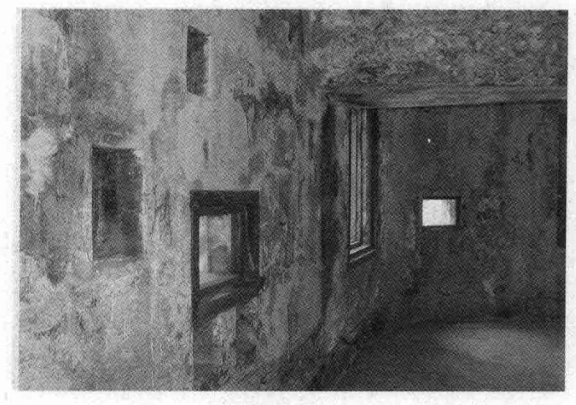
窗户下的射击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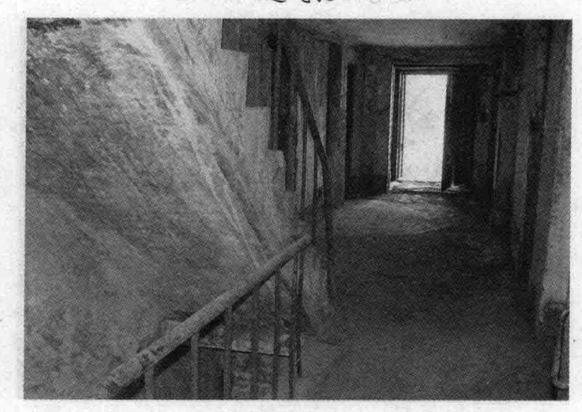


上下楼的阶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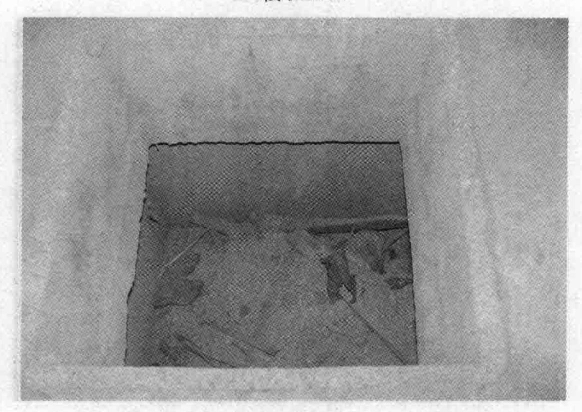

台 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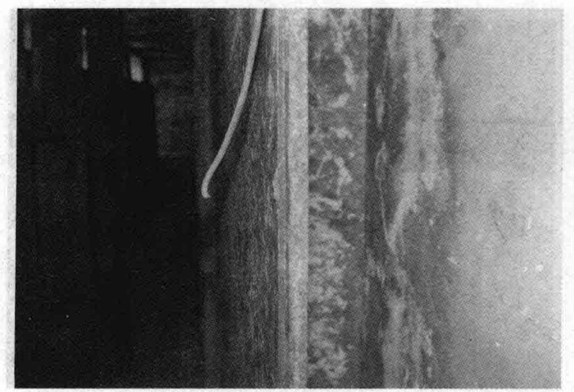

通气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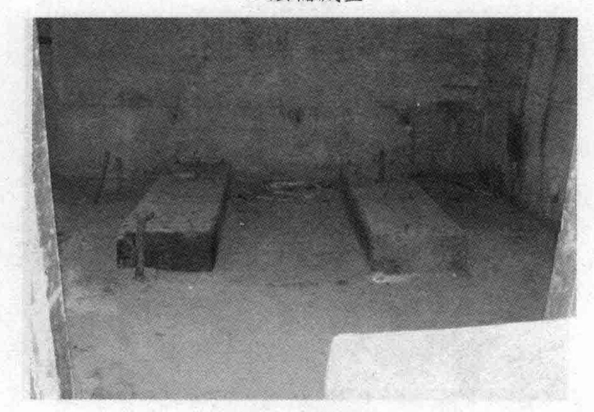

墙上的灯台


一楼出入口


地下室水井


二层储藏室


钢板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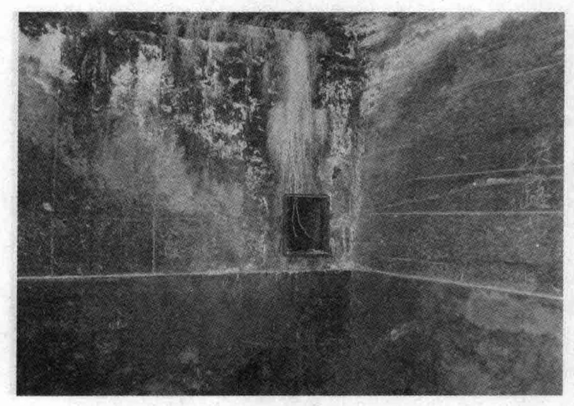

发电机房机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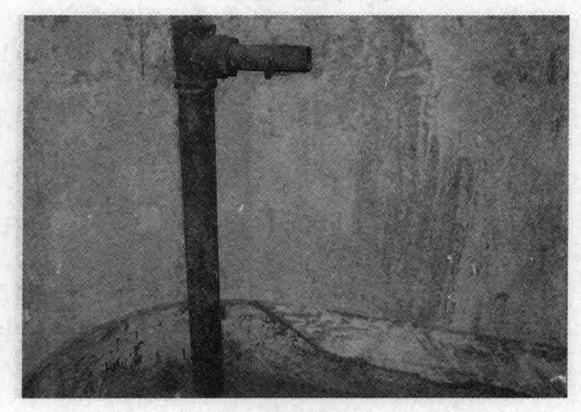
发电机房冷却水循环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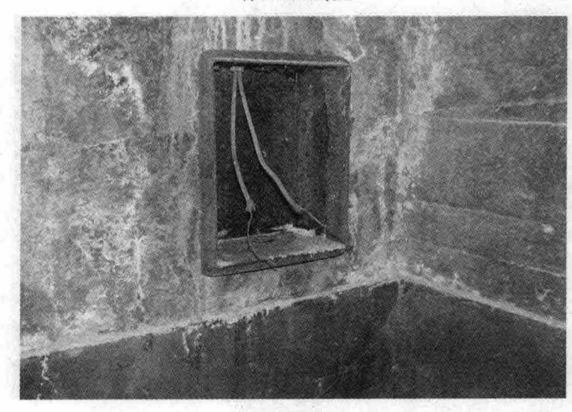
可用钢板门封闭的射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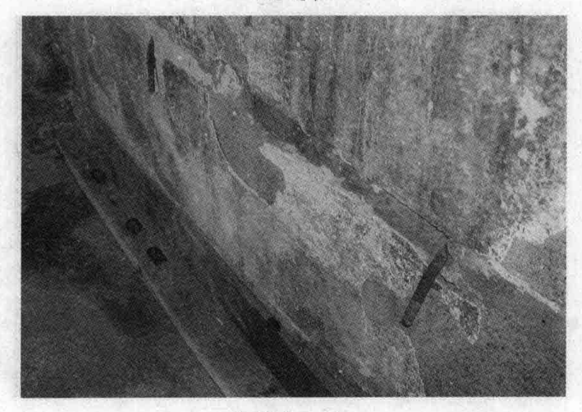
墙上配线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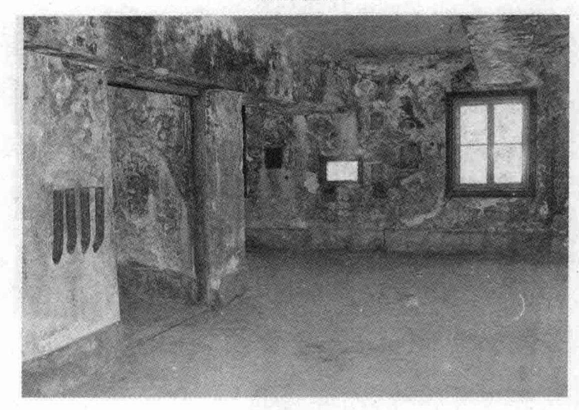
暖气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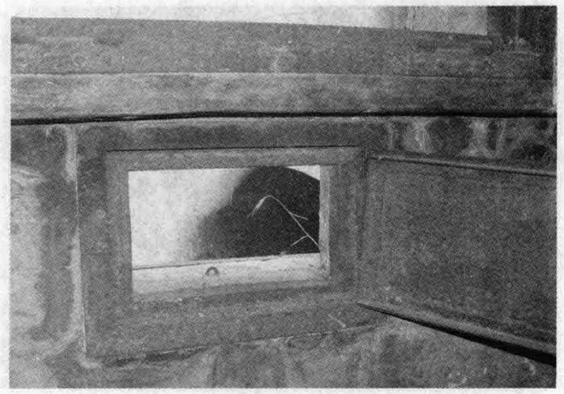
配线盒



枪架(二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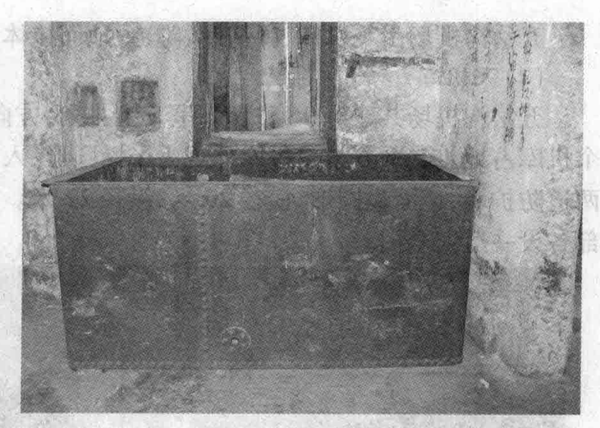


三层墙上通话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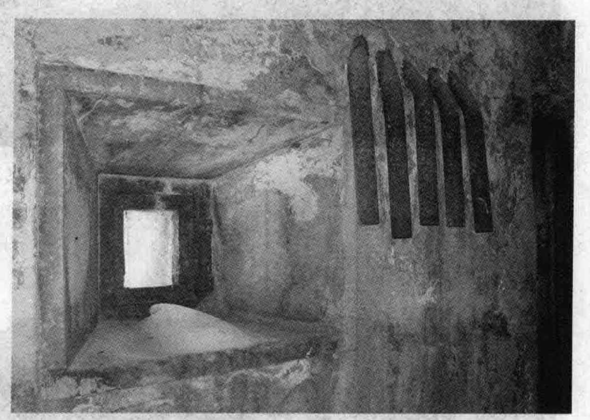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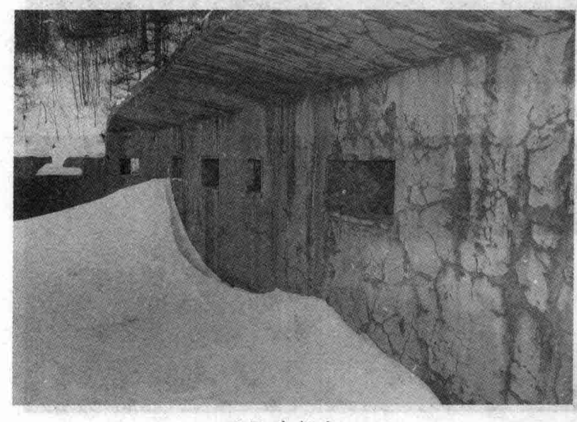
用钢板门封闭的射击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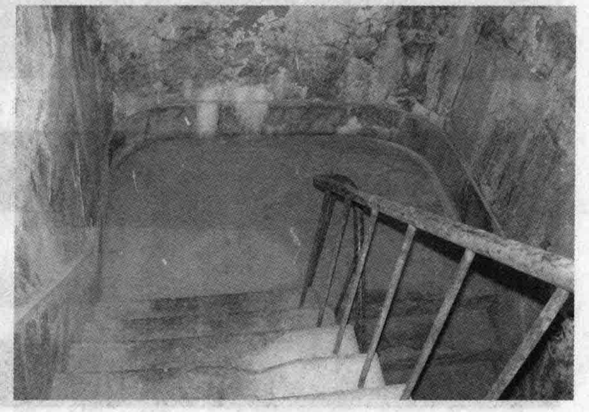

四层射击口


一层浴盆


一层厕所


碉堡内射击口和通话筒


碉堡外射击口


碉堡阶梯

(三)航　空

在兴安南地区，日军在五岔沟、好仁、德伯斯等地建立了军用机场，其中五岔沟机场仍保存完好。

1. 五岔沟机场

五岔沟机场位于阿尔山市五岔沟镇境内东南3公里处一片平坦开阔的河谷地带。南距洮尔河100米，北离白阿铁路线0.5公里。处于北纬46°45′12″～46°45′14″，东经120°19′50″～120°20′44″之间，海拔762～782米。机场所在地整体形状呈两边中低山挟持河水流贯其中的东西长南北窄的长条形地带。

1939年，诺门罕战争日军战败后，深感阿尔山地区对苏联、蒙古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于1940年6月，开始修筑五岔沟军用机场。

五岔沟机场由飞机库、弹药库、跑道、地面掩体、通道五部分所构成。

(1)飞机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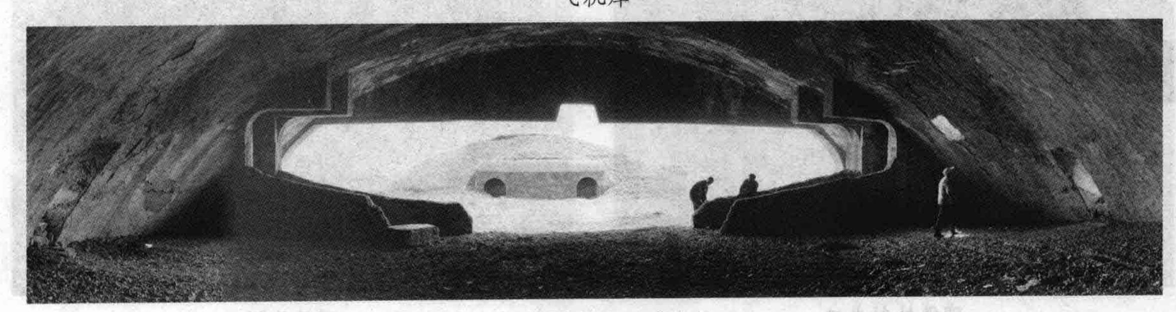
五岔沟机场共建有9座机库，呈S型排列，方向走势各异，规格、结构相同，为钢筋水泥结构。每个机库占地465平方米。机库外观为半椭圆形，入口顶部高6.10米，入口呈半圆形。库内进口处设两道防护墙，地面显圆形，横径20米，纵径22米。右侧顶部开有大小两个天窗。机库尾部及两侧中部各设一道安全门。



飞机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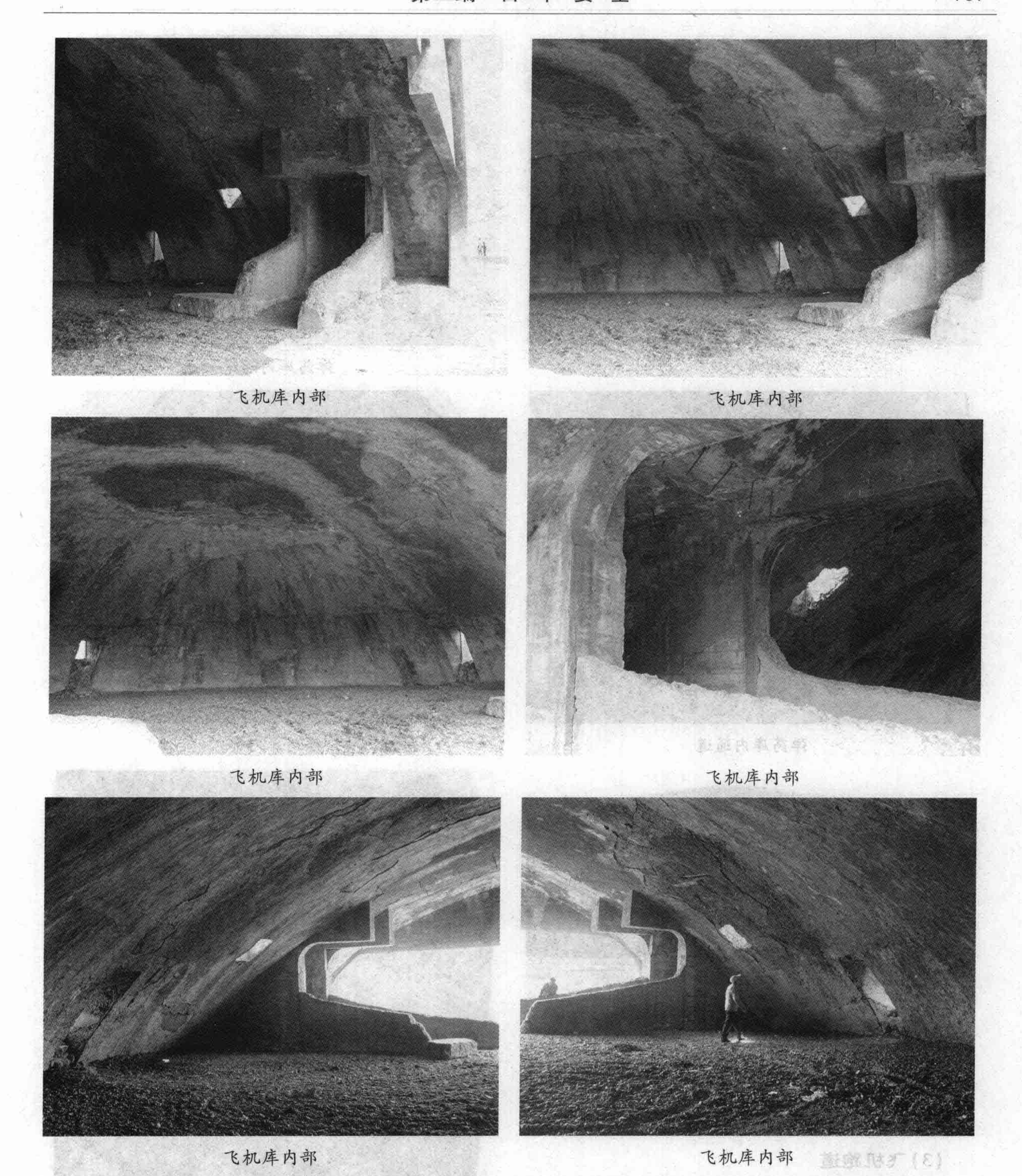
飞机库



飞机库内看对面弹药库



飞机库内部



飞机库内部　飞机库内部

飞机库内部　飞机库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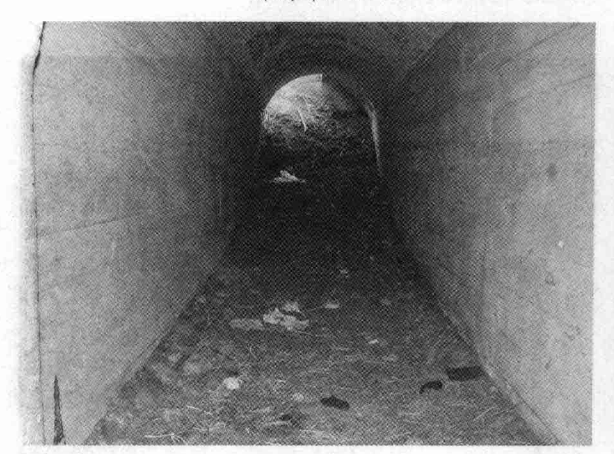
飞机库内部　飞机库内部

（2）弹药库

与机库1比1配套设置，两者相距21米，方位相同，不同处是弹药库外均有馒头状封土堆。库体为钢筋水泥结构，构筑十分坚固。每座弹药库占地123平方米，弹药库制式为外门两个，高1.5米，入库内后有一横廊，再进又分有两门，分别是储备弹药的长廊式纵向库房。两库尽头又设有一门相通。弹药库与机库排列相同，呈S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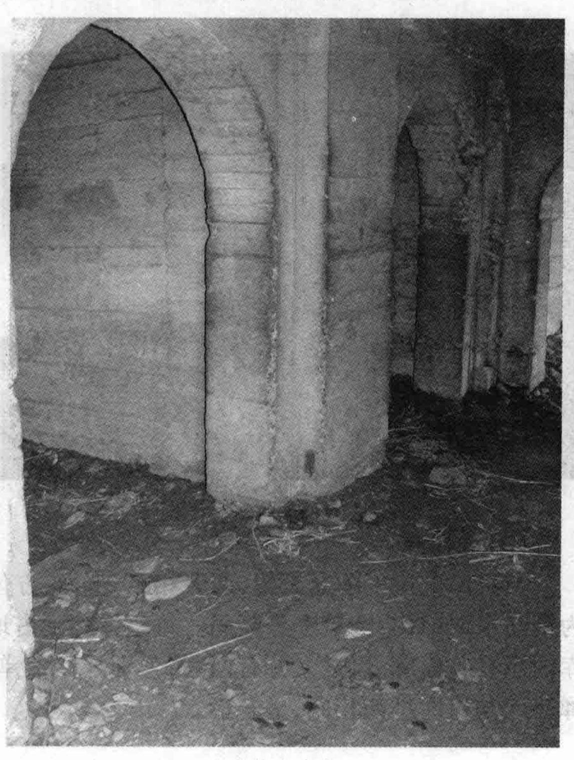

弹药库入口


弹药库内通道


弹药库内通道


弹药库内部


飞机库对面的弹药库


弹药库内部

(3)飞机跑道

跑道长1 500米,宽100米,占地15万平方米。跑道为混凝土结构,通过水泥滑道与机库连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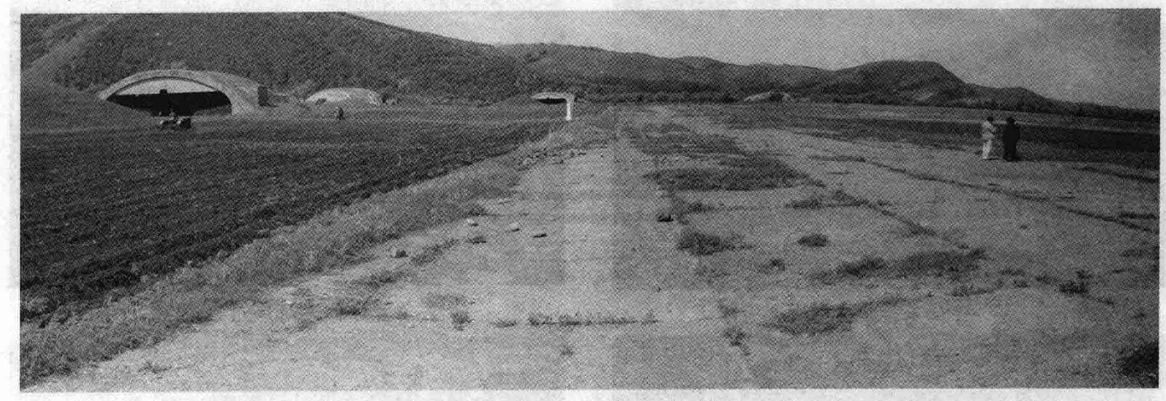
(4)飞机滑道

混凝土结构,宽10~20米不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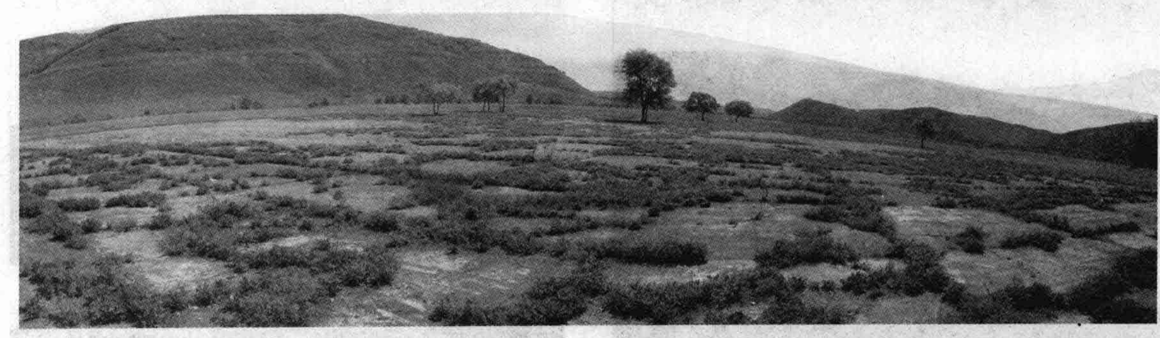
(5)地面掩体

掩体位于机场跑道、飞机库、弹药库中央地带,占地62平方米,为钢筋水泥结构,穹隆顶,内高2.5

米,北侧顶有35厘米正方形天窗一处,正顶偏南有一直径65厘米的圆形残洞。掩体门高1.7米,宽1.8米,内地面圆径7.6米。掩体外有馒头状封土。封土底周长34米。



飞机跑道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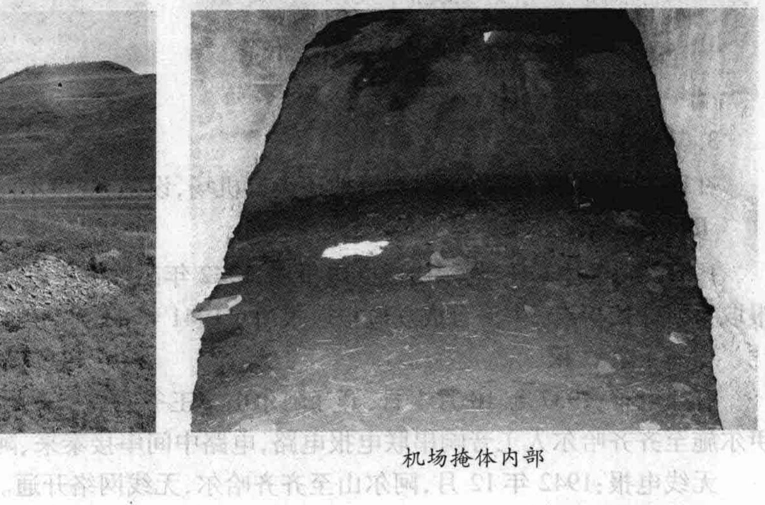
飞机跑道遗址



飞机出入机库通道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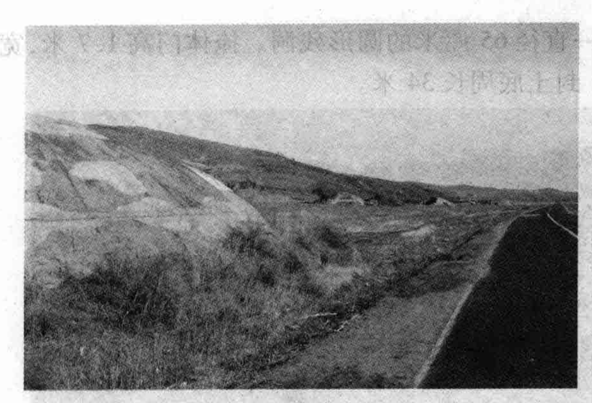
机场掩体入口



机场掩体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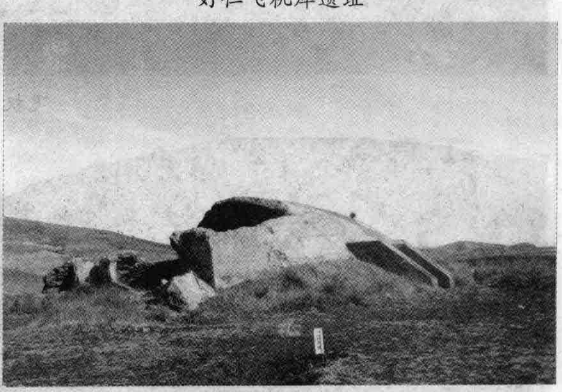
2. 好仁机场

位于兴安盟科右前旗好仁乡代合西北2公里处,北纬46°26′46″,东经121°30′13″,海拔423米。在公路北山根处,呈小半圆状西南东北向分布9个飞机库,多数已损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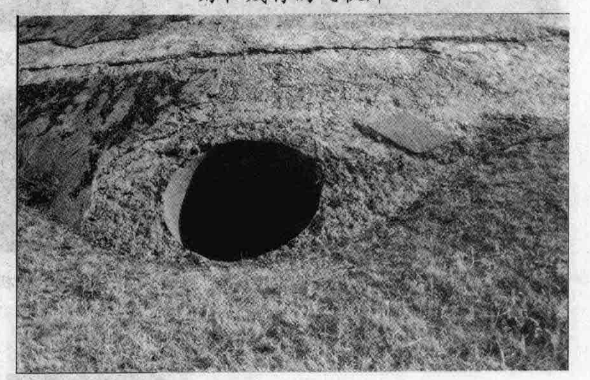

好仁飞机库遗址


好仁飞机库遗址


好仁残存的飞机库


好仁残存的飞机库


好仁飞机库顶残存通气孔


好仁机库背面通气口

3. 其他机场

在西口、德伯斯、哈拉黑镇西等地还设有机场,设施、规模不同。

四、通 讯

1937 年 10 月 1 日,阿尔山成立电报局,1942 年改称电报电话局。1937 年 12 月 3 日,白狼成立电报取报所。1939 年,牛汾台成立电报取报所。1941 年 11 月,伊尔施电报所成立。

(一)电 报

有线电报:1937 年 10 月 1 日,开通阿尔山至王爷庙人工音响串联电报电路。1941 年 11 月,开通伊尔施至齐齐哈尔人工音响串联电报电路,电路中间串接泰来、阿尔山。

无线电报:1942 年 12 月,阿尔山至齐齐哈尔,无线网络开通。

(二)电 话

1939 年 11 月 16 日,开通阿尔山至索伦长途电话线路。1941 年,开通阿尔山至洮南载波电话电路。

第三节 驻军与武器装备

一、关东军第 7 师团守备队

1939 年 9 月诺门罕战争结束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为加强对中蒙边境地区的防守,命令驻齐齐哈尔的关东军第 7 师团派出 1 个加强步兵联队进驻阿尔山地区。该部队对外称阿尔山地区守备队,下辖 10 个步兵中队、4 个炮兵中队和 1 个工兵中队。

二、关东军第 14 师团守备队

1940 年 3 月,第 7 师团被调往中国关内战场,阿尔山地区的防务由日本国内新调来的第 14 师团接替。14 师团司令部驻齐齐哈尔,其部分兵力分别部署在白城子至阿尔山铁路沿线及国境阵地一带。其中 1 个加强步兵联队专职负责国境阵地的守备,守备阵地的联队由师团司令部每隔半年从其下属联队中轮流抽调。其驻守兵力及武器装备仍保持原第 7 师团守备队的规模。

三、阿尔山驻屯队

1942 年 5 月,关东军司令部决定,解除第 14 师团部队在阿尔山国境阵地的守备任务,并在阿尔山至五岔沟国境地区野战阵地单独组建一支旅团级的守备部队。该守备部队直属于新成立的关东军第 2 方面军(司令部驻齐齐哈尔),其正式番号是"阿尔山驻屯队"。驻屯队以步兵第 90 联队为基干,在充实加强步兵力量的同时,重点加强了火炮和重机枪的配备,还相应的配备工兵、辎重、通讯等必要的专业兵种,总兵力约 5 000 人左右。

四、关东军第 107 师团

1944 年 6 月,关东军为加强西正面对苏作战准备,在索伦一带新组建了关东军第 3 方面军第 44 军编成内的步兵第 107 师团。该师团整建制地接收了原阿尔山驻屯队的官兵,统一领导指挥罕达盖、伊尔施、阿尔山及五岔沟的全部国境哨所和野战阵地。

第 107 师团的师团长为安部孝一中将,参谋长为河濑繁太大佐,师团司令部驻索伦。下辖步兵第 90、第 177、第 178 三个联队和搜索第 107 联队、野炮兵第 107 联队、工兵第 107 联队、辎重兵第 107 联队及直属师团的通信队、兵器勤务员、病马厂、卫生队、第 1 野战病院等。总兵力约 13 000 人左右。

第 107 师团守备的国境线东北自罕达盖起,西南到五岔沟以西的望远山附近,全长 90 余公里。1945 年 7 月,107 师团集中所属各部队突击抢修五岔沟阵地前,国境一线的守备任务全部由步兵第 90 联队负责,联队本部及所辖第 2 大队驻守在阿尔山;第 1 大队驻守在伊尔施;第 3 大队驻五岔沟。第 90 联队沿国境一线从北到南共建有 12 个监视哨,由第 1、第 2 大队负责指定中队分兵驻守。每个监视哨由 1 名见习士官领导,下配士兵 15 人左右,即 1 个分队编制。这些监视哨从北向南依次是:1. 武勇山;2. 伏龙山(以上 2 哨属 1 中队);3. 北镇山;4. 三角山(以上 2 哨属 2 中队);5. 神武山;6. 十胜山(以上 2 哨属 3 中队);7. 双胜岭;8. 飞付山(以上 2 哨属 5 中队);9. 胜山;10. 伏敌山;11. 必胜山;12. 望远山(以上 4 哨属 6 中队)。这些监视哨一般离后方的联队本部为 15 ~25 公里左右,离所属中队及大队则近一些。他们日夜监视侦察国界对面蒙军动态并随时将有关重要情况按规定用电话报告给中队或大队。

五、关东阿尔山宪兵队

1939 年,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在伪兴安省新设了兴安宪兵队,下辖兴安、白城子、立义沟 3 个分队。其中白城子分队下设洮南、索伦 2 个分遣队;立义沟分队下设阿尔山分遣队。阿尔山和索伦宪兵分遣队下设庶务系、警务系和特高系,每个分遣队有宪兵 15 人左右。

1940 年 12 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将阿尔山宪兵分遣队升格为阿尔山宪兵分队,下设索伦宪兵分遣队。阿尔山分队归属于齐齐哈尔宪兵队本部管辖。分队下设庶务系、警务系和特高系,有宪兵 80

人左右。

1944年5月27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对各地宪兵队和分队设置重新进行了调整部署。调整后原隶属齐齐哈尔宪兵队本部的阿尔山宪兵分队升格为阿尔山宪兵队,下设阿尔山宪兵分队和兴安宪兵分队。阿尔山宪兵队本部下设庶务课、经理班和特高课,其中特高课又下设警务系和特高系,有宪兵200人左右。

第四节 要塞阵地

从1940年开始,在位于伪满洲国兴安南省的阿尔山、白狼、五岔沟地区构筑国境要塞阵地。在沿90余公里长的中蒙边境线上,修筑了阿尔山、白狼、五岔沟3个永备阵地群、12个监视哨阵地和4个前线机场。

阿尔山要塞阵地修筑在大兴安岭山脉南麓中低山主脊线附近,山势陡峻,沟谷宽大,谷坡陡峭。阵地工事多依山势构筑成环形,火力指向中蒙边境和通往中国境内的道路、沟谷,以及白阿铁路线和公路。

阿尔山要塞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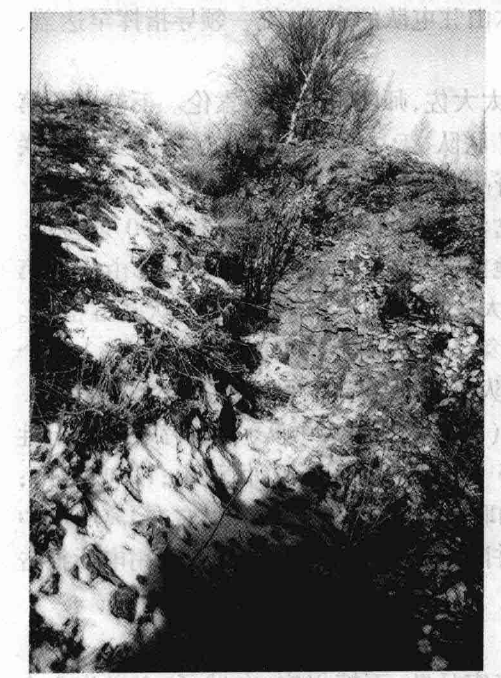


一、阿尔山阵地群

阿尔山阵地西起罕达盖,东至白狼火车站。防御正面约84公里,纵深22公里。由洞神山、圆山、胜山、西山、东山、北山、南山、南兴安花炮台、罕达盖等阵地组成。

(一)洞神山阵地

洞神山又称哈尔巴岗托乌拉山,主峰位于阿尔山市区南10公里处,距中蒙边境11公里,北纬47°05′02″,东经119°55′57″,海拔1 533米,是阿尔山要塞的核心主阵地。东北依托南兴安花炮台阵地,西北与圆山、胜山阵地组成沿中蒙边境线互相依托的3个火力支撑点,形成一条线形防御阵地。阵地上有永备工事碉堡、掩蔽部、指挥所、观察所和炮阵地、机枪阵地、交通壕、堑壕等。各种工事环山而建,面向蒙古人民共和国。交堑壕遍布山体,把各种工事连为一体,形成一个封锁严密、相互支援,没有射击死角的火力配系。



堑壕遗址

(二)圆山阵地

圆山也称馒头山,位于阿尔山市区西部15.1公里,距中蒙边境2公里。主峰



碉堡遗址

位于北纬47°08′38″,东经119°46′15″,海拔1 401米。

圆山阵地的地形为群山上一个制高点,地上均为永久工事,有碉堡、掩蔽部、机枪阵地、炮阵地、指挥所及交通壕、堑壕。碉堡等工事在山顶上呈环形构筑,由交堑壕将其连接起来,交通壕布满山岗,与西北方胜山阵地相连。山下还有一道反坦克壕。

山顶西部有一指挥所,钢筋水泥浇筑。东西长6米,南北宽3米,深2.5米。靠北部顶盖上有2个长25厘米、宽15厘米、高15厘米的通气孔。在西北、东南、西南开3个出入口,宽1米、高1.7米,各出入口均与交通壕相通。交通壕均在石质山上挖掘而成,宽0.8米,深1.5米。



碉堡遗址



碉堡遗址

(三)胜山阵地

胜山也称必勒车尔山,位于阿尔山市区西北部20公里,距中蒙边境3.47公里。主峰位于北纬47°11′44″,东经119°45′23″,海拔1 300米。胜山阵地在西北部与圆山阵地组成2个火力网,火力指向西部中蒙边境地带。

阵地上有永久工事碉堡、掩蔽部、指挥所、机枪阵地、炮阵地、交通壕、堑壕等。依山势筑的环形工事、各火力点由交通壕连接起来。

(四)西山阵地

西山阵地位于阿尔山市区西北部8公里处,距胜山阵地6.19公里。是胜山和圆山阵地的后方阵地,阵地呈条状,长约4公里。

阵地工事呈环形构筑。工事主要有碉堡、掩蔽部、指挥所、炮阵地、机枪阵地及野战掩体、交通壕、堑壕等。



掩蔽部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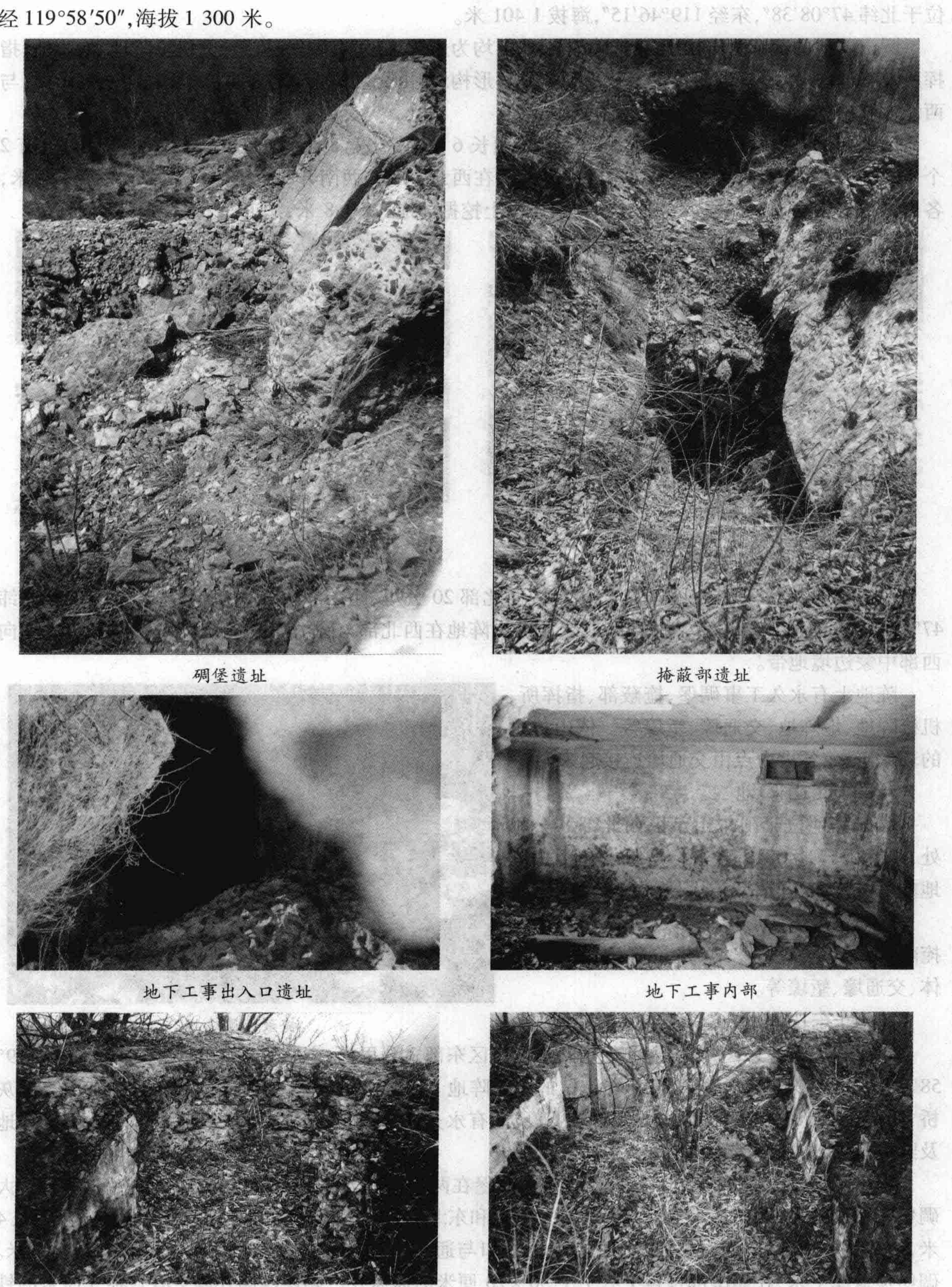
(五)东山阵地

东山当地人称东岗,东山阵地位于阿尔山市区东部3公里处,主峰位于北纬47°10′14″,东经119°58′10″,海拔1 350米,是防守阿尔山市区的主要阵地。从阿尔山火车站至小炮弹沟,再到东山至洋灰桥,防御正面5.3公里,纵深14.6公里。阵地上有永久工事碉堡、掩蔽部、指挥所、炮阵地、机枪阵地及野战掩体、交通壕、堑壕、反坦克壕等。

东山阵地制高点并排有4个碉堡,2个大碉堡在两端,2个小的在中间。碉堡之间相距30米。大碉堡东西长7米,西北宽4米,高2米,在东南角和东北角有出入口,宽1米,高2米。小碉堡东西长4米,南北宽3米,高2米;在北侧连一通道,出入口与通道相连。通道东西向长15米,宽1米,高2米。碉堡顶盖厚1米,在靠南部顶盖上有1个50×20厘米的通风孔。碉堡西侧外墙上有直径3厘米的铁管,是传声筒。

在阵地上西、南侧沿铁路线有一道长150米、宽5米、深3米的反坦克壕,位于北纬47°11′01″,东

经 119°58′50″，海拔 1 300 米。



碉堡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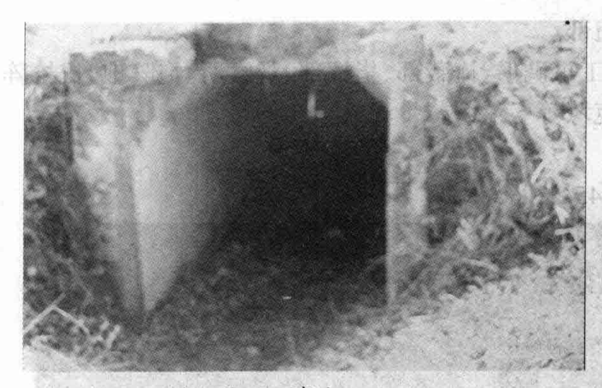
掩蔽部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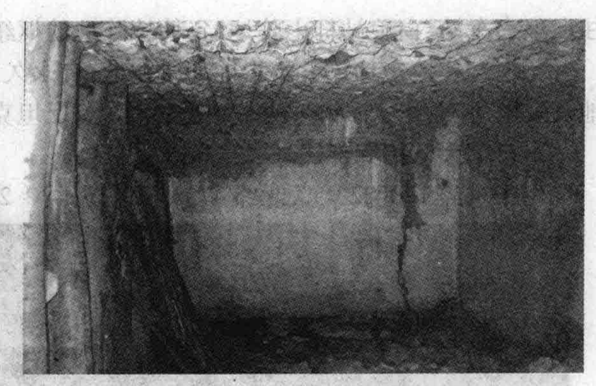
地下工事出入口遗址

地下工事内部

机枪掩体遗址

掩蔽部遗址


地下工事出入口


地下工事内部

（六）北山阵地

北山阵地位于阿尔山市区北部5公里处，主峰位于北纬47°10′01″，东经119°58′25″，海拔1 295米。北山阵地是圆山和胜山的第三线阵地，中间有西山阵地。阵地呈条形，沿铁路线西北至东南走向，防御苏军沿铁路线进攻。阵地上有永久工事碉堡、掩蔽部、指挥所、炮阵地、机枪阵地及野战掩体、交通壕、堑壕、反坦克壕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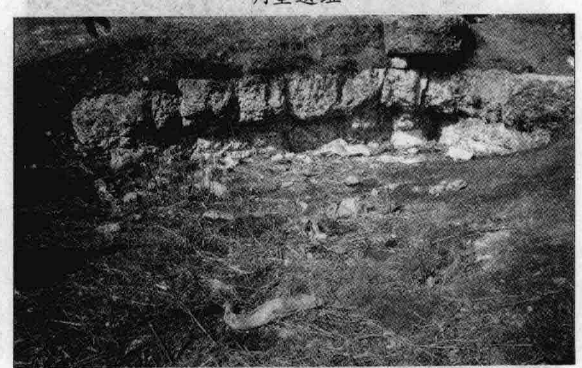
（七）南山阵地

南山阵地位于阿尔山市区南部4公里处，主峰位于北纬47°04′10″，东经119°58′12″，海拔1 268米。阵地位于铁路线南部，是神洞山阵地的二线阵地，防御苏军沿铁路线进攻。阵地上有永久工事碉堡、掩蔽部、指挥所、炮阵地、机枪阵地和野战掩体、交通壕、堑壕等。


地下工事出入口遗址


碉堡遗址


碉堡遗址


掩蔽部遗址

（八）南兴安花炮台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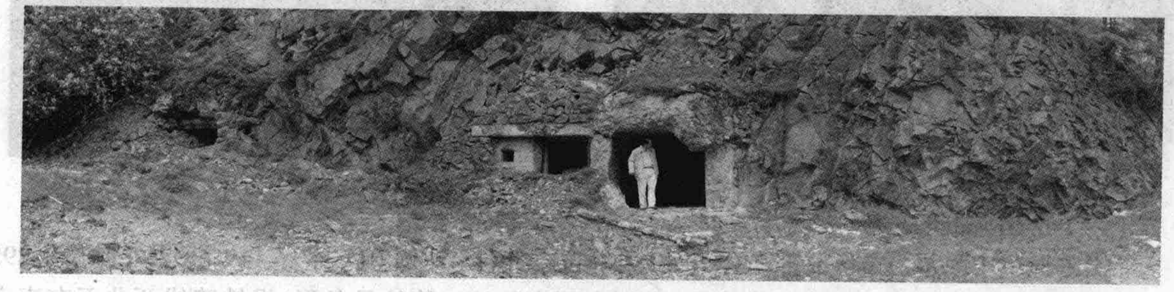
南兴安花炮台阵地位于阿尔山市区东北16公里大兴安岭南麓的一条两侧为高地的河谷地带，河谷东高西低，一条小河与盘山路在河谷地带由东向西并行。花炮台阵地中心位于北纬47°05′39″，东经120°02′04″，海拔1 247米。花炮台阵地位于铁路南侧1.5公里处，主要防守南兴安铁路隧道，是通

往白狼火车站、白狼站杆山阵地、飞仙岭阵地的枢纽部。

花炮台阵地是日军大队指挥部所在地，有永久工事碉堡、掩蔽部、指挥部、观察所、炮阵地、机枪阵地及发电所、营房、车库、水井、交通壕、堑壕、反坦克壕等。

1. 日军大队指挥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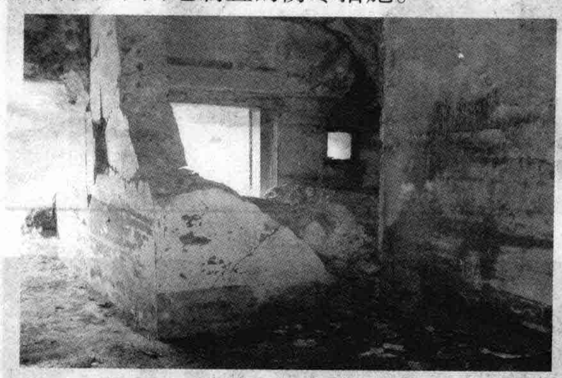
位于东经120°02′05″，北纬47°05′39″，海拔1 245米。



花炮台大队指挥部地下工事出入口遗址

该指挥部依山体南北走向挖山凿石而建，建成后又恢复成山体模样并恢复植被，十分隐蔽。从洞口进入，是一个大房间，左侧是值班室，右侧的守护室呈岗楼状，残盖厚1.5米。顺着通道南行，右侧为通道，道宽1.2米，高2.3米，长170米，水泥被覆，墙角有排水槽。左侧为形式一致的12个大房间，每个房间面积27.5平方米，均为混凝土墙，砖拱结构，地面用水泥平抹，顶部为条砖顺砌，条砖之上是防渗水用的薄铁皮，上面是起支撑作用的圆木。房间拱高3米，长5.5米，宽5米。间壁墙有两种：一种是砖砌火墙，另一种是混凝土墙。间壁墙隔出的24个小房间除一处有门无窗外，其余各房间均在北墙上开有小窗。窗高0.8米，宽1米。房间顶部设有烟道、通气孔，墙壁设有通线孔。东部门外山体已倒塌，门道被堵死，无法继续前行。每个房间外均有排水井，用水泥管道连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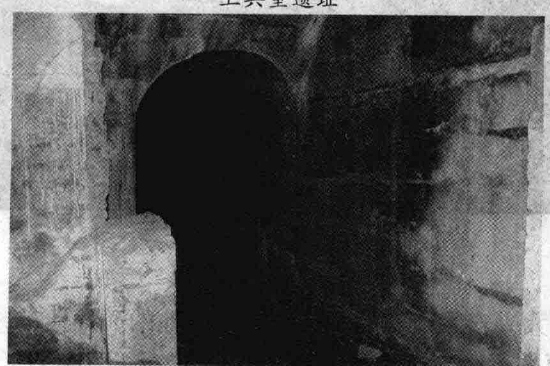
该指挥部采用掘进式建筑技术，同时解决了照明、电讯、通风、排水等问题。尤其是取暖采取了火墙式，体现了因地制宜的防寒措施。



卫兵室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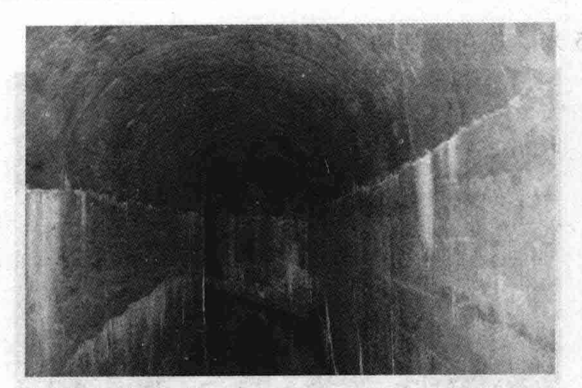
窗口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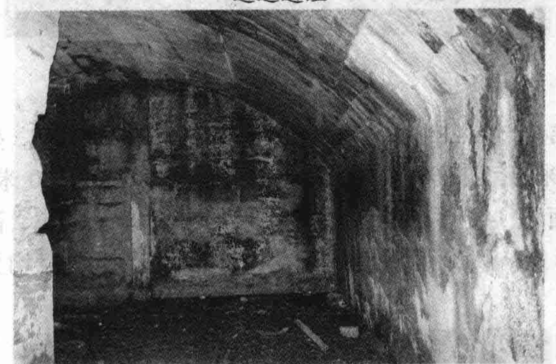
通道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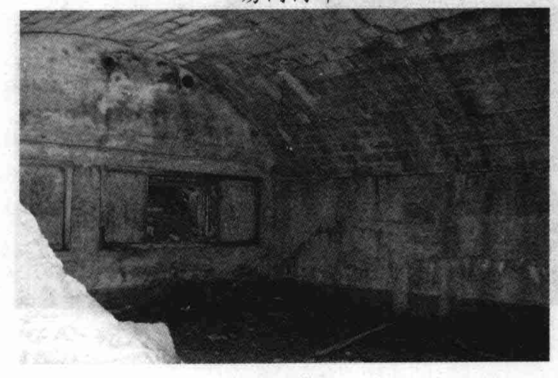
通道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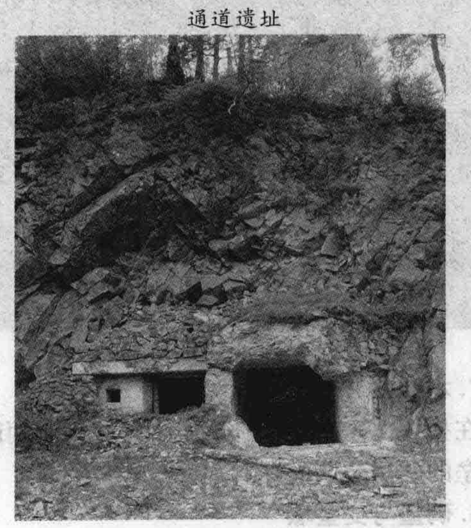

通道遗址


通道遗址


房间内部


通道遗址


房间内部


出入口遗址

2. 反坦克壕和暗堡

指挥部前有一道反坦克壕，深 3 米，宽 5 米，长 400 米。在壕的两端各有一个暗堡，堡身掩埋于山中，只露出正面。每个暗堡面积 3×6 米，计 18 平方米，射击孔 4 个。

3. 观察所

观察所距指挥部西 89.2 米，北 45 米，面积 28 平方米，墙体厚 0.65 米，了望孔 3 个。

4. 车　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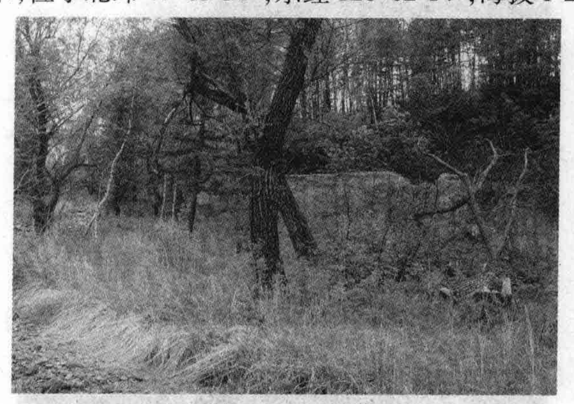
在指挥部东 180 米处，依山势建车库 1 座，面积 240 余平方米，位于北纬 47°05′34″，东经 120°02′11″，海拔 1 247 米。里面有值班室和厕所。

5. 发电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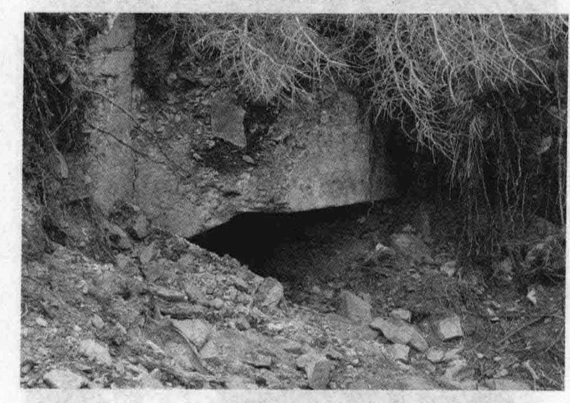
在指挥部东 300 米处建有发电室，面积 24 平方


观察所遗址

米，位于北纬47°05′31″，东经120°02′14″，海拔1 245米。现存墙基和发电机残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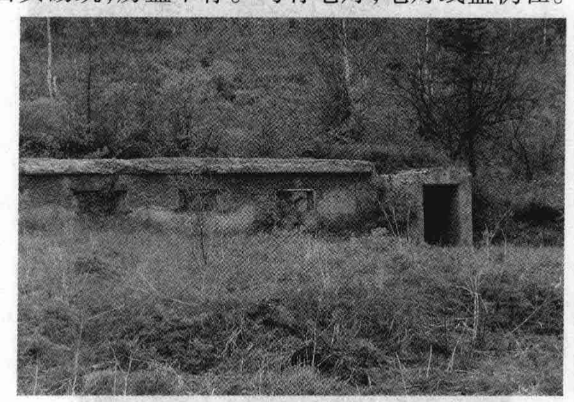
车库遗址



火力发电室遗址

6. 营　房

指挥部东320米处，有大小两处营房。位于北纬47°05′28″，东经120°02′16″，海拔1 253米。坐南朝北，相距50米。大营房长30米，宽5米，墙高3米，面积160平方米。有8个窗户，窗宽0.80米，高0.45米。小营房长20米，宽3.6米，墙高3米，面积144平方米。有6个窗户，窗宽0.80米，高0.45米，间距1.2米。门有2个，高1.80米，宽0.80米。两个营房墙厚均为0.60米，墙体残存均为石头砌筑，房盖不存。均有电灯，电灯线盒仍在。



营房遗址



营房遗址

7. 水　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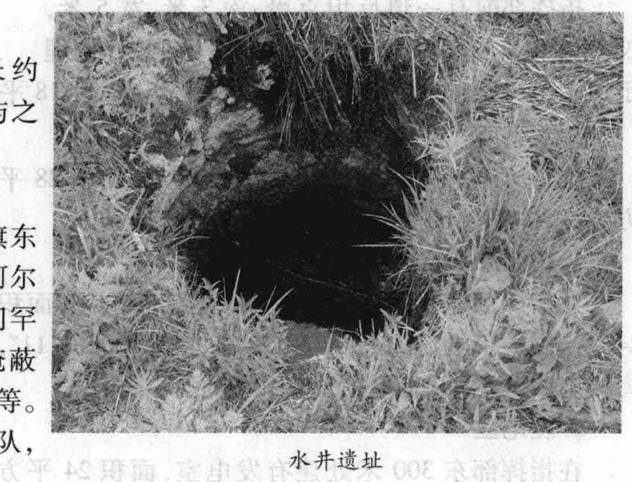
在指挥部东960米、1 200米处分别有两眼混凝土管套砌的水井。井口直径1.4米，其中一眼用石头垒的井房残墙尚存。

8. 碉堡与交堑壕

在河谷地带两旁山地制高点上，阵地长约1 000余米，均有钢筋混凝土碉堡，并有交堑壕与之相连。

(九) 罕达盖阵地

罕达盖阵地位于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东南部，阿尔山市西60公里处。罕达盖阵地是阿尔山要塞最西北的一处野战阵地，主要防御从诺门罕方向进攻的苏军。阵地上有永久工事碉堡、掩蔽部、炮阵地、机枪阵地及野战掩体、交通壕、堑壕等。1940年阿尔山守备队曾在此驻有步兵3个中队，



水井遗址

炮兵 1 个中队。

二、白狼阵地群

白狼阵地群位于阿尔山和五岔沟阵地之间，白阿线白狼火车站至牛汾台火车站铁道线西侧，面向中蒙边境布阵，防御正面 50 公里，纵深 10 ~ 40 公里，西北向东南有站杆山、鸡冠山、光顶山、三广山、班家山等 5 个阵地。

（一）站杆山阵地

站杆山阵地距白狼火车站西部 16.9 公里，位于阿尔山阵地群洞神山阵地的东南部，相距 7 公里。阵地上有永久工事碉堡、掩蔽部、指挥所、炮阵地、机枪阵地、仓库及野战掩体、交通壕、堑壕等。

阵地上有一个依山势掏洞而筑的 100 余平方米的仓库，至今仍有煤、水泥残渣。山上有水井，10 余米深，盘山道直通山顶。阵地有公路通往白狼和洞神山阵地。

（二）鸡冠山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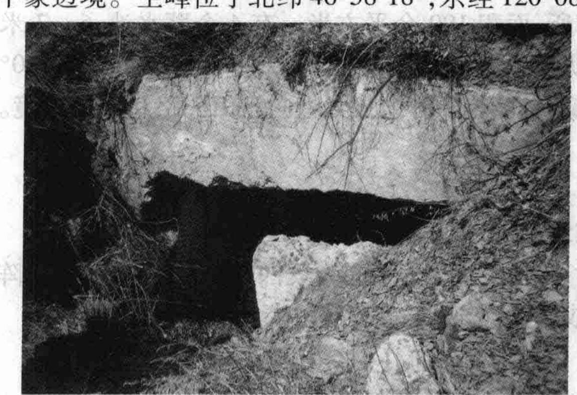
鸡冠山阵地位于白狼东南 8 公里处，铁道线东北方。鸡冠山是铁道线附近最高峰，地势险要。阵地西南部 2 公里处是铁道线和公路，是防御沿铁路、公路进攻的苏军。

阵地上有永久工事碉堡、掩蔽部、炮阵地、机枪阵地及野战掩体、交通壕、堑壕等。火力指向均为铁路和公路。

1945 年 8 月日苏交战时，曾在鸡冠山西部谷地双方激战过，战场面积 290 多平方公里。

（三）三广山阵地

三广山阵地是白狼阵地群的主阵地，位于白狼镇东南 9.2 公里，铁道线西侧，阵地火力指向西南中蒙边境。主峰位于北纬 46°58′18″，东经 120°08′46″，海拔 1 539 米。



地下工事出入口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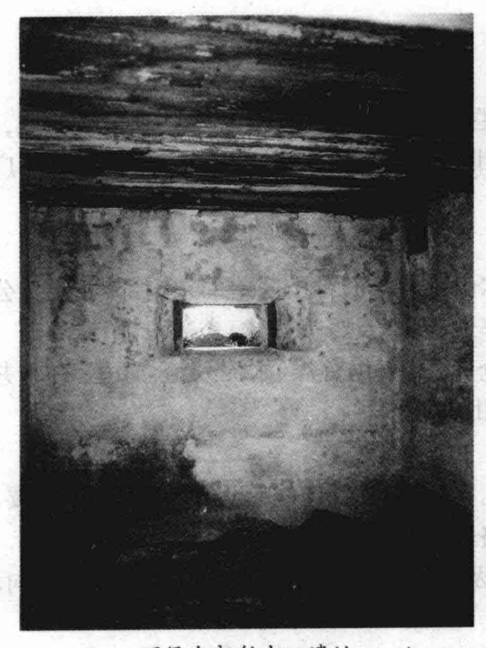
掩蔽部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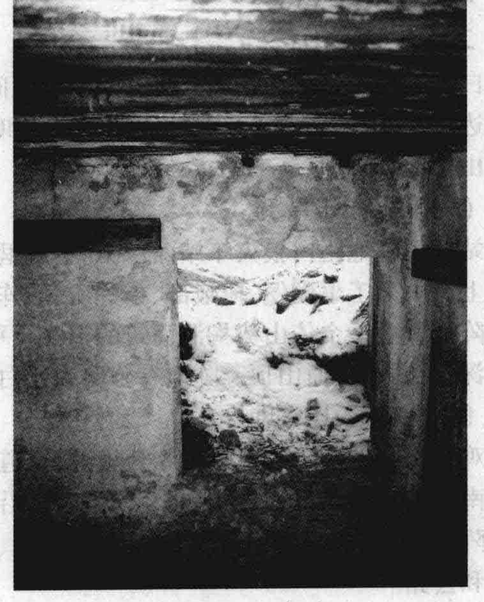
地下工事出入口遗址



调查人员在碉堡遗址合影



碉堡内部射击口遗址



碉堡出入口遗址

阵地上有永久工事碉堡、掩蔽部、指挥所、观察所、仓库、车库、炮阵地、机枪阵地及野战掩体、交通壕、堑壕、营房、蓄水池等。工事沿山顶呈环形分布,各碉堡、掩蔽部等工事由交通壕和堑壕相连接。在面向中蒙边境山顶部2 000米长、100米宽的地带,就有十几个大小碉堡错落配置,火力交叉。在山顶东部有一栋营房,长30米,宽6米。有一地下指挥所,面积100余平方米。有4个蓄水池,6～7米1个,成“田”字形分布。在三广山主阵地北部有辅助阵地无名高地,位于北纬46°58′17″,东经120°08′17″,海拔1 300米。阵地上有碉堡、掩蔽部、交通壕、堑壕等。阵地火力指向盘山公路和中蒙边境。有公路与三广山相通。

(四)光顶山

光顶山阵地位于白阿铁路线东侧光顶山乘降所东北1.96公里处。

光顶山阵地与三广山阵地隔铁路和公路遥遥相对,阵地工事火力指向为蒙古方向和铁路、公路。阵地上有永久工事碉堡、掩蔽部、炮阵地、机枪阵地及野战掩体、交通壕、堑壕等。

(五)班家山阵地

班家山阵地位于三广山主阵地东南方5.3公里,距白狼镇13.8公里。

阵地上有环形永久工事,火力指向西侧中蒙边境,东侧为铁路和公路。阵地上有碉堡、掩蔽部、指挥所、炮阵地、机枪阵地及野战掩体、交通壕、堑壕、水井等。

三、五岔沟阵地群

五岔沟阵地群西北起牛汾台阵地,经过五岔沟镇,向东南至绿水火车站。从绿水至西口、明水直至索伦,沿铁路线都设置一些阵地。防御正面40公里,纵深8～30公里。在五岔沟阵地设有五岔沟和西口飞机场。五岔沟阵地主要有牛汾台、大青沟、278沟、矿山沟、大炮弹沟、蒙古包沟、东南沟、飞机包沟、大半截沟、绿水阵地。

(一)牛汾台阵地

牛汾台阵地位于牛汾台火车站西南3公里沟堵山上,白狼阵地群班家山阵地南3公里处。

阵地上永久工事有碉堡、掩蔽部、指挥所、炮阵地、机枪阵地及野战掩体、交通壕、堑壕等。工事呈环形沿山体构筑,工事火力指向中蒙边境和铁路、公路。

(二)大青沟阵地

大青沟阵地位于牛汾台火车站西南4公里。西、南为红石砬子沟。阵地上有永久工事碉堡、掩蔽

部、炮阵地、机枪阵地、指挥所及野战掩体、交通壕、堑壕等。工事沿山体呈环形布置，火力指向中蒙边境，是牛汾台阵地的前突阵地，距中蒙边境 8 公里。

（三）278 沟阵地

278 沟因白阿铁路线距白城 278 公里而得名。278 沟阵地位于五岔沟北 7 公里，铁路线东北部。阵地工事火力指向铁路、公路。

阵地上有碉堡、掩蔽部、机枪阵地及野战掩体、交通壕、堑壕等。

（四）矿山沟阵地

矿山沟阵地位于五岔沟镇东北 4 公里。在铁路、公路东北部。

阵地上有永久工事碉堡、掩蔽部、机枪阵地及交通壕、堑壕等，工事火力指向铁路、公路。

（五）大炮弹沟阵地

大炮弹沟是因此地山沟里曾存有大量日军炮弹而得名，位于五岔沟镇西 15 公里。

大炮弹沟阵地是五岔沟阵地群的主阵地，是距中蒙边境最近的阵地，直线距离为 6 公里。阵地上有永久工事碉堡、掩蔽部、指挥所、观察所、炮阵地、机枪阵地及仓库、弹药库、野战掩体、交通壕、堑壕等。阵地工事环绕山体构筑，火力指向中蒙边境。

（六）蒙古包沟阵地

蒙古包沟阵地位于五岔沟镇西北 12 公里的铁道线西部。

阵地上永久工事有碉堡、掩蔽部、机枪阵地、炮阵地及野战掩体、交通壕、堑壕等。阵地工事沿山体环形布置，火力指向中蒙边境和铁路、公路。

蒙古包沟阵地是大炮弹沟阵地的二线阵地。

（七）大半截沟阵地

大半截沟阵地位于五岔沟镇西南 13 公里，比思玛沟西北部。

大半截沟阵地是五岔沟阵地群的主阵地，是防御中蒙边境方向的一线阵地，距中蒙边境 3.9 公里。

阵地上的永久工事有碉堡、掩蔽部、指挥所、观察所、炮阵地、机枪阵地及野战掩体、交通壕、堑壕、水井等。

（八）东南沟阵地

东南沟阵地位于五岔沟镇东南方 3 公里处，比思玛沟东侧，北侧是五岔沟军用飞机场。

阵地上有永久工事碉堡、机枪阵地、交通壕、堑壕等。工事火力指向比思玛沟，是大半截沟的二线阵地，从南部守护五岔沟军用机场。

（九）飞机包沟阵地

飞机包沟阵地位于五岔沟镇东南 6 公里。在五岔沟飞机场的东南方，与东南沟阵地平行。

阵地上有永久工事碉堡、机枪阵地、交通壕、堑壕等。火力指向西南和正北铁路、公路，是守护五岔沟机场的阵地之一。

（十）绿水阵地

绿水阵地位于绿水车站东南方，是大半截沟阵地的后方阵地。

阵地上有永久工事碉堡、掩蔽部、指挥部、观察哨、炮阵地、机枪阵地及仓库、水井、野战掩体、交通壕、堑壕等。

四、边境监视哨所阵地

日军占领阿尔山地区之后，就沿中蒙边境设置了 12 个边境哨所，监视蒙军的行动和维持边境地区秩序。这 12 个哨所是武勇山、优龙山、北镇山、三角山、神武山、十胜山、双树岭、飞付山、胜山、伏敌山、必胜山、望远山。各监视哨由见习士官领导，各有 15 名士兵担任监视哨。在监视哨所在地构筑了野战阵地，有碉堡、机枪阵地、交通壕、堑壕等。

第十一章 乌奴耳要塞

概 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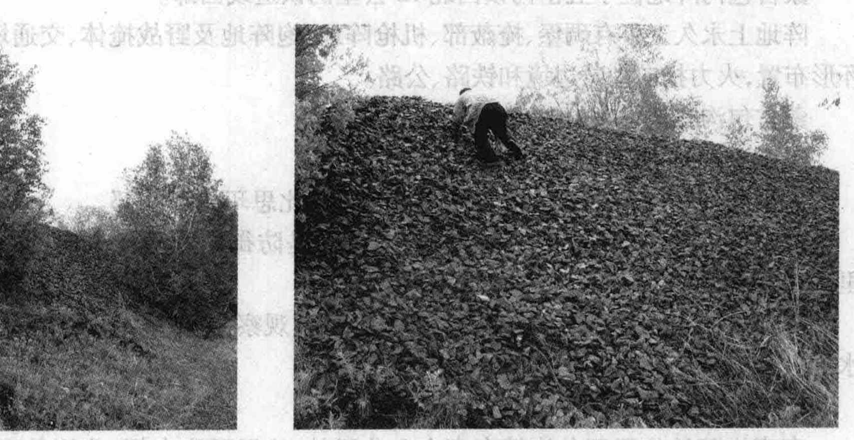
一、关东军乌奴耳要塞

乌奴耳要塞位于关东军国境要塞中的西正面战略方向，是日军战略防御纵深的重要要塞，是以防御为主的要塞阵地。日军在大兴安岭山脉中段西部，依据山势和战略方向及任务构筑了乌奴耳要塞阵地，西距中苏边境满洲里和额尔古纳河各为300公里左右，要塞防御纵深西起牙克石，东至大兴安岭岭顶博克图，东西长127.6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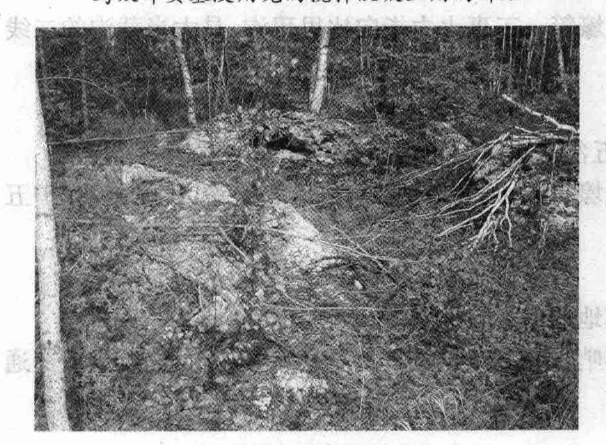
乌奴耳要塞始建于1944年，是关东军计划构筑的17处要塞中最大的一处，是可容纳3个师团7万余兵力的庞大要塞。1944年度关东军筑城预算1.1亿元都用在了乌奴耳要塞的构筑上，因还没有完工便战败投降。



乌奴耳要塞没用完的搅拌混凝土用的碎石



乌奴耳要塞没用完的搅拌混凝土用的碎石



乌奴耳要塞没用完凝固的水泥



乌奴耳要塞没用完凝固的整袋水泥

乌奴耳要塞西起牙克石以东的卓山，中经乌奴耳，东至博克图，在滨洲铁路线南北两侧的军事要地、山隘口、公路等处构筑了大量的永久性工事和野战工事。乌奴耳车站东北部的昆独山（二道梁子）是乌奴耳要塞的核心主阵地，是该要塞的指挥中心。乌奴耳要塞有B级阵地11群，C级3群。




乌奴耳要塞碉堡遗址


乌奴耳要塞碉堡遗址

二、乌奴耳要塞的战略意义和特点

(一)战略意义

乌奴耳要塞位于大兴安岭中段西侧的山地之中,位于海拉尔要塞东100公里处。在苏军突破海拉尔要塞防线后,用重兵布防的乌奴耳要塞阵地将会起到第二道防线的作用,在此阻挡苏军的进攻,以坚固的工事和有利的地势及优势的兵力消灭苏军有生力量,迟滞苏军的进攻速度。

(二)特　点

1. 乌奴耳要塞是关东军17处要塞中距国境线最远的一处,距中俄和中蒙边界均为300公里左右,是二线防御阵地。

2. 乌奴耳要塞是关东军拟建的最大一处要塞阵地,设计能容纳3个师团7万余兵员的特大型要塞,因战败而未完工。但构筑完工的阵地规模和工事数量已超过凤翔、法别拉、观月台、鹿鸣台、富锦等要塞。

3. 乌奴耳要塞是关东军17处要塞中唯一一处构筑在铁路线两侧山地上的防线。

4. 乌奴耳要塞交通方便,滨洲铁路西线从要塞中穿过,军事公路直通要塞各阵地,在乌奴耳车站东南部和绰源有2处飞机场。

5. 乌奴耳要塞构筑在山地制高点上,而且多构筑成环形工事。工事多为丙、丁级,多为素混凝土,很少见到铺有钢筋。火力点多由地下通道相连,火力点2～6个设置在一个相连的工事内,这些工事多设有掩蔽部。这是与其他要塞的不同点。

6. 驻乌奴耳要塞日军第119师团主力未做大的抵抗,1945年8月15日收听到日军宣布投降的广播后就决定不抵抗,缴械投降。所发生的战斗都是一些小股部队和从海拉尔方向东撤的零星部队与苏军进行的交战。

三、乌奴耳要塞在对苏作战中的作用

乌奴耳要塞是未完工的军事工程。1945年5月,驻海拉尔的第119师团奉命移驻乌奴耳要塞抢修阵地和驻守。日苏开战之初,第119师团未做任何战争准备,开战后仓促上阵。师团主力部队未与苏军正式交火,8月15日师团长盐泽清宣听到天皇关于无条件投降的广播后便命令各部队原地待命,与苏军接洽商谈投降事宜。只有一些小股部队与苏军交战。因此,乌奴耳要塞在对苏作战中基本没发挥任何作用。

第一节 地理历史环境

一、地理环境

（一）位置面积

乌奴耳要塞位于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所辖的牙克石市西北部牙克石至博克图铁路线的两侧山地上。

牙克石市位于呼伦贝尔市中部、大兴安岭山脉中段西侧，东经 120°28′～122°29′，北纬 47°39′～50°52′。东与阿荣旗、鄂伦春旗接壤，南与扎兰屯市相连，西邻额尔古纳市、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旗、海拉尔区，北接根河市。市域沿大兴安岭主脉南北分布，南北长 352 公里，东西宽 147 公里，总面积 27 590平方公里。

（二）地　貌

牙克石市属大兴安岭的中山区，山峰海拔 900～1 300 米。最高峰为南部大黑山，海拔1 600.3米，地势南北高中间低。境内地貌分为山地、河谷和浅山丘陵三种类型。

（三）水　系

市境内海拉尔河源于大兴安岭吉勒奇老山西麓。发源于大兴安岭中段哈达岭两侧的免渡河流经市境后，汇入海拉尔河。发源于乌奴耳镇西南兴红林场附近的乌奴耳河，流经乌奴耳镇域后汇入免渡河。

（四）气　候

牙克石市属大陆性气候：冬季寒冷漫长，夏季温凉短促，春季干旱多风，秋季降温急骤。年平均气温 -1～5℃，极端最低气温 -50℃。年平均日照时数 2 564 小时，年平均降水量 385.5 毫米，平均大风日数 16～17 天。

（五）土壤植被

土壤成分自东向西分布为暗棕壤、棕色针叶林土、灰色森林土、黑钙土、暗色草甸土、沼泽土。其中黑钙土为基本土壤。

植被分为森林植被、草原植被和草甸植被、沼泽植被。森林植被由针叶林和兴安落叶松林、樟子松林、偃松矮曲林、针阔叶混交林和阔叶林的白桦林、黑桦林、蒙古栎组成。草原植被由线叶菊草原、贝加尔针茅草原、平草草原组成。草甸植被由白花地榆、金莲花、小叶樟、苔草沼泽化草甸组成。

二、建置沿革

牙克石市古代为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之地。清雍正十年（1732），索伦（鄂温克）等族从大兴安岭东麓布特哈地区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建索伦左右两翼八旗。同年，清政府在齐齐哈尔至呼伦城设 10 个台站（境内设 5 台）。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东铁路通车营运，在巴林至牙克石间建 10 个火车站。1912 年岭西归呼伦贝尔道尹公署管辖，岭东归西布特哈总管街署辖。1929 年，岭西归呼伦贝尔市政筹备处辖，岭东归雅鲁县辖。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牙克石境内大兴安岭以西地区归兴安北省辖，岭东归兴安东省辖。1934 年牙克石归兴安北省索伦旗辖，岭东归兴安东省布特哈旗辖。1936 年，索伦旗设牙克石街，辖岭西原辖区。

第二节 要塞设施

一、营　房

在免渡河、博克图、新南沟、伊列克得、乌奴耳等地都设有日军的营房，规模最大的是免渡河和博

克图。

在博克图和免渡河有伪兴安东省警备军、关东军骑兵第1旅团、关东军骑兵集团、关东军第23师团、关东军第119师团派出的驻守部队的营房。1945年,在免渡河驻有119师团254联队和免渡河陆军医院。

二、仓 库

在乌奴耳要塞各阵地中都构筑了大量的仓库,包括弹药库、粮秣库、被服库及其他各类物资仓库。有的仓库构筑好后进行密封,待战时启用。

三、水 源

在各阵地上都进行了水源地建设。一是挖井,在二道梁子核心主阵地上不到100平方米的范围内就有8眼井,均用木板围护井壁。二是建蓄水池,在核心主阵地上有1个50余平方米的蓄水池,用水泥构筑。

四、交 通

(一)公 路

乌奴耳要塞区域内修筑了大量盘山军用公路,通到各个阵地。并沿滨洲铁路有东通齐齐哈尔、西通满洲里的沙石公路。

(二)铁 路

乌奴耳要塞区有滨洲铁路西部线东西向横贯,并有森林铁路从博克图开进原始林区125公里处。

(三)机 场

在乌奴耳车站东南2公里处有乌奴耳飞机场,在博克图车站东南120公里处有绰源飞机场,18个飞机库仍较完好保存。

五、病院与酒保、慰安所

在免渡河设有陆军医院1所,主要为乌奴耳要塞区军人服务。在各大队以上营区都设有酒保,出售生活用品。在免渡河和博克图都设有慰安所。

第三节 驻军与武器装备

一、伪满洲国军驻守部队

(一)伪兴安北省警备军

1933年9月,伪兴安北分省警备军组建,直属伪满洲国国务院军政部。司令部驻海拉尔,司令官乌尔金,顾问寺田利光,参谋长福岭。辖骑兵第7、第8团,有兵力656人。

伪兴安北省警备军任务是守备满洲里、海拉尔、牙克石、免渡河、乌奴耳、伊列克得、新南沟、博克图等哈满铁路沿线和兴安北分省国境与地方防卫、维持驻地治安等。

(二)兴安第1警备军

1935年,伪满洲国军政部根据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将原伪兴安4个省的警备军集中改编为兴安第1、第2警备军。原伪兴安北省警备军和伪兴安东省警备军合编为兴安第1警备军,司令部驻海拉尔,司令官乌尔金少将,顾问寺田利光大佐。第1警备军的任务是除边境地区的防务外,还协同日军守备免渡河、乌奴耳、伊列克得、兴安、新南沟隧道等兴安岭据点。

(三)再次合编的伪兴安北省警备军

1939年1月,关东军又下令将1936年5月兴安第1警备军分设出的伪兴安东、北2个警备军整编为伪兴安北警备军。司令部驻海拉尔,司令官乌尔金中将,顾问矢村上校。辖骑兵第1团,团长郭

美郎中校(1939 年 5 月由金振吉少校接任);骑兵第 2 团,团长何维成中校;骑兵第 7 团,团长郭文通上校;骑兵第 8 团,团长索德那木中校。此外还有直属警备军司令部的独立步兵营、卫生队、通信队、汽车队、独立炮兵连等分队。总兵力约 2 500 人左右。其中驻守在免渡河至博克图铁路沿线一带的有骑兵第 1、第 2 团和 1 个独立步兵营。

(四)第 10 军管区

1940 年 3 月,关东军撤销全部伪兴安警备军番号,将伪兴安北警备军所属部队整建制编入新组建的第 10 军管区,军管区司令部驻海拉尔,司令官乌尔金中将。第 10 军管区组建后不久将原骑兵第 1、第 2 团撤销,只保留独立步兵营在博克图铁路沿线驻防。1944 年 7 ~ 8 月,独立步兵营也整建制由驻地博克图调往哈尔滨,归第 4 军管区统辖。至此,乌奴耳、伊列克得、开岭、新南沟、博克图等兴安岭阵地守备任务由日军第 23 师团所辖联队专驻防卫。

二、关东军专驻防卫部队

(一)关东军骑兵第 1 旅团

1932 年 12 月 5 日,关东军骑兵第 1 旅团侵占海拉尔,随后该旅团在此地驻防。骑兵第 1 旅团长高波少将,辖骑兵第 13、14 联队和 1 个骑炮兵联队、1 个辎重队等直属部队,配备骑枪 1 000 余支,轻机枪 64 挺,重机枪 16 挺,掷弹筒 64 门,山炮 4 门,步兵炮或速射炮 4 门,总兵力 1 600 余人。

关东军骑兵第 1 旅团作为野战部队承担了从中苏、中蒙边境地带至大兴安岭区域的整个呼伦贝尔地区的防卫、警戒任务。

(二)关东军骑兵集团

1934 年,骑兵第 1 旅团与 1933 年秋调到海拉尔的关东军骑兵第 4 旅团整编组建直属关东军司令部的骑兵集团,司令部驻海拉尔,骑兵集团长笠井中将,辖骑兵第 13、14、25、26 联队和 1 个骑炮兵联队、1 个辎重队、1 个重炮兵大队及 1 个战车中队。

骑兵集团除将第 13、14 联队整建置留守海拉尔外,从其余部队中抽调基干中队或加强中队的分队,以守备队名分驻满洲里、三河、吉拉林等边境地区以及免渡河、乌奴耳、伊列克得、兴安、新南沟隧道等在防卫作战上有重要意义的大兴安岭据点,并由日军军官控制、指挥的伪满洲国军配合日军各部协同。

该骑兵集团所属各部队自 1934 年起即轮流抽调赴华北作战,至 1938 年 7 月便全部调往察哈尔、绥远和蒙疆地区。

(三)关东军第 23 师团

1938 年 7 月,关东军第 23 师团由日本调来海拉尔驻防,师团司令部驻海拉尔今沿呼伦路上山约 1 公里处北侧的 1 座 2 层楼内,师团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参谋长大内孜少将。下辖 3 个步兵联队、1 个骑兵联队、1 个炮兵联队、1 个工兵联队、1 个辎重联队和师团直属的卫生队、野战医院、病马厂、防疫给水部等。

第 23 师团野战部队担负除海拉尔要塞以外的整个西正面的作战防卫任务,其中大兴安岭西麓作为中苏、中蒙边境后方战略要地是第 23 师团的重要防卫地域。为此,该师团在大兴安岭西麓前沿的免渡河铁路车站河南面约 2 公里处专门为守备部队修建了 1 座兵营,并派第 23 师团步兵第 71 联队专驻防卫。

步兵第 71 联队下辖 3 个步兵大队、9 个步兵中队、3 个重机枪中队、3 个步兵炮小队和联队直属的 1 个山炮中队、1 个速射炮中队等,总兵力约 4 500 人。同时,该联队又抽出不同建制级别的分队分驻自乌奴耳到新南沟的铁路沿线和塔尔气等岭西各重要垭口、制高点等险要地点,并构筑简易工事和了望台。

1944 年 10 月 23 日,关东军第 23 师团整建制调往东南亚菲律宾战场。

（四）关东军第119师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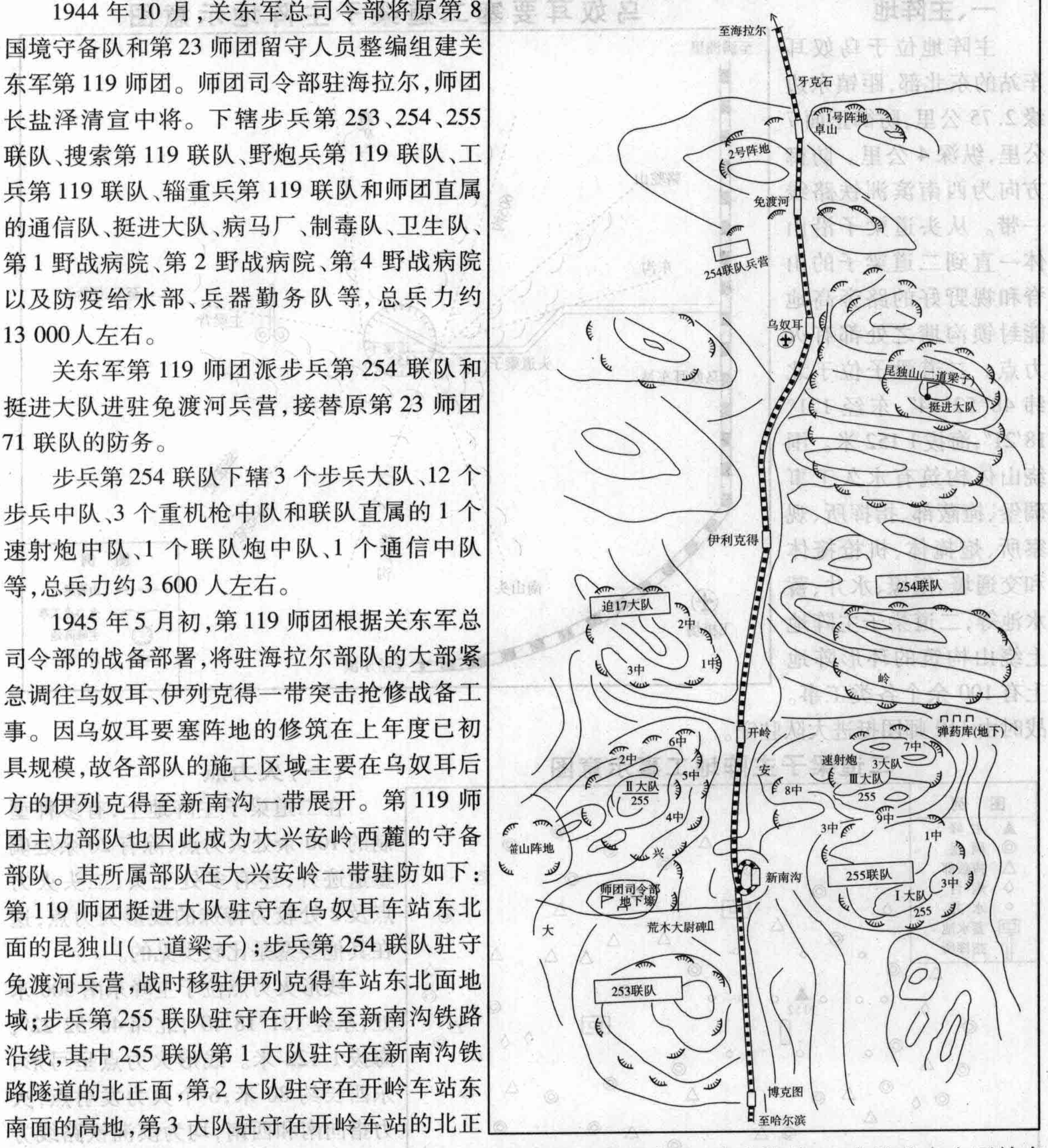
1944年10月，关东军总司令部将原第8国境守备队和第23师团留守人员整编组建关东军第119师团。师团司令部驻海拉尔，师团长盐泽清宣中将。下辖步兵第253、254、255联队、搜索第119联队、野炮兵第119联队、工兵第119联队、辎重兵第119联队和师团直属的通信队、挺进大队、病马厂、制毒队、卫生队、第1野战病院、第2野战病院、第4野战病院以及防疫给水部、兵器勤务队等，总兵力约13 000人左右。

关东军第119师团派步兵第254联队和挺进大队进驻免渡河兵营，接替原第23师团71联队的防务。

步兵第254联队下辖3个步兵大队、12个步兵中队、3个重机枪中队和联队直属的1个速射炮中队、1个联队炮中队、1个通信中队等，总兵力约3 600人左右。

1945年5月初，第119师团根据关东军总司令部的战备部署，将驻海拉尔部队的大部紧急调往乌奴耳、伊列克得一带突击抢修战备工事。因乌奴耳要塞阵地的修筑在上年度已初具规模，故各部队的施工区域主要在乌奴耳后方的伊列克得至新南沟一带展开。第119师团主力部队也因此成为大兴安岭西麓的守备部队。其所属部队在大兴安岭一带驻防如下：第119师团挺进大队驻守在乌奴耳车站东北面的昆独山（二道梁子）；步兵第254联队驻守免渡河兵营，战时移驻伊列克得车站东北面地域；步兵第255联队驻守在开岭至新南沟铁路沿线，其中255联队第1大队驻守在新南沟铁路隧道的北正面，第2大队驻守在开岭车站东南面的高地，第3大队驻守在开岭车站的北正面高地；步兵第253联队驻守在新南沟至博克图铁路线的南面高地；迫击炮第17大队驻守在开岭车站的西南面地域；野炮119联队和辎重119联队驻守在开岭车站南部地域；工兵119联队驻守在新南沟铁路隧道地域；搜索119联队驻守在博克图。

乌奴耳要塞阵地和兵力部署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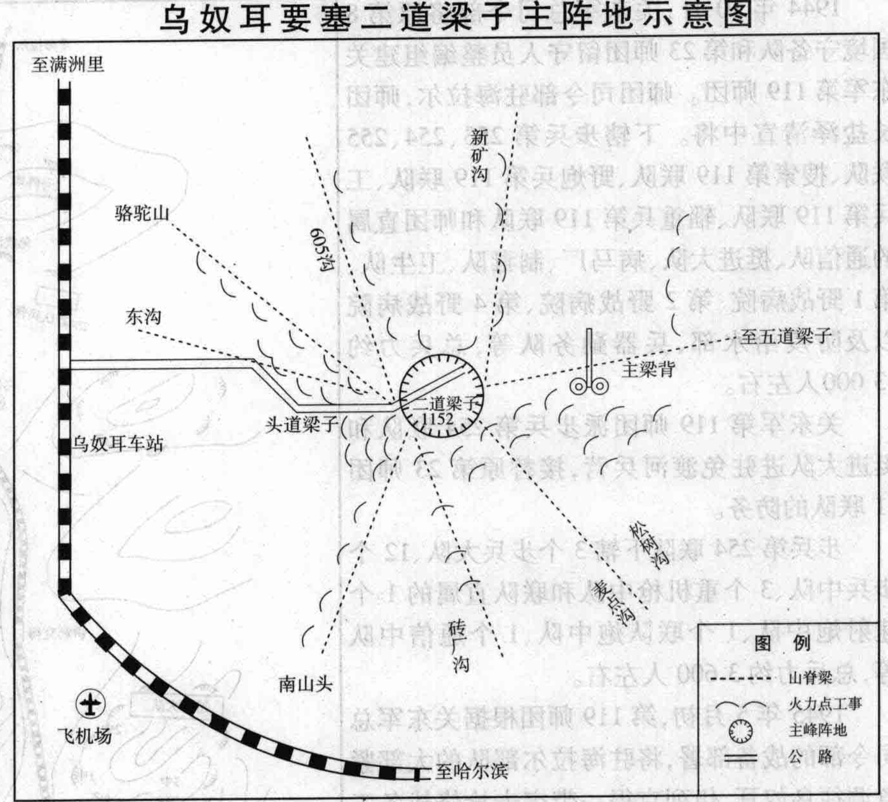
第四节 要塞阵地

乌奴耳要塞阵地西起牙克石，东至博克图，长达120余公里。要塞阵地主要设置在滨洲铁路两侧及隘口、公路两侧高地上。主阵地位于二道梁子，辅助阵地设在头道梁子、三道梁子及新南沟、开岭、

伊列克得、免渡河、牙克石卓山等，野战阵地设在二道梁子周边封锁各交通要道的山梁子及沟塘边。

一、主阵地

乌奴耳要塞二道梁子主阵地示意图



主阵地位于乌奴耳车站的东北部，距镇东边缘2.75公里，防御正面7公里，纵深4公里。防御方向为西南滨洲铁路线一带。从头道梁子沿山体一直到二道梁子的山脊和视野好的路旁高地能封锁沟塘之处都有火力点。二道梁子位于北纬48°52′14″，东经121°18′21″，海拔1 152米。围绕山体构筑有永久工事碉堡、掩蔽部、指挥所、观察所、炮掩体、机枪掩体和交通壕、堑壕、水井、蓄水池等，二道梁子主阵地上绕山构筑的环形阵地上有100余个各类工事。战时由119师团挺进大队驻守。

二道梁子主阵地工事示意图

图例：▲ 主峰　◎ 碉堡　△ 掩蔽部　◊ 炮台　○ 水井　▭ 蓄水池　▯ 指挥所　1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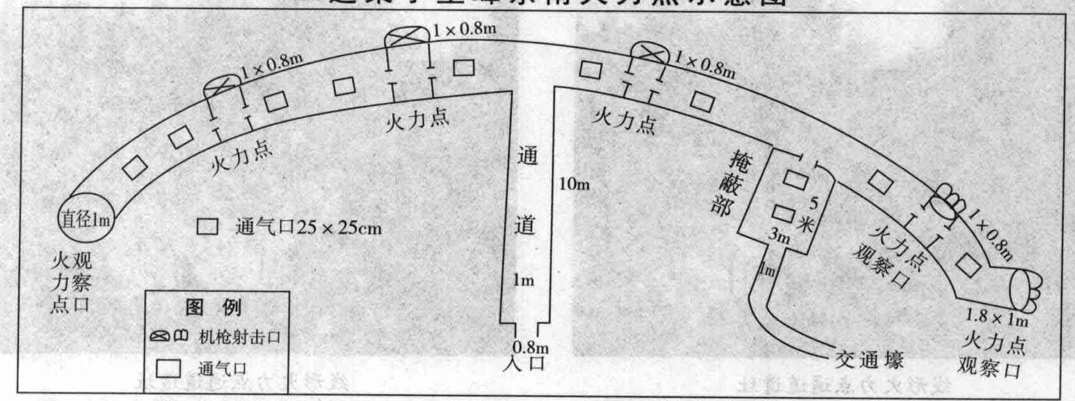
（一）火力点

在二道梁子主阵地上，有多种型制的100余处火力点，除有20余处碉堡遗迹外，还有多处三头、二头火力点及2处较为特殊的线形火力点，这在其他要塞是比较少见的。

线形火力点位于主峰东南300米处，东经121°18′40″，北纬48°52′22″，海拔1 122米。线形火力点呈弓形，东西长约80米，6个火力发射点，火力指向南和西南，均为滨洲铁路线方向。整个工事均在地下，火力点和掩蔽部之间由宽1米、高1.8米的通道相连。通道为拱形水泥盖，厚15厘米。最东端为一个直径1米的观察口兼机枪掩体；向西南每隔10米为一个机枪火力点，共3个，火力点左右长1米，宽0.8米；在第二个和第三个火力点之间是一个南北向通道，长10米，宽1米，北部为入口。再向西为一个掩蔽部，南北长5米，宽3米，高2米；再向西每隔10米，各有一个机枪掩体，呈“m”形，掩体长1.8米，深1.5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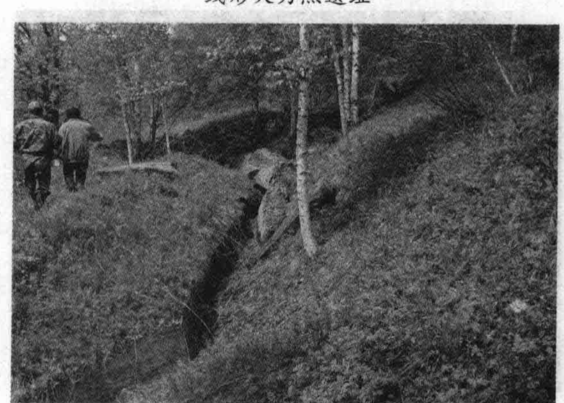
在通道和掩蔽部每隔5米有一个25×25厘米的通气口，高10厘米，通气口内布有镀锌铁丝网，至今仍多数完好，没有生锈。

二道梁子主峰东南火力点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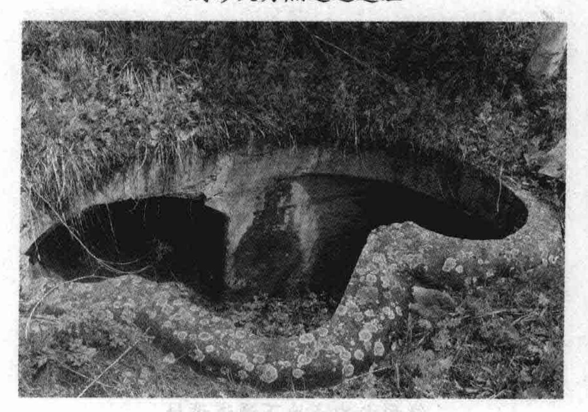



线形火力点遗址


线形火力点遗址


线形火力点通道遗址


“m”形火力点遗址


“m”形火力点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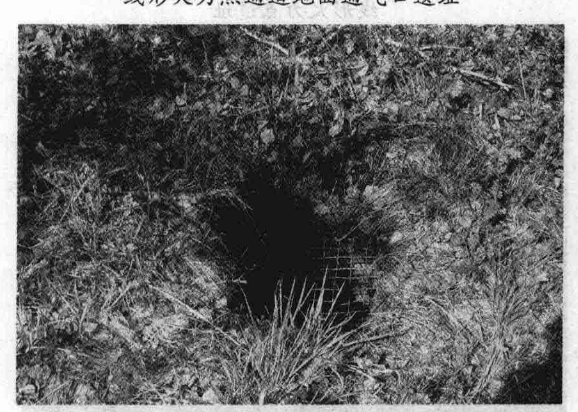

炸毁的地下通道遗址


线形火力点通道遗址


线形火力点通道遗址


线形火力点通道地面通气口遗址


线形火力点通道地面通气口上的镀锌铁丝网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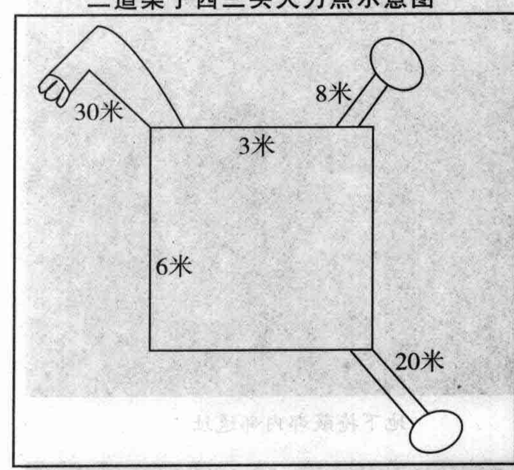

线形火力点通道地面通气口上的镀锌铁丝网遗址


线形火力点通道入口遗址


线形火力点被炸毁的通道遗址


线形火力点地下通道遗址

二道梁子西三头火力点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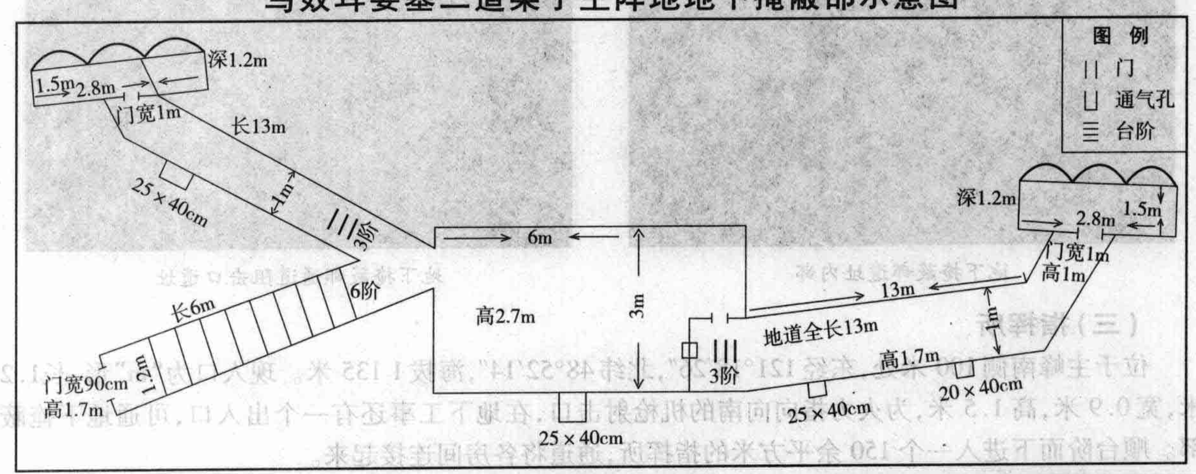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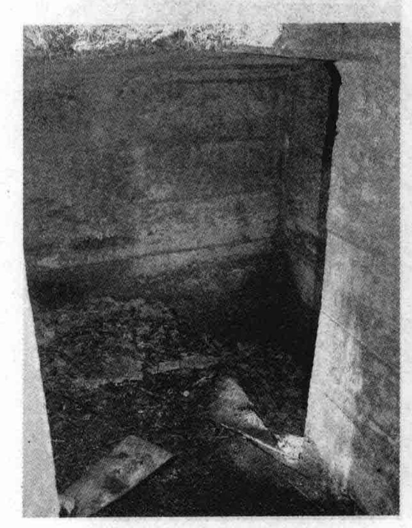
三头火力点位于主峰西侧，东经121°18′15″，北纬48°52′14″，海拔1 118米。火力指向为东北、西北和东南。中间为长6米、宽3米的掩蔽部，西北30米长、1米宽的通道直通一个“m”型火力点；东北8米长、1米宽的通道直通一个圆形碉堡；西南20米长、1米宽的通道直通一个圆形碉堡，通道盖厚60厘米。

（二）掩蔽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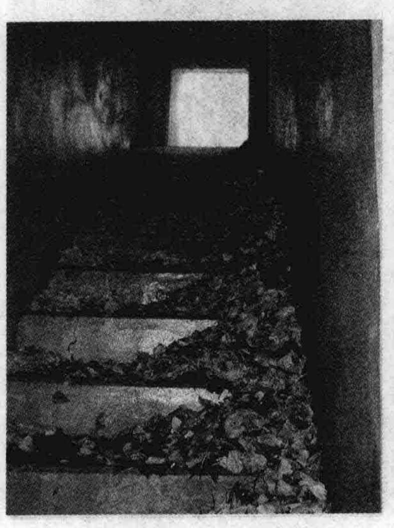
在二道梁子主阵地有10余处掩蔽部，有的是炮兵掩蔽部，有的是碉堡附近的掩蔽部，而且大小不一，出入口最少都有2个以上。主峰西侧60米处的掩蔽部，位于东经121°18′17″，北纬48°52′10″，海拔1 127米。其西南10余米处是炮阵地，为炮兵掩蔽部。入口在东侧；长12米，宽1米，向下走11个台阶，进入长6米、宽3米的掩蔽部；西北通过长15米、宽0.9米的通道进入一个直径1.2米的圆形观测射击口；东南通过长15米，宽0.9米的通道直通一个长2.5米、宽0.9米半圆形观测射击口。

乌奴耳要塞二道梁子主阵地地下掩蔽部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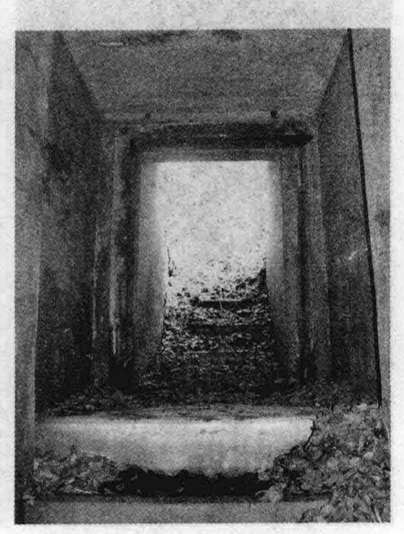




地下掩蔽部遗址内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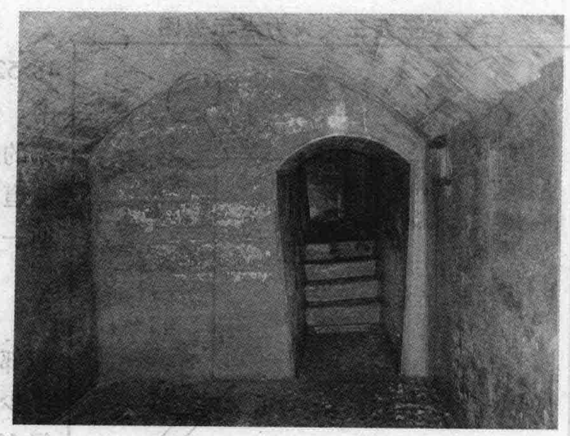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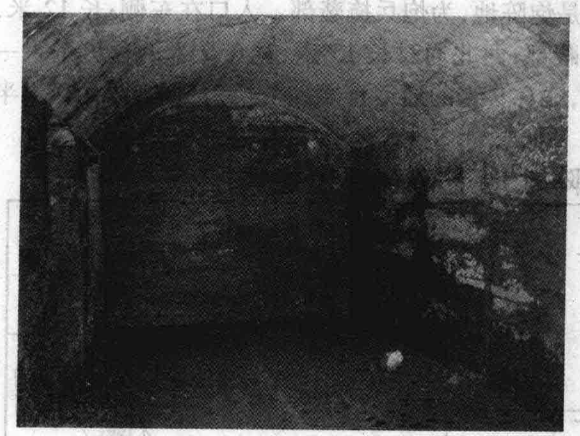
地下掩蔽部出入口台阶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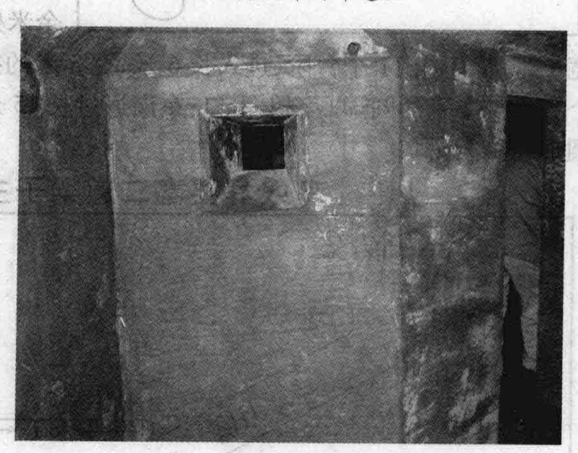


地下掩蔽部出入口遗址


地下掩蔽部入口遗址


地下掩蔽部内部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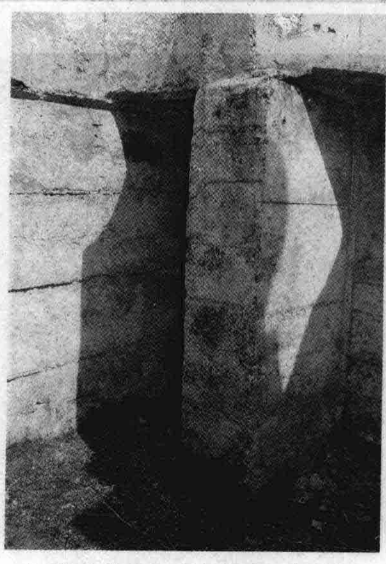

地下掩蔽部遗址内部


地下掩蔽部通道阻击口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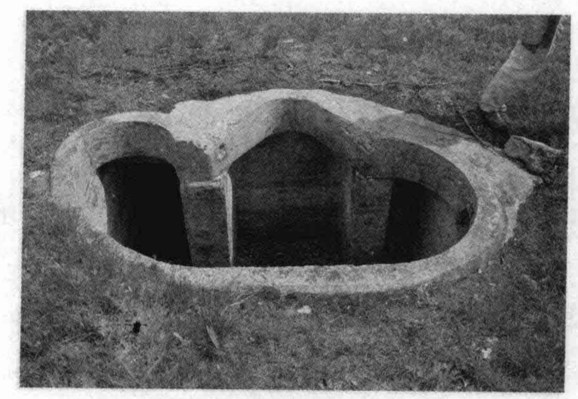
（三）指挥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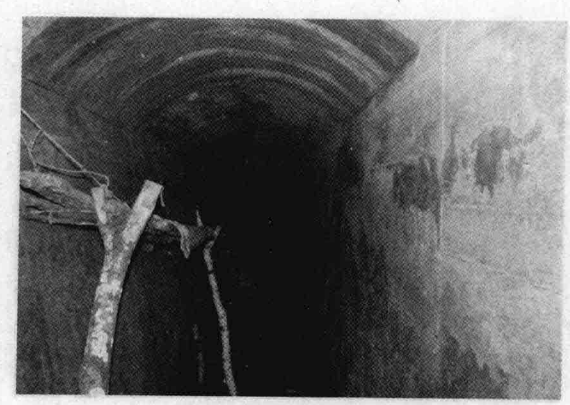
位于主峰南侧100米处，东经121°18′26″，北纬48°52′14″，海拔1 135米。现入口为“m”形，长1.2米，宽0.9米，高1.5米，为火力指向向南的机枪射击口，在地下工事还有一个出入口，可通地下掩蔽部。顺台阶而下进入一个150余平方米的指挥所，通道将各房间连接起来。


地下指挥所出入口台阶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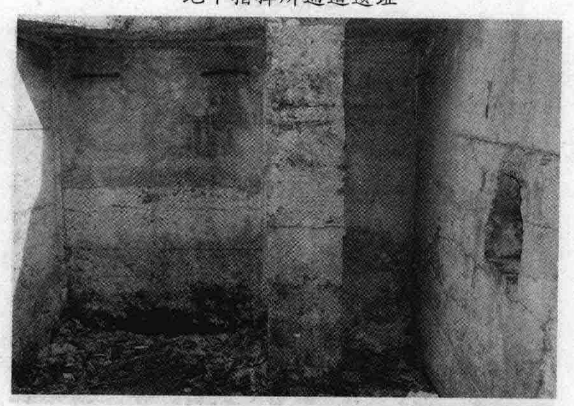

指挥所地面火力点遗址地下部分


进入地下指挥所遗址拐弯处


指挥所火力点遗址地面部分


地下指挥所通道遗址


地下指挥所通道遗址拐弯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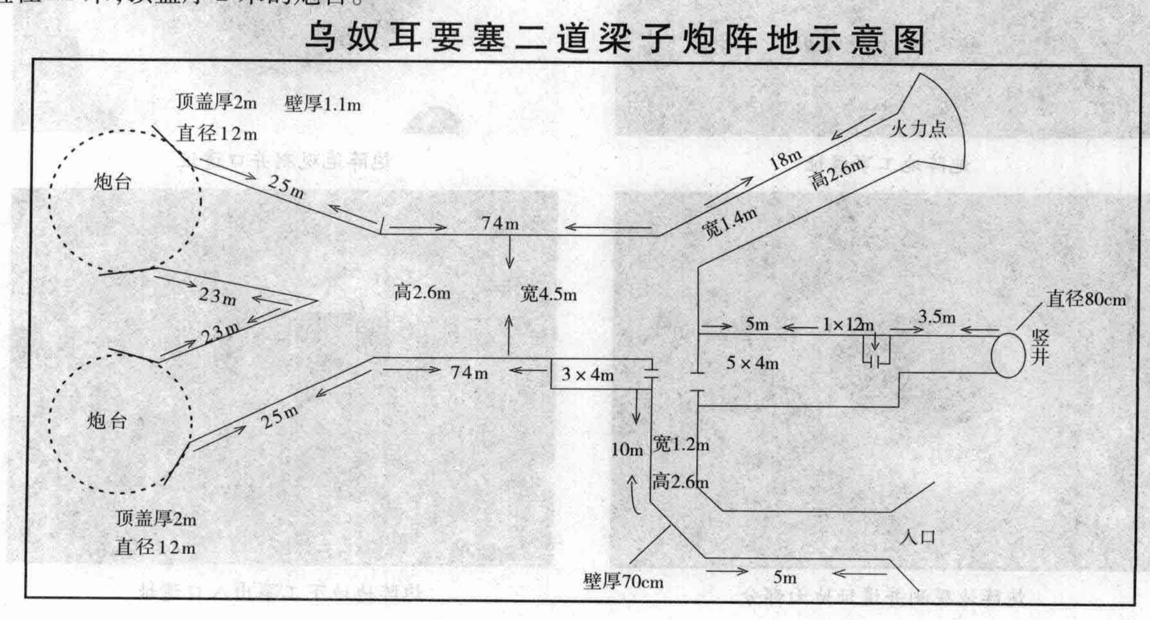

指挥所地面火力点遗址下部

(四)炮阵地

在二道梁子主峰有3处炮阵地,分别位于主峰的西部和东南部。其中最大的一处炮阵地位于主峰的东南1 000米处,北纬48°52′255″,东经121°18′469″,海拔1 138米。炮阵地东西长120米,南北宽50米,火力指向为西南滨洲铁路方向,距滨洲铁路7.5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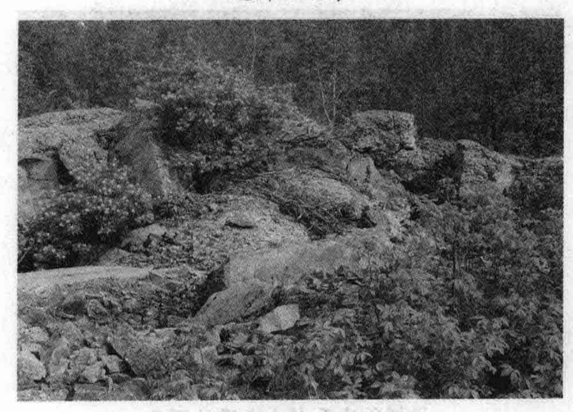
入口位于东南,地下工事内有指挥室、休息室等不同功用的3个大小房间;在东北方设有机枪火力点;在东部设有观测竖井;有一个74米长、宽4.5米,高2.6米的通道直通位于西南和西部的两个直径12米,顶盖厚2米的炮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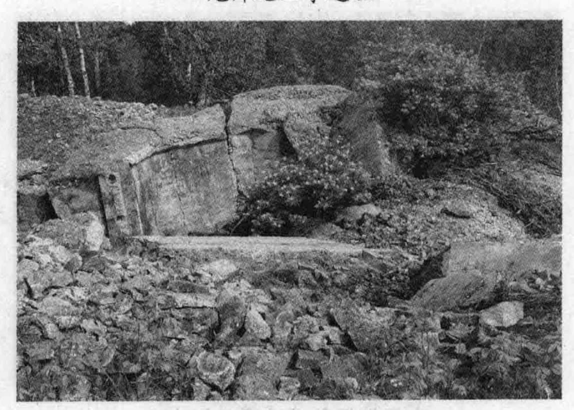
乌奴耳要塞二道梁子炮阵地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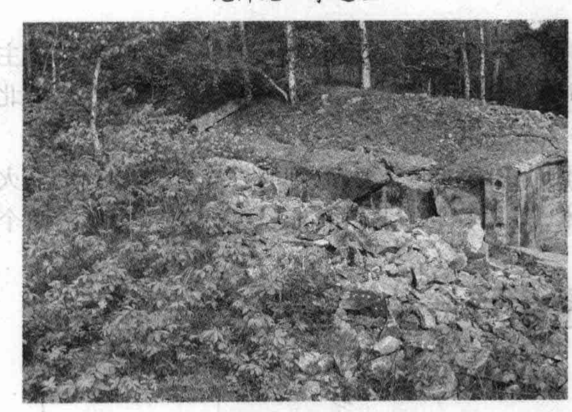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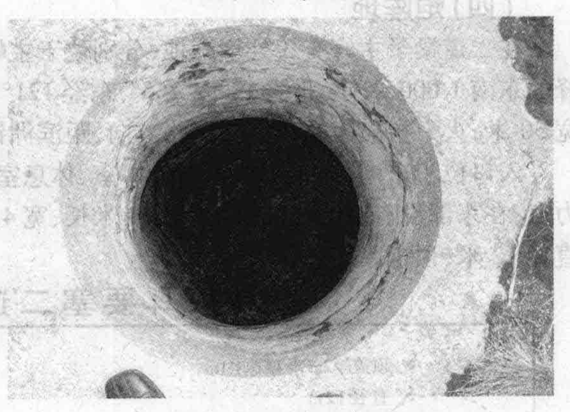

炮阵地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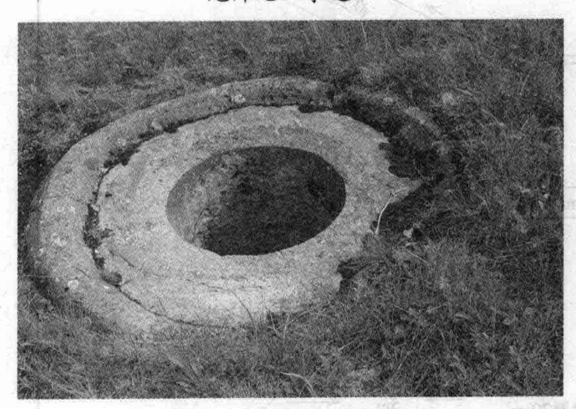

炮阵地工事遗址


炮阵地工事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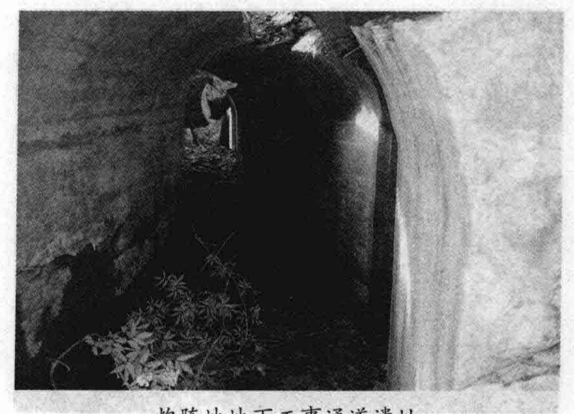

炮阵地工事遗址


炮阵地工事遗址


炮阵地观测井口遗址


炮阵地观测井遗址地面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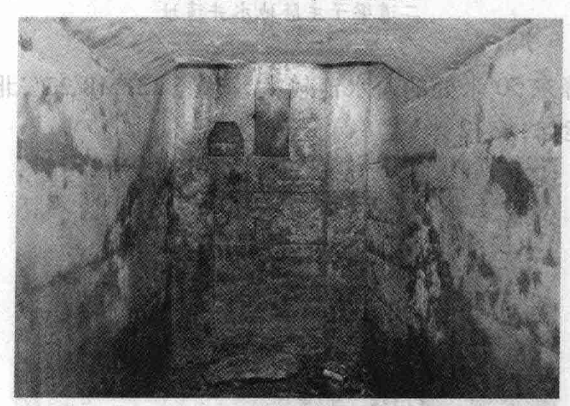

炮阵地地下工事出入口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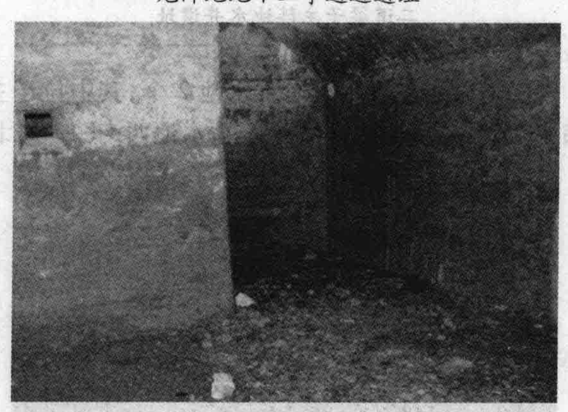
炮阵地地下工事通道遗址



炮阵地地下工事通道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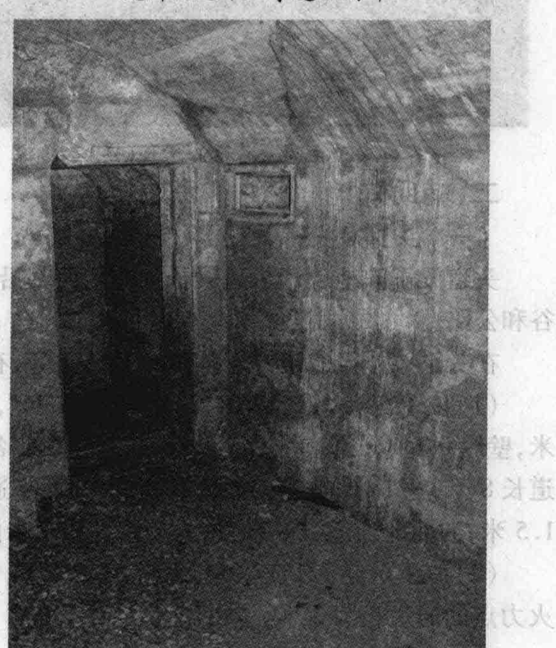
炮阵地地下工事遗址内部



炮阵地地下工事遗址内部



炮阵地地下工事出入口遗址



炮阵地地下工事遗址内部

(五)水 井

在二道梁子主峰四周有10余个水井。水井型制基本相似,多为1.5×1.5米,井壁用木板围起。有一口井现存井水仍满,且清澈甘甜。很具代表性,位于主峰西侧,北纬48°52′13″,东经121°18′20″,海拔1 147米。井较大3×3米,其北部5米处有1个1.5×3米的井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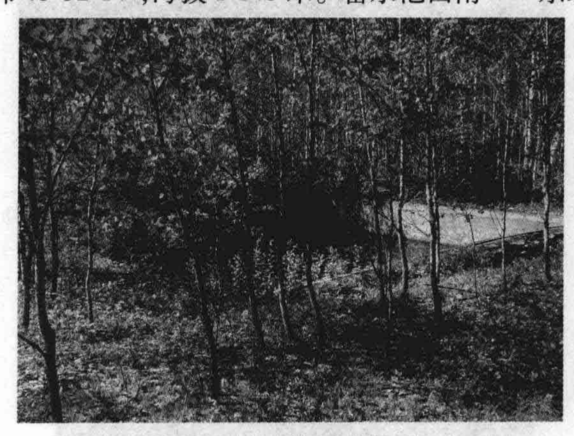


二道梁子主阵地水井遗址

二道梁子主阵地水井遗址

（六）蓄水池

二道梁子主峰附近有蓄水池2个，其中位于主峰东50米处的蓄水池较大。东经121°18′27″，北纬48°52′14″，海拔1 148米。蓄水池西南——东北走向，长12米，宽8米，深5米。



二道梁子主阵地蓄水池遗址（远）



二道梁子主阵地蓄水池遗址（近）

二、辅助阵地

（一）头道梁子

头道梁子阵地位于二道梁子主阵地西部沿山脊东北——西南向排列10余个碉堡火力点，封锁河谷和公路。

在头道梁子至二道梁子阵地中间公路旁，有两个大的火力点：

（1）位于东经121°17′04″，北纬48°52′11″，海拔965米。工事呈南北向，长6米，宽3米，深2.5米，壁厚0.8米，顶盖厚1.3米；在西北和东北各有一个出入口，长10米，宽1米；在西南角有一条通道长8米，宽1米，分岔向西南和西北；向西南通道长7米，进入一个圆形直径1米的火力点掩体，深1.5米；向西北通道长8米，进入一个直径1米的圆形火力点掩体。

（2）位于东经121°17′05″，北纬48°52′13″，海拔970米。该火力点制式与（1）相同，只是通向西南火力点的通道长为3米。

（二）新南沟阵地

在滨洲铁路新南沟车站南5公里处，是119师团司令部所在地。在铁路北有255联队驻守的阵地。在新南沟阵地上有永久工事碉堡、掩蔽部、地下指挥部、观察所、炮阵地、机枪掩体及交通壕、堑壕、反坦克壕等。

（三）开岭阵地

在滨洲线开岭站（今沙力站）南北两侧山地上都筑有环形阵地，路北面阵地有255联队第3大队

驻守；路南面有第2大队驻守。

（四）伊列克得阵地

在滨洲铁路伊列克得车站东南和东北两侧高地上构筑有环形阵地，路东北侧有254联队驻守，路东南侧有迫击炮第17大队驻守。

三、野战阵地

（一）免渡河阵地

在滨洲铁路免渡河车站西部山地制高点上构筑有碉堡、掩蔽部、机枪掩体、炮阵地、交堑壕等，为永备阵地。

（二）牙克石卓山阵地

在滨洲铁路牙克石车站东10.4公里处卓山车站南北两侧高地上构筑有永备阵地，北侧为1号阵地，南侧为2号阵地。

（三）银北山阵地

银北山阵地又称北矿沟阵地，位于今乌奴耳水泥厂后沟堵，在1073高地至1106高地之间，主峰位于北纬48°54′45″，东经121°24′13″，海拔775米。该阵地从今301国道延伸到银岭河谷的日军军用公路。该阵地封锁从铁路线进入银岭河谷南至伊列克得、北至扎敦河林场（39公里），以及大尖山的河谷公路。山上有碉堡10余个。

（四）大架子山阵地

主峰位于北纬48°47′32″，东经120°53′34″，海拔1 216米。公路两旁山梁上视野开阔，有10余个碉堡，封锁从高吉山至大架子山直达海拉尔方向公路。

（五）伊和布德日阵地

主峰位于北纬48°43′52″，东经120°50′37″，海拔1 257米。公路两旁山梁上有10余个碉堡，封锁穷棒子沟通往高吉山、62公里（绰源）公路。

（六）元宝山

元宝山阵地又称玉镇山阵地，主峰位于北纬48°36′33″，东经121°13′43″，海拔1 050米。公路两旁山梁上有10余个碉堡，封锁去62公里（绰源）的公路。

（七）62公里阵地

主峰位于北纬48°30′40″，东经121°48′50″，海拔1 100米。公路两旁的山梁上有10余个碉堡，封锁海拉尔方向直奔塔尔气道路，阻挡从大架子山、伊和布德日方向入侵者。

乌奴耳要塞野战阵地示意图

第五节 飞机场

一、乌奴耳机场

乌奴耳机场位于火车站东南5公里处，地处北纬48°49′34″，东经121°14′54″，海拔780米，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该机场于1944年9月建成，机场跑道东西向，宽约150米，长约1 000米。目前，水泥跑道少部分保存，多数已毁坏，生长了片片柳树林。

二、绰源机场

机场中心位于东经121°23′19″，北纬48°25′02″，海拔930米，在1122高地山下。于1942年建成。机场出口朝向09°～270°，机场跑道混凝土厚度0.20米，机场长1 500米，宽70米。机库共有18个，多数保存完好。机库长度内17.0米，外21.0米；机库宽度17.0米，外17.6米；机库高度内5.0米，外5.6米；滑行道质地为沙土/草皮，滑行道长250～1 120米。



绰源机场1122高地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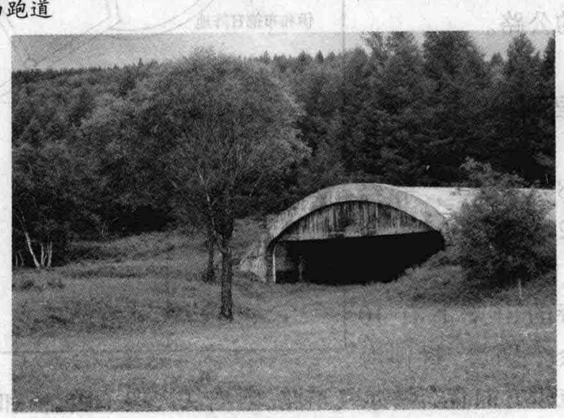
绰源机场1122高地全景



绰源机场跑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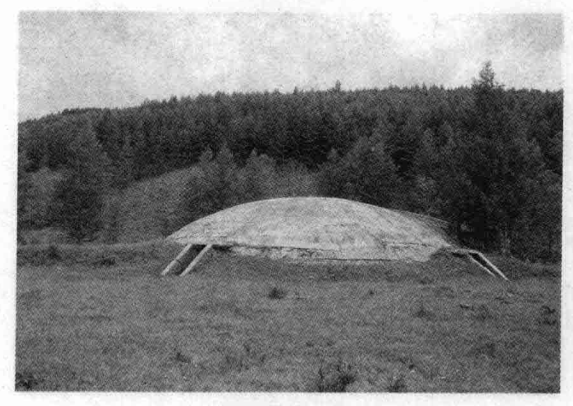
第1号机库



第2号机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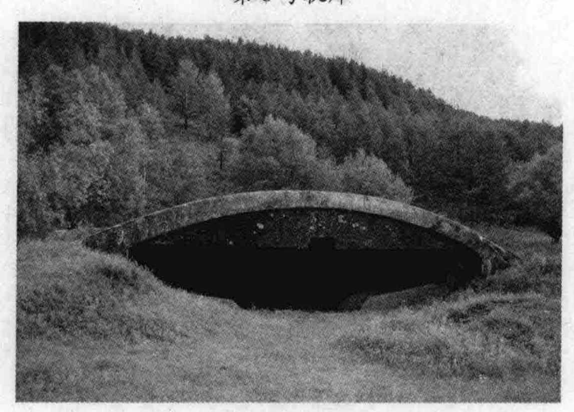

第 3 号机库


第 4 号机库


第 5 号机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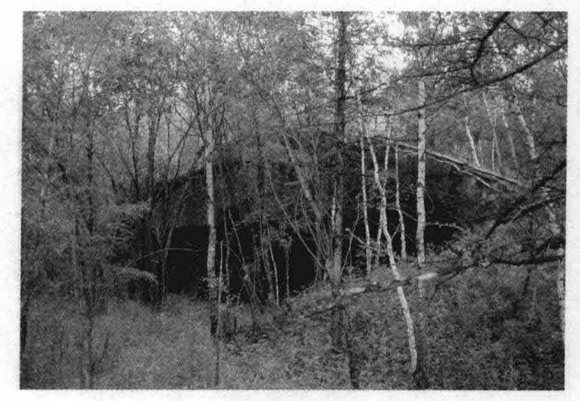

第 6 号机库


第 7 号机库


第 8 号机库


第 9 号机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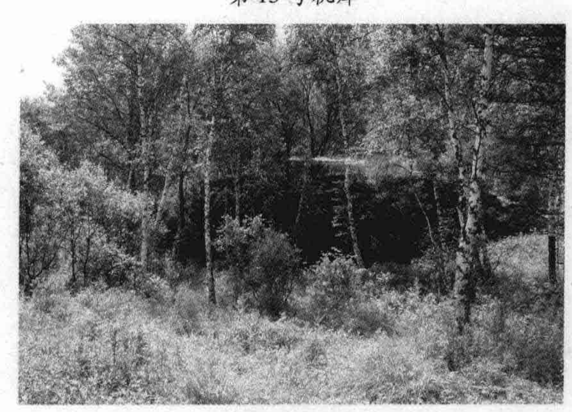

第 10 号机库


第 11 号机库


第 12 号机库


第 13 号机库


第 14 号机库


第 15 号机库


第 16 号机库


第 17 号机库


第 18 号机库

第三编
修筑要塞的劳工

本编揭示的受日本奴役的中国劳工，是指日本在侵华期间，由日军或通过日伪政权及其派生机构，违反劳动者的意愿，以欺骗的手段招募，或强制征派、抓捕为其服劳役并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中国劳动者。

日本在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中苏、中蒙边境各战略要地修筑的规模庞大的军事要塞工程，以及附属的机场、公路、铁路、桥梁、隧道、仓库、营房等设施，都是驱使中国劳工完成的。"国境建设"（北边振兴计划）曾是伪满洲国确定的与"产业开发计划"和"移民开拓计划"并重的"三大国策"之一。为此，对劳动实行"统制"，千方百计地掠夺和奴役中国劳工，也就成为日本在侵占东北期间所施行的一项重要政策。在实施这项政策的过程中，数以百万的中国劳工被关东军驱赶到东北中苏、中蒙边境地带，在日军的监视下从事着繁重的劳役，使上百万劳工被残害致死。

第一章　"劳动统制"政策与机构

第一节　"劳动统制"政策

关东军为掠夺和奴役劳工，施行了"劳动统制"政策，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利用与限制并用

从1932年伪满洲国建立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在东北推行其"劳动统制"政策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在劳动政策上除使用东北本地劳工外，对华北劳工实行了既允许其进入东北，又对进入东北的劳工数量实行一定限制的政策。

日本在东北施行"劳动统制"的最高机关是关东军。1933年12月，关东军成立了由特务部长兼任委员长的"劳动统制委员会"，负责制定"劳动统制"政策；1934年4月1日，关东军与在天津的日军特务机关于天津日本租界内设立了"大东公司"，其职能是在劳动统制委员会限定的数量范围内，负责华北劳工的招募、供应、输送和发放身份证明等事宜。

与东北邻近的华北地区，人口稠密，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从20世纪20年代起，华北就是东北地区重要的劳动力来源地。1926～1931年，由华北进入东北的做工人员达469万人，平均每年78万余人，其中最高年份为1927年，达104.38万人。在上述年份中，除228万人离开东北外，还滞留在东

北的约241万人。①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之前，华北劳工到东北做工为的是赚钱养家糊口，虽有受骗上当之人，但多数是志愿到东北的，并且有流动、返乡的自由。

从1934年起，关东军通过"大东公司"等机构从华北向东北和在东北本地招募劳工。这些劳工受到严格的身份检查、登记，被认为合格者发放劳动证，输送到各劳动地点，受到严格的管束。其中到东北边境地区修筑军事工程的劳工，是由关东军通过各承包公司用欺骗的方式招募的，他们只能在各施工地点劳动，不准脱离或逃跑，失去了人身自由，成为被强制奴役的劳工。到1937年，关东军在东北实行"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并加大对边境军事工程的修筑之后，各种劳工从招募到指定地点劳动，都受到严密控制，失去了流动的自由。因而，无论是华北进入东北的劳工，还是东北本地的劳工，从总体上已经成为被强制奴役的劳工了。本编所记述的就是这些被强制奴役的劳工。

在第一阶段由华北进入东北的劳工数量，最多为1934年的62.73万人，最少为1937年的32.37万人。这些劳工大部分在各地工矿企业中做工，同时有相当部分被送到边境地带从事修筑要塞工事及其附属的机场、军营、公路、铁路等工程。还有大批直接由关东军派出机构骗招的劳工被直接送往各要塞工地。



由华北招到东北刚从大连港下船的劳工

1934年，关东军开始"在东边珲春和东宁两县最靠近苏联国境的地方以及在虎林县的虎头和抚远县(应为富锦县——编者注)的五顶山等方面……布置了表面上说成是'防守苏联进攻的军事工事'，实际就是进攻苏联的最前线的阵地工事。"②1934年4月至1937年10月，日本为加强对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的军事占领和伺机北侵苏联，动工修建了索伦——南兴安、南兴安——温泉段铁路和连接两段铁路的大兴安岭阿尔山隧道，并在阿尔山修筑了兵营，在五岔沟修建了飞机场。其中阿尔山隧道全长3 218.5米，1937年10月1日全线贯通。③ 这些设施的修建，使日本军队可由王爷庙(今乌兰浩特)乘火车直达临近中蒙边界的阿尔山，乘飞机可直达与阿尔山一岭之隔的五岔沟。这些边境军事工程以及与军事工程配套的铁路、隧道等设施的建设，都是通过骗招等手段征集中国劳工完成的。

① ［日］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庶务部劳务室：《北支劳动力ノ对外移动状况》昭和17年11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2024/2/401。

② 谷次亨：《所谓"北边振兴计划"的内幕》，载《文史资料》第39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内部版，第83页。

③ 李玉侠主编：《阿尔山市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第15页，2001年10月。

二、强化对劳工的募集

从1937年7月到1941年6月，是日本在东北实行劳动统制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关东军在东北的“劳动统制”政策因其实行“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而发生转变，不仅取消了对华北进入东北劳工数量的限制，而且采用各种手段极力招募华北劳工，将其输送到东北，并开始大量使用东北本地劳工。随着以“国境建设”为中心的所谓“北边振兴计划”的实施，“劳动统制”政策又得到进一步强化。

日本为了扩大对东北地区的经济侵略与掠夺，经周密的准备，制定了《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纲要》，于1937年1月由关东军司令部正式通过，4月开始付诸施行；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该计划又纳入日本扩充军需生产的四年计划中加以进一步扩大。而实施这些计划需要大批劳动力，当时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便突出起来。1937年7月，伪满民生部对重要产业的劳动力供求状况进行了调查，发现所有的重要产业部门都缺乏劳动力。为此，关东军在加大利用东北本地劳动力的同时，将对华北劳工出关数量的限制改为积极招徕华北劳工的政策，并着手成立新的劳工管理机构。1937年12月14日，伪满政府公布了《满洲劳工协会法》，翌年1月7日正式成立了特殊法人团体——满洲劳工协会，负责对劳工的招募与管理。为尽快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满洲劳工协会成立后，首先把重点放在劳工的招募和登录上。为了实现劳工管理机构的统一，1938年7月，将大东公司并入满洲劳工协会。与此同时，伪满政府按照关东军的要求，于1938年7月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内增设了企划委员会，下设劳务委员会，同时撤销了原关东军劳动统制委员会。新的劳务委员会委员长由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担任，成员包括政府有关部门和民间公司的代表，是审议劳动政策的最高机关。这样，就以伪满洲国的名义进一步加强了对劳务问题的管理。企划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制定了《劳动统制纲要》和《劳动统制法》，并于1938年12月1日公布；翌年1月30日公布了《劳动统制法施行细则》，2月20日开始施行。

《劳动统制法》是伪满洲国实行“劳动统制”的基本法。制定《劳动统制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和确保劳动资源，以期有效地使用劳动力。该法在第一条中就明确提出：“本法为谋劳动力有效之使用，以涵养确保劳动资源，保护辅导劳动人，调整劳动力之需给为目的”。为此，该法明确提出了“为行公共之事业有紧急不得已之情形时，满洲劳工协会对于管辖该事业地之省长或新京特别市长，得申请劳动人募集之斡旋”。① 即在“公共事业”紧急需要时，满洲劳工协会可通过伪省长向下属市县分配“募集”劳工人数。可见，对劳工的招募已经同行政分配结合起来了。这里所说的“公共事业”，在当时主要是指修筑边境要塞等军事工程。据1939年8月伪《兴安北省概要》记载：“根据劳动统制法，在海拉尔市各行业中谋求圆满地调和对工人的统制和供需，维护会员们的利益。在兴安北省一带，最近计算约有七千人。其中在协会登记了的有四千七百人。他们大都以海拉尔为中心，从事着工事施工和其他劳动(据说其他方面有一万人……)。然而在现有人员中，由于在完成各种事业上发生故障，协会方面于本月初从热河、奉天两地强制招募约两万人，适应了各方面的需要……为再次补充人员之不足，预定最近从其他地区招募一万人，打算分配给乌奴耳地区的满洲国国防工事施工现场。”②这一记述清楚地表明，关东军在1939年，已经利用《劳动统制法》通过“劳工协会”等组织，在东北各省“强制招募”劳工，用于满足边境军事工程等“公共事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1939年5月，关东军指使伪满政府正式公布了以实行“国境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北边振兴计划》。为适应对劳动力的扩大需求，对“劳动统制”的机构和政策又作了进一步调整。1939年9月，日本军方为加强对华北劳动力的掠夺，协调东北与华北的劳动力分配，着手筹备负责“统制”华北劳工的一元化机关——华北劳工协会，办理华北地区劳工的招募、配给、输送等事宜。与此同时，伪满洲国的劳务行政管理机构也得到了加强。1940年1月，在伪民生部创设了劳务司，内设劳务、动员、辅导

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4月版，第865页。

② 〔日〕铁道总局建设局计划课小原元主编：《兴安北省概要》〔极秘〕，昭和十四年八月。

三科，以强化中央劳务行政机构；同年5月，在部分省的民生厅内也设置了劳务科，加强了对东北本地劳工的募集。1940年4月17日伪满劳工协会决定：本年度将从伪满洲国境内募集劳工50万人，其中热河省7万人，安东省5.9万人，锦州省10万人，奉天省16.1万人，吉林省5万人，其他省6万人。[①]7月1日，以伪满民生部的名义发布了《工人专营募集规则》，以加强对劳工的募集和管理；8月，修订了《劳动统制法》，对劳动力分配、防止劳动力移动等作了进一步的规定；11月，又制定了《防止劳动者移动对策纲要》，严格控制劳工移动，以保证军事工程和矿山对劳动力的需求。

三、"劳动统制"的极端化

从1941年7月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是日本在东北推行"劳动统制"政策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日本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尤其是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急需增加军需品生产，加快边境要塞工程建设，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加迫切，因而进一步加强了对劳工的掠夺，将"劳动统制"政策推向极端。



伪满锦州省1944年劳务动员计划文件残页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为实施以进犯苏联为目标的"关东军特别演习"，急需大量劳动力。与此同时，从华北向东北招募劳工也愈发困难。从1941年起，日本为了掠夺华北的矿产资源，各企业、矿山开始有计划地强制征用劳工。为确保这些企业矿山的劳动力的供应，华北日伪当局规定：从1941年初开始，华北主要城市、港湾和主要煤矿周围10公里以内，为对满蒙禁止募集劳工区。[②] 在此情况下，关东军开始把解决劳动力的途径主要放在伪满洲国的范围内。

1941年7月，伪满政府制定了《劳务新体制确立要纲》，10月10日由伪满国务院会议通过，11月1日起施行；在组织机构上新设立了"劳务兴国会"，取代原有的满洲劳工协会。采取这些措施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伪满政府的劳务行政，在伪满洲国内实现所谓的"国民皆劳"，确保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将全东北变成可随时调用劳动力的集中营。"过去劳工协会所掌管的业务，属于行政管理部门的业务，由劳务行政机构扩充接收到政府部门，其他业务由劳务兴国会掌管。另外，把政府、协和会、劳务兴国会成为一体，在全国国民当中开展勤劳兴国运动，确立劳动力国家性动员体制，提高劳务效率。"[③]实行"劳务新体制"，成立劳务兴国会，也是"为期急速确立国防国家，根据国防诸设备之急速完成及基础产业力之扩充……"而解决劳动力问题。[④]

在"劳务新体制"下，伪满洲国民生部大臣被赋予发布有关劳动者募集、供应、使用、解雇、移动等

---

① 《劳动统制本年对策大纲》，载《内外经济情报》6卷5号，1940年5月1日出版，第13页。

② 华北综合调查所：《事变后华北经济概要与矿工业及劳动事情》，1943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第230页。

③ 〔日〕古田末二：《劳务兴国运动的兴起——满洲劳工协会撤销的意义》，载《满洲经济》1939年11月1日发行，第15页。

④ 《劳务兴国会法公布实施》，载《大同报》1942年10月22日。

必要命令的权力。据此,1941 年 12 月 13 日以民生部令和治安部令的名义公布了《劳动者募集统制规则》,1942 年 2 月 9 日又公布了《劳动者紧急就劳规则》。其中规定:"关于公共事业或国策事业重要事项……有紧急必要时",可"向民生部大臣申请配置所需之劳动人。"民生部大臣认为有配置劳动人之必要时,"命省长或新京特别市长供出所需之劳动人。"省长在接到供出命令后,于"市县旗之区域内规定供出劳动人数,……命该市长、县长或旗长供出之。"①这就是"供出劳工",即用行政命令强制摊派而产生的劳工。此后,修筑边境军事要塞等"国策事业"所需要的大部分劳工,就是通过伪满民生部和省、市、县(旗)逐层将数量指标下达到各地农村,强制摊派给各个农户"供出"而集中起来的。

"劳务新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实行"勤劳奉公"(由于日伪在东北各机关学校同时实行"勤劳奉仕"即义务劳动制度,在许多场合,从城市、农村征用适龄青年参加的"勤劳奉公"也被混称为"勤劳奉仕")制度。所谓"勤劳奉公",就是以"义务奉公"为名,要求凡未能服兵役的适龄健康男性青年,在三年内必须服 12 个月的劳役。关于编入"勤劳奉公"者的年龄,在 1942 年 5 月 27 日发布的《国民勤劳奉公制创设要纲》中规定是"自 21 岁至 23 岁",但同时又规定:"在战时或事变时,于不超过一年之限度内,得延长前项之年龄及期间",这样,参加勤劳奉公的年龄就成了自 20 岁至 23 岁。到 1945 年 3 月 1 日,伪满洲国撤销了民生部,新设国民勤劳部和厚生部,并于 11 日修订了《国民勤劳奉公法》,将勤劳奉公队适龄年下限延长到 30 岁,参加勤劳奉公期间延长为 6 年内服劳役 3 年。这样,凡是未被征为"国兵"的东北青年,都成为可随时调用的青壮年劳工,编成"勤劳奉公"队,被输送到工矿、交通、农业等部门或边境军事工程中服劳役。

在"劳务新体制"下,关东军采取的另一项措施是强抓劳工。在边境军事工程建筑之初,所需劳工大都是用欺骗的方式招募的,当骗招的方式逐渐失效后,征派和抓捕就成为解决要塞工程所需劳工的主要方式。1943 年 4 月 18 日,伪满洲国国务院又制定了《发动都市人口疏散紧急对策》,在城市大抓"浮浪"即所谓无正当职业者,强制其从事各种劳役。

所有这些"供出劳工"、"勤劳奉公"和抓捕劳工,除由劳工协会、劳务兴国会等劳务部门出面之外,还有协和会、警察局等相协助。协和会是关东军在东北建立的带有政治性质的官办组织。劳务新体制确立后,协助日伪政权搜刮劳动力就成为协和会的工作重点。在 1941 年 10 月召开的协和会第八次全国联合会议上,讨论的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如何"推进劳务政策","确保劳动力"。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亲临会议讲话,重点阐述了劳务对策问题;会议做出了《关于劳动对策实践协定》,提出:鉴于劳务问题之重要性,协和会要予以"全面的协力"。② 伪满警察系统则是协助征派、抓捕、监视劳工的重要部门。伪满治安部还成立了指纹管理局,劳工在进行劳动"登录"的同时要进行指纹登记。因此,农民、市民一旦被确定征用为劳工,就无法逃脱,成为关东军任意榨取的对象;如果试图躲避或逃跑,其本人甚至家属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战犯岐部与平供述:"征用劳工是伪满臭名昭著的苛政之一,奴役中国人民从事各种军用设施建设,完全是毫无代价的,而且劳动条件非常恶劣。所以,没有人愿意去当劳工。为此,采取了强制手段抓劳工。由省、县把具体数额分配给各村,根据户籍法以停止配给等威胁手段征用劳工。因为任务完成得不好,后来又行使了警察权,甚至用殴打、关押等手段进行威胁,以达到征发劳工的目的。"③

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 年 4 月版,第 870~871 页。

② 《大同报》,1941 年 10 月 13 日、14 日。

③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 年 4 月版,第 878 页。

第二节 “劳动统制”机构



满洲劳工协会发放的劳工票

一、“劳动统制委员会”与大东公司

劳动统制委员会于1933年由关东军提倡设立，是制定全满劳动对策的最高协议机关。委员会委员长由关东军特务部长（参谋长）小矶国昭兼任，委员由军参谋、朝鲜总督府、政府机关（民政部、军政部、实业部、交通部）、土建协会等各方面代表组成。委员会做出决定：依靠满洲国和关东厅的合作，逐渐加强限制华北劳动者进入东北。限制入满劳工数量的业务交由大东公司执行。①

大东公司实际上是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的劳务机构。1934年4月1日在天津日本租界浪速街正式成立，领导者由日本天津特务机关长担任。其业务是负责“外国劳动者”的身份证的发放、募集、供应、输送、保护等。由向山东、河北等省派驻的募集人员通过“把头”对应募者进行调查，查明身份后发放证明书，并办理赴“满洲国”的手续，如身份不明确则不予发放入境手续。根据1935年3月伪满民生部颁布的《外国劳动者取缔规则》规定，华北劳动者出关必须首选通过大东公司的审查，取得大东公司发给的身份证明书，劳工在入境时向警察官呈验并加盖许可检验后，才允许进入东北。1939年6月30日，大东公司合并于满洲劳工协会。

二、伪满劳务行政机构与劳工协会

（一）伪满中央劳务行政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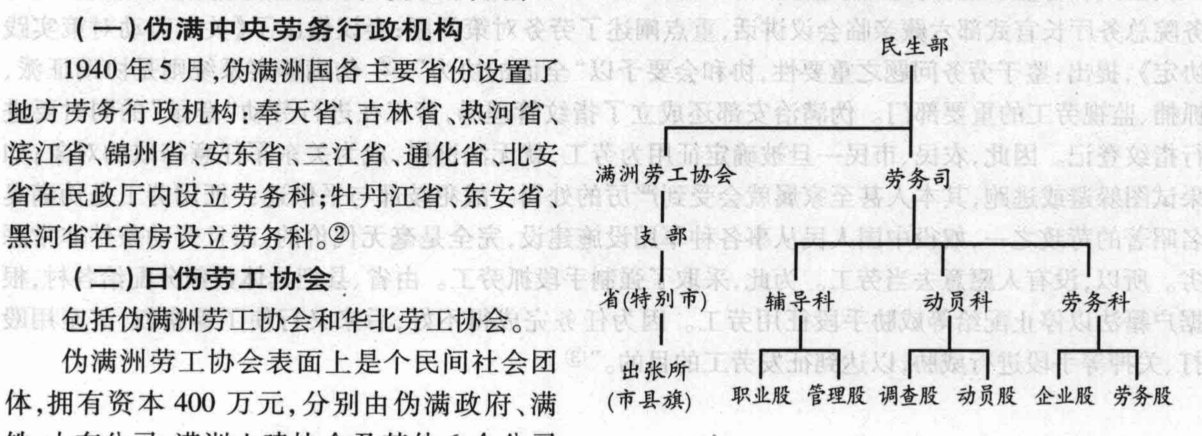
1940年5月，伪满洲国各主要省份设置了地方劳务行政机构：奉天省、吉林省、热河省、滨江省、锦州省、安东省、三江省、通化省、北安省在民政厅内设立劳务科；牡丹江省、东安省、黑河省在官房设立劳务科。②

（二）日伪劳工协会

包括伪满洲劳工协会和华北劳工协会。

伪满洲劳工协会表面上是个民间社会团体，拥有资本400万元，分别由伪满政府、满铁、大东公司、满洲土建协会及其他6个公司

中央劳务行政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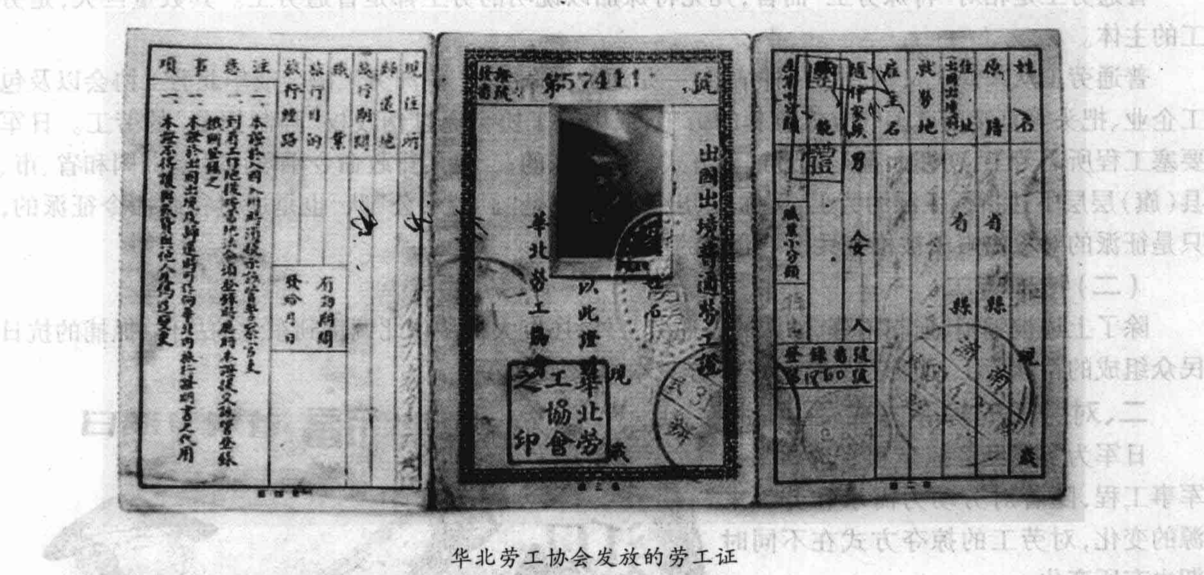
投资。其业务是在调整劳工的供求、确保和培养劳动资源的总目标下，负担劳工的招募、供应、输送、分配的斡旋，劳工的登录、劳动票的发放、劳动市场的经营管理、有关劳动的调查等。但其业务要接受

①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满洲国史》分论下，中译本，第802页。

② 《第四次民生年鉴》，第70页，辽宁省图书馆藏。

伪满政府的命令与监督，重要事项需经伪满民生部大臣的许可。协会总部设在伪都新京（长春），在各省设立支部，在各市县设立办事处，支部长由各省次长担任；办事处主任由各市、县、旗的行政副职担任，各办事处的主事、参事和科、股长均由日本人担任。由此可见，满洲劳工协会实质上是日本控制的伪满政权和日本资本家相结合的半官方机构。

伪华北劳工协会则是日军设在华北一元化的劳动统制机构，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实业总署（后改为经济总署）领导，设理事长、理事、监事若干人，都由华北政务委员会任命。其机构分为中央机关（本部）和地方机关（基层支部），内设总务部、管理部、辅导部。地方机关在省（道）及特别市设总处，在各市县设办事处和分处。华北劳工协会的性质、主要职能与伪满劳工协会大体相同，其不同点主要是为日军掠夺华北劳工，在供应华北企业矿山及各种工程的同时，负责向伪满洲国、伪蒙疆和日本国内输送劳工。



华北劳工协会发放的劳工证

三、“劳务兴国会”

1941 年 10 月 22 日，伪满政府颁布了《劳务兴国会法》，随之成立了劳务兴国会，解散了满洲劳工协会。据《劳务兴国会法》规定：劳务兴国会分为满洲劳务兴国会和省（含新京特别市）劳务兴国会；满洲劳务兴国会由民生部大臣、省劳务兴国会由省长、新京特别市长监督之。其业务包括振兴劳务兴国运动、制定关于劳动的统制规程及指导国内外工人的招募斡旋、工人的福利保健、工人生活必需品的调配、劳动科学的研究及科学的劳动管理指导等。

四、“国民勤劳奉公”组织机构

1942 年 7 月 29 日，伪满洲国成立“国民勤劳奉公制实施准备委员会”，以民生部次长源田松三为委员长；10 月在民生部内增设勤劳奉公总局，任命半田敏治为局长；11 月 18 日，伪满国务院发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和《国民勤劳奉公队编成令》。国民勤劳奉公由国务总理大臣兼任名誉总裁，协和会中央本部部长兼任名誉副总裁；设置总司令、副总司令、省司令、副司令；市县旗司令、副司令；下设大、中、小队长、副队长。① 每个小队一般由 60 人组成，三四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三四个中队组成一个大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1945 年 3 月 12 日又公布《国民勤劳奉公队总司令部令》，明确规定勤劳奉公队的司令由省和市县旗的省长和市县旗长担任。

---

① 伪满《政府公报》，康德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第二章 对劳工的掠夺

第一节 劳工类型与被掠夺方式

一、劳工类型

(一)普通劳工

普通劳工是相对“特殊劳工”而言,凡无特殊加以说明的劳工都是普通劳工。其数量巨大,是劳工的主体。

普通劳工从来源上又可分为几种情形:一是通过大东公司、满洲劳工协会或华北劳工协会以及包工企业、把头等直接用欺骗的方式招募的劳工,或由劳工协会通过伪政权“强制招募”的劳工。日军要塞工程所需劳工,初期大都是通过这种方式集中起来的;二是用行政命令手段由伪满洲国和省、市、县(旗)层层下达指标征派的劳工,又称“供出劳工”;三是“勤劳奉公”队,也是通过行政命令征派的,只是征派的对象仅限于被检查兵役不合格的“国兵漏”。

(二)特殊劳工

除了上述被骗招、强制招募、征派的普通劳工外,还有大批从华北调集到东北的战俘、抓捕的抗日民众组成的特殊劳工,又称“特殊工人”。详见本编第四章第一节。

二、对劳工的掠夺方式

日军为实现经济掠夺和修筑要塞等军事工程,随着对劳动力需求和劳工来源的变化,对劳工的掠夺方式在不同时期也有所变化。

(一)骗 招

要塞工程具有机密性,而且都地处偏远,条件恶劣,为了防止劳动者了解实情或不响应招募,所招劳工大都是用欺骗的方式募集的,尤其在工程修筑初期更是如此。凡是各招工机构触角所及之处有劳动能力之人,都可能成为被骗招的对象。据海拉尔幸存劳工张玉甫回忆说:1935 年 2 月,他在郑家屯谋生,在街上碰见一伙招工的声称:“去东山开荒,每天工钱一元五,吃三顿馒头。”结果受骗,同大约 400 人一起被押送到海拉尔修筑要塞当上了劳工。据张玉甫所见,劳工棚子“一眼望不到头”,在北山上干活的劳工“少说也有两三千人。”①这些劳工自然都是被骗招来的。其他要塞的劳工也是如此。据瑷



大东公司骗招劳工广告

① 张玉甫:《修筑海拉尔北山要塞劳工的悲惨生活》,载《呼伦贝尔文史资料》第 2 辑。

珲劳工幸存者杨凤沼说：伪康德3年2月，大东公司用欺骗的方法，在天津招劳工1 100多人，在沈阳招600多人，被输送到瑷珲县西岗子给日本岩崎部队修山洞。我因受不了罪偷着跑了，那1 700多人始终没见回来。① 虎林幸存劳工孙同修回忆说：1937年春，沈阳街里出现了几个戴红胳膊箍的招工人，说"一天开2块钱工资"，就报了名。招工者给每个人预支5元钱，将他们领进一个大院，外面有人把守。招了四五百人后赶进了闷罐车，走了七天七夜到了虎林。孙同修所在的工区有18栋工棚子，1～17栋每栋住200人，共约3 500人，第18号工棚是专为病号预备的。为修筑虎林要塞工程，驻虎林的关东军经理部与日本在东北经营的各大公司如清水、高岗、大野、大仓、神谷、益群、荒川、长谷川、安藤窑业、满洲土木株式会社等签订了工程承包合同。这些公司在虎林各有一二十个办事人员，下设若干中国把头即"二柜"，派人到各处骗招劳工。从1936年起，安藤窑业从外地骗招劳工1 200余人建窑烧砖；1938年春，清水、高岗、大仓组骗招劳工3 000余人修筑日军营房；1942年4月，陈文林、栾贵堂等100余人被骗到虎林修军用道路，而前期在此修路的劳工已有1 000余人。② 其他要塞大同小异，可见要塞工程中骗招劳工的普遍性。

（二）强　征



日军在大街上抓劳工

强行征派劳工主要集中在东北，具体情形可分为三种：一是"强制招募"，二是"供出劳工"，三是"勤劳奉公"。随着用欺骗的方式所能招募的劳工数量越来越少，强征劳工成为要塞工程后期劳工的主要来源。"强制招募"就是由劳工协会、劳务兴国会出面，通过各级伪政权招募劳工。"各县募集、摊派劳工的情况是：由各县出张所与伪县公署根据伪国务院和伪劳工协会及伪省公署下达指标，由各县行政科，按区、村人口摊派……劳工募集、摊派就绪后，由各县行政科照册移交劳工协会各县出张所，然后编成大、中、小队，实行连坐、连环保。"③"供出劳工"即自上而下用行政命令下达数量指标而征派的劳工，"依靠行政权力的强制手段，按照一定的数额分配，民生部大臣命令省长，省长命令县长，县长再命令街村长，必须按照规定的劳动力数额，在指定的时间、场所交出。"④供出劳工的年龄，在《劳动人紧急就劳规则》中规定，免除就劳者的年龄为"年龄未满18岁或50岁以上者"。这就是说，凡年满18岁至50岁都在被"供出"之列。实际上，年龄小于18岁的劳工也大有人在。因为在征用劳工时，主要是保证上级规定的人数。1943年，伪奉天省复县老虎屯雅化村的曹树德顶替哥哥到虎林出劳工，当年才15周岁。"勤劳奉公"则是将强征的

① 王登明：《日本帝国主义在黑河省罪行》，载《黑河文史资料》第2辑，第53页。

② 刘翰章：《虎林伪满劳工初记》，载《虎林文史资料》第3辑，第172页。

③ 袁铁凤：《伪满劳工协会内幕及其罪行》，载《沈阳文史资料》第13辑。

④ ［日］古田末二：《劳务兴国运动的兴起——满洲劳工协会撤销的意义》，载《满洲经济》1939年11月1日发行，第16页。

对象限定为年龄 20～23 岁未当伪国兵的健康男性青年;1945 年 3 月,参加“勤劳奉公”者的年龄又被延长至30 岁。



日军抓捕的中国劳工

(三) 抓 捕

强行抓捕劳工是日军为解决劳工不足问题采取的又一项罪恶措施。抓捕的范围包括华北和东北的广大城乡,较远处还有从安徽等地沦陷区被日军抓捕到东北的。1939 年 2 月,17 岁的李丛田到蚌埠的舅舅家,在街上被抓到东北当劳工,先在图们修铁路,冬天又送到鸡西煤矿当矿工,后来又被带到虎林当劳工。①

1941 年 4 月 5 日,关东军与华北日军达成《关于入满劳动者的协议》,以争取每年由华北向东北输送 110 万人为目标,决定将华北的“治安工作”同招募劳工联系起来。② 所谓将“治安”与招募劳工相联系,即由华北日军通过“讨伐”、“扫荡”等“治安”战,大肆抓捕青壮年劳动力输送到东北,其中相当部分被运送到边境地带修筑要塞工程。如前面所述华北的特殊劳工中,有相当部分是从各沦陷区抓捕的抗日民众或普通百姓。

在东北大规模强抓劳工是在“劳务新体制”确定之后,主要集中在城市。1943 年 4 月 18 日,伪满洲国国务院制定了《发动都市人口疏散紧急对策》,在城市大抓“浮浪”,强制其从事各种劳役。19 日伪都新京警察全部出动进行大搜捕,抓捕 3 160 人,将其中 1 287 人强行送往各劳动地点;27 日伪奉天市抓捕 3 576 人,5 月 4 日抓捕 326 人,6 月 22 日又抓捕了 3 500 余人;7 月 23 日齐齐哈尔也逮捕 152 人。被逮捕的人中凡有劳动能力者,都被送往各矿山或各军事工程中强迫劳动。③

除集中抓捕外,伪劳工协会设在市内的招工点还随时抓捕零散的民众当劳工。家住奉天的刘宝钧 1942 年两次被抓。第一次是“在日本站(现沈阳站)附近被抓劳工的抓走了,送到鹤岗挖煤,住的是席棚子,吃的是玉米面、橡子面的窝窝头和咸菜。到了 11 月天冷以后,我实在忍受不了就跑了,偷着上火车后藏在座位下,到沈阳老道口车速变慢时跳下了车。可是刚走到日本站(今沈阳站),又被抓了。抓劳工的是两个人,什么也没问就架着我送到日本站旅馆”,然后被送到了漠河军事工程中做苦役。④ 在嫩江金水修机场当劳工的王树熙,也是在沈阳市内做零工期间被强行抓走的。

第二节 劳工的数量与来源

一、华北劳工

(一)由华北输送到东北的劳工数量

在日本侵占东北时期,华北一直是东北地区重要的劳动力供应地。1934 年到 1945 年 8 月,从华

① 张凤鸣、王敬荣主编:《残害劳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 6 月版,第 88 页。

② 抚顺矿务局日文档案,劳 1941/385。

③ 《满洲新闻》1943 年 4 月 21 日、28 日、6 月 25 日、8 月 24 日。

④ 刘宝钧访问录,李秉刚存。

北输送到东北的劳工，由日伪劳务管理机构登记的就达794万人。

1934～1941年对满劳动移动年别统计表①

年　次	入满数	离满数	离满率%	残留数	残留率%	年　次	入满数	离满数	离满率%	残留数	残留率%
1934	627 322	399 571	63.7	227 751	36.3	1939	985 669	390 967	39.7	594 702	60.3
1935	442 667	420 314	95.0	22 353	5.0	1940	1 318 907	849 581	64.4	469 326	35.6
1936	364 149	382 966	105.2	－18 817		1941	949 200	688 169	72.5	261 031	27.5
1937	323 689	259 098	80.0	64 591	20.0	合　计	5 503 979	3 643 461	66.2	1 860 518	33.8
1938	492 376	252 795	51.3	239 581	48.7						

另据日本"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庶务部劳务室关于《北支劳动力ノ对外移动状况》报告中，《对满出稼劳动者出身地省别调》中记载，由华北劳工协会和满洲劳工协会统计的华北劳工被输送到东北的人数，1938～1940年分别为501 686人、1 012 148人和1 364 706人，比前表相同年份共多出81 588人。

1942～1945年，华北劳工被输送到东北的人数是：1942年1 004 479人，1943年786 638人，1944年346 448人，1945年1～7月29 674人。计2 167 239人。②

据此，从1934年至1945年8月，从华北被输送到东北的劳工数量，仅经过华北、东北劳工管理部门登记的就达7 671 218人。

在华北输送到东北的劳工中，有部分劳工有家属同行，是全家被骗或强征到东北的。其中1941年带家属的劳工占劳工总数的比例高达15.7%；仅1940～1941年带家属的劳工就达30多万人。而从1936～1945年到东北的劳工中，伴随的家属达250万人。③ 如果加上家属的数量，从1934～1945年，被日军从华北掠夺到东北的劳工及家属达1 000多万人。

（二）华北劳工来源地分布

由华北输送到东北的劳工，主要来自邻近东北地区的山东、河北两省，也有很少一部分来自山西、河南、江苏、安徽等省。1935～1941年，7年中被输送到东北的劳工495.8万人，其来源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北两省，其中山东省269.7万人，占54.4%；河北省206万人，占41.5%；其他如山西、河南、安徽、江苏等省共20.1万人，占4.1%。

1937～1941年河北省部分地区被输送到东北的劳工来源地情况表④

地　区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合　计	年平均
冀东道	55 034	92 790	155 959	199 899	121 484	625 166	125 033
燕京道	4 332	19 867	24 926	26 650	11 332	87 120	17 421
津海道	15 806	40 419	64 839	97 693	50 924	269 681	53 936
渤海道	33 678	58 595	128 496	190 909	81 473	493 151	98 630
保定道	8 247	11 138	20 707	39 844	21 081	101 017	20 203
直定道	6 240	10 684	16 481	25 960	19 358	78 723	15 745
顺德道	2 429	4 550	7 679	12 247	7 242	34 147	6 829

① 〔日〕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庶务部劳务室：《北支劳动力ノ对外移动状况》昭和17年11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2024/2/401。

② 华北劳工协会《业务概况报告》第4号，《华北劳工时报》1～4辑输出劳工统计表，天津档案馆藏；满洲帝国民生部：《第三次民生年鉴》，辽宁省图书馆藏。

③ 辽宁省档案馆：《满铁与劳工》第2辑(3)，第96页，天津市档案馆：《华北交通公司第一运输局旅客运输移交报告》。

④ 〔日〕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庶务部劳务室：《北支劳动力ノ对外移动状况》昭和17年11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2024/2/401。

地　区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合　计	年平均
冀南道	7 406	10 981	17 181	15 126	7 229	57 923	11 585
合　计	133 172	249 024	436 268	608 328	320 123	1 746 915	349 383

从本表及前表中的统计可以看出：自从日军加强从华北募集和抓捕劳工后，1937～1940 年华北到东北的劳工数量一直呈增长态势，而 1941 年则有所下降。这也正是伪满洲国自 1941 年开始加大在东北地区征派劳工的主要原因。

（三）华北劳工在东北劳动地分布

华北劳工被输送到东北后，被分散在当时伪满洲国的各省。

1936～1941 年华北劳工在东北劳动地分布情况表①

省/年度	昭和 11	昭和 12	昭和 13	昭和 14	昭和 15	昭和 16	合　计
关 东 州	98 056	76 530	115 862	170 008	169 404	185 360	815 220
奉 天 省	102 351	88 219	153 671	325 805	467 320	348 204	1 485 570
吉 林 省	42 088	32 680	39 892	96 267	154 858	87 898	453 683
滨 江 省	48 812	54 316	76 057	109 212	126 877	74 301	489 575
龙 江 省	10 975	12 536	15 533	22 806	29 428	14 792	106 070
安 东 省	22 187	14 508	23 228	29 646	36 795	18 612	144 976
三 江 省	10 161	5 490	9 530	19 390	36 475	21 198	102 244
黑 河 省	3 236	2 564	3 732	12 007	22 839	12 375	56 753
间 岛 省	1 691	8 136	6 001	22 980	24 063	11 515	74 386
通 化 省		334	6 872	33 751	50 768	22 451	114 176
牡丹江省	298	15 050	74 891	58 734	23 026	171 999	12 375
锦 州 省	13 887	18 383	30 286	51 478	79 696	62 503	256 233
热 河 省	6 082	5 710	9 573	16 857	15 784	8 488	62 494
兴安四省	4 623	3 985	5 399	11 486	22 202	10 986	58 681
东安北安				15 564	69 463	47 500	132 527
合　计	364 149	323 689	510 686	1 012 148	1 364 706	949 209	4 524 587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1941 年与 1936 年相比，在东北处于内地一些省份使用劳工的数量虽然也有很大增加，但边境地区如牡丹江、东安、北安等省的劳工数量却是从无到有，数量增加的比例远远高于内地的省份。而边境地区没有大的厂矿，可以推断，所增加人员主要是用于修筑边境要塞等军事工程。

二、东北劳工

（一）东北劳工的数量

关东军从 1934 年开始在东北用欺骗的手段招募劳工，用于军事工程建设。但目前尚未发现 1934～1937 年使用伪满洲国内劳工数量的统计资料。参照伪满民生部 1938 年的统计资料，1934 年至 1937 年每年使用的“国内”劳工数字按照 1938 年使用人数的一半推算，这 4 年使用的“国内”劳工数量至少超过 150 万人。

1938 年至 1945 年 7 月使用东北劳工的数量是：

1. 1938 年即“康德五年度国内普通劳动者登录数”为 559 732 人。②

① 〔日〕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庶务部劳务室：《北支劳动力ノ对外移动状况》昭和 17 年 11 月，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 2024/2/401。

② 满洲帝国民生部：《民生年鉴》，康德五年度，第 52 页。

2. 1939 年，经劳工协会对“国内劳动者招募”的劳工为 493 577 人。[①]

3. 1940 年，伪满洲国从国内募集的劳工数量为 387 966 人。[②]

4. 1941 年，日伪加大了在“国内”募集劳工的力度。据伪满洲国 1941 年 12 月调查：本年招募的劳动力，一般劳工为 192 万人。[③] 扣除当年由华北输送到东北的劳工 94.9 万人，在东北当地征调的劳工为 97.1 万人。

5. 1942 年至 1945 年 8 月招募与征派劳工的数字，没有找到当时的历史统计资料。据原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战犯古海忠之 1954 年 6 月 3 日笔供的概数：“1942 年 100 万人（其中供出劳工 35 万人）；1943 年 120 万人（其中供出劳工 50 万，勤劳奉公队 5 000 人）；1944 年 130 万人（其中供出劳工 60 万人，勤劳奉公队 2.5 万人）；1945 年 160 万人（其中供出劳工 60 万人，勤劳奉公队 15 万人，截至 8 月 15 日是 8 万人，勤劳奉公队累计 14 万人）。”[④]据此，1942 年至 1945 年 7 月（1945 年按半数计算），在东北征调劳工及勤劳奉公队员为 430 万人。

另据原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战犯武部六藏供述征调的勤劳奉公人数是：“1943 年动员了 6 万青年，令他们平均从事 4 个月的劳动。1944 年动员了约 20 万人，1945 年预定动员 30 万人，后因日本投降而停止。”[⑤]按照武部六藏所供述的使用勤劳奉公人数，比古海忠之多出了 27 万人（1945 年按半数计算）。即 1942～1945 年使用的东北劳工人数为 457 万人。

武部六藏供述的勤劳奉公人数得到了其他日伪战犯的佐证。据曾在各省任职的伪满官员供述：1943 年至 1944 年，伪滨江省每年供出劳工为 6 万人，勤劳奉公队 7 万人；伪四平省每年供出劳工 4 万多人，勤劳奉公队员 4 万多人；伪三江省每年供出劳工 3 万人；伪吉林省每年供出劳工 5 万多人，勤劳奉公队员约 3 万多人；伪国民勤劳部首任部长兼勤劳奉公队总司令于镜涛也供认：“1945 年 3 月勤劳部成立以后，由民生部移交来的计划是，1945 年预定供出 180 万人，4 月份各地已供出 10 万人。勤劳奉公队的供出数，民生部的计划是 30 万人，第一期供出了 7 万人。”[⑥]此外，原满洲中央银行经理部用度课参事金弘田记于 1946 年 8 月 20 日汇集的伪满洲国劳动动员统计表记载的数字也大大超过了古海忠之所述的数字。该表记载：1943 和 1944 年伪满“建设关系”、“特殊工厂”、“军用工厂”、“军建设关系”等使用的劳工数量，分别为 280 万人和 330 万人。[⑦] 按照该表的统计，这个数字去掉当年从华北等地进入东北的劳工和日本人勤劳奉仕队的数量，在东北本地征集的劳工分别为 190 万人和 255 万人。两年相加共高出古海忠之所述数字达 195 万人。从两份资料形成的时间上看，后者比前者早了将近 8 年，制表者系伪满中央银行经理部“用度课”的参事，其数字应该更为可信。

这里仅按照武部六藏供述的 1943 年和 1944 年勤劳奉公队的人数计算，从 1934～1945 年，日本从东北征派劳工的总数即达到 790 余万人。

（二）东北劳工来源地分布

1934～1938 年，关东军在东北用欺骗的手段招募劳工，以及最初用强制手段征用劳工，主要是在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但其分布还是相当广泛的。从 1938 年日伪在东北各地招募的劳工情况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

① 满洲帝国民生部：《第三次民生年鉴》，第 51 页。

② 《满洲矿工年鉴》，昭和 17 年 9 月版，第 93 页。

③ 伪满劳务司、劳务兴国会：《劳动者就劳状况调查表》，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 1991 年 4 月版第 945 页。

④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 1991 年 4 月版第 861 页。

⑤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第 856 页。

⑥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第 874、879、881、894、895 页。

⑦ 吉林省档案馆藏档案，282－41。

康德五年度国内劳动者普通登录者数[①]

新京特别市	32 924	滨江省	53 890	奉天省	270 467	间岛省	11 480
吉林省	27 569	通化省	16 134	龙江省	11 013	安东省	30 154
黑河省	1 205	锦州省	32 646	三江省	43 150	热河省	911
牡丹江省	28 189	合　计	559 732				

另据前述《劳动统制本年对策大纲》中的记载,1940 年伪满劳工协会决定当年从伪满洲国境内募集的 50 万劳工,其分布情况是:热河省 7 万人,安东省 5.9 万人,锦州省 10 万人,奉天省 16.1 万人,吉林省 5 万人,其他省 6 万人。但随着各军事工程对劳工需求量的增大和行政供出手段的简便有效,很快在东北绝大部分省份设置了劳工募集和管理机构,开始普遍征派劳工。1940 年 5 月,伪满洲国下令各省设置地方劳务行政机构,奉天省、吉林省、热河省、滨江省、锦州省、安东省、三江省、通化省、北安省在民政厅内设立劳务科;牡丹江省、东安省、黑河省在官房设立劳务科。[②] 可见已经将征派劳工的范围扩大到东北各地。到日本侵占东北后期,即使是人烟比较稀少的边远地区也不能幸免。例如位于内蒙古东部的突泉县强征劳工的情况是:"1942 年 4 月,伪县公署在各村征集 500 名劳工,去锦西县修筑战备工事。1943 年 5 月,县动员股强制征集 500 名劳工,去白狼山、阿尔山一带修筑战地工事。同年 6 月,县动员股征集 300 名青壮年,组成'勤劳奉公'队,在黑河一带修筑战备工事。1944 年 7 月,伪县公署强抓 500 名劳工,征集 600 名'勤劳奉公'队,分别去海拉尔、白狼沟修筑战备工事。1945 年 6 月,县动员股征集'勤劳奉公'1 020 人,去哈尔滨南部的拉林;强抓 500 名劳工去海拉尔修筑防务工事。"[③]可见日伪在东北征派劳工的普遍性。

三、特殊劳工的数量

被输送到东北的特殊劳工,大部分没有被华北和东北的日伪劳工管理部门统计在内。这是因为在 1943 年末之前,这些战俘集中营是由日军直接管理的,其输送与使用都由华北日军和关东军直接经手,直到 1943 年末华北劳工协会才直接参与对各战俘集中营的管理。[④] 因此,在 1943 年末以前由华北输送到东北的统计的劳工数字中,并不包括特殊劳工的数量。根据专家推算,被押送到东北的特殊劳工(含由俘虏组成的"辅导工人"和由抓捕百姓构成的"保护工人")总数至少在 20 万人以上。[⑤] 由此推算,1934～1945 年从华北输送到东北的劳工总数至少超过 780 万人。加上在东北本地征派、抓捕的劳工,1934～1945 年,日本在东北奴役中国劳工总数超过 1 500 多万人。

四、要塞工程的劳工数量

关东军在中苏、中蒙边境修筑军事要塞到底征用了多少劳工,现已无完整的档案资料可查。但根据战后审判日伪战犯的资料,可基本搞清关东军在要塞奴役中国劳工的概数。

(一)1934～1939 年的劳工数量

关东军从 1934 年开始使用中国劳工在中苏边境修筑要塞。这个时期每年由华北进入东北的劳工数量,如前所述,已有伪华北劳工协会和满洲劳工协会的统计。然而,要计算出要塞劳工的数量,还要考虑历年华北劳工滞留在东北的人数和日军使用东北本地劳工的数量。

据曾任伪满民生大臣的谷次亨供述:从 1933～1936 年由华北来东北的劳工每年大约有 80 万人。其中"大约四分之一从事军事工程建设,四分之三是在各工厂、矿山、铁路等部门劳动。这 80 万劳工

① 满洲帝国民生部:《民生年鉴》,康德五年度,第 52 页。

② 满洲帝国民生部:《第四次民生年鉴》,第 70 页。

③ 《突泉县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8～19 页。

④ 李扬、何天义:《日伪华北劳工协会的罪恶史》,载《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第 10 页。

⑤ 解学诗、松村高夫主编:《满铁与中国劳工》,第 122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 10 月。

可分为固定性40万和移动性40万两种。所谓固定性劳工，就是长时间在一个地方干活的劳工；移动性劳工，是春天来东北干活，工程结束便返回原地或到另一个地方干活。"①按照谷次亨的估计推算，这个时期每年在军事要塞使用华北劳工的数量约为20万人。

谷次亨所说从1933～1936年每年从华北进入东北的劳工数80万人的数字，与前述表1中伪华北劳工协会和满洲劳工协会的统计有一定出入。那么，从1934～1939年这6年中，能否得出谷次亨所说的每年约20万华北劳工用于军事工程的结论呢？在前述表1中，根据伪华北劳工协会和伪满洲劳工协会的统计，自1934～1939年，6年内由华北输送到东北的劳工数量达323.5万人，平均每年为53.9万人；但如果加上历年滞留在东北的关内劳工和东北本地的劳工数量，平均每年用工总数至少在80万人以上。按四分之一的比例推算，并参照1940年后在军事工程中使用的劳工数量，从1934年至1939年平均每年使用劳工20万人左右，6年使用120万人左右是可以确认的。

（二）1940～1945年的劳工数量

据曾任伪满国务院总务次长的古海忠之证实："由1940～1941年，由于实行北边振兴计划，每年供给关东军的劳工30万人，共计60万人。由1942～1945年，每年供给关东军30～40万劳工。根据以上推算，总共供给关东军的劳工有200万人。这个数字是比较可靠的。"这个证实笔录，得到了被证实者原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的认可。②

综上所述，自1934年至1945年8月，关东军在东北各要塞等军事工程中共奴役劳工至少在320余万人。

第三章　对劳工的奴役与迫害

第一节　劳工的生活条件

一、劳工的输送

东北地区铁路交通比较发达，日军以各种手段将劳工集中后，一般都是通过铁路将劳工输送到各个劳动地点。华北的劳工有的直接用火车输送到东北，也有的先用船由青岛等地运送到大连，再利用铁路进行输送。在春季劳工输送比较集中的时候，满铁等部门还组织劳工专用列车，将劳工从募集地直接输送到厂矿集中的地区或接近要塞工程的地区。据满铁所办《协和杂志》1941年3月在第285号刊发的新闻《济南——牡丹江劳工专用列车运转》中报道："因本年度计划从华北进入满洲的工人人数为110万，为保证运输，会社和华北交通等运输机构合作，采取以下紧急措施……经山海关：2月17日起，山海关——牡丹江除由货车已编成的一辆列车外，在现有的旅客列车上平均每天加挂15节旅客客车。为扩大输送能力，在3月的入满高峰期，还增发一辆天津——奉天间的临时列车；经大连：2月10日起，除大连——哈尔滨编发的10节往返临时列车外，根据华北形势需要，对鞍山、本溪湖、抚顺、西安、通化、齐齐哈尔等地区每天在定时货车上加挂10节货车运送。"牡丹江距离东宁、绥芬河要塞很近，也是通向鸡东、密山、虎头等要塞的中转站，因此可以判断开往牡丹江的劳工专列中，大部分是向这些要塞工程输送劳工的。

不管是专用列车还是临时列车，劳工乘坐的列车绝大部分是运送货物的封闭式闷罐车。招工的

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4月版，第876页。

② 中央档案馆战犯档案119-2-5，武部六藏证据第7号，查讯证人古海忠之的笔录及武部六藏签字，1955年5月22日。

日伪公司为了节省成本,每节车厢内塞进几十人、上百人。为防止劳工逃跑,在劳工上车后立即将门反锁。由于运输时间长,吃、睡、大小便全在车上,车内污浊不堪,加上劳工被抓捕或骗招心情忧郁,造成许多劳工生病甚至死在运输途中。据曾在伪安东省民生厅动员科主管劳工供出的张子舟回忆:"1942年,有一次我代表安东省长到安东车站,对集合完了的由各市县供出的劳工讲话。当时的情形是:各个劳工背着一个小小的铺盖卷,蹲在站台上,神色不安,好像要上法场的犯人。更有大部分劳工的家属(大部分是劳工的父母、妻子),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掩面而泣,警察、宪兵挥动着木棒四下驱逐,一种凄惨情景令人不忍目睹。"伪满官吏和日本军官训话后,"就由劳工使用人率领装上闷罐车,铁门上了锁,就这样像装猪似的装上,在闷罐车里大小便、吃饭、睡觉,到了换车站停下来就是两三天,有的要这样走十天半月,不等到工作地点就死了许多。"①



日军用闷罐车运劳工

为了防止劳工将传染病带到劳动地点,关东军有时对劳工采取某些"消毒"措施。据曾在五岔沟修筑要塞的劳工幸存者吴月庆回忆:1945年春,他和几百名被强征劳工的乡亲们被带到了沈阳站附近的抚顺客栈集合,第二天押上了闷罐车,一路向北开了两天两夜,到了王爷庙火车站。下火车时正下着大雪,看见地上摆着几口大锅,烧着火,"我们都以为里面蒸着窝窝头或大饼子之类吃的东西,哪知道,有个翻译过来说,中国人身上有虱子,让我们将衣服脱下来。我们脱下衣服后,他们把衣服都放在笼屉里蒸,也不让我们进屋,就在雪地上赤身站着。等衣服取出穿上后,刚开始觉得热乎乎的很舒服,然而过一会儿,衣服便结上冰,抬手都抬不起来了。随后,我们又上了车,把我们拉到了兴安南省五岔沟。"②家住瓦房店的幸存劳工刘俊清也有同样的遭遇。与他一同去五岔沟的五六百劳工刚到那里,日本人便命令劳工们把衣服全都脱下,放在蒸笼里蒸,称为"消毒"。③ 伪满《大同报》报道称:鉴

① 张子舟:《我与伪满劳工供出》,载孙邦主编:《伪满史料丛书·经济掠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65~466页。

② 吴月庆口述资料,2002年6月3日,李秉刚存。

③ 刘俊清口述资料,2003年,李秉刚存。

于海拉尔天然痘之流行,"赴海拉尔劳工,劳协令一律种痘"。① 但真正享受到预防注射的劳工微乎其微,并且在恶劣的生活条件和繁重的劳动条件下,即使做了某种预防注射的劳工也难免得传染病。李德贵于1943年被征派到五岔沟当劳工,刚去时打了一次预防针,但不久便染病发烧,靠同伴的帮助和用喝辣椒水发汗的土办法自救,才逐渐恢复。②

被押送到一些绝密工程的劳工,关东军为了保密,在运往工地过程中还要将劳工用黑布蒙上眼睛。据劳工幸存者尹德田证实:"1943年到阿尔山去出劳工,我被分到236部队,地点在阿尔山车站南两公里。火车运来军用物资,有时也派我们去搬运,经常看到从闷罐车里出来的人,眼睛都用布蒙着,前边有人领着下火车。"③还有许多当地百姓在晚间看到被蒙上眼睛的劳工,由日军押送着一车一车地送往工地的情形。

二、劳工的居住条件

在各个要塞劳工驻地,劳工们住的都是就地用苇席或茅草搭起来的棚子,即使是在最冷的黑龙江北部地区,也仅仅是在两层席子之间夹一层油毡纸。④ 劳工棚子一般都搭建在工地附近,在一些绝密工程中,劳工棚四周还设有铁刺网,旁边设有日军岗哨或狼狗圈,以便于日军监视,防止劳工逃跑。席棚子呈长筒形,两头留门,中间是过道,两面离地一尺多高搭成通铺,还有的就地铺上些干草,人就睡在地铺上。被征派到东宁老城子沟的榆树县劳工杨德宽因睡地铺落下小便失禁的毛病,劳役结束回家后几个月还尿炕,直到晚年也不敢着凉,落下了终身疾病。⑤



劳工棚四周的铁丝网

① 《大同报》,1940年3月2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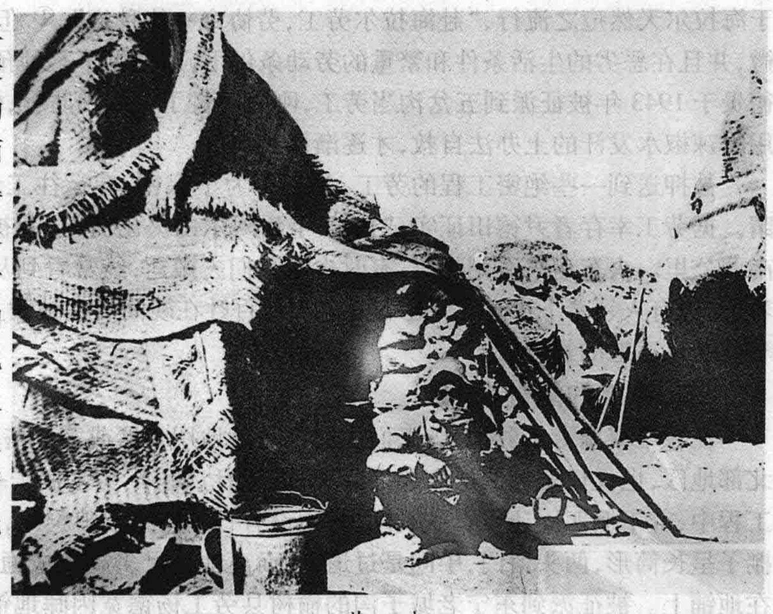
② 李德贵访问录,2003年,李秉刚存。

③ 尹德田:《不能忘记的血泪史》,载中共兴安盟党史办公室编:《侵华日军在兴安盟罪行录》,1995年8月内部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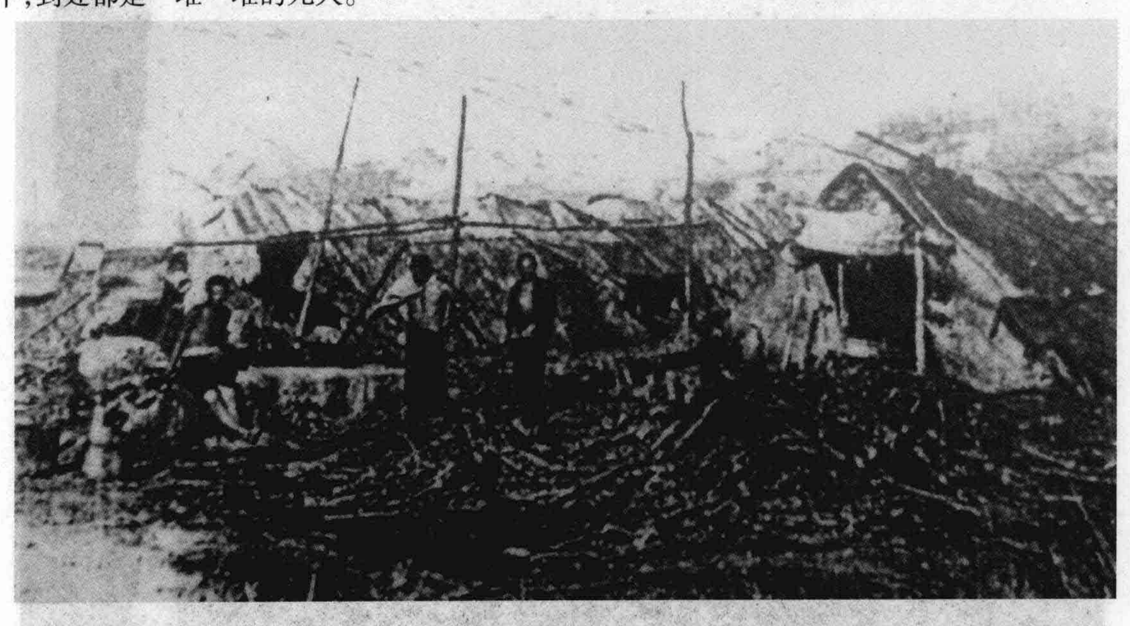
④ 王树熙访问录,李秉刚存。

⑤ 张凤鸣、王敬荣主编:《残害劳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60页。

每个劳工棚子里住几十人、上百人不等。席棚子十分简陋，夏天外面下大雨，棚子里下小雨，劳工的被子湿得无法用。铺上返潮，地面积水，加上蚊虫、虱子、跳蚤叮咬得人们无法入睡，大多数劳工身上长了疥疮，浑身流脓水。冬天工棚子里如冰窖，有的工棚即使有取暖的炉子或烧木头的火堆，但要塞都地处北部寒冷地区，住几十人、上百人的工棚子里燃起一两个土炉子或火堆无济于事，薄薄的工棚难以抵挡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冻得劳工无法栖身。由于劳工棚子十分密集，有时还因取暖失火造成劳工大量伤亡；或建在低洼处的劳工棚子在山洪暴发时被冲垮，大批劳工被水淹死。1938 年，在东宁修铁路的劳工中，因"河水上涨，一场大水把西浦组的人大部分都冲走，淹死了。水下去以后，河套两边，柳毛树丛中，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死人。"①



劳工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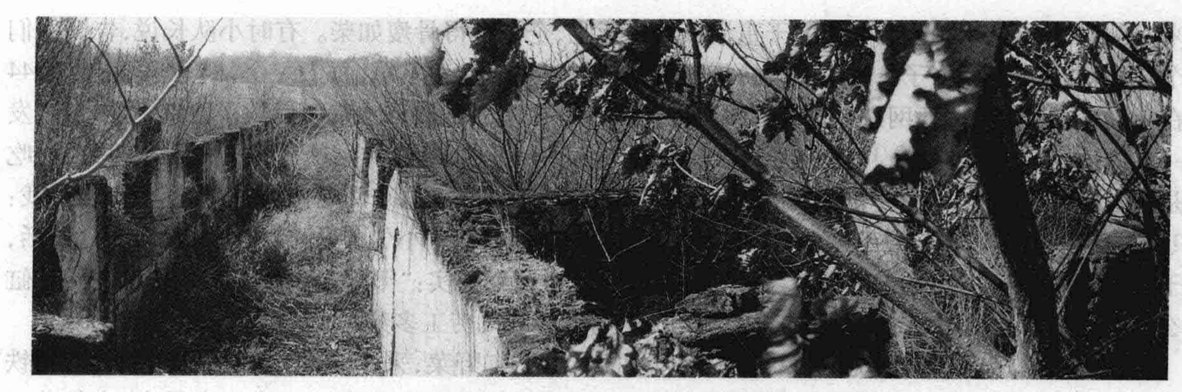


劳工棚

工棚子一般都是由首批到达的劳工搭建，前面所述吴月庆等劳工到五岔沟的头一件事是搭工棚子。"地上都是雪，扫扫雪就搭。三天后工棚才搭完，共有 10 多个，每个工棚住 100 多人，总共有 1 500多劳工。棚子不高，有个劳工在棚子里烧火御寒时不小心把棚子点燃了，日本工头过来将劳工们毒打了一顿。"劳工张树海到乌奴耳后也是"首先搭席棚子，每个小队住一个席棚子，中间是过道，两边板铺上住人。当地气候冷，外面地表都冻着，棚子里稍暖些，一化冻就有水，能没到脚脖子了。"②

① 高晓燕主编：《东宁要塞》，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 6 月版，第 85 页。

② 吴月庆、张树海访问录，李秉刚存。



东宁要塞勋山阵地劳工棚旁的狼狗圈遗址



劳工穿的用水泥纸袋做的衣服

三、劳工的衣食条件

（一）劳工的行装

被输送到要塞的劳工，只有勤劳奉公队和很少一部分劳工能领到一套衣服、一双鞋，绝大部分被征派和抓捕的劳工，行李服装完全自备。劳工们晚上睡觉没有铺盖，只好找些破草袋子、纸袋子盖在身上。由于劳动强度大，劳工所穿的衣服很快就会破碎不堪，因而夏季大都赤身裸体，春秋和冬季只好用装过水泥的纸袋子御寒。据劳工幸存者王树熙证实："冬天穿的是临行发的棉衣，没几天就破了，兴安岭零下三四十度的气候下根本无法御寒，劳工们只好往身上裹水泥袋子，走路得倒退着走，不敢迎风走；到了夏天，劳工都只穿条裤子，赤着上身，有的干脆一丝不挂，反正方圆五六十里内没有人家。"①由于各要塞工程都大量使用水泥，装过水泥的破纸袋子几乎成了每个要劳工都普遍使用的"衣服"，当地百姓称这些劳工为"纸人"。身上的"衣服"可以对付，脚下的鞋却是很大的问题。鞋磨破了，光脚走石子路干活，许多劳工因而脚部划伤或冻伤。1942 年夏天，伪满三江省省长卢元善视察富锦县劳工时，见劳工们"都光着脚在碎石子上走，脚磨破了，出了很多血，这些劳工一齐给我跪下，哀求发给鞋子穿。"②



东宁劳工穿过的麻袋片

（二）劳工的饮食

要塞劳工的伙食一般为粗制的高粱米或玉米面粥、橡子面等，基本上没有蔬菜，有时能吃到一点咸菜或盐豆，伙食质量极为低劣。更主要的是数量不足，劳工们普遍吃不饱，不得不忍受着饥饿的煎熬。

据劳工幸存者吴月庆回忆：在要塞工地，日本人给我们吃的是

① 王树熙访问录，李秉刚存。

②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 年 4 月版，第 881 页。

苞米面稀粥,稀得比水稍强些。劳工干重活不给饱饭吃,个个饿得骨瘦如柴。有时小队长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今天吃大饼子!所说的大饼子只有一手长,一指厚,手掌宽,每人一个,根本吃不饱。1944年在乌奴耳当劳工的锦西网户屯刘庚起因为每顿都喝稀粥,有一次将稀水喝下后数了数碗中的米粒,发现一碗稀粥只有87个米粒。[①] 被征派到珲春的劳工幸存者于洪义到达地点后,看见先到达的劳工"吃的是橡子面,我刚去时见到这样的伙食就问其他的劳工:'咱们就吃这东西啊,能吃饱吗?'他们告诉我:'只能是这些,就这还不管饱呢!'事实正如他们所说的,一顿只给一小勺,饿得劳工根本没有力气干活,可干不动又得挨打,只好咬着牙拼着命干。"劳工幸存者黄文喜证实:"干那么重的活每顿仅给吃一茶缸那么多的小米粥,说是小米好听点,其实三分之二是谷子。死的劳工多数是饿死的。"

劳工们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只得四处找吃的,"山上有野菜,采来就吃,夏秋时捉些蚱蜢,用铁丝串成一串,生火烤着吃,这是饥肠辘辘的劳工们心目中最美味的大餐了。日本人有马房,有的劳工晚上利用上厕所的机会也去偷吃喂马的豆饼。"特殊劳工幸存者武永和证实:由于日本人不给我们足够的食物,饿得直不起腰来,我们只好吃野菜树叶。张树海证实:"山上有一种草开黄花,辣乎乎的,大伙就偷着捋黄花吃,并给这种草取名为'山茴菜'。日本人看见哈哈直笑,说'中国人马的一样'。我们吃的是草啊!"

有的劳工实在饿得受不了,竟然到炼劳工尸体的地方吃烧过的尸体。肇东农民冷凤仪1944年冬替哥哥到虎林出劳工,每天挑沙石修路,由于活累,吃不饱,正是冬天,也找不到野菜充饥,实在饿得受不了。一次看到几个劳工正在火化一个死难劳工的尸体,便不由自主地走过去,拎起一只大腿就吃起来。"看炼尸的劳工都愣住了,过了一会向我大声喊:'别吃,药着!'我不听,他们动手打我,我还是拽住死尸大腿往下撕肉,狼吞虎咽地吃着。他们看我真是饿急眼了,不忍心打我了,我就吃了个饱。"[②] 这是关东军的严酷统治和奴役给中国劳工造成的人间悲剧。第二年夏天,冷凤仪也病倒了,如果不是日本战败投降,他也难以活着离开虎林。然而仅仅10个月时间,同他一起被征派到虎林的500多劳工,光复时只剩下100多人,其余都被残害致死。

劳工们很少能喝到菜汤,有时能喝到蒸窝窝头锅里剩下的水,更多的情况下是冬天喝雪水,夏天喝山沟里自然流淌的水或坑中的死水,劳工们常常腹泻、中毒、发生疾病甚至死亡。曾被征派到乌奴耳的劳工幸存者孙巨田回忆说:喝山沟里的水"就像喝酒醉了,迷糊,坏肚子。刚去第三天,有一个屋都是重病号,60人死了29个。"[③]

第二节 劳工的劳动条件与待遇

一、劳工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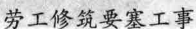
在各要塞工程中,劳工们基本上是天亮就出工劳动,天黑才返回住处,劳动时间都在十几个小时,夏天的劳动时间更长。劳工张玉甫说:"每天得从天亮干到天黑,夏天天长,一干就是十八九个小时。干活时稍微慢了点,监工的棍棒、枪托劈头盖脸地打来。"劳工们称劳动时间是"三九点",即凌晨3点起床,晚上9点睡觉。冬天的劳动时间也很长。据曾被征派到乌奴耳附近免渡河的劳工幸存者黄文喜证实:"日本人为赶工程进度,不管多么冷的天,逼迫我们早上7点多开工,一直干到天黑,在八月节前后都下雪了,还点着灯摸黑干活。"而在山上修筑工事的劳工,在"浇灌水泥时不分昼夜,加班加点地干"。

① 陈耿秋:《伪满劳工的遭遇》,锦西文史资料第2辑,1984年内部版,第6页。

② 冷凤仪:《我当劳工的遭遇》,载《肇东文史资料》第1辑,第37页。

③ 孙巨田等访问录,李秉刚存。




劳工修筑要塞工事


劳工修筑要塞工事

劳工每天的劳动一般都有定额。黄文喜被分配筛沙子,“一起干的有 10 个人,规定每人每天筛 10 立方米。由朝鲜人当监工,用木板钉的一个框作计量,装满是 1 立方米。我们将沙子倒进去,满了后叫监工来看,合格便将木框取下放一旁接着装。如果监工故意刁难,装满也不许取,我们还得继续往里倒,直到他们满意为止。”如果完不成定额,就会遭到监工者的毒打。1944 年被征派到五岔沟当劳工的刘俊清证实:“我们这批劳工有五六百人,分到一个作业场。上工时,要先扛上一袋水泥往山上走,到干活地方有半小时路程,上些年纪的劳工有的扛不动,日本监工拿着洋镐把便打。”①


劳工在日军监视下修要塞工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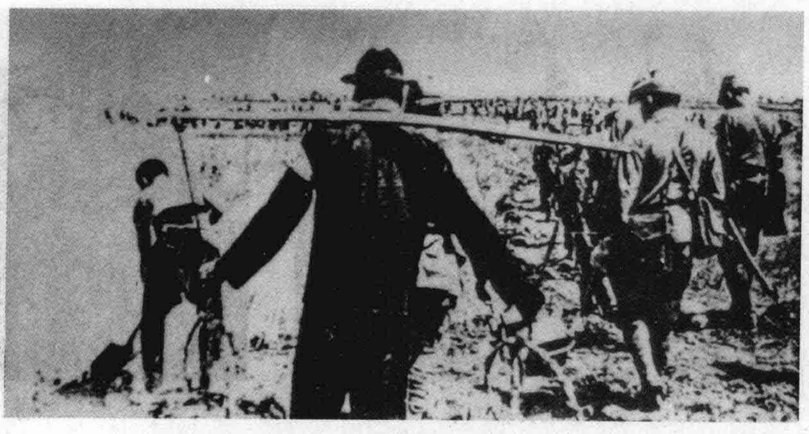
曾任伪四平省省长的曲秉善证实:劳工在山里为日军修道路、修兵舍、修仓库和修飞机场,每天都吃不饱,活儿又累,天一亮就被赶出去做工,一直到天黑才收工,要是去的稍微晚一点,日本兵就用枪把子打和用脚踢,做工稍微慢一点或者休息时间稍微长一点,日本兵也过来打骂。有病不给治也不让休息,还得和平常一样去做工。自己穿来的衣服破了,也没有人过问,都得光着身子干活。冬天都披着破麻袋或破洋灰袋子纸御寒。② 劳工劳动时间长、强度大、缺衣少食是普遍现象。

---

① 黄文喜、于宝钧、高殿太、于俊清访问录,李秉刚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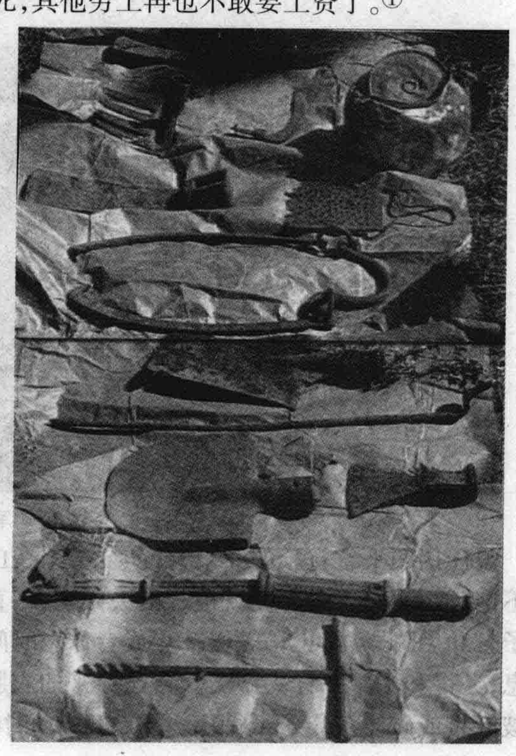
② 曲秉善:《伪四平省人民受奴役的实况》,载孙邦主编:《伪满史料丛书 · 经济掠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年 12 月版,第 487 页。

二、劳工的“工资”待遇


劳工修筑要塞工事

大批被征派的劳工、勤劳奉公队员或被抓捕的劳工，他们被输送到各要塞工程，完全是无偿的劳动，得不到任何工资。只是在初期一些被骗招的劳工，有的得到一点微不足道的工钱。例如各包工组在骗招劳工时给一二十元伪币，其目的是为了诱骗更多的人上当。这些劳工在预定的劳动期满或因天冷无法施工时，有的包工组发给幸存者一点工钱，但即使给也是少得可怜。例如劳工贾满顺被西松组从张家口骗招到东宁，招工时给了10元钱，在东宁干了5年分文未给，连回家的车费也没有，最后只好在当地落脚。1941年春高岗组把头马厚林以每天三四元工资为诱饵从安东招了200名劳工到虎林施工，到10月工程期满才给每个幸存劳工15元；陈文林等劳工被大野组骗到虎头修路，干了一年只得到30元；1942年同样是在大野组干活的孙同修等人在虎林干了一年苦役，只发给每人5元钱，并且不负责往原地送回。孙同修等无钱回家，只好流落在虎林谋生。高岗组一青年向大把头马德良索要工资，马德良操起一个带钉子的木板，当众把这个青年活活打死，其他劳工再也不敢要工资了。①


虎头要塞劳工使用的各种劳动工具


东宁要塞劳工使用过的各种劳动工具

① 刘翰章：《虎林伪满劳工初记》，载孙邦主编：《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508页。





虎头要塞劳工使用的不同规格的尖镐



劳工修筑观月台武藏山要塞道路的压道碾子

第三节 对劳工的迫害与劳工的反抗

一、对劳工的监视迫害

无论是被骗招的劳工，还是被征派的劳工、勤劳奉公队员，一到了要塞工地都要受到日军的严密监视，以防止劳工逃跑。在一些绝密工程中，劳工住处四周还要围上铁刺网甚至电网，设置日军岗哨和狼狗圈，以监视劳工，防止劳工逃跑。“每个劳工棚子里两头都各设一个站岗的，专门看守我们。为防止逃跑，还命令我们都脱光衣服睡觉，连出去大小便时也不许穿衣服。”①劳工上下工有日伪军警押送，还有的要塞甚至在劳工上下工的途中也要戴遮住眼睛的“黑帽子”，劳工们左手牵一条绳子，右手拿着工具，由日本人押着上下工，以防止劳工了解要塞的秘密。据劳工梁德云证实：“我们每天走的路都是一人多深的沟，收工时得把眼睛蒙上，手拉手，后面有日本兵端着枪跟着，草甸子有日本兵端着上刺刀的枪在上面押解。……我们所有活动——吃饭、睡觉、干活都在日本鬼子的监视之下，没有一点自由。”②



日军用机枪监视劳工

在劳工施工地周围，常有日军小队巡逻，防止劳工逃跑。在施工现场则有日本人或雇用的朝鲜人（劳工称之为“二鬼子”）监视劳工劳动。据劳工张树海证实：他们刚开始到乌奴耳施工时，日本人的监视还不很严厉，“到了七八月时，派来个戴眼镜的日本人，他对劳工更严了，每个坑设一个朝鲜人当监工，谁要是干活稍直一下腰就打。这时各工棚开始死人，有的大队只剩下不到一半人了。”高殿太证实：“干活时挨打是家常便饭，背着100多斤的水泥袋子往山上走，后面跟着手拿皮鞭的日本人和‘二鬼子’，看谁不顺眼上去就是一鞭子，边打边骂。有一天下雨路滑，我和一个人一起抬木头，不小

① 高殿太访问录，李秉刚存。

② 高晓燕主编：《东宁要塞》，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70页。

心滑倒了，日本人过来不由分说就狠打了我一顿，晚上还不让我吃饭。”劳工黄文喜亲眼目睹过一个劳工被打死的惨剧。他说“和我对面一起筛沙子的是彰良村的一个小伙子，他就是因为水土不服肚子疼，干活时忍受不住了，停下来想歇会。监工走过来手持镐把不由分说一顿狠打，打完后还逼他接着干。第二天早上，我便看见他的尸体被抬出了工棚。”另据阿尔山幸存劳工方德财介绍：“有一次我们集合晚了，日本人叫劳工立正站着，互相打嘴巴子，叫什么‘协和’嘴巴子，就是两个劳工面对面站着，你打我一个嘴巴子，我打你一个，打轻了不行，若有一下打轻了，就得再互相打三下，日本人在一旁看着哈哈笑。有一次，我拉电线，日本人说我跑得慢，拿起军刀就向我大腿刺来，当时刺入我右大腿内侧，把我刺倒在地，鲜血流满全腿。日本军人见我倒在地上，就用皮鞭打，让我起来。但我根本就起不来，他打了一气，见我真的无法干活了，只好走了。我用土堵住伤口，由另一个架线的劳工搀扶着回到工棚。第二天腿肿得老粗，半个月才慢慢消肿，但伤还没痊愈，只得又继续干活。”①



狼狗撕咬劳工

劳工们在日军的残酷奴役下，由于饥饿、劳累、疾病等原因，许多人身体无法支持，不能再为日本人卖命，日本把头、监工不但不给劳工治病，反而残忍地将劳工处死。劳工于洪义亲眼看到一个有病的劳工被日本监工举起来摔死，然后拖到狼狗圈喂了狼狗。劳工王树熙有个要好的伙伴叫杨林，原本在哈尔滨学徒，因奶奶有病，回家探视时路过沈阳站被抓，同王树熙一起当了劳工。后来杨林患了一种病，口鼻血流不止。“到第三天时，我去看他，监工来对我说：‘走，帮着把他抬到林子里去。’我眼瞧着杨林还没死，就给监工跪下，哀求放过他。但监工仍是命令人把杨林拖到林子里，铺上几层桦木，把他架在顶上，点燃桦树皮开始火化。一是杨林没有死，二是人被炼时肌肉收缩的反应，我看见杨林猛地从火中坐了起来。我悲痛地大喊着：‘小杨，你再也看不到你奶奶了’，可这又怎能挽救杨林的生命呢?”幸存劳工吴月庆也看见“有的劳工病倒了，还没有死，就被架上木头烧，那人还在喊：‘我还没死呢！救救我！’可是谁敢去救啊，日本兵牵着狼狗端着枪在一旁监视着，谁要上前去就用刺刀挑。大家只好眼看着这个劳工被活活烧死。”还有许多劳工因病重无法再为日军卖命而被活活扔进“万人坑”。② 还有的劳工或因病、因伤或因逃跑，被日军残忍地将其双腿锯断，折磨致死。仅从东宁劳工坟中发掘的18具尸骨中，就有4具尸骨的双腿从小腿处被齐齐锯断，可见对劳工迫害之残酷。

被日军抓到边境要塞的劳工，往往是有去无回。即日本人残酷奴役这些被抓到边境的劳工，除了病死、累死或因保密被残杀、毒害而死的之外，只要还有口气，就得服苦役，绝不放回。1944年从沈阳被抓到瑷珲县大城的王树熙等300多人，一直被奴役到光复，一年多时间仅有29人生还。原住安东东沟的谷振斌于1939年被抓当劳工后，一直毫无音信，家人以为他早已经不在人世了。1945年农历腊月二十八，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的谷振斌突然回到家中。原来，他被日军抓到黑龙江省虎头要塞当劳工，同伴相继被折磨而死，他却顽强地活了下来，直到光复后沿路乞讨，历时近半年才回到家中。瓦房店木工厂的15名木工是1938年被抓走的，他们先后在讷河附近、佳木斯和海拉尔当劳工，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死去11个人，到光复时只剩下周茂胜等4个人几经周折回到家乡。③

① 张树海、高殿太、黄文喜、方德财访问录，李秉刚存。

② 王树熙、吴月庆访问录，李秉刚存。

③ 谷庆斌之子谷永利及周茂胜回忆资料，李秉刚存。

二、劳工的反抗斗争

1937年9月，在孙吴平顶树修筑军用机场的2 000多名劳工，因日本人无故打死2名劳工，爆发了一场大罢工。在2名劳工惨死的第五天早上，劳工们拒绝出工。负责看守人员随即调来大批日军包围了机场，强令劳工集合，从劳工中抓出6人，当场将其中4人用刺刀挑死，将另2人拴在马后拖死；然后又抓走几十名劳工，这些人从此下落不明。日军以为这样就可以把劳工镇压下去了，但几天后的一个中午，五六百名劳工利用收工吃午饭的机会集体向西北方向逃跑。日军立即部署追捕，直到黑嫩线二站和大岭之间才截获了两三百人，其余劳工成功逃脱。这两三百劳工被抓获后，当天晚上被日军集体屠杀于逊别拉河畔。①

1939年8月，在虎林西岗修弹药库的2名清水组劳工，冒着生命危险逃到北山，已经奄奄一息，幸好被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3师补充团的战士发现得救。抗联官兵为解救苦难的劳工，经研究选出30名精悍的战士组成抢救小组，在9团团长和政委的率领下，于8月4日潜伏到西岗工地附近的庄稼地里；另由补充团团长李一平率领2个连于子夜前到工地接应。8月5日零时40分，抢救小组袭击了西岗日军劳工守备队，救出劳工180余人，同时打开仓库，让每人扛一袋面粉随队伍撤离。在撤离途中，因受到日军守备队和伪警察队的追击，失散60余人，其余110多人随部队回到了山里，参加了抗联。②

逃跑是劳工们反抗的主要方式。尽管逃跑一旦被抓回来就可能受到最严厉的惩罚直至失掉性命，但逃跑是劳工可能脱离虎口的唯一选择。劳工们为了死里求生，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逃出虎口。1941年7月1日，阿尔山日本宪兵分队长给关东宪兵司令官的报告中称："5月底到现在，发生劳工逃亡41件，计135人（已逮捕93人）；联合罢工2起……95人。"并称"这种现象还可能继续出现"。1942年7月2日齐齐哈尔日军宪兵分队长向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在霍黑线金水车站附近修建军用机场的高桥组张忠才、高永智等66名劳工，于6月18日和20日结伙逃走。③

据日本关东宪兵档案资料记载，在边境要塞工地，劳工逃跑事件屡屡发生，有时还是规模较大的集体逃跑。仅以昭和18年（1943年）为例：5月15日，在伪兴安南省五岔沟伊贺原组的"勤劳报国队"队员25人集体逃跑。④ 5月25日至27日，在北安第956部队大同组服劳役的约600名劳工中，逃跑了91名。⑤ 7月30日，在白城至阿尔山铁路线建设工地德伯斯一带满洲第956部队军事工程中，神谷组索伦现场的劳工36名逃走。⑥ 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伪黑河省嫩江县金水飞机场工程的劳工逃跑43人；12月29日至30日又逃走123名，两批共有166名劳工逃走。逃跑的劳工中，被霍龙门日本宪兵队逮捕33名。⑦

由于日军监视严密，多数逃跑者被捉回，受到监工更严厉的迫害，其中大部分被处死。据阿尔山劳工幸存者方德财证实："阿尔山的狼特别多，有一次跑了7个人，被狼吃了6个，剩下一个爬到树上没死，却让日本人抓回来了。大家都以为会放了他，结果夜里把人们都集合起来，让他站在中间讲是如何跑的，其他几个人是怎么被狼吃的。然后，日本人叫劳工们打他，谁不打他就得挨日本人打，就这

① 何尔华：《孙吴平顶树血案》，载孙邦主编：《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492～494页。

② 刘翰章：《虎林伪满劳工初记》，载孙邦主编：《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510页。

③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4月版，第970～971页。

④ 阿宪高第81号，昭和18年5月29日，吉林省档案馆，下同。

⑤ 孙宪高第286号，昭和18年6月3日。

⑥ 孙宪高第145号，昭和18年8月12日。

⑦ 孙宪高第561号，昭和18年12月15日。

样把这个劳工活活打死了。”还有的劳工逃跑被抓回来后，“日本人把他们的衣服脱光，让光着脚在雪地里跑，直到冻死，要不然就是打死。”①总之，对逃跑者施以酷刑直至处死以警告其他劳工，几乎是每个要塞工地都经常发生的事情。但尽管如此，仍无法阻止劳工的逃跑，许多劳工是通过逃跑才得以幸存的。

也有的劳工为了活命，打死监视的日本兵后集体逃跑。据东宁幸存劳工梁德云证实：1937年他和一些同乡在正月十五看秧歌返回时，被日军抓到东宁挖战壕。他在一次上厕所时亲眼看到对面山上日军正把已被集体杀害的劳工往事先挖好的大坑中埋，他所在的劳工队头头也说工程结束要给大家“开支”。劳工们为防止被日军集体屠杀的悲剧重演，在一次午饭后杀死监工的4名日军，集体向老黑山方向逃走。②

1943年，在东宁的要塞工地发生了43名特殊劳工集体暴动逃跑的事件（详见第四章第四节）。

第四章 特殊劳工

第一节 特殊劳工计划的形成



石家庄集中营的战俘劳工被日军押送到各劳动地点

关东军不仅在东北地区征派、骗招、强制招募普通劳工，还有大批从华北调集到东北的战俘、抓捕的抗日民众组成的特殊劳工，又称“特殊工人”。华北日军在向东北遣送特殊工人的计划中对特殊工人的界定是：“因犯罪嫌疑现正拘押于当地部队、宪兵队、县公署及警察分局等处者；通过清乡捕获的通匪嫌疑者；讨伐作战中的俘虏；有害于社会工作实施者；上项人员中品质不太坏并有劳动能力者。”③随着被输送到东北的特殊工人不断增加，1942年6月，由伪满民生部次长源田松三主持的一次会议决定，又将特殊工人分为“辅导工人”和“保护工人”。前者是指原抗日武装被俘人员，后者是指被日军抓捕的抗日民众和老百姓。但其处境没有什么区别，都属于特殊劳工。

1934年以后，关东军积极准备对苏作战，因此令驻在中国东北的各部队在“满”苏边境加强修筑各种军事工程，以强化其军事基地的配套设施建设。从战略目的出发，在伪满劳动力日益紧张的情况

① 方德财、吴月庆回忆，李秉刚存。

② 高晓燕主编：《东宁要塞》，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71页。

③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4月版，第936页。

下，关东军在大本营的支持下，采取了既可保证对苏作战计划的顺利实施，又可分散瓦解抗日力量的一石两鸟的恶毒措施，不顾国际公约对战俘的规定，从1940年起，关东军将华北日军抓捕的中国人战俘，经过俘虏收容所的一段拘禁训练后，源源不断地押解东北，分配到关东军各部队，在残酷的监管下，从事繁重的军工劳役。由于"特种工人"多为华北地区的共产党八路军和国民党部队的抗日军人，另有很少一部分投降兵也被收容其中。这些"特种工人"的绝大多数具有抗日意识，较一般劳工更具有反抗性。因此，关东军对"特种工人"在使役和管理上，也采取了极端严酷的防范措施。1941年6月11日，关东军司令部做出了关于《筑城工程就劳特殊工人处理规定》，对在边境筑城即修筑要塞工程及附属设施特殊劳工的使用管理做出了具体规定。该《规定》提出：在筑城就劳地点设置特殊工人收容所，并与一般工人隔离，周围设外栅，必要时设铁丝网，以进行监视；对筑城的特殊工人要建立名簿，记载特殊工人的姓名、年龄、身份、阶级、原籍、本国所属部队以及其他必要事项，附以照片、采取指纹；特殊工人如有不服从行为，得以监禁、绑缚和其他惩戒上必要的处分，发生企图逃跑的场合，以兵力防止，不得已时得以杀伤；特殊工人的就劳地点要避开国境线附近，原则上以采沙、碎石、运输材料和道路工程作业为主，严禁使用炸药、火器等危险品等。[①] 由此可见，特殊劳工是修筑边境要塞劳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要受到最严厉的监督管理。

1943年7月13日关东军司令部又颁布实施了《关东军特种工人处理规定》，[②]更加具体而残酷地体现出对"特种工人"奴役和镇压的宗旨。"规定"共七章三十二款。其中第三章《使役》、第四章《管理》和第五章《监视与警戒》，无不反映出对"特种工人"非人权、非人性的残酷使役、监禁和镇压。译文节选如下：

特种工人处理规定

关东军总司令部制定绝密昭和十八年七月十三日关总参——发第9222号特种工人处理规定

（第一章　通则、第二章　输送、第六章　经理、第七章　报告及附则　略）

第三章　使　役

九、特种工人在整个劳动期间，不拘过去身份地位，只按其各自特长技能服劳务。但准士官以上者通常可不直接就劳，可利用其指挥能力，作为第十三条所规定的对组织干部加以利用。

十、特种工人在使役上应尽量以宿舍为单位，选出工人中适任者为宿舍长，编成工人组织加以利用。部队长可令其作为指导员，并派所需有关管理人员，对工人之劳务作业进行指导。

十一、使用特种工人时，应选择适当之劳务场所及工作种类，特别注意保守机密。为此，应尽量避免让特种工人在电气设施、火药库等重要警护设施及其附近就劳。

十二、应尽量避免特种工人与一般劳务者一起或混合作业。

十三、被配属部队长指令特种工人就劳军需作业以外之其他劳务时，应向关东军总司令官提出申请，详细报告诸如事业主、劳务种类、场所及劳务期限等必要事项。

十四、前项涉及之劳务申请被批准时，被配属部队长应委托事业主承担特种工人之使役管理及警戒。同时，对其实施进行指导和监督并给予必要之援助。

第四章　管　理

十五、特种工人应依军队纪律从严管理，不得丝毫松懈。同时，要特别在思想上予以善导。并且，直接管理时，要以第十条规定之队组织为基础，令其实行自体管理，部队长应派所需有关管理人员担任指导和监督。

十六、被配属部队长应在作业地设置特种工人收容所，以对其进行管理。收容设施（具备照明、取暖），应与一般劳务者隔离并在周围设外栅等（必要时设铁丝网），以便于进行保护、管理和监视。

---

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4月版，第939～940页。

② 吉林省档案馆日本关东宪兵队档案315－7－692号卷。

十七、特种工人收容所应承制、保管特种工人名簿，并在该名簿上注明工人姓名、年龄、原籍、旧所属部队、所属党派、身份阶级、使役日期和其他必要事项，并采取指纹。

十八、部队长接受特种工人时，应立即对其实施防疫和身体检查，以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

第五章 监视与警戒

十九、对特种工人之监视和警戒，鉴于他们自身之素质及其经历，尤其应严格防止其逃亡和从事谍报与谋略活动。

为此，部队长应以必要兵力，直接对工人进行监视和警戒。另外还要与有关宪兵队密切联络，采取必要措施对工人之日常起居、言行进行监视和警戒。

二十、特种工人收发的所有电信、邮品，预先都要进行检阅。

二十一、犯特种工人罪或因不顺从及发生其他需要惩戒的行为时，可以加以监禁、制缚及其他必要之处分。此外，对企图逃亡者，必要时，可对其使用兵器。

二十二、特种工人应加戴一定标志，使其一见便容易与一般劳务者相区别。

第二节 特殊劳工的来源

被输送到东北的特殊劳工数量没有完整的统计资料。据伪满劳务司、劳务兴国会的统计，1941年7～9月被输送到东北的特殊工人为35 402人，其中用于军事工程的9 943人，地方部门25 459人。①

1941年末到1942年末，从石家庄集中营输送到东北的特殊劳工达9 686人，加上1943年输送到东北的劳工，石家庄集中营至少送往东北15 000余人。②

据柏叶勇一供述："1940年被日军俘虏后送到抚顺煤矿做苦役的中国抗日人员共4万余人……由于被虐杀和逃跑，最后剩下尚不足2万人。"③此外，分布在鞍山、本溪、阜新、北票、鸡西、西安（辽源）等地矿山和东北边境各要塞的特殊劳工，数量也相当巨大。

日军除了直接将华北特殊劳工运送到东北各要塞地点之外，为解决要塞劳工不足的问题，有时还把在东北各厂矿服苦役的特殊劳工临时调到边境地带军事工程中做苦工。据特殊劳工幸存者武永和、张克亮等回忆：1943年春，约500多名特殊工人由阜新煤矿被运送到虎林修军用道路，住在草甸子上用草席子搭起的马架子里，每天劳动12个小时以上。所修路段有的地方水深没膝，要用肩从远处扛来土块填上。有时想歇口气，日本兵见到了马上抡起铁锹打。由于活累，吃不饱，加上疾病，死了很多人。④ 到了冬天无法修路时，这批劳工又被运送到抚顺等矿山做苦工。1943年秋末冬初，由虎林、东宁、宝清、东安等要塞工程中向满铁抚顺炭矿转送的特殊劳工达5 264人。

---

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4月版，第945页。

② 何天义：《石家庄集中营始末》，载《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石家庄集中营》，新华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27页。

③ 《柏叶勇一口供》，1954年11月30日，中央档案馆战犯档案119－2－1。

④ 傅波主编：《罪行、罪证、罪责》，辽宁民族出版社，1995年6月版，第2、第5页。



1944年石家庄集中营的战俘劳工被日军押送到火车站运往各劳动地点

转送特殊劳工情况表①

配属地点	到达时间	原属日军部队番号及高地	人数	配属地点	到达时间	原属日军部队番号及高地	人数
大山坑	10月14日	虎林7017	457	东乡坑	11月11日	虎林9750	239
万达屋坑	同上	湖北5245	164	搭连坑	同上	新密山4838	245
老虎台坑	同上	湖北5245	155	龙凤坑	11月12日	新密山4838	445
东乡坑	11月1日	东宁777	194	老虎台坑	11月13日	东宁1271	286
东乡坑	同上	东宁123	52	万达屋坑	同上	东宁1271	347
南山坑	同上	东宁844	159	西露天坑	11月22日	鸡宁5860	235
南山坑	同上	东宁299	176	制铁	同上	鸡宁5860	82
西露天坑	同上	东宁396	416	蛟河	同上	永安536	203
南昌(山)	11月9日	宝清	218	老头沟	同上	鸡宁5860	131
大山坑	11月10日	东安土木工程队	359	烟台	同上	鸡宁5860	240
烟台坑	同上	东安土木工程队	220	合计			5264
东乡坑	同上	虎林9750	241				

根据在各大厂矿和要塞工程中部分特殊劳工的数据估算，被押送到东北的特殊劳工总数至少在25万人以上。

特殊劳工的来源主要是华北各战俘集中营，较大的有石门(石家庄)、太原、北平、济南、青岛、塘沽等集中营，其中仅石门集中营先后关押抗日军民和无辜群众达5万余人，有3万余人被送往东北、华北和日本；也有一部分由日军抓捕的抗日民众直接押送到东北成为特殊劳工。1941年3月至1942年末，日军在华北强行实施了五次残酷的“治安强化运动”，并对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实行疯狂的“扫荡”及“三光”政策，乘机抓捕抗日军民200多万人作为“特殊劳工”，送到东北、蒙疆和华北、华中地区做苦工。②

① 资料来源：《抚顺炭矿长宫本慎平致关东军函》，1943年12月10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4月版，第959～961页。

② 居之芬：《日本对华北沦陷区劳工的劫掠》，载《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新华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27页。

第三节　特殊劳工的反抗

日军对要塞劳工的残酷奴役和迫害，引起劳工们尤其是特殊劳工的反抗，其主要方式是怠工、罢工和逃跑，有的还打死日伪看守，暴动逃跑。

特殊劳工被迫强制劳役，他们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反抗意识，这些抗日将士有着非同一般劳工的反抗精神。在押解东北的途中，特殊劳工为了一线生机，不惜从飞驰的列车上、日军的枪口下跳车，冒死反抗。据吉林省档案馆馆藏315－7－1692号卷特种工人在输送途中逃亡事件的报告记载：满洲某部队仁平少尉，指挥由华北军押送的1 516名特种工人去往黑河省山神府修筑军用工事，途经奉天车站查验人数时发现，有147名特种工人已从押送火车小窗跳车逃走。后经搜查，在沿途的兴隆店至马三家一带，发现13具跳车摔死的工人尸体，另外还逮捕了11名重伤者。同号卷中另一份昭和十八年（1943年）七月十四日奉天宪兵队长关于上述事件呈报给关东军司令部的调查报告称：被捕逃亡工人证实，这些工人相继逃走，是因为他们从德州、天津、北京乘车出发时，日军部队只发给他们每人3个小馒头，此后数日，每天只发给一次水，工人们饥渴难耐。1名工人班长对同乘工人说，自乘车至今已有20多人相继死亡，要到达终点尚有4天行程，如果跳车逃走，不过摔死而已，与其饿死，不如跳车逃走。

到达工地后，关东军对特殊劳工的管理，更是狠毒、残酷和血腥。为了秘密迅速完成军事工程的计划，除按《要塞法》和《关东军特种工人处理规定》诸多条款严厉对待特殊劳工外，宪兵和监视员还在特殊劳工内部利用极少数思想软弱的投降兵做“眼线”，以随时掌握工人的言行动静。

据吉林省档案馆藏315－9－538号卷中海拉尔宪兵队长谷家春雄致关东军司令部一份报告称：昭和十六年（1941年）六月二十四日，满洲第388部队使用特殊劳工，被命令去哈拉沟铺设军用道路直到乌奴耳地区建筑军用宿舍。一次配属宪兵带着翻译来到乌奴耳地区军事工地做工人动向例行调查时，接到线人报告，称特殊劳工丁五才曾私下对工人透露，“我们这些俘虏工人，都将在工程结束时被杀掉，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设法跑掉。”配属宪兵立即向满洲第388部队长做了报告。根据部队长命令，宪兵于7月9日16时带着部队的军医来到哈拉沟工程现场，佯称给全体就劳工人做健康检查。离开时，以丁五才是传染病患者需要隔离为由，将其带往部队本部严加审讯。并于当日20时，在警备队协助下，于乌奴耳东北3公里处的山中，将丁五才秘密杀害。

1985年，一位当年曾在绥芬河、观月台要塞鸟青山阵地服役的日本老兵回来谢罪，他怀着内疚的心情，默默地在鸟青山下寻找，他想寻找一块巨石。他记忆中，他曾受命押解1名试图挑动逃跑的劳工，在一块巨石后面将其杀害。可他没有找到那块巨石，只面对着鸟青山伫立了许久。

在大肚川村的一道山岗上，有一排32座崩塌的半地下仓库，巨大的钢筋混凝土断块仰面朝天，七扭八歪地废弃了半个多世纪。1942年夏天，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和冲天大火惊动了人们。这事发生在东宁要塞，位于第三道防线上最大的一个后勤保障基地的军火仓库中。在大肚川的老人口中，一直认为是在军火库里当搬运工的战俘所为，“四十来个”或“一二百个”被关押的战俘劳工在修建完这类军事设施后均被秘密杀害。普通劳工和外人没有可能进入层层设防的“军事禁区”。根据为大肚川后勤基地做饭和送给养的长期雇佣人回忆，军火库区里确实有“四十来个”没有被屠杀的战俘。在1945年8月，胜哄山要塞最后时刻，仍有“40名劳工被关进粮秣库里”。①

大肚川军火库大爆炸给关东军以沉重的打击。爆炸声整整响了一夜，冲天大火烧了好几昼夜。军火库区内的库房、枪支弹药、楼房和堆积在露天的军事物资毁于一旦，甚至连车辆、坦克也被炸翻、

① 〔日〕佐藤和正著：《最后关东军》，白金书房，1976年版，第209页。

烧毁。日本随军记者闻讯赶来，拍下了一片狼藉的军火库废墟照片。日本军方一连数日在大肚川村搜查、抓人，终无结果。

如果说东宁大肚川军火库爆炸事件是个历史之谜的话，那么发生在昭和十八年(1943年)九月十一日东宁石门子碱厂沟特殊劳工结伙袭击日军逃走事件，则详细地记录在日本宪兵的报告之中，而成为至今发现关东军血腥镇压特殊劳工的唯一证据，也是记述战俘劳工不畏强暴、英勇暴动的唯一史料。

据吉林省档案馆藏315－7－692号卷中昭和十八年七月五日，“东宪高第173号”报告较详细记载：“管内劳动之特种工人，是本年3月及5月两次从华北日本军移交接收的，总人数为1 935人，来到迄今，共出事故172名，目前尚有1 763名工人劳动。”“这些特种工人约60%是属盘踞在山东省附近的蒋介石直系军，其余为八路军和其他杂牌军。”“因营养不良，身体极度虚弱，来到后不久，就死亡163人，目前情况有所好转。”“但由于管理不当加之工作思想不良，迄今已发生逃走事件8起，涉及特种部队工人53名(已逮捕44名，在逃9名)。”“这些工人分别被分配到满洲第1271部队、160部队、844部队和3611部队劳动。第1271部队配属的工人在老黑山、黑营附近，从事国防道路建设作业，其他被安排在各部队工程中作业。”

1943年特殊劳工情况表

配属部队	配属工人	事故者		现有人员	就劳地
		死亡	逃走(未逮捕)		
1271部队	805	8	9	788	老黑山黑营附近道路工人
160部队	599	30		569	本队军事工事
844部队	341	18		323	本队军事工事
3611部队	230	107		123	杂役及患病者
合计	1975	163	9	1803	

1943年特殊劳工逃走者情况表

月日	使用部队	逃走状况		在逃	原因动机前后情况	摘要
		逃走者	逮捕			
4.7	108部队	6	6		粮食不足、利用看守监视不力的空隙	结伙
5.15	3611部队	1	1		神经衰弱	结伙
5.22	3611部队	4	4		思乡之情驱使	结伙
6.5	1271部队	28	28		思乡之情驱使	结伙　未遂
6.9	1271部队	5	3	2	思乡之情驱使	结伙
6.9	1271部队	2		2	思乡之情驱使	结伙
6.25	关东军后方演习部队	5		5	思乡之情驱使	结伙
6.26	844部队	2	2		思乡之情驱使	结伙
计		53	44	9		
备考	参加关东军后方演习的特种工人是从第1271部队使役的工人中临时配属的					

第四节　东宁43名特殊劳工的暴动

1943年9月11日，在黑龙江省东宁县发生了由关东军第570部队役使的43名特殊劳工的暴动。其中，有31名暴动逃跑成功，2名被日军开枪打死，10名被日军抓捕后处死。该事件发生后，关东军司令部和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极为震惊，立即采取严密措施加强对特殊劳工的使役和监管，并对相关责任者分别进行了处理。本节根据学者周艾民、陈云来有关调查资料及相关的历史档案，对发生在东宁县关东军役使的特殊劳工暴动综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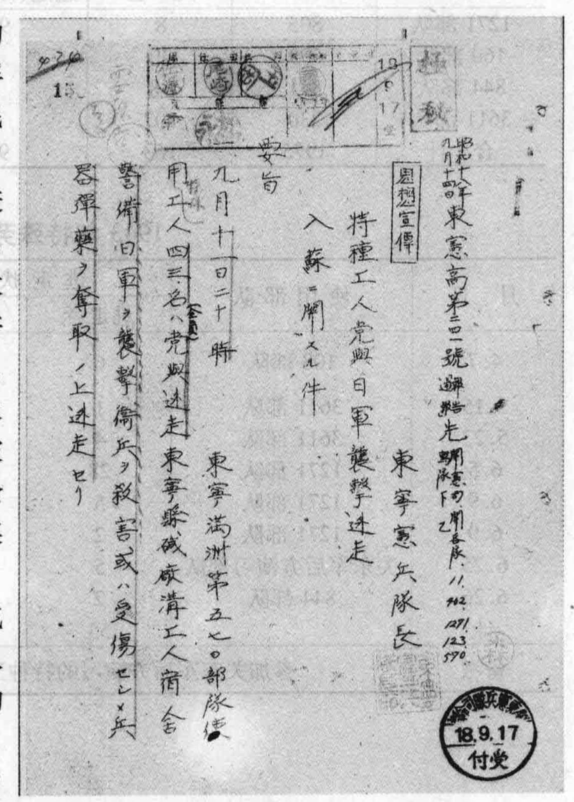
被押解到东宁的43名特殊劳工,是日军在华北战场上进行扫荡时俘获的八路军和人民群众。从《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关于军用特殊工人结伙袭击日军逃走的报告》的附件《结伙逃走工人名簿》上可以看出,属于八路军部队的有8人(其中第10团4人,属新4旅;第21团1人,属新7旅;骑兵团1人,该团由军区直辖;游击队2人);属于地方武装的有24人;平民百姓有7人(东光县1人、任丘县5人、曲周县1人);抗日县政府干部3人(枣强县、唐县);所属部队不明的1人。他们是在1939～1943年春季期间由于日军大扫荡而被俘的。被俘的地点大多数是在河北省的冀南地区,其中有的是在战场上被俘,有的是负伤后养病期间被汉奸告密而被俘,有的是日军抓捕的平民百姓。

在这43人中,学者周艾民等人目前找到唯一健在的张世文(真名叫张思问),老人回忆他被日军俘房的经过时说:

1940年时我18(岁),八路军来了,就自愿当了八路军。刚当兵时就在10团4连(八路军冀南军区所属新4旅第10团4连),司令员是陈再道。我们主要活动在新河、南宫、枣强一带。1943年春天,在冀南一带,日本鬼子从南往北横推,日本鬼子人多,能有1万人;而我们人少,不超过3个团的兵力。在枣强我们4连100多人也被日军包围了,我们边打边退,我右臂挂彩了,在老乡家养病。有一天,我正在炕上躺着,被汉奸告密了,日本鬼子就把我抓走了。在一个炮楼里,问了两次话,我也没跟他们说真的,我当了两年多八路军,就说当了三四个月,啥也不知道。关了一阵子,就把我押送到山东德州去了。

张思问老人所说的押送到德州,就是将被俘的抗日官兵和抓捕的平民百姓押送到德州的日军战俘训练营。在德州的战俘营里关押的有八路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的战俘及抓捕来的老百姓。经过"训练"后,日军再将这些人用火车运往东北。他们被赶进车厢,车门被从外面锁死。闷罐车厢内,挤满了人,没有可以躺下的地方。途中给干馒头吃,喝凉水,大小便都在车内。上车前就有许多人已生病,又有许多人因喝凉水拉稀,结果死了不少人。到了山海关,日军把车门打开,把死的及奄奄一息的人都扔下火车。有的为了逃命,就从车厢内的气窗跳车,也都被摔死了。最后去往东宁的这节车厢里只剩下40余人。在东宁火车站下车后,日军又将他们集中在某地进行训练。

1943年5月31日,这批43人的特殊劳工被汽车送到东宁县石门子碱厂沟,移交到日军工程部队第570部队管辖。当时这批特殊劳工中,年龄最大的44岁,最小的只有17岁。


昭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　東憲高第三一二號
東寧憲兵隊長
周知宣傳
特種工人党與日軍襲撃逃走入蘇ニ關スル件
要旨
九月十一日二十時東寧滿洲第五七〇部隊使用工人四三名ハ党與逃走東寧縣碱廠溝工人宿舍警備日軍ヲ襲撃衛兵ヲ殺害或ハ受傷セシメ兵器彈藥ヲ奪取ノ上逃走セリ
18.9.17 付受

东宁日军宪兵队关于特殊劳工逃跑的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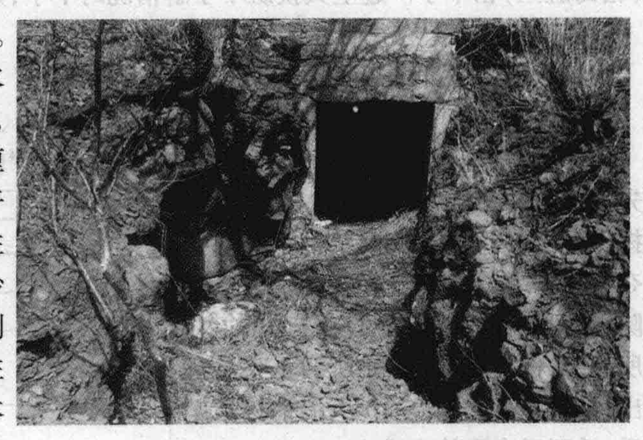
特殊劳工宿舍位于东宁县石门子碱厂沟附近夕阳丘的东南侧。日军将东宁列为军事要塞基地之后,东宁日军宪兵队根据关东宪兵队防卫的规定,对在国境线上的15个村屯(包括石门子)的5 000名中国居民采取强制方式将其搬迁到穆棱和绥阳。特殊劳工的宿舍,就是当年清边时小乌蛇沟村一大户村民孙士福留下的房屋。日军为防止特殊劳工逃跑,在宿舍的周围设有近似长方形的铁丝网,在铁丝网的东西两边各设一扇门,连接东西两门的是一条通道。西门通向进惠桥,东门通向日军第570部队。特殊劳工宿舍在通道北,日军卫兵所在通道南。为了日夜监视特殊劳工,日军还设有监视哨,监视哨的岗位分别位于宿舍的南北两侧,另设有可以俯视全景的监视台。

特殊劳工宿舍的结构是一座泥墙的草房，共两间，靠里面的一间是翻译的住室。房间内搭着对面炕，但不烧火，有炕席，因没有被褥，日军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条旧军用毯子。晚上睡觉时就弄些干草铺在炕席上，也不脱衣服，裹着毯子睡。没有电，晚上点油灯。他们穿的是来时的那套衣裳。日军曾给每个人发过一套日军的旧军装和一双很破旧的翻毛皮鞋。吃的是高粱米和棒子面，一年每人就给一斤白面，棒子面是特殊劳工自己用碾子压的。平时没有什么菜，只是在驻地的院内有一点菜地，种可以顶粮食吃的窝瓜。

日军对他们的管理很严格，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和部队，互相间不熟悉，也不了解对方，因此彼此都不说话，而且日军也不允许他们相互讲话，避免串联发生变故。下雨天不干活在屋里呆着，相互也不准说话，他们因此谁的底细也不知道。就连上厕所、洗澡都有日军监视。在宿舍内，翻译与他们同住，翻译是个朝鲜人，日本名叫松岛胜三，日军称他为"半岛人"，他是日军忠实的走狗，对劳工的一举一动都进行严密的监视。

在这批特殊劳工中，有1名叫陈恩的八路军，他用的是假名，真名叫吕庆林，原籍是河北省冀县人，他报给日军的是兰县马城镇。他报给日军的是八路军某部第10团第3连连长，根据当时八路军的建制，他所在的团应是冀南军区所属新编第4旅第10团。在这43人中他的军阶最高，被日军指定为这43名特殊劳工的队长。被日军俘虏的抗日军人，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保护家人和亲友，大多数报的是假名，有的连家庭的详细住址也是假的。

这批特殊劳工的任务就是修筑军事工事。开始是到河沟挖沙子、抬沙子，然后就搅拌水泥，在山上修炮台。炮台很大，是修在地下的，上面是圆形，下面是方形，水泥墙厚40～50厘米。施工时是在日本工程师的指挥下搭盒子板，搭好后就将拌好的水泥往里灌，一层一层往上浇，没有钢筋，都是沙子、水泥和小石子。沙子、水泥、石头子都是按日本工程师告诉的比例来抬筐次的多少。所用材料都是人工从山下往山上抬，除了卫兵在一旁站岗外，还有1名日本籍翻译官，看见有人偷懒，就用小石子打，喊着快干活。外出干活常有2名卫兵拿着枪看守。每天上工、下工都由日军严密看押。按照日军的管理规定，特殊劳工的驻地与工地之间，采取就近的原则。由此认定他们担任修建炮台的地方应当属日军勋山、胜哄山要塞工程的组成部分。



43名战俘劳工修筑的地下工事

有一天，特殊劳工队长陈恩偷偷地对另外1名劳工李久林（李九林）说："生活一天不如一天，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咱们这些人都是有死没有活，早晚都得被弄死。"正当他们为自己的命运担忧时，偶然发生一件事给他们带来了希望。1943年7月上旬的一天，他们正在山上干活，在一旁站岗的日本卫兵突然发现一只野鸡，便开了一枪，但没有击中，日本卫兵便跑去追野鸡，追着追着野鸡飞过了一条河，日本卫兵此时也不追了，也不放枪，有些劳工在一旁叫道快开枪呀，怎么不打了？这时日本翻译官随口说出那边是苏联，不能再打枪了。从这时起，他们第一次知道了河那边



43名战俘劳工修筑的炮座

就是苏联。



43名战俘劳工修筑的未完工的山洞

他们确定河那边就是苏联的还有一次，据张思同老人回忆说：“有一次，卫兵押着我们几个人到小乌蛇沟村屯一个有碾子的人家压棒子面。趁卫兵不注意时，那个老头告诉我们，河那边是苏联，你们咋不跑呢？再不跑，干完活就被日本人杀了。我们这时才知道河那边是苏联……我们把知道的情况告诉给了陈恩，陈恩也验证了河那边是苏联。”

有了确切的情报，陈恩便开始考虑如何带领大家逃出虎口的方案。他与王伸（真名叫王坤）暗地里商量、串通，研究逃跑办法。并对全体人员的情况进行摸底，搞清谁是八路军，做过什么事。经过一段时间秘密摸底，陈恩与王伸了解了每个人的经历，随后他们秘密制定了一个完整的行动计划。

特殊劳工制定的逃走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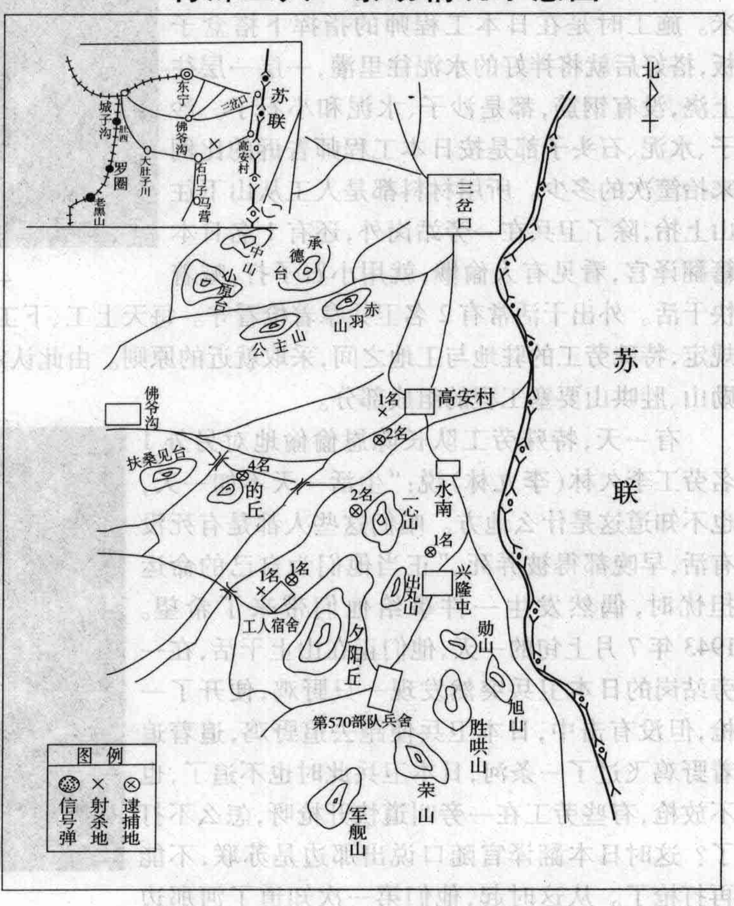
时间：选择卫兵大换班的那一天举行，即9月11日。据张思同老人回忆证实：这天（9月11日）是卫兵大换班，从前的卫兵走了，又来了一伙新卫兵，有12个人，都是20多岁的兵，只有那个翻译官（松岛胜三）留下了。趁卫兵换班不了解情况时下手，是最好的时机。

地点：收工后，在宿舍驻地内。

暗号：陈恩队长问大家：“有人洗澡吗？谁洗澡。”

工具：实施暴动当天，秘密准备几把锤子、砍柴刀、菜刀、尖镐、铁锹等。

“特殊工人”暴动情况示意图



分工：第2班长张凤鸣等4人，首先将就寝的翻译松岛胜三杀死，然后指挥另外9人袭击大门岗哨，杀死哨兵，夺取枪支，携带10名体弱患病者逃出；陈恩等10人打碎照明灯后，袭击卫兵所，夺取枪支，攻击卫兵所的士兵后逃出；第1班长王伸等10人悄悄接近哨兵，杀死后夺取枪支逃出。

为了迷惑日军，也为了使大家逃跑有劲，陈恩以即将来到的八月十五中秋节为由，同翻译松岛胜三交涉，要求把每人一年的面粉量领出来。翻译报告卫兵队长后，同意发给。陈恩就让两个做饭的劳工领回白面，并全部蒸成馒头。同时暗示大家说这是最后一顿饭了，能吃多少就吃多少。

1943年9月11日21时50分，日军卫兵曹长若林义太郎开始对劳工点名，没有发现异常，确认所有特殊劳工进入宿舍后，曹长返回了卫兵所。与劳工一同回到宿舍的还有翻译松岛胜三。

陈恩等43名特殊劳工与翻译回到宿舍后，就准备立即开始行动。他们都

进入了房间，有的坐在炕上，有的站在地上，翻译站在炕前，催着大家洗澡。陈恩像往常一样问："有人洗澡吗？谁洗澡。"这是发出行动的指令。这时，坐在炕上的王伸起身站在翻译的身后，摸出事先准备好的尖头锤子，朝翻译的后脑部猛打下去，翻译一声也没喊出来。张思问也抽出藏在袖子里的尖头锤子，又朝翻译的头上砸了几下，看见翻译嘴里还在冒沫，便扔了锤子往门外跑。平时这批特殊劳工与翻译接触时间最长，而这个朝鲜籍的"日本人"，倚仗日军的势力，竭力压榨他们，并且凶暴蛮横，经常殴打、谩骂他们。陈恩等43名劳工早就恨透了他。这次行动一开始就先把这个监视他们的日军走狗作为攻击目标，从而扫除了障碍。

随后，各班按照事前的分工，开始分头行动。当他们从宿舍出来，看见大门值勤的哨兵荻野顺次还拿着枪站在那里，而分工打这个哨兵的人在门口来回走，不敢下手。张思问便拿了一把铁锹与分工打这个哨兵的那人一起直奔哨兵。到了跟前，张思问张口向哨兵要烟抽，当哨兵低头掏烟时，两人将哨兵绊倒在地，并朝哨兵的脑袋砍了一铁锹，该哨兵被击中头部当即死亡。然后第2班组织病弱者从西门逃出。

与此同时，陈恩带领10人从宿舍出来直奔日军卫兵所。这里是卫兵的指挥机关。他们首先打碎照明灯。当时在卫兵所里有若林义太郎曹长、步哨值勤者温浅末吉上等兵、待岗的井原次男一等兵、丰田某以及天野吉库、中村秀佳等人。陈恩等人冲进卫兵所后，先夺取放在枪架上的枪支，同时将这些日军堵在卫兵所里。张思问老人在回忆攻击日军卫兵所的情形时说："这时大批人都拿着菜刀、砍柴刀涌向卫兵所，我也跑上去。卫兵所是单独一栋房子，一铺炕，有12个卫兵换班住在里面。有的在睡觉，枪放在墙边。当时我看见有卫兵往门外跑，前面的人就往里拥，用肩膀扛，把惊醒的卫兵挤到旮旯里，这样他们的枪就用不上了。卫兵所里没有灯，有人喊把卫兵扭出来打，我也这样喊。里边的人就摸一个，扭一个，弄到门口就是一刀。"他们将卫兵曹长若林义太郎打倒在地，不久死去，其他日军也都被打倒。然后陈恩就指挥大家从西门逃出。

这43名特殊劳工，在陈恩的指挥下实施暴动的壮举是日军所料不及的。在东宁要塞被迫服苦役的特殊劳工中，这次暴动是成功的。不仅打死、打伤日军卫兵（死亡2名、重轻伤4名），夺得武器（步枪4支、刺刀4把、子弹56发），无疑使日军十分震惊。按照他们秘密指定的暴动计划，应当说是很周密的。但是有1名哨兵开枪，引来日军的追击和抓捕。据东宁宪兵队事后的报告称："内门哨兵点名结束后，巡查工人宿舍时，目送两名工人上厕所直到归来（此间有七八分钟），这时，工人宿舍正门方面一阵喧哗，哨兵赶忙跑向那里，发现工人正结伙逃走，遂开枪射击，到卫兵所与替补哨兵共同追到栅栏外二三十米远，没有捉到任何人。"特殊劳工在出逃的路上，得到暴动消息的日军立即出动，并迅速调集驻守东宁的满洲第570、396、777各部队及驻守在石门子满洲第108部队的所有兵力和东绥报国农场队员100人、青少年义勇队员100人，携带军犬封锁国境进行搜查，企图抓回参加暴动的所有特殊劳工。

而这批特殊劳工，事先按照队长陈恩的部署，各班在完成各自的攻击任务后，分别向边境出逃，越境去苏联。他们出逃的路线是从驻地出来后，大体是沿着小乌蛇沟经高安村，渡过瑚布图河过境进入苏联。张思问老人在回忆逃跑时的情形时说："我和一些人是最后跑的。我们在前面跑，卫兵所里跑出来的卫兵在后面追，还打枪。我们一共抢了4支枪，是九九式步枪，有人还递给我一把枪刺，打死几个人也闹不清。我把鞋跑掉了。跑到一条河边，我们这伙一共9个人。那时，我成了指挥官了。我说别乱跑，听我的。我看了一下地形，发现河不宽，辨认一下方向决定越过河向北跑。等指挥大家越过河往北跑时，北边响起了汽车声，还一个劲地打枪，就决定往东跑。这时，日本兵追过来了，还有狗叫，好像有四五条狗。我是最后一个下的河，追上来的日本兵差点抓住我。我一边上岸一边喊'快跑'，边打边跑，许多人都把鞋跑掉了。再往东跑，让一道刺鬼（铁丝网）挡住了。我叫大家都脱光了，把衣服搭在刺鬼上，垫着爬上去，之后就听见苏联兵打枪，不一会好像马队也过来了。我们还是往东跑，又遇一条河，水挺深，能没脖。我们只好顺着河边走，看见有露石头的地方，我带头踩着河里的石头，一

个挨一个过了河。苏联兵还在放空枪。我指挥大家往一条山沟里跑,跑进山沟里停下来。我就拍着巴掌向苏联兵走去,表示我手中没有武器。苏联兵一看我是中国人,就把枪放下问我几个人,我说9个。我们把4支枪和一把军刺交给了苏联兵。他们领着我们走了。我们穿着湿衣裳冷得很,苏联兵就让我们生火烤火。烤了一阵子火,又让我们走。遇见一个房子,我们又烤火。烤完火后又领我们走,来到一处有两座房子的地方。这时看见陈恩他们20人早到那里了,也正在烤火。后来来了一辆汽车,把我们拉到双城子,整天过堂,挨个问事。我有什么就说什么。问了不知多少遍。我就说我是八路,让日本鬼子抓了当劳工,怎么闹暴动逃跑的。"

在出逃的途中,由于日军大部队的追击,有2人被日军开枪打死,有10人被日军抓获。这次暴动的43人中,有31人越境到了苏联。宪兵队对抓捕的10名特殊劳工进行了严刑拷打,最后全部被杀害。

进入苏联境内的大多数人后来经过训练,成为谍报人员,并返回国内从事搜集日军情报等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张思问最后率领9名战友涉过的中苏界河

根据吉林省档案馆藏"东宪高第437号",暴动者名单见下表。

结伙逃走工人簿①

结伙逃走工人名簿 *符号为被捕者

原籍	姓名	年龄	身份阶级	职业	本国所属部队服役年数	学历
兰县马城镇	陈恩	29	中队长中尉	无	第10团3连 4年	小学四年
蓟县天平庄	侯东山	20	二等兵	农	蓟宝三基干队 6个月	无
献县黄之铺	王伸	31	助理员	同上	献县四区分所 4年	小学四年
曲州牛村	张文柱	25	三等兵	同上	济南6分区19团7连 8年	小学二年
河北省辛河县训宅	张世文	22	同上	同上	第10团第4连 4个月	无
*枣南县王家平与	李久龙	20	同上	木匠	枣南县政府 2个月	小学二年
迎县十四城塞	李云林	24	同上	农		小学四年
阜平县连甲沟	郑子义	24	二等兵	同上	三分区骑兵团第4连 1年	无

① 吉林档案馆藏315-7-694号卷。

结伙逃走工人名簿 *符号为被捕者

唐县下庄	赵金科	25	侦察员一等兵	同上	唐县政府 2年	同上
*早城县乾村	姚德胜	28	二等兵	农	第10团第4连 3个月	小学一年
*冀县杨树	王来面	19	同上	鞋匠	早北游击队	同上
枣强县省庄	冯庆治	21	同上	农	枣强县警备队 1个月	小学三年
枣强县强庄	王维田	28	同上	商	枣强县民运科 4个月	小学八(六)年
东光县双届杨庄	张凤鸣	28	村长	商	良民	小学四年
任邱县陈王北	李保玉	39		农	同上	小学一年
任邱县陈王北	李久林	32		同上	同上	小学三年
*任邱县尺王庄	李砚由	33		同上	同上	无
任邱县天王城	王宗洲	44		同上	同上	小学一年
任邱县陈王庄	李海璋	26		同上	同上	小学三年
枣强村薛庄	薛凤海	39	二等兵	同上	八路军游击队 5个月	小学五年
冀州小芦家台	李海同	21	二等兵	农	冀州警备队	无
*山东夏山县四屯	夏呈恩	24	同上	同上	第6分区警备队	同上
河北省宛县下守庄	冯国华	21	同上	同上	骑兵团第3连	同上
宁津县树村	正秀正	17	通信兵二等兵	同上	宁津三区分所 2年	小学二年
*南宫县好家屯	李文之	18	二等兵	同上	第21团第5连 3个月	无
*深县大屯	杨束刚	18	同上	同上	枣县游击队 1个月	小学二年
枣县陈李村	陈彦额	17	同上	同上	枣县游击队 1年	无
*河明县大桃	万文双	26	同上	同上	河明县大桃游击队	小学一年
冀州小豆村	张文明	20	同上	同上	第10团新兵连 1个月	无
枣施(强)黄鹿庄	郑连城	25	同上	同上	河北枣强警备队 3个月	小学一年
*迎县西半	房振海	25	同上	商	北中原军分区警备队 1年	小学一年
温县大莫关	对点点		二等兵	农	温县基干队 3年	无
河间县小心庄	徐及永	19	同上	商	八路军游击队 5个月	同上
献县诸庄	刘长发	37	同上	农	献县三区游击队 1个月	同上
枣强县思察镇	苏明武	23	同上	商	枣强县抗连 8个月	同上
河间城内	刘春海	25	同上	农	河间县游击队 1年	小学二年
河间县区村	冯立东	23	同上	商	河间县游击队 1年	同上
清远县王利庄	刘志兴	20	同上	农	第8分区第4区队 1年	小学一年
阜平领口村	陈国人	24	同上	商	温县支队	无
衡水县周西管	李锡衡	23	同上	农	早北队大队 5个月	无
河南省章德村	马凤田	31	同上	同上	第6分区特务连 2年	同上
曲洲吴庄	吴春杰	24		同上	良民	同上
深县河坊村	吴奇俊	26	二等兵	同上	深县游击队 1年	小学一年

第五章　要塞劳工的终结

第一节　要塞劳工的命运

一、非绝密工程的定期劳工

在日军要塞施工中，对于在非绝密工程施工的普通劳工，如用欺骗方式招募的劳工、有预定期限按村摊派的劳工和勤劳奉公队等，到劳动期满或延长一段时间后，对幸存者予以放回并用火车运回原地。但在几个月的“就劳”时间内，不知有多少劳工命丧工地，永远地留在了那里。还有许多人即使被放回去，也带着一身疾病，回家后不久死去或留下永久的残疾。

据对1943年辽西地区去内蒙古乌奴耳地区劳工情况的初步调查，到免渡河哈拉沟当劳工的黄文喜回忆：劳工一个小队60人，都住在一个工棚子里。“我们的小队长为人不错，非常照顾我们。七个半月劳动期满后，小队中只有一个叫郭振生的死在了哈拉沟。其他小队情况就不行了，挨着我们的一个小队多数是来自彰良村的，60个人除小队长外都死在那了。”①

锦州市松山镇穆家村1943年春赴乌奴耳当劳工的共11人，到了秋天仅回来4人，其中1人带病回家，不久也死亡。其名单是：

刘连春（时年40，生还），贾会（时年50，生还），李云波（时年23，替父去当劳工，生还），穆绍臣（时年42，带病回家，病死），孟宽峰（时年50，死亡），宋云凤（时年50，死亡），王国兴（时年49，死亡），穆荣芳（时年49，死亡），刘庆瑞（时年35，死亡），周庆禄（时年30，死亡），周庆祥（时年26，周庆禄的胞弟，死亡）②



东宁老城子沟劳工坟（局部）

① 黄文喜访问录，李秉刚存。

② 2002年12月7日李秉刚在当地调查并存。

事后，伪锦州省对每个死去的劳工家属发给白布5尺、"表彰状"一张，算作对死者的补偿。其中，以伪锦州省省长王瑞华的名义发给死亡劳工穆荣芳的"表彰状"至今由其长子穆景元保存完好，其编号是2380。据初步分析，到穆荣芳为止，在锦州省的劳工中至少已经有2 380名死在要塞工地上。

被征派到乌奴耳勤劳奉公队的绥中县劳工魏连仲回忆：这次全县共2个大队、6个中队、2 160人，在乌奴耳死亡960多人，另有患病者300余人，其中许多人回家不久即死去。① 勤劳奉公队员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正当身强力壮之时。这些青年尚且如此，其他劳工的境遇可想而知。

除正常放回家的劳工外，还有的劳工在回家途中，被日军运往哈尔滨平房731部队用作细菌试验。1943年10月，日军将从乌奴耳等地撤回的海城、大石桥、锦州等地800多名劳工送到哈尔滨平房做人体试验，两个月时间死亡600余人，其余侥幸活下来的劳工被送回原籍。经对葫芦岛地区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

二、绝密工程的劳工惨遭杀害

在要塞的绝密工程修筑完毕后，参与修筑的劳工都被日军秘密处死。大量的资料证实了这一点。

据原孙吴劳工王文斌口述："康德3年，我到孙吴给日本694部队修大营。康德4年9月，由694部队装10辆汽车劳工，约五六百人，拉到山里集体屠杀了；康德六年六七月孙吴有个老赵头给日本人放牛，他一天早晨到南山放牛，看见694部队在头道卡子桥西面把100多名劳工集体屠杀了；听李景顺说：在1939年冬，孙吴南山阵地西南沟子里，日军杀害劳工500多名。"据滕吉发口述："康德4年，从北安抓到西岗子修南山洞子的劳工1 300名，完工时剩下700名，也被日寇集体屠杀了。"②



奄奄一息的劳工

在阿尔山绝密工程的劳工，在工程完工后也被秘密处死。据阿尔山劳工幸存者方德财证实："山洞工程完成后，我亲眼看着这些人在夜里被抓起来，绑上后往车上扔，这些人也不知道要被整死呀，被绑也没有反抗。不光绑胳膊，还绑腿，两个绑在一起，用8号铁线胳膊挨胳膊、腿挨腿绑上，拧得很死，绑好后往车上扔，像扔绵羊似的。这些人都被汽车拉走了。反正只看见一车一车的人被拉走，没看见有人回来。"③方德财正是看到日军对劳工下毒手后，冒死逃出虎口的。

在富锦五顶山要塞工程完工后，所有参与秘密工程修建的劳工都被杀害。"一项工程结束，日本人也要开个'庆祝会'，会后要给劳工一顿平日吃不到的好饭食：两合面的馒头，一大碗带油腥的菜汤、两块日本咸菜。劳工们常年不见米面，当然个个狼吞虎咽。可谁知，日本人在饭菜里下了毒药，时间不长，全棚劳工便一排排、一条条地头朝里，规规矩矩地死去了。"④

对劳工用食物中下毒药的方式杀害，是日军惯用的手段。据幸存劳工曹树德回忆：他于1943年替哥哥到虎林出劳工，"1944年秋季时工程接近完工，日本人为保守军事秘密，对劳工们下了毒手。

① 魏连仲：《记乌奴耳勤劳奉仕经过》，载《绥中文史资料》第2辑，1964年内部版，第12页。

② 王登明：《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伪黑河省杀害中国劳工罪行》，载孙邦主编：《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501~502页。

③ 方德财访问录，李秉刚存。

④ 刘学让：《白骨累累五顶山》，载《黑龙江文史资料》第19辑。

一天,他们借口改善伙食,向劳工们供给了大米饭,暗中在其中掺放了毒药,将劳工们都毒死了。万幸的是我在此前十多天一直生病,拉肚子,后来已经水米不进,没有吃到这顿毒饭,后来就昏迷不醒了。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了野外,周围都是死人。我担心被日本兵抓到,白天躲在草丛中不动,夜间悄悄朝着一个方向往外爬,渴了就找水坑里的水喝,饿了挖野菜吃,过了几天才见到一户人家,好心的主人留我住了三天,等我身体稍稍有所恢复后辞别他们继续赶路。因为害怕,我始终不敢坐车,一路讨饭走了两三个月才回到了家。"①

曾在虎头要塞服役的日本老兵也证实了日军对劳工屠杀的事实:"曾在虎头满洲第851部队炮兵服役的加纳传三说,他入伍第一年,亲眼目睹在猛虎山背后有许多暴弃于山野的苦力尸骨。这层层白骨是被日军强抓的中国劳工,他们被迫从事修筑阵地,工事完成后,日军假意让他们喝酒把他们全部杀死。"②"昭和18年的某一天,由于要塞设施大体完成,俘虏劳工被集中在猛虎山西麓的洼地,举行完工酒宴,用酒菜酬劳他们……突然,重机枪喷出了火舌,刹那间,宴会场化为血腥的屠场,到处是刺鼻的血腥味和堆积如山的尸体。"③



虎头被害的中国劳工尸骨

据被抓到五岔沟的瓦房店幸存劳工郑福德证实:他们这批劳工在劳役期满时,一个工棚100多人只剩下了60多人。临结束前,日本人以改善生活为名给劳工们发了白面烙饼吃,却在里面放了毒药。他所在的工棚有人看见日本人往面里掺东西,知道日本人没安好心,互相宣传,绝大多数人都把饼扔进灶台里烧掉了,只有三个人不相信日本人会杀害劳工,因饥饿难忍而吃了饼,结果这三个人都被毒死了;其他工棚的劳工也大批死亡。郑福德等幸存劳工参加了对死难劳工的掩埋工作。据他回忆:劳工们吃了饼后每天死亡二三十人,最多的一天死亡48人。后来伪复县政府到工地去领到期的劳工回家,未死的劳工才得以返回。④

另据战犯、伪满军事部大臣邢士廉证实:"有的秘密工程完工之后,把从事该工程的劳工全部杀死。1943年,锦州1 000多名劳工到这些工程中去,但是一直到1945年春也没有回来。锦州责任者

① 曹树德访问录,2002年8月,李秉刚存。

② 〔日〕冈崎哲夫著:《战尘之心》,庄文社,第53页。

③ 〔日〕冈崎哲夫著:《秘录·北满永久的要塞》,秋田书店,第20页。

④ 郑福德访问录,李秉刚存。

询问关东军,回答说不知道;问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他说:'我也不知道,没经政府手续,大概是关东军直接办的。'后经家属百般探询,确认被日本鬼子杀死无疑。"①

三、日本投降时的中国劳工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开始了对日本法西斯的最后一战;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这时还有许多要塞工程没有完工,许多劳工滞留在各要塞工地。这些劳工除部分被日军杀害外,大多数逃离曾洒满血泪的劳动场地,返回家乡,其中部分劳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据五岔沟劳工吴月庆介绍:1945年8月初,"堡垒修完了十五六个,我们察觉到日本人有些变化,对劳工的态度有所缓和了。不久日本人跑了,我们就被送回来了。"孙吴的劳工孙士凤回忆,8月11日,他被派出到三关屯给日军送给养,第二天当他回到城里时发现日军已经没有了,"据说都调到山里去了,没有人管我们,就这样劳工开始徒步往家里走。平时还不知道孙吴有多少劳工,这一下可知道了,少说也有十万八万的。"这些劳工一队队地顺铁路向哈尔滨方向走,各自返回家乡。②

1945年8月,在嫩江北部金水修机场的劳工发现日本人逃走后,在一名有威望的劳工老赵的组织下,大家打开仓库,背上粮食,顺着火车道往嫩江方向走,然后折向齐齐哈尔。"到齐齐哈尔时,大家已经衣不遮体,经人指认,找到了苏军司令部。一位军官告诉我们,抗日将领王明贵成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如愿意参加就等着,不愿参加可换身衣服、拿些粮食回家。经老赵动员,这29人都参加了人民自卫军,走上了革命道路。"③

然而,也有的劳工在日本投降前惨遭杀害。194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一群衣裳褴褛、瘦骨嶙峋的人来到东宁县地方治安维持会,述说在苏军向日军发动进攻后,东宁要塞庙沟阵地的日军以防苏军炮弹炸伤为名,押解上千名劳工进入地下工程中,然后将山洞一段一段的用沙石封死,致使其中大部分劳工被永远埋在地下,只有30多名离洞口比较近的劳工奋力扒开沙石才逃了出来。④ 1945年8月9日即苏军发动对日军进攻的当天,驻富锦五顶山的日军也对中国劳工下了毒手,连临时征派的当地车夫也不放过。这天下午,日军用铁丝将强征的13名车夫双手绑住,押到山坡上准备用战刀砍杀。正当日军要行刑之时,遇到苏军飞机轰炸,一个小伙子乘日军钻进山洞躲避轰炸之机破开铁丝捆绑,飞快地逃离了虎口;车夫马运荣在被日军刀砍时,由于本能地躲避和所戴毡帽阻隔,只伤到脖子大筋,昏倒在地,后日军又在他身上补刺了两刀,均未伤及要害。因此马运荣得以在夜间爬回距日军兵营十多华里的新发屯,被住在村头的刘三虎救起。苏军解放富锦后,对马运荣进行了救治,使之转危为安。马运荣由此被当地群众称之为"马铁脖子"。但他终因多处刀伤造成气胸,50多岁就失去了劳动能力,1972年62岁时去世。⑤

第二节　要塞劳工的死亡情况

被迫修筑要塞的劳工,在所有劳工中死亡率是最高的。

一、伪满战犯的供述与证实

据战犯于镜涛证实:

---

① 邢士廉:《我所知道的军用劳工》,载孙邦主编:《伪满史料丛书·经济掠夺》,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67页。

② 张凤鸣、王敬荣主编:《残害劳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76页。

③ 王树熙访问录,2002年6月2日,李秉刚存。

④ 宋宪章:《日军修造庙沟地下工程时杀人惨案》,载《东宁文史资料》第2辑,第85页。

⑤ 乔福林、韩云朋:《马铁脖子》,载《富锦文史资料》第2辑,1985年7月内部版,第23页。

1941年秋，我到北安、孙吴、逊河、瑷珲、山神庙等地视察劳工服劳役情形。北安、孙吴是修军用道路，聚集了三四千劳工。住在旷野中搭的草棚，天气已经非常寒冷，穿的破烂不堪，甚至用洋灰纸袋绑在身上御寒，多数光着脚，没有鞋。我亲自到五常、肇源县供出的劳工棚子视察，一个棚子中住了100多人，病倒的有50人左右，工棚子外面放着10多具劳工尸体。生病的人向我要求，尽快送他们回家，救救他们的命。工作是包工制，由日本人的包工组指定工作，限制当天完成，否则就不许休息。工地上有日本人监工，稍有怠慢就遭毒打。因为饥寒、劳累过度、缺乏卫生医疗设施，劳工死亡率达到20%左右。①

另据战犯谷次亨在《检举日军战犯武部六藏奴役屠杀中国劳工的罪行》中证实：

关于奴役、屠杀中国劳工的罪行：伪满日寇在东北屠杀中国劳工，起码不下200万，特别是由武部六藏到任后，其执行的惨状更甚。第一个时期，由1933～1936年来自华北的劳工约80～90万，主要被分配在都市建设、铁路建设、国境地带军事工事建设各方面。这个时期的死亡率二成以上。第二个时期，由1936～1941年，华北劳工约280～300万，除分配在上述各场所外，主要分配在矿、厂的新建和扩大方面，港湾建设方面，这个时期的死亡率三成以上。第三时期，由1941～1945年，华北劳工约由300万减至250万，除分配在上述各场所之外，主要是与苏联接近的国境地带军事工事建设和北边振兴建设方面。这个时期的死亡率平均五成以上。特别是对于在国境地带从事建设军事工事的劳工们，工事建设完成后，唯恐泄露军事工事秘密，就成千上万的一帮帮的就地枪决了。关于上述第一、二期来自华北劳工的数目及其死亡率，在伪满洲国总务厅统计处，伪康德十一年度印刷的《全满劳工生活情况》资料里所记载的。也曾由1942年伪满民生部劳务司长日寇田村仙定所报告的。关于第三时期的数目和死亡率，在1944年当时的滨江省次长日寇田村敏雄也在该省公署向我报告过。……谷次亨，1954年11月10日于抚顺。②

在该证词的前面，谷次亨还有一段说明：

我在1954年11月10日检举武部六藏奴役屠杀中国劳工罪行的材料，我已仔细看过，它完全与其犯罪事实相符，如有伪造，我愿负法律责任。证人谷次亨(印)

于镜涛于1940～1943年任伪滨江省省长，1943～1945年任伪奉天省省长，1945年3月任伪国民勤劳部大臣兼勤劳奉公队总司令；谷次亨于1937年担任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1941年任伪民生部大臣，1942年任伪交通部大臣，是长期主管劳工征派输送问题的伪满高级官员。他们对武部六藏等人的证词，具有一定的可信性。下面所列举的资料和幸存劳工的回忆也基本印证了上述关于劳工死亡率的判断。

二、部分调查整理资料的数据

据《锦西市志》记载：东北沦陷时期，全县先后被抓劳工6 297人，去乌奴耳、密山等地服苦役，有758人被折磨死。③ 按此数字，劳工死亡率为12%。

日伪统治时期劳工受害情况表

村　别	劳　工	劳工死亡	村　别	劳　工	劳工死亡	村　别	劳　工	劳工死亡
虹东	30	10	小寺	6	2	团山子	21	4
虹西	50	1	兴隆	11	1	英守	11	6
虹南	16		靠山	50	4	板石	21	4
虹北	10	2	前潘	15	3	西沟	6	
大安	56	8	后潘	14	4		345	54

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1991年4月版，第874～875页。

② 中央档案馆战犯档案119－2－5武部六藏证据第13号。

③ 《锦西市志》，1988年5月内部版，第565页。

村　别	劳　工	劳工死亡	村　别	劳　工	劳工死亡	村　别	劳　工	劳工死亡
大台	8	2	大岭	30	3			

注：此系不完全统计，出劳工总数约400余人。

按表中数据，劳工死亡率为16%。



珲春要塞大小五家子山之间抛弃劳工尸骨的“死人沟”



海拉尔要塞万人坑一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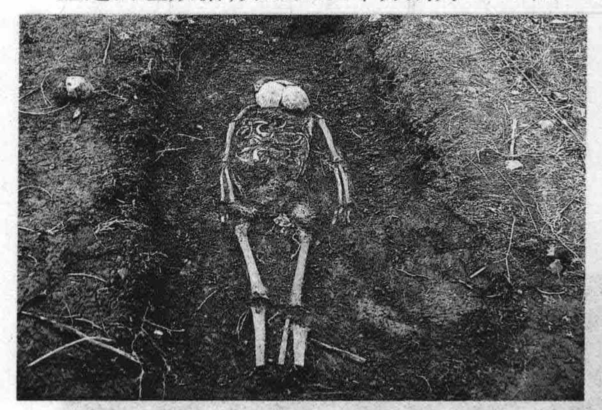
另据1993年对锦西钢屯镇征劳工及死亡情况调查：全镇22个村共出劳工499人，死亡60人。据调查者说明：该项调查是不完全的，原因是当时许多人家雇用了外村或城镇的人出劳工，其人数和伤亡情况本村人无从了解，已无法统计。按统计的人数，劳工死亡率为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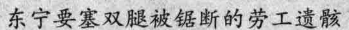
据凌源市志办公室调查：伪满时凌源地区（含建昌、喀左）被抓劳工情况，1939年仅要路沟、山嘴子一带被抓劳工就达300余人，不到一年仅剩下100余人。按此数计算，劳工死亡率超过50%。

据《台安县志》记载：“康德八年，全县被抓去劳工1 372人，被折磨致死致残的达800多人；康德

十二年，被抓去 1 600 多人，到免渡河给日本人修工事，死去 700 多人。”①

上述两组数据，劳工死亡率分别为 58% 和 44%。




东宁要塞双腿被锯断的劳工遗骸


东宁要塞劳工遗骸

据《绥中县志》记载：“1942 年 2 月，伪县公署强征‘国兵漏子’2 160 人去乌奴耳修军用公路，服苦役期间因冻饿、疫病和被毒打，大量死亡，回县时只剩下 1 000 多人。”②这些勤劳奉公队员的死亡率为 46%。


霍尔莫津要塞李志云控诉书

三、要塞幸存劳工的回忆与证实

张喜武（1943 年虎林湖北站修飞机场）：所在的“第二中队 250 人，回来时只剩下 73 人。”③死亡率为 70%。

张树海（1943 年乌奴耳）：“大队下设中队，一个中队四个小队，我在二中队二小队，一个小队 60 人。有的大队只剩下不到一半人了。各中队情况不太一样，第一中队就没剩多少人，我所在的二中队死了一半人，其中的第一小队死人最多，没回来几个人，二小队、三小队能死一半，四小队人却没有死的。每天都能死四五个人，山坡上到处都是坟包。”按上述各小队情况总的估算，死亡率约为 50%。

侯春玉（1943 年乌奴耳）：“劳工上面的人死的多，水土不服，咱街上张满他们干活的山沟 700 多人，死剩 100 多人。人死得惨，身上像黄纸似的，嘴一咧，第二天早上往外一搭，哪个棚子都搭仨俩的”。据此数字，死亡率超过 80%。

孙宝林：“1943 年到东宁城子沟当劳工，县里编成一个大队，共 1 600 人。到 10 月死了 723 人。”④据此，死亡率为 45%。

---

① 《台安县志》，1981 年内部版，第 100 页。

② 《绥中县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年 12 月版，第 15 页。

③ 张凤鸣、王敬荣主编：《残害劳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6 月版，第 127 页。

④ 孙宝林：《忆起一段心酸事——说说我去劳工的遗遇》，载《榆树文史资料》，1984 年第 5 期。

张录(1944年去黑河山神府修机场):庆安一共去了307人,干了5个月苦工,活着回来的仅有68人。[①] 死亡率为78%。

冷凤仪(1944年去虎林):和我一起去的劳工有500多人,可回家时只剩下100多人了。[②] 死亡率为80%。

刘俊清(1944年在五岔沟):"我们这批五六百人,到原定的七个月劳动期满时已死了三分之一,死者都往山沟里一扔,任由狼群啃噬了。"死亡率超过30%。

王树熙(1944年在瑷珲大城、嫩江金水):"我们从沈阳一起出发的300多人仅生存了29人"。死亡率为90%。

吴月庆(1945年,五岔沟):"五六个月时间,这1 500多人死了500多。"死亡率为33%。

武心田(1943年,黑河):"三个月的时间,我们这1 300人的劳工队,死的只剩下500人,800名难友惨死在日本法西斯暴行之下。"[③]死亡率为60%。

尽管这些劳工幸存者对劳工死亡数量的估计有的可能不十分准确,在减少的劳工人数中也有逃跑的,但逃跑的人所占比例极小,总的分析相差不会很大。正如幸存劳工张喜武所说的:"第二中队250人,回来时只剩下73人。这个数字我记得非常清楚,一点儿也不会有差错。大家都是老乡,朝夕相处半年多,不管死了谁都挺伤心的。"如果加上绝密工程中被集体屠杀的劳工数量,劳工死亡的比例完全可印证战犯所供述的劳工死亡比例。



东宁劳工坟

据上述各种资料推算,由于日军的残酷奴役与虐待,从1934年到1945年8月,在各边境要塞等军事工程中,共死亡中国劳工至少达100多万人。

第三节　关东军给劳工家庭造成的创伤

关东军在中国东北中苏、中蒙边境修筑要塞等军事工程,强征和奴役中国劳工320多万人,造成了100多万劳工的死亡,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死亡劳工大都是青壮年人,来自100多万个家庭,是这些家庭的支柱和主要劳动力,他们的死亡给这些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巨大创伤。许多家庭在丈夫死后,妻子或被迫改嫁,或忧伤而死,造成人亡家破的惨境;还有许多家庭在儿子死后后继无人。关东军为修筑边境军事要塞不仅直接奴役320多万人,还造成许多青壮年为了躲避被征被抓而逃离家乡,流离失所,对劳工所在地区的农业生产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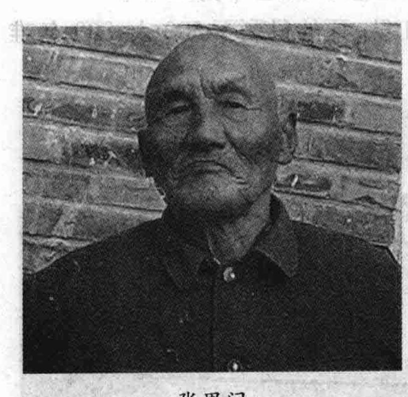
日军为修筑要塞征派、抓捕和奴役中国劳工,对劳工及其家属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造成了长期的影响和损害。即使得以回家的劳工,因为在服劳役期间遭受非人的待遇与奴役,大多数人患有关节风湿、腰腿痛、消化不良或皮肤等方面的疾病,造成早衰、早亡或留下终身病痛。更严重的是,非人的奴

① 于洪乔:《劳工血泪》,载孙邦主编《伪满史料丛书·伪满社会》,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7页。
② 冷凤仪:《我当劳工的遭遇》,载《肇东文史资料》第1辑,第37页。
③ 《日本枪刺下的中国劳工·华北劳工协会罪恶史》,第83页。

役给劳工及其家属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精神创伤,被采访的劳工及家属每当提起这段往事,至今仍悲痛万分,乃至声泪俱下,许多天不能恢复平静,足见当年受日军伤害之深。

第六章 幸存劳工忆述

第一节 特殊劳工忆述



张思问

一、张思问回忆东宁特殊劳工暴动的经过

张思问,曾用名张世文,男,1922年生,河北省新河县寻寨镇寻寨村人,是1943年由陈恩领导的东宁特殊劳工暴动的亲历者。此材料根据学者周艾民、陈云来2003年11月1日访问记录整理。

我原籍就是新河寻寨人,小时念了四年书,当年我父亲张海江在高义开饭铺,我辍学后就在父亲的饭铺里当帮手。不久日本鬼子来了,在这一带修炮楼。1940年1月份,日本鬼子抓我去打更,就是帮他们站岗。那时我有18岁了。后来八路军来了,把打过更的人都叫去问话,教育老百姓不要为日本人干事。那些打更的人都跑了,我没跑。我当时想,整天受日本人的气,还不如当兵打日本,我就自愿当了八路。我刚当兵时就在10团4连,司令员是陈再道,团长叫陈之斌,四川人。4连连长叫王什么臣,排长叫徐士珍,班长叫什么名字忘了。我用的枪是捷克式步枪。从此当兵打日本鬼子,打了不少次仗,有时一天就打好几次仗。我们主要活动在冀南新河、南宫、枣强一带。1943年初,天挺冷,我们在枣强和日本鬼子打了一次大仗。日本鬼子人多,能有一万多人,我们人少,总共不超过三个团的兵力。日本鬼子从南往北横推,我们边打边退,跟鬼子打了一天,一直打到天黑,打得好惨,我们被鬼子包围了。我右胳膊(上臂)挂彩了,让子弹打透了,差点没打到骨头。我藏在一个老乡家养伤,连队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只听说打到冀中时,八路军人多了,把鬼子打的不轻,把一个叫中山的日军司令打死了。我不记得养伤的那个村叫什么名字,那个老乡家的人名也记不住了。只记得有一天,我正在炕上躺着,被汉奸报告了,日本鬼子来了,一看我身上有血,就把我抓走了,弄到炮楼里,在一个小屋里关了起来。问了两次话,我也没跟他们说真的,我当了两年多八路,就说当了三四个月,啥也不知道。关了一阵子,就把我押送到山东德州一个集中营里去了。

在德州整天就是训练,吃不好,喝不好,吃完饭就练操。那里能有5 000人,什么人都有,许多人穿着八路军和中央军的军服。后来,就把我们全部押到德州火车站,把我们都赶进一趟闷罐车里,人进车厢后就把车门扭死,拉到东北去了。途中给干馍馍吃,喝凉水。拉尿都在车里,那味熏死人。一个闷罐里挤满了人,闷热闷热的,没有能躺下的地方。上车后,我靠车门口让冷风呲着了,头痛、发烧,我不吃不喝。上车前就有许多人病着。许多人喝了凉水都拉稀,折腾死不少人。到了山海关一带把车门打开,把死的快要死的人都扔下了火车。我看着喝冷水的人都拉稀,没敢喝,就活下来了。车里有几个人爬上气窗跳车,有的摔死了。我也想逃跑,不敢跳车,想等车门开了就跳,可是车门总是关得死死的。也不知走了几天,到了什么地方,最后下了火车,就剩我们40多人了。后来才知道我们是到了东宁。其余那些人都上哪去了我们也不知道。

到了东宁,日本人把我们弄到一个地方搞训练,我当时还病着,后来慢慢自己好了。我记得到了1943年的春天,就不再训练了,给我们分了班,当劳工,一个叫陈恩的八路军是劳工队长。我们40多人谁都不认识谁,也不问,整天不说话,我记得还有一个孩子,最多有十六七岁。后来用汽车把我们拉

到一个叫小乌蛇沟的山里，有个叫570的部队，整天有13个卫兵看着我们。那时河里已没有冰，岸上也没雪，但天还很冷。我们整天到一条沟里拉沙子，抬沙子，后来就拌水泥，在山上修炮台。石头子不是我们打的，也不是我们运的，石头子和水泥在我们到之前早就预备好了。炮台很大，是修在地下的，上面是圆的，下面是方的，像个房子，水泥墙有这么厚（双手比划，约40~50厘米）。开始我们就在日本工程师指挥下搭盒子板，搭好就拌水泥往里灌，一层一层往上浇，没有钢筋，都是沙子、水泥和小石子，是日本工程师告诉我们抬多少筐就抬多少筐，沙子、水泥、石头有比例。都是人工从山下往山上抬，除了卫兵在一旁站着，还有一个日本翻译官，年龄不大，看见有人偷懒，就用小石头打，喊着快干活。外出干活常有两个卫兵拿枪看着。下雨天不干活在屋里呆着，相互不准说话，谁的底细也不知道，连真名实姓也不知道。我们住的地方是在一个山沟里，住在一座泥墙草盖房子里，里面搭着对面炕，进门往里面走，还有一个屋子，是翻译官住的房子。说是炕，却不烧火，我们没有被服，日军给每人发了一条旧毯子，我们弄些干草铺在炕席上，也不脱衣服，裹着毯子睡，晚上点的是油灯。穿的是自己原来的那套破衣裳。日军发过一套他们的旧军装和一双破得不像样的翻毛皮鞋，吃的是高粱米和棒子面，听说一年每人就给一斤白面，棒子面都是我们自己用碾子推。吃不到什么菜。

有一次，卫兵押着我们几个人到小乌蛇村西北村一个有碾子的人家压棒子面，房东老头趁卫兵不注意时告诉我们，河那边就是苏联，你们咋不跑呢？再不跑，干完活就被日本人杀了。我们这才知道河那边是苏联。往河那边一看，那边山上有个哨所，山下是草地，也有林子。那个老头还说，以前来的人，都让机枪点名了。我们把知道的情况告诉了陈恩，陈恩也验证了河那边是苏联。后来，陈恩和一个叫王坤的八路一起暗中商量、串通，研究咋个跑法。他俩开始暗中打听谁是八路，都当过什么兵，干过什么事，谁能打，了解每个人的经历。陈恩找我时，我承认是八路，又都是一个团的。我说我不怕死，打死一个算一个。利用干活的机会，陈恩暗中通知：决定阴历八月十三那天开干。这天是卫兵大换班。从前的卫兵走了，又来了一伙新卫兵，有12个人，都是20多岁的兵，只有那个翻译官留下了。趁卫兵换班不了解情况时下手，是最好的时机。中午饭都是在山上吃。那天在吃饭前，陈恩同翻译官交涉，要求把一年的白面领出来，说是快要过八月十五了，翻译官不同意，陈恩还有一些人就跟他争。翻译官报告卫兵司令同意了。陈恩就让两个做饭的劳工去领白面，全蒸成馍馍。说是晚上回来吃，多吃，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在山上干活时也暗下叮嘱说，这是最后一顿饭了，吃饱了好有劲，还通知了开干的暗号，报名洗澡时喊“谁洗澡”就开干。陈恩是总指挥，他做了分工，谁打翻译官，谁打前门岗，谁打后门哨兵；然后一起打卫兵住的地方。我知道我是和王坤负责在报名洗澡时打翻译官。我们事先准备了几把砍柴刀，还有菜刀、尖镐、铁锹等家伙。

那天晚上干活回来天已经黑了，吃完饭，就预备开干。往常习惯就到了洗澡的时候。每天洗澡是日本人规定的，也有不愿意洗的。谁洗澡、谁报名，洗澡时有卫兵看着。洗澡的地方在院子里，用席子围着。里面有三个大铁桶，一个铁桶允许三个人一块洗，热水是自己在伙房烧，常用凉水。我们都到了屋里，有的站在地上，有的坐在炕上，翻译官站在炕前，促着大家洗澡，陈恩像往常一样问“谁洗澡？”这时，在炕上的王坤，摸起准备好的尖头锤子，站在翻译官身后，朝着翻译官的脑袋打了一下，好像打在翻译官的后脑上，一下就把翻译官打倒了，躺在地上嘴里光咕嘟沫，一声也没喊出来。我抽出藏在袖子里的尖头锤子，朝翻译官头上又砸了几下，只看见翻译官嘴里冒着沫，我就扔了锤子往门口跑。到了门口，看见门口旁边的卫兵还拿枪站在那里，分工打这个哨兵的人在门口来回走，我问那个人，你咋还不动手？看我的眼色行事！我拿了一把铁锹走出房门，直奔卫兵，走到跟前，装着要烟说了一句日本话：“有烟吗？请给我一只。”（说的是日语）卫兵说了声有，一手向衣兜摸烟，这时我看跟上来的人还不敢动手，我急了，说：“还不快下手”，那个人一下抱住了卫兵，我用脚又把卫兵绊倒，朝着卫兵脑袋就是一铁锹，好像砍在了脖子上，也没管卫兵死没死，就奔向房后的卫兵岗。跑到房后一看，那个卫兵岗没人了。我看见电话线没人弄断，就用铁锹勾住电话线，勾了几下也勾不断。这时大批人都拿着菜刀、镰刀涌向卫兵所，我也跑上去。卫兵所是单独一栋房子，一铺炕，有12个卫兵住在里面。

都睡着,枪放在墙边。当时我看见有卫兵往门外跑,前面的人就往里拥,用肩膀扛,把惊醒的卫兵挤到旮旯里,这样他们的枪就用不上了。我们一共抢了4支枪,是九九式步枪,有人还递给我一把枪刺。卫兵所里没有灯,有人喊把卫兵扭出来打,我也这样喊。里边的人就摸一个,扭一个,弄到门口就是一刀。刚砍到两个卫兵时,远处的机枪就响了,来了一汽车鬼子。可能是后门岗那个哨兵听到了什么动静,跑去打了电话,要不鬼子不会知道这么快。大伙慌了,陈恩就指挥大家跑。

我和一些人是最后跑的。我们在前面跑,卫兵所里跑出来的鬼子卫兵在后面追,还打枪,打死我们几个人也闹不清。跑到一条河边,我们这伙一共9个人,我和许多人都把鞋跑掉了。这时,我成了这伙人的指挥官了。我说别乱跑,听我的,我说咋跑就咋跑。我看了一下地形,发现河不宽,辨认一下方向决定越过河向北跑。等指挥大家越过河往北跑时,北边响起汽车声,还一个劲地打枪,我就指挥大家往东跑,又过了一条河。这时,日本兵追过来了,还有狗叫,好像有四五条狗。我是最后一个过的河,追上来的日本兵差点抓住我。我一边上岸一边喊:快跑!边打边跑!我们打了一阵子排子枪(连续射击),把日本兵火力压住了,这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我们再往东跑,让一道刺鬼(铁丝网)挡住了,大家都急得团团转。我出了一个主意,叫大家都脱光了,把衣服搭在刺鬼上,垫着爬上去,再爬下来。我们翻过刺鬼后,听见苏联兵打枪,不一会好像马队也过来了。我们还是往东跑,又遇一条河,水挺深,能没脖子,我们只好顺着河边走,看见有露石头的地方,我带头踩着河里的石头,一个挨一个过了河。苏联兵还在放空枪。我指挥大家往一条山沟里跑,跑进山沟里停下来。这时苏军到了附近,我知道中苏友好,就拍着巴掌向苏军走去,表示我手中没有武器。苏联人一看我是中国人,就把枪放下问我几个人。我说9个。我们把4支枪和一把军刺都交给了苏联人,他们就领着我们走了。这时,我们都穿着湿衣裳,冷得不行,苏联人就让我们生火、烤火,烤完火后又领我们来到一处有两座房子的地方。这时看见陈恩他们20多人早到那里了,正在烤火,我们就会合了。

后来苏军开来一辆汽车,把我们拉到双城子。在那里整天过堂,挨个人问情况,问了不知多少遍。我有什么就说什么。我说我是八路,让日本鬼子抓了当劳工,怎么闹暴动逃跑的。忘了在双城子那呆了多少天,苏军又把我们9人带到海参崴,从此再没见过陈恩等人。海参崴是个海口,把我们关在什么地方闹不清,是在五层楼上,都是铁门铁窗,我认为是大狱。开始还是每天过堂问事,后来有人给我们讲苏联的法律,说我们没有证明,犯了法,犯了哪条哪条,最后把我们都判了30年徒刑。以后又把我们9人送到一个叫24公里站的地方。在那里有人给我们讲国际形势,主要讲俄国和德国战争形势。在那过了个阴历年。有一天来了一个官,把我和一个姓王的领走了,从此,我和大家就分开了,再也没有见面。我离开24公里站时,苏方看管人员说要把我发配到新疆伊犁。我不出门,我说,你们判了我30年徒刑,我要蹲够30年再走。他说你走吧,走出这个门槛,30年徒刑就没了。我只好跟他走了。我跟着那个军官上了火车往北走,经过一个晚上,吃了一顿饭,又坐汽车走了一天,天黑时来到兴凯湖边上一个村子里住下。我住的是一个单独的房子。派来一个穿军装的山东人给当翻译,还有一个带两个小豆肩章的小军官经常给我讲打仗的事,后来让那个山东人专门教我打电报。在那里整天就是学打电报,他打电报我接,戴着耳机听,看字码本子。密码用数字组成,每组5个字码,表示一个意思。在学打电报期间苏军还发给我一套旧洋服,是灰色的,见过一次带着一个大豆肩章的军官,跟着一个带两个小豆肩章的小官,再没见过什么人。有一天,做饭的列佳要给我介绍对象,她领来一个俄罗斯姑娘,那姑娘问我要胖的要瘦的,要白的要黑的。我不说话,光摇头,后来她问我:"你看我行不行?喜欢不喜欢",我还是摇头,她和列佳就说笑着走了。

学习了不到一年,就派我背电台回东北负责电报工作。那是个冬天,走之前,我和三个俄罗斯军人喝过一次酒,是红酒,喝了一水桶,我们都喝醉了,睡了一天半才醒。那个带两个豆的军官也在场,就是他给我另起了一个名儿叫张庆恩,还给我起了个苏联名叫米沙。苏军军官为我们组织了一个三人小组,负责人叫佟安林,是个山东人,住在俄罗斯,有个俄罗斯老婆,他负责联络,来回跑。还有个叫秦三的是东安人,在东安开窑地,他负责掩护我。走时,佟安林领着我从兴凯湖一头出发步行越过国

境，走了一天多，记得过了一条河，最后到达东安秦三的窑地。那个窑地叫南窑地，我在窑地公开身份是工人，单独住一个屋子，负责向苏联方面发电报。不发电报时就把电报机藏在锅台里，发报时就拔下锅，把电报机拿到炕上，用被子盖着，我钻进被窝发报。这样做很危险，因为到处都是日本特务，窑地南头就有一个，一不注意就坏了。有一天晚上我正钻在被窝发报，院子里来了警察，秦三出门给挡住了。他在院里应付，我来不及把电报机藏起来，就用被子捂住了，走出门和警察打招呼。幸好警察没进屋就走了，躲过了一次险情。我在南窑地没干什么，也没发过几次电报，许多情报都是佟安林带过去的。好像发过一次我们到达南窑地的电报，发过一两次不知是从哪里接的密码电报，记得内容是日军在什么地方，一支部队走了多长时间，汽车、炮车走了多少时间，是用分钟计算的。可能俄国人接到后就能算出多少兵力，多少武器；也发过日军驻地周围是什么环境的电报。不久，电池用完了。到东北时，配的八块电池，其中有两块是小电池，全没电了，电报机等于没有一样。我就跟秦三说："你领我跑趟苏联吧。"他说："干啥去？"我说："电报机没电了，弄电去，要不啥也干不了。"秦三领我去了，可是没找到人，又把我送回来。这次去苏联，电池没弄到，却把我的一只脚冻坏了，还冻伤了一只耳朵。快回到窑地时天黑了，秦三说他有一个朋友，去他家吃了饭再走。等吃完饭，脚一热，我就走不动道了。好不容易回到了窑地，再也不能动了。我只好每天在屋里硬挺着，不敢到医院治，怕日本特务发现。我的脚伤经过一春一夏也没好，整天流脓，脚后跟都烂掉了。

1945 年 8 月，苏联红军打过来，日本投降了。打仗时，苏联红军派人找到我，给了电池，又用车把我送到勃力县，一面治脚，一面发报。在勃力有苏军的司令部，那个医院是苏联红军的一个点。到了 1946 年的春天，我整天没事干，请求回老家。苏联红军同意了，给了我 1 000 元钱，我又把多余的衣裳、鞋还有行李都卖了。那时往关里的火车还没通，有车就坐车，没车的地方我就走。脚上冻伤还没完全好，一瘸一拐，累了就歇一会，实在走不动了就趴下，有时走几步就趴下，饿了买点干粮吃。脚痛得受不了，就喝酒，喝了一路酒，把 1 000 块钱都喝酒了。一边走一边问路，有时问离河北还有多远？路上的人就说："你走吧，到吃饺子时就到了。"就是说得走到年根才能到家。我一共走了一个月零八天才回到寻寨老家。由于一路折腾，家里见着我时都没人样了。

后来我一直在家种地，高级社时当过小社社长，大跃进时当过民兵连长，文化大革命时还当过队长。村里的老人都知道我当过八路，可是找不到证人；我被日本鬼子抓去了，又逃到苏联，搞过情报，也找不到证人，直到现在也没什么待遇。我得脚病几十年也没好利索，整天流黄水，现在伤口干巴了，总算再也不闹心了。

张世文这个名字是假的。当时日本兵把我抓走，登记时我顺嘴报了假名，还说没念过书，怕连累家人。我现在就记住陈恩和王坤的名，王坤是暴动时当的班长，其他人的名字想不起来了。暴动时肯定有 40 多人。


鞠修经

二、鞠修经回忆被送到东宁当特殊劳工的经过

鞠修经，1929 年生人，原籍山东省安丘县人，现住沈阳市新城子区虎石台，沈阳煤业集团公司离休。此材料根据 2003 年 3 月 15 日采访录音和本人书面资料整理。

1942 年秋，我 14 岁时参加东北军，在 51 军 113 师 678 团输送连当勤务兵。51 军是山东境内主要的抗日部队，我当兵四个月参加了两次与日军作战，第一次在日照，第二次是 1943 年 2 月在莒沂边境，因敌强我弱被敌人包围，上千人被俘，我是其中之一。日军把我们押往青州，路上连续走了 5 天只给了一些花生饼吃。到了青州把我们关进监狱，共 1 200 多名俘虏分成 12 个中队，每个中队约 100 人住在一所大房子。房子里没有床铺，我们只能睡在水泥地上，一天两顿饭，一个窝头或一张煎饼，没有菜，渴了就喝院子里的井水。在青州把我们关了一个月，饿得大家四肢无力，站起来眼前发黑，许多人病倒了。我的脚被冻伤，疼痛难忍。有一

天12点多钟,通知集合,去车站上火车。因为火车是1点钟发车,监狱离火车站10多里路,日本人就命令跑步前进,路过街里时人很多,有些胆大的人就乘混乱之机逃跑了。

我们坐的是闷罐车,一个车厢装30多人。上车后日本人从外面把车门用铁丝拧死,里面空气浑浊。我上车后就病了,有个姓张的班长与我同乡,40多岁,他一直照顾着我。车到了天津,日军396部队接收劳工的人将我们带上了客车,每节车厢都有日本兵把守着。我病得四天四夜没吃东西,光喝水,一直挨到了东宁县。下车后有汽车将我们拉到距东宁县城20多华里的山里。那里是军管区,没有住户,沿途经过的山岭上都修着工事,有炮位和机枪掩体。

我们住的地方有6栋半地窖式洋铁皮的房子,每栋房子有几十米长。我们共有200多人,分成两个班,住第一、二栋房子,每班自己选出一个班长。我们的班长姓王。看守我们的是关东军396部队,附近另外还有两个部队,一个是123部队,一个是777部队,每个部队是一个团,总司令部也在附近,司令是个少将,曾给我们训过话。过了一个多月,又调来一批从河北抓来的战俘,有300多人,里面有不少人是八路军,编作第三班,住第三、四栋房子。第五栋房子空着。第六栋住着先期在此干活的29个人,据他们讲,原先同他们一起的人也有很多,所干的工程完工时,日本人说"在满"(家住东北的)留下来继续干活,"不在满"的送回家去。当时只有他们29个人报是"在满"的,其他人都被拉走了。没过20多分钟,就听到山沟里一阵枪响,此后再也没见到那些人,猜想日本人为保密将他们都枪杀了。住地外面围着五道铁丝网,上面挂满罐头盒子,有人碰到就响个不停。7月第三班有5名劳工逃跑,日本兵把我们折腾了四五天,最后枪毙了3名劳工才罢休。

先期工程是在山里挖山洞,我们干的是后期工程,主要是抹水泥和修隧道,而我干的是在河边装沙子和石子,供搅拌水泥用。我们每天天刚亮就由日本兵押送着上工,天黑后再押回来。除非下大雨,否则根本没有休息时间。

我们是2月到的,一直干到了10月份,日本人始终没有发过衣服和行李,只给了一件半破的黄军毯子,夜里冻得睡不着,都挤在了一起取暖。在这期间,有七八十人得了霍乱,我也被传染得了病,被隔离住进席棚子里。得病的劳工死了很多,严重时一天死三四个人。我幸亏得到同乡老李的护理,病渐渐好了,才脱离了一次灾难,重新回到劳工队伍里。

到了10月,天气冷了,日本人将我们送到了抚顺煤矿继续当劳工。我被分到了西露天矿,我们这些特殊工人住在单独的两个房子里,与其他劳工隔开了。我是装车的,每人都有任务量,3.3吨的车每个班要装完4个,干完发给两毛钱饭票,干不完不给。那年我才15岁,没有力气,累得吐了血。为了活命,我于1944年1月逃到了在龙凤矿的四叔鞠景文家,得到他们的照顾才活了下来。

三、武心田回忆日军对修筑黑河军用公路"特殊工人"的残害

武心田,男,1926年生,黑龙江省双鸭山市离休干部。此材料根据1998年11月16日王敬荣、高晓燕访问记录整理。

我原籍河北省,1940年10月参加革命,在八路军129师9旅25团当战士。1942年12月12日,在河北新河县兴风头村与日军作战时因伤被俘。同时被俘的还有李玉影等5名同志。我们先后被日本兵押送到新河和辛集的监狱,后押送到石家庄战俘集中营"劳工教习所"。大约在1943年3月初,日军从集中营里选出1 300多人,把我们押上火车,送到北平门头沟挖山洞,6月送到西苑集中营,6月下旬又把我们押上火车,一直送到黑龙江省黑河一片草原上用铁刺网围起的席棚子里,让我们在这里修国防公路。

我们住的床铺用木板子搭成,离地面有半米高,下面就是一汪汪的水和一丛丛青草,睡在铺上就像睡在小河的桥上。我们观察周围的地形,分析形势,看到这里一望无际、一人多深的大草原,东边很远的地方有山脉和森林。我们商量的意见是:这里虽然有铁丝网而没有电网,但逃跑也是很难的,如果毫无目的地逃跑,掌握不了方向,很可能跑不出去这大草甸子就被狼吃了。如果顺着铁道跑,会被日本鬼子抓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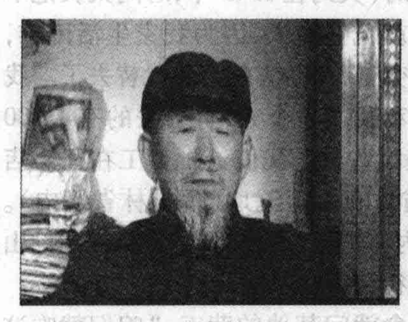
我们在黑河干的活是修靠近苏联的国防公路。每天早晨天亮就出工，晚上天黑才收工，每天往返工地和工棚子要走十来里地。上下工都要排队，由日本兵端枪押解着。我们所有的活动，吃饭、睡觉、干活，都被置于日本鬼子的监视之下，没有一点自由。日本鬼子对我们中国人根本不当人看待，视我们的生命如草芥。有个日本兵小头目叫渡边，这个人非常狠毒。有一天傍晚，太阳刚刚落下，我们在院子里的草地上休息，他走过来，掏出手枪，无缘无故地打死了一名难友。还有一个同志逃跑不幸被他们抓了回来。就在这天天快黑时，日本兵把我们赶到院子里，让逃跑的人给我们讲话。逃跑的这位同志大约二十八九岁，中等身材，毫无惧色。他大义凛然地站在那里大声地说："同胞们！这样牛马一样的生活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咱们来世再见吧！"说完，日本兵把他押到铁丝网外，那里事先挖好了土坑，他们让他蹲在坑边，一个日本兵用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枪，举枪向他的背后刺去。那位同志被刺倒了。接着日本兵又在他身上连刺几刀，直至他停止了呼吸。

除被日本兵残害死之外，大量的劳工因病饿劳累而死亡。由于吃不饱，劳动量大，饥饿、寒冷，有病也不给治疗，而且越有病不能干活的人，吃的东西给得越少，生病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有时一天就得埋葬20多个死人。日本鬼子还特别毒辣，让不能干活的病人去抬死人的尸体，让他们去埋死人。这对病人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一个病人，今天去抬同伴的尸体，明天就可能轮到别的生病的人来抬自己的尸体。对尸体的埋葬，只不过是在草甸子上挖一个2尺来深的大坑，十几个尸体往里一扔，掩上一点土就不管了，死者的胳膊、腿都露在外面。我曾参加过两次埋葬死尸，到那一看，已埋的死尸被狼啃得东一块、西一块，肠子拖得老长。从6月下旬到9月下旬我们离开黑河，仅仅3个月的时间里，我们1 300多人的劳工队死得只剩下500来人，800多名难友死在日本侵略者的法西斯统治之下。同我一起被俘的李玉影也惨死在黑河。

到了9月下旬，黑河的天气冷了，无法再修公路了，日本鬼子又把我们押送到伪奉天省辽阳弓长岭铁矿挖矿石。在这里，又死了许多同志，也有一些同志逃跑了。1944年2月，我也在同事的帮助下逃出了这吃人的地方，在附近的何家堡子干零活，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重新参加了革命队伍。

第二节　普通劳工忆述

一、关凤崇回忆被抓到珲春当劳工的经过


关凤崇

关凤崇，1925年出生，现住沈阳市大东区。此材料根据2003年4月9日访问记录整理。

我原籍辽宁省盖县，家里有父母和一个哥哥。1941年我16岁时去大石桥铁工厂学徒，干的是铁匠活。1943年3月，我正干活时，来了一群日本人还有翻译抓住了我，说是要送我当劳工。这样，我被带到了海城，有日本兵和伪警察持枪看守着。第二天，连我在内的200多人被押上闷罐车，车门都上了锁，三天三夜之后，我们在间岛省珲春县板石沟车站下了火车，又向山里走了十多里才到达干活的地点。我们海城这200多人算是一个大队，附近另有两个大队分别来自辽阳和盖县，每个大队住两个大席棚子。

当时板石沟的工程刚动工。我们到后的第二天开始修盘山道。日本人手持棍棒监工，见到干活慢就打。我的耳朵就是在那时被打聋的。盘山道修好后进行分工，有铁匠、木匠、石匠等技术工和挖土方等力工。我是铁匠，先是在山坡上支起木架子，挂上草帘子，可能是要防止东边的苏军侦察。接着就放炮炸山，三层楼高的山都被炸平了。修工事时第一步是支水泥盒子，由铁匠绑铁筋，然后浇灌水泥，水泥干后撤掉水泥盒子，再把石头都抬上去，接着抬土、重植草皮，炮眼预先留出位置，整个工程

结束后，与原来的山形基本一样，外表根本看不出山里藏有暗堡。我整天扛着铁筋去各个山头做活，凡是修有炮垒的地方几乎都到过，据我估算我见过的炮垒至少有30多个。

劳工所干的都是重活，可是供给的食物却少得可怜，一天三顿饭，早上一碗高粱米饭，中午两个窝头，晚上是玉米粥，没有菜，只给些咸盐水当菜。日本人的住址距劳工棚四五里远，他们有一口井，不许劳工用。我们在山里干活渴了就只得喝河沟里的水。

干活挨打是家常便饭，人不吃饱饭哪有力气干活呀！在5月份左右，一个劳工干不动了，遭到日本人的毒打，我们海城的大队长姓李，上前和日本人讲道理，也被打了一顿。晚上回来后，日本人来把他抓到日本人住地继续拷打，次日押走了，直到最后劳工回家也没再见过此人。

还有一次，有一名辽阳劳工逃跑失败被捉，被逼着跪在两根圆木上，肩上另压一根大木头。日本人将所有劳工集合在一起，边打他边对我们说，这里是国境线，戒备森严，谁都休想逃跑，今天就给你们瞧瞧他的下场。还威胁我们说，满洲人有的是，死几个没关系，今后再有逃跑者一律打死。一顿暴打后，那名劳工被押走，不知去向了。

到了七八月份，天气转热，山里小咬、蚊子特别多，晚上休息不好，白天活又累，劳工们陆续开始患病，症状是头疼、无力，有的口鼻流血，严重的甚至便血吐血。可是日本人对此不闻不问，还强迫出工，干不动便打，许多病人当场被打死，也有的干着干着突然倒在地上死了。死去的人就被扔在沟里不管了，任凭狼群撕啃，一两天后尸体就成一堆骨头了。

到了11月天冷了，我春天带的棉衣都破烂不堪了。为御寒，我把褥子抠个洞，套在身上，用草绳一系，还算能对付。脚上因为只穿双单鞋，都冻破了，肿得像个馒头似的，勉强去上工。监工嫌我干活慢，起初是拳打脚踢，后来用棒子打。晚上回去，我便发起高烧，还拉肚子，可是第二天仍得坚持上工。

好不容易挨到了12月，山里下起大雪，无法干活了，日本人才将还活着的劳工送回了家。因为我年纪小，劳工们都爱护我。我在板石沟认了个干爹叫吴云清，是海城大甲屯的，还有一个干哥哥叫刘金生，是海城南台的，他们都很照顾我。劳工遣返时，是干哥将我背上火车的，一直把我送到了家里。我们海城去的200多人只回来了100多，一半人死在了板石沟。回来后，村公所曾给每个劳工发放过一个劳工证，可惜现在遗失了。

二、于洪义回忆在珲春当劳工的经过

于洪义，1925年出生，现住瓦房店市阎店乡郭家村。此材料根据2002年7月16日访问记录整理。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和哥哥都给别人扛活。在我十八九岁时（大约在1943年，时间太长记不清了），附近石佛寺村有个叫韩永发的人被摊派了劳工，他不愿去，就花钱雇人，因为我家生活困难，他家给了五石粮，雇我父亲代替他出劳工。这时我父亲也被摊派出劳工，没办法就由我代替去了。我们村去的有于洪春、于国政（已故）、于洪成（已故）、于洪番（已故）和我共5个人，全县去的有1 000多人，另外还有其他县的人，但管劳工的人不让互相打听，不知都是哪些县。我们这批劳工在瓦房店火车站上的火车，闷罐车开了两天一夜才到了做工地点——间岛省珲春县阿五地（现吉林省境内）。这里离苏联很近，只隔着一道铁丝网。当时天气很冷，劳工住的屋内有炉子。我们到了后就开始挖山洞，周围的山上都有劳工在干同样的活，山洞有的是作仓库用的，大得可以在里面开汽车。

劳工的境遇极其悲惨，吃的是橡子面，我刚去时见到这样的伙食就问其他的劳工："咱们就吃这东西啊，能吃饱吗？"他们告诉我："只能是这些，就这还不管饱呢！"事实正如他们所说的，一顿只给一小勺，饿得大家根本没有力气干活，可干不动又得挨打，只好咬着牙拼着命干。如果得了重病，日本人不但不给医治，反而将奄奄一息的病号举起来往地上摔，要是没活气，拖出去就喂了狼狗。我们只管挖洞，干了9个月，等这些洞挖好，就放我们回来了，后期的工程是另由后来的劳工干的。万幸的是，我们村的5个人都保全了性命，可是有很多人都命丧在阿五地了。


佟玉贤

三、佟玉贤回忆在东宁“勤劳奉公”死里逃生的经过

佟玉贤，1920年生，现住沈阳市新民县胡台乡前公太村。此材料根据2003年5月12日访问记录整理。

我原籍是沈阳市新民县沙岭堡村，13岁丧父，随母亲迁到了现在的前公太村。1942年春天，我在沈阳的一家店铺学徒，被征派为“勤劳奉公”队，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到北满出劳工。临行前，铺上给我拿了一身黄衣服和一条灰毯子，没给我钱，说是等回来后再结账。那天，在沈阳站上的火车，有十二节，每节车厢装百人左右，听说还有几车陆续发出了，据说这一次整个沈阳共出了七八千人。

火车到延吉后休整了一夜，第二天上车后换火车头时，车身一震，车门合上了，我正扶着车门向外张望，当时被车门夹住了脖子，流了许多血，顿时昏了过去，直到图们才醒过来。火车又走了两天，到了黑龙江省东宁县，有一个日本人和两个中国把头领我们到了劳工房，是那种屋顶铺着油毡纸的大房子，房子里搭着板铺。开饭时，吃的是高粱米饭，里面掺着米壳，还有沙子。大家见与来之前所说的待遇不一样，都很不满，有的发牢骚。两个把头听了大发雷霆，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勤劳奉公也是劳工，就得在这住，在这吃。”我们看见把头这么凶，就没敢说别的。第二天一早，把头就来了，拿着镐把敲打着板铺，把我们都喊起来上工卸火车。就这样，我们在东宁干了一个多月，天天装卸火车。因为活很累，加上天冷，与我挨着住的一个姓于的劳工身体弱，夜里被冻死了，日本人用两根铁丝绑着腿就拖出去了。东宁离苏联近，有想逃往苏联的劳工被抓住后就被打死了。那些日本人是毫无人性的，死在他们手里的劳工数不胜数。

到了秋天，我们被转到了东宁县万鹿沟继续卸火车。到万鹿沟后，才吃到了一点菜，就是萝卜咸菜。阴历八月节时分，奉天慰问团来东宁看望劳工，发给我们每人一块肥皂，一个手巾。当慰问团询问劳工们的生活状况时，我年纪轻，口无遮拦，如实地说这里不给饱饭吃。没想到随同的日本人中有懂中国话的，暗暗地记住了我。慰问团走后，有个侍候日本人的博役（辽阳人）下午悄悄跑来告诉我：“你闯了大祸，恐怕过不了今晚，日本人就要把你喂狼狗了。”我吓得跪下求他搭救，他也很为难，就出主意说用钱贿赂日本人或许可以免祸。但当时我身无分文，想来想去，只有随身的那条毯子还值点钱，就取来毯子交给他去换钱。他到镇里卖了四块钱，用三块钱买了瓶酒和一些鸡蛋打点日本人，给我留了一块钱。当天夜里倒是平安无事，我以为日本人放过我了。没想到第二天过来一个日本人，眼珠子都红了，二话没说，揪着我的衣领就摔，连摔我七八个跟头。我昏了过去，他又命令劳工们一同打我，可劳工们都不忍下手，这才气哼哼地走了。过了三天，日本人又把我带到了劳务科，一个日本人拿管钢笔往我眼睛上戳，吓得我赶紧躲开了。然后，一个外号叫大金牙的日本人左右开弓狠命打我的嘴巴，血顺着我的嘴角往下淌。大金牙打累了，就叫那个博役把我拖到狼狗圈喂狼狗。狼狗圈离劳务科仅百米之遥，博役带着我往外走时，偷偷告诉我赶快逃。我走到半路，就拼命向铁丝网跑，翻过铁丝网时连衣服都刮破了。

我跑回万鹿沟就病倒了，接连五天水米未进。博役来看过我，向日本人求情，说我已经病得不行了，不要再为难我了。日本人见我确实病得很重，才同意把我送到了医院。在医院中，每顿只给一小碗饭，根本不给治病。虽然如此，同在医院的两个劳工给我出主意，叫我就在医院呆着，尽管吃不饱，但总比回去受累挨打强。就这样，我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到阴历9月时，劳工期满，我才随着其他人一起回到沈阳。

四、贾满顺回忆被骗到东宁当劳工的经过

贾满顺，男，1917年生，原籍河北张家口，现住黑龙江省东宁县大肚川镇，1938年被骗招到东宁当劳工。此材料根据2000年春访问记录整理。

我是伪满洲国康德5年春天被西松组招工招来的，那年我22岁。当时说是去天津修飞机场，到

了天津等了一个多月，又坐船到了营口，在营口呆了20多天，坐火车一直到了绥芬河，又走了几天来到了东宁老黑山罗圈。西松组开始时一共招了5 000多人，但在天津和营口停留时，大部分人都跑了，到终点罗圈时只剩下1 500多人，住在十几个大席棚子里。100多人住一个席棚子，用木杆就地搭起地铺，上面铺草帘子，人就睡在上面。我们的任务是修铁路大桥，挖桥墩地基，打水泥，都靠人力完成，背、扛、挑土篮，人海战术。除了西松组外，参加修桥的还有义和祥组、松浦组，据说松浦组参加修铁路的共有2万多人。这年夏天连续下了70多天雨，河水上涨，一场大水把松浦组的人大部分都冲跑了，淹死了。大水退下去后，河套两边、柳树毛子里，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死人。我们的席棚子建在地势较高的山坡上，不然也被一齐冲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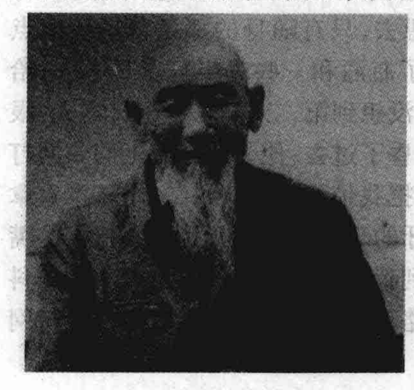

贾满顺

我们每天吃的是苞米面窝窝头，后来还往里掺橡子面，又苦又涩，咸盐水煮黄豆就是菜。从来不发衣服，只发过一次胶鞋。我从家穿来的衣服不长时间就穿坏了，没有穿的，就只好把洋灰袋子用手揉巴揉巴，绑在腿上、胳膊上、缠在身上，当衣服穿。天冷时，身上冻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每天早上天刚亮时，二柜把头就拿着镐把来招呼上工，有时人累得爬不起来，他们就用镐把打，大家再难受也得起来。有病的实在打不起来，就把你送到病号棚子里呆着，也没人医治，时间长了，半死不活的就把你扔到棚子外面去了，连冻带饿，用不了多长时间人就不行了。人死了以后就用席子一卷，让几个劳工随便挖个坑埋了。我们住的工棚子里就死了七八十人。参加修大桥的共有5 000多人，干了两年多，只剩下1 000多人了。

修完桥，又让我们修公路，从路两边往路基上挑土。我是挑土篮的，每天上来下去，挑100多斤重的土篮，累得要死。由于吃不饱，又没衣服穿，冬天手脚冻得直冒水，一直干到元旦才歇工。

我在西松组一共干了将近五年劳工，除招工时给了10元钱，其余一分钱也没给。想跑也跑不了，因为到处是日本人设的卡子，我们又没有路费，没有劳工证，逃跑的抓回来，就用镐把打死，这是我亲眼看见的。直到活都干完了，才把我们放了。由于没有路费回不了家，我就在大肚川落下脚了。

五、梁德云回忆被抓到东宁当劳工暴动逃跑的经过


梁德云

梁德云，男，1912年生，原籍吉林省图们甘河镇，现住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饶河县，1937年被抓到东宁当劳工。此材料于2000年5月根据本人口述整理。

1937年我26岁，在图们甘河镇八里木造纸厂当工人。这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延吉那边的秧歌队到图们演秧歌，我们一些人去观看。看完秧歌往回走时，路过一个十字街口，就被日本兵给围上了，旁边还停着一辆黄色军用车，被围的人中还有穿长袍马褂的。我们被赶上了车，一直把我们拉到一个破帐篷里，不让我们出来。到了第五天晚上，又押着我们上了图们去牡丹江的汽车。到了牡丹江换上火车，不等天亮，日本鬼子就把我们赶下车，让我们在一个山头上打石头。活干完了，当天晚上又把我们的眼睛蒙上，赶上火车，下了火车又稀里糊涂地上了汽车，走了两天车停了。我们被赶下车，都懵头懵脑的，不知道东南西北，更不知道这是哪里，只看见眼前一片大草甸子，不远的地方有很多席棚子。一起把我们拉到这里的共有40多辆汽车。后来才知道，这里归东宁管辖，离老黑山不远。

到那里后，日本人让我们挖战壕。开始时给的是军用小铁锹，铁锹没开刃，把又短，挖不动，常常挨打，监视我们的日本兵还说我们笨，干活磨蹭。后来有了大铁锹，干起来稍好些。挖出的土要自己背出来。每天早上天一亮就得起来干活，一直干到天黑，一天要干十三四个小时，把人累得要命。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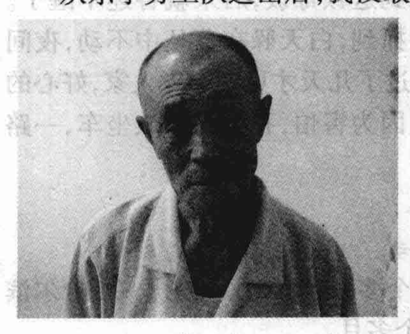
们走出工棚子干活时，日本兵还要到棚子查一遍，如果发现有人没出工，揪出来就是一顿大棒子。

我们吃的是豆饼面和橡子面做的窝窝头，吃的时候得用手捧着，不然掉到地上就捡不起来了，就得挨饿。赶上阴雨天，席棚子漏，被褥浇得湿漉漉的，没人管。干活时两人说话是不行的，得挨打。我们每天走的路都是一人多深的沟，收工时得把眼睛蒙上，手拉手，后面有日本兵端着枪跟着，草甸子上有日本兵端着枪在上面押解，我们在沟里走。到吃晚饭时，天已漆黑。我们所有的活动，吃饭、干活、睡觉都在日本鬼子的监视之下，没有一点自由。上厕所也得看着，还得请假，不请假不给他们行个礼就不许你过去，有时还无缘无故地打一顿。每天吃橡子面，胃肠不好，总想上厕所，日本人就说我们想逃跑。我们说话，他们听不懂就打人。我们住的工棚子里有一个小伙子，被打得很窝火，再加上想家，就病倒了，起不来，不能去干活。做饭的大师傅给他送一碗豆饼粥，他没喝。过了一会儿，就来了两个人，用两个草袋子，两边用棍子捅个眼，像担架式的把他抬走了。这个棚子有了病人，日本人让那个棚子的人来抬。日本人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不等死就抬出去。死了一个中国人就像死一只鸡、一条狗一样。

我们修的战壕分许多岔，有的向东挖，有的向西挖。有一天，有个领头的人说："快开支了，你们有钱花了。"我们还以为真的给钱。有一天我去上厕所，然后顺着厕所的铁刺网子爬进了柞树林子，偷看对面的山坡，那儿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有3米宽，四五米长。据说这天开支，机关枪就在开支的棚子里，开支的人站在离棚子三四米的地方，机关枪就开始扫射，不知毙了多少人，只看见当兵的往那事先挖好的大坑里埋。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开支"。看完以后，我的心怦怦直跳，匆匆跑回了工棚告诉了工友。工友说："你找死啊，吵吵啥。"这样又不声不响地过了几天。一天，正好派我们到几里外的地方干活，有日本人押解。吃早饭的时候，大师傅说："好好多吃点，要不你们挨累，早晨起得早，晚上回来得晚。"我听出他的话实际上是叫我们多吃点，意思是说你们要跑就跑吧。4个日本兵押着我们顺着战壕走得很快，天还没亮就到了，得接着战壕头干，有四五个岔子，每个岔子都有十个八个人，日本兵在草甸子上居高临下看着我们。就4个日本兵，我们人一分散，他们看着的人就不够了，我的心也就踏实很多，觉得有力量了。

到了中午，送饭的来了。大师傅说："吃吧，吃完了自己好去开支。"我的心吓得直扑腾，心想这下完了，没命了。正巧是吃午饭的时候，大家互相递了一下眼色，几个人对付一个日本兵，大家一起动手，用铁锹和镐把就把4个日本兵给砍了。砍完之后，我们尽快把他们埋了起来，拿起枪和子弹就跑。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决不能再被抓回去。我们在水甸子里跑，不能叫他们看到我们的脚印，这一跑就是半天，天黑以后才上了旱地。从旱地往远看一片漆黑，后来才知道这就是老黑山。这时我们悬着的心才稍微踏实一点。一天半后，我们出了林子，就各自跑了。

从东宁劳工队逃出后，我没敢回家，四处打零工，解放后到饶河落了户。


曹树德

六、曹树德回忆在虎林当劳工死里逃生的经过

曹树德，原名曹树成，1928年6月26日生，1947年参加革命，现住瓦房店市老虎屯镇雅化村。此材料根据2002年8月10日访问记录整理。

1943年夏，我正在读小学，一天放学回家，看到母亲一边烧火做饭一边哭，就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母亲告诉我说：县公署指派屯长征劳工，我哥哥被县里要了劳工，很快就走。我家里共兄妹六人，一个哥哥当时已成家，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我父亲身体不好，哥哥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嫂子为此也总是哭哭啼啼的。我就对母亲说："我不念书了，替哥哥出劳工吧。"父母同意了。就这样，我带着家里准备的行李来到了瓦房店。我们同村被摊派劳工的共三人，有邵新年、李学政和我，那两个人和我去的不是一个地方，听说也是在北方，具体地点说不清楚了。在县里有日本兵看守着，当天，满载着劳工的闷罐车向北开去。车窗遮得严严的，什么也看不见，一直把我们拉到伪

东安省虎林县东仓库。

虎林东临苏联边境，我们干活的地方周围都是山，见不到住户，远处便是虎头镇，日本兵在那里和附近都有驻军。我们住的是木棒搭架的席棚子，有十多间房那么长，四面透风，下雨时漏雨。席棚子就搭在草地上，夏天蚊虫肆虐，叮咬得浑身是包；冬天时棚子里也不许生火，劳工只好盖着家里带来的已经破烂得露棉絮的被子穿着衣服在寒夜中煎熬。棚里是两层铺，我住下层，由于挨近地面，极其潮湿，而且上铺有人还偶尔尿床，就像下雨似的，可是又不敢出声。共有十多个这样的席棚子，劳工有上千人都住在这里。席棚子外围拉着铁丝网，有一个朝南开的大门，门两侧是岗楼，日本兵在上面持枪站岗放哨，旁边有两个狼狗圈。

到虎林后，给劳工每人发一个茶缸子拴在裤腰带上作为饭碗，吃的却只有半碗高粱米饭和半碗稀汤（所谓的汤就是用咸盐水兑的）加一个土豆，或者是橡子面窝窝头，有时吃的是掺沙子的小米饭，嚼起来格格直响，只能皱着眉硬往下咽。吃饭要排队去领，日本兵还端着上刺刀的枪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监视，严禁劳工吃饭时交头接耳，要是看谁不顺眼非打即骂。他们养的狼狗睡觉时还铺着海绵垫子防潮，吃的是大米饭。在那个做亡国奴的岁月里，劳工们竟然不如他们的狗呀！

因为卫生条件极差，棚子里跳蚤、虱子四处乱蹦乱爬，劳工们身上的虱子就更多得数不清了，晚上大家痒得受不了就抓，有的甚至直接用铲子铲。日本人做的更绝，他们如果见到后，干脆在劳工棚边支起蒸笼，烧好水后，将劳工聚集在一处，命令全脱光衣服，坐在地上等着，他们把衣服放在屉里蒸，冬天也是如此，根本不顾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赤身裸体的劳工们。

干活的地方离住处很近，让我们干的是修山洞，挖战壕，用于防御苏联进攻，所有的山头上都有劳工劳动，满山都是山洞。劳动强度极大，完全用人力挖洞挑土石，日本兵架着机枪、端着刺刀在劳动现场警戒，严禁劳工左顾右盼，即使是鞋带松了弯腰去系也不行，如果觉得谁干慢了就用棒子、皮鞭劈头盖脸地打，有的当场就用刺刀挑死了。我们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不如的食物，本来就饿得浑身无力，哪有力气从事如此繁重的劳作，劳工们连累带饿，很多人病倒了，可日本人说是装病，根本不给治疗，而且有时硬说是得了传染病，拖出去喂了狼狗。当时几乎每天都要死几个人。有的被打或生病无力再为日本人卖命干活了，日本兵过来往野外拉，又担心没有断气会趁机逃跑，就找来席子，把人卷上，再用绳子捆牢才扔。虎林山上狼特别多，夜间狼嚎声不绝于耳，这些可怜的劳工不用说肯定是成了狼的口中之食了。死了的劳工有的被随便找个地方挖坑埋掉，有的浇上汽油或架在木柴上焚烧，也有的弃之荒野，任凭狼群撕咬。

就这样过了一年多，1944 年秋季时工程接近完工，日本人为保守军事秘密，对劳工们下了毒手。一天，他们借口改善伙食，向劳工们供给了大米饭，暗中在里面掺放了毒药，将劳工们都毒死了。万幸的是我在此前十多天一直生病，拉肚子，后来已经水米不进，没有吃到这顿毒饭，后来就昏迷不醒了。等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了野外，周围都是死人。我担心被日本兵抓到，白天躲在草丛中不动，夜间悄悄朝着一个方向往外爬，渴了就找水坑里的水喝，饿了挖野菜吃，过了几天才见到一户人家，好心的主人留我住了三天，等我身体稍稍有所恢复后辞别他们继续赶路。因为害怕，我始终不敢坐车，一路讨饭走了两三个月才回到了家。

七、冷凤仪回忆到虎林当劳工的遭遇

此材料转引自《肇东文史资料》第 1 辑，第 35～37 页，士隆整理，题目有改动。

伪满洲国时，我曾先后去做过四次劳工。第一次去佳木斯，一个多月；第二次去亮子岭（哈尔滨东南方向），两个多月；第三次去黑河，六个多月；第四次去虎林，十个多月。

去虎林那次是最苦的了。那是康德十一年（1944 年）冬天，我的哥哥冷凤君摊上了劳工。我跟家里人说："哥哥年岁大，在家里是主心骨，我年岁小，又轻手利脚，还是我顶哥哥去吧。"说完，全家人都哭了。因为去当劳工，死的多，活着回来的少。家里人没办法，也就只好让我去了。走时，家里东借西凑了 15 元钱，嫂子用布把钱缝在我的棉袄里子上，家里人一再嘱咐：到那别饿着，饿了买点吃的。在

去往虎林的路上,这15元钱被劳工头宋谎子(谎子是外号,原名不知)知道了,他非要借不可,恳求说:"借给哥哥用用,过几天就还给你。"我心眼儿实,就借给他了,结果一直不还,我才知道受骗了。

到虎林后,我们住在山上用草苫搭的工棚里,一个工棚30多人,地上铺点谷草,我们就睡在上面。屋子里非常冷,被子又薄,睡觉时大伙挤在一起,互相暖身子。

我们干的活是挑沙石修道,一挑沙石足有100多斤,得挑着走六七十丈远。那时干活不论小时,只记得两头不见日头。天天吃不饱饭,一顿饭只给一个一两左右的小窝头,粥像清水似的。吃不饱饭,又干这么重的活,哪能受得了?一次,我饿得难受,挑土篮走得慢了点,日本鬼子监工冷不防用木梓子打在我的背上。我疼也不敢吱声,只好咬牙挺着。又一次,我挑得少了点,被日本鬼子发现,边骂"八格牙鲁",边扯着衣领打我。劳工头宋谎子打骂劳工也不次于日本鬼子,一次因干不动活他打我,我哀求说:"宋谎子哥,你让我回去就回去,你不让我回去就一板子把我打死得了。"他仍不住手,还一个劲地打我。劳工们饿得干不动活,挨打受骂的次数太多了,几乎天天都有。时间长了,有些身体弱得就受不住了,一个个病倒而死去了。我想,我这样饿下去也活不了啊。想起一家的老小,不能死,还要活下去。可是怎样活下去呢?买点吃的,兜里没有钱;找点野菜吃,又是大雪封山的时候;跑吧,各地都有岗哨,害怕被抓住。每天只得紧紧裤带,咬牙去干活。

到了过年(春节)那天,我们干了一天活,说晚上给改善伙食。可是到了晚上,宋谎子给每个劳工发下来两个烧饼。实际应发四个烧饼,另外两个叫宋谎子给克扣下来,偷着卖了。每个烧饼也就一两左右,我吃完了两个烧饼,觉得肚子里还是空空的,饿得特别难受。实在受不了啦,看到山下有几堆火,那是正在炼死去劳工的尸首。"吃死人肉去",脑子里这样想着,两条腿也就跟着往山下走去。半路上又停下来,看见火光里有几个人影晃动,这几个人是看着炼尸的劳工,不能让吃。等他们炼完吧,一想不行,等他们炼完了,不就剩骨头了吗?再说还不得找个地方把炼完的尸首埋起来,现在去正是时候。我什么也不顾了,一口气跑到炼死人的地方,看到炼的死人脑袋已没模样了,糊巴拉啃的;肚子那部分囫囵点儿,烧得吱吱响着。我边看边琢磨吃哪儿,脑袋没肉,肚子那地方也没有多少肉,还怕烧不熟,只有大腿肉多能烧熟。于是我抢上前去,拎起死人大腿就撕着吃。吃了一口没有什么邪味,就接二连三地吃下去。看炼尸的劳工都愣住了,过了一会儿向我大声喊:"别吃,药着!"我不听,他们动手打我,我还是拽着死尸的大腿往下撕肉,狼吞虎咽地吃着。他们看我真是饿急眼了,不忍心打我了,我就吃了个饱。

我吃人肉的事传开了,日本鬼子为了防止劳工吃人肉,死人就不炼了,挖个土坑埋了。第二年夏天,我病了。刚开始有病我不敢说病,硬挺着干活。因为日本鬼子知道你有病就给你打针,打上针病人过不久就得死。劳工管日本鬼子打的药针叫"死人针"。后来我病倒了,就在这时,"八一五"东北光复了。劳工那个乐呵劲就不用说了,准备回家和亲人团聚。和我一起去的劳工有500多人,可回家时只剩下100多人了。

八、谷永利回忆父亲谷振斌被抓劳工的经过



谷振斌

谷永利,1932年6月23日生,辽宁省瓦房店市退休干部。其父谷振斌于1939年被抓到黑龙江省虎林当劳工,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返乡。此材料于2003年9月根据谷永利本人回忆资料整理。

我家原籍辽宁省东沟县。在我7岁那年即1939年农历7月3日,我父亲刚从田间劳动回家吃午饭时,突然保甲领着两个身穿黄绿装、头戴大檐帽、腰系皮带挎洋刀的人,来到我家,命令我父亲去当劳工。我父亲说我给人家种地,还给老刘家看坟,脱不开身。来的一个人上前打了我父亲一个嘴巴子,当时我吓得躲到鸡窝里。这时我看到保甲拖我父亲,带洋刀的警察拿出绳子绑我父亲。我父亲不让绑,那个带洋刀的警察抡起洋刀朝我父亲砍去,我父亲头顶偏右侧被砍,血从头顶沿前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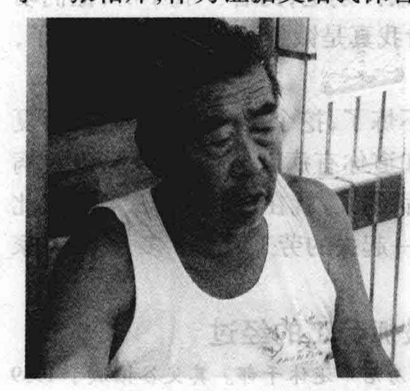
流到腿上,他们三人一起动手将我父亲从背后绑上押走。我家遇上塌天大祸,母亲抱着我们哭成一团。父亲被抓走后,音讯皆无,我们失去了生活支柱,靠乞讨艰难度日。

1945年祖国光复。我们全家老小做梦也没想到,这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深夜,大雪铺地,久别的父亲带着残疾回到家中。父亲回到家时,头发又长又乱,身上衣衫褴褛单薄,裹着一块破狍子皮,已经不像人样了。全家人相认,悲喜交加。父亲在家养了好长时间,才渐渐恢复过来。后来,慢慢听我父亲讲述了他被抓后的情形。

我父亲被抓走后,被押到安东(今丹东)火车站,装进闷罐车押送到黑龙江省虎林的军事工程工地做苦役。地点是靠近苏联的一个山沟里,劳工都住在就地搭起的大席棚子里,每个席棚子住80人,吃的是高粱米、苞米面和橡子面混合的窝窝头,吃不饱。患病不给治,人死了就喂狼狗。劳工统一编成大中小队,班长是利用中国人,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都是日本人,还有日本宪兵队临场监视。劳工们不分昼夜,轮班挖山洞,挑土篮子。劳动时间长,活也特别累。有时瘟疫流行,劳工大批死亡,日本人根本不救治,有病的劳工带气就被活埋。劳工们不堪忍受酷役折磨,有的就寻机逃跑。逃跑不成被抓回的劳工,就被日本人当着广大劳工的面打得皮开肉裂,然后拉出去枪毙。有时还把抓回的逃跑劳工绑在大树上,浇上煤油点火活活烧死,日本人还哈哈大笑,说死了死了的好……也有的劳工逃跑被抓回来,被大头朝下吊起来活遭罪,或被灌煤油、灌凉水,肚子灌大了再用脚踩。许多劳工被折磨死,有的没死就活埋或喂狼狗。日本鬼子采用这些毒辣手段,目的是想防止劳工逃跑或怠工。有一次,一个姓陈的劳工干活稍慢了些,被监工的日本人用镐把暴打,他忍痛不住,跑到我父亲身边,监工的追过去又打,把镐把打成两截,并打伤了我父亲的脚大筋,造成残疾。我父亲脚伤未好,日本人就叫他上工,说是照顾,让他清理山洞外的排水沟。因父亲伤未好,干不了,被班长告到日本队长处,又遭到日本监工用皮鞭毒打,把我父亲打得满地翻滚,嘴唇打成血肿,凸起了一个大血包,几天无法吃饭。后来形成疖瘌无法恢复,其他人叫我父亲"谷大嘴唇子",父亲受尽侮辱。

我父亲在虎林整整当了七年劳工,备受摧残,在那当劳工的绝大多数都死去了,他侥幸活了下来,直到祖国光复,他从阴历七月一直走到腊月底,受尽千辛万苦回到家中。父亲生前,于1963年特意照了一张相片,作为证据交给我保管,嘱咐我有朝一日控告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九、张富盛回忆到富锦出"勤劳奉公"的经过


张富盛

张富盛,男,1924年生,辽宁省瓦房店人,现住瓦房店市老虎屯镇雅化村,1944年被征派到伪三江省富锦县太平乡五顶山出"勤劳奉公"当劳工。此材料于2003年8月13日根据本人回忆资料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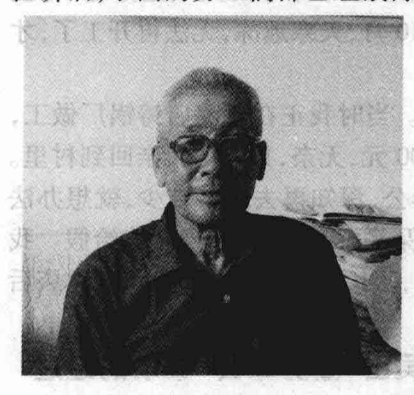
1944年4月,我和曹景轩、谭加福、宋茂福一起被征派到伪三江省富锦县五顶山当勤劳奉公。按当时伪满的规定,勤劳奉公要在三年内每年出一次,每次四个月,不去不行。

我们在五顶山整天修工事,在山上挖大坑,够深够宽后浇灌水泥,修成一个大房子,上面盖上水泥板,重新覆上土,植草种树,外表跟原来一样,满山都有这样的工事,可即使走近也看不出来。吃的每顿饭只给我们一碗稀饭,用黄豆和高粱米煮在一起,甭提多难吃了,还没有菜,大家饿得都去山上采野菜。我有一次在山里无意间发现一个通气孔,趴下往里一看,见到工事里还有日本兵在里面睡觉。工事有的是做仓库用的,与我同住的一个劳工在仓库搬运物资时,曾偷偷拿回了一小包盐,回来后分给我一些。盐在那里相当珍贵,伙食中根本没有,因此我节省着用,直到回家前也没舍得全吃完。

我所在的是第三大队,与宋茂福在一起,曹景轩和谭加福在第二大队。一个大队三个中队,一个中队四个小队,小队还分四个分队,20个人一个分队,由一个日本兵监管,干活慢了非打即骂。上下工还得像军人一样站成四排,把锹镐扛在肩上打起精神来走路。到了工地得脱掉上衣,叠好放在地上,光着膀子干活,天冷时也是如此。

到了阴历8月23日，我们劳动期满，开始从山上往回返。从富锦乘船四天才到佳木斯，上船前每人只发了两个饼子，到了佳木斯后，大家饿得随地捡些生土豆或白菜便吃。从佳木斯上火车也不给发吃的，直到哈尔滨才发了四个窝头，一直挨到瓦房店。下车后，动员科召开劳工大会，当官的在台上正在讲话，下面的劳工们都已经饿得全倒在地下了。

十、于福顺回忆当“国兵漏”被派到富锦服苦役的经过



于福顺

于福顺，1923年生，原沈阳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退休，现住沈阳市铁西区小七路14号。此材料根据2003年8月9日本人回忆资料整理。

我原籍辽宁省瓦房店市谢屯镇七间房村（伪满时称奉天省复县望海村七间房屯），全村一百户左右，四五百人口。家里兄弟四人，我最小，读过三年书，17岁时离家到大连一家铁工厂学翻砂。1942年我虚岁20岁时，村里通知我去检查国兵。因为我在前几个月因翻砂时不小心将脚踝烫伤没痊愈，检查国兵没被检查上。负责检查的日本医生以为我是故意弄伤的，当场骂我“良心大大的坏了，死了死了的有！”并左右开弓打了我一顿耳光，打得我鼻口流血。没有检查上国兵，就成了“国兵漏子”，要出三年“勤劳奉公”。

1943年4月，村上通知我，派我出勤劳奉公，到辽阳北的张台子修哈大道。与我同去的还有同村的王乐田。我隶属于第二中队第六小队，中队上有大队，总人数不清楚，只看到北边的席棚子一眼望不到边。我们住的席棚子，就地铺上干草当床，每个工棚对面铺睡60人，正好一个小队。伙食是由中队统一做饭，各小队派人去抬。每顿都是高粱米饭，每人半碗，再加一勺清汤，根本不够饱。上工只管挑土，小队分成四个组，每组有定量的任务，不干完不收工，早上四五点钟就去，干到晚上五点多才收工。干活时挨打是家常便饭，还经常被搜身翻行李，见到钱就没收。席棚子两头都有日本兵持枪站岗，想逃也不容易。到了6月，有一天夜里狂风大作，把席棚子都刮飞了，住地一片混乱，我就乘机逃走了。辽阳离普兰店500多里路，白天不敢走，便一直昼伏夜行，半个多月到了普兰店，没敢回家，到“盛德东”铸锅厂当了工人。后来听说日本人去我家找我，可是家里也不知道我去了哪里，也就不了了之了。到了第二年，因为还要出勤劳奉公，家里又没钱雇人，父亲只得四处寻找并找到我，把我带回了家。

1944年3月末4月初，我第二次被派出勤劳奉公，去的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富锦县距苏联边境不远的一个大山谷里挖山洞。从瓦房店坐了七八天的火车，在佳木斯又换船行了三四天，下船后坐汽车到了山里。我所在的是勤劳奉公队第六大队，有十几个住人的席棚子，刚去时天还很冷，住的是地铺，在地上铺些干草取暖，天暖些后，干草都发霉了，身子压不到的地方还长出了青草。下雨天，席棚子里漏水。当时劳工中间流传着一段顺口溜：“天上下大雨，棚内下小雨；天上不下了，棚内还嘀嗒；草铺下成流河，腰腿痛受折磨；喊天天不应，呼地地不语。”潮湿的生活条件使多数人都落下了腰腿痛的毛病，我的腿就总抽筋，一抽筋就疼。吃的不够，为了生存，大家就背着日本兵到山上挖野菜吃。山上有一种野菜我们给它起名叫四叶菜，根是白色的，外形像水萝卜，一有机会我们就挖着吃。这种菜不知使多少人保住了性命。由于长期挨饿，我又得了胃病，常常胃疼，吐酸水。劳工们有了病也不敢报告，强挺着干活，不然的话就会被送到医院。一旦被送到医院，十有八九不能活着回来。西南方向的山谷里有所医院，那里的劳工病死的就抬出去火化，几乎三两天就有死人，每次看到远处升起黑烟，就知道又在火化了。我们小队有个姓张的，是复县卧龙屯人，一家来了堂兄弟俩，哥哥有点发烧，送到医院的第三天就被火化了。据传说病重的人有的没死就火化了，怕是传染病。劳工棚的四周围着铁刺网，加上离家乡有2 000多里，没法逃跑。

我们每天干的工程是在山顶上挖大坑，每个坑20多米深，直径十几米，我们小队在富锦的8个月里挖了3个大坑。挖坑一律用镐、钎子，不用炸药崩，可能是担心对面的苏联人察觉。刨下的碎石和

土由勤劳奉公队员排着队从坑内向上挑。谁走得慢了,小队长张口就骂,举手便打。在盘山道上还可以看到有多处装着铁门,有的山坡到山顶上明显有一条不长树、只有草的地带,还有的地方连草也像后栽的,可以推测下面一定修着工事。我还听见过翻译指着图纸对中队长说:“这往上有7米多厚的水泥”,我在工厂干过几年,能看懂图纸,我在富锦工地上曾瞥见过中队长手中拿的图纸上标有“将校室”、“休息室”的字样,可想而知,我们所挖的山洞是军用的。直到10月,天寒地冻,无法再开工了,才送我们回家。

1945年4月,村公所通知我父亲,还要派我第三次出勤劳奉公。当时我正在普兰店铸锅厂做工,父亲找到我说,如果不去得交500元。我当时一年的工资还不到400元,无奈,只好随父亲回到村里。第二天到村公所报到,当天就去了瓦房店。我已经出了两次勤劳奉公,深知再去凶多吉少,就想办法躲避。我向队长提出请假到普兰店取行李。队长说得大家给我作保,再交100元押金才能给假。我没有那么多钱,交了50元押金,又找一同出勤劳奉公的几个人作保,队长也同意了。我去了普兰店后就再没回去,算是躲过了这一劫。几个月后,伪满洲国就倒台了。

十一、姚醒民回忆在孙吴出“勤劳奉公”暴动的经过

姚醒民,男,1921年生,天津荣军假肢厂离休,现住辽宁省灯塔市沈旦镇小堡村。此材料根据2003年4月28日采访录音和本人提供资料整理。


姚醒民

伪满时,我家住奉天小东边门外三家子,那时我名叫姚国治,解放后更名为姚醒民。我因为家穷,1934年就随父亲进入了伪满奉天造兵所学徒,受尽了日本人的欺压。一次,我在给绘图员川琦倒水时,不小心把玻璃杯掉到地上摔碎了,川琦拿起一根铁管打在我头上,当时我就不省人事了。父亲带着几个人把我抬到了医院,头上缝了七八针,至今我的头骨还有个坑。

1941年春天,伪满政府检查国兵。因为我长得瘦小体弱没合格,就被征入了勤劳奉仕队。集合地点在皇姑屯车站东面的一个旧仓库,门口有个牌子写着“勤劳奉仕报到处”,有专人在门口登记。我在上午十点多钟赶到了集合处报完姓名、住址后,登记员告诉我到里面等,不许随意走动,上厕所也要请假。到了仓库里一看,已经来了好些人。下午一点多,开来一辆汽车,给我们送来一些馒头。一个穿灰大衣的人叫我们出来站队,并向我们训话说:这次勤劳奉公的地点和任务,是去哈尔滨北边黑河修仓库、卸火车。活不累,吃得饱,吃的好,还有玩的地方,一个星期休息一天,一年期满就回来。然后将我们五个人编成一组,四个小组为一个分队,加上分队长共21人,四个分队为一个小队。后来才知道讲话的人就是大队长。晚饭后开来一辆闷罐车,带队的领着我们上车后,站台上有人关上了车门,并用铁丝把车门从外面拧死了。

在车上大家聊天时,互相通名报姓,彼此认识了。现在我能想起的有:李忠孝(山东人)、陈绍棠、康连喜、刘鑫、张景春等。这些人中有的是检查国兵不合格征为勤劳奉仕的,有的是别人花钱雇来的,有的是替亲属出劳工的。火车开三天三夜,也不知道是到了哪里,等车停下后,有人打开车门,我们下车立即呆住了,只见到处是炮楼、铁丝网和电网,站台上每隔四五米就站着一个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手端的步枪上了刺刀,还有的日本兵牵着狼狗,正虎视眈眈地警戒着。带工的汉奸们喊叫着我们下车列队,站成两排。有几个日本军官在翻译和汉奸的陪同下,从我们面前来回走了两趟,也不知他们说了些什么。接着,有人领着我们走到了车站北几里地远一个由电网围着的劳工宿舍前,按小队分配了宿舍。后来我们才知道日本人把我们带到了黑龙江省(当时是黑河省)的孙吴。

我们住的劳工宿舍是土房,中间开门,进门是四口大水缸,绕过去就是两铺炕,也有窗户,不过钉着铁条。一个宿舍容纳一个小队84个人,由小队长负责。都安排完后,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吃完饭,大家就休息了。第二天早上日本人给我们打防疫针,究竟是什么药谁也不知道。接下来给我们消毒,又是洗澡,又是蒸衣服、行李,足足折腾了一天。到了第三天,就开始正式上工了,小队长训话说:

"只许干活，不许乱说乱动，解手要拿出恭牌。"我们干的活是装卸火车和在仓库里搬运各种物品，仓库里有各式各样的草袋捆、大小木箱，有时在某个仓库中摆放这些物品，有时按照要求将一个库的东西全搬到另一个库去。劳工们从早忙到晚，却不给饱饭吃。每顿发一个窝头，最初是玉米面，后改为高粱米面，以后又成了由橡子、豆饼、树皮等磨成的混合面，总之什么都可以往里掺。这样的杂面窝头又苦又涩，为了活命就得往下咽。菜就更不像样了，带叶的萝卜、带根的白菜、烂土豆、臭韭菜，随便冲冲就往锅里一扔，连点油星都没有，就是这样的菜也不多放，煮了一大锅汤，基本是光喝汤了。不仅如此，汤上还经常漂着一层小黑虫，看着恶心极了。可是不吃就得挨饿。劳工们气得都去找做饭的人，那人一脸无奈，对我们说："在这里根本不许出去买东西，日本人发什么，我就得做什么。你们是劳工，我也是劳工，你们吃这个，我也得吃这个呀！"

我们二中队一分队有个家住奉天小南门叫陆汉章的劳工，20岁，瞎了一只眼，长得膀大腰圆的，就因吃不饱，活重，整天累得腰酸腿疼的。有一天他搬运豆饼，日本人规定每人每趟必须扛三块，他实在扛不动了，走到半路摔倒了。他爬起来见地上有摔掉的豆饼楂，就捡起来吃了。日本兵有个伍长看见了，硬说他是有意破坏，吩咐一个叫佐佐木的日本兵用皮带抽得陆汉章遍体鳞伤，第二天还得照常出工。我们小组有个湖南人叫张福来，也因体虚乏力，摔倒后将背的木箱磕破了，日本兵松井把他捆起来毒打了一顿。第二天，张福来便发高烧，上工时都走不动路了，是大伙扶着他去的，到了仓库也干不了活。我是组长，报告了分队长，想让他回去休息，分队长不敢做主，就请示小队长，小队长向日本监工松井说情，这才允许张福来靠墙边躺着。张福来有病怕凉，我顺便拿条草袋子给他盖上，可他仍说冷。好不容易到了下班时，大伙轮换着背他回到宿舍，卫生员找来医生给他打针吃药，这一夜平安无事。次日出工前，分队长找来医生，医生说张福来病很重，不能出工，这样就留下他休息。等我们收工回来，发现他不见了，小队长去问，说是他住院了。劳工房院里根本没有医院，只有个医务室。从此，我们再也没见到他，后来听说他死了，还有人说是被日本人用车拉走了。山东人李忠孝也是得病昏迷不醒，被日本人用车拉走了，此后也下落不明了。类似情况在劳工房内还发生过几起。为此，劳工们有所猜疑，因为在我们北面三里地左右有个工厂十分反常，光围墙就有5米多高，立有一个大烟囱，有人说是砖厂，可从没见过有运砖车出入，烟囱冒的烟也不是黑色，而是白色或淡黄色的。很多人都说那是个细菌研究所，不知李忠孝等人的失踪是否与它有关。此外，我还亲眼见到一个叫关启德的劳工不堪忍受折磨触电网自杀了。

最使人忍无可忍的是日本兵丧心病狂地污辱中国人的人格。这件事引发了劳工们自发的强烈反抗，组织了暴动杀死了侵略者，并投入了革命队伍。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奉天来的劳工中有个姓马的，回族，20岁左右，大家都叫他小马。他会说点日本话，被日本人选中当了博役即勤杂工，在门卫室侍候日本兵，负责烧水、劈柴、跑腿送信。他白天在门卫室，晚上回大队部睡。有一段时间，大家忽然听说他病了，一直在宿舍休养，我们就去看他。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下，他才吐露了实情，原来他所得的病竟是被泯灭人性的日本卫兵长期鸡奸造成的脱肛。他声泪俱下地讲述了被凌辱的经过：有一天下大雨，他没事可做，一个人在门卫室打盹。站岗的卫兵原川太郎走进屋来与他说话，先是对他挑逗，接着就命令他脱光衣服。小马不从，原川就拔出刺刀相威胁。小马被逼无奈，只得顺从了，就这样，小马就被原川鸡奸了。第二天，原川见到小马又给烟，又给糖，极力拉拢他。尽管小马对原川愤恨至极，可也不敢发作。此后，原川更加肆无忌惮，在当班时多次对小马施暴，有一次还带来一个日本兵来合伙凌辱他。最惨的一次是一天夜里十点多，小马正在睡觉，原川来叫他去给门卫室生炉子。小马到了门卫室一看，炉火红彤彤的烧得很旺，察觉到上当了，但想逃也来不及了。原川反身将门插上，拦住了他，此时从里屋里又出来两个日本兵，三个人不由分说，就把小马抬到里屋"轮奸"了。小马的肛门疼得都麻木了，第二天就无法上班了。大队长知道后也没说什么，就让他休养了，另由劳工匡海栋接替他当了博役。

大家听到小马的遭遇后无不义愤填膺，决定要惩治暴虐的侵略者，捍卫中国人的尊严。匡海栋当

年42岁,河南人,富于心计,是行动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他利用在门卫室当博役的便利条件骗取了日本人的信任,又秘密在劳工中联系了20多个志同道合的同志,其中包括我。事后我才知道,匡海栋和劳工中的冯敬久、沈玉堂、赵有才都是从河南来的中共党员,出劳工以前就一直在奉天进行地下工作,这次来孙吴当劳工实际是受组织的委派打入日军军事要地探听情况,等待时机率领劳工破坏军事工程的建设计划。其中冯敬久的身份是大队医生,在这次行动中担任了组长。我们商量:日本兵把守严密,劳工房外围圈有电网,硬冲硬打恐怕难以成功,必须寻找时机杀死警卫,然后悄悄逃跑。

到了12月下旬,沈玉堂利用卸车的机会告诉我:组织决定在日本军庆祝圣诞节的那天晚上10点准时暴动,杀死警卫的任务有专人负责,我们的任务是负责监视劳工队内部的异己分子和抢门卫的枪支弹药。之后,我又和冯敬久、赵有才碰了头,他们都有各自的任务,定下的联络暗号是手电的光亮,行动顺利为一长亮三短亮,如果有特殊情况发生就一亮即灭。到了圣诞节那天夜里,日本卫兵从外面带来两个日本女人,在一起饮酒、跳舞,纵情狂欢。匡海栋负责伺候日本人,他按照事先安排,悄悄地将冯敬久弄来的麻醉药溶进了酒和饮料里。这种麻醉药是伤员做手术用的,药力奇强,那10个卫兵和日本女人喝下去后,没用多久便倒在地上人事不知了。在劳工房中焦急等待的同伴们收到了匡海栋发出的行动顺利的信号后,立即冲向了大门。这次无声的战斗共收缴三八步枪10支、手枪1支、手榴弹20多颗、子弹数百发。然后,我们七八十劳工沿着预先商量好的路线迅速越过日本兵的警戒线,经过两天两夜的连续奔跑到了湖通镇。

湖通镇是个三角地带,往北八九十里就是呼玛县,往西是加格达奇,往东过河不远就是苏联边境的斯沃博德内。我们到了这里一研究,觉得在这里驻扎比较理想。冯敬久分析了形势说:我们多数人是被征来的,日本人对我们的个人情况了如指掌,回家等于是自投罗网,不如去找抗日联军,一同打鬼子。在暂时无法与抗联取得联系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能去吃老百姓,他们都很穷,甚至一家三口只有一床被,干脆拉起队伍劫富济贫。有人提要打出抗日联军的旗号,赵有才说:我们还没找到抗联,不能打抗联的旗号,就叫东北义勇军吧。就这样,我们成立了东北义勇军。开始时有六七十人,但渐渐地一些人脱离了队伍。

我们四处活动时,有些老百姓问我的姓名,我担心给家里带来麻烦,因为我姥家姓杨,就自报假名杨有。我们人单势孤,条件非常艰苦,在克山一带活动快走投无路的时候,来一名妇女找到我们,自称叫张苦莲,指名要见东北义勇军的负责人。谈话中,她说自己是抗联将领李兆麟的联络员,并拿出了联络信和身份证明,此行的目的就是要请我们去参加抗联。当时我们只剩下13个人了,大家一致同意参加。张苦莲给我们写了封信,让我们去依安火车站等候。我们安排人到了依安,果然有人前来接头,这样就与抗联接上了关系,匡海栋还得到了李兆麟的亲自接见。从此,我们这些历经苦难的劳工加入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革命队伍。

十二、刘培义回忆到黑河、五岔沟当劳工的经过



刘培义

刘培义,1915年7月生,现住沈阳市铁西区艳粉小区。此材料根据2003年5月10日访问记录整理。

我原籍山东,1928年随父亲来到东北沈阳,曾在东洋珐琅工厂当学徒。珐琅工厂是日本人开的,主要生产标牌。由于长年同日本人打交道,学会了一些日本话。1942年,我家摊上了劳工,当时父亲年纪大,哥哥成了家,没办法就由我去了,把我们用火车拉到黑河修铁路。到那一看,能有四五千人,住的是大席棚子,一个棚子住100多人。我们干的活主要是挑土篮运土,垫路基。刚开始时土篮子不太大,还不算太累,渐渐地挑土的土篮子就换成特大号的,活就重了。饭食最初只给煮土豆,大伙吃了后都闹肚子,病得干不动活,日本人才让我们改吃玉米面粥。

有一次,我挑的太重,半路上摔倒了,脸、手都蹭破了,日本人不但不同情,还过来打我。由于吃的不好,活重加上想家,我就病倒了。队长摸我的头热得烫手,便让我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日本人来逼我出工,我病得实在起不来了,就没去。到了晚上,日本人命令一个赶车的老武头来把我拖到沟里去,实际是想把我喂狼。我哀求老武头救我一命,老武头同情我,悄悄把我带到山沟中的一个树林里掩藏了起来。这个地方离工地有一段距离,挺隐蔽,已经有几个像我一样的人在这里养病。老武头花钱给我买了水果罐头吃,我吃过后出了一身汗,感觉好多了。可是老武头没让我立即回去,怕日本人还要害我。养了两天,吃了些干粮,身体有所恢复了。我没别的地方可去,又重新回到了工棚子。日本人看见了,说你怎么没死?对我"死而复生"感到惊异,却也没理会,反正有人干活更好,就让我干活去了。我们一直干到了11月,天气已经很冷,上冻没法挖,铁路也修得差不多了,日本人才放我们回来。

回沈阳后,父亲去别处干活去了,我就与叔叔住在了一起。到了第二年春天,叔叔家也摊上了劳工,我本来也没有生活出路,就替叔叔家出了劳工。这次是到五岔沟出劳工。在对劳工点名时,因为我会说几句日本话,就被日本人指派为小队长,领着32个人。我对这32个人说:当队长的没有一个好东西,我是有良心的人,你们跟着我不会吃亏。火车过了白城子又走了很长时间到了五岔沟,我们小队被分到了绿水车站装卸火车。领头的日本人叫冈村,在车站旁边有个小房当办公室。两天后开来一列货车,拉的全是粮食、水泥和钢筋,这32人有老有小,老的近60岁,小的不满18岁,一直忙到半夜才卸完。第二天,货车又来了,我就对冈村说人手不够,得另派人来。冈村一看确实如此,就答应了。过了一段时间,又调来60多人,由3个小队长带队。那3个小队长都不懂日本话,我半懂不懂的,却也比他们强,冈村就不让我卸火车了,让我领着人去修公路。

一天,我正在干活,跑来一个劳工对我说:冈村正要活埋一个叫"于瞎子"的劳工,你能和他说上话,快回去救人。我问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于瞎子"头天晚上拉稀得了重病,干不动活了,日本人正在活埋他。我一听就火了,都是从沈阳来的,怎么忍心见死不救呢?我急忙赶到车站一看,坑都挖好了,眼瞧着就要活埋了。我冲进冈村的办公室讲情,冈村二话没说,就抽了我两个耳光。我也没退缩,对他说:这样的不行!冈村转身就想从墙上摘枪,被我抢先一步摘下枪扔到门外去了。正在危急时分,来了一辆摩托车,下来一名日本军官和一名翻译。那名翻译我认识,也是从沈阳来的。他们一看围了一群人,停下来问是怎么回事。情况搞清后,翻译对日本军官说了很多话,看样子是在替劳工说情。那名军官对冈村说了一大堆话,我听出他说的意思是冈村没长头脑,埋人地点在车站附近,人来人往的,这些劳工没造反把你打死就算便宜了,赶紧把人放了。冈村一连"哈依!"(是)说个不停,马上命令放人,日本官和翻译走后,他还对我说:你的对。过了几天,上边另派来一名日本人接替了冈村。

到了八月,卸车的活干完了,公路也修好了,日本人又调我们进山里去修山洞。我知道修山洞的活累,就自行决定让14个重病号和年老体弱者请假回家了,只带着18个人进山。日本人见我带来的人少了将近一半,大发雷霆,硬说我收了贿赂,逼我承认。我没收贿赂,问心无愧,坚决不承认。日本人就把我绑了起来吊着拷打,打了整整一天,昏过去用凉水泼醒再打。劳工们都来说好话,一再保证没有收受贿赂,日本人这才把我放了。

我们修的山洞是在山体里挖成的,在石头中钻眼放炮,四周支起水泥盒子,灌注水泥,最厚处有80多公分。劳工们每天上工时都得扛着一袋水泥上山,我是队长,不用扛,有时看到体弱的扛不动,就帮一把。在山上,一个山洞就得干一天一夜,要一气干完,只能轮班休息。修山洞时死的劳工就更多了,有的是带着气就扔了。有的尸体摞在一起架起木柴炼,然后也分不清到底是谁的骨灰,随便抓一把往小匣里一放就是这个人的骨灰盒了。就这样又干了一个多月,我们的期限到了,才放我们回来。

十三、王树熙回忆被抓到瑷珲当劳工的经过

王树熙,1927年4月30日生,原籍山东省莱州市掖县城关区南关村,现住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离休前曾任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此材料根据2002年6月2日访问记录整理。


王树熙

我小时候家里很穷，我父亲年轻时闯过关东，到过苏联，身份说不清楚。七七事变后八路军五支队曾在我家乡建立了一个抗日根据地，我参加了儿童团。1941年日本军队占领了我的家乡，有一次父亲去破坏日军的电台，被日军抓捕杀害了。我当年14岁，生活没有着落，就到东北投奔沈阳的一个亲戚，在他家开的油漆铺里做学徒，以后在大连、鞍山、辽阳等地做零工，1944年又回到了沈阳。阴历3月20日这天，我在日本站（现沈阳站）附近等电车，过来两个穿着旧西服的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做工的。他们让我出示劳工票（当时给工厂正式职工发的凭证），我回答说，我是做零工的，没有劳工票。他俩说："没有劳工票，跟我们走吧！"然后不由分说，连拖带架地带到一家旅馆。旅馆里有一百多像我一样被抓的人，门口坐着两个手拿镐把的打手，防止有人逃跑。

我在旅馆里呆了七八天，被抓进来的人达到了300多人。一天，来人发给我们一套更生布做的棉衣和一双棉胶鞋，然后都押上了闷罐车。火车开了三天，通过车厢的小窗可以看见路过了哈尔滨、孙吴，到了一个叫山神府的地方，车在此停了很长时间后又向山里开，一直拉到了瑷珲县大城，离苏联国境不会超过60公里，这天是农历四月初一，我们下车时正下着大雪。这里已为我们搭好了棚子，用桦树杆支成人字架，两层席子，中间加层油毡纸，铺上当地产的茅草。一个棚子住30人，共有10个棚子。

我们这些被抓的劳工吃的是苞米面掺橡子面的窝窝头、大馇子（玉米粥），没有菜，日本人为让劳工多干活，有时给每人一小把咸盐豆。当地没有井，我们喝的是冰雪融化后流到河沟里的水。大概连日本人都没想到的是，兴安岭由于人迹罕至，树叶等腐败物堆积得很厚，流过的水中也含有了大量的毒素，因此饮水生病的人很多。冬天穿的是临行发的棉衣，没几天就破了，兴安岭零下三四十度的气温下根本无法御寒，劳工们只好往身上裹水泥袋子，走路得倒退着走，不敢正面迎风走；到了夏天，劳工都只穿条裤子，赤着上身，有的干脆一丝不挂，反正方圆五六十里内没有人家。

我们每天蒙蒙亮时就吃饭，接着便开始干活，修飞机场。先是凿石头，后来是平整土地，将树根刨出来，这些活没有机械作业，全用人工完成，平完地后又铺水泥。劳动时按每个棚子分配定额，完不成就要被暴打一顿。监工打人用的是镐把和勘探锤，用勘探锤把比镐把打人还疼，若用锤尖打，头上挨一下就得打死。劳工每天疲惫不堪，兴安岭的蚊虫特别多，尤其是牛虻叮人更狠，即使这样，只要一躺下就沉睡不醒了，早上起来一身都是包。

由于条件艰苦，劳工大量患病。监工根本不给医治，还说只要能站起来就得干活。实在站不起来的就送到病号房里，进了病号房等于是在等死。日本人怕得上传染病（当时称霍痢拉），劳工病死或即将病死时，就拖到森林里火化。有个和我关系要好的叫杨林的小劳工，原本在哈尔滨学徒，奶奶有病，回家探视时路过沈阳站被抓。他患了一种病，口鼻血流不止。到第三天时，我去看他，监工来对我说："走，帮着把他抬到林子里去。"我眼瞧着杨林还没死，就给监工跪下，哀求放过他。但监工仍是命令人把杨林拖到林子里，铺上几层桦木，把他架在顶上，点燃桦树皮开始火化。一是杨林没有死，二是人被炼时肌肉收缩的反应，我看见杨林猛地从火中坐了起来。我悲痛地大喊着："小杨，你再也看不到你奶奶了。"可这又怎能挽救杨林的生命呢？

有些劳工忍受不了虐待，就开始逃跑。当时日本人给当地居民发放国境证，劳工没有，而且几十里内没人烟，往北是黑龙江，往南是原始森林，设有关卡和巡逻队，即便跑出去，老百姓也不敢收留，因此逃跑的劳工绝大多数被抓了回来。逃跑劳工一旦被抓，遭遇极其悲惨。日本人先打一阵，然后将我们集合起来，让我们用镐把打。如果认为我们中谁打得轻或犹豫不打，监工的便会将这个人也打一顿。逃跑劳工还没被打死的话，日本人就把他带到巡逻队的狼狗圈任凭狼狗撕咬而死，受难劳工的喊叫、求救声令人惊心动魄。

我们在大城干了接近一年，冬天时又被带到金水，因天冷，窝棚已无法御寒，就在地下挖坑，上面铺树枝，压上土，坑里盘上炕，就在里面住。开始是凿石头，以备春天时修飞机场。这里离嫩江近，有的劳工试图逃跑，但是冬天的雪中容易留下脚印，日本人会顺着追踪，抓回来后有时会换一种惩罚办法，脱下衣服在室外冻死。

我们窝棚里有个姓赵的，此人原是河北省八路军的一个营级干部，负伤被俘，曾在鞍山集中营中干活，后来逃出来，在沈阳再次被捕。每当劳工们因环境恶劣轻生厌世时，他就开导大家说："日本人修飞机场是为与苏联开仗，早晚日苏会打起来，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借机逃跑了，咱们得好好活着。"正是他的话使我们有了一线生存的希望。

1945年8月，我们正在干活时，从北面开来一群大型飞机，连过三批，每批有50架以上，从外形上可辨认出不是日本飞机。同时，我们注意到日本监工住处停着几辆汽车，正往上搬东西，过一会，汽车都开走了。老赵就让我过去看看，因为我年纪小，日本人有时派我给他们干些零活，出入他们那里不会引起怀疑。我过去一看，房里空无一人，物品扔得乱七八糟的，便往回跑，边跑边喊："鬼子跑了，鬼子跑了。"劳工们都闻讯赶来，有人提议把仓库烧了。老赵比较沉着，告诉大家别烧，一是日本人没走远，看见火光兴许回来，二是如果日本人真逃了，这些物资就是中国人的，没必要烧。他吩咐大家背着仓库里的粮食赶快走。此时，我们从沈阳一起出发的300多人仅生存了29人，这29人顺着火车道往嫩江方向走，到嫩江后折向齐齐哈尔。到齐齐哈尔时，大家已经衣不遮体，经人指认，找到了苏军司令部，一位军官告诉我们说，抗日将领王明贵成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如愿意参加就等着，不愿参加可换身衣服、拿些粮食回家。经老赵动员，我们这29人都参加了自卫军，走上了革命道路。

十四、赵开林回忆被征派到黑河金水当劳工的经过

赵开林，男，1927年生人，原籍辽宁省海城县西柳村，现住沈阳市瞿家乡瞿家村。此材料根据2002年6月3日访问记录整理。

1943年，我17岁，因为家里困难，我就到沈阳县沙岭乡北李关村姥爷家住。后来姥爷被亲属接走了，只把我留了下来。当时正赶上沈阳县在村里要劳工，村里研究让谁去，因为我没户口，姥爷又不在，就一个人，就让我去。于是他们就来找我，说给我钱，我同意了，但实际上并没得到钱。阴历7月25日，我和乡里一起去的12个人到沈阳市抚顺站（现在的沈阳站附近的客运总站）集合，住了一宿。第二天共集合了400人，编成了两个中队，坐着闷罐车走了6天，8月初二下午4点多钟到了就劳地点黑河省嫩江县金水站。


赵开林

我们下了火车就看见很多劳工在干活，头发特别长，只披个毯子头。我们一下子心就凉了半截，但也没办法，经打听才知道，这里是999部队召的劳工。下车第一件事就是搭席棚子。钉桩子时，桩子碰到个东西，觉得不对，一看埋个死人，只得将死人挖出来重钉。头一天干的活是挖地沟。第二天，看管的人找博役（就是伺候日本人的仆役），因为我小，就把我选上了。我们吃的是土豆，带皮的，煮熟后切开，拌在饭里吃，碗都放在木板上，见碗就盛，一人一碗。我去时所在的组叫冈组（类似现在所称呼的某某工程公司），在冈组做了七天，又转到了尖组修飞机库（当时叫飞机窝），一共修了18个真的，18个假的，昼夜不停，轮班干。到了冬天天寒地冻的，劳工没有棉衣穿，就把褥子在中间抠个窟窿，往头上一套，用草绳子一系，胳膊也缠着水泥袋子，裤子是用几层水泥袋子缝制的，走起路来哗哗直响。喝水得到一里外去挑，回来时桶里水都冻严了，得用棒子敲，连冰带水倒出来。由于深山中腐枝烂叶长年堆积，水从上面流过后都有了毒性，我有一次踏水过河，腿上生个红包，手一挠就感染了，腿肿得特别粗，两个月没下来地，同伴用熟土豆摊在布上给敷上，有人会医术，说是疔毒，用银针给我扎，后来病好了，落下了三个疤。可是我们都得用这水做饭，喝的也是这水。劳工吃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一口大锅里，

把苞米面往里一倒，用棒子一搅，叫建国粥，就喝这粥。有时也给些小米的皮子吃。由于吃不饱，穿不暖，有病不给治，加上想家，死的人很多，我记得12月12日那天一晚上就死了12个人。

都说当时是人吃人的社会，我们那还真发生了人吃人的事。一天，有个姓崔的劳工回来就说吃人肉了。原来，当地的鄂伦春族人打猎后就地烧狍子吃。他饿了，就四处想找烧吃剩的狍子肉，还真在一个灰堆子里翻出了肉，吃完后又拨拉，结果看见了劳工服上的铁钮。那时候死一个劳工给两瓶煤油，抬到山里，架上桦木，倒上煤油烧。他看见纽扣才意识到吃的不是狍子肉，而是劳工被火化后的肉，当时就呕吐了。

劳工们为了活命，也有跑的，有一个人跑时被警卫开枪将腿打个洞，拉回来后用麻绳从洞里穿了过去来回拉，这还不算，还被扒光衣服，胸前挂个牌，写着"逃亡者"，在三九天零下30多度的室外冻死了。我们都被强迫观看，警告我们再跑就是一样的下场。

第二年秋天时，县里往回要期满的劳工，我们才得以回来，我们去时有400人，有逃跑的也有死的，死的占多数，回来时只剩120多人。我回来时带了7个骨灰盒(除本乡死的三个人外，还有其他乡的死难劳工的骨灰)。回来后也没得到工钱，白干了一年多。

十五、刘宝钧回忆被抓到漠河当劳工的经过

刘宝钧，1928年生，现住沈阳市团结路义友巷4号。此材料根据2002年6月20日访问记录整理。

1942年4月，我在日本站(现沈阳站)附近被抓劳工的抓走了，送到鹤岗挖煤，住的是席棚子，吃的是玉米面、橡子面的窝窝头和咸菜。到了11月天冷以后，我实在忍受不了就跑了，偷着上火车后藏在座位下，到沈阳老道口车变慢时跳下了车。可是刚走到日本站，又被抓了。抓劳工的是两个人，什么也没问就架着我送到日本站旅馆，里面已经有30多人，没过几天就把我们送上火车，同时上车的还有从别处押来的30多人。

这次我们被送到了漠河当劳工，住的是席棚子，没有被盖，劳工们只能把水泥袋和草袋子当被子盖，用来御寒。每天干活以天亮、天黑为标准，劳工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夏天则更长。劳工每天打眼、放炮、打石子、挑土、平整土地，修建飞机场、飞机跑道、秘密军事工程等等。劳工们夏天上工时大多数是赤身裸体，反正周围几十里也没有人家，只是偶尔看到少数民族打猎的人。到处都是原始森林，森林里还有日本兵，那时称山林队或开拓团，到了冬天零下三四十度，大雪有1米深，因此没人逃跑。劳工每天干的活都有定额，完不成就会遭到监工的毒打，打残、打死的不计其数。如果生病了，轻的仍要干活，重的就抬出去，不等人死就用柴给活活烧死，这样死掉的劳工数也数不清，实在太多了。每天繁重的劳动搞得劳工们身心疲惫，而吃的却是玉米面、橡子面的窝窝头和咸菜，一年四季看不到一点青菜，只有下雨天采些木耳什么的才能改善一下。渴了喝的是河水，冬天是雪水。有时监工高兴才发给每个人一点盐豆。到冬天只给劳工发一套更生布做的棉衣，穿不几天就变透亮了，劳工们只有用水泥袋裹在身上取暖。冬天也没有棉鞋，只发一双水靴，很多劳工被冻伤，既无药，也不给医治。

有一段时间我生了一身疥疮，手不能握拳头，有的患处已化脓、流血，夜间刺痒得睡不着觉，白天还得坚持上工。到夜间痒得难以入睡时，我就想起离散的父亲，不知哭了多少次。1945年，一个叫李广洋的跟我是要好的工友，比我大10多岁，对我说："宝钧，咱们跑吧，在这我们只能死路一条，不能活活等死。"他又约了两个人，大家一起研究，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夜间，我们带上一些窝窝头就跑了，当时逃跑的路都是原始森林，连走好多天，只歇了几次，用火烤烤身子暖和一下，这样才侥幸逃出来。我们来到了嫩江前官村的一个大户人家找宿，当家的把我们留下管了一顿饭。后来，我被留下放猪，与他们分手了。放了两个月猪后，我非常想念父亲，就一个人又走到齐齐哈尔，做了一个多月临时工，日本投降后回到了沈阳。

十六、张玉甫回忆被骗到海拉尔当劳工的经历

本文摘自张玉甫的回忆资料《敖包山上的血海深仇》，由毛吉昌、王洪昌整理，原文刊载于1963年9月10日《呼伦贝尔日报》。


张玉甫

我是河北滦县人，从祖辈起就房无一间，地无一垅，全凭扛大活混口饭吃。我17岁那年就给本村的一家财主放羊，20岁又扛大活，辛辛苦苦卖力气，所得收入不够还债的。万般无奈，跑到锦州，在一家日本人的煤矿里当了"煤黑子"。旧社会挖煤那活儿，简直不是人干的。吃的是橡子面，睡在阴暗潮湿的工棚里，受监工的打骂更是家常便饭，经常发生倒塌、爆炸事故，不知夺走了多少矿工的生命。我拼死拼活地干了6个月，除去伙食费所剩无几。正在这时，老爹闹病，我回了家。一登家门，老爹就断了气。以后才知道，父亲久病没钱治，加上好几天没揭开锅盖，活活折磨死了。

等我返回煤矿的时候，日本鬼子一脚把我踢了出来。后来，有人说郑家屯招人，我就望风捕影地又赶到了郑家屯。正是数九寒天，我穿着件露着棉花的薄棉袄，冻得浑身打战。我挨门逐户地打听："有用人的吗?"遭到的不是白眼就是一顿臭骂。

一天，我正在郑家屯"蹲街头"，忽然听到有人吵吵嚷嚷地喊道："招工了！招工了！快来报名！"只见好几个穿着日本服的中国人，手里摇着小旗，上写"招工"二字，边摇边喊。我当时那股高兴劲儿简直没法说，三步并两步地跑到摇小旗的人面前，哀求地说："先生，求求你，给我报个名吧！"那人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张玉甫。"我又追问一句："先生，到哪去？做什么活儿？多少工钱?""叫你们到东山里去开荒种地，每天是三顿白面馒头，一天八小时的活，工钱是一元五角。"正在这时，只听摇小旗的人又大声喊道："自愿报名者，先领15元。"说着拿出厚厚的一沓钞票，在我面前用力地晃着。我立刻就报了名。旁边还有不少中国人也是一手接过钞票，一手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事情真是一时一变，刚写上自己的名字，马上就身不由己了。我们这些报了名的人，被几个穿着日本军服的人叫到一旁，编上队，马上就送到有人看守的旅馆里，再也不能随便行动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一批400名劳工，被押到了车站。招工时说乘客车走，到车站一看，等着我们的是四节"大闷罐"，一帮日本兵连骂带赶把我们拥入黑洞洞的车厢，就听"咔嚓"一声，把车门锁上了。我的心"崩崩"地跳了起来，每个人都不解地互相观望着。谁知道什么样的命运等着我们呢?

两天两夜的旅途，把人们折磨得死去活来，每天只给一顿干粮吃，喝不到一口水。第三天深夜，火车突然停了。车门打开，紧接着就听到："起来，起来，站着队下车！"人们按照次序下了车，车厢外边一片黑，只有地上的白雪反射出一点微弱的光亮。当我们走下车，抬头一望，啊呀！一排气势汹汹的日本兵，早已在等待着我们。他们一个个手持大枪，枪上的刺刀寒光耀眼，真叫人胆战心惊。点了名，早已准备好的十几辆军用大卡车又向我们开来。"上车上车！"领队的中国狗腿子向我们大声喊叫着。日本兵端着枪，横眉竖目地吵嚷着。我们刚上了车，又听到中国狗腿子喊道："不准说话，不准东张西望！"话音刚落，十几辆大卡车便飞一般地向荒无人烟的山里驶去。

天亮了，这时才知道已经把我们拉到海拉尔的北山上了。山上布满了长排的工棚，再就是蛛网般的铁丝网和星罗棋布的岗楼，别的啥也看不到了。

我们这400人一直在山上等到天亮，一个个冻得像猫咬一样难受。又等了一会儿，一个胖得像肥猪样的中国狗腿子开始给我们训话，除讲了些要我们好好干、干好早些回家之类的话以外，说："你们手里的钱和物品可以交给我们保存，等你们挣够了钱回家时，统统还给你们。"在郑家屯他们预发的15块钱，又原封不动地给了他们。

苦难的劳役开始了。在山上干活的劳工少说也有两三千人。我们所干的活儿，说起来只有一种，就是修筑军事地洞。劳动的强度简直就无法想象。无论是打洋灰、挖洞子、挑沟，没有一样是轻松的活。3米多深的壕沟，一锹锹把土扔到上边，干上一天，两肩就别想再抬起来。可是在皮鞭和棍棒的威逼下，劳工们不得不咬牙拼命干，偷不得半点懒。饥饿、劳累、疾病、事故以及日本鬼子、监工们的洋

刀和皮鞭，随时都会夺去劳工们的生命。

是真的每天只干八小时的活吗？那是骗人的鬼话。什么叫时间？什么叫休息？根本谈不到，每天不见太阳出工，太阳不落不收工，走回工棚常常是摸黑吃饭。

有这样一件事，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是一天下午，天气十分炎热，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一个年轻的"苦力"，已经连续打了好几天的洋灰（这活最累），这时他直起腰来，用手擦了把汗，喘了口气，正想再干，不料被监工发现了。他气冲冲地走过来，一把夺过他的铁锹，当头就砍，这个可怜的不知姓名的"苦力"晃了几下身子，再也没有爬起来。接着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监工冲着我们说："谁要磨洋工，谁就跟他一样。来人！把他拖走。"不大工夫，这个监工在另一地方用洋镐把又打死了一个"苦力"。面对这些血淋淋的事实，虽然我们当时敢怒不敢言，可是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偷偷抹掉眼里的泪水。可是，那些野兽般的日本鬼子，每当杀害了中国人都会洋洋得意地说："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几个没关系！"

干起活来把我们这些"苦力"当牛马，而在生活上，却连牛马也不如。早晚吃的都是高粱米稀粥，午饭是又酸又硬的混合面馒头，不管饱不饱，一律给四个。每天三顿咸盐豆，喝的是生水，许多人都闹肚子，连拉两天就不像人样了。可是还得坚持出工，要不打入到"病号房"就倒霉了。

提起住的简直没法说。一排席棚子足有半里长，对面二层铺，躺下就不能翻身。工棚阴暗、潮湿，得疥疮、寒腿的人不计其数。一个工棚住着400多人，为了看守方便和不易逃跑，只在中间留一个小门，晚上有人大小便时，非等凑够4个人，拿着4个牌子，一起出去，再一起回来，若逃跑了1个那3个人负责。有时不够4个人，就得等，把人憋得满棚乱走。我记得有一次，白天劳累了一天，收工后躺在铺上就睡了，疲乏得竟连小便都没知觉了，尿在凉席上，又漏在下铺。这事被看守知道了，一下子从铺上把我拖下来，随手拾起洋镐把，劈头盖脸就是好几下，打得我鼻口冒血，至今胳膊上还有一个伤疤。这样的事，几乎每天夜里都会发生。

我到北山后没发给一件衣服。比我来得早的"苦力"说，冬天只给他一套麻袋一样的更生衣，这怎么能抵住零下40多度的严寒？无奈，只好把洋灰袋用绳子绑在身上、腿上，那种可怜的模样，简直连"要饭花子"都不如。每年冬天冻死的人，就没法计算了。

打死、病死、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日本鬼子一天比一天看管得更紧了。事情越来越清楚，我们这些"苦力"的命运，不管迟早最后只有一条道：死！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念头：跑！有机会就跑出这个吃人的阎王殿，跑出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窟。

几个月的折磨，我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不久就病倒了。最初是从眼睛开始的，左眼突然发红，渐渐就模糊不清了。想治，可上哪儿去找医生？上哪里去弄药？几天以后左眼就瞎了。日本鬼子一看我瞎了眼，身上又害了病，知道离死不远了，于是发了"善心"，把我打发到病号房去了。

提起病号房真叫人伤心透顶。一个席棚子住着500多病号，痛苦的喊叫和呻吟声，听了真叫人心酸。这些病号都是卧床不起、米汤不入的，只要还能拿动铁锹，谁也不愿到这里来等死。世间竟有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得了病不但不给治，反倒每天只给一顿高粱米稀汤喝，据说这是日本鬼子怕劳工们泡病号采取的办法。天天都有新病号送进来。每天早晨，看守都要到病号房里去检查一遍，逐个用脚踢几下，发现僵硬的尸体，便命令拖出去，每天至少三四个，多至七八个。把这些病死的人都堆到一个大席棚里，三四天就用卡车拉一次，扔到伊敏河边。每当河水上涨，伊敏河上到处漂浮着这些"苦力"的尸体。我在病号房里除了"养病"以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差使：每天往外拖死尸。

我在病号房住了些日子，趁机逃跑的念头就更强了。因为病号棚离工棚较远，看守的也比较松。虽然总想跑，可是心里有点害怕，万一跑不成被抓回来那可怎么办？那还是我到病号房以前的事。一个不知姓名的"苦力"半夜跑了出来，没等他越过铁丝网，日本鬼子便带条狼狗把他抓了回来。第二天我们站队去上工，发现在道旁的电线杆上，五花大绑高吊着一个血肉模糊的"苦力"，身上被剥得光光的，鲜血从身上流到地下。这个有骨气的中国同胞，虽然身遭毒鞭，但一声不吭。我们再也不忍心

看下去了，可是恶毒的鬼子，为了杀一儆百，非叫我们看着打不可，并大声地向我们说：“谁要逃跑就和他一个样子……”这个中国人一直被吊打了两三天，晚上蚊子、小咬糊遍了他的全身。一想到这些我心里着实有些胆怯，可是又一想，不跑也没活，万一跑出去也许还能有条生路。跑！主意就这样打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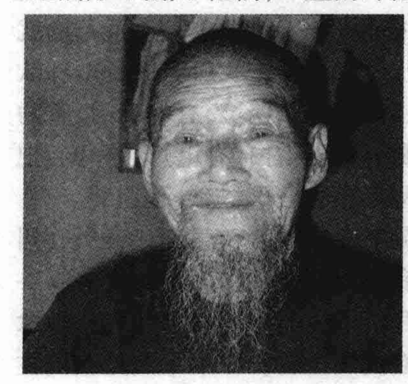
1936年7月的一天夜里，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这天深夜，天黑得伸手不见掌。病号们的呻吟声渐渐低了下来。门口的看守在用口琴吹着日本小曲。突然，口琴声停止了。不多时，门口又传来轻微的鼾睡声。“看守睡着了？”我心里猛地一亮，就轻轻地光脚下了地。走近门口一看，看守果然坐在那里抱着枪睡着了。“好机会！”我顾不得多想，小心地拉开门，从看守面前走了过去，随后我就使出全身力气撒腿跑了起来。

我分不清东南西北，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跑对，只是往黑暗的地方跑。可是刚跑了不远，一道铁丝网就横在我的面前。我过去只听说这里有高压电网，现在遇到的是不是呢？当时真是吓糊涂了，用手一摸没电，于是我就用手扒个空子，用力钻了过去。衣裳被撕破了，手上流着鲜血，我还是一个劲地往前跑。又跑了几十米，又是一道铁丝网，接连一口气爬过了七道铁丝网，最后还有一道深沟。这时，我全身没有一点好地方了。我漫山遍野地跑着，遇到山坡就滚下去，遇到深沟就爬过去。也不知道跑了多远，一直跑到天亮，才知道我已经跑到西山松树林里了。

在西山松树林里，我整整躲藏了两天两夜。白天我不敢露面，藏在草棵子里，晚上出来采点野菜充饥。两天两夜真比两年还难熬啊！第三天早上，我已经饿得昏昏沉沉了，想找点野菜吃也爬不动了，我心里暗说：“张玉甫呀！虎口狼窝你都闯过来了，难道今天就活活饿死在荒山上吗？”我不禁落下了眼泪。

正在这时，忽然听到马车的声响，我赶忙又藏起来，心想这回可算完了。走近一看，原来是几个中国人，谈论着打羊草的事，我这才放了心。我壮了胆子向他们走过去。他们见了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当时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呀！这几个中国人给了我几张大饼吃，救了我一条命，又指给我到街里的安全去路。我谢了他们，一直向海拉尔街里走去。

十七、周茂胜回忆在海拉尔等地当劳工的经过


周茂胜

周茂胜，男，1912年11月20日出生，现住辽宁省瓦房店市杨家满族乡高丽沟村。本材料根据2004年6月10日访问记录整理。

伪满时我在瓦房店木工厂当木工。父母早亡，因为生活所迫没法生存，把唯一的年仅13岁的妹妹送给人家做童养媳，家里就剩下我一人。在我26岁那年，我所在的木工厂有15人被日本人抓去当了劳工，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在瓦房店上车，车上一天只给两个小饼子充饥，而且饼子已经发霉长了绿毛，饿得没法才硬着头皮吃。喝的也是发绿的臭水，就是这样的水还不够喝。火车向北行驶了七八天，到了黑龙江一个小车站叫青椅山，听说离讷河不远，具体地点不清楚，只知道邻近苏联边界，有时能听到对岸苏联市区内的声音。我们干的活是给日本人修机场、盖飞机窝，干活慢便挨打。一起干活的劳工有上千人，来自各省的都有，瓦房店去的就我们15个木工。因吃不饱，活累，病轻的得坚持干活，病重的就被扔到山沟里喂了狼。日本人监管很严，我们住在席棚里，睡觉时都有日本人站岗看管。在这里修了两年半才完成，一起去的同伴已死去了七八个人。

接着又把我们用火车送到佳木斯修军营，干了三年才完工。然后又把我们运送到海拉尔修飞机场，一干又是三年。住的地方是木架搭的席棚，是地窨子，四面透风，地上铺着茅草，夏天漏雨，潮湿阴冷，冬天冻得难以忍受。劳工浑身长着疥疮，奇痒难忍。我们干的是牛马活，干活慢了便被日本人用刺刀、洋镐把打。大家怕被打死，就得拼命干。吃的却连日本人的狼狗都不如。每顿饭两小碗煮八分

熟的高粱米稀饭，两块咸萝卜，饮水也不充足。有病也不给治。若病重就说有传染病，死了就扔到山沟里。

我们从被抓走当劳工，一直干了七八年，这些年日本人只发过三次黄胶鞋，只在冬天时发过一身棉衣，到五六月天热时还穿着棉衣干活，后来天气实在太热了，劳工们只好全光着身子干活；鞋子最后也破烂得挂不住脚了。到1945年8月日本人已经投降，没人管我们了，大家才知道日本人垮台了，开始往家走。这年冬至月时，我才回到家。而同我一起去的15人，只有4个人活着回来，另外3个人有姓韩的、姓王的、姓刘的，名字想不起来了。其余11人全在当劳工期间死去了。

十八、方德财回忆在阿尔山当劳工的经过

方德财

方德财，1923年10月15日生，原籍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县余粮堡区太平乡太平村，现住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东乐小区5号楼2单元3号。此材料根据2002年4月8日访问记录整理。

我老家住在通辽县余粮堡区太平乡太平村，家里共6口人。我在日本侵略时期当了三次劳工，受尽非人的摧残和凌辱，死里逃生。

1942年我19岁时，日本人来登记户口要青年出劳工，当时村里有几十户人家，年龄适合出劳工条件的一共16个，我是其中之一。登记后由村长作保，负责看着我们，谁也跑不了。第二年春天，我20岁，日本人又来检查身体，没有什么病的就叫去出劳工，当时叫"勤劳奉仕"。第一次是到奉天省新民附近的巨流河修大坝，共干了6个月，大坝完工后就放我们回家了。

转过年我21岁那年春天2月，日本人又来抓劳工，这次是去阿尔山。我们村包括我去了4个人，通辽县共去了一二千人。去时从通辽坐闷罐车，人太多没地方坐，都站着，两天两夜没给吃东西，在王爷庙车站一个人给点大饼子吃，然后直到阿尔山才吃饭，整整坐了四天四夜火车。阿尔山有一个小车站，铁路到那里就到了头，是在边防线上，对面是蒙古。我们干活的地方周围都是山，四周用铁刺线围着，防止劳工逃跑。住的就是木头板子钉的人字架窝棚，下面用木板搭的板铺，有草的铺草，没草的就在板子上睡，非常潮湿。工棚子附近有个温泉，修了几十个水泥池子，可以洗澡。我所在的日军部队叫"878部队"，劳工大队长听说叫贺田富士雄，管四五千劳工。劳工有的挖沟、挖坑，有的栽树，有的埋电线杆子，多数人修防空洞，修好的防空洞一个屋一个屋的，里面刷得溜光雪白，有电灯，修好后把门封上，上面栽树，外面看不出来是什么。我跟着一个日本人干活，我埋电线杆子、拉线，他组装。

日本人对劳工管理非常严厉。有一次我们集合晚了，日本人叫劳工立正站着，互相打嘴巴子，叫什么"协和"嘴巴子，就是两个劳工面对面站着，你打我一个嘴巴子，我打你一个，打轻了不行，若有一下打轻了，就得再互相打三下，日本人在一旁看着哈哈笑。有一次，我拉电线，日本人说我跑得慢，拿起军刀就向我大腿刺来，当时刺入我右大腿内侧，把我刺倒在地，鲜血流满全腿。日本军人见我倒在地上，就用皮鞭打，让我起来。但我根本就起不来，他打了一气，见我真的无法干活了，只好走了。我用土堵住伤口，由另一个架线的劳工搀扶着回到工棚。第二天腿肿得老粗，半个月才慢慢消肿，但伤还没痊愈，只得又继续干活。直到后来逃回家后，腿伤才慢慢养好，现在仍留有伤疤。这劳工遭的罪就甭提了。日本人爱吃蛇，我会抓，晌午还得给他们抓蛇。我中午没法休息，天天都得给他们抓蛇，不抓不行，抓不到就得挨一顿毒打。他们吃完高兴了才给我饭吃。劳工吃的大饼子只有手掌厚，巴掌大小，一顿只有一个，只能吃一个小半饱，劳工们饿得没法只好挖野菜吃。喝的就是坑里的死水，劳工自己拿着小碗，从里面舀着喝，许多人得了病。

在阿尔山死难的劳工不计其数，其中修火车道时死的人最多了。有一次开山洞，山洞很长，点完的药捻子没响，日本人就让到外面躲炮的劳工统统进去，日本人拿着枪在两边站着，不进去就打。当时，一次进洞是1 000多人，这些人都进洞后，突然炸药"轰"的一声爆炸了，大石头都飞起来了，进洞

的所有劳工都被炸死了。炸死的劳工,都被拖出扔到山沟里去了。平时劳工每天都有死的,死人有的炼了,多数被扔在附近的山沟里被野狼撕咬,或是腐烂发臭,离很远都能闻到臭味。还有的劳工冒犯了日本人,被日本人绑在树上,脖子一勒,就等着饿死。我做外线埋杆工作的,这些事都能看到。我们太平庄一起出劳工的有个叫王俭的就死在那了。因为他会日本话,听见日本人说有八路军要打他们,他就把听到的消息向其他劳工说了,结果夜里来了日本人,把他关到一个小屋里给打死了。王俭被打死后日本人要火化,没人敢炼,我们是一个村的,问我,我说一个死人有啥可怕的,我就把他炼了,炼完用木板钉个小骨灰盒,装些骨灰,日本人说给寄回他家,寄没寄谁也不知道。由于劳工太苦太累,天天有逃跑的,可是周围都是大山,多数人由于不熟悉路被抓回来整死了。阿尔山狼特别多,有一次跑了7个人,被狼吃了6个,剩下一个爬到树上没死,却让日本人抓回来了。大家都以为会放了他,结果夜里开会,把人们都集合起来,让他站在中间讲是如何跑的,其他几个人是怎么被狼吃的。然后,日本人叫劳工们打他,谁不打他就得挨日本人打,就这样把这个劳工活活打死了。

山洞工程完成后,在山洞上面栽树,栽完树修山洞这帮人就都没有了。我跟着一起干活的那个日本人对我的限制没那么严,不像别的劳工那样晚上不让出去,我亲眼看着这些人在夜里被抓起来,绑上后往车上扔。这些人也不知道要被整死呀,被绑也没有反抗。不光绑胳膊,还绑腿,两个绑在一起,用8号铁线胳膊挨胳膊、腿挨腿绑上,拧的很死,绑好后往车上扔,像扔绵羊似的。这些人都被汽车拉走了,听说拉到了五岔沟,五岔沟有一个万人坑,到坑边往里一推。反正只看见一车一车的人被拉走,没看见有人回来。

我在那里干了约半年时间,由于住的地方潮湿,身上长了许多疥疮,又看见内线干活的基本没有活着出来的,心想若不逃跑早晚也得死在这里,就在干活时留心周围的道路,找机会逃跑。因为我是给日本人干外线,能踩道,才跑出来捡条命。阿尔山周围好几百里地没人家,根本找不着东西吃,要逃跑只能坐火车。阿尔山火车站离我们干活的地方很近,我事先把从阿尔山往家乡这边开的火车发车时间都摸得差不多了,一天半夜,我就溜出工棚逃跑了,没敢走大道以免被抓,从山上树林里往车站跑。我到了火车站,趁天黑钻进一个闷罐车里,靠在边上不出声。日本人检查车时用电棒晃来晃去也没看到我,过了一会火车开了。我在火车上呆了三天三夜,一点东西也没吃。第四天夜间火车停在一个小车站,我偷偷地下了车,当时饿得我都走不了。我判断着家乡的方向,白天不敢走,只在夜间往回走,路上讨些吃的,好不容易才回到家中。

我回到家里就病倒了,身上的疥疮奇痒,肚子胀得很大,吃不下东西。本村的刘国香是我扛活时的东家,他收留我并给我治病。有个中医教了一个方法,用一些草药洗,还把砖烧热放上几层布片,脚心踩在砖上发汗,身上的衣服被汗浸湿透都拧出了水,再用热手巾擦身子,一天两次。足有三个多月,身上脱了一层皮,肚子也不胀了,这样才救过来。

我身体好转后,1945年我又被抓了一次出去做劳工,到奉天省大石桥修飞机场。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国劳工当人看,随时都有中国劳工被打死。我在大石桥干了三个月,直到日本宣布投降为止,我才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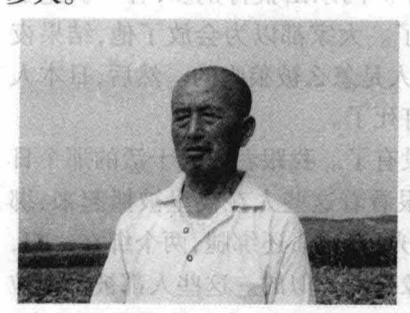
十九、尹德田回忆在阿尔山当劳工的经过

本文摘自《不能忘记的血泪史》,载中共兴安盟党史办公室编《侵华日军在兴安盟罪行录》,1995年8月内部版。题目有改动。

1943年3月22日,我被派到阿尔山去出劳工。全旗10个保,每保10名,全扎旗共要100个人。23日到泰来火车站,坐闷罐车,一天一夜到阿尔山下了火车,前来接收劳工的有日军第87部队、371部队、236部队,我被分到236部队。地点在阿尔山车站南两公里。火车运来军用物资,有时也派我们去搬运,经常看到从闷罐车里出来的人,眼睛都用布蒙着,前边有人领着下火车,紧接着又上敞篷汽车,往南山运去。后来我们在山上放猪放牛,遇到他们出来解手,才知道他们是979部队的,都是从辽宁一带夜间从大街上、旅店里抓来的,到这里来修秘密工事。这是什么地方,修筑工事干什么都不知

道。他们每天干15个小时活,吃不饱,睡不好,穿的是麻袋片子,腰间围着草袋子,大腿都被草袋子磨出了血。有一次,我遇到3个979部队的人,听他们说,劳工病死、累死的无数,即使有幸活下来,待工程完工后,也不能让他们活着回家,都弄死在山谷里,人们把那个地方叫死人坑。因为每天都死人,死的人用汽车拉到山谷里,开始时用火烧,然后埋上,以后死人多了,也不烧不埋,扔下就不管了。山上的狼很多,经常有二三十只狼在那等着吃死人。野狼吃死人都吃疯了,有一次野狼把送死人的车围住了,最后连活人也被吃掉了。这年的农历八月十九日下了一天一夜大雪,地上的雪一米多厚,劳工全部出来清雪,一干就是三四天。979部队抓来的劳工肚子里无食,身上无衣,三四天内就冻死饿死170多人。

二十、刘俊清回忆在五岔沟当劳工的经过



刘俊清

刘俊清,1919年11月21日出生,现住瓦房店市复州城镇大窖村。此材料根据2002年7月16日访问记录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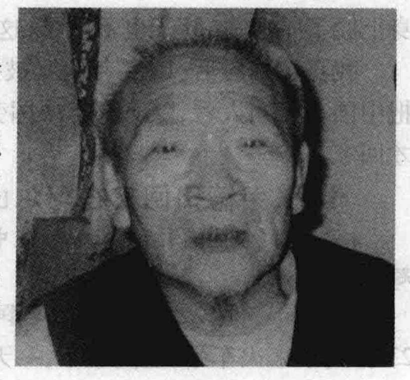
1944年四五月间,日本人来摊派劳工,我们村派了我和李旭春(已故)。我们在瓦房店上了闷罐车,发给一点吃的,经过两天两夜到了五岔沟。我们这批人有五六百人分到一个作业场。刚到那里,日本人便命令劳工们把衣服全都脱下,放在蒸笼里蒸,称这叫"消毒"。我们从家里带的一些钱物全部被搜走,目的是防止我们逃走。住宿地点搭了四五个席棚子,每个席棚子住百余人。每天每顿给两个小窝窝头、一个咸萝卜条,有时食物供给不足只发几个土豆,根本吃不饱。上工时,先扛上一袋水泥往山上走,到干活的地方有半小时路程,上些年纪的劳工有的扛不动,日本监工拿着洋镐把便打。到山上干的是挖山洞、抹水泥,远处的作业场时常传来开山的炮声,想必他们和我们一样是在修山洞。日本人不但派兵在山上监工,还经常有小队骑兵跑上山来炫耀武力,警告劳工们要对他们俯首帖耳,唯命是从。

一些劳工难以忍受如此艰苦的劳动和饥饿的折磨,设法往外逃,可是周围方圆300多里没有人家,日本人又戒备森严,逃跑者多数被抓了回来,遭受一顿毒打之后,如果侥幸活命,还得挺着伤痛继续干活。在五岔沟,生病是最可怕的,因为日本人对病号毫不怜惜,连饭都不给吃,只让喝些豆腐水,还假惺惺地说:病号不能吃硬东西,喝豆腐水有益恢复。病重的往往因饥饿而死。我们这批人到原定的七个月劳动期满时已死了三分之一,死者都往山沟里一扔,任由狼群啃噬了。

到11月份,五岔沟已经下起了雪,劳工们从家里没带什么厚衣物,可是日本人不闻不问,仍逼着劳工穿着单衣干活。我的鞋早破了,只得用水泥袋子缠着脚御寒。万幸的是,我们劳动期满了,才得以活着回到家里。

二十一、吴月庆回忆两次替父当劳工的经过

吴月庆,1928年生,现住沈阳市于洪区杨士街道郑家委。此材料根据2002年6月3日访问记录整理。



吴月庆

我叫吴月庆,今年74岁,是沈阳有色冶金机械总厂的退休职工。1944年我16岁时,家住在沈阳市三经街六纬路。那年的二三月份,父亲吴春山被日本人派了劳工。由于我父亲身体不好,我下面还有两个小弟弟,若父亲走了,他俩都得饿死,我便哀求抓劳工的人,由我顶替父亲出劳工。这样,我就替父亲给日本人当了劳工。我们被用火车拉到梅河口下了车,排队步行向西走,说是走8里地就到了。可是从中午下的车,走了不知道几个8里地,天快黑时才到达劳动地点。我们干的活是开山,用炸药崩山洞,听说是装飞机用的。干活有日本人端着枪看着,我们不敢说话。每天吃的是苞米稀粥,住的是劳工自己搭的席棚子,吃不饱,睡不好,超体力的劳动累得我们不行了,咬牙也得坚持,要是被日本人看到偷懒,就会遭到一顿毒打。有病也得坚持干,日

本人发现你有病不能干活了,就往山沟里扔。日本人根本不管我们死活,我亲眼看到两名劳工被炸药炸死了。人被炸死后,日本人马上让我们清理现场,然后继续干活。两条生命就这样被夺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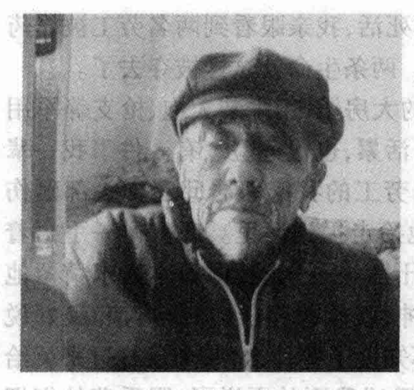
后来又让我们到梅河口车站修建一座长约100米、宽约50米的大房子,用来装大炮、枪支等军用物资。房子修完后,我们每天卸火车,把各种物资运送到大房子里,活累,也很危险。有一件事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有一天卸火车,一个箱子从车上掉下来,把一同来当劳工的我家邻居邱富祥头部砸伤了,当时鲜血直流。这时日本人来到他身边,二话没说,就让人把他抬走扔到河里。邱富祥一手捂着头,一手拽住我的衣角,叫着我的小名说:"根记呀,我还能活,还能干活……"让我向日本人求情留他一命。我当时心里很着急,但又不敢说话。后来看到他可怜的眼神,就壮着胆子向日本人和汉奸说情,说我这个爷们还能活,你们别把他抬走。日本人当时很厉害,不知说了些什么,一个汉奸过来就给我一个耳光,嘴里骂道:"你这个小兔崽子,再多说话连你一块扔河里!"我不敢再说了,眼看着他们把我这位老乡邱富祥扔到10多米深的河里。在场的劳工哭声一片,我更是哭得无法形容。日本人和汉奸看见大家哭,阴笑着喊:"都给我干活去!"手中还挥舞着军刀。大家只好继续干活。

这样险恶的生活过了半年多,一天,日本人突然让大家上闷罐火车。火车向南开了很久,车门打开,让我们赶快滚。下车一看,回到沈阳北站了。我高兴得不得了。回到家里,全家人抱头痛哭。就这样,我结束了第一次劳工生活。这时,天气已经开始冷了。

回到家里不到一个月,日本人和汉奸再次来到我家,强迫我父亲出劳工。没办法,经过求情,我第二次替父亲出劳工。我和其他被强征劳工的乡亲们被带到了沈阳站附近的抚顺客栈集合,第二天押上了闷罐车,一路向北开了两天两夜,到了王爷庙火车站。下火车时正下着大雪,看见地上摆着几口大锅,烧着火,我们都以为里面蒸着窝窝头或大饼子之类的吃的,哪知道,有个翻译过来说,中国人身上有虱子,让我们将衣服脱下来。我们脱下衣服后,他们把衣服都放在笼屉里蒸,也不让我们进屋,就在雪地上赤身站着。等衣服取出穿上后,刚开始热乎乎的很舒服,然而过一会,衣服便结上冰,抬手都抬不起来了。随后,我们又上了车,把我们拉到了兴安北省五岔沟。到五岔沟的头一件事是搭工棚子。地上都是雪,扫扫雪就搭。棚子不高,有个劳工在棚子里烧火御寒时不小心把棚子点燃了,日本工头过来将劳工们毒打了一顿。三天后工棚才搭完,共有10多个,每个工棚住100多人,总共有1 500多劳工。日本人给我们吃的是苞米面稀粥,稀得比水稍强些。我刚开始被分到了木匠房里,共有20多木匠。我不会木匠活,别人都照着划好的线锯,我跟着学,可还是把木头锯坏了。日本工头和朝鲜工头就拿着木头锤打我,把我打得直哭。木匠中的小队长会几句日本话,跟日本人说情,这才不再打我。日本人说我是小孩,既然不会木匠,就去捡锯剩的木头来给大家烧火取暖。

我们在车站干了一个月,又被调到山里修堡垒。修筑时非常劳累,每天只给喝稀粥,没有力气,稍有懈怠,监工的用带尖的小铁锤上去就是一下子。有的被打在头上当时就死了,监工让人往边上一放,架上木头就烧。也有的病倒了,还没有死,就被架上木头烧,那人还在喊:"我还没死呢!救救我!"可是谁敢去救啊,日本兵牵着狼狗端着枪在一旁监视着,谁要上前去就用刺刀挑。大家只好眼看着这个劳工被活活烧死。

劳工干重活不给饱饭吃,个个饿得骨瘦如柴。有时小队长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今天吃大饼子!所说的大饼子只有一手长,一指厚,手掌宽,每人一个,够不够不管。尽管这样,有的人也省着吃,攒着准备做逃跑时的干粮。附近有很多狼,单独跑不了,只能在夜里结伴逃跑,可是日本人岗哨很隐蔽,有些劳工会被抓回来。日本人把他们的衣服脱光,让光着脚在雪地里跑,直到冻死,要不然就是打死。劳工们连饿带病,再加上毒打,每天都死人,平均一天死两三个人,五六个月时间,这1 500多人死了500多。到"八一五"时,堡垒修完了十五六个,我们察觉到日本人有些变化,对劳工的态度有所缓和了。不久日本人跑了,我们才坐火车回到沈阳。


郑福德

二十二、郑福德回忆在五岔沟当劳工的经过

郑福德，男，1920年11月13日生，现住辽宁省普兰店市大田镇小李屯村前山咀屯。此材料根据2004年6月9日访问记录整理。

在我17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里有我妈、我、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最小的弟弟只有7岁。1941年3月初，日本人向大田村山咀前屯要劳工，村里摊到我的头上。我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我若是走了，家里人就没法生活了，就向村里求情想不去。村里说不去也可以，但得交纳480元才行。我四处借债，只借来20元。期限到了，村里的邴德有、侯连治领着人来了，见我没钱交，便说不去是不行的，硬用绳子把我反绑着抓到田家村，下午送到瓦房店交给了日本人，被关在南满旅社，外面有日本兵站岗监管。次日上午8点，我们这些被抓的劳工由日本人押送着上了闷罐车，外面用大铁锁锁着。装劳工的车有20多节车厢，每节车厢装了60多人，没地方坐，只能站着，连气都透不过来。到郑家屯火车站才每人给了两个窝窝头和一个腌萝卜，以后在王爷庙、索伦分别送过饭，然后一直把我们拉到内蒙五岔沟。下车后，日本人预备了一个大木槽子，装上水，让我们洗澡。五岔沟的3月天寒地冻，甭提有多冷了，就这样也得强挺着脱光衣服跳进去浸一下水。随后又说分配给劳工的粮食还没到，先将就着吃，每人只给了一小勺水煮的玉米粒。刚开始时没有饭碗，同去的有会木匠活的，给大伙现用木板钉的木头盒子盛饭吃。吃了饭后，我们就直接分到了第四作业场。到天黑时，连住的工棚都没搭好，劳工们只得就地倒下露天睡下了。

在五岔沟共有七个作业场，有2 000多劳工，全是复县去的。我在第四作业场干了十多天后被转到了第七作业场。到了之后也是现搭的席棚子，在挖土时猛地挖出了一具劳工尸体和许多勤劳奉仕用的饭碗，把大家吓了一跳。有的人就说，听说先前来的那批劳工一个都没活，全死在五岔沟了。大伙一听，心全凉了半截。

和我在一起的有100多人，住一个大工棚，由日本人今井和现瓦房店市吴店的小队长侯连元领着干活。日本人看我身体壮，就叫我跟汽车拉石头、水泥、沙子，修筑防空洞和机枪垛等工事。所修的工事是在山上挖个大坑，浇灌上两米多厚的水泥，再盖上三米多厚的水泥盖，留有枪眼和炮眼。之后重新培上土，种上草，外表掩饰得非常巧妙，与周围环境浑然一体。

我们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干活，天黑了才收工。日本人不给劳工饱饭吃，每顿顶多给一个二两半的玉米面饼子。有的劳工饿得受不了，就找山上的野黄花菜、野韭菜吃。有一天下雨，车在半路上坏了，今井让我修车，我不会修车，没修好，他就拿皮带打我。我被打得满身是伤，疼痛难忍。即使这样，日本人还不放过我，仍逼我干活，一直干到7个月期满。此时的劳工大多衣不蔽体，鞋子坏了，便用麻袋片缠上当鞋穿。我们劳工棚的100多人，历经磨难后已经只剩下60多人了。

活干完后，日本人就说："复县（瓦房店旧称）人干得好，给他们点细粮吃。"他们把面倒在石槽里和面，让伙夫做饼给我们吃。日本人在倒面时，往里面撒了些东西，被我们棚的人发现了，大家彼此知道后怕是毒药，都不吃。可是日本人经常到工棚里来，大家怕他们识破，就在烧火时偷偷地把饼扔进火里烧了。侯连元和山咀屯一个姓杨的及瓦房店西一个姓许的三个人嘴馋，认为日本人不会害大伙，非要吃不可，谁也阻拦不住，结果他们三人吃后第二天就死了。其他作业场也开始大批死人，最多的一天死了48人，少的每天有二三十人不等。我之所以知道这样详细，是因为日本人派我埋尸体，那些人全是由我参加掩埋的。当时劳工死了就在地上挖个坑，架上木材，把劳工尸体倒上汽油火化，然后把骨灰装在小木盒里。

日本人看我们工棚的人只死了3人，觉得既奇怪又不死心，一天派来一个叫八田的大夫到工棚，挨个问我们有没有感觉不舒服。大伙全往后退，不敢出声。问到我的时候，我说没怎样，只是这两天干活腰累。八田假装来捏我的腰，突然在我腰上扎了两针。当天下午，我的腰就开始又肿又痒，第三

天开始溃烂,从针眼往外出水。五岔沟有一个姓冯的老太太常到工棚附近向劳工卖食物,认识我,就问我:"你怎么走路腰都直不起来了?"我就把被打针的事对她说了。冯老太太立刻明白了,告诉我恐怕回不了家了。她很同情我,对我说:"我给你东西吃,可不是药,能不能治好你很难说,不过你不能告诉别人,要不我就没命了。"我吃了她的三粒小药丸后,第二天感觉好了许多。冯老太太就又给了我6粒,嘱咐我分两次吃,又教我用盐水洗针眼。我吃了冯老太太给的药丸,又按照她教的办法洗伤口,这才把伤治好了。至今我的腰仍留存着两个蚕豆粒大的针眼,清晰可见,每到开春就又痛又痒。

又过了几天,复县来人向日本人要求将到期的劳工放回去。大概是日本人怕不好向复县交代,不敢将我们全弄死,于1941年10月,在对我们劳工强行搜身后,将幸存的劳工一二百人全放回来了。大家把行李都扔了,带上死去同伴的骨灰盒上了车。从五岔沟出发的火车挂有四五节车厢,我们工棚的60多人全在一节车厢上。临上车前,日本人还伪善地发给劳工每人一斤酒,让大家车上御寒。有了吃毒饼的教训,谁还敢喝?火车开动后,那些酒全被劳工们倒掉了,但仍不断有劳工死在了路上。我所在的棚与我一起回来的劳工中,能想起名字的有拉山的田万贵、吴成贵等人。

自我被抓当劳工走后,家中老小吃不饱穿不暖,忍饥挨饿,东借西要,勉强度日,而我回来后又是满身伤残无法劳动,家境更是一日不如一日。

二十三、张树海回忆在乌奴耳当劳工的经过

张树海

张树海,1922年8月30日出生,葫芦岛市钢屯镇张屯村人。此材料根据2002年11月17日访问记录整理。

出劳工那年我20多岁,具体哪年记不清了。村里共去了十多个人,别人家都出钱在锦西雇人,当时我家里十多口人,有4个妹妹,3个弟弟,我已成家,有1个儿子,生活非常困难,没钱雇人。

那年三月二十多(阴历)从锦西上的火车,有三十多节长,车上全是劳工。火车经过一个大山(大兴安岭),有一个隧道,很长,足足开了十多分钟。记得在到乌奴耳之前有个大站叫博克图。到了乌奴耳后,我们被分到东北沟,在前山,一个大队是一个单位,大队长姓张,锦州人,与我们一同来的,副大队长姓啥忘了,是早些时候来的。大队下设中队,一个中队四个小队,我在二中队二小队,一个小队60人。首先搭席棚子,每个小队住一个席棚子,中间是过道,两边板铺上住人。当地气候冷,外面地表都冻着,棚子里稍暖些,一化冻就有水,能没到脚脖子了。大伙一路劳累,想早些歇会儿,就干脆把鞋脱在外面,扳着门框上了床铺。可是还没歇多大会工夫,大队长拎着大棒子闯进来把我们全赶出去了。他痛骂我们说:又不是让你们来这享清福的,自己的地方都不会收拾一下?没办法,大家现找些干草将屋里的水都扫了出去才得以休息。

到了领饭时间,其他人都从家带了饭碗、饭勺,我却什么也没带。正发愁时,小队长王钟龄(音)对我印象挺好,给我出主意,去找了个萝卜,借勺子挖个坑当碗用。分饭时,每人两木勺小米粥,一半米一半水的,轮到我时,萝卜坑里盛不下,小队长就说:你们都分完后,剩下的都给他了。就这样,那顿饭我是吃饱了,可别人都是半饱。到屋休息时,大伙就抱怨说:来干活也不给吃饱饭。可是以后天天如此,始终就是这么多吃的。

头几天,我们修盘山道,活不重,大队长、副大队长不用上工,也没人监管我们,过得还比较轻松。等道修完后,又让我们去挖坑,这回情况可不一样了。每个坑都规定尺寸,山上尽是石头,打眼放炮,然后用镐刨,再把石头运出去。坑有大有小,先把草皮抠下来放在一边,底下铺上水泥,四周支起水泥盒子,用铁丝绑好,有五尺多高,灌入水泥,水泥干后再把盒子撤下来。然后上面用水泥盖盖好,再铺上土,把草皮重新覆盖上,浇些水,使草长好,看起来与挖坑前一模一样的。据说这是做仓库用的。有一个日本人做监工,见有偷懒的便打小队长,小队长受了气就对我们发火。到了阴历五六月时,工程更紧了,每个小队分配两个坑,小队长来回巡视,忙不过来,又由每个坑各选一个分队长,领着大伙干。

活累，吃的又不够，这时山上有一种草开黄花，辣乎乎的，大伙就偷着捋黄花吃，并给这种草取名为“山茴菜”。日本人看见哈哈笑，说中国人像马一样。我们吃的是草啊！

到了七八月时，派来个戴眼镜的日本人，他对劳工更严了，每个坑设一个朝鲜人当监工，谁要是干活稍直下腰就打。这时各工棚开始死人了。有的大队只剩下不到一半人了。各中队情况不太一样，第一中队就没剩多少人，我所在的二中队死了一半人，其中的第一小队死人最多，没回来几个人，二小队、三小队能死一半，四队人却没有死的。每天都能死四五个人，山坡上到处都是坟包。有个大队死的人最多，八月十五那天，他们给死去的劳工上供。大队长对手下人很好，与其他人同吃同住，虽然他不用出工，却整天在伙房看着，不许分配不均。那天，他喝酒喝多了，上台讲话时说：日本人根本不拿中国人当人，干活也不给饭吃。中队长赶忙把他拉了下来，幸好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中国话，没惹出祸来。后来听说这个大队长也死在乌奴耳了。

接近九月时，乌奴耳就下雪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冷。身上穿的单薄，缠些洋灰袋子还勉强能对付过去，可鞋子早穿坏了，在雪地里干活，雪直往鞋洞里钻，那罪受的就不用提了。我同屋住的一个人生病了，他对我说，这回咱们都回不去家了，日本人这个工程是保密的，不让外面人知道，等工程完事后，好人都推进江里去，像他这样的病号就得被填坑里了。后来结果出乎他的意料，到了九月二十多号时，我们幸存下来的劳工都被放回来了。

二十四、冯彼恩回忆到乌奴耳当劳工的六个月经历

此文原题为《乌奴耳六个月》，冯彼恩口述，苑耀辰整理，载《绥中文史资料》第2辑，收入时文字有删节。

伪满时期，我先后3次被抓去做劳工。第一次是在康德9年(1942年)3月，被送到当时的三江省依兰县修飞机场。那次绥中去了800余人，3个月后回来。第二次是康德10年（1943年)6月间，去乌奴耳修军事工程，半年之后回来。第三次是康德12年(1945年)8月间，去吉林缸窑，同去的有1 400人。到那里仅五六天，日本就投降了，我们沿路乞讨才回到家。

康德10年6月，上面摊派给我们冯家屯出劳工4名。叫谁去呢？村长便决定抓阄。这一天村里人集合到南面场里，参加抓阄的共60人，都心惊胆战，生怕这不幸会落到自己头上。我因为上次出劳工受过苦，就更加害怕。当我拿起纸阄打开看时，顿时眼前发黑，厄运偏偏又降临到我的头上，我和冯树思、冯向清、冯汉清一起中阄了。

第二天集中到县里，全县共有六七百人，编成了大队、中队、小队。总领队为大队长吴冠三。每100人一个中队，50人一个小队。当时我被编到四中队。临上火车前，有一个当官的给我们讲了话，他说：“去做劳工是有好处的，是光荣的，能吃饱穿暖，6个月完工就回来，不准逃跑。”我一听就知道他是在骗人，既然吃得饱穿得暖，为什么还有人逃跑？

上了闷罐车，中、小队长就把车门把起来，生怕我们中途跳车逃跑，连大小便都不准下车，人们只得在车上拉屎撒尿，臭气熏人。从绥中到哈尔滨一段，每天只发给两个馒头，往往吃了上顿没下顿。大家饿得慌，到站停车，不顾队长阻拦，争先恐后去买食物。车到江北以后就更惨了，每天两个馒头也没有了。每到停车，争买食品的人更多了，可是车站上除了卖熟鸡蛋的，别的什么也没有。就这样经过7天7夜才到了乌奴耳。

在乌奴耳修的是军事工程，日军驱使数万人在这里干活，在山上挖有几条很宽很深的壕沟，沟壁沟顶用水泥筑起，上面盖土种草，加以伪装，沟与沟之间有通道。大多数人的工作是抬石头，从取石地点到工段有200米远，每两个人一次要抬100公斤，每天要抬够规定的次数，定额很高。如果能够吃饱肚子，还能勉强完成，但是我们哪能吃得饱呢？本来日本鬼子给我们的口粮就少，加上管事的汉奸从中克扣，就所剩无几了。每人每顿只能吃到窝头两个(约2两多粮)，没有菜，每天都饿得发昏。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走路都吃力，更不用说干重活了。

见有完不成定额的，日本监工就去找队长，队长就强迫人们去干，有时天黑了也得接着干，直到完成才回来。对于那些经常完不成定额的非打即骂，对所谓磨洋工的人也是如此。因此被折磨死的不

在少数。顺山堡有个姓王的,日本人认为他磨洋工,把他抓了去。刑罚很绝,要他骑在木杠子上,如果骑不住掉下来就打,这样整整折腾了四五个钟头,不到3天就死了。

居住条件更是恶劣。全工地分为东南西北4个区,我所住的北区,有5 000余人,都挤在十几个席棚子里,夏天又热又臭又脏;冬天冷得睡不着觉。

由于饥饿、疲劳和条件恶劣,发病率越来越高。有了病不但得不到治疗和休息,还要被队长和监工逼着去干活,干不动就打。后来就更残忍了,他们说病号有病吃不多,每顿只给一碗粥吃,于是轻病号也变成了重病号。有一次我有了病,他们只给我一碗稀粥,我忍不住饿,勉强去上工,因为浑身发软没有劲,抬得很慢,日本监工看见了,抬手就是几个耳光,我被打得眼里直冒金花。

在各种残酷的虐待和折磨下,劳工开始死亡。起初每天一二人,以后逐渐增多,每天一个棚里都要抬出三四个去。住在北区的4个月之内就死了1 000多人。尸体都埋在离工地不远的地方,在3里长1里宽的一片地里,埋满了劳工的尸体。沟屯有个姓张的兄弟二人同一天死去,都埋在这地方了。

人们不堪忍受这种非人生活,有些大胆的就试着逃跑,但逃跑是十分困难而又危险的。不用说周围有日本兵站岗,近处有二鬼子监视,根本没法跑出去,就是跑出去,也很难活着回到家里。乌奴耳一片荒凉,几百里以内没有人家,跑出去弄不到食物,也会饿死的。有些逃跑被抓回来的更是遭殃。帐沟子有个姓杨的,逃跑被抓回来,腿被打断了;邓吉山逃跑几乎被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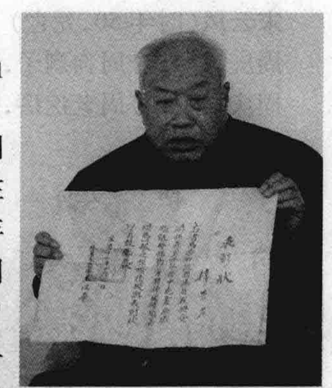
逃跑是不可能了,人们就想办法减轻劳动强度。原来监工的里面有很多是二鬼子(这是对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少数朝鲜人的蔑称),他们贪财,有些人就赌博,二鬼子只要抽了头就不大管事。以后赌的人多了,二鬼子得的钱也多了。但这种办法功效不能持久,因为大家的钱有限,钱输完了还得干活去。

大概是因为人死得太多了,各方面都有些反映,出劳工多的几个县份更是如此。他们派人来调查死亡的原因,向日本人反映说是饿死的。日本人不信,他们就会同日本人解剖尸体,结果发现死者的胃里尽是青草和野菜。日本人这才承认汉奸和二鬼子克扣太厉害,把原管理人员全部撤换,改由"关东军"直接管理。为了缓和这种矛盾,关东军在两个月内没有克扣和打骂现象,生活好像改善了一些。

我在乌奴耳6个月,到这年年底才回到家里。

二十五、穆景元回忆父亲穆荣方被抓当劳工的情形

穆景元,1925年10月10日生,锦州师范学院退休教师。此材料根据2002年11月13日访问记录整理。


穆景元

我家在伪满洲国时住在伪锦州省锦县松山村穆家窝棚屯(今属锦州市郊区松山镇),屯里有50多户人家。1944年3月,当时我20虚岁,正在县城一个小铁工厂当工人。一天,忽然父亲来找我,说要去乌奴耳出半年劳工,是村丁半夜里把他抓去的,屯子里共被抓去11个人,其中一户姓周的哥俩都被抓了,事先谁也没有得到通知,也没有什么名额指标,看来日本人抓劳工都抓红眼了。我问父亲是怎么到我这里来的,他说是请了一个小时假来嘱咐我照料家里。当时父亲已49岁,母亲48岁,一个弟弟在上学,家里还有76岁的祖母。我对父亲说赶快趁机逃走吧,可是父亲担心日本人会为难家里人,没有同意。我就去厂里找会计借了40元钱,交给父亲留着在外面用,父亲就匆匆回去了。第二天,父亲和被抓的劳工都被带到锦县劳工协会(现锦州市实验小学所在地),有人看管着,再也没让出来,不久就和其他人一起被送去了大兴安岭的乌奴耳。

父亲走后一直杳无音讯,祖母日夜思念儿子,半个月后就过世了。到了夏天,我因年龄适合,被征到县里进行"国兵"训练。当正式征召"国兵"时,我说自己是文盲,幸而没有被录用。我高高兴兴地

回家报信,却看见母亲正在哭,忙问怎么回事。母亲告诉我,邻村有个与父亲一同出劳工的人因病提前回来了,他送信说我父亲已死在了乌奴耳,他是亲眼目睹的。我半信半疑地说,这消息不一定属实,安慰母亲别难过。

到了阴历10月,同村去的劳工期满回来了。村里共去了11个人,可是仅回4个人,其余都死在那里了,死者中就有我父亲。而活着回来的这4人中,有一个叫穆绍臣的带病回家不久也死了。我弟弟到县劳工协会去取父亲的骨灰盒,看到那里的骨灰盒堆得像小山一样,好不容易找到父亲的名字,可里面根本没有骨灰,只有几片指甲和一绺头发,也无法肯定这就是父亲的。大约一个月后,杏山村(松山村以西20里)警察署通知给死去的劳工发放抚恤品,母亲到杏山去,领回来的是一个所谓的"表彰状"和五尺白布。在日寇侵占时期,一个中国人的生命对他们而言贱如蝼蚁啊!

后来我从同去的劳工处得知父亲的死因。父亲身体不好,患有风湿病,经常腰疼,在乌奴耳又水土不服,加重了病情。5月份的一天,父亲在干活时感到劳累,直起腰刚想休息一会儿,一个日本监工(因他满脸络腮胡子,劳工送他绰号"大黑头")过来对着父亲就是一镐把,正打在腰上。父亲惨叫一声躺倒在地,过了不长时间就死去了。

以伪锦州省省长王瑞华的名义于伪康德11年10月1日颁发给我父亲的"表彰状",编号为2380号,这个数字应该是截止到我父亲的死难劳工数,排在后面的不知还有多少,而且这只是伪锦州省死在乌奴耳的中国劳工,其他省的究竟还有多少呢?为了记住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我把"表彰状"一直保留至今。

我家所在的穆家村与我父亲一同当劳工的名单是:

刘连春(时年40,生还)

贾　会(时年50,生还)

李云波(时年23,替父当劳工,生还)

穆绍臣(时年42,带病回家后不久病死)

穆荣芳(时年49,死亡)

孟宪峰(时年50,死亡)

王国兴(时年49,死亡)

刘庆瑞(时年35,死亡)

宋云凤(时年50,死亡)

周庆禄(外号周狗剩子,时年30,死亡)

周庆祥(外号周老疙瘩,时年26,与周庆禄为同胞兄弟,死亡)

二十六、黄文喜回忆在免渡河当劳工的经过


黄文喜

黄文喜,1919年生,现住辽宁省锦州市松山镇。此材料根据2002年11月13日访问记录整理。

出劳工那年我20多岁,具体哪年已记不准了。当时我在市里学徒,父亲来找我,说村上派我出劳工,如果我不去,就得由我父亲顶替。于是,我收拾行李回到村里去报到。点名的人认识我,问我怎么来了,名单上没我。我刚想往回走,乡劳务股的一个姓赵的人来了,问点名的人点到我没有,那人说名单上没有,姓赵的就告诉他现在就把我的名字添上。原来,我在交公粮时曾与此人发生过口角,这次他借机报复我。就这样,我被押上火车来到免渡河(现属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市)附近的一个叫哈拉沟的地方当了劳工。

我被编在一个小队里,小队有60人,都住一个工棚子里,同伴来自我家附近的各村,有白马寺的、俞屯的、桃园的。我被分配去筛沙子,一起干的有10个人,规定每人每天筛10立方米。由朝鲜人当监工,用木板钉的一个框做计量,装满是1立方米。我们将沙子倒进去,满了后叫监工来看,合格便将

木框取下放一旁接着装。如果监工故意刁难，装满也不许取，我们还得继续往里倒，直到他们满意为止。我是阴历2月去的，9月才回来，当地气候严寒，可是日本人为赶工程进度，不管多么冷的天，逼迫我们早上7点多开工，一直干到天黑，在八月节前后都下雪了，还点着灯摸黑干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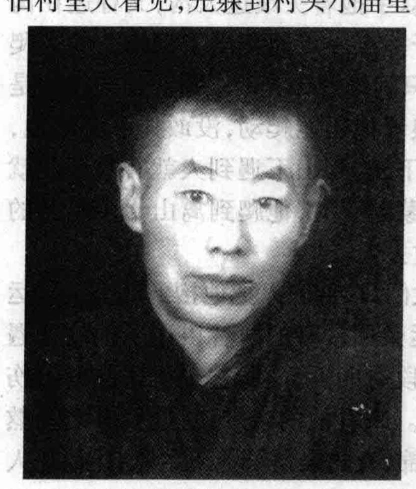
如此劳累的活，每顿仅给吃一茶缸那么多的小米粥，说是小米好听点，其实三分之二是谷子。死的劳工多数是饿死的，加上水土不服，一旦拉肚子，日本人又不给医治，无论怎样结实的身体都会被折磨死。监工的手段更是狠毒，死在他们手上的劳工难以计数。我就亲眼目睹过一个劳工被打死的情形。和我对面一起筛沙子的是一个彰良村的小伙子，他就是因为水土不服肚子疼，干活时忍受不住了，停下来想歇会儿。监工走过来手持镐把不由分说一顿狠打，打完后还逼他接着干。第二天早上，我便看见他的尸体被抬出了工棚。

按日本人的规定，死难的劳工必须火化。由本小队的人从队部领取一瓶煤油，将死者连同他的行李物品一齐抬到山上，那里事先已挖好了炼人坑，一米多宽，一人多深，砍来些桦树枝，把人放上去，泼上煤油就烧，那情景极其凄惨。正应了那句话，“兔死狐悲”，不一定哪天，自己也会落得如此下场。好在我们的小队长为人不错，非常照顾我们，七个半月劳动期满后，小队中只有一个叫郭振生的死在了哈拉沟。其他小队情况就不行了，挨着我们的一个小队多数是来自彰良村的，60个人除小队长外都死在那了。

好不容易熬到9月份劳动期满，我又坐上闷罐车回来了，七个半月的劳工生涯把我已摧残得不像个人样，鞋底早已磨掉，是用铁丝穿起来对付的，头发始终没剪，衣服也破烂不堪。我没敢直接回家，怕村里人看见，先躲到村头小庙里，等到天黑才回到家里。

二十七、马铁脖子

本文为乔福林、韩云朋回忆，孙恒久整理，原载《富锦文史资料》第2辑，1985年7月内部版，第23～27页。选用时略有删节。


马铁脖子

马铁脖子，原名马运荣，是一位勤劳贫苦的农民。后来为什么又叫马铁脖子呢？这里有他一段生命攸关的惨痛历史。

1910年马运荣出生在富锦县大榆树乡宝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时依靠父亲给地主扛活勉强维持生活。他从小给地主放牛、放马当半拉子，受尽了地主的打骂。1945年，35岁的马运荣才结婚成家。为了生活，他离家到县城给赵家豆腐坊赶车喂马、种地当长工，维持全家的生活。这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大东亚圣战”处于日暮途穷、节节败退的困境。日寇为了挽救败局，急于抢修富锦东乌尔古力山（日军称五顶山——编者注）的军事工程，以加强“北边镇护”，阻挡苏联军队从抚远、同江、富锦一线对中国东北的进攻。乌尔古力山位于富锦县城东南10公里，是个重要的军事阵地。1932年日寇入侵富锦以来，就从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关里各地抓来成千上万的劳工，在山上修明碉暗堡、军火库等军事工程，妄图利用居高临下的乌尔古力山，封锁松花江面，控制富锦重镇。1945年8月初，日寇为了加快未完工程进度，便疯狂地到农村抓劳工、要官车。一天日军闯进福德屯，屯里的劳力、车老板知道一去当劳工是凶多吉少，都跑光了。马运荣是在这屯给赵家豆腐坊种地、喂马的长工，因他晚上喂马，白天正在睡觉，不知日寇进村，所以他没跑。日寇抓到了马运荣，逼他套车去东山。从此，他和其他被抓的劳工整天在日寇的刺刀监视下日夜抢修工事，运送日军准备撤退隐藏的军需物资。一天、两天、十几天，真是度日如年。

这时，苏日两军已经交火，苏军飞机不时在乌尔古力山上空盘旋轰炸和扫射，日寇垮台的日子快到了，劳工们盼望早一天回村和家人团聚。可杀人成性的日寇怕泄露军事机密和掩藏的物资，竟对13个车老板下了毒手。一天下午，一队手端刺刀的日军突然闯进工棚，逼着劳工到工棚的西南角集合，然后把他们的双手倒背过来用铁丝拧上，穿成两串，用刺刀逼着他们出工棚，东西一字排开，站在

山坡上。马运荣想这下坏了,日寇是要杀死我们了。可双手已被拧得紧紧的,又是一个连着一个穿成了串儿,想跑也挣不脱。他正想着,日寇开刀了。一个日本兵手提战刀,从西往东砍。正在砍的时候,苏军的飞机飞到上空盘旋轰炸,日寇在慌忙中钻进山洞躲藏起来。当时一个穿在另一串上的小伙子,破开铁丝捆绑,突然窜出,往山南坡跑去。日本兵开了一枪,打伤了那人的胳膊,但那个小伙子终于逃出了虎口。后来知道那个人是太平川仁安屯的。飞机过后,日本兵出了山洞,把剩下的车老板一个一个地杀害了。当砍到马运荣时,他看到一个刀影往头上砍下来,在他一缩头的功夫,刀已砍到脖子上了,他就昏倒在死人堆里了。过了一阵之后,他又苏醒过来了。他怎么没死呢?原来日本兵的屠刀砍到他头上的一刹那,他见刀影下来就本能地一缩头,头上的毡帽给挡了一下,只砍断了他的大脖筋,颈动脉却没伤着。他苏醒过来以后也没敢动弹,等候着日本兵的撤离。他在死人堆里躺了三个多小时,蚊子、瞎蠓咬的实在厉害,他在不知不觉中动了一下,被守护在尸体旁的日本哨兵发现了,那鬼子一边喊叫着,一边用刺刀照着他肋部刺了两刀,他又昏了过去。到了半夜,他又苏醒过来。看到满天星斗,还听见日军哨兵巡逻来回走动的声音,他知道自己还活着,就是抬不起头来。生存的欲望促使他想,只要有口气就得想办法逃出去。他开始一点一点交错地挣脱拧在双手上的铁丝,不知用了多少时间,费了多大的劲,终于被他挣开了。他就用一只手托着脑袋,用一只胳膊着地匍匐着从死人堆里往南坡的山下爬去。爬出一段路,因为夜深人静,他爬行的响声被日军哨兵听见了,随着日军哨兵的喊叫声,向他爬动的方向开了枪。他静静地躺在草棵里一动不动,听到日本哨兵走远了,又继续往山外爬。他爬进草丛,爬过树林,爬着爬着,遇到了日军的铁丝网。他就一只手托着下巴,一只手拄地,从低处贴着地皮爬了过去。后来,他又遇到一个一房子多深的大深沟,他就双手抱着头滚进大沟,又昏迷在沟里了。苏醒过来后,他歇了一会,就用尽全身力气,用手拽着大蒿子一点一点地爬出了深沟。他边爬边不时地往回看,怕日军追来。这时他发现身后不远的地方,有两只闪烁着绿光的眼睛。他知道这是在附近吃惯了劳工尸体的野狼,闻到他身上的血腥味跟上来的。狼看他还能爬动,没敢扑上去吃他,但始终跟在他后边。他想,狼不扑上来咬我,我就得争取时间往山下爬,到山下遇到人就有救了。就这样,他提心吊胆地用了大半夜时间,从丛家大沟爬出了山。到天蒙蒙亮时,他爬到离山十多里路的新发屯,终因流血过多,精疲力竭,到刘三虎子家大门口处又昏了过去。

当刘三虎子家早起开门时,发现一个满身血葫芦似的人躺在大门口,刘家人把他抬到屋里。马运荣慢慢醒过来后感到口渴厉害,就喝了一瓢凉水。刘三虎听到马运荣用沙哑的声音讲述了他的遭遇后,立即给赵家豆腐坊送信,赵家用车把他拉到街里治疗。治了一段时间后,两肋被刺得透腔的刀伤见好,脑后砍断的大脖筋却因伤口太深治也不见好,已溃烂生蛆了。来看他的亲友说:这回够老马熬的,怕治不好了。这时,苏联红军已在我抗日军民的配合下进驻富锦,有的亲友给他出主意,让他托人找翻译,恳请苏联红军司令部医院为他治疗。经过工作,苏军司令部知道马运荣是被日寇砍头没死的劳工,竟欣然同意为他治疗。这样,马运荣就住进了苏军设在富锦的医院。在红军医院里,他的伤口得到了抢救治疗,在苏军医护人员的亲切关怀、精心护理下,经过20多天的治疗,很快痊愈出院。但因日寇刺刀刺进胸腔造成气胸,虽然治疗了伤口,却说话费力,声音嘶哑了;脑后留下了一扁指深的一个伤疤,体力也很衰弱。这是日寇侵略中国、残杀无辜百姓的又一铁证。

在日寇屠刀下幸存者马运荣,出院后高兴万分,不知用什么语言能表达自己的激动和感激心情。于是,他逢人便讲:"日本鬼子砍了我的脑袋,是苏联红军和共产党又给我安上了个脑袋,不然哪有我马运荣的今天啊!"从那以后,村里的人都说他是"铁脖子",马铁脖子的外号就这样传遍全县。(20世纪)50年代初,马运荣惨遭日寇杀害的这段历史,在《松江日报》、《东北日报》皆有报道。

由于马运荣身经旧社会的磨难,又惨遭日寇的屠刀,身体过早地衰老,50多岁就丧失了劳动能力,常年弯腰驼背,说话很费力,后因患肺气肿,于1972年在宝林村去世,终年62岁。

第四编
强化要塞区的殖民统治

第一章　政治体制向军事化转轨

第一节　伪满洲国政治体制

伪满洲国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日本为愚弄世界舆论,为自己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找块遮羞布,竭力保持伪满政权“为一独立国家的体面”,而导演了伪“满洲国建国”这场闹剧。经过精心包装,使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有了通常独立国家所应具有的一切外部特征:国号、国旗、国歌、国家政权、军队和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等。从表面上看,伪满建国伊始实行的是执政统治下的立法、司法、行政、监察四权分立原则,伪《政府组织法》规定,“执政由人民推举产生,对全体人民负责”,“立法权由立法院辅佐……”似乎带有某种程度的民主共和色彩。1934年改行帝制后,又以“满洲国的政体为君主立宪制”,其新订的《政府组织法》称“……具有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① 但实际上,在伪满洲国政权存续的全过程中,除了先后颁布“产业开发”、“移民开拓”、“北边振兴”等所谓“三大基本国策”和伪皇帝先后颁发的《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国本奠定诏书》《时局诏书》《建国十周年诏书》等几件“诏书”以及1942年末公布的《满洲帝国基本国策大纲》等全局性重要法律、法规、文告外,却从未制定颁发任何宪法。

而真正“具有宪法性质的根本大法”,实际上早在1933年8月8日日本内阁通过的“八八”决议,即《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便已出笼了。这个要纲是日本控制伪满洲国的纲领,它明确规定了对伪满洲国的国体、军队、经济、财政等各方面的控制政策。关于控制伪满洲国的体制与机构,“要纲”写道:“对满洲国的指导,在现行体制下,在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籍官吏实际进行。”“为便于其统制,使之维持以总务厅为中心的现行体制”。这个“要纲”清楚地表明,只有关东军司令官才是名副其实的伪满洲国的最高统治者,是主宰伪满洲国、居于伪满洲国皇帝头上的太上皇。这种表述并非意味着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各职能机构全属虚设,也并非这些机构未发挥任何政权职能作用,而是实权不在他们手里。所有伪机构,包括伪满洲国皇帝本人,都只不过是按照以关东军司令官为代表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志和利益行事。

---

①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洲国史》总论,第424页。

第二节　向军事化转轨

上述由关东军通过总务厅对伪满洲国政权实行内部统辖的政治体制，在伪满洲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内，大体上沿用原有的行政体系和正常、例行的领导指挥方式进行。随着1937年7月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使日本国内军部和右翼在政府中的地位逐渐发展到完全操纵控制政府，日本政府从"举国一致体制"发展到东条英机主持时的"战时体制"。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作为伪满洲国也只能使自己的政治体制迅速与日本政治的法西斯化进程完全同步。于是，在关东军的内部统辖下，伪满洲国政府于1938年5月开始实施《国家总动员法》，随后又陆续以"战时状态"、"非常时期"、"时局特例"等名义在先后发布的一些重要法规、文告中提出"共同防卫"、"确立国防体制"、"非常对策"等论调，为伪满洲国政治体制逐步向军事化转轨鸣锣开道。并随着形势的发展，以有利于军事战备为由，有步骤地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通过改革行政区划和一些机构的编制、组织形式、领导指挥体制、职权责任、调整人员等办法，不断促进强化政治体制向军事化转轨的进程。其做法主要有：

1. 从1939年8月1日起正式推行的《北边振兴三年计划》，是伪满洲国在政治体制向军事化转轨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步。

《北边振兴计划》的实质是要把伪满洲国北部的7个边境省限期建成可随时发动对苏侵略战争的综合性军事基地。同时进一步加强殖民统治，使这种统治的政治体制转向军事体制，并全面纳入战争轨道。其具体措施是：

——把北边各省的行政权转由当地日军最高司令官指挥与统辖。为此调整了北边各省的行政机构，进一步缩小行政区划，增设了东安、北安两省，并新设了鹤岗、林业、绥阳等县，撤销了凤山县，调整了部分县的行政区划；

——扩大了北边各省伪省长的权限，把原属中央上层的一些权限直接转移给有关省长，各省长可依据军事行动需要不经请示中央而自行处理；

——为使日本人直接统治北边各省，原由中国人充任的伪省长，大部分由日本官吏接替。还以便于与当地日军联系为名，将珲春、东宁、绥阳、穆棱、密山、虎林、孙吴等各重要边境县的县长，也直接改由日本官吏充任。同时在北边各省的行政机构内，增加了日本官吏人数；

——北边各省一律建立了所谓"军、官、民一体制"的省"防卫委员会"，由当地日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长任委员长，统辖全省军事事务，从而使日军现地司令官在实际上掌握了对该省行政机关的"区署权"，即不经中央而自行独立处理的权力；

——将原各司其职、互不相属同时并存的国境县（旗）一线国境警察队与驻地县（旗）内警务科系统的地方治安行政警察合并为统一的县（旗）国境警察队，并将其组织编制体制由原来的县（旗）警务科——区（努图克）警察署——警察派出所——警察分驻所形式，改编为军事性编制体制，即县（旗）国境警察队本队——各中队——各小队——各分队。在武器装备上，一线的各中队、小队均配备了轻机枪，有的还配有重机枪和轻迫击炮等。

2. 极力强化对广大青少年学生的所谓"国防训练"。1940年2月，日伪统治者新公布了向学校派遣陆军现役军官令，明确规定在"国民高等学校"（中学）、师道学校、师道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等均开设军事训练课，规定"教练以施行军事的基础训练，培养至诚之精神，实行心身之实践的锻炼，提高国民资质，增强国防能力为宗旨"。教练内容分为学科与术科两种：学科在课堂上教学，主要内容有军人素质与军事理论知识，借以向青年学生灌输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阶级服从思想；术科是操场和野外训练，主要内容有队列、射击和班、排的进攻与防御、行军野营、侦察、距离测量、防空、防毒等事项。

3. 强化扩充"日满协和会"组织，在加强其对人民思想统治的同时，还大力推广普及协和会掌握

领导下的协和义勇奉公队,为战争条件下城乡国民总动员打下组织体制基础。1940 年 12 月,伪满洲国政府指使协和会中央本部制定并发布《协和义勇奉公队组织要纲》。"义勇奉公队"是 1937 年在农村地区推行"街村制"时,为取代原有的雇佣制"自卫团"而组建起来的,以承担街村警备任务为目的。1940 年改组为"协和义务奉公队"后,成为协和会一体化领导指挥之下的"国民防卫的核心"、"精锐的行动组织",由 20 ~ 40 岁的青壮年中选拔组成。中央和省协和会本部都设有"协和义勇奉公队训练总处",县(旗)编成总队,总队最下层单位为分队,由协和会基层分会的 20 名左右分会会员组成,总队与队之间设定战术区域,组成区队。到 1943 年,全伪满洲国分队员总数已达 43 万余人。奉公队实行军事化管理,执行任务时统一着装,佩戴袖标,每人配发一只"协和棒"(齐眉棍)和一根"捕绳"。需要时当局随时抽调他们配合军警进行巡逻、戒严、防空演习等活动,当时民间称他们为"棒子队"。随着奉公队组织的扩大,其执行任务范围也"根据时局需要"而发生转变,例如让他们参加建设"建国忠灵庙"、营造宫廷府、造林绿化运动等"勤劳奉仕"活动。

4. 建立并全面强制推行无偿奴役东北人民的"勤劳奉仕"和"国民皆劳"制度。"勤劳奉仕"运动最初是由协和会于 1939 年发起的。协和会以"协和义勇奉公队"为基础,组织动员社会各阶层,包括机关团体职员、青少年学生等投入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劳役。有了这个开头后,日伪当局一遇到劳务上的紧急需要,便以"勤劳奉仕"名义,迫使人民服劳役。而且这种劳役的军事性质日益浓厚,奴役的对象也从城镇逐渐扩及农村。1940 年日军在东满对抗日军民进行"讨伐"时,动员伪吉林、通化两省的青年为"讨伐队"运输作战物资和掠夺的农产品等。1941 年在"勤劳奉仕"名义下被奴役的总人数达 33.2万人,在全部的"奉仕"项目中,有 85% 属于军事、农产、矿产、公路、土地开发等方面,后来则集中于铁路建设、国防公路建设等。但这时的"勤劳奉仕"从形式上看还是作为"国民强化组织"的协和会组织发动的"国民运动",还不具有法律地位。

1942 年 10 月,伪满洲国当局公布了《国民勤劳奉公局官制》,同年 11 月颁布《国民勤劳奉公法》和《国民勤劳奉公队编成令》。至此,国民勤劳奉公制度在伪满洲国全境正式确立,并成为"国民皆劳"政策的重要一环。"勤劳奉公法"规定,凡 20 ~ 23 岁的青年男子(1945 年该法修改,适龄年龄延长至 30 岁),未被征为国兵者,除残疾、精神异常及身体虚弱者外,均有义务参加勤奉队,在三年内服劳役 12 个月。1940 年伪满洲国实行征兵制后,每年征兵数为 3 万人,而适龄壮丁每年则约有 30 多万人。征兵剩余的便组成"勤劳奉公队",俗称"国兵漏",按地区准照军队形式编组,伪民生部长任总司令,勤劳局长任副总司令。勤奉队的劳役包括军事工程、铁路、公路修筑,水利、造林、土地开发,农作物收获、救灾等。

"勤劳奉公"制度也适用于大学和中学甚至高小在校学生。1942 年 12 月伪满公布了《学生勤劳奉公令》,每个学生一年要参加一个月左右的"勤劳奉公"。

1942 年 12 月,伪满洲国当局颁布的《满洲国基本国策大纲》第三章《民生纲要》中明确提出"建立国民皆劳体制",使伪政权可以用行政手段并以"紧急就劳"、"行政供出"名义向全民摊派劳工或者直接从居民中抓劳工。

5. 简化政务,"高度发挥战时行政效率"。1944 年 12 月,公布《奉天省在防御上的时局职权特例》,其中规定:奉天省长在发生紧急事态而在防御上有特别必要时,在警备、避难、救护及应急抢修等问题上,可对锦州、安东、通化各省长进行指挥,并对其他……有关防御工作,进行所需要的指示。1945 年 6 月伪满当局在《时局行政职权特例法》中规定,为应付时局,国务总理大臣、主管各部大臣,在增强生产能力、贯彻防御、加强地方行政及其他综合国力的扩充运用上,有特别必要时,可以令一个行政官署对另外的行政官署发出必要的指示。另外,可以将一个官署的职权,交由另外的官吏、团体工作人员、雇用人员来行使。

6. 兴安总省应关东军要求拟订了《战时兴蒙对策要纲》。关东军考虑到伪满洲国西北部的兴安总省以人迹稀少的大兴安岭及广阔的草原同苏、蒙相连,一旦日苏开战,日、满军的部署难免因地域广

阔而不足,因此于1944年末要求兴安总省研究拟订对苏防御对策。兴安总省拟订了日、苏开战后,迅速将妇女、儿童集中转移到内地避难,日系男子则全部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计划。为此,兴安总省参事官将依据"时局职权特例"集中所有权限,担任防御指导。这个计划被称作《兴蒙对策要纲》,其基本内容是:

(1)以县、旗为单位,举全体居民,形成游击战态势;

(2)兴安总省被入侵敌军南北切断的可能性大,因此,总指挥部南北两分,北拟设于扎赉特旗,南为东科后旗;

(3)储备游击战所需的资金、鸦片、资材、弹药及其他生活物资,构筑游击据点;

(4)游击战应接受关东军第二游击队节制。

第二章 调整行政机构

自伪满洲国建立以后,遵循日本对伪满洲国政治、经济统治政策的变化和军事斗争形势的需要,其各级政权机关曾多次进行所谓的改革和调整,不仅中央有些机构时而合并,时而又分设或增设,省、县(旗)等各级地方行政区划也不断调整、变动,表现出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步步加深,从伪满洲国的组建到崩溃,所谓调整改革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节 溥仪出任执政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在关东军的调唆、怂恿和鼓动下,一批原张学良部下的省级地方军阀、政客,如原辽宁省长袁金凯、臧式毅,吉林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熙洽,东省特别区张景惠,洮南镇守使张汉鹏、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等汉奸亲日派先后发表宣言,声明脱离南京政权,实行独立。后又在关东军撮合操纵下联合部分蒙旗王公贵族进行联省自治,于1932年2月17日组成以张景惠为委员长的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紧锣密鼓地筹建伪国家。同年3月1日,张景惠以满洲国政府名义发表了建国宣言。与此同时,3月1~5日,伪政府先后三次派团赴旅顺向溥仪"呈奉拥戴书","披沥三千万民众的诚意",恳请其出任执政。溥仪在受到"三顾之礼"后,始于3月6日起程,以执政身份抵达长春,受到"隆重欢迎",并于3月9日出席了建国庆典和执政就职仪式。

从1932年3月到1934年3月,伪满洲国实行执政期间,为标榜名义上的"民主共和制",伪满洲国《政府组织法》规定,在伪中央政府实行立法、司法、监察、行政四权分立,同时设立作为执政咨询机关的参议府。

在这最初两年期间,日本对武力侵吞中国东北做贼心虚,为欺瞒世界舆论,避免国际干涉,极力从外表上将傀儡政权打扮成一个"独立国家"。他们采取哄骗、利诱等手段,网罗一大批为捞取个人实惠或实现某种野心而甘愿为其主子效忠卖命的前地方军阀、政客以及连同溥仪在内的清廷遗老遗少为其充当走卒,匆忙搭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构。一方面,为稳定局势,笼络地方实力派人物,原封不动地沿袭了原东三省区划,保持其原有地盘并尽量照顾旧的派系部落关系。另一方面,为防止军阀割据一方拥兵自重形成难以驾驭的个人势力,又采取调任架空、明升暗降,逐步削弱其实权,斩断其网系的手段,将各省省长均委以中央要职,而省长职务则为兼职制。如建国后于3月9日任命臧式毅为国务院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熙洽任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马占山任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汤玉林任参议府议长兼热河省长。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以所谓"总务厅中心主义"来实现关东军从上到下对伪国务院到省、县各级政权的全面彻底地"内部统辖",即在国务院内设置总务厅,各部厅

级也相应设有总务司(处)。各省也一律设总务厅,国务院总务厅名义上掌管"部内的机密人事、主计及有关需用的事项",而实际上权大无边,从国务院各部局到省,任何重要事项未经总务厅裁可一律不得实行,总务厅(司、处)长一律由日本人充当,包括其一般职员也几乎清一色由"日系官员"充任。在伪县(旗)级政权,则由日本参事官操纵实权。总务厅长的权限超越伪国务总理之上,同样,各部局的总务司(处)长的权限也超越各伪部、局长之上。关东军司令官下属有第三课和特务部,其中第三课通过总务厅系统对伪满洲国的政治、行政、人事等重大问题进行决策,"日系"总务厅长则以此为最高决策,在辅佐伪国务总理大臣的名义下对各部(局)及各省行使指导统制权,其具体贯彻执行又是通过各部(局)、伪省公署的"日系"总务司(厅)长来进行。而关东军特务部则负责"掌管经济立案及有关经济统制业务"。总之,关东军是凌驾于伪国务院之上的真正统治中枢,而伪满的执政、总理及部(省)长和市、县(旗)长也就成了傀儡和牌位。为确保对伪执政溥仪在暗中随时进行监督控制,关东军司令部还特设了一个第四课,专门承担此项内部控制任务,在溥仪身边安插了一个关东军常驻代表——执政顾问官,直接监视控制溥仪。

在县以下的基层,伪满洲国成立之初,日伪当局为扑灭东北爱国人民反满抗日的斗争烈火,尽快建立起殖民统治秩序,袭用封建专制政体和旧有的基层统治政策,对县以下机构实行保甲制,并于1933年12月颁布了《暂行保甲法》。其中规定,在基层以十户为一牌,一村或相当村的区域为一甲,每个警察署管辖区域为一保,分别设置保长、副保长、甲长、副甲长和牌长,他们"由地方行政官署长和警察署长指定之","受警察署长之指挥监督"。《暂行保甲法》规定,住民中凡犯有"内乱罪、公共危险罪、暂行惩治叛徒法所规定之罪、暂行惩治盗匪法所规定之罪、暂行枪械取缔规则所规定之罪"等各罪款之一者,"警察署长课得对于该牌之各家,课以2元以下之连坐金……"。

此外,该法还规定,各保需建自卫团,凡18岁至46岁男子在当地居住一年以上后,均得参加自卫团,负有供日伪当局驱使的义务。由警察署长指定团长、副团长(保自卫团)和团总、副团总(甲自卫团),自卫团费用由居民负担。

保甲制度的实施,是日本统治集团镇压、统治东北人民和维持、巩固其殖民统治秩序的重要决策之一,手段极为阴险、毒辣。一是通过"连坐"制度,对居民实行层层控制,使之相互制约,把殖民统治政策直接贯彻落实到基层;二是通过自卫团制度把青壮年居民组织起来,逼使其跟随日伪军警讨伐镇压抗日力量,实现"以华制华"的罪恶目的;三是维护了东北农村旧有的封建统治关系,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第二节　实施帝制与十四省建制

1934年3月1日,日军为了更得力地驾驭伪满洲国,操纵以溥仪为首的大小汉奸,决定迎合溥仪"重登大宝"的梦想,让溥仪宣布伪满洲国实行帝制,由关东军操纵,在长春伪皇宫举行了"登基"典礼,溥仪当上了伪满洲帝国开国皇帝。日军利用称帝首先稳住了溥仪及其周围热衷复辟的重臣,然后便根据政治需要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伪满洲国体制的"改革"。

在伪中央一级,根据实行帝制后颁布的新《组织法》规定,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制。即由立法院行使立法权,法院行使司法权,国务院行使行政权,参议府则系重要的国务咨询机关。伪皇帝为国家元首,可以通过政府机关统揽国家一切大权,并统率陆、海、空三军。伪国务总理改称国务总理大臣,辅弼皇帝,主持国务院工作。伪国务院各部总长改称为各部大臣。伪帝宫另设侍卫机关以及负责掌管印玺的尚书府等。原执政顾问官则改称"帝室御用挂"。但这都是表面上为把伪满洲帝国打扮成一个"独立国家"所需要的,而实际上却更加强化了关东军对伪满政权的全面操纵控制,加强了对伪国家的中央集权。这种集权程度从官吏任免权上可见一斑,例如荐任官以上任免一律由中央掌握;委任官下人员省长才有权任免,使伪满帝国统治机构成为贯彻执行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意图

的更为驯服有效的工具。

实施帝制后,关东军为进一步控制伪满政权,于1935年5月对伪满中央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变动。高层官员除少数人仍留任原职外,其余的人都做了更换,凡被日本人认为不可靠和不驯顺的汉奸、复辟狂与旧军阀,均换成与日本人关系更为密切、更被信任的人。同时,从中央到地方进一步提高了日系官吏在官吏总编制中的比例,例如在中央一级伪机构中,日系官吏的比例已超过一比一。

这样,原国务总理郑孝胥因"健康上的理由"请求辞官,得到准许。同时发令任张景惠为国务总理大臣。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将原有省区划小划细,进一步削弱各省的实权,遏制地方势力的滋生、发展和膨胀,防止各地游离于日伪中央统治之外。对地方采取"广设诸侯,分而治之"的方针,将各级政权也进行了改组。于是,依据1934年10月新制定公布的《省官制》,于同年12月公布了新的省级行政区划及省长。结果,原有的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建制被改划为十个省建制,同时将原兴安总省管辖的蒙古族聚居的兴安四个分省均升格为省。这样,伪满全国共划分为十四个省,其基本情况如下表:

省名	省公署驻地	市数	县(旗)数	新任省长	省名	省公署驻地	市数	县(旗)数	新任省长
奉天省	奉天市	1	28	葆康	锦州省	锦州		13	徐绍卿
滨江省	哈尔滨特别市		28	吕荣寰	热河省	承德		12	刘梦庚
吉林省	吉林市	1	16	李铭书	黑河省	黑河		8	钟毓
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	1	25	孙其昌	兴安东省	扎兰屯		5	额勒春
三江省	佳木斯		14	金名世	兴安南省	郑家屯(后王爷庙)		7	业喜海顺
间岛省	延吉		5	蔡运升	兴安西省	开鲁		6	扎嘎尔
安东省	安东		11	王兹栋	兴安北省	海拉尔		8	凌升

此外,还有直属国务院的两个特别市,即新京(长春)和哈尔滨,以及"北满特别区"(中东铁路沿线的原"东省特别区",后于1935年12月撤销)。

伪满"实施帝制"的1934年,也正是驻东宁、绥芬河、平阳、海拉尔等边境地区的驻军根据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大将关于修筑国境阵地的《关作命第589号命令》在东满、北满及西满国境开始大规模进行要塞修筑的时刻。日伪当局恰在此时对伪省级行政区划进行调整,无疑也是适应了关东军的军事需要。伪满民政部大臣臧式毅,当年在说明省级改革宗旨及其六个"着眼点"时,其第五点便是"便于军事机关的联系"①。而关东军修建的第一批8个要塞正是在上述区划缩小或新设的吉林省、三江省、龙江省、兴安北省国境地带修建的。

第三节 机构调整

随着关东军对伪满傀儡政权控制的不断强化,殖民地统治秩序也日益得到进一步巩固,日本急需相应地强化对经济及其他事业的统治,以满足其对战争物资的需求和经营东北战争基地的需要。伪满洲国当局遵照其日本主子的旨意,于1937年5月即颁布了《政治行政机构改革大纲》,同时修改了《组织法》和国务院以及各部的官制,宣布自7月1日起进行新的一轮"行政机构改革"。

这次改革,在中央一级是将国务院原设的外交、财政、交通、文教、民生、军政、实业、司法、蒙政9部简化成治安、民生、司法、产业、经济、交通6部,撤销了文教部(划入民生部),蒙政部和外交部分别

①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洲国史》总论第459页,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90年。

改称兴安局和外务局，属国务院直辖，另设一直属国务院的内务局。撤销了监察院，改设审计局。

日伪当局宣称，此次“改革”旨在实行“政府各部企划执行的一元化”，实质是进一步全面扩充总务厅的职权范围。首先是在国务院新设了一个“企划委员会”，下设经济、民生振兴、文教3个委员会，负责审议、制定有关方面的政策，该委员会由总务厅统辖。因而“日系”总务厅长便可经由此渠道有效地操纵伪国务院一切行政大权。二是将军政部改称治安部，实行军警合一，将原分别由民政部掌管的警察业务和军政部统辖的伪军事务统归治安部管辖，使军警业务“一元化”，其指挥权则“化”到关东军设在治安部的军事顾问部手中。三是撤销蒙政部，改设为兴安局，作为协调兴安各省同各部关系的机构，不再像以前的蒙政部那样全面、直接统辖蒙古地区的行政、警务、经济、教育等业务，减少了层次，使日本统治集团的意志更能直接贯彻到兴安各省。四是安插日本人直接出任一些主要部门的主官。

在省级，日伪当局于1937年6月又新增设了通化、牡丹江两个省，同时增设安东、抚顺、营口、鞍山、四平、辽阳、铁岭、牡丹江、锦州、佳木斯10个普通市，将哈尔滨特别市改为普通市。

1939年，关东军为了加速东北战争基地的建设，打着“振兴边境”地区的幌子，抛出了“北边振兴计划”，在中苏边境地区大肆进行与此前已于1934～1938年间完成的第一期国境要塞工程相配套的军事工程、铁路、公路交通和通讯线路、野战医院、仓库等后勤保障供给设施的建设。为保证“北边振兴计划”的顺利贯彻落实，于1939年6月宣布增设北安、东安两省（由牡丹江、滨江、龙江三省分划出来），1941年春又增设四平省。

与此同时，为强化对国境和其他有重要军事意义地区的统治，“便于和日军驻屯部队的联系和交涉”，又采取边境省份全部直接由“日系”官吏取代“满系”省、市、县长的措施，而且这些职务由日本人接任后，不论后来人事上几经变动，由“日系”掌权这一格局，一直到日本战败投降为止。另一方面，日伪政府对边境地区的省、市、县长的权限又作了新的规定，即：“大臣的权限尽可能移交给省长……地方机构可以采取临变应急措施，根据军事上的需要变更体制”，这实际上是向日本人直接充任伪省、市、县长的边境省份放权。

日伪当局这次机构“改革”的另一特点，是变“总务厅中心主义”为“次长中心制”，即除伪国务院保留总务厅并相应强化外，各部及地方各省、市、县均实行“日系”次长（副职）中心制，这种组织形式比起原有的各部“日系”总务司长、各省“日系”总务厅长主政更为直接、便当。

在基层，日伪当局鉴于这个期间殖民统治秩序已初步确立，针对原有保甲制度的某些弊端，决定将日本国内的市町村制搬进东北，经在奉天试点后，于1937年12月正式颁布了《街制》和《村制》，并全面推广。街是次于市的城镇，多为县驻地，村是所谓部落的结合。街设街长、副街长各1人及司计、事务员若干，并由县长任免。村设村长、助理员、司计、事务员等“有酬吏员”，也由县长任免。同时，日伪当局又公布了《市街村自卫法》，将过去由居民雇佣的“有薪制”自卫团改为“无薪制”，实行自卫团义务制、轮换制。

这次“改革”显然是进一步加强日本在伪满的殖民统治与经济掠夺。首先，它进一步扩大了伪总务厅的权限，使其不仅掌握了原属外交、兴安、民政等部的一些权力，而且还获得原监察院的会计检查与行政监察等权力，即从纵向与横向加强了“日系”官吏在伪满机构中的地位，使伪满从上到下的一切殖民权力都直接操纵在日本人的手里，为其加强法西斯政治统治与经济掠夺，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其次，通过“改革”加强了伪满经济结构，强化了经济统治，并把伪满引向战时体制。第三，通过“改革”将伪军警统一划归治安部，并增设了一些新的省、市和军管区，便于和加强了日伪对抗日武装的镇压，强化了对苏作战的准备，从而也适应了全面侵华战争的需要。第四，通过实施《街村制》和《市街村自卫法》，加强了对东北人民的控制、搜刮和奴役。

第四节 行政改组

1941年12月8日，日本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由于侵略扩张野心过大，树敌过多，战线拉得过长，逐渐暴露出其力不从心的虚弱本质，并开始一步步走下坡路。为了全力以赴支撑这场战争，日本百倍疯狂地垂死挣扎，敲骨吸髓地攫取掠夺殖民地和占领区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战争资源，使伪满洲国也被绑上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进入所谓“战时体制”。

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到日伪政权倒台前的几年里，为适应对外战争、对内镇压和资源掠夺的需要，不断地对各级行政机构进行调整改组。

1942年4月，由于伪满当局宣布加入德意日轴心国联盟，又和伪蒙疆政权、汪精卫伪政权等建立“外交关系”，外交事务频繁，故将外务局升格为外交部；同年10月为促进“勤劳奉仕”运动，加强对东北人民的奴役，迫使其为侵略战争提供无偿劳力，在伪民生部内设立了国民勤劳奉公局。1943年4月，民生部教育司也升格为文教部；同时再度将军警业务分离，以新设军事部取代治安部，新设警务总局，划归总务厅统辖。这样，伪国务院又从6部制变为8部制，即军事、民生、文教、外交、司法、经济、交通、兴农部(1940年由产业部更名而来)。

1945年3月，又将民生部中的劳务司同国民勤劳奉公局合并，升格为国民勤劳部，以强化统制“勤劳奉仕”运动。而民生部则予撤销，其中的一些业务同禁烟总局合并，改称厚生部。

在地方一级，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为统一国境地区军事管辖区和省行政区，以适应军事要求，1943年10月将国境地区的6个省合并成2个总省，即：将东满地区的牡丹江、间岛、东安3个省合称东满总省，总省长负责管内各省行政的综合调整，除对间岛、东安2个省长进行指挥、监督外，并直接领导牡丹江省。此外，为决策省的“最高方针”与特殊重大问题，各省设立省政议会，以省次长、各厅长、主查参事官、省协和会本部长、副本部长或省事务长、省兴农合作社主任等组成。在原兴安4省的蒙古地区，除保留兴安北省外，原兴安东、南、西3省则合并为兴安总省，原兴东、兴南、兴西3省改设为省领导下的地区行政公署，以加强总省长权限。另外，由于形势变化，新设还不到两年的东满总省，于1945年5月28日，又分成为东满省(含原牡丹江和东安两省)与间岛省。

伪国务院总务厅将全满分为南、中、北、东满和兴安5个协议区，以便在需要时，在总务长官监督下，随时召开地区行政协议会。在县(旗)公署设立审议室，其机构权限准照省参事官制。同时，准照省政会议，设置县(旗)参政会议。为加强一线行政工作，改革官制，使第一线的县(旗)长(日、满系)、日系副县(旗)长也可以任用“简任官”(即按相当于省厅级高配)。

在基层，自1940年12月日伪当局颁布了《国民邻保组织确立要纲》后，便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撤销原有的街、村组织，而代之以由协和会操纵基层实权的《国民邻保组织》。至1942年12月，日伪当局共在21个大中小城市组建了69 934个“国民邻保组织”，但由于种种原因，在农村中这种组织发展很不顺利。于是日伪当局借助“战时体制”于1942年4月抛出《自兴村设置五年计划》，宣称“唤起农民的自兴精神，促进其生产意欲，集结部落的总力，以期适应国家的各种需要”。自兴村以“农产物搜获为第一主义”。不久又宣布实行《村治一元体制》，即村长、协和分会长、兴农合作社长由一人兼任，实现三位一体，村的中心协议会和唯一协议机关为协和分会常务会，以确保日本对东北农村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全方位的绝对支配权，“以期战时任务的迅速确实完成”。所以说，自兴村是日本统治东北期间最疯狂、最贪婪、最残暴的农村基层殖民统治机构，也是其在东北殖民统治最终完结的基层政体。

第三章　国境防卫体制

伪满洲国领土主权，一开始便被日本所全部攫取。所以，不但伪满洲国的国境，就是伪满洲国领土、领海的任何角落，关东军都一概视同己有，它可以在自己选中的任何地方兴建兵营、基地、塞堡、军港、机场或其他任何军事工程，也可以任意圈占土地划为军事禁区。

关东军的这些特权是通过和伪政权签订的一系列秘密或公开的条约取得的。

首先是溥仪出任伪满执政的第二天，即1932年3月10日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以换文形式签订了密约，其主要内容有：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全部委托日本管理，所需经费由伪满洲国负担。

同年9月15日，新任关东军司令官兼日本驻伪满大使武藤信义与伪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其中的第二条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的领土及治安的一切威胁，事实上同时成为对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安宁和存在的威胁，缔约两国共同担负防卫国家的责任，为此需要日本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同日，在《日满议定书》的基础上又签订了所谓《日满防卫军事协定》，其中规定：日本与伪满两方军队统一由日军指挥官指挥，日军享有在伪满洲国领域内军事行动上的必要的“自由、保障”和“与此有关的便利”。

1933年初关东军完成对东北的全面军事占领后，便同时面临以下各项任务：一是以各独立守备队为主，在野战师团的支持和伪军警的密切协同辅助下，集中精力进行所谓“治安战”，即对正风起云涌的东北爱国人民抗日游击运动进行大规模围剿镇压，“整肃、讨伐”；二是以主要精力投入对苏扩张侵略的积极备战活动。关东军在1932年便拟制出1933年度《对苏攻势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便是“一开始就把战场锁定在苏联境内……东正面第一期会战，西正面第二期会战（决战）……”从此，关东军的历年度作战计划都是“攻势作战计划”，这就是关东军所谓的“国境防卫”任务。直到1944年9月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屡遭惨败，形势持续恶化，已无法逆转；在其他战场，也到处碰得焦头烂额，被迫收缩，日本已根本无力再对苏发起攻势，大本营才向关东军下达了《对苏全面持久作战计划》，去掉了“攻势”二字，实际是侧重防御，以集中全部精力应付太平洋战争。

为了在突出抓好“国境防卫”的同时，协调进行“治安肃正”，关东军司令部对其各种部队驻防分布进行过多次调整部署，也就是按各个不同的战略方向将其驻军部队划分成若干防卫（或警备）地区，实行关东军统一领导指挥下的防卫地区司令官负责制，这是关东军从始到终对“国境防卫”的基本体制。1938年随着国境沿线各重要战略进攻方向或战略掩护防卫方向要塞工程的竣工及各要塞国境守备队的编成进驻，原“国境防卫”体制中，又增加了在地区防卫司令官节制下的要塞区国境守备队司令官负责制。在1941年“关特演”后，由于日本帝国主义根据《日、德、意军事同盟条约》中关于三国联合反苏反共条款的规定和随后德国悍然发动全面侵苏战争的形势发展，准备在有利时机随时对苏发起大规模入侵，故关东军下属部队成倍增编。从1933年时的3个野战师团，3个独立守备队，1个混成旅团，1个骑兵集团，到1942年时已逐步扩大到8个军司令部，14个野战师团，2个坦克师团，1个坦克旅团，1个骑兵旅团，9个独立守备队，13个国境守备队，1个驻屯队，1个航空军司令部，2个飞行师团等。由于原来的防卫地区司令官一般都为军级，有的甚至是师团级，而这时随着部队建制的成倍增编，仅军司令部就设有8个，有的一个防卫地区就设有两三个军司令部，七八个野战师团，加上其他兵种，已远远超出军司令部的指挥范围，故关东军从1942年起又增设了2个方面军司令部，即设在吉林省敦化的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和设在奉天的第三方面军司令部。这样，关东军对“国境防卫”首先实行了关东军自身方面军——防卫地区——要塞区三级司令官的负责制。其次，自

1939～1940年间完成了对国境县(旗)和邻近国境地区的地方治安行政警察改编为"国境警察"后,关东军司令部主管防谍、谍报和谋略的第二课通过伪国家安全局对全伪满洲国近30个国境县(旗)的监督,对除关东军要塞区域和野战阵地以外的全部国境一线和纵深地域的监控与严密封锁体制。第三是部署在国境附近的伪军部队对国境的辅助防卫体制。第四是在"日满共同防卫"的口号下,根据伪满当局颁布的《防卫法》和平战结合原则实行的日军防卫司令官统一指挥下,由日、满军和警、宪、特、行政当局、协和会及重要事业单位头面人物组成的以省级为单位的防卫委员会体制。

第一节　关东军防卫地区司令官负责制

关于关东军各防卫地区的划分、驻防部队的调动部署和防卫司令官的任免,曾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多次作过调整变动。

一、第一次防卫地区划分

1933年初,关东军在伪满洲国全境共划分了五个防卫地区司令部,即东地区、北地区、西地区、南地区、西南地区的防卫司令部,另在伪满的首都新京设立了警备司令部,在旅顺口地区设立了要塞司令部。

二、第二次防卫地区划分

1934年3月3日,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大将签发了《关东军关于改变军队部署的命令》,其原文如下:

关东军关于改变军队部署的命令

(1934年3月3日)

关作命第575号附件

3月3日上午9时于新京军司令部

1. 鉴于满洲国内目前的治安情况及其他一般形势,预定自4月1日起改变我军部署。

部署概要如附图。(略)

2. 第10师团长任东地区防卫司令官,除负责地区内之治安维持工作外,在东宁、绥芬河、平阳镇及富锦附近分别部署部分兵力,警备苏满国境。其他部队尽可能集结在铁路沿线,做好随时出动之准备。

根据关作命第554号配属之装甲列车2辆、装甲轨道车3辆,于4月1日以后应配属给第2独立守备队。

3. 第14师团长(军预备队及新京警备队之派遣不变)任北地区防卫司令官。除负责防区内之治安维持外,在黑河附近部署部分兵力,担任苏满国境之警备。其他部队尽可能集结在铁路沿线,做好随时出动之准备。

根据关作命第554号配属之装甲列车及装甲轨道车各1辆,于4月1日以后配属给第3独立守备队。

4. 骑兵集团长任西地区防卫司令官。主力位于海拉尔附近。除负责维持防区内的治安外,在三河及满洲里部署部分兵力,负责苏满国境之警备。

必须充分做好出动之准备。

原配属之第14师团部队,在3月末之前,务使其返回其原所属部队。

根据关作命第554号配属之装甲轨道车2辆,于4月1日以后,配属给第3独立守备队。

5. 第7师团长任西南地区防卫司令官。除负责维持防区内之治安,保护该地区内之铁路(奉山线除外)及各项重要通信设施、掩护其施工外,在古北口、马兰峪、建昌营等长城重要关口附近之要

地，部署部分兵力，以监视中国方面遵守停战协定之情况。

务须充分做好随时出动之准备。

原配属之第3独立守备队部队，在3月末之前应使其返回原所属部队。

汽车3中队之配属不变。

6. 第1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任南地区防卫司令官。除负责维持防区内之治安外，以主力保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线；以部队兵力保护奉山线、沈海线以及防区内的重要通信设施。

以约1个步兵大队随时做好出动之准备。

其司令部设于奉天。

7. 新京警备司令官（指挥下之部队不变）除承担原有之任务外，任中央地区防卫司令官。负责维持防区内之治安，以及重要通信等各项设施之保护。

同军预备队接交有关宽城子及孟家屯无线电信所掩护任务之时间定为4月1日。

8. 上述各防卫司令官，在维持治安工作中，可安排使用非其隶属或指挥部队之日满军警。

9. 第2独立守备队司令官，自4月1日以后除以主力保护京图线及拉宾线，并掩护东地区内的新设铁路和重要通信设施工程外，还须以部分兵力保护吉海路，维持北满铁路东及南线之交通。

同军预备队之间接交北满铁路南线主要列车警备任务之时间定为4月1日。

其司令部设于新站。

10. 第3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除以主力保护四洮、洮昂、齐北、宾北线，并掩护北地区内的新设铁路及主要通信设施和京洮线的工程外，还须以部队兵力维持北满铁路西线之交通。

同军预备队之间接交掩护京洮线工程任务之时间定为4月1日。

其司令部设于昂昂溪。

11. 关于独立守备队对铁路巡警之指挥权，按照关作命第526号执行。

12. 旅顺要塞司令官任旅大地区防卫司令官，负责其担当地区内之防卫任务。

为此，必要时可安排使用旅顺重炮兵大队。

13. 关东军飞行队队长派其侦察飞行队驻齐齐哈尔（工程结束后，部分派往锦州或奉天）；派战斗飞行队驻哈尔滨；司令部及轰炸飞行队驻新京（轰炸飞行队在兵营建成同时，转移至公主岭），除配合各兵团实施之讨伐行动外，须充分做好出动之准备。

14. 电信第3大队长除负责军内及与军外之主要通信联络外，还须以部队兵力做好随时出动之准备。

15. 军预备队、坦克第3大队、野战重炮兵第9联队、高射炮第2大队、旅顺重炮兵大队、关东军汽车队（原缺少部队不变）及铁道第3联队，分别在目前驻地充分做好出动准备。

16. 关东宪兵司令官除执行其原有任务外，还须统一动用日本驻满各警察机关，担任满洲国内之治安勤务；协助军队之行动。

17. 关东军铁道线区司令官除处理满洲国内的军事运输事宜外，还须充分做好有关军事运输的作战准备。

18. 关东军兵站司令官应处理军内之兵站（补给业务除外）业务。

19. 关东军野战兵器厂、航空厂及关东陆军仓库厂，关于各自的主管事项，除负责军内补给及修理业务外，还须充分做好作战准备。

20. 各地卫戍病院院长除从事其本职工作外，应使救护班或救护员随时做好出动准备。

21. 以3月末为期，解除关东军临时预备马厂编制。

关东军临时病马厂厂长除继续执行现有作业外，自4月1日以后接替关东军临时预备马厂之业务。

应在奉天设分厂。

22. 无线电信教习所、军犬育成所及军用鸽育成所所长继续执行现有任务。

23. 多田少将应采取措施将全满划分成必要之警备地区，在各地区部署必要之满洲国军队，责成满洲国军警备司令官在有关的日本陆军防卫司令官的分别处理下，负责其管区内的剿匪及维持治安工作。

关东军司令官 菱刈隆大将

三、第三次防卫地区划分和担当兵团的编成

1934年11月18日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大将签发关作命第626号命令，变更各兵团担当的防卫地区，其原文如下：

关东军关于变更各兵团担当之防卫地区的命令

(1934年11月18日)

关作命第626号

11月18日正午于新京军司令部

本军鉴于各方面情况，将变更各兵团担当之防卫地区。

为此，关作命第575号(3月3日发令)、第582号(4月5日发令)、第607号(7月7日发令)关东军命令所提出的防卫地区，以及过去规定之新京警备地区，做如下变更(参照附图，省名按照新制度规定)。

东防卫地区 第3师团长担任

三江省全境、滨江省大部(包括在北地区的8个县除外)及吉林省之一部(榆树、扶余两县)。

东南防卫地区 第2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担任

吉林省大部(包括在东地区及南地区的4个县除外)及间岛省大部(珲春县除外)。

南防卫地区 第1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担任

安东省全境、奉天省大部(包括在西地区的2个县除外)及吉林省之一部(伊通县和怀德县)。

西南防卫地区 第7师团长担任

锦州省、热河省之全境及兴安西分省之西半部。

西防卫地区 第3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担任

奉天省之一部(双山、辽源2县)、龙江省之一部(泰来、镇东、洮安、洮南、突泉、瞻榆、开通、安广、大赉9县)，兴安南分省全境、兴安西分省之东半部、兴安东分省之一部(喜札嘎尔旗)。

北防卫地区 第16师团长担任

滨江省之一部(铁骊、庆城、绥楞、绥化、海伦、望奎、青岗、安达8县)、龙江省大部(包括在西地区的9个县除外)及兴安东分省之大部(喜札嘎尔旗除外)。

西北防卫地区 骑兵集团长担任

兴安北分省全境。

旅大防卫地区 旅顺要塞司令官担任

关东州全境。

新京警备地区

附图二所示地区。

第3师团长、第2独立守备队司令官、第1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旅顺要塞司令官、第7师团长、第16师团长、骑兵集团长在上述各担当地区内应继承有关的防卫任务。

对于新担当地区的责任转换时间定为12月1日正午。

在维持治安方面，仍然可以调动使用担当地区内的所属部队或不属于其指挥部队的日满军警。

第3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除执行现有任务外，任西防卫地区司令官，负责第1项所示担当地区内的维持治安工作。

在维持治安方面，可调动使用防卫地区的所属部队及非其指挥部队之日满军警。

关东军飞行队长自12月1日起同岩佐少将进行交接，兼管新京司令官任务。责任转换时间定为12月1日正午。

关东军司令官 菱刈隆大将

这次关东军防卫地区的调整和部队的部署变动，与上次比较主要变化是：

1. 全"满"防卫地区由原来的6个改设为8个，增加了西北和东南2个地区，即将原来的西地区分为西防卫地区和西北防卫地区；将原来的东地区分设为东防卫地区和东南防卫地区。这种改变主要是1940年10月伪满当局颁布新的《省官制》，决定进行省行政区划的调整改革，将原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和兴安总省改为十四省制（从原兴安总省分出东、西、南、北4省，从原黑龙江省分出为滨江、龙江、三江3省，从原奉天省分出安东省、锦州省，从原吉林省分设出间岛省），为适应这一变化，进一步明确各防卫地区的防卫职责，故有必要重新划分。

2. 由于这个期间驻防部队的换防调动，各防卫地区司令官也相应做了变动。例如这个期间日本由国内调来第3师团、第16师团进入东北，隶属关东军建制；分别接替原第10师团对东地区和原第14师团对北地区的国境警备和地区防卫职责。第2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出任新建的东南防卫地区司令官，第3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则出任新分出的西防卫地区司令官。

四、第四次调整防卫地区

这次的调整特点一是将原有的8个防卫地区改划为6个，二是防卫司令官全部由各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担任，并将独立守备队司令官的军衔一律高配到中将级，以赋予其临战时统一调动指挥非隶属的邻近地区野战部队。至1936年，关东军的战略兵团虽未得到大的增强，一直保持3个野战师团、1个骑兵集团、1个混成旅团的态势，但独立守备队却不断得到增强，从1934年12月的4个独立守备队、24个大队，到1936年5月已扩大到5个独立守备队、30个大队（每个独立守备队由6个大队编成），总兵力约2.4万人，相当于当时2个半步兵师团的兵力。

1936年3月，关东军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抗日武装力量的镇压，同时加强"苏满国境警备"，决定将"伪满洲国"全境重新改划为6个防卫地区的"警备"态势。防卫地区名（所含省名）——防卫责任者（司令部所在地）如下：

1. 东部防卫地区（牡丹江、间岛、东安、三江）——第四独立守备队司令官（牡丹江）。

2. 北部防卫地区（黑河、北安、滨江）——第五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哈尔滨）。

3. 西北防卫地区（兴安北省、龙江）——第三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昂昂溪）。

4. 中部防卫地区（吉林、兴安南省）——第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新京）。

5. 南部防卫地区（奉天、通化、安东、四平、兴安西省、锦州、热河）——第一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奉天）。

6. 旅大防卫地区（关东州）——旅顺要塞司令官（大连）。

在上述"警备"态势下，担任防卫司令官的各独立守备队的司令官由中将担任，在"治安防卫"方面赋予其对驻屯的防卫地区内的野战军司令官也可以指挥的权限。这一时期对反满抗日力量的武力镇压、实战的主角已经开始逐渐转移到伪满洲国军和警察队方面来，但独立守备队仍居于中枢地位。各独立守备队司令部配备2名参谋，担任"讨伐"作战的筹划指导工作。1个独立守备队（6个大队）平均司令部有40人，各大队800人，总兵力约4 800～5 000人，马500匹左右。平常以中队为单位（150～200名）分散驻屯。

随着伪满洲国军和警察队能独自实施武装镇压，独立守备队的兵力和权限也相应缩小。

五、第五次防卫地区划分

1939年8月，关东军将伪满洲国全境划分为"作战地区"和"防卫管区"，命令驻屯在"作战地区"内的独立守备队隶属于所在地野战军司令官。同时，独立守备队由5个增至9个，但在总兵力上由

30个大队削减到27个大队，即1个独立守备队下设3个大队。从过去相当于1个旅团的大部队缩小到1个联队规模的部队。

在新的“警备”态势中，“作战地区”为间岛、牡丹江、东安、三江、黑河、北安、兴安北各省（1941年8月以后，加上龙江省）。新的“警备”态势中防卫地区名（所含各省名）——防卫责任者（司令部所在地）如下：

1. 东部防卫地区（牡丹江、间岛）——第3军司令官（掖河）。
2. 东安防卫地区（东安）——第5军司令官（东安）。
3. 三江防卫地区（三江）——第10师团长（佳木斯）。
4. 北部防卫地区（黑河、北安）——第4军司令官（北安）。
5. 西部防卫地区（兴安北）——第6军司令官（海拉尔）。
6. 龙江防卫地区（龙江）——第7师团长（齐齐哈尔）。
7. 滨江防卫地区（滨江）——第5独立守备队长（哈尔滨）。
8. 吉林防卫地区（吉林）——第2独立守备队长（新京）。
9. 南部防卫地区（四平、奉天、通化、安东、兴安南）——第1独立守备队长（奉天）。
10. 西南防卫地区（兴安西、热河）——第9独立守备队长（热河）。
11. 旅大防卫地区（关东州）——旅顺防卫司令官（大连）。

防卫地区比以前细分了，独立守备队按在2~3个省配置3个大队的比例配置。配置的密度和以前基本相同，但除了第1、第2、第5、第9独立守备队外，其余的守备队在“讨伐”方面归野战军司令部指挥，降低了其独立性。由于独立守备队隶属于野战军司令部，野战军便成为计划、实施“讨伐”的主体。这是为了使野战军专注于对苏作战准备而采取的措施，是为了防止由独立守备队主导拉野战军参加“讨伐”而进行的改编。另一方面，由于独立守备队缩编为3个大队，在兵力运用上也相当紧张了。守备队的司令官也由老龄少将或大佐一级充任。由此可见，在这个阶段武装镇压的主角已经由独立守备队转移到伪满洲国军、警察队方面担任。

这是关东军防卫地区的最后一次调整。这次调整较之前几次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一是防卫地区数量增加了，而其防卫范围相对缩小了。即从此前的6个防卫地区增设到11个防卫地区。

二是将新定的11个防卫地区中的东部（牡丹江、间岛两省）、东安（东安省）、三江（三江省）、北部（黑河、北安两省）、西部（兴安北省）等5个邻近“苏满国境”的防卫地区明确为“作战地区”，而其余内地的6个地区则系“防卫管区”性质。

三是5个“作战地区”的防卫地区司令官一律由野战部队的军司令官担任，而其他“防卫管区”性质的防卫地区司令官则由旅团级建制的各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担任。

上述变化显然是和伪满洲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关东军自身战略重点的转变相关联的。从伪满洲国内的形势看，一是伪满当局1937年决定增设通化、牡丹江两省，1939年又决定增设北安、东安两省，使伪满的省级行政区划增加到18个。这就不能不使关东军考虑相应调整防卫地区。二是经过日伪军警多年的“治安肃正”讨伐，各地抗日武装均遭到严重损失，不得不化整为零，抗日斗争陷入低潮，日伪的“治安肃正”任务已逐步开始主要由伪满军警承担。使关东军得以脱身于“治安肃正”，将主力部队部署在靠近国境地区，侧重对苏作战准备。三是到1939年秋，沿“苏满国境”线从五家子、东宁经黑河到海拉尔的13个国境要塞阵地已全部建成或基本建成，各国境守备队也同时编成进驻，加上1938年已在东部张鼓峰，1939年在西部诺门罕和苏军进行了大规模军事冲突，使得关东军更加把战略重点转向苏联。因而，到1939年底前在靠近国境的各“作战地区”已经进驻5个军司令部，9个师团，1个坦克旅团，9个独立守备队，8个国境守备队，1个驻屯队，1个飞行集团司令部，18个飞行战队。上述部队除飞行部队外，均分别由所驻防卫地区司令官统一指挥，使各作战地区的防卫

司令官配备到军级。

1944 年下半年后，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接连惨败，被迫调用关东军大批主力部队南下，使关东军的对苏作战计划由“攻势作战”改为“持久防御作战”，各“作战地区”部队缩编，从而使某些防卫地区司令官的职级规格也相应下降。如设在海拉尔的西部防卫地区，1939 年时防卫司令官是独立第 6 军司令官，而到 1945 年初由于第 6 军司令部连同下属的第 23 师团整建制南调，在海拉尔驻军中建制级别最高的部队只剩新组建的第 119 师团，故由 119 师团长继任为西部防卫地区司令官。

在防卫地区司令官负责的体制下，还有各个要塞区国境守备队司令官的负责制体制。要塞区国境守备队的任务是对要塞区实行“专守防卫”，要塞区的范围一般是正面从几公里到一二十公里，纵深也大致如此的构筑坚固的地上、地下作战工事地区。在此范围内分设数个作战阵地区，即抵抗枢纽部。要塞区对于防卫地区来说只是一个点，而防卫地区负责的则是包括要塞区在内的整个国境线的一个截面。

第二节　县(旗)国境警察本队长负责制

“国境警察”是伪满洲国一建国便设立的一个警种，但比起 1938 年后的国境警察，它们只是名称相同，而在设置位置、目的、职责范围等方面却全然不同。

1932 年 3 月，伪满洲国建国时将全国警察工作列入民政部警务司，警务司设有直属的特殊警察队，包括海边警察队、国境警察队和游动警察队。其中的国境警察队只设在“国境口岸和海边枢要”地区。经过筹备和人员调集、培训，于同年 6 月初起，以日本警察为骨干和基础，组成了若干国境警察队，先后进驻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与中国华北的所谓“国境”)、满洲里、黑河、绥芬河、东宁、土门子(中苏国境)、安东(与朝鲜的国境)、瓦房店(与当时由日本直接统治的“关东州”即旅顺、大连地为界)等地，担任警备和取缔非法入境扰乱国内治安、出入境人员走私等任务，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边防检查和海关缉私性质，只能说是与“国境防卫”有一定联系，而在实质上却不能将其混为一谈。

1937 年 7 月，随着伪满当局颁布废止《特殊警察队官制》，原各地国境警察队和游动警察队，全部按“属地原则”合并到驻地县、市警察机构中。

在此期间，从伪国军角度配合辅助关东军对伪满绵延近 5 000 公里长国境的整个面上进行“国境防卫”的，是原属军政部后改为治安部参谋司直辖的分布在各地的“国境监视队”，其哨所共数十个，总人数 2 000 余人。他们原属伪国军系统。

1938 年 4 月，上述原伪国军系统的国境监视队连同其营房、哨所、通信所全部整建制划为伪治安部警务司管辖，并改编为国境警察队，与驻地市(县、旗)行政警察并存，但各司其职，互不相属。这是伪满组建其完整意义上的国境警察的开始。同年 12 月，伪满当局颁布了《国境警察队官制》，其中第一条规定：“……关于治安部指定事务受地方保安局长，关于其他警事务受县长或旗长的指挥监督而掌管之。”1939 年 6 月 1 日，伪满治安部布告第 4 号《关于设置国境警察队的县、旗之件》，指定在间岛、牡丹江、东安、三江、黑河、兴安北 6 省 25 个县旗设置国境警察队，到 1940 年兴安北省警察机构全部改为国境警察队，1943 年扎赉诺尔又升格为市单独设本队。此外在伪三江省还新设鹤立、林口等县，这样整个伪满设有国境警察队的省共有 7 个，市、县、旗有 30 个。改编为国境警察的原市(县、旗)警察厅或警务科，一律改称国境警察队本队，在组织形式上，由县、旗国境警察队本队——各中队——各小队——各分队的新体制，取代过去县(旗)警务科——各警察署——派出所——各分驻所的旧体制。以兴安北省为例，1941 年全省共设旗、市国境警察队本队 8 个，下辖中队 21 个，小队 85 个，分队 11 个。而到 1945 年 8 月，兴安北省市、旗级国境警察本队已达 9 个，下辖中队约 30 个，小队约 90 ~ 95 个，分队近 20 个。共有不同规模的国境警察哨所或执勤点近百个，警察队员近 2 000 人，

平均每市旗约220余人。一个地区人口数量的多少和警察编制配备无疑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相对于其他各省,兴安北省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尚且配有如此众多的国境警察,其他各省可想而知,伪满全国的国境警察在日伪覆灭前应不少于7 000~8 000人。

国境警察队除行使内地一般治安行政警察的全部职权外,更主要的任务是在地方国家保安局的领导指挥下,紧密配合关东军监视封锁国境线,取缔非法出入境人员,积极开展防谍谍报工作和搜集各种情报等特务工作。遇有小股武装队伍潜入潜出国境,则直接予以围剿捕获或歼灭。在这方面珲春县国境警察曾作出令日伪当局十分满意的突出表现:1938年5月,该县太阳村国境警察中队板石桥小队盘岭监视哨在国境线上扣捕了苏联滨海边区波塞特地区越境叛逃的苏军三级上将柳希克夫,移交日军特务机关。监视哨的两名普通警士为此均被越级擢升为"警尉补",受到警察的最高奖赏。

国境警察队因任务特殊,故编制、装备也与内地一般治安行政警察有所不同。在编制上,小队级从十余人到三四十人,中队级从四五十人到百八十人。武器装备以步枪、刺刀、手榴弹为主,小队一般配有轻机枪1挺,中队武器装备则根据场所的不同、队员的多少略有差异。如珲春县马滴达中队就配有轻迫击炮1门,轻机枪2挺。每个小队在其驻地和管界的高地建有一至数个了望塔,轮值警察在塔上用望远镜向对方境内不断进行观察监视,并对发现的情况随时作出记录,逐日向上级书面汇报,重大情况随时用电话或电台密码上报。沿国境线装有国境警察专用警备电话通讯网或电台(边远小队配有电台)。此外,"全满"国境警察系统还建有警用信鸽通信所136处,信鸽7 030羽(1940年度)。信鸽配备最多的是三江省,有信鸽通信所16个,信鸽1 096羽;最少的黑河省3处80羽,兴安北省4处320羽。警察对国境线除利用了望塔、哨所进行静态监视外,还用骑马巡逻、设临时秘密潜伏哨等办法进行动态监控。并常常派遣"谍者"潜入苏蒙境内进行侦察、搜集情报或进行其他破坏活动。因此伪国境警察队是关东军国境防卫上的一支得心应手的辅助力量,填补了关东军各国境要塞间的空白,发挥了拾遗补缺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三节 伪满国军和"国境"防卫

伪满初期的"国军",是由投降日军的原东北军地方军阀部队改编而成,分别称作各省警备军。1934年伪满实行帝制后,于同年7月初步对伪军实行了改革,组建了5个军管区,除东蒙地区的兴安军管区暂时保留警备军番号外,伪满各省均撤销省警备军。后随着伪满国内省级行政区划的变动调整及适应关东军作战防卫体制的需要,伪军的各军管区也逐渐增多。到1941年时已分为11个军管区,到1945年4月最后一次改编时,其所辖主要部队计有步兵旅10个,骑兵旅1个,独立炮兵团2个,山(野)炮营3个,工兵大队2个,辎重队16个(内辎重营2个),通信队11个。各军管区司令部直属机关一般都设有顾问部、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军械处、军法处、军医处、兽医处、兵事处等各部门和陆军医院、军乐队、警卫连等直属单位官兵约200~250人,各军管区官兵总数应在9.3~9.5万人。

此外,在伪军事部机关及其直属的铁道警护军(含司令部机关和警护学院及6个警护旅等共约近1万人)、江上军(3 500人)、飞行队(1 200人)、皇宫禁卫队(880人)、高炮队(600人)和军事部直属各种军事院校及被服、兵器、卫生材料、军马场等,全部伪军约为12万人左右。

关于伪满洲国的国境防卫问题,在伪满建国伊始,即1932年3月10日溥仪出任伪满执政的第二天,溥仪和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以换文形式明确规定:满洲国的"国防、治安",全部委托日本管理……同年9月签订的《日满防卫军事协定》又规定:日本与伪满两方军队统一由日军指挥官指挥……1933年9月,日本陆军中央又特意制定了《满洲国陆军指导要纲》,其基本内容如下:

1. 伪满军必须在日军指挥官的实质性把持之下,担负维持国内治安,作为日本国国防的补助要素。

2. 伪满军兵力必须限制在最少限度,总数字为6万人。

3. 伪满军兵力限于步兵骑兵，不得拥有战车、重炮、飞机等。

由于上述条约和文件已经明确伪满国防“全部委托日本管理”，而伪军只是在“日军指挥官”的实质性把持下首先是“担负维持国内治安”，其次是“作日本国国防的补助要素”。因此伪满军完全成了关东军的附庸军，成了配合关东军镇压东北各族爱国抗日人民的帮凶。他们在“担负维持国内治安”方面，为其日本主子立下了汗马之劳，例如先是紧紧追随关东军在1934年底前基本上消灭了总人数近30万人的以原东北军旧部为主的抗日义勇军和继之蜂拥而起的救国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团体，继而又经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的“三江”大讨伐，1937年7月至1941年3月的吉林、通化、间岛三省联合大讨伐（野副大讨伐）以及分散、零星的讨伐，给中共领导的抗日联军总部及其所辖各路军部队造成极其沉重的打击，使东北的抗日运动转向了低潮。此外，伪军还作为关东军的凶恶鹰犬和对外侵略工具，曾于1937～1938年期间先后3次派出“热河支队”、“石兰斌部队”、“甘（珠尔扎布）支队”等部队万余人进入长城以内对华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进行血腥镇压。1945年1月还派出总兵员达1.6万人的“铁石部队”到冀东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运动，进行镇压和围剿。

伪军在伪满的“国境防卫”上在不同时期或不同情况下曾经起过一些“补助要素”作用：

1. 在关东军“满苏国境要塞”第一期计划完成并进驻各国境守备队前，即从1932年到1938年4月，伪军政部（后改治安部）直属的伪军国境监视队2 000余人曾驻守边境一线担任国境警备，直到1938年4月上述伪军国境监视队奉命全部整建制改编为各地国境警察队为止。

2. 伪军建制中还曾设有1支由中央直辖的“江上军”，配有25艘从三四十吨到两三百吨的炮舰或炮艇，通常以两舰（艇）为单位，于每年解冻期高悬伪满国旗，编队游弋于乌苏里江、黑龙江等界河上。1945年8月11日，苏军出兵东北时，伪江上军司令部命令第4战队“熙春”、“阳春”号两炮舰出动，抵御苏军进攻，结果在佳木斯附近的松花江面上被苏军击沉。

3. 伪兴安北警备军所属部队在1934～1939年曾驻防兴安北省（今呼伦贝尔）的“满苏”、“满蒙”国境一线，如其骑兵第7、第8团部队驻“满蒙”边界和“满苏”边界的额尔古纳河上游一带，伪骑兵第9团则分驻“满苏”边界的额尔古纳河中游黑山头、吉拉林等地。期间便发生了“满蒙”边境大型局部战争——诺门罕战争。在持续3个月的边境战争中，日、“满”和苏、蒙双方共投入兵力近20万人，不但负责警备这一区域的伪兴安北警备军第1、2、7、8骑兵团2 000余人全部投入战斗，又先后将当时驻防郑家屯、通辽一带的伪满军的1支野战部队——兴安骑兵师所属4 700余人及驻防齐齐哈尔的伪第3军管区步兵混成旅石兰斌部5 000余人也分别倾巢出动，投入诺门罕战场，结果被歼灭的歼灭，哗变的哗变，逃散的逃散，最后残部都溃不成军地撤回后方整顿。

4. 尽管根据关东军的总部署，伪军基本上不承担中苏国境的一线防卫，但它毕竟属于关东军各地区防卫司令官需要时可绝对全权统一调动指挥的武装力量，也自然起到国防补助要素的作用。日军曾于1940年在富锦东部约20公里处的五顶山一带建成1处较大型永久性阵地，后来驻守该阵地的日军被调往太平洋战场作战，该永久性工事便一度移交给伪靖安军步兵第2团驻守，给日军的国境防卫解了一时的燃眉之急。直到1943年8月后该部伪军调往锦州，阵地才由日军重新接防。1945年春，兴安北省“满蒙”国境新左旗阿木古郎附近的1处原由日军中队驻守的小型永久性工事，交由伪第10军管区第51骑兵团的某连接防。

1945年8月日苏开战前，伪军中除派往冀东的铁石部队和驻热河的第5军管区部队另有任务外，其他伪军大部被日军抽调从事修筑工事、运送弹药、军需等活动。如第10军管区的半数官兵分别被派到红花尔基以南“满蒙”边境和大兴安岭柴河地区以及海拉尔东郊哈克附近修筑作战工事。驻牡丹江的伪第6军管区总兵力约5 600人，除1 800人事前已被抽调到华北参加铁石部队外，其余全部被分别指定在牡丹江东京城、明月沟等地为关东军运送武器弹药和修筑作战工事。同年6月，为突击构筑通化一带的大型防御工事，更有上万名各地伪军被抽调前往施工。

第四节 各省防卫委员会

伪满洲国从建国伊始便基于《日满议定书》和《日满联合军事协定》,把自己捆绑在关东军的战车上,并日益形成密不可分的"共同防卫"关系。

1936年2月伪满洲国颁布了《国家总动员法》,同年3月又公布了《防卫法》,旨在"战时或非常时期最有效地动员发挥全国人力、物力、资源投入国防事业"。1937年11月和1938年2月,意大利和德国先后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并与之建交,签署了"满洲帝国参加国际反共协定的议定书",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的帮凶。

1939年5月起,在诺门罕地区爆发苏、蒙和日、"满"的战争,伪满洲国当局依据前述《防卫法》,于同年7月宣布在全国实施《防卫令》。此前,同年4月以第82号政令颁布了《防卫委员会官制》,决定在各省会和国都建立防卫委员会,以便在日"满"共同防卫的宗旨下,本着平战结合原则,将"日满军、官、民各机关……置于盟国防卫司令官的领导之下,实行实质上的一元化……。"建立防卫委员会显然和伪满洲国参与国际反共协定,以及东北抗日运动的熊熊烈火已基本上被扑灭,需要着重考虑配合关东军准备发动对苏侵略战争这一背景有关。

防卫委员会是在防卫司令官的监督下,就平时和战时防卫法的具体运用、必要的联系、调整等事项进行审议的地方决策机关。所谓"防卫"是在关东军司令官的统辖下,根据防卫司令官的指挥和命令实施的。关东军根据管内的治安情况作出判断,认为有必要时,由防卫司令官进行指挥和命令,维持该地区的治安。

防卫委员会委员长由日军防卫兵团参谋长或防卫司令官担任,参与人员中包括新京特别市市长、省长等中国人,委员是由有关兵团、政府机关和特殊会社的日本人首脑充当,干事长是日军主任参谋,常务干事和干事全部是省、新京特别市的有关科的日籍科长。

需经防卫委员会审议的重要事项大致如下:

1. 制定配合关东军防卫的警护计划。
2. 实施配合关东军防卫的警护训练或检阅。
3. 有关军事警察的情报或有关治安的必要情报的交流和联系。
4. 有关防谍(包括共产党和思想对策)的情报和研究资料的交流与联系。

第四章 "五族协和"体制

第一节 "五族协和"

"五族协和"或"民族协和",是与一系列从伪满洲国建国之初即先后抛出大肆鼓噪、极力标榜的日"满"亲善、一德一心、王道乐土或王道主义以及实现道义世界等口号一样,都是欺骗世人、愚弄舆论的政治宣传口号,后来这一切又都被纳入所谓"建国精神"的重要内容。民族协和这个问题比起其他几个口号,显然更加受到日本关东军当局的重视,因而它在伪满殖民统治中占有更为突出的重要位置,并且凸显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五族协和"或后来使用更加普遍的"民族协和"这个口号,从伪满时期一开始提出,直到日伪倒台,都始终保持不变,不像其他几个口号那样随着局势的发展变化而作出某些变动修改补充,

甚至干脆弃之不提。例如日“满”亲善的提法就不断深化、发展，而形成不断出现的新提法，从开始的友邦，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时发展为盟邦；而到1942年溥仪颁布《建国十周年诏书》又宣称“献身大东亚圣战，奉翼亲邦之天业……”使日伪满关系升格为“亲邦”，从“精神如一体”到“一体不可分”；而早年的王道主义，则是在后来被“体现天照大神意旨的日本天皇的惟神之道”即法西斯皇道所取代。



宣传“五族协和”条幅



宣传“五族协和”条幅

其次是“五族协和”不仅是作为一般口号，而且作为重要政策被纳入1942年颁布的《满洲国基本国策大纲》。该大纲第一章的根本方针的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宣扬国本主义，培养国家观念，以民族协和巩固国家之团结。”

第三是为了从组织上确保民族协和政策的全面贯彻推行，伪满洲国专门拨出大量编制和巨额经费以及办公处所，建立了作为国家体制的从中央到省、县乃至基层街、村的组织严密、结构健全的协和会系统。

各级协和会的存在，是伪满洲国“五族协和”体制的重要标志。协和会组织差不多与伪满洲国同步形成，并伴随伪满洲国政权的调整、改革而不断在各方面有所刷新，经历了较为复杂的发展演变，又最终随伪满洲国而覆灭。因此，协和会的兴亡史，足以诠释伪满洲国“五族协和体制”的形成、实践及其本质。

第二节　协和会

协和会是由日本法西斯分子组织的“协和党”脱胎演变而来。它是在关东军操纵下传播所谓建国精神的吹鼓手；是散布殖民统治思想和毒素的大本营；是协助关东军进行武装侵略和日伪军警进行讨伐、屠杀掠夺的帮凶和别动队；是排斥共产主义和一切进步思想的反动堡垒；也是同伪满洲国政府一起成为关东军驾驭的双驾马车。总之，它在维持和巩固殖民统治秩序的过程中，发挥出关东军军事镇压和伪满洲国政权暴力统治所起不到的独特作用。概括来说，在它成立后的十几年中，它的主要罪恶活动有如下方面：

1. 协和会成立以后的第一个轰动舆论的大动作，便是遵照关东军的旨意掀起一个大力促进承认伪满洲国的运动。为此，他们专门组成了一个以协和会总务处长于静远为首的17人“派遣团”，东渡日本，向日本朝野各界公开亮明他们背叛分裂祖国、死心塌地地投入日本怀抱的决心，在日本各地大肆游说，盗用东北民众代表名义，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声称“满蒙之地，本不属禹贡九州……”满蒙人民过去在军阀暴政的黑暗统治下，如何水深火热，在友邦仗义出师援助下满洲国得借天赋之机成立，“使身受资本主义重压束缚和共产主义搅扰的三千万民众，再度沐浴世界文化的光芒……”为伪满洲

国的成立声嘶力竭地高声喝彩，大唱赞歌，奔走呼号，为关东军效尽犬马之劳。

2. 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各种形式，开动其全部宣传机器进行反动的宣传鼓动工作，辅助关东军从精神上奴役和统治东北各族人民。首先是创办协和会机关刊物，开展反动宣传。协和会中央本部的会刊《协和》在建会之初即已创办。不久随着“会务的拓展”，各地方分会也相继纷纷出版会刊，如奉天分会的《新青年》，新京《大同报》协和分会主办的《国民文库》、大连的《王道周刊》、抚顺的《东亚之光》（副刊）等。此外，哈尔滨、滨江、吉林、延吉、营口、锦县等地协和会组织也都办有各种刊物。这些刊物都上行下效连篇累牍地刊出各类反动文章，大张旗鼓地宣扬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建立“满洲国”王道乐土的“德政”，吹捧“无敌皇军的赫赫战果”，鼓吹“日满一体”、“民族协和”、“建国精神”，诬蔑谩骂人民抗日斗争，丑化、攻击共产主义理论和革命运动，还随时紧密配合政治、经济形势，开展各种反动宣传。

与此同时，协和会各级组织还大量编印、广泛散发各种宣传品，大肆鼓噪。仅在协和会成立一年多的时间内，便散发小册子 25 种 75 万册，传单 71 种 510 万张，张贴画、宣传画 16 种 17 万张，伪国旗 45 万面，还有大量标语口号。另外，每隔 10 日还散发一次新闻传单。

协和会中央本部还利用汉奸和“日系”官员组成高级宣讲班，在东北 21 个城镇地区举办“普及建国精神大演说会”，进行巡回演讲，并开办讲习所和学院等。各地协和会也见缝插针地分别利用花会、绘画展览会、庙会等大型群众集会场合，进行“特别宣传”。

此外，协和会还无孔不入地充分利用当时刚出现的广播、电影等宣传工具以及文艺团体的演出，插进大量日满亲善卖国反共的反动内容，足见其在宣传工作上使尽浑身解数，煞费苦心，企图从思想上解除东北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烈的抵触和反抗情绪。

3. 随军“宣抚”，积极参与日伪军的“治安肃正”活动，充当日伪军镇压抗日武装力量的帮凶。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人民抗日斗争进行武力镇压的过程中，协和会为配合日伪军警的“讨伐”行动，把宣抚工作作为协和会的重点工作，全力贯彻关东军“治安第一主义”的方针，专门成立了“宣抚训练班”，培养奸逆人才，不断组织各种形式的“宣抚班”、“特别工作班”等，紧密配合日伪军警讨伐队，深入抗联比较活跃的地区，从事策反、招降、谋杀、搜集情报等罪恶活动，并不惜以金钱、官位为诱饵，收买抗日队伍中的叛徒，驱使汉奸、特务千方百计地分化抗日武装力量，割断群众同抗日武装的联系，从经济、物资上封锁抗日根据地。

1933 年 2 月，当关东军侵入热河时，协和会中央本部组织的“宣抚班”，在中央事务局次长中野琥逸的率领下，随同日军进行了约半年左右的“宣抚”工作。1937 年 10 月到 1940 年末，关东军以“治安肃正”名义，在吉林省的舒兰、蛟河、盘石、桦甸等县和伪牡丹江省宁安以及伪间岛、通化两省境内，对抗日军民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屠杀和镇压。对这次讨伐行动，日伪军警宪特和协和会等组织了统一机构，即在讨伐司令部下设参谋部、宪兵部、警务部、行政联络部、最高检察联络部、协和会联络部、铁警联络部等，协和会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化省通化县的协和会本部还组织了青年行动队，即从该县协和会青年训练所毕业生中选派 40 人，参加肃正工作。他们化装成工人、农民，混入人民群众当中，搜集各种情报，同时还帮助日伪军警宪特大量强制征召“民夫”，驱使奴役群众从事为讨伐队背粮送草等各种劳役。

4. 大肆进行“排共运动”。1936 年 12 月，协和会中央本部设立“排共特别委员会”，把排共运动作为“国民运动”亦即协和会的日常重要工作来有组织地进行。1937 年 7 月 1 日向抗联战士频繁出入并与苏联接壤的伪三江省派遣协和会工作队。在协和会企划局内，研究对苏思想战的方案，召开对苏思想战规划会议。还组织思想战人员训练班，分配到边境地区进行阴谋活动。1940 年以后，由于八路军深入冀察热辽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因而以热河为中心的伪满所谓西南地区成为“治安肃正”的重点和协和会排共运动重点。于是，在通化一带活动的协和会青年行动队，也跟随日伪军警进入热河地区，分成两个队，分别进入滦平和兴隆两县。这次，他们是离开军队，自行武装，配合日伪军警的武力围剿，积极进行与共产党、八路军争夺居民群众的“思想战”，并组成了所谓的“协和灭共青年队”。

5. 配合时局，大搞所谓“国民运动”。协和会从成立伊始，就首先发起了颇具声势的促进承认伪满洲国运动。1934 年伪满实施帝制，协和会进行第一次改组后，集中精力推动以壮大自身组织，使协和会成为“全体主义的国民组织”。其后，随着协和会组织在伪满政治地位的提高，便逐渐跳出“思想的、教化的、政治的实践组织体”的框框，把自己的活动扩展到几乎和贯彻落实强化日本殖民统治、扩大侵略战争政策有关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会与伪满洲国政府“两位一体”、“互为表里”，使其直接跃上权力机构政坛，更具备了“指导国民运动的资格”，协和会更加活跃在日伪当局推行的各项国民运动中，举凡“北边振兴”、“勤劳奉仕”、“金属献纳”、“粮谷出荷”，协和会无不首当其冲，堪称运动先锋。如“七七”事变后，协和会在东北人民中发起“飞行机献纳”活动，强行从民众中搜刮伪币 16 万元，用以购买 3 架轰炸机，支援侵华日军。在“粮谷出荷”中，协和会会同警察署、兴农合作社等部门挨门逐户搜索粮食，发现隐匿拒不“出荷”者，除没收粮食外，还罚款、毒打、烧房、监押，手段极其残忍。为落实“北边振兴”和“百万日本移民计划”，协和会中央本部和各有关省本部都设立了“开拓科”、“北边振兴对策委员会”，协助主管部门落实有关事宜。例如强制农民“出卖”土地，驱赶农民离开家园，“让”给日本移民“开拓”等罪恶活动。此外，为支撑捉襟见肘、日渐困窘的财政危机，协和会积极投入“金属献纳”、“储蓄报国”运动。各地方分会要员三天两头闯入街道、村屯居民家中，强行逼索“献纳”，甚至连民用的小五金、铜、铝炊具也搜罗一空，有些居民因没有东西可“献纳”，只好到黑市高价求购再上缴应差。为强制群众储蓄，各协和会均下达指标，向群众摊派，完不成定额的要受罚。

6. 插手基层组织的建设和统制。伪满洲国时期先后实行的保甲制、街村制和“国民邻保组织”等各种基层组织形式，都与协和会的意志和干预有关。协和会成立之初，其基层会员主要来自农村中的地、富、乡绅等所谓“地方实力派”，这些人又往往充当保甲长，并在村区划的设置上与地方协和分会的设置保持一致。协和会把这些人抓在手里，通过举办讲习班等形式，促进了保甲制的实施和完善。改行街、村制后，日伪当局为街、村事务提供了合法依据和极大方便。1940 年 12 月，日伪当局颁布的《国民邻保组织确立要纲》更明确规定该组织与协和分会保持一致，并由协和分会指导运用，其组织长（即屯、牌、班、组长）由协和会员充任。同时实行“村一元体制”，即村长、协和会会长、兴农合作社长“集于一人之身”，协和会常务会即是“村的协议体”，“不得另设其他协议体”，使协和分会取代了伪基层行政权力机关。

7. 建立和操纵外围团体。由于协和会是伪满洲国“唯一的思想、教化和政治上的实践团体”，从事社会教化是其工作重点之一。在协和会的直接控制下，属于协和会的外围团体先后设立有协和青年团、协和少年团、国防妇人会、赤十字社、武道会、军人后援会、协和义勇奉公队等，将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组织团体直接控制在协和会的手中，并根据其特点分别规定其宗旨、活动范围和活动内容。此外，对各宗教团体、社团，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德会、红十字会等也都负有指导之责。

8. 奴化、毒害青少年一代。1937 年初，协和会便在东北各地设立了 48 个青少年训练所，专门训练 16～19 岁的青少年，课程只有两门，一是军事课，一是公民课，即灌输“建国精神”，培养“忠良国民”，时间为 2～3 个月，当年培训了 7 000 余人。次年训练所又增加到 59 个，培训人数达 15 000 余人。其后培训规模更是逐年扩大，到 1942 年，其培训总数已达 8 万余人。这些受过训练的青少年，多作为协和会的劝导员分赴各地促进“国民运动”，充当殖民地奴役政策的吹鼓手。

1938 年 6 月，协和会中央本部发布《青少年组织大纲》，规定 10～15 岁的儿童必须参加协和少年团，16～19 岁的青少年参加协和青年团。为此，协和会中央本部特别设立青、少年团 2 个总监部，由协和会中央本部部长兼任总监。煽动青少年作“增产及实现其他国家任务的尖兵”，完成“积极思想战和宣传情报部队的任务”。此外，协和会还在 1939 年建立了直辖的外围组织协和义勇奉公队，吸收 20～35 岁（后扩大到 40 岁）的青壮年为队员，取代原自卫团的职能。义勇奉公队开始是“圆满完成民间警护和应急警护的实施”，后来则无异于其他形式的勤劳奉公队或勤劳奉仕队，完全成了日伪当局

驱使下的劳役队。为了使用好这支身强力壮的队伍,协和会中央本部设立了协和义勇奉公队总监部,由中央本部部长兼任总监。各省协和会本部则设训练总处,由省长兼总处长。各市、县(旗)为总队,下设战术区队、分队,其分队同协和会分会和国民邻保组织合一。到1945年5月,伪满洲国全国共有协和义勇奉公队总队89个,队员476 000人。协和会在操纵青、少年团和义勇奉公队的过程中,刻意奴化、腐蚀和毒害广大青少年,采取法西斯军营式的严厉管理手段,培养"阶级服从"意识,使其成为听凭长官奴役、顺从上司摆布的奴隶和顺民。

第五章 北边振兴计划

二线军事设施和三线基地建设,是关东军于1938年冬初步完成对国境一线要塞化建设的首批工程之后的又一项分期分批大力推行的庞大的系统战略工程,这就是被日伪当局称为"集国防、产业和民生于一体的"所谓《北部边疆振兴计划》。该计划和伪满当局此前在1936年业已出笼的《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以及日本多年一直在极力实施的《满洲移民开拓计划》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对于日本来说是巩固其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并进而完成对苏扩张侵略作战准备的协调配套的综合性措施。因此,《产业开发计划》《北边振兴计划》与《移民开拓计划》并列为伪满洲国的"三大重点国策"。

第一节 《北边振兴计划》的形成与目的

关东军侵占东北之后,在疯狂镇压东北人民抗日爱国斗争,不断强化巩固其对东北殖民统治的同时,基于其大陆政策,迅即把侵略矛头直指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从1934年春开始便全面启动了苏"满"国境地带要塞等军事工程。1936年11月,日本与德国签订了国际反共协定,更加凸显出处于反苏第一线地位的关东军国境要塞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到1938年秋第一期国境要塞工程的施工计划已顺利完成,同时将新组建的各国境守备队分别派驻各要塞地域,按照关东军各年度对苏攻势作战计划所调集的各野战师团,也均按预订方案完成了在大、小兴安岭和完达山脉外侧的各作战正面或其邻近地区的战略部署。

但关东军早已意识到,单纯地依靠国境要塞和一些野战阵地,去实现自己称霸东亚的长远战略目标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苏"满"国境要塞地处偏远的深山,受自然条件限制,交通不发达,与外界联系非常不便,极大影响了军队的调动指挥。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工农业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也相对远远落后于内地,物资供给不足,也给军队的后勤保障造成了很大困难。要尽快解决边境地区的交通、通信、后勤保障等基础设施就成了燃眉之急。于是关东军下决心把伪满洲国全面纳入战争轨道,使其成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基地。

为此,关东军第四课在1938年3月便制定了《自昭和十二年度到昭和十六年度(1937~1941年度)满洲国境战争准备指导计划》,其方针为:

"满洲国政治、经济所有领域……平时力求近似战争状态从事组织与经营,迅速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按完成战争准备加以指导……以求满洲国之健全、迅速之开发与发展,以备随时开战及指导尔后之战争。"①

继而,关东军于1938年12月10日制定了《关于边境方面国防要求事项》,指出"在国境建设(方面)考虑在'满'日本军队的增强,对苏作战的各种准备和其他军事要求,以在满诸机关合作为原则

①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洲国史》汉译本,第688页,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

……”作为第一期计划，大致到1941年完成主要方面。该“要求事项”还提出“鉴于目前情势，依照日满共同防卫的观点，作为对苏诸准备的一环，要加强北满开发的一个主要部分的国境方面的国防建设，使之与增强在满的军备、开发产业、五年计划的措施相适应，要以积极有力地发挥日满综合力量为基础，集中彻底地实行这一措施。”①同时，该文件还提出以下列地区作为“国防建设”的重点，即：

1. 甲方面

牡丹江省，特别是牡丹江市及虎林、密山、东宁、穆棱各县；黑河省，特别是黑河市及瑷珲、呼玛、孙吴、逊河、奇克各县。

2. 乙方面

间岛省，特别是珲春县；兴安北省，特别是海拉尔地区。

3. 丙方面

三江省，特别是佳木斯市及富锦、宝清、饶河各县。

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按照关东军的上述要求，决定由总务厅长官、治安部次长等会同关东军第四课等部门，对东部、北部等边境进行了现地调查。同时，组织了铁路、公路、通信、航空、航路、照明、给水、移民、物资供应、保税仓库、马政、建设资材、振兴军需工业、产业政策、劳力政策、防空设施、保健防疫、经费预算等共计20个专题的国境建设方策准备委员会。各专题委员会从1939年1月起陆续拟制出分科国境建设方案。同年5月1日制定出综合性的《国境建设施策基本要纲》，最后决定以所谓《北边振兴计划》为名发表。该计划以五年为期，从1939年6月1日正式实行。

第二节　《北边振兴计划》的内容

这时所指的北边，是指伪满洲国东、北、西部与苏联边境相毗邻的各省，包括间岛、牡丹江、三江、黑河、兴安北和后划出的东安、北安等共七个边境省。日伪当局为此计划总计投资10亿日元。

日伪在边境地区进行的所谓“振兴”，其中有相当大部分为纯军事用途项目，但为了掩人耳目，便将其纳入到交通、产业、物资、调集、劳动、开拓和福利等项目内容。日伪称“北边振兴”是集国防、产业和民生于一体的综合性计划，事实上该计划固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和所谓综合性计划有关，但从其提出的目的和实际上的主要内容性质等方面来看，则明显是为军事目的服务的计划。

“北边振兴计划”主要由两大部分内容构成。一是以军事基地建设为中心的国防设施建设，二是把边境地区的殖民统治转向军事体制的行政建设。

国防建设的内容又包括“整备国防设施”、“开发当地产业”、“民生振兴”三项。

“整备国防设施”是“北边振兴”的主要内容。按其所公布的计划是指“交通、通讯、航空诸机能之整备刷新。”具体包括：

1. 铁路建设由“满铁”（指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承担。对已有铁路按军事需要进行改建，并增设新的铁路运输线，投资大约6亿日元。

2. 加强军用公路建设，合计为12 800公里，其中新建7 000公里，改建5 800公里。包括设在“国境地带第一线方面的军用道路”和设在“国境地带第二线方面”的“特殊道路”。此外，还有军事基地后方的“移民道路”或称“开拓团道路”以及设在“国境地带的第三线方面”的道路。为了满足军事方面运输的需要，增加一大批汽车数量，设立一批加油站，在一些重要地方设置修理厂。

3. 在通讯方面，为便于军事上的联络指挥，除了推进通讯干线地下电缆建设和整顿地方的通讯电网外，还增设约4万公里有线通讯线路。

---

①　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史纲要》第37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

4. 增设广播和收听设施，设立广播局，建立50个发射塔所。

5. 加强邮政，增设300个邮政局、所。

6. 航空设施，主要是加强军用机场的修建。

此外，还有城市的防水、河川改修工程等。

“产业开发”主要是指农牧渔业和林木矿业的开发和掠夺。在农业方面，计划开垦土地37万亩，扩充农业试验研究机关，增设农事合作社。牧业方面，积极增殖牛、猪、鸡等约800万头只，增设牧场。渔业方面，主要是利用江、湖、河川开发渔场，以增产25 000吨为目标，增设水产合作社。在林木工矿业方面，计划大量采伐原始森林，增设林业加工业。矿业重点是采掘密山、鹤岗、三姓和扎赉诺尔煤矿，开采黑河、佳木斯、珲春、延吉、奇乾、间岛的金矿以及铝、亚铅、铜等有色金属，同时注重勘察兴安岭的矿产资源。在工业方面，发展手工业、修理业、水泥业、制瓦业和农、林、牧、渔的加工业等。为适应上述行业用电需要，以预算投资1亿日元，新设发电所30个。

所谓“振兴民生”，主要是随着国境地区军事化建设和产业开发，设置便利战时军事需要的卫生防疫机构、配备卫生防疫人员及器材，增设医院和药品的加工制造，以及城市规划和房舍的建设等。

第三节 《北边振兴计划》的实施

1939年6月1日起，北部边境地区综合军事基地建设计划正式推行。该计划涉及方方面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均须联动运行。

日伪当局首先从投资较少又易于收到立竿见影之效的上层建筑方面着手，迅速实现把边境地区的殖民统治转向军事体制的行政建设方面，其采取的主要措施有：

首先，为进一步加强对北边各省的统治，将北边各省的行政权转由当地日军最高司令官指挥与统辖。为此，调整了北边各省行政机构，进一步缩小行政区划，从牡丹江、滨江、黑龙江三省中划出东安、北安两省，并在伪三江省增设鹤岗、林口两县，在牡丹江省增设绥阳县，撤销了三江省的凤山县，还调整了其他部分县的行政区划。

其次，借伪满洲国行政机构改革之机，扩大了北边各省伪省长的权限，把原属中央大臣的一些权限直接转移给北边各省省长，使其可以不必向中央申请、报告，即可依据中央军事行动需要，由有关各省独立处理。

第三，为使日本人直接统治北边各省，将原由中国人充任的伪省长改由日本人接替。还以便于与当地日军联系为名，将珲春、东宁、绥阳、穆棱、密山、虎林、鸡宁、瑷珲、孙吴和林西等县的县长，也直接改由日本官吏充任。北边七省各县(旗)级行政机构，也大幅度增加了日本官吏的人数。

第四，在北边各省率先建立了所谓“军、官、民一体制”的省“防卫委员会”，由当地日军最高司令部的参谋长任委员长，统辖全省军事事务。使北边各省日军现地司令官取得对该省行政机关的“区署权”，即不经伪中央机构可自行处理的特殊权力。

第五，1939年12月1日，正式建立国境警察队，到1940年6月1日已在北边各省的25个市、县(旗)设立了国境警察队。这些警察既执行地方治安行政警察任务，又在省国家保安局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与境内外的所谓谍报与反谍等特务情报工作。

此外，还大力整顿扩充了省、县(旗)协和会本部，增设了分会机构，强制组织“协和义勇奉公队”及协和会青、少年团，开设协和青年训练所。协和会在当地驱使人民群众为“北边振兴”服务。

以军事基地建设为中心的国防设施建设中的铁路建设是重点项目之一，故取得了较大进展。一是增设了一批新线，例如霍龙门至鄂伦，南岔至伊春，佳木斯至富锦等线段。二是新滨线、滨绥线、林虎线等主线段敷设了复线。

公路修建以保证军用线路为主，主要是在原有基础上扩建和改建。由于动工较晚，结果只完成原计划的70%，即8 500公里左右，但仍然在“北边振兴计划”结束时，基本上形成了沿国境线的三条主要军用公路，即从珲春起贯穿各大小军事基地，直到漠河的第一线“军用道路”，第二线的“特殊道路”和第三线的“开拓团道路”或“移民道路”。

在航空设施建设方面，主要是为军事进攻需要，修建了一大批飞机场。在航线中，除了部分民用航线之外，几乎全是军用，仅军用机场就有420余处。在与苏联毗邻的边境各县都有军用航线，基本上形成空运和航空通讯网。伪满全境航空运输线路，1936年定期营业的有8 920公里，到1940年为12 400公里，而1942年则增加到18 575公里，其中北部航线约为8 920公里。

通讯方面，主要是完成了无线通讯和信鸽通信设备，而原计划中的地下电缆铺设工程，由于电线供应严重不足，只完成了一少部分地段的铺设。

在电力方面，只完成了较大的发电站的建设，如镜泊湖水电站到1942年6月建成并开始发电。但原计划中的中小型电站，由于资材缺乏，不得不延期。

城市建设方面，重点是牡丹江、佳木斯、鸡宁、海拉尔等城市的防水、上水和卫生防疫以及其他设施建设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取得进展。

“北边振兴计划”实施期间，在军事基地建设方面，主要是建设二线、三线的军事基地。在二线建成一大批兵营、军官家属宿舍、指挥机关房舍、军用仓库、医院、学校、邮政局、电话局等。在东线的鸡西、东安、佳木斯和北线的奇克、孙吴等地增建了10个师团司令部的军事设施。而第三线则成了以日本开拓团为主要对象的兵源动员、退伍军人就业的基地。将东宁、绥阳、穆棱、密山的开拓团定为东安地区日军司令部管辖区；将孙吴、瑷珲、呼玛、北安、佛山、乌云等县开拓团定为孙吴地区日军司令部管辖区。在上述各军事基地范围内，严禁中国居民居住。

日伪当局为推行“北边振兴计划”，在伪国务院总务厅设立了“总预算为10亿日元的”“北边振兴特别会计”。原定于1942年5月末完成，但实际上推迟到1943年。为筹集该项资金，伪满洲国政府于1939年5月发布了《北边振兴事业公债法》，将这沉重的经济负担转嫁到东北人民身上。计划实施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又增加了1亿日元的预算支出。

为解决各项建设的劳动力问题，日伪当局还制定了《国境方面建设上必要的劳动对策要纲》，由大东公司和满洲劳工协会负责在东北各省和华北一带征募劳工。曾有数十万劳工被骗或被抓到东北边境各地修建铁路、公路、机场和其他设施。由于劳务繁重、营养不良、条件恶劣、疫病横生、没有医疗措施，因此累、病、饿、冻致死或因逃跑、反抗而被毒打致死的不计其数。更有甚者，一些秘密军事工事建成后，日军为防止泄露军事机密，竟对劳工实行集体秘密屠杀。

总之，“北边振兴计划”的实施是建筑在对中国人民严酷统治、掠夺、奴役和屠杀的基础上的。而其目的则在进一步强化对边境地区法西斯统治的同时，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来完成对苏攻势作战准备的体制。

另外，组织日本移民开拓，不仅是“北边振兴计划”的内容之一，也是日本政府早在1937年7月上旬就提出的（向中国东北地区）“二十年百万户移出计划”的组成部分。“北边振兴计划”的起止期限恰好是日本二十年百万户“满洲开拓移民”活动第一期计划的后三年。

1937年8月，关东军将“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改组扩大为“满洲拓殖公社”，作为日本移民事务的政府代行机关，同时成立“满洲拓殖委员会”作为移民的领导机关。并根据“二十年百万户”的总目标，确定了第一期（1937～1941年）的十万户移民计划实施大纲和实施要领。实施要领中规定移民分为政府奖励的农业集团移民和自由移民。以集团移民为移民村的核心，一个移民村中至少应有200～300户集团移民，自由移民可在集团移民附近，形成一个移民村。每个集团移民村，一般分为10个左右的移民“部落”，每个“部落”可由20～30户组成。

第一期五年移民开拓计划表

单位:户

年 度	农业集团移民	自由移民	合 计	年 度	农业集团移民	自由移民	合 计
1937	5 000	1 000	6 000	1940	20 000	8 000	28 000
1938	10 000	5 000	15 000	1941	20 000	10 000	30 000
1939	15 000	6 000	21 000	合 计	70 000	30 000	100 000

从1937年起,日本募集集团移民开始采取在原籍地“分村分乡”方式,即把日本的一个村、乡作为“母村”,从中分出部分农户,组成一个开拓团,到中国东北建立一个“分村”或“子村”。在贯彻移民开拓计划中,日本还在国内大力推行“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形式。被募集的日本青少年首先要在国内接受三个月训练,其科目有“皇国精神、军事训练、满洲殖民问题、满洲事情、满洲农业要点、农产品加工、建筑、修路”等。重点在于向他们灌输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思想,把他们培养成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训练期间队员按军队编制,编成大、中、小队,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结业后还要分别在中国东北的各训练所接受一年以上的集中训练。据1941年5月统计,东北各地共设有这类训练所93个,分为大、小两种。1938年时嫩江、孙吴、铁力、勃利、宁安五地为大训练所。队员首先要在小训练所训练受训一年,而后再到大训练所受训2年。到1945年止,由日本来东北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共约9万人左右,约占移民总数30万人的30%。战争结束时尚在训练所者约2万人左右。由这些训练生组成的开拓团共5批,计279个团。

上述“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除具有一般移民作用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具有作为关东军后备兵员的军事作用。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东北后,他们全部被抽调加入战斗部队,成为战争的炮灰和牺牲品。

日伪当局的移民开拓政策,给东北人民造成了极为深重的灾难,使数以万计的中国农户被剥夺土地,失去生计,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按当年“二十年百万移民计划”规定,伪满当局应为日本移民准备耕地2 650万公顷,占当时东北即耕地总面积的80%以上。如上述计划完全得逞,那么东北大部分耕地将被日本所掠夺。据黑龙江省巴彦县资料记载,日本开拓团移民共占地28 400垧,为全县耕地的14%,而其农户仅占全县农户的1.5%,每个日本“开拓民”占地为中国人拥有土地平均数的20余倍。

日伪当局为了给日本移民准备大量土地,采取了种种掠夺的办法。一是没收“国有地”、“公有地”及所谓“逆产地”;二是强行超低价进行“收买”;三是利用驱逐和屠杀中国人制造无人区的办法,夺取中国农民的土地。

自1943年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屡遭惨败,前线形势日益恶化吃紧后,日本的开拓移民募集活动也愈来愈困难。日伪当局于1943年不得不将原计划移民256 000户的数字削减为119 680户,但即使如此,也仍未能完成。当年一般开拓团实际移入只有2 895户,加上“义勇队开拓团”的9 049户,总共不过11 944户,实际移民数不到原计划的10%。以后逐年减少,1945年“一般开拓团”仅移入1 000余户。太平洋战争期间随着关东军不断被调走,移民团员中的青壮年男子均被征召入伍。到日本投降前,许多开拓团部落只剩不到10名的老弱病残男子,带着百八十名妇女、儿童在苦苦支撑残局。日本的移民开拓侵略政策,也伴随战争的失败而最终破产。

第五编
日本开拓团与要塞慰安妇

第一章　日本开拓团

第一节　移民政策

日本开拓团是日本侵略中国，以移民政策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在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是从伪满洲国成立后开始的。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也为其全面向东北移民创造了条件。1932年9月13日，关东军特务部制定了“关于满洲移民要纲案”。这一方案首先强调了武装移民的四个军事、政治方面的目的。该方案指示：“日本人移民是在满洲国内扶植日本的现实势力，以期达到日满两国国防的充实、满洲国治安的维持以及在日本民族指导下取得远东文化的发展”。所谓在“满洲国内扶植日本的现实势力”，即在伪满洲国内，以日本人为中心，加强日本的统治力量；所谓“日满两国国防的充实”，即将日本移民移往东北北部地区，作为对苏战备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满洲国治安的维持”，即协助关东军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日运动；所谓“在日本民族指导下取得远东文化的发展”，即“满洲移民”是日本在伪满洲国建立日本秩序和日本文化的领导力量。

1937年7月上旬，关东军制定“二十年百万户移出计划”的“满洲现地案”，日本政府遂以此案为基础制成日本政府方案，并于7月23日递交海外拓殖委员会进行咨询，原案通过，至此，“二十年百万户移出计划”正式确定为日本政府的方案。8月25日，广田弘毅内阁阁议决定二十年百万户大规模的移民计划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的重要国策。伪满傀儡政府也将日本移民政策定为它的三大国策之一。

1937年6月设立了伪满洲国拓殖会社。各地设拓殖分社。1939年又设立了伪满洲国建设勤劳奉仕队和开拓青年义勇队。为强化推行移民政策，日伪还成立了各级组织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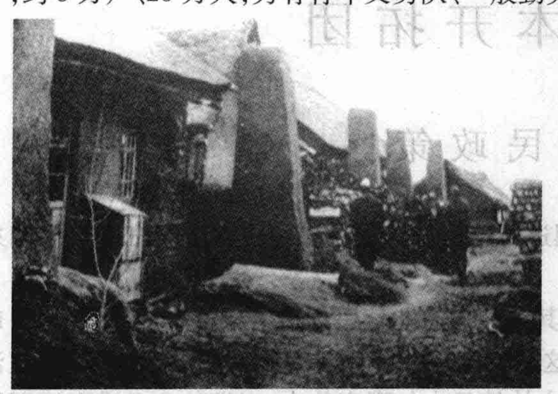
日本开拓团的组织形式有下列几种：集团开拓民，是从日本农村协同体中分出来的一部分，由200～300户为集团；集合开拓民，是集合部落形成，为30～100户；分散开拓民，属于开拓民自由移住型，为30户以下。

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目的，首先是镇压东北人民巩固其殖民统治；其次是加强经济掠夺，通过农业移民，掠夺他们“所缺乏的物质”和发动战争“所需要的资源”，特别是对粮食的掠夺尤为重要；第三是进攻苏联的需要。在制定移民方案中，在目的一项中，都写有“对苏国防”的内容，其反苏目的显而易见。因此，日本移民主要都安置在东北北部，以便在进攻苏联时，可以作为反苏的桥头堡和军需

品的供应地；第四是日本企图通过向东北移民，缓和国内阶级矛盾。

在大规模移民期间，为了保证移民计划的实施，日本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移民的法律。1939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纲”，这可以说是日本关于向中国东北移民政策的“最高宪典”，是日本进行移民侵略总的行动纲领。其后又根据“基本要纲”的要求，分别于1940年5月、6月和1941年11月公布了“开拓团法”、“开拓协同组合法”、“开拓农场法”。即所谓开拓三法，对移民组织的性质、组成、管理、财务、土地等都在法律上明确规定。进而推进了二十年数十万户移民计划的实施。“基本要纲”中规定日本开拓团要融和原住民，向一般行政机构过渡，建立包括原住民村庄在内的混成村，由日本开拓团团长当村长，经济管理上变成开拓协同组合等内容。至1940年，已有25个开拓团改成了伪满洲国新的基层行政村。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统治已直接深入到中国东北广大农村，日本变东北为其国土一部分的目标正在实现中。

1937年，开始分批向中国东北大量移入日本平民。至1941年8月，移入中国东北的日本开拓团总数已有435个、46 300户、107 089人。至1944年末，移入中国东北的日本一般开拓团数已达850个，约8万户、20万人，另有青年义勇队、一般勤劳奉仕队13万人。



开拓团移民民舍



开拓团移民妇女在做饭



开拓团移民在打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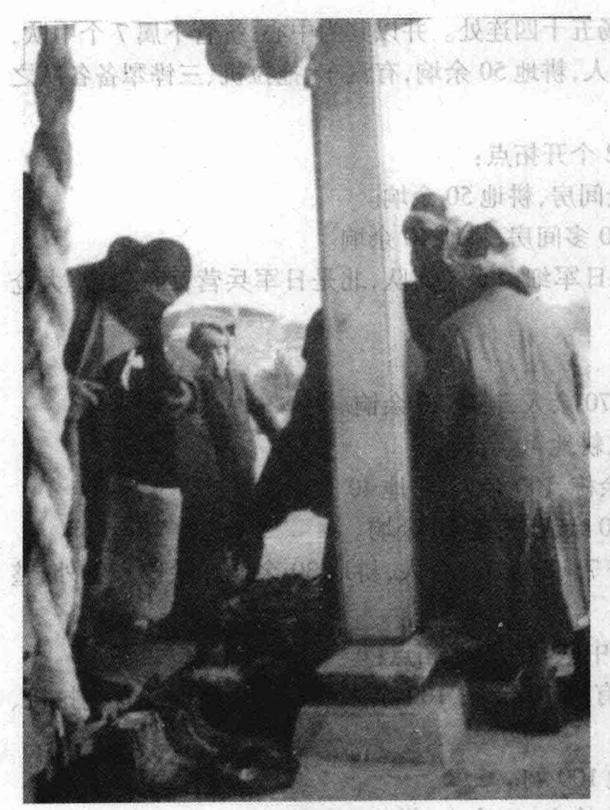
开拓团移民在铲地



开拓团移民在劳动



开拓团移民在用拖拉机耕地



开拓团移民在参拜神社



开拓团移民在参拜神社



第二节　要塞区日本开拓团

在东北部分要塞地区的日本开拓团情况如下：

一、虎林开拓团

虎林县有两个开拓团，一个是1937年6月以古谷正雄为团长的黑嘴子开拓团，共297户，属于第六次移民。另一个是1938年12月以梅川胜卫为团长的清和开拓团，共60户，是第七次移民。两个开拓团共计1 000余人，占地4 000多垧，同时每户配有一支枪。

1941年5月，清和开拓团成员和邻近的和气村中国农民因土地和伐木之事，发生激烈冲突。5月10日，双方的冲突升级，开拓团成员向中国农民开枪射击，当场打死3人，打伤10余人，其中重伤5人。后在县警察局派出的武装警察镇压后事情才算平息。这次流血事件发生后，时任虎林县长的日本人大濑户权次郎完全站在日本开拓民这一边，威胁中国农民让步，向日本开拓民赔礼表示和解。5月25日，大濑户权次郎将双方都找到县里，在县公署举行和解仪式。然后，由县公署付给每名死者200元，受伤者只给少量的医疗费而了结。

二、孙吴开拓团

（一）基本情况

孙吴是“开拓第一线地带”的重点地区，屯有重兵，筑有坚固的纵深军事设施。1940～1942年，从日本琉球群岛将15～19岁的日本青年移送到孙吴。这些移民中的一部分，是日本的农民和普通劳动者。他们是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威逼利诱下，背井离乡，同样是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受害者。这些移民，特别是义勇队开拓团是根据所谓“国防第一线的人殖方针”，移至日军驻地附近和铁路、公路主要交通干线附近。

日本在孙吴的移民，组成一个本部，设在现农场五十四连处。并以其为中心，统管下属7个中队，共有移民1 000余人。本部有房子10余栋，200余人，耕地50余垧，有汽车、拖拉机、三铧犁备各队之用。具体分布是：

1. 在西兴乡范围内，西兴村设一个中队，下分2个开拓点：

第一个点在西兴屯，有移民200人左右，120余间房，耕地50余垧。

第二个点在西兴村东侧，有移民100人左右，80多间房，耕地40余垧。

这两个点沿原北黑铁路的南侧驻守，毗邻南是日军细菌673支队，北是日军兵营，西是日军大仓库（十八仓库）。

2. 在腰屯乡范围内设有5个中队：

第一中队位于腰屯东侧，桥东道旁，有房7栋，70余人，耕地20余饷。

第二中队位于今良种场处，有房7栋，60余人，耕地40余垧。

第三中队位于腰屯河南现种畜场处，有房10余栋，100余人，耕地40余垧。

第四中队位于新村西沟里上顶子，有房6栋，70余人，耕地20余垧。

第五中队位于吴家堡东北原星火畜牧场，有房7～8栋，60余人，耕地30余垧。除曾家堡外，整个腰屯乡均被开拓团包围。

3. 在沿江乡范围内，顺沿江军用公路设有一个中队和4个开拓点：

第一个点在农场四十六连，是原移民中队部，有房10余栋，100余人，耕地50余垧。有拖拉机、汽车等大型农具供多点使用。

第二个点在小河西屯，有房8栋，60余人，耕地100垧。

第三个点在小桦树林子，与当地农民混居40余栋房，50余人，耕地200垧。

第四个点在大桦树林子，与当地20余户农民混居，40余人，耕地40余垧。

以上开拓团的队、点，除在军事上隔离中国抗日联军和人民的联系以及战时作后备兵员外，主要是种植"狗宝"、白根萝卜、马铃薯等，供应日军驻孙吴的部队。

（二）日本开拓团给孙吴人民带来的灾难

日本开拓民既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政策的受害者，同时又给孙吴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

1. 掠夺土地

日本开拓民在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政府的庇护支持下，借口所谓"危险地区"和维持治安的需要，硬从中国农民手中掠夺上好的可耕地。据不完全调查，日本开拓团共从孙吴县农民手中掠夺上好耕地1 000余垧。当时兴北乡100余户菜农的200余垧好地几乎全部被抢占。开拓团看中哪块地好就要哪块地，大桦树林子被抢去300余垧土地，仅臧来庆家就被抢去120垧地。小桦树林子全屯共有耕地300余垧也几乎全部被抢占。除小河西屯的四角农户土地幸免外，所有200余垧地全被占去。开拓团将抢占的耕地并不全部耕种，有的耕地宁可荒废。大桦树林子屯被抢占300多垧地，只挑最好的地种30多垧，其余的全被荒废。

2. 抢占民房

日本开拓团在孙吴还强占民房，逼得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开拓团在孙吴霸占民房210间，赶走农民约90户，使310人无家可归。西兴村和铁道北被赶走20余户农民，其中10余户自己有车有马的搬迁到西南屯和西地营子重建家园，没有车马的，有的弃农投工出卖劳力，有的投靠无门流浪街头。前、后协振屯的建屯历史是孙吴人民遭难的见证。1942年春，伪政府下令小河西的住户，限期三个月搬出，还没到期就将屯中心的20余户农民强行赶走并抢占房屋。没车马的各奔他乡，自谋生路。有车马的5户，40多口人，含泪弃舍搬迁到荒无人烟的腰屯乡北山南坡，就地砍杆，打些羊草，撮起"撮罗子"，挖"地窨子"，几家挤在一起，从此这里叫协振后屯。小桦树林子屯原有30户人家，开拓团先借房住，后强行没收，全屯被赶走的26户搬迁到腰屯乡北山重建家园，由此

叫协振前屯。

3. 打骂欺压

日本开拓团对中国人经常打骂欺压。小桦树林子吴小奎是侥幸没被赶走的四户之一,经常受日本开拓民的欺辱,不敢出门,吴小奎的孩子因掐了开拓团的一根葱叶,吴小奎就挨了三个日本开拓民的毒打。傅锁山家的小猪跑到开拓团的园子里,傅锁山被日本开拓团打倒在地,全家人敢怒不敢言,还得笑脸赔不是。

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节节失败,兵源日渐不足,1944 年后,日本开拓团从各中队抽调大批青壮年人伍充军。到 1945 年初,各中队的开拓民所剩无几,抢占的土地也成了一片荒原。

三、珲春开拓团

移居珲春的有 8 个开拓团和 1 个开拓义勇队,共计 3 004 人,占土地 14 000 垧。其中熟地约 8 000余垧。他们在杨泡、马川子、板石、敬信四乡,划地区、建村落、变地名,直至日军投降为止。珲春开拓民在日军投降后,除战死及病故者外,多数已于 50 年代回国。截至 1984 年止,在珲春有日侨 39 名,入中国籍 2 名。

(一)高鹫开拓团

该团成员是由日本岐阜县郡上郡高鹫村来珲春,故得名高鹫开拓团。1940 年 4 月 10 日移入珲春县纯义村图鲁屯(现板石乡图鲁村)。分为 6 个开拓点名曰部落,即图鲁村 4 个、春景 2 个,总户数 112 户,总人口 646 人。其中从事农业的 160 人,从事工业的 15 人,从事商业的 10 人,有关办事人员 12 人,其他 8 人,余为家属。

该团属集团开拓团,其组织和经营都比较完备,设有农业、畜牧、建筑、经理、购买、贩卖、校务、医务等机构。团长为麦岛逸三,副团长为上个岛米糙、野久尻庄七,畜牧指导员为樱井伸太郎,经理为村正夫,学校校长为杉木辉次,医疗保健为中屋喜一。该团共占地 2 200 垧,其中水田 600 垧、旱田 600 垧、育林地 1 000 垧。在 1 200 垧耕地中(1945 年统计),属于开拓团耕种的(类似集体)430 垧,种有水稻 170 垧、大豆 55 垧、燕麦 49 垧、稗子 20 垧、土豆 39 垧、蔬菜 47 垧、线麻 8 垧、其他 42 垧;属于开拓团个人耕种的 430 垧,其余 340 垧出租。开拓团占用的土地房屋一部分是以廉价的方式强迫购得的,一部分是以军用地的名义征用的。由于开拓民大多是失业的工商业者,因此耕种无方,土地荒芜,水田稗子茂盛而收成不好。而土地、房屋、家园都失去的珲春人民,有的迁去他乡,有的租种开拓团土地成了佃户,有的当了开拓团的长工。开拓团中的住宅多改修利用原住户的房屋,开拓团本部住在纯义村太阳屯原春景警察队的驻地。还新建了校舍、教员住宅、保健诊疗所、警备室、仓库以及民宅等房屋。该团在训练上采取以日军在乡军人为主进行各种国防军事、警备的训练。如在要道上设岗哨,搜集苏军、抗日游击队情报;建立开拓团"部落常会",在会上作形势及时局变化报告;每年在四炮台旧址举行集会,庆贺日本国家繁荣、五谷丰登等。学校教育分青年科(男生 25 名)、高等科(男生 15 名、女生 10 名)、初等科(男女生各 30 名)。学校校长村井芳郎(第一任)、杉木辉次(第二任),教员有山口河江、南武、时国剑一、村井汁子、内田稔、杉木美智子、长尾节子等人。

1945 年 8 月 9 日按伪间岛省珲春县长安田正治的通知,高鹫开拓团集中到珲春镇明德学校(今第四小学),8 月 10 日从珲春出发经图们市到延吉市北山小学。9 月 19 日被苏军迁回到珲春难民收容所(原珲春警察宿舍,现一中果园一带),同年 12 月在英安煤矿成立"日本人会"(所有日本人难民均集中在该会),1951 年 8 月 13 日接到回日本通知,于 9 月 1 日出发经长春、锦州、葫芦岛于 10 月 10 日返回日本。据《满洲开拓史》记载:该团员里死亡的 170 人、残留的 39 人、失踪的 89 人、归还的 353 人。残留的 39 人和被珲春各族人民收养的日本孤儿以及与汉、满族结婚的妇女有的回国,也有的仍留在珲春。当时留在珲春的日本人,随着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从 1973 年以来,相继回国探亲。日本开拓民由于来中国时家园已处理,回日本后已无家可归,只好投亲靠友;更有一些开拓民亲人已死在中国,有的开拓民家庭妻离子散。他们回日本后参加了"开拓民自兴会",回到北海道成立了"珲春会"。

（二）朝日开拓团

因来自日本岐阜县益田郡朝日村而得名。1940 年 4 月 20 日，以铃木亨为团长、田中英一为副团长，将日本岐阜县朝日村的小坂町、久久野町、宫村、荻原町等地居住的 138 户，663 人移入珲春县纯义村的柳亭和新农，把柳亭和新农分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部落。在移住地还新建了学校、医院、事务室等。他们用征用或“买”的方式占用良田约 2 000 垧。据日本有关资料，该团约 300 余人死于战争，约 50 名妇幼儿留在中国，其余均回国。

（三）和良开拓团

1939 年由日本岐阜县郡上郡和良村长等官员，组成和良村开拓民先遣队来珲春视察后组成的。1941 年以川尻弥三助为团长，青年学校的青年学生为先遣开拓民，进入珲春杨木林子，团部设在杨木林子。住 50 多户开拓民，占有杨木林子、泡子沿、东阿拉、松林等地的良田约 1 700 垧。1945 年 8 月全团有 304 人，回国 156 人，死亡 121 人，失踪 23 人，留在珲春的 4 人。

（四）青森开拓团

该团分三次移入珲春市马川子村五家子屯。第一次是 1940 年，名为饭诘开拓团；第二次是 1941 年，第三次是 1943 年。团长是中古弥八郎。以开拓民来自青森县北津轻郡，故名青森开拓团，又以第一次移来珲春的是以饭诘为首的开拓民，又名饭诘开拓团。该团占熟地约 1 000 余垧，其他与高鹫开拓团相同。1945 年 8 月 9 日，开拓团全体成年男子和当地驻军一起参战，集合在马鞍山建筑工事，有 4 人被苏军击毙，全团有 731 人，其中应征 76 人，死亡 245 人，其余均回国。

（五）津轻开拓团

属分散的小开拓团。其成员来自歌山县北村及三重县的一小部分，团长由青森开拓团长兼任。津轻开拓团移入地点是马川子东炮台，占熟地约 300 垧。1945 年 8 月共有团员 47 人，其中应征 1 人。

（六）甲贺开拓团

该团因来自日本滋贺县甲贺乡村而得名。1944 年 3 月移入珲春县长岭屯（现板石乡太阳村），团长是竹村贤太郎。该团占熟地约 200 余垧，全团有 99 人，其中应征 13 人，回日本 70 人，死亡 8 人，未回国 8 人。

（七）滋贺报国农场

该农场于 1944 年 3 月由日本滋贺县移入马川子依力哈达，主要任务是掠夺粮食、饲草，故名曰“报国”。团长中西利弘。该团占熟地 300 余垧，全团有 93 人，其中应征 10 人，死亡 12 人，回国 79 人，未回国 2 人。

（八）小波义勇队开拓团

该团于 1941 年 6 月由滋贺县、长野县、爱知县、大阪府等处募集的 18～21 岁的青年组成。开始时为义勇队，1944 年 6 月 1 日建立开拓团。该团地点在崇礼村（马川子乡），主要在河南（4 队）一带，约占熟地 300 余垧。该团边种地，边进行军事训练，团员均穿军服，团长由军官竹村国之郎担任。全团有 189 人，其中应征 88 人，死亡 1 人，未回国 4 人，失踪 96 人。

（九）黑顶子开拓民训练所

该所属青少年义勇队性质，分大训练所、甲种训练所、乙种训练所、特别训练所四种。分布在勃利县、依兰县大林、饶河县大和村、宝清县龙头、头道、东宁大乌蛇、宁安南山市、镜泊学园、珲春县黑顶子等地。预计训练 12 900 人，到 1941 年就有 5 163 人。黑顶子为乙种小训练所，预计训练 300 人，到 1941 年有 60 人，1945 年日本投降前夕已达 232 人。建设班长为藤原力置。所训练青年 1944～1945 年初都陆续参军。

四、额尔古纳开拓团

设在伪兴安北省额尔古纳左翼旗上库力地区的义勇队开拓团，是 1937 年由日本关东军少佐岗部带领 310 名 16～20 岁的日本青少年全副武装移住的。最初几年主要搞军事训练，当时称兴安北省第

四训练所。后来改称开拓团,但仍然是全副武装的军人集团。这个开拓团共建点3处(依根、西库力、东西乡),最后达到500多人,繁重的劳动和放养牲畜都雇用俄侨和中国人。农忙时还雇用临时工人。耕种土地2 000多亩,饲养牛、马千余头匹。配备有铁犁、打草机、载重汽车等机械。8年间,开拓团换了5任团长,都是日本现役军官。第一任开拓团长岗部曾向关东军本部报告称:"依根这个地方可蓄养很多兵员,一旦战争需要,他们所训练的这批开拓团员便是战争中具有军人素质之士兵"。由此将义勇队开拓团的宗旨和性质表白得淋漓尽致了。

五、牙克石开拓团

设在牙克石、免渡河一带的日本开拓团共有5个农场,即满铁农场(在牙林线55公里处)、满拓农场(现大雁车站附近)、劝农模范场(在免渡河原先进生产大队农业点处)、20里农场(在免渡河原团结生产大队牧业点处)、日本昭和鞍山制钢所农场(在免渡河2号农业点处)。共耕种土地约1万亩左右,主要种植小麦、燕麦,使用机械耕作。主要劳动力靠雇用的中国人和俄国侨民。如满铁农场雇用20多名中国人和4名俄侨,满拓农场雇用10余名中国人和1名俄侨,场内的日本人只有7名,多从事管理。收获的产品小麦在牙克石加工成面粉供日本人食用,燕麦则供应日军军马或运到山场套子房(林区集运木材点)作牲畜饲料。

第三节　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

为了贯彻"百万户移民计划"大规模移民的需要,日本又在国内大力推行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这种移民形式。这是由于日本发动扩大侵华战争的"七七事变"后,大批日本青壮年农民应征入伍,农村劳动力日益紧张,移民的来源不足,因而采取这一新的措施。1937年11月30日,第一次近卫内阁阁议决定,由青少年代替壮年移民,从此,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制度正式建立。

一、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政策的确定

1934年9月,东宫铁男和加藤完治等人组织了14人的"忧国前卫军青少年突击队",在饶河县建立了名为"大和村北进寮"的日本移民村,至1937年,人数达到84名。1937年7月中旬,关东军、满洲拓殖公社等召开会议,确定了"青年农民训练所创设要纲",并在嫩江县到伊拉哈建立第一训练所(嫩江训练所),9月上旬至12月中旬,从长野、山形、宫城、新潟、崎玉等地募集了319名日本青年作为先遣班分三批进入第一训练所,所长由日本第一次移民团团长山崎芳雄担任。1937年8月建立了城子河、哈达河少年队。至1938年1月,各地少年队共有队员400余人。

1937年11月3日,日本农村更生协会理事长石黑忠笃、满洲移住协会理事长大藏公望、理事桥本传左卫门、那须浩、加藤完治、日本联合青年团理事长香椒昌康等6人联名向日本近卫内阁提出"关于编成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建议书",日本拓务省根据石黑等人的建议,制定了"关于向满洲送出青年移民之件",11月30日提交近卫内阁,当日即被通过。

12月22日,在拓务大臣的官邸召集拓务省、陆军省、关东军、拓殖委员会、满洲拓殖公社等代表开会,确定"满洲青年移民实施要纲",接着于1938年1月,决定了"满洲开拓青年义勇军募集要纲",2月即开始募集,在内原训练所开始训练。

"满蒙青少年开拓义勇军募集要纲"公布后,日本政府开动各种宣传机器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日本的各种报纸、杂志大肆宣传义勇军的"国策意义",鼓吹去满洲建设"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甚至悬赏征集歌颂"义勇军"的歌曲,在电台广播,大造舆论。日本青年(募集对象为16~19岁)被日本政府的宣传所欺骗,同时为农村的贫苦生活所迫,纷纷报名参加。首次报名应召的人数为9 950人,约为第一次募集指标5 000人的一倍,最后录取了7 700人,至5月末,录取人数达14 863人。

被募集的青少年首先要在茨城县内原训练所接受训练,训练的重点在思想教育方面,即向青少年

灌输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思想，把他们培养成日本对外侵略的工具。队员按军队编制，组成大、中、小队，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

队员在内原训练三个月后即被送往中国东北，进入设在东北的训练所。设在东北的训练所分为大小两种，队员首先要在大训练所训练一年，1938 年有嫩江、孙吴、铁力、勃利、宁安 5 个大训练所。一年后，队员转入小训练所训练两年，主要进行军事、农业及其他技能训练。据 1941 年 5 月统计，在中国东北的训练所共有 93 所。至 1945 年 8 月，由日本内原训练所来到中国东北的训练人数为 86 530人（另有资料记载为91 930人，战争结束时尚在训练所者仍有 22 000 人），约占日本移民总数 30 万人的 30%。由训练生组成的开拓团共 5 批，计 279 个团。

来到中国东北的日本青少年，对东北的气候、水土都不适应，特别是严格的军事训练生活，更使他们难以忍受。在训练所内部，队员动辄要受到训斥、体罚和殴打。这种法西斯式的训练，使许多队员思想动摇，思念家乡和亲人，到处充满着失望和不满情绪。“屯垦病”在东北各训练所到处蔓延，自杀、逃跑事件屡有发生。据 1939 年 8 月伊拉哈训练所建所两年来的统计，训练所内发生火灾 21 件，枪击 12 件，危险行为 12 件，自杀和自杀未遂 6 件，擅自离所 177 人（有 50 名逃跑），开除 137 人。1939 年 5 月，昌图特别训练所甚至发展到武力火拼事件。他们放火烧毁营房，用步枪互相射杀，双方死伤 7 人，被审问的有 222 人，收监 123 人。



黑河省大额训练所

日军为稳定人心，平息他们的不满情绪，经常到各训练所组织电影等文体活动，并经常派去由日本教师和女学生组成的慰问团。自 1939 年起又开始实行所谓“寮母”制度，即将 25 ~ 50 岁的独身女性插到各训练所，负责照料队员的生活。1940 年又开始实行“大陆新娘”的措施，即将日本青年女子经过女子拓务训练所训练后，集体嫁给义勇军开拓团团员，组成家庭。所有这些措施并未起到多大作用，义勇军队员的应募者急剧减少，致使日本拓务省不得不多次缩减募集计划。

二、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募集和训练

1938 年 1 月初，拓务省同有关官厅及诸团体进行最后商讨，制定了《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募集要纲》。根据这一《要纲》，开始了募集工作。《要纲》规定，募集对象为 16 岁至 19 岁的青少年，其学历大致分为普通高等小学毕业或青年学生中途退学者，年龄以十五六岁者居多。1941 年，伴随着以乡土为单位组成的乡土中队的增加，年龄层次更为降低，平均仅为十四五岁。

《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募集要纲》制定后，各县立即召开会议，开始募集活动。1938 年 1 月 20 日，长野县向市长、村长、学校校长、町村在乡军人分会长、市町村青年团长、市町村女子青年团长、市町村农会长、市町村产业组合长、经济派出所长等发出学务部长“关于募集满蒙少年开拓义勇军之件”的通牒，传达了《募集要纲》，并希望推荐适当人选。同时，又向在乡军人会郡联合分会长、郡农会长、产业组合长等发出了学务部长的“关于召开组成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协议会”的通告。1 月 25 ~29 日，县内十处召开了协议会，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并形成了募集的组织网络。

日本各地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动员宣传工作。岩手县和长野县还分配给学校一定的名额。因而教师必须在每天晚上步行到各部落，进行义勇军应募的说服工作。这些参加义勇军的青少年，到中国

东北后，曾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受骗了！是谁？是学校的老师?!"、"畜生！我真糊涂！"

经过各种宣传动员，在全国各地开始募集工作。1938 年内，计划向中国东北输送 3 万人。从 1 月中旬开始募集先遣队，1 月下旬陆续进入内原训练所，至 3 月上旬，已入所约 6 500 名，到 2 月末截止的第一期生应募总数达 9 950 名，录取了 7 700 余名。因房舍等条件的限制，对一部分被录取者，不得不延期入所。

凡是参加青少年义勇军的青少年，首先要接受三个月的内地（日本）训练，随后即派往中国东北，进入大小训练所，进行现地训练。

内地训练所设于日本国茨城县东茨城郡下中妻村内原。此处原为日本国民高等学校内原农场，1938 年 3 月正式改称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内原训练所。所长为日本国民高等学校校长加藤完治，训练组织按军事组织编制，即所长下设本部，本部下设总务部、训练部、警备司令部 3 部以及训练生的第 1 至第 5 大队。大队的最基层为班，每班由训练生 20 人组成，3 个班 60 名编成 1 小队，5 个小队 300 名编成 1 中队，6 个中队 1 800 名编成 1 大队。内原训练所共组成 5 个大队，约有 1 万名训练生。

内原训练所把集体训练放在首位，从起床到就寝，皆按军事训练方式进行。并在警备司令部的指导下，持枪站岗放哨，进行自警训练。教育和训练的内容，分学科、术科和实习 3 科。这一期间的教育和训练，主要是向青少年灌输"皇国精神"，即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思想，培养"武士道"精神。

在经过内原训练所两三个月的训练以后，即开往中国东北，进行为期三年的所谓现地训练。现地训练，原则上分为一年的基本训练和两年的实务训练。训练所也分为基本训练所和实务训练所。所谓基本训练，首先是思想训练，确立其作为开拓民的信念以及适应气候、水土、衣食住和培养纪律性、提高战斗力。实务训练所除进行基本训练外，还要进行作为一开拓民的更为实际的训练，如营农法、林业大要、土壤肥料和家畜的饲育、管理等。

三、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军事意义

日军企图将这些青少年作为后备兵源，将训练所作为兵站基地，成为镇压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和向苏联进攻的据点，因此，它的军事目的十分明显。

首先表现在大、小训练所的配置上，东自东宁起，经勃利、铁力、对店、孙吴，西至嫩江，恰好沿中国东北边境形成一条"弓"形线，即沿伪满洲国东北部边境建立战略据点，以准备对苏作战。同时这一地带也是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活跃地区，因此，训练所兼有镇压东北人民抗日运动的作用。

其次，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是关东军的后备兵源。这些青少年入所后，完全按军队编制，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由驻防部队将校任教官，按陆军步兵操典，从实战出发，进行警备、战斗、防空、防谍等战术训练。此外，还根据个人特长，分兵种进行特技训练，如汽车、通讯、气象、鞍工、锻工、蹄工、测量、照相等 20 余种特技训练。这些青少年经过 3 年的训练，有的达到应征入伍的年龄而加入正规军，有的建立开拓团，成为屯田兵，一面从事军事训练，一面从事生产，可随时应征入伍。义勇队可以说是当时关东军的后备军。



少年开拓义勇队小队员在站岗

第三，从训练所的设施来看，也是按军用设置的，训练所设有各种仓库，如弹药库、车库、食品库、被服库等，同时设有各种加工厂，这些设施可随时转为军用。

第四，训练所的组织领导直接隶属关东军。关东军在义勇军制度创设之初，就把它视为自己的囊

中物，从1939年开始，大小训练所的所长皆改由陆海军预备役军人担任，例如大训练所之一的勃利训练所所长原为开拓元老千振开拓团团长宗光彦，1939年改由预备役海军少将松本忠左担任。宁安训练所由城子河开拓团长左藤修改由陆军少将栗田小三郎担任，哈尔滨训练所也由饭岛连次郎改为富永良男、井上觉治，大石头训练所由川原侃各陆军少将担任。其他大部训练所也依关东军的命令，改由军人担任。1941年夏，关东军特别演习之际，宁安训练所训练生戴上二等兵的肩章，搬运弹药等。当时关东军曾指令说："一有命令，义勇队就立即与关东军一起行动，进入苏联沿海州，担任后方任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驻密山的803部队中的井上中尉小队（30人）进驻密山训练所，全员分散在训练生队伍中，共同起居食宿，训练生的日常生活完全军事化，皆在关东军的指挥下进行冬季军训，如对坦克的攻击、爆破作业、渡河作战等。

综上所述，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在胎动中就受关东军所控制，义勇军是关东军的后备兵源，训练所是关东军的兵站基地。


第一次"入植"孙吴的义勇队队员

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是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一项重要措施，如果没有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及其以后转变的义勇军开拓团，在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本的伪满洲移民政策早就破产了。青少年义勇军队员不仅仅是一般移民的后备力量，更重要的是关东军的后备兵源。到战争末期，大部分队员应征入伍，担负起守卫军火仓库、军事工厂和铁路的任务，直接镇压中国东北人民。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关东军参谋本部命令义勇队训练生全部加入战斗部队，参加对苏军作战。

第二章　要塞慰安妇

第一节　从军慰安妇制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迫使占领地区妇女充当日军的性奴隶，建立起一整套的慰安妇制度。在此制度下，数十万亚洲各国妇女惨遭日军蹂躏。中国是在二次大战中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长期占领和蹂躏最严重的国家，日军所设的慰安所绝大多数在中国内地，中国妇女遭受的痛苦尤为深重。据研究者初步统计，约有20余万中国妇女先后沦为慰安妇，她们被剥夺了精神上、肉体上的自由，整日遭受日军的性暴力、性虐待。

1932年3月6日，冈村宁次作为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到达上海。这时在沪日军已达到3万人，由于日军士兵的野蛮残暴和军纪松弛，在上海战地发生了多起强奸妇女事件，这些暴行引起了中国和各国舆论的严厉谴责。为了防止发生更大规模的强奸事件，防止性病蔓延而影响日军的战斗力，冈村宁次决定设立一些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的场所。这一计划得到了白川义则司令官的肯定，冈村宁次便指令高级参谋冈部直三郎具体经办。

1932年7月15日，冈村宁次调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于1944年11月升任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战争结束后，他在1949年2月由中国返回日本的轮船上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是无耻至极的慰安妇制度的缺席的始作俑者，昭和七年（1932）上海事变时，发生了两三起官兵强奸驻地妇女的事件，作为

派遣军副参谋长的我，在经过调查后，我只有仿效海军早已实行的征召妓女慰军的做法，向长崎县知事申请招来华进行性服务的慰安妇团。事实证明，当从本土征募而来的慰安妇团到达时起，便不再发生强奸的事情。”

冈村宁次所特别组织的慰安妇团，比海军就地利用现有妓女作军妓要进了一步，它是日军慰安妇制度发展中的第二阶段。它是由日军上层和日本地方政府共同策划下完成的，因为慰安妇的征集得到了长崎县知事和警察的协助，而这两个系统是由日本内务省管辖的，也就是说没有内务省的支持，这个慰安妇团是不可能到上海来的。这个特别组织的慰安妇团来到前线唯一目的就是为日军提供性服务，这个慰安妇团的成员显然已是一种军队慰安妇，冈村宁次创造的这一形式不能不说是一种创举——是法西斯战争机器侮辱人性的一种创举。当然，这比起后来日军大规模地推广慰安妇而言，还只是一个开端。


軍慰安所従業婦等募集ニ関スル件
兵務課

1938 年 4 月日本陆军省征召慰安妇设立慰安所命令书

日军全面实施慰安妇制度是在 1938 年。特别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后，日军奸杀妇女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全世界的谴责。于是，在 1938 年 4 月，陆军省兵务司在给华北、华中方面军参谋长的《关于招募慰安妇的文件》中，命令各部设立慰安所，要求：“在招募（慰安妇）时，由派遣军领导，选用适当的人选，处理好与各方面的关系。应与当地的宪兵、警察合作，保持军队的威信，不要造成各种不良的社会影响。”各方面军和关东军在陆军省的指示下，各部队每到一地，首要任务便是征集妇女，辟室觅屋，快速建立“合法”的服务场所——慰安所。

日军自侵入中国东北后，随即在驻地开设了大量的慰安所。1938 年，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冈部直三郎向所属的几十万部队发出了设置慰安所的指示。1941 年 7 月，关东军在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参谋长吉田本贞一的策划下，制定征集 2 万名朝鲜慰安妇运至中国东北的计划。后来在中国几乎凡有日军驻扎的地方就有慰安所。

日军设在中国的慰安所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军队直接经营的固定的专供日军使用的慰安所。这是最普遍的形式之一，其主管者从方面军、师团、旅团到联队、大队甚至警备队或小队都有。当军队转移时，慰安所也一同转移。二是形式上由日侨民营，但军队也插手，供军人、“军属”玩乐的“军督民办”式的慰安所。这类慰安所多在日军的支持下开设，其数量不在少数。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买春业者成群地来到中国东北，在各地关东军驻地周围设立大量的料亭（供将校使用的慰安所）和游廊（供士兵使用的慰安所），随着战争的扩大，这种方式推广扩大到中国南方及亚洲各地。三是由日军指定的、专供日军使用的民间妓院形式的慰安所。这类慰安所除了日军利用外，一般的日本人也可以利用。四是军队或民间经营的流动式的慰安所，一般设在军用卡车上，慰安妇的吃喝睡觉都在车里，管理者通常用卡车将她们运到部队驻地，用木桩和毛毯等围起简易棚子，作临时慰安所，士兵们排着队进去接受“慰安”。也有设在轮船上和火车上的。五是日军指使伪政权或胁迫中国的娼业老鸨开设的慰安所。

这些慰安妇大多是来自亚洲的被占领国和日本的本土。其中在东北的慰安妇以朝鲜人居多，从日军本土运来的慰安妇大多是为军官们服务的。征集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在战场或占领地，通过暴力强行掳掠当地妇女；二是强行征召殖民地妇女；三是设下种种圈套，诱逼妇女坠入陷阱；四是

在战场上俘获的女战俘。日军部队直接参与了慰安所的建立和管理,慰安所的建筑多是由日军提供的。因此,慰安妇制度具有明显的国家行为特征,是战时日本政府违反人道主义的国家犯罪。

慰安妇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整日遭受日军的性虐待。当年美国记者约瑟·道格拉斯采访日本时任首相的东条英机问:"据西方一些通讯社披露,贵军在占领区秘密强制当地妇女充当随军妓女,不知此情是否属实,你对此有何看法?"东条英机说:"我不能否认军队里会出现这种事情,就像你不能否认美军士兵能请假去当地妓院一样。至于看法,我以一个东方人的观念,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资,并且是对胜利不可缺少的独特营养的战略物资。"这位战争狂人竟说出如此荒唐的话,好像他没有母亲妻女一样。

日本政府和军队所以要实施慰安妇制度,其主观动机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向官兵提供性服务以稳定军队,增强战斗力。用慰安妇来疏导官兵之间的紧张关系,抚慰对战争有恐惧心理的士兵,将慰安妇作为奖励官兵的手段,可以使军队得到充分休整,提高士气和战斗力。

第二,维护日军的军纪,防止大规模强奸事件的发生。日本军队在侵华期间,军纪败坏,最骇人听闻的就是大肆强奸当地妇女。在此情况下,日军高层认为,只有推行慰安妇制度,才能减少强奸事件,恢复占领地的秩序。

第三,预防性病的传播。日军企图通过设置慰安所,并对慰安妇进行严格体检,来杜绝或减少性病在官兵中蔓延。

第四,治安和防泄密的需要。慰安妇由日军集中管理,情报不能泄露。如果允许官兵到民间的妓院去,不仅有生命的危险,也会泄露军事情报。

第五,心理战的特殊需要。他们认为,当武士道不能支撑精神崩溃的士兵时,慰安妇的肉体能对复原士兵必胜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中国和亚洲国家期间,出于将战争持续下去的目的,而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士兵的性奴隶,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这一暴行,极大地侵害了被强迫妇女们的人格、人性、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荣誉感,使她们蒙受了无比巨大的肉体和心灵上的痛楚。慰安妇与日军的关系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找不到第二例的男性对女性的集体奴役现象,这一现象充分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和暴虐。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人类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的政府犯罪行为。日军强征中国、朝鲜、东南亚各国妇女以及美、英、澳、俄等部分欧美国家的数十万妇女为慰安妇,这也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的记录之一。慰安妇制度与战时德国军队疯狂屠杀犹太人行动是法西斯主义践踏文明世界的两大罪状,而尤以慰安妇这种完全违反人类两性伦理的性奴隶制度给人类心灵带来的耻辱最为深重。

第二节 要塞慰安所

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即在占领地开设了大量的慰安所。凡是有日军驻扎的地方,哪怕是偏远的山沟、战斗的前沿地均设有慰安所。1934 年日本关东军出于战略的需要,开始在中国东北部修筑对苏国境要塞阵地,并在各处设置了若干慰安所。经要塞研究人员调查、证实的要塞慰安所如下:


东宁要塞出土的避孕套

东宁要塞有石门子、大肚川、新城子沟、东宁县城、南天门、绥阳、二道岗子、老黑山、三岔口、八里坪等慰安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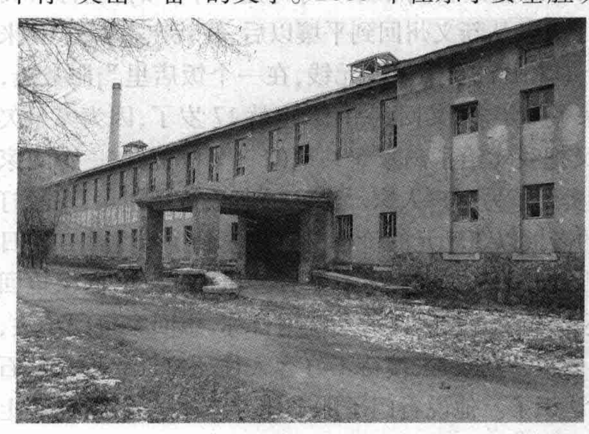
绥芬河要塞有靖国山西坡、楠公园、绥芬河城内等慰安所。

孙吴要塞有松风町、孙吴县城、军人会馆等慰安所。

海拉尔要塞有河西、腰卢子、东山下等慰安所。

其他要塞都有数处慰安所。

各日军慰安所都进行严格管理，日军官兵去慰安时都要使用避孕套，避孕套上面印有日军标徽和印有“突击一番”的文字。2000年在东宁要塞胜哄山阵地曾发掘出这种避孕套。



孙吴的军人会馆



孙吴的军人会馆正门

第三节 要塞慰安妇

关东军边境要塞的慰安妇属于强征、骗征的性奴隶。她们的穿衣吃饭均由部队供给，慰安所的老板也由部队指定担任。期间也给慰安妇每人每天“两毛钱”，但这是零用钱，甚至只给吃穿，不给钱，单一为日军服务，与当地开设的以赚钱为目的的妓院有明显的不同。要塞慰安妇是完全被监禁在军事禁区的某一要塞群中，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



东宁要塞慰安妇幸存者控诉日军的罪恶

在关东军要塞的慰安妇，战后多数都流落他乡，隐姓埋名，不愿再回首那段凄惨经历。近几年，在多方面正义力量的感召下，有些原“慰安妇”终于开口向世人倾诉她们那段辛酸悲惨的历史，发出要向日本侵略者讨还血债的呼声，向世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推行随军慰安妇制度的实质。下面是研究要塞的工作者近几年来共同调查采访的战后隐居在东宁、绥芬河、孙吴的6名受害者的综合记录。① 她们只是千万名慰安妇的代表。

一、东宁要塞慰安妇

（一）金淑兰

采访金淑兰老人那年她79岁，原籍是朝鲜平壤。应我们提出的问题，老人讲述了她的痛苦经历：

“我是在平壤出生的，我家人口多，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两个妹妹，生活困难得几乎用水来充饥。记得我7岁那年父亲被地主打死了，父亲死了以后生活就更不行了，家里为了生活就把我给卖了。一共把我卖了五次，一直到20岁始终在外边，给人家做饭，看孩子，洗衣服，做佣人。”

“第一次把我卖到新义州，那年我才15岁，卖的时候说是给人家当干女儿，到了人家是看孩子。有

① 本节中东宁要塞慰安妇金淑兰、李光子、池桂兰、李凤云由宋吉庆调查采访；绥芬河要塞慰安妇朴玉善由周艾民、陈云来调查采访；霍尔莫津要塞慰安妇文明金由杨柏林调查采访。

时地主老财有钱的来了就让我陪着伺候,在新义州干了一年多一点,我又回到平壤,是我自己挣钱还了债才回家的。回来后,家里就剩下我母亲、哥哥、嫂子,还有姐姐和俩妹妹。哥哥是一个罗锅(驼背),天生的残废,啥活也干不了。姐姐在我15岁的时候嫁了人。从新义州回到平壤以后,我就在家呆了10来天,因家里太穷,实在没有办法,家里又把我卖到奉天(沈阳),卖了100元钱,在一个饭店里当服务员,干一些杂活,因不会说汉语,也遭了很多罪。在奉天呆了一年多,又回到平壤,也就17岁了,因为家里欠了地主的钱,又把我送给地主家抵债。后来,地主家又把我卖给了离家5站地的一个村里,在一个酒家当服务员。我在那干了5个月以后,这家老板又把我卖到了另一户人家。这家的老板特别狠毒,不是打就是骂,我在那里干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然后这家的老板以300元的价格又把我卖到了黑龙江东宁日本人开的妓院。我是19岁到的东宁,卖我时说是招工,把我骗来了。为了生活,当时是姑娘,回家也回不去,没有钱,生活所迫,现在想起来那个日子心里还害怕。越害怕日本人就越打你,想回家也回不去,逃跑就挨打,最后就认命了。在东宁慰安所里的日本老板特别狠毒,接待不好客人往死打你。后来从石门下来的一个日本军官,是个大尉,他经常来,我们就认识了。他说石门子那个地方能比这好点,叫我上那去。我想,换个地方兴许能强点,到了石门子一看,到哪儿都一样。"



金淑兰

我们问她:"一天要接待多少个日本兵?"她回答说:"要是休息日,要接待近20个,甚至更多。每天接待10个以下就不给你饭吃,超过10个能吃点高粱米饭,大葱蘸盐面。每天都达到近10个,后来受不了啦,有时候达到休克为止。"金老太擦了一下脸上的泪水,停顿一下接着说:"那时整天的忧虑,想跑跑不了,抓回来就打你,往你鼻子里灌辣椒水,醒过来还得接客。"

我们问她:"在你们姐妹当中有没有被折磨死的?"

她回答说:"有,太多了。第二次去的那家有3个人被折磨死了。她们一般都是从朝鲜来的,年龄都是十七八岁,当时日本侵略了朝鲜,为了生存到中国来。没想到中国也有日本人,想回也回不去了。你再难受也得化妆抹粉,漂亮点。一不化妆时就随时随地挨打,灌辣椒水。我们每周要检查一次身体,当检查身体时发现自己的身体已被糟蹋得不行了。在三年里,我就是在这里每天履行这个程序,就这样度过了这三年,整个身体受到了摧残,落下了腰腿痛、心脏病等疾病,还不到50岁,整个大胯痛得睡不着觉,两条腿也不好使。整年的吃药,花了很多钱。"1945年光复时"慰安妇"多数都跑了,战乱年代是死是活很难知道,现在她只知道还有3个同伴健在。25岁时金淑兰嫁给了现在的老伴,生有一个女儿,一直到现在。

(二)李光子

李光子不会说汉语,每次采访必须有翻译,她讲道:"我今年74岁(2001年),是在日本出生的,父亲在一家日本的株式会社工作。在我6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父亲去世以后,当时有我和妈妈还有妹妹3个人,生活非常艰苦。后来母亲得了病,我的叔叔在韩国知道这个情况后,就到日本把我们娘仨接回了韩国釜山。"



李光子

"回来之后为了生活,妈妈到了一家工厂给人做衣服。到我7岁的时候,我母亲说,日子也没法过,得给我找点活干,我就到一家小旅馆当了服务员,给人家干一些杂活。到我9岁的时候又到一家小旅馆,帮

人家洗菜，洗衣服，什么活都干。干活没有工钱，只是管饭，说是一年给一套衣服，结果一套也没给。在我15岁那年，妹妹来找我，我想家里人都想哭了，我妹妹提出来要回家，我俩就回去了。我干活的地方离我家是8里地，但我在外的8年时间里和妈妈一直没有见面。妈妈心疼我，看见我这样受苦，就不让我回旅馆去干活了，后来我叔叔介绍我到一家工厂里学织布。”

“有一天，我家来了一个韩国女人，是一个酒店的老板，她对我妈妈说，中国有个纺织厂挺大的，到那儿能挣着钱，还能吃大米饭，何必在这受苦。虽然这个酒店的老板说的多么多么好，我还是考虑妈妈和妹妹，我走了她们怎么办？所以我就没有答应。到了第二天，这个老板又来到我在的工厂找我，她说，看你在这里挺遭罪的，去吧，听我的，中国大米有的是，工厂也多，还能挣钱。因为生活所迫，妈妈有病又没钱治，我对那个老板说，你给我妈妈点钱我就去。那个老板答应了我的要求，给了我妈多少钱我也没问。”

“收了人家的钱，三天之内必须走，我妈妈把自己的衣裳改了一下给我穿上，因为我的个子小。酒店的女老板只领我一个人走的。从釜山坐火车，三天到了牡丹江，是从图们这个线过来的，从牡丹江又坐火车到了东宁。在东宁一下火车，就看见有三辆带篷的军用车在那里停着，车上有日本军人，还带着枪，然后就让我上车，这时候吓得我就不敢上车了，他们就硬拉我上了军车，把我拉到了石门子。下了车已经半夜了，给我安排了一个小破屋睡觉。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到处都是日本军人，还有很多妇女。这个时候领我来的女老板对我说，你这小丫头蛋子，这里不是工厂，你今天也看明白了，就在这地方哭也没用。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板就是石门子慰安所的女老板。”

“他们没有让我马上接客，而是考验我，开始叫我干点杂活。在干杂活的时候他们在旮旯里放点钱什么的，看我拿不拿。考验完了之后，第10天安排了个小屋就让我接客。我怎么求他们都不行，我说扫地、洗衣服干什么都行，那一年我才16岁。我在的那地方叫‘爱简所’，男老板是日本人，叫伊道桑。”

“第一次接客我拼命地反抗，反抗也不行，那个日本兵拿着一把刀摁着我，给我扒了衣裳，我年龄小，也抗争不过他呀。慰安所里有个规定，每接待一个要交给老板一个小票，一天如果达不到15个小票就得挨打。后来实在是没办法，只好认命了。”

“这事提起来就没法说了，吃的是高粱米饭，冬天吃的菜是咸盐水煮冻萝卜，夏天吃的是咸盐水和大葱。吃不饱也得干那个活，白天来的是小兵，到了晚上来的是官，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日，来了月经也不准休息。老板要让你(把身体)擦洗干净，叫人感到很干净，一年四季就是这样，一点自由也没有。日本兵上午9点多钟来，下午两点多钟走，3点钟以后能休息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官就来了。就这样，钱也没挣到，没钱也回不去，一天一天地忍着盼着。3年中‘爱简所’里有两个姐妹生了病也不给治，也不给饭吃，眼看着死去，死后被用她自己的被子裹着，扔到荒野外。”

“光复那年苏联红军打过来了，飞机往地下扫射，我们一看没人管了，我们40多个朝鲜姐妹就奔太平川跑了。跑到那个地方碰到一些朝鲜族人，有一个人把我们姐妹分到各家去住，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太平川的老百姓收留了我们。有一个叫卢其汉的小伙子和他妈也是因避难跑到这来的，我们在这里住了40多天就认识了。有人给我和这小伙子介绍对象，那个介绍人和他妈说，我只是在‘那里’(慰安所)擦擦地什么的，当服务员，没干别的，这个小伙子她妈就同意了。后来我们姐妹就开始分散了，有20多人又回到了石门子，其他人就到了大肚川一带，我和卢其汉到了三岔口定居下来。”

卢其汉于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后来就再也没有回来，可能是牺牲在战场上了。13年后李光子又找了第二个老伴叫金再石，生有一个儿子，老伴在1994年去世。儿子现在家种地，生活过得不宽裕。李光子老人到现在也没有和朝鲜的家人联系上，她十分思念家乡的亲人。2002年秋李光子病逝。

(三)池桂兰

池桂兰原籍是韩国釜山人，采访那年她78岁，原住大肚川村。她有一儿一女都已结婚，儿子在家务农，女儿住在县城里做生意。采访时她说：“我是1944年8月来到石门子的，也是被招工骗来的。因为姊妹6个，家庭生活困难，出来想挣点钱，没想到来这里。”



池桂兰

池桂兰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在本国念书念到初中二年级。她很有骨气，干这样的“工作”（当日军“慰安妇”）受到人格的侮辱，她一次次不从，也就一次次地挨打，受尽了折磨。她说：“我的耳朵就是那时候被打聋的，日本人很凶，不管怎么打我，我没有在他们面前掉过一次眼泪，我哭也要自己偷着哭，我恨透他们了，他们不是人，都是些畜生。”

在光复后池桂兰嫁给了一个汉族人，过着和普通农民一样的生活，老伴前几年去世了。“你不想得到日本人的赔偿吗？”老人气愤地说：“谁要他们的臭钱，现在拿来我当面就撕碎它。”老人说着，心中的仇恨和愤怒都在脸上表现出来。

（四）李凤云

李凤云家住离东宁县城50公里的道河镇小地营村，近年政府安排她住进了敬老院。老人原籍朝鲜，采访那年她79岁，岁月的沧桑全都刻在了她的脸上。她不会朝语，汉语说得也不好，时常还带有一点山东口音。


李凤云

采访时她说：“我的老家在朝鲜农村，一开始在弄城，后来搬到平壤。”

“我的原名叫李寿段，在念书的时候日本人让改姓‘松春’，在慰安所里日本人又强迫改名叫‘西刀米’。我19岁来到哈尔滨阿城。那年母亲有病，治病欠人家钱还不上，招工的说到中国能挣到钱，开始说是唱歌跳舞。来到阿城后，住的是日本人开的‘旅馆’，其实就是日本人的窑子（慰安所）。接待的全是日本军人，当时我也没见过日本兵，他们说话咱也听不懂。吓得我就跑，还没跑出多远，就被抓了回来，抓回来差点没打死。我在阿城那个地方干了一年多，家里就捎信来，说我妈妈病重了，快不行了，我就偷偷地逃回家去了。我妈妈听说我为给她治病给了日本‘窑子’，病情更加严重，不久就去世了。”

“后来爸爸又找了一个后妈，后妈对我不好，生活十分艰苦，我一天只能用泡豆饼的水来充饥。实在是受不了啦，我又把自己卖给了‘招工’的，来到东宁县石门子。”

“我是21岁那年到的东宁石门子，我在的那个慰安所叫‘苏苏浪’，也都是接待当兵的，老百姓不让进。上午接待小兵，下午接待小官，到了晚上接待大官，大官可以在所里住下，有时一天要接待20来个人。那时候一天就给两顿饭，吃不饱，平时吃高粱米、大葱蘸盐面。有时候饿得不行了，到人家菜窖偷点小青萝卜吃，被人家发现后挨那个打呀。有时想哭就在被窝里偷着哭，不敢让老板看见，擦干眼泪还得接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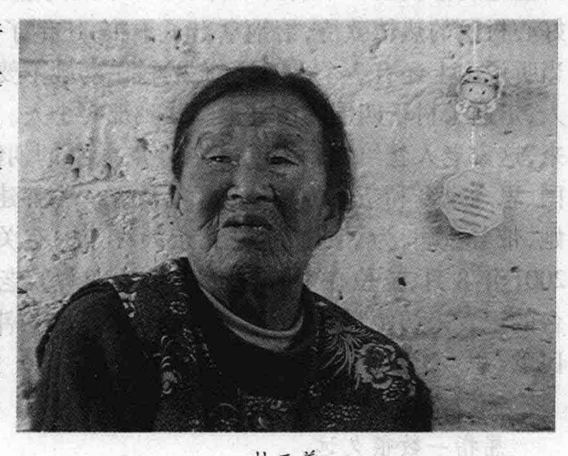
老人说着已是声泪俱下了。她擦了擦眼泪接着说：“事变时老板把我们的行李都装上了车，说是上哈尔滨，当时兵荒马乱的，一些人都跑了。我们40多个朝鲜姐妹跑到了太平川，在那里住了40多天。后来我们十几个人又搬到大肚川，我住的对门有一个饭店，有个叫李跃星的在那里头干活，时间长了有人就给我介绍对象，我无依无靠地就和他结了婚，一年后我家搬到了小地营。我没有生育，老头对我也不好，经常打我骂我。我白天到生产队里去干活，回家连口热饭都吃不上，下雨天我还要上山去捡木耳，大队的干部看我太苦了，就劝我离婚，我没同意，就凑合着和老头过，我有苦跟谁说去。”

“提起日本人，我扒他的皮也不解恨。我不说别的，他们糟蹋多少中国人、朝鲜人，后来日本人都回国了，挺高兴的，我们哪有回去的路啊，出来了就回不去了。日本人可绝了，把我们的姓都改了，不

让咱过阴历年，不让穿朝鲜衣服，让穿日本衣裳，你看电影电视里演的一点都不差。共产党对他们多好，几个月的、五六岁的（日本遗孤），都把他们抚养大了，都送回国去看看。要是日本人（对其他亚洲国家的人），那就一个也剩不下（都得被杀害），我就是扒了他们的皮也不解恨。”

二、绥芬河要塞慰安妇朴玉善

2001年春天，绥芬河电视台副台长陈云来一行四人，在穆棱镇一座偏远的山村找到了昔日绥芬河天长山要塞兵营慰安妇朴玉善。她已75岁，疾病缠身，至今还不会说汉语。她于1941年秋，被日军以招收纺织女工的名义，从韩国原秘阳郡秘阳县（现为庆尚南道）一个朴姓农村同许多同村姐妹一起被骗到中国，押送到绥芬河天长山要塞兵营，被迫充当慰安妇。她是秋天来的，日本老板娘给她起了一个日本名秋子。从此，秋子这称呼，带着奸淫的声浪，浸着强暴的满足传遍兵营，伴随着她度过了长达4年屈辱的慰安妇岁月。



朴玉善

朴玉善在慰安所的4年中，不能走到兵营外，也不能和外人接触或交谈，甚至和同命运的姐妹也不能自由来往。晚上整夜遭受日军的凌辱，白天还要给日军补衣服、洗衣服。在那走投无路的日子里，她几次想到死，但兵营岗哨重重，无路逃跑。她唯一的乐趣是到慰安所前的小河洗衣服。一个人蹲坐在河边，望着弯弯曲曲、清清亮亮、哗哗流淌的河水，想起遥远的故乡小河，眼前常常浮现出阿爸吉、阿妈妮和3个哥哥、1个妹妹的面容，不知暗自流过多少思念家乡和亲人的泪水。

初到要塞兵营时，朴玉善刚满18岁。父母给了她一副苗条的身段、清秀的面容，加之她能歌善舞的天赋，比一般慰安妇招惹日本人喜欢。兵营军官把她同其他慰安妇分开，让她独住一处房子，专门供军官级享受，并派专人教她学唱日本歌、学跳日本舞，把她打扮成日本女子，并按期为她检查身体。大约一年之后，她除了为军官充当“性工具”，同时还充当了艺伎，每逢日军节假日或军事演习之后，就有专人指派她唱日本歌、跳日本舞。平日里，还有专人带她到其他日军驻地去慰问演出。在绥芬河电视台采访中，朴玉善老人用日语唱起了她当年学唱的一首日本民歌《春天到了》：

春天到了，春天到了，
春天到了哪里？
春天到了山野，
春天到了家乡。
花儿开了，花儿开了，
花儿盛开在哪里？
花儿盛开在田野，
花儿盛开在家乡。

这本是首古老的日本民歌，充满了日本人对春天的向往和对家乡的赞美，而从当年这位日军慰安妇口中却听不出一丝的美好。记者们听着这首民歌，无一不感到歌声中浸透着朴玉善老人的屈辱和酸痛，在场的人也都流下了酸楚的泪水。

天长山要塞兵营其他慰安妇的生活待遇则比朴玉善差多了。在指定日期，日本兵排着队等待“免费性服务”。有时一个慰安妇一个晚上要惨遭30多个日本兵牲畜一般的性虐待。不知有多少同命姐妹病死、自杀，也记不清先后有多少姐妹被抓进兵营，又被转移到什么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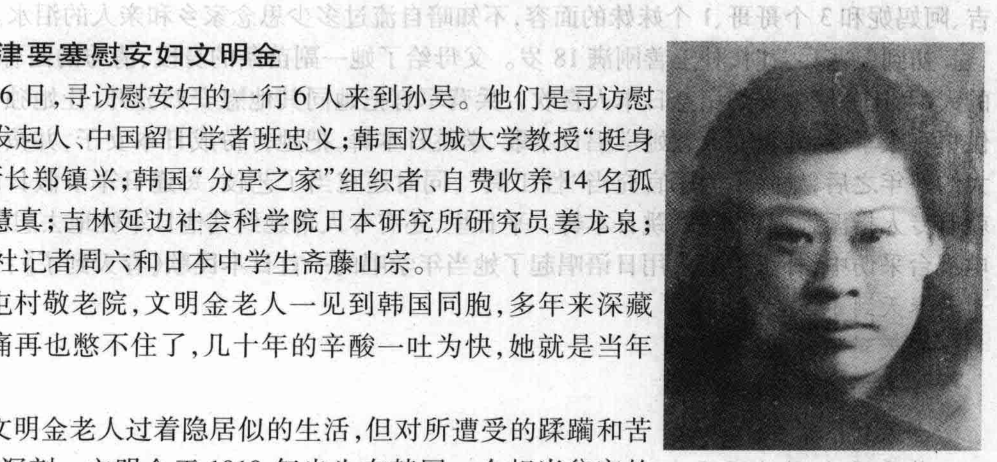
1945年8月9日凌晨，在苏联红军进攻绥芬河的炮火打响时，天长山兵营慰安所里的朴玉善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位在兵营当翻译的朝鲜人要带她逃命时，她才明白过来。于是她和另一

个同族姐妹随着那个翻译和一名日本士兵4个人逃向山里。白天不敢走，晚上走，饿了吃草根、野菜，渴了喝口山沟水。就这样在山林里走了15天，由于体力极度虚弱，走在一处小山坡上时再也走不动了。这时，他们看见山下有处村落，在朴玉善眼里很像家乡房舍的样子。其实，那是离绥芬河100多公里远的穆棱县一个朝鲜族村子。4个人商量后，决定让朴玉善去要点吃的。朴玉善进村后，受到了好心村民的热情款待，给她拿出了干粮，还倒了一碗热水，说着同情、可怜她的话，劝她好好歇一歇。当听说山上还有3个人时，好心的村民劝她不要走，把那3个人也找回村来。于是，几个村民上山找人，走遍了村子四周的山林也没找到那3个人。朴玉善在村民的挽留下，被一个朝鲜族家里收留。后来，这家老人就给她介绍了一位老实、善良的朝鲜族青年，结了婚，还生了一对儿女。可是，她思念祖国、思念家乡和亲人的心一直没有放下。中韩建交后，她多方与韩国联系，均不能如愿。年过七旬的她，带着重病，为了能回家见到亲人终于向有关人士和韩国驻北京领事馆道出了难以启齿的遭遇。2001年8月，这位在中国居住57年的朝鲜族老人，终于踏上了回祖国的飞机。在此前，绥芬河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她时，她还请求记者们帮助她与韩国联系。当采访结束时，她还用朝鲜语唱了一首朝鲜民歌《思乡之歌》：

离别家乡几多年，
屈指一数很久远，
一年复一年。
折断柳枝做成哨，
吹出一曲故乡恋，
苦思我家园。
……

三、霍尔莫津要塞慰安妇文明金

1998年4月6日，寻访慰安妇的一行6人来到孙吴。他们是寻访慰安妇国际行动的发起人、中国留日学者班忠义；韩国汉城大学教授“挺身队”问题研究所所长郑镇兴；韩国“分享之家”组织者、自费收养14名孤苦伶仃慰安妇的慧真；吉林延边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姜龙泉；《妇女之友》杂志社记者周六和日本中学生斋藤山宗。


青年时的文明金

在孙吴县腰屯村敬老院，文明金老人一见到韩国同胞，多年来深藏于心的屈辱和苦痛再也憋不住了，几十年的辛酸一吐为快，她就是当年的一名慰安妇。

饱经磨难的文明金老人过着隐居似的生活，但对所遭受的蹂躏和苦难，记忆依旧十分深刻。文明金于1919年出生在韩国一个相当贫穷的农民家庭，家中姊妹5人，她是老大。9岁开始靠讨饭和上山挖野菜帮助家里苦度岁月。

18岁时，她偶尔在集市上遇到一个50多岁的韩国男人。这个男人问他愿不愿意到中国东北干活，那里有饭吃、有钱赚。单纯的文明金以为自己从此可以养家糊口，不加怀疑地同意了。这个人直接领她住到一个旅馆里，给她从没吃过的饼干、糖块吃，她更加不存疑虑，但很想家。接着又陆续来了6个少女。这期间，她的家搬走了，四处找不到她，父亲也去世了。

不久，她们辗转来到孙吴的日本军营。同来的共有七八个韩国女孩，大的20余岁，小的才16岁。当时的孙吴日军军人会馆是典型的高级军官俱乐部，一楼有酒吧、大浴池、电影院、舞厅等设施；二楼是一排小房间，文明金就住在第四个房间里。

在那里休息了几天之后，一天，她的房间进来一个50多岁中等个的日本军官，腰里挂着战刀，文明金害怕极了。到了晚上，军官不顾她的哭叫、反抗，强行脱掉了她的衣服。第二天，同来的几个女孩在军人会馆外的草地上抱头痛哭，可这并不能改变她们的命运。从此开始了暗无天日的慰安妇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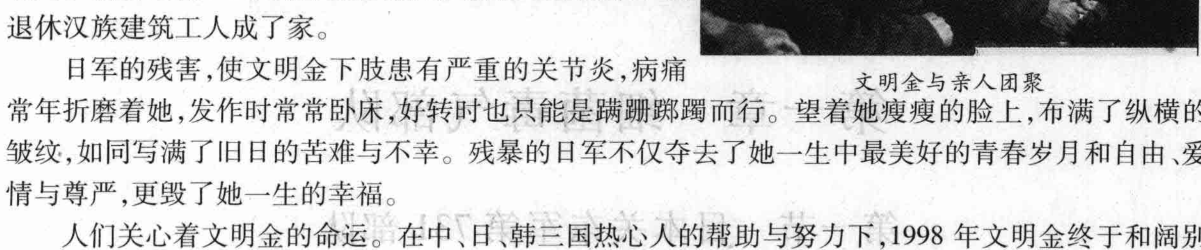
每天都要接待日本军官，星期天要达到几十个，稍有不从就会遭到打骂。曾经有人逃跑，但被抓回来打得死去活来，再没有人敢跑了。

就这样一直到1945年8月，苏联红军突破霍尔莫津要塞防线时，日军溃败逃散，文明金在奔逃途中，遇到一位姓尹的韩国好心同胞，带她到现在的孙吴县沿江乡东光朝鲜族屯定居下来，后来两人结婚，度过了30年平静的乡间生活。一直没有人知道她曾是被日军蹂躏的慰安妇，她把那段屈辱和痛苦埋在心底，连对她很好的救命恩人——丈夫也没有告诉。后来，丈夫去世了，她没有任何收入。独自生活一年以后，经人介绍与孙吴县城里一位退休汉族建筑工人成了家。

文明金与亲人团聚

日军的残害，使文明金下肢患有严重的关节炎，病痛常年折磨着她，发作时常常卧床，好转时也只能是蹒跚踯躅而行。望着她瘦瘦的脸上，布满了纵横的皱纹，如同写满了旧日的苦难与不幸。残暴的日军不仅夺去了她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和自由、爱情与尊严，更毁了她一生的幸福。

人们关心着文明金的命运。在中、日、韩三国热心人的帮助与努力下，1998年文明金终于和阔别61年的亲人团聚了。





老年时的文明金





文明金回到军人会馆

第六编
要塞区的细菌毒气战

第一章 细菌毒气部队

第一节 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

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开始了细菌战的准备活动。于1918年11月经参谋本部批准，由陆军省医务局开始研究细菌，后一度中断。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继续进行细菌实验，并由石井四郎负责。

石井四郎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发明者和创始人。1932年8月，在日本军方支持下，于日本东京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创立了由石井四郎领导的细菌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开始进行细菌武器的研究，石井四郎把鼠疫作为主攻方向。在去欧洲考察时，石井四郎发现包括纳粹德国在内的国家，都把鼠疫菌排除在武器之外。因为14世纪中叶，欧洲大陆曾发生一次流行面非常广的鼠疫。当时欧洲有一亿人口，因患鼠疫而死亡的有两千五百万人，鼠疫几乎毁灭了整个欧洲大陆。所以，欧洲各国列强都未把鼠疫菌当作细菌战的武器。石井四郎决定把被各国排除的鼠疫菌当作日本单独研究和仅有的最有威力的武器来进行实验。1933年，细菌研究室进行扩建，改称“防疫研究所”。在石井四郎的主持下，这里成了日军准备细菌战的研究中心。大批研究人员从事霍乱菌、伤寒菌、鼻疽菌、瓦斯炭疽菌等细菌的培养、使用和预防方法的研究，研制装有这些细菌的地雷、榴弹、枪弹和在水面上使用的玻璃弹等爆炸装置。


731部队长石井四郎


731部队长北野政次

1933年初，日军大本营批准了石井四郎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细菌研究基地的报告，并任命他指挥这支细菌部队。主要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在中国东北容易得到细菌研究的“材料”——活人；它靠近苏联国土，气候相似，一旦与苏军交战，可以直接实施细菌攻击……同年8月，在哈尔滨市南岗区秘密设立了“石井部队”，其附属细菌实验场设在70公里以外的背阴河。

为把这支部队隐蔽起来，石井四郎首先给它化名为“加茂部队”、“东乡部队”，并定了另一个队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731 部队建筑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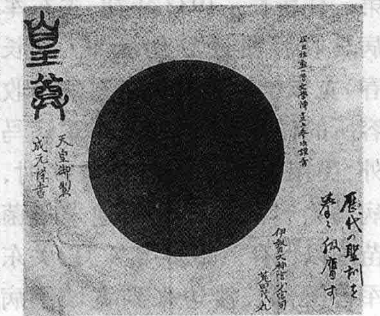
1936 年，日军参谋本部根据裕仁天皇的敕令，在中国东北地区正式设立了两支特种部队：一是侵驻哈尔滨市的石井部队（即后来满洲第 731 部队），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一是侵驻长春市孟家屯的若松部队（即后来满洲第 100 部队），对外称“关东军兽类防疫部”（该部队 1940 年曾在海拉尔设支队，后迁至黑龙江克山）。

1938 年 6 月，石井部队正式移驻平房，对外的“加茂部队”改称“东乡部队”，秘密番号为“满洲第 659 部队”。1941 年，启用“满洲第 731 部队”。1945 年 5 月，又改称为“满洲第 25202 部队”。


731 部队本部大楼

731 部队本部下设 8 个部：细菌研究部、细菌实验部、防疫给水部、细菌生产部、总务部、训练教育部、器材供应部、诊疗部。此外还有一个与各部平行的管理监狱的“特别班”。731 部队平房驻地占地面积 30 多平方公里，规模庞大，是按德国式“秘密建筑法”修建的。有工作人员 3 000 余人。1940 ~1945 年，在这里用细菌杀死了 3 000 多人，其中大多数是中国人，也有少数苏联人、蒙古人等。

1940 年 12 月 2 日，日本天皇裕仁又发布一个敕令，要求在中国东北的西部、北部和东部靠近苏联前沿地区的战略要地，建立细菌战的基地，作为 731 部队下属的支队，扩大该部队的规模和细菌武器的生产。据此，731 部队在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分别建立了 4 个支队。1941 年 8 月，号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石井部队及其各支队改用秘密番号：本部为 731 部队，海拉尔支队为 543 支队，孙吴支队为 673 支队，牡丹江支队为 643 支队，林口支队为 162 支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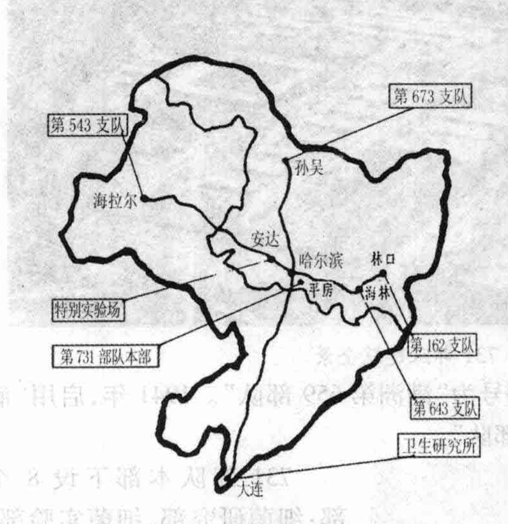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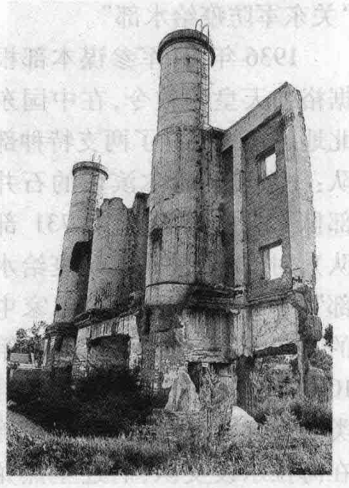
日军参谋本部对细菌部队实行这种战略布局，不仅可以按品种、数量扩大细菌武器的生产，发挥各支队直接进行细菌攻击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在一旦出现战局不利、731 本部或某一支队遭到毁灭性打击时，细菌战的研究、制造基地和进行细菌战不会受到根本性的影响。为此，731 部队不断为各支队补充人员，尤其是加强专业技术力量，同时帮助增添和更新必要的设备，使各支队的生产规模逐步扩大，生产能力迅速提高。1944 年上半年，

731 部队的设备有许多分散到各支队。

除上述 4 个支队外，731 部队还辖有大连卫生研究所，该所主要任务是培育各类疫苗。日本侵略军在准备和使用细菌战的过程中，不仅建立了 731 部队，也不仅只进行细菌武器的实验，而是在实施着一个全面的庞大的细菌战的战略部署和计划。为此，在不断扩大 731 部队的同时，还在中国东北、华北、华南、华中各地设置了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一些特种细菌部队、细菌战研究机关。主要有：1936 年在长春孟家屯设立的名为“关东军兽类防疫部”的满洲第 100 部队，1938 年在齐齐哈尔车站附近建立的与各细菌部队配合作战的 516 毒气部队，1939 年在北京天坛附近建立了号称“北支甲 1855 部队”的“细菌武器研究所”，1939 年在南京建立了“荣”字第 1644 部队和在广州建立了“波”字第 8604 部队；在侵华日军的军事团内，还设置了“防疫给水部”和“兽类防疫部”，它们是在各细菌部队指导下的野战细菌部队。此外，在日军控制下的伪满洲国军内和伪满卫生科研机关（如长春的大陆科学院）、军医学院内，也都进行着以动物和人体为对象的细菌研究、实验活动，成为日军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争的一支别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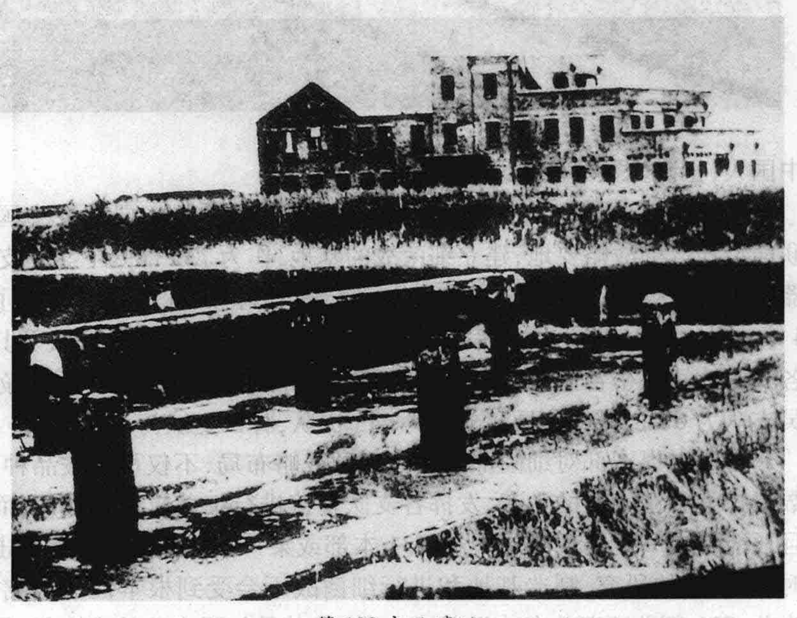


731 部队所属支队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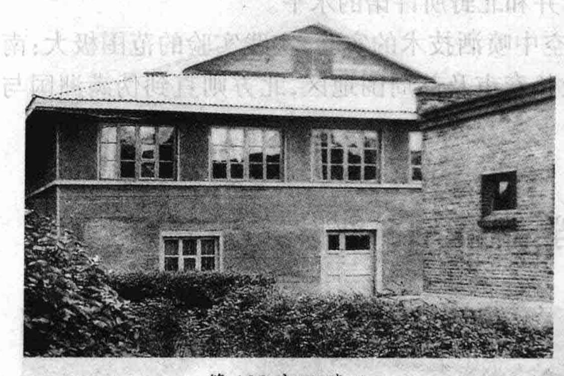

动力班遗址

第二节　日本关东军第 100 部队

关东军第 100 部队的前身，是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于 1931 年 11 月在奉天（今沈阳）成立。第一任所长是兽医中佐小野纪道。1932 年 8 月 5 日，安达诚太郎任关东军病马收容所第二任所长。1933 年初，关东军病马收容所迁到伪新京（今长春）宽城子。当时关东军病马收容所的任务，除治疗关东军病马外，民用马匹若流行传染病时，病马收容所立即到当地采集菌苗加以保存。1933 年 4 月，关东军兽医部长渡边来到宽城子病马收容所，要求安达诚太郎着手研究细菌，准备细菌战。病马收容所马上设立细菌室，立即着手筹划。关于经费要多少有多少。根据


第 100 部队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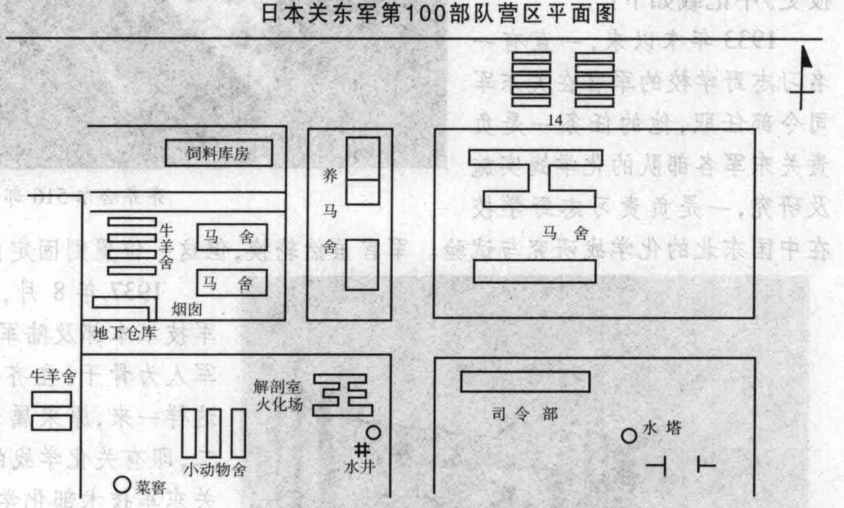
渡边部长的指示，安达诚太郎和他的部下市川大尉商量，做了设计细菌研究室内设显微镜实验台，以备放显微镜。除细菌室外，还设计了孵卵室、冷藏室、小动物室、消毒室和制剂室，还有30间马房。从1933年5月开始修建，历经3个月，除马房外，已完成建筑面积百分之八十，仅就建立细菌室，曾从关东军司令部那里三次领取经费就达10万元左右。1933年8月，兽医中佐高桥隆笃任第三任所长。1935年7月，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改称关东军病马厂。关东军马匹防疫部在1935年底、1936年初成立。以后第四、五、六任关东军马匹防疫部的部队长是兽医大佐高岛一雄、并河才三。从1939年到1941年7月，在并河才三任职期间把关东军马匹防疫部改称为关东军第100部队后，兽医少将若松就任第100部队部队长，直到日本投降。


第100部队遗址

与石井不同，若松从1941年调任第100部队第四任部队长后，从未将指挥权让给别人，从建立开始直到1945年溃败，他一直掌握着。1945年他晋升为兽医少将。按陆军的习惯，这个新建的机构被称为“若松部队”。后来，为了保守军事机密，关东军决定给各个细菌战研究部门指定数字代号，它又被称为“100部队”，也称“关东军兽类防疫部”。

这个部队主要是以家畜和植物为研究对象的细菌部队，同时还研究畜类病菌对活人的杀伤力。他们配备有足够数量的细菌学、化学、生物学和兽医专家学者。部队的编制中有陆军兽医、军医，有生物、植物、细菌、解剖、工程、化学、药物、农业学等专家，他们中有些是被授予博士学位的人。此外，凡属于这支部队里的文官（技正、技传），也都相当于陆军校尉级的各具科技专长的人，他们都配有专业技术人员做助手。这个部队是囊括了各方面专家和技术人员的特殊部队。在若松的严密管理下，100部队常年地雇用600～800人，在这些人员当中，科技人员的比例要远远高于平房731部队。100部队的细菌生产规模相当大，它的各个实验室分别生产着4种不同的病原体，同时还生产少量的其他种类细菌，主要有炭疽、鼻疽、鼠疫和马鼻疽菌。

本　部：下设总务部和4个细菌生产研究部门。1940年以后，在大连、海拉尔（后迁至克山）、佳木斯、拉古（位于牡丹江市附近）等地建立了所属的支队。苏德战争爆发不久，它除在四平设立支队外，在关东军所属的部队里，都奉令设立了军团兽医部队，分驻克山、东安、鸡宁、东宁、四平等地区，配合100部队的细菌战活动。



100部队营区示意图

总务部：下设两个分部。除了负责整个部队的总务、后勤、医疗、卫生等工作外，还有一处种植实验场。

第一部：是实战研究部门，下设若干分部。通过细菌和病毒的实验，确立鼻疽、炭疽、传染性贫血以及植物病毒的效能和传染方法。

第二部：主要负责各种细菌、病毒的研究和制造，是该部队的主要部门。1943年分设五个分部：一是细菌分部，拥有20人，在科学工作员西田和实验员山口的指导下，从事炭疽菌、鼻疽菌的研究工

作；二是病理学分部；三是实验动物管理分部；四是有机化学分部；五是植物学分部，研究细菌毒害或传染植物的方法。

第三部：制造血清疫苗。

第四部：饲养动物。

第五部：是教育部，又称531部队，它负责培训专业技术人员。

100部队与731部队不同之处是本部的全体科技人员几乎都住在营区之外。营区里还有三处焚尸炉，同时还有一个很大的墓场用来掩埋未焚化的动物和人的尸体。

1943年12月，若松又建立了第六个部门，这个新的部门被指定专门研究据称在平房开发成功的鼠疫细菌武器的散布系统。散布系统一直没有达到石井和北野所许诺的水平。

100部队也像平房731部队的研究者们一样进行空中喷洒技术的实验，实践实验的范围极大：南到广东，西到西安以西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城市，近及长春市及其周围地区，北方则直到伪满洲国与苏联的边界。

第三节 关东军化学部第516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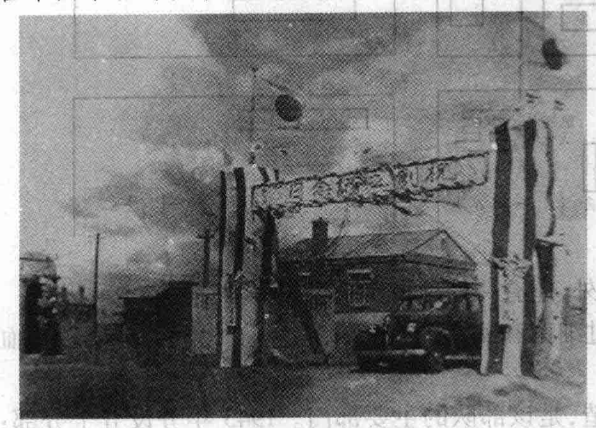
1933年8月，在日本东京附近的千叶县津田町建立了陆军习志野学校，进行有关化学战的各种学术性教育、调查和研究，进行化学战器材的研究、实验。



齐齐哈尔516部队遗址

关东军化学部516部队组建情况，在《陆军习志野学校校史》中记载如下：

1933年末以来，一直有一名习志野学校的军官在关东军司令部任职，他的任务一是负责关东军各部队的化学战实施及研究，一是负责习志野学校在中国东北的化学战研究与试验。军官虽然轮换，但这一位置则固定由习志野学校军官担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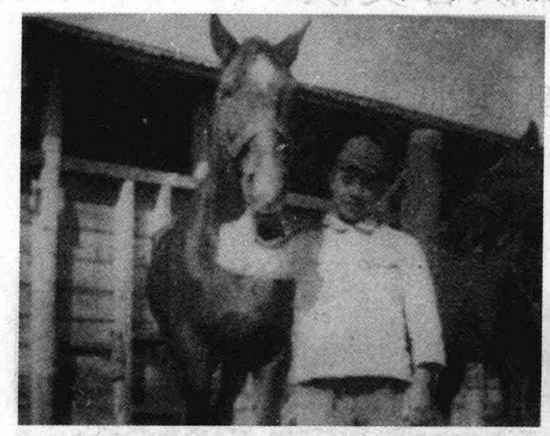


1940年的关东军化学部

1937年8月，为在中国东北试验兵器，以陆军技术本部及陆军科学研究所派驻关东军的常驻军人为骨干，在齐齐哈尔设立了关东军技术部。这样一来，原来属于关东军司令部的事务一分为二，即有关化学战的研究、试验等事务归新设立的关东军技术部化学兵器班，而有关教育、训练的事务仍旧由司令部（参谋部第三课）担任（1938年5月新设立的迫击第二联队同关东军技术部化学兵器班在业务上联系密切，故设在齐齐哈尔）。

1939年5月11日，化学兵器班作为化学部而独立出来。第一任部长由技术部部长小野行守兼

任。化学部的任务与中央的科学研究所的任务大体相当,即化学战的运用,化学、医学、兽医学方面的研究及气象的研究等领域。在这之后技术部迁移到新京(长春),化学部占了原技术部的全部土地与建筑。化学部同毗邻的迫击第二联队共同成为化学战研究的中心。



关东军化学部军人

化学部516部队共设六个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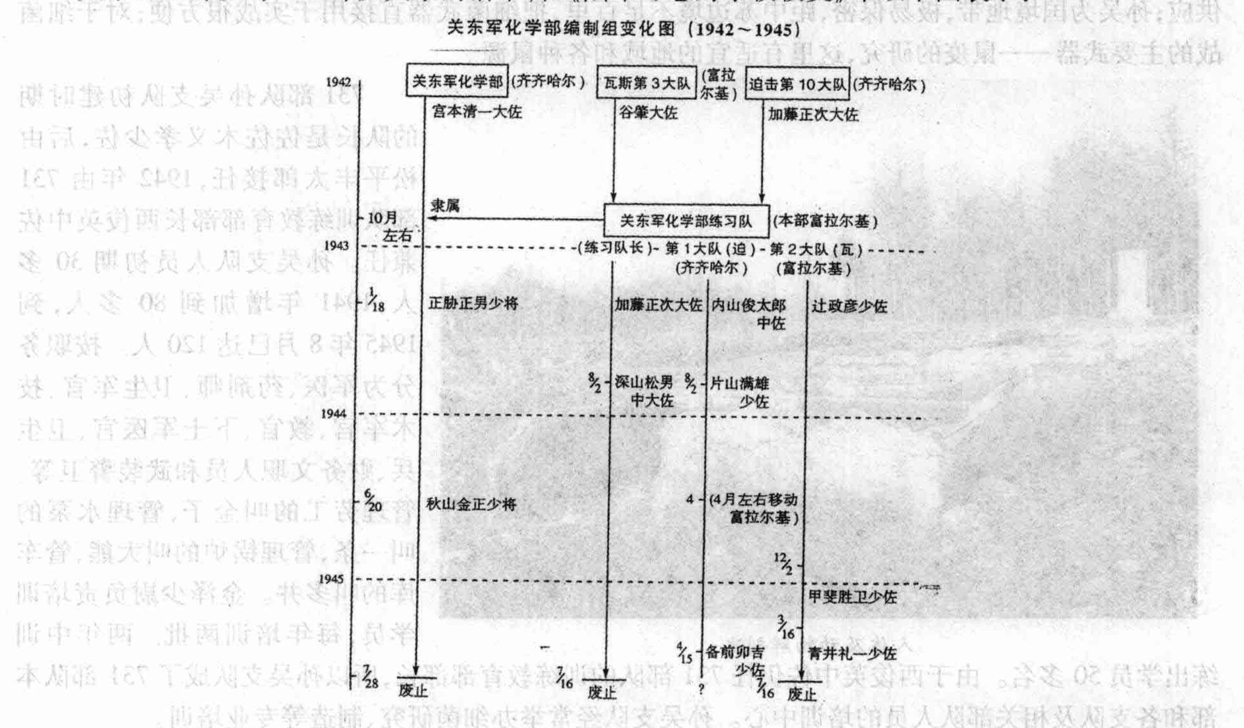
第一科:综合;第二科:运用研究;第三科:化学研究;第四科:医学研究;第五科:兽医学研究;第六科:气象研究。

关东军化学部成立之后,日本军队的化学武器研制和训练就有了一个新的中心。陆军将该化学部同在日本的化学武器研究工作一体看待,规定由关东军的化学部承担在中国东北的化学武器的实验和化学战的训练,特别是从事日本化学战的一切实际准备工作。在陆军常设的从事化学战的三个迫击炮联队中,就有一个设在关东军中,即迫击炮第二联队。

第二联队原驻化学部的旁边,作为化学部的练习队,设有一个迫击中队,迫击炮是用骡马背负和牵引的;一个用汽车牵引进行毒剂撒布的瓦斯中队,称为车撒中队;另有一个用牲畜牵引进行毒剂撒布的瓦斯小队,称为手撒小队;此外还有一个材料工厂。到1940年3月,车撒瓦斯中队扩大为物种车联队,转移到齐齐哈尔南部的富拉尔基嫩江铁路桥畔,其中设车撒瓦斯两个中队,手撒瓦斯一个小队和一个材料厂。这是日本军队中唯一的一支专门的常设瓦斯队。原来的迫击炮第二联队扩大为两个中队和一个材料厂。

1942年10月左右,由一个毒气大队和一个迫击大队联合组成化学部的练习队,于是,历来是协作关系的实战部队成为隶属于化学部的部队,关东军化学部成为名副其实的化学战研究的一大中心,对外称“516部队”。而练习队对外称“526部队”。

· 关于516部队与526部队关系的沿革,在《陆军习志野学校校史》中以下图表示:



第二章 731部队各支队

第一节 孙吴支队

731部队孙吴支队，位于孙吴镇西南1.5公里的小山上，日本人称之为铃兰台。于1940年6月始建，12月完成。孙吴支队对外番号是673支队。内设总务课、第一课、第二课、资材课、教育课。建有青砖房300余间，有15间用于饲养实验用动物，其余为支队官员办公室、制菌室、训练室、守备部队营房、食堂、仓库、汽车间、锅炉房、家属宿舍、卫兵室等。安装大型锅炉一部，还建有环山公路，电力电讯、自来水管线等设施。



673支队营区遗址

关东军731部队之所以选择在孙吴建立支队，主要原因是：孙吴人口少，可用地多，队地周围平坦，没有山谷、沼泽地等自然障碍；此地交通方便，有铁路、公路相通，且劳工人数多，实验对象有充足供应；孙吴为国境地带，极易保密，距中苏边境不足百里，把细菌武器直接用于实战很方便；对于细菌战的主要武器——鼠疫的研究，这里有适宜的地域和各种鼠源。


人体及动物解剖池

731部队孙吴支队初建时期的队长是佐佐木义孝少佐，后由松平丰太郎接任，1942年由731部队训练教育部部长西俊英中佐兼任。孙吴支队人员初期30多人，1941年增加到80多人，到1945年8月已达120人。按职务分为军医、药剂师、卫生军官、技术军官、教官、下士军医官、卫生兵、财务文职人员和武装警卫等。管理劳工的叫金子，管理水泵的叫一条，管理锅炉的叫大熊，管车库的叫多井。金泽少尉负责培训学员，每年培训两批。两年中训练出学员50多名。由于西俊英中佐仍任731部队的训练教育部部长，所以孙吴支队成了731部队本部和各支队及相关部队人员的培训中心。孙吴支队经常举办细菌研究、制造等专业培训。

孙吴支队主要任务是培养与繁殖供生产细菌用的寄生虫，进行细菌实验等。在孙吴城乡强迫群众交田鼠，责令学生停课捉老鼠。支队的15间22层饲养室中，地下有试验室和贮存饲料的地窖，上层是成排的鼠笼。收养老鼠10 000多只。还有黄色老鼠，民间称之为“大眼贼”，还有兔子、山羊、灰鼠、白鼠、麻雀、江豚，每周在这些动物身上轮抽一次血。还抽过3 000多名劳工的血（以检查身体验血为名）。



细菌制品地下贮藏井

1945年开战时该队正在开办一期“青少年（未满20岁者）练成队”，培养未来的“军属”（文职雇员），在训学员达200多人。部队配有汽车40台。开战之后由西俊英率其主力撤往北水台阵地，并由以井上少尉为首的破坏班对本部营区各种设施进行纵火焚烧和破坏。8月17日，西俊英获悉日军战败的消息后，曾为部队全员分发了供“自决”用的氰酸加里毒剂2片，指示他们必要时随时自决。但结果除去哈尔滨本部运送机密文件档案及奉命护送“军属”和少数“自由南下”去北安者以及个别人“自决”外，其余89人向苏军投降作了战俘。

孙吴第六七三支队平西示意图

10　0　10　20M
1：1000
向西20米
空地
锅炉房
动　物　舍
仓库及地下实验室
兵　舍
实验室
六七三支队本部
卫兵所

1945年8月，日苏开战后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命令731部队和100部队立即爆破各自的一切实验室和设备，迁往汉城。731直属各支队开始行动。逃到长春的石井部队长用关东军总部的电话通知孙吴、海林等地的支队，立即行动销毁细菌试验罪证。

1945年8月17日，在孙吴西山，673支队驻地一片混乱，支队长西俊英中佐特地从长春赶回孙吴组织残兵向大兴安岭撤退和处理后事。此时的673支队还有100多名主力队员和50名家属。支队长西中佐以下有军医大尉金泽一久，医药少尉井上正男，主见习士官梅冈孝，第一分队军曹神田信雄以及二、三、四分队的伍长铃木菊一、河野孝树、船奥勇。锅炉班的大熊带领4

人把机密文件、研究资料、图书、实验用小动物塞进锅炉里烧掉。井上少尉组织的破坏班放火烧房，爆破军用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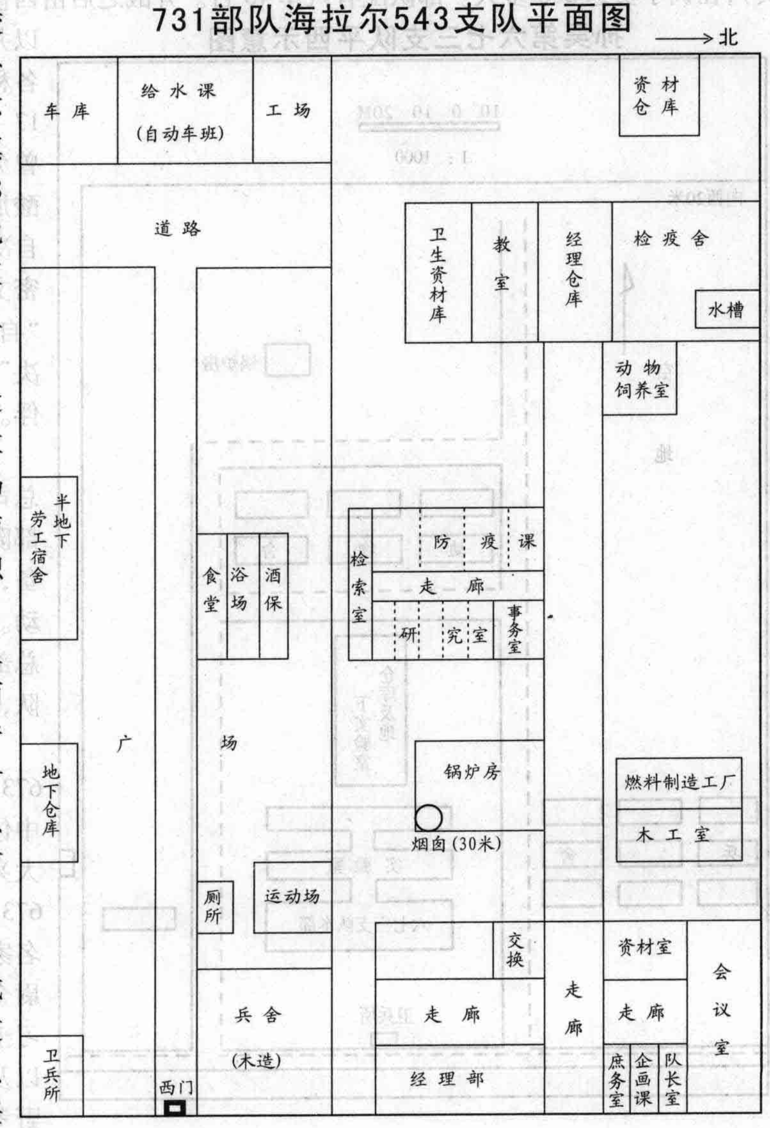
8月17日，673支队全体人员集合在操场上，听西中佐的训示。西俊英此时努力掩饰心中的惊恐，说了一些不战胜、毋宁死的空话，激励他的部下为了大东亚圣战的"光荣"，为了表现出"大和族"的优势和"八弘一宇"的武士道精神，不成功、便成仁。于是给每人发了一瓶毒药——氰酸加里，以备在遇到苏军和东北抗日联军时，立即服毒自尽。士兵东条明一下子就把剧毒药喝了下去，两眼僵直，顷刻毙命。那一边冈崎幸夫拉响了手榴弹，马上粉身碎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武士道精神被他们表演得淋漓尽致。

50年后6月的一天，从日本国静冈来了一位老人，他曾是673支队的少年兵，在重游旧地的时候，看到了眼前的残迹，泪水夺眶而出。他披露了673支队潜逃前的一次集体自杀，士兵站成两排，前面的机枪一响，人群一倒，把他幼小的身躯压在下面，才得以逃生。

第二节　海拉尔支队

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是规模较大的支队，1940年12月建成，对外称"防疫给水班"。支队设在海拉尔伊敏河东岸的东南山下（今奋斗镇辖区）。东部是丘陵台地，海拔668米，比高约40米，坡度约10度，台地上是戒备森严的海拉尔要塞四地区（东南山阵地）。山上有钢筋混凝土永备火力点和碉堡及防坦克壕等，南部是226部队营房，北部是汽车运输联队，东北是飞机场，西部是海拉尔滨洲铁路线至伊敏河放排贮木场的铁路专用线和菜地。营舍占地南北长1公里，东西宽1.5公里，面积1.5平方公里。四周有铁刺线围圈，其内还有1.5米高的土围墙，墙上有近一米高的铁刺线。门设在西侧，设有卫兵室，营舍内建筑均为青砖青瓦，有兵舍、动物舍、饲料库、材料库、汽车库、教室、锅炉房、浴池、小卖部、卫生所、食堂、跳蚤室、菌苗地下仓库等，共有房舍300余间。

731部队海拉尔543支队平面图



海拉尔支队有日本研究人员226人，他们身着日本军服，但不戴军衔，对外称"日本军属"。首任支队长清水富士夫，继任藤井莫太郎、蓬田正二、伊藤加明、天野勇，末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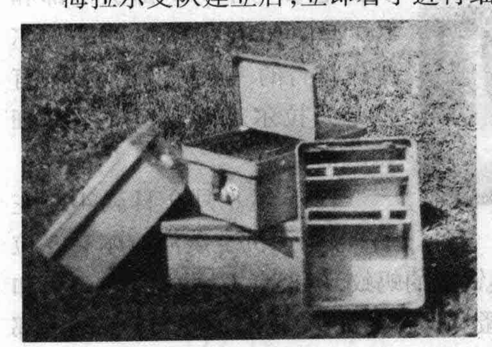
支队长为加藤恒则。支队内设总务课(计划、经理、庶务)、第一课(培养老鼠和跳蚤)、第二课(细菌研究)、资材课(器材保管供应)和教育课(业务教育培训)。

海拉尔支队守卫森严,其他军营中国菜农可赶马车入内至门卫房送菜,唯有这个"单位"不用菜农送菜;这个支队的人员除有业务联系者外,不许与其他军方和社会人员接触,否则要受到严厉制裁;购物、医疗、文体活动均在支队营区内进行。

在海拉尔支队建立前,石井四郎曾于1938年3月下旬亲临海拉尔视察,对进行细菌武器及细菌战问题做了重要指示,并为海拉尔陆军医院增设了大型设备,以加强细菌研究工作。对此,1954年8月21日,在沈阳对日本战犯审讯时竹内丰的供词说:

1938年3月,我被调到内蒙古海拉尔市海拉尔陆军医院,任军医中尉。3月下旬,在海拉尔市入舟饭店,听过细菌战犯石井四郎对全体军医的讲话。他说:"日苏战争只是时间问题,迟早是免不了的。现代化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细菌武器,日本对细菌战是有把握的,你们身为军医,就得在平时提高自己的业务,学习新的科学知识,一旦战争爆发,马上就能用上"。石井四郎为了加强细菌研究工作,大量制造细菌,曾亲自与关东军军医部长梶塚隆二中将联系,在海拉尔陆军医院增设了大型孵卵器3个、大型干热灭菌器2个、病源检索器2个、显微镜2架及病理实验设备,建筑上也扩大了两倍。①

海拉尔支队建立后,立即着手进行细菌研究和实验。


细菌培养基箱

海拉尔支队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繁殖致命细菌的传染媒介物——跳蚤,除支队本身用于实验外,还要按731本部下达的指标上交。于是,支队投放大量的人力去专门研究和繁殖它。由第一部专门负责培殖跳蚤,设置了专用的地下跳蚤培养室。1945年5月,战场吃紧,石井四郎向各支队下达了大量繁殖跳蚤的任务。于是,6月海拉尔支队派2名专业人员去哈尔滨731部队本部受训,接着又有3人前去参加培训班。7月又派数人专程去哈尔滨取回相当数量的"母本"跳蚤。由于没有现代化设备和培育器具不足,他们就把近百个洗涮干净的空汽油桶摆放在培养室里,把切得很碎的干草放在空汽油桶里,然后将喂得很肥的老鼠固定在桶底上,再把跳蚤放进里边。闻到动物热量的跳蚤飞快地扑到老鼠身上,吸吮其鲜血,由此跳蚤不断繁殖。待到把老鼠吮食成一个骨架或者吸死后,铁桶里就有20~30万只跳蚤了。1945年7月至8月初,海拉尔支队就两次派专人将10多公斤跳蚤送到哈尔滨731部队本部。这些跳蚤染上疫病菌,就成了细菌武器。如果使用鼠疫、霍乱、伤寒菌,500公斤就可使17万平方公里,即相当于东北三分之一以上的地区染上鼠疫、霍乱、伤寒,将会使数千万军人丧失战斗力,数十万居民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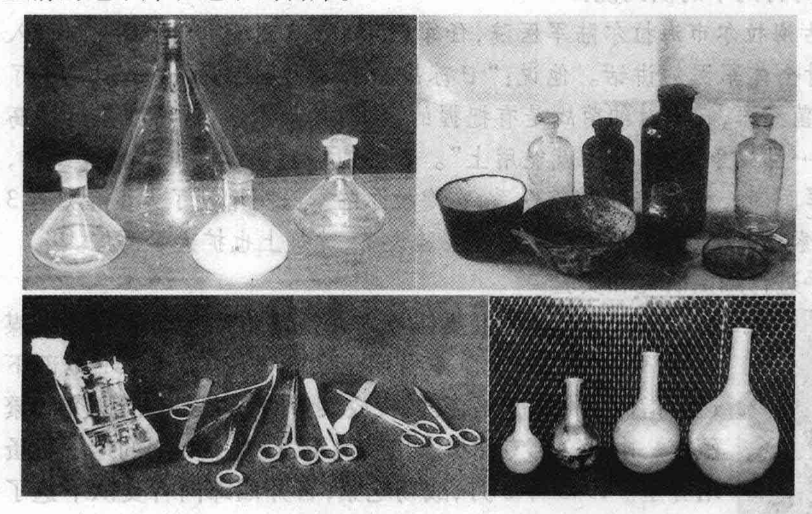

动物饲养笼

海拉尔支队的主要任务之二是饲养各类动物,他们配置了动物室,由十几个人负责动物饲养,修建了各类动物房舍。这些动物一是本支队用于细菌实验,二是供给731部队本部使用。支队养的动物有10匹马,还有羊、猪、兔、苏雀、鸽子和老鼠数千只。对于731部队来说,老鼠是最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172~173页,中华书局,1989年。

有用的动物，它既可以培殖用于传染鼠疫的跳蚤，又可做细菌实验的先行“牺牲品”。同时用它的血还能培养细菌。所以，海拉尔支队便把培殖鼠类当作主要工作来做。有专门培殖老鼠的房舍，在里面分排、分层摆放老鼠笼子。一个个用粗铁丝编制的一尺见方的小笼子，底层有铁皮包着的抽屉。抽屉分前后两格，前边放饲料，后边放草做鼠窝。每个小笼子里放着雌雄两只老鼠，每排有30个小笼子，有七八层高。

海拉尔支队的主要任务之三是根据731部队本部的指示，培殖伤寒菌、副伤寒菌、赤痢菌和结核菌，配备了专业人员和数台蒸煮营养液的锅炉以及其他必需的设备。支队内还设有储存菌苗和疫苗、血清的地下库和地下饲料库。



细菌试验器皿和手术工具

海拉尔支队教育部经常对各类专业人员进行培训。在教室里常有穿白色工作服的日本军医们给队员讲课，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

除上述业务活动外，海拉尔支队还参与了731部队本部和100部队、516部队在呼伦贝尔地区进行的一系列实验活动，有的是海拉尔支队自身实施的细菌战活动。

1945年8月9日晨4时左右，苏军飞机空袭海拉尔。海拉尔支队的官兵们知道苏军已开始进攻，大势已去，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窜来窜去，满院子吵嚷声和谩骂声连成一片。一笼笼捕捉和饲养的老鼠、支队培殖的跳蚤和保存的细菌，正准备按731部队本部的命令启运哈尔滨，看来已办不到。9日晚，按731部队本部的命令，将支队饲养的所有动物、贮存的细菌、营房、动物舍、实验设备、各种文件资料、细菌实验数据档案等，全部焚烧。支队的队员拎着装满汽油的铁桶，泼到动物的身上，再引火点燃。顿时动物舍火光四起，浓烟滚滚。各种动物被烧得乱叫，空气中散发着烧焦的马、羊、猪等动物的糊臭味。大火整整烧了一夜。其他各部队也在按命令放火烧营房和设施，做着进入阵地进行抵抗或撤退的准备。关押在第十军管区军法处监狱里准备用做细菌实验的10名苏联人，抢在海拉尔支队派人前来枪杀他们之前，从浓烟烈火中冲出去，摆脱了被杀死的厄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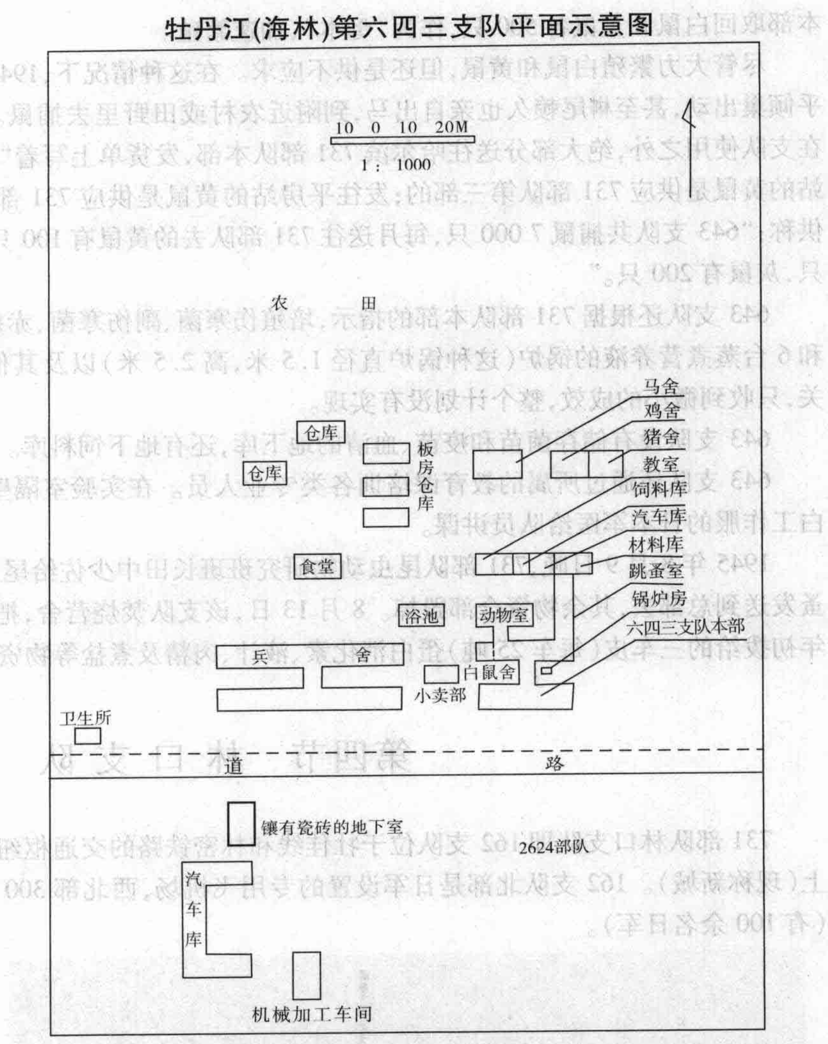
8月10日凌晨，海拉尔支队官兵分乘八辆汽车向大兴安岭方向逃去。一路上走走停停，不时与穿插迂回作战的苏军交火，有的战死，有的被俘。

第三节　牡丹江支队

731部队所属的牡丹江支队（即643支队，也称海林支队），归第三军，位于海林镇北5华里的后腰屯（现在的福利屯）。以一条南北道为界，西半部是中国居民，东半部是643支队的营区。营区占地28万平方米，长方形的四周围有铁刺线。营舍占据地盘不大，大部分土地为农田。从海林车站延伸过来的铁路专用线，从该支队营区通过，一直进到斗银沟的另一个日军医院和仓库。

643支队规模略小，但机构比较健全，曾设有总务课、第一课、第二课、经理课、资材课和教育课。其人员配备只有200名左右，始终没有达到关东军作战命令的要求。支队长为池井贞夫、尾上正男少佐。

牡丹江(海林)第六四三支队平面示意图



这里有中国劳工30名,他们受到日本统治者的严格管制和残酷的虐待。

繁殖致命细菌的传染媒介物——跳蚤,是这个支队的首要任务。于是,他们投放大量的人力去专门研究和繁殖它。由第一课课长中村兼管的专门培殖跳蚤的分部,设置了专用的地下跳蚤培养室。由于没有现代设备,采取了用空汽油桶代作跳蚤培育器的办法,经过多次实验获得成功。1945年5月,石井四郎向各支队下达了大批繁殖跳蚤的任务。于是,643支队于同年6月派两名专业人员到哈尔滨731部队本部接受培训,接着又派3人参加731部队本部举办的培训班。然后,立即投入了大批繁殖跳蚤的准备活动。为加速跳蚤繁殖的进度,7月,又由一名准尉带领6人专程到哈尔滨731部队本部,取回相当数量的"母本"跳蚤。由于培育器不足,经军事团批准,从牡丹江市内的军事仓库领回200个空汽油桶。在此期间培养出的跳蚤,都按规定数目上交了哈尔滨731部队本部。从7月末到8月9日,又由铃木带队先后两次专程把25公斤的跳蚤送到哈尔滨。

643支队另一项重要任务是饲养各类动物。这里的动物有:马4匹、羊3只、兔和江豚各30只左右、鸡50只、猪8头、鼠1 000余只。饲养这些动物都是为了抽血。他们配置了动物室,有岛崎、小林甲及士兵井上等10多名日本人在内工作。由该支队经理课课长榊尾赖久兼动物室的主任。在这里有两名中国劳工,一个叫李宝昌,另一个姓裴。开始,动物较少时,由他们去喂养。后来,由于动物增多,鼠类由日本人岛崎和小林甲雇员以及士兵井上专门饲养,中国劳工只负责喂养其他动物。


643支队遗址

1943年,北野政次部队长命令这个支队注重对白鼠和黄鼠的繁殖。为此,他们组织了两个饲养鼠类专业队,每个专业队配置5人,分别培殖白鼠和黄鼠,并派人到731部队

本部取回白鼠和黄鼠各500只,作为"母本",加速繁殖。

尽管大力繁殖白鼠和黄鼠,但还是供不应求。在这种情况下,1945年6、7月间,全支队的人员几乎倾巢出动,甚至榊尾赖久也亲自出马,到附近农村或田野里去捕鼠。捕来的大量黄鼠,除了部分留在支队使用之外,绝大部分送往哈尔滨731部队本部,发货单上写着"滨江站"或"平房站",发往滨江站的黄鼠是供应731部队第三部的;发往平房站的黄鼠是供应731部队本部的。尾上正男在法庭上供称:"643支队共捕鼠7 000只,每月送往731部队去的黄鼠有100只到150只,家鼠有150只到200只,灰鼠有200只。"

643支队还根据731部队本部的指示,培殖伤寒菌、副伤寒菌、赤痢菌和结核菌,配备了专业人员和6台蒸煮营养液的锅炉(这种锅炉直径1.5米,高2.5米)以及其他所必需的设备,但因技术没过关,只收到微小的成效,整个计划没有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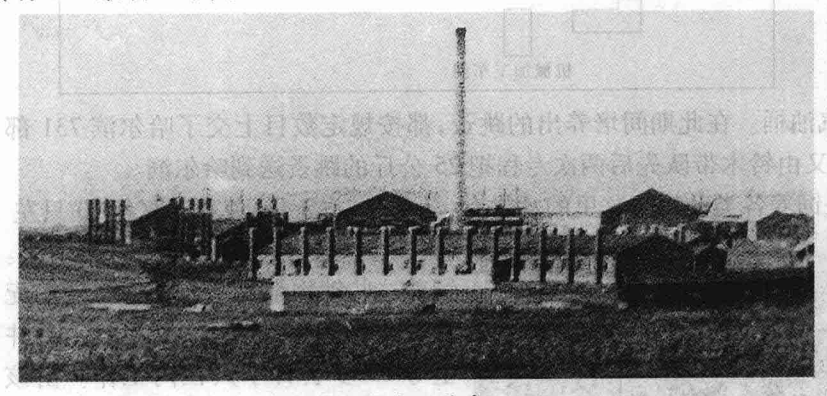
643支队设有储存菌苗和疫苗、血清的地下库,还有地下饲料库。

643支队还通过所属的教育课培训各类专业人员。在实验室隔壁的一个较大的房间里,常有穿白工作服的日本军医给队员讲课。

1945年8月9日晚,731部队昆虫动物研究班班长田中少佐给尾上正男支队长打电话,要求把跳蚤发送到总部去,其余物资全部毁掉。8月13日,该支队焚烧营舍,把尚未运走的跳蚤及北野政次于年初拨给的三车皮(每车25吨)蛋白消化素、液汁、肉精及煮盐等物资一并烧毁。

第四节　林口支队

731部队林口支队即162支队位于牡佳线和林密铁路的交通枢纽林口镇与古城镇之间的东岗梁上(现称新城)。162支队北部是日军设置的专用飞机场,西北部300米处是保卫162支队的警备队(有100余名日军)。



162支队营房

162支队占地面积大约1平方公里,四周都围着铁刺线,南正门设有卫兵所。从正门进去绕过圆形花包,北行不远便是支队的本部办公室;西北处有长200米、宽8米的砖瓦结构的实验室,实验室下面还有地下室;实验室的北侧是动物室;在本部的东南处有半卧式圆顶水泥建筑物,由于山顶上无水源,在西北坡下乌斯浑河畔设有抽水泵房,在这里抽取河水供实验、人和畜食用。支队长榊原秀夫少佐住在林口北山日军官邸,并经常乘坐专用小汽车来支队和林口北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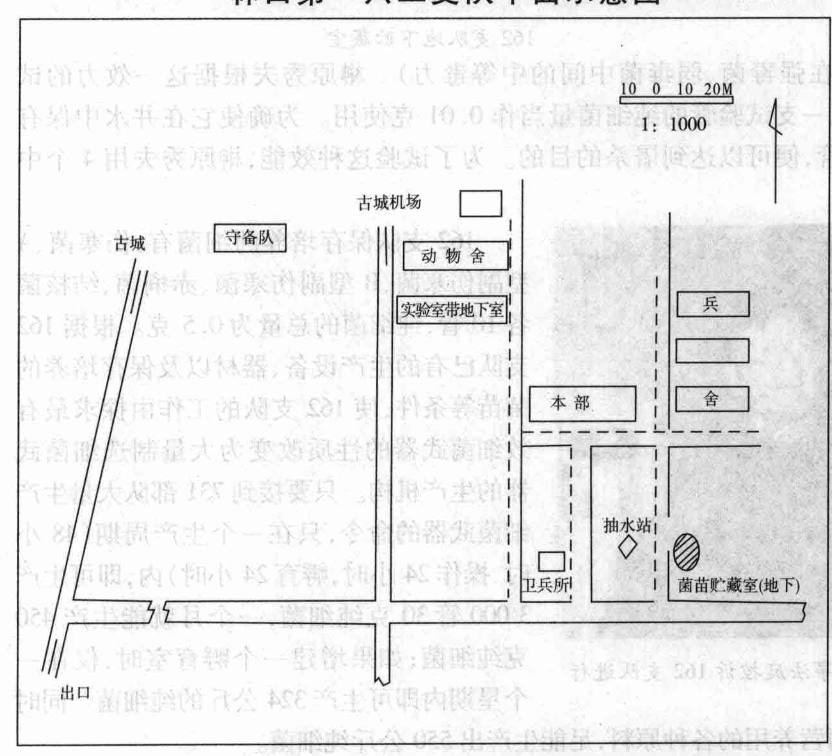
162支队的编制人员是280名,其中有中国人十五、六名,朝鲜人1名;有3名军医、1名司药官、1名军需官和5名将佐级军官以及60名军佐。由总务、第一、第二、资材、教育等五个课组成。总务课的课长由细矢少佐担任,主要任务是传达部队命令及掌管支队人事、经费事项;第一课的课长由细矢少佐兼任,课副是渡边中尉,任务是保存培养细菌、检查细菌及一般的防疫工作;第二课的课长是间所少尉,主要是部队给水及修理滤水器;资材课的课长由间所少尉兼任,主要是保管、清理各种卫生材料、生产材料以及饲养动物、培养跳蚤等;教育课的课长由渡边中尉兼任,主要任务是培养训练有关细菌战所需的人员。162支队是731部队所辖四个支队中最大的一个支队。

162支队用于大量生产细菌武器的器材有口径一公尺半，长达两公尺的大型高压蒸汽灭菌锅炉五具（是做蒸煮细菌营养液用的，根据731部队的命令，1945年7月，将其中的一具运到朝鲜江界第731部队预定撤退的地点）。小型高压蒸汽灭菌锅炉1具，小型蒸汽灭菌器2具，干热灭菌器3具，大型孵育器3具，显微镜35台，天平10台，远心沉降器3具，氢电子浓度测定器1个，白金条100只，酒精灯80个，还有若干生产细菌用的玻璃器具，还设有培养室、镜检室、消毒室等。



162支队营房

林口第一六二支队平面示意图



生产细菌用的材料有60吨，即蛋白消化素10吨、肉精10吨、液汁30吨、盐3吨、棉花2吨。

饲养的白鼠6 000只、豚鼠100只、兔子25只、马2匹、跳蚤1公斤。

另外，还有为准备战时用的防疫医疗箱2套（每套33包）。还有蛋白消化素0.8吨，压榨干燥肉精0.7吨，液汁2.3吨，食盐0.3吨。

162支队准备进行细菌战活动的主要任务是培殖跳蚤和各类动物。在动物室东面的一个大房间饲养着从日本运来的白鼠2 000余只，由日本人亲自饲养，此外，还让当地老百姓抓老鼠，一家发一个或两个笼子，每天由日本兵自己去取。这个部队的兵有时也自己到野外去抓，但外出捕鼠时，不准提部队的名称，要穿着便服让人看不出是哪个部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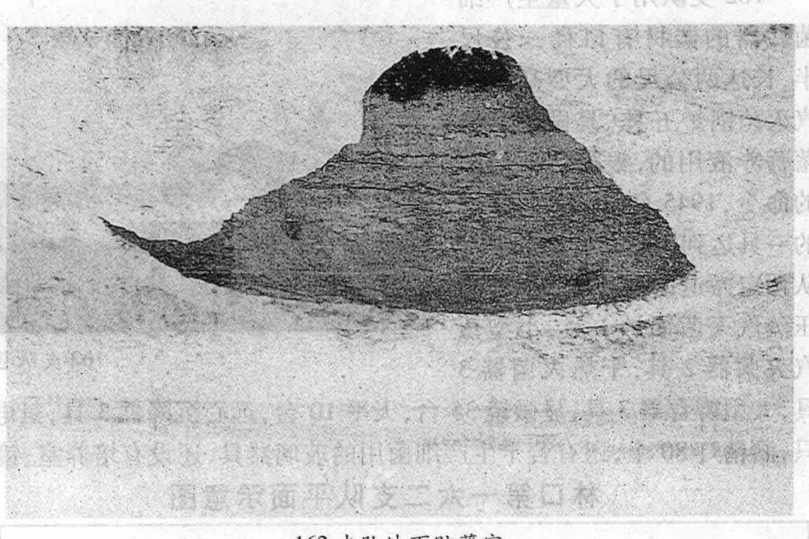
有一位叫张清林的中国人和4个日本兵长期喂老鼠，其他喂老鼠的人则是轮流的，每次约20多人，他们是一个月换一次。西面的一个房间装有本地的各种鼠类，由1名日本兵领着4名中国劳工进行饲养。在其余各房间内，饲养着兔子四五十只。江猪七八十只（也称荷兰猪），还有12条狗。

该支队也很重视跳蚤培养工作。为加速培养跳蚤，当时，根据哈尔滨731部队本部的命令，派细矢少佐到本部领来1公斤母本跳蚤，由有经验的细矢少佐及4名军佐负责进行培养。每隔一个星期，榊原秀夫带领日本研究人员到动物舍给动物抽血，有时在地下室内宰杀当地鼠取血。

当时的162支队已经存有培养细菌用的大批原料，其数量足够生产500公斤以上的细菌，而在良好的条件下，这个产量可能达到1 000公斤。从所培养的细菌的致病性能来看，这个产量是十分巨大的。该支队已经有了大批的石井式培养器和其他大规模生产细菌所需要的设备，利用这些原料每月

可以生产1.5公斤以上的细菌。

从1945年1月起,支队长榊原秀夫命令细矢少佐(1944年12月从731部队第四部调林口支队)领导第一课进行细菌的生产。1945年1~4月,生产了100支试验管的霍乱菌,250支试验管的伤寒菌,200支A型副伤寒菌。同年5~6月,生产了100支霍乱菌,120支伤寒菌,100支A型副伤寒菌。经过731部队第一课毒力检验班的检验,162支队培养着的伤寒菌、A型副伤寒菌都合乎731部队第一课保存菌中的标准毒力(在强毒菌、弱毒菌中间的中等毒力)。榊原秀夫根据这一效力的试验,计划在向水泥撒毒时,可以把一支试验管的纯细菌量当作0.01克使用。为确使它在井水中保有效力,在井水里放入一两个试验管,便可以达到屠杀的目的。为了试验这种效能,榊原秀夫用4个中国人做了试验,致使他们死亡。



162支队地下贮藏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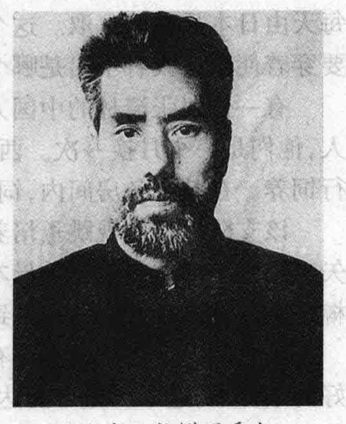


证人张清林1956年在沈阳军事法庭控诉162支队进行细菌实验的罪行

162支队保存培养的细菌有:伤寒菌、A型副伤寒菌、B型副伤寒菌、赤痢菌、结核菌各10管,纯细菌的总量为0.5克。根据162支队已有的生产设备、器材以及保存培养的菌苗等条件,使162支队的工作由探求最有效细菌武器的性质改变为大量制选细菌武器的生产机构。只要接到731部队大量生产细菌武器的命令,只在一个生产周期(48小时,操作24小时,孵育24小时)内,即可生产3 000管30克纯细菌,一个月就能生产450克纯细菌;如果增建一个孵育室时,仅在一个星期内即可生产324公斤的纯细菌。同时支队里已保存了60吨为制造细菌营养用的各种原料,足能生产出550公斤纯细菌。

1945年3月,榊原秀夫命渡边中尉为教官,森军曹、管军曹、沟渊伍长为助教,以进行细菌战所必需的知识和技术为重点,对70名新兵进行细菌培养法、细菌检查法、传染病的知识和一般卫生常识的教育。6月,大部分配在林口第162支队的第一课和第二课进行实际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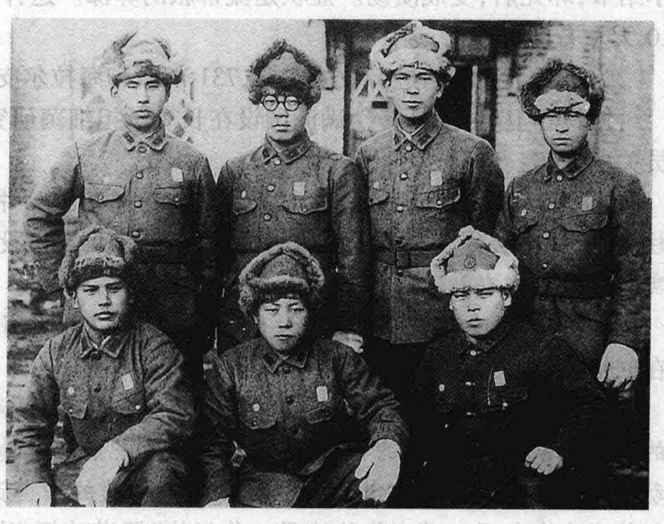
1945年8月9日,162支队得知日苏开战的消息后,将支队保存的菌苗、动物,派人送交731部队本部,并带领200名左右的队员、50辆汽车、两套防疫医疗箱赶往牡丹江。其中有小型蒸气灭菌器工具,干热灭菌器3具、小型孵卵器3具、培养盘1 000个、试验管1 000支、蛋白消化素0.8吨、压缩肉或肉汁0.7吨、"寒天"2吨、食盐0.3吨、共计66包(此2套是备战用的)。另外还有显微镜80台、小型蒸汽灭菌锅1个、小型蒸汽灭菌器2具、小型孵卵器3具、石井式培养器1 000个、蛋白消化素3吨、



162支队长榊原秀夫

“寒天”5吨，肉（压缩肉或肉汁）3吨、食盐0.7吨、滤水器（乙、丙、丁、戊型各10具）以及粮食、子弹等。

携带的细菌种类和数量：保存培养霍乱菌的试验管5支、伤寒试验管4支、A型副伤寒菌试验管4支、B型副伤寒菌试验管细菌——霍乱菌试验管1 000支、伤寒菌试验管120支、A型副伤寒菌试验管100支、6月生产的霍乱菌培养盘100个。这是榊原秀夫准备继续进行细菌战而携带的必需的器材和细菌。



162支队队员

榊原秀夫命令留下25名队员，将其余的设备、器材包括文件资料、贵重仪器等堆上稻草，浇上了汽油，全部进行烧毁。并把部队的房舍全部点火烧光。

榊原秀夫率队退向牡丹江途中，遇苏军进攻，在七星附近将汽车、医疗箱和细菌全部烧毁。在桦林162支队人员多数战死，榊原秀夫被俘。

第三章　要塞区细菌战

第一节　海拉尔要塞区细菌战

一、以人和动物为材料的实验活动

731部队海拉尔支队组建后，便利用该地区的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的优势，成为细菌战实验的急先锋，颇受731部队本部和石井四郎本人的赏识，石井四郎和其他将校军官多次来海拉尔视察。

1939年初，731部队已培养出了成吨的各类传染病菌，这些病原菌主要有：

1. 鼠疫杆菌：主要培养在跳蚤身上，这些跳蚤因饥饿就要吸血，一旦人被跳蚤叮咬，细菌进入人的血液，立即能蔓延传染。一般症状是发高烧的同时发冷打战，恶心呕吐，眼睛结膜充血，步行困难，语音涩滞，浑身无力，如同醉酒。随之淋巴腺逐渐发肿，全身火烧，以致皮肤干巴巴地发僵，引起腺周围组织炎，常因皮下出血以致皮肤变成黑紫色（也称黑死病）。患者5~7天即能死去。在菌量多或菌力非常强的时候，能在细菌侵入血液前引起毒血症而死亡。鼠疫菌还可以通过空气传入人的呼吸器官，引起大范围的疫病流行。

2. 霍乱弧菌：能引起急性肠道传染病。症状是腹泻、呕吐（上吐下泻），大便很稀像淘米的泔水，四肢痉挛冰冷，出现休克。患者因脱水而眼窝凹陷，手指、脚趾干瘪，3~5天内即可死亡。

3. 斑疹伤寒菌：是寒带病的一种，也称“战争伤寒”，几乎是战时必然发生的一种传染病，为急性肠道传染病，病原体是伤寒杆菌。症状是体温逐渐升高，持续在39~40度，脉搏缓慢，脾脏肿大，白血球减少，腹部可能有玫瑰色疹出现，也称肠伤寒。这种传染病对战争胜负有很大影响，是由战场上的跳蚤和虱子做媒介传染的。

4. 炭疽菌：炭疽是一种急性传染病。马、牛、羊等家畜和人都能感染，病原体是炭疽杆菌，水肿或痈，也能侵入肺或胃肠。人极易在枪、炮弹造成的创伤上感染，伤口小又不干净的情况下最易发生。发病时伤口周围红肿，体温急剧上升，引起肌肉坏疽并产生炭气。潜伏期5~6小时后死亡。

5. 鼻疽菌：主要是使马患的一种慢性传染病。病原体是鼻疽杆菌。在内脏、鼻腔黏膜和皮下形成小结节，坏死后，变成溃疡。症状是流带脓的鼻涕。这种病菌也危害骡、驴、牛等家畜，并能使人感染。10天左右即可死亡。

为了对上述细菌进行效能实验，731部队和海拉尔支队进行了大量的以活人为材料的实验。

据长春卫生技术厂（伪满洲国设在长春承担细菌研究任务的"大陆科学院"的下属单位）工作人员关孝证实：

"原731部队队员松村，在与他的朋友岛崎的谈话中透露，731部队在海拉尔一带把活人绑在大柱子上，把小动物装在很坚固的小铁笼里，然后从空中投下细菌炸弹，进行细菌传染实验。他参与了实验效果的调查和采样活动。"①

和野是1941年3月加入731部队的卫生兵，在平房本部工作不久便调至海拉尔第543支队。他在回忆调到海拉尔支队以后的情况时说：

我在石井部队平房本部仅工作了几个月，便调到了海拉尔支部。一年前，号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731部队，出于战略的需要，分别在东满和北满边境地带密设了4个支部，不久日本陆军大本营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而今由于战势紧张，731部队的细菌试验活动也更加频繁了。我刚一到海拉尔支部就奉命参加了细菌实战的演习。他们的"阴谋破坏班"多次秘密地潜入蒙古人部落，在居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将霍乱菌、伤寒菌投入水井等饮用水源地。在事先和事后，我要两次去水源地取回水样，进行水质检查。这种事我干了好多次，实质就是检验细菌野外试验的效果。

海拉尔支部的任务和其他支部一样，就是繁殖备用的实验动物和细菌传染媒介物，同时配合731部队本部的专业人员进行疫情调查以及细菌传染的野外试验，后期还担负分散生产各种传染病菌的任务。我去海拉尔支部的第二年，那细菌生产的设备、原材料等都从平房本部运来了，同时还把专业人员送到本部去培训，有时支部也组织些短期的专业人员培训。②

山本明司原在731部队海拉尔543支队任职，给支队长加藤恒则军医少佐当秘书。日本战败时，他和加藤恒则等人均被苏军俘虏，在西伯利亚度过了几年战俘生活。回国后，他和中平松鹤先生联络130名原队员，组成了海拉尔队友会，每年举行例会。

山本明司先生回忆说：

1944年2月，我加入731部队不久，就调到海拉尔支队去了。因为部队对外称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海拉尔支部，所以它给我的印象是军队防疫给水部队。这样，看到那里培殖老鼠、跳蚤一类动物，加上到处捕鼠一些事情，也就不以为奇了。可是，到了下半年，从平房本部运来了大型灭菌锅炉、细菌培养箱以及60吨生产细菌的各种材料，才知道731部队的真正意图。当时德国对苏战争得势，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告急，关东军改变了"南防北进"为"南进北防"的策略。于是731部队按照陆军大本营的命令，要求迅速把海拉尔、孙吴、海林和林口支队变成细菌生产基地分支，如果战争需要，可直接对苏进行细菌攻击。一旦平房本部或某一支队遭到破坏，也不会影响战势大局。海拉尔支队在原有培殖实验动物、细菌传染媒介物的基础上，增加细菌生产任务，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山本明司发现海拉尔支队在野外用活人做试验的秘密，是他担任支队长秘书的时候。山本明司先生回忆说：

加藤支队长起草的文件，都经过我抄写并按照文件处理程序上呈下达的。有一天，他将一篇要在什么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让我抄写，我一看，是鼠疫跳蚤实验的报告。那是不久前，支队在附近的村屯组织一次鼠疫传染与防护的演习，结果是一次检验鼠疫跳蚤的效能试验。由此可见，海拉尔支队和整个731部队一样，表面上都以防疫为目标，而秘密地进行细菌武器的实战研究。

① 长春市公安局存敌伪档案。

② 韩晓、金成民编著：《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行见证》，第52～5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2001年3月8日的《哈尔滨日报》第3版报道了金成民等人在日本跨国取证时，731部队543支队老兵森冈宽介提供的证词。



原海拉尔543支队队员森冈宽介在接受取证。左为取证团成员“731”研究所所长金成民

作为侵华日军731部队海拉尔支队一名军官，因为在防疫室和解剖室工作，接触并掌握了有关731部队的核心内容，并直接参与了细菌培养和人体解剖实验。在长达两个小时的自述中，他首次向世人披露，海拉尔支队曾挖掘中国百姓尸体进行解剖实验，同时还进行过细菌培养。但涉及具体情况，森冈宽介仍保持沉默。

以下为原海拉尔543支队队员森冈宽介确认的证词：

我是1942年参军的。最早入队是在哈尔滨平房区，在那里受训了5个月。在这5个月当中，我首先受到了卫生教育的训练，培训结束以后，我被分到了海拉尔，成为731部队海拉尔支队的队员。无论是我们这里，还是孙吴支队，所有的队员都是在哈尔滨731部队受训后才分到各地的。在我印象中，林口、孙吴、牡丹江等地都有731部队分部。

长官告诉我们，731部队海拉尔支队就是为哈尔滨731部队服务的。海拉尔防疫给水部队分三个部分，即防疫部、给水部、总务部，在这里我又接受了一次卫生训练和治疗训练、细菌培养训练和传染病预防训练。我在防疫部当伍长。在那里，我学习了有关细菌、各种传染病菌方面的研究方法，并直接参与了伤寒、赤痢、鼠疫、霍乱、普通霍乱菌等细菌的培养和研究工作。我每天负责把病菌放在器皿中观察。

森冈宽介在现场画了肠杆菌和赤痢菌的图片，画出了工作房间的情况。在他画的图当中，有检疫室、动物饲养室，旁边是防疫室。他们在这里完成培养后，就把带菌的动物送到哈尔滨731部队。

我们首先在跳蚤身上培养细菌，后来在老鼠身上做细菌培养。老鼠不够用时，我们就四处征集老鼠。我记得我们部队曾用钱在孙吴买过老鼠。我还记得海拉尔给水部队曾发动整个支队和附近部队的队员在全地区范围内捕捉老鼠，这些都送给了哈尔滨的731部队。

我以前从未对别人说过，海拉尔支队曾挖掘中国百姓的尸体进行解剖试验，把我们需要的脏器掏出来，再把尸体躯壳扔回坟墓。我还记得，1945年，一名叫伊豆加明的军医在731部队海拉尔支队防疫室做过人体解剖试验。供我们用作试验的是宪兵抓到的“间谍”。这个用做试验的人被伊豆军医用刀从脖颈一直剖到腹部，我们就负责往外拿所需要的内脏。

在我们的部队里有一个最高的烟囱，能有30多米高，那里是焚尸炉，专门用来消灭尸体。此外，还有埋尸体的地方。

我清楚地记得：1945年8月10日我们战败了，这一天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苏联红军打进来之后，按照上面的指令，我带领部队的几个队员把当时培养细菌的全部器具扔到了兵舍附近的沼泽地里。

二、在辉河一带进行的细菌实验活动

海拉尔支队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以鄂温克人和蒙古人为主要对象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细菌实验。其实验手段五花八门，仅细菌的传染实验就有四五种，通常使用的是“菌液注射”和“菌液内服法”。他们对实验对象采取诱骗和强制相结合的手段。

在进行细菌液注射实验时，他们说是给打“预防针”；菌液内服实验的方法是偷偷把鼠疫菌、霍乱

菌、伤寒菌、赤痢菌掺入牛奶和水里，或者把各种菌液注入瓜果、面食内。实验证明，霍乱、肠伤寒等胃肠道传染病菌致人死亡效果明显，死亡率高，人在不治疗的情况下3～7天即可死亡。



幸存者哈勒珠

因为当时索伦旗（今鄂温克族自治旗）距海拉尔较近，加之有鄂温克族、厄鲁特蒙古族、布里亚特蒙古族等多种民族成分，所以遭灾最重，成了海拉尔支队的细菌战实验场。

海拉尔以南150公里的南辉和北辉苏木，是鄂温克族牧民的聚居区。

1941年春天，日本特务上牧濑三郎带着一些警察在南辉苏木将布拉尔嘎查（村）反抗日本人统治的牧民马赛尔、鲁温泰、胡利抓到海拉尔兴安北省警务厅的监狱里，关押了一年多。马赛尔和鲁温泰在严刑拷打和非人折磨下相继死亡。海拉尔支队派人到监狱以打“防疫针”为名，给胡利注射了菌液，并让他吃了放进细菌的面包和奶茶，然后把他放回家乡。

1942年初夏，胡利回到辉河白音敖拉。一年多监狱里的非人折磨已使他神经不正常。他上身不穿衣服，只穿一条破裤子，到处乱走，谁家都进，这样把疫病传染给了鄂温克族牧民们。许多人家同时发病，病人个个发高烧打冷战，上吐下泻，四肢痉挛，昏迷不醒。得病3～5天便开始死亡，牧民们称这种病为“哈伦病”（即“热病”，发高烧之意）。牧民洛坨一家人全死亡。桑布、班加日钦、乌力吉、额杰顺、嘎哈顺、哈勒珠等人家只剩下一个孤儿，其余亲人全都死亡。其中乌力吉家有7个孩子，父母和6个孩子全死亡，只剩下一个孩子；哈勒珠一家五口死了奶奶、父亲、母亲和哥哥，他若不是被及时送到喇嘛医旺吉德（藏族）处治疗，也活不成了。当时传染病从南向北蔓延，在额莫勒图、敖拉给勒、哈库木、乌兰布拉格、喜桂图、白音敖拉直至查干阿木吉都有人患病，家家都有人死。牧民们迅速将疫情上报伪索伦旗公署和伪兴安北省公署，要求给予防治。但日本人根本不到辉河去，并别有用心地说，这是一种汉族人常发的病症，没有灵丹妙药，就是“天神”也无能为力。鄂温克族牧民在这次细菌实验中共死亡80多人，其中杜拉尔姓就死了30余人。

1944年7月，海拉尔支队又在辉河一带进行了细菌实验，南辉和北辉到处蔓延着传染病，比上一年的疫病来势更猛，规模更大，死人更多。至9月末，共死亡240多人。

南辉和北辉苏木因海拉尔支队进行细菌实验两次就死亡320多人，南辉死人最多，苏木所在地哈和木南15里处的伊万那日斯的沙坨子里，是埋葬死人较多的地方。1945年4月，人们看到，春风刮过，沙坨子里露出了一层层白骨，令人不寒而栗。

1942～1944年辉河地区日军进行细菌实验死亡人员名录

被害人姓名	年龄	性别	民族	遗属姓名	与被害人关系	住址	被害人姓名	年龄	性别	民族	遗属姓名	与被害人关系	住址
花拉	47	女	鄂温克	谢拉	母亲	辉道村	额吉松	40	男	鄂温克	巴音其木格	大爷	辉道村
扎来	21	女	鄂温克	谢拉	婶婶	辉道村	孟格	36	男	鄂温克	巴音其木格	大爷	辉道村
其其格	2	女	鄂温克	谢拉	侄女	辉道村	乌日吉玛	20	女	鄂温克	吉日嘎拉	奶奶	辉道村
斯皮勒	10	女	鄂温克	谢拉	妹妹	辉道村	格德日	26	男	鄂温克	吉日嘎拉	爷爷	辉道村
汉德玛	65	女	鄂温克	谢拉	奶奶	辉道村	格乐塔	2	女	鄂温克	吉日嘎拉	姑姑	辉道村
浩日嘎	34	男	鄂温克	谢拉	叔叔	辉道村	干哈松	30	男	鄂温克	巴图孟和	父亲	辉道村

被害人姓名	年龄	性别	民族	遗属姓名	与被害人关系	住址	被害人姓名	年龄	性别	民族	遗属姓名	与被害人关系	住址
班迪	41	男	鄂温克	哈勒珠	父亲	哈库莫村	玛吉嘎	30	女	鄂温克	巴图孟和	父亲	辉道村
敖波日	38	女	鄂温克	哈勒珠	母亲	哈库莫村	乌力吉	45	男	鄂温克	占布拉	父亲	辉道村
额尔和木	14	男	鄂温克	哈勒珠	兄	哈库莫村	格日乐玛	46	女	鄂温克	占布拉	母亲	辉道村
阿杰	66	女	鄂温克	哈勒珠	奶奶	哈库莫村	斯色日	9	女	鄂温克	吉日嘎拉	妹妹	辉道村
班吉日格其	36	男	鄂温克	利希尔	父亲	喜桂图村	宝丁	6	男	鄂温克	吉日嘎拉	弟弟	辉道村
格日乐	32	女	鄂温克	利希尔	母亲	喜桂图村	宝桑	5	男	鄂温克	吉日嘎拉	弟弟	辉道村
呼杰	31	女	鄂温克	宝力图	母亲	喜桂图村	工林	47	男	鄂温克	斯仁巴图	爷爷	哈库莫村
拉特尔	39	男	鄂温克	巴敖登高娃	爷爷	辉道村	宝力嘎	35	男	鄂温克	斯仁巴图	爷爷	哈库莫村
苏米尔	36	男	鄂温克	巴敖登高娃	奶奶	辉道村	玛吉格玛	32	女	鄂温克	斯仁巴图	奶奶	哈库莫村
孟和	5	男	鄂温克	巴敖登高娃	叔叔	辉道村	希希布	20	女	鄂温克	斯仁巴图	母亲	哈库莫村
盖哈顺	44	男	鄂温克	巴敖登其木格	爷爷	辉道村	冷兵	44	男	鄂温克	本布日	父亲	哈库莫村
马吉格	41	女	鄂温克	巴敖登其木格	奶奶	辉道村	阿米日图	18	男	鄂温克	本布日	哥哥	哈库莫村
额吉顺	39	男	鄂温克	巴音其木格	爷爷	辉道村	吉木太	21	男	鄂温克	敖和乐图	大爷	哈库莫村
满达拉	10	男	鄂温克	巴音其木格	叔叔	辉道村	德黑	43	女	鄂温克	敖和乐图	奶奶	哈库莫村
阿格尔	67	女	鄂温克	呼格吉尔	奶奶	辉道村	塔普	10	男	鄂温克	萨如玛	弟弟	哈库莫村
图士列	36	男	鄂温克	呼格吉尔	爷爷	辉道村	阿拉腾扎布	8	女	鄂温克	萨如玛	妹妹	哈库莫村
内库乐	22	女	鄂温克	呼格吉尔	母亲	辉道村	塔思	5	男	鄂温克	萨如玛	弟弟	哈库莫村
苏荣	10	女	鄂温克	呼格吉乐	姑姑	辉道村	朋色迪	32	男	鄂温克	斯格米德	父亲	喜桂图村
和力提尔	5	男	鄂温克	吉日嘎拉	叔叔	辉道村	兴娜	32	女	鄂温克	斯格米德	母亲	喜桂图村
乌力吉	46	男	鄂温克	占布拉	爷爷	辉道村	朋苏格	35	男	鄂温克	斯格米德	大爷	喜桂图村
哈斯乐玛	42	女	鄂温克	占布拉	奶奶	辉道村	丹琼	15	女	鄂温克	潘其日	妹妹	喜桂图村
斯斯格尔	8	女	鄂温克	占布拉	姑姑	辉道村	乌义登	37	男	鄂温克	扎瓦	爷爷	辉道村
宝定	6	男	鄂温克	占布拉	大叔	辉道村	斯乐其	34	女	鄂温克	扎瓦	奶奶	辉道村
宝升	4	男	鄂温克	占布拉	二叔	辉道村	敖登	6	女	鄂温克	扎瓦	叔叔	辉道村
乌日吉日玛	22	女	鄂温克	哈斯托雅	母亲	辉道村	马萨日	42	男	鄂温克	诺日吉玛	父亲	哈库莫村
吉拉塔	2	女	鄂温克	哈斯托雅	姐姐	辉道村	伊敏花	43	女	鄂温克	诺日吉玛	母亲	哈库莫村
孟和	8	男	鄂温克	胡德勒	叔叔	辉道村	额努和	20	男	鄂温克	诺日吉玛	哥哥	哈库莫村
章瑞	21	女	鄂温克	额日德氏其其格	母亲	辉道村	嘎丽玛	20	女	鄂温克	诺日吉玛	嫂子	哈库莫村
尼斯呼勒迪	47	男	鄂温克	同贡	爷爷	辉道村	胡久	1	男	鄂温克	诺日吉玛	侄子	哈库莫村
宾巴	8	男	鄂温克	同贡	叔叔	辉道村	鲁温太	45	男	鄂温克	乌日根毕力格	爷爷	喜桂图村
额格日玛	6	女	鄂温克	同贡	姑姑	辉道村	胡萨布	43	男	鄂温克	乌日根毕力格	爷爷	喜桂图村
占斯瑞	20	男	鄂温克	阿珠	丈夫	乌兰宝日格村	伊先	46	男	鄂温克	乌日根毕力格	爷爷	喜桂图村
苏和	25	女	鄂温克	苏讷木	母亲	乌兰宝日格村	巴音花	46	女	鄂温克	乌日根毕力格	奶奶	喜桂图村
汉达	27	女	鄂温克	苏讷木	伯母	乌兰宝日格村	胡列	32	男	鄂温克	巴亚列	哥哥	喜桂图村
希林花	40	女	鄂温克	郎头	奶奶	嘎鲁特村	额盖布	53	男	鄂温克	巴亚列	父亲	喜桂图村
哈拉	51	男	鄂温克	玛杰	爷爷	伊拉勒特村	汉都玛	51	女	鄂温克	巴亚列	母亲	喜桂图村
达希	36	男	鄂温克	玛杰	叔叔	伊拉勒特村	后日钦	55	男	鄂温克	巴亚列	大爷	喜桂图村
苏如黑	24	女	鄂温克	玛杰	母亲	伊拉勒特村	通列	42	男	鄂温克	巴亚列	叔叔	喜桂图村
阿迪雅	4	女	鄂温克	玛杰	大哥	伊拉勒特村	蒙克岱	40	男	鄂温克	劳合玛	父亲	哈库莫村
阿日塔	1	男	鄂温克	玛杰	二哥	伊拉勒特村	花拉	38	女	鄂温克	劳合玛	母亲	哈库莫村

被害人姓名	年龄	性别	民族	遗属姓名	与被害人关系	住址	被害人姓名	年龄	性别	民族	遗属姓名	与被害人关系	住址
顺迪	55	男	鄂温克	龙给扎布	爷爷	伊拉勒特村	西什勒岱	45	男	鄂温克	车仁	爷爷	哈库莫村
老登森格	27	男	鄂温克	龙给扎布	叔叔	伊拉勒特村	额合莫	9	女	鄂温克	车仁	姑姑	哈库莫村
老得布	17	女	鄂温克	龙给扎布	婶婶	伊拉勒特村	宾巴	7	男	鄂温克	车仁	叔叔	哈库莫村
阿拉楚迪	29	男	鄂温克	龙给扎布	叔叔	伊拉勒特村	姜克来	21	男	鄂温克	阿珠	丈夫	辉道村
格日乐	37	女	鄂温克	力斯日	母亲	辉道村	苏克	25	女	鄂温克	索诺木	母亲	乌兰宝力格村
阿拉孝嘎	57	男	鄂温克	额尔登挂	爷爷	辉道村	汉德玛	23	女	鄂温克	索诺木	婶婶	乌兰宝力格村
讷苏和	60	男	鄂温克	额尔登挂	爷爷	辉道村	昂库列	47	男	鄂温克	苏古尔	爷爷	喜桂图村
哈拉	58	女	鄂温克	额尔登挂	奶奶	辉道村	汗岱	51	男	鄂温克	宝布扎布	爷爷	喜桂图村
芬东	20	女	鄂温克	额尔登挂	婶婶	辉道村	加吉玛	50	女	鄂温克	宝布扎布	奶奶	喜桂图村
塔日巴	35	男	鄂温克	陶格通太	父亲	辉道村	道登曾格	26	男	鄂温克	宝布扎布	大叔	喜桂图村
玛龙花	37	女	鄂温克	陶格通太	母亲	辉道村	老道布	24	男	鄂温克	宝布扎布	二叔	喜桂图村
胡那屋	59	女	鄂温克	陶格通太	奶奶	辉道村	阿拉楚岱	21	女	鄂温克	宝布扎布	姑姑	喜桂图村
帕仁嘎	21	男	鄂温克	陶格通太	叔叔	辉道村	德格吉玛	25	女	鄂温克	宝布扎布	婶婶	喜桂图村
特布新吉日嘎拉	7	男	鄂温克	陶格通太	弟弟	辉道村	索伊勒	5	男	鄂温克	宝布扎布	孙子	喜桂图村
苏荣	5	男	鄂温克	陶格通太	弟弟	辉道村	苏和布	37	男	鄂温克	杜道尔吉	舅舅	嘎鲁特村
拉达日	22	男	鄂温克	巴图	叔叔	辉道村	道波迪	35	女	鄂温克	杜道尔吉	舅母	嘎鲁特村
苏米荣	23	女	鄂温克	巴图	嫂子	辉道村	优吉玛	64	女	鄂温克	杜道尔吉	岳母	嘎鲁特村
孟和	5	男	鄂温克	巴图	弟弟	辉道村	高通	9	男	鄂温克	杜道尔吉	长子	嘎鲁特村
阿嘎日	67	女	鄂温克	呼格吉米	奶奶	完工村	曼古德	7	男	鄂温克	杜道尔吉	次子	嘎鲁特村
陶都日	39	男	鄂温克	呼格吉米	大爷	完工村	耶列	5	女	鄂温克	杜道尔吉	女儿	嘎鲁特村
内胡乐	22	女	鄂温克	呼格吉米	母亲	完工村	满都热娃	3	女	鄂温克	杜道尔吉	妹妹	嘎鲁特村
苏斯德	10	女	鄂温克	呼格吉米	妹妹	完工村	孟都拉	30	男	鄂温克	巴音其木格	大爷	辉道村

三、在伊敏一带进行的细菌实验活动

1944年春天，索伦旗（今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苏木北起向南从萨格道布、苇特坑、阿贵图、毕留图至红花尔基，凡是有人居住的蒙古包、土坯房附近，都出现了大群的跳蚤。饥饿的跳蚤满地乱蹦，追着人咬。牧民们用各种盆子装满水放在草地、房子或蒙古包内，晚上月光下盆里的水发亮，跳蚤就往里边跳，早起一看，盆里水面上爬满了一层跳蚤。这是海拉尔支队在伊敏苏木搞的一次鼠疫杆菌的实验。跳蚤咬人后，人就发高烧，同时打冷战，眼睛结膜充血，步行困难，随之淋巴腺逐渐发肿，全身火烧，在5～7天里即死亡。这次传染病死了许多人，使本来人口不多的厄鲁特蒙古人几乎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仅萨格道布嘎查就死了20余人。苇特坑、阿贵团、毕留图、红花尔基等嘎查的死亡人员尚待进一步调查。



学者赵玉霞（右）向伊敏苏木萨格道布嘎查幸存者额尔登（左）和敖日勒玛（中）取证

1944 年伊敏苏木萨格道布嘎查日军进行细菌实验死亡人员名录

被害人姓名	年龄	性别	民 族	遗属姓名	与被害人关系	住 址	备 注
延吉玛	35	女	蒙 古	额尔登	母 子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额当时 5 岁
巴图苏和	32	男	蒙 古	额尔登	舅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那木吉拉	68	男	蒙 古	额尔登	舅 爷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米 兰	30	女	蒙 古	额尔登	舅 妈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额日木德	7	女	蒙 古	额尔登	姐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旦德格	40	男	蒙 古	额尔登	姐 夫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德力格玛	34	女	蒙 古	额尔登	妈 妈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脑 海	18	男	蒙 古	额尔登	邻 居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查干喇嘛	40	男	蒙 古	敖日勒玛	舅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好日劳	39	女	蒙 古	敖日勒玛	舅 妈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斯格木德	43	男	蒙 古	敖日勒玛	舅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查干喇嘛之兄
尼 亲	50	男	蒙 古	敖日勒玛	大 爷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丹都玛	50	女	蒙 古	敖日勒玛	大 娘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尼亲之妻
阿优喜扎布	45	男	蒙 古	敖日勒玛	邻 居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额仁沁	43	女	蒙 古	敖日勒玛	邻 居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额仁沁之妻
拉 拉	11	女	蒙 古	敖日勒玛	邻 居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额仁沁之女
格 日	58	男	蒙 古	敖日勒玛	邻 居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希日巴之父
希日巴	40	男	蒙 古	敖日勒玛	邻 居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格日之子
达日黑	38	女	蒙 古	敖日勒玛	邻 居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希日巴之妻
根 登	55	男	蒙 古	敖日勒玛	邻 居	伊敏苏木萨格道布	

四、100 部队进行的细菌战

第 100 部队在中苏边境曾组织了数次"远征队",攻击目标是中苏边境附近牧场上的牲畜。准备一旦日本战败,便进行细菌战。

1944 年 3 月,关东军司令部责成兽医部长、中将高桥隆笃拟令,经司令部第二侦探部(亦称特务部)批准,命令第 100 部队组织"远征队",到海拉尔地区侦察附近的道路、夏季牧场、贮水池以及当地饲养的牲畜头数和分布状况。其目的是,一旦日苏战争爆发,便在中苏边境进行细菌战,制造牲畜死亡和居民点混乱。

这次"远征队"写在军部档案上称"别动队",队长由少将若松部队长下令,委任中尉军医官平樱全作充当。委任令是由第二部部长、中佐惠坂下达,同时,配备了 7 名士兵和技术员。

1945 年 3 月,平樱全作向高桥隆笃作了"远征演习"的汇报后,立即奉命出发,率队去海拉尔地区。行前,若松部队长下令,将藏在山沟里的牲畜,分别染上炭疽热菌、鼻疽菌、牛瘟、羊痘菌,等待日苏战争的爆发。后来,又将这批染病的牲畜,驱赶到海拉尔城西北约 80 里的山沟里。为指导这次阴谋计划的实施,若松部队长派出军医少佐山口、军医中佐雄坂同行。

在《伯力审判》一书中有关于在呼伦贝尔地区进行细菌战实地演习和实验的记载。

平樱全作在伯力军事法庭受审时供认:

关于第 100 部队为了细菌战目的在实验应用某些细菌方面所进行的种种实验。

1942 年夏季,大概是七八月间,我参加过夏季演习。现在我就要说说这次演习。

参加这次夏季演习的一队人是由村本少佐带领的。除他之外,这队人中间还有好几名科学工作员、官佐及技术人员,总共约达 30 人。

全部必要的器材都预先运到了长春,发送器材一事是由金田少尉主持的。

实验工作是在北兴安省三河地区靠近苏联边界的结尔布勒河(应为得耳布尔河—编者)岸上野外条件下进行的。这种实验的目的,是研究在战争爆发时使用各种细菌的可能。当时用鼻疽细菌污染了河流和湖泊,并且用炭疽细菌污染了地面,是离苏联边界不远的结尔布勒河。当时染上细菌的地方约有1公里长。施放细菌是经过一定距离即大约100公尺来进行的。施放细菌的工作,是由满田和井田清两位科学工作员乘坐橡皮舟去进行的。

平樱还供认了在南岗河一带的动作,供词中说:

该远征队到南岗河一带动作,是1945年3月间的事。原先领导这次远征的是雄坂中佐,后来他由山口少佐代替了。

该远征队中有20余名科学工作员,当该队抵达海拉尔后,我就把它送到位于海拉尔以南20公里的怀乐镇去。这次远征演习目的是要检查在冬季条件下用鼠疫传染牛马而以疸疮传染羊群的条件和可能性,试验方法把细菌放到雪上和草中。我从若松少将口中知道,这批牲畜是预备供进行细菌破坏工作用的。在战争爆发时应将这批牲畜染上细菌后放到敌军后方去传染牲畜。

平樱又供认说:

部队长若松少将吩咐我在海拉尔收买牲畜。牲畜应经过满洲国政府机关收买。我应到农业畜牧公司海拉尔分部去领牲畜。部队中有一位姓林的职员从长春带来了8万日元的款子,于是我们就收买了500只羊以及90~100头左右的马牛。当时我从部队长若松少将口中知道,这些牲畜是预备供军事破坏工作用的,即是要把这批牲畜染上细菌,然后用它们去散布牲畜疾病。据我推测是用炭疽、鼻疽及牛瘟三种病菌去播染的。

雇员、证人桑原明在伯力军事法庭受审时供认:

这是1945年8月20日的事。当时我到本支队马棚那边去过,看到马棚近旁有本支队6名工作员。这是部队工作员洼田、池田、矢田、木村、石井及长谷川。马棚内关着当时由部队蓄养的60匹马。我刚走到那批工作员跟前时,他们立刻就预告我说,他们是在那里用鼻疽进行传染这些马匹,传染的办法是把鼻疽菌掺到燕麦里面。当我回到了实验室时,我看见那里有一些从前盛鼻疽菌的空玻璃管。后来我问过科学工作员木村,究竟他们是否用这种细菌传染过马匹。他证实了这点,说他们是用鼻疽传染了马匹。

那一批人对马进行了传染之后,就把栏杆捣毁而把马匹放到四方八面去了。所有的马匹都四散跑到附近各村庄里去了。染上鼻疽的马匹就是引起鼻疽流行病的原因。

第100部队的工作人员三友一男在伯力军事法庭受审时供认:

我承认我所犯的罪,我是在1941年4月间自愿到专门培养炭疽、鼻疽、牛瘟、羊痘等病的关东军第100部队内工作,并且我明知培养此种病菌是专门为了进行反苏战争,但我仍积极参加了第100部队特别实验室内培养此种细菌的工作。

我进入该部队后,参加过炭疽菌和鼻疽菌培养法训练班,曾用专门由我看管的孵育器培育过此种病菌。

我曾多次参加过用动物和活人来做的实验,我所培养出的致命细菌的效能实验,以备日军统帅部在反苏战争时使用这种细菌。例如1942年7、8月间,我协同第100部队一批人员到三河区去行动过,当时我们把鼻疽菌投在结尔布勒河里,把炭疽菌投到蓄水池内,实验此种细菌的存活性。

第二节 霍尔莫津(孙吴)要塞区细菌战

一、"孙吴热"的发现与673支队的活人试验

1939年8月,日本关东军第x兵团去东北松花江(哈尔滨下游40公里)进行渡江演习之后,回到

中苏边境孙吴驻地。同年9~12月,发生了20多名以发热、蛋白尿、出血性素质为主症的病人,有6人死亡。当时认为是一种原因不明的疾病,临床病名很难确定,即按发病的地名命名为"孙吴热"。至此,孙吴县成为中国流行性出血热最早的疫区之一。"孙吴热"这一病名也被沿用多年。

1939年前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中,先后在虎林、二道岗、绥芬河等处发生与"孙吴热"相同的疾病并有死亡。日军医院曾诊断为斑疹伤寒、急性出血性肾病、异型猩红热等多种病名。因诊断难以确立,也曾按发病地点而命名。到1941年,在100万侵华日军中,就有10 000人患此病,后经查明为"孙吴热"同一类疾病,从而引起了日军关注。日本陆军少将军医伊吹目雄撰文说:"由于各地相继发生并有死亡,中央对在满洲发生的不明疾病的研究也很注意,深感对此要有紧急的对策。"

1942年12月19日,在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卫生部首脑们对此疾病进行了协议,认为目前对本病的研究尚未十分明确,在研究出能证明本病的方法之前,可以主要症状命名为本病。鉴于发生于各地,以地名称呼本病不妥。虽然也提到了命名为传染性出血性紫斑病或地方性紫斑病热等病名,又鉴于按流行病处理,则正式命名为"流行性出血热"。同时制定了第989号文件。

附:陆普第989号

北满及东满发生的以发热、蛋白尿及出血性素质为主症的所谓孙吴热、虎林热、地方性紫斑病热等暂称的病名疾病,对此流行病定如下病名:

病名:流行性出血热

至此,在日本的医学文献中,正式将"孙吴热"改为流行性出血热。

而孙吴则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出血热疫区的代表之一。

日本关东军731细菌部队对"孙吴热"进行过各种调查,对其流行特点、疾病变化、临床表现及治疗措施均进行了详细、全面的研究。731细菌部队于1939年12月下旬在东京关东军医官会议上和1940年3月陆军军阵医学研究会上做了专题报告。嗣后,在关东军的军医机关中,先后发表了七篇有关该病的研究报告。最权威的研究,乃是731部队部队长北野政次中将的研究。军医少将伊吹目雄于1942年在日本军医团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加茂部队对此进行了解剖,阐明了特有的变化,将其血液对猿及豚鼠进行实验,获得病毒移植成功,发烧、浮肿及出血症状传种九代。"从而揭露出加茂部队曾用猿及豚鼠进行了生物学发病试验。关于病原学的研究,在日本的各种文献中,有的说用猿,有的说用满洲猴,有的说用志愿者,有的直接道出用中国人做试验。

那么,到底是用什么做试验呢?731细菌部队的北野政次1942年在孙吴地区曾捕获40只黑线姬鼠,在鼠身上收集到耶氏历螨203只,将螨制成悬液后再注入黑线姬鼠体内,25日后将鼠杀死,用鼠的肝、脾、胃再制成乳状液,经病毒过滤器过滤之后,将此乳状液注入猿身上,19日后引起发病,再把已发病的猿的血液注入另一猿体内,亦引起同样的出血热。遂确定本病是由病毒引起的病。这里的猿到底是什么?可以肯定是人,而不是所谓真正的猿猴。其理由是:1.解放后在我国、我省均用猴及其同类对出血热进行了活体感染试验,实验证明,这类动物对出血染病毒不敏感,根本重复不出北野政次所谓的实验传了九代的结果。2.1983年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撰文《流行性出血热的新进展》中指出:"日本学者40年代在中国东北用人的志愿者试验,发现了从人到人的传播的感染因子,1945年日本战败后,所有的资料和记录被遗弃。"这里首先证实是用人做试验的,所谓志愿者,不可能是日本人,中国人也绝不可能去志愿做这种试验,显然是被日本侵略者关押的大批中国爱国者和被抓的外国人。3.许多历史文献都充分证明:731细菌部队以及孙吴支队都曾用"马路大"做细菌试验。这个支队具备了比较好的试验条件。4.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其《魔鬼的乐园》一书中揭露,前金泽医大细菌学教研室的二木博士自昭和13年以来,他便在731部队新定的研究课题——关于探索"孙吴热"病源研究上,一直执刀宰杀"满洲猴",干得相当利落。满洲提供的猴,不拘是苏联产的,还是中国产的,一律叫"满洲猴"。森村又提到,石川博士率领各种研究班,陆续到满洲所有的国境地带,对凡是认为同病源有关的老鼠……都做了采集,并对受疫患者即"满洲猴"强迫做了彻底地解剖。对"满

洲猴”的含义，现今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病理研究室一博士说：“凡是提到猴的地方，只管把它理解成人就是了。”前面提到的曾任731部队长的北野政次在《陆军卫生史》卷七中发表的《关于在这次战争中的二、三病原的研究》第一章就是关于流行性出血热的研究成果的论述。“昭和13年（1938年）夏季以来，在北满特别是苏联边境地区闪电般地流行一种罕见的怪病，以蛋白尿、特殊的容貌、出血、出血倾向以及严重的自觉症状为主要症状，由于发展迅速，许多人病死，造成极大的威胁”。“流行性出血热的病名是陆军在昭和17年7月命名的，并以陆普的名义作了公布”，指定为战时流行病，但当时尚未发现病原体。北野接着这样写道：“昭和17年8月被任命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长之时，至前任石井部队长时期发现流行性出血热已经过了整整四年了，然而无论是病原体还是感染途径都尚未确定，成为防疫上的重大障碍。因此，为了确立防疫方针，痛感首先发现感染途径是先决问题，于是重新组成研究班，并对其进行直接领导。”

1944年《日本病理学会会刊》第34卷1、2号也发表了有关流行性出血热病原体的感染实验结果的论文，署名是笠原四郎、北野政次、菊地参、作山原治、金泽谦一、根津尚光、吉村济夫、工藤忠雄。

在北野主持的新组建的研究班中有一个代号为A的军医少佐就是一骨干人物，他供认——首次进行人体实验是在1941年底，他在孙吴地区用注射器采日本兵流行性出血热患者的血液，“注射到两名在地区医院干活的中国劳工身上”。“自1942年1月起，在（七三一）部队内至少对七名被称作‘木头’的中国人使用媒介动物做了试验。据说其方法是，首先是吸过日本兵患者血的虱子和跳蚤处于一昼夜空腹的状态，在把这些跳蚤和虱子装入底层罩着铁丝网的玻璃瓶中，在‘木头’的腹部和肩、大腿内侧吸血20～30分钟，反复进行感染实验”。

A军佐在回忆中说：“那是可怕的病，尸体也充分地解剖了。”“用一些动物作了实验但总也没搞清楚，只有用人做实验了。开始，被置于实验台上的人的症状清晰地出现了。全身突然出现斑点，我想是死了吧？但是没有死，我尽管作了实验，但也全部进行了治疗。”上述事实我们从直接和间接的角度出发，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满洲731部队和孙吴673支队在中国进行的流行性出血热的发病学研究，是野蛮地用人体进行的。

二、细菌研究、制造和培训基地

731孙吴支队队长、兼任731部队训练教育部部长中佐西俊英在细菌学方面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因此在1944年7月起兼任731部队的训练部长，孙吴支队也就成了731部队培训的基地，由他主持在本部和孙吴培训了许多细菌战的骨干分子。从这个意义来说，孙吴673支队不仅是细菌试验与生产基地，也是细菌战人员培训的中心。1941年8月，孙吴673支队接受的主要任务是“生产细菌武器的必要材料的全盘工作”，即培植传播细菌的媒介物及生产细菌和防疫血清。这个支队还培育大批鼠疫菌，除自用外，还定期送731本部以供使用。

1944年5月，按照日本军的命令，北野部队长派柄泽十三夫视察各支队，研究增设设备，提高细菌生产能力和解决保证连续性生产的问题。孙吴支队因此得到一批培植细菌的现代化设备。西俊英还多次指挥和参加活人试验。

三、孙吴地区的细菌污染

1933年初，关东军兽医部长渡边就指示关东军临时病马研究所着手研究细菌，这就是后来迁移到长春市孟家屯的关东军第100部队。1950年，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隆笃在苏联伯力战犯法庭受审时供认：“为了增加细菌武器，我曾下令，大批繁殖鼠疽、炭疽热、牛瘟、羊瘟等细菌。”

以下为北黑铁路辰清车站附近的细菌扩散事件的参与者中村文三卫生上士的供词：

1934年8月29日，在北黑线辰清车站附近掩埋用炭疽菌杀死的中国马百余匹。此系研究细菌而进行实地试验所造成的。我接受消灭罪证任务后，亲督民夫10～15名，于5天完成了掩埋工作。为了制造和扩大疫情，又将一批死马故意扔到站北的河里，制造辰清河下游的疫情。当时在河里有一日军士兵钓鱼一条，生吃后不日死亡。

据日军细菌部队成员加地信证实,1941年731本部汇同孙吴673支队在孙吴毗邻的德都县传播霍乱菌与炭疽菌,造成人畜大量死亡。日本医学教授卢田说,此次发生的马炭疽病相当严重,时间不长即死掉数千。七星泡村仅50余户,有30多人感染病菌死亡,村长魏志清饲养的50头牛,只剩5头。

据《逊克县志》载:1937年日本并强行给居住在浦拉口子的鄂伦春人注射"防疫药物",结果一次死亡50多人,占这个县鄂伦春人总数的1.8%。

1999年初,农民迟连升说,在原673细菌支队驻地的西山脚下,56年前,他亲眼看到了草草掩埋的中国被害者的白骨100多具。



农民迟连升指证当年日军埋人处

在孙吴县西兴乡有个西兴村,过去的名字叫"西窑地"。1932年秋天,日本侵略军到了孙吴,大兴土木,这里就成了烧砖的窑地。71岁的村民迟连升,就是在那个时候闯关东,在窑上挑沙子,12岁的小小年纪做着苦工。离西窑地3里多路的小南山,四周青松环绕,山坡上绽开着铃兰花,日本人看中了这个地方,还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铃兰台",在这里修建了一大片青瓦砖房,就是建成后的731细菌部队孙吴支队,代号673。从1940年支队投入使用,到1945年战败自我破坏,细菌支队干了多少坏事没人知晓,而迟连升年轻时候…遇到的事情至今不能忘怀。1999年初,孙吴县的文物考古工作者访问了他,迟连升说:大约是1944年,我15岁,赶上西南沟小河涨水,冲下来不少鱼,我抓些鱼进城卖了几毛钱,为了避开警察我绕道从小南山下回家。走到山坡下通往细菌部队的道路西边,看见一群猪在一个大坑里拱什么,走近一看吓了我一跳,只见一大片白花花的人骨头、人骨架,我赶紧跑回家。现在回想起来,足有100多具尸体,不会是日本人也更不会是中国人的坟。这时候迟连升40多岁的儿子说,我小的时候到细菌部队山上去玩,在解剖消毒池旁边也看见过死人脑瓜壳。迟家父子在解放前后的发现,是731细菌部队孙吴支队用中国人做人体实验的见证。

第三节　诺门罕战争中的细菌战

一、日军发动诺门罕战争

1931年日本关东军侵占中国东北以后,就把它作为进攻苏联的战争基地,不断挑起与苏联的边境冲突。于1939年又在罕达盖—将军庙—阿木古郎一线至哈拉哈河一带悍然发动了诺门罕战争。战争从1939年5月4日开始,到9月16日停战,共历时135天。日本关东军损耗了5.4万多兵员和大量重武器,最后进行了细菌战和毒气战,但仍然遭到惨败,被迫停战讲和。

二、日军进行细菌战准备

日本大本营多次向关东军下达命令,指挥这场战争。在诺门罕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到731部队视察,了解它的实力。这时,731部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细菌生产能力,

并掌握了使用细菌武器的手段,同时实战防疫使用的滤水机也研制成功。石井四郎为显示731部队的实力,命令总务部庶务主任饭田大尉和6名少年队员布置了一个临时陈列室,摆放了石井式培养箱、胜矢壳和人体试验的照片以及中国各地区的气候图等进行展示。植田司令官视察后非常满意,并命令石井四郎尽快制订出在诺门罕之战中配合行动的方案来。

根据关东军司令部的这个命令,拟订了731部队参战的三个方案:

一是将装有感染炭疽菌弹丸的炮弹,用日军炮兵的榴弹炮向苏蒙军阵地发射。

二是用飞机在哈拉哈河西岸上空投掷石井式土陶细菌炸弹,或者空投受细菌感染的小动物、物件和食品。这种土陶细菌炸弹,每架飞机可携带数十个,每个里面装有5 000只鼠疫蚤。借助附在弹体尾部的少量火药,使它在快接近地面时爆破。这样,疫蚤落地后,就能向人体传染细菌,发生鼠疫;落地的小动物,人接触后也会发生传染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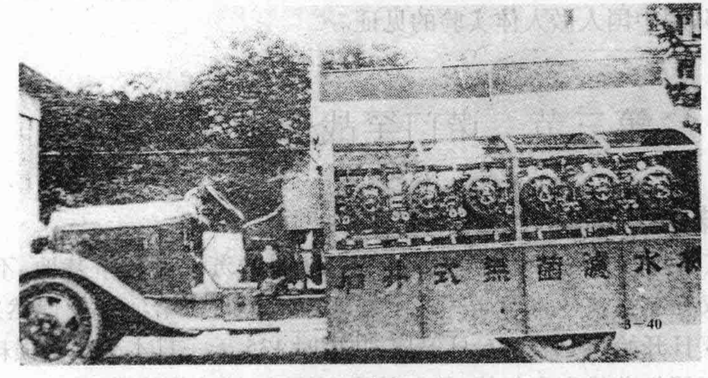


石井式土陶细菌炸弹

三是派出一支"敢死队"深入哈拉哈河西岸地区,往所有的水源投撒细菌和毒品,使苏蒙军误饮被污染的水而患传染病。

由于731部队对鼠疫菌、炭疽菌能否达到传染的目的还没有十分把握;对霍乱菌、伤寒菌和赤痢菌的传染途径,已基本上搞清了,所以,石井四郎提出,这次在诺门罕战场上使用鼠疫、炭疽菌是属于实验性的,而霍乱菌、伤寒菌和赤痢菌则既是实验,又是向苏蒙军队的破坏性的攻击。因此,他决定把投撒霍乱、肠伤寒菌和赤痢菌作为重点。阴谋破坏班也按照他的意图,绘制了对哈拉哈河西岸实行谋略的精密示意图,在地图上标有可供细菌污染的河流、泉眼、湖泊、水井等饮用水源的作战目标。

关东军诺门罕前线指挥官小松原道太郎中将凭多年从事间谍活动的经验和战场形势可能出现的变化,对731部队的三个配合作战方案的实施作出了详尽的预测:如果用迫击炮发射细菌弹,战斗打响后,日军的炮兵阵地就会遭到苏军的炮击,细菌弹就可能在日军阵地上爆炸,使日军自身受到危害;如果用飞机投掷细菌弹,高空作业命中率低,低空飞行就可能被苏军击毁,并落在哈拉哈河东岸地区,这样也会危及日军;如果深入苏蒙军所在地区撒菌,凡是有水源的地方,苏蒙军必定严密把守,不易靠近,即使能够靠近,也难以进行撒菌活动。小松原道太郎等人认为,关东军进入哈拉哈河西岸地区之前若使用了细菌武器,待日军进入西岸地区之后必将受到危害。



石井式无菌滤水机

经过缜密的研究,他们一致认为,细菌武器只有在日军败退的情况下才能使用。因此,决定放弃空投的计划。战败后,在做好隐蔽的情况下,突然把细菌炮弹发射出去;也是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将细菌投入哈拉哈河上游,使位于下游的苏蒙军喝了受细菌污染的水而发生传染病,损耗其攻击作战的

能力。

石井四郎接到参战的命令后，极为高兴，认为这是他为"大东亚圣战"立功和进行检验细菌武器效能的机会。于是，他把731部队当时仅有的400名各种从事细菌研究的人员抽出一半，以"关东军防疫班"名义参战。"关东军防疫班"按其参战任务，分为两部分：

一是组织了以十几个第三部的卫生下士官为主吸收正在教育部受训的少年队员参加的，为日军前线部队防疫供水服务的防疫班和整备班，每班10人，由少年队教官佐佐木少尉带队。在此之前(6月下旬)就将准备的20个甲型滤水器、50个乙型和50个丙型滤水器以及其他一些必备的器材，分别装进50个大木箱内，用火车发往海拉尔。其人员乘731部队的专用汽车，昼夜兼程，开赴诺门罕战场。

作战时，每个防疫班配置1名装有甲型石井式滤水器的给水车，跟随野战部队行动。这种滤水器可以保证一个中队一周的用水。它的水箱是木料制作的，一旦遇到敌方缴获的危险，即可浇上汽油就地烧毁。这种设备，苏军当时尚未研制出来 。

二是组织了阴谋破坏班，通过各种手段施放细菌武器。其组成人员是以第二部为主，适当吸收一些经过专门训练的少年队员参加，由第二部部长碇常重少佐负责。早在6月末，石井四郎就组织了以碇常重少佐为队长的敢死队。出发时，在哈尔滨731部队本部，碇常重少佐在石井四郎面前，带头咬破手指，用血在一面日本国旗上签了名，另一名官佐和22名敢死队员也一个接一个地照样签了名，以表示他们要发扬"大和魂"精神、为效忠天皇而视死如归和永不泄露731部队秘密的决心。

三、日军进行细菌战

厉春鹏、徐占江、阿必德等人著《诺门罕战争》中关于日军在诺门罕战争中进行细菌战有如下记述：

7月初，在诺门罕布尔德诺尔和胡鲁斯台诺尔之间，日本关东军开来了一支奇特的部队。这支部队的周围布满了指向天空的高射炮，巡逻队牵着德国种的"黑盖"和日本种的"狼青"等著名警犬，在这支部队周围东闻闻西嗅嗅。这支部队可以说是从天空到地上戒备森严，即使是日军各作战部队，也不准许接近这块禁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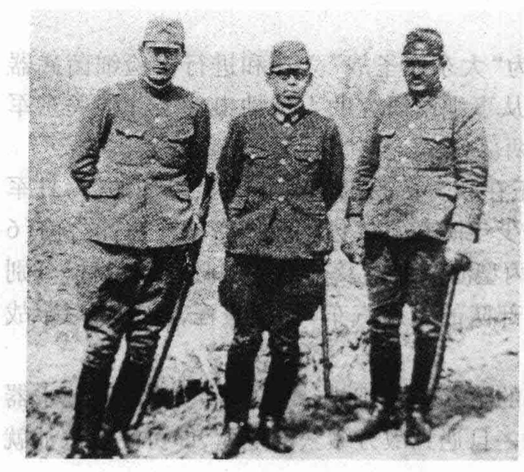
当时日军的军服全是黄色，而这支部队的军人和文职人员的服装则是草绿色。军人上衣佩着肩章、袖标、胸章，下面是马裤、靴子，帽子的前沿缀有一枚黄色的星星，挎着带系在草绿色的衬衣领上，肩上也戴有肩章，胳膊上戴"山"形臂章，胸前有的绣着一颗紫星，有的绣着黄星或白星。各种颜色的星，区别着每个人的等级。这支部队人数虽然不多，却使日军的各部队长们敬而远之。这就是日本陆军的秘密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①


731部队在诺门罕战场上

关于进行细菌战的经过，在韩晓、辛培林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中记述如下：

7月12日，敢死队潜入哈拉哈河旁的一片松林中。他们都穿着没有肩章和帽徽的黄色日本军装，以防有人发现他们是关东军细菌部队。气式橡皮船、十几个大型金属瓶、一些玻璃容器、铁水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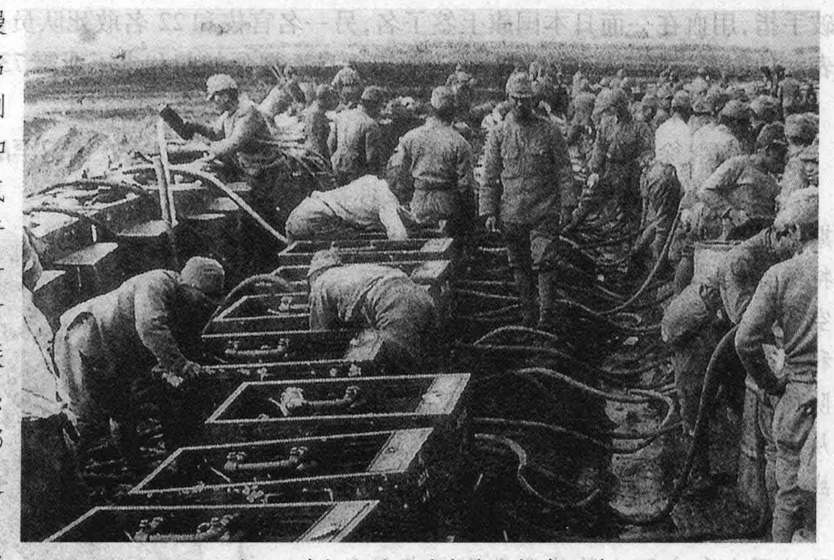
① 厉春鹏、徐占江、阿毕德等：《诺门罕战争》，第4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



原731部队第二部部长、诺门罕细菌战敢死队队长碇常重(左一)

长柄勺、绳索和装有零碎物资的大型皮箱等,这些特殊器材分别背在身上。在碇常重少佐的指挥下,隐蔽地沿着松林的边缘向哈拉哈河岸靠近。

哈拉哈河发源于大兴安岭的达尔滨湖,最终弯弯曲曲地流入贝尔湖,全长近400公里,有12条小河汇入。河宽50~80米,水深平均2米,流速每秒1米。河西岸比东岸高50米,在东岸看不到西岸上面的情况。因此,731部队敢死队潜入哈拉哈河岸边,没有被苏蒙军队发现。他们隐蔽在茂密草丛里,把橡皮船充气后,装上金属的和玻璃的菌液瓶、铁水桶、长柄勺等物品,推进河里,用绳索拴在岸边的大树上。他们上了船急速地向河中心划去。当拴船的缆绳拉紧时,船上的士兵就做好了撒菌的准备。为了防止自身受污染,他们在逆水上行时撒菌,岸上的士兵解开拴在树上的缆绳往上游拉船,船上的士兵有的划动船桨,有的迅速打开菌液瓶盖,连菌液瓶一起投进河里。在行进1公里的河段上,撒了各种细菌溶液22.5公斤。菌液瓶落入河底,霍乱、伤寒、赤痢和鼻疽菌慢慢地流出来,向下游漂去。两名军官立即用长柄勺提取水样,测试水温和流速,作了投菌记录和拍照。船靠岸后,他们马上乘汽车返回了驻地——将军庙。于是,1939年7月13日午后1时30分,石井四郎到胡鲁斯台河南岸的日本关东军步兵第71联队队部,向那里的官兵通报说:"不要饮用哈拉哈河的水了,那河水可能被污染"。接着,就通知诺门罕战场上第一线的各日军部队和伪满洲国军的部队,都要使用经过石井滤水器滤过的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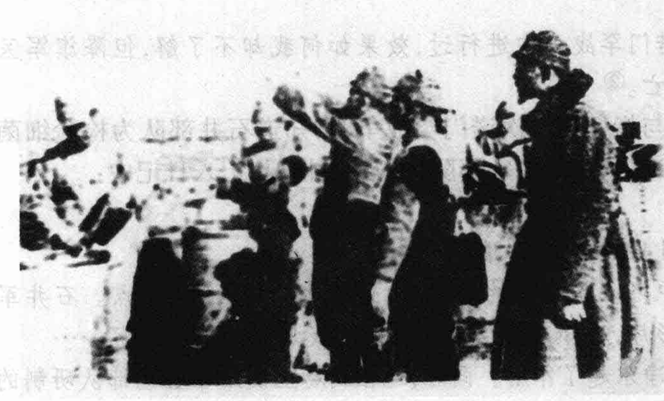
诺门罕战场上的石井式滤水机在工作

731部队在实施这次细菌阴谋破坏活动前1个月,就加紧了细菌武器的生产。第四部在早川少佐、小林准尉和渡边准尉的指挥下,把60名队员分成两班,昼夜不停地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就把所需要的霍乱、伤寒和副伤寒菌赶制出来。石井四郎命令担负霍乱菌制造任务的濑户川班必须在10天内完成任务。由于时间紧迫,莳田丰技师要求田村良雄和另一名队员每天要洗涤150个玻璃试管,由小林灭菌室灭菌消毒后交给培殖班。培殖班的13个人,除负责人今野信次技师外,每3人编为一组,用150个培养罐,按时生产出6公斤霍乱菌。另一个班抽出4名队员,利用两个大型培养罐,很快生产出19公斤伤寒菌。生产出的这些细菌密封后贮存在地下库里,然后由田村良雄和奥富克二人把它专程送往将军庙,交给敢死队的队副难波准尉。专门研制和装配细菌弹的山口班6月抽调6名队员专门装配细菌榴霰弹。据被俘的田村良雄在中国军事法庭上的证实,在山口班长的



原731部队队员田村良雄

命令下,他和4名队员仅3天就制造出2 000余个炭疽菌弹丸。这种弹丸是由0.5厘米粗1.5厘米长的铁盘锯成×型槽,染上炭疽菌后装入榴霰炮弹内。这些炭疽菌炮弹制成后,由山口班的人员专程护送到诺门罕前线的炮兵阵地。①



731部队长石井四郎在诺门罕战场上指挥作战(右后)

日本战败后,回国的原731部队队员鹤田回忆说:

我是第二次诺门罕战开始后一个月进入战场的。一天下午,我们三人小组为执行去胡鲁斯台河撒菌的命令,把装有伤寒、鼠疫菌液的容器和染疫鼠以及撒菌的用具装上汽车后,就从将军庙出发了。

天黑时,我们赶到了胡鲁斯台河岸。先隐蔽在一片松树林里,将菌液瓶装上橡皮船。胡鲁斯台河是哈拉哈河的支流,此时,日军和苏、蒙军还在15公里远处对战,隆隆的炮声不断地传来,空中还有苏军的飞机在盘旋,我们的心情十分紧张。班长观察一下地形,胡鲁斯台河对岸是一块十几米高的台地。如果趁夜色,在河里进行撒菌作业,那对岸的苏、蒙军巡逻人员就难以发现。于是,我们登上橡皮船,借着半明半暗的月光,一边逆水而上一边进行撒菌作业……

那次搞得好紧张,对岸有苏军的封锁,空中时时有信号弹升起,大概由于匆忙的缘故,我们的班长不慎感染了肠伤寒病。当我返回哈尔滨后听说,他转入海拉尔陆军医院治疗,不久就死了。

鹤田还回忆说:

那次撒菌,我们小分队是那天下午从将军庙出发的。途中在一户农家休息,谎说是过路的日本人。那户农家包了野韭菜馅饺子招待我们。临走时,我们趁农户主人不防之机,把随身携带的鼠疫干燥菌偷撒在农房里。当我们完成在哈拉哈河的撒菌任务返回这户农家的时候,发现那农户家3口人全部死掉了。②

四、细菌战结果

731部队出动了细菌作战半数以上的队员在诺门罕参战,原想以“细菌战”极大削弱苏蒙军战斗力的赫赫战果显其“军威”,彪炳史册,没承想却事与愿违,自食其果,竟有130名日军患了伤寒病、赤痢病和霍乱病。这些伤病员都被火速转送到海拉尔。陆军第一医院、陆军第二医院、第十军管区医院都住满了伤员,装不下又住进了铁路医院和地方各医院。731部队庞大的“防疫班”这下派上了用场,8月中旬,山下建次大尉所指挥的病源检查班和十几名防疫人员麇集在海拉尔,通过验便的方法进行其病源和细菌效能的调查。仅一个星期,对日军官兵伤病员验便就达8 500人次,调查结果证明,病源来自他们自己投放的细菌。

731部队第二部军医准尉难波死了,尉级军医官肥田中信、井上贯一、美马孝义、仓上正博死了……被细菌传染而亡命的有40余人。而且还带来了后患——疫病流行。伪满当局和关东军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防疫,伪满民生部从各卫生机关抽调人员,组织防疫队赴海拉尔配合防疫,并在海拉尔设立了防疫检查所。③

1939年10月,731部队从诺门罕战场撤回哈尔滨总部。据本部工作员山内丰纪证实:

---

①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第252~25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第253~25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③ 长春市公安局档案:加地信证言。

"我看见他们个个垂头丧气。听参战的人讲，苏蒙盟军英勇善战，我们被打得稀里哗啦。"①

鹤田兼敏也对此作了证明：

退下战场时，看见那运回来的榴弹炮、滤水车都已经破烂不堪了。听说，石井部队参战人员有30多名病亡，他的班长因患伤寒，病死在海拉尔陆军病院。①

731部队的镰田证实：

实地投撒细菌的事，我只准确地听说在诺门罕战争中进行过，效果如何我却不了解，但降旗军医大尉等参战的有几十个人因被细菌感染而死亡。②

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远藤三朗少将在参与指挥第二次诺门罕战争时，知道石井部队为检验细菌武器的效能，也派员来到战场。远藤三郎副参谋长把与石井部队长的接触情况，记入日记中：

10月12日 木 晴

午后7时，接受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在其官舍的宴请，边进晚餐边谈至夜12点。石井军医大佐亦前来，观看他带来的细菌实战纪录影片，得知石井部队在诺门罕战场上的部分实况……

石井发明的滤水机，在诺门坎为官兵供应净水起了作用。同时，还在战场上使用了自己部队研制的细菌。石井拍摄了队员战死的照片。按照石井的话说，即使在战败的情况下，也要为部下留个纪念。

尽管石井的研究成果甚微，但荻洲中将还是赞扬道："在广漠不毛之地，时值盛夏酷暑，赤砂灼热，兵困马乏之际，石井部队甘冒枪林弹雨，出入第一线，立下了汗马功劳。"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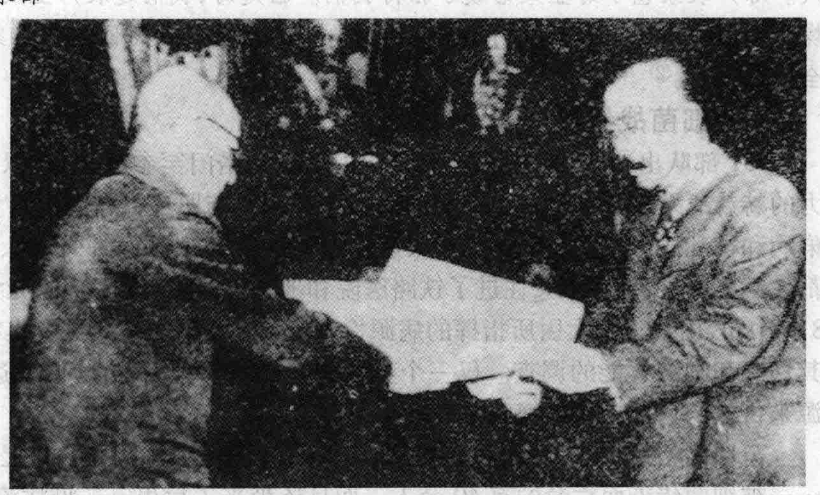
1939年10月2日，731部队获得了关东军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所颁发的奖状。该奖状的内容如下：

奖 状

第六军临时防疫给水部

第二十三师团临时防疫给水部

上述部队在军医大佐石井四郎的领导与指挥下，参加第二次"诺蒙坎"事件，在整个事件期间担任防疫供水的任务（中略）。



诺门罕战争后石井四郎（右）接受关东军第六军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将颁发的奖状

尤其，当8月下旬敌军发动攻势之际，该部队独立死守哈勒欣河附近的水源，尽管在牺牲了井上军医大尉以下数十名的人员以及器材也被炮弹炸毁的情况下，（中略）9月下旬，该部队为全军开辟了大型作业场，连日有成效地完成了卫生任务，便利了军方得以充分做好战斗准备（后略）。

①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第25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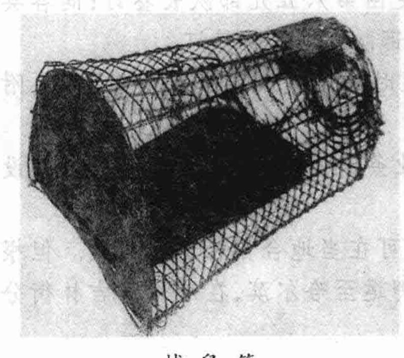
① 韩晓、金成民：《日军七三一部队罪行见证》，第20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 同①，第54页

③ 同①，第131页。

翌年,1940 年 5 月 23 日,大本营陆军部在各报刊上发表了授予这个部队奖状的消息。

第四节　为 731 部队提供老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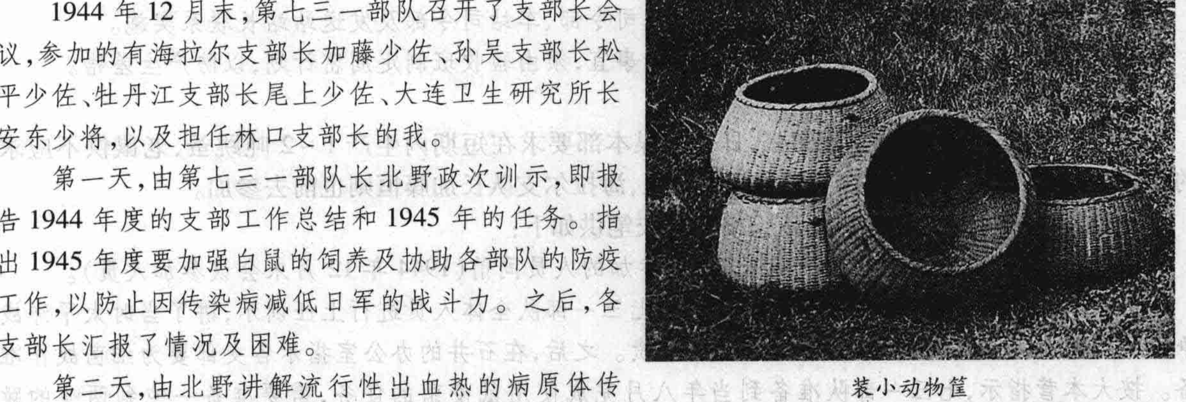
捕鼠笼

731 部队进行细菌实验必须有足够的鼠类。于是日本关东军便命令哈尔滨附近各县和各支队所在地区大量捕鼠,交哈尔滨 731 部队。

1941 年 7 月,日军参谋本部总长提出了要加快细菌战步伐,731 部队短期内必须完成培殖 200 公斤跳蚤的任务。当时 731 部队包括各支队最大生产能力是 3 ~4 个月能繁殖出 45 斤(1.45亿只)的跳蚤。200 公斤则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培殖出来,但日军参谋本部规定的时间是 3 个月。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扩大生产规模,但存栏的鼠类远远满足不了采血和繁殖跳蚤的需要。于是,731 部队要求寻找新的跳蚤宿主。海拉尔支队利用呼伦贝尔草原鼠类众多的条件,找到了可作为跳蚤宿主的土拨鼠(旱獭)、松鼠(灰鼠)、黄鼠和灰田鼠,并大力进行繁殖。由伪海拉尔市公署卫生科通过开展所谓“防疫周”的活动,发动学生捕鼠,捕的鼠交到学校,学校交到市公署,再由海拉尔支队派车取走。老鼠不够,就在牧区收购土拨鼠,到林区收购松鼠顶任务。

对当时的捕鼠情况,原林口支队长榊原秀夫于 1955 年 4 月 11 日笔供如下:

1944 年 12 月末,第七三一部队召开了支部长会议,参加的有海拉尔支部长加藤少佐、孙吴支部长松平少佐、牡丹江支部长尾上少佐、大连卫生研究所长安东少将,以及担任林口支部长的我。



装小动物筐

第一天,由第七三一部队长北野政次训示,即报告 1944 年度的支部工作总结和 1945 年的任务。指出 1945 年度要加强白鼠的饲养及协助各部队的防疫工作,以防止因传染病减低日军的战斗力。之后,各支部长汇报了情况及困难。

第二天,由北野讲解流行性出血热的病原体传染途径及防疫法等问题。后由诊疗部长说明有关诊疗法,并共同看了患者。此次会议目的,就准备使用鼠疫菌进行细菌战和繁殖白鼠问题,传达指示,并说明利用流行性出血热进行细菌战的可能性。①

1945 年初,第 731 部队制定了田鼠搜集计划。

附: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昭和二十年(1945 年)度田鼠搜集计划

第一,方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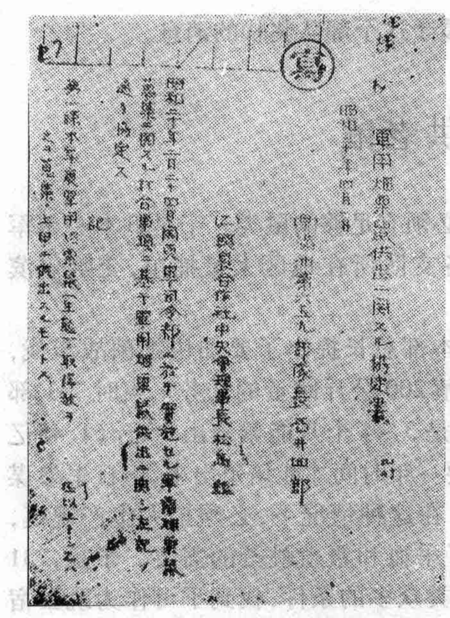
本年度搜集田鼠事宜,在关东军之支援下,督促满洲国行使行政权力,配合部队之现场指导,绝对确保所需数　　万只。

第二,实施要领

一、关于满洲国政府提出协助问题,须向总司令官提出申请。

---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145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1945年4月1日731部队为大量征集田鼠与伪兴农合作社签订的协定

二、政府指令与部队之现场指导相配合，要求有关各省切实执行此项任务。

三、与省方的指导相配合，部队须对有关各县旗给予具体指导。

四、同各省间的征购协定由第六五九部队长签订；同各县旗间的征购协定由第六五九部队经理课长签订。

五、各省搜集数量、搜集时期及搜集县旗见附表一。（附表略）

六、为圆满切实地开展业务，根据需要，可在各省及县旗设临时嘱托一名。

七、各县旗搜集之田鼠，可在当地合作社进行验收。但根据部队情况，可责成各县旗押运至哈尔滨，在哈尔滨吉林街分室进行验收。

八、验收仅限于活田鼠。

九、验收后的饲料由部队负责供应。

十、有关现场指导及验收等具体计划，可同省、县、旗联系，分别制定。

十一、为推动征购工作，可特殊供应与征购数量相当之生活必需物资。就此问题，可同省、县、旗协商解决。

十二、为圆满完成运输任务，可同大陆野铁司令部、车站司令部及发送站站长联系实施。

十三、运输箱由部队准备，有关向产地运输事宜，须由验收班制定周密计划，以防产生差错。

十四、验收人员旅费另定。①

1945年5月，由于战事更加紧张，日军参谋本部要求在短期内生产1～2吨跳蚤，老鼠供不应求的矛盾更加突出。石井四郎在本部召开了会议，海拉尔支队长加藤恒则也前去参加。

1955年4月11日，原林口支队长榊原秀夫笔供如下：

1945年4月，再一次召开了支部长会议，参加的人员同前（1944年12月末会议参加人员）。

第一天，由第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向第七三一部队全体人员进行上任训示，讲了当时太平洋战争的不利的战况，勉励全员努力尽到自己的职责。之后，在石井的办公室指示各支部要为细菌战作准备。按大本营指示，七三一部队准备到当年八月完成使用鼠疫菌的任务，需要准备一吨到两吨的跳蚤，因而需要大量老鼠，故指示各支部要全力进行捕鼠和繁殖白鼠，以协助七三一部队完成任务。同时石井还指示捕鼠时要特别注意防谍。

第二天，总务部长太田大佐、企划课长田部中佐和支部长讨论了有关捕鼠的人员、方法、运输、防谍等问题。决定捕鼠班以军官或下士官为首组成，并按各支部人员多少为原则编成常设班。捕鼠方法以掘土捕鼠和器具捕鼠兼用。为了防谍，参加捕鼠的人员要穿便衣。所捕活鼠运交七三一部队第二部田中班。各支部所需捕鼠器具可到七三一部队领取。②

会后，加藤恒则支队长回到海拉尔立即命令支队内能出动的人员全部换上便衣，除在市内继续号召市民和学生捕鼠外，还到有关地区收购鼠类，上上下下掀起了捕鼠“大会战”。至1945年7月，除上交哈尔滨731部队本部外，海拉尔支队内存老鼠1.3万只，支队能装老鼠笼的地方全摆满了，甚至各排房舍的走廊里也都摆上了鼠笼。

---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和毒气战》，第139～140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和毒气战》，第146～147页，中华书局，1989年。

2001年4月19日的《哈尔滨日报》第1版报道了金成民等人在日本跨国取证时731部队543支队老兵谷崎等提供的证言。

侵华日军731部队海拉尔支队原队员谷崎等已年近八旬，最近身体状况不好，但听说访问团跨国取证，他便抱病前来提供证词。



原海拉尔543支队队员谷崎等在接受取证

以下为其提供的部分证词：

昭和十九年(1944年)3月份我到达海拉尔，海拉尔支队的番号是543。海拉尔支队约有150人，我们分部约有30人。在海拉尔，我与其他队员接受了长达3个月的严格训练，其中主要是医疗卫生方面的。当时我就有疑问：一个部队有一两个卫生兵就够了，为什么这里需要这么多的卫生兵？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队呢？

后来，我了解到，731部队海拉尔支队共有3个课，第一课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但我知道他们从事的是与细菌有关的研究，第二课叫给水课。第三个叫总务课，负责各种事务，其中包括饲养老鼠。虽然在一个部队里，但我们之间往来很少，上面也命令我们，不同的课之间不许互相谈论与工作有关的事情，有关各自工作的内容要严格保密。第一课最严格，除了第一课的人外，任何人都不允许进去。我是第三课的，每天早8点至晚5点工作，负责在一个能有近300平方米的大房子里饲养黑鼠，即田间老鼠，别人养的是白老鼠。上面给我们下指标，我和另一个人一年要养3 000只黑鼠。为了让这些老鼠长得快一些，我们就给白鼠喂高粱，给黑鼠喂马肉。因为黑鼠生存能力强，我们就把很大的一块马肉扔进笼子里，让它们自己撕食。等到哈尔滨731部队来取的时候，大的就送走，小的接着饲养。

731部队需要的老鼠非常多，一开始是从日本运到中国，后来就在中国直接培养。有时要得急了，543部队要发动所有的人到田间去捕鼠。我们每年要往731部队送10次老鼠，一次1 000只。我知道，还有一部分老鼠就在第一课进行细菌培养。我想，搞的试验肯定是鼠疫菌。

战败后，我们按照上面的要求把没有送走的老鼠和其他动物埋入深坑销毁。

尽管没有直接进行细菌培养，但我们私底下也经常议论。我听说凡是在731用做试验的人，全是特别班的人送来的。731部队用健康人做试验，他们都是宪兵队抓来的，听说本部大楼里一年需要四五百人进行试验。

731部队的事情，除了核心的人外，外围的人只有在战后才了解到，当时要求不允许把自己做的事情告诉别人。回国以后，我渐渐地了解到更多的731的事情。731部队所进行的活动，是非人道、违背国际公法的残酷行为。

1955年5月17日，在沈阳战犯审判时，162支队长榊原秀夫供认说：

1945年4月，我参加了731部队本部召开的支队长会议，石井四郎部队长命令各支队大力动员部下进行捕鼠工作。会后我回林口召集了支队的干部会议，决定在林口设置一个以间所少尉为首的25名常设捕鼠班，专门从事捕鼠工作；另外还组织渡边中尉、岛田准尉为首的几个临时性的捕鼠班，派到“千振开拓团”、“龙爪开拓团”等地，以消灭“鼠害”为名，宣传、鼓励日本开拓民以及中国居民大量捕鼠，捕的老鼠交林口162支队。这样大规模进行捕鼠的结果，自1945年4～7月间，林口第162

支队先后送交731部队的老鼠有26 000余只，供731部队制造细菌武器用。此外，林口162支队还提供了饲养的白鼠1 000只。根据送交老鼠的数量，估计足够培养繁殖出1～2吨染有鼠疫菌的跳蚤，供大批制造武器之用。

1945年6月，根据731部队电报命令，我派了七夕曹长及以下7名，到731部队学习饲养跳蚤的方法，并带回1公斤跳蚤，在林口支队的35平方公尺的地下室里，由细矢少佐具体指导七夕曹长以下7名进行培养繁殖跳蚤的工作。另外，我到职时，该队只有白鼠1 000只，豚鼠50只、兔子10只、马2匹。到1945年7月止，我领导繁殖了白鼠6 000只、豚鼠100只、兔子25只、马2匹。

周绍濂见证书

1956年5月12日，佳木斯市居民周绍濂提供的证书说：

1945年春季，我在佳木斯市协和学校优级部念书，学校曾让学生捕鼠，并发给捕鼠笼子和捕鼠食物（元宵那么大的面丸）；捕的老鼠送给学校，也有几个同学联合送交市公署。我当时也参加了这一活动，拿了一个捕鼠笼子和给的食物回家捕鼠，家里也曾帮助捕鼠。捕鼠的时间共有两三个月。

1956年5月12日，曾在伪佳木斯市公署卫生防疫股当雇员的许文章证实说：

大约在1944～1945年的时候，是春天，佳木斯市西南岗子部队，通过市公署卫生科，叫全市学生捕鼠。当时，我亲眼看到每天往卫生科送老鼠有300多只，当日就由住西南岗子的部队来汽车用木箱子装上拉走，每箱子装三四十只。捕鼠前日本军队发了捕鼠铁笼，学生捕到老鼠后天天往卫生科送。

第四章 要塞区毒气战

第一节 日军在东北进行化学武器实验的原因

日本进行化学战的准备起步相对较晚，从1933年建校的日本陆军习志野学校不仅是化学战的教育机构，而且承担着研究和演习的任务。1937年设立的关东军技术部及1939年设立的关东军化学部（516部队），都是日军化学武器的研究、制造、训练中心。他们进行生化武器的实验，主要是在中国的东北进行，尤其是在中苏边境的要塞区内进行。

日本军队之所以在关东军内设立规模庞大的化学部，从技术上看，是为了研究化学武器能够在各种气候条件下，特别是寒冷的环境中的使用问题。因为关东军的主要任务是“对苏作战”，如果同苏联发生战争，作战的环境肯定是在寒冷的条件下。虽然在日本的北海道地区也可以遇到寒冷的天气，但中国的东北更加寒冷，同苏联的气候条件更加相似。

从政治上看，与中国东北毗邻的苏联是日本的战略进攻的目标，而同苏联这样的军事大国一旦发生战争，使用化学武器是势所必然。在中国东北进行化学武器的实验，不仅同苏联的气候条件相似，而且随时可以投入战争，可以收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日本进行化学武器的实验，受到日本区域狭窄、人口密集的条件的限制，即使建立了实验场，也与当地的居民有许多的冲突。但到了中国东北，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一方面，东北土地辽阔，人口相对稀少，而更重要的是作为殖民地，东北人民已经失去了任何主权的自由，任日本统治者随意宰割，不能对化学武器的实验提出抗议或反对，日本军队可以为所欲为。同时，在这块土地上，日本军队也可以方便地找到被用以进行人体实验的对象，这是在国内根本无法实现的。从这一点看，在东北的化学武器实验同建立731细菌部队的意图是相同的。所以在当时由关东军化学部主持了多次毒气实验。这样的实验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在野外毒气发射实验，主要目的是研究摸索在实战环境下如何使用化学武器；另一种是在实验室中，目的

是研究各种毒剂的伤害效果。这两种实验都使用动物甚至活人作为实验品,后一类实验多与设在哈尔滨市平房地区的731细菌部队共同进行。实验的时候,将关东军内担负化学战指导任务的有关人员集中起来,进行观摩。①

516部队的毒气实验有一部分是与731部队共同进行的。

因为日本军队在研究和制造出化学武器以后,一方面需要检查其在战争中的实际效果,另一方面也要研究自己军队防护的方法。实现这两个目的,需要用人作为实验对象。到哪里去找这些实验对象?当然,利用实战是一个办法,但研究防护方法如果用自己的军队,代价太高。理想的办法是在平时就能随时找到可资利用的实验对象,而这种特别稀少的人体实验对象恰恰在731部队中大量存在。而731部队同时也对人体进行各种各样的细菌实验,加上毒气实验,不过就是对人体充分利用而已。问题就这样简单地解决了。②

当时,关于细菌毒气实验场问题,731部队在距其哈尔滨本部较近的安达设立了实验场,而516部队则主要在距其部队驻地较近的富拉尔基、扎兰屯一带进行实验。由于呼伦贝尔位于地广人稀的草原,又因为与日军进攻的主要目标苏联接壤,气候、地貌相似,而且宜于保密,所以731、100和516部队都把呼伦贝尔选定为天然大实验场,并在这里多次进行毒气实验。

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日本当时参与实验活动的官兵在其著述或供词、证言及回忆录中都多有记载。

第二节　日军在东北地区及要塞区进行的化学武器实验

一、习志野学校在中国东北的演习

1933年12月,在齐齐哈尔附近进行了各种毒剂实地实验。

1935年1月,在北安镇附近进行了东北冬季研究学习。

1935年末,在孙吴进行了暂时性毒气实验。

1935年12月,在北安镇附近进行了东北冬季研究学习。

1936年末,在东北进行了光气实验。

1937年1月和12月,在孙吴附近进行了东北寒地研究学习。

1938年11月,在海拉尔附近进行了东北寒地液体氢氰酸研究学习。

1939年7月,在齐齐哈尔(嫩江)附近,进行了氢氰酸研究学习。

1940年1月,在东宁附近,进行了化学战实地研究。

1940年9月,在牡丹江附近,进行了毒气弹射击学习。

1940年9月,在呼伦贝尔附近进行氢氰酸研究学习。

1941年11月,在白城子附近进行50公斤航空氢氰酸弹空投学习。

1941年8月,在海拉尔附近进行氢氰酸研学习。

在前述研究演习中,从内容上看主要是实用性,尤其以氢氰酸的研究演习。

1935年1月在北安进行演习的内容如下:

一、目的

冬季在北满主要进行野战毒气队的应用研究,以检验瓦斯队在极寒地带的作战能力。

二、主要研究事项

1. 以一个投射中队进行暂时性及持久性毒气弹的射击试验,检验战术效果;

① 步平、高晓燕、笪志刚:《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第219~22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② 步平、高晓燕、笪志刚:《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第22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2. 冻土地带的射击准备；

3. 关于运输马匹的部队运动能力部分的研究。

三、毒烟及烟幕的使用

1. 研究在北满的气象条件下的毒烟及烟幕的应用；

2. 毒烟与烟幕混用时的攻击要领；

3. 受到毒烟攻击后的反击。

四、关于撒毒队的应用

1. 极寒地带撒毒队的撒毒能力及价值；

2. 手撒与机撒混合黄剂的要领；

3. 机械化撒毒校对的运动能力。

五、关于消毒队的应用

六、强化通过(撒毒地带)

七、预定试验场所：北安镇(克山东北50公里)

八、预定演习时间：1935年1月中旬，约6日

二、日军在东宁、牡丹江、孙吴、虎林的化学武器实验

1940年1月29日至2月10日在东宁的演习就是以苏联为进攻目标进行的。陆军习志野学校的正、副校长和研究部高级主事直接指挥了这次演习。

该演习在关东军司令部了解的基础上，由西原贯治校长统辖，副校长稻田正纯大佐(后为中将)和研究部高级主事宫本清一大佐(后提为少将)主持。在“满”苏国境东宁的正面集中了中央三机关(陆军部、参谋本部、教育总监部)的有关人员(专修员1940年1月29日在牡丹江第三军司令部集合)。①

该演习结束后，于1940年9月在牡丹江以北地区，关东军炮兵部队进行了毒气弹(黄弹)射击演习，由关东军炮兵司令官指挥，野(山)炮两个大队，15厘米榴弹炮一个大队参加；同时在呼伦贝尔地进行了氢氰酸放射实验，由关东军化学部长指挥。这两次演习是与东宁的演习有关系的。

黑龙江省孙吴县位于黑龙江边，是中苏边境军事重镇，日本关东军将其视为“军都”和进攻苏联的军事基地，同时也是日军生化武器实验基地。1935年在此进行的一次化学武器实验险些酿成与苏联的国际冲突。

在这一年的年末，关东军进行了一次“赤筒”的实验。当时的实验规模是在宽300米的正面上，每隔一米放置赤筒一只，一起点燃。点燃后，有毒的浓烟腾空而起，遮天蔽日，效果十分明显。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滚滚的浓烟不“遵守”国际间的规定，竟冲出“国界”，直扑向黑龙江对岸的苏联城市海兰泡(布拉戈维申斯克)，致使许多人受到伤害，引起了苏联方面的严重抗议。

1942年4月4日，日本关东军迫击第13大队(城第3107部队)从齐齐哈尔移驻虎林。迫击第13大队参加了日本关东军组织的毒气实验：

1943年左右，部队进行过发射芥子气和路易氏气炮弹的演习，对一些地区造成了污染。因为天色已晚，来不及消毒，就只对污染地区做了标志后结束了演习，但是当天晚上，当地居民因为捡拾弹片误入污染区，造成了皮肤的溃烂。大队长因此也受到上司的斥责。另外，在征胡台(黑龙江省虎林县——引者)进行赤弹演习的时候，中国人不懂得地上插的红旗是禁止进入的标志而误入实验区，军队认为正是极好的检验赤弹效力的机会，于是就根据风向故意使毒烟飘向中国人的方向。二三分钟后，毒气到达中国人所在的区域，中国人顺来的道路拼命逃跑，但是跑出五六十米就倒了下去。②

---

① 〔日〕陆军习志野学校校史编纂委员会：《陆军习志野学校校史》，第319页。

② 〔日〕迫击第13大队史编纂委员会：《迫击第13大队史》，第51页，1980年。

三、日军在呼伦贝尔进行的化学武器实验

(一)以人和动物为材料的毒气实验活动

有关日本关东军在呼伦贝尔地区的毒气实验,步平先生在《北方文物》2001 年第 3 期发表的《残暴罪行不容掩盖》中作了详细的记述: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毒气实验有多次是在海拉尔地区进行的,而且规模相当大。

1939 年 5 月至 9 月,日本军队在诺门罕战役中受挫,从而意识到坦克装甲车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于是在开发自己的坦克的同时,也加紧研究与之对抗的武器,使用氢氰酸的“茶瓶”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手段。

这时日本陆军开发的“茶瓶”被命名为“一式手投罐”,是直径 11 厘米的球形玻璃瓶,内装 200 克氢氰酸,并装有安定剂,以防止氢氰酸分解。在遇到坦克或碉堡的火力点的时候,将其投向目标,玻璃破碎后,液体的氢氰酸迅速气化,可立即致敌人员死亡。①

为检验该武器的效力,在 731 细菌部队曾经多次进行过人体实验。在 731 部队的宪兵队服役过的古贺胜彦回忆在 1941 年 10 月左右,曾经以苏联军队进攻边境地区为假想,进行了毒气的实验:

把死刑犯固定在苏制坦克的前部座位上,戴着手铐和防毒面具,把坦克的空气清洁装置取出来,玻璃窗蒙上。在控制犯人呼吸的面具上安装了可测试其呼吸情况的装置,并将一个开关放在他的手上,一旦呼吸困难的时候,就可按那个特别按钮。这些装置都通过电线连接到距离坦克数十米以外的安全地带,从这里可以观察犯人呼吸的振幅和频率,也可知道犯人是否按了特别按钮,因为一旦按了按钮,蜂鸣器可以发出高音。参加实验的人都戴了防毒面具,仔细地观察着那些器械。

上司命令我把着手教给犯人使用按钮,并把下面的话翻译给犯人听:“如果感到呼吸困难,按这个按钮就死不了。”犯人说:“明白了。”

但是,我对这样的任务很讨厌,说完了那些话,我感到很口渴。我想,如果他真的按了那个按钮的话,实验不就泡汤了吗?我也必死无疑了。接着,在坦克里面还放了各种小动物土拨鼠、鸟类等。一切安置好了,我们从坦克的天盖出来,发出了准备完毕的信号,举起一只手左右晃动几次,离开了坦克。

接着向坦克投掷有毒液体,十几秒后,蜂鸣器发出了几声,虽然还在响,但是呼吸的振幅减弱了。后来,蜂鸣器的声音也消失了。周围寂静下来,振动也停止了。过了一会儿,电扇向着坦克打开的天盖开始吹风,让充斥在坦克里面的毒气散发出来。

在检测了坦克内的毒气残留值确认安全后,调查班的军人戴着防毒面具进入坦克,观察新开发的毒剂的效果,摄影班也同行。

尽管是死刑犯,也是人啊。每次都杀死这样的人,我感到恐怖和讨厌。但是一想到苏联可能会用其拥有的化学武器给日本以毁灭性打击,所以这样做也是不得已的了,我只好那样想。②

1995 年 9 月 13 日日本的《每日新闻》曾报道:

1942 年 4 月,731 细菌部队与 516 化学部队在内蒙古海拉尔市郊区的草原上共同进行了人体实验,使用了大约 100 人左右的俘虏。

当时的实验进行了 3 天,将用作实验的俘虏每二三人一组放置在四个碉堡内,他们的身上都放置了电极,可以从远处观察他们的心电图。由穿着防毒服和防毒面具的军人将“茶瓶”投入堡垒内,或者用装了光气的钢瓶向堡垒内发射窒息性的光气,以观察堡垒内俘虏的反应,直至那些俘虏死亡。为确认那些俘虏是否完全死亡,军人们手持试纸接近堡垒,检测堡垒内残留毒气程度。一次实验没有死亡的俘虏,在下一次实验时继续使用。

日本军人的回忆中记载,当时有 68 岁的男性中国人,在 731 细菌部队中就被注射了鼠疫菌没有

---

① 步平:《残暴罪行不容掩盖》,北方文物,第 79 页,2001 年第三期。

② 〔日〕古贺胜彦著:《谍报机关成员的战场》,私家版,第 147～150 页,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1992 年。

死,所以被拉来进行毒气实验。没有想到在光气的攻击下仍然没有死。于是一名军医给他的血管中注射了空气。本来以为这样就会立即死去,但是仍旧活着。再用粗大的针管注射空气,还是不奏效,用木棒狠击他的头,才使他死去。但是残暴的军人又对他的生命感到惊奇,居然又将该人进行了解剖,发现他的心脏同年轻人的一样。

在日本防卫厅技术研究所编《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一书和日本秋山金正编写的《陆军科学研究所及第六陆军技术研究所进行的化学武器研究经过概要(草稿)》一文中记述了在海拉尔地区进行过大规模的撒播毒剂的实验。

1940年9月,日本关东军化学部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草原进行了撒播30吨氢氰酸的大规模实验。在他们的回忆中,关于这一实验有简略的记载:

选择气象条件好的时机,在数分钟内撒播了30吨氢氰酸。30公斤的氢氰酸钢瓶两个两个地每隔一米排列,氢氰酸随空气的流动可以飘向远方。经检测,2公里之内所有的被实验的动物均死亡,4公里内马匹也死亡。①

1942年8月,关东军化学部与日本第六陆军技术研究所在内蒙古的海拉尔附近再次进行了大规模氢氰酸放射实验。这次放射的是装在500公斤的罐中的氢氰酸分两次放射,共使用了30罐。实验后,6公里以内的鸽子均死亡。②

日本《战争责任研究》第2号中也曾做了记述。

在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员井本熊男的"业务日志"中,还记载在1942年11月9日,曾进行了氢氰酸毒气喷射机的实验,在他的记录中说:

在1 000米的正面上,每隔25米放置50公斤的氢氰酸毒剂喷射机,共喷射17.5吨氢氰酸毒剂。结果在纵深2公里内产生致死效力,再纵深2公里内产生半致死效果,即浓度为每立方米1 500毫克。③

516部队经常在距其驻地较近的富拉尔基、扎兰屯、海拉尔等地在野外进行实验,并对当地的中国居民造成严重的伤害,致使多人死亡。原516部队的队员渡边国义(1940年时在该部队所属的特殊汽车第一联队材料厂担任训练新兵的助教伍长,1942年担任练习队炊事曹长,1945年在练习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担任曹长,日本投降后被关押)曾经在1954年8月8日提供如下证言:

1940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的某一星期,在兴安北省海拉尔日军飞机场北2公里草原,借口毒气普及训练,以中国人为目标,进行了放毒。当时我是特殊汽车第一联队材料厂新兵训练助教伍长,根据教官中尉小世胜次的命令,我直接指挥命令10名新兵,在通向东面1公里拥有50户中国居民的村庄道上及草地上,秘密地散布了面积2 000平方米,毒量100公斤,杀伤效力1 000名,毒气有效时间一星期的糜烂性持久瓦斯。放毒结束后,于该村庄的小河里,还放流了附在放毒工具上的瓦斯5公斤。结果有中国农民6名通过该放毒地之际,由于身体中毒腐蚀而被惨杀。此外有中国男女农民约50名的脚和手因瓦斯腐蚀而受到伤害。

1940年7月中旬,于黑龙江省富拉尔基东4公里草地,在特殊汽车第一联队材料厂进行新兵放毒训练时,我是材料厂新兵训练助教伍长,奉教官中尉小世胜次之命,直接指挥命令新兵10名,在通向中国人村庄(西方700米处10户,西南1公里处30户,东北1公里半处30户)的道上及草地上,散布了面积2 000平方米,毒量100公斤,杀伤效力1 000名,毒气有效时间一星期的糜烂性持久瓦斯。结果有中国农民男子5名通过该散毒地区时,中毒后身体腐蚀而被惨杀,另有中国男女农民25名的手脚被瓦斯腐蚀伤害。

① 〔日〕防卫厅技术研究所:《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第206页,技术资第31号,1958年。

② 〔日〕秋山金正:《陆军科学研究所及第六陆军技术研究所化学武器研究经过概要》,1956年11月。

③ 〔日〕吉见义明、伊香俊哉:《日本的细菌战》,载〔日〕《季刊·战争责任研究》,总第2号,第20页,1993年。

1942年5月下旬至6月上旬，约两个星期，于兴安西省（应为东省—编者，下同）扎兰屯西南6公里山地，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为实验瓦斯效力，对中国人散布糜烂性持久瓦斯时，我以部队炊事系军曹的身份参加，对300名士兵供给了一切给养，援助了该散毒部队。这次实验毒死了中国农民3名，使70名男女农民的手脚受瓦斯腐蚀伤害。

1942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约2个星期，于兴安西省扎兰屯东南6公里山地，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进行瓦斯效力实验。向中国人散布糜烂性持久瓦斯时，我以部队炊事系军曹的身份参加，对300名士兵供给了一切给养，支援了该项瓦斯放毒实验。此次实验毒死了中国男性农民4名，使30名中国男女农民的手脚受了腐蚀伤害。

1943年1月中旬，于东北兴安西省（应为兴安东省—编者注，下同）扎兰屯东南8公里山地，我作为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本部附军曹，参加了训练队的山谷瓦斯发射训练，发射大型"赤筒"（喷嚏性瓦斯）50个，大型发烟筒50个，迫击赤弹30发。被害情况不明。

1943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约2个星期，于兴安西省碾子山东3公里山地，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进行瓦斯效力实验，对中国人进行糜烂性持久瓦斯放毒，我以部队炊事系军曹的身份参加，对300名士兵供给了一切给养，支援了该项瓦斯实验。这次实验毒死了3名中国农民，使得约50名男女农民的手脚受了腐蚀，或者由于"赤筒"（喷嚏性瓦斯）的毒害而使呼吸器官受了刺激伤。

1943年9月中旬，约2个星期，于兴安西省扎兰屯东南6公里山地，关东军化学部训练队进行散毒、放毒实验，对中国人进行糜烂性瓦斯及"赤筒"放毒时，我又以部队炊事系军曹的身份参加，对200名士兵供给了一切给养，支援了该项实验。此次实验毒死3名男性中国农民，并使约40名男女农民的手脚受了瓦斯腐蚀伤，或者由于气体瓦斯"赤筒"的毒害而使呼吸器官受了刺激伤。

1944年8月中旬，为在黑龙江省富拉尔基东4公里，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材料厂进行散毒实验，我（材料厂曹长）以协助散毒的身份，监督散毒班长伍长某以下10名，在通向中国人村庄（该地西南1公里及东北1公里半各有1个30户，约150人的村庄）的道路上及草地上秘密散布了面积2 000平方米，毒量100公斤，杀伤效力1 000名，毒气有效时间1星期的糜烂性持久瓦斯，结果通过该散毒地的中国男子4名中毒，由于身体受腐蚀而被惨杀，还有男女农民约20名的手脚受了瓦斯腐蚀伤。

1945年6月上旬，于黑龙江省富拉尔基部队演习场，当时我是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第一大队第一中队曹长，在训练队训练放毒时，我在炮的旁边，监督发射赤筒30发，对中国人放毒，瓦斯流向距该地300米的富拉尔基及齐齐哈尔的道上，使过路的及耕地的10名中国人的呼吸器官受了损伤。①

（二）毒气战演习

关于日本关东军在呼伦贝尔地区进行毒气战演习的一些情况，在日本"光人社"出版的《证言·昭和的战争》丛书中的一册《啊！海拉尔——第八国境守备队》中有一篇由日本人写的《满洲雪原上的恐怖的化学战》，专门讲日本关东军在呼伦贝尔草原进行化学实验的内容：

海拉尔的血色黄昏

司令部的房子终于建成了，我们被安排在2楼，那里有观测班、预报班、统计班和通讯班。虽然我们只进行了4个月的速成训练，但是训练很有成效，已经能够发挥作用了。我被分配在预报班。

11月，我和岩田接到命令，要我们到海拉尔参加一个月的毒气演习。

接受命令后，我们就乘上了从哈尔滨到海拉尔的列车。

（乘车过程和到达海拉尔的过程以及关于海拉尔的描述从略）

晚上，我们住在日本式的旅馆里，舒舒服服地洗了热水澡，一切疲劳都消失了。

第二天早上，有人来给我们每人送来一大包东西，原来是防毒面具，以前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见

---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2～445页，中华书局，1989年。

过。看来我们要参加的是毒气演习了,我和岩田互相对了一下眼神,谁也没有说话。

这就是毒气演习

爬到卡车上,视野很开阔。但是天气太冷,汽车开起来又有风,为了防寒不得不把帽耳都放下来,把头包的严严实实,只露出眼睛,其他地方都不能露风。

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始终徘徊在贝加尔湖附近,所以一直是干冷干冷的晴天。我和岩田把观测器械、通信器械都装到木箱里,用绳子仔仔细细地捆好,堆放在卡车上,然后背对汽车前进的方向,蜷缩在那些箱子之间,以躲避寒冷的风。

汽车的速度是30迈左右,但是机械传动发出的急促的声音给人以车速很快的感觉。海拉尔说是个城市,其实就是牧民们夏天的放牧的根据地,没有什么产业。只是由于关东军在这里驻扎和增兵,才使海拉尔有些生气。

汽车很快就开出了市区,眼前出现了白皑皑的雪原。

三辆汽车排成一行纵队前进在丘陵的谷地间,没有正式的道路,反正是怎么走都可以,无所谓道路。最前面车上拉的是当地的驻军,因为向导坐在司机旁边引路,后面的车都跟着他走。远处小山的上空有一片云,阳光从云的缝隙中照射下来,形成一束束奇妙的光线。光线投射在雪地上又反射回来,似乎是从雪地上发出来的光彩,真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奇特景象。突然车停了,命令"下车!"

前面两辆车上的士兵一下车就立即跺脚,看来是冻得不轻。原来停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稍微活动一下,避免被冻僵了。但即使是这样不时地停车小休,在车上面呆上一个小时都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就同坐在助手席位上的人互相轮换到驾驶室暖和一下。

第二次换到车上面时,汽车从海拉尔出发已经开了3个多小时。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前方的黑色的小三角形的东西。原来以为是鄂伦春人的部落,但是开到前面才发现是一大群帐篷。原来是为了这次演习专门预备的,有数十顶,俨然是一个大部落。

我们所在的气象队分到了两顶帐篷,帐篷是八角形的,中央有铁皮制的圆形火炉,这是关东军为在极寒地带对苏作战而专门开发的设备。帐篷的周围用雪围了起来,雪的高度几乎是帐篷的三分之一。只有门的部位有一个缺口。因为天气寒冷,我们不得不戴着手套搬东西,加上厚厚的防寒靴子,动作很不灵活。

进了帐篷后马上生火,燃料是木柴和煤。帐篷的顶上有一个黑黑的洞,烟筒从那里伸出去,烟筒与布帐篷用石棉隔开。每个帐篷都在生火,有的烟筒里冒出的是黑色的烟,有的却是像棉花一样的白烟。看起来真是一个帐篷村庄。

就这样过了一夜,从这以后,几乎一个月的寒地毒气演习,我们都是在这个帐篷里度过的。

这里位于呼伦贝尔高原的东端,哈拉哈河(应为伊敏河—编者)支流就从旁边流过,那也是我们的水源。把从那里砸下来的冰融化后烧水做饭。演习的第一晚,园部中尉在帐篷里对我们说:"这次演习是毒气演习,以检验毒气在极寒地带的效果。演习结束后,即使你们回到新京,也绝对不许向别人讲这件事。我们气象队的任务是检验在什么样的气象状态下毒气的效果发挥得最好。因为天气特别冷,一定要注意不要冻伤。"

听说在华北的山西,日本军队已经使用了催泪性的毒气。所以一旦日本同苏联开战,当然要使用毒气。研究在极寒地带使用毒气的方法,恐怕是关东军的重要任务吧。

明天就要进行演习了,我们都很兴奋,难以入睡。山下伍长带领少年兵在练习使用防毒面具,一遍又一遍,已经十分熟练了。外面值班的哨兵在帐篷周围走来走去,踩着积雪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数十根电线杆上的电灯都打开了,似乎像一座不夜城。这么多的哨兵一是为了防间谍,二是为了怕发生火灾。他们每隔两小时换一班,已经换了几班,我们还是没有睡意。

我们想起在东京的陆军气象部接受教育期间教员所讲的:

“所谓的毒气,分为液体和气体两种。芥子气和路易氏气都属于液体一类,是糜烂性的毒气,对于人或动物的皮肤作用强烈,可以用飞机将其撒播在敌方要塞或阵地的周围,像下雨一样,液体的效力可保持相当长的时间。

所谓的气体如‘光气’等,可以装在炮弹中;用掷弹筒或迫击炮发射到敌方。还有催泪性、窒息性和呕吐性的毒气”。

作为这次毒气演习所利用的实验材料,除了人以外,还有通信鸽和军马。演习的第一天,前往距离帐篷村数公里的雪原,进行催泪毒气的实验。

讲义上讲述的发射毒气最有效的气象条件是:

1. 在距地面5~10米的高度有气温的逆转层;所谓的逆转层,是说在一般的情况下,气温是随着高度而降低的区间相反,即温度与高度成正比,这一高度区间就是逆转层。演习那一天,气温的逆转层在地面以上6米左右。

2. 经常有吹向敌方的风,即风向基本稳定。

3. 风速在3~5米左右,过低不能将毒气迅速排放到敌方,过快又会把毒气吹散。演习那天,风向西南,风速3米。

我们气象队树立起7~8米高的铁管接起来的柱子,上面有风向计、风速计、温度计等,测量各个高度的温度和风向、风速。证明确实存在逆转层。

气象队的成员在2公里的宽度上分成几个地点,用风向计和风速计测量风,把结果用电话及时报告给本部。

催泪毒气罐高约20厘米、直径约10厘米,由士兵将其与风向成90度角排成一列,长达一公里。

排列好了以后,用电线把罐的导火索联接上,各种准备完成后,中队长一声令下,按电键通电后点燃了导火索,一排火花闪烁,发出“嗞嗞”的声音。不一会,火花消失了,随即黑烟在一公里的沿线升起,毒气罐开始放射毒气。一二秒后,黑烟越来越浓厚,像波涛一样翻滚,黑烟的前端像云层一样有细细的白色的边缘。

因为假想敌在前、东方,所以风向正好。

毒气发射后,戴了防毒面具的步兵部队开始向放毒的前方运动。两匹马被他们拴在前面的桩子上,还有两三个笼子,里面是通信鸽。

我们在观测完成后,也接到了戴着防毒面具向前方推进的命令,立即进入了毒气放射区。

尽管戴了防毒面具,但是我们的鼻子立刻嗅到了强烈的化学物质的气味,“哎呀!不得了!太呛了!”我们都拼命地向前跑,想冲出毒气区,但是眼泪和鼻涕一起流了出来,在黑黑的浓烟中,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出发前目测估计了距离,大约冲出毒气罐地带有50米,才能看清楚眼前的东西,我也总算松了一口气。擦去眼泪后再回头看,只见黑烟依然笼罩着山头,隆隆的炮声从东方传来。

慢慢地,黑烟飘过了山头,向远方的雪原扩散了,等确认已经安全后,园部中尉带领我们返回,军马和通信鸽的笼子也带上。

晚上,园部中尉在帐篷里对我们说:“看来在毒气攻击下,人是最弱的。马和鸽子都没有什么问题,这次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点。”

这一天进行迫击炮的毒气弹演习。天气相当晴朗,视野可达10公里左右,但是很冷。夜间的温度在零下30度,白天即使在下午也在零下15度。阳光在白雪的反射下闪闪烁烁,但是照在脸上似乎感受不到温度。

呼伦贝尔高原比较平坦,夏天是一片草原,冬天是一片雪原,我们就把气象观测站定在这样的丘陵上。

两个迫击炮中队位于观测站西南2公里的地方。

这次的演习目的是检查呕吐性毒气弹,调查毒气弹爆炸后的烟幕的扩散状态。考虑到弹片可能

造成的伤害,我们先躲避在炮队的后方。

所谓迫击炮就是同中国军队作战时经常使用的炮,炮弹的尾部有翼,飞行时发出声音,可以观察到它的运动路线,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中队长一声令下,两个中队的10门炮一起开火。声音很大,有些像开汽水瓶的音调。距离迫击炮近的话,可以看到炮弹飞行的弹道曲线轨迹。

炮弹在大约2公里的雪地上爆炸,雪和土被炸飞起来,黑烟升了起来。在10公里以外看,好像是舞台上戴着黑头巾的男人在表演,大概是呕吐性毒气出来了。速度不快的迫击炮弹在天空飞行的时候容易受到气流的影响而偏离轨道,有的炮弹偏到落在气象观测站附近。

"不好!炮弹发射结束后赶紧观测!"

园部中尉担心观测站受到破坏而无法进行观测。

炮弹发射了5分钟结束了,黑烟还没有散去时,井上军曹就直起身大喊:"好啦,跟我来!"我们也都起来,爬上卡车,向观测站迅速地冲了上去。

(以下是修复气象观测器械的记载,从略)

演习后半段的一天,下起了大雪。这时进行了从飞机上撒播毒剂的演习,撒播的是芥子气和路易氏气的液体。

在满苏国境线两侧,日本军队和苏联军队都有大量的要塞和阵地。在大兴安岭,还有许多使用中国的劳工建设的军事要塞,那些要塞的规模据说可以同法国的马其诺防线相媲美。在战争中如果在那些要塞或阵地的周围用飞机撒播了毒剂,就会起到切断其后路的作用。因为糜烂性毒气的伤害能力持续时间很长,为了不使自己人受到伤害,所以没有使用实物,而使用掺了红颜色的水。用红色的布在地面上铺了长20米、宽50厘米的十字,作为假想的敌人阵地,我们测量从各个高度撒播毒剂时候与风力、风向的关系。

一个月的演习终于结束了,我们把气象器械装到箱子里,准备返回新京过新年。但是,在海拉尔住了一夜后,接到命令,在一面坡还有15天的演习,气象队要参加,从海拉尔直接前往一面坡。①

(三)巴彦汗毒气实验场

1. 设立巴彦汗毒气实验场的原因

长期以来,一些中外专家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行的化学战进行了系统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证明:日本侵略军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生化武器实验,并在中国战场上进行了化学战。其中日本关东军所属的731部队、100部队及516部队曾多次在呼伦贝尔地区进行细菌、毒气实验,并在诺门罕战争中进行了细菌和毒气战。而巴彦汗毒气实验场,就是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设置的二战时期世界上最大的生化武器实验场。

日本关东军在此设立生化武器实验场,一是因为日军在当时一直把苏联作为进攻对象,而呼伦贝尔地区的气候、地貌等重要自然条件与苏联相似;如果与苏联发生战争,作战的环境肯定多是在寒冷的条件下进行,在此进行实验,除实验效果好外,还可直接投入战争。二是此地是游牧民的游牧场所,地广人稀,宜于保密。

2. 巴彦汗毒气实验场的自然概貌

巴彦汗地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托海镇行政区域内。处于巴彦汗山(蒙古语意为"富饶的最高山")西部,实验场得名于巴彦汗山。北与海拉尔区哈克镇相邻,与哈克站相距10公里;东北连巴音嵯岗苏木,东南、南部与锡尼河东苏木接界;西、西北部与巴音塔拉达斡尔民族乡接壤。实验场四角位置地理坐标:西北部北纬49°08′11″,东经119°50′44″;东北部北纬49°08′12″,东经119°58′09″;西南部北纬49°01′42″,东经119°50′44″;东南部北纬49°01′40″,东经11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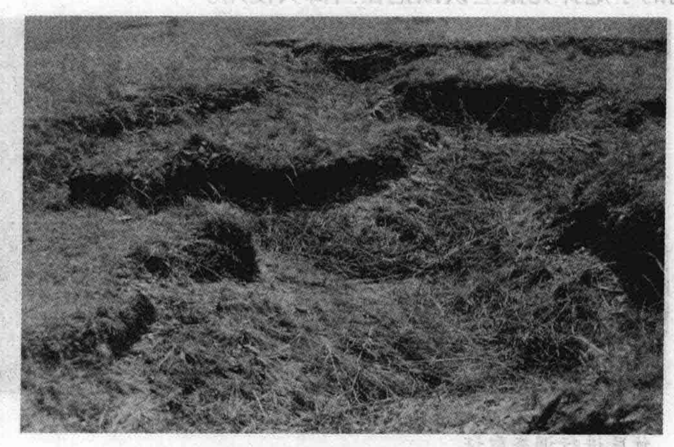
---

① 志贺清茂:《啊!海拉尔—第八国境守备队》,光人社出版,1992年。

03″。实验场中心位于东经119°54′44″，北纬49°04′48″。东西宽8.96公里，南北长13.1公里，面积110平方公里（不规则概算面积）。目前此地为巴彦托海镇雅尔赛、团结、巴彦托海、马蹄坑嘎查的打草场。

3. 巴彦汗毒气实验场遗构与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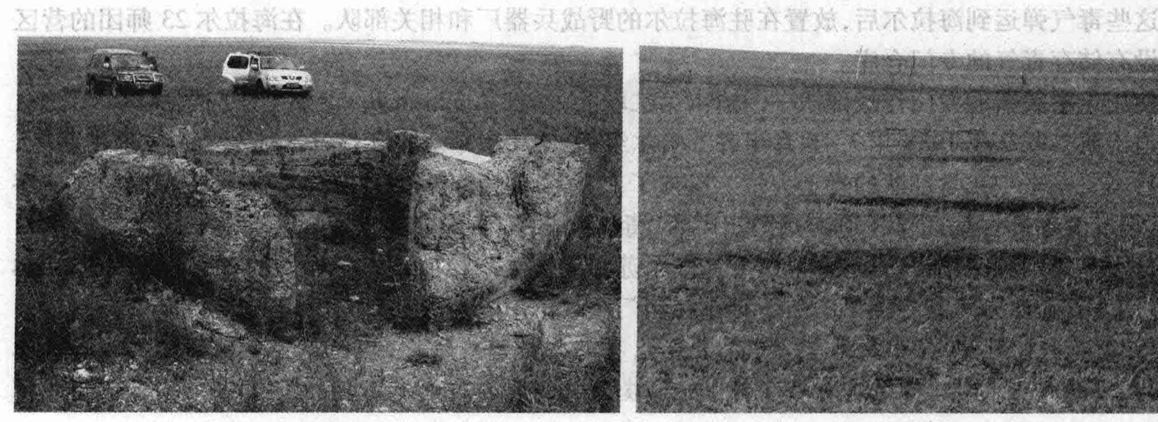
(1)遗　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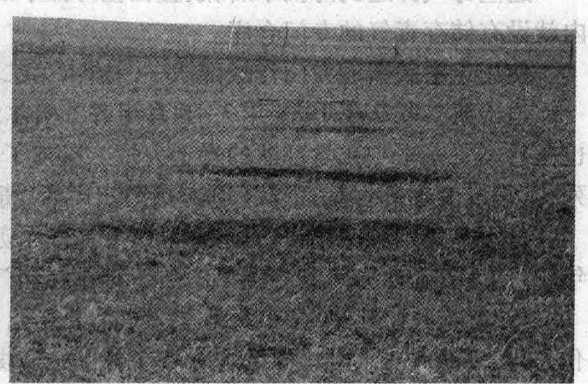

巴彦汗毒气实验场工事

巴彦汗毒气实验场的土筑遗构约有千余处，分布在近110平方公里的草原上。由于实验场位于草原深处，无人为损坏及当地植被良好，而没有被风沙埋没，所以时过60余年，实验场约千余处土筑遗构仍保存完好。根据生化武器实验的需要，日军在实验场构筑了形制各异的工事。根据考察实测，这些工事主要有堑壕、交通壕、汽车和坦克掩蔽部、各种步兵作战掩体、土筑炮阵地、指挥所、大小牲畜及小动物坑、混凝土碉堡和蓄水池及地下工事等30余种。主实验区设在北纬49°03′48″，东经119°54′44″。比较集中分布的有6处，其中南部多为马蹄形单坑、交通壕及部分堑壕；在北部多为能容纳汽车和战车的大坑和马蹄形及其他形制的大坑；在东北部是一片较大连片的堑壕、交通壕、能容纳汽车和战车的大坑、炮阵地、步兵作战掩体等；在西北部多为马蹄形步兵作战掩体，并在工事中间有均匀着弹点的炮弹坑，中部多为步兵作战掩体、炮阵地；在东北部高地和西部高地实验场边缘地带分别筑有混凝土碉堡、蓄水池和地下掩蔽部；在东南高地，则是一个单独的连片实验工事群，有多种形制。


巴彦汗毒气实验场马蹄形工事

巴彦汗毒气实验场大部分保存完好，但在实验场西北部因为建立人工草场需要，约有1万亩草场的数百处工事被马蹄坑嘎查的牧民用推土机填平，围上了网围栏，其内播种了牧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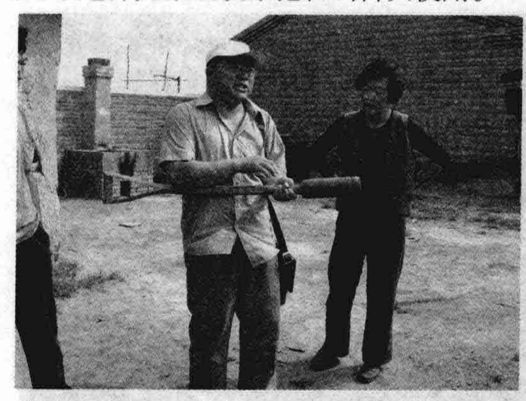

巴彦汗毒气实验场碉堡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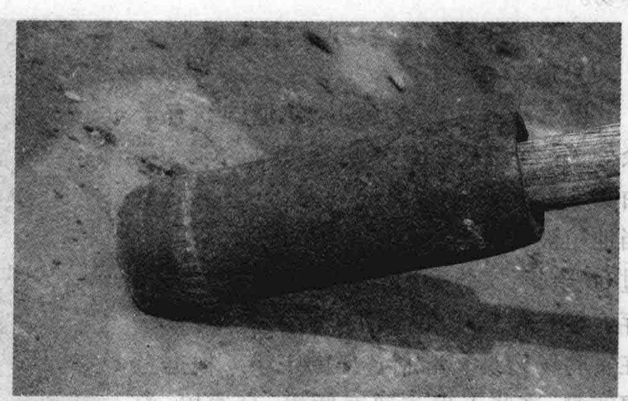

巴彦汗毒气实验场碉堡遗址

(2)遗　物

据当地老牧民介绍，在日军战败后，在巴彦汗地区曾发现过日军遗留下的木桩、铁器等物品。

近几年，住在实验场附近巴彦托海镇马蹄坑嘎查的牧民曾在此地捡到过爆炸后的炮弹皮，因为钢好，被人们打刀用了。牧民多金凤家曾捡到一颗20公斤重的炮弹被当作废铁卖了。牧民金铁柱将捡到的小炮弹壳镶上铁锹把在当榔头使用。


徐占江先生在实验场附近马蹄坑嘎查向牧民进行调查取证


炮弹壳做成的榔头

第三节　日军在诺门罕战争中进行毒气战

在诺门罕战争中，日军除进行细菌战之外，还进行了毒气战。日军使用的毒气主要有氢氰酸，也称青酸，陆军代号为茶1号，为神经窒息性毒气弹。制式化时间为1937年，主要由设在日本濑户内海大久野岛（原广岛县竹原市忠海町）上的"陆军兵工厂忠海兵器制造所"完成。这些毒剂、毒弹以及各种毒气筒，不断运往中国战场。有些毒剂是运到战场附近的兵器站装填到炮弹里的。日军的毒气弹有12种，分别配合13种不同规格的火炮使用。手投式毒气筒有三种：八九式催泪筒甲、八九式催泪筒乙、催泪筒丙。手投兵器中还有手投茶瓶。《日军化学兵器史》中记载：

"茶瓶"是直径11厘米的球形玻璃器皿，充填茶一号后加盖瓶塞。在接近坦克或火力点时（7米以内），把"茶瓶"投向炮塔或枪眼附近，即可使内部人员死亡。坦克的发动机从操纵室或炮塔中吸入空气，所以效力极大……坦克的了望孔和各个出口的盖子即使都封闭，只要命中履带上方，即可歼灭乘员。火力点有枪口，密封不可能严密，即使窗口密闭，只要命中枪眼附近，即可使内部人员死亡。①

在1939年5～9月的诺门罕战争期间，日军在战场上进行了毒气战。其毒气就是从日本大久野岛运来的。

这些毒气弹运到海拉尔后，放置在驻海拉尔的野战兵器厂和相关部队。在海拉尔23师团的营区内就设有储存毒气的专门仓库。

使用化学武器的专门作战部队——迫击第二联队（满洲第525部队）参加了诺门罕战争。

迫击第二联队于1938年3～5月于齐齐哈尔组建，属关东军。实际是日本陆军第一支迫击联队，也是日本关东军中化学部队的骨干力量。参加了1939年的诺门罕战争，当时配属第三师团的战斗序列，其编成为本部、第一中队（迫击）、第二中队（毒气）、材料厂，共454人，74匹马。②

日军在诺门罕战场进行了毒气战，并造成了苏军的伤亡。参加诺门罕战争的日军深泽美芳1954年4月21日在沈阳审判中提供了关于日军在诺门罕战争中进行毒气战的供词：

1939年4月5日（应为5月末——编者注），我参与诺门坎事件，担任二十三师团之兵力运输工作，部队长是川根大佐。于拉鲁尔战斗中，发现被摧毁的蒙古军战车四辆、装甲车两辆、尸体约一百

---

① 〔日〕防卫厅技术研究所：《日本化学兵器技术史》，1958年。

② 步平等：《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第22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名。六日晚把日本人的尸体运回海拉尔,在该地休息了一个星期。后来,又参与了第二次诺门坎事件的弹药粮草之运输工作。七月,根据川根部队长的命令,我和井泽一等兵回海拉尔兵站兵器厂,秘密运送四发甲号瓦斯弹(每发五百公斤)供给第二野战航空队。四五天后,部队长命令把第一医院(应为诺门罕战场战地医院——编者注)内的一名苏军军官和一名士兵运回海拉尔第一陆军医院,途中苏军军官就死了。到达医院后,经医生检验结果是因瓦斯中毒,为此将汽车进行了消毒。①

第四节　日军毒气战的保密

日本大本营为掩盖其使用化学武器这种违背国际公约的罪行,在不断向侵华日军下达使用化学武器命令的同时,也下达了一系列严格的保密命令。

1938年4月11日,大本营颁布了《大陆指110号》:

可在下记范围内使用赤筒和轻迫击炮用赤弹。

1. 使用目的:对盘踞在山区地带的敌匪扫荡时;
2. 使用区域:山西省及与之相邻地区;
3. 使用方法:尽量与烟混用,以严格隐匿用毒事实,注意不留痕迹。

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根据这一命令向下属各军下达了使用赤筒并严加保密的命令。5月3日,第1军司令官香月向下属部队下达了《关于混用特种资材以及保守秘密的指示》:

1. 将毒气资材的筒及包装箱上的标记擦掉;
2. 使用过的赤筒须收集带回;
3. 教育时不使用文字资料,无关人员一律不得参加、参与;
4. 在使用时,尽量全歼用毒地区之敌,不留痕迹;
5. 避开居民区和交通便利之地区;
6. 不使毒气资材落入敌方手中;
7. 不得使用当地居民之马匹车辆运输器材;
8. 针对敌方攻击我用毒之宣传,我应称只使用烟,未使用毒气。②

在日军化学战教程中,也制定了"化学武器携带搬运办法",以保证在运输的过程中保守机密。

黄剂运输上应注意的问题:

1. 一定注意检查,勿使内部毒剂泄露;
2. 补给罐内部压力有增加的危险,在那种情况下,应缓慢旋开口盖排放,然后切实拧紧;
3. 放置车上运输前再次检查泄露问题;
4. 运输时必须携带防护器材;
5. 不得与一般弹药混载,更不得与其他化学武器混载;
6. 卸载时必须在军官监督下进行,必须稳当,不得使容器剧烈震动,决不可倒转;
7. 要预防运输途中容器的震动、倒转以及坠落等,必要时采取适当的处置;
8. 使用马匹运输时,不得使马匹沾染毒剂,为此需准备草垫、棉布等材料,以防备一旦泄露;
9. 运输时应以苫布覆盖;
10. 运输途中休息时须选择安全地带,不得泄露,随时监视;
11. 运输途中一旦发生毒剂泄露,应选择适当位置隔离,卸下后及时消毒,对马匹等进行消毒处理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战与毒气战》,第440~441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② 〔日〕粟屋宪太郎、吉见义明:《关于毒气作战的资料》,第230页,日本不二出版,1989年。

及其他处置。①

《关于毒气作战的资料》中披露了华中派遣军第2军保密措施：

1. 为保守秘密，将历来所称的特种发烟筒（即赤筒）、特种发烟弹（赤弹）统称为“特种烟”；

2. 将筒及包装箱上的标记涂掉后再交作战部队使用；

3. 交接时应有特别手续，以防遗失；

4. 使用时适当混入发烟筒或绿筒，以便掩盖，起到保守秘密的作用；

5. 使用之际须不失时机，充分利用，以全歼为目的，不可留下隐患；

6. 使用时尽量避开城镇、有第三国人居住区域及交通便利地点；

7. 不得使用当地居民的车马运输特种资材；

8. 特种资材不可落入敌方手中，运输及发烟之际须切实加以掩护，如有落入敌手之危险时，可将其引爆、销毁；使用后之烟筒应埋入地下或带回上缴，切不可留下凭据；

9. 应将使用时间、地点等情况从速上报。

该部队还规定了训练有关人员的方法：

1. 教育训练场所应尽量选择避人耳目的适当位置；

2. 教育训练尽量以口头进行，分发的印刷物不可落入敌方；

3. 教育训练地点须严格警戒，绝对禁止被训练者以外人员进入。

该部队还对对外宣传也做了规定：

针对敌人指责我方使用毒气的宣传，我方应以敌人使用毒气进行反宣传；

宣传由军一级实施，无关人员一律不得擅自表态。②

通过上述对使用毒气进行严格保密的命令和规定等，可以看出日军是绞尽脑汁来掩盖自己违背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的行为和罪行的。

第五节　日军毒气战遗害

一、国境要塞的化学武器

日本关东军为加强防御苏军进攻的实力和为进攻苏联做准备，不断把化学武器运进中苏、中蒙国境要塞区域各阵地，各要塞区域都单独建立了毒气储藏仓库和毒气弹存放地。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成为各要塞区武器装备中的特殊组成部分，是要塞攻防体系中极为重要的链条。在孙吴、黑河、东宁、海拉尔等地都发现了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并对当地居民造成极大伤害，至今这些化学武器还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

二、孙吴要塞阵地遗留的毒气弹

（一）毒气弹的掩埋

在孙吴北山一块空旷的坡地上，有一座高约2.5米、宽0.5厘米左右的水泥碑，这就是孙吴县政府1954年在此竖立的掩埋毒气弹的警示碑。上面写道：

这里埋藏着日伪军遗留的毒气弹，政府为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禁止入内。孙吴县政府1954年立。

① 〔日〕粟屋宪太郎、吉见义明：《关于毒气作战的资料》，第337页。

② 〔日〕粟屋宪太郎、吉见义明：《关于毒气作战的资料》，第336页。

有关孙吴县毒气弹被掩埋在这里的情况，1954年4月26日当时的孙吴县武装部给上级军分区的报告中说：

我县根据上级指示，为了给人民除害，把日伪残留之毒气弹调查清楚和作处理，因此，事先成立了处理毒弹委员会，并抽出一定的人力，在东北军区和省军区毒弹检查小组配合下，在3月中旬开始了毒弹与废弹的调查工作。于4月4日调查与包装工作基本结束，并经过勘察地形请批后，在上级政府和各部门的有力支持下，在4月17日开始处理埋毁。历经7天时间，在4月23日埋毁工作结束。



1954年4月孙吴县政府立在毒气弹掩埋地的警示碑

我县日伪残留之炮弹，虽然流散基地颇多，但大多数为榴弹，在调查了解过程中，只于一区西山十八仓库（日伪军火仓库）和孙吴镇里的居民26组、西兴供销合作社、西兴屯、山东屯、西南屯、工矿局、推销部等地群众所存放之废弹或收买之废弹中，发现了毒瓦斯筒和150、75、105等口径的毒弹。

清调的结果，一区毒弹共计513发，毒瓦斯筒4箱。这些毒弹的主要来源系过去齐齐哈尔市机械十五厂在我县收买皮钢时，群众从十八仓库捡回没有卖出所存起来的。毒弹清查后，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先向群众讲清道理，说明毒弹之危害性，使其自动交出。把群众中所存放之毒弹完全包装起来（工矿与企业自己负责包装），共包装了114箱（内有4箱瓦斯筒），并按委员会指定的地点集中起来，以待处理。

参加这次工作的工作人员13名（其中有东北军区工作组），医务人员6名，警卫人员14名，绘图1名。动员民工170人（包括车夫），大车25台，马62匹。因天冷没有开冻，在挖坑前事先使炸药把地皮崩开。因此共用炸药130公斤、雷管34米、导火索19米、废弹240发，崩坑宽6米、长7米、深4.2米。埋毁后用刺线围起来，树立了标志。

当年参加毒弹掩埋工作的孙作敏先生也证实说：

1953年齐齐哈尔北满钢厂在孙吴收购废钢铁，一些日伪时期遗留的废炮弹也被收去了。在冶炼前切割炮弹时发现有毒气弹，因此上报东北军区。东北军区为此专门下发了文件，要求各地清理日伪时期遗留下的毒气弹。这年秋天，东北军区和黑龙江省军区成立了调查小组，东北军区军械处派来了一个王参谋，省军区派来了一个孙参谋。我当时在县武装部工作，县里非常重视这件事，组成几个小组，对全县进行调查。



孙作敏先生

我们到胜山要塞（那时叫胜武屯）清查时，在那里还发现了日军的尸体，毒弹是在要塞一进门的两个水泥房子里找到的。我们对北孙吴的机场、要塞、军营、野战工事等地进行了全面清查，并把它们一一画下来，我记得负责绘图的是谷向阳同志。

孙吴县的毒弹主要分布在胜山、十八仓库、废品收购站，还有一部分是群众拣到的交上来的。清查结果是500多发毒弹，在武装部的原日军军火仓库中还清查出几个毒气罐。

为什么在孙吴会有毒弹呢？当时日本把孙吴当作对苏联作战的主要防线，在这里修了大量工事，许多工事是永久性的。日军对此下了很大力量，弹药也集中在这里。这整个清查过程中，其他地方只有黑河发现了两桶毒剂。怎么知道是日军的毒弹呢？当时这里没有中国军队，只有日本军队，而毒弹都是从日军工事里找到的。孙吴不是最早发现毒弹的地区，东北军区军械部早已掌握了什么样的是毒弹，有识别日遗毒弹的标志图。调查人员把毒弹搜集回来后，由王参谋做了全面检查。


日本学者山边悠喜子考察孙吴系列化学武器

我们把这些毒气武器全部集中在武装部院内。经过请示，1954年3月份，东北军区决定将毒弹深埋。在埋毒弹时，王、孙二位参谋也来了，县里就是我参加了。

当时对埋藏地点的要求是在30年以内没有矿可采，要深埋4米以下。经省政府批准选好地点，就开始工作了。

4月份，孙吴的土地还冻得很深，我们三人去山里，用炸弹崩开一个大坑。埋毒弹时，我们动员民工用大车把毒弹拉进山。为了安全起见，县里的邹乃朋医生也跟去了，还带着药包。那时没有什么保护措施，每人发一副手套。坑深4米，上面3米见方，人下到坑里去一层层摆的。毒弹有装箱的，也有单个的，埋时没有区别毒弹类型。有几箱毒罐，罐体10公分粗，30～40公分高，外面是灰色的，每箱里装好几罐。从黑河用马车运来两个毒桶，每桶50公斤。整个掩埋过程用了近一天的时间，没有出现中毒受害情况。埋完后，四周用铁丝网围起来，第二天在旁边立了石碑。当时还请县照相馆来拍了照片，照片是8寸的，东北军区、省军区和县武装部都留一份。

因崩上来的冻土块很大，回填后虽高出地面很多，但也有许多空隙，后来化了冻，土就往下沉，加上雨水冲刷，现在看到的是一个大水坑。当时掩埋毒弹，一颗也没留在外面，现在地面上有一些，估计是农民挖出来的。

（二）2002年挖掘运走

中日两国政府于1999年正式签署了《关于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日本政府明确承认了遗弃化学武器的事实，承担履行销毁的责任。

2002年9月5～27日，中日双方在中国首次进行了化学武器的挖掘。在孙吴县北山挖掘现场，作业面积为9 000平方米，分指挥挖掘、收、储存三大区域。中日双方出动200名专家、工作人员和防化兵，经费完全由日方负责。

在挖掘现场，5米宽的沙石路两侧是白色的道牙，十分规范、整齐，指挥区的8座帐篷一字排开，门前是狭窄的红砖路，最外侧是一条红色绳索，红线内是指挥区域。

这里提到的化学武器是指用毒剂杀伤有生力量的武器，所谓毒剂是指作战中以毒害作用伤人的化学物质，按毒理作用可分神经性、糜烂性、全身中毒性、窒息性、失能性等类型，按毒害作用持续时间又分持久性和暂时性两种类型。

2002年9月5日上午10时，孙吴挖掘遗弃化学武器作业启动仪式举行。

日本政府内阁政务次官奥山茂彦，中方协助团负责人、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在华武器问题办公室主任滕安军分别讲话。

9月20日,中国新华社记者在现场询问日方调查团团长藤井,他说:这里的土比我们想象的硬,挖起来很困难。4月,日本方面相继出动两个专家组,对北山的地理位置、化学武器埋藏点的规模、风险等情况作了详细勘测和评估。由于埋藏位置在地下三四米处,此次仅挖开地表土就用了5天时间。第一枚常规炮弹于9月6日挖出,以后挖掘工作就比较顺利了。到9月27日,所有的毒气弹及其他毒品一并挖出,安全地运送到齐齐哈尔临时托管库保存。

三、黑河毒弹遗害

毒气受害人何长海的哥哥黑河锦河农场职工何长安在写给黑龙江省社科院的历史研究学者高晓燕的"受害者自述"中说:

1945年8月15日,日本人跑了以后,我父亲到黑河市上马厂南山兵营拣破铜烂铁,当时看见一罐100斤装的液体,以为是汽油,就拉回家。打开罐盖闻到一种药味,以为是灭苍蝇的药。有一天天气很热,屋里苍蝇也多。就打开罐用喷雾器吸了一点,在屋内喷了3下,并没有多喷,想看看效果如何。时间不长,我们就觉得眼痛,跑到外边去了。受害最深的是我最小的弟弟,他当时只有1周岁,在屋里睡觉。我们年龄较大的兄弟3人和姐姐在次日感觉眼痛、皮肤红肿。小弟弟三天后眼肿皮肤溃烂,不知什么原因,来到黑河医院治病。在当时黑河和平医院是最好的,是私人开的。我们家卖了所有的生产资料和马匹,上面的4人总算治好了,可是最小的弟弟就活活地烂死了。他叫何长海……

1996年1月10日,58岁的何长安向前来调查的高晓燕等学者讲述了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我们那一带都叫上马厂(现在是上马厂乡),我家住在法别拉村。还有一个上马厂村。日本的南山兵营离我们有10多公里,渡过卧牛河,一上岗就是。老黑河人都叫它上马厂兵营,那兵营很大,满山都是房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时,我只有6、7岁,日本人逃跑的一幕幕我记得很清楚,就像在眼前一样。日本人在兵营里丢下的东西,被苏联军队拉走了不少。等我们老百姓拣第二遍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可拣的了。那时,我也跟着大人们整天在南山大营里转,后来就发现了这么个铁罐,就像汽油桶似的,但比汽油桶小,外面是绿色的,挺新,晃晃还挺沉,不知里面是什么。打开罐盖闻闻,就像杀苍蝇的药水。人们分析说,可能兵营里也有苍蝇,需要杀灭,所以备有灭蝇水。因为觉得那种罐挺好,琢磨着将来还能装别的东西,就把它拉回去了。

1946年夏天,苍蝇很多。当时在我家搭伙干活的叔叔就用抽子抽了一点这罐里的水,在屋里喷了3下。农村的屋子大,我们家有3间房,这是最大的一间,三面火炕,大约有50平方米。当时大伙还说不知是什么药,少喷点试试。

当时我小弟弟何长海1岁左右,在炕上睡觉,我大哥、二哥、姐姐和我都在家,屋里外头跑着玩。喷完药不大一会儿,我们就觉得眼睛不得劲,我父母都在外面干活,他们一看,我们几个孩子的眼睛都红了,就像得了"红眼病"似的。大家奇怪怎么突然都得了这样的病。第二天我们的眼皮也肿了起来,脸上出现红斑,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由于我们几个大的孩子当时闻到味就跑出去了,只有我小弟弟一直在屋里睡觉,所以他的眼睛肿得最厉害。而且夏天热,他当时身上只盖了一层布,露在布外面的地方,包括身上、脸上、胳膊上都红肿起来,到了第三天就起了黄水泡,比黄豆粒子还大,浑身淌黄水。

父母领着我们到黑河和平医院看病,这是黑河当时最好的医院,这里有一个在日伪时期学医的大夫叫丁二弟,他看了我们的症状后,问是怎么引起的。我父亲说:"好像是喷苍蝇水喷的。日本人跑了以后,我拣了一罐杀苍蝇的药水,就喷了3下。"大夫说:"我估计你喷的不是灭蝇水,而是一种毒,是什么毒不知道。"

家里为了给我们治病,先卖了马,又把刚打下的粮食卖了,钱都花光了,我们4个大孩子因为中毒较轻,治了一个星期左右就好了。可怜我那小弟弟,全身溃烂,到底也没有救活,从中毒到死也就是10多天的时间。那种毒可真厉害。

我们知道这是毒了,就谁也不敢再碰它,把罐弄到房后,埋在院子里了。

我家当时是7口人,父亲何庆丰,母亲何雅仙,大哥何长兴,二哥何长茂,姐姐和我,小弟何长海死后,对我父母的打击很大,不但孩子没了,为了治病把辛辛苦苦置办起的一点家产也折腾没了。那几年生活十分困难。

直到1954年,政府派人来调查毒剂罐的事,问我们"有没有受害者,毒剂现在哪里?"这才知道我弟弟烂死的过程。黑河防疫站和人民武装部来的人把毒剂罐挖了出来运走了。他们都戴着口罩和手套,是用马车拉走的,拉到哪儿去了我就不知道了。

高晓燕等学者在调查这起黑河毒剂受害事件的过程中,又了解到另一件日军遗留毒剂伤人的事。

据现住孙吴的钱如九老人讲,他家原住黑河上马厂乡上马厂村,他记得光复后村里发生了一次毒剂中毒事件:

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东北,日本关东军都跑了,黑河上马厂村农民都上南山日本军的营房中去拣日本军队遗留物资。村民吴凤山(现年84岁,尚在)看到一个装着不知是什么液体的铁罐,当时以为是"坏水"(即稀硫酸,在用锡焊接金属时,用以腐蚀清理金属表面),就把这个罐拉回来了。罐上的螺丝很紧,当拧开时,液体就流出来了一些,村民中有好奇的就用手去摸。有一个叫张老二的人(现已去世),用手指摸完,又用这个手指头擤鼻涕,结果鼻子和手指都起了泡;还有一个叫王宪章的青年人(也已去世),用手摸完后去解小便,结果阴茎上沾染了毒液,也引起溃烂;最严重的是吴凤山的儿子吴龙昌,他当时才6、7岁,他的手触摸过毒液后起泡、腐烂,烂得很厉害,由于这3个人受害很严重,皮肤腐烂得很快,就把曾在上马厂村住过的外科医生康跃廷接到上马厂村给这3人治疗,经过3个多月的治疗,这3个人基本上被治好了。王宪章和张老二没落下残疾,吴龙昌因手心烂得严重,治好以后,他的手一直伸不开。后来也曾结婚生有儿女,但现在也已去世了。

钱如九老人说:"后来,那罐毒剂被推到黑龙江里去了,我还帮着推来着。"

为了证实这一事件,高晓燕她们于1996年1月11日赶往上马厂乡上马厂村。

在张地营子村吴凤山老人向高晓燕等人讲述了他儿子吴龙昌受毒气伤害的事:

是光复那年,我们都去山上拉东西,邻居张老二看到有一个罐,以为是好东西呢,就拉回来了。他把罐拉到江沿,我儿子吴龙昌当时10来岁,去江沿玩碰上了,左手起了泡。张老二也受伤了,还有一个叫王宪章的小便沾上了毒,就烧坏了他们3个人。

那时我们家5口人,3个孩子,龙昌是老大。我看孩子的手起着大泡,整天疼得直哭,那遭罪的样子真让人心疼。

我带他去黑河看病,治这病可费了不少事。先到黑河荣久医院去看,人家不给治。多亏了有个外科的康跃廷大夫,他在上马厂住过,后来搬到卡伦山村去了。他是从外地来的,当时他也就是20多岁,他用自己配的药膏给这几个人治。那病不爱好,治了有3、4个月才好。我儿子的手背上留下了一些伤疤,后来还能写字、干活。张老二和王宪章也好了。现在他们都过世了。

四、东宁毒剂遗害

1968年春天,东宁县有位老头上西山刨地时,发现了两个铁桶,于是一个刘姓司机把桶拉下山来。这两个桶类似于汽油桶,其中一个桶转圈带螺丝,都锈上了,刘姓司机用汽油泡一下后把螺丝卸了下来,发现内壁是用铅铸的,里面尽是水,还有的像面碱似的,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他们把水倒出来,用火架在下面烧,里面有1公分厚的软铅,当时,铅是比较稀少的金属,老百姓经常用来浇铸渔网的坠子。

东宁县运输公司的徐景飞和谢树春是这位老人的邻居,喜欢打鱼,当一个桶化的铅使完了以后,他们想再化第二个。这个桶上不带螺丝,有3个大铜帽,从这里面倒出来的不是清水,像酱油色的,浓稠,桶里的液体都倒了出来,只剩点残渣。谢树春用电焊枪切割桶盖时,刚一冒火花的一瞬间,从3个铜帽眼里冒出了1丈多高的气流,响声也很大,就像老牛叫。当时有点微风,谢树春在下风头,液体落下来,都落到他的身上,徐景飞一点也没挨着。落在谢身上的液体黏糊糊的,像油似的,他当时就在运

输公司的水龙头上把落到身体上的液体冲洗了,洗的时候谢的眼睛刺痛,疼得都叫人难以忍受。

晚上5点多出的事,8点多钟就不行了,他的眼睛就像用开水烫了似的有一层白膜。当地的下乡大夫根本弄不明白,来到牡丹江医院,有个姓谭的医生,用盐水把眼睛上的白膜冲下来,谢才能模模糊糊的看清东西。到了第二天早晨5点多钟,谢的身上起满了小红点,凡是溅上液体的地方都起了小泡,洗头时可能是毒液扩散了。整个头上、脸上都被染上了,手上也起了泡,连成片,头发、眉毛都掉了,一根都没有。在牡丹江住院时头都是肿的,鼻子、嘴角都是模糊的,如果不是刘大夫给他用油纱条治,可能鼻子、嘴就长到一块了。

大夫问接触了什么,他们照实说了。从桶里倒出一小瓶液体送到绥阳驻军防化部队,经检验后就是日军的芥子气。部队首长非常重视,派来一个防化班,把染上芥子气的地方都消了毒,把毒桶送到西山里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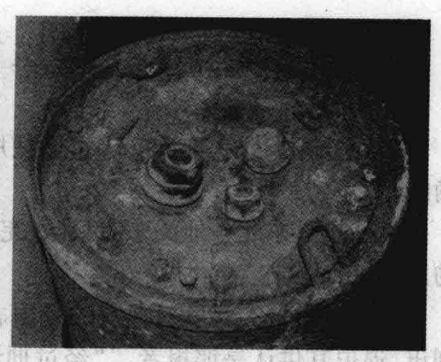
那时候生活得都很困难,谢穿的卫生衣没舍得扔,他的妻子放在盆里用棒槌弄了好几遍,后来用手洗,也被染上了毒,3年中,一到夏天就起斑,变黑。

谢树春好了以后只上了几年班,总有病,没过几年就死了。

五、呼伦贝尔地区遗留的化学武器

1997年8月,在海拉尔河西某面粉加工厂的厂房地下2.5米深处挖出一个具有日本遗弃散装毒剂桶外观结构特征的铁桶,高73厘米,直径46厘米,顶盖外缘为一圈固定螺栓,中部有3个较大的铜螺帽,其中2个铜螺帽上有"W"钢印字样,重190公斤,桶上端有一条约3厘米的黄色色带,内有液体声。出土铁桶之地为一直径1米的砖砌竖井,上面覆盖有铁丝网。





毒气桶

第五章　特别输送

第一节　特别输送的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及日军731部队实施细菌战的罪恶史中,完全违背国际法,反人道、反人类的暴行数不胜数。其中,尤为令人发指的是它使用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人,也有俄国人、朝鲜人、蒙古人等,进行各种细菌武器的研究、制造、实验,直至实施细菌作战。但进行细菌试验,需用大量的活人作材料。活人从何而来?为此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总长东条英机、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田中静一、警务部长梶荣次郎及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等人经过秘密策划,决定实施"特别输送"计划。"特别输送"又称"特殊输送",日文为"特移扱"。1938年1月26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下发了58号文件,规定并实行"特别输送"。

731部队特设监狱,关押的"特殊试验材料"多是爱国志士、反满抗日地下工作者、苏军被俘人员和地下谍报人员及其他国际反法西斯战士,他们是各地日伪军警宪特通过多种形式抓获后"特别输送"来的。

1943年3月12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又向各地宪兵队及分队下发了关于"特别输送"

通知的第120号文件。该文件将“犯人”划分为“间谍”和“思想犯”(民族运动和共产运动分子)两大类,并根据“犯人”的类别、“罪状”的性质和具备条件等确定了“特别输送”对象的标准,即:“依其罪行程度,预料到必须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并没有被收买和利用价值者”;“一贯进行间谍或破坏活动分子,至今仍怀有亲苏反日思想,并没有被收买和利用者”;“虽然预料到该犯提交到法庭审判后将被释放,但属于鸦片吸毒的无家可归的游民,而且顽固地怀着亲苏反日情绪,并无悔悟表现,甚至有重新犯罪的严重危险者”;“当过抗日游击队员或从事具有同等危险作用活动,无接受感化希望者”;“因参加秘密活动,而其生存极不利于军队与国家者”;“与‘特别输送’的犯人同一思想,罪行虽轻,但不宜将其释放者。”①

根据上述各项规定,日军各宪兵队、宪兵分队、宪兵分遣队对被捕的爱国抗日人士和情报人员直接进行秘密审讯,然后将审讯报告逐级上报至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经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下达关于处置苏谍的“特移扱”指令后,各宪兵队将被捕者秘密押送至哈尔滨宪兵队,由其交给731部队,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直至残害致死。因为“不经庭审,不把他们的案件交给法庭就径直把他们送交731部队去。这是带有特殊性质的办法,所以此种手续就叫做‘特别输送’”。②

第二节　特别输送的实施

“特别输送”是关东军731部队使用活人进行细菌战实验的第一步、关键环节。其程序是非常明确的。

第一步是东北各地关东宪兵队、宪兵分队、宪兵分遣队按照事先研究确定的抓捕计划,抓捕中国的反满抗日志士。

第二步是各宪兵队对抓获的爱国志士进行审讯。“在数次或数十次的审讯过程中,进行残酷的刑讯,逼迫其供认是谍报者。”“经过刑讯后,如证据不足时,即使是送交军法会审也得释放。在这种情况下,便建议队长作送交石井部队处理,类似这种例子以前是有过的”。③

第三步是宪兵队长提出并签署意见后,“缮写发送‘特殊输送’申请文件,即‘关于苏联谍报者×××的取调报告’;以暗号给哈尔滨宪兵队本部打了电报。”这里所说的暗号是“乙级密码”,这个密码是当时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文书科电务室主任兼任伪满治安部事务官渡边卯一郎制作的,而且他供述“向石井细菌部队运送被实验的人,也是用我制的密码联系的。”“司法部对爱国人士、进步分子、共产党员判刑、屠杀和秘密输送往石井部队做实验,也是用我作的密码联系。”④

第四步是将“各宪兵队报送(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司令官申请送往细菌部队的一切人员,首先由我(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第三科科长吉房虎雄)初步审查,后报经司令官批准,并由我的部下处理送往细菌部队的一切文件,即‘关于苏联谍报人员处置法令’”。⑤这个“指令”同时下发所报宪兵队和哈尔滨宪兵队。

第五步是被“特别输送”者所在宪兵队根据关东宪兵队司令官下达的“特别输送”指令,将被“特别输送”的抗日爱国志士捆绑并戴上手铐,由所在宪兵队派出两名或几名日本宪兵携带关东宪兵队

① 中国中央档案馆编:《七三一部队“特别输送”记录》,复印件。

② 苏《证人橘武夫受审经过》《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389页,莫斯科外国文出版局印行,1950年。

③ 中央档案馆等编:《细菌与毒气战》,第88页,中华书局,198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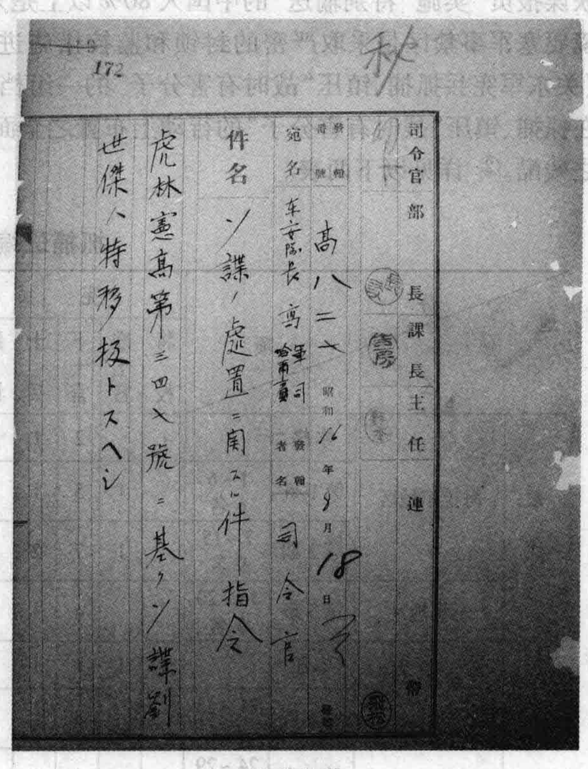
④ 中央档案馆等编:《细菌与毒气战》,第90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⑤ 中央档案馆等编:《细菌与毒气战》,第105页,中华书局,1989年。

司令部批复的报告书，乘车押送至哈尔滨宪兵队和哈尔滨特务机关，由其转送或直接押送至日军 731 部队。



档案资料



司令官部　長　課長　主任　連

番號　高八二〇

宛名　東安隊長　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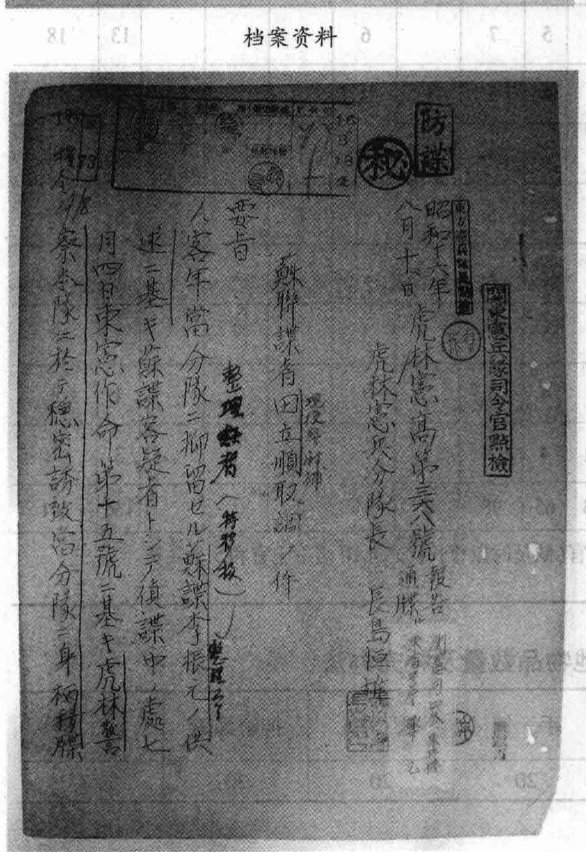
發翰　昭和16年9月18日

發翰者名　司令官

件名　ソ諜ノ処置ニ関スル件指令

虎林憲高第三四〇號ニ基クソ諜劉世傑ハ特移扱トスヘシ

档案资料



防諜

昭和十六年八月十日

虎林憲兵分隊長

蘇聯諜者田立順取調ノ件

要旨

档案资料

至此，这些爱国志士便作为日军 731 部队进行细菌战的实验材料而惨遭杀害。

2000 年 10 月至 2001 年 4 月，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学者杨玉林等人，先后走访了绥芬河、东宁、鸡东、密山、虎林、饶河等 7 个市县的 30 多个区、镇、乡、村，访问了约百余位各类证人。仅对已发现的 22 名被“特别输送”到第 731 部队进行细菌试验者的遗属和见证人的访问就有确凿的事实证明，被“特别输送”者大都是抗联人员和其他抗日志士，他们在日军的“大讨伐”以后，不得不转入地下，秘密搜集日军国境要塞的情报，为地下抗日组织及转移到苏联的部队进行特工活动。日军为了严守国境要塞及其兵力、武器配备的重要军事机密，严密布控，搜捕这些地下抗日人员。

2001 年由《东北沦陷史研究》杂志刊载的《吉林省档案馆藏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人员档案选编一》中，共有 42 名被“特别输送”者，全部都是来自东宁、密山、孙吴、瑷珲、阿尔山、齐齐哈尔、鸡东等地国境要塞军事禁区，除 1 名苏联人员外，其余

41 名全都是中国人。[①] 据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 731 研究所所长金成民先生的研究成果表明，被以“苏联谍报员”实施“特别输送”的中国人 80% 以上是来自关东军国境要塞区。这充分证明，关东军对国境要塞军事禁区是采取严密的封锁和监控措施进行保密的。从 2000 年《东北沦陷史研究》刊载的《关东军宪兵抓捕、镇压“战时有害分子”的一组档案史料二》附表 2、附表 3 中就可清楚地看到，日军在抓捕、镇压“战时有害分子”的行动上布置之全面，投入兵力之多，组织系统之严密，抓捕、关押手段之残酷。[②] 详见以下两表。

抓捕班编成及部署

地区＼分项				宪兵						满洲国警宪							合计
				将校	准士官	下士官	士兵	翻译	计	满警		铁警		满宪	保安局	计	
										满警	翻译	铁警	翻译				
本部	海拉尔地区	本部		1		2	1		4	2		1				3	7
		第1班	1~6 6名		1	5	1		7	13		2				15	22
		第2期	7~15 9名		1	7	2	1	11	18		4				22	33
	三河地区	第3班	16~20 5名			4	1		5	25						25	30
满洲里	满洲里地区	本部		1	1	1	1		4	2		2				4	8
		第1班	21~23 3名			4			4	8	1	4				13	17
		第2班	24~29 6名			2	2	1	5	7		6				13	18
		第3班	30~32 3名			2	2		4	5	1	4				10	14
		第4班	33~36 4名			2			2	3		8	1			12	14
		第5班	37~40 4名			2	2		4	6		1	1			8	12
	阿尔坦地区	第6班	41~42 2名			1	1		2	1						1	3
	扎赉诺尔地区	第1班	43 1名		1	3	1		5	2		1				3	8
		第2班	44 1名			3	1		4	3		1				4	8
		第3班	45 1名			2	1	1	4	3						3	7
合计				2	4	40	16	3	65	98	2	34	2			136	201
备考	1. 本部(特高课)的抓捕班从海拉尔分队派出，1 名准士官(缺员时以曹长代之)、10 名下士官和 5 名兵长。 2. 满宪及保安局视需要出动。																

抓捕时所需戒具和其他物品数量及补充办法

队署别＼区分	催泪弹	手铐	脚镣	押解绳索	摘要
海拉尔宪兵队本部	20	20	20	20	库存

① 杨玉林：《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实践研究》，载于《东北沦陷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

② 周艾民著：《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第 90 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

区分 / 队署别	催泪弹	手　铐	脚　镣	押解绳索	摘　要
海拉尔宪兵分队	20	10	10	10	
海拉尔国境警察队		5	5	10	
海拉尔铁道警护队		1	1	2	
第十宪兵团		2	2	4	
奈勒穆图国境警察队		5	5	10	
满洲里宪兵分队	22	11	6	11	
满洲里国境警察队		16	16	16	
满洲里铁道警护队		7	7	7	
扎赉诺尔宪兵分遣队	6	5	5	3	
扎赉诺尔国境警察队		7	7	7	
扎赉诺尔铁道警护队		2	2	3	
合　计	68	91	86	103	
备　考	1. 抓捕用绳索由宪兵警察官各自携带，不计入上表。 2. 因催泪弹作演习之用，但抓捕时如无库存可不使用。				

这仅是海拉尔一处国境要塞地域的所谓“防谍”组织及抓捕、镇压措施，但却反映出东起珲春，西至海拉尔17处国境要塞地域实行严格保密、残酷镇压的内幕。①

第三节　特别输送的规模与数量②

关东军利用“特别输送”残杀中国人民的活动是极端秘密的，不但规模大，而且数量也很多。

他们对“特别输送”对象的标准虽有明文规定，但无论是“通知”中的明文规定还是实际上的所作所为，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绝无严格的限制。这表现得最明显的是，除如前所述“文件”中规定之外，还利用“特别输送”滥捕无辜，从而使“特别输送”这种残酷虐杀中国人民的方式成为关东宪兵队及特务机关“立功”，取得“奖状”、“奖金”和“晋级”、“荣升”的手段。为此，他们人为地制造“特别输送”的条件。而为了造成“特别输送”条件，他们唯一的手段就是靠残酷的刑讯，即把人抓来后，采用灌凉水、殴打、过电、手指夹铅笔等刑讯，强迫其供认是谍报者。1941年8月，新上任的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第三课课长吉房虎雄中佐为了克服晋级大佐路上的障碍，想要拼命“干出成绩”来，他以“国境防谍”为借口，下令强化无线电侦察，并以奖状和奖金为诱饵，要求各宪兵队以各种手段来增加“特别输送”的数字。于是，日本宪兵队的宪兵们都红了眼。鸡西宪兵队长堀口正雄和半截河分遣队长津田准尉为了升官，便捏造了一个探听机密的罪名，强加在国境附近的三名善良的普通中国人身上；长春宪兵分队长橘武夫捏造了一份中国人的反满抗日黑名单，并一举把这几十名和平居民逮捕，并进行各种拷问，在没有得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也按其计划“特别输送”了。这一“优秀成果”为他后来当上宪兵司令部的课长并晋升为大佐奠定了基础；鸡西宪兵队长上坪铁一日夜都想着“荣升”，1944年11月初，他以刺探情报、进行反满抗日活动为借口，把住在平阳的善良农民张玉环及其父亲等15人逮捕，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凶残的拷打，一无所获，但他仍把这件事变成自己的“成绩”，将张玉环及

① 周文民著：《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第90～9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② 本节根据杨玉林、辛培林、刁乃莉著：《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追踪——日军细菌战人体实验罪证调查》摘编。

其父亲等6人作为“特别输送”处理了。①

据中国中央档案馆“731部队‘特别输送’记录”和黑龙江省、吉林省档案馆“特别输送”档案以及其他文献资料所载,也可以进一步看出“特别输送”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数量之多。

第一,日伪军、警、宪、特全部参与“特别输送”的罪恶活动。参与这一罪恶活动的不只是日军731部队,也不仅有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所属的各宪兵队、宪兵分队及分遣队,而且还有伪满洲国的各警察厅、各级警察局、保安局、特务机关以及国境警察队等。分解“特别输送”的过程,可以看出,它经过了对“特别输送”者的抓捕、刑讯、押送、接收、实验、致死等六个步骤,以关东宪兵队为主的日伪军、警、宪、特则从事的是前三项活动,731部队进行的是后三项活动。这说明,“特别输送”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殖民统治和镇压东北人民反满抗日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日伪军、警、宪、特等法西斯统治机构也是日军细菌战的参与者,罪责难逃。

第二,被“特别输送”者民族、种族构成广泛。其中,不仅有中国人,而且还有为数不少的朝鲜人、俄国人、蒙古人以及荷兰人,甚至是无辜的妇女、儿童和游民也无法幸免,可见其残酷性。

第三,进行“特别输送”活动的时间长、次数多。其时间是1938年始至1945年止,达八年之久;每年近千次,每次“特别输送”的数量有的一二人,有的七八人,还有的达数十人。1939年8月9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发出的第224号命令,一次就“特别输送”中国八路军被俘人员90人,其中有731部队本部30人、孙吴支队60人。而且,这是“依据关东宪兵队作战命令第222号所派第二批‘特殊输送人员’”。②

第四,“特别输送”的数量巨大。据川岛清供称:“第731部队中,每年因受实验而死去的大约至少有600人。”“从1940年至1945年间,通过这杀人工厂,因染受致命细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3 000人。”③吉房虎雄说:“从1937年起到1945年9月里,被石井部队杀害的至少有4 000人。”④根据黑龙江省档案馆所藏记载的“特别输送”档案有的是一天发一个指令,而下达“特别输送”的是两个人,如1941年8月6日的787号指令,“特别输送”的是季兴田、刘汉升2人;1941年8月13日的815号指令,“特别输送”的是盛桂题、董殿全2人。有的则是一天发出两个指令,每个指令就“特别输送”了一个人,如1941年9月13日的918号指令“特别输送”的是原美臻,同一天发出的919号指令又“特别输送”了一个人,即张汝成;1941年9月22日的935号指令“特别输送”的是于金喜,同一天发出的936号指令又“特别输送”了一个人,即矫吉明。川岛清才在伯力法庭上还供称:“石井部队对于用以进行实验的人是从未感到缺乏的。”⑤从现在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731部队每年用于细菌实验的人数要远远多于川岛清在法庭上所供述的600人。

第四节 要塞区特别输送的罪证

中国东北的中苏、中蒙边境地区,自日军占领该地区后,就有许多中共地下工作者和苏蒙谍报员在这里活动,其中有不少人在日军的围捕中壮烈牺牲,不幸落入敌手的反满抗日志士和谍报人员便被关东宪兵队按“特别输送”指令送到731部队。下面将一些在要塞地区参与了“特别输送”的原日军战犯的审讯记录摘录如下:

① 吉房虎雄:《杀人魔王石井四郎》,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历史的见证》,第73页,解放军出版社,1974年。

② 《平野部队〈阵中日志〉摘录》,《细菌战与毒气站》,第95页。

③ 《起诉书》,《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21页。

④ 吉房虎雄:《杀人魔王石井四郎》,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编《历史的见证》,第73页,解放军出版社,1974年。

⑤ 《国家公诉人底演词》,《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审判材料》,第464、465、462、468页。

一、森三吾口供

1954 年的一天,森三吾在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讯中供认:

1942 年 11 月,我任东宁宪兵队少尉战务课长时,得到汉奸李树桂关于佛爷沟煤矿工人王某(时年 35 岁左右)向苏联提供军事情报的报告后,命令宫泽曹长及郑翻译在东宁街将王某逮捕,经审讯后,我申请将其作为"特殊输送",司令官批准后,送石井部队予以杀害。

1942 年 8 月至 1943 年 11 月,东宁宪兵队和各分遣队将所逮捕的 11 名中国人送到石井部队作细菌实验。其中东宁分队送 2 名,大肚子川分队送 5 名,老黑山分队送 2 名,石门子分队送 2 名。这个数字是确实的,因为我当时是战务课长,事先曾参与研究逮捕的计划,事后又将各分队提出"特殊输送"的意见报给队长,积极参与了这一罪恶行动。

1944 年 3 月,我任满洲里宪兵队少尉分队长时,命令扎赉诺尔宪兵分遣队队长佐藤准尉,将与苏联谍报机关有联络嫌疑的彭志克达西逮捕刑讯后,他供出了嵯岗车站西 12 公里村庄的 8 名老百姓,于是在 4 月上旬,我指挥宪兵 15 名及嵯岗站守备队员 12 名,逮捕了这 8 名老百姓,经审讯后,将其中的姜巴拉江吉和彭志克达西二人作为"特殊输送"对象上报,批准后派人送到石井部队。①

二、成井升口供

1954 年 10 月 4 日,成井升在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讯中供认:

1937 年 12 月至 1940 年 3 月,我在佳木斯宪兵队富锦宪兵分队任庶务系助手和庶务主任期间所犯的罪行如下:

1938 年 3 月 15 日,佳木斯宪兵队于汤原一带对中国共产党吉东省委,即北满省委,进行了规模巨大的镇压和逮捕,共逮捕投狱约 300 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与抗日工作人员。当时为逮捕富锦县委的共产党员,我受分队长之命,在野口军曹的指挥下,还有另外 3 名宪兵,于 3 月 15 日的黎明在富锦县集贤镇,将中国共产党富锦县委书记冯玉祥、宣传刘某及委员 3 名逮捕,拘押于分队,由野口军曹、山崎军曹进行了约二十天数十次的刑讯,我除监视拘留所外,并协助刑讯。监禁四个半月后,按佳木斯宪兵队长儿岛正范的命令,我和山崎军曹将上述 5 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送往哈尔滨石井细菌部队惨杀了。②

三、高见忠夫口供

1954 年 7 月 9 日,高见忠夫在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讯中供认:

1939 年 3 月,我是海拉尔宪兵分队警务系上等兵,奉分队长池山靖少佐之命,与铃木勇曹长一起,将在海拉尔市内逮捕的 36 岁左右的中国男子 1 名,押送到哈尔滨车站,交给石井部队予以杀害。③

四、笹嶋松夫口供

1954 年 8 月 11 日,笹嶋松夫在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讯中供认:

1939 年 7 月,孙吴宪兵分队长毛利幸三大尉,根据情报命令部下坂口直藏曹长等 3 人,将在黑河省孙吴县曾家窝铺休息的、由苏联回国的中国爱国者(30 岁左右的男子)1 名逮捕。经审讯后,命福田静夫军曹送往北安宪兵队本部,以后由北安宪兵队本部送往石井部队予以杀害。当时我是庶务会计主任军曹,为逮捕而准备汽车,在监禁中指挥宪兵看守,并传达了输送的命令。④

1940 年 6 月,北安宪兵队长和田昌雄中佐令孙吴宪兵分队逮捕了中国情报人员刘某(刘相征),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与毒气战》,第 87～88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与毒气战》,第 91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③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与毒气战》,第 92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④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与毒气战》,第 94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经审讯后送往石井部队予以惨杀。当时我是北安宪兵队本部的功绩系曹长，对逮捕者发给奖状，并传达了送往石井部队的命令。①

1941年3月，北安宪兵队的宪兵在北黑线（北安—黑河）301次列车上，检查发现赵殿卿携带的是苏联颁发的居民证。和田昌雄中佐命令部下跟踪侦察。渥美清志少尉又令本部的奥田胜翻译官带领2名宪补（中国人）从龙镇上车，先沿北齐线（北安—齐齐哈尔）跟踪，后又跟至通北车站，没有发现同伙。于是饭原金司军曹将其逮捕，押回北安宪兵队本部审讯，然后送往石井部队杀害。

五、今关喜太郎口供

1954年10月19日，今关喜太郎在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讯中供认：

1939年10月至1940年1月，我奉命先后三次将命令东安宪兵队等向石井部队输送5名抗日人员充作细菌实验的指示，译成密码电报，由通讯所下达执行。

1940年12月至1941年6月，我奉命先后审查佳木斯、东安、孙吴宪兵队队长提出的拟送抗日人员共15名至石井部队的报告，我审查后草拟"电报呈请事宜，准予执行"的命令，经司令官批准后，传达给上述各队执行移送，使15名抗日人员成为细菌实验品。②

六、长沼节二口供

1954年9月11日，长沼节二在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讯中供认：

我任东安宪兵队特高内勤和消极防谍系军曹，是在1939年12月至1941年3月。在这一时期内，东安宪兵队长命令虎头分队、东安分队、宝清分队、平阳镇分队逮捕的中国抗日人员13名送石井部队处理。我用公文和电报向以上宪兵分队转达了队长的命令。③

七、原口一八口供

1954年8月26日，原口一八在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讯中供认：

1940年10月至1943年3月间，我在兴安北省地方保安局（分室）任事务官代行局长和理事官职务。

我在保安局（分室）工作的2年零4个月中，奉命指示保安局（分室）防谍单位及各国境警察队先后以通苏嫌疑者等名义，逮捕中国人70余名、苏联人6名、蒙古人15名，共90余名。经审讯后，根据中央保安局的指示，分别按四种办法处理：一、杀害；二、送哈尔滨石井部队；三送阜新煤矿作劳役；四、作特务逆用。其中被杀害的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21人；送哈尔滨石井部队作细菌试验的中国人、蒙古人40名；送阜新煤矿劳役的苏联人5名；送阿巴嘎日本军的蒙古人3名，长春蒙古学院逆用的蒙古人1人（名西野）；释放的10余名；其中的十四五人在我离职时还押在分室拘留所内。④

八、荻原英夫口供

1954年9月25日，荻原英夫在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讯中供认：

1942年1月（老黑山宪兵）分遣队的三浦卓伍长，在老黑山西村国际运输株式会社逮捕了1名中国抗日工作人员许某。当时我奉分遣队长之命，与三浦卓共同审讯后，将许某送到哈尔滨石井部队杀害。同年3月，三浦卓又在老黑山第十六野战货物场逮捕了1名中国抗日工作人员，我和三浦卓共同审讯后，由三浦卓送往哈尔滨石井部队杀害。

1942年8月，我在老黑山南村侦察发现了中国抗日工作人员康永昌，他逃到罗子沟被警察逮捕，我奉分队长米仓宪一之命，将其带回，严刑拷打后送石井部队杀害。

---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与毒气战》，第97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与毒气战》，第96~97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③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与毒气战》，第99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④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与毒气战》，第102页，中华书局，1989年。

1943年5月,小川五男兵长在老黑山车站附近逮捕了1名中国抗日工作人员,我受分队长之命将此人监禁,以后送到石井部队杀害。①

九、东一兵口供

1954年7月16日,东一兵在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讯中供认:

1942年5月,大肚子川宪兵分队将中国爱国者刘某(男,45岁,佛爷沟煤矿工人),以所谓"苏联谍报工作员"之名,送哈尔滨石井部队杀害。我是兵器厂派遣宪兵,与班长筱田重稔准尉及翻译方国万3人对上述被害者加以讯问。为了追查苏联当局对其指示的内容,让他跪在算盘上,用竹剑殴打其后背,并将其背手吊于天棚上(上大挂),用竹剑殴打,进行了残酷的刑讯,结果使其后背青肿往外渗血,两肩脱节。一个月后,其伤稍愈,由令畠山伍长押送到石井部队。在押送之前,我准备了缚绳、手铐。②

十、堀口正雄口供

1954年8月28日,堀口正雄在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讯中供认:

我任鸡宁临时宪兵队长时,辖有鸡宁、绥阳、勃利、八面通、林口五个分队和平阳镇、绥芬河、杏树镇、下城子、滴道、半截河六个分遣队及梨树镇、老黑山分驻所。

在职期间,我命令对搜集各地军情、各机关动向、工人动态、民心动向的抗日地下工作人员进行秘密侦查并加以逮捕。1942年8月,在平阳镇地区逮捕了约10名;在半截河地区逮捕了约20名;在鸡宁、滴道地区逮捕了约10名;在八面通、下城子、梨树镇地区逮捕了约15名;在绥阳、绥芬河地区逮捕了约15名;在林口、杏树、勃利地区逮捕了约10名,总计有80名左右。对这80名左右的抗日地下工作人员经过拷问审讯,按照"伪满军机保护法"、"治安维持法"等处理。其中由我提议,经宪兵司令官许可,于1942年9月至1943年7月中按"特殊输送"送交哈尔滨石井细菌部队约20名;送牡丹江省和东安省检察厅处刑的有25名;送鸡宁陆军特务机关处理的有20名;送伪满第六军管区军法会审的有10名;我队强迫使用者有5名。③

十一、平木武口供

1954年6月9日,平木武在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讯中供认:

我在1942年10月至1943年11月担任东宁宪兵队长,共领导东宁、虎林、宝清三个宪兵分队和斐德、虎头、饶河三个分遣队,另外还有一个密山分驻所,管辖了东安省东半部地区。

1943年5月,虎林宪兵分队饶河宪兵分遣队曾逮捕中国地下工作人员3名,其中1名按"特殊输送"处理,2名送密山法院处理。④

十二、阴地茂一口供

1954年6月18日,阴地茂一在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讯中供认:

1943年6月,在富锦宪兵分队,由永井伍长和另外2名,将决定交与石井部队作化学实验的中国爱国人士男子2名,由富锦向哈尔滨押送时,我曾给准备手铐和缚绳。我当时是兵长庶务助手。

1943年12月,在富锦宪兵分队,我与山口、小越一同,将决定送交石井部队作化学实验的中国爱国人士2名(男子),由富锦押送至哈尔滨。我当时是兵长庶务助手。

1944年6月,在富锦宪兵分队,小野武次和另外7人,将决定交与石井部队作化学实验的中国爱国人士6名,由富锦向哈尔滨押送时,我曾为其准备了手铐和缚绳。当时我是兵长庶务助手。

---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与毒气战》,第107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与毒气战》,第107~108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③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与毒气战》,第109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④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与毒气战》,第111页,中华书局,1989年。

1944年12月,在富锦宪兵分队,佐藤幸雄和另外2名,将决定交石井部队作化学实验的中国爱国人士男子2名,由富锦向哈尔滨押送时,我给准备了手铐、缚绳。当时我是伍长庶务助手。①

十三、田上末藏口供

1954年10月8日,田上末藏在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讯中供认:

1943年12月,我在富锦宪兵分队担任补助宪兵人事系内务班长、准尉时,受分队长庄治常二少尉之命,将拘禁的中国爱国者2名,派部下小野光男与阴地茂一押送哈尔滨石井部队。

1943年12月,富锦宪兵分队长庄治常二少尉率领曹长畠山藤吉郎、军曹小野武次以及其他宪兵10名,补助宪兵20名,以"清流工作"为代号,在绥滨县逮捕抗日地下工作人员及有关和平居民100名。经残酷刑讯后,因患斑疹伤寒而在分队拘留所死亡2名,因重病释放者10名,送石井细菌部队残杀者11名,余者释放。当时,我命令部下补助宪兵20名,参加逮捕、刑讯、监视,我还先后命令8名补助宪兵将中国抗日人员11名押送哈尔滨石井细菌部队。我在1944年5月26日转鹤岗勤务时,同被押送石井细菌部队的8名中国人,同船到达佳木斯。②

十四、小野武次口供

1954年9月23日,小野武次在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讯中供认:

1943年12月,我在富锦宪兵队担任防谍员时,参加了以"清流工作"为代号的大量逮捕杀害绥滨县中国地下工作者和有关和平居民的罪行。当时,在宪兵分队长庄治常二少尉指挥下的40名宪兵,在绥滨县共逮捕中国人约100名,分别关押在富锦宪兵队、伪满富锦宪兵分团、伪富锦警察署。其中我亲自逮捕了3名。对逮捕的中国地下工作者及和平居民,全部加以刑讯。由于残酷的刑讯及在拘禁中的虐待,在富锦宪兵队拘押的40名发生了斑疹伤寒,死去2名。

1944年3月至6月间,前后3次,奉命送石井细菌部队予以杀害者16名,余者释放。我亲自向石井细菌部队送去5名。③

十五、日野需口供

1954年8月15日,日野需在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讯中供认:

1943年底我在原东安地方保安局时,将中国爱国者2名送石井细菌部队。1945年5月我在原黑河省孙吴县特务股时,将中国爱国者2名送孙吴街日本细菌研究所作为细菌试验予以杀害。以上4人中,我亲自逮捕的有2人。④

十六、筱原隆雄口供

1954年6月2日,筱原隆雄在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讯中供认:

1944年4月,我被派到大肚子川宪兵分队时,该分队押有中国人5名左右,经过对这些人审讯,扩大线索,6月份又逮捕了15名左右。审讯结果:7月份由北川明军曹和守屋秀雄兵长2人,将按"特殊输送"处理的2名押送哈尔滨;9月前后,战务班长阿部一郎军曹和我又将按"特殊输送"处理的5名押送到哈尔滨。⑤

十七、志村行雄口供

1954年7月10日,志村行雄在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讯中供认:

1944年7月至1945年4月之间,侦察逮捕了中国抗日地下工作者朝鲜族李济[清]泉1名,"特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与毒气战》,第120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与毒气战》,第124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③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与毒气战》,第124~125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④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与毒气战》,第125~126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⑤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与毒气战》,第128~129页,中华书局,1989年。

殊输送”了。

1945年3月至1945年4月之间,侦察逮捕了抗日地下工作者乔连奎1名,“特殊输送”了。

1945年4月至1945年7月之间,侦察逮捕了抗日地下工作者王殿模,“特殊输送”了。

1944年6月开始,对扎赉诺尔煤矿及发电所进行侦察,结果逮捕了赵振明等四五人,其中2名被“特殊输送”,其余送伪检察厅处刑了。

1945年3月海拉尔分队逮捕1名延安派来的抗日地下工作者,“特殊输送”了。

1945年7月满洲里分队逮捕1名与苏联领事馆有关系者,“特殊输送”了。

1945年4月,三河分遣队逮捕了共产党员3名,“特殊输送”了。①

十八、平林茂树口供

1954年8月28日,平林茂树在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讯中供认:

1944年11月,富锦宪兵分队侦知1名地下工作人员嫌疑者。宪兵将其扣押并搜查其房屋,发现藏有富锦街地图,并标有日军飞机场用地等。经审讯,判明他是地下工作人员。此事上报后,宪兵司令官命令作为“特殊输送”(送石井部队)送交哈尔滨特务机关。我执行了宪兵司令官的命令。

1945年1月,根据师团的命令,富锦部队开始移动,这时有1名中国人秘密向汽车司机打听部队的名称和人员等。司机将此事告密。宪兵把该人逮捕,在搜查其房间时,发现有记载部队名称的纸片(用符号记的)。经拷问后,判明是地下工作人员,并报告给宪兵司令官,根据司令官的命令,以“特殊输送”送交哈尔滨特务机关,用作细菌试验而杀害。②

十九、长岛玉次郎口供

1954年6月10日,长岛玉次郎在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讯中供认:

1944年11月至1945年6月,东安、虎林、宝清、鸡宁、平阳各宪兵分队长将各该管区内逮捕了称为“苏联间谍”的中国抗日组织成员男子15名。审问后,根据(东安宪兵队)队长上坪铁一中佐的命令,送交哈尔滨石井部队,作为细菌实验予以杀害。③

二十、关山顺作口供

1954年7月23日,关山顺作在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讯中供认:

1945年5月上旬,我在伪瑷珲县国境警察队特务股任特务主任警佐时,以所谓无职业者激增影响治安为名,根据风间队长的命令,在各区队管内逮捕了中国人74名。其中62名送鹤岗煤矿强制劳动;5名释放;7名以抗日有关人员的罪名,通过哈尔滨特务机关,送731部队杀害。④

另外,由苏军缴获的关东宪兵队本部的公文中,有1939年把“犯人”押送给石井部队的关东宪兵司令城仓少将所签发的第224号命令,以及平野宪兵队的第一号作战命令等文件。现抄录如下:

关东宪兵队作战命令第二二四号

关东宪兵队命令

八月八日十六时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

(一)依据关东宪兵队作战命令第二二二号所派第二批“特殊输送”人员约九十名,于八月九日抵山海关站。到达山海关站后即派客车厢一辆输送,客车于八月十日十一时十五分由山海关站出发(客车厢挂在山海关至沈阳线列车上),十三日零时十三分抵达孙吴站。

①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与毒气战》,第129~130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②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与毒气战》,第132~133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③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与毒气战》,第133页,中华书局,1989年。

④ 中央档案馆等:《细菌与毒气战》,第135页,中华书局,1989年。

（二）由山海关至孙吴站间沿途护卫前项人员之责，由锦州宪兵队长担任。

被输送人员中除留下六十名应送达目的地外，其余人在到达哈尔滨站时即交付石井部队长。为此，须事先将应交付石井部队长的人员区分出来，以免在交付时发生延误。

前项被输送人员，应由承德宪兵队派出军官一名，平野部队派出下士官二十五名，关东宪兵队教导队派出卫生下士官一名负责护送。另由锦州宪兵队派翻译一名随往。

（三）承德宪兵队长派承德宪兵分队柴尾大尉，平野部队长派下士官兵二十五名（内有曹长一名），关东宪兵队教导队长派卫生下士官一名。所派人员均须于八月九日内到达山海关，听候锦州宪兵队长指挥。

（四）哈尔滨宪兵队长须与石井部队长取得密切联系，保证在哈尔滨站及以后途中竭力防范外国侦探，并采取必要的监督方法。

（五）平野部队及关东宪兵队教导队所派人员之路费，概由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支给。

（六）其他事项即依据关东宪兵队作战命令第二二二号办理。

关东宪兵队司令官　城仓少将

平野宪兵队在接到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的224号命令之后，立即发出由部队长平野大尉签发的第1号作战命令，详细部署了这次任务，包括平野部队拟派出一部分人员实行第2批"特殊输送"。由稻邑曹长率宪兵24名和卫生军士1名，火速由长春出发，到达山海关后，听从锦州宪兵队长指挥。出发之前还到宪兵队司令部领取了刑具，其中脚镣81具，手铐52具，捕绳40根，护送绳25根，另在沈阳宪兵队内领取手铐30具，护送绳40根。

从上述作战命令224号和平野部队作战命令第1号来看，"特别输送"准备是充分的，行动是迅速的，戒备是森严的。

1939年8月9日，一列由客车和闷罐车混合编组的列车抵达山海关车站，早就等在那里的日本宪兵立即把挂在列车尾部的一节车厢包围起来。车厢里关押着90名中国军队的被俘人员。这是一次为731本部及孙吴673支队运送活体试验者的非同寻常的大规模"特别输送"。由承德宪兵队、平野宪兵队和关东宪兵教导队派出官兵，由锦州宪兵队担负主要任务。稻邑曹长在山海关与锦州宪兵队长办好交接手续后，立即将这节车厢挂在山沈线的列车上。列车进入哈尔滨站，被押下的30名被俘人员，由哈尔滨宪兵队推上了早已等在站台上的731部队的"特别囚车"。其余被俘人员60名在闷罐车里，沿着滨绥线、北黑线行驶，于8月13日零时13分到达孙吴站，被关押在军管区的监狱里。731部队及其所属的孙吴673支队的研究人员随时在他们身上做"孙吴热"的传染及治疗的试验，其幸存者又继续成为冻伤试验对象。

第五节　要塞区特别输送受害者[①]

2000年10月至2002年5月，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学者杨玉林等人根据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档案记载的线索，先后对黑龙江省东部的绥芬河、东宁、鸡西、鸡东、密山、虎林、饶河7个市县及辽宁、山东和北京等地进行实证调查，并且首次成批发现众多的细菌实验受害者遗属和见证人，以及大量的实物证据。通过这些调查和实证资料，对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的内幕有了比较真实的了解。

一、李厚宾（彬）

李厚彬是学者杨玉林等人开始"特别输送"追踪调查以后的第一个调查对象。黑龙江省档案馆

① 本节根据杨玉林、辛培林、刁乃莉著：《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追踪——日军细菌战人体实验罪证调查》和杨玉林、辛培林主编《细菌战》中摘编。

所藏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档案第36号《关于审讯苏联谍报员李厚彬情况的报告》,即虎林宪兵分队1941年8月16日呈送虎林宪兵队记载:李厚彬,男,1909年6月29日出生于安东省安东县九连城村,1926年在原籍地东边道中学毕业后曾任小学教员、警官等职,1929年随其父母一起移居虎林县务农,1931年被虎林县公安局录用为警察,日本占领东北和伪满建立后仍任警察,先后在虎头独木河警察署、倒木沟警察署、亮子警察署、密山警察队和平阳镇警察队任警尉等职。1940年6月自动辞职,回虎林街(今虎林镇)开杂货店谋生。根据"苏谍"庄凤鸣的供述和东安宪兵队的命令,1941年8月8日于虎林县虎林街四道街住所将其秘密逮捕。该报告说,李厚彬在倒木沟警察署工作期间,被"1937年叛变入苏的原该地警察署长刘日宣'发展'加入谍报组织,作为同伙活动",直到被扣留时,李仍在"继续活动"。报告认为李厚彬"无逆用价值,适合特别输送"。1941年8月30日,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发布指令:"根据虎林宪高第386号,同意将苏谍李厚彬特别输送"。命令原件上有原守的签名和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第三课课长吉房虎雄的名章。①

二、王明生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原恒山煤矿劳务系佣人王振达,现年25岁(1941年),别名王明生,工作名满炭,原籍、出生地奉天省西安县炮手堆子,住址东安省密山县城子河村宝山屯,扣留时间、地点为1941年5月3日于密山县东安街长明路。""据密报,王振达有苏谍嫌疑,3月10日以来一直对其侦察。后发现该人好像觉察到我方的侦察,企图外逃,故于(1941年)5月3日将其秘密扣留审讯。"两天之后的5月5日,东安宪兵分队长辻本信一以东宁宪高第164号向东安宪兵队长白滨重夫报告审讯情况,并附有王振达全身正面和侧面照片。该报告说"该人性格狡猾,思想亦无悔改之意,无逆用价值,故认为应该特殊输送。"白滨重夫批示"同意分队长的意见,拟将其特殊输送。请关宪司指示。"②关东宪兵队司令官随后下达了将王振达"特殊输送"的指令。

三、唐永金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唐永金,男,1904年出生,38岁,农民,原籍奉天省,曾在伪满东安省密山县半截河(今黑龙江省鸡东县向阳镇)日军部队做杂役。1942年12月10日,唐永金被密山县半截河宪兵分遣队逮捕,罪名是"苏联谍报员"。据称唐永金曾先后8次入苏,接受苏联"湖岸警备地区队"的指令,侦察二人班、半截河等地日军军情和军队调动情况,获得酬金300元。根据1942年驻鸡宁(今黑龙江省鸡西市)宪兵队本部呈报的《昭和十七年度管内扣留谍者一览表》记载,唐永金已在当年被实施"特别输送。"③

四、安鸿勋

1941年8月19日,驻虎头(现黑龙江省虎林市虎头镇)宪兵分遣队向东安宪兵队队长白滨重夫递交报告称:8月2日秘密逮捕"苏联谍报员"安鸿勋并进行了秘密审讯。安鸿勋"无固定职业",1938年11月被虎头村西顺街明远春饭店厨师国恩章发展为苏联谍报员,曾随国恩章一起进入苏联境内接受指示,奉命收集虎头附近的日本军情及中国国内情况,并多次入苏提供情报,被捕前仍在活动。该报告认为,"这种人留在国境地区有再次进行活动之虑,并且无悔改之意,适合特别输送。"东安宪兵队队长白滨重夫批示"同意分遣队长的意见,适合特别输送,请关宪司指示。"1941年8月27日,日军关东宪兵队司令原守发布"关宪高第855号"指令,批准"将苏联谍报员安鸿勋作特别输送处理。"④

---

① 黑龙江档案馆编:《"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以下简称《"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第375~37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第313~316页。

③ 黑龙江省档案馆编印:《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侵华日军"特殊输送"档案简介》,第16页;鸡宁宪兵队本部《昭和十七年度管内抑留谍者一览表》,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档案第614号。

④ 《"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第367~370页。

五、刘文秀

1999年公布的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档案第59号记载：刘文秀，男，1913年出生于原籍山东省费县，1927年随双亲兄长等来东北以务农为业，当时住址牡丹江省绥阳县绥芬河街阜宁镇（今黑龙江省绥芬河市阜宁镇）正阳街8号。1928～1933年期间曾在阜宁镇自卫团服役，日军侵入绥芬河地区后转为国境监视队队员，但仅工作一年即因“成绩不良”被解职。而且此人“素行不良”，于1940年通过“苏谍杨经兴介绍”加入苏联谍报组织，负责收集绥芬河、绥阳等地区的日军军情，曾9次入苏递送情报，领取“资金四百五十元”，并先后发展阜宁镇同乡孙福发、薛孟祥等人为“同党”，被捕前一直在积极活动。1942年5月17日19时20分在牡丹江省绥阳县绥芬河街三岔河干草小屋被绥芬河宪兵分队逮捕。6月16日，绥芬河宪兵分队长冈本义作以绥芬河宪高第232号向牡丹江宪兵队长呈报了审讯报告，认为该人“极其狡猾，屡屡翻供，无悔改之意，无利用价值，可将其特别输送”。[①] 虽然在黑龙江省档案馆收藏的档案中没有发现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关于刘文秀的“特移扱”指令，但在吉林省档案馆公布的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档案中，有刘文秀已于当年被绥芬河宪兵队“特别输送”到哈尔滨的确凿证据。[②]

六、国恩章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国恩章，别名国高，原籍山东省掖县过西村，当年（1941年）32岁，独身，原籍地有父亲国登文、母亲任氏和弟弟国恩周。1926年来东北，在虎林县虎头村做杂货店店员或打零工，1934年随同乡王某进入苏联境内，在虎头镇对岸的伊曼市做泥瓦匠，不久又返回虎头镇，在虎头村西顺街明远春饭店当厨师直至被捕。该档案称国恩章系于1934年在苏联境内时被发展为秘密情报人员，接受搜集情报的指令后回国，此后至1941年5月间“除先后14次入苏提供情报之外，还发展了3名苏联谍报人员。”[③]因先期被捕的“苏谍”安鸿勋“供述”，日军虎头宪兵分遣队于1941年8月11日将其逮捕。审讯的结论是：“无利用价值，且该人长年累月进行谍报工作，对日满军危害极大。因此，特别输送较为妥当。”1941年8月27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指令将国恩章“特别输送。”[④]

七、季兴田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第12号记载：季兴田，出生于1891年4月14日，原籍山东省掖县桂村季家，在家乡读过3年私塾，1913年离开山东老家，经东北出境到苏联远东伏罗希洛夫等地经商。1930年回到东北，在今黑龙江省虎林县虎头镇一带做杂货生意。1934年，季兴田由朋友介绍加入苏联情报组织，然后回到虎头以经商为掩护秘密进行搜集日军情报工作。1941年4月，可能是发现自己已经被日伪特务“侦察”，季兴田悄悄迁移到密山县滴道村金刚路（今鸡西市滴道区），但还是被宪兵发现，于1941年7月在滴道的住所被日军驻滴道宪兵分遣队逮捕，随即被移送虎林宪兵分队。经过审讯，日本人认为季兴田“性情顽固，无悔改之意，且无逆用之可能”，因而于当年8月将其“特别输送”。被捕时季兴田是独身一人，“父母及妻子均在原籍地，长子在奉天（沈阳）的袜子厂工作。”[⑤]

八、张汝成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张汝成，字韶九，男，1895年9月3日出生于原籍山东省掖县吕村，读过4年私塾。1912年来东北，在哈尔滨、绥芬河等地的杂货店学徒，1933年到

① 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档案第59号。
②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侵华日军“七三一”部队有关档案介绍》，2001年9月该馆铅印本，第19页。
③ 即安鸿勋、苏介臣和于金喜3人。
④ 《“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第371～374页。
⑤ 《“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第335～337页。

密山县当壁镇开杂货店，1937 年移居到虎林县大桥村荒岗屯开杂货店。其间在朋友介绍下加入苏联情报组织，1940 年移居密山县黄泥河子安乐屯（今黑龙江省鸡西市恒山区）继续经营杂货店。妻赵氏与长子张永俊在原籍务农，"妾王氏"与次子张永杰与其同住。张汝成移居黄泥河子之后，因远离边境地区，故已停止从事情报活动。但是，因"苏联谍报员盛桂题"[①]将其供出，1941 年 8 月 13 日，由平阳镇宪兵分队在黄泥河子居住地将其逮捕，然后移送虎林宪兵分队。经过审讯，虎林宪兵分队认为张汝成"无逆利用价值，故适合特别输送。"同年 9 月 13 日，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签发第 919 号指令，同意将张汝成特别输送。[②]

九、刘文斗

1941 年 7 月 18 日虎头宪兵分遣队呈送给东安宪兵队的审讯报告记载：刘文斗，时年 39 岁（1941 年），原籍山东省莱阳县临个村。1921 年离原籍到东北大连做工 5 年，1926 年返乡务农，1930 年再到大连做工，1936 年 5 月来（虎林县）虎头村西顺街经营饭店，直至被捕，同住者有妻刘杨氏。刘文斗于 1939 年加入苏联情报组织并且一直活动积极，因其同党段凤楼的供述，于 1941 年 7 月 15 日被秘密逮捕。经审讯，虎头宪兵分遣队认为刘文斗"无逆用价值，对日满方面危害极大，应将其与同党刘元杰[③]、段凤楼等一起特别输送。"1941 年 8 月 6 日，东安宪兵队密电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将于 8 月 9 日乘 8 时 32 分到达哈尔滨的火车，将刘文斗等人实施"特别输送"，请哈尔滨宪兵队接收。[④]

十、任增殿

根据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第 22 号《佳木斯宪兵队呈报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关于富锦宪兵分队逮捕审讯苏谍任殿曾的情况报告》（1941 年 7 月 8 日）记载：任殿曾（真名叫任增殿），男，时年 38 岁（1941 年），农民，独身，原籍山东省平度县西安村（实为山东省平度县明村镇辛安村），被捕时住三江省抚远县东安镇下营（现黑龙江省饶河县）。1933 年来东北，一直以种菜为业。1940 年 8 月在乌苏里江上捕鱼时被苏军掠至对岸，被释放回国后开始从事谍报活动，于 1941 年 6 月 15 日被富锦宪兵分队秘密扣留。"该人在原籍读了一年私塾，能简单地阅读，头脑比较灵敏，记忆力强。""虽然该人基本上直率地供述了事实，并有悔改之意，但鉴于这种谍报活动的危害及时局的关系，拟作特别输送处理。"1941 年 7 月 30 日，佳木斯宪兵队队长宇津木孟雄以"佳宪高第 487 号"向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报告，按照 7 月 15 日关宪高第 710 号等各项指令，已将任殿曾等 6 人"特别输送"。[⑤]

十一、原美臻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虎林宪兵分队 1941 年 8 月上报的《关于审讯苏联谍报员原美臻情况的报告》记载：原美臻，男，1902 年 10 月 8 日出生，原籍山东省掖县三山原家，当时住虎林县虎林街安乐区 2 牌，职业饭店主。根据先期被扣留的苏联谍报员邹宝丰的供述，原美臻于 1941 年 8 月 17 日在虎林县虎林街安乐区被虎林宪兵分队秘密逮捕。9 月 13 日，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签发第 918 号指令："根据虎林宪高第 423 号，同意将苏谍原美臻特殊输送。"[⑥]

---

① 盛桂题，男，1907 年 10 月 23 日出生，山东掖县小琅琊村人，1930 年到虎林县做杂货生意，1941 年 7 月 11 日在大连市西岗子以通苏罪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不久被"特别输送"，未找到其遗属。见《"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第 351～353 页。

② 《"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第 391～394 页。

③ 刘元杰，男，1916 年生，天津杨柳青人，1941 年 7 月在虎林县虎头村以通苏罪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不久被"特别输送"。《"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第 303 页。

④ 《"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第 330～334 页。

⑤ 《"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第 322～325 页。

⑥ 《"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第 387～390 页。

原美臻1921年离开原籍到东北，先在哈尔滨生活了9年，其间在酱油厂做工。1929年开始在松花江上当船夫。1933年参加伪满国军，在密山县的伪满军第4旅第13团第8连服役。后来该部队在虎林地区“哗变”，即集体起义参加抗日联军，原美臻离队到虎林街经商，1939年开始经营饭店“原家馆子”直至被捕。宪兵队档案记载，原美臻是在1936年被同乡李万春发展为苏联谍报员，后来与李万春一起“从事双重间谍活动”，即明里为日军特务机关服务，暗中为苏联提供情报。李万春是虎林日本特务机关的“逆用谍报员”，1940年12月入苏后失踪。

十二、苏介臣

苏介臣，别名苏敬先，男，1901年出生于原籍山东省莱阳县曲格庄，在当地读了2年私塾，之后务农。1930年12月闯关东来到虎林县虎头村下水捞屯，与同乡张先礼搭伙种地。1935年2月到虎头村干零活，1940年被西顺街饭店雇为厨师。宪兵队档案记载，苏介臣是在虎头村干零活时，在国恩章的引诱之下加入苏联谍报组织，先后5次入苏提供情报。虎头宪兵分遣队在审讯国恩章时得知苏介臣的情况，于1941年8月16日将苏介臣秘密扣留。经审讯认为苏介臣“无利用价值，且性情放纵，无悔改之意，最适合特别输送。”1941年9月2日，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下达命令：“根据虎头宪高第264号报告，准予将苏联谍报员苏介臣作特别输送处理。”①

十三、刘　恩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刘恩，男，时年39岁（1941年），原籍山东省栖霞县城落庄，当时住址密山县东安街花乐街。秘密身份为苏联谍报员。1941年7月14日13时在其住所被东安宪兵分队秘密逮捕。7月29日，东安宪兵队长白滨重夫以东宪高第629号向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呈报审讯报告，提出“应尽快在当地给予严重处分，请求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指示。”1941年8月7日，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下达第488号指令：“根据东宪高第629号，同意将苏联谍报员刘恩适时特殊输送”。8月10日，东安宪兵队长白滨重夫分别密电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和哈尔滨宪兵队：“8月11日6时36分，将苏联谍报员刘恩特殊输送哈尔滨，请哈尔滨宪兵队收领。”

十四、董殿全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董殿全，男，时年55岁（1941年），原籍山东省莱阳县后山村，当时住址东安省虎林县虎头村朴实屯。职业农民，秘密身份苏联谍报员。1939年5月加入苏谍报机关。1941年7月27日，在虎林县虎头村朴实屯被虎头宪兵分遣队逮捕。7月31日，虎头宪兵分遣队长桦泽静茂以虎头宪高第288号向东安宪兵队长白滨重夫呈报审讯报告。8月13日，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签发第815号指令，密令将董殿全适时“特殊输送”。

十五、刘汉升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刘汉升，男，时年48岁，原籍山东莱阳县，当时住址东安省虎林县虎头村朴实屯。职业农民，秘密身份苏联谍报员。1934年4月成为苏联谍报员。1941年7月20日，在虎头火车站候车室被虎头宪兵分遣队逮捕。7月25日，虎头宪兵分遣队长桦泽静茂以虎头宪高第217号向东安宪兵队长白滨重夫呈报审讯报告，认为“该人没有利用的价值，对日满军实为大害，故我们认为适合特殊输送”。8月6日，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签发第787号指令，密令将刘汉升适时“特殊输送”。8月25日17时，东安宪兵队长白滨重夫密电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苏谍报员刘汉升以下7人于8月27日乘20时30分列车特殊输送哈尔滨。请哈尔滨宪兵队进行交接。”

十六、张生文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张生文，别名张开，男，时年28岁，原籍山东省莱阳县张家寨村，当时住址东安省虎林县虎头村朴实屯。1939年5月，张生文加入苏谍报组织。

① 《“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第379～382页。

1941年7月25日在其住所被虎头宪兵分遣队逮捕。7月29日，虎头宪兵分遣队长以虎头宪高第224号向东安宪兵队长白滨重夫呈报审讯报告，认为"该人性情狡猾，无利用价值，故认为适合特殊输送"。白滨重夫阅后提出意见："因时局的原因，在当地给予严重处分较妥当。请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指示。"并将审讯报告转呈"关宪司、四参、东特机、队下乙"。8月9日，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下达第796号指令，密令将张生文适时"特殊输送"。

十七、赵成忠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赵成忠，男，时年33岁，原籍山东省高唐县十里堡，当时住所东安省密山县鸡西街。职业烧砖工，秘密身份为苏联谍报员。1941年4月，两次到苏军兵营提供日满军情报。7月9日19时，在其住所被半截河宪兵分遣队秘密逮捕审讯。7月12日，半截河宪兵分遣队长日比野亀三郎以半截河宪高第125号向东安宪兵队长白滨重夫呈报审讯报告。认为该人"将来没有逆用价值，考虑适合特殊输送"。白滨重夫签批意见："因时局关系，我们认为该人应尽快特殊输送。请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指示。"并将审讯报告转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四参、东安特务机关。7月25日，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签发第755号指令，密令将赵成忠"特殊输送"。8月8日21时，半截河宪兵分遣队派下士官2名，将赵成忠"特殊输送"至哈尔滨宪兵队本部。

十八、田立顺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田立顺，男，时年40岁，原籍山东省胶州县王台村，当时住址东安省虎林县独木河村。于1939年12月担任吉祥屯警察署外勤警察期间，加入苏联谍报组织。1941年8月1日被诱至虎林国境警察队本部秘密逮捕，之后移交虎林宪兵分队审讯。8月10日，虎林宪兵分队长长岛恒雄以虎林宪高第368号向东安宪兵队长白滨重夫呈报审讯报告，认为"没有逆用价值，给予特殊输送较妥当"。白滨重夫签批意见："我认为适合特殊输送，请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指示。"并将审讯报告转呈关东宪兵队司令部。8月19日，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签发第331号指令，同意将田立顺"特殊输送"。

十九、刘世杰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刘世杰，别名冠英，男，时年38岁，原籍吉林省永吉县城内，当时住址东安省密山县城内朝阳区13牌。1935年10月由苏联谍报员黄兆珠发展为谍报员。1941年7月8日在密山国境警察队被东安宪兵分队秘密逮捕后，移交虎林宪兵分队。8月7日，虎林宪兵分队长长岛恒雄以虎林宪高第347号向东安宪兵队长白滨重夫呈报《关于苏联谍报员刘世杰审讯情况的报告》，认为给予"特殊输送"较妥当。白滨重夫审阅后提出意见："我认为适合特殊输送。请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指示。"8月18日，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下达指令，同意将刘世杰"特殊输送"。

二十、张振起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张振起，别名张老窝，工作名伊万，男，时年37岁，原籍山东省即墨县蛮家兰屯，当时住址东安省虎林县虎头村饭冢木材部。职业炊事员，秘密身份苏联谍报员。张振起于1938年6月加入苏联谍报组织。1941年8月21日在虎林县虎头村兴隆街被虎头宪兵分遣队秘密逮捕审讯。8月25日，虎头宪兵分遣队长桦泽静茂以虎头宪高第270号向东安宪兵队长白滨重夫呈报审讯报告，提出"该人在本分遣队拘押中，无利用价值。如果留在国境线地区有再次活动之虑。鉴于时局的关系，最适合特殊输送。"白滨重夫审阅后签批意见："关于该人的处置问题，同意分遣队长的意见，适合特殊输送。请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指示。"9月4日，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下达第883号指令，同意将张振起"特殊输送"。

二十一、于金喜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于金喜，男，时年32岁，原籍山东省黄县北马集

村,当时住址东安省虎林县虎头村兴隆街。1940年7月加入苏谍报组织。1941年8月31日被捕。9月5日,虎头宪兵分遣队长桦泽静茂以虎头宪高第290号向东安宪兵队长白滨重夫呈报审讯报告,认为"该人无利用价值,留在特殊地区有再次活动之虑。鉴于时局关系,适合特殊输送"。东安宪兵队长白滨重夫将报告转呈"关宪司、3036、四参、东特机"。9月22日,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签发第935号指令,同意将于金喜"特殊输送"。

二十二、矫吉明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矫吉明,别名子信,工作名高列维,男,时年44岁,原籍山东省黄县城西九里站,当时住址东安省虎林县虎头村平安街。职业劳工,秘密身份苏联谍报员。1939年3月加入苏谍报组织。后在驻虎头日军部队干力工或在砖场做烧砖工。1941年8月20日,矫吉明在东安省虎林县虎头村平安街被虎头宪兵分遣队秘密逮捕。8月30日,虎头宪兵分遣队长桦泽静茂以虎头宪高第277号向东安宪兵队长白滨重夫呈报审讯报告,认为"该人无利用价值,适合特殊输送"。白滨重夫审阅后批示,"同意分遣队长意见,认为适合特殊输送,请求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指示"。并向"关宪司、3036、四参、东安特机、牡宪"转呈了审讯报告。9月22日,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签发第936号指令,同意将矫吉明"特殊输送"。

二十三、朱云岫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朱云岫,别名朱焕臣,工作名清云,时年23岁,原籍奉天省开原县千岗王村,当时住址东安省密山县城子河村保山屯。1940年9月27日,经苏谍报员万信介绍加入苏谍报组织。1941年5月3日在东安省东安街长明路三义栈前被东安宪兵分队逮捕。5月20日,东安宪兵分队长辻本信一以东安宪高172号向东安宪兵队长白滨重夫呈报审讯情况报告,提出该人入苏及返满后的不良行为危害极大,最适合"特殊输送"。东安宪兵队长白滨重夫审阅后签批意见:"队长所见,其虽然入苏提供情报仅一次,但危害甚大。同意分队长的意见。像这种不法之徒必须彻底清除,故认为应坚决将其与同伙王振达一同特殊输送最为妥当。请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指示。"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随之下达指令,将朱云岫实施"特殊输送"处理。

二十四、段凤楼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段凤楼,男,时年43岁,原籍山东省牟平县段家村,当时住址东安省虎林县虎头村。职业鞋店主,秘密身份苏联谍报员。1941年7月10日被虎头宪兵分遣队逮捕。依照7月26日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下达的第438号指令,于8月9日18时32分将段凤楼"特殊输送"至哈尔滨宪兵队本部。

二十五、杨吉林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杨吉林,男,时年54岁,原籍山东省莱阳县佳化,当时住址东安省饶河县大代河。职业农民,秘密身份苏联谍报员。1941年7月9日,在其住所被虎头宪兵分遣队秘密逮捕审讯。依照7月28日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下达的第765号指令,于8月9日18时32分将杨吉林"特殊输送"至哈尔滨宪兵队本部。

二十六、张忠盛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张忠盛,男,时年40岁,原籍山东省黄县,当时住址密山县黄泥河子,秘密身份苏联谍报员。1941年1月20日在密山县半截河忠信屯被捕。据东安宪兵分队《1941年防谍服务成果表》记载,张忠盛已被实施"特殊输送"。

二十七、刘宝湖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刘宝湖,男,时年32岁,原籍山东省即墨县,当时住址密山县滴道村金刚大路,秘密身份苏联谍报员。1941年3月2日在其住所被捕。据东安宪兵分队《1941年防谍服务成果表》记载,刘宝湖已被实施"特殊输送"。

二十八、王勤山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王勤山，别名三连子，男，时年38岁，原籍安东省，职业农民，秘密身份苏联谍报员。1941年8月19日被绥芬河宪兵分遣队逮捕。据鸡宁宪兵队本部《1942年度管内扣留谍者一览表》记载，王勤山已被实施“特殊输送”。

二十九、马尚文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马尚文，男，时年27岁，原籍奉天省，职业劳工，秘密身份苏联谍报员。1942年9月10日被林口宪兵分遣队逮捕。据鸡宁宪兵队本部《1942年度管内扣留谍者一览表》记载，马尚文已被实施“特殊输送”。

三十、刘维平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刘维平，男，时年60岁，籍贯密山县半截河，职业商人，秘密身份苏联谍报员。1942年9月26日被半截河宪兵分遣队逮捕。据鸡宁宪兵队本部《1942年度管内扣留谍者一览表》记载，刘维平同年被实施“特殊输送”。

三十一、王照儒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王照儒，男，时年34岁，原籍山东省，职业农民，秘密身份苏联谍报员。1942年9月28日被半截河宪兵分遣队逮捕。据鸡宁宪兵队本部《1942年度管内扣留谍者一览表》记载，王照儒同年被实施“特殊输送”。

三十二、吴春福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吴春福，别名吴连克，男，时年32岁，籍贯吉林省，职业工人，秘密身份苏联谍报员。1942年10月13日被半截河宪兵分遣队逮捕。据鸡宁宪兵队本部《1942年度管内扣留谍者一览表》记载，吴春福已被实施“特殊输送”。

三十三、尹文生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尹文生，男，时年37岁，原籍吉林省，职业农民，秘密身份苏联谍报员。1942年11月10日被鸡宁宪兵队逮捕。据鸡宁宪兵队本部《1942年度管内扣留谍者一览表》记载，尹文生已被实施“特殊输送”。

三十四、赵新贵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赵新贵，男，时年43岁，原籍吉林省，职业劳工，秘密身份苏联谍报员。1942年12月28日被平阳镇宪兵分遣队逮捕。据鸡宁宪兵队本部《1942年度管内扣留谍者一览表》记载，赵新贵已被实施“特殊输送”。

三十五、吴天贵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吴天贵，别名吴宝廷，男，时年26岁，原籍安东省凤城县，无职业，秘密身份苏联谍报员。1943年1月18日被八面通宪兵分队逮捕。据鸡宁宪兵队本部《1943年度管内扣留谍者一览表》记载，吴天贵已被实施“特殊输送”。

三十六、孙福发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孙福发，男，时年23岁，原籍河北省玉田县红家庄，当时住址牡丹江省绥阳县绥芬河街阜宁镇兴隆街26号。1942年3月3日加入苏谍报组织。5月20日17时在绥芬河神风山满洲第229部队山室队被捕。6月16日，绥芬河宪兵分队长冈本义作以绥芬河宪高第232号向牡丹江宪兵队长呈报审讯报告，认为该人为“出入部队的劳工，国境部队情况清楚，可以特殊输送”。

三十七、薛孟祥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薛孟祥，别名薛老三，男，时年33岁，原籍山东省诸城县方士庄，当时住址牡丹江省绥阳县绥芬河街阜宁镇太平街5号。职业炊事员，秘密身份苏联

谍报员。1942年3月20日被刘文秀发展加入苏联谍报组织。1942年6月5日18时30分在绥芬河街电厂街路上被绥芬河宪兵分队逮捕。6月16日,绥芬河宪兵分队长冈本义作向牡丹江宪兵队长呈送审讯报告,认为该人"长年在日军部队做工,详细了解情况,滥用这等人恐受其害,应按特殊输送处置"。

三十八、冉庆顺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冉庆顺,时年59岁,原籍山东省肥城县象庄,当时住址黑河省瑷珲县五道沟乌斯道干。1939年11月加入苏联谍报组织。1944年6月1日16时在瑷珲县五道沟下头南2 000米处被山神府宪兵分队逮捕。6月28日,伪满第八军管区司令部(北安)以第681号向伪满军事部呈报审讯报告,认为该人"无逆利用价值,危险性极大,适合特殊输送",并请指示。

三十九、周殿平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周殿平,别名周俭,男,时年48岁,原籍山东省泰安县。职业农民,秘密身份苏联谍报员。1943年3月29日被绥芬河宪兵分队逮捕,预定"特殊输送"。

四十、张兴华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张兴华,别名张吉胜,男,时年49岁,原籍河北省青丰县邵张屯,当时住址东宁县石门子村佛爷沟屯。1941年6月入苏,接受日苏开战时扰乱后方、开展游击战、组织秘密团体的密令返回。1942年5月22日在东宁县石门子村佛爷沟屯被捕。7月26日,石门子宪兵分遣队长野原佐之助以石门子宪高第69号向东宁宪兵队长坂元正呈报审讯报告,认为该人"没有逆利用价值,给予特殊输送较妥当"。

四十一、韩成镇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韩成镇,男,国籍朝鲜,时年30岁,农民。原籍为朝鲜咸镜北道镜城。住址是间岛省珲春县春化村杜荒子屯第2牌。1943年6月25日被珲春宪兵分队逮捕,同年7月16日间岛宪兵队以间宪高第386号,申请"特别输送"处理。

四十二、全圣瑞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全圣瑞,男,原籍朝鲜咸镜北道吉州面以下。住址为间岛省珲春县镇安村马滴达屯第8牌。1943年7月25日被珲春宪兵分队抓捕,7月31日间岛宪兵队以间宪高第418号申请,向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提出对其进行"特别输送"。

四十三、高昌律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高昌律,男,时年42岁,原籍朝鲜江源道淮阳郡兰谷面,被捕时住址为间岛省珲春街大同区第9牌,从事饮食业。1941年7月25日被珲春宪兵分队逮捕,7月31日间岛宪兵队以间宪高第418号申请"特别输送"处理。

四十四、李树春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李树春,男,汉族,时年47岁,原籍山东省日照县黄山前村,当时住址牡丹江省东宁县东宁街七宝小路,于1942年7月26日被东宁宪兵队捕获,同年8月1日申请"特别输送"处理。8月24日,关东宪兵队以关宪高第526号指令,批准对其实施"特别输送"处理。9月1日,东宁宪兵队以东宪高第404号,向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呈交了"特移扱"实施完毕的报告。

四十五、李金生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李金生,男,时年29岁,原籍河北省富城县小李家村,时住牡丹江省东宁县东宁街河沿区万鹿沟满洲第3620部队。1942年6月25日被东宁宪兵队逮

捕,7月25日,东宁宪兵队以东宪高337号申请“特别移送”处理。关东宪兵队于1942年8月5日以关宪高第508号指令,批准实施“特移扱”。东宁宪兵队据此实施“特别输送”完毕后,以东宪高第365号,向关东宪兵队呈送了“特别输送”报告。

四十六、孙登俊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孙登俊,时年32岁,原籍山东省。时住三江省抚远县海青村,木匠。1943年10月6日被捕,佳木斯宪兵队以佳宪高第685号申请对其“特别输送”处理。档案上盖有军司二课和“特移扱”处理印章。

四十七、陈传志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陈传志,时年60岁,原籍山东省平原县,住址三江省抚远县海青村,农民。被捕地点是三江省抚远县海青村国富屯老登窝。1943年9月22日被佳木斯宪兵队以佳宪高第684号申请“特移扱”处理,档案上盖有军司二课和“特移扱”处理印章。

四十八、娄清玉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娄清玉,时年49岁,原籍山东栖霞县,住址三江省抚远县秦得利,农民。1943年9月27日被捕,佳木斯宪兵队以佳宪高686号申请“特移扱”处理,档案上盖有军司二课和“特移扱”处理印章。

四十九、彭凤昌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彭凤昌,时年57岁,原籍山东省郓城县,住址三江省抚远县东安村下营屯第14牌,劳工。1943年11月17日被捕,佳木斯宪兵队以佳宪高682号申请“特移扱”处理,档案上盖有军司二课和“特移扱”处理的印章。

五十、王兆臣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王兆臣,男,原籍山东省海阳县,住址三江省萝北县镇东村一屯第5牌,农民。1943年10月11日被凤翔宪兵分遣队逮捕。10月29日凤翔宪高第140号向佳木斯宪兵队提出对其实施“特移扱”处理的意见,佳木斯宪兵队同意该分遣队意见,1943年11月24日关东宪兵队下发了对其实施“特别输送”处理的指令。同年12月6日,佳木斯宪兵队以佳宪高第722号向关东宪兵队呈送了将王兆臣和张德君“特移扱”完毕的报告。

五十一、张德君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张德君,别名张景贵,男,时年36岁,农民,原籍奉天省海城县,住址在三江省绥滨县集贤村福禄屯。1944年9月11日被富锦宪兵分队逮捕,同年10月26日,佳木斯宪兵队在佳宪高第634号提出对其实施“严重处分”的意见,11月5日,关东宪兵队以关宪高第520号指令批准“特移扱”。

五十二、李宝成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李宝成,男,时年36岁。原籍河北省南皮县梨明杨家村,住址东安省饶河县新民街,马车夫。1943年2月1日被虎头分遣队在虎头逮捕,同年3月30日虎头宪高第38号申请“特移扱”,同年4月15日以关宪高第183号指令批准“特移扱”。

五十三、于兴飞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于兴飞,男,原籍山东省莱州县平度村,住址苏联浦盐斯德二道后春沟子,农民。1943年4月14日在东安市被东安宪兵队逮捕。同年5月2日,东安宪兵队以东安宪高第75号提出“特移扱”处理申请,后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下发指令批准“特移扱”处理。

五十四、刘恩起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刘恩起,时年48岁,无业。原籍山东费县,1943年

7月16日被捕,绥阳宪高第128号申请"特移扱",1943年9月3日关宪高第413号指令批准"特移扱",同年10月3日鸡宁宪兵队向关东宪兵队呈送了"特移扱"完毕的报告。

五十五、刘昆玉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刘昆玉,时年62岁,原籍河北省霸县城南,部队卫生员,住址绥阳县西阳街。1943年10月7日被捕。1943年11月11日下城子宪兵队以下城子宪高第177号对其提出"特移扱"申请,关东宪兵队于同年11月30日以关宪高第563号指令,批准对其实施"特移扱"处理。同年12月20日鸡宁宪兵队以鸡宪高第679号文件,向关东宪兵队呈送了"特移扱"完毕的报告。

五十六、郭增汉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郭增汉,时年38岁,原籍山东省深县,住址绥阳县全厂。1943年10月9日被下城子宪兵分遣队逮捕。1943年11月11日下城子宪兵队以下城子宪高第177号对其提出"特移扱"申请,关东宪兵队于同年11月30日以关宪高第563号指令批准"特移扱"。同年12月20日鸡宁宪兵队以鸡宪高第679号向关东宪兵队呈送了"特移扱"实施完毕的报告。

五十七、石福廷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石福廷,男,时年29岁,勤杂工,原籍山东省济南府临清县,住址绥阳县三道街,1943年10月6日被捕,1943年11月11日下城子宪兵队以下城子宪高第177号对其提出"特移扱"申请,关东宪兵队于同年11月30日以关宪高第563号指令,批准对其实施"特移扱"处理。同年12月20日鸡宁宪兵队以鸡宪高第679号向关东宪兵队呈送了"特移扱"完毕的报告。

五十八、崔玉山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崔玉山,原籍奉天省海阳县小房身,农民,时年46岁,住址东安省饶河县饶河街。1943年2月22日被捕,同年3月25日东安宪兵队以东安宪高第95号提出对其实施"特别移送"处理,同年被关东宪兵队以第159号指令批准"特移扱"。

五十九、孙学君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孙学君,男,时年30岁,原籍安东省安东县六道沟,住址东宁县石门子村大肚子川屯飞鸟组劳工宿舍,马车夫。1943年8月2日被东宁大肚子川宪兵分队捕获。1944年2月8日东宁宪兵队以东宁宪战第33号申请"特移扱"。同年2月15日关宪三战第92号指令批准。

六十、陈　宪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陈宪,时年46岁,原籍山东省鞠县雪青庄,住址在东满总省东宁县石门子村西南岭,农民。1943年12月26日6时左右被捕,1944年1月26日大肚子川宪战第14号提出"特移扱"申请,同年2月14日关东宪兵队以关宪三战第89号指令批准"特移扱"。

六十一、刘德盛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刘德盛,时年37岁,原籍安东省安东县大涧沟,时住三江省萝北县萝北村三中,农民。1944年1月31日佳木斯宪兵队以佳宪战第49号提出对其实施"特移扱"处理,1944年2月7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收到该申请,2月9日下达指令,文号为关宪三战第81号,案卷上加盖了"军司二课"和"特移处理"字样的印章。

六十二、罗玉萱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罗玉萱,男,别名罗四亭,时年35岁,原籍山东省

登州府招远县罗字村，时住鸡宁县鸡宁街城子河区城子河煤矿，供职于该矿机电系。1943年11月17日被鸡宁宪兵队捕获，1944年1月19日鸡宁宪兵队以鸡宁宪战第25号申请对其“特移扱”处理，同年2月23日关东宪兵队以关宪三战第99号指令批准“特移扱”，同年3月12日鸡宁宪兵队呈送“特别输送”完毕报告。

六十三、马德祥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马德祥，男，时年42岁，原籍山东省文昌县马家庄，住址牡丹江省东宁县东宁安宁区明智通，从事煎饼业，1943年4月10日被东宁宪兵队申请“特移扱”，后关东宪兵队下发了将马德祥与杨永和一起“特移扱”的指令。

六十四、杨永和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杨永和，男，别名杨老三，时年33岁，原籍牡丹江省东宁县八家子，住址东宁县东宁大同区大同街，职业木匠。在东宁县二十八道河子（今称道河）地营屯被捕。1943年4月10日申请“特移扱”，后关东宪兵队下发了将杨永和与马德祥一起“特移扱”的指令。

六十五、王宝珍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王宝珍，别名王振元，男，时年37岁，原籍河北省安平县西关屯。孙吴宪兵队于1941年10月1日以孙宪高第232号申请对其实施“特移扱”处理，同年10月8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以关宪高第966号指令，批准实施“特移扱”。

六十六、沙利盛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沙利盛，男，时年35岁，农民，原籍安东省凤城县太平山村，住址三江省绥滨县绥东村河东屯。1943年12月13日被捕，1944年2月29日以佳宪战89号提出“特移扱”申请，同年3月11日关东宪兵队以关宪三战127号批准实施“特移扱”。

六十七、孙　芳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孙芳，时年37岁，职务警尉补，原籍牡丹江省东宁县石门子村佛爷沟屯，住址东宁县暖泉子沟区。1943年3月9日大肚子川宪兵队申请“特移扱”，档案上盖有“特移扱”处理的印章。

六十八、袁永利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袁永利，别名袁小金，时年22岁，原籍滨江省双城县双城街，住址东宁县老黑山村。1943年2月24日被捕，同年3月22日东宁宪兵队以东宪高第80号申请“特移扱”，3月29日关东宪兵队以关宪高第151号指令批准“特移扱”。

六十九、秦化雕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秦化雕，别名秦成云，时年35岁，原籍山东省掖县驿道村，住址东宁县老黑山村太平沟屯。1943年2月17日被捕，同年3月22日东宁宪兵队以东宪高第80号申请“特移扱”，3月29日关东宪兵队以关宪高第151号指令批准“特移扱”。

七十、李殿山

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李殿山（化名），原名李凤鸣，原籍兴安南省通辽县胡子园，时年28岁，原为伪满洲国军独立步兵第1旅原石兰斌部队2营2机连步兵中等兵，住在兴安南省喜札嘎尔旗白狼。阿尔山宪兵分队以阿宪高第84号提出“特移扱”申请，1943年6月4日以关宪高第262号下发了“特移扱”指令，同年6月11日，阿尔山宪兵分队以阿宪高第98号向关东宪兵队呈送了“特移扱”实施完毕的报告。

第七编
苏联红军攻克关东军要塞

概　述

苏联参加对日军的作战行动，在国际反法西斯联盟中酝酿已久。早在1943年11月，苏、美、英三国在德黑兰举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首脑会议时，斯大林元帅就曾表示：苏联将在打败德国之后对日本宣战。但是，由于当时欧洲战事正酣，此事尚未列入正式谈判议程。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

1945年2月4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议。2月11日，美、苏双方达成协议，并由三国首脑共同签署了《雅尔塔协定》，即《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协定》，主要内容如下：

苏、美、英三大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应参加同盟国方

面对日作战。苏联参战的条件是：

(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须予维持。

(2)由日本1904年背信弃义进攻所破坏的俄国昔日权益须予恢复，即：

甲、萨哈林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

乙、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

丙、对沟通大连与外界联系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中苏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满洲的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雅尔塔会议确定了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对争取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协定签署后，苏联最高统帅部从1945年春天开始进行对日作战的准备。

欧洲战场苏德战争结束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心转移到亚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尤其是在亚洲的中国战场已经开始局部反攻，日本侵略军处于孤立的垂死挣扎状态。在这种形势下，同盟国与苏联之间就如何处置战后一些问题，如何分享战争胜利果实，如何实现世界和平并最终消灭日本法西斯，迫切需要协调关系，并采取必要的行动以实现这些目标。

1945年7月17日下午5时10分，美、英、苏三国首脑在柏林南的波茨坦市郊巴贝尔斯贝格镇会晤，史称"波茨坦会议"或"柏林会议"。杜鲁门、丘吉尔(7月25日因大选失败而落选回国，7月28日换新首相艾德礼)、斯大林参加会议，与会的还有三国外长、参谋长和顾问。在会议期间的7月24日下午，美、苏、英三国参谋长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对日作战问题，苏方出席者有总参谋长安东诺夫、海军人民委员库兹佐夫、空军参谋长法拉列夫；美方出席者有海军上将李梅、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上将；英方出席会议者有陆军参谋长布鲁克爵士、皇家空军元帅波特尔、海军元帅坎宁安。会上苏方介绍了备战情况，美方介绍了盟军从海上空中对日本战略攻击情况，英方介绍了东南亚战场日军情况。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会议以宣言形式，发表《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简称《波茨坦公告》，该公告有13项内容，中心点是敦促日本帝国投降。其全文如下：

美英中三国政府领袖公告

(一)余等：美国总统、中国国民政府主席及英国首相代表余等亿万国民，业经会商，并同意对日本应予以一机会，以结束此次战事。

(二)美国、英帝国及中国之庞大陆海空部队，业已增强多倍，其由西方调来之军队及空军，即将予日本以最后之打击，彼等之武力受所有联合国之决心之支持及鼓励，对日作战，不至其停止抵抗不止。

(三)德国无效果及无意识抵抗全世界激起之自由人之力量，所得之结果，彰彰在前，可为日本人民之殷鉴。此种力量当其对付抵抗之纳粹时，不得不将德国人民全体之土地、工业及其生活方式摧残殆尽。但现在集中对付日本之力量则较之更为庞大，不可衡量。吾等之军力，加以吾人之坚决意志为后盾，若予以全部实施，必将使日本军队完全毁灭，无可逃避，而日本之本土亦必终归全部残毁。

(四)现时业已到来，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已陷于完全毁灭之境之军人之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

(五)以下为吾人之条件，吾人决不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

(六)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势不可能。

(七)直至如此之新秩序成立时，及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俾吾人在此陈述之基本目的得以完成。

(八)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九）日本军队在完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

（十）吾人无意奴役日本民族或消灭其国家，但对于战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日本政府必须将阻止日本人民民主趋势之复兴及增强之所有障碍予以消除，言论宗教及思想自由以及对于基本人权之重视必须成立。

（十一）日本将被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以偿付货物赔款之工业，但可以使其重新武装作战之工业不在其内。为此目的，可准其获得原料，以别于统制原料，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贸易关系当可准许。

（十二）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

（十三）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1945年7月28日下午3时，日本铃木首相明确表示：政府认为，波茨坦公告无任何价值。只有对它置之不理，我们只能为将战争进行到底向前迈进。7月30日，日本报纸《昭南新闻》以极其强硬的语气宣称："如果敌人想结束战争，那么，让他们向日本投降吧。指望日本向他们投降的想法是荒谬的。"

日本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波茨坦公告》，其结果招致了苏联加紧对日作战的准备。苏联远东军总司令部在苏军最高统帅部的指挥下，秘密展开改组调整战线组织，充实高级领导指挥人员，调兵遣将，补充增加集团军以下各级作战部队的建制和兵员，突击运送部队所需兵器装备、弹药粮秣，制定战略战术计划，演练战役行动，进行战前敌情侦察等大量战备行动，做好了苏军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前的一切准备工作。

第一章　苏军进攻部署和准备

第一节　军队、武器装备的调动、集结与部署

苏德战争结束后，苏联最高统帅部由西部向东部重新变更了武装力量部分兵力、兵器的部署。第39集团军是柳德罗科夫上将率领的战斗力很强的铁军，从4月30日起，第39集团军从莫斯科转运到后贝加尔的指定地点。克雷洛夫上将统帅的第5集团军从东普鲁士调往滨海集团，加编在远东第1方面军。以克拉夫钦科坦克兵上将为司令员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调到后贝加尔方面军。由马纳加罗夫上将领导的第53集团军也调到远东，加入后贝加尔方面军。

滨海地区是击败日本关东军的重要突击地域，最高统帅部对这一地区的军事指挥人员也进行了调整。别洛鲍洛罗多夫上将率领的红旗第1集团军[①]，契斯佳科夫上将领导的第25集团军，扎赫瓦塔耶夫中将指挥的第35集团军及驻在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一些卓越的军事政工干部也被调到远东的赤塔。可以说，苏联把最优秀的高级将领都派到了远东。

大量的战略物资准备工作在远东辽阔的战线上同时展开。一些铁路工人和农民不分昼夜地抢修铁路，扩延新路线，并有几万群众修筑了数百公里的战备公路。后贝加尔方面军战前担负了紧急修复铁路线路和改轨任务，以便迅速调集部队。

苏军从道路兵部队抽调了两个公路桥梁营和两个公路建筑营来支援第14修复工程局。

---

① 该集团军因战功显赫，荣获红旗勋章。苏联最高统帅部批准，在部队番号前冠"红旗"两字，以示光荣和功勋。凡冠以"红旗"两字的部队皆如此。

第39集团军所在的后贝加尔方面军,没有铁道兵修复铁路。集团军军交处长奥夫钦尼科上校将该集团军工程兵第32旅调来。

战役开始前,远东第1、第2方面军都编入了铁道兵旅,并调来了4个地方铁路管理团和交通部的3个军管分局。

由于上述措施和苏联广大工人、农民的帮助,保证了铁路的迅速修复和改轨。某段有655公里铁路,修复和改轨仅用了两天时间。总共修复改轨铁路2 623公里,修复大、中型桥梁39座,小型桥梁60座,隧道5个。

1945年5~7月,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全部归远东苏军总部使用。根据各个集团军的地域,有的铁路线还划分了阶段,供各个集团军使用。仅有的几条铁路干线十分繁忙,昼夜火车隆隆,一列列载着火炮、坦克部队的火车不停地向远东开去。在伊尔库茨克,又新修建了远东铁路,3个月时间,成了调兵遣将的大动脉。源源不断的人流、军车、炮车鱼贯而行。在车站平台上、车板上、月台上下挤满了部队官兵,堆满了军用物资。

仅仅在5~7月,就从苏联各地调运来13.6万节车皮日夜兼程地把大量部队、武器弹药、燃料、粮食通过9 000~12 000公里的铁路、陆路运到远东和后贝加尔地区。6~7月是运输的最高峰,从后贝加尔向东,每昼夜发出22~30列火车。10万辆汽车也在公路上日夜不停地运送部队、武器装备。仅7月份就运送军用物资36万余吨。此外,不少方面军利用纵横的江河靠船只进行运输。

大规模的战略调动秘密地进行了3个月,出于军事秘密的需要,特别是大部队集结行动一般都安排在夜间。至1945年7月底,75万苏联红军全部集结在远东,使远东的兵力增加了一倍,达到157.7万人。同时,部队所需的物资储备也宣告完成。

第二节　远东军总司令部编成与战略部署①

一、远东军总司令部

1945年2月,苏联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开始调整远东部队高级指挥员,要求远东高级指挥人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曾在远东地区服过役,熟悉远东地区情况;曾在苏德战争中锻炼过,有指挥对敌作战经验。同年6月,苏联最高统帅部向远东派出了最高统帅部代表,统一协调备战。7月30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命令,正式组建远东军总司令部,从而拉开了苏军进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的序幕。远东军总司令部成员如下:

远东军总司令员为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军事委员为上将希金;参谋长为上将伊万诺夫;作战部长为中将波塔波夫;侦察处长(代)为少将楚维林;炮兵司令员为炮兵元帅契斯佳科夫;装甲兵司令员为坦克兵上将索洛马京;空军司令员为空军元帅诺维科夫;海军司令员为海军元帅库兹涅佐夫;工程兵主任为工程兵上将纳扎罗夫;通信兵主任为通信兵上将普苏尔采夫;后勤主任为上将维诺格拉多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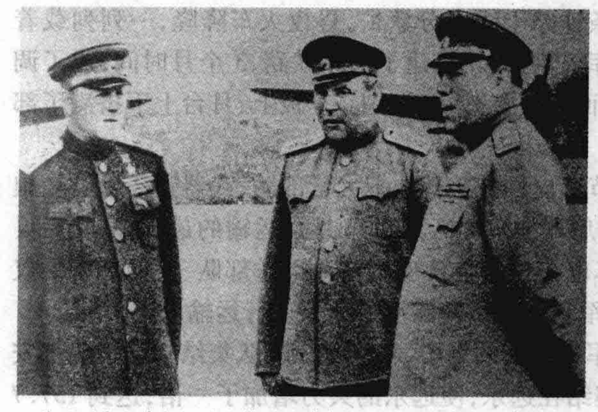


华西利夫斯基元帅

① 本节照片选自俄罗斯赤塔军事博物馆和赤塔地方志博物馆、蒙古国乌兰巴托军事博物馆。

总司令部组建时驻赤塔,战役前移驻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战后移驻中国长春。

远东军总司令部成立后为防备日军窃密,高级指挥人员的活动和行踪实行极端保密的措施。1945年6月27日开始,总司令员华西列夫斯基、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和远东第1方面军麦列茨科夫三位元帅先后离开莫斯科前往远东地区,他们改换假名或佩戴上将军衔。其中,麦列茨科夫改名为马克西莫夫,6月29日到达伏罗希洛夫(双城子)指挥部。马利诺夫斯基改名为莫洛佐夫,7月4日到达赤塔指挥部。后贝加尔方面军参谋长大将扎哈罗夫改名为佐洛佐夫,换戴上将军衔,7月4日到达赤塔指挥部。华西列夫斯基改名为华西里耶夫,对外称副国防人民委员,7月5日到达赤塔指挥部。


华西列夫斯基(右一)和梅列茨科夫(右二)1945年8月在远东


华西列夫斯基同参谋长伊万诺夫上将(右)在一起

二、兵 力

1945年5月,苏联军队的作战主力部队大都远在欧洲战场,而远东地区的驻军只有40个师。苏联最高统帅部为保证远东战役对日军发起进攻时的绝对兵力优势,确保战役的完全胜利,决定向远东地区调集作战部队。从5月开始首先由德国战场调第5集团军和第39集团军,从捷克斯洛伐克调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第53集团军等。共先后调集了2个方面军的指挥机关,3个集团军、1个坦克集团军等27个师、12个旅和其他独立兵团和特种部队,兵种有步兵、机械化步兵、坦克兵、炮兵、航空兵


苏军向远东地区集结

等主力作战部队。利用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动用13.6万节车皮(辆),历时2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了"西兵东调"向远东地区集结兵力的行动。并在1945年7月组建远东军总部的同时,调整和加强了远东方面军集团军的指挥力量,将远在欧洲战场的8个集团军司令员调到远东地区,分别任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方面军所属集团军的司令员。在战役开始前苏联远东军总部统辖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1方面军、远东第2方面军、太平洋舰队和红旗阿穆尔区舰队。在各军指挥员中,有元帅7位,将军200余位。参加对日作战的有20个集团军、33个军、134个师,总兵力1 577 725人,火炮及各种大炮26 137门,坦克和自行火炮5 556辆,作战飞机3 800余架,海军航空兵飞机1 549架,各种舰艇510艘。

空军总司令诺维科夫元帅负责指挥航空兵与诸方面军部队间的协同;海军总司令库兹涅佐夫元帅负责协调太平洋舰队、红旗阿穆尔区舰队与诸方面军部队间的协同;总后勤部主任维诺格拉多夫上将指挥整个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

三、武器装备

1945年4月,苏联远东军各坦克兵团陆续增配了T—34—85改进型坦克、NC－2式新型坦克、NCY－122式和CY－100式自动火炮。炮兵部队装配了10厘米加农炮,增配的中型、重型坦克和自行火炮数量已达到远东地区原数量的45%,火炮增加了40%。由航空制造厂和从苏德战争抽调的飞机较原远东地区的飞机数量增加了20%。

与此同时,盟军美国援助的武器及所需战略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运至远东地区。其中有战车7 056辆,高射炮8 218门,飞机14 834架,军用卡车385 883辆,吉普车51 503辆,轻巡洋舰以下各种舰艇500艘,万吨级货轮95艘,无线电台16 000部。

发动战役前的战略战术和物资储备也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远东第一方面军在苏联境内修筑突出阵地,挖交堑壕1 662延长公里,构筑指挥所、观测所1 283个、重炮和迫击炮工事9 477个,掩体1 662个,挖水井93口,新建和加固桥梁255座,新修和复修公路1 488公里。外贝加尔方面军在突击前进的路线上每相隔15～30公里挖1口井。另外,各突击部队按远东军总部的命令,在战役发展的纵深地域内共建筑了35座军械仓库、20余座给养仓库和50座燃料仓库。

四、战略部署

1945年6月27日,苏联最高统帅部对将要发动的"远东战役"确定了战略目标。其中将消灭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的战役称之为"满洲战役"。战役的区域南北长1 500公里,东西宽1 200公里,面积约4 000平方公里,战区的深度、广度都超过了欧洲战场。面对这个庞大的战场,苏联最高统帅部决定,战役实施"三个毁灭性突击"。最高统帅部命令各参战部队在突击的主要方向使用密集的兵力和兵器,平均每平方公里配置250门至300门火炮、20辆至30辆坦克或自行火炮。在主要突击方向的兵力要超过关东军的3～5倍。以达到兵力和兵器的绝对优势,彻底消灭"满洲国境"境内的日本关东军。

实施"三个毁灭性突击"之一,以外贝加尔方面军为主力,配属擅长山地、沙漠地域作战的集团军,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塔木察格布拉格实施突击。由坦克、机械化步兵编成第一梯队,在200公里长的中苏、中蒙边境发起正面进攻。实施高速、纵深的突击,消灭长春、沈阳、旅顺、大连等重要城市的关东军。

突击之二,以远东第2方面军为主力,配属坦克和自行火炮部队,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西南地域实施突击,渡过黑龙江,向佳木斯、哈尔滨方向推进,消灭北满地区的关东军。

突击之三,以远东第1方面军为主力,配属具有攻击筑垒阵地经验的集团军和炮兵部队,从滨海地区实施突击,渡过乌苏里江,向吉林方向推进,与外贝加尔方面军会合,消灭东满地区的关东军。

苏联最高统帅部要求三个方面军密切配合,协同作战,采取分进、切割、合击的战术,向长春、沈阳的关东军实施强大的中心突击、速战速决,避免与关东军在满洲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尽快取得"满洲战役"的胜利。

苏军总参谋部1945年8月消灭日本关东军战略部署图



本图选自〔苏〕
弗诺特钦科《远东的胜利》

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员在制定战役计划时，充分考虑到日本关东军1945年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态势。一是日本关东军远离日本本土，而此时美军已包围了日本本土，掌握了制海权，断绝了日本本土对它的支援；二是“关东军被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长达4 000余公里的弧线国境线所包围”，虽然在中苏边境地区构筑了大量要塞阵地，但它不可能在整个边境线所有的天然屏障上设防，也没有大量的兵力分布在各作战地段上，日军防御的主要薄弱环节在蒙古的最右翼，也就是通往多伦、张家口的山地和沙漠地区；三是整个中国东北地区都在苏军航空兵的航程之内，日本空军已经丧失了制空权。东北西部地区的铁路交通与东北中部和南部地区的运输与联系十分有限；四是关东军处在中国民众的包围之中，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军的仇恨已到了空前高涨的程度，日军没有后方群众的保障。

远东军总部根据上述对日军情况的分析和判断，制定战役计划的指导思想是：“要在短期内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就必须实施迅猛的进攻，迅速消灭关东军，不能让它向中国内地或朝鲜退却。”①

以此形成的战略分布是：后贝加尔方面军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实施进攻；远东第1方面军从滨海地区实施相向进攻；远东第2方面军从黑龙江实施正面进攻。三个方面军齐力并进，协助分制，将关东军分割在各地域内予以消灭。各方面军在实施突击时必须“迅猛的进攻”，充分运用和发挥坦克集团军、独立坦克兵团和骑兵的作用。海军和空军支援协同作战。同时将坦克集团军配属在后贝加尔方面军，因该突击方向没有大江大河，也没有众多的要塞阵地，使用坦克集团军能使方面军具有突击力、高速度和实施纵深进攻。将火箭炮部队配置在第1方面军，因该突击方向有日军坚固的要塞阵地，必须使用空中火力和猛烈炮火加以摧毁。发动闪电式的进攻后，要求各方面军立即利用猛烈的炮火和坦克、自行火炮迅速突破，昼夜不停地突进，不恋一地一垒的酣战，各集群部队快速前进分割敌军，迅速占领交通要道和城市，对敢于顽抗的敌军坚决全部歼灭。

1945年8月3日，远东军总司令员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通过电话向斯大林详细报告“进攻准备已接近完成”，后贝加尔方面军第39集团军和第53集团军，已经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东北地区

① 〔苏〕什捷缅科：《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三联书店，1973年4月。

之间的边界，仅距边界 50～60 公里地域，两个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①，可以从 8 月 5 日晨发动突击，太平洋舰队 7 日前完成战斗准备。斯大林在电话中说："很好，等待命令。"

8 月 7 日 16 时 30 分，最高统帅部斯大林命令华西列夫斯基：8 月 9 日，三个方面军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开始战斗行动，从而使进攻的突然性得到更充分的保障；建议各方面军航空兵的战斗行动从 8 月 9 日晨开始；太平洋舰队转入一级准备，潜水艇从 8 月 9 日晨与航空兵同时开始行动。

第三节　各方面军部队序列与作战任务

苏联远东红军参战部队由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 1 方面军、远东第 2 方面军及太平洋舰队和红旗阿穆尔河舰队四部分组成。

一、后贝加尔方面军

（一）后贝加尔方面军战斗序列

1941 年 9 月 15 日，在后贝加尔军区所属部队基础上组建，高级指挥员中有元帅 2 名，将军 76 名。有 8 个集团军、15 个军、60 个师。司令部初驻赤塔，战役开始后前移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塔木察格布拉格、中国开鲁，战后移驻中国长春。

1. 方面军

司令员：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军事委员：中将捷夫钦科夫和少将索罗金；参谋长：大将扎哈罗夫；作战部长：中将帕弗洛夫斯基；侦察处长：少将波波夫；政治部主任：中将兹科夫；炮兵司令员：炮兵上将福明；装甲兵司令员：坦克兵上将库尔金；工程兵主任：工程兵上将齐尔林；通信兵主任：通信兵上将列昂诺夫；后勤主任：上将沃斯特鲁霍夫。

2. 集团军

（1）第 17 集团军

司令员：中将达尼洛夫；军事委员：少将叶麦利扬诺夫和少将拉萨金；参谋长：少将斯皮罗夫。

（2）第 36 集团军

司令员：中将卢钦斯基；军事委员：少将什马年科和少将祖多夫；参谋长：中将罗加切夫斯基。

（3）第 39 集团军

司令员：上将柳德尼科夫；军事委员：少将鲍伊科和少将佐林；参谋长：少将西米诺夫斯基。



39 集团军司令员上将柳德罗科夫同军事委员少将鲍伊科等在一起

（4）第 53 集团军

司令员：上将马纳加罗夫；军事委员：少将戈罗霍夫和少将查廖夫；参谋长：少将雅科夫列夫。

（5）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

司令员：坦克兵上将克拉夫钦科；军事委员：中将图马尼扬；参谋长：坦克兵中将什特

① "近卫"：1941 年苏军处于困难条件下，第 100、127、153、161 师为歼灭进攻莫斯科的德军立下赫赫战功。同年 9 月 18 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会授予 4 个师"近卫军"光荣称号，自此诞生了冠称"近卫"的部队番号。1943 年 4 月 16 日最高统帅部颁布使用"近卫"两字的规定。凡在进攻战役中，应用于完成最重要的任务；在防御时，应用于对敌实施反突击。

罗姆别尔格。



第39集团军军委委员和领导成员

39集团军军委委员少将鲍伊科

(6)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

司令员:上将普利耶夫;参谋长:少将尼基福罗夫;政治处主任:上校谢尔盖耶夫。

(7)空军第12集团军

司令员:空军元帅胡佳科夫;政治副司令:空军少将帕利扬诺夫;参谋长:空军少将谢列兹涅夫。

(8)后贝加尔防空集团军

司令员:炮兵少将罗日科夫;军事委员:上校马尔金;参谋长:上校乌萨罗夫。

(9)各军军长

步兵第2军:中将洛帕京;近卫机械化第3军:坦克兵中将奥布霍夫;近卫步兵第5军:中将别祖格雷伊;近卫坦克第5军:坦克兵中将萨维利耶夫;机械化第7军:坦克兵中将卡特科夫;近卫机械化第9军:坦克兵中将沃尔科夫;近卫步兵第18军:中将阿福宁;步兵第49军:中将捷连季耶夫;步兵第57军:中将萨菲乌林;步兵第86军:少将列武年科夫;步兵第94军:少将波波夫;步兵第113军:中将奥列舍夫;突破炮兵第5军:炮兵少将阿列克谢耶夫;轰炸航空兵第6军:空军少将斯科克;轰炸航空兵第7军:空军中将乌沙科夫。



步兵第113军中将军长奥列舍夫在行军途中向军委汇报工作

(10)各师师长

近卫空降第1师:少将索波列夫;蒙古骑兵第5师:少将道尔吉帕拉姆;步兵第6师:上校马利切夫斯基;蒙古骑兵第6师:上校策登达希;蒙古骑兵第7师:上校道尔吉;蒙古骑兵第8师:上校奥德苏伦;近卫步兵第17师:少将克瓦什宁;近卫步兵第19师:少将比比科夫;摩托化步兵第36师:上将克里沃西任;步兵第52师:少将米利亚耶夫;摩托化步兵第57师:上校扎基罗夫;骑兵第59师:少将科尔库茨;坦克第61师:上校沃隆科夫;近卫步兵第91师:少将科让诺夫;步兵第94师:少将扎马哈耶夫;步兵第103师:少将索洛耶夫(1945年8月31日起由巴纽克上校任该师师长);近卫步兵第109师:上校巴尔迪诺夫;近卫步兵第110师:少将克里沃拉波夫;坦克第111师:上校谢尔盖耶夫;步兵第124师:少将帕普钦科;步兵第192师:少将巴萨涅茨;步兵第203师:少将兹达诺维奇;步兵第209师:上校杜鲍维克;步兵第210师:少将索科洛夫斯基;步兵第221师:少将库什纳连科;步兵第227师:上

校彼得罗夫；步兵第243师：上校萨基托夫；步兵第262师：少将乌萨切夫；步兵第275师：上校马约罗夫；步兵第278师：上校拉扎列夫；步兵第284师：上校巴杰利泽；步兵第292师：少将波梁斯基；步兵第293师：上校斯基勃涅夫；步兵第298师：上校古津科；步兵第317师：上校多勃罗沃利斯基；步兵第338师：少将洛扎诺维奇；步兵第358师：少将扎列茨基；近卫突破炮兵第3师：炮兵少将波波夫；近卫突破炮兵第6师：炮兵少将库利科夫；高炮第7师：炮兵少将鲍伊丘克；高炮第14师：上校瓦休塔；高炮第17师：上校叶弗多基莫夫；高炮第30师：上校津尼科夫；高炮第92师：上校舒尔；高炮第93师：上校安东诺夫；高炮第94师：炮兵少将普卢日尼科夫；近卫运输航空兵第21师：空军少将戈尔斯基；轰炸航空兵第30师：中校萨任(1945年8月30日晋升上校)；运输航空兵第54师：空军少将谢尔金；轰炸航空兵第113师：上校菲诺根诺夫；轰炸航空兵第179师：空军少将杜鲍申；歼击航空兵第190师：上校福金；歼击航空兵第245师：上校普列辛科；歼击航空兵第246师：上校图连科；轰炸航空兵第247师：上校西拉耶夫；强击航空兵第248师：上校萨维利耶夫；歼击航空兵第297师：中校苏哈切夫；强击航空兵第316师：上校叶罗欣；轰炸航空兵第326师：上校列别杰夫；轰炸航空兵第334师：上校别雷伊。

(二)后贝加尔方面军的作战任务

后贝加尔方面军的战略计划是15～20天内，在2 300公里宽的战线上全面展开进攻，并实现600～800公里纵深的战略突破。其主攻集团以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为核心，加上第17、第39、第53集团军，从尤哥吉尔庙——塔木察格布拉格一线展开，分三路进军东北。其战略目标为南部经巴林右旗攻占赤峰；中部经鲁北攻占沈阳，北部经索伦、洮安(白城)攻占长春。北面的助攻集团由第36集团军担任，任务是粉碎海拉尔、博克图方向的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南面的助攻集团由苏蒙机械化集群负责，攻占多伦至张家口一线，切断关东军与华北派遣军的联系，从而与远东第1、2方面军完成对关东军的合围。

二、远东第1方面军

(一)远东第1方面军战斗序列

1945年8月5日，在滨海军区所属部队基础上组建，高级指挥员中有元帅1名、将军62名，有7个集团军、13个军、45个师。司令部初驻双城子，战役开始后前移到加里科沃。

1945年8月苏第36集团军进军部署图

1. 方面军

司令员：苏联元帅麦列茨科夫；军事委员：上将什蒂科夫和少将格鲁谢沃伊；参谋长：中将克鲁季科夫；作战部长：少将谢苗诺夫；侦察处长：上校伊辛科；政治部主任：少将卡拉什尼科夫；炮兵司令员：炮兵上将杰格佳列夫；装甲兵司令员：坦克兵中将科诺诺夫；工程兵主任：工程兵上将赫列诺夫；通信兵部主任：通信兵中将多贝金；后勤主任：少将尼古拉耶夫。


远东第 1 方面军司令员元帅麦列茨科夫


远东第 1 方面军红旗第 1 集团军司令员上将别洛鲍罗多夫

2. 集团军

(1)红旗第 1 集团军

司令员:上将别洛鲍罗多夫;军事委员:少将斯莫利科夫和少将普鲁德尼科夫;参谋长:少将马斯连尼科夫。

(2)第 5 集团军

司令员:上将克雷洛夫;军事委员:中将波诺马廖夫和少将坚金;参谋长:中将普里希季科。

(3)第 25 集团军

司令员:上将契斯佳科夫;军事委员:少将列别杰夫和少将富尔索夫;参谋长:中将佩尼科夫斯基。

(4)第 35 集团军

司令员:中将扎赫瓦塔耶夫;军事委员:少将楚布诺夫和少将罗马年科; 参谋长:少将沃隆佐夫。

(5)空军第 9 集团军

司令员:空军上将索科洛夫;政治副司令员:空军少将霍罗勃雷赫;参谋长:空军少将斯捷潘诺夫。

第 5 集团军司令员上将克雷洛夫、中将波诺马廖夫、普里希季科在前线

(6)滨海防空集团军

司令员:炮兵中将格拉西莫夫;军事委员:少将马莫诺夫;参谋长:炮兵少将恰伊洛赫扬。

(7)楚古耶夫卡(战役)集群(1945 年 8 月中旬起改称滨海战役集群)

司令员:少将扎伊采夫;代理军事委员:上校格拉福夫;代理参谋长:上校安舒科夫。

(8)各军军长

机械化第 10 军:坦克兵中将瓦西利耶夫;步兵第 17 军:中将尼基京;步兵第 26 军:少将斯克沃尔

佐夫；步兵第39军：少将莫罗佐夫；步兵第45军：少将伊凡诺夫；步兵第59军：中将克谢诺方托夫（1945年8月起由赫塔古罗夫中将任该军军长）；步兵第65军：少将佩列克列斯托夫；步兵第72军：少将卡扎尔采夫；步兵第87军：中将赫塔古罗夫（1945年8月21日起由克谢诺方托夫中将任该军军长）；步兵第88军：中将洛维亚金；轻山地步兵第126军：少将索洛维耶夫；防空第11军：上校莫罗佐夫；轰炸航空兵第19军：空军中将沃尔科夫。

（9）各师师长

步兵第22师：少将斯维尔斯；步兵第39师：少将谢苗诺夫；步兵第40师：上校齐普连科夫；步兵第59师：少将巴特拉科夫；步兵第63师：少将戈罗多维科夫；步兵第66师：上校涅斯捷罗夫；骑兵第84师：少将杰杰奥格卢；步兵第97师：上校雅科夫列夫；步兵第105师：少将谢别尔；步兵第144师：上校佐林；步兵第157师：上校库萨金；步兵第159师：少将加里宁；步兵第184师：上校安德鲁先科；步兵第187师：少将萨文；步兵第190师：上校斯塔夫采夫；步兵第215师：少将卡扎梁；步兵第231师：少将季莫辛科；步兵第258师：上校德米特里耶夫；步兵第264师：少将维诺格拉多夫；步兵第277师：少将格拉迪舍夫；步兵第300师：少将切列帕诺夫（1945年8月15日负伤，16日起由师参谋长斯坚科中校代理师长）；步兵第335师：中校沃尔科夫；步兵第342师：少将穆拉托夫；步兵第345师：上校皮扬科夫；步兵第355师：上校阿巴库莫夫；步兵第363师：上校佩切年科；步兵第365师：上校格沃兹季科夫；步兵第366师：上校马努伊洛夫；步兵第371师：少将克拉斯诺夫斯基；步兵第384师：少将马马耶夫；步兵第386师：上校图戈卢科夫；步兵第393师：上校伊萨科夫；高炮第33师：上校加茨科；高炮第48师：上校斯捷潘佐夫；高炮第95师：上校希中连科夫（1945年8月21日由戈尔季因科上校任该师师长）；高炮第96师：上校季什列尔（1945年8月25日由斯皮里顿诺夫上校任该师师长）；歼击航空兵第32师：上校费多连科；轰炸航空兵第33师：上校科罗别伊尼科夫；轰炸航空兵第34师：少将卡利努什金；轰炸航空兵第55师：上校阿勃拉缅科（1945年8月20起由鲍利沙科夫上校任该师师长）；歼击航空兵第147师：上校麦利尼科夫；歼击航空兵第249师：上校米哈伊洛夫；歼击航空兵第250师：上校涅姆采维奇；强击航空兵第251师：上校基斯洛夫；强击航空兵第252师：上校马卡罗夫。

（二）远东第1方面军的作战任务

远东第1方面军的战略部署是从格罗捷克沃北面和南面由主力红旗第1集团军，第5、第25集团军和机械化第10军突破日本关东军第1方面军东正面要塞地域，向牡丹江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同时向吉林、哈尔滨方向展开进攻，占领汪清、图们、珲春一线，然后与后贝加尔、远东第2方面军会合，达到分割并全歼日本关东军的目的。作为辅助突击，方面军的右翼为第35集团军，其主攻方向是虎头和密山要塞地域，同时在乌苏里江、松阿察河沿线苏方一侧设防，以掩护后方铁路、公路。方面军左翼为25集团军一部及滨海集群（即楚古耶夫卡战役集群），其主要任务是沿日本海海岸实施辅助突击，保障方面军左翼安全，建立太平洋舰队海岸防御区，并切断关东军从朝鲜到东北的交通线。

三、远东第2方面军

（一）远东第2方面军战斗序列

1945年8月5日，远东方面军改称远东第2方面军，高级指挥员中有将军39名，有5个集团军、5个军、23个师。司令部初驻伯力，战役开始后前移到列宁斯阔耶。

1.方面军

司令员：大将普尔卡耶夫；军事委员：中将列昂诺夫和少将库德里亚弗采夫；参谋长：中将谢夫钦科；作战部长：少将卡扎科弗采夫；侦察处长：少将索尔金；政治部主任：少将卢卡申；炮兵司令员：炮兵中将帕尔谢戈夫；装甲兵司令员：坦克兵少将拉德克维奇；工程兵主任：工程兵中将莫列夫；通信兵部主任：通信兵少将诺维尼茨基；后勤主任：中将安德列耶夫。

2. 集团军

(1)红旗第2集团军

司令员:坦克兵中将捷列欣;军事委员:少将纳钦金和少将谢米昂科;参谋长:少将莫扎耶夫。

(2)第15集团军

司令员:中将马莫诺夫;军事委员:少将罗曼诺夫和少将马尔采夫;参谋长:少将普罗夏耶夫(1945年8月15日起由伊凡诺夫少将任该集团军参谋长)。

(3)第16集团军

司令员:少将切列米索夫;军事委员:少将里亚波索夫和少将波利亚科夫;参谋长:上校鲍里索夫。

(4)空军第10集团军

司令员:空军上将日加列夫;政治副司令员:上校费多罗夫;参谋长:空军少将拉夫里克。

(5)阿穆尔河沿岸防空集团军

司令员:炮兵少将波利亚科夫;军事委员:空军少将希姆科;参谋长:少将科勃连茨。

(6)堪察加防区

司令员:少将格涅奇科;参谋长:中校沃罗诺夫;政治处主任:上校沃罗德科。

各军军长

独立步兵第5军:少将帕什科夫;步兵第56军:少将季亚科诺夫;防空第3军:炮兵少将利亚尔斯基;防空第15军:炮兵少将麦任斯基;混成航空兵第18军:空军中将纽赫季林。

各师师长

步兵第3师:上校谢因;步兵第12师:少将克留奇科夫;步兵第34师:少将杰明;步兵第35师:少将瓦西列维奇;步兵第79师:少将巴图罗夫;步兵第101师:少将季亚科夫;步兵第255师:上校苏霍夫;步兵第361师:中校奥加涅佐夫;步兵第388师:上校穆林;步兵第390师:上校捷普利亚科夫;步兵第396师:上校福奇金;高炮第73师:上校伊瓦申科;高炮第97师:上校巴拉巴什;高炮第98师:中校多莫拉茨基;歼击航空兵第29师:上校戈尔洛夫;轰炸航空兵第83师:上校沃洛金;强击航空兵第96师:中校科切尔金(1945年8月30日晋升为上校);混成航空兵第128师:上校叶列明;歼击航空兵第149师:上校科兹洛夫;强击航空兵第253师:中校采德里克;歼击航空兵第254师:上校西拉耶夫;混成航空兵第255师:中校洛兹钦科(代);歼击航空兵第296师:上校米辛科。

(二)远东第2方面军作战任务

远东第2方面军在进军东北中担任助攻任务,助攻正面宽达2 000公里,纵深为220~250公里。其主要任务是第15集团军从列宁斯阔耶出击,协同红旗阿穆尔区舰队强渡黑龙江,并沿松花江向佳木斯、哈尔滨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独立步兵第5军从比金向饶河、宝清实施辅助突击;红旗第2集团军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强渡黑龙江,经孙吴、嫩江向齐齐哈尔发动进攻,切断关东军独立第4军和主力的联系;第16集团军与北太平洋舰队、堪察加防区部队则防守鞑靼海峡和日本海沿岸,并准备进攻库页岛,起到方面军战略预备队的作用。空军的任务是掩护突击集团强渡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轰炸日军要塞阵地。

四、太平洋舰队和红旗阿穆尔河舰队

(一)太平洋舰队

1. 太平洋舰队序列

太平洋舰队于1935年1月组建,含北太平洋舰队,高级指挥员中有将军13名,拥有海军航空兵6个师,司令部驻海参崴。有巡洋舰2艘、驱逐领巡舰1艘、驱逐舰12艘、潜艇78艘、护卫舰19艘、布雷艇10艘、扫雷艇52艘、猎潜艇49艘、鱼雷艇204艘。海军航空飞机1 549架。

(1)太平洋舰队

司令员:海军上将尤马舍夫;军事委员:岸上勤务中将扎哈罗夫和滨海边区党委书记别哥夫;参谋长:海军中将弗罗洛夫;政治部主任:岸上勤务少将穆拉维耶夫;岸防主任:中将卡巴诺夫;空军司令

员：空军中将列麦什科；防空司令员：少将苏沃罗夫；后勤主任：海军少将工程师杜勃罗文；防空军军长：少将杜什宁。

（2）北太平洋舰队

司令员：海军中将安德列耶夫；军事委员：少将扎伊采夫；参谋长：海军少将巴伊科夫。

（3）各航空兵师师长（隶属于太平洋舰队）

水鱼雷航空兵第2师：空军少将苏奇科夫；歼击航空兵第7师：上校罗马年科；俯冲轰炸航空兵第10师：中校科瓦连科；强击航空兵第12师：上校巴尔塔绍夫；混成航空兵第15师：上校米哈伊洛夫；混成航空兵第16师：中校杰尼索夫。

2. 太平洋舰队作战任务

主要任务是以潜艇和航空兵切断关东军与日本本土的联系，阻断日本关东军逃窜其他地域或逃回本土；主力舰及海军陆战队攻占朝鲜雄基、罗津、清津、元山等海港；掩护海岸，支持陆军作战。

（二）红旗阿穆尔河舰队

1. 红旗阿穆尔河舰队序列

红旗阿穆尔河舰队指挥员中有将军2名，拥有浅水重炮舰8艘，炮舰11艘，装甲舰和扫雷艇64艘。司令员：海军少将安东诺夫；军事委员：海军少将亚科文科；参谋长：海军上校古辛。

2. 红旗阿穆尔河舰队作战任务

红旗阿穆尔河舰队主要任务是协同北线集团军强渡黑龙江，支持北线陆上作战。

第四节 各方面军司令员的决心

苏联远东各方面军和集团军进攻战役的准备工作是在战斗行动开始之前进行的，因此具有一系列突出特点：一是各方面军和集团军进攻战役决心的形成和计划的拟定，以及实际准备工作必须保持绝密，只让极少数人员了解整个任务。二是当进行进攻的直接准备时，在可能的时间限度内，不向执行者下达具体任务。三是在进攻出发地域或变更部署、集中和展开部队尽可能保持隐蔽。

所有这些及其他一些问题在司令员的决心和准备阶段的实际工作中都得到了体现。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意图和受领的任务，各方面军司令员定下了决心。

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1、2方面军的进攻部署示意图

一、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的决心

后贝加尔方面军当面，除了左翼的海拉尔、乌奴耳要塞地域和中央的阿尔山要塞地域外，日军没有既设的防御阵地。边境地带只有一些掩护队，其主要集团集中在个别方向的纵深要塞内。这里的

草原沙漠地形便于苏军在宽大的正面上组织进攻并对各要塞地域实施深远的迂回。

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决心以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第 17、39、53 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从南面迂回阿尔山要塞地域，向长春方向实施主要突击。首要任务是消灭对面日军，越过大兴安岭，在战役第 15 天进至大板、鲁北、索伦一线（纵深 350 公里）。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最晚不迟于战役第 5 天进至上述地区。随后，预定以方面军主力推进到赤峰、沈阳、长春、扎兰屯一线（纵深 800 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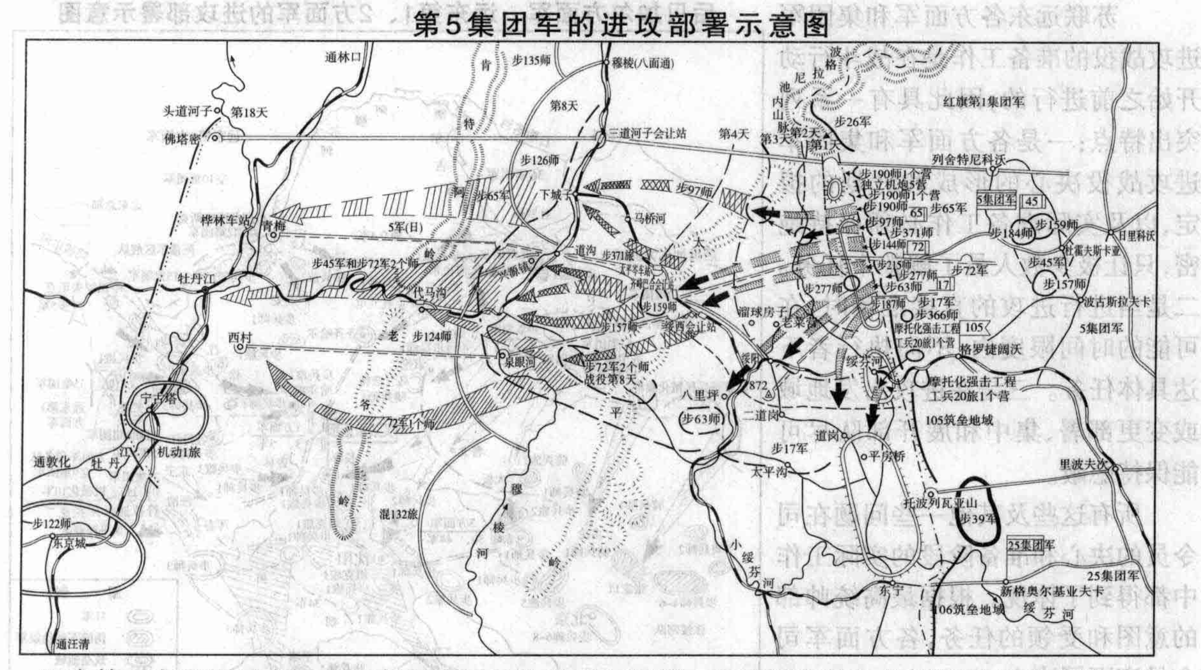
方面军主要集团军分成两个梯队，第 17 集团军、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及第 39 集团军为第一梯队，第 53 集团军为第二梯队。由步兵第 317 师、第 227 师、坦克第 111 师、坦克第 201 旅、防坦克歼击炮兵和高炮部队所组成的方面军预备队置于主要突击方向。同时，预定实施两个辅助突击，保障方面军主要突击集团的行动：第一辅助突击由骑兵机械化集群实施，该集群又分成两个战役集团，在 350 公里的正面上分别展开，向张家口和多伦方向突击。第二辅助突击由第 36 集团军实施，该集团军也分成两个战役集团，展开在 250 公里的正面上向海拉尔、扎兰屯方向突击。

突击集团（进攻正面达 360 公里）的主力集中于中央，向鲁北、长春进攻。该集团动用了整个方面军的大部分兵力和武器（54% 的步兵师、73% 的坦克和自行火炮、62% 的火炮和迫击炮）。在方面军总长 2 300 公里的战线上，行动地段占 1 500 公里。进攻计划在宽大的正面战线上于几个方向同时展开。诸兵种合成兵团平均每昼夜进攻速度预定为 23 公里，坦克兵团预定为 70 公里。

二、远东第 1 方面军司令员的决心

滨海边区至中国东北方向上的情况与后贝加尔方面完全不同。在远东第 1 方面军地带内，日军调配了为数 20 万人并以强固边境要塞地域和沿穆棱河、牡丹江的既设防御地区为依托的强大集团。防御纵深达 150 ~ 180 公里。山地及山林地形使苏军部队只能在个别方向上行动，所以进攻必须从夺取要塞地域开始，同时，需要在突破地段上高度集中兵力。

第5集团军的进攻部署示意图



远东第 1 方面军司令员麦列茨科夫元帅决心以红旗第 1 集团军及第 5 集团军的兵力向牡丹江方向实施主要突击。首要任务是突破边境要塞地域，粉碎对面日军，于战役第 15 ~ 18 天前出至勃利、牡丹江、汪清一线（纵深 150 ~ 180 公里）。随后，主力向吉林、长春方向进攻，以部分兵力进攻哈尔滨（纵深近 500 公里）。同时，实施两个辅助突击。第 35 集团军从帕夫洛——费多罗夫卡地区向密山、勃利方向进攻，保障方面军突击集团的右翼。25 集团军在方面军主力左翼行动，任务是向汪清总方

向发起进攻，向南攻击日军防御阵地，保障方面军的左翼。

方面军战役纵深为400～450公里，预定以平均每昼夜8～10公里的进攻速度完成攻击任务，推进之所以这样缓慢，是因为必须突破要塞地域，加上山林地形十分复杂。

方面军司令员特别重视对突击集团的保障和向两翼扩大突破口。远东第1方面军与需要在各独立方向上沿行军路线集中兵力并绕过要塞地域的后贝加尔方面军不同，其兵力部署都集中在各个突破地段。因此，战役意图中规定要在狭窄正面上实施毁灭性的突击，并向翼侧扩大突破口。为完成上述任务，在主要突击方向上作战的各集团军，进攻地带较窄，加强较多，从而得以建立很大的战役密度。

三、远东第2方面军司令员的决心

远东第2方面军司令员普尔卡耶夫大将在定下决心时注意到，部队一旦展开进攻就必须强渡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两大江河，攻占对岸的各个要塞地域。在方面军总长2 130公里的战线中，积极行动地段占520公里，但即使在这一地段，进攻也只计划在个别方向上实施。整个方面军作战是在红旗阿穆尔区舰队的密切协同下进行的。计划以第15集团军的兵力，在阿穆尔区舰队两个舰艇支队的协同下向三姓、哈尔滨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在饶河方向，独立步兵第5军则在阿穆尔区舰队1个舰艇支队的协同下向宝清方向突击。当后贝尔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1方面军在主要方向上扩大战果时，预定以红旗第2集团军的兵力在方面军右翼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向齐齐哈尔实施辅助突击。

方面军战役部署成一个梯队，以1个步兵师和1个旅担任预备队。战役纵深的直线距离为500公里，沿松花江进攻的为700公里左右。预定平均每昼夜进攻速度为13公里。

第五节　炮兵战斗行动计划

炮兵战斗行动计划是根据方面军司令员的决心和各战区的具体情况制定的。因此，每个方面军的炮兵战斗行动计划都各有特点。

一、后贝加尔方面军炮兵行动计划

后贝加尔方面军鉴于边境没有日军重兵，同时准备对要塞地域实施深远迂回，只将部分骑兵机械化集群、第17集团军、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第39集团军的炮兵在国境线上的进攻出发地域展开，以支援先遣支队，消灭日军国境哨所。炮兵的基本兵力准备在部队主力的行军纵队内行动，冲击的炮火准备和火力支援均不打算进行。

只有第36集团军展开了全部炮兵行动，准备摧毁日军的个别支撑点和为强渡额尔古纳河提供火力支援，保障部队在河东南岸夺取登陆场。


炮火准备就绪

第39和第36集团军进攻地带面对要塞地域，因此得到的炮兵加强支援最多。在第36集团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上（海拉尔方向），每公里火炮和迫击炮密度达84门。在辅助突击方向上（满洲里方向），每公里密度达43门。强渡额尔古纳河时，1个步兵营可得到1个炮兵营和1个迫击炮营的火力支援。步兵团的炮兵和防坦克歼击炮兵营则配置在渡河地段，以摧毁直接瞄

准射击的火力点。

二、远东第1方面军炮兵行动计划

远东第1方面军得到的火炮加强数量较其他方面军多。战役开始前，第1方面军共有76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和迫击炮(高射炮和火箭炮不包括在内)8 000多门。这是因为必须突破强固的要塞地域，然后又需要在独立而分散的方向和山林地条件下作战，而且在日军防御纵深内还有数道既设的防御地区。

在战役计划和准备过程中，第1方面军司令员十分重视建立适当口径火炮的炮兵群，以保障被大片难于通行的地形所隔开的各集团军能够独立地完成战斗任务。

第1方面军所属各集团军进攻方向上的地形和日军防御各有不同，各集团军炮兵战斗行动计划也各不相同。

第5集团军因为要突破极其强固的绥芬河要塞地域，得到的火炮最多。76毫米口径以上的火炮和迫击炮达3 000门，还有火箭炮400余门。

第5集团军司令员接到指示："在主要突击方向上，每公里火炮、迫击炮平均密度不得少于180门(45毫米和76毫米加农炮不包括在内)，个别地段上要达到250门。在辅助方向上，每公里不得少于60门。其炮兵战斗行动计划分五个阶段执行：第一阶段，在战役开始前一天，对日军永备工事进行预先破坏；第二阶段，在夜间进攻前1.5～2小时保障先遣营作战；第三阶段，炮火准备，持续4个小时；第四阶段，一层徐进弹幕射击与逐次集中射击相结合，支援部队冲击；第五阶段，在日军防御纵深的战斗中护送部队。

计划特别强调破坏日军永备工事。为完成这一任务，第5集团军建立了特种破坏炮兵群。这个阶段的计划也特别详尽，规定在同一时间内炮兵精密火力准备的目标每公里不超过5～6个，以保证破坏炮兵群能有效地执行任务。

同三个方面军的其他各集团军相比，该集团军的火炮密度最大，每公里突破地段达210～260门火炮和迫击炮。在山林地条件下，这样大的火力密度在整个战争期间是空前的。

对如此大量的炮兵如何转移的问题，也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尤其注意的是使其不落后于步兵和坦克，并保持不少于50%的火炮经常处于准备射击状态。攻占绥芬河要塞地域后，预定将一部分炮兵转隶于红旗第1集团军和第25集团军。

远东第1方面军其他集团军的炮兵战斗行动计划则全然不同。

在第35集团军的右翼虎头方向，炮兵用于保障强渡乌苏里江和突破要塞地域。在主要方向列少扎沃德斯克西南预定进行55分钟的炮火准备，还计划强渡松阿察河和发起冲击后1小时内进行火力保障和支援。在以后的6～8小时内，炮兵则保障步兵和坦克在日军防御纵深发起进攻。

为完成上述任务和便于灵活机动地指挥炮兵，第35集团军司令员决定组建炮兵群。在主要突击方向，建立了集团军、师、团的远战炮兵群和火箭炮群。在辅助突击虎头方向，建立了包括破坏炮兵分群和对日军炮战炮兵分群的集团军炮兵群。

红旗第1集团军在战役初期必须穿过山丘原始森林地域，因此未计划炮火准备。但在进攻出发地域有50%火炮随时做好射击准备，支援穿越原始森林的部队。

第25集团军计划从筑垒地域抽调兵力组成先遣营，在夜间突然实施冲击，攻占对面的一些独立支撑点和抵抗枢纽部。为保障行动的隐蔽和突然性，只有当日军进行火力抵抗时，炮兵才应开火。因此，计划中没有规定炮火准备的开始时间及持续时间，而是在战斗发展过程中视所遭遇的日军兵力大小而定。

远东第1方面军的炮兵战斗行动计划特别周密细致。这是由于在战役中，特别是在攻占日军要塞地域时，炮兵作用特别重要。炮兵主力集中在方面军的主要突击方向，方面军主要集团里的集团军、军、师也都掌握有足够数量的火炮。方面军指挥部把炮兵主力集中在主要突击方向后，得以形成很大的火炮密度。在第5集团军的12公里突破正面上，每公里密度即达212门火炮和迫击炮，个别师的突破地段达263门火炮和迫击炮。因为情况不同，方面军统一的炮兵进攻计划没有制定，只是在

集团军范围内制定了计划，并依次得到了方面军司令员批准。为了最大限度地达到突击性，还准备了不经炮火准备，部队就发起进攻的方案。

三、远东第2方面军炮兵行动计划

远东第2方面军第15集团军和独立步兵第5军进攻地带内，炮兵受领了如下任务：当部队强渡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在对岸攻占和巩固登陆场，突破要塞地域并在日军防御地纵深发起进攻时，提供火力保障。红旗第2集团军的炮兵则负责保障部队的防御行动。

方面军配置了足够数量的炮兵，进而在第15集团军主要突击方向形成了每公里突破正面达100～150门火炮和迫击炮的密度。

炮兵战斗行动计划包括实施炮火准备、保障强渡江河及攻占并扩大登陆场，保障各步兵师完成当前任务等内容。

为保障先遣部队强渡阿穆尔河在对岸夺取登陆场，计划的炮火准备持续时间为50分钟。同时，在先遣支队搭乘渡河器材期间，预定对已查明的目标进行5分钟急袭射击。当登陆兵渡河时，炮兵应在25分钟内压制并摧毁防御前沿和防御浅近纵深内的目标。登陆兵上岸前，阿穆尔区舰队舰艇上的火炮对上岸地域日军防御阵地进行10分钟的急袭射击。随后再对上岸地域和已夺取的登陆场实施10分钟的边缘射击，阻击日军反冲击。然后，炮兵再保障部队扩展登陆场和抗击日军反冲击。

综上所述，各个方面军火炮的数量和种类，各个通行程度不同的战役方向上炮兵的部署，炮火准备的方法及其持续时间，以及炮兵战斗行动所遵循的原则都是互不相同的。这不仅取决于炮兵的任务、部队的编成和日军防御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战区条件。

炮兵部署的重要特点是：当攻占边境地带日军防御阵地并向各既定方向发起进攻时，炮兵基本力量将分散使用，配属给各师，以便使部队在脱离集团军主力执行战斗任务时，能有较大的独立性。

所有这些情况，不仅限定了各方面军和集团军火炮的数量和质量，而且也决定了炮兵的组织与编成。

第六节　航空兵战斗行动计划

后贝加尔方面军的空军第12集团军（司令员为空军元帅胡佳科夫）从方面军司令员受领了如下任务：掩护在集中地域和战场上的方面军部队，尤其是保障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免遭日军航空兵突击；在主要方向上支援进攻；进行系统的侦察，查明日军陆、空军部署以及军队沿铁路、公路调动情况；阻止日军预备队纵深向前开进。



航空兵、地面火炮联合作战

方面军司令员给航空兵确定的首要任务是破坏日军从东北内地通往边境的铁路线，对从东北中部向大兴安岭开进的日军实施突击。据此，方面军航空兵应切断位于东北中部平原的日军第3方面军主力同边境部队的联系，并阻止其先于后贝加尔方面军前出至大兴安岭。

空军第12集团军司令部计划了战役前五天的战斗行动。大部分航空兵，其中包括轰炸航空兵，被用于支援在各独立战役方向上行动的部队。计划以2个强击航空兵师和1

个歼击航空兵师支援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以1个轰炸航空兵师支援第36集团军,以1个歼击航空师(欠1个团)支援第39集团军,以1个歼击航空兵团支援骑兵机械化集群。五天期间,空军第12集团军将出动6 000架次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歼击和侦察航空兵每天各出动2次,而轰炸和强击航空兵每天则出动1次。在出动总架次中,预定在主要突击方向上使用4 980架次,占总出动架次的80%。

计划在战役第一天,对铁路车站(索伦、海拉尔、阿尔山)列车、汽车纵队、集结地的预备队以及日军机场进行密集突击。

空军第12集团军的2个输送航空兵师,用于保障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燃料和弹药运输。

远东第1方面军的空军第9集团军(司令员为空军上将索科洛夫)的战斗行动计划比较完善,符合突破日军强固防御阵地这一任务的特点。对方面军突破要塞地域发起进攻和各集团军执行当前任务时的航空兵保障,进行了尤其周密的筹划。

战役开始前,计划进行5~7天的预先航空火力准备(总计约4 000架次),以查明方面军对面直至牡丹江一线的日军部署,破坏日军防御工事,压制方面军主要突击方向上绥芬河要塞地域沃勒恩抵抗枢纽部的日军。

直接航空火力计划分为破坏和冲击准备两个阶段(总计约3 000架次)。在持续为一天的破坏阶段,为摧毁绥芬河要塞地域的永备工事,计划以近程、远程轰炸机和强击机分批轮番突击,共出动1 578架次。冲击准备阶段,预计出动1 338架次。此外,航空兵应在发起进攻的前夜,出动单机,以声响掩护坦克占领冲击出发地位,并沿途轰炸目标,疲惫和消灭日军有生力量。

发起冲击前,轰炸机和强击机将对要塞地域的防御工事进行2次密集突击。第1次出动393架次;第2次出动轰炸机和强击机200架次,歼击机593架次。

冲击开始后,强击航空兵就转而用于对日军工事实施突击,保障地面部队突破日军防御阵地,并在整个战役中纵深护送步兵和坦克进攻。

进攻第一天,空军第9集团军就集中使用主力在方面军主要突击方向上的第5集团军进攻地带内。这一天计划出动的3 514架次中,有2 200多架次用于保障第5集团军的行动。然后,当各集团军完成当前任务时,计划出动4 330架次,保障方面军部队的行动。

在航空兵活动的整个10~12天期间(包括5~7天的航空火力准备),共计划出动14 284架次。

按照使用航空兵的计划,空军第9集团军司令员为了同诸兵种合成集团军直接协同,区分了各航空兵师的任务,而集团军司令部则与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司令部共同制定了协同动作计划表,具体区分了航空兵攻击的目标、时间以及任务执行者和出动架次。之所以能够如此具体,是因为在进攻前方面军掌握了有关日军防御性质的详细情报。

远东第2方面军的空军第10集团军(司令员为空军上将日加列夫)的主要力量用于掩护和保障方面军主要突击集团第15集团军的行动。在该方向,集中了空军第10集团军全部兵力的45%。战斗行动计划详细规定了对日军侦察措施和歼击航空兵的行动。歼击航空兵的任务是掩护地面部队和红旗阿穆尔区舰队免遭日军空中突击。

强击和轰炸航空兵负责在步兵强渡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时保障步兵行动,随时准备对日军及其工事进行突击。

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司令员为空军中将列麦什科)负责对朝鲜港口的战斗舰艇和运输船只实施猛烈轰炸和强击,使日军无法从本土向关东军增调预备队和输送技术兵器。与此同时,掩护苏军舰艇、运输船只和机场免遭日军可能的袭击。

海军航空兵还负责对海面、港口和海岸进行系统的侦察。随后在战役过程中,海军航空兵的任务有所改变。航空兵被用于支援和保障登陆兵夺取雄基、罗津、清津等朝鲜港口的战斗行动。北太平洋区舰队航空兵的任务是协同步兵和区舰队防御鞑靼海峡附近的海岸,破坏日军交通线和对日方进行

侦察。

综上所述，在方面军战役第一阶段，各方面军航空兵和海军航空兵的任务是：后贝加尔方面军航空兵负责保障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诸兵种合成集团军迅速向东北纵深推进；远东第1方面军航空兵负责在突破日军要塞地域和对日军追击时保障突击集团的顺利行动；远东第2方面军航空兵负责保障部队强渡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太平洋舰队航空兵则保障舰队在海上顺利作战，破坏日军海上交通线，支援登陆兵登陆。

所有航空兵还须进行不间断侦察，并掩护地面部队和海军的交通线免遭日军袭击。

第七节　装甲坦克、机械化兵战斗使用计划

远东作战准备过程中，集中了大量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最强有力的集团部署在最便于行动的后贝加尔至中国东北方向上。

各方面军、集团军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的使用计划因战区的自然条件、日军各集团的编成和防御性不同而不同。

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决心将全部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团（担任预备队的坦克第111师除外）用于战役的第一梯队，力图尽快地越过大兴安岭，先发制敌，不让来自东北中部地区的日军预备队利用这一天然屏障展开部署。

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在战役中起主导作用。其应不迟于战役第五天越过大兴安岭，扼守山垭口，攻占鲁北、突泉地域。鉴于从边境至大兴安岭这一地段内日军兵力不大，计划以纵队行军队形实施进攻，必要时再随时展开。

计划分两个阶段越过大兴安岭。第一阶段持续时间是2昼夜。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应消灭日军国境守备队，越过沙漠草原地域，前出至大兴安岭。纵深达200公里，每昼夜平均进攻速度100公里。第二阶段持续时间是3昼夜，任务是占领大兴安岭山垭口，前出至中部平原。任务纵深为250公里，每昼夜平均进攻速度80余公里。

进攻在两个方向上实施，彼此相距75公里。战役部署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为机械化军，第二梯队为坦克军。为使行军纵队不致过长，各机械化军通过沙漠时，预定使用两条行军路线，并派出强有力的先遣支队和运动保障队。此外，每个行军纵队还有1个防坦克预备队，高射炮则混编于纵队之中。

近卫坦克第5军（集团军第二梯队）派出1支先遣支队，利用坦克的高速度，保障该军能迅速进入集团军第一梯队。配属给诸兵种合成兵团的所有独立坦克旅、团，都编入该兵团的先遣支队。先遣支队一般由步兵、坦克兵、炮兵、工兵组成，能够独立执行战斗任务。

越过大兴安岭后，集团军主力近卫机械化第9军和近卫坦克第5军应向沈阳发起进攻，而机械化第7军则向长春进攻。此外，集团军指挥部还须在部队前出至长春、沈阳地域后，以部分兵力进攻旅顺口。

远东第1方面军集中主要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用在突破地段。直接支援步兵的坦克在每公里突破正面上达到30~40辆。突破要塞地域后，坦克部队编入先遣支队进一步扩大战果。

第5集团军攻占牡丹江后，越过国境线150公里时，方面军快速集结机械化第10军，计划使用第5集团军进攻地带。

远东第2方面军根据各方向上地形的可通行程度区分坦克兵力，以坦克旅为基本单位。红旗第2集团军有3个坦克旅和3个自行火炮营。第15集团军有3个坦克旅和4个自行火炮营。独立步兵第5军有1个坦克旅和2个自行火炮营。远东第2方面军司令员计划强渡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后，

以坦克兵团共7个坦克旅担任先遣支队。

综上所述,制定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战斗使用计划时,考虑了东北的复杂自然条件以及各个战役方向上日军的防御和部署的特点。

第八节 工程保障

战役准备工作和部队实施战斗行动都需要进行大量的工程作业。因此,各方面军都加强了相当数量的工程兵,计有18个工程工兵旅和舟桥旅以及30个其他各种工程兵部队。各方面军加强如此大量的工程兵,首先是由于在当地地形条件下作战十分艰巨。

后贝加尔方面军需要穿过辽阔的沙漠草原地域,越过大兴安岭,并强渡多条河流。

远东第1方面军突击对面是难以通行的山丘原始森林地形和森林沼泽地形。

远东第2方面军开始作战,就必须先强渡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这两大江河,并在森林沼泽地形上实施进攻。

此外,许多战役方向道路稀少,缺乏用水、烧柴等必需品,必须在各方面军行进的地带内进行大量的工程作业。因此工程保障的基本任务是:实施工程侦察;修建军用道路和急造军路,架设新的和加固旧的桥梁;完善防御前沿,使之成为部队进攻出发阵地;组织供应后贝加尔方面军用水;保障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越过大兴安岭;当部队在荒芜道路的地区行进,翻越山垭口,渡河和通过森林沼泽地形上的隘路时,护送部队前进;保障远东第2方面军强渡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参加突破要塞地域,同时还须参加部队的战役伪装工作。

在短短的时间内,工程兵扩展了由后方通向国境线的乡村土路,加固和修整了现有道路的路基,检修了桥梁,使之可供中型和重型坦克通行。为迷惑日军,还隐蔽了主要突击方向,全线都进行了构筑进攻出发地域的工程作业。

战役准备阶段的工程作业量,以远东第1方面军的任务尤为艰巨。在山丘原始森林和沼泽地形这一困难条件下,更需要周密地拟订作业计划,尽最大可能地动员一切人力和器材,以期在规定时限内完成任务。此外5~6月份不间断的降雨使河水泛滥,部分已修好的道路被冲毁,许多桥梁被破坏。在无休无止的雨天中作业,不但人员极度疲劳,而且耗费大量时间。在第35集团军地带内,由于降雨,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有好几十公里的沼泽河谷变成了一片汪洋。在这种情况下,已无法再挖掘平底坑、堑壕和交通壕。所有工事都采取堆积式。进攻出发地域的堑壕由草皮土块堆砌而成,前墙上面开以射击孔并构筑了枪座。沼泽地段铺设了多层小圆木路面,土路路面则添上了新土。

其他集团军进攻地带内的山地地貌起伏较大,土质坚硬多石,土层很薄,只有20~30厘米厚的浮土,某些通过地段还是原始的林海,因此,构筑出发地域得付出很大劳动。按照伪装要求,进行工程作业时不得发出声响。绝对禁止爆破作业。这样一来,像清除顽石,开辟原始森林道路这样艰巨的劳动只能靠双手来完成。

进攻出发地域的组成如下:沿国境线的前沿阵地是2~3道具有各种战斗和生活设备的堑壕,之间以纵横交错而且能够据以射击的交通壕相连接。然后是带有火炮和人员掩蔽所的火炮阵地地域及步兵和坦克的待机地域。最后是集团军二梯队所属部队的阵地和各兵团的后方地域。

在原始森林地域(主要是在红旗第1集团军地带内),进攻出发地区是一条宽20米沿国界走向的林中界道。这也是第一线步兵分队的观察和射击地带。此外,这条界道还与两条通往国境线的纵向道路和日军在原始森林内临时开辟的一些道路相连接。

进攻出发地域工程构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铺设地雷掩护国境线,尤其是次要方向上的国境线,以保障苏军集中并防止日军进行侦察。地雷场和战役性障碍物的设置是按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批准的

集团军计划实施的。截至8月1日,方面军地带内共设置了760个地雷场,总计188 867颗地雷。

远东第1方面军在准备战役阶段完成了巨大的工程作业量,共挖掘1 662米堑壕及交通壕,构筑1 283个指挥所和指挥观察所、112个钢筋混凝土帽堡、9 477个火炮和迫击炮掩体、1 662个土层式掩体,挖掘93口水井,新修143座桥梁,将112座桥梁加固到能负重60吨等。仅在第5集团军进攻地带内(方面军主要突击方向上)就开辟了180公里方面军道路、380公里集团军道路、470公里部队道路,总长1 030公里。在方面军地带内总长5 510公里的道路中,有2 772公里(部队、集团军、方面军道路)是新开辟的,其比例占道路总长的50%。

后贝加尔方面军地带内地形开阔,需要进行大量工程作业来隐蔽集中进攻出发地域内的人员和武器。

坦克一般隐蔽在山丘及斜面上挖掘的平底坑内,覆以制式伪装网或帆布篷。根据伪装纪律采取了一系列就便伪装器材的措施。白天绝对禁止沿边境线来往运动,夜间则只准车辆闭灯或开小灯(远离国境线时)行驶。

为了在主要方向上迅速地通过障碍物,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坦克和汽车装备了束柴、垫席、自救圆木、车辙板和其他辅助设备,每辆车携带两根圆木和223捆束柴,为此共准备了1 860根圆木、6 650捆束柴、580块车辙板。

战役准备期间,方面军工程兵修复了1 219公里道路,开辟了269公里急造军路,制成了纵长170米的可分解桥(负重60吨)的构件,勘察标定了755公里的开进道路。

沙漠地形判定方位困难,因此行进路线和急造军路都用特制的路标加以标志。在山丘和高地上设置了从远处可以辨认的方位标志,如涂以白色的土座,夜间则设置灯标。为了便于空中识别方位,空军第12集团军的工程兵在国境线附近的个别高地上设置数字标志,而在一些最重要的道路上,则用涂有白色的石块砌成"A"、"B"等代号。

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工程兵,为了保障部队用水,进行了大量作业。仅在乔巴山车站地域就修建了将近100口水井。在部队向进攻出发地域行动的路线上,每隔15~30公里就有一口水井。为了更好地保障用水,每个步、炮兵营都建立了由1个步兵班组成的非建制供水组,其成员都受过侦察水源、挖井和建井的训练。仅在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集中和出发地域内,就挖了200多口水井,并准备了大量备用井架。

1945年6月10日至8月8日期间,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工程兵总共构筑了1 194口水井,修复了322口水井(包括行进路线上构筑和修复的每昼夜总供水量为15 920立方米的873口水井)。除水井外,还修建了21眼机井,设立61处供水站。由于工程兵做了大量工作,方面军的全体人员没有在用水方面遇到困难。

远东第2方面军地带内,也大量进行了构筑出发阵地的工程作业。在4~7月,共新修了266公里道路,修整了1 417公里道路,桥梁则加固到能负重30~60吨。

工程兵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保障进攻部队强渡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仅在第15集团军地带内,工兵就修筑了三个渡河地段,配备了必要的器材和工程人员。

综上所述,军队工程保障的特点是大量修筑道路和桥梁;在山丘原始森林地和森林沼泽地构筑进攻出发阵地;保障突破要塞地域;保障强渡大型江河和越过大兴安岭;在缺水的沙漠条件下保障部队用水。工程兵在战役准备期间所进行的大量工程作业,保障了苏军顺利地转入决定性的进攻。

第九节　物资和技术保障

组建了以苏军总后勤部副部长、上将维诺格拉多夫为主任的远东苏军总后勤部。

远东苏军总后勤部负责制定运输计划,在战区范围内分配和调拨运到的物资器材,同时领导各方面军后勤部工作。

1944年12月1日至1945年4月1日,共运往远东迫击炮4 640门、火炮2 200门、炮弹320万发、子弹4.1亿发及其他武器弹药。德国投降后,这类物资器材的调运明显增加。

苏联内地的铁路、公路和水上运输干线也同样被用来进行大规模的物资调运。鉴于战区遥远,苏联国防委员会为远东武装力量规定了高额的弹药、燃料和粮秣储备量。萨哈林岛、堪察加半岛和其他边远地区的部队拥有足够一年之用的粮秣和油料储备。

由于铁路网不够发达,汽车运输起到了很大作用。战役开始前,各方面军部队共拥有10余万辆汽车以及大量的拖拉机和牵引车。此外,还给后贝加尔方面军加强了两个输送航空兵师。在江河流域进攻的远东第2方面军,拥有大量的轮船、驳船和拖船等航运工具。

当各方面军和集团军位于进攻出发地域时,主要的后勤部队机关要尽可能地靠近部队,缩短部队后勤与集团军后勤之间、集团军基地和方面军仓库之间的距离,使各类储备品位于部队附近,减少前送距离。

伊尔库茨克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干线交由远东苏军总部管辖。从主要干线通往满洲里和朝鲜的支线则归各方面军管辖。

1945年7月20日,建成了一条从共青城到苏维埃港的新铁路线,西伯利亚铁路干线有了第二个出海口。有了主要铁路干线和大量支线,从而使各方面军后勤基地分配到一定数量的铁路区段:后贝加尔方面军分配了12个铁路区段,远东第2方面军分配了9个铁路区段,远东第1方面军分配了8个铁路区段。

各方面军的分配站是:总分配站——博尔集亚,分站——乔巴山(属后贝加尔方面军);总分配站——斯沃博德内,分站——哈巴罗夫斯克(属远东第2方面军);总分配站——库别罗沃和乌苏里斯克,分站——曼佐夫卡(属远东第1方面军)。

后贝加尔方面军各集团军(第39、53、17集团军、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骑兵机械化集群)将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起进攻,所以没有自己的铁路区段。为了保障不间断地供应后贝加尔方面军和缩短从铁路车站至各集团军基地的土路运输距离,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决定方面军基地在乔巴山地区展开。除第36集团军外,各集团军基地距部队的土路距离一般是40~100公里,距方面军基地约为240~300公里。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基地距方面军基地290公里,距部队30~60公里。

战役准备时期,各方面军后勤机关在修筑军用汽车路方面做了大量工作,3个方面军地带内有4 274公里的军用汽车路,其中大部分预定给后贝加尔方面军部队运送弹药和给养。因后贝加尔方面军部分部队是在赤塔地域下车,随后再以自己的运输工具向边境行进1 000公里,为此,从赤塔经达拉松到乔巴山的公路增修了长620余公里的军用汽车路。后贝加尔方面军军用汽车路全长2 280公里,其中第53集团军的汽车路约300公里,第36集团军则在330公里以上。

战役开始前,各方面军部队得到了物资器材的充分保障,拥有33~100个日份量的粮秣(各类品种),5~10个基数的弹药(空军为50~70个),15~20个基数的燃料。

各方面军后方地域和舰队基地内拥有大量物资储备,因而减轻了对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的依赖。一旦西伯利亚铁路干线的正常运输被破坏,向部队输送各种供应品的问题就可直接在方面军后勤范围内加以解决。

为了存放储备品,在各方面军建立了200多座仓库,其中有35座军械库、20余座给养库、约50座燃料库等。

各方面军所属各集团军直接掌握10个日份量的粮食,其中有3个日份量的干粮。

考虑到战役过程中前送路线可能延长,加上东北境内道路网不良,各方面军每个汽车团里编组了一个有高度越野能力的汽车营。战役进程表明,这一措施是完全正确的。

在战役准备阶段，医疗卫生部队和机关的医务人员及医疗卫生器材已充分配齐。每个集团军根据其任务情况，有6所野战医院、1个卫生汽车连。远东第1方面军各集团军都有铁路卫生列车和卫生轻快车组。在一些集团军里还设有卫生马车连。

医务人员在战斗训练过程中和专业训练过程中研究了卫国战争历次重大战役中医疗保障的经验。大部分集团军进行了实际开设野战医院和在复杂地形条件下解决进攻战役中医疗保障问题的专业集训。战役开始前野战医院都向边境移动并局部展开，各医疗卫生营和集团军野战医院都做好了接收伤员的准备。

第十节　对日军侦察的组织

在战役准备阶段，苏军必须完全遵守所有边界准则，避免边境事件。这意味着部队不能利用战斗侦察、航空照相和空中目视侦察等有效侦察手段，完全不能使用炮兵侦察仪器来查明日军的炮兵部署。这样一来，各方面侦察机关只能依靠地面目视观察和研究上级司令部下发的日军情报资料。因此，目视侦察特别重要。

仅在远东第1方面军第5集团军地带内，就开设了576个观察所，对日方观察纵深可达6公里。在远东第2方面军第15集团军地带内，每个步兵团设有近20个观察所，昼夜进行观察。



苏军边境观察哨



苏军边境观察哨

远东苏军总部到达哈巴罗夫斯克后，组织了广泛的无线电截收网。各方面军司令部也组织了无线电侦察，获得了日军部署的重要情报。

为详细研究日军在国境线附近的防御工事，在不进入中国和朝鲜领空的情况下，使用飞机对边境地带进行航空照相，并派中国抗日联军第88教导旅侦察人员潜入中国境内的日军要塞内进行侦察，彻底查明了日军防御纵深内的工事。战役开始前，连长以上的军官都领到了标有日军防御工事的地图。

在各方面军部队里，训练了专门的侦察组，进攻刚一开始，他们就立即行动。

在当时的情况下，组织大量的侧方观察所是一种新的侦察方法，采用这一方法能在某些方向上观察到日军山岗的反斜面。此外，还建立了配有专门照相器材的侦察小组，以详细查明日军永备工事。苏联边防军对部队研究日军情况也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第十一节　保障进攻突然性的措施

当准备远东进攻战役时，最高统帅部发出指示，要求极其严密地隐蔽战役准备。各方面军、集团

军和太平洋舰队战役计划的制订,只由限定的人员参加。

部队集中、变更部署和在进攻出发地域展开,都严格遵守隐蔽和伪装的要求。与部队调动有关的一切措施,都以"演习"的名义进行。

第5集团军就是按一些部队7月下旬的演习计划向边境开进的。7月中旬前原在图哩洛格至托波列瓦亚山一线担任防御的红旗第1集团军,为第5集团军腾出进攻出发地带并变更了自己部队的部署,这些工作也都是按演习训令进行的。同时,其部队直到7月末,还留在已经腾出的地带内。

边防军一如既往地在各地段执行勤务。筑垒地域守备部队专门的割草队(15~20人)继续工作,在日军能观察到的一些地段上割晒干草,呈现一幅每逢这个季节边防军人的生活常景。驻在萨哈林岛的步兵第56军所属各部队的军官,在战前的最后一刻仍然到当地疗养院和休养所去度假。

边境地带的居民没有迁走,他们的宁静生活一如往常,这也迷惑了日军。部队向国境线调动的同时进行着演习,居民把这看做是平常的军事行动。部队调动时,严格遵守灯火管制,汽车行驶禁止开全灯,在离国界线6~8公里处则闭灯行进。部队都在森林和谷地里宿营,对兵器进行了周密的伪装。在达乌里亚和蒙古草原地区,坦克、汽车、火炮都隐蔽在专门构筑的平底坑里,覆以遮障或帆布篷。

在战役准备阶段,本地区原在部队电台才获准开机工作,新到部队的无线电通信网路仅允许接收电讯,大部分兵团的电台根本就没有开机。各方面军和集团军的指挥员力求完全达到行动的突然性。

战役开始前1~2天,经过仔细现地勘察之后,部队进入国境线上的进攻出发地位。每个分队、部队、兵团都有指定的区域。在该地域内,不准车辆行驶,禁止做饭和砍伐树木。

各集团军和方面军司令部派出专门军官组检查部队遵守伪装的情况;各方面军都设有由军官率领的交通检查哨。在日军能观察到的道路上设置了垂直栅栏遮障和道路上空遮障。在第5集团军地带内,仅在主要突击方向上就设置了18公里长的垂直栅栏遮障和1 515个道路上空遮障。

各级司令部都特别注意为数众多的现地勘察小组的活动,以侦察日军情况。向部队下达任务和组织协同为目的的指挥员现地勘察,都在堑壕、交通壕和专门构筑的观察所里隐蔽地进行。军官在勘察期间改着士兵服装。

为最大限度地达成突然性,计划以先遣营在宽大正面上实施战斗,隐蔽地越过国境线,夺取日军边境防御地带。

综上所述,为保障进攻的突然性而采取的措施是部队及其指挥部的一项复杂而大量的工作,这项工作最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正如以后的作战进程所表明的那样,苏军达到了战役的突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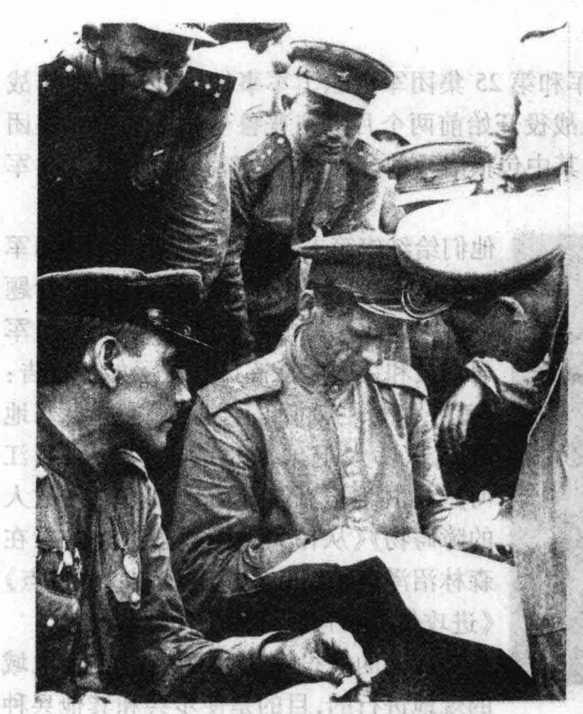
第十二节　部队的战斗训练

战役准备阶段,各方面军所属各部队都展开了紧张的战斗训练。组织实施战斗训练的特点之一,就是远东原有部队基本上受的是防御战斗训练,没有进攻作战的经验。而从西部战场调来的部队,虽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但对远东战场的地形条件和对面日军情况却很陌生。

为了解这两部分军队的训练程度和素质,1945年4月15日至5月9日,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部对部队的战斗准备状况进行了一次深入全面的检查,并根据检查结果,确定了纠正薄弱环节的措施。

准备阶段战斗训练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使远东部队学会进攻作战,而新调来的部队则学会在当地复杂地形条件下作战。为尽快利用战斗经验,最高统帅部给远东总部派来了大量经过实战锻炼的将军和军官,任命他们担任集团军司令员或兵团、部队的指挥员,从而加强现有指挥人员的素质。

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1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特别重视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的战斗训练。训练军队和各级司令部时所注重的是:组织和实施对要塞地域的突破,善于在山丘沙漠地、山丘森林地或沼泽地快速行动;学会在荒野开辟急造军路,长途行军,强渡江河,翻越山岭,穿过森林。



苏军指挥官在熟悉进攻地域的情况


苏军飞行员研究空战

远东第1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在关于战斗训练的训令中指出："通过进攻战斗训练，使部队能够实施突破日军坚固要塞地带的进攻战斗，学会在荒野绕过日军防御地带，前出至日军后方交通线，合围并歼灭日军的机动作战。"

训令中所颁布的1945年夏季的演习计划规定部队演练下列题目：加强步兵营（团）在无路的山林地行军和实施遭遇战斗；加强步兵团在日军防御纵深森林沼泽地域进攻以及对转入防御日军进攻；加强步兵营（团）强渡江河以及渡河后进攻并突破日军防御阵地；坦克旅在森林沼泽地突破日军防御阵地及扩大战果。

强渡阿穆尔河、乌苏里江、额尔古纳河、松阿察河以及参加海上登陆作战的部队进行搭乘登陆器材、上岸以及随后夺取和巩固登陆场的演习，研究了登陆兵同舰炮和航空兵之间的协同问题。

将军、军官以及司令部的战役战术训练的主要方法是：实施首长——司令部携带通信工具的演习，进行图上军事导演和山丘沙漠地及山林地等复杂地形条件下的演习。

各集团军司令员亲自组织军长参谋人员的作业。远东第1方面军的各集团军司令部在战役准备阶段就进行了46次首长——司令部导演和演习。军、师指挥员则亲自组织领导其所属指挥员和司令部的作业。

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部拟定司令部演习题目时，极其重视部队在沙漠草原地形上的战斗和山地进攻的组织与实施。所属部队都在现地以演习的形式研究并演练了下列题目：夺取山垭口；实施前出至日军翼侧和后方的迂回机动；加强步兵营对山顶的冲击；夺取山地隘路；顺山脊或越过山脊进攻的组织与实施。

远东第1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于1945年5月初设立了训练中心，以集训的方法对军官进行复训。集训共搞了5次，训练了1 286名军官和将军。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2方面军也分别建立了这样的训练中心。

在集训期间的实弹射击中，每公里突破正面的火炮、迫击炮密度达150门。还安排了工程技术装备（舟桥、水陆两用汽车、筑路机械等）的操作以及急造军路的铺设等示范表演。每次集训都是按照切合参训对象及训练目的的大纲实施的。

通过演练、集训和交流经验，全体军官们学会了在山丘沙漠地、山丘原始森林地、森林沼泽地等实际野战条件下组织实施战斗。通过训练，掌握了在部队、分队内部以及同加强单位之间的组织协同动作的熟练技巧；掌握了战斗过程中恢复协同动作的方法；练习了对所属部队、分队的组织指挥。军官们研究了强渡江河时渡河司令员和指挥员的职责，精通了地图、指南针的使用，研究了苏军技术兵器

和日军装备的战术技术性能。

远东第1方面军的红旗第1集团军、第35集团军和第25集团军组织了军事知识和同德国作战的战斗经验介绍。根据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从战役开始前两个月自东普鲁士调来的第5集团军抽调军官,组成各有12名成员的3个军官工作组,其中包括诸兵种合成军官、坦克兵、炮兵、工兵军官。



苏军将领在视察部队射击演练

他们给红旗第1集团军、第25、35集团军的全体官兵作了讲演和报告,进行了专题座谈。这3个军官组的军官以及集团军司令员和兵团的指挥员共做了如下报告:《就夺取哥尼斯堡的经验谈强击要塞地域》《从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看强渡江河》《山林地坦克的行动》《如何通过敌人的障碍物》《从伟大卫国战争的经验看在森林沼泽地组织和实施进攻的一些特点》《进攻作战中司令部的工作经验》等。

部队的战役训练是在类似实战地域的现地进行的,目的是使步兵和其他兵种学会在难以通行的山丘原始森林地实施进攻战斗以及铺设急造军路和强渡江河。训练力求真实,部分演习实施实弹射击,并且是在长时间离开经常性驻地,尽可能在近乎实战的情况下实施。

通过训练,部队学会了构筑进攻出发阵地,迅速巩固已占领的地区,独自排雷,在铁制网中开辟通路,铺设急造军路,修复被破坏的道路,构筑迂回路等。

1945年6~7月,所有步兵部队和兵团都搞了支队编练演习,其中大部分演习是在极难通行的地域完成的。

射击训练基本上在支队编练演习中实施。实弹射击演习时,火炮和迫击炮的密度达到每公里突破正面120~170门。

炮兵和坦克兵部队除参加诸兵种合成演习外,还进行了与整个部队战术训练有关的单独演习。

海军步兵进行了上船和下船的演练。

对后勤部队和机关的专业训练以及抗击日军对后勤机关袭击的训练也极其重视。

综上所述,太平洋舰队和各方面军在准备阶段都对部队进行了大量临战训练工作。训练中,仔细地研究并运用了卫国战争的经验,特别是在山林地条件下作战的经验。通过紧张的学习,各方面军全体官兵受到了在极其艰难而特殊的地形条件下实施进攻作战的良好训练。

第十三节　各方面军部队的党政工作

在进攻战役的政治保障方面,各级指挥员、政治机关、党团组织的党政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的基本任务如下:

以苏维埃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士兵、军士和军官,培养他们对社会主义祖国、对共产党的无限忠诚和热爱,鼓舞官兵不断提高战斗素养和军事技能,在各方面军所属部队中巩固和提高士气,严明军纪,加强内务秩序和组织纪律性。



在苏军部队中广泛开展政治学习



在苏军部队中广泛开展政治学习

为完成上述任务，必须做到对指挥员、政工人员、党团积极分子、士兵、军士和军官中的党、团员进行政治工作训练；广泛开展宣传卫国战争经验的党政工作；加强各级党团组织，使其成为各级指挥员完成战斗任务和教育军人的主要依靠；培训现职政工人员和连队党、团小组长，储备必要的党政工作骨干；在方面军和海军部队全体人员中开展党政工作，提高革命警惕性；提高党内工作的水平；在后勤部队和机关中开展政治工作，动员后勤人员做好对部队的不间断的物质技术保障；组织检查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的工作并对其完成任务给予必要的帮助。

1945 年 5 ~7 月，方面军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方面军和集团军政治部举办了部队和兵团指挥员、政治机关的首长、政治机关共青团工作负责人、报告员、鼓动员、师和集团军报纸编辑、部队的政治副职等参加的短期训练班和集训。

参加短期训练班和集训的人员听取并讨论了由方面军司令员、方面军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兵团指挥员、政治机关首长、集团军及方面军政治部报告员的下列报告：《共产党是苏联人民战胜德国法西斯的组织者和鼓舞者》《苏联的国际地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满洲是日本进攻苏联的桥头堡》《日军的精神面貌》等。

仅在 5 ~7 月期间，第 35 集团军政治部报告员和鼓动员就作了 113 次报告，红旗第 1 集团军政治工作人员作了 100 多次报告。第 25 集团军政治部的报告员也做了大量宣传鼓动工作，在所属部队中仅对军官就作了 67 次报告。

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 2 方面军所属部队中也做了类似工作。仅第 53 集团军全体官兵就听取了近 450 次报告。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所属摩托化步兵第 57 师官兵听取了 30 多次报告。这些报告阐明了苏联政府的对日政策，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各方面军和集团军政治部十分重视使军官掌握党政工作的方式方法，善于发动全体人员去完成各项战斗任务。政治机关十分关心使年轻军官学会在工作中发挥党团组织的作用，使他们掌握在战斗过程中从政治上影响部属的方式方法。为此，1945 年 7 月，3 个方面军向各部队的军官作了下列报告：《党组织是指挥员的依靠和助手》《进攻战役前对全体官兵的精神政治训练》《战地宣传工作的方式和方法》等。指挥员参加宣传鼓动工作并领导对军士和士兵的政治教育，对于提高军官们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改进政治教育质量具有很大意义。

在军官中,特别是连、排长中间进行党政工作的基本形式是办短期训练班,时间一般为2~3天,由师团举办。训练班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党政工作的实际问题,有时也学习军事和研究苏日双方的技术兵器。

7月20~27日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所属各兵团都举办了3天的短训班,由兵团指挥员和政治部门首长作了下列报告:《太平洋战争和我们的任务》《共产党是胜利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连队党组织是指挥员在战斗中的依靠》《进攻战斗中连队党团组织的工作》《提高官兵斗志的党政工作》。

通过对军官的政治教育,提高了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军事素养,丰富了对部属进行实际政治工作的经验,增强了履行对苏联的义务的责任感。

在作战准备时节,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对军士的教育。巩固军士威信的问题受到了特殊重视,因为他们是指挥员训练和教育士兵的得力助手。鉴于年轻军士缺乏实战经验,指挥员、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特别注重向他们传授战斗经验。为此,曾多次召开军士会议和举办军士集训,由对德作战和哈桑河、哈勒欣河对日作战的战斗英雄中的老军士们作经验介绍。军官穆拉维耶夫出席了步兵第97师的一次军士会议,作了题为《在哈桑湖畔我们怎样痛击日本鬼子》的报告,介绍了日军的战术和战斗方法。

报刊对宣扬优秀军士的经验给予了很大帮助。由于部队内下发的条令数量有限,印发了大量的军士须知,介绍军士教育和训练士兵的基本职责。步兵第264师的《为社会主义祖国而战报》7月22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军士们要像这样训练战士》,介绍了该师善于训练和教育部属的优秀军士。

6~7月间各方面军部队举行年轻军士集会,一些一、二、三级光荣勋章和苏联英雄称号的获得者,久经考验的老军士出席了这些集会。苏联英雄乌多多夫中士向步兵第374师年轻的班长们作了关于单兵临战训练及进攻战斗中班的行动报告,他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介绍了训练和教育本班战士的经验。

进攻战斗的准备工作一开始,方面军和舰队政治机关就着手按编制充实党政机关人员。考虑到远东各兵团大部分政工人员缺乏战斗经验,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仅给远东第1方面军政治部就派来了511名具有战斗经验的政工人员。



战前训练之余的娱乐

没有战场工作经验的部分政工人员被派往方面军政治部举办的为期1个月的训练班受训，他们的位置由西部战场调来的政工人员接替。

总政治部从储备人员名额中给后贝加尔方面军派去770多名政工人员，他们都被方面军政治部分配到战斗部队中。

各方面军所属部队的政治机关十分重视在各连队中建立党组织。仅在1945年6～7月期间，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1、2方面军就吸收了2万多人入党，13 286人入团。截至1945年8月1日，远东部队中共有党团员885 478人，占3个方面军总人数的一半以上。

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建立了72个党组织，第39集团军建立了29个基层党组织、23个连队党组织及39个党小组，第53集团军建立了17个基层党组织和113个连队党组织。

党员队伍的扩大，使远东第1、2方面军所属部队的所有连队中都建立了有10名以上党员的党组织。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大多数连队里都有党组织，而所有连队都有团员达40人以上的团组织。

红旗第1集团军步兵第39师有58个基层党组织，116个连队或相当于连队的党组织。在27个步兵连中有24个党组织，各有30～45名党员。

党团队伍的发展，扩大了部队中党团员的比例。战役开始前，第35集团军党员人数占28%，团员人数占28.4%。党团员比例占集团军总人数的56.4%。第25集团军党团员比例更大。截至1945年8月1日，集团军共有25 402名党员和25 892名团员，占集团军总人数的78%，机械化第10军甚至达到85%。

方面军党团队伍的增长，使部队具有高度战斗能力和突击力量，表明他们随时准备去完成上级指挥部的战斗任务。

分队的党团员基本都是坦克驾驶员，炮班和机枪班的班长和射手。他们掌握着比较复杂和威力较大的武器。党员队伍的这种分布有利于加强对全体人员的党政工作。

加强连队党组织并正确配备党团员，为战时在连队这样的战术分队中广泛开展党政工作打下了牢固基础，同时，也保证了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在组织战斗的政治保障工作时，可以有效地依靠他们。

第二章　日军的编成与战略部署

第一节　日军的编成

1942年6月，中途岛战役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败势开始显现但又无法扭转，海军、海军陆战队、陆军等伤亡达143万人。此时日本国内兵源几乎枯竭，而太平洋战场又急需补充兵力，为支撑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日本军部决定从中国内地战场和中国东北地区抽调日军南下。

1944年2月开始，日本军部开始大规模调动关东军南进，至1945年3月，共调走关东军19个师团、1个战车师团、1个混成旅团、94个联队、500架飞机及一些特种部队。其中调往日本本土、朝鲜和中国台湾岛8个师团、1个战车师团，调往中国关内1个师团，其余全部调往太平洋战场及东南亚各地。关东军调走21个师(旅)团后，尚有34%的老兵即11个师(旅)团留在东北，分别是第122、123、124、125、126、127、128师团，独立混成第77、78、79、80旅团。日本军部为弥补东北地区关东军兵力的不足，从1944年6月开始快速组建新的师团。

1944年6～11月，关东军新组建6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分别是1944年6月13日组建第107师团，8月5日组建第108、111、112师团，10月11日由第8国境守备队和留守在海拉尔的第23师团1个大队基础上组建第119师团，在留守孙吴第1师团1个大队基础上组建独立混成第73旅

团，由留守在勃利战车第2旅团1个大队基础上组建独立战车第1旅团，11月24日组建第120师团。

1944年12月1日，关东军总司令部对东北地区“在乡军人”发出征召令：“凡45岁以下的男性一律征召入伍。”命令到达后，在24小时内离职入营。1945年1月1日，关东军总司令部发布命令：“凡有兵役关系者，新年在家待命，废止四方拜（贺年活动）。”2月1日，“在乡军人”和“有兵役关系者”应召入伍。5月开始，在关东军总部命令下，日本各企业、各机关、各事业单位中的应召者，纷纷举行“壮行会”，他们与送行者都明白此去难以复返。1945年7月10日，东北地区“在乡军人”和“有兵役关系者”40万人进入关东军兵营，其中25万人编入战斗序列，15万人编入后勤、兵站、运输等部门。

1945年3月末，日本军部将新组建的关东军第111师团和第120师团调往朝鲜。同年5月，从中国关内战场调4个师团进入东北地区，分别是第39、59、63、117师团。从朝鲜半岛调第79师团进入东北地区，组建第30军司令部。

1945年7月30日，新入伍者与老兵合编成关东军8个师团、8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独立战车旅团，分别是第134、135、136、137、138、139、148、149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30、131、132、133、134、135、136、137旅团、独立战车第9旅团及5个炮兵联队①。至此，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陈兵24个师团（其中2个师团在朝鲜）、11个混成旅团，还有总司令部直属部队及宪兵部队等，号称“精锐”70万人。关东军兵力约占日本陆军总兵力的14%左右。关东军新组建的师（旅）团，约占关东军总兵力的59%左右。关东军新召入伍人数约占关东军总兵力的53%。由于没有足够的武器配给新入伍者，关东军总部规定：“7月9日以后入伍的40岁左右没有经过训练的补充士兵，要他们自己携带武器，猎枪最好，刀和矛也好，只要能斩杀的都行”。②

关东军新组建的部队缺少装备和武器，仅常规轻武器步枪一项就缺少10万支左右，平均每5个列兵有一支步枪，有些列兵只能用战刀、刺刀、猎枪暂时装备起来。楪本舍三在《关东军秘史》一书中写道：“编入师团的25万在乡军人……步枪等武器并没有发放到全体人员。”在重武器装备方面，有火炮3 700门，坦克600辆，作战飞机仅有230架。库存储备弹药仅能供应13.5个师团使用，汽车用燃油仅够1.5万辆汽车15天的量，航空燃料仅有1.6万吨，机油仅有2 736吨。日本大本营要求关东军打“持久战”、“游击战”，显然是自欺欺人。关东军第5军参谋长河野重贞被俘后说：“日军兵器是落后的，炮兵还是30年代的水平。”原日军森松俊夫大尉在其所著《中国大陆战场的溃败》一书中写道：“就军备来说，曾被称为精锐的关东军，连当年的影子都不存在了！”前关东军总司令部作战课课长草地贞吾大佐说：“其战斗力不过5个师团模样。”实力越来越弱，但是，“在表面上还要炫示强大的军备，尽量防止苏联参加对日作战。”③《关东军覆灭记》一书记道：“这些新组建起来的部队，不管编制或装备、素质都极差，可以说是在悲观情绪下拼凑起来的自救部队。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吧！因此，如果用以前的关东军精锐师团进行换算，这70万人的战斗力，只能相当于原关东军8.5个师团。以前令人‘谈虎色变’的关东军，现在倒成了用竹枪武装起来的不堪一击的纸老虎！”④《日本战史》一书中写道：1945年的关东军，“简直成了一只拔掉了牙的老虎！”

综上所述，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已明显呈现出衰危状态，其兵力总数（包括预备队及协同作战兵力）虽然与1944年2月之前的关东军总数大致相同，但其战斗力和武器装备已完全不能与抽调走的关东军相比较。

苏联远东军出兵东北前夕，日本关东军除关东军总部直属机关和特种部队、旅大地区海军基地和驻军外，投入东北战场的有2个方面军、1个独立军、22个师团和11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守备队。

---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　关东军2》，朝云出版社。

② ［日］楪本舍三著：《关东军秘史》，第27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1月。

③ ［日］楪本舍三著：《关东军秘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1月。

④ ［日］乌田俊彦著、李汝松译：《关东军覆灭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

总兵力约70万人。战斗序列如下：

一、关东军总司令部

关东军总司令部驻新京，战时准备南撤至通化，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其作战总任务是粉碎苏军的进攻，确保新京至大连一线以东、新京至图们一线以南的地区，利用东北广阔的地域，同苏军进行持久战。

二、第1方面军

第1方面军也称东满方面军，是关东军的主力部队，司令部驻敦化，司令官喜多诚一大将，参谋长樱井镣三少将。辖2个军、10个师团、1个独立混成旅团及第15国境守备队，总兵力约15万人。

第1方面军各师团集中于东北地区东部正面，跨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黑龙江省牡丹江地区。第1方面军在这个地域内设三道防御区，第一道防御区在珲春、绥芬河、东宁、虎头等中苏边境要塞地域；第二道防御区在穆棱河至牡丹江之间的地域；第三道防御区在牡丹江沿岸地域。在第二、第三道防御区筑有大量野战工事，在牡丹江、宁安、延吉、珲春各主要方向均设有永备火力点。其主要兵力配置如下：

（一）第3军

第3军军部驻延吉，司令官村上启作中将。下辖第79师团驻守图们，师团长大田贞昌中将；第112师团驻守珲春，师团长中村次喜藏中将；第127师团驻守龙井东八道河子、开山屯，师团长古贺龙太郎中将；第128师团驻守汪清罗子沟，师团长水源义重中将；独立混成第132旅团驻守东宁，旅团长鬼武五一少将。

（二）第5军

第5军军部驻牡丹江掖河，司令官清水规矩中将。下辖第124师团驻守穆棱，师团长椎名正健中将；第126师团驻守掖河、八面通，师团长野沟贰彦中将；第135师团驻守密山、桦林，师团长人见与一中将；第15国境守备队驻守虎头，守备队长西胁武大佐。

（三）方面军直属师团

方面军直属第122师团驻守镜泊湖北侧地区，师团长赤鹿理中将；第134师团驻守方正、佳木斯，师团长井关仞中将；第139师团驻守敦化，师团长富永恭次中将。方面军直属炮兵部队则主要配置在东宁、虎头等要塞地域。

三、第3方面军

第3方面军也称西满方面军，司令部驻奉天（沈阳），司令官后宫淳大将。辖2个军、9个师团、5个旅团，总兵力约30万人。

第3方面军集中于东北地区的南部、西部、东南部（所谓“东边道”地区），防御区域以奉天为中心展开，跨今辽宁省、吉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和赤峰地区。在这个地域内，除在科尔沁右翼前旗境内有阿尔山要塞阵地外，其他各处皆无永久性防御阵地。其主要兵力配置如下：

（一）第30军

第30军军部驻新京，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中将。下辖第39师团驻守四平，师团长佐佐真之助中将；第125师团驻守通化，师团长今利龙雄中将；第138师团驻守抚顺，师团长山本务中将；第148师团驻守新京，师团长末光元广中将。

（二）第44军

第44军军部驻郑家屯，司令官本乡义夫中将。下辖第63师团驻守奉天，师团长岸川健一中将；第107师团驻守索伦，师团长安部孝一中将；第117师团驻守大赉，师团长铃木启久中将；独立战车第9旅团驻守安东（丹东），旅团长北武树大佐。

（三）方面军直属师（旅）团

方面军直属第108师团驻守锦县、赤峰，师团长盘井虎二郎中将；第136师团驻守奉天，师团长中

山淳中将；独立混成第 79 旅团驻守安东，旅团长冈部通少将；独立混成第 130 旅团驻守奉天，旅团长桑田贞二少将；独立混成第 134 旅团驻守临江，旅团长后藤俊藏少将；独立战车第 1 旅团驻守奉天，旅团长阿野安里少将。

四、独立步兵第 4 军

独立步兵第 4 军也称北满军，属关东军总司令部直属军。司令部驻齐齐哈尔，司令官上村干男中将，辖 3 个师团、4 个旅团，总兵力约 16 万人。

独立步兵第 4 军集中于今黑龙江省北部，第一道防御区在大、小兴安岭外侧，主力部队配置在北正面孙吴、瑷珲、黑河、法别拉等边境要塞地域，依靠边境要塞、永久性阵地及自然地势进行持久防御；第二道防御区在嫩江沿岸，最后固守齐齐哈尔和哈尔滨据点。

独立步兵第 4 军下辖第 119 师团驻守海拉尔，师团长盐泽清宣中将；第 123 师团驻守孙吴，师团长北泽贞治郎中将；第 149 师团驻守齐齐哈尔，师团长佐佐木到一中将；独立混成第 80 旅团驻守海拉尔，旅团长野村登龟江少将；独立混成第 131 旅团驻守哈尔滨，旅团长宇部四雄少将；独立混成第 135 旅团驻守瑷珲，旅团长浜田十之助少将；独立混成第 136 旅团驻守嫩江，旅团长土谷直二郎少将。

五、第 17 方面军

第 17 方面军驻朝鲜汉城，司令官上月良夫中将，该方面军战时归关东军总司令部直属。辖 2 个军、9 个师团、3 个独立混成旅团，总兵力 305 700 人。

第 17 方面军在战争爆发前，主力部队仍驻在朝鲜。其中第 34 军已编入关东军战斗序列，但司令部仍驻朝鲜咸兴，司令官栉渊瑄一中将，辖第 59 师团、第 137 师团和独立混成第 133 旅团。其中独立混成第 133 旅团已进驻新京，旅团长原田繁吉。第 17 方面军主要任务除阻止苏军对朝鲜半岛的进攻外，随时准备调往东北配合关东军作战。

第二节　预备队及协同作战兵力配置

与关东军陆军配合作战的还有第 2 航空军，司令部驻新京，司令官原田宇一郎中将；大陆铁道队，司令部驻新京，司令官草场辰巳中将；伪满军松花江舰队，司令部驻哈尔滨，下辖 3 个步兵团，有内江作战舰艇 25 艘和登陆小汽艇；伪满蒙军 13 个师 14 个步兵（骑兵）旅；在华北与东北交界处作为日本大本营预备队的有 2 个军、6 个师部署在北京、张家口一线；在东北面对抗牵制苏军的有驻南库页岛（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第 5 方面军，辖 6 个步兵师团、1 个航空兵师团和 2 个步兵旅团。

这样，在东北与苏军相对峙的日军计 4 个方面军、1 个独立军、1 个航空军，总兵力达到 120 万人，但从实力上已不能与关东军鼎盛时期相比。日军虽人数众多，但新兵比重大，士气低落，军队素质不高。现代武器装备的技术性能和威力都已无法和苏军相抗衡。以日苏开战时使用的坦克来对比，可以看出双方的差距。关东军使用的坦克以九七式坦克为主，没有重型坦克，都属中型和轻型坦克，重量只有 15 吨，装配 47 毫米机关炮 1 门，甲板厚度 20～50 毫米；苏军使用的坦克多半是重型坦克，T34 型坦克重达 32 吨，装配 85 毫米机关炮 1 门，装甲厚度 35～70 毫米。KB 型坦克重达 46 吨，装配 85 毫米机关炮 1 门，装甲厚度 70～105 毫米。NC2 型坦克上甚至还装配了 122 毫米的重炮。

日军的组织编制也不够完善。步兵师团显得臃肿，难于指挥，没有足够的现代化技术兵器和运输工具。从 1945 年春季起，关东军的步兵师团由每师团 2 万人的旧编制改为每师团 13 000～17 000 人的战时新编制。编余人员再编成新的部队。之所以改为新编师团，是因为在研究作战经验的基础上使其更有机动性。

通常，关东军步兵师团的标准编成是 3 个步兵联队、1 个炮兵联队，并下辖工程（或工兵）、辎重、通信、装备、卫生和病马厂。但是，战争开始时师团的改编尚未全部完成，每个师团实际平均人数是

10 000～13 000人。有些师团不是直接下辖步兵联队，而是步兵旅团，有的师团还配置侦察联队或骑兵联队。此外，还有兵力为5 000～8 000人的独立步兵旅团。这种旅团类似小型师团，有独立的后勤机构，便于在山丘森林地带活动。

关东军中尚有一批资深少壮派官兵，深受仇苏教育，盲目服从，富于宗教狂热。他们沿用日俄战争时期的“肉弹”战术，在战斗中组成“特攻队”，用肉体当作枪弹、炮弹攻击苏军战车，他们被宣传所蒙蔽，相信为帝国战死沙场是最高的奖赏，愿为天皇“玉碎”。各要塞地域的守备队都编有这样的部队，而机动第1旅团和其他一些部队则完全由“特攻队”编成。这些死硬的战争亡命狂徒，并不代表军队的战斗力，恰恰相反，那是失败后的绝望挣扎，但这些“特攻队”确实也给苏军造成了重大伤亡。

日军所受的是攻击训练。日军条令规定：进攻是战斗行动的基本类型。但在防御中，部队也表现得非常顽强坚定。夜间战斗训练及分队（小队至中队）在山丘森林地独立作战和设伏的训练极受重视。但是，日军实际上没有现代战争的经验。同国民党军队和太平洋上的战斗胜利冲昏了日军头脑，他们自信已经掌握了现代化战争的经验。以后的战斗行动暴露了日军其他一些弱点，如指挥不够稳定，士兵缺乏主动性，害怕暴露翼侧，畏惧苏军使用坦克、火箭炮、冲锋枪等现代化战斗技术装备。

1945年，伪满军队也相应配置了一些新装备，关东军还派出有经验的日军军官充当教官或指挥官到伪军军营中对伪军进行训练。但大部分伪满士兵敌视日军，不愿为其卖命打仗。开战后有一部分伪军调转枪口打击日军，如驻守在新京的伪满第2军管区第2混成旅步兵第13团1营官兵，在8月15日上午10时击毙日本顾问官后反正。当天反正的还有“宫内府”警卫步兵团、警卫骑兵团、警卫炮兵团、第5自动车队（汽车队）、第3高射炮队、“首都宪兵团”等。

第三节　作战计划和战略部署

随着关东军实力的迅速减弱，其原来的对苏“攻势作战”已成泡影，战略任务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1944年9月18日，日本大本营向关东军下达了“对苏全面持久作战”的命令（大陆令第1300号），要求关东军“尽力防止战争之发生”，并作好对苏持久作战的准备，一旦苏军进攻，关东军应利用东北的广阔地域阻止和迟滞苏军的进攻，即使万不得已，至少应确保东北东南部到朝鲜北部之间的地区。这种纯粹被动防御的作战方针，对于一贯骄横的关东军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

1945年1月，关东军司令部根据日本大本营的命令，制定出对苏防御作战计划。主要内容是：自朝鲜半岛北部山脉起，延伸到中国东北地区的完达山脉、小兴安岭、大兴安岭以及齐齐哈尔、四平街市之间铁路沿线向外，形成第一道防线，利用地势和军事设施阻止苏军；在作战不利的情况下实行第二道防线防御作战，在东北广大地域及最后根据地东北东南部和朝鲜北部进行持久战和游击战。在兵力部署上，改变“关特演”以来力量重心一直放在边境一线的局面。

1945年3月起，关东军为实施这一作战计划，各指挥机关和部队开始大调动和重新部署。在东线方面，第1方面军司令部自牡丹江移驻敦化，所辖第3军司令部自牡丹江移驻延吉，第5军司令部自东安移驻掖河。在北线方面，独立步兵第4军司令部自孙吴移驻齐齐哈尔。在西线方面，第3方面军司令部自齐齐哈尔移驻奉天，所辖第30军的第125师团，自黑河移驻通化。第44军（关东军防卫军）司令部自奉天移驻郑家屯，并赋予野战性质，担负东北中南部防卫作战任务。上述指挥机关和师团如此大规模移动，在短时间内是很难完成的。这种混乱的战备调整反映出日军对苏军未来的作战处于盲目的状态。

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消息传到日本，朝野震惊。这时，日本统治者自知“战局已抵最后阶段”。5月30日，日本大本营向关东军发出了准备对苏作战的命令（大陆令第1340号），即《满朝方面对苏作战计划要领》。该命令又进一步修改了1944年9月18日的对苏作战计划，关东军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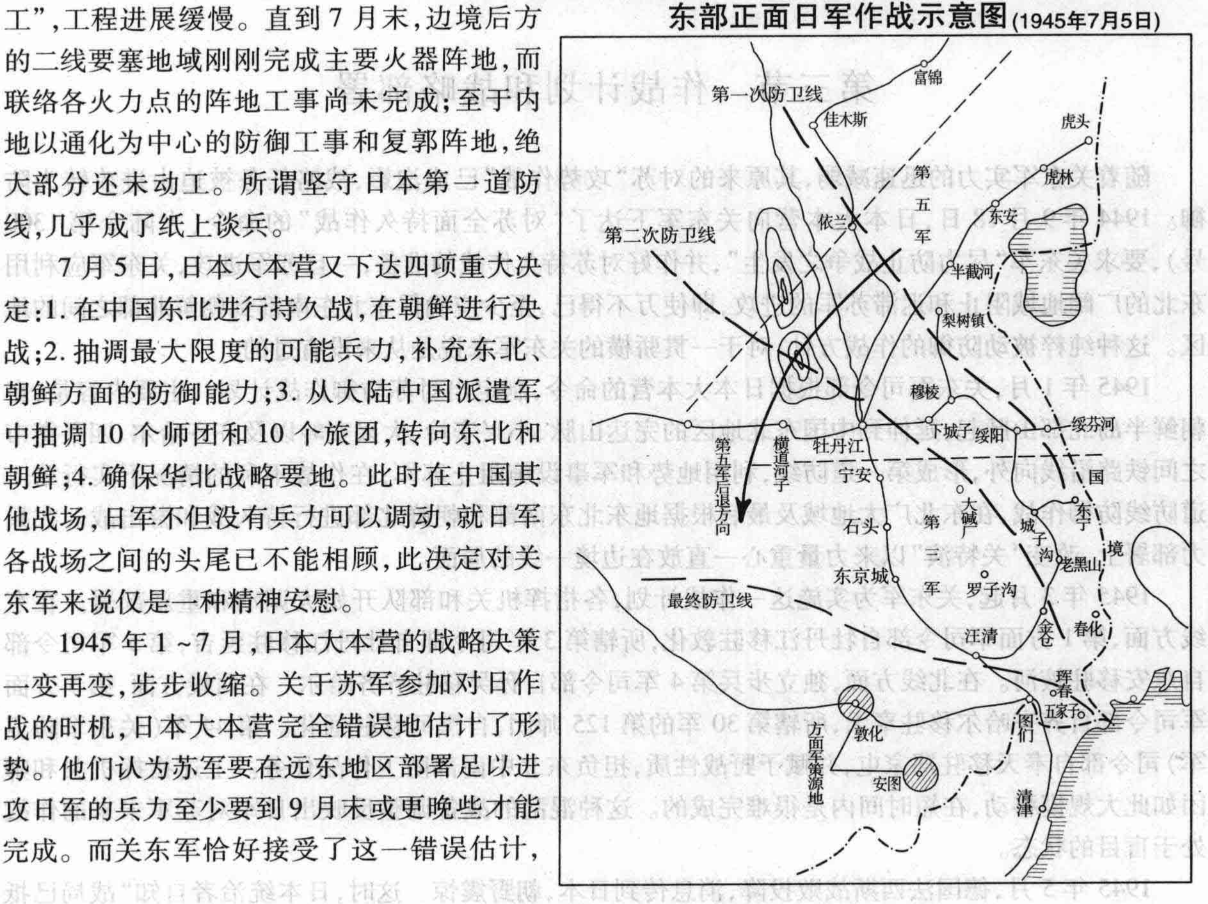
后撤,持久战的区域划定在东北南部地区,即新京至图们以南、新京至大连以东与朝鲜交界、以通化为中心的三角地带。关东军可以放弃东北大部分地区而向南紧缩,其主要任务已不是坚守"满洲",而是保卫朝鲜,建立"本土决战"的第一道防线。

6月4日,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亲自抵达大连满铁总裁官邸,召集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强调《满朝方面对苏作战计划要领》,再次明确关东军对苏作战的战略思想:"满洲"是日本帝国第一道防线,主要是固守以通化为中心的"东边道"地带,坚守在这道防线,以持久战将苏军阻挡在那里,哪怕是放弃全"满洲"四分之三地域也可以。梅津美治郎要求山田乙三在9月下旬完成上述部署,同时要求冈村宁次在派遣军中调出1个军部和4个师团到东北以增强关东军战斗力,尽快撤出湖南、广西兵力,将兵力调到华中、华北战场,与关东军形成"互为犄角"之势。但冈村宁次表示很困难,会议不欢而散。

6月14日,山田乙三在新京召集各方面军司令官、军司令官参加的兵团长会议,传达大本营的战略意图,研究制订作战方案。其内容包括:变动部队配置,在二线增修防御工事,补备交通和通讯网,强化后方机场,调剂和向纵深配置战场资财,战斗动员和制定教令等。山田乙三估计,苏军的进攻必选定在气候适宜的秋季,而日军的上述作战准备最快也只能在冬季到来之前完成。因此,山田乙三要求各师团尽快部署,争取在9月下旬完成上述要求。方面军司令官和军司令官们都表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巨大的军事行动是难以办到的,但谁也不敢说出一个不字,只能点头称是。①

6月下旬开始,关东军动员3万伪满洲国军和大批"国民勤劳奉仕队"及中国劳工,在今吉林省通化一带加紧兴建后方的军事工程。但是,由于没有设计方案,指挥混乱,资材不足,加上老百姓"磨洋工",工程进展缓慢。直到7月末,边境后方的二线要塞地域刚刚完成主要火器阵地,而联络各火力点的阵地工事尚未完成;至于内地以通化为中心的防御工事和复郭阵地,绝大部分还未动工。所谓坚守日本第一道防线,几乎成了纸上谈兵。

东部正面日军作战示意图(1945年7月5日)



7月5日,日本大本营又下达四项重大决定:1. 在中国东北进行持久战,在朝鲜进行决战;2. 抽调最大限度的可能兵力,补充东北、朝鲜方面的防御能力;3. 从大陆中国派遣军中抽调10个师团和10个旅团,转向东北和朝鲜;4. 确保华北战略要地。此时在中国其他战场,日军不但没有兵力可以调动,就日军各战场之间的头尾已不能相顾,此决定对关东军来说仅是一种精神安慰。

1945年1~7月,日本大本营的战略决策一变再变,步步收缩。关于苏军参加对日作战的时机,日本大本营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认为苏军要在远东地区部署足以进攻日军的兵力至少要到9月末或更晚些才能完成。而关东军恰好接受了这一错误估计,

① [日]森松俊夫:《中国大陆战场的溃败》,载孙邦编:《伪满灭亡》,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遂决定于9月下旬完成新的作战部署。实际上,关东军各项战备工作的实施,即使是昼夜兼程地进行也需数月时间完成。但关东军就是在这样错误的判断指导下,进行着手忙脚乱却又无可奈何的战备。而对即将到来的苏军进攻,关东军只能是仓促应战,等待它的结果也只能是溃败和灭亡。

第三章　苏军出兵中国东北

第一节　苏联对日宣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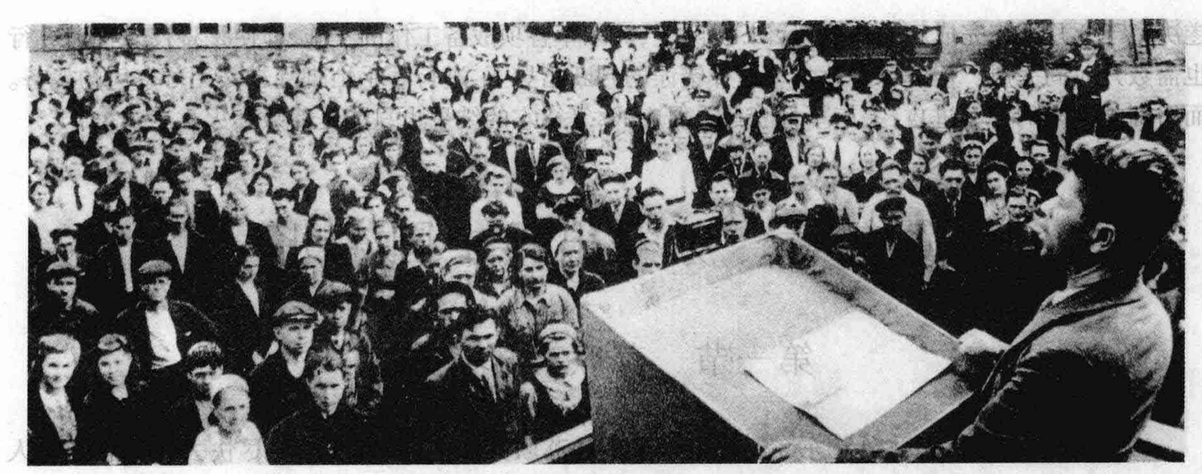
1945年8月2日,日本外相东乡茂德电告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沿武,命他尽快去找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请苏联政府出面调停,并指示佐藤:"可以在波茨坦公告的基础上同他们谈判。"日本国内主和派已迫切希望尽快结束战争。此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还远在德国的波茨坦。佐藤大使想尽办法,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回到莫斯科后仍让他耐心等待。8月6日上午9时15分,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了原子弹,仅当天广岛就死亡10多万人,全市化为一片焦土。此时,形势对日本来说已经越来越紧张了。8月7日,外相东乡茂德在焦急之中又给佐藤大使发来电报,称:"局势急转直下,必须尽快澄清苏联的态度。请再作努力,并急复告。"

斯大林因没有在波茨坦公告上签字,苏联同日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处于战争状态,所以日本认为,苏联是最合适的调停角色,即使斯大林不愿意出面调停,只要苏联能保持中立,日本也就心满意足了。可此时斯大林考虑的是如何向日本宣战的问题。莫斯科时间8月7日下午4时30分,斯大林签署命令,命令苏联红军于9日零时开始进攻,比原定于8月11日发动的进攻提前了2天。与此同时,莫洛托夫电告苏联驻日本大使马立克:"8月8日白天,您将收到一封我们递交给日本政府的紧急电报。确实保证立即将密码译出来并及时交与收件人。"并通知佐藤大使,将于8月8日晚8时会见他。稍后,莫洛托夫又将会见时间改为下午5时。

8月8日下午5时,佐藤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准时到达莫洛托夫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莫洛托夫和他本人,佐藤镇定了一下,准备会谈苏联中立与调停问题。不料,莫洛托夫用手制止了佐藤,对他说:"佐藤大使先生,我这里有一份苏联政府给日本政府的通知,传达给阁下。"莫洛托夫接着宣读了苏联对日本的宣战书。全文如下:

在希特勒德国失败与投降后,日本是依然坚持继续战争的唯一强国。美英中三大强国今年7月26日,关于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已被日本拒绝。因此,日本政府要求苏联调解远东战争的建议已失去一切根据。鉴于日本拒绝投降,盟国建议苏联政府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这样使战争结束的时间更加接近,减少牺牲者的数目,并加速一般和平的最早恢复。苏联政府忠实于其对盟国的义务,接受了盟国的建议,并参加盟国今年7月26日的公告。苏联政府认为苏联政府的这一方针,能使和平更加接近,解决各国人民进一步的牺牲与苦难,并是日本人民避免在其拒绝无条件投降后遭受危险与毁灭的唯一方法。由于上述各点,苏联政府宣布从明天起即8月9日起,苏联认为其本身已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

1945年8月8日,莫斯科



苏联政府官员向国内人民宣布对日开战

至此，日本政府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了。佐藤抑制住难以言表的震惊和恐怖的情绪对莫洛托夫说："假如说要解救日本人于危险和破坏之中，那么不进行战争不是更好吗？"莫洛托夫没有回答他。佐藤接着说："既然如此，我深表遗憾。"莫洛托夫也用同样的话回答了他。随后佐藤追问道："所谓自8月9日进入战争状态的时间，那就意味着8月8日是和平状态、自9日起为战争状态吗？""是这样的。"鉴于两人长期在外交场合打交道，莫洛托夫对佐藤说："对于过去几年你作为大使的行动我一直深为满意。我感到高兴的是，尽管我们遇到种种困难，但我们两国政府到今天为止，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此，苏联对于大使的处境是不会给予侮辱的。"佐藤很有礼貌地回答说："对贵国政府之善意和款待，我谨表感谢。""我们就要作为敌人分手了，这确实是不幸的事情。但是，这也没有办法。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握握手再分别吧，这也许是我们俩人最后一次握手了。"临行前，佐藤问道："我可否将此消息通知本国政府？"莫洛托夫答道："当然可以，你可以拍发明码电报，也可以拍发密码电报。"

佐藤沿武大使回到使馆后立即向国内打电话，但电话打不通，电报也发不出去。此时苏联政府已经将日本视为敌对交战国，在佐藤回使馆之前已经将电话线切断。佐藤只好写了一封明码电报，派人跑到电报局发往国内。可是，佐藤的电报并没有发出去。

8月9日凌晨4时，日本政府通过莫斯科塔斯社的播音，才得知苏联已经向日本开战。当天上午，苏联驻日本大使马立克要求会见东乡外相，但东乡一直推迟到8月10日上午11时15分才会见了马立克。见面后，马立克将一份迟到的宣战书递交给了东乡。

第二节　苏军对关东军的进攻

1945年8月8日晚，在东北地区中苏、中蒙边境线上，158万苏军部队已全部进入进攻出发位置。9日零时，远东苏军总部下令进攻，3个方面军立即冒着倾盆大雨冲过边界，在消灭靠近边境的小股日军监视哨部队后，从西、北、东3个方面向东北境内迅速推进。与此同时，空军轰炸机群在歼击机的掩护下也飞越边界，对边境区的日军要塞工事和哈尔滨、牡丹江、吉林、长春等大城市及铁路交通枢纽实施密集轰炸。

由于关东军总部事先未得到苏联对日宣战的任何消息,因而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此时,关东军司令部乱作一团,而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却还远在大连观看歌舞伎表演,司令部只好派侦察机专程去接。总参谋长秦彦三郎赶到司令部匆忙召集僚属商议对策。直到9日早6时,关东军总部才终于摸清各路苏军进攻情况,并向所属各部队发出了“各方面军及各军要根据关东军作战计划粉碎各入侵之敌”的作战命令。9日下午1时,山田乙三从大连赶回长春,向所属各部队发出“以楠公之精神,坚决进行圣战”的指令。同时下令准备将司令部迁往南部山区,并要求溥仪等将伪满政府迁往通化;紧急指令731等特殊部队销毁罪证撤往朝鲜;向后方遣送关东军家属和日本侨民。日本大本营陆军部也一直到10日晨才向关东军发出“大陆令第1374号”作战命令:“以国境方面现存之兵力粉碎敌人进攻”,“随处击溃来犯之敌,保卫朝鲜”①。关东军总部受命后并未作出明确的指挥调动,而是匆忙向通化地区转移。各关东军所属部队也因此失去了总部的统一指挥。


蘇聯對日宣戰
加速結束戰爭減少各國人民的犧牲和苦難
莫洛托夫

中文报纸报道苏联对日本宣战消息

苏联远东军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年8月9～14日,苏军各所属部队越过边境的沙漠、山地、江河等天然障碍,消灭或围困日军各要塞守备队,前突至东北中部平原地带,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第二阶段:8月15～17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关东军仍继续抵抗,苏军扩大战果,攻克重要城市牡丹江市。

第三阶段:8月18日至9月2日,关东军停止抵抗,苏军运用空降兵和机械化快速先遣支队抢占东北大、中城市,关东军缴械投降。

后贝加尔方面军奉命从东北地区的西部正面进攻,方面军分兵三路出击:一路向南直扑海拉尔;一路从蒙古人民共和国向东进攻索伦;另一路是骑兵部队,通过戈壁后向南进攻,矛头直指伪满政府统治中心长春和沈阳。方面军沿中蒙、中苏边界展开战线,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额尔德尼察干(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对面)到额尔古纳河沿岸,总长达2 300公里。8月9日凌晨,后贝加尔方面军各路部队未经炮火准备,就在夜幕的掩护下越过了国境线。方面军的进攻方向是关东军所谓的“满洲西正面及中部方面”防御区。但是,苏军进攻一开始,担负该地区防御的关东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后宫淳大将认为其前方地域尚未完成作战准备,对苏军难以实施有效的阻击,便于10日晨下令将部署在边境地域的第44军(3个师团、1个坦克旅团)撤回到长春——大连铁路沿线。于是在后贝加尔方面军对面的日军只剩下海拉尔、阿尔山要塞地域和大兴安岭乌奴耳要塞的2个师团和1个步兵旅团防守。而这些日军又部署在方面军进攻方向左翼的个别点上,便于苏军迂回作战。其他从边境到纵深地带的广大地域内,基本上没有日军重兵防守。因此,方面军除左翼少部分部队外,其他大部队在越过边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第659～66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境后，几乎不用战斗，就以急行军的速度向东北纵深地区快速挺进，日行进速度达50~150公里。在2 00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许多苏军兵团齐头并进。面对如此迅猛的进攻速度，关东军总司令部仓皇南撤，并急令驻齐齐哈尔的第4军撤往哈尔滨，令驻守阿尔山——五岔沟阵地的第107师团撤往长春。苏军的进攻刚刚开始就以其强大的攻势迫使日军后撤，将西部广阔地域弃之不顾，从而加快了苏军的进攻速度。

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是后贝加尔方面军主要突击部队，该军从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部的塔木察格布拉格出发，以高度机械化的快速优势第一天就前进了150公里，第二天翻越了大兴安岭，8月11日占领鲁北，12日占领突泉，14日攻占洮南。

后贝加尔方面军另外3个主力集团军也进展快速。右翼的第17集团军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额尔德尼察干地域越过边界，向大板、赤峰方向进攻，12日翻过大兴安岭，先后占领林西、大板、经棚（克什克腾旗），14日抵达巴林桥地域，距赤峰仅1天路程。第39集团军紧靠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左侧向白城方向进攻，12日占领阿尔山，14日占领五岔沟。其间与奉命撤退的日军第107师团数度激战，使该师团不得脱身，最终陷入苏军包围之中。第39集团军主力先行越过大兴安岭，13日攻克索伦，14日进抵洮儿河流域。第53集团军属突击集团的第二梯队，紧随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之后前进，扩大战果。

后贝加尔方面军右翼部队由苏军普利耶夫上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乔巴山元帅共同指挥的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奉命向多伦和张家口方向进攻，其任务是保护方面军的右翼，与第17集团军一起切断关东军与华北日军的联系。该集群两路部队一路上几乎未遇抵抗，5天便穿过了蒙古草原，左路部队于14日晨占领多伦，右路部队11日占领二连浩特，14日进抵张北。

后贝加尔方面军左翼的第36集团军右路部队沿中东铁路出击，很快占领了满洲里，左路部队从多萨图伊的旧粗鲁海图一带强渡额尔古纳河，于9日晚进抵海拉尔，盘踞在海拉尔要塞地域的日军独立混成第80旅团主力6 000余人拼死固守。第36集团军留下部分兵力围攻海拉尔要塞地域，主力部队继续沿铁路向东南方向进攻，先后攻克乌奴耳要塞的牙克石、免渡河、乌奴耳、开岭、新南沟，于14日占领大兴安岭山顶博克图一带。

8月14日，后贝加尔方面军在各突击方向上均越过了沙漠、草原和大兴安岭，到达了东北中部平原和东北与华北之间的交通线上。整个东北腹地已展开在苏军面前，此时日军已无力阻止苏军向长春、沈阳等中心城市的进攻。

远东第1方面军在向牡丹江、吉林方向进攻时，遇到了十分激烈的战斗。该方面军以2个主力集团军向牡丹江实施主要攻击，以1个主力集团军向虎头、密山方向进攻，以另1个主力集团军向东宁、珲春、汪清、延吉、吉林方向进攻。其中第1、第5集团军于10日攻占穆棱和绥芬河，14日从东南和东北两个方向逼近牡丹江市郊，对牡丹江市形成合围。在攻打牡丹江的战斗中，苏军伤亡很大。其中第5集团军主力于12日在穆棱镇西部高地与日军第124师团激战并将其击溃，但苏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第1集团军先遣支队第257坦克旅于12~13日在桦林车站与日军第135师团主力展开激战。苏军坦克先后击毁4列满载日军部队和重武器撤退的火车，歼敌900余人，苏军也损失惨重，被日军使用“肉弹”战术攻击下的第257坦克旅只剩下7辆坦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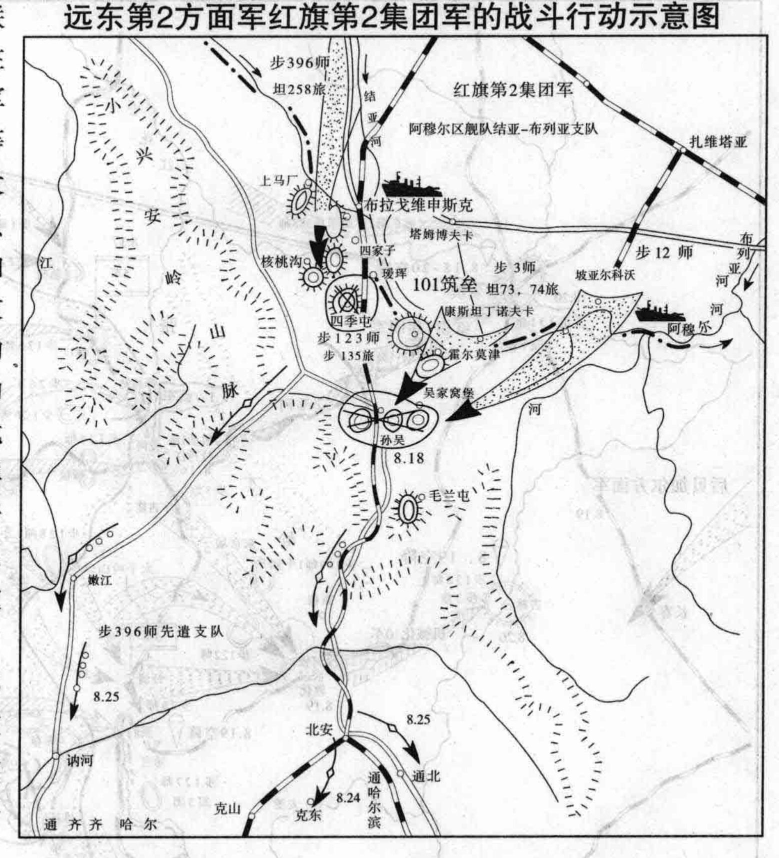
远东第1方面军右翼的第35集团军从密山、虎林对面强渡松阿察河和乌苏里江，12日攻占虎林和密山，然后向勃利、鸡西前进。但虎头要塞的日军凭借坚固工事顽强抵抗，攻坚战持续到8月26日才彻底将要塞内的日军全部消灭。左翼的第25集团军向东宁、汪清方向进攻，10日主力部队越过东宁要塞和珲春要塞，13日进抵罗子沟，14日逼近汪清、图们，切断了日军牡丹江与吉林两大集团军的联系，其他部队继续围攻东宁要塞阵地，直到26日攻克了东宁要塞。

哈尔滨、吉林战役中远东第1方面军的战斗行动示意图（1945年8月9～20日）

远东第2方面军在饶河、抚远、黑河对岸强渡乌苏里江和黑龙江，向勃利、哈尔滨、齐齐哈尔方向进攻。位于方面军进攻战线中路的第15集团军于9日攻占抚远，11日占领同江、萝北，13日攻占鹤岗、富锦，逼近沿江重镇佳木斯。左翼的第5军于9日晚强渡乌苏里江，10日进占饶河，14日占领宝清，在向勃利进攻途中渐与第1方面军会师。右翼的红旗第2集团军在黑河、瑷珲等处渡过黑龙江，12日逼近日军瑷珲、黑河、法别拉要塞和孙吴的霍尔莫津要塞阵地，13日红旗第2集团军留少部分兵

力将这4处要塞阵地包围,其余主力向嫩江、克山方向挺进。

远东第2方面军红旗第2集团军的战斗行动示意图



在东北地区的制空权上,苏联空军完全掌握了主动。苏军飞机在东北上空可任意飞行,并对日军军列、兵营、基地、要塞阵地及仓库等地进行轰炸。因关东军作战飞机大部被抽调至东南亚战场等各地,只集中仅有的230余架飞机对后贝加尔方面军的坦克群作了几次拼死攻击。8月12~14日,日军先后出动数十架飞机袭击突泉、林西地域的苏军坦克部队,但都遭到占绝对优势苏军飞机的痛击。日机在耗尽弹药后经常一头冲向苏军坦克同归于尽,苏军坦克也因此受到一定损失。8月15日,日军仍出动39架飞机攻击洮南地域的苏军坦克部队,使日军飞机损失殆尽。当天,日军第2航空军欲将几百架教练机编成特攻队,准备拼死一战,对苏军坦克实行毁灭性打击。不过未及施行,日本已宣告投降。

苏军经过6天的迅猛进攻,至8月14日,苏联3个方面军已深入东北境内各地,关东军各所属部队已处于被包围的态势。

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告无条件投降。但关东军各部队并未放下武器,其前线部队仍在拼死抵抗。鉴于此种情况,远东苏军总部决定继续进攻,对盘踞在东北各地负隅顽抗的关东军予以彻底消灭。

8月15~17日,苏军进攻进入第二阶段,后贝加尔方面军所属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攻占张北,并与北上的八路军会师。第17集团军占领乌丹和赤峰。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沿铁路向沈阳和长春高速推进。第39集团军占领了铁路交通枢纽白城,并继续沿铁路向长春前进。第36集团军主力于15日在大兴安岭乌奴耳要塞与日军第119师团进行战斗,并快速攻占博克图车站,17日越过大兴安岭,占领扎兰屯。

远东第1方面军主力进行了牡丹江攻坚战。日军将4个师团收缩到牡丹江市,并炸毁周围的铁路、公路桥梁,凭险顽守。经双方激烈战斗,日军被迫撤往横道河子方向,苏军于16日晚占领牡丹江,然后兵分两路向哈尔滨和吉林方向进攻。与此同时,右翼的第35集团军占领勃利,左翼的第25集团军占领汪清和图们。

远东第2方面军主力第15集团军于17日攻克佳木斯,然后沿松花江追击退却的日军部队,向依兰、哈尔滨方向前进。左翼的第5军于17日在勃利与第35集团军会师。右翼的红旗第2集团军在嫩江和北安两个方向上分别进至科洛站和龙镇。驻守在霍尔莫津要塞的日军第123师团在苏军猛攻下于17日停止抵抗,17 061人缴械投降。

远东第2方面军第15集团军和步兵第5军的进攻示意图

8月15日以后，尽管关东军总部尚未发出投降命令，但日军军心已乱。除个别要塞阵地守备部队以外，日军前线各部队对苏军的抵抗已大为减弱，并有成批的日军缴械投降。8月15～17日，苏军各部队用3天时间在各个方向前进了60～300公里，占领了一系列的战略要地，苏军与关东军之间的大规模战斗也就此结束。

8月18日，关东军开始投降，为迅速占领东北全境和解除全部关东军的武装，苏军采用快速支队从空中和陆上迅速向东北各大中心城市突击。8月18～22日，苏军先遣分队先后在哈尔滨、吉林、延吉、长春、沈阳、旅顺等地实施空降，由坦克、装甲车和自行火炮组成的地面快速支队（有些支队搭乘火车）也随空降部队之后开进各大城市。关东军和伪满洲国的统治中心在几天之内被苏军迅速占领。苏军各路大军也日夜兼程前进，并陆续集结于东北各地，至此整个东北地区已完全处于苏军占领之下。

9月3日，远东苏军总部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率领下进驻长春，苏军对东北的进攻和占领也因此完成。整个苏军进攻东北战役历时24天，就以全胜宣告结束。

被苏军俘虏的日军，共有148名将领，594 000名官兵。并缴获了大量战利品，仅后贝加尔和远东第1方面军就缴获大炮1 565门、迫击炮和掷弹筒2 135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其中包括教练机和伪满民航机）、机枪12 000挺、汽车2 000辆、马13 000匹、各类仓库679栋。远东第2方面军和阿穆尔舰队缴获了伪满江上军的全部舰艇。①

苏军以强大、迅猛的攻势最终导致日本关东军迅速覆灭和伪满洲国的彻底垮台，从而促进了东北的光复和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第三节　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4日10时45分，日本天皇裕仁在美军战略轰炸声中，在防空洞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全体阁僚、两总长、枢密院议长、内阁书记官长、综合计划局长、陆海两军军务局长、最高战争指导会议成员，列席会议的有杉山、畑俊六、永野修身3位元帅。

在御前会议上，陆相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军令部总长丰田副武，再次陈述将战争进

① 苏联科学院编：《世界通史》，第10卷，下册，第710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年，中译本；《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第5卷，第581页。

行到底的意见，并向天皇哭诉：“毋宁于九死中求一生机，继续战争，此外别无良策。”①

裕仁听完各方发言后，流着泪发表如下讲话②：

我的异乎寻常的决心没有变。

我不是轻率地作结论，而是根据内外形势、国内情况和彼我双方的国力战力来判断的。

关于国体，敌方也是承认的，我毫无不安之处。

关于敌方的保障占领，虽然不是没有一点不安情绪，可是如果继续战争，无论国体或是国家的将来都会消失，就是母子都会丢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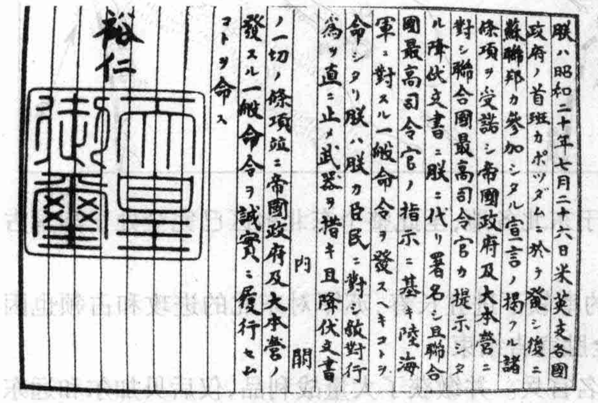
如果现在停战，可以留下将来发展的基础。

解除武装是难受的，但为了国家与国民的幸福，必须用明治大帝对待三国干涉的心情来干，希赞成此意。

统制陆海军，也有困难吧，我亲自广播也行。

赶快发出诏书，把这个意思传达下去。

裕仁天皇讲完话离开了会场。在一片哭声中，战时的最后一次御前会议结束。14 日下午到夜晚，内阁召开了 3 次会议，讨论和起草《停战诏书》。起草人是内阁书记长迫水久长，然后经 4 位阁员对文字、体例加以修饰，并经内阁会议通过，各大臣副署。晚 11 时呈给天皇署名、用玺，完成了必经程序。


朕ハ昭和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米英支各國政府ノ首班カポツダムニ於テ發シ後ニ蘇聯邦カ參加シタル宣言ノ揭クル諸條項ヲ受諾シ帝國政府及大本營ニ對シ聯合國最高司令官カ提示シタル降伏文書ニ朕ニ代リ署名シ且聯合國最高司令官ノ指示ニ基キ陸海軍ニ對スル一般命令ヲ發スヘキコトヲ命シタリ朕ハ朕カ臣民ニ對シ敵對行為ヲ直ニ止メ武器ヲ措キ且降伏文書

内閣

ノ一切ノ條項竝ニ帝國政府及大本營ノ發スル一般命令ヲ誠實ニ履行セムコトヲ命ス

裕仁

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


朝日新聞

戰爭終結の大詔渙發さる

新爆彈の慘害に大御心

帝國、四國宣言を受諾

必ず國威を恢弘

聖斷下る・途は一つ

信義を世界に失ふ勿れ

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

天皇要亲自向国民、向国内外军人宣读《停战诏书》，但不能亲临广播电台，因此先录音，由电台播放录音带。内阁将《停战诏书》稿呈交皇宫，裕仁的广播录音在 8 月 14 日 23 时 30 ~ 50 分完成，之后将录音带收藏进宫内省二楼的一个小保险箱里，以免发生意外。

日本东京时间，1945 年 8 月 15 日中午 12 时，日本天皇裕仁向国内外日本国民播放讲话录音。

日本《停战诏书》全文如下③：

朕深鉴于世界大势及帝国之现状，欲采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时局，兹告尔等臣民，朕已饬令帝国政府通告美英中苏四国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盖谋求帝国臣民之康宁，同享万邦共荣之乐，斯乃皇祖皇宗之遗范，亦为朕所拳拳服膺者。前者，帝国所以向美英两国宣战，实亦为希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而出此，至如排斥他国主权，侵犯其领土，固非朕之本志。然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虽陆海将兵勇敢善战，百官有司励精图治，一亿众庶之奉公，各尽所能，而战局并未好转，世界大势亦不利于我。加之，敌方最近使用残酷之炸弹，频杀无

① 迫水久长：《日本投降内幕》，转载于《八一五这一天》，第 56 ~ 71 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 年 7 月。

② 此讲话录自与会的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笔记，时间：1945 年 8 月 14 日 11 时。引自日本参谋本部编：《战败的记录》，第 290 页，1967 年。

③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 ~ 1945)，下卷，1969 年。

辜,残害所及,真未可逆料,如仍继续交战,则不仅导致我民族之灭亡,并将破坏人类之文明。如此,则朕将何以保全亿兆之赤子,陈谢于皇祖皇宗之神灵。此朕所以饬帝国政府接受联合公告者也。

朕对于始终与帝国同为东亚解放而努力之诸盟邦,不得不深表遗憾,念及帝国臣民之死于战阵、殉于职守、毙于非命者及其遗属,则五脏为之俱裂;至于负战伤、蒙战祸、损失家业者之生计,亦朕所深为轸念者也。今后帝国所受之苦难固非寻常,朕亦深知尔等臣民之衷情,然时运之所趋,朕欲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以为万世开太平。

朕于兹得以维护国体,信倚尔等忠良臣民之赤诚,并常与尔等臣民同在。如情之所激,妄滋事端,或者同胞互相排挤,扰乱时局,因而迷误大道,失信义于世界,此朕所深戒。宜举国一致,子孙相传,确信神州之不灭,念任重而道远,倾全力于将来之建设,笃守道义,坚定志操,誓必发扬国体之精华,不致落后于世界之进化。尔等臣民其克体朕意。

御名　御玺

昭和二十年八月十四日

各国务大臣副署

同一天,日本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决定通知中、苏、美、英四国,主要内容如下:

一、天皇陛下已下诏,接受《波茨坦公告》各项条款。

二、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和大本营签署为实施《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所必须的各项条款。天皇陛下还准备对日本陆、海、空当局及其所属不管驻何处之所有部队发布命令,停止战斗行动,放下武器。并发布盟军最高司令认为在执行上述各款中有必要发布的其他命令。

8月15日中午,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所有人员以立正姿势在新京司令部大楼收听东京播放的日本天皇裕仁的《停战诏书》录音。收听后,整座大楼哭嚎声一片,绝望的气氛笼罩在关东军所有将士的心头。在其他各集合点收听的日本军人、官吏和职员们也在一片哭声中离去。

15日下午2时,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紧急派副总参谋长松村知胜少将去东京,了解日本大本营的具体安排。松村知胜于当晚9时回电告之:陆相阿南自杀,大本营乱作一团,没有明确指令。

8月16日上午9时,关东军司令部派入江和山岸2名少佐乘装甲车到与司令部相邻的上海路观察市况,遭到伪满军人的开枪射击,造成一死一伤。事发后山田乙三命"首都警备军"司令官山田铁二郎与伪满军交涉,双方达成协议,以大经路和五马路为界,伪满军驻大经路以东、五马路以南的市区东南部,关东军驻市区的西北部。此时,日本关东军已经失去了它在新京的主宰权。原定转移到通化的伪满洲国各部次长官(日本人),行动撤销。已经转移到通化的关东军"作战指挥部",也又回到新京。

16日晚,关东军总司令部在三楼中央作战室召开全体幕僚(18人)会议,由主任参谋草地贞吾主持。会议主题是如何对待天皇的《停战诏书》,会议一开始,狂妄的主战参谋们手握军刀敲打桌面,大喊大叫,流泪不止,誓死与苏军"圣战"到底。稍为冷静者则主张继续作战,战到形势有利于日本关东军时再停战。双方争吵喧嚣不止,会场似乎变成了战场。最后由总参谋长秦彦三郎发言,他说:"现在我说的话,如果真是不忠,不是为民族的未来着想,就请大家立刻砍我的头。"他开导众参谋说:"历来,关东军就是天皇的军队,并不是山田乙三的家兵。诸位大谈维护国体,不奉天皇之命,何能维护国体?如果敢于自行打下去,军纪将无法维持,也不能为民族的未来有所作为!"山田乙三最后表态发言,他说:"我与总参谋长所想的完全一致,诸君心情我十分理解,但是,圣断已下,本军只能也必须奉戴圣旨,全力以赴终战。"众幕僚们不再讲话,掩面暗泣,低下头表示服从。在日本关东军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幕僚会议,在绝望的气氛和哭泣声中结束①。

8月17日拂晓,关东军收到大本营的"大陆命第1382号"命令,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战斗行动,在停战谈判达成协议之前,遇到敌人攻击,不得已时采取自卫战斗行动不在此例。"顷刻,又收到

---

① 〔日〕草地贞吾著,高书全译:《关东军作战参谋的证言》第59~81页。

“大陆命第2545号”命令，要求关东军：“可就地与苏军进行局部停战交涉并交出武器。”当晚10时，关东军总司令部发出“关作命第106号命令”，全文如下①：

1. 帝国决定停止对美、英、苏、华的作战。

2. 关东军要想尽种种办法达到停战的目的。

3. 各方面军、各军及直属部队，应立即停止战斗行动，但在停战谈判达成协议之前，遇到敌人进攻，不得已时采取的自卫战斗行动，不在此例。

4. 应特别注意下列几点：各部队要考虑到宿舍、给养等方便，把部队集结到适当的地方，并做好今后的行动准备；今后要严防放火、破坏等活动；要尽可能努力保护当地侨民；要迅速掌握分散的部队，并广泛传达本命令的精神；各兵团、部队可分别同自己面对的苏军进行适当的停战谈判，并交出武器和碉堡。

与此同时，又下密令，要求各部队，“秘密处理掉军旗、敕谕、敕语、军事文件；尽可能迅速解散征召而来的士兵。”

从上述内容看，关东军下达的命令没有“投降”字样，而是“停战”和“谈判”的字样，与《波茨坦公告》要求不符。从日本大本营和关东军总部的命令中，特别强调“自卫战斗”一词，实质上是一句含有隐意的自行反抗的暗语，关东军各部队若拒绝投降缴械，都可以用“自卫”行动向苏军进攻，可见日本大本营仍顽强地表现着不愿投降的愿望，也由此可以看出苏联统帅部下达的不停止进攻命令的正确性。

17日，关东军收听到日本东京广播的天皇裕仁《敕语》，安慰海内外军人，要他们理解天皇的“朕意”。下午6时，竹田宫恒德亲王（中佐）以天皇特使身份飞抵总司令部，向山田乙三传达《敕语》，要求日本关东军“平静地缴械投降”。山田乙三向亲王表示：按“圣旨行事”。竹田宫恒德亲王立即起身去沈阳，向第三方面军司令官传达《敕语》，之后从沈阳返回东京。护航的日本第2航空军4架战斗机，返航时与苏军飞机遭遇，日机不敢反抗自行撞向地面，机毁人亡。

日本天皇裕仁《敕语》全文如下②：

朕往日对美英宣战，历三年又八月。其间，朕亲爱之陆海军人挺身效命，奋勇战斗于瘴疠不毛之原野，炎热狂涛之海洋，朕深嘉之。

现新有苏联参战，自内外各种形势观之，今后战争之继续徒增祸害，终使帝国有丧失存在的基础之虞。虽然帝国陆海军之斗志尚为壮烈，然为保持维护我国光荣之国体，朕现欲与美英苏及重庆媾和。对毙命于锋镝、死于疫疠之众多忠勇将士，衷心哀悼，同时深信汝等军人之诚忠遗烈为万古国民之精粹。

汝等军人，克体朕意，坚持巩固团结，严明出处进止，以期克服千辛万苦，忍所难忍，而遗国家以永远之基础。

山田乙三意识到，命令虽然发出，但一些部队已经失去了控制能力，还在拼死的抵抗。还有一些部队联系已经中断，命令难以到达。于是他通过电台向苏军播音声明：“为了尽快实现停止军事行动，我方代表将乘飞机，在8月17日10时至14时之间，飞抵牡丹江、密山、穆棱、同江等地上空和城市，与苏军接触。关东军总司令部这一措施，希望不要引起任何误会。”

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员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命令远东第1方面军派出参谋人员，前往牡丹江和穆棱等地机场，会晤关东军代表，要求各地仍在抵抗的日军不能停战谈判，必须就地无条件缴械投降。

17日早上6时，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电令山田乙三：“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致电远东军总司令部，建议停止军事行动，但对满洲日军投降只字未提。”同时，“日本军队在苏战线一系列地段上却发起了

① ［日］楪本舍三：《关东军秘史》，第301页。

②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4卷，1953年。

反攻。”“我要求关东军司令官，从8月20日12时起，在整个战线停止一切对苏军的战斗行动，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一俟日军开始缴械，苏军即停止战斗行动。”山田乙三在当日和次日上午均未对上述命令作出答复。

17日上午10时，日本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飞抵哈尔滨，会见苏联驻哈尔滨领事包瑞切夫，要求联系苏联远东总部，没有结果。下午3时秦彦三郎返回长春。

8月18日上午8时，秦彦三郎接到苏军通知，再次飞抵哈尔滨机场等待苏联远东军总部召见。下午7时，苏军空降兵在哈尔滨机场着陆，随机到达的苏联远东第1方面军副参谋长、军事委员特命全权代表舍拉霍夫少将立即召见秦彦三郎。秦彦三郎向苏方报告：“哈尔滨地区的日军已经瓦解，几乎不受总司令部指挥。”舍拉霍夫向秦彦三郎宣布如下通牒：为避免无谓的流血，苏军统帅部命令日军立即停止抵抗并做有组织的无条件投降，为此应在2小时内呈送有关哈尔滨地区日军部队实力资料；在苏军统帅部下达特别号令前，关东军的将领和军官在自动投降的条件下，允许持有冷兵器并留在自己的住宅内；日军指挥部在苏军抵达前，对武器、弹药、仓库、基地及其他军用物资的保管和移交负完全责任；在苏军到达前，由日军部队负责维持哈尔滨市内和郊区的秩序，为此，允许保留一部分由日本军官率领的武装分队；哈尔滨市内和郊区的最重要目标，如机场、松花江桥、铁路枢纽部、电报局、邮局、银行等，应由苏联空降兵立即占领；为了协商“满洲”境内整个关东军的投降和解除武装事宜，要求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中将、日本驻哈尔滨领事宫川和日军指挥部指定其他人员，于19日7时乘我空降兵飞机，前往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员指挥所（加里科沃），接受通令关东军无条件投降具体事宜。

秦彦三郎表示接受通牒，但请求给他3小时时间，以便准备必要材料，苏方对此表示同意。

8月19日下午3时30分，秦彦三郎率幕僚到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会合领事宫川等人，随后被苏军送到远东第1方面军总部加里科沃。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指挥部亲自向秦彦三郎等人宣布关东军投降程序命令：日本关东军投降和解除武装时间，限定在8月20日12时前结束。第1方面军司令员麦列茨科夫元帅，宣布具体投降程序，指定受降地点、行动路线和时间。秦彦三郎表示接受全部条件，但他向苏方解释：“某些部队之所以没有执行缴械命令，是由于关东军总司令部未能及时将投降令传达下去。因为关东军总司令部在苏军进攻第二天就失去了对部队的指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警告秦彦三郎：“日军必须有组织地缴械投降，包括军官在内，俘虏的伙食在投降初期应由日军领导负责安排。部队必须同伙房和存粮一起移交到苏军手中。日军将领必须同自己的副官和个人必需品一起到场。”秦彦三郎接受苏军命令后，于当晚11时在苏军军官的陪同下飞回长春。

关于这次召见，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在他的《毕生的事业》回忆录中写道：“秦彦三郎和他的随行人员相当沮丧，‘武士道’的自负精神已荡然无存。昨日还很傲慢的满洲太上皇表示俯首听命，甚至显得卑躬屈膝。我们每说一句话，他们都连连点头。”

19日，在秦彦三郎飞往哈尔滨和苏军远东军总部之际，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阿尔捷缅科上校被指定为苏军全权代表，空降长春接受日军投降。方面军总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签发了全权代表证书，全文如下：

持证人阿尔捷缅科上校，作为我们全权代表前往长春，接受长春守备区的日满部队以及驻防长春地区的部队投降。我的全权代表阿尔捷缅科上校对长春地区军政当局所下达之一切命令，必须无条件地执行。随同阿尔捷缅科上校前往者有4名红军军官和6名红军列兵。

特此证明

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签名）

临行前马利诺夫斯基强调，见到山田乙三要他立即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没有任何停战谈判可言，唯一出路：“立即停火，投降！”

同一天，外贝加尔方面军快速先遣部队空降长春机场，随机到达的方面军军使团即驱车直驶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部，进入山田乙三的办公室。阿尔捷缅科上校通牒山田乙三：“立即在全线停火和停止

抵抗,放下武器,迅速撤出长春及其附近地区的所有部队,到指定地点无条件缴械投降。"山田乙三先是默不作声,后又说有各种困难,难以控制部队,然后又用恫吓的口气将无条件投降说成停战谈判。就在此时,前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进来,阿尔捷缅科上校命令他们通过电台广播告知市民,苏军已进入长春接受关东军投降的消息。张景惠看着山田乙三不敢表态。正在山田乙三顽抗和拖延时间之际,后贝加尔方面军阿符拉缅科少校率领的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组成的空降兵(由近卫机械化第30旅官兵组成),在长春机场着陆,解除了日军武装,在机场组成环形防御阵地,准备向市区挺进。山田乙三听到报告后,露出既震惊又沮丧的表情问阿尔捷缅科:"这是什么意思?"阿尔捷缅科告诉他:"你不在指定的条件下投降,你本人和你的幕僚将遭到致命的打击。"说完后立即用电话通知机场防务的苏军指挥官:"命令轰炸机在长春城市上空巡逻飞行,等待我的信号,如到约定时间不见我的信号,立即进行轰炸。"当山田乙三明白了阿尔捷缅科的电话内容后,提出了一些条件,阿尔捷缅科断然拒绝,并告诉山田乙三必须彻底无条件投降。至此,山田乙三才摘下自己的佩刀,双手捧刀交给军使团,同时承认自己投降成为苏军俘虏,随后会议室内所有的日军将佐、幕僚都交出佩刀无条件投降。① 随后山田乙三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向市民发表了投降的广播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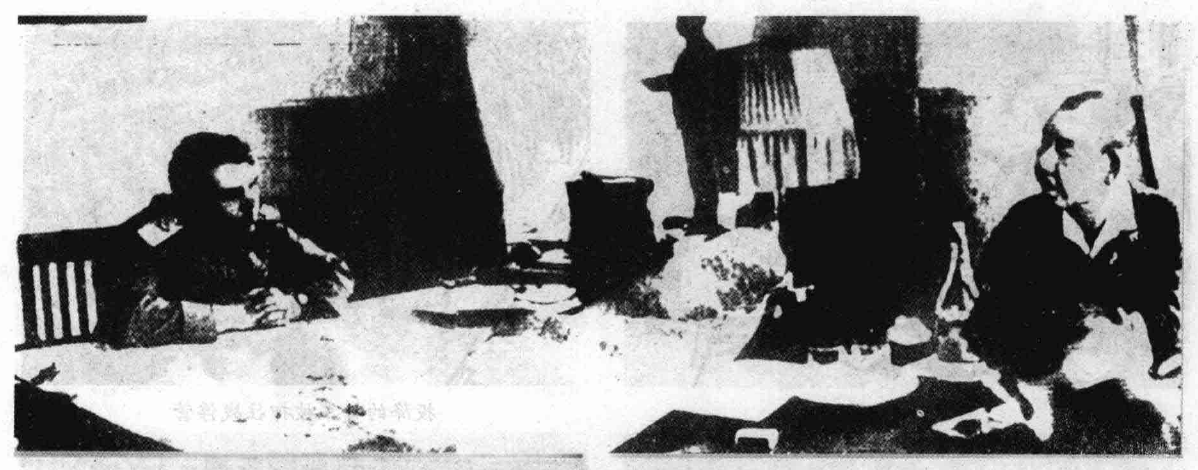
8月20日晨,后贝加尔方面军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的先遣快速部队开进长春,司令部设在前"日本军人会馆"(今吉林省公安厅大楼)。同一天,设立长春卫戍司令部。司令员加尔洛夫少将,司令部设在前"满洲国协和会中央本部"(今长春市人民大街2818号)。

20日,日本关东军总部及驻长春各部队集结向苏军缴械投降,主要有关东军总部直属机关、院校和部队、步兵第30军司令部及所属驻长春部队、第148师团、第34军独立混成第133旅团等,总计约1.5万人,全部押往前关东军南岭兵营、南岭伪满高等院校中设置的临时战俘营。至此,在日本历史上骄横一时的"皇军之花"——日本关东军已不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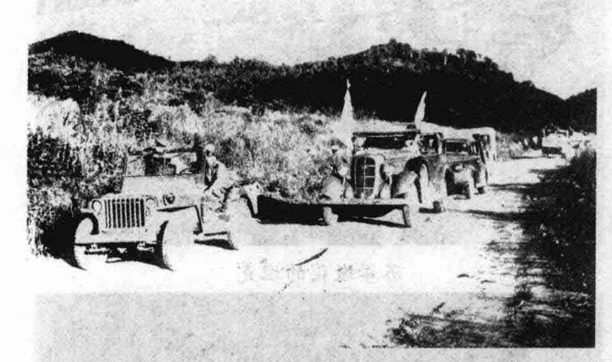


苏军阿尔捷缅科等代表与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右二)谈日军投降事宜

① 德春著:《关东军司令官在长春投降》,载《吉林党史资料》,1987年第3期。



1945年8月19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左)与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谈日军投降事宜



日军使赴苏军驻地接洽投降车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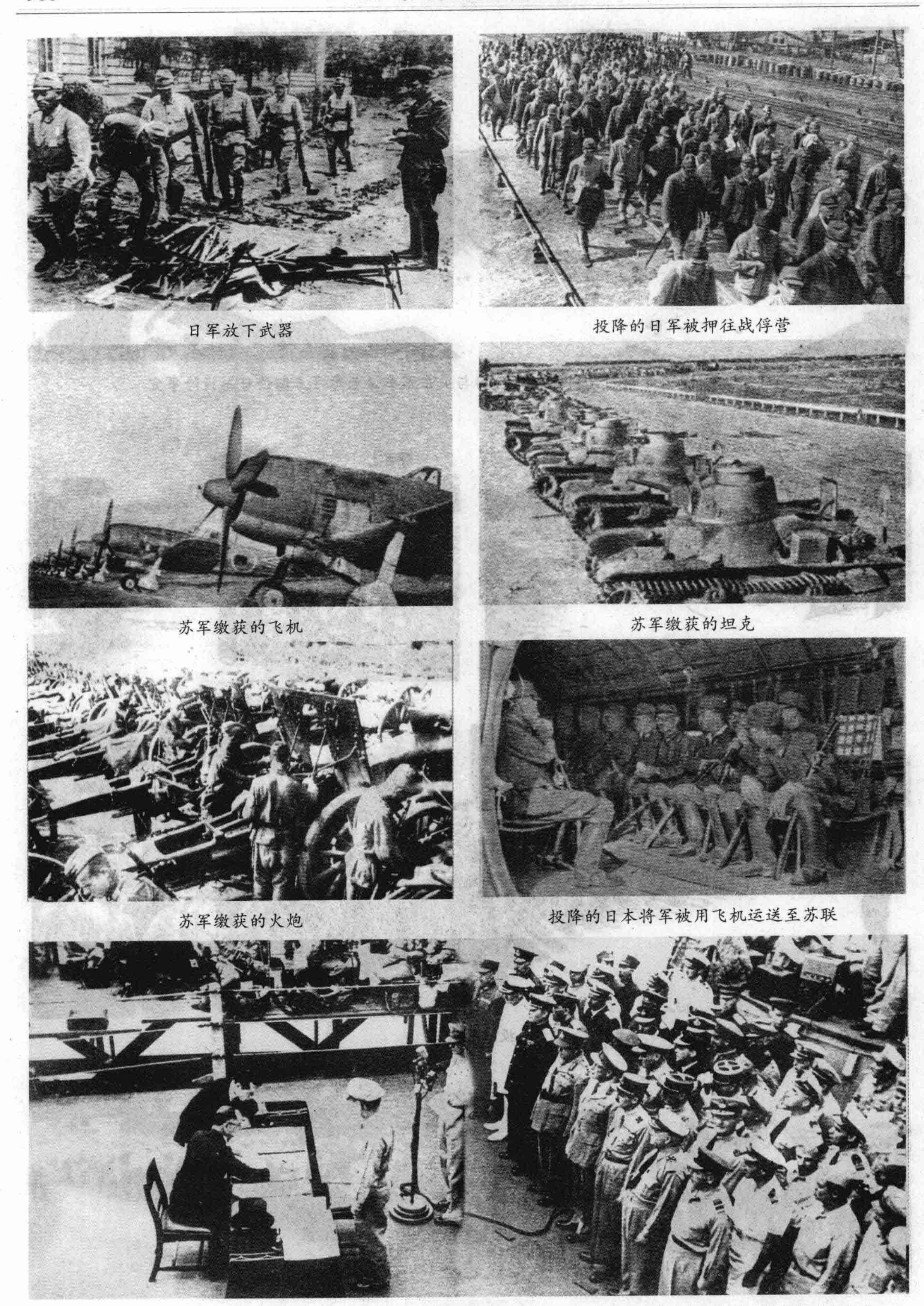
日军向苏军投降



投降的日军



投降的日军



日军放下武器

投降的日军被押往战俘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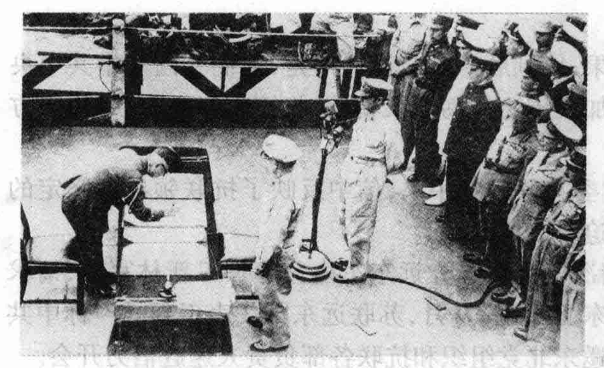
苏军缴获的飞机

苏军缴获的坦克

苏军缴获的火炮

投降的日本将军被用飞机运送至苏联

1945年9月2日在“密苏里”巡洋舰上举行日本向盟军的投降签字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



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



苏联代表德雷维扬库陆军中将签字

第四章　抗联参加攻克日军要塞

第一节　国际第88旅

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后,东北人民一直没有停止过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曾发展到很大规模,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1933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人民革命军逐步发展,并于1936年联合各抗日武装统一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抗击着日本侵略者。然而,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东北地区漫长的严寒等外部条件和抗日联军缺乏统一的领导指挥及没有后方支援等原因,东北抗日义勇军各部相继遭到失败,东北抗日联军也遭受到了严重挫折,部队人员也由原来的3万人减少到不足2 000人。面对如此艰难的局面,抗联部队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加强统一领导,改变游击运动的战略布局和活动方式。

1939年9月,中共北满省委常委冯仲云越界到达苏联伯力城(哈巴罗夫斯克),要求苏方协助召集北满吉东的扩大会议,以便决定北满、吉东地区党组织的统一合并,第二、三路军的合并和统一。苏方接受了冯仲云的建议,并指定专人负责,在政治、组织、军事上对抗联部队给以帮助,并派专人送信给周保中、赵尚志。12月,周保中、赵尚志先后到达伯力城。

1940年1月24日,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亦称第一次伯力会议)在苏联伯力正式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东北游击运动的经验教训,分析形势,确定今后斗争方略;讨论与苏联远东军建立联系及相互合作问题。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历时20天。最后经过深入研究讨论,形成了《吉东北满党内斗争问题的讨论总提纲》和《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两个重要文件。这两个文件的主要成果是:

(1)总结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制定了新的斗争方略。

(2)文件指出了部队的编制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抗联队伍的实际情况,根据会议确定的“保存实力,逐渐收缩”的方针,肯定对抗联部队实行统一领导和进行整编是十分重要的。具体的整编方案是:路军下面设支队——大队——中队——小队、支队、大队、中队的领导人为队长、政委、指导员各1人。第1路军各部缩编成第1、4、7支队;第2路军各部缩编成第2、5、8支队;第3路军各部缩编为第3、6、9、12支队。

(3)中共北满和吉东党组织和东北抗联的代表与苏联远东军政当局达成协议:由苏联协助通过共产国际的帮助,争取恢复抗联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东北抗联表示接受苏联某些必要的援助,但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联的领导,保持东北抗联的独立性,坚决否定东北抗日游击队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分

开。

会议结束后，抗联各路军领导对会议取得的成果，感到欣慰和自豪。但是，他们又因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而深感孤掌难鸣。返回东北后，他们一边加紧传达贯彻会议精神，收缩改编部队，一边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

3 月 24 日，周保中、冯仲云代表吉东、北满两省委写信给党中央，信中反映了抗联领导人坚定的原则立场、组织观念及渴望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的迫切心情。

7 月 20 日，周保中在得不到中共中央回信的情况下又给苏方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写信，请求帮助去内地找中共中央所在地，要求派代表来解决东北问题。9 月，苏联远东军代表王新林声称中共已派代表来解决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有关问题，特邀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各部负责人速赴伯力开会。

东北党组织和抗日联军负责人接到通知后，心情异常激动，纷纷从东北各地奔赴伯力。

12 月中旬的一天上午 9 时，会议在伯力举行。苏方代表王新林发言中强调："我们都是共产党大家庭的兄弟，目前抗日联军面临绝境，只有将抗联并入苏军才有出路。"

抗联代表冯仲云认为："现在苏方代表的用意已经明确，根本就没有中共代表到会。他是想借中共中央的名义召集我们来参加会议，以达到规劝我们'易帜'的目的。"

对此，与会抗联代表团结一致，有理、有利、有节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原则，与苏联代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苏方代表理屈词穷，便动手拍桌骂人；抗联的领导者们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一个多月的会议辩论，苏方代表仍固执己见。这样，各联军代表和抗日联军的越境部队，准备返回东北，继续打游击。但是，1941 年 4 月 13 日，苏日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方王新林又以此无理提出停止抗联派部队回东北。

周保中对此予以严厉驳斥，同时上书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申明坚持抗联旗帜，保持东北党组织独立性的立场。他的意见很快得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支持，并使主张取消抗联的苏方代表王新林受到撤职处分。


周保中将军

这样，第二次伯力会议，在中共中央未派代表到会的情况下，作出了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组织编制的重要决策，决议指出：

为实现统一指挥，东北抗日联军组成总司令部，推举周保中、李兆麟任正、副总司令，魏拯民（重病留在密营未到会）任政治委员。

从此，周保中率领着 2 000 多人的部队，在位于苏联的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和双城子（沃罗什诺夫）的两处森林中，建立了 A 野营和 B 野营。

1941 年冬，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提议将东北抗日联军越境转移到苏联的伯力和双城子休整训练的 2 000 多名官兵，组建为一个国际旅。1942 年 7 月，经共产国际批准，苏联远东红军第 2 军司令部发布命令，将这支中国抗日联军改编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第 88 独立步兵旅（又称国际第 88 旅或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由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副旅长兼政委，崔石泉任参谋长（后由苏联的什斯基任副旅长兼参谋长）。一批苏联红军军官也编入国际旅担任军事教员。国际旅下设 4 个步兵营、1 个无线电连、1 个迫击炮连。金日成（朝鲜）、王效明、许亨植（朝鲜）、柴世荣分任 1、2、3、4 营营长。同时，在教导旅中设立中共东北委员会，由崔石泉任书记。

至此，东北党又有了统一的组织，抗日联军有了统一的领导。他们在野营中，组织部队认真学习军事、政治，同时，又不时地派一部分同志组成若干小分队，返回东北战场出其不意地打击日军。

教导旅成立后，抗联指战员的政治学习进一步加强。为提高指挥员的军事理论水平和指挥能力，

全旅干部每周集中一天时间学习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当时，由于抗联部队长期与党中央隔绝，要得到中共中央的文件和材料非常困难。尽管如此，抗联指战员还是千方百计想办法，通过公开发行的报刊获取材料。如《关于新四军皖南惨案概况》，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周恩来的《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斗争》，朱德的《建立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等文件就是通过《新华日报》《救国时报》获得的。旅党组织根据这些文件精神，及时引导大家理论联系实际地进行学习讨论，自觉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通过学习，不仅了解到关内抗战情况，增强抗战胜利的信心，而且提高了思想认识水平，增强了团结，改进了作风。此外，抗联教导旅的同志虽身居异国，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但每个指战员的心都向往着延安，怀念党中央。每个连队的俱乐部都挂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画像，这些图片都是他们自己依据报刊的新闻图片精心绘画出来的，表现了抗联同志热爱党的深厚感情。

在军事训练上，一般的训练内容有队列、刺杀、射击、投弹、瞄准等项目，同时也组织一些特殊技术和技能的学习。如讲授战术、军事地形、爆破、防化、侦察、警戒、绘图、照相、发报、空降、滑雪、驾车、窃听、耐寒等课程。这些课程一般由苏军军官任教，或由他们训练几个小教员，再由小教员进行施教。

抗联各路军都非常重视射击训练。周保中要求每个指战员都要"尽心练习瞄准演习和实弹射击"，将自己培养成"沃罗什夫式的、朱德式的射手"，具有超等的射击技术，百发百中。训练中，抗联指战员都以坚强的毅力和饱满的热情进行苦练，取得了优异成绩，仅刺杀一项就有40人获得奖励。

空降训练，由旅司令部根据需要组织空降跳伞活动。以1942年9～10月的一次空降训练为例，参加者337人，其中有87人成绩优秀而受到奖励，还有11名女同志获奖。



抗联88旅部分军官合影



抗联88旅部分指战员在野营的合影

抗联在进行紧张军事训练的同时,还加强文化学习和娱乐活动。文化学习按文化程度不同分成4个学习班,有的学俄语,有的学中文,还有扫盲班;文化活动主要是组织文艺晚会、演讲会、观看电影、举办墙报等。

同时,抗联战士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劳动成果。以北野营为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先后建起3所营房、1座面包炉、4个仓库,还建有食堂、厨房、卫生室、浴池、医院、俱乐部等设施。半年中,他们开垦荒地种植蔬菜,养猪捕鱼,实现了蔬菜和部分副食品的自给。

1944年冬,苏联远东军区的索尔根将军亲自组织了国际旅的一次对抗性演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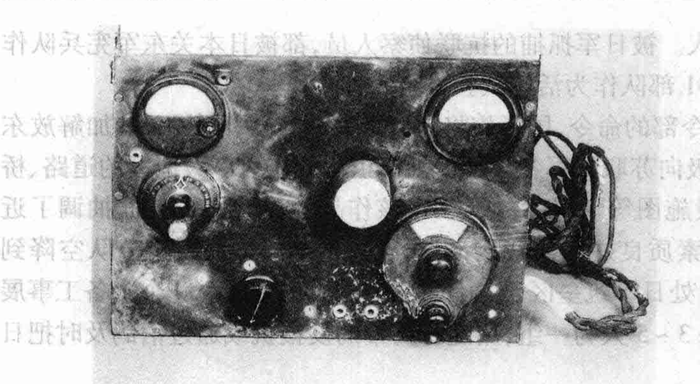
经过严格的训练,这支有着光荣抗日传统的部队军事素质不断提高,保留了一批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为配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消灭关东军、解放祖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前夕,国际旅以苏联远东军第88独立步兵旅的名义向斯大林元帅请战,要求与苏联红军一起出征,解放东北。不久苏联远东军情报部长索尔金少将向国际旅传达了普尔卡耶夫大将和军事委员会法捷夫的指示,国际旅将与苏联红军一同开进东北,参加解放祖国的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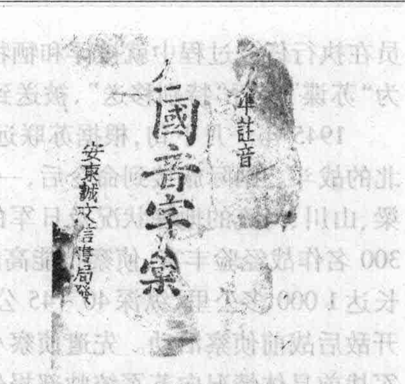
第二节 战前的敌后侦察

一、抗联小部队对日军要塞的侦察

在抗联教导旅成立之前,先期进入苏联境内的抗联人员和坚持在东北边境地带的抗联部队,就在苏联远东军的直接领导或指导下,对日军要塞等军事目标进行了侦察,并及时准确地报告给苏联远东军边防部队及情报部门。



抗联88旅侦察小分队使用的电台



抗联88旅侦察小分队使用的密码本

1938年2月，抗联第3军第9师在萝北附近作战失利，200余名官兵进入苏联境内进行休整。同年5月，苏联远东军经过审查，挑选了吴兴才、刘福廷、王志成、李东光等13名战士编入苏联远东边防军区第58大队的侦察分队，进行专业的侦察特殊技能训练，如搏杀、空降、驾驶、收发报、电话窃听、标图、绘图、照相、爆破、伪装等。侦察分队经过专业训练后，分成几个侦察小组对南起珲春、北至虎林的日军军事设施、军事目标不间断地侦察，他们每年潜回东北约20次，每次行动时间1～2个星期，将日军在上述地域修筑的要塞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获取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情报。

1939年，由李明顺领导的侦察小组，在宁安、穆棱、海林、东宁、汪清等地进行了侦察。在图们、汪清一带侦察的吕英俊等还深入到日军的工事群中，除进行拍照绘图外，还将工事上的水泥敲下一小块带回化验，以便掌握日军工事的强度。这些专业的侦察活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7月。

从1940年开始，坚持在东北的抗联部队，也对日军的要塞等军事设施进行了侦察活动。活动在宝清、虎林、饶河一带的抗联第2路军第2支队在队长王效明、副队长刘雁来的领导下，对日军在中苏边境的密山、虎林、宝清、富锦等地的军事部署、兵力调动、公路、铁路、桥梁的位置、运输情况及飞机场等进行了侦察，并将获得的情报通过电报或派秘密交通员送达苏联远东军。

1941～1945年，抗日联军派出多批精干的侦察小分队在图们、和龙、汪清、安图、敦化、蛟河等敌后开展侦察活动，并成功地炸毁了林口——佳木斯、图们——牡丹江的铁路桥梁。

二、战前对日军要塞的侦察

国际第88旅成立后，特别培养了一批心理素质好、军事素质强、作战经验丰富的侦察员，他们在对日军要塞设施的侦察和后来的反攻作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国际旅经常不断地派遣侦察小分队返回东北深入敌后，除开展联络、宣传和小规模抗日活动外，同时对日军要塞防御区的构成、工事结构、位置、强度、营房兵舍、弹药库、粮库、发电厂、桥梁、飞机场、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及数量、其他军事设备、部队的调集等军事情报，采取各种侦察手段进行大量艰苦卓绝、甚至流血牺牲的工作，获得了一份份精确翔实的情报，为苏联红军在极其复杂的地理条件下攻击日军，以极少数的战争代价在极短的时间内，将日军苦心经营十几年的“固若金汤”的“东方马其诺”防线和“军中之花”的关东军全线击溃作出了贡献。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国际旅的侦察英雄们用生命和鲜血为胜利铺平了道路。

日军各要塞地处边境，属高度军事机密区域，戒备森严，配有军犬的边防巡逻队在设有多道铁刺网的边境线上日夜巡逻，给深入敌后的侦察兵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这些困难并未难倒侦察兵，他们采取风雨天潜入或在潜入沿途撒辣椒面、胡椒粉等刺激味强的物品干扰军犬的嗅觉，或穿倒挂鞋掌的鞋扰乱敌人的视线等各种灵活机智的办法，使敌人难以判断，无法追踪。他们有时在敌人鼻子底下搞侦察，往往一潜伏就是一两天，不仅忍饥挨饿，还要忍受蚊虫的叮咬和潮湿寒冷等恶劣气候的侵袭。为躲避敌人搜捕，侦察队员往往吃不上饭、睡不好觉，在不可避免时只能与敌人遭遇作战。为了侦察到日军要塞等军事情况，有很多抗联侦察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仅1943年夏季南野营派出的侦察人

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就被俘和牺牲20余人。被日军抓捕的抗联侦察人员，都被日本关东军宪兵队作为“苏谍”实行“特别移送”，被送到日军731部队作为活体试验材料残害致死。

1945年7月下旬，根据苏联远东军司令部的命令，国际旅将随同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参加解放东北的战斗。国际旅接到命令后，一方面积极向苏联红军各兵种提供修正后的东北广大地区的道路、桥梁、山川、河流的地理状况及日军的防御设施图等情况，并修正、审核作战地图。另一方面抽调了近300名作战经验丰富、侦察技能高超、心理素质良好的侦察兵，组成了数十个先遣侦察小分队空降到长达1 000多公里、纵深40～45公里的17处日军筑垒区、3道防御线的地域内的8 000个永备工事展开敌后战前侦察活动。先遣侦察小分队每3～5人为一组，用随身携带的发报机或通过信鸽及时把日军战前具体情况向苏军统帅部报告。

先遣侦察分队的战士们都接受过严格的专业军事训练，个个都是优秀的特种兵。他们侦察到的这些重要的军事情报，苏军指挥机关高度重视，在1945年8月9日向日军发起全线攻击前，根据各部队、各兵种在作战中的不同任务，把这些情报连同日军防御工事的地图，分门别类编成手册，发至连以上军官人手一册。远东苏军司令部领导人对抗联的同志说：“感谢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情报，为我们远东军进兵东北起了重大的作用。中国有句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们是在老虎嘴中拔牙式的侦察，得来的情报，既有价值又及时。佩服中国的英雄们，我代表苏联人民感谢你们。”

正是这些凝聚着抗日联军及国际旅侦察员鲜血的情报，为苏联红军确定作战方案、选择进攻路线、在消灭敌人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最终取得战斗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节 配合苏军进攻的先遣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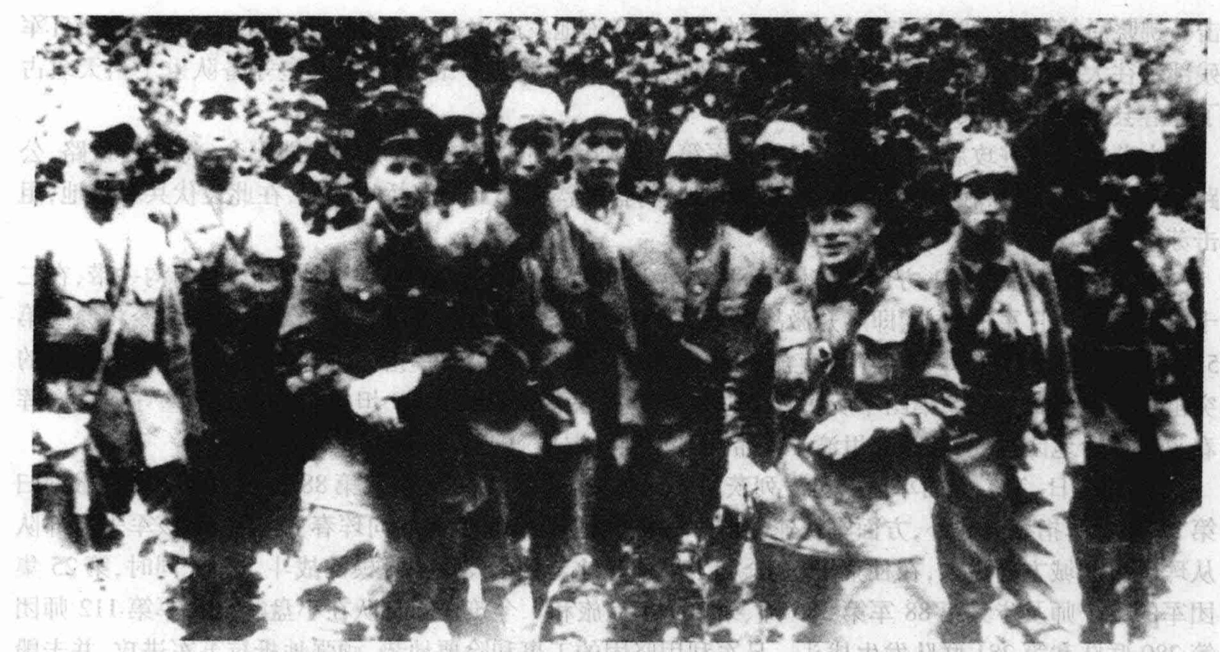
在苏军进军中国东北的同时，东北抗联教导旅配合苏军进攻东北，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在苏军出兵东北的前夕，周保中在教导旅中抽调了340名指战员，作为配合苏军进攻的先遣队，派到苏军中进行统一训练并受其调遣。其中远东第1方面军有160人，第2方面军有80人，后贝加尔方面军有100人，作为苏军前锋部队的向导，这些抗联指战员也就成为了解放东北的尖兵。

苏军进攻东北日军战役开始前或战役打响后，东北抗联教导旅派出300余人参加苏军先遣支队，作为前导实施突击。许多抗联人员被编入特种支队，于7月下旬和8月初由苏联空军飞机空投至东北境内。据不完全统计，由苏军空投到东宁、牡丹江、佳木斯等边境地区的特种支队抗联人员有李明顺、徐雁来、吕英俊、全文益、王立臣、刘子臣等160余人。这些先遣官兵进入东北后，执行敌后穿插，监视敌军动向、用电台指示空军轰炸目标等任务。还有的在当地组织了武装，袭击小股日军，维持社会秩序，配合苏军收复东北。

当苏联红军从三个方向对关东军发起闪电式的攻击战时，这些抗联的英雄们冲在苏军前锋部队的最前面，对日军阵地进行火力侦察，向进攻部队指示行进方向、行军路线及进攻的目标和方位。许多侦察人员甚至还钻进日军的防御阵地，为苏军飞机、大炮指示轰击目标。这些先导部队还和以前派出的各侦察分队一起，积极配合苏军作战，他们在完成侦察任务之后，就寻机袭击敌人，里应外合，扰乱敌后，给苏军正面进攻减少阻力。

东北抗联官兵熟悉东北的山川道路，战役打响后，有一大批抗联人员充当向导，带领苏军大部队进攻。王乃武、陈忠领、王庆云、孙志远、李海青、李树臣、周玉山等抗联战士被调到第2方面军先遣支队担任向导，他们乘坐苏军水陆两用军车引导苏军向饶河、宝清、勃利、富锦、佳木斯、萝北、黑河等地进军。当苏军收复这些地区后，他们有的在当地担任了领导职务。如王乃武担任了佳木斯市卫戍区副司令，陈忠领担任了萝北县卫戍区副司令兼萝北县县长。



抗联88旅先遣支队从苏境返回东北作战时与前来送行的苏军军官合影

还有先遣小分队完成情报侦察任务后，直接深入当地群众，帮助群众恢复一些党的组织和抗日群众团体。季青、陶净非所部50余人，在中东铁路道南地区恢复了当地党组织，并在牡丹江、穆陵、敦化等地开展游击活动，伺机进行敌后的大破坏。如金光侠等抗联战士炸坏了林(口)佳(木斯)铁路数段及军车一列，李中彦小组也成功地炸毁了图(们)牡(丹江)段的数处铁路路基和一座桥梁，使日伪铁路运输经常中断。

著名的抗联英雄于天放，在抗联主力撤入苏境后，他率领的一支小分队，仍一直活跃在北满黑嫩平原上。于天放曾一度被捕后机智地越狱成功。在日本投降前夕，他率领的队伍与王明贵、张瑞麟、王钧、陈雷等所率领的小分队在北安一带会合后，立即组织成一支近1 000人的人民自卫军，在配合苏军解放北安、佳木斯等城镇的战斗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抗联战士王来臣、冯淑艳夫妇，于1943年初奉命潜入穆陵县泉眼河一带做地下工作。苏军发起进攻后，他2人组织发动当地群众缴了伪警察署的枪械，随后打开了一个日军军用仓库，把武器弹药分发给群众，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并袭击了这一带的敌据点，截击日军的交通运输，还曾歼灭缴械一支日军100余人的队伍。随后与苏军在绥芬河胜利会师。

在东北松花江和乌苏里江下游饶河、宝清、同江、富锦等地和黑嫩平原一带坚持抗战的抗联小部队，在苏军进军东北的过程中，也积极配合苏军作战，为最后消灭日军、收复东北作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苏联红军之所以能在极其艰难的地理条件下和极为广阔区域的远东战场上所向披靡，使日本关东军在短时间内就失去了抵抗力，这固然是苏联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战斗的结果，但其中与中国抗日联军的奋斗牺牲所作出的贡献也是分不开的。

第五章　苏军攻克珲春、庙岭、半截河要塞

第一节　苏军攻克珲春要塞

1945年8月9日零时，苏联远东第1方面军第25集团军所属炮兵开始对珲春要塞各阵地进行炮

击。拂晓后，第25集团军步兵随坦克开始向水流峰阵地发起攻击。经激战，歼灭日军100余人，日军残部逃往大肚川方向。远东第1方面军直属第88军第258师一部和1个筑垒守备队也于当天攻占了珲春县境的春化、梨树沟两地。

在苏军发动进攻后，驻守在珲春的日军第112师团长中村次喜藏中将立即下令，将境内铁路、公路和桥梁全部炸毁，在大盘岭沟修筑防御阵地，将盘岭沟口小河公路桥炸塌后，在此设伏兵和阵地，阻击苏军的进攻。

8月10日，苏联第1方面军直属第88军第258师和筑垒守备队前突至杜荒子、西南沟一带，在二十三堤溜地与日军遭遇，随即展开激战。下午5时，第1方面军司令员麦列茨科夫元帅下令将原属第5集团军的步兵第17军和1个坦克旅、1个炮兵旅划归第25集团军指挥，从而加强了第25集团军的突击力量。当天，第25集团军所属2个师及第88军第386师、第209坦克旅和1个筑垒守备队向珲春县境长岭地区进发，在西北甩湾子一带与日军独立混成第132旅发生激战。

8月11日，第1方面军司令员麦列茨科夫元帅又下令将直属的步兵第88军及第209坦克旅划归第25集团军指挥。此外，方面军快速集群——机械化第10军也开始向珲春方向进发，该军先遣部队从珲春大北城方向进入，在杜荒子、金仓和十里坪等地与日军发生小规模的战斗。与此同时，第25集团军的2个师及步兵第88军第386师、第209坦克旅和1个筑垒守备队在小盘岭与日军第112师团第280联队和第281联队发生战斗。日军利用坚固的工事和险要地势，顽强地抵抗苏军进攻，并击毁苏军7辆坦克。战斗进入了胶着状态。

当天，第1方面军司令部向第25集团军下达命令：向西南方向迅速发展进攻，占领汪清、延吉、图们地区，切断日军朝鲜各港口通往中国东北的交通线。

8月12日，步兵第88军第258师和筑垒守备队在二十三堤溜地经与日军3天激战，全歼日军1个联队。战斗结束后，筑垒守备队前往汪清方向，步兵第258师沿太平沟南下，迂回小盘岭侧后，增援在此与日军激战的第386师和第209坦克旅。当天，苏军调来重炮，架设在朝鲜马乳山北侧，对日军小盘岭阵地实施远程轰炸，将阵地内大量工事摧毁。但日军利用炮火无法轰击到的死角工事仍顽强抵抗，使苏军士兵伤亡很大。下午3时，苏军又调来60架轰炸机机参加战斗，轰炸机群与地面炮火密切配合，向日军小盘岭阵地展开了轮番轰炸。与此同时，步兵第258师也迂回到达小盘岭侧后，向日军发起进攻，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苏军几次冲锋均被日军火力击退。

8月13日，日军依托小盘岭阵地有利地势，依然进行殊死抵抗。苏军伤亡惨重，随后苏军集中火力猛烈轰击日军阵地，然后发起冲锋，双方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当晚，苏军炮兵继续向日军阵地进行轰击。

8月14日，苏军继续炮击日军阵地，猛烈的炮击打得日军喘不过气来，甚至无法还击。炮弹雨点般地落下来，许多炮弹相继击毁各种设施和工事，日军被迫撤回地下工事和掩蔽部。午后，苏军步兵经过急冲锋，攻克了日军阵地，日军第112师团长中村次喜藏中将和部分官佐自杀，剩余1 300多名日军投降。随后苏军开进珲春县城。此次战斗，苏军损毁坦克100余辆，伤亡官兵2 000余人。

8月15日，苏军步兵第88军第386师、第258师及第209坦克旅、筑垒守备队沿图们江左岸向图们街推进，在珲春西北10公里的英安河一带，遭到日军第112师团第247联队的疯狂阻击。双方经过一天激战，苏军未能突破日军的防线。随后第88军决定改变部署，以1个师转东北方向，绕过英安河防线，以另1个师和第209坦克旅在古城以南渡过图们江，沿左岸向图们街方向推进。同时，对固守在英安河阵地的日军进行合围歼击。

8月17日，经过3天激战，被苏军重重包围的英安河阵地的日军被迫向苏军缴械投降。

至此，日军苦心经营达7年之久的珲春要塞，在苏联远东第1方面军第25集团军的强大攻势下，只用短短的9天时间就被苏军彻底摧毁了。

第二节　苏军攻克庙岭、半截河要塞

在1945年8月9日零时日苏开战后，驻庙岭、半截河的日军第5军第135师团和第126师团的主力部队按照关东军的命令，先后向牡丹江以东的掖河、穆棱方向撤退，在庙岭、半截河要塞的阵地上只有前沿阵地驻守日军与苏军进行了战斗。

1945年8月8日晚9时左右，数架苏军飞机穿过半截河要塞岩高山阵地（位于平阳镇半截河西约200米处）的上空向平阳镇方向飞去。苏军飞机的出现使驻守在筒子沟监视哨（位于岩高山阵地南8公里处）的日军高岛队长十分惊恐，他立即下令让所有士兵立即进入阵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战斗。筒子沟监视哨是由日军步兵第278联队第2大队第6中队第1小队在筒子沟村建立的，以高岛为队长共49名监视哨兵在此地监视苏军动向。日军士兵在阵地上戒备，到凌晨2时左右，并未发现任何情况，于是高岛就下令解除戒备，让士兵们回营房睡觉，只派一等兵鬼塚一人放哨。

8月9日零时，苏联远东第1方面军红旗第1集团军先遣部队，正冒着大雨和雷电越过中苏边境，分7路穿越森林，从西和西北方向朝密山县推进。

8月9日凌晨4时左右，筒子沟监视哨前一声响动，吸引了鬼塚的目光，他定睛一看，见许多苏军武装士兵正向阵地方向移动，他吓得喘不出气来更不敢出声，片刻才惊魂未定高呼："敌袭、敌袭！"喊声未落就被苏军投来的手榴弹炸死。喊声和爆炸声惊醒了日军其他士兵，他们慌乱地摸起武器进行抵抗。这时的苏军以密集的枪弹和手榴弹向顽抗的日军发射、投掷，并使用了火焰喷射器，将日军依托抵抗的兵营烧成了一片火海。顽固的日军拒不投降，纷纷冲出兵营向苏军冲来。经过近2小时的激战，筒子沟监视哨的日军几乎被全歼，只有几个残兵侥幸逃向第6中队主力防守的岩高山阵地。

与此同时，位于日军川上山阵地前沿的鹰山监视哨阵地也被苏军突破，驻守在监视哨的日军残部退守到川上山阵地，准备在此还击苏军。川上山阵地（也称六十三号阵地）位于岩高山阵地南约12公里处，距半截河阵地约3公里。由日军步兵第278联队第4中队驻守，负责正面12公里宽的警戒和守备任务。共有日军200余人，配备的武器有"九九"式轻机枪2挺，掷弹筒2个，步枪160支。8月9日黎明时分，第4中队长（见习士官）就对士兵做出了战斗部署，加强戒备。川上山主阵地由1个分队守备，主阵地东600米处的辅助阵地由中队长带1小队守备，主阵地东500米处的辅助阵地由2个分队守备，主阵地后方的第二道防线由1个小队守备，主阵地左翼的坦克入口处由2个分队守备。



苏军坦克部队在进攻

8月9日上午，在筒子沟监视哨阵地被苏军占领后，驻守在岩高山阵地的日军第278联队第2大队第6中队主力在中队长的命令下，立即进入了构筑的工事和野战阵地内，准备抗击苏军的进攻。而苏军只派出小股部队向岩高山阵地发起进攻，主力部队已向平阳镇进发。向阵地攻击的苏军在坦克和炮火的掩护下发起猛烈的进攻，日军也凭借坚固的工事进行抵抗。面对苏军坦克的攻击，缺乏对付坦克武器的日军只好组织冲杀队（肉弹）对苏军坦克进行贴身攻击，双方战斗异常激烈，当天苏军未能攻克岩高山阵地。

8月9日下午4时左右，苏联远东第1方面军红旗第1集团军所属部队从正面开始向川上山主阵地的日军发起冲锋。在苏军猛烈的炮火轰击下，阵地内的工事、堑壕及交通壕均遭到了严重损毁。随后，苏军的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向阵地发起集群式的攻击，但日军利用反坦克壕来阻碍坦克的进攻，并利用“肉弹”炸毁苏军的坦克。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苏军的坦克始终无法越过阵地前沿的反坦克壕。战斗持续到日落时分，苏军随即改变了部署，放弃了对川上山阵地的进攻，部队随坦克及装甲车向东北面的半截河方向驶去。阵地上的守备日军暂时得以喘息。

8月10日拂晓，苏军红旗第1集团军所属部队向大顶子山日军抵抗枢纽部发起猛烈的进攻。在实边村的战斗中，苏军第112团筑垒工兵连22岁的上等兵、共青团员瓦西里·科列斯尼克为攻克村后高地上的日军火力支撑点，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实边村位于庙岭要塞的主阵地大顶子山阵地的西南部，日军在村后的无名高地上构筑了坚固的火力支撑点，并在附近埋设了地雷和设置了铁刺网。

在苏军向大顶子山日军抵抗枢纽部发起冲锋的前夜，苏军指挥员派出由瓦西里·科列斯尼克等士兵组成的先遣小组，在日军设置的地雷场和铁刺网中为苏军开辟出一条通道。通道开辟后，苏军于拂晓时分向日军发起了冲锋，日军依靠火力支撑点疯狂抵抗，瓦西里·科列斯尼克也随着散兵线前进，战斗越来越激烈。忽然，日军举起了白旗。指挥员按照团长的命令派出了中尉排长胡桑诺夫和连党小组长萨姆索诺夫上士为军使，向日军阵地走去，当他们刚一接近日军阵地时，日军突然向他们开枪射击。党小组长萨姆索诺夫上士受了致命的重伤，在临牺牲前他要求战友们为他和其他牺牲的战友们报仇。瓦西里·科列斯尼克在党小组长身边听完遗言后，便下定了决心。此时，日军的火力支撑点还在继续吐着火舌。随后瓦西里·科列斯尼克翻身带着集束手榴弹向日军火力点爬去。他动作灵活，准确而快速地接近了日军火力点，他微微抬起身体，将集束手榴弹准确投进了火力点的射击孔内。日军的机枪顿时哑了。但只过了一会，日军机枪又重新扫射起来。这时的瓦西里·科列斯尼克已没有手榴弹了，面对吐着火舌的日军射击孔，他毅然地扑了上去，用胸膛堵住了日军的枪口。此时全连战士们从地上一跃而起，向日军阵地发起冲锋，并最终摧毁了日军设置在这里的火力支撑点。为了表彰这一功绩，瓦西里·科列斯尼克被授予苏联英雄的崇高称号。

8月10日下午5时，驻守在青狐岭庙阵地的日军第1中队受到了在10余辆坦克掩护下的苏军步兵集群式的猛烈进攻。在苏军强大火力和步兵自动武器的打击下，日军坚固的地面工事被猛烈的炮火接连摧毁，守备日军也被苏军步兵的自动武器连连击毙，使日军伤亡惨重。双方经过2个小时的激战，日军被击溃，青狐岭庙阵地被苏军占领，逃离阵地的日军残部三五成群、不成建制地向梨树镇方向逃去。

当天，红旗第1集团军第451团迫击炮兵、第1630团反坦克炮兵，合力支援苏军步兵对庙岭、半截河要塞群阵地展开强攻，并占领了要山监视阵地。下午，苏军第409机枪营从大顶子山和柞木台两阵地侧翼通过，经过巷战占领了二人班镇。

守备在川上山阵地的日军第278联队第4中队的中队长得知以上情况后，下令将营房烧毁，全部士兵进入阵地坚守。同时一等兵大崎船津也跑来传达了花岛大队长在半截河下达的命令，要求各部队死守阵地。

8月11日，苏军步兵在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分多路猛攻半截河要塞阵地，此时的半截河阵地上到处是爆炸的声浪，工事的碎块、残缺的尸体四处飞扬，剧烈的爆炸声震得整个阵地在颤抖。经过苏

军步兵的多次冲锋，苏军终于占领了半截河阵地。

8月12日，岩高山阵地的守备日军经过与苏军3天激战，士兵死伤惨重，粮弹也已耗尽，毫无士气的日军只好放弃了阵地向平阳镇联队驻地败退。此时溃逃的日军如惊弓之鸟，并时有发生两股部队自相残杀的误会，平添了许多伤亡。当历经周折退到平阳镇时，中队长派出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说，联队已经撤退到牡丹江方向，平阳镇已被苏军占领，这股败兵又翻山越岭向八面通方向撤退。

8月17日拂晓，溃不成军的这股日军疲惫地爬上了一座山坡，在晨曦中看到了朦胧中的梨树镇。此时派出的侦察兵将苏军要攻打八面通的情报向中队长作了汇报。中队长听后立即召集这股残兵，高喊要用"肉弹"攻击苏军，不惜生命消灭苏军的口号。他命令士兵隐藏在道路的两侧，士兵们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喘，像死人一样在草地上伏卧着。紧张寂静的气氛中，苏军皮靴踢踏石子和说笑声越来越近，毫无戒备的苏军士兵们或倒背着手或横挎着冲锋枪从日军士兵眼前走过。一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寂静，随着枪声过后一名苏军士兵倒下了。随后隐伏路旁的日军枪声骤起，苏军接二连三地倒下，但随即苏军开始向日军扫射。经过短暂的战斗，苏军以强大的优势几乎全歼了包括中队长和川本见习官在内的这股日军。

密山要塞群被摧毁后，仍有小股日军藏匿在地下工事里，另有一部分逃进山林里，他们组织"特攻队"，袭击苏军后续部队。9月2～3日，苏军经过围捕，将山林里的"特攻队"歼灭。9月5日，日军各小股部队组成150人的"特攻队"偷袭平阳镇苏军卫戍司令部，被就地全歼。

9月12日上午9时，苏军向仍然顽守在川上山阵地的日军发起了全面进攻，将阵地的日军团团包围，苏军动用了大量的火炮和坦克对日军发起强大的攻势，战场上到处烟尘滚滚，弹雨如注。苏军的重炮和迫击炮准确地将阵地内的工事摧毁，步兵的冲锋枪也一起射向顽抗的日军。苏军以武器和兵力的绝对优势将川上山阵地的日军彻底歼灭，占领了该阵地。

第六章　苏军攻克东宁要塞

第一节　苏军的进攻部署

负责突破东宁正面日军防线的是远东第1方面军所属第25集团军、第5集团军步兵第17军、机械化第10军和第106筑垒守备部队等，空军第9集团军负责支援其战斗行动。第25集团军的司令员是契斯佳科夫上将，军事委员是列别杰夫少将，参谋长是佩尼科夫斯基中将。该集团军的主要任务是突破日军的防御。第5集团军主力部队从绥芬河的大石砬子、鸟青山、铁路沟向日军发起进攻，突破要塞防线后，主力沿铁路向牡丹江方向进攻。所属步兵第17军则前突到东宁以北地域与第25集团军会合，并隶属第25集团军指挥，夺取东宁要塞地域。同时以不少于5个步兵师的兵力向汪清、延吉方向发起进攻，向方面军左翼扩大突破口，切断日军撤往朝鲜的退路。机械化第10军从东宁县三岔口正面突破后跟进。用一部分兵力沿绥芬河的左岸向大碱厂(共和乡)方向进攻，消灭防守在二线的日军。

由第106筑垒部队负责东宁要塞的主攻，为了摧毁日军坚固的地下工事和地面工事，特调来独立大威力榴弹炮第223旅、独立特大威力炮第34营和第100营。其中2个大威力炮兵营实施直接瞄准射击，摧毁特别坚固的工事。此外，空军第9集团军出动约2个轰炸航空兵师，对日军要塞和重要的军事目标进行周期性轰炸，配合地面部队作战。在组织进攻之前，苏军根据抗联侦察小分队提供的标有东宁要塞和防线构成、工事结构、位置、火力配备、住所、弹药库、发电厂、飞机场、大小桥梁等具体位置绘成的图纸，分门别类编成手册，发至连以上军官使用，为苏军进攻作战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按照苏军最高统帅部指令，苏军严密地隐蔽战役准备行动，大规模的运兵都是秘密进行的，大型

兵器必须伪装起来,并实行了严格的无线电管制。边境地区尽量保持原样,没有迁走1户居民。直到战役开始前1~2天,军队进入国境线的进攻出发地,仍实行最严格的隐蔽措施:不准车辆行驶,禁止做饭和砍伐树木等。这一切对日军起到了麻痹作用,到战争打响时,日本关东军对远东苏军的兵力部署和作战准备等都模糊不清,一直没有进入临战状态,更没有制定出有针对性的防御计划。

第二节 日军的兵力配置与部署

1945年7月28日,关东军第1国境守备队进行大改编,取消东宁、绥芬河、鹿鸣台3个国境守备队的编制,在原第1国境守备队的基础上,加上新招募的补充兵员,改编成独立混成第132旅团。旅团长鬼武五一少将8月4日才到任。旅团司令部设在东绥,其兵力部署为:

独立步兵第783大队在胜哄山阵地区域组织防御,兵力850人,由原驻守在第1防御区的第570部队改编。

独立步兵第784大队第1中队在南天山和北天山阵地区域组织防御,第2、3、4中队作为旅团的预备队,配备在大城子南沟。共有兵力500人,由原驻守在第2防御区的第299部队改编。

独立步兵第785大队在东绥地区组织防御。所属第1中队56人,中队长真岸少尉,在南北高安村、公主山一带组织防御;第2中队82人,中队长缨井中尉,在团山子、袋山一带组织防御;第3中队72人,中队长川内中尉,在三岔口东门、赤羽山一带组织防御;第4中队82人,队长佐佐木少尉,在承德台一带组织防御。共有兵力510人,由原驻守在第3防御区的第396部队改编。该大队还配有机枪中队和步兵炮小队,大队配备野山炮14门、10厘米榴弹炮16门、中迫击炮22门、15厘米加农炮4门、速射炮6门、掷弹筒16个。

独立步兵第786大队在绥芬河的北岸郭亮船口(庙沟)一带组织防御,共有兵力850人,由原驻守在第4防御区的第777部队改编。

旅团挺身大队驻守在石门子,共有兵力1 115人。主要担当对苏军作战重要的攻击任务。此外还有东宁各地区残留的步兵、炮兵、工兵、通信兵等组成的独立步兵大队、旅团炮兵队、旅团工兵队、旅团通信队、旅团辎重队等,整个旅团兵员定额为6 000人,但实际兵员不足5 000人。

在东宁要塞还保留2个重炮中队。第1中队80人,有24厘米榴弹炮2门,配备在胜哄山阵地;第6中队96人,有30厘米榴弹炮2门,配备在麻达山主阵地上。

第三节 苏军进攻东宁要塞

1945年8月9日零时,苏联航空兵开始对东宁镇和庙沟日军实施空袭,苏军先遣队首先袭击南高安村警备队,前线监视哨日军被全部歼灭。与此同时,关东军第1方面军司令官喜多诚一大将向关东军总司令官发出第一份急电:"东宁、绥芬河正面之敌开始进攻。"而这时的关东军司令部还没有接到大本营关于苏联对日宣战的通告,仍在按要求遵守"北边静谧"方针,对毫无准备的日军守备部队来说实属出其不意。

凌晨3时,日军才正式得到作战命令:"一、苏军从正东方开始进攻;二、各方面军、各军及关东军直辖部队,应各自避免入侵之敌攻击,迅速进入全面开战准备。"此时,日军设在国境前沿的监视哨都受到了苏军的袭击,大部分日军被歼灭。同时,苏步兵第39军主力由法达耶夫卡出发从十八盘南侧南天门等地突入,经万鹿沟占领东宁北侧的日军东大营。拂晓前,苏军的侦察兵奉命秘密接近三岔口,悄悄突入三岔口城门的了望台,并歼灭了日军的哨兵,等苏军侦察兵进入了望台门内的时候,那些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日军已被俘虏,反抗者当场被击毙。随后苏军的汽车、坦克、大炮开进三岔口停在

大街上。被打散的日军士兵只能躲在暗处放冷枪，而且很快就被苏军发现并击毙。当苏军扫清道路沿公路开往东宁的时候天已拂晓。拂晓后，第25集团军在280公里的正面从4个方向向日军防线发起全面攻击。

日军旅团步兵第785大队南高安村监视哨在受到苏军袭击后，立即向第3军司令部作了急报，关东军总参谋长事先基于大本营的意图有了准备，发布了作战命令。132旅团长鬼武五一接到命令后，决定将作战指挥所从东绥转移到第四防御区三角山阵地；石门子旅团挺身大队第3中队336人配置在胜哄山阵地，并隶属第783大队参加对苏作战；步兵1个大队（缺1个中队）、挺身大队（缺1个中队）、炮兵队（缺2个中队）、工兵队的2个小队进驻麻达山及三角山阵地。

9日6时左右苏军开始炮击，最初以郭亮船口阵地为目标，紧接着八家子、泡子沿、东绥官舍都遭到了猛烈的炮击。与此同时，苏军向胜哄山阵地南部、郭亮船口阵地北部的重要支撑点展开进攻，突破了日军的防线。苏军向胜哄山阵地和郭亮船口阵地发射了约2 000发炮弹。8时左右，苏军打到东绥的第一炮就击中了日军东绥旅团司令部官舍的烟囱，炮弹从中间炸开，屋顶被掀起，墙壁被炸塌，从里面冒出滚滚浓烟，但没有人员伤亡。紧接着第二、第三发炮弹在周围爆炸，其军官家属们只好被紧急隐蔽到战斗指挥部据点里，而后旅团长鬼武五一率司令部成员及家属向三角山阵地转移。但是，这时候三角山的一端已被苏军占领，他们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经向第3军司令部请示，中午接到有关死守和转移的命令：命令防守在胜哄山阵地的第783大队、郭亮船口阵地的第786大队、三岔口阵地的第785大队中的1个小队，扼制前来侵袭的苏军，死守胜哄山和郭亮船口两个阵地，并将这些队伍统称东宁支队，任命第四防御区的部队长驹井庄五郎少佐为东宁支队的支队长，负责指挥战斗。其他第784大队、785大队的主力、挺身大队的主力、炮兵、工兵、辎重队随旅团司令部急向第二线阵地大碱厂撤退。

在8月9日的战斗中，苏军对郭亮船口及胜哄山阵地以陆、空优势火力进行重点打击。5时左右苏军大部队从郭亮船口阵地526高地攻入，关东军见习士官高桥命令12名士兵上刺刀，冲出阵地与苏军展开肉搏战，除1人逃脱外，其余全部战死；十多分钟后，驻守在600高地的日军见习官以下16名士兵也全部冲出阵地，与苏军决战，全部战死；驻守东大川阵地的第1中队黑岩伍长指挥的14人多数被打死或失踪，部分生还者退入麻达山阵地；三角山阵地由旅团炮兵2个中队、东宁重炮1个中队及航空监视队守备，在对苏军还击时，让苏军掌握了炮的位置，招致苏军远程加农炮的集中轰击。

此时驻守东绥的是独立步兵第785大队，该大队是由原第1国境守备队第396部队（联队）的炮兵、工兵、挺身队、辎重队、通信队改编的，守备范围是以三岔口为中心，南约10公里到胜哄山，北约6公里到绥芬河的地区，以及麻达山阵地西北的一贯山。大队长柴田常吉大尉，包括4个中队，1个机关炮中队，1个步兵炮小队。8月9日南高安村监视哨被袭击后，按旅团司令部命令："前线各哨不予应战，撤退"。大队转达该命令，同时指挥部队：团子山撤到袋山、东门撤到赤羽、北高安村撤到公主山各阵地进行守备。而在麻达山西北约6公里的一贯山阵地，由于苏军的突然进攻，守军22人只逃出2人，其余全部战死。东门监视哨在受到苏军攻击后没有人员伤亡，自己将营房烧毁后撤退。团子山没有受到苏军的直接攻击，但因炮弹密集无法行动，到傍晚才到达袋山。午后代理大队长川内接到命令："第785大队留1个小队在高安村第21号阵地，主力到金鸟山（东宁西约12公里）附近阵地，掩护各部队向大碱厂撤退。"在金鸟山，动员报国农场的车辆、马匹往据点里运送弹药，准备掩护其他部队撤退。

驻守在大城子南沟的独立步兵第784大队是由第1国境守备队第二地区队（第299部队）改编而成的，改编前驻守在郭亮船口北方的南天山。该部队1945年7月28日改编后，在南天山阵地留1个中队，大队主力移驻大城子南沟。大队长大森寅大尉，兵员500人，包括4个中队，1个机关枪中队，步兵炮1个小队，守备着麻达山北方的第二地区。三岔口北约25公里的要山、监军台、南天山、眼镜山一带的阵地。此时也面临着灭顶之灾；8月9日晨，南天山及其南北各阵地同时受到苏军攻击，前线各监视哨几乎瞬间全被消灭。该大队开始还在与苏军的攻势进行抵抗，随着天亮，苏军的战车在重

炮的掩护下直冲阵地，日军多人战死、失踪。早上7时接到主力转移的命令。这时第4中队已到达三角山顶，他们没有贯彻转移的命令，而是与大队分道扬镳了。

此时，苏军的作战思想非常明确，为了减少伤亡，其主力部队开始并没有在正面进攻郭亮船口阵地日军，而是选择主阵地的北侧东大川为突破口，首先消灭了日军主阵地外围526高地、600高地和一贯山阵地小股日军，然后迂回到日军主阵地的西侧，占领有利地形，形成了东西合围郭亮船口阵地日军的态势。

9日下午2时，日军前方观察哨发现武勇阵地前方100米的地方苏军正在组织进攻。武勇阵地在409高地北侧，日军没有想到这个易守难攻的阵地会如此之快的被苏军突破。武勇阵地的前方是一个急陡坡，苏军利用这个被日军忽略的地方组织进攻，攀岩石而上，占领了有利地形。阵地指挥部立即发出了向苏军攻击的命令。日军准尉带领几名士兵冲出阵地，沿右侧的堑壕行进，刚走到观察哨前，就被苏军全部消灭。



苏军在坦克掩护下发起冲锋

旅团长鬼武五一向下传达了撤退的命令后，于8月10日清晨急率指挥部从三角山来到东宁街。这时其他部队已在此集结完毕，由满铁提供的63辆卡车排成两队，待命而发。有30辆卡车装满弹药，2门10厘米榴弹炮也由卡车牵引驶向大碱厂。日军的主力后续部队到达东宁北河沿时，苏军已经进攻至万鹿沟。苏军战车奋勇追击撤退的日军，使正在撤退的日军部队受到重创。其后苏军的飞机跟踪日军的大部队进行扫射，日军的部队只能边行军边躲藏边战斗，行军速度非常缓慢。中午后，日军集结在大碱厂沟(今和平村)西北的狭路上进行休息。而此时东绥守备队及第785大队正在东宁以南的高地上等待夜晚再出发，目的是减少伤亡。



苏军在坦克掩护下发起冲锋

8月10日清晨,苏军集中炮火轰炸秩父阵地和武勇阵地。在优势炮火的打击下,秩父防御阵地(由总部、第1、第2中队守卫)的南翼一角被苏军占领,双方在阵地里展开了白刃战。第1中队与苏军反复展开争夺战,主力全部战死;北翼的第2中队地下阵地也被苏军攻入。日军在秩父和武勇阵地上损失惨重,已无力继续抵抗下去,队长驹井无奈之中决定放弃郭亮船口,残部趁夜间撤退到麻达山阵地地下工事中。

8月10日,日军第784大队主力大部分从要山、监军台、南天山及眼镜山撤退后,只有在北天山的田口少尉等90余人在坚守阵地。在苏军的再次猛攻下,一度突破防线,经激战苏军撤回。

8月10日17时,苏联第5集团军步兵第17军奉命归第25集团军指挥,两个军的主力向老黑山进攻,留1个筑垒守备队,1个炮兵旅,2个独立炮兵营,在2个轰炸航空兵师的火力支援下,围攻东宁要塞地域。随后机械化第10军由三岔口突入东宁,而后机械化第10军尾随第17、39军,沿一条公路进入老黑山地区。在万宝湾南侧兵分两路,第17军和机械化第10军沿七十二道顶子、罗子沟、大兴沟向汪清进攻。

8月11日拂晓,日军第132旅团辎重队在沙洞附近受到苏军的攻击。中午前后,主力集结在道河附近。午后苏军坦克追击而至,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日军的步兵大队和挺身大队损失严重。苏军的坦克也有4辆被击毁。当晚旅团长鬼武五一率旅团继续向大碱厂方向撤退。

与此同时,马厂山阵地、勾玉阵地、日军的兵营和重炮中队已陷入苏军的包围之中。从勾玉阵地山顶往下看,东宁街道上挤满了苏军的坦克、军用卡车等,正隆隆地长驱直入。苏军猛烈的炮火使山顶变了形状。炮火过后苏军开始进攻。苏军的主攻部队距离勾玉阵地只有300米,日军的指挥官虽然下达了用掷弹筒射击的命令,但是士兵到处找不到弹药。苏军越逼越近,日军指挥官命令靠近了再打,到双方只有100米距离时,日军指挥官下达猛烈射击的命令,冲锋在前的苏军一个个倒下,后边的苏军组织反击,双方形成了对射,日军也有数十人死亡,并有很多负伤者。为了减少伤亡,苏军不得不撤出战斗。

8月11日,留守在北天山阵地的第784大队田口少尉部队等90余人再次遭到苏军的猛烈炮火轰击。经反复攻击,苏军再次突破防线,激战中田口少尉负伤。晚上8时左右,日军冲出阵地与苏军展开肉搏战,结果全军覆没。同时从要山和南天山逃出的日军也在这次战斗中被歼灭。第784大队主力在转移时受到苏军飞机的轰炸,造成了极大混乱,延迟了转移时间,在东宁西约1公里处的绥芬河岸,与有4辆坦克、10多门迫击炮的苏军部队遭遇,因及时隐蔽在山中和河岸的树丛中,人员未受到损失。

同日,日军第785大队主力在转移到绥芬河大桥边整修时突遭苏军坦克袭击,日军用机关枪、手榴弹应战,但丝毫奈何不了在厚厚装甲里的苏军。第1中队派出攻击队仍没有成效,日军逃到山里、河里,被苏军机枪扫射,损失惨重。报国农场运输队也被击溃,伤亡很大。14日残兵败将才到达大碱厂。18日停战,22日解除武装。

日军第784大队主力在转移到东宁西约15公里处的洞庭附近时,又遭遇到拥有坦克50辆、炮兵1个大队、汽车数十辆的苏军大部队,因及时躲避到山顶上,才未受损。8月16日到达大碱厂,19日被解除武装。

被收容在郭亮船口阵地的镜丘弹药库里的妇女、伤病员、东宁义勇队训练所的练习生、职员及家属等约60人集体自杀。只有1名训练生生还。夜晚时分三角山阵地被苏军攻占。

地下工事里的日军各部队在进行着最后的挣扎,他们不断组织突击队、敢死队,但在苏军的机枪、大炮的打击下无济于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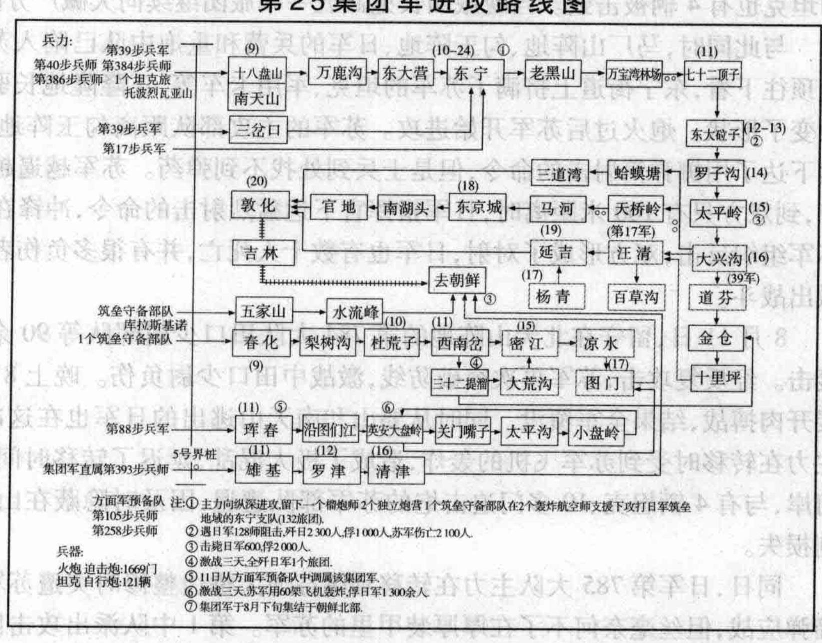
8月12日,麻达山顶阵地被苏军炮火破坏,混凝土露了出来,已经登到半山腰的苏军在大炮的掩护下正缩小包围圈,逐渐逼近。日军寡不敌众,午后麻达山顶被苏军占领。其他日军部队也受到夹击,面临绝境。

麻达山阵地右支点的是第2中队。因地下工事的铁门被苏军放射的火焰弹烧毁,只好退向中支点,而退守这里的第3中队也只剩下30人;左支点上有第1、4中队和挺身队,在受到猛烈攻击后,第4中队全部出逃。第1中队在已被突破的阵地里拼死抵抗,最后全军覆没;麻达山阵地的中支点由总部、桥本炮兵小队、机关枪中队的主力、大队炮兵小队、东宁重炮联队第6中队组成,最初没有受到直接打击,后在协助第3中队和东宁重炮联队第6中队作战中损失严重。第3中队长中尾中尉受了重伤,在医务室里指挥作战。重炮联队第6中队的定光中尉因阵地外的重炮被破坏,进入阵地内,在指挥南翼阵地的激战中,遭受苏军迫击炮打击,同部下10名士兵一起战死。此后又进行了一些小战斗,日军不断增加伤亡。

8月11~12日,苏军在七十二道顶子和东大石砬子与日军经过两天激战,共歼俘日军2 300人(其中俘虏日军1名少将及以下1 000人);苏军伤亡2 100多人。

8月13日,日军在作最后的挣扎,日军冲出阵地与苏军展开肉搏,日军反复冲击苏军部队,苏军用手榴弹或冲锋枪应战,从山坡上的单人掩体到山顶的堑壕,布满了双方的尸体。有的双双倒在地上,刺刀还插在对方的胸膛里。双方损失巨大。此时的日军各中队已被苏军分割,失去了联络,只能各自为战。

第25集团军进攻路线图



8月14~15日,苏军继续对麻达山阵地进行炮击,此时阵地能够进行战斗的日军士兵已经寥寥无几,伤兵多数自爆,幸存者向大碱厂方向逃亡。

8月14日,苏军进至罗子沟,15日在太平岭与日军激战,歼日军600余人,俘虏2 000人。

8月16日,第四地区各阵地事实上已全部被苏军占领。面对残局,驹井大队长命令"因难以继续进行有组织的战斗,各队各自为战进行转移"。此时的日军大部被消灭,只有少数残兵躲在地下工事深处,面对满山的苏军,日军只能趁着夜色出逃,跑出去的日军又受到炮击,死伤不少,也有跑进山林里失踪的。战斗的最后结果是第786大队第1中队伊藤等在苏军总攻后逃出。第2中队中尾在马厂山自尽,第3中队则全军覆没。第4中队黑田德次郎逃出后在9月15日向苏军投降。从第四地区逃出的日军士兵只有数十人。生存者于9月2日在东宁附近被解除武装。

8月24日,在后马厂附近,独立混成第132旅团长鬼武五一和参谋长被苏军抓获,收容在东京城,9月12日经绥芬河押送到苏联。

第四节 日军的覆灭

胜哄山阵地被关东军称之为最优秀最坚固的阵地,阵地的内部设施非常齐全,仅地下工事就可容纳1 000多人。

8月9日凌晨，胜哄山阵地指挥部接到苏军开始进攻、北部南高安村已经开始交战的情报后，立即进行紧急动员，全员进入战备状态，指挥部设在胜哄山阵地第三入口内。就在如此紧急的时刻，阵地与驻东绥的第132旅团司令部的无线电联系突然中断，使整个阵地陷入极度的困境。

8月9日零时，南高安村监视哨受到苏军急袭，拂晓时分，苏军从苏境的“扶桑台”、“扬赫扎”后方阵地同时向胜哄山阵地进行炮击。爆炸声越来越响，并带着红色的火光和漆黑的硝烟，爆炸的巨响震耳欲聋，几乎听不到别的声音。接着就是呈雁形队的飞机群，大约有30架，分成3个队，从胜哄山阵地飞过，在东宁、狼洞沟等地进行轰炸。白天苏军的大炮不停地向胜哄山阵地及周围阵地轰击，只有到晚间日军才敢走出地下工事清理战场。傍晚驻守在石门子的旅团挺身大队，由提温中尉率336名官兵进入胜哄山阵地，给气氛紧张的阵地带来新的兵力，使这里的守军一时士气大增。

当天夜间，苏军约30名侦察小分队员利用大雾潜入278高地。10日早晨，被西胜哄山的监视兵发现后，立即集中火力进行打击，苏军的侦察小分队受到突然袭击，措手不及，伤亡惨重。驻有9名日军的290高地侦察哨，在苏军的攻击下，于10日早上撤退到出丸山阵地。

8月10日，第783大队指挥部从早上用无线电向司令部进行联系也都没有应答，接着向东绥司令部、第三地区司令部、三角山等联系都没有应答。此时，大队指挥部预感到整个形势的严峻，决定派饭田等3人去总司令部联络，旅团司令部设在缸窑沟，当3人穿过苏军的几道封锁线到达缸窑沟时，发现这里已被苏军占领。

苏军设在苏联境内扶桑台山背坡上的火炮阵地，从胜哄山阵地上根本看不到，此时的日军阵地上的重武器只有24厘米榴弹炮2门、山炮1门、迫击炮5门。对于苏军的炮火没有一点还手之力。8月11日，苏军的炮兵部队继续向日军各阵地反复炮击，直到晚上才停止。

8月12日，当晨雾消失后，苏军炮火再次向胜哄山阵地进行猛烈的轰击。在三岔口的正面，苏军的坦克、自行火炮、军用卡车群成纵队向东宁方向开去。此前，日军对三岔口通往东宁的桥梁和公路已作了爆破的准备，但在苏军炮火的轰击下，爆破计划未能实行。苏军机械化部队从三岔口方向长驱直入，到东宁街里后，各主力部队稍加休整之后向老黑山和道河方向进发，追击日军的主力部队。

从8月12日起，苏军的炮击越发猛烈起来，躲在地下工事的日军在苏军强大的炮火下毫无办法，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胜哄山阵地在晚间日军全体集合，各个划分任务，部队长斋藤决定放弃兵营，利用夜晚时间将营房里的物品全部搬进地下工事。将营房放火烧毁，并将63匹军马全部杀掉。

8月13日，从早晨开始，苏军继续向日军阵地炮击。但是唯独没有触及出丸阵地，这个阵地也一直没有动静，苏军以为这是日军已经放弃的阵地。出丸阵地只有50余名日军在那里防守，因为人少，他们都龟缩在地下工事里面观察动静，没有暴露目标。出丸阵地也是一个秘密地下军事工事，在“关特演”时有500名官兵在这里防守。该阵地的地面火炮阵地和十几个碉堡都与地下工事连通一体。过了中午，山头的步哨向指挥官紧急报告情况：“大约500名苏军从北侧已经登上了山顶，正朝着出丸阵地方向奔来。”日军指挥官命令立即做好战斗准备。从作战人数和装备上看，苏军是500人，日军是50人，苏军的武器多是自动步枪，而日军的武器多是三八式步枪。但是苏军并不知道这里地下还隐藏着日军。当苏军靠近日军的火力点仅10米时，日军指挥官下达了射击命令，走在前面的苏军士兵成片地倒下，走在后面的士兵奋力还击，但是无济于事，苏军指挥员不得不命令撤出战斗。日军像是杀红了眼，对正在撤退的苏军士兵也不放过，等苏军完全撤出战斗后，兵员已经损失一大半。为了尽快拿下这个阵地，苏军重新制定了作战计划，以优势的兵力在傍晚向出丸阵地发起了总攻。强击组交替掩护前进，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日军终因寡不敌众，撤向胜哄山阵地。出丸阵地被占领后，苏军在出丸阵地山顶及290高地快速构筑了数十门大口径炮兵阵地，与从苏境掩护炮击相呼应，向第一地区队阵地进行炮击。

8月14日6时，胜哄山以南的荣山阵地前方约1 000米的反坦克壕附近，苏军集结了1个营的兵

力，成战斗队形向荣山阵地逼近。胜哄山阵地的日军指挥官接到报告后下达了最严厉的命令："在没有下达射击命令之前，绝对不准射击。"苏军的部队已经接近了荣山阵地的前沿，而射击的命令还没有下达。正在此时，日军炮兵队的一发迫击弹打到了苏军的阵营中，在炮弹爆炸的同时，荣山阵地的指挥官下达了命令："射击！射击！"日军依托有利的作战工事，每个士兵都在拼命的射击，苏军损失了近500人。随后苏军停止攻击荣山阵地。当晚通信班的军曹在收音机旁听到这样一条消息："明天中午12点有重要的无线电广播，大日本帝国臣民，无论国内国外都要接听。"胜哄山阵地的战斗指挥所与旅团司令部、东宁支队失去了联系，对其他地区的战斗状况也不清楚，明天中午的重要广播究竟是什么内容，谁也预料不到。大多数日军判断可能是大日本帝国向臣民发出不惜牺牲、奋战到底的重大命令。

8月15日，天刚亮，苏军的炮弹就已倾泻到胜哄山的阵地上，苏军的轰炸机也不停地向各个阵地投下了大量的炸弹，使日军只能躲藏在地下工事中，不敢露头。苏军的坦克群在胜哄山的北侧，大摇大摆地集结。为保存实力，日军指挥官对炮兵队已经下达了死命令，严禁射击。由东宁重炮联队分配来的大野中尉连日来受到苏军的炮击终于忍无可忍，不等大队长下令，就将24厘米榴弹炮发射了，命中苏境扶桑台南部101炮兵阵地，同时暴露了自己重炮的位置，苏军的炮口摇向日军的炮阵地，给予毁灭性的打击。一时间炮弹就像雨点一样落到了胜哄山阵地上，各阵地的日军伤亡严重。战斗指挥部被炸，在地下工事里的日军有的缺氧而窒息死亡。中午，苏军又一次集中火炮和飞机轮番轰炸，地面机枪手也一同扫射，使阵地上面的日军官兵无一幸免。中午12时，阵地的无线电队从无线电广播中收到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三田曹长和作战部长井手永中尉听到广播后，怀疑这是苏军的策反阴谋，决定封锁这一消息，没有向部队长斋藤报告，他们知道斋藤对战争的前景比较悲观，曾经几次说过"战争不能长期继续，马上就要结束"的话。

8月16日，苏军攻占了荣山阵地。日军在胜哄山主阵地利用新型15厘米中迫击炮击退了苏军的一次进攻，鼓舞了日军的士气。但同时，胜哄山指挥所所在的第三入口处被苏军30厘米榴弹炮击中，炸透了3米厚的岩石，将工事炸了一个大坑，而且炮弹落在附近的发电所，炸毁了发电设备使阵地全部停电。晚上，日军组织了数个敢死队，偷袭苏军的炮兵阵地，使苏军的很多炮兵都牺牲在炮位上，造成很大的损失。

8月17日，苏军炮火依然十分猛烈。近中午时，胜哄山战斗指挥所被投入毒气弹，部队长等人均中毒，经紧急抢救，才将部队长救过来，这一天是胜哄山战役中日军伤亡最多的一天。提温中尉建议组织敢死队，有计划地到出丸阵地破坏苏军的炮火进攻。每天夜里派出几个由4~5名士兵组成的小组，携带炸药、手榴弹及2天的食物，到出丸阵地进行破坏。因日军对地形比较熟悉，所以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大多数士兵都能够平安回来。傍晚，1名苏联士兵在中国人张福忠的带领下，来到胜哄山阵地送劝降书，结果苏联士兵遭到射杀，张福忠逃脱。信是用日、俄、中、英四种文字写的："贵军也能够在无线电广播中收听到，日本天皇通过无线电广播已下发停战命令了，关东军业已投降。为什么贵军违背，不遵守天皇的命令？甚至还一直违背关东军的命令，仍在继续战斗？假如贵军进行战斗，我方也继续作战。如果响应停战，那么在明天早9点派遣将校军官1名，士兵2名，作为军使到第三渡河点。"

看到军使拿来的这封信件，部队长召集部下进行分析，是真还是假，现在谁也说不明白。他们判定8月15日重要广播将成为事实，或许那个重要广播就是天皇对军队下达的停战命令，但又不太理解。他们开始怀疑苏军为什么使用中国人充当军使，如果关东军投降，上级应对各个部队下达命令，现在一个上级的命令也没接到，最后认定这是苏军的阴谋。

8月18日，苏军指挥官从早晨9时一直等到了中午，认为日军指挥官不派出军使就意味着继续再战。中午刚过，苏军在290高地的炮兵开始向胜哄山阵地进行猛烈的报复性炮击。日军也不甘示弱，组织了18人的敢死队，由见习士官带领，破坏苏军的炮阵地。半夜时分敢死队摸上了山顶，在接近炮阵地时被苏军的哨兵发现，山顶响起了数枚手榴弹的爆炸声，不一会儿山顶就平静下来，日军敢

死队被全部消灭。

8 月 19 日清晨，苏军继续猛烈地炮击胜哄山阵地，晚上，日军又组织了数个敢死队。吸取了上次被全歼的教训，改变了战术，使苏军的炮阵地遭到了严重破坏，敢死队安全地返回了胜哄山阵地。

从战役开始 10 余天来，胜哄山阵地的日军与其他部队全无联系，胜哄山阵地完全被孤立了。他们每天向司令部发电报，无线电波又会引起苏军的注意，成为炮击的目标。前次派人联系的结果，只知道司令部已经撤退到后方，但为了日后的战斗，必须与司令部联系。日军指挥官们经再三研究决定，又派熟悉情况的渡边彦男曹长带 3 天的粮食和武器到三角山和郭亮船口阵地进行联系。

8 月 20 日，苏军白天的炮击减少，夜间激烈起来。或许苏军知道日军在夜间进行阵地加固，或许是苏军白天测准方位晚上袭击。而日军只能利用苏军轰炸的间隙进行加固。与此同时，挺身大队第 3 小队的 24 人多次攻击被苏军占领的出丸阵地，但遭到苏军的强烈反击，结果战死 15 人，生还 9 人。第 783 大队第 1 小队也派出数组突击队，攻击荣山阵地南部的军舰山苏军大部队营房，当场战死 3 人，但因是在夜间偷袭，给苏军造成一定程度的恐慌。

8 月 21 日拂晓前，苏军在胜哄山西南的军舰山上构筑炮兵阵地，如果这个炮阵地构筑完毕，对胜哄山阵地将形成三面炮火封锁的态势，地下工事中的日军就形同瓮中之鳖。日军为破坏这个还没有建成的炮阵地，又派出 9 名敢死队员，分成了 3 个组，从中午开始，在茂密的草丛和灌木丛的掩护下匍匐前进，到夜幕降临时接近了炮阵地，苏军没有想到日军会在白天摸上来，日军的 9 名敢死队员同时动作，苏军的炮阵地遭到严重的破坏。

8 月 22 日，苏军为了报复日军敢死队员的袭击，从清晨开始，把炮火又指向了胜哄山，炮弹像雨点一样落到阵地上，日军只能躲避在坑道里不敢露头。这天晚上，一身泥土的渡边赶回报告情况：旅团司令部已经撤退，不知去向；第四区（庙沟）的官兵已经全部战死，阵地已被苏军占领；132 旅团只有我们还在胜哄山阵地坚持战斗。

8 月 23～25 日，苏军一直进行炮击，炮弹像雨点似的一个接一个，爆炸声响成一片，巨大的气浪吹得日军只能紧紧地趴在地面上。大炮轰击之后，就是飞机的轰炸。胜哄山阵地久攻不克，日军拒不投降。

8 月 24 日，苏军为了尽早结束胜哄山战斗，减少伤亡，决定在间岛的日军战俘营里，找一个熟悉胜哄山阵地的军官前来传达关东军有关投降的命令，敦促日军尽快投降。由已被解除武装的第 3 军司令部后勤参谋河野贞夫中佐到胜哄山阵地传达投降命令。

河野中佐在停战的当时是间岛兵站基地的指挥官，此前曾在东宁地区服役，知晓第 1 国境守备队的情况，也是日军的高级军官。

8 月 25 日早晨，按照约定时间，苏军的特鲁宾大尉乘汽车来到间岛收容所接河野中佐。在间岛飞机场，特鲁宾大尉和河野中佐分乘两架战斗机前往。上午 10 时出发，沿间岛至东宁的铁路线北上。中午 12 时到达胜哄山阵地以东苏联境内“诺欧保”军用机场。下了飞机就能听到东宁一带的群山里不断传来密集的炮声。

午饭后，他们坐车离开了“诺欧保”小镇，经过绥芬河向三岔口方向的中苏边界驶去。当汽车行驶到三岔口盆地约 2 公里的地方时，遇到了从战场上下来的一辆小汽车，车上坐的是攻击胜哄山阵地作战的苏军少将师长，他来到河野中佐面前高声喊道：“为什么胜哄山阵地的指挥官斋藤不听朝廷皇帝的命令，还在继续战斗呢？我们派出的军使也被他们枪杀了，不回答也不回信！”

河野中佐：“由于贵军猛烈的炮击，我想胜哄山阵地的通信设备恐怕被破坏了，朝廷皇室的命令无法听到，所以皇室的停战命令就得我前去传达，除了我去传达之外，没有任何好的办法。师长阁下，我请求下命令停止炮击，这一点如不能得到实现，是保证不了明天停战的呀！请马上停止炮击吧！”

苏军少将师长说：“好吧！让炮击停止，但日军也要立即停止战斗！”

河野中佐说：“日军停止战斗，是我到胜哄山阵地之后才能解决的问题，在此之前是没有任何好办法的！”

苏军少将师长："日军在每天晚间用手榴弹和带着军刺的步枪杀进我军阵地，我军已经损失了一个大队以上的兵力。苏军用四五天的时间已把东北全境平定下来，先头部队已进击到朝鲜的中央核心地带，我们这个师只是在苏'满'国境进攻后，一步也没能得到前进。苏军的上层领导对我们这个师进行了严厉的叱责。"

河野中佐："我不知说什么才能使你们得到安慰，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说对不起外，我再也没有适当语言可说了。"

当天晚上苏军停止了炮击，但立即让河野中佐去胜哄山阵地是危险的，晚上河野住在了苏军的军官宿舍里。为了防止日军敢死队前来偷袭，保护河野的安全，苏军派出1个连的兵力层层警戒。

8月26日上午9时，苏少将师长和特鲁宾大尉陪同河野中佐一同前往，车行进到军舰山下一个三岔路口的地方停下来。苏少将师长下车后对河野中佐作了如下指示：

1. 在阵地中央，从苏军阵地能一目了然的地方，中午悬挂起白旗。

2. 排成五列纵队，走出阵地之外。出阵地的顺序按伤员、苏军俘虏、非战斗人员、军官、下士官、士兵、军属的顺序排列而行。

3. 走出阵地的官兵，停止在地区北门的路上。

4. 武器要集中在北门的一处，交付给苏军。

5. 阵地内的各项设备不准破坏，原封不动地保留。

河野中佐在间岛出发时就准备了参谋肩章，他认为，为了劝导顽固抵抗的胜哄山阵地的官兵，佩戴参谋肩章是必要的。他扛着已准备好的白旗，只身一人朝胜哄神社方向的山上走去。不一会就登上了往左拐的山道。河野逐渐接近阵地来到分哨。哨兵并不知道他是来劝降的使者，认为在前沿阵地上不应该有这样大的日军军官出现，怀疑河野是朝鲜人或中国人的便衣，端着枪作出一个刺杀动作，正在这时，阵地上担任分哨长的伍长大声喊道："等一下！"

河野中佐被带到分哨长的阵地后，被怀疑是苏军的密探，河野马上拿出第3军的文件让他们看，并说服和劝导他们。可无论河野怎么说，阵地上的日军全都不相信。他们认为，这里是关东军的最前线阵地，我们还没有被打败，而后方是不应该投降的。河野中佐据理力争，左右解释。周围的人对他百般挑剔，硬说他是苏军派来的密探，此时第3中队长出光中尉向各处通电话，询问有谁认识和了解第3军河野中佐？从阵地深处有个叫柳田的主计少尉说认识河野中佐。出光中尉命令他前来认证。柳田少尉来到阵地的坑道口，分开围观的官兵，跑到河野中佐的面前，看了一眼说："没有错，是第3军的河野中佐！"

河野中佐的身份被确认后，又恢复了帝国军人的威风，抖了一下军装，毫无拘束、毫不客气地向地下工事里的战斗指挥所走去。河野中佐来到斋藤部队长的面前，两个人沉默无言地握了手。河野中佐说："战争结束了。在8月15日这个日子里，天皇陛下，大日本帝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颁布诏书。8月6日美国在广岛、9日在长崎投下了新型炸弹，陛下唯恐日本臣民遭灭亡，在难以忍耐的情况下无条件投降，这是天皇对我们特大的关怀。关东军都停止战斗了。对苏军来说，关东军直到现在仍然继续作战的部队，那就是这个胜哄山阵地，这是可以理解的。要派遣熟悉胜哄山阵地和环境的军官，令你们立即停止战争，是因有严格的命令。由于我了解胜哄山阵地情况，于是就派我来到这里。"

他继续说："开战以来，你们干得很好，值得感谢。但是战争既已结束，现在只有你们努力作战也不行，请诸位忍泪尽早停止战斗，其他部队都解除了武装，正向后方集结。先尽快让全体官兵撤出阵地下山，等苏军司令官来时解除武装。选2名熟悉地形的人把白旗插到人人都能看到的地方。虽然现在苏军还有少量的炮击，但你们打出白旗，炮击就会立即停止。"

河野中佐介绍完情况后，手拿着命令和文件，开始宣读起来。在宣读中，河野的声音渐渐的低沉，嗓子变得嘶哑起来。斋藤部队长悲痛地低下头，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指挥所里的官兵虽保持立正姿态，但也在不停地擦着眼泪。地下指挥所里的哭声和抽泣声响成一片。

听完河野宣读命令后，部队长斋藤立即命令："快速挂出白旗，与各阵地电话联系，全体官兵务必在中午到石门子分哨集合。"

此刻，早上一直安静的战场突然又开炮了，炮弹不时落在胜哄山阵地上，日军用两块敷布缝和成2米见方的大白布，绑到白桦木杆上制成白旗，当白旗从地下工事的出口伸出去后，不到5分钟，炮声就停了。

白旗竖在了胜哄山这个被夸耀为东"满"国境最优秀的阵地最高处。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那里曾是日本皇室三笠宫亲王来视察时站过的地方。

一些分队长和老兵，喊叫着干脆全部战死，也有的主张自杀。敢死队队长筒井中尉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情况，高声叫道："战争结束了，关东军毁灭了，我们干脆全军战死。现在投降，对那些溃散的战友和杀入敌阵死亡的战友怎么交代?"斋藤部队长把嗓门提高到最大的程度："服从命令，全体官兵立即撤离阵地，到地区队北侧集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各中队长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的阵地里传达命令去了。

中午，地下工事的日军像土窝里的蚂蚁一样纷纷地钻出洞穴，他们来到地区队的北侧，在指定地点站成五列纵队。斋藤部队长站在官兵面前，把部队从头到尾环视了一遍，然后拔出军刀，向全体官兵下达了口令："着剑！皇宫遥拜！举枪！"军人将步枪双手举起，纵立胸前，这是日本军人的最高礼节。部队长在下达口令的同时，水田曹长将天皇的诏书和神社的神体扔到火里。整个部队动作一致，放下了手中武器，摘下了头上钢盔，清点人数后，正式交给了苏军。在这之后，一切都按照苏军的要求行事了。

胜哄山阵地的战斗，日军战斗全员1 200多人，投降者901人，战死、失踪者300多人。苏军在这次战斗中付出很大的代价，牺牲了1个大队以上的兵力。

在攻克东宁要塞的战役中，苏军第384部队第567分队7连下士阿列克谢·费尔索夫多次不怕牺牲建立功勋，阿列克谢·马特洛索夫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永备发射孔，为完成任务争取时间提供了条件。在夺取东宁城市的战役中，老阿力耶夫勇敢顽强地活捉12个日军俘虏。中尉共青团书记耶甫列莫夫1人冲入日军驻地，消灭日军35名官兵并缴获武器。克罗斯顿士兵雷亚克和4名自动步枪手摸进日军指挥所，夺取哨兵岗，用手榴弹消灭6个永备发射点和土木发射点，拆毁敌人3个检查站，这次共消灭日军官兵200余人。

至此，围攻东宁要塞地域的苏军部队经半个月之久才逐个攻克东宁要塞，共消灭日军2 000人，俘虏1 000多人。

第七章 苏军攻克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要塞

第一节　苏军的进攻部署

在绥芬河、观月台、鹿鸣台要塞正面，远东第1方面军部署第5集团军担当突破绥芬河、观月台、鹿鸣台要塞防线的作战任务。1945年7月，第5集团军从东普鲁士对德战场秘密转运到远东，部署在乌苏里距边境100～120公里一线，同月25日，又秘密移驻距边境15～20公里各出击地带潜伏待命。这是一支由克雷洛夫上将指挥的精锐部队，是诸兵种合成的集团军，有10个步兵师，3 509门火炮和迫击炮，72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计划正面进攻地带65公里，其中鹿鸣台、绥芬河、观月台正面45公里。在主要突击地带，每公里正面坦克和自行火炮最大密度达40辆，火炮和迫击炮达260门，炮火准备持续时间4小时20分钟。

远东第1方面军第5集团军共4个军，部署在绥芬河正面，苏境纵深20～30公里的多格瓦亚山、杜霍夫斯卡亚、格罗捷阔沃地域。按区域突击方案，分别从绥芬河北部观月台要塞阵地正面即沃勒恩斯基山、龙王庙（大日山东北）、绥芬河要塞阵地的别勒洼（铁路沟）和南部的鹿鸣台要塞北天山、十八盘山峡谷地带向关东军要塞防线实施突击，计划利用两昼夜时间，推进纵深20～25公里。

绥芬河要塞正面12公里，苏军第72军负责从绥芬河正面突击。具体准备执行突击任务的是第187师先遣营和工程兵第20旅。主要突破口选择在格罗捷阔沃正西部，即被日军长期封锁的铁路沟（别勒洼）。预定在10日拂晓前为第5集团军主力和后续主力部队第25集团军打开通往汪清、牡丹江方向的通道。

第二节 日军的战略部署

绥芬河、观月台、鹿鸣台国境要塞阵地属于关东军第5军（司令部驻牡丹江市掖河）第124师团（司令部驻穆棱）驻地。这支部队是在1945年2月20日，关东军第124师团完成对第1（东宁）、第2（绥芬河）、第10（鹿鸣台）、第11（观月台）国境守备队的编成。总编制定员约12 500名。7月，旅团炮兵队准编制为师团炮兵队。国境守备队中的炮兵队人员及装备由正规野战炮兵第116联队改编，又从各步兵联队抽调编成师团挺进大队。总编制定员15 000人，包括苏军对日宣战前，临时现地征召的4 000多名日本开拓团和朝鲜籍出身者。同时，还在这一防区配属了野炮兵第116联队，备有41式山炮、90式野炮、15厘米榴弹炮共计24门，主要集中在绥芬河、观月台阵地。具体分布在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阵地的步兵状况是：第271联队第3大队配置在绥芬河要塞阵地；第271联队第10中队一部分和第272联队第10中队配置在鹿鸣台要塞阵地；第273联队第3大队配置在观月台要塞阵地；其他大部分部署在二线，即绥阳至穆棱地区。3月，将原第111师团从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等地区调出，配置在绥阳一线。这一兵力部署是根据第5军司令部遵循关东军总体作战计划，具体将第124师团主力集中在二线阻击作战，对一线只要求凭借要塞阵地全力遏制苏军攻击速度，以便在二线和三线调集兵力，进行歼灭战，一旦战局有利，迅速展开反击战。

第三节 苏军突破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要塞

一、苏军攻克绥芬河要塞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苏联远东第1方面军第5集团军全线发起炮击。1时，各先遣支队冒着大雨按预定突击线路，以坦克、自行火炮为先导，向国境前沿日军防线出击。6时，苏军第187师先遣营和第20旅工兵突击队，最先接近清风台及南部的神风山阵地，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和背面对两处日军前沿阵地的4个监视哨所同时发起袭击。部署在清光台、神风山阵地的日军，仅有北岛清八伍长以下28名，还未来得及组织反击，阵地就被苏军攻占。只有8人侥幸逃生，其余21名全部阵亡。而在此前午夜1时30分，绥芬河要塞北部左翼大日山阵地被日军放弃，苏军未遭任何阻击，先遣部队迅速围攻观月台要塞。其中大部向绥阳方向突击，一部折向绥芬河突击。

苏军第187师先遣营和第20旅工兵队夺取清风台、神风山日军阵地后，分兵袭击前山阵地和靖国山阵地。前山阵地盘踞着第10中队桥本秋夫军曹以下约11名日军。靖国山阵地驻守着第11中队长松岛省三少尉以下约75名日军。前山阵地如同清光台、神风山阵地一样，迅速被苏军攻克，11名日军只有4名逃生，其余下落不明。靖国山阵地则不同，苏军工兵几次冲锋均被日军凭借地下工事猛烈的火力击退。由于靖国山别勒洼一侧横陈三道陡峭的山梁，任凭苏军怎样迂回，也难抵居高临下

的火力封锁,久攻不克。在苏军伤亡严重的情况下,只好派出工兵小组,在炮火掩护下,从已占领的前山阵地及火力间隙地带对火力点实施爆破。日军宁死不降,战斗非常激烈。当主要火力点被炸毁之后,大批工兵冲上阵地,与日军残部短兵相接,展开了白刃战。松岛省三少尉以下约75名日军全部阵亡。靖国山阵地争夺战持续3个多小时,10时30分才开始转入夺取绥芬河火车站和西屯(西山)阵地的战斗。当火车站火力点和西山火力点被攻克后,先遣营一部在站前小广场集结,突遭隐蔽在小广场对面山坡上东正教堂钟楼里的日军机枪扫射,数十名苏军伤亡。随后,苏军调用自行火炮,指定伊万诺夫为炮手,从西山上瞄准,平射钟楼,仅放一炮就击中,2名日军毙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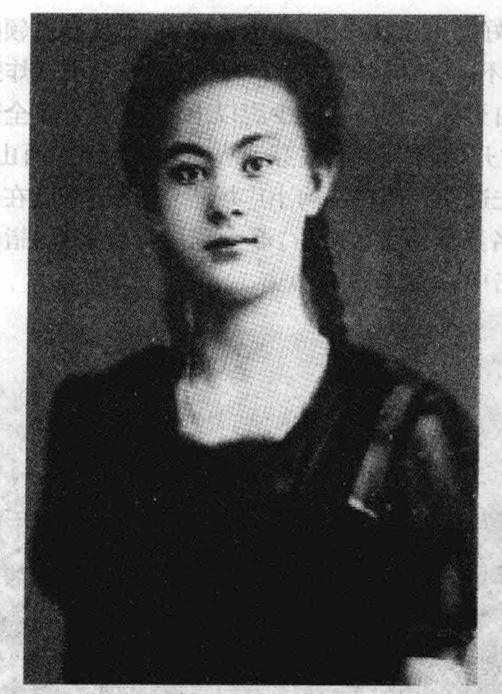
苏军进攻日军阵地



苏军进攻日军阵地

9日黄昏前,苏军第5集团军在各个突击方向上已纵深推进了近20~25公里,比预定计划提前了一昼夜。其右翼部队已接近太平岭。左翼部队也于10日凌晨全部占领了交通要道。苏军主力分兵两路,向南部吉林、西部牡丹江方面大举进兵。此前,第72军所辖的第63、215、277师各留下1个配有工兵和自行火炮的加强步兵团,奉命在3日内肃清绥芬河日军残余部队,夺取天长山要塞阵地。

10日清晨,苏军步兵加强团,已在夜间完成了对天长山阵地的包围,并在前山、靖国山、西山、地久山、北炮台山设置了火炮阵地,同时,从北部的齐胖子沟东南部的东北沟和西南部的楠公园三路向天长山阵地发起进攻,几次冲锋均被日军凭借永备火力点击退。苏军指挥部考虑用重炮火密集轰击,当苏军获知天长山要塞躲藏150名日本妇女、儿童和老人时,便于11日下午2时,在当地居民中选派了1名会汉、俄、日三种语言的不足18岁的华俄后裔姑娘嘎丽娅作为军使翻译,当日午夜天长山苏军指挥部指令机枪连指导员菲多尔琴科·斯捷潘·扎哈洛维奇上尉为军使,并组成了15人特别小分队前去劝降。



嘎丽娅



苏军菲多尔琴科上尉及妻子、女儿(1946 年)

12 日上午,嘎丽娅手持白旗,菲多尔琴科上尉紧随其后,在特别小分队掩护下,登上天长山。中午,到达谈判地点,狡猾的日军禁止苏军军使走进阵地,只允许嘎丽娅一人进入阵地单独谈判,让苏军其他人员原地等待谈判结果。嘎丽娅一人跟随日军走进兵营,三个多小时不见踪影。黄昏前,在嘎丽娅与日军谈判的地方,突然传出一声枪响,菲多尔琴科上尉断定嘎丽娅被枪杀。于是,用步话机向山下指挥部报告情况。这时,日军又突然冲向苏军并开枪扫射,劝降小分队战士当场被打死 2 名、打伤 3 名。劝降失败后。傍晚,苏军指挥部发出炮击天长山要塞阵地的命令,猛烈的炮火从各重炮阵地一齐射向天长山,一直炮击了四昼夜。整个天长山像火海一样,爆炸声连成一片。15 日下午 3 时,在坦克车、装甲车掩护下,苏军从四面八方冲上天长山,整个永备工事已土崩瓦解,残存为数不多的日军仍在地下工事中负隅顽抗。苏军采取爆破的办法炸毁地下的火力点,并将汽油倒入洞中点燃。天长山阵地日军石岛长吉大尉以下 300 名(包括战时放弃地久山阵地的日军),"在乡军人"200 名,绥芬河街(町)爱甲嘉津磨街长以下 150 名(包括伪警、宪、特、日军家属),绝大多数阵亡或自杀。15 日下午天长山阵地彻底陷落。由于苏军炮火覆盖天长山多日,战后未能找到嘎丽娅尸首。嘎丽娅殉难时,年仅 17 周岁。

二、苏军闪击鹿鸣台要塞

鹿鸣台要塞阵地防区东正面 7 公里,由于靠边境一侧均为高山峡谷地带,其地理环境复杂而险恶,没有一处可作为突破口。苏联远东第 1 方面军第 5 集团军在战前选择战略突破口时,未将其列入重点突破地带。但是,为了全线歼灭日军每一个前沿监视哨、火力点,按先前侦察的目标,第 20 突击工兵旅派出一支先遣队,在边防部队支援下,从苏联境内 601 高地,即 105 筑垒地域正面展开秘密攻势,趁漆黑的雨夜穿过国境线,潜伏在鹿鸣台各日军阵地及各监视哨前。当先遣队接到突击命令后,快速登上日军阵地,对日军进行突然袭击。

当时,日军驻守在鹿鸣台阵地的兵力仅有 100 多名,为应设 1 000 名兵力的十分之一,而且主要分布在最南部 808 高地,约有 70 名兵力,其他 30 余名兵力分散在东望山阵地 14 名,天晴山分哨 6 名,岚山分哨 6 名,龙头山分哨 7 名。苏军从鹿鸣台阵地中部切入后,很快占领了中部及北部阵地,夺取了东望山(883.1)核心要塞阵地。随后孤立在最南部 808 高地的日军也遭到攻击,在拂晓前苏军便结束战斗撤出阵地。因此,鹿鸣台要塞阵地是苏军最早突破的边境要塞防线。

三、苏军激战观月台要塞

苏军突破观月台要塞阵地并不像攻克鹿鸣台要塞阵地那么容易,而是和突破绥芬河要塞一样,采取闪击战术,同观月台日军争夺主攻方向上的交通要道,为后续主力部队梯次进军扫清障碍。



苏军第 5 集团军先遣支队越过中苏边境由清政府于 1886 年勘察监立的 21 号界标进攻日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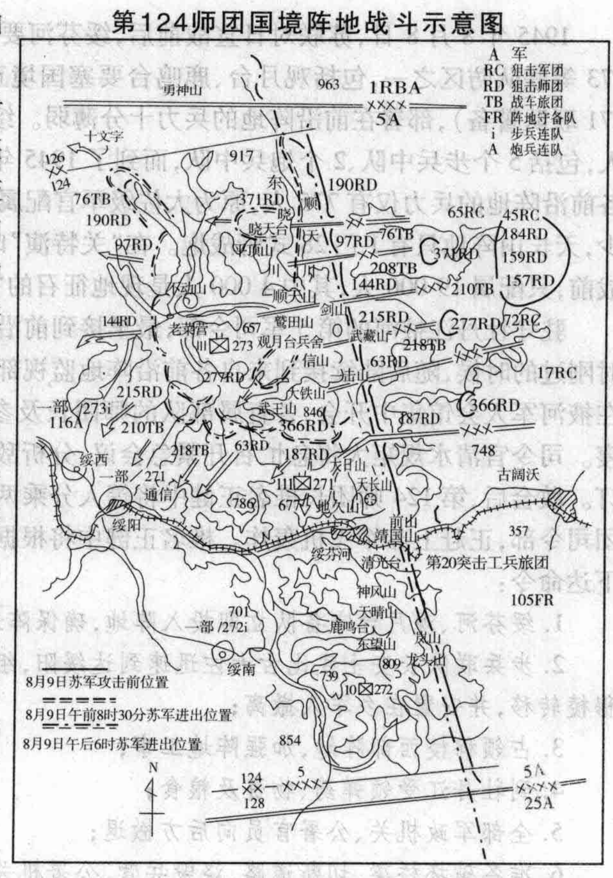
清政府于 1886 年勘察监立的 21 号界标

远东第 1 方面军第 5 集团军第 65 军第 190 狙击师、第 97 狙击师、第 144 狙击师、第 215 狙击师、第 63 狙击师各先遣支队分别依次以晓天台(包括顺天川、平顶山)、顺天山(包括顺天川)、剑山(包括鹫田山)、武藏山(包括观月台兵舍、信山)、一拳山(包括大铁山、武王山)为攻击目标,对观月台要塞阵地进行散点围歼。紧随其后,第 76 坦克旅、第 208 坦克旅、第 218 坦克旅协同作战。

8 月 8 日,是日本每逢必庆的大昭奉戴日,白天除监视哨兵、值班卫兵外,全员休息。晚饭时,土荣太郎大尉主持节日庆祝仪式和晚宴,并观看了慰问团文艺演出。深夜入睡不久,值班副官突然接到情报,获知苏军已对虎头阵地正面展开交战。随即,土荣队和绥阳方面联系,迅速将慰问团成员送出阵地。同时召集所在观月台兵舍的各中队,下达紧急应战命令。还未等日军完全进入阵地,苏军已开始了猛烈炮击,随后,先遣部队从不同方向展开突击战,空中伴有飞机协同。

突破观月台的先遣部队打开日军前沿缺口后,部分先遣队继续向纵深挺进。于 9 日 10 时开始,苏军第二梯队第 371 师、第 277 师、第 366 师各抽调 1 个团的兵力,分别从平顶山与顺天山之间的顺天川、武藏山南部与信山北部之间、武王山南部与大日山北部之间先后冲入日军阵地。为肃清凭借地下工事疯狂抵抗的日军残部,同时保持高速度进军,苏军指定第一梯队第 65 军和第 72 军各师留下一个有工兵及自行火炮组成的步兵团,并命令在三日内消灭抵抗的日军和摧毁永备火力点。其中,在武藏山、剑山阵地的交战异常激烈。

第124师团国境阵地战斗示意图



顺天山(大石砬子,苏军称骆驼山或驼峰阵地)阵地易守难攻,日军第3大队第10中队(又称那须川队)全力负隅顽抗,苏军步兵第277师第825团的1个步兵加强连,一面封锁,一面攻击。在打掉一个主峰火力点后,连长命令1个工兵排用1门自行火炮对准主峰钢帽堡发射点和地下工事入口进行轰击。炮弹命中,但未摧毁。随后,苏军趁日军射击短暂间隙,派工兵携沙袋冲上火力点,堵住钢帽堡射击孔,以便实施爆破。第一次在钢帽堡顶部中央引爆了250公斤炸药,没有达到预想效果。原因是钢帽堡顶部覆盖了两米多厚的土层,承受了轰击。第二次,装药量为500公斤,钢帽堡还是安然未动。苏军这才领教了钢帽堡具有如此之大的抗轰击力。于是,第三次又在钢帽堡周围埋放了三个500公斤的炸药包,同时在钢帽堡入口处塞了两个炸药包,还在顶部安放了一个炸药包,总装药量达到1.5吨,这样才将剑山阵地地面火力点清除。但退入地下的日军继续顽抗。苏军战士无法进入地下作战,依旧利用400公斤的炸药包进行爆破,最后彻底消灭了剑山阵地顽抗的日军。

武藏山要塞要比顺天山要塞规模大,而且地上、地下工事复杂,永备火力密集,仅钢帽堡就有24个,机枪永备火力点28个,还有5个地下炮兵永备发射点、6个地面炮兵阵地,分别由1~4门不同型号火炮构成强大火力。苏军第72军留守攻坚部队同时对武藏山和630高地永备火力点实施了强攻,对个别火力点进行轮番爆破,对退入地下工事里的日军采取火焰喷射或炸毁通道进出口的方式予以打击。近中午,已基本消灭大部抵抗的日军,打开了观月台向南部绥芬河、向西部绥阳、马桥河两个攻击方向的通道。次日黄昏前,第5集团军在主攻方向上已推进了20~23公里。

第四节 日军的应战对策与撤退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前后,绥芬河要塞阵地属于关东军第5军124师团第271、272、273等联队防区之一,包括观月台、鹿鸣台要塞国境正面60公里,其中绥芬河要塞正面20公里(由271联队警备),部署在前沿阵地的兵力十分薄弱。绥芬河要塞阵地原第2国境守备队,定员为1 500人,包括5个步兵中队、2个炮兵中队,而到了1945年2月20日,新编成的第124师团部署在绥芬河各前沿阵地的兵力仅有775人,原为大佐级军官配属,战时仅配属了大尉军官。其武器装备也大量减少,天长山阵地只有1门28式野战炮。在"关特演"时期,绥芬河至绥阳地区驻守野战部队3万人,而战前,只配属19 000人,其中4 000人是现地征召的"在乡军人"和朝鲜籍士兵,战斗力十分低下。

驻守牡丹江掖河的第5军司令部,最早接到前沿阵地虎头要塞遭受苏军炮击的情报,是在午夜零时刚过的时候,随后陆续接到来自各前沿阵地监视部队关于苏军进攻的消息。当时,第5军司令部正在掖河军人会馆集中开会,各直属部队的师团长及参谋长、主要参谋在"大昭奉戴日"晚宴后刚刚就寝。司令官清水规矩大将急忙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敌情,研究应战对策。3时30分,临时应战方案拟订。散会后,第124师团长椎名正健中将等人分乘两辆汽车,火速向穆棱驶去。天亮时,到达穆棱师团司令部,正赶上苏军飞机轰炸。椎名正健中将根据司令部应战方案向师团所属部队及国境守备队下达命令:

1. 绥芬河、观月台守备队立即投入阵地,确保阵地,全力阻止苏军前进;

2. 步兵联队长安士武比古大佐迅速到达绥阳,组织绥阳附近残留的各部队人员、武器、弹药等向穆棱转移,并安置在乡军人撤离;

3. 占领穆棱西部阵地,加强阵地工事;

4. 到牡丹江受领弹药、物资及粮食;

5. 全部军政机关、公署官员向后方撤退;

6. 准备破坏桥梁、切断道路、烧毁兵营、公署机关房屋等。

在第271联队长安士武比古大佐赶赴绥阳收拾残局的同时,驻守绥芬河国境阵地的第3大队长

石岛长吉大尉受命进入应急部署。第3大队部署在绥芬河各阵地的兵力共有775名,包括200名“在乡军人”。具体各阵地配备兵力如下:

第9中队以竹内俊夫见习士官为首的67名驻守大日山阵地;

第10中队以桥本秋夫军曹为首的11名驻守前山阵地;

第10中队以矢岛幸作伍长为首的22名分别驻守清风台阵地和神风山阵地;

第11中队以松岛省三少尉为首的75名驻守靖国山阵地。

地久山阵地在战前被日军放弃,其驻守兵力集中到天长山核心阵地。位于东正教堂钟楼、火车站、西山上的火力点是战时临时抽调的机枪手而秘密设置的。总兵力不超过800人。

8月8日是日本的“大昭奉戴日”,绥芬河日军大部分在兵营军人会馆、兵寮及酒保狂饮作乐,一直持续到深夜。当午夜苏军炮击开始时,日军尚在睡梦中。在哨兵通报声中,各阵地一片慌乱,纷纷进入要塞阵地,准备迎战。

9日8时,绥芬河街(町)长爰甲嘉津磨指挥满铁人员及家属150人,“在乡军人”200名乘一列火车向牡丹江方向撤退。尚有200名“在乡军人”及家属和伪、警、宪、特人员没有机动车辆撤退。10时,爰甲嘉津磨再次打电话与绥阳县县长后藤春吉请示,通话之中电话突然中断,再也无法接通,无奈,只有亲自率领剩下的350人撤往天长山地下工事。在此前,爰甲嘉津磨已指命柳川株式会社负责调动马车,将全部物资和重要档案送往天长山工事。据当年马车夫幸存者李聚堂老人回忆,柳川株式会社一共召集了五六辆马车,把街公所、宪兵队、特别机关和警察署的东西大都运到了天长山,一个上午,每辆马车送了两趟。李聚堂是赶最后一辆马车上的山,已经没什么可装的,装的都是胶皮鞋、马灯、煤油。第一趟装的是铁柜、木箱,不知里面是什么东西。当他第二趟上山时,看见有两三百人往山上走,有电报局的熟人叫王年,还向他打招呼。他看见上山的人群里有不少妇女、孩子和老人。

早在5月间,绥芬河宪兵分遣队、特务机关就得到了有关情报,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开始备战,并作好撤退的准备。绥芬河宪兵分遣队宪兵赵乾新对铁路警护团的傅永久透露说:“上级下来指示,日本有退出东北的可能,必须迅速组织留守人员。你可以带上5人小组,你任组长,不管哪国军队到绥芬河,都要了解情报,特别是新式武器、驻军地点。情报写好后送到牡丹江柴市街18号。苏军进来的可能性大些。”

7月中旬,宪兵队接到命令,清除所有文件,重要文件运走,一般文件销毁。此项工作要在26日前完成。队部里只剩下几张办公桌、一张地图,说留给特务机关使用。宪兵分遣队人员及家属待命撤离。27日晚19时,宪兵分遣队人员及家属在义合饭店会餐。宪兵分遣队长、日军准尉冈田勇先提议大家举酒干杯,接下来互相敬酒,然后轮流唱歌。没人讲话,因为都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命运。

8月1日接到命令,绥芬河宪兵分遣队撤销,队员调走,不许带家属包括日本人在内。次日,大部分人员到绥阳宪兵分队集中,后与当地调出人员一同去牡丹江宪兵队本部,被编成警备大队,派往安东、鞍山等地。

留守在绥芬河的原宪兵分遣队队长冈田勇,特务班长加藤太一、小石军曹、日本俄语翻译官原田进、宪补王惠民(别名王执中)、马丁坂平等人,按通知要求将其并入绥芬河特务机关。

8月9日早4时,绥芬河上空出现苏军飞机。留下的宪兵队人员在原队部礼堂集合,冈田勇对大家说:“现在情况很紧急,你们赶快把家属集合起来,送到安全地方。我们都上天长山准备决一死战。”尔后,又对王惠民说:“你也把家属领来。马上到阜宁镇找区长要四五辆马车,在12点前把枪弹、被服和粮食送到三道洞子。”

此时,绥芬河特务机关长新井三郎还在牡丹江开会。8月8日,其他人员除值班外都在家休息。苏军炮击后,他们立即接到集合通知。早6时,张广芝、秦正二陆续赶到特务机关。看见屋里地上放着一箱刚从楼下仓库搬出来的子弹,桌子上放了十几瓶烧酒。刘志鹄和滕岳岚及一个日本人正往酒

瓶里灌药面。张广芝问刘志鹄:"灌什么?"刘志鹄没吭声,滕岳岚白了他一眼。张立刻明白是毒药,便不再问了。

8时,特务系主任桥本典治收听广播,确认了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消息,见绥芬河上空有苏军飞机盘旋、扫射,便立刻指示韩明国和特务分室系长户滕把重要档案、密码拿到院内厕所烧毁。特务系内勤警尉王文惠受命装文件。警察署和特务机关的文件共两大卷柜和两小卷柜,共装了四五箱,准备在撤往天长山时一起带上去。这些有名有姓的伪警、宪、特大都随着街长爱甲嘉津磨撤退到天长山。少数汉奸特务潜伏下来,后相继被捕。

9日上午,曾被派遣到绥芬河西部寒葱河一带的日本石川乡开拓团和开拓义勇军训练所共计250人,有组织地向西撤退,在撤退途中遭到苏军袭击,全部死亡。

15日下午3时,退守天长山要塞阵地负隅顽抗的日军石岛长吉大尉以下300名(包括战时放弃地久山阵地的日军),"在乡军人"200名,还有以绥芬河街(町)爱甲嘉津磨街长为首的150名(包括伪、警、宪、特、日军家属),除30余名日伪警察于11日午夜有组织地逃跑外,另有2名日本妇女先前逃生,苏军当场只俘虏26名伤残日军,其他全部阵亡或自杀。

第八章　苏军攻克虎头要塞

第一节　苏军的进攻部署

负责突破虎头要塞日军防线的是远东第1方面军所属第35集团军,空军第9集团军负责支援其战斗行动。第35集团军由步兵第66师、第264师、第363师和第109筑垒守备部队以及第125、209坦克旅、第93装甲车营组成,拥有火炮和迫击炮955门,坦克166辆。司令员是扎赫瓦塔耶夫中将。由35集团军的兵力从库别罗沃、列少扎沃德斯克地域向密山方向实施第一辅助突击,攻占虎头和庙岭、半截河要塞地域,从北面保障方面军主力的行动。

第35集团军以部分兵力掩护库别罗沃、斯帕斯克等地段上的公路和铁路,以主要兵力从列少扎沃德斯克西南地域向虎头要塞地域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并占领该要塞地域。然后向勃利方向发起进攻,与红旗第1集团军协同,消灭对面日军。

远东第1方面军司令员考虑到35集团军右翼面对强固的虎头要塞地域,给该集团军下达了从南面迂回并完全孤立虎头要塞地域的任务,以可靠地保障方面军突击集团的右翼。

在炮兵战斗行动计划中,第35集团军炮兵用于保障强渡乌苏里江和突破要塞地域。在列少扎沃德斯克西南方向预定进行55分钟的炮火准备,还计划强渡松阿察河和发起冲击时进行火力保障和支援(冲击发起后1小时内)。在以后的6~8小时内,炮兵则保障步兵和坦克在日军防御纵深发起进攻。

为完成上述任务和便于灵活机动地指挥炮兵,集团军司令员决定组建炮兵群。在主要突击方向,建立了集团军、师、团的远战炮兵群和火箭炮群。在辅助突击方向(虎头方向),建立了包括破坏炮兵分群和对日军炮战炮兵分群的集团军炮兵群。

为了最大限度地达到突然性,还准备了不经炮火准备部队就发起进攻的方案。

在工程保障方面,为迷惑日军,隐蔽主要突击方向,全线都进行了构筑进攻出发地域的工程作业。在35集团军地带内,由于降雨,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有好几十公里沼泽河谷变成了一片汪洋。在这种情况下,已无法再挖掘平底坑、堑壕和交通壕。所有工事都采取堆积式。进攻出发地域的堑壕由草皮土块堆砌而成,前墙上面开以射孔并构筑了枪座,沼泽地段铺设了多层小圆木路面,土路路面则添

上了新土。

进攻出发地域的组成如下:沿国境线的前沿阵地是2~3道具有各种战斗和生活设备的堑壕,之间以纵横交错而且能够据以射击的交通壕相连接。然后是带有火炮和人员隐蔽所的火炮阵地地域及步兵和坦克的待机地域。最后是集团军二梯队所属部队的阵地和各兵团的后方地域。

进攻出发地域工程构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敷设地雷掩护国境线,尤其是次要方向上的国境线,以保障集团军集中和防止日军对集团军进行侦察。

地雷场和战役性障碍物的设置是按第1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批准的第35集团军计划实施的。

在对日军侦察的组织上,为详细研究日军在国境线附近的防御工事,在不进入中国和朝鲜领空的情况下,使用飞机对边境地带进行了航空照相,彻底查明了日军防御纵深内的工事。

第109筑垒守备部队专门的割草队(15~20人)继续工作,在日军能观察到的一些地段上割晒干草,呈现一幅每逢这个季节边防军人的生活常景。

边境地带的居民1户也没有迁走,他们仍一如往常地生活,这也迷惑了日军。部队向国境线调动的同时进行着演习,居民把这看做是平常的军事行动。部队调动时,严格遵守灯火管制,汽车行驶禁止开全灯,在离国境界6~8公里处则闭灯行进。

战役开始前1~2天,经过仔细地现地勘察之后,部队进入国境线上的进攻出发地位。每个分队、部队、兵团都有指定的区域。在该地域内,不准车辆行驶,禁止做饭和砍伐树木。

在战役准备阶段,本地区原在部队的电台才获准开机工作,新到部队的无线电通信网路仅允许接收电讯,有的兵团的电台根本就没有开机。第35集团军的指挥员力求完全达到行动的突然性。

在部队的战斗训练中,第35集团军所有的步兵部队在6~7月间都搞了支队编练演习,其中大部分演习是在极难通行的地域完成的。

射击训练基本上在支队编练演习中实施。实弹射击演习时,火炮和迫击炮的密度达到每公里突破正面上120~170门。

炮兵和坦克兵部队除参加诸兵种合成演习外,还进行了与整个部队战术训练有关的单独演习。

第35集团军对后勤部队和机关的专业训练以及抗击日军对后勤机关袭击的训练也极其注重。

在部队党政工作上,仅5~7月期间第35集团军政治部报告员和鼓动员就作了113次报告。主要报告是:《共产党是苏联人民战胜德国法西斯的组织者和鼓舞者》《苏联的国际地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满洲是日本进攻苏联的桥头堡》《日军的精神面貌》等。

党团队伍的发展,扩大了部队中党团员比例。战役开始前,第35集团军党员人数占28%,团员人数占28.4%。党团员比例占集团军总人数的56.4%。

第35集团军广泛利用了讲演、报告、军人大会、群众大会、座谈会、直观教育和报刊等政治教育形式。步兵第363师什卡德雷耶夫中尉代表全排保证狠狠地打击日军,他说:“我们满怀喜悦盼来了向日本帝国主义者算账的这一天。远东军人将光荣地履行对祖国、对亲爱的共产党的义务,让全世界再一次看到我们手中武器的威力和我们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吧!只要钢枪在手,就要无情地痛击日本鬼子。”

就这样,在部队万众一心,情绪高涨的情况下,第35集团军做好了越境战斗的准备。

第二节　日军的兵力配置与部署

1945年3月,关东军对其所属部队进行大规模地调整和部署,驻守在虎头的第4国境守备队主力调入第122师团,移防宁安,所余一部改编为虎头临时国境守备队继续留驻虎头要塞。4月,关东军在虎头只留下2个步兵中队和称之为“王牌”的2个炮兵中队,共计700人,其余全部抽调到南方战

线。

1945年7月10日，依[军令陆甲第106号编成令]，以原日军第4国境守备队第三地区队主力为基干，从伪满洲第5方面军（牡丹江掖河）所属各部队调入约600名日军改编为日军第15国境守备队，总兵员为1 400名，为原第4国境守备队全盛时期兵员总数的1/7，队长是西胁武大佐，守备队下辖4个步兵中队，2个炮兵中队、1个高射炮中队、1个步兵炮中队、2个炮兵中队、1个工兵中队和1个水克列车炮中队。步兵第1中队驻防虎东山，步兵炮中队和高射炮中队、步兵第3中队驻防猛虎山，步兵第4中队和工兵中队驻虎北山，步兵第2中队驻虎西山和虎啸山。7月30日，举行编成式，新编入人员大部分是刚入伍不久的一二等兵，而且多半是同年5月总动员时而被征集的在“满”补充兵，都是几乎从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人。总之是勉强整顿集中起来的部队，由于监视队缺乏兵员，用他们充任也很适合。

装备也仅留下运输困难的巨炮和少量的弹药，战斗力也明显下降。在苏军进攻虎头前夕，24厘米口径列车炮中队在若井少尉指挥下也由水克基地出发，向牡丹江方面撤退。

8月初，在守备队兵器委员松原准尉同东安司令部进行强烈交涉下，速射炮、曲射弹道炮、迫击炮各数门运抵虎头。然而，局势发展变幻莫测，上级的指令一日三变，下达了将虎头要塞大量的弹药输送到南方的命令。8月5日和8月8日，分别从虎北山弹药库和西猛虎山弹药库偷偷地搬运出重机枪子弹、迫击炮弹、野炮弹和速射炮弹，在完达车站装上两辆货车，于8月9日运往东安后方。

另外，还下达命令，除无法拆卸搬运的大口径炮外，猛虎山和虎东山所有重炮立即拆卸运回日本，用于本土决战。

临战前的8月6日，位于虎头西南方乌苏里江畔的新桥国境监视哨，被苏军挺进队包围。随即虎头国境守备队下达战备令。7日，为了出席全“满”国境守备队长会议，队长西胁武大佐带领山田俊夫少尉和荻原胜美曹长2名部下，乘飞机飞往牡丹江。

虎头要塞第二地区队战斗示意图

本图由冈崎哲夫提供

松原准尉了解到这些不稳事态后，坐立不安。经坚决要求，于8日20时和天云定文军曹等人，坐车前往东安交涉，要求立即停止撤除重型大炮。

8月8日为“大诏奉戴日”，虎头守备队全体人员准予全日休假（只有少数劳役者搬运西猛虎山的弹药和做饭用的酱桶，一直干到半夜11时）。完达官舍和其他各中队在当晚举行军官酒宴，军官们围着中队长开怀畅饮，尽兴欢乐到深夜。

第三节　虎头要塞的覆灭①

1945 年 8 月 9 日零时 5 分，从波隆卡、萨里斯基、伊曼、克拉夫斯基各地，苏军的重炮开始炮击虎头要塞。苏军在伊曼集结的 16 门 20 厘米榴弹炮。第一发炮弹击中完达车站背后的仓库引起爆炸。同时在第 35 集团军进攻地带内，苏军第 57 边防总队的边防军首先展开了战斗行动。边防军乘坐消音汽艇和小船渡过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着手消灭日军国境哨所。到 2 时，整个边境线已被苏联边防军控制，占领了日军全部哨所，控制了江面。日军仅被击毙就达 260 人。与此同时，第 264 师和第 109 筑垒守备部队经过 15 分钟的急袭火力攻击，集团军主力的第一梯队（步兵第 66 师和第 636 师）在帕夫洛——费多罗夫卡方向开始渡过松阿察河，各师的第一梯队也顺利地完成了渡河。5 时，苏军炮兵停止炮击，虎头镇的 2 000 多居民扶老携幼从镇西公路向飞机场及黄泥河等荒郊野外避难。日本居民也纷纷逃至日军地下工事中，包括日本开拓团、职员及妇女儿童等。猛虎山地下工事收容了近 300 名，平顶山地下工事收容了近 200 名。7 时，苏军每师各 2 个团的主力都渡到了河的右岸。

11 时左右，从月牙、黄泥河方面攻击的苏军也进入到了虎啸山阵地前沿飞机场附近。另一部分苏军也向砌山、小临江台进攻。同时，苏军炮兵 20 厘米、30 厘米榴弹炮及各种口径炮从萨里斯基、伊曼、哥老夫斯基一齐向虎东山、猛虎山射击。13 时，日军重型榴弹炮对准远东铁路的伊曼铁桥，加农炮对准苏军炮阵地，各种火器对准苏军集结地还击。双方炮火齐鸣，不绝于耳。虎头镇火光冲天，建筑物大部被摧毁，苏军哥老夫斯基和三栋房的炮兵阵地一时沉默。日军炮兵第 1 中队第 4 小队的士兵们按教学规程搬运 41 厘米榴弹，装填炸药，发射了 41 厘米榴弹炮在战场上的第一发炮弹。士兵们的耳膜几乎被震破，眼花缭乱。炮塔前面的遮蔽林被削去一大片，旋风紧裹着大团火焰刮过西猛虎山顶，山顶上的几棵大树被旋风卷进一吨重巨弹的弹道连根拔起飞向天空。紧接着炮塔前面山上的尘土飞扬，天空一片烟雾弥漫，视线被遮住。在 41 厘米巨炮发射的一瞬间，向后退了 3 米，发出了可怕的呼啸声，然后又恢复原状。其威势连炮兵队的老兵都为之战栗不已。继第一发巨炮发射之后，马上推入装载第二发炮弹的车辆，接着装入炸药，打出几发炮弹之后，炮手们筋疲力尽，脸色苍白，马上由其他士兵替换。到下午 13 时，41 厘米巨炮共发射 11 发炮弹。炮弹落在伊曼铁桥三对拱门的北端。据中猛虎山山顶观测所的观测兵了望，看见高高的水柱落下之后，露出折断的桥桁软瘫瘫地悬吊在江面上。西伯利亚大铁路伊曼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交通被切断了。

炮兵队开战初期炮击示意图



渡过河的苏军部队面临着一片寸步难行的沼泽地。8 月 7～9 日的大雨，不仅淹没了小路，而且灌满了松阿察河的整个河谷。唯一出路就是开辟急造军路。为此，第 35 集团军指挥部向步兵第 66 师地带内调来 3 个工程兵营和 3 个步兵营，向步兵第 363 师地带内调来 1 个工程兵营和 2 个步兵

① 本节根据〔日〕冈崎哲夫著《日苏虎头决战秘录》摘编。

营。

步兵第66师在工程兵等部队修筑的急造公路上穿过了沼泽地，到8月9日20时，已向前推进12公里，前出至大桥东北2公里一线。

步兵第363师主力9时完成了渡河，穿过沼泽地，开始向荒岗方向推进。11时，该师步兵第404团以2个营的兵力前出至指定地点。在这一地区该师首次受阻。荒岗是日军的一个支撑点，有5个用交通壕连接起来的土木质火力点，周围是近1米厚的土墙及铁刺网，前面还挖有1条防坦克壕。近1个中队的日军防御着这个支撑点。

第404团团长决定调集炮兵实施急袭射击，然后冲击支撑点。苏军战士穿过连绵的沼泽地拖来了4门76毫米火炮。但是，从遮蔽阵地实施急袭射击效果并不大，最后苏军用2门火炮直接瞄准射击才压制了所有的土木质火力点。19时，支撑点被苏军占领，日军伤亡约50人。到日终时，该师已前出至大桥西南郊。

第35集团军在战斗的第一天就强渡了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部队越过这两条河河滩里的大片沼泽地后，向纵深推进了5～12公里，前锋推至虎头西南地区，切断了虎头至虎林县城的铁路和公路。

8月9日傍晚，日军完成了虎啸山的防御部署，在阵地正面布置速射炮1门、重机枪1挺、迫击炮1门。在腰营背面布置速射炮1门、重机枪1挺、迫击炮1门。其他地区一般装备轻机枪4挺、掷弹筒4个、步枪170支。配备兵力有(箱根队)3个小队120名，速射炮2个分队(筑波队)30名，迫击炮2个分队(日光队)20名，合计总兵力170名。

上述兵力大部分部署在虎啸山地下工事指挥部，一部分部署在不动山地下工事，少部分人员作为大虎啸山地下工事的警戒力量，炊事班长远宫伍长和10名警备兵部署在平顶山地下工事。乌苏里江畔桦树林子监视哨所，凌晨被苏军攻陷，从那里逃出来的10名士兵，最后退到平顶山。眼镜山和虎啸山两处地下工事因无多余兵员派遣，日军不得不放弃这两地的防守。按日军防御作战兵力配置，大虎啸山、虎啸山、平顶山等处地下工事的防守兵力需要1个联队计3 000人，才能发挥相互联合作战作用。而现在全部兵力仅170人，避难的日本侨民大约200人，靠这些兵力是难以防守的。

入夜，日军趁苏军立足未稳的机会，组织两个中队的兵力冲击苏军工事、袭击苏军宿营地，给在虎头北面莺谷、砂利取山附近的苏军造成一定损失。日军趁夜又将大批粮食和武器弹药匆匆搬入地下工事。

8月10日早晨6时30分，日军炮兵川崎中队向苏境内各重点地带进行射击，苏军重炮也向日军各炮阵地和观测所开始射击，双方炮声齐鸣。

上午8时，在虎头台南侧丛林中待机的苏军，快速构筑了野战阵地。炮兵部队开始向猛虎山日军阵地轰击。

猛虎山上日军阵地中硝烟弥漫，尘土飞扬，无数个冲天而起的火柱遮蔽了整座山头，苏军机关枪也不间断地进行扫射。

苏军炮弹在地上大爆炸所产生的巨大轰鸣声，响彻云霄。其中虎东山和猛虎山每间隔15～20分钟，就可以看到特别巨大的黑色浓烟升腾天空。两三分钟之后，便传来打雷似的炮弹爆炸声，震得远处虎啸山上的树梢哗哗作响。

上午9时左右，苏军迫击炮又开始对虎啸山进行集中轰击。到处都是炮弹在空气中飞行的尖啸声和轰隆隆的爆炸声。刚开始炮击的时候，炮弹落在离虎啸山阵地较远的地方，有的飞到了山的背后。到11时左右，苏军的炮击精度越来越准确，迫击炮的弹着点逐渐接近虎啸山地下工事入口及其附近的交通壕。

上午11时，苏联远东第1方面军空军第9集团军49架伊尔—4型轰炸机在50架歼击机的掩护下，对虎头要塞日军阵地实施了两个小时的轮番轰炸和低空扫射，重点轰炸了日军炮兵阵地，使炮兵阵地被毁，武器和人员遭到很大的破坏和伤亡。炸毁15厘米加农炮1门，大口径榴弹炮1门，观测所

2个。

上午11时,苏军步兵两个连队突然袭击虎西山。虎西山阵地同虎啸山不同,由于阵地小、防守兵力少,仅有1个小队,难以防守。躲在地堡暗处的日军四散溃逃,最后长野见习士官以下全体军官和大部分士兵都阵亡了。

中午,苏军停止了炮击,虎啸山阵地地下工事里的日军为弄清阵地外情况,派出士兵出去侦察。"喂,友军全体已布置完毕!"喊声从入口传来后,日军便蜂拥而出。虎头要塞日军地下工事指挥部的兵力布置如下:三分之一的兵员布置在虎头正面,三分之二的兵员布置在腰营背后的不动山、眼镜山、大虎啸山一线。

过了中午,指挥所的扇谷伍长命令速射炮击毁苏军的重型火器。

日军将速射炮安置在炮座上,然后往炮座上培土堆、清理炮座前的杂木、隐蔽炮位。下午1时,第2速射炮分队发现在腰营河对面的虎林公路上,大约有100名身份不明的队伍向虎头方向行进,并有几辆自行车随队行动,无论旗帜或标识都看不清楚。日军的几发榴弹立刻射向公路上行进的队伍,榴弹爆炸后公路上的队伍四散溃逃,消失在公路的另一侧。时隐时现,使日军无法进行有效轰击。

下午1时,一架苏军侦察机盘旋在猛虎山顶,超低空飞行一圈后,开始进行重机枪扫射。

下午2时,苏军突然开始炮击。迫击炮弹如雨点一般落在虎啸山中部一带,爆炸声惊天动地,火光冲天,硝烟弥漫。众多树木被炮弹击中,连根掀起。仓库和监视哨等建筑物被炮弹炸得粉碎。

这次炮击击毁日军迫击炮1门,炮手同时阵亡。猛烈的炮击打得日军喘不过气来,甚至无法还击。苏军隐蔽在月见丘附近洼地里的大约10门迫击炮,发射的炮弹雨点般地落下来。许多炸裂的炮弹,相继击毁各种设施和工事。日军被迫撤回地下工事和掩蔽壕。被切割成几个小组,彼此孤立,相互失散并且中断了联络。在苏军炮击期间,日军的防御、警戒、部署等都无法实施。

下午5时30分,苏境内的重炮又对虎头各阵地实施了全面炮击。同时,苏军以部署在虎头境内的15厘米榴弹炮向虎头台南侧以及石利山、砂利取山进行近距离的准确射击。

下午6时,苏军在强大火力支持下,以坦克开路,从三个方面发起第一次总攻。日军冲出工事与苏军短兵相接,双方展开激烈的肉搏战,苏军一时陷于混乱,败下阵来。日军乘胜四面追击。苏军第一次总攻失利。

虎啸山山腰背后的日军仍在战斗,从山谷对面的眼镜山传来苏军一阵阵的叫喊声和号令声,那些声音听得非常清晰。一瞬间,激烈的射击、烟雾、叫喊声从眼镜山的草丛中涌了出来。那是已经接近山顶的苏军。大虎啸山一带响起了激烈的对射声。

日军速射炮在对眼镜山的八合目一带炮击时,发现已登上眼镜山的苏军架起了重机枪,马上转过炮口,几发炮弹打去,苏军急忙隐蔽。日军趁机急忙卸下炮拖拽着拼命退向掩蔽壕隐蔽。炮滑进了掩蔽壕后,日军士兵爬上交通壕观察苏军情况,从不动山方面射来的枪弹在日军头顶发出锐利的啸音,也弄不清是日方的还是苏方的。眼镜山上,日军的机关枪仍在发射着。

当日军士兵从眼镜山迂回到大虎啸山时,发现交通壕前方有几个翻过个儿的黑色疙瘩。那些黑色疙瘩都是尸体,是最初阵亡者们的尸骸。沿着交通壕前行每隔20~30米,便可看到一个个倒毙的尸体。这些尸体都呈仰卧姿势,颈部有血痕,眼睛半睁半闭,嘴巴张得大大的。张着的嘴里像草木灰一样发白,舌头卷缩成一团,圆圆的像一颗小石子堵着喉咙。敲打一下,尸体已僵硬发直并发出坚硬的声响。这些阵亡者由于遭受到强烈的打击,而一下蜷缩成一团,两脚弯曲,缩着肩膀,躯体变小,两臂向前举着好像要抱住什么东西似的断了气。

那些阵亡者都是30多岁的补充兵,或者是很年轻的入伍新兵。那些士兵军服褴褛,制作粗糙的军阶章上凄凉地缀着一颗星。

苏军的侦察机已消失在腰营山那边的云层里,日军又开始重新布置阵地。已经听不见一声枪响了,阵地上沉寂得令人烦躁。

“全体人员撤回地下工事！敌人退却了。”传令兵跑向各处传达命令，使日军深深地松了口气。

虽然击退了苏军第一次总攻击，但日军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不动山已陷入苏军手中，20名日军官兵，被困守在不动山地下工事里，已无法取得联络。对于大虎啸山地下工事，是否派遣步哨以外的警戒兵员，目前尚难决断。另外，由于眼镜山已成为更加激烈的战场，那里日军几乎全部阵亡，只有一挺重机枪瞄准了集结在山上的苏军攻击部队，突然进行扫射才击退了苏军。

眼镜山顶上，所有的树木都毁于战火，到处都裸露出剥去地皮的红土。几条交通壕在山顶弯弯曲曲，从山下往山上列队冲锋的，和由山上往山下撤退的苏军，交替倒下，陈尸遍野，到处都是黑压压的尸体群，呈放射状带子连接在一起，呈现一派令人可怕的地狱情景。

这一天，日军箱根队队长田村三郎少尉以下官兵人员，阵亡者30名，失踪者25名。在25名下落不明者中，除了不动山的20名外，其余根本不知道怎么样了。箱根队的士兵们将交通壕里的尸体扔进山谷，或埋在山上。为了处理这些尸体，他们竟干了一两个小时。

8月10日晚上，为阻止苏军35吨重中型坦克的进攻，虎啸山阵地的日军组织了与苏军坦克同归于尽的“特别肉拚班”，也称“肉弹”、坦克攻击班，以消除苏军坦克对虎啸山阵地的威胁。同时，趁夜晚日军派15名士兵将丢弃在不动山阵地战壕中的1门速射炮和18箱炮弹（穿甲弹30发，榴弹120发），抢回到虎啸山阵地。

8月10日当天，苏第35集团军又推进15～25公里，步兵第1058团从南面迂回虎头，在该镇南郊投入战斗。步兵第1056团在第109筑垒地域各分队配合下同日军展开争夺东郊码头的激烈战斗。日军拼死抵抗并两次发起反冲锋。苏军击退日军反冲锋后，步兵第264师各团三面包围，同时发起冲锋，当日攻占码头和虎头镇。日军继续困守虎头要塞阵地各支撑点负隅顽抗。当日白天，苏空军猛烈轰炸日军虎头要塞各支撑点。步兵第1056团和第109筑垒部队再次发起对虎头要塞各支撑点的攻势，并切断虎啸山和猛虎山两阵地间的联络。各支撑点的日军守备部队凭借工事仍继续坚守，利用地道迅速实施机动迂回穿插战术，从翼侧和后方对封锁各要塞支撑点的苏军进行反击，仅一天内苏军第1056团就击退了日军四次反冲击，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当日夜间，苏联空军再次猛烈轰炸了虎头要塞日军各支撑点。在空战中，歼击航空兵第22师的飞行员切列普宁中尉表现得非常出色。在短促的格斗中，他用自己机翼撞击日军战机尾翼，击毁了日军战机。为表彰切列普宁中尉的功勋，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

8月11日早晨5时，苏军仍然用重炮对日军阵地进行彻底炮击，准备第二次总攻。日军也以大口径榴弹炮对准苏境拉佐水塔轰击，但因距离太远而未达到目的。这时，苏军穿插分割，逐步压缩和各个击破的战术逐渐奏效。6时左右，苏军乘11辆汽车由月牙开往飞机场、边连子山一带，另有一批装甲车和汽车也从虎头北面向莺谷方向驶去。

与此同时，日军速射炮分队开始进入阵地进行部署，分队长布施和田原一次又一次地掰下树枝，着手用大小树枝隐蔽炮身。其他人也各自忙碌着，有的整理弹药箱，有的修补破损的箱子，有的擦拭炮弹上的泥土并摆放规整。放在弹药室正下方的箱子里，交替排列着穿甲弹和榴弹。交通壕的泥泞道路上，步兵队的士兵们也在穿梭不停地忙碌着。

上午8时，日军进行总部署。他们仔细地保养大炮，涂上了油。士兵在交通壕里散开，随时随地注视苏军情况的变化。此时出现三五个苏军士兵的身影，正在接近前沿阵地时，呼啦一下散开又不见踪影。在月见丘官舍附近，苏军布置了迫击炮阵地，有2辆中型坦克在砂利取山的台地上缓慢地行进。

9～11时，苏军2个连队包围了日军边连子山阵地，占领了靠虎头镇阵地的一座小山。虎东山的日军此时也和临江台方向的苏军展开战斗。

日军炮兵第2中队再次进入对苏军戒备状态，分队长冈崎哲夫站在速射炮旁边。交通壕里不时响起激烈的射击声，随着士兵中间涌动起一片嘈杂声。观察后发现，苏军1个分队正悄然无声地行进

在月见丘军用道路上。在他们的旁边，几辆坦克在缓慢地往上爬行。

突然，平顶山背阴处出现了苏军坦克，距离不足500米。日军似乎像凝结了似的沉默着，一直在等待炮击的时机。坦克沿着军用道路呈一直线驶来。

坦克更接近了，终于开到了公路中央。

这时，日军的速射炮突然开火。交替发射榴弹和穿甲弹，穿甲弹不击中坦克躯体就不会爆炸，而榴弹即使在接近目标的距离内爆炸，也有破坏性的效果。但如果要击毁坦克，就必须是穿甲弹。因此，交替使用两种炮弹对苏军坦克进行炮击。



苏军步兵随同坦克进攻

2辆坦克突然发出高亢的轰鸣声，从尾部喷射出浓浓的烟幕，立刻高速撤离。速射炮慢慢地倾斜炮口，发射的炮弹从望远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对面的道路上炸起腾腾烟柱。

速射炮依然在连续炮击。苏军1辆坦克撤往月见台方向，被击中履带的另1辆坦克慢慢地开动起来，利用单侧履带，像爬行似的在原地打转，然后缓缓地摆动着爬行。一会儿，坦克摆正了黑黑的平坦躯体，又长又大的炮口对准日军阵地方向，随后就这么一直停在那里一动不动。日军的速射炮弹连续在坦克周围爆炸。这时，苏军坦克炮口轰然喷出火舌。炮弹在远离交通壕下边的山腰处爆炸，弥漫的飞尘使日军眼前一片昏暗，爆炸声发出可怕的声响，那巨大的爆炸力令日军士兵吃惊。其威力至少在日军速射炮的两倍以上。

苏军第二发炮弹把交通壕上方的山腰炸得“翻了个儿”。日军已发射炮弹60～70发仍未击中苏军坦克的要害处。而苏军坦克的炮弹打出几发之后，正在越来越接近速射炮阵地，使日军非常惊慌。

终于日军速射炮阵地被苏军坦克的第六发炮弹彻底摧毁了，分队长冈崎哲夫也身受重伤。

日军的速射炮阵地上，炮、人、交通壕、堤坝及其周围的树木，一切都已化为乌有。那里的地表被深深地剜去一层，只留下个巨大的如喷火口一样的洞穴。

速射炮已被炸得七零八碎，炮轮只剩下破碎的残片凌乱不堪，铁板被撕得如同一块破布片，炮身倾斜着。瞄准镜、摇把、撞针等零件，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除了被弃置的铁屑外，满地都是泥土和沙石。

下午3时，边连子山和虎西山顶先后被苏军占领，虎西山已成为苏军的观测所。虎头台附近苏军约1个营兵力向日军司令部官舍进攻，不久占领该官舍，并派2个连队向日军395兵营进攻。诚心谷日军阵地上火炮已不能发射，30名日军和苏军3个连进行激战后，将炮炸毁退却。晚上7时，虎东山阵地被苏军2个连占领。此时，日军已被压缩到猛虎山主阵地附近。

8月12日上午，苏军炮兵利用占领的日军边连子山和虎西山的两个观测所，更加准确地炮击日军阵地。并发起第二次总攻击，空陆相互呼应，以优势的兵力和火力对日军火炮阵地及要塞设施进行毁灭性的破坏，苏军步兵攻击部队在坦克掩护下，与日军在各阵地前展开白刃战。

下午4时，苏军2个连队约400人和8门野炮从虎头台攻入日军炮兵851兵营；莺谷附近的苏军2个连队也攻入了日军506兵营。乘天黑，苏军侦察兵及步兵深入到猛虎山阵地，与日军在各处阵地交战。晚上7时，苏军2个连队又包围了临江台日军薄井小队。激战后，日军撤离阵地，钻进虎东山地下工事防守。

8月13日清晨，攻入851兵营的苏军又从莺谷方面调来8门野炮开始向猛虎山轰击，并派出1个连的兵力向西猛虎山阵地进攻，日军原田中队在西反击口迎战，双方展开手榴弹战。8时左右苏军攻

克了西猛虎山，并在山顶上插上红旗，架上机枪。同时，约1个连的苏军开始向中猛虎山进攻，日军工兵小队出洞迎击，被苏军歼灭。此时，苏军已一举占领了猛虎山一带大部分日军阵地。占领山顶的苏军士兵利用通风口、烟道竖井等向地下灌注汽油、投放炸弹等，地下工事内浓烟密布，许多日军窒息死亡。与此同时，守卫虎北山的樱井中队与从袋谷攻入的苏军2个连在山顶展开激战。上午10时左右，日军组织敢死队与苏军2个连队在西猛虎山顶展开激战，并夺回苏军占领的阵地。苏军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又冲杀上去，双方形成拉锯战。这时守卫在猛虎山、虎东山、虎北山的日军倾巢出动，在炮兵掩护下，又从苏军手中夺回了阵地。

下午3时，乌苏里江对岸苏军炮兵，以强大的火力展开了连续炮击，日军1门大口径炮因人员不足，加上多处被炸，已不能使用。下午4时，从完达车站攻入的苏军，在堑壕中待命，在苏军炮击结束时，再次进击西猛虎山。晚上8时，苏军约200人包围了日军炮兵阵地，另外从南反击口进攻的苏军再次攻下西猛虎山阵地。

虎啸山整个阵地笼罩在激烈而紧张的气氛之中，伺机作战的命令已于昨日下达，而无意中未下达休息令。苏军的迫击炮集中炮击，目标是虎啸山地下工事正面入口和大虎啸山顶，炮击整日整夜无休无止。虎啸山地下工事正面入口警戒、大虎啸山的警戒以及两地之间的联络，仅可乘炮击间隙时间断断续续地勉强保持着。由于不得已而暂居地下工事中的士兵使得栖息所内拥挤不堪，他们全神贯注，都集中在头顶上看不见的高处，所有的人都屏息静听，辨别一切音响，推测战况的变化，头脑中每时每刻都在描画着战场变化的情景。迫击炮弹的爆炸掀起飞溅的沙土，遮蔽盖板崩塌了，地下工事的水泥渐渐剥落。

当天下午，大虎啸山被苏军占领。驻守的日军1个警备分队全部死亡。虎啸山方面已自顾不暇，再无多余兵力可以增援了。

大虎啸山是虎头要塞第三地区阵地，为虎啸山阵地的最高峰。由于该地是制高点，可以俯视阵地全貌，所以虎啸山、平顶山两处地下工事的出入口、交通壕及步哨通道大部分都已落入苏军视野范围之内。

地下工事顶部的观测井传来报告，大虎啸山的苏军兵力已减少到1个排，兵员20~30人。全体人员携带狙击枪或自动步枪，另有装备两挺轻机枪的重型步兵武器的步兵，他们固守在大虎啸山地下工事被毁坏的暗堡里。

从虎啸山地下指挥所正门入口或背后反击口两处到大虎啸山顶，直线距离大约都在300米之内，即使穿过山涧，也大约只有600米左右。苏军是在令人吃惊的最近距离布置了前沿阵地，什么时候都会发起进攻。两军仅相隔一条山谷。

当天，中猛虎山日军死伤者已达200名以上，医务所里早已满员，于是开放中猛虎山弹药库作为患者的收容所，以后伤员数量越来越多，在猛虎山最后的日子里，弹药库里的收容人数超过了500名。

中猛虎山弹药库宽约5米，高4米，纵深达20米。要让200名伤病员躺卧是很困难的。换句话说，患者收容所实际上就是停尸房。13日以后，山下的尸体已无法收拾，干脆弃之不管了。由于地下工事内和病房里的尸体不能往外处理，只好一个一个码放在弹药库里边的墙边，数量多达300具。那些尸体就像米袋子内外排列三层堆到天棚顶，地下工事简直成了可怕的墓穴。码放尸体旁边的地板上，躺着近200名伤员。

8月14日清晨5时，守卫在猛虎山的日军原田队，在野炮掩护下，突入西猛虎山顶，拔掉苏军红旗，夺得了两挺机枪，收回了西猛虎山阵地。

早晨7时，苏军在坦克、飞机、大炮的猛烈火力掩护下，再次向猛虎山阵地展开进攻。

苏第35集团军第66师师长柳辛科夫少将亲自指挥了这场战斗。他是个不到30岁的小伙子，在苏德战场上打过不少硬仗。此刻，他手持望远镜，站在对面山头的1辆坦克车上，兴奋地观看着自己的部队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猛虎山。极短的时间内，尖刀团队就冲过了山前的开阔地带，靠近了山

脚。进攻发展得如此顺利,这是他事先未曾料到的。

柳辛科夫正要命令炮火延伸射击时,猛然怔住了。原本悄无声息的猛虎山,突然从山体里喷射出无数条火舌,将一片片苏军士兵舔倒在山脚前。继续前进的士兵,踏响了日军预先埋设的地雷,一声声爆炸的巨响,震得大地乱颤。

片刻之间,猛虎山下变成了一个屠宰场,几百名苏军官兵的躯体血肉横飞。硝烟散去,尸体几乎覆盖了山脚。柳辛科夫马上组织了第二次、第三次冲锋,但几乎都遭受了与第一次相同的命运。柳辛科夫长嘘一口冷气,粗黑的眉头痛苦地扭在了一起。



苏军炮击日军阵地



苏军发起冲锋

猛虎山阵地的火力点并未设置在表面阵地上，当苏军的炮火进行猛烈轰击时，日军则躲进山体内。苏军步兵冲击到山脚前时，他们才从山腹中钻出来，毫发无损地进行抵抗。

柳辛科夫又组织了第五次进攻。

这一次，苏军突击部队做了梯次排列。前面是8辆坦克冲击开路，步兵分成多路小股尾随在坦克之后，炮火准备的时间也由通常的30分钟延长到40分钟。攻击实施前，铺天盖地的炮弹将日军早些时候埋设的地雷、炸药基本廓清，10余架米格战斗机围绕着猛虎山上下盘旋，从空中用准确的机关炮打击阵地上的日军，为地面进攻部队清除障碍。

下午2时15分，苏军终于登上东、西猛虎山，准备再次集结兵力，向虎北山合围。突然，战局发生了变化。隐蔽在山后的日军炮阵地，出其不意地向占领两山表面阵地的苏军实施猛烈炮击。浓稠的黑烟尚未消散，山洞里的日军便从秘密通道里冲了出来，山头上立刻呈现出白刃相接的厮杀场面。

刚刚冲上山头的苏军只有70~80人，既无重兵器，又无工事依托。但战士们打得很英勇。子弹打光了，便同扑上来的日军进行肉搏战。拼刺英雄尼古拉·基罗瓦抓起日军的一支步枪，同4个日军士兵拼杀在一起。日军虽然刺杀动作娴熟，训练有素，但在身高体阔、威风凛凛的基罗瓦面前却占不到丝毫便宜。基罗瓦正面佯刺，待背后的日军扑上时，灵活地闪身，大喝一声，用枪托猛力磕开后面士兵的脑壳，接着一个漂亮的偏刺，刀刃又戳进了右首一个大块头士兵的腹部。剩下的两个日军趁基罗瓦刺刀尚未拔出的瞬间，一左一右猛然突刺过来。基罗瓦拄枪一跃，避开日军的刀锋，回身一脚，将左边的一个踢下山岗，最后一个日军见势不妙，转身便跑。基罗瓦将手中的步枪奋力掷了出去，步枪如标枪一样划了个弧线，刀刃从日军的后背透胸穿了过去……

山脚前8辆苏军坦克上的105毫米滑膛炮发挥了巨大威力，它用近距离的准确射击，压制住了日军反冲锋的火力，为山头上的步兵提供了有力的援助。

面对苏军坦克的强大攻势，日军指挥官大木正大尉采取了“肉弹”自杀式的攻击手段，以炸毁苏军的坦克，阻止苏军的进攻。15名疯狂的“肉弹”以攀登、贴近、悬挂等方式接触到苏军坦克后，纷纷拉响雷管，引爆周身缠满的炸药与苏军坦克同归于尽。“肉弹”的攻击使苏军坦克损毁严重，当场就被炸毁4辆。见此情景，苏军指挥官立即命令狙击手，消灭日军的“肉弹”。在苏军狙击手精确的打击下，一个个“肉弹”被击中，周身缠满的炸药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肉弹”被炸得粉身碎骨。

8月14日，苏军占领日军地面阵地后，秘密设置了大量的阻击阵地，派出了多名狙击士兵，将日军地下工事的出入口死死封锁，对钻出地下工事的日军准确地射杀。切断了日军所有的地面联络和食品、水源供应，将日军困死在地下工事中。

8月15日早晨6时，苏军在虎头街北侧部署了10厘米榴弹炮4门、20厘米榴弹炮2门、野战炮4门，日军炮兵阵地对其展开射击，苏军重炮再次从对岸开炮，支援虎头街北侧炮兵。上午7时，苏军部署的各炮一起打响，对猛虎山、虎北山阵地进行连续炮击。日炮兵受地形限制，只能勉强应战。进攻的苏军愈战愈勇，有2个连的兵力径直向日军重炮阵地猛虎原冲去。

日军炮兵阵地受到苏军狙击兵的数次攻击，并且一次比一次猛烈。日军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好不容易才击退苏军。

环视虎头周围任何地区，到处都是苏军的地面部队。数十门野战重炮、数十辆坦克、数百辆卡车及各种车辆、一个师的步兵，同一片葱绿的草木，以及凹凸不平的大地交织在一起，黑压压地布满大地。

然而，日军守备队最基层的全体士兵，并没有明确认识到这一事态的严重性。看少数军官眼色行事的大部分士兵，在地面作战中，只关心个人身边的危机，遁入地下工事之后，对于外部的情况一无所知。由于他们奔走于枪林弹雨和战斗行动之中，陷入了一种异常的心理状态，几乎完全丧失了一般的理性和常识。

他们翘首以待，盼望来自后方的援军到来。

事实是这样的：几天过后无线电通讯突然中断（开战后几个小时，日军改变了通讯密码，虎头方面又没有收到任何新的电码表，密码通讯已不起作用），中猛虎山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终于改装成无线电接收机。他们仍然坚信："日军没有受到重创。"

当天中午时分，收音机清晰地收听到东京广播，那是日本天皇的电台播音，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天皇的"玉音广播"，像是患了感冒似的，声音模糊得听不太真切，所以守备队的将校们都不相信是"玉音"（此前天皇似乎从未站在麦克风前讲话，所以难以判断其真伪也是有道理的）。

"混蛋！"守备队长大木正大尉怒斥道。

"关掉收音机！哪里有什么陛下的广播，分明是削弱日军战斗力的谋略性广播。"

这一句话，具有不容反驳的权威性，支配了所有在场的人。午后，守卫在猛虎原重炮阵地的日军竹恒队曾一度撤退，在15厘米加农炮阵地守卫的川崎队增援下，大仓班长带领50名士兵再次守卫此阵地。下午2时，部署在虎头街北侧的苏军10厘米榴弹炮4门、20厘米榴弹炮2门，向飞机场转移。下午3～5时，进攻的苏军2个连队，在日军15厘米加农炮正面与日军展开肉搏战。与此同时，另1个连的苏军出现在该阵地背后，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手榴弹战，后在同阵地的日军用野炮平射才击退苏军。

晚上9时，大木正大尉命令中野副官，在午夜12时，组织见习士官以下的人员建立强有力的穿插部队，潜入虎头街苏军阵地，特别是奇袭苏军的重炮。正在此时，苏军的15辆中型坦克正沿军用道路北上，从猛虎谷迂回巨炮阵地和西猛虎山阵地，逐个对地下工事出入口、巨炮炮塔阵地进行炮击后，向完达车站方向驶去。当天，日军炮兵1中队全部被歼灭。

当晚，以见习士官为指挥的日军突击队向虎头街苏军指挥所进攻，并毁掉苏军2处兵营。苏境伊曼市当晚则取消了灯火管制，市区内灯火辉煌。

8月15日夜晚，日军决定夜袭月见丘的苏军，并进行爆破，准备乘深夜摸进苏军阵地，投掷强力火药。派出三四组人员行动，最后只越过铁刺网勉强进入苏军阵地。由于眼前潜藏着苏军监视的目光和枪口，既不能前进，也无法后退，长时间地俯卧在草丛中，直到拂晓才好歹撤了下来。根据这种情况，日军得出一个结论：即使虎林的日军还照常存在的话，虎头的命运也快接近尾声了。虎啸山阵地的毁灭已难以避免，问题只在于时间的早晚而已。苏军发起总攻击的那一天，将决定地下工事的命运。

8月16日，苏军为了减少突击部队的伤亡，柳辛科夫少将命令炮兵团将火炮推上前沿，在日军猛烈的迫击炮和机枪火力下占领直接瞄准射击阵地。

这是一个决定性措施，苏军的炮火立刻显示出威力，日军的火力点只要一曝出火光，就会立刻召来数十发炮弹的平射轰击，有的炮弹竟直接飞进了洞口，在洞穴里面爆炸。

在这场战斗中，苏军独立炮兵第97营的官兵们表现得十分突出。

苏军第109筑垒地域独立炮兵第97营的1个炮兵连，在连长菲利莫诺夫上尉指挥下，奉命以直接瞄准射击摧毁虎北山日军永备火力点，保障第109筑垒地域各突击组攻占高地。

在战斗中，有1门自行火炮在进入发射阵地的瞬间，牵引车驾驶员中弹牺牲了。火炮倒拖着失去控制的牵引车顺坡滑向日军的堑壕，停在胸墙附近。大木正大尉发现后，命令日军用手榴弹和炸药包将其炸毁。

苏军连长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炮救出来。他率领一组战士在其他炮兵班的支援下，冲了上去，占领了堑壕，并与从地下工事里钻出来的30多个日军士兵展开了白刃战，双方肉搏绞杀在一起。刀刃的撞击声，突刺的吼喊声，粗重的喘息声，受伤的惨叫声不绝于耳。

半个小时后，苏军终于将炮拖回了发射阵地，这次白刃格斗杀死了约30名日军。

战斗中，菲利莫诺夫上尉负伤不下火线。炮兵连以直接瞄准射击摧毁了日军的永备火力点，保证了突击组行动的成功。

也是在这一天争夺虎北山的战斗中,炮兵第97营1连战士上等兵柳比莫夫奋不顾身,发扬了英雄主义的精神。炮兵连在距日军永备火力点300米左右时开火射击。突然,从暴露的翼侧方向,日军土木质火力点内机枪向炮兵连扫射过来。柳比莫夫扑向火力点,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射孔。

同一个炮兵第97营的共青团员、上等兵萨马林,在连长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刻,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了连长。

苏军又一次攻上了虎北山,与日军展开了地道战。苏军封锁了所有的出口,用火焰喷射器烧,用发烟罐熏,用手榴弹炸,大木正大尉率领的核心卫队蜷缩在山腹中,拒不投降。

柳辛科夫已经为夺取虎头要塞付出的惨重代价急红了眼,他发恨地命令工兵营,搜索地道的出口,用炸药将所有的地道出口炸塌,要把这些魔鬼活葬在大山里……

下午2时,虎啸山地下工事中的大部分日军士兵靠在长椅子上打盹儿,有些士兵在悄悄地交谈着。突然,轰隆一声惊天动地的声响震动了地下工事,在爆炸声响起的同时,地下工事后出口被爆破崩塌。那是由于哨兵只考虑到苏军狙击枪弹,而未想到来自大虎啸山方面的苏军,而苏军正是乘哨兵疏忽打盹的间隙对虎啸山进行了偷袭。

下午3时,苏军萨里斯基军事区重炮开始对莺谷、东猛虎山南侧和猛虎山主阵地射击。下午4时,猛虎山阵地再次被苏军攻陷,并在地下工事入口处投放炸弹。下午5时,日军炮兵开始用15厘米加农炮对猛虎山阵地上的苏军射击,将苏军再次击退。此时萨里斯基重炮仍不断射来,日军重炮亦予以报复性射击。下午5时30分,苏步兵在重炮射击后再次攻击猛虎山顶,双方经激烈射击,苏军撤退。

8月17日上午10时,日军野炮部队炮击了从虎头街开来向虎头台转移的苏军4辆坦克。下午1时左右,苏重炮从对岸一齐发射炮击猛虎山阵地,随后部署在日军阵地前方的苏军野炮、野战重炮也对猛虎山阵地进行榴弹射击。与此同时,苏40架战斗机飞临日军阵地上空,进行猛烈的机枪扫射。下午2时,部署在851兵营方向的苏军迫击炮、火箭炮向日军猛虎谷炮阵地开炮攻击,并切断一切通讯线路,使日军失去相互间联系。下午3时,苏军在上述火力掩护下,以2个连队兵力向西猛虎山进攻,1个连队向猛虎原重炮阵地进攻。下午4时,苏军占领西猛虎山顶,并部署2门火炮,对剩余日军观测所进行摧毁性炮击。晚上9时,苏军中型坦克再次攻入猛虎山,从最近距离向地下工事入口和猛虎谷日军炮兵阵地炮击后撤离。

当天,虎啸山地下工事日军难以容忍大虎啸山苏军的存在,向苏军阵地发动了总攻击。攻击之后,阵亡、下落不明者达30名,此时阵地上的兵员仅剩下75名,其中伤病员就占了三分之一。

8月17日,日军虎头要塞虎北山地下工事中的指挥官大木正大尉及以下约200名官兵(包括20多名慰安妇),引爆了工事中存放的约百吨炸药,葬身在山腹中。

8月18日,苏军指挥部向日军守备队发出最后通牒,但日军残余官兵仍坚持顽抗。凌晨3时,苏军2个连队经东猛虎山欲袭击猛虎原日军炮兵阵地,在东反击口附近被日军击退。早晨5时,日军在炮兵掩护下,对苏军进行小反攻。上午8时,根据日军侦察兵报告,拥有大量火炮的苏军部队正在集结中,先遣部队已向临江台进发。上午9时,苏军炮兵已对日军设置在北见台15厘米榴弹炮4门、砂利取山附近的20厘米榴弹炮2门、10厘米加农炮4门及莺谷附近的15厘米榴弹炮4门等全部进行包围。猛虎谷炮兵虽全力对苏军进行阻击射击,终因炮弹不足而不能达到目的。中午时分,苏军炮兵开始对猛虎山阵地进行破坏性轰炸。此时,猛虎山地下工事内因瓦斯聚集大多处于混乱状态,指挥联络失效。各工事地下入口都布上了地雷,日军地下阵地只能备好警卫部队,进行严密地监视。下午2时以后,守卫在猛虎山阵地的日军原田队,在工兵小队和炮兵队的协力下,击退前来进攻的苏军。

下午4时,在虎啸山阵地西侧月牙方面,苏军2个营在沿虎啸山山麓的虎林公路上行进,消失于薄暮朦胧中的虎头镇。那是以重炮、野炮、牵引车等步兵、炮兵组成的庞大混合部队,威风凛凛地在最近距离示威性地走过,仿佛是在嘲弄日军寒酸的武器装备。日军阵地上一片骚然不安,但未敢动手反

击，有些吓破了胆，茫然若失地在山上观望着为这支队伍送行。

8月18日下午，苏军向猛虎山日军阵地派去了以日本在虎头附近的"旭"开拓团在乡军人分会长、预备役陆军中尉白井为首的一行5人劝降代表（其他为朝鲜人）。猛虎山阵地的日军拒不接受苏军的劝降，并由一名副官将劝降的日本人白井用战刀砍死。

同日晚7时，由日军炮兵下士官为首组成了2个敢死特攻队，对设在砂利取山、莺谷的2处苏军炮兵阵地进行了自杀式袭击。

8月19日，苏军对拒不投降的日军，决定给予严惩，将各攻击目标都对准猛虎山地下阵地。经过苏军猛烈的攻击，猛虎山日军主阵地各个出入口和反击口已全部被毁，苏军的包围圈逐渐缩小，日军各工事阵地陷于孤立。

早晨，苏军占领了东猛虎山顶，并设立了前进观测哨所，动用了所有可以投入作战的一切装备，猛击日军阵地，使日军的通讯几乎断绝，炮塔式15厘米加农炮已不能使用。苏军发射的炮弹在无休止地爆炸，无数的巨大块状物和断片被高高地抛向天空。虎头周围一带笼罩在闷雷般的爆炸声中，地下工事各处的混凝土掩体出现了严重的崩裂，伴随猛烈的震动又出现裂缝，并发出巨大断裂音响。

上午8时，苏军火箭炮向中猛虎山及猛虎谷日军炮兵阵地进行猛烈射击。同时，从莺谷附近开来装备优良的苏军3个连队，与日军展开肉搏战，中猛虎山一带再度被苏军攻占，攻入猛虎谷炮兵阵地的苏军，击溃了全部日军。

苏军火箭炮轰击日军阵地

下午5时，苏军8门15厘米榴弹炮搭载自行火炮，从司令部兵舍出发，向猛虎山日军阵地驶去。

苏军的这种自行火炮各自连接钢铁弹药车2辆，上面各架1挺水冷式马克西姆重型机枪，威严地注视着前方。各车辆周围有狙击兵数十人，保卫和警戒着前进。而此时日军阵地上已经没有1门可用于远距离作战的火炮了。

近30辆苏军野战重炮车队，从虎头台边的树林子边缘渐渐露出了全貌，长长地排成一列，开始对残留在主阵地上的日军进行最后的炮击。

炮击射程距离都在300米左右，所以每一发炮弹都是致命的打击。日军均躲在地下工事中，无力反击苏军的进攻。

各反击口塌落下来的水泥块，每次堵塞通道后再由下一次爆炸掀往别处，这样一来，一次又一次崩塌的水泥块和沙石几乎掩埋了出入口，炮弹的爆炸引发了埋在附近的地雷，到处都掀起沙石、烈焰。

日军猛虎谷15厘米口径加农炮炮塔群，也被炸开巨大的缺口，已经彻底毁灭。猛虎山原大口径炮炮塔，也终于被钻入水泥壁里的重型炮弹击中，引爆了剩余的炮弹和炸药，在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

炮塔被掀起,仅留下了半球形护盖的基础部分。虽已呈现土崩瓦解的状态,但仍然是苏军重炮弹轰击的目标。

在西猛虎山阵地,到19日早晨,日军步兵第3中队还有近百名生存者,其中包括步兵第4中队的兵力。

下午,苏军在地下工事入口处布置了重机枪,对着地下工事通道内进行猛烈地扫射。几发重炮炮弹击中入口,沙土掩埋了入口,日军被活活埋在地下工事里了。

苏军从换气孔注入的汽油爆炸后产生的有毒气体,慢慢地向地下工事纵深渗透。

同一天,苏第35集团军由两翼向日军阵地发起攻击,并调来203毫米火炮、34门大威力火炮及火箭炮配合作战。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日军虎头要塞各制高点均被苏军占领,日军已无险可守,实力也消耗殆尽,转入地下工事负隅顽抗。

苏军攻占了日军守备队本部,中猛虎山、东猛虎山阵地日军守备队步兵第1中队、步兵队本部、步兵炮中队、炮兵队本部全部被歼。

8月20日凌晨2时,苏军袭入猛虎山主阵地,掘开地下工事入口,直接攻入地下阵地,猛虎山主阵地被彻底摧毁。

8月21日,西猛虎山步兵第3中队被苏军歼灭。

伴随猛虎山阵地的毁灭,枪炮声在乌苏里江畔完全消失了。同猛虎山隔开的要塞地区后方的虎啸山,有50余名幸存者,他们处于疑虑猜测境地。

8月23日上午,日军哨兵突然报告:"猛虎山上发现敌军!"阵地上立刻一片骚动不安。

如沙丘崩塌裸露出红壤的猛虎山顶上,隐隐约约地有东西在蠕动,像黑色的棋子一样。从望远镜里才看清红旗在山顶上翻飞,有十几名苏军士兵在活动。位于山腰的地下工事入口,以及破碎不堪的炮座通道那黑糊糊的四方洞穴一边,停放着苏军的卡车。

爆炸的浓烟升腾在猛虎山各处,尘埃飞扬,高于猛虎山的几倍。这是威力非常强大的炸药,以致爆炸接连不断,烟尘更加猛烈地腾空而起。更远的虎东山阵地的情况也是如此。

猛虎山山上的日军毫无抵抗能力,似乎完全沉睡过去了一样。这使日军意识到猛虎山和虎东山两地守军也被全部歼灭了。

位于虎西山麓的陆军医院建筑物上,红旗高高地飘扬,汽车来来往往,那里已经成为苏军的指挥本部。

士兵们久久地停在交通壕里,呆滞的目光凝视着远方。当太阳沉没在沼泽地尽头的时候,士兵们就像一群窝囊废似的,一个个都无精打采的样子。此时,他们知道休战的幻想彻底粉碎了。

8月24日,苏军已在月见丘官舍台附近部署了阵地,沿途经常有少量队伍调动,官舍下边的洼地里又配备了几门迫击炮。

8月26日早晨7时,虎西山下的苏军步兵部队,开始大规模移动。

苏军的巨炮和野战重炮,从虎头镇方向开进月见台官舍背后、砂利取山的隐蔽地点。

上午8时,在虎啸山周围地带苏军阵地上,配备重迫击炮20门、20厘米口径榴弹炮4门、15厘米口径榴弹炮6门,大约有2个营1 000名步兵呈密集队形散开。

上午9时,苏军炮兵部队大致到达腰营桥一线,距离虎啸山日军阵地约2 000米左右。稍过片刻,苏军从视线中消失,苏军并未过桥,在堤坝下部署了阵地。

大约过了3分钟,有一种异样的声音伴着几个物体超低空地掠过。突然,巨大的轰鸣震动了山谷,像天上落下无数雷鸣。眼镜山通往虎啸山的山谷处,如同火山爆发,烟雾弥漫,尘土飞扬,像旋涡一样冲天而起。

遥远的腰营桥麓,拖得长长的烟像彩霞一样,那烟幕从爆炸点到处接二连三地喷涌而出。重炮弹一个接一个地在日军头顶上爆炸,天空中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大地在颤抖震荡。

炮弹爆炸后，无数弹片四处飞溅，发出螺旋桨一样的呼啸声飞向各处，一块弹片掠过日军头顶，令人心惊胆战，最后落在山谷间的树丛里，劈裂了大树。

犹如火山的喷火口，奔腾在山峰相连的山脊线上。哪怕是重炮弹的一块炮弹皮，也具有相当于迫击炮弹几倍的杀伤力。重炮的集中炮击由眼镜山凹移向虎啸山背后的山地。苏军正在狙击地下工事背面出口。

此后过了大约20分钟，炮击突然停止。同一时刻腰营方面也中止了炮击，苏军将转入下一个预定的行动计划。

苏军的步兵开始行动了，眼前响起激烈的枪声。苏军步兵在对面交通壕布置了第二线，自动枪打得掩体上沙土飞溅，几名日军士兵战斗在对面的掩护阵地里。他们失去了进入地下工事的机会，由于混战而留在苏军阵地里，他们用单发枪应战，完全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射击更加猛烈了，日军士兵拼死展开防御战，在其他日军士兵手榴弹的攻击下，苏军开始撤退。

枪声渐渐稀疏，继而便完全停息了。此时已过了中午。半个小时后，突然天空又出现3发信号弹，接着苏军又开始了第二次炮击。

虎啸山地下工事的后侧，在每一发炮弹的轰击下崩塌着，山崖塌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平地，交通壕已被炮火掩埋，形成广阔的沙砾场，仅留下的那些小树丛也被炮火成片成片地削去，掀落在谷底。地下工事背后出口的水泥壁毁于重炮弹而彻底崩溃，最后只剩下一个小小的洞穴。

……炮击终于停息了，一阵猛烈的自动步枪齐射。

"乌拉！"呼喊声带着余音在四处响起，没有任何回音。

日军突然发出"哇呀！"的叫喊声，立时响起一阵手榴弹爆炸声和机关枪扫射声，噼噼啪啪地乱成一团。双方在地下工事正门口进行殊死的搏斗。

"哇呀！"日军又一次发出叫喊声。

"乌拉！"苏军也发出一阵喊叫声。

集团和集团之间的格斗又进行了两三次。

这时，后方出口的苏军士兵已集合在被破坏的地下工事前面，向里面窥视着，稍远处架起了重机枪，不时瞄准地下工事通道喷出火舌。

两个苏军士兵拖着一个大帐篷包裹，一下一下地磕打着前胸搬运包裹，一辆小车停靠在山崖背阴处，那两个士兵双腿用力交叉蹬着地面，把包裹装上车。别的小组又搬来相同的包裹装上车，车上有3个那样的包裹堆成一座小山，一个人在后面推着，小车开始前进了，苏军士兵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远处。

那个人还在推着小车往前走。

小车咣当一声顶在地下工事入口的墙壁上，突然一下子坠入地下工事通道。

2秒、3秒、4秒，轰隆一声升起了冲天大火。大气受到意外的强有力的冲击，爆炸出的轰隆声震撼大地，从巨大的烟尘下端接二连三地散落下沙石。这时，从阵地正面方向传来了高亢的喊声，随后双方的喊叫声停止了。枪炮声也完全消失了。

与此同时，虎啸山如火山爆发，烟尘四起。

大气像石头一样发出瞬间的鸣叫声，从地下工事正面越过山峰传来轰隆隆的音响，再次震撼了整个山头。……时间恰好是下午3时。

地下工事一个接着一个爆炸，从分水岭两侧的喷烟，越过山顶冲入云霄，将山地整个儿包围了。

从渐弱的烟幕空隙中，可看见红色的山体时隐时现。接着一个更猛烈的爆炸，烟雾更加浓烈，烟幕隐没了山峰。

虎头要塞战斗示意图

本图选自〔日〕冈崎哲夫《日苏虎头决战秘录》

8 月 26 日下午 3 时 30 分，虎头要塞终于彻底宣告覆灭。至此，历时 17 天的虎头要塞战役结束了。虎头要塞各支撑点的日军守备队计 1 387 人，除 53 人突出苏军包围逃离阵地外，其余全部被歼灭。加上收容在要塞内的日本守备队家属和武装开拓民，死亡人数超过 2 000 余人。苏军伤亡人数也超过 2 000 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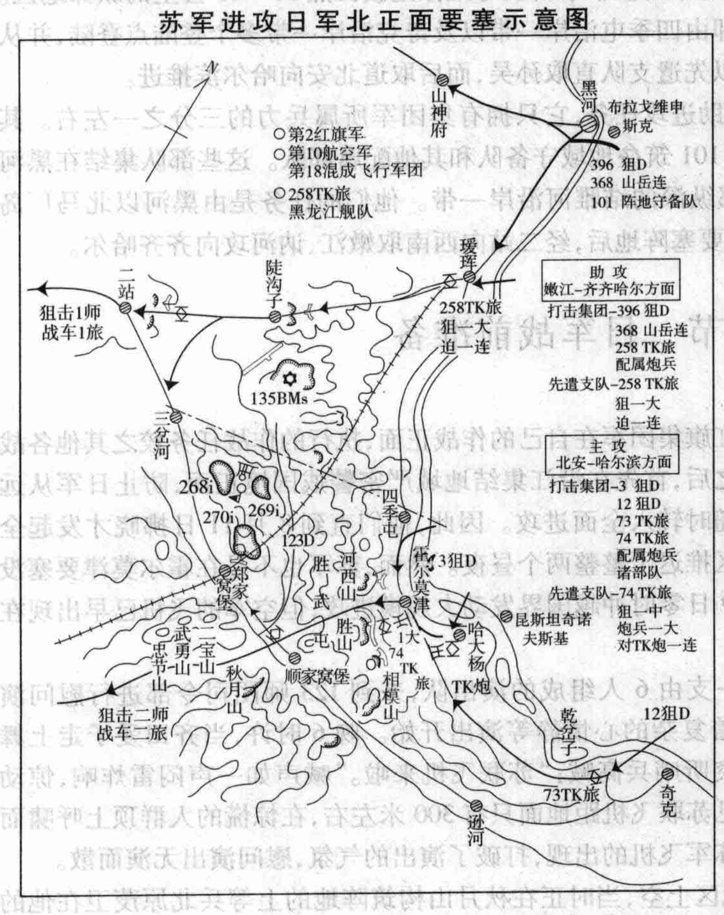
攻克虎头要塞后苏军第 264 师部分官兵合影

第九章　苏军攻克霍尔莫津要塞

第一节　苏军的进攻部署和准备

苏联红军在以孙吴为中心的关东军北正面进行作战行动的是第2远东方面军所属的红旗第2集团军隶下的各步兵师和配属的各坦克、炮兵、黑龙江舰队、水上舰艇和航空兵等。

第2远东方面军尽管无论在兵员编制或是在火炮、坦克等重武器装备的数量方面，在苏联远东军的三个方面军中都是规模最小的。但它承担的作战正面却相当可观，即从黑龙江上游到下游末端的沿江全部国界，约2 900公里，第2远东方面军把这个展开正面分为左翼和右翼两个作战集群。左翼的作战正面是从黑龙江下游萝北、同江到抚远一线的沿江地域和乌苏里江国界全线。左翼是第2远东方面军的主要突击方向，这里集中了方面军所属9个步兵师中的6个（占步兵师总数的66%以上）。同时，配属于该方面军中苏国界地区的各特种兵部队也大多集中在此线，例如23个独立炮团中的14个部署此线，占61%弱；3个独立高炮团的2个，占66.6%强；10个独立高炮营中的6个，占60%；2个独立歼击反坦克炮旅的全部；7个独立坦克旅中的4个，占57%以上；1个独立高炮师的全部；航空兵931架飞机中的532架，占飞机总数的61.5%。可见左翼集群的重要性。第2远东方面军左翼集群的总进攻方向是哈尔滨。该集群也分为左、右两路纵队，其中位于右路的第15集团军为主要突击集团，其下属部队主要包括第338、361、34等3个步兵师，第165、171、203等3个坦克旅和第102筑垒地域守备队（相当于1个旅）。该集团军分布于黑龙江下游的萝北、同江、抚远对岸地域。其任务是在空军第10集团军机群和红旗阿穆尔河（黑龙江）舰队2个旅的协同下，经同江，沿松花江向哈尔滨方向突击。在该集团军左翼，是集结于乌苏里江对面比金地区（饶河对岸）的苏军第5混成军，下辖第255、390、35等3个步兵师和配属的第172坦克旅，1个歼击反坦克炮旅，1个独立高炮团，2个独立高炮营，2个独立加农和榴弹炮团，空军第29歼击机师第308歼击机团的40架战机等。第5混成军的任务是从乌苏里江东岸突破日军虎头要塞和饶河地域后，朝西南向宝清、勃利方向突进，从松花江以南配合第15集团军攻向哈尔滨。



苏军进攻日军北正面要塞示意图

在以孙吴为中心的关东军北正面发起进攻作战的是苏军第2远东方面军的右翼集群。相对于上

述方面军主要突击方向的左翼集群,这里是方面军的辅助进攻方向,承担这一地区辅助突击任务的是苏军第二远东方面军下属第2红旗集团军及其直属的3个步兵师和配属的3个坦克旅(共240辆坦克),9个独立炮团,1个独立高炮团,2个独立高炮营(共1 270门包括追击炮在内的各种火炮),1个筑垒地域守备队,1个航空混成军(即第18混成军,下属有第96强击师,第296歼击师,独立第777歼击团等共359架作战飞机)。另外,还配属有红旗阿穆尔河(黑龙江)结雅—布列伊斯克舰队1个旅和斯列钦斯克内河舰艇独立营共数十艘舰艇的协同行动。第2红旗集团军的司令员是坦克兵中将莫·弗·捷列欣,军事委员哈·阿·纳钦金少将,参谋长斯·弗·莫热阿耶夫少将。航空兵第18混成军的军长是空军少将勃·弗·纽合吉林。

按照第2远东方面军的作战部署,由第2红旗集团军负责组织实施的上述右翼集群辅助攻击作战,也分为左、右两路纵队。方面军要求,在开战伊始,第2红旗集团军及其配属部队首先要集中力量做好黑龙江沿岸的边界保卫战斗准备,严防日军采取报复措施,由此方向突入江北苏联境内炸毁西伯利亚铁路运输线干线,切断远东苏军的后勤供应和兵员调动。在此基础上,再根据本方面军左翼主攻集团以及第1远东方面军和后贝加尔方面军各战线的总的进军态势,待命随时渡江转入向齐齐哈尔、哈尔滨方面的进攻作战。

作为方面军的右翼集群,尽管从方面军的总体部署上看,第2红旗集团军的作战地域属于辅助性进攻方向,但集团军也把自己的左、右两路纵队分成主要进攻方向和辅助进攻方向:左路为主攻,右路为辅助进攻。为确保在主要进攻方向保持优势兵力,左路部署了本集团军直属及配属部队约三分之二的兵力,其主力是第12、第3步兵师和第73、第74坦克旅等部队。他们早已提前集结在孙吴县四季屯对岸东北方康斯坦金诺夫卡和奇克北岸的波雅尔科沃等距拟定渡江点20~80公里的纵深地区。他们计划在部队由防御转入进攻后,立即由四季屯沿岸一带以及奇克沿岸一带多个登陆点登陆,并从东西两侧迂回进攻霍尔莫津要塞,同时以先遣支队直取孙吴,而后取道北安向哈尔滨推进。

第2红旗集团军的右路纵队承担辅助进攻任务,它只拥有集团军所属兵力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主力是第396步兵师、第258坦克旅、第101筑垒地域守备队和其他配属部队。这些部队集结在黑河对岸的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及北部纵深的结雅河沿岸一带。他们的任务是由黑河以北马厂岛一带渡江迂回进攻法别拉、黑河、瑷珲等要塞阵地后,经二站向西南取嫩江、讷河攻向齐齐哈尔。

第二节 日军战前准备

在远东苏军对日作战行动中,第2红旗集团军在自己的作战正面,执行的作战任务较之其他各战场有些特殊:他们奉命在对日战斗打响之后,首先在沿江集结地域严密警戒国境正面,防止日军从远东苏军的背后发起战略突击,而后待命随时转入全面进攻。因此,他们直到8月11日拂晓才发起全面渡江越境进攻行动,较之其他边境地区推迟了整整两个昼夜。然而,苏军也不是在霍尔莫津要塞没有一点军事行动,他们虽然没有在8月9日零时冲越国界发动大规模进攻,但空军的飞机已早出现在了日军第123师团面前。

8月8日,日本艺人齐田爱子率领一支由6人组成的演出队,来到123师团司令部进行慰问演出。师团司令官的幕僚们携带眷属,怀着复杂的心情静等演出开始。晚6时许,当齐田爱子走上舞台,酝酿好表情,正准备弹奏三味琴时,突听哨兵高喊:“苏联飞机来啦。”喊声如一声闷雷炸响,惊动所有人员,惊慌地涌出了剧场。抬头只见苏联飞机距地面只有300米左右,在惊慌的人群顶上呼啸而过,飞机尾翼上的苏军红星清晰可见。苏军飞机的出现,打破了演出的气氛,慰问演出无演而散。

8月9日,苏军飞机陆续飞临孙吴地区上空,当时正在秋月山构筑阵地的上等兵北原茂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看,飞机!”我们在大白桦树下的白板饭桌上吃着高粱米饭,听到喊声一齐凝视着东北方的天空。

从秋月山的东北和大天山的方向,发着金属的尖叫声,一架二架三架,好像冲破低空朝着秋月山方向飞来。盘旋两三圈后飞向西方的孙吴。

“奥伊,有些奇怪,那一定是苏联飞机,越境了。”

“你看到红星了吗? 又来了。”

大家又一齐仰望天空,这一次又飞来五架。

“那是轰炸机!”

“看,那星星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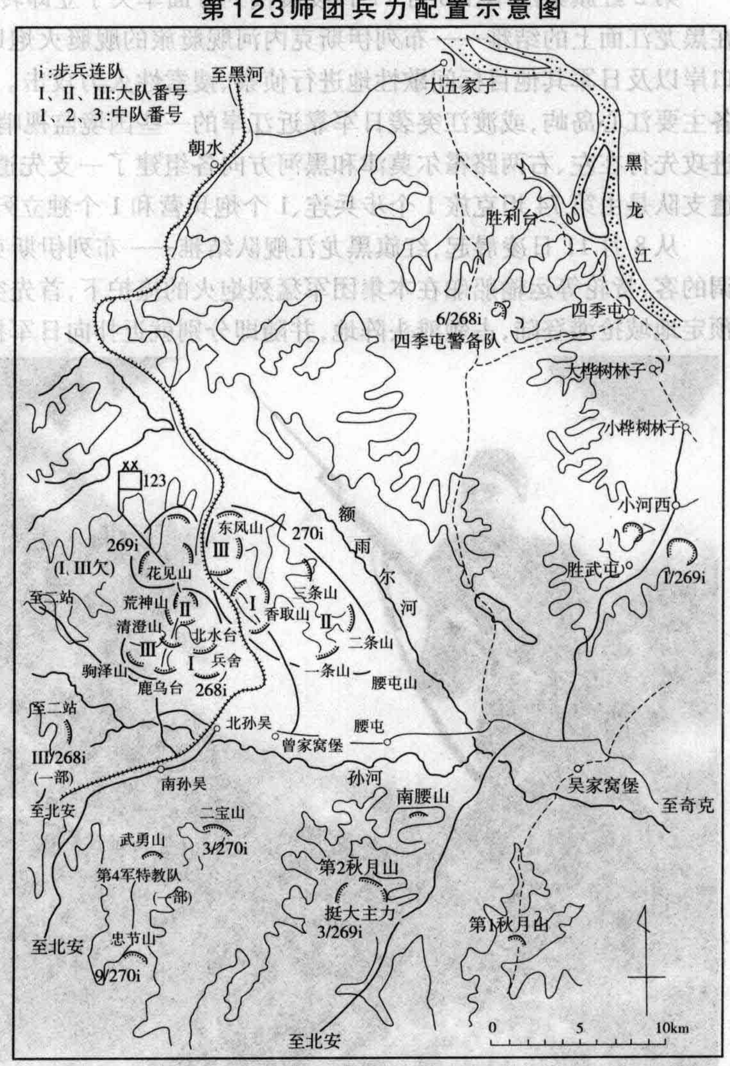
“飞机肚子里还抱着炸弹呢。”

再也没有吃饭了,大家都端着饭盒呆立着。很明显可以看到有着红星标志的苏联飞机,留下了引擎的声音,五架飞机的影子在去孙吴的方向消逝了。不一会儿,从遥远的孙吴方向传来了频繁不断地、犹如沉雷般的爆炸声。

“是孙吴街被轰炸了!”

“谁还有心思吃饭呀? 不赶紧准备战斗不行了。”

第123师团兵力配置示意图



正在秋月山构筑工事的村上大队的士兵们异常激动,他们放下餐具,跑进帐篷,穿好军装,等待着行动命令。这时候,指挥部的帐篷里,军用电话响个不停,士兵们十分紧张地打探着消息……。

须田中队长拔出了军刀,在饭桌上站着,满脸胡须发青,表情紧张极了。他大声向士兵说着:“今天早晨天没亮,苏联军队全面突破了国境线开始了攻击。据说昨天晚上,东满的国境线上也遭到了攻击。据师团的情报,在康斯坦丁诺夫卡,配备有重型坦克的机动部队正在集结准备渡江,他们就在我们的对面。科尔希加的飞机是苏联远东空军最有力量的一支部队,已经开始了对东北地区的轰炸。苏联军队从海兰泡也开始向黑河攻击过来。”

123 师团挺进大队星野喜勇回忆道:

8 月 9 日,兵舍上空敌机飞行同时机枪扫射,露木大队长高声喊叫,士兵躲避,全副武装的士兵机敏的行动隐蔽起来。步兵弹药、手榴弹、装具检点之后小队传达命令,选拔组成敢死队之后,笠间小队长同 25 名士兵敢死队员用茶碗饮酒。然后部署任务,包括看守桥梁、守卫飞机场,一部分士兵开往秋月山阵地,敷设对敌战车攻击用的地雷,架设迫击炮,投入对苏联部队的作战。

第123师团得知苏军已于8月9日零时全线发动了进攻，虽然在他们防御区内还没有大的军事行动，但那是早晚的事。按照防御预案，各部队都进入了各自的阵地（详见第二编第六章第四节）。

大战即将来临，北泽贞治郎司令官决定视察要塞各阵地，鼓舞士气。通往胜山的路上尘土滚滚，几辆小型越野车向胜山阵地上驶来。守备阵地的官兵们列队迎候着师团长北泽贞治郎的到来。在随从人员的陪同下，北泽贞治郎匆匆忙忙地检阅着部队，走马观花般地视察着阵地。在阵地指挥部里向部属们讲了第123师团正面临的严峻形势。阵地指挥官听完师团长的讲话，惊愕的表情跃然脸上，目光呆滞地望着北泽贞治郎走向自己的汽车。已走到车旁的北泽贞治郎又转身缓缓地走回到他们的面前，向每个部属的肩上拍了拍，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浑浊的目光盯视着每个人的脸，然后挥了挥手与陪同人员钻进汽车，一溜尘土驶下了胜山阵地。

阵地的守备部队随即进入了紧张的应战苏军的准备。

第三节　苏军先遣支队突入要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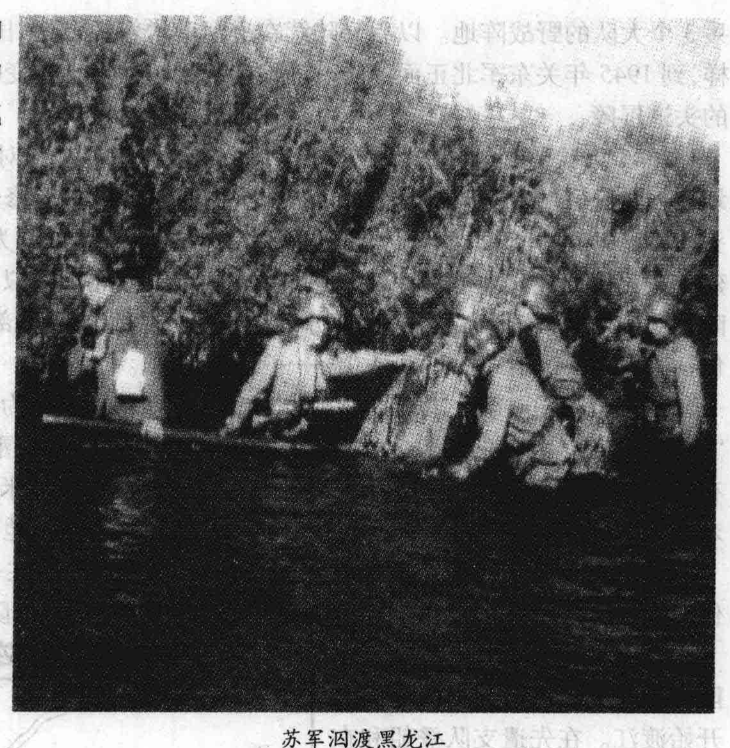
第2红旗集团军在8月11日凌晨接到方面军关于立即转入全面进攻的命令前，主要是利用行驶在黑龙江面上的结雅——布列伊斯克内河舰艇旅的舰艇火炮以及江岸苏方一侧的地面火炮，对黑河口岸以及日军其他目标间歇性地进行侦察、搜索性火力攻击。同时派出侦察分队攻占拟渡江地域的各主要江心岛屿，或渡江突袭日军靠近江岸的一些国境监视哨所。但同时，集团军也为尔后的大规模进攻先行在左、右两路霍尔莫津和黑河方向各组建了一支先遣支队。在霍尔莫津——孙吴正面的先遣支队是由第74坦克旅1个步兵连、1个炮兵营和1个独立歼击反坦克炮团组成。

从8月11日凌晨起，红旗黑龙江舰队结雅——布列伊斯克旅所属各种舰艇及由地方航运部门抽调的客、货轮等运输船舶在本集团军猛烈炮火的掩护下，首先突击运送先遣支队的各分队分头在对岸预定地域抢滩登陆，占领滩头阵地，并随即分别就近扑向日军投入战斗。



苏军进攻日军阵地

由于缺乏必要数量的舰艇船舶和其他渡江手段,使先遣支队的渡江行动大大迟滞。例如,以3艘平底船连接成的中型渡船平台,载重量只有60吨,时速不到10公里,而江水的流速却达每小时6公里。因此渡船从停靠渡口、装卸到航行,往返一次要近2个小时,而这个运输平台上只能装载1辆T－34中型坦克和2辆T－26轻型坦克。这样,先遣支队的1个坦克旅(通常为80余辆坦克外加油料、工程修理、物资补给等许多后勤保障车辆)要完整送到对岸就需要20余个小时。所以先遣支队无法等到全部渡江取齐后统一投入作战行动,而只好依据渡江进度以连、排级规模分散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但这些小部队却及时准确摸准了日军的兵力部署,揪住了日军的尾巴,使其难以挣脱转移撤逃,为而后的集中围歼创造了条件。


苏军泅渡黑龙江

8月11日拂晓,苏军先遣支队陆续由哈大杨、霍尔莫津一带渡江后,一部指向胜山以东的三角山地区,一部则直扑胜山阵地山脚,还有一部向四季屯、小桦树林、河西山方面迂回进攻。攻向胜山的苏军先遣分队,在空军强击机、先遣队坦克、火炮以及后方远程火炮的有力掩护下,当晚即对胜山日军主阵地多次发起排级规模的冲击,使这里的攻防战处于胶着状态。

苏军先遣支队的积极作战行动,有效地牵制驻孙吴日军步兵第123师团在胜山一带部署的左、右两支前进部队,为后续主力部队的渡江前进打开了通道,指引了方向。当苏军主力部队到达日军前进部队驻守的各阵地时,先遣支队则不失时机地甩开残敌向南部纵深的孙吴等地疾速前进。到8月13日他们已占领孙吴近郊的飞机场一带,并越过逊别拉河以南迂回穿插日军各主阵地逼近县城,一路充任后续主力部队的开路先锋。

第四节　苏军出重拳力克胜山主阵地

胜山是霍尔莫津要塞关东军原第5国境守备队的枢纽和核心阵地,也是第5国境守备队本部的战时指挥部所驻地。其设防地域包括胜武屯、西胜山、胜山、三角山一线,建有大批永久性工事。尤其在主阵地胜山环山建有反坦克壕、交通壕、碉堡、火力点交错配置,步兵壕密如蛛网,山顶部还有多处钢混结构的半地下式加农炮和榴弹炮发射阵地及炮兵掩蔽部。指挥所的地下工事深藏于山体内部,通道两侧建有大小十余个房间,除部署有指挥所、炊事房、医务所、物资弹药库外,还有供电、通信、采暖、通风、供水等设施一应俱全,并通过竖井、观察口与地面工事相连,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加强步兵大队的防御阵地。

关东军考虑到,孙吴以北只有霍尔莫津要塞一处防御阵地远不能万无一失地确保北正面的作战需要,为预防一旦开战苏军从奇克方向由胜山的东侧背发起迂回突袭,故于1940年在胜山阵地东南、逊别拉河以北的毛兰屯山区(日军称之为相模山)建起了一处规模更大并足可容纳步兵5个大队、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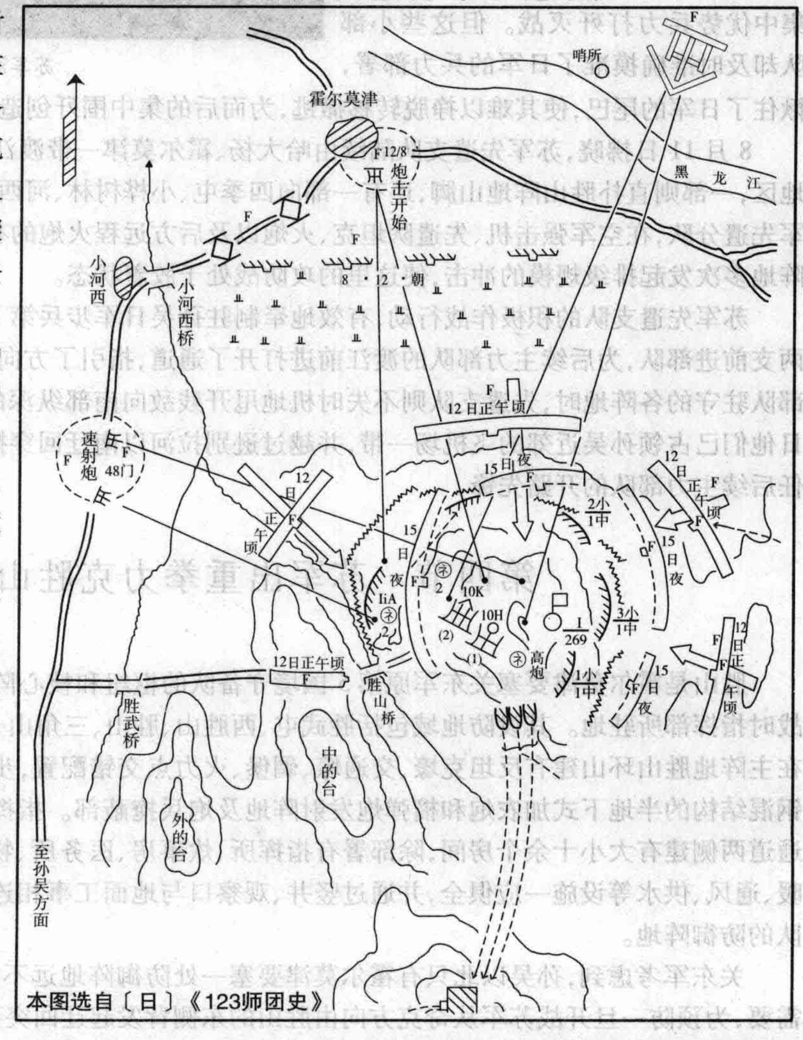
兵3个大队的野战阵地。以后又陆续在逊河南增修了多处“国境筑城”,计有B级7群,C级1群。这样,到1945年关东军北正面的防御阵地情况已较前有不少变化。但胜山阵地仍然是最北部紧邻江边的头道屏障。

1945年春,驻孙吴的日军第123师团根据关东军总部对苏作战的总体部署和第4军的作战计划,对北正面的全面持久防御作战安排进一步作出了补充修订。主要安排是:把孙吴周围的几个山头、高地作为主阵地,主力兵力部署在此,并将此主阵地分划为东、南、北三个地区,师团司令部进驻其建于花见山的战时地下指挥部——“特仓”(为掩人耳目而拟定的代号,意为特别仓库),另外在胜山阵地和毛兰屯(相模山)野战阵地分设左、右两个“地区前进部队”,胜山属于左地区队。其作战范围包括胜武屯——胜山——河西山——三角山等地。

“左地区前进部队”以第123师团第269联队第1大队为基干编成,大队长是村上实大尉,故也称“村上大队”。大队的编成内包括大队本部,1~3步兵中队、重机枪中队、1个步兵炮小队。配属部队有第123炮兵联队第1大队野炮第3中队(编成内有10厘米加农炮2门、10厘米榴弹炮1门、7.5厘米山炮3门)。全部编成兵员共约1 030人,其中胜山主阵地约600人,河西山和秋月山各200余人。

8月9日清晨开战,苏军飞机发起突袭时,村上大队尚在50公里外的秋月山构筑阵地,接到师团作战命令当即率队出发,并于当晚18时抵达胜山地区,将部队部署展开,进入阵地。

胜山阵地战斗示意图



本图选自〔日〕《123师团史》

8月11日凌晨,苏军先遣支队在霍尔莫津和哈大杨两地同时开始渡江。在先遣支队登船和在江面航行期间,分布在江对岸各地的数百门各种火炮、大批坦克以及舰载火炮同时对日军江岸及纵深目标进行了半个小时暴风骤雨式的急袭,掩护先遣队成功登陆。与此同时,支援炮火又对日军江岸纵深地域进行了20分钟的延伸射击,支援登陆分队巩固滩头阵地,开辟前进通道。胜山主阵地的各阵地均受到苏军炮火的猛烈轰击。日军村上大队也慌忙开动其部署于胜山的仅有的几门火炮进行反击。先用加农炮对着渡江舰艇开了几炮,发现炮弹射程不足,只好作罢。而榴弹炮则因缺乏炮弹也发挥不了应有作用。为解决燃眉之急,村上大队长立即派深山军曹等带4辆汽车去兵器厂取运榴弹炮弹,归途中在胜山阵地背后被刚刚推进到这里的苏军先遣分队包围,第一辆运弹车在第一卫兵所附近受到猛烈射击,深山军曹中弹身亡,车队中的上等兵今井在胸部负伤的情况下驾车突围进入阵地。有了炮弹,榴弹炮便频频开炮,但不久火炮

的驻退却发生严重故障，炮手们全力投入修理。此间，师团辎重联队由伴正则见习士官领队的4辆运送炮弹汽车由兵器厂出发行抵胜山桥时遭到附近苏军的密集的枪、炮火力拦截，车辆全部起火被毁，伴正则等9名士兵当场毙命，少数突围脱身归队。次日晨又有1个由安田领队的车队，送3车炮弹去胜山，结果有2车弹药被炸起火，只有安田的一台车进入阵地。在11日下午的炮战中，日军火炮本来就屈指可数，再加上不是缺炮弹就是出故障，无法以火炮从远距离压制苏军的快速推进，弄得自己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而苏军炮兵则以更加密集的火力向日军炮兵阵地所在的胜山中心部位猛轰，正巧一发炮弹直接命中一个加农炮座上，正在指挥所工事中观察战况的炮兵中队长大木中尉被从观察口飞进的一块弹片击中头部，当场身亡。

8月12日黎明前，苏军已有一支15厘米重迫击炮部队开抵胜山脚下的日军火炮发射死角区内，他们可以曲射火力轰击日军阵地的任何角落，而日军火炮却无法打到他们。随即苏军其他后续主力部队也源源开到。当日中午，苏军用2个步兵团、1个歼击反坦克炮团（48门）和数十辆坦克从西部、北部、东北部和东部4个方向进行攻击。日军居高临下，借助有利的地形和坚固的阵地工事，据险顽抗，垂死挣扎。苏军一些步兵分队在猛烈炮火掩护下不断发起突击，有时一直冲到日军一线堑壕的四五十米处，用冲锋枪抵近猛扫。日军则以密集的手榴弹和掷弹筒进行有力还击，迫使其后退，一日反复争夺数次，有的高地几易其手，使双方都受到很大伤亡。胜山之战已呈白热化，后来日军把这一天称为“死亡之一日”。苏军不仅在地面部队方面对日军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制空权也全部操在手中。苏军航空兵的强击机、歼击机不时飞来从空中对日军发起强有力地突击。地面炮火加上空中战机的扫射轰炸，使胜山主阵地被淹没在一片浓烟烈火中，从而使日军中心弹药库和油料引起数十吨炸药和炮弹的连续爆炸，响声震天动地，巨大的钢筋水泥板块从土层下被掀到数十米开外。粗大的柞树、椴树被连根拔起，枝干炸断，败叶乱飞。在苏军的炮轰中，小队长熊仓中弹，顿时血肉横飞，身体被肢解，一只胳膊挂在了弹痕累累的树枝上，血淋淋地悠荡着。士兵桥本的两腿自膝盖处被弹片切断，立马躺倒在地，参差的皮肉连着白花花的骨头茬子，动脉血哧哧地向外喷射着，染红了树皮和草地。他疼得龇牙咧嘴，脸色惨白如纸。临死前，他痛苦地呼唤亲人的名字：“梁子、合子……”上等兵竹前的前额被炸出血，脑液外流，面目全非，猝然倒地如一截朽木。一等兵西岗手被炸坏，他挥动血淋淋的残手，捶胸顿足地号啕。此时，整个胜山在燃烧，山顶炮台被炸毁，亚雷高地阵地上的上等兵野明胸部中弹，口吐鲜血，临死前还高喊着“天皇万岁”。

由于收发报机和电话线路的破坏、故障，使村上大队与联队及师团司令部的通讯联络中断，炮兵中队则在13日上午用加农炮打了几炮后，招来对方暴风雨式的火力还击，阵地和火炮基本被摧毁。丧失了战斗力的炮兵，不得不全员改用步枪和手榴弹同步兵一起投入战斗。村上大队长考虑到，从12日起由于通往外部的道路被切断，后勤补给断绝，连饮水也发生困难，包围圈不断缩小，伤亡日益增多。如不尽早设法突围撤出，必将全军覆没。夜10时，村上大队长安排军曹天野民夫率上等兵野吕向师团参谋长土田传递紧急军情报告，大致的内容如下：1. 有线无线均故障；2. 部队正面状况由传令兵口述；3. 士兵、军属和开拓团员准备为国尽忠；4. 人员有伤亡，士气旺盛，人员伤亡1 000以上，火炮战车均有破坏……

天野民夫在回忆录中描述了前去报信的实情：

13日午后10时，村上大队长给我下一命令说，天野军曹急去师团司令部向土田参谋长送达报告，说明胜山情况。午夜12时出发，与另一士兵同行。我想作为帝国军人这是自己的本分，一定要完成送达任务。行前大队长、中队长、副官均多有嘱咐，我也做好了军刀、手榴弹等自卫武装的准备，深夜出发。过了外之台、中之台，渡过了二道河，看见了胜武屯的军官街、给水塔，两个人无声的摸索前进。天亮的时候看见有苏军通过的印迹，又捡到一枚写着俄文字的白色纸片，又听见胜山方向的枪声大作，不知村上大队长怎么样了。我与野吕上等兵一路小心，时而躲藏，时而屈身匍匐，艰难地行进，终于到了花见山中的123师团“特仓”阵地。在阵地的廊下，我们向参谋部的将校交上了村上大队长

的信和口头报告。村上的信中叙述了胜山的被围状况,1 000余人杀伤的概算,战车、火炮、枪械等的破坏情况。

在派人送战报的同时,村上又召集各中、小队长商定,于15日夜撤往大天山,而后再转主阵地花见山。

就在村上秘密准备撤逃时,驻守河西山的村上大队第2中队手岛芳雄所部也已死伤累累,危在旦夕。8月13日其阵地被苏军攻破,手岛于上午9时率残部数十人突出重围,经天拜山、缅羊牧场昼伏夜出,于14日晚到达西胜山,手下兵员已只剩30人。连夜潜行,于15日晨6时许在胜山桥附近又被苏军发现围攻,经激战后,手岛仅率残部数人突入胜山主阵地。

8月15日夜,村上大队长组织其残部100余人,乘夜暗雨雾分散逃出阵地。出逃前他们把不能随行的重伤者拖进主阵地地下指挥所,随后将指挥所洞口引爆,算作是对伤员的妥善处理。当夜,该大队的步兵炮小队长须田少尉带领约80人逃到大天山,17日夜又由大天山出发奔花见山,途中在丁字山休息时被尾追的苏军包围,激战中大部分官兵被打死,其余拉响手榴弹自杀,须田少尉战刀切腹自杀。

村上大队第3中队受命守卫胜山左翼的秋月山一带,开战以来还一直未和苏军有过接触。8月16日晚接到师团转来的停战命令,向孙吴方向撤退。同晚8时出发,10时左右到达秋月山以南约8公里的"一本松"高地。由于多日来昼夜不停地战备值班,官兵均极度疲乏,短暂休息中竟不觉昏然睡去,被一支苏军部队突袭,结果中队长伏田以下官兵死伤过半,余者侥幸逃出。

至此,胜山主阵地被苏军全部攻克,日军第123师团左地区前进部队第269联队第1大队由大队长村上本人带着百余人分散逃出胜山南下,途中在北安投降就俘。

第五节 日军遭分割全面陷入绝境

就在苏军先遣支队打响胜山主阵地战斗的同时,苏第2红旗集团军左路纵队的后续主力部队,也源源不断由四季屯、霍尔莫津、哈大杨、奇克等沿江地域多路渡江。渡江行动一直持续到第5天才结束。各路主力部队渡江后,竭力向孙吴纵深地区高速突进,按预定计划对日军各阵地进行穿插分割,再行合围。但是由于苏军主力部队的渡江行动速度不够理想,而日军又在其渡江前就已将从江边通向内地的铁路、公路及其全部大小桥梁或爆破焚毁或设置路障,埋设地雷,故显著迟滞了苏军的推进和集结速度。到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发布《停战诏书》前,苏军第2红旗集团军主力部队才最终全部完成渡江行动,其前锋已截断孙吴日军退路,第123师团各阵地的部队业已被优势苏军穿插分割,使日军全面陷入绝境。一方面是苏军还未来得及组织起几场大型歼灭战役,另一方面是日军在苏军的强大进攻态势面前已是仅有招架之功,而根本无力主动发起强大反击战役。故这个期间苏军只是分路推进,迂回穿插过程中和相遇日军发生过不少持续时间较短、战斗规模相对较小的战斗,而所有这些战斗无一不是以日军的最终惨败而告终。

一、吴家窝堡遭遇战

胜山东南、逊河以北的一个被日本人称作相模山的地域是日军孙吴北正面右前进阵地,由第269联队第3大队防守。开战后连续数昼夜日兵枕戈待旦,却一直未和苏军正面接触。大队长平间才次郎少佐,下辖第9、10、11步兵中队,重机枪中队,1个步兵炮小队,全员约1 100人。另配属有步兵第268联队第5中队215人,步兵第270联队特遣队(100人),关东军第4军特别教育队(40人)。总计该阵地兵员约1 450人左右。

8月13日晚,平间大队长接到向孙吴主阵地撤退的命令。平间部署的撤退行军序列是:由第268联队第5中队为尖兵,其后依次为大队本部,第270联队派遣队,本大队步兵炮小队,步兵第11中队,

第9中队为后卫,第10中队后续追尾。但此前,该大队第10中队的350余人已于12日被调去三角山地域进行防守侦察,故10中队又受命随后撤回追尾。但中队未及行动便与南下苏军遭遇,围绕三角山展开攻防战。几经争夺,第10中队损失惨重,中队长中村少尉率残部约70人突围。一路又遭到截击,队伍不断减员,最后返回花见山时,中村手下已不足10人。

平间大队于8月13日零时撤退行动开始后,因夜深雾浓,能见度极低,加之官兵连日不眠不休,体力不支,急行军中队形混乱,各队间距较长,首尾难以相顾。

14日晨4时左右,日军前锋三浦小队有人似乎隐约听到前方有战车的声音,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还听到女人的说笑声和歌声,凭直觉,那声音不是来自中国的花姑娘。滴里嘟噜的语句,挺长,一串一串的。他们很快地判断出是出自苏军的女坦克手。

于是,日军借助晨雾和山岚的掩护,迅速地散开,占据有利地形,构筑反坦克工事,架好迫击炮,预备好火焰喷射器、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誓与苏军决一死战。

坦克一过小河,便停下来。上面车盖掀开,一位漂亮的苏联女兵从里面洒脱地钻出来跳到草地上。这时,她返身向坦克打招呼,继她之后钻出坦克的姑娘像老大姐似的沉稳,身子坐在坦克上,腿脚留在坦克中,她并不想下来。

那女兵哼起了那支动人魂魄的《喀秋莎》。

车上的老大姐也随着少女轻声地哼起来。

突然"叭"的一声枪响,歌声戛然而止。一颗子弹射中她的胸脯,她高呼一声"蜜勒,乌拉!"便猝然倒下。

老大姐见状,想下来救。可日本人的枪声骤然响起。有几发子弹"啾啾"地打到坦克的甲板上。她急忙缩回坦克,盖上盖子。

MT34坦克像匹脱缰的野马,带着仇恨疯狂的向日本人碾压。

首先开枪的三浦,还来不及跑回日军阵地,就被坦克碾倒,从脚到头,压成肉饼。

古野等4人,还在修筑反坦克工事,坦克已急驶过来,有的士兵衣服被绞进履带,连同肉体,像塞进绞肉机一样被绞得粉碎。

听到枪声,苏军的坦克、装甲车、步兵都赶来参战。

吴家堡遭遇战就这样打响了。

混战中平间少佐当场阵亡,部队失去指挥,战场一片混乱。当前方枪声大作响成一片时,担任后卫的第9中队在中队长橘田指挥下仓皇地由路南低洼湿地向路北高地撤退,但撤逃中队伍失控,自然形成两群,一群约65人在橘田带领下逃离战场,辗转归还孙吴主阵地。另一群约百余人在山本见习士官带领下南逃,途中被本师团挺进大队所接应收容。其他参战部队,人数为662人,其中战死232人,逃出353人,去向不明66人。

二、日军在"一本松"的又一场悲剧

8月14日,在这个被日本人称为"一本松"的山头,曾上演过一场日军第269联队第1大队第3中队在此遭苏军突袭伤亡过半的悲剧。而3天后,还是在这个"一本松",又再次演出了第123师团挺进大队长露木甚造大尉亲率500精兵在此全军覆没的更大悲剧。

挺进大队是第123师团的精锐,被称为"肉弹挺身"敢死队。1945年7月初组建时,其编成内的1 030人,都是从入伍1年以上、体格强健、训练有素的老兵中精选的。由于任务特殊,编制装备也很特殊,共设3个中队,每个中队设1个指挥班,5个小队,每小队61人,指挥班27人,加中队长共338人,大队装备重机枪50挺(超过普通步兵大队的5倍以上),轻机枪每3人1挺。开战当时又从新兵中补充选拔了300余人。

挺进大队全体官兵都经过极其严格的特殊训练。其主要任务是战时潜入敌后,对敌军高级指挥机关、空军机场和坦克、炮兵阵地要害部位进行挺身急袭,使之瘫痪或给予重大损失,同时对敌后交通

干线、兵站等重要目标进行爆破、纵火及其他扰乱破坏活动。

8 月 12 日,师团司令部命令挺进大队长露木甚造亲率大队本部、第 3 中队和第 123 炮兵联队的 1 个炮兵小队及 1 个通信兵分队火速开往南腰山南方地区对苏军进行阻击。由于走了弯路,14 日到达秋月山,后又转往南腰山,此时由胜山阵地撤逃来的原步兵第 269 联队第 3 大队第 9 中队一部约 150 人也由露木大队长收容接管。同时又由驻防花见山的挺进大队第 1 中队派来笠间、小玉、冈本 3 个小队 180 余人来此增援。另外,此前还有露木大队第 2 中队的林田小队也在南腰山东侧驻防。这样,露木大队长已拥有兵员 800 多人(其中本大队直属 600 余人,其余为配属)。8 月 16 日晚接到师团无线电报,命令露木大队撤回花见山。次日早 8 时,露木率部撤离南腰山。当日下午 3 时露木率部抵达一本松休息时,被过路南下的一支苏军部队发现,从北、东、西三面包围日军。露木指挥所部拼死冲杀,企图杀出一条血路,但终因回天无力,仅经过不到 1 小时的激战,便全军覆没,连露木本人也被生俘。其下属各部的主要损失情况是:第 2 大队本部 30 人中,27 人战死或"下落不明";主力第 3 中队 338 人中,中队长久保宽少尉以下 330 人"全灭",仅有 8 人生还;第 1 中队的冈本、笠间、小玉 3 个小队也仅有笠间、小玉见习士官以下 20 人逃离战场;2 中队村田小队也被"全灭"。

三、二宝山战斗

二宝山位于北孙吴东南、南腰山以西。开战时阵地由第 270 联队第 1 大队第 3 中队守卫。中队长足立少尉以下 182 人,另配属 1 个重机枪分队(12 人),总计 194 人。

8 月 16 日中午,苏军 1 个步兵排在 3 辆坦克的引导下,向由第 3 中队第 1 小队守卫的二宝山阵地正面冲来,小队长大西庆一见习士官手握战刀怒吼着指挥下属士兵应战。但不久大西小队长以下全员阵亡。苏军转而攻打日军第 2、第 3 小队防区,日军又有一些官兵死伤。接着苏军坦克 2 辆迂回到日军重机枪分队阵地后方,随伴着苏军冲锋枪手们在日军背后一阵猛射,重机枪分队的 12 名士兵也全部战死。这一仗,使二宝山日军第 3 中队伤亡百余人。余者乘夜暗逃往邻近的忠节山,二宝山阵地在几个小时内便被苏军攻克。

四、日军"主动"进攻

在整个孙吴正面的攻防作战期间,日军一直是处于防御即被动挨打的状态中。至于主动发起反击或进攻,哪怕是中队级规模的也没有。小队或分队级主动出击是在下述具体情况下不断发生:

1. 在阵地防御中,为夺回被攻占的制高点而发起反击,这种战斗通常是近距离进行,甚至是白刃拼杀,火炮等重火器已不便合用,故日军也常一时获得成功,但反复争夺后日军最终还是以惨败告终,在这种情况下日军不免要付出整个分队甚至小队"全员覆灭"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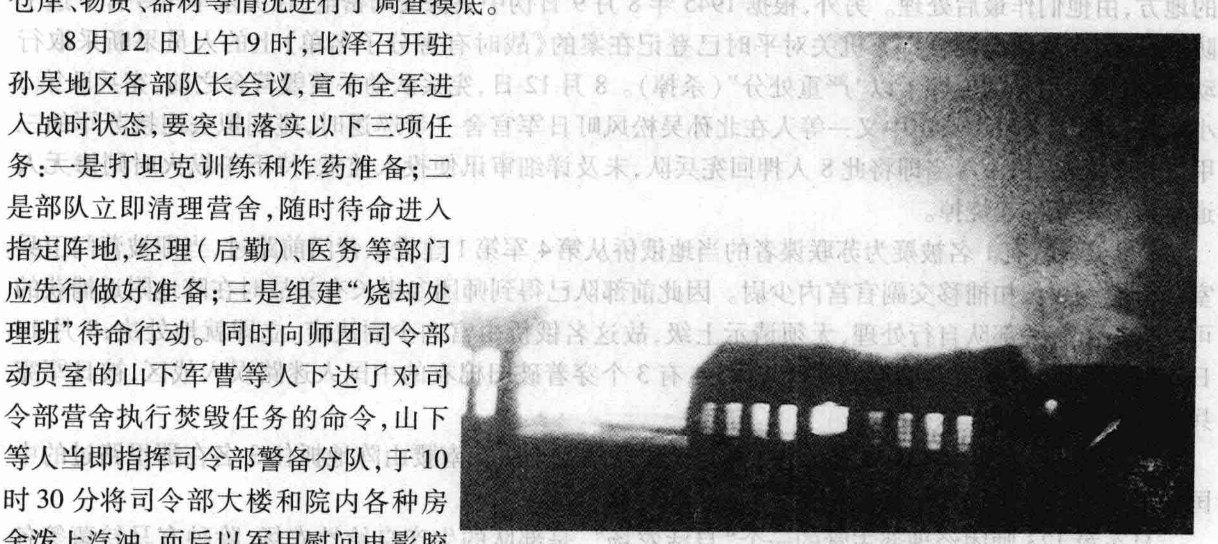
2. 在反坦克作战方面,日军专用于对付坦克的步兵炮和速射炮对苏军的 T-34 型坦克无可奈何,而日军自己的几辆破旧笨拙不堪一击的老式坦克,又根本不是苏军坦克的对手。在一条山战斗中,日军 2 辆九五式坦克首次"披挂上阵",刚一亮相便被当场击毁。故日军只好在各部队普遍组织小队或分队级的敢死队身背炸药包,以 3 人为 1 组,主要利用暗夜或丛林沟坎的地形隐蔽接近目标,而后突然跃起连续发动所谓"肉迫攻击"。但由于种种原因,成功率毕竟不是很高,而且即使成功其代价也颇高,许多敢死队的小组或分队不是无功而返便是一去不返,与坦克同归于尽。如 8 月 15 日挺身大队第 3 中队太田正澄小队长亲率特攻班于吴家窝堡以西向苏军坦克部队发起轮番突袭,共炸坏苏军坦克 14 辆,其小队兵员也死伤殆尽。

第六节 日军溃败时的烧杀和破坏

自 8 月 9 日晚日军孙吴地区驻军各部奉命分别进入指定阵地备战后,城区的大批兵营和军需物资、粮秣、弹药等仓库和其他军用设施,只留少量人员看守管理。此时前方苏军主力部队正全面围攻

孙吴日军赖以挣扎的胜山主阵地,形势危急。而苏军先遣部队则正在大举南下,步步向孙吴逼近,随时有可能突入这个事实上未设防的空城,抢占上述军用设施,中国居民也可能乘机哄抢。为避免产生这些情况,需预先制定应对措施。为此,第123师团长北泽贞治郎中将于8月11日下午4时亲自带人对本师团各部、野战兵器厂、货物场、汽车修配厂等第4军直辖部队和关东军总部直辖部队的营房、仓库、物资、器材等情况进行了调查摸底。

8月12日上午9时,北泽召开驻孙吴地区各部队长会议,宣布全军进入战时状态,要突出落实以下三项任务:一是打坦克训练和炸药准备;二是部队立即清理营舍,随时待命进入指定阵地,经理(后勤)、医务等部门应先行做好准备;三是组建"烧却处理班"待命行动。同时向师团司令部动员室的山下军曹等人下达了对司令部营舍执行焚毁任务的命令,山下等人当即指挥司令部警备分队,于10时30分将司令部大楼和院内各种房舍泼上汽油,而后以军用慰问电影胶片作引火剂,引着了汽油桶,霎时浓烟烈火升腾,司令部大院整个陷入火海。此时苏军先遣分队坦克数辆正在离师团司令部正面约六七百米的路面上巡回侦察,还朝司令部卫兵所及土围墙连开数炮后离去。


日军烧毁营房兵舍

根据师团司令部部署,各部队立即行动起来。同日下午3时30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731细菌部队)孙吴支部首先将重要文档清理出来派专人押运去哈尔滨,随即将家属用汽车运送南下,部队主力100余人也出发去北水台阵地。与此同时由军医少尉井上正男负责指挥的"破坏班"便立即着手对营房和各种设施器材、文件资料等全部纵火焚毁。

8月12日傍晚,步兵268联队第2中队的指定分队在焚毁本联队全部营舍后,又奉命将军人会馆焚毁。

8月13日晚,正在山区野战阵地进行战备值勤的步兵第270联队也匆忙派回事先已组织好的"夜袭队"下山焚毁其营房。队长由第11中队长津守中尉担任,副官中野一郎,下设由4名见习士官领导的4个班组,每班组各5名士兵。同时,由第3大队行李班、弹药等单位抽调30辆马车,组成专门由营区搬运物资的别动队,由加藤军曹负责指挥。于午夜悄悄摸进早已空无一人的营区,检查确认了各兵营房间设施有无异常状况,特别是联队长官、联队军旗"奉安室"等,而后打开物资库,由别动队突击装运各种物资动身出营房后,烧却班即从油料库中取出几桶汽油到处泼洒,将营区建筑物引燃。几分钟后,整个兵营便高高升起浓烟烈火。

师团挺身大队组成10人的烧却处理班,大队长授权他们在12日晚当大队最后一辆车抢运完库存弹药、物资后随即进行烧却,他们按预定计划准时完成了任务。

师团通信队也于8月12日夜从花见山野战阵地派出铃木康兄、高松、越石辉男等多人下山回通信队营地与留守人员一起烧掉了本队全部兵舍中有关设施。

8月14日,关东军直辖第一建设队宫内少尉指挥部分士兵将本部在南孙吴兵舍、陆军病院、大和宾馆及日军官舍烧毁。

从8月12日中午师团司令部的烧却处理班率先烧掉司令部营舍起,各部队先后动手将各自营区全部点燃,使全城日军营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夜以继日爆炸声不绝于耳。连同日军没有直接关系

的满映馆(电影院)、满铁旅行社、火车站等无一幸免,多半个孙吴陷入火海之中。

在这次大纵火统一行动中,宪兵队充当了较为特殊的角色。他们除了自行负责彻底销毁本队的一切文档资料、营舍、牢房外,还负责全城纵火任务落实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他们于8月14日下午最后撤离城区前,对所有列入焚毁清单的建筑物等设施,突击检查一次,凡尚未及烧掉或烧得不彻底的地方,由他们作最后处理。另外,根据1945年8月9日伪中央保安局密电,在关东军司令官下达了防卫令后,宪兵队应配合特务机关对平时已登记在案的《战时有害分子名单》上的人员果断采取行动,其中列入甲类的应即予以"严重处分"(杀掉)。8月12日,宪兵队动手焚毁营舍之前,宪兵队第3小队长世岛松夫派宪兵田中义一等人在北孙吴松风町日军官舍一带巡逻时,碰到拟去迎接苏军的三甲屯8名农民,田中等当即将此8人押回宪兵队,未及详细审讯便投入监狱,待下午纵火时则惨无人道地连房带人一起烧掉。

8月13日,有1名被疑为苏联谍者的当地俄侨从第4军第1建设队营门前路过,当即被营门卫兵室金子兼吉兵长扣捕移交副官宫内少尉。因此前部队已得到师团参谋长有关战时在阵地附近捕获的可疑人员由有关部队自行处理,无须请示上级,故这名俄侨由宫内少尉决定,立即就地处决;8月14日,在花见山主阵地宪兵队防区的堑壕附近,有3个穿着破旧棉衣的中国人迷路误入战区,被日军宪兵抓住反绑在大树上杀死。

8月14日,日军第123师团挺进大队第1中队第3小队在南腰山阵地抓住3名在那里路过的中国居民,疑为苏谍,立即予以枪杀。

日军第123师团经理部主管的一个"自活农场",是部队的生产自给性农场,除种有马铃薯等各种蔬菜外,还饲养着生猪360头,蛋鸡100只,雏鸡150只,家鸭20只,还有牛、马、蜜蜂等。接到烧却处理命令后,他们除了焚毁房舍、马厩外,还把鸡鸭拧死投入火堆,将猪用拌有砒霜的饲料全部毒死。

第18野战货物厂和兵器厂被排在了最后,因为那里存放着可供数万日军使用2~3年的物资和弹药。由于运力有限,为了尽可能多将一些物资弹药抢运到各阵地,师团司令部决定让他们在苏军主力部队抵达县城近郊时再点火,故他们都是8月14日夜才行动。货物厂由渡边助久指挥烧却班纵火。干部候补队的高田嘉郎等10余人则纵火烧毁了被服库。

为了有效地阻止和迟滞苏军的进攻,第123师团对爆破铁路、公路、桥梁、电厂等事项也同时作了具体部署。爆破工作主要由师团工兵联队负责。孙吴北正面的北黑铁路、奇逊公路沿线的大小桥梁一律在北部日军最后一批车辆向南通过后立即予以炸毁。

第1中队的宫崎队于1945年8月9日开始执行爆破北黑铁路北孙吴到黑河站之间的所有铁路桥的命令。小队长宫崎正雄率领加濑军曹以下7名士兵,从黑河站开始乘轨道车,边走边炸,一路炸毁了石金河桥、公别拉河铁桥、瑷珲桥等大小桥梁。

第1中队小竹队的小竹见习士官和第1分队大关伍长及第2分队岩崎伍长指挥炸毁逊别拉河上的北孙吴大桥和并行的北黑铁路桥。当时使用的15厘米榴弹炮炮弹,连续三次才把大桥炸塌,爆破中一名日军被弹片击中死亡。第2中队第1小队长折田见习士官指挥3个分队炸掉孙吴至奇克公路的全部桥梁,破坏公路。第2中队山本队则接受了一个特殊任务,在北黑线北孙吴车站到额雨之间,挖开额雨河堤坝,形成了一大片河水泛滥的淹没地,以阻止苏军坦克的进攻。

有的分队还被派去执行拆毁铁路任务。他们带上铁锤、钢锯、扳手、扒路、撬杠等工具,到一些地方将铁路钢轨、枕木拆除,锯断后扔在附近草丛中。还有的分队被派去奇逊公路沿线破坏公路,设置障碍。

第七节　苏联红军解放孙吴和日军投降

8月15日,苏军由胜山南下部队与奇克西进的机械化部队在孙吴县吴家堡会师后,形成对孙吴

日军花见山主阵地全面合围的态势。苏军在曾家堡机场扎营设立指挥部，并设立炮兵阵地，其先头部队沿公路直逼孙吴。由于孙吴大桥被炸，加之秋雨连绵，水流湍急，无法渡河，暂时撤回曾家堡。次日在曾家堡飞机场南老河套架设浮桥，强渡逊别拉河。渡河后立即攻打对面一宝山、二宝山日军守敌。上午两次攻击不成，伤亡较大。第三次在飞机和坦克掩护下，于当日20时攻克日军阵地，又沿龙逊官道迎头截击溃退日军，在李福窝棚予以全歼。

苏军另一支部队攻下胜山主阵地后，通过胜武屯后面的丁字山奔协振屯，在协振屯和丁字山之间的十字路口设立指挥部，并用气球作标记。苏军通过协振屯向西挺进，攻打东兴屯后山守敌，战斗中得到曾家堡飞机场炮兵的火力支援，但因地势不利，战斗持续一天一夜，苏军伤亡100余人，后来由东兴屯一老乡带路，从侧面攻下东兴屯后山。按着向邻近日军占据的山岗发起进攻，全歼该股守敌。通过东兴屯到曾家堡与主力部队会师。日军第123师团北泽师团长决定由步兵第268联队于8月15日夜向对面苏军组织一次强有力的反击。

恰在此时，第123师团通信队接到第4军司令部电报通知称，8月15日正午将有天皇御音的重要广播，要组织官兵聆听。但此时已过正午，只好在下午5时再行收听。收音机中传出的是天皇"御音"宣读的《停战诏书》，师团长以下对此惊愕不已。为核实消息真伪，又连忙收听了新加坡、旧金山等地美国电台的日语广播，结果内容完全一致。师团长又指示通信队向第4军和关东军总部请示天皇诏书是否属实，得到确认。但军方尚无具体实施办法。

8月16日清晨，师团长召开有参谋长、高级副官、各联队长参加的紧急会议，讨论关于天皇《停战诏书》问题。会上议论纷纷，有的主张继续作战，有的坚持按天皇圣旨行事，立即停战。最后北泽师团长作出了"必须谨遵天皇诏书实行停战"的决断。与此同时，师团参谋部密码班长南部少尉送来了刚刚接到的"第4军司令部关于立即与对面苏军进行停战洽谈"的命令。北泽当即派片山参谋偕翻译并卫队乘坐插着白旗的卡车下山来到已进驻孙吴的苏军野战司令部，会见了苏军第2红旗集团军司令员捷列欣中将，苏军方面还有几名少将等高级军官在场。当片山申明交涉停战的来意后，苏方说"不存在停战问题，而是无条件投降！"片山则以未得到无条件投降的授权为盾词，拒绝讨论该事。经过一番争论后，苏方宣布留下片山的翻译和5名卫兵做人质，要片山即刻返回师团请示，限1小时内回音。片山辩称，途中往返就需2小时，师团长召集各部队长讨论决定需1小时，途中若遇意外事故还可能造成耽搁，故以4小时为限较为适宜。最后苏方同意片山的意见，但声明如到时无回音，则立即处决人质。片山立即返回向师团长汇报。师团长经与各部队长紧急磋商后表示只好遵命照办，别无选择。片山随即返回孙吴，向苏军司令员承诺接受无条件投降。苏方在桌上摊开孙吴地图，指着官舍地带，要求当日中午日军将全体官兵在该处集中。片山表示，日军分散部署在周围几十公里地区，有的电台损坏联系不上，当天下山集中难以实现。他建议可先令就近地区部队自行解除武装，将兵器堆积于指定场所，而后下山集结，其余地区陆续照此办理，时间应予宽限。苏方接受了该建议。片山再次返回师团，向北泽汇报交涉结果，并商讨各部队解除武装的具体位置等有关事项。

8月17日，按计划应首先由辎重联队解除武装，但联队长安倍少佐带头抗命，将部队事先自行解散，安倍本人带部分官兵逃向北安。还有的部队因未及时接到解除武装的命令，而在局部地区当天仍发生了战斗。当天，关东军总部电命各部队应即接受当地苏军司令官的指挥。片山即陪同北泽师团长去北孙吴向苏军司令部投降。北泽在苏军司令员面前主动献上其佩带的军刀，作为赠送对方的纪念品。因苏军关于日军投降政策中允许日军投降军官佩带军刀，故婉言谢绝了这份赠品。

按照北泽师团长下山投降前的部署，第123师团各部队应在当日即8月17日17时举行"军旗奉烧"仪式，这种仪式在小范围秘密举行。参加人员除部队长外，还有副官、参谋、主计、护旗中（小）队长、卫兵等人。在场的许多人还清楚记得第123师团3个步兵联队在东京军旗拜受仪式的情景：1945年3月31日，在日本东京皇宫便殿，举行第123师团步兵3个联队（268、269、270）联队军旗拜受仪式。第268联队长山中高助大佐，第269联队长后藤三平大佐，第270联队长太田纪一大佐和护卫将

校、护旗兵接受了天皇亲授的军旗。参加仪式的有当时军部的陆军三长官，陆相阿南、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和教育总监土肥原。天皇敕语中说："步兵第268联队(269、270)联队编成授予军旗，望汝军人，戮力协心，保卫国家。"

历史无情地嘲弄了一小撮战争狂人，拜将授旗之日，即是玉石俱焚之时。就在东京授旗仪式之后的五个半月的8月17日，师团举行军旗焚烧仪式。在阵地小广场，官兵整队肃立。四名士兵各拽旗子的一角，默然来到队伍前面，旗手杉泽把早已准备好的一瓶汽油，倾倒在易燃烧的日本国出产的名贵丝绸上，那一轮旭日在汽油的浸泗下立即发黑、变暗。



第123师团军旗焚烧仪式

又有一名士兵把点燃的火炬交到北泽司令官手里。北泽中将手执火炬，声泪俱下，这个生于明治22年、曾是日本陆士22期毕业生的职业军人，从步兵第50联队少尉起步，后任参谋本部副、第10师团高级副官、姬路联队区司令官、第三船舶司令官，一直官运亨通，跃升至北正面中心部位的师团长要职。此时，北泽的心情是复杂而低怆的，日本帝国的惨败，军旅生涯的结束，注定了此后他多舛的命运。

当火炬投向旗面的时候，呼的一声，火焰飞腾，那轮太阳顷刻间支离破碎，化为灰烬。无法烧毁的旗杆头，被联队旗手杉泽用木棍像拨拉土豆一样从灰土中拨出来，再用毛布包好，在阵地就近山坡上秘密埋藏。接下来就是苏军受降仪式。

当日18时，第123师团各部队将武器弹药集中堆放在指定地点后，带上行李、衣物、粮食等下山到孙吴官舍街待命。到18日上午，日军下山部队全部集结完毕，并陆续进入指定的俘虏集中营，开始其战俘生涯。加上后几天零星俘获的，在孙吴总计有17 061名日军官兵投降。至此，孙吴全境解放。

第十章　苏军攻克瑷珲、黑河、法别拉要塞

第一节　苏军的进攻部署

负责突破黑河要塞关东军防线的是远东第2方面军所属红旗第2集团军，空军第10集团军和红旗阿穆尔河舰队负责空中和水面的协同作战。

经过改编加强的红旗第2集团军从原来的单一守备部队扩充为兵种齐全、攻击力强、机械化程度高的合成作战部队。司令员为坦克兵中将捷列欣；军事委员为少将纳钦金和少将谢米昂科；参谋长为

少将莫扎耶夫。

空军第10集团军司令员为空军上将日加列夫；参谋长为空军少将拉夫里克。

红旗阿穆尔河舰队司令员为海军少将安东诺夫；军事委员为海军少将亚科文科；参谋长为海军上校古辛。

红旗第2集团军的作战任务是：当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1方面军在主要战场取得胜利并扩大战果时，集团军从其右翼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地域强渡黑龙江，消灭黑河要塞日军守敌，除一部分兵力沿北黑铁路向哈尔滨进攻外，其余部队向齐齐哈尔实施辅助攻击。同时，苏军在其他两个主要战场也同时开辟多个辅助攻击地，迫使日军全线设防，无法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集中起强大的兵力。

第2集团军所属部队分别是步兵第3师、第12师、第396师、山地步兵368团、坦克第73、74、258旅、加强炮兵师、第101筑垒守备队（相当于独立师）。同时，空军第10军轰炸航空兵83师782团，阿穆尔河舰队结亚——布列亚支队的舰艇配合作战。结亚——布列亚舰艇支队包括："积极"号浅水重炮舰、5艘炮舰、16艘装甲艇、4艘扫雷舰、6艘扫雷艇。另外，筑垒部队的126艘机枪艇归支队调动使用，还有一些辅助船只。

远东第2方面军司令员普尔卡耶夫大将命令红旗第2集团军主要承担战区防御任务，防止关东军在东西两面遭到苏军打击下，孤注一掷，集中兵力从北部进犯苏联。待后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1方面军进攻取得胜利后，强渡黑龙江，歼灭黑河要塞日军守敌，然后向嫩江、齐齐哈尔、北安、哈尔滨方向转入进攻。

红旗第2集团军接到进攻命令后，立即将所属部队组成2个突击集群，第1突击集群有步兵第3师、第12师、坦克第73旅、第74旅、炮兵加强旅，在逊克地域康斯坦丁诺夫卡渡江（位于黑河下游，距黑河100多公里），直奔孙吴日军第5国境阵地（霍尔莫津要塞），第2突击集群有步兵第396师、山地步兵团第368团、坦克第258旅、第101筑垒守备队、加强炮兵旅，在黑河对岸城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附近集结，然后从黑河上游1公里、下游1公里两处同时强渡黑龙江，消灭日军第7国境守备队，然后向西岗子第6国境阵地进攻，取得胜利后，沿黑嫩公路，向嫩江、齐齐哈尔方向前进，做辅助攻击。

与此同时，组成2个先遣支队，1个编成有坦克第74旅并配属1个步兵连、1个炮兵营、1个防坦克歼击炮团，在主要方向上行动。另1个编成内有坦克第258旅、1个步兵营、1个重迫击炮团，在辅助方向上行动。

第二节 苏军先遣支队攻入黑河

8月9日上午8时，苏军3架侦察机在黑河上空盘旋侦察一圈后返回，2个小时后，苏远东第2方面军所属空军第10集团军轰炸航空兵第83师第782团派出18架轰炸机对黑河火车站、机场、兵营、第7国境阵地等设施进行扫射和轰炸。晚上10时50分，苏军所有炮火对黑河的日军目标进行了近5个小时的不间断轰炸。8月10日凌晨4时30分，数艘苏军边防部队的装甲艇全速驶入预定水域，对岸上目标进行齐射。日军的炮兵进行了回击，但由于命中率极低，未能对苏军装甲艇造成多大损失，装甲艇没有减速，继续沿黑龙江左岸航行并对目标直接瞄准射击，1小时后，装甲艇返回结亚河口。这次突袭摧毁了日军设在江岸的几个火力点和一座油库，击沉2艘快艇和4条平底船。

清晨对日军的炮击，拉开了红旗第2集团军向黑河要塞全面进攻的序幕。上午10时左右，苏军先遣支队的人员乘坐运载武器装备的运输船，开始强渡黑龙江，在黑河市下游1公里处登上黑河土地。上岸后，快速向市区推进，扩大战果。结亚——布列亚舰艇支队也组织了一支水兵登陆部队，协同苏军先遣支队共同作战。


苏军舰艇强渡黑龙江


水陆无阻的坦克

在苏军强渡黑龙江过程中，没有遇到日军有组织的大规模抵抗，仅有零星日伪军企图阻击苏军，但很快就被先遣部队消灭。事后查明，在苏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日军已接到撤退的命令，向瑷珲要塞集结。这样，苏军先遣支队一面快速占领黑河市区，一面集合整理继续上岸的部队。由于人多，重武器装备多，所有部队都挤在一个渡口，因此，傍晚苏军在黑河码头又开辟了第二个登陆点，登陆速度加快。上岸部队来不及休息，采用边侦察边推进的战术，连夜占领了日军第7国境阵地。

在向日军驻黑河大本营山神府开进途中，曾遇到小股日军的抵抗，在苏军强大的火力打击下，日军大部被歼，其余四处逃散。到达山神府后发现，所有的日军早已逃走，只留下被关东宪兵队点着的大片燃烧着的营房。

因渡江器材不足，重型坦克、大炮、自行火炮装卸时间长，耗时费力。因此，红旗第2集团军先遣支队是按渡江的先后投入战斗的。

从8月11日开始，红旗第2集团军所属两个突击群主力分别在黑河、孙吴等地渡江，并按照集团军统一部署，部队快速集结，逼近日军主要防御阵地的抵抗枢纽——瑷珲和霍尔莫津要塞。

第三节 日军的烧杀与破坏

8月9日凌晨以后，关东军便陆续接到中苏(蒙)边境各地关于"苏军全面入侵"的情报。5时左右，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35旅团便接到部队集结的命令，于是下令所属各部队向西岗子集中。

与此同时，伪黑河省省长日本人村川矢之助在省公署警务厅召开了省公署、警务厅、宪兵队、特务机关等单位股长以上军、政人员紧急会议，宣布苏联已对日宣战，部署从即刻起，"满洲"全境进入战争状态，在黑河的日本人撤退到孙吴，有关文件档案烧毁，军用设施及码头、发电厂、飞机场尽数破坏等事宜。会后，日伪机关开始焚烧文件档案，特务机关、宪兵队及伪警察，除安排逃跑后事外，还专门成立"放火处理班"，在日本军曹的带领督促下，开始有计划地将发电厂纵火破坏，四台发电机组约有三台毁坏严重。在航运码头，将火车站至码头的铁路全部拆除，放火烧毁了候船室。日伪特务还将黑河邮政局洗劫一空，将伪满中央银行黑河分行营业室洗劫后放火烧毁。

晚8时，日军宪兵将黑河的伪、警、宪、特机关、兵营驻所全部浇上汽油后点燃，全城顿时火光冲天。后来，放火处理班一部分宪兵、特务将一些非军事设施也一起烧掉，如洋行、商社、会馆，殃及许多无辜市民。大火造成十里连营，浓烟烈焰遮天蔽日，数十里外都可见到。

黑河宪兵队和特务机关的特务们在逃出黑河路经山神府时，将山神府的日军兵营也放火烧毁。在逃至嫩江的路上，放火班后来竟丧心病狂，见金银首饰便抢，见房子就烧，走一路，抢一路，烧一路。

在黑河特务机关逃离黑河时，机关内尚关押着2名被俘的苏联谍报人员(中国人)，随着特务机关的被焚，2名谍报人员也被活活烧死。

第四节　苏军攻克瑷珲要塞

苏军先遣支队从黑河登岸成功，并快速向前推进，沿途几乎没有遇到日军有组织的抵抗，追击速度很快。主力部队渡江后也立即加入到追击日军的行动中，于8月11日逼近西岗子瑷珲要塞，在要塞阵地前苏军做兵力调整，组织炮火，集结部队。

瑷珲要塞为日军第6国境阵地，是关东军北部正面战区重要战斗指挥枢纽，以工事坚固、占地面积大、装备精良而著称，守军为7月份刚刚组建的独立混成第135旅团。由于日军在前沿阵地采取收缩、集中的策略，以免被苏军各个击破，因此，黑河要塞及前沿阵地的日军几乎全部集中到西岗子，使西岗子日军人员猛增，已接近5 000人。瑷珲要塞守敌依仗工事坚固、兵员充足，积极备战，妄图阻止苏军进攻速度，为孙吴霍尔莫津要塞守军做好军事部署赢得时间。独立混成第135旅团根据要塞各阵地的战略位置，在兵力、炮火等方面做了新的调整和部署，其构成是：

一、西岗子主阵地

旅团司令部、步兵第797大队第4中队（旅团直辖）、步兵第795大队第1中队驻守在东山阵地，第2中队驻守在南丘阵地，第3中队驻守在三角台阵地，第4中队驻守在北山阵地。机枪中队配属于各中队。

旅团挺进大队大队部驻守在中山阵地，第1中队驻守在中山阵地，第2中队驻守在西山、舟山、铁蹄山阵地，临时炮兵大队、旅团工兵中队、旅团辎重大队、独立速射炮第30大队驻守在舟山、三角台阵地。

二、陡沟子阵地

步兵第796大队第3中队驻守在陡沟子阵地，中队长饭岛中尉。

三、二站阵地

二站阵地指挥官为长岛少佐（炮兵大队长）。驻守兵力为步兵第796大队所属步炮小队、第1中队、第2中队、第4中队和机枪中队；步兵第797大队所属第1中队（缺1小队）、第3中队、机枪中队和步兵炮小队，大队长千叶大尉；挺进大队，中队长雨官中尉；炮兵大队，大队长长岛少佐；另有工兵小队、通信小队、宪兵分队。

此外，在二站阵地新增加了关东军骑兵下士官候补队，大队长间濑大尉，下设第1、第2中队，总兵力约400人；步兵第798大队所属第4中队和机枪中队；伪满洲国军大队，大队长由日本人担任。二站阵地守备队总兵力达到2 500人。

四、潮水阵地

潮水阵地指挥官为佐久间中尉。驻守兵力为步兵第797大队所属第1中队中的第1小队和第2中队；旅团炮兵大队第3中队；旅团工兵队一部分；旅团挺进大队第3队中的1个小队；旅团通信队一部分；潮水青少年义勇队，队长千田曹长，约100人。

8月11～16日，苏军先遣支队及后续渡江的步兵第396师和山地第368团、坦克第259旅及集团军直属炮兵，不断在西岗子日军要塞周围集结。由于渡河器材不足，第2集团军一共用了5天时间，直到8月16日才完全从2个登陆地点全部登上黑河土地。苏阿穆尔舰队——结亚支队及配属的快艇、浮动器材共运送22 845人、1 574匹马、847辆辎重车、1 459辆汽车、161辆坦克、116辆装甲车和牵引车、429门火炮和迫击炮，各种物资4 000多吨。从瑷珲至逊克之间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向瑷珲、孙吴沿江运送64 891人、4 933匹马、2 213辆辎重车、488辆坦克、460门大炮和重迫击炮、3 800多辆汽车及14 330吨物资。

攻打西岗子日军要塞的战斗从8月11日开始打响，苏军在这个地段集中了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100多辆坦克直接参加战斗，每平方公里火炮密度达到230门，10余架轰炸机、强击机在空中配合作战。

战斗从一开始就打得异常激烈残酷,苏军集团冲锋前的炮火准备每次都在1小时以上。日军凭借坚固工事同苏军展开厮杀,甚至利用战斗空隙,多次组织反冲锋,将刚刚被苏军占领的工事又夺了回来,日军的“肉弹”敢死队员手抱炸药包扑向苏军坦克,苏军的进攻速度受阻。

8月13日开始,苏军及时做出战术调整,增加了前沿攻击力量,炮火准备时间延长,从全线进攻改为定点清除,一段战壕一段战壕地同日军展开争夺,夺取一个前沿工事就随即炸毁一个。猛烈的炮火和轰炸打得日军抬不起头来,被迫全部转移到地下工事里顽抗,使苏军有机会在占领地面工事后,用火焰喷射器和集束炸药包攻击日军。尽管部队前进速度缓慢,但是却收到良好效果。日军南山主阵地的炮火已被苏军彻底压制住,部队之间的联系已经中断,各阵地之间的火力支援已完全不起作用。第135旅团同第123师团已失去联络,只有通信兵冒死闯过苏军的火力封锁网,将旅团长的命令传给各个阵地的官兵。苏军在不断加大攻击力量的同时,巩固成果,使日军不得不放弃前沿阵地,开始向南山主阵地溃逃。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接到命令后,许多日军部队立即放下武器,向苏军投降。然而,驻守瑷珲要塞的日军135旅团由于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根本听不到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命令,旅团长浜田十之助少将躲到巨大坚固的地下指挥部里,指挥所属部队继续同苏军顽抗。

8月15~16日,苏军的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开上前线,阵地的争夺战达到了高潮。日军不断发起反冲锋,妄图夺回前沿阵地,但都被苏军猛烈的炮火击退。在航空兵的掩护下,苏军一次又一次向要塞守敌发起进攻,以阿穆尔舰队——结亚支队组成的水兵突击营始终冲在最前面,他们在攻克了日军最前沿阵地后,将胜利的旗帜插在了日军要塞东山阵地和北山阵地上。日军主力已全部退守在南山阵地的地下工事里,成了“瓮中之鳖”。苏军不断调集炮兵,延长炮火攻击时间,从原先的1小时炮火准备延长至2~3小时,并将航空兵第18军的主力轰炸师、强击机师派上前线,对日军工事轮番轰炸,直接配合地面部队向前推进。

与此同时,苏军先遣支队在开往嫩江途中遇到了陡沟子日军的阻击,战斗十分激烈。在战斗中,苏军首先用猛烈炮火压制日军,使日军守敌顾此失彼,然后以坦克为先导,猛攻日军阵地。从8月15~18日连续4天,日军阵地被各个击破,伤亡惨重。苏军在深夜仍不放弃进攻,日军弹药不足,疲惫不堪,中队长饭岛负伤,数十人被打死。8月19日中午苏军派出1个士兵,押着1名手持白旗的日军俘虏,来到日军阵地前,宣布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和关东军司令部要求所有部队放下武器的命令。日军最终被迫放下武器投降,生还者仅20多人。

在二站,日军坚守阵地,同苏军寸土必争,苏军尽管在兵员、武器、炮火等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但进展缓慢。8月15日,二站与西岗子旅团司令部的电话中断。从8月16日中午开始,苏军加强了进攻速度,炮火集中攻击了二站北阵地。午夜时分,为了扩大战果,苏军改打夜战,无数颗照明弹将天空照亮,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轮番冲向北阵地。8月17日凌晨,日军从北阵地上败退下来,逃往东阵地。苏军乘胜追击,十几架飞机在空中掩护,冲锋部队以坦克开路,尽管日军仍在顽抗,但损失惨重,人员伤亡不断增加。为了挽回败局,日军阵地最高指挥官长岛少佐下令集中部队,对苏军坦克实行“肉弹”攻击。肉弹攻击班队员手拿集束手榴弹或炸药包,扑向苏军坦克;工兵队在苏军的必经路上埋设地雷,破坏道路。所有这些措施,虽然使苏军进攻一度受挫,但日军终究无力回天。苏军的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打得日军肉弹攻击班队员根本靠不上前,除了逃跑就是等待被消灭。日军下士官候补队几乎被全歼,中队长以下干部全部被打死,步兵第796大队第2中队也损失大半。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8月19日,残余日军终于举手投降,黑河——嫩江公路全线打通。

8月12日,苏军红旗第2集团军步兵第396师一部分兵力与坦克第258旅自动火炮团从瑷珲至大五家子处登岸,直插西岗子国境阵地中另一个重要据点——潮水。日军设在黑龙江岸的监视哨士兵(每个监视哨有士兵20~30人)惊慌失措,急忙向潮水阵地退去。苏军先头部队来不及整顿休息,一路追击至潮水阵地前沿。仅有的几条军用公路已被日军破坏,日军依仗地理优势,妄图阻止苏军从

这一地区向前推进。

苏军集中了优势炮火首先摧毁了日军潮水阵地上的地面工事,然后兵分多路,以小股部队(每次进攻都用1个排左右的兵力)轮番向日军阵地发起冲锋。从8月13日开始,苏军的进攻尽管受到日军的顽强阻击,但进攻决心不变,进攻部队不断增加,苏军航空兵的轰炸机、强击机直接参加战斗。至8月16日,前沿阵地尽数被苏军攻克。日军在猛烈的打击下,伤亡损失巨大。8月19日,日军仅剩北山阵地一处。中午时分,苏军所有炮火、轻重机枪同时向北山阵地开火,射击约半个小时后开始冲锋。多名日军士兵举枪投降。8月20日早晨,在苏军限定投降的最后时间内,潮水阵地日军终于放下武器,并于当晚9时和西岗子要塞的俘虏一起被带到孙吴战俘营集中看管。

瑷珲要塞,这个号称为关东军北部正面战区规模最大的要塞阵地,现在只剩下南山主阵地了。日军龟缩在地下工事里,任凭苏军猛烈轰炸。8月18日,驻孙吴的日军第123师团被彻底打败,一万余名日军成为俘虏。而在西岗子,日军135旅团仍在做最后的抵抗。为彻底将其打垮,苏军第2集团军司令部决定从8月19日开始,加强攻击力度。轰炸航空兵第83师第782团飞行员起飞前,列成一队亲吻战旗,并庄严宣誓,一定要彻底打垮日军第135旅团,为军旗争光。步兵第396师第614团、第101筑垒部队、坦克第258旅、集团军直属加强炮兵师在战前也都表达决心。同时,苏军飞机将日本天皇投降诏书、关东军司令部关于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和红旗第2集团军司令部限第135旅团于8月20日零点前放下武器的命令,空投给阵地上的日军,然后总攻打响。苏军猛烈的炮火轰击及苏联红军敢于作战、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令日军守敌心惊胆寒。8月19日傍晚,南山阵地面目全非,到处是冒烟的战壕和被炸得粉碎的混凝土制成的掩体和工事。苏军主力未急于地面进攻,除了空中打击和炮火齐射外,只派出小股部队去牵制日军,使日军不敢大意。8月20日下午6点,已经投降的第123师团派出军使中村少尉来到西岗子,宣读了日本天皇、关东军及第123师团放下武器投降的命令,瑷珲要塞最高指挥官浜田少将随即做出了放下武器的决定。苏军从四面八方冲上阵地,欢呼胜利。日军除一部分被消灭外,4 520人做了俘虏。

这是一场实力相差悬殊的战斗。从战斗一开始,日军就处在下风,一个是硬攻,另一个是死守,苏日双方兵力对比为3∶1、坦克为6∶1、火炮为20∶1,并且苏军武器性能、质量要远优于日军。日军在黑河境内共修建了10个军用机场,但战争打响后,日军连1架飞机也没有,制空权完全掌握在苏军一方。

第五节　苏军的英勇战斗

苏联红军在攻打瑷珲要塞及黑河其他日军的战斗中,表现了高尚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良好的战斗素养,充分体现了苏联红军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8月10日,结亚舰艇支队装甲艇向黑河日军阵地炮击时,第174号装甲艇一个汽油箱被日军燃烧弹击中起火。这时,机枪手、共青团员安德里发现后,立即扑向汽油箱,毫不犹豫地以自己身体盖住火舌,排除了一场险情。8月17日,在攻打二站阵地的战斗中,1辆苏军坦克被击中起火,车长、共产党员阿列金没有退出战斗,而是指挥已着火的坦克冲向日军阵地,消灭了2个机枪掩体。

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员都是以身作则,他们站在消灭关东军战役的最前列,成为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表率,成为全军学习的楷模。阿穆尔河舰队在整个战役期间,有530多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许多水手在接受任务时都说"请党考验我"。他们在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证明了他们是一群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步兵第396师第614团第3营冲锋枪手、共产党员萨沙在进攻陡沟子日军前沿阵地时,被日军一颗子弹击中左腿,包扎之后,他又投入了战斗,后被5名日军包围,他宁死不屈,等到敌人靠近时,他高呼口号,拉响了集束手榴弹,与5名日军同归于尽。山地步兵第368团第1营的排长,在攻打西岗子南山阵地时,身中3枪不下火线,高喊"同志们,跟我冲",带领全排进

攻并亲手打死了2名日军。

战役结束后,远东第2方面军红旗第2集团军所属部队有8 000多人荣获各级勋章、奖章和荣誉称号,阿穆尔河舰队有3 000多人荣获了勋章与奖章,有7人荣获苏联英雄荣誉称号。

第十一章　苏军攻克富锦要塞

第一节　苏军的进攻部署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按苏联远东军总指挥部的作战部署,红旗阿穆尔河舰队协同远东第2方面军第15集团军,溯松花江而上。8月10日拂晓,舰载步兵第361师、第388师和坦克第171旅登上同江,日军在同江的顽强抵抗没有能够阻止苏军的进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日军大部分被歼,苏军水陆两路从同江发起攻势,准备直奔富锦。

8月10日下午3时,远东第2方面军第15集团军的第361师黑龙江舰队接受了向富锦要塞区进攻的战斗任务。富锦要塞区是关东军阻止苏军进攻的主要江上屏障,是进入松花江向哈尔滨航线通行的第一个防御要塞区。

苏军的部署是:1个步兵师由第1支队长指挥。舰队运载2个营和1个强击连,在松花江右岸登陆,协同在这一地域进攻的1个坦克旅夺取松花江右岸日军工事并占领富锦县城。为确保攻克富锦,第1支队长克里诺夫海军中校又重新调兵布阵,将第1江河舰艇支队分为侦察和掩护2个中队;侦察中队由"孙中山"号和9艘装甲艇和扫雷艇组成,护送第1梯队登陆;掩护中队由"列宁"号、"红色东方"号和3艘装甲艇组成,任务是掩护侦察中队并护送第2梯队登陆,同时还布置了空中巡逻和空中封锁,进行海空配合作战。

各中队又利用战前仅有的几小时时间,在蓝色的江面上,进行了以富锦江岸为目标的快速登陆演习和战前政治教育。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们纷纷宣誓坚决消灭敌人。战前教育搞得十分热烈,苏军官兵们士气非常高涨。

第二节　日军的兵力配置与部署

一、部队的改编与准备

1945年1月25日,驻守在佳木斯的关东军第71师团抽调台湾,其后由残留的临时设置师团(为日后组成师团的基干人员构成的部队)和富锦驻屯队担任三江省的防卫任务。同年7月30日,在第14国境守备队、富锦驻屯队和独立混成第78旅团的基础上组建关东军第134师团,师团长井关仞中将,师团司令部驻佳木斯。师团所属步兵第367联队第2大队驻守富锦。

第134师团的任务和行动安排如下:作为第1方面军的直辖师团担任佳木斯等方面的防御作战任务。按第1方面军最初的计划,第134师团的基本任务是以持久抵抗的方式,在阻击面临的苏军同时后退,这样最初佳木斯必然会成为阻击阵地。但下达的命令却是开战的同时向方正方面后退,于是造成开战后只有富锦部队进行激战的局面。

在此之前的1945年6月,佳木斯的临时设置师团和富锦驻屯队(以步兵3个大队为基干)的主力,为了构筑阵地移动到了三江省方正县。于是守卫富锦的部队完全由步兵第367联队第2大队独立承担,并做了大量的战前准备工作。

在富锦街南侧的扶桑台(台的南侧有富锦飞机场)原先就有比较坚固的阵地,但战前需要大量的补修工作,于是第2大队在强化训练演习的同时,也加紧了诸工事的作业。考虑到苏军会有猛烈的炮击,需要有连接阵地各据点的地下坑道,因此加紧了这方面的构筑,但只完成了七成战争就开始了。其他方面如进行了兵营及阵地的强化加固,特别是加强了伪装,另外还进行了用混凝土制作预备枪眼的埋设及伪装等。另一方面为了直接防守面临松花江岸的富锦街,在街东侧及东南侧构筑了大型的防坦克壕和临时城墙阵地。

1945年7月下旬,步兵第367联队第2大队长木村大尉向上司要求准备防坦克地雷1 000发,得到了"因师团没有多少,而富锦部队的富安煤矿有2吨甘油炸药,和其交涉后去取"的答复。后因事情紧急,最终地雷和甘油炸药都没有得到。

二、日军的兵力部署

开战时守卫富锦的兵力,有步兵第367联队的第2大队主力和富锦江上军第2团(重机1个,炮4门),由陆军上校菅野仓之助指挥。

1945年8月9日3时,日军接到值周军官坂井淳二少尉东部国境日苏两军已经进入开战状态的报告后,立即集合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并进行了以下部署:

1. 同江及抚远的国境最前线做好战斗准备,并详细报告苏军情况。

2. 富锦驻屯各部队向阵地内蓄积粮食、弹药等物资,尽快彻底地进行阵地加固与伪装。

3. 通知驻屯地内的各部队及满军、警察队、宪特机构、县公署、街公署日苏已开战,各机构中相关人员按战斗预警迅速集中,配备到各部队。

4. 富锦陆军病院优先乘坐早晨第一班船,向哈尔滨市出发。其他的在留日本人也坐船、汽车去佳木斯避难。在乡军人收回警察的武器,护送在留日本人。

8月9日清晨,富锦上空从五顶山方向飞来苏军侦察机,朝绥滨街方向飞去,10时左右开始以对岸绥滨码头的船舶为目标进行轰炸。11时左右富锦上空出现苏军30余架飞机开始轰炸,午后转向停在富锦码头的船只,轰炸了集积的炮弹及汽油等。下午5时许,日军的家属乘坐卡车向佳木斯出发,由数名军曹以下的士兵护卫。宪兵及特务机关的家属也于8月10日早晨出发去佳木斯。

富锦江上军第2团在守备富锦街阵地的同时,在安盛屯北方松花江上沉没2艘拖船,以阻止苏军舰艇的进攻。

8月10日晚10时,江上军第2团的小仓少校请求让江上军向后方转移,遭到拒绝,并命其回去为明早战斗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同江县的日本难民要求在富锦阵地停泊,未许并让其到后方避难。

在富锦县城内,步兵第367联队第2大队木村大队长命令国境地带的部队和视察班逐次后退,在与苏军接触的同时,努力收集情报。

同江的谷井队,谷井正夫中尉及属下约100名,和三江口的足立少尉及属下汇合转移,10日夜进入富锦的五顶山阵地。

第三节　苏军初攻富锦

1945年8月10日下午4时,同江县江面停泊口上排列着一艘艘苏军战舰,舰上大炮已摘去护罩,炮口已昂起。陆军第364师步兵团2营已进入"孙中山"号舰舱,全副武装的苏联红军时刻待命。4时20分,第1支队的巡逻侦察中队悄然离开同江向富锦驶去。晚7时,第345步兵团乘坐的"列宁"号也起航向富锦的日军要塞区驶去。

晚10时,航舰一律闭灯行驶,在距离富锦27公里处,掩护中队迅速减速,舰队在图斯科沙滩旁停

航。1营在这里悄悄上岸,按照指定目标向纵深前进。

此时,装甲艇中队继续在松花江上向富锦快速前进,关东军在江上设置的航行标志灯,给航行带来了极大方便。3艘装甲艇上所有的炮口都瞄准了岸上的工事,舱内的步兵也进入了战斗状态。到图斯科时,又有1个步兵营在这里登陆向富锦方向进发。

此时,自称森严壁垒的富锦要塞已被先后从岸边登陆的苏军部队包围起来。登陆的步兵从侧后、侧面围绕起来,并抢占了两个山包,等待第二天拂晓和江上的舰艇一齐发起全面进攻。

8月11日凌晨2时,松花江图斯科的江岸上,掩护中队的舰艇正在做进攻的准备。在一艘舰艇指挥作战室内,步兵大校师长同舰长帕夫洛夫大尉、装甲艇的指挥员伊万丘克、加里宁、索科尔尼科夫、斯米尔诺夫等海军上尉、大尉们在一张军事地图前研究进攻方案。师长指示:一旦战斗命令下达,各装甲艇应全速向日军码头进攻,用迅猛的火力摧毁日军工事,快速抵达岸边,掩护艇上的步兵登陆;潜伏在日军侧后的1营和强击连,在炮火一停看到信号后,迅速发起冲锋,全歼守备日军。

8月11日凌晨3时,3艘战舰在图斯科的江岸水中前进,为了扫除日军水雷,扫雷艇在前面打头阵,其后为装甲艇,后面是重炮艇,3艘舰艇之间拉开了一定距离,快速前进。当富锦出现在江面上时,3艘舰艇加速向停泊场冲去(停泊场为江上军2团嘎尔当营区范围内)。

8月11日凌晨4时30分,当苏军3艘舰艇刚一冒出水面,就被日军的观察哨发现,一阵急促的警报后,2 000多名日伪军钻进了碉堡、地堡等工事。日军的江岸工事建筑面宽大,纵深长,而且错落有致。驻守在这里的日军是松花江舰队江上步兵团2营、25守备营和伪满步兵等。

驶在前面的扫雷艇被日军的一发炮弹击中燃起大火,救护班的12名苏军战士立即用水龙头灭火,用工具扑打。随即舰艇上的大炮向岸边要塞工事猛烈开炮。

"孙中山"号浅水重炮艇,艇上有4座炮塔,此时炮弹早已装上膛。这个舰艇的最高指挥官是少校科尔涅尔,他在发现日军岸上工事和火力点时,立即命令开炮,一阵轰炸后,岸上有个两米多高的碉堡被摧毁,架在山石上的2挺重机枪和附近的1门迫击炮也被炸毁,首发命中,使苏军精神大振。

江岸有设在地下十分坚固的火力点,探出上面的混凝土掩体里,三个黑洞喷着火舌,重机枪的子弹如雨般的打到舰艇上。由于地堡嵌在石头里,苏军的炮弹在上面轰炸后,只能掀起几米深的土,而底下毫无损伤。激怒的炮手杜勃列夫对准日军的目标连发几炮,终于将日军的火力压制住。苏军慢慢将"孙中山"号浅水重炮舰停靠在岸边,在岸边建立了观察点,用仪器对日军阵地进行快速测量,准备在停泊场一带登陆。

射手们在江面炮塔瞄准好日军的阵地时,再与观察所测量的目标一核对,修正后的目标使炮手们放出的炮弹几乎百发百中。岸边的日军工事也接连被摧毁。在一片开阔地里,日军的几十门迫击炮一齐向舰艇射击。由于战舰的面积大,炮弹大部命中,致使炮塔附近的炮手和弹药员受到很大的威胁。

科尔涅尔少校命令4门炮同时向日军迫击炮阵地轰击,瞄准日军炮阵地后观察哨用仪器很快校正了瞄准距离。4门炮一齐射击了10多分钟,整个日军迫击炮阵地几乎被炸成一片废墟。

当观察哨报告有一栋日军营房隐藏在绿树下,并有日军频繁往返时,舰上的炮又一阵猛轰,只见房屋内发出阵阵爆炸声,火光冲天,浓烟滚滚,弹片横飞,原来这里是江岸日军的一个武器弹药仓库,房内存有十几种弹药,重量达100余吨。

江对岸的激战进行了半个小时,日军在岸边的炮火主要是机枪、步枪和迫击炮。虽然火力密集,但威力不大,特别是和苏军舰艇上的大炮、装甲舰上的火箭炮相比,威力相差悬殊。由于苏军舰艇甲板上防护较好,战斗自始至终没有受到重大损伤和破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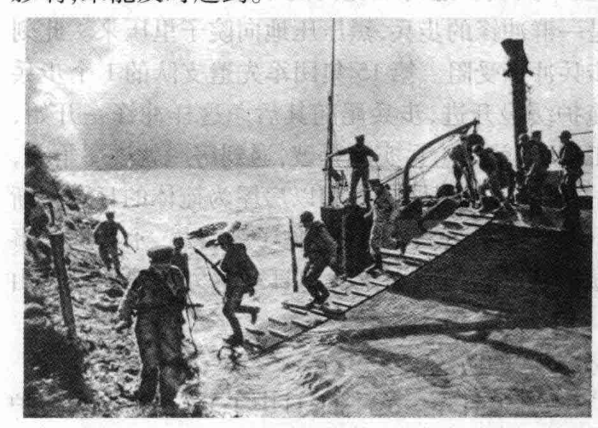
港湾炮火连天,日军仍在用大小炮还击,战斗进行十分激烈。富锦江湾被10余艘舰艇包围着,几艘装甲艇停在岸边和浅水处向日军射击,舰艇上有名叫夏卡巴诺夫的战士爬上了了望台,帮助校正装甲艇上的火炮。在他的指导下,击毁了几十个火力点和另一座弹药仓库。对射了1个多小时,富锦江

岸山坡上,一片火海浓烟,日军表面工事遭到极大破坏,死伤了大批官兵,火力也几乎失去作用。

8 月 11 日上午 8 时 30 分,“孙中山”号浅水重炮舰边缓缓行进,边向日军开炮,慢慢接近了岸边、码头。步兵第 364 团 3 营和强击连从舰上快速登陆,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迅速占领港湾的制高点和工事,并向富锦城内推进,舰艇的水兵也同步兵一起向城内行进。可是刚才被猛烈的炮火轰炸躲藏起来的日军,见炮火一停,又从破碎的掩护角落里冒出来,用机枪、步枪和手榴弹拼命反击。日军的永备火力点和钢筋水泥筑成的碉堡,虽被严重摧毁,但部分残体仍很坚固,日军步兵借助残缺工事又筑起一道防线。3 营的 500 多名官兵和 200 多名水兵,端着冲锋枪冲锋,工事里日军一阵猛射,冲在前排的苏军倒下了一批,冲锋此时受阻,3 营官兵被阻止在江岸边。

日军少校 2 营长藤谷川颜,立即下令迫击炮向苏军阵地开炮,并纠集 300 多名步兵准备反冲锋,企图将苏军消灭在河岸,或赶到江里。300 多名日军向江岸扑来,冲势很猛。这时,“孙中山”号浅水重炮舰上的炮开火了,只用 3 炮就将日军阵营炸乱,日军死伤大半,剩余的逃走。

按计划,富锦江岸的日军应被苏军江边兵力和先遣部队包围起来,但有些先遣部队受道路泥泞的影响,未能及时赶到。



苏军登陆



苏军登陆

在同一时间内,苏军从四面发起了进攻,200 多名穿着海军服的水兵正沿着一片杨树林向富锦街道冲来。街道几乎没有日军阻拦,他们从一个僻静的小胡同里冲了进去。在库兹涅佐夫海军大尉的率领下,水兵们边打边冲,在一个营房拐角处与日军遭遇。但这只是一股从岸边败下来的江岸守备日军,有的有武器,有的没武器,还有几个背着行李和皮箱的,战斗力不强,经苏军一阵猛打后,便有 150 多名日军投降。

登陆的苏军 3 营从正面向日军冲击时,突然遭到日军 1 个中队的反击。100 余名日军在冲锋号的催促下,边冲边喊,苏少校营长立即命令队伍卧倒射击,苏军的冲锋枪打得日军纷纷倒下,前边被打倒一批后,又有一批冲上来,和前面的苏军拼起了刺刀,由于日军人数少,很快便被全部消灭,百余具尸体横躺竖卧在阵地上。剩余的江岸守备日军都退守到富锦县城里去了。

第四节　苏军总攻富锦

富锦县城是日军江岸防御工事的重要地带。日军在这里建筑坚固的工事,一是防止东北抗日联军的袭击,二是抵防苏军的攻打,所以十分坚固。城远郊有一圈铁刺网,高 4 米,又绕了一圈深沟高垒。近郊是连绵的地堡,高 1.5 米左右,上面有机枪和步枪的枪眼,各个火力点可交叉射击。县城各路口城墙有 10 米高的圆柱状大炮楼,可用重机枪扫射,控制城镇四周。在县城内,有从江岸溃退的边防哨所的日军,有江防步兵的 2 个营,共 900 余人,有 3 个连的伪军则在开战不久后便逃离了。

8 月 11 日上午 9 时,富锦县城开始被苏军的部队和坦克包围起来,炮口直对城堡。刚刚乘舰艇沿松花江逆流而上的第 15 集团军先遣部队,登陆后也逼近了富锦。这是主力部队,有 2 个坦克旅、1 个步兵营。这样,苏军的兵力和武器装备大大地超过了日军。

9 时 30 分,苏军坦克旅的 70 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先向富锦城堡开炮 5 分钟,之后数以千计的苏军步兵向县城冲了过去。两个喷着机枪火舌的碉堡,被 1 辆坦克的火炮轰了 3 炮后,炸飞了。步兵们高喊"乌拉——"端着冲锋枪冲了上去。工兵们也炸开了 3 个炮楼,从而打开了缺口。苏联陆海军战士一起冲入城内。

日军松花江江边步兵 2 团 3 营和守备 2 营的富锦城防司令部设在一座有 3 层鹅黄色楼房的大院内,这里壁垒森严,不仅设有指挥部、防炮洞、地堡、炮楼,还有日军少校营长藤谷川颜率领的在江岸被击溃的 300 多名步兵。20 米高的圆柱形炮楼,上中下形成 3 道火线,有 6 挺重机枪,另有 36 个步枪射击孔,可控制四周 2 公里以内的地带。

在街道的两座茅草房前,4 辆并列的坦克猛烈地向日军碉堡开炮。随着一声声巨响,大院的炮楼被击中,因双方距离只有百米左右,炮楼的左角被掀去一大块。这时坦克向院子里冲来,木桩做的路障被撞碎,由草包堆起的沙墙也被跃过。坦克后面是一群冲锋的步兵,黑压压地向院子里压来。此刻日军也相继从各个角落开火,而且枪法很准。苏军步兵冲锋受阻。第 15 集团军先遣支队的 1 个步兵营,在少校营长的指挥下,重新改变战术,由坦克做掩护缓慢开进,步兵尾随其后。这样冲锋一开始,坦克边开进边放炮,而跟上的步兵每接近一个日军工事时,就用工兵实施爆破,遇到房屋就逐屋争夺,并派兵进行迂回包抄。日军的火力点在坦克面前失去了效力,炮楼、地堡和以房屋为掩体的日军逐渐被击垮。战斗到黄昏,院子里仍硝烟弥漫,日军少校(是院子里最高指挥官)见子弹将尽,永久性工事大部分被破坏,就趁天黑之机,下令撤退,从富锦县城撤到了日军南岗军营和日军主力防守的五顶山阵地。

日军的南岗军营距富锦县城 10 公里,是一道十分坚固的防线。

另一方面,战斗也在进行中,苏军坦克旅和 1 营官兵猛追日军。8 月 11 日中午,苏军在炮火掩护下,约有 1 个连的兵力逼近日军扶桑台阵地。从南门通往南岗飞机场的道路也被苏军一举突破,共 12 辆坦克突入。当苏军离日军阵地 60 米时,日军突然开火,进行火力急袭,造成苏军约 400 ~ 500 名官兵伤亡,第一次冲锋受阻。进入阵地的 12 辆坦克,到达阵地南端时,日军利用野炮及南门外的速射炮射击,并在阵地内与苏军进行了肉搏战。到黄昏时,苏军冲锋 7 次都没有成功,只好停止,并有 10 辆坦克被日军击毁。

双方在对峙。黄昏,趁苏军吃饭时,日军 400 余人共分三组,袭击了阵地前的苏军炮兵和坦克。狡猾的日军不开枪不开炮,弯着腰偷偷摸摸上来,临近苏军坦克前先扔一阵手榴弹,后冲上来与苏军拼刺刀,半个小时后日军又跑回阵地死守起来。

8 月 11 日夜,日军又从阵地出来偷袭了苏军的两三个炮兵阵地,造成苏军一定程度的伤亡。

8 月 12 日凌晨,苏军先用江上军舰的炮火向日军军营进行轰炸后,又发起冲锋,但未成功。早晨日军炮兵对苏军进行了急袭射击和数次空袭时的对空还击。

8 月 12 日下午 2 时,苏军从富锦街西南方开始攻击,向陆军病院及第 775 部队兵营的阵地攻击。坦克与昨日不同,以 T34 型为主,在狙击兵的协同下冲锋。日军的木村大队及片山队、片冈队一起在阵地前与苏军展开了激战。由于苏军坦克炮火的攻击使各碉堡枪眼遭到破坏,日军伤亡严重。加上日军所有的大炮都不能击毁 T34 型坦克,日军只好将 2 个坦克所使用的地雷并用,炸药也是将 5 公斤为一份的双份使用,进行"肉弹"攻击。T34 型坦克使日军各碉堡破坏非常严重,苏军逐渐进入日军阵地,日军只好退到备用阵地,并用刺刀与苏军展开白刃战死守阵地。

这天的战斗,使日军各部队遭受到了严重损失,第一线中队死伤者约 30%,苏军坦克也有损坏,官兵也有相当的伤亡。

8月12日晚11时,日军步兵第367联队第2大队长木村大尉担心日军更大的损失及弹药不足,决定转移,并下达了转移的命令。全文如下:

木村部队命令　　8月12日午后11时　　于扶桑台

(1)部队根据师团命令8月13日午前0时向五顶山转移,然后准备战斗。

(2)各队准备携带可能的兵器弹药,在炮使用不上后,各方面同时突破包围,向五顶山集结。突破的位置用图指示。

(3)负伤行动不便者由军医处置。

当时的兵力约600人,各中队保有坦克地雷及炸药二三发,各队二三组的挺进奇袭中止,做好转移的准备。

8月13日中午,苏军由于第367步兵师和第171坦克旅的配合,在富锦开始对扶桑台阵地发动全面进攻。

苏军1名小队长冒着危险将炸药和手榴弹运到碉堡附近。看到日军从碉堡中逃出,1个团的苏军趁机冲了上来,这时苏军小队长被日军包围并负伤,前去支援的士兵也负了伤。小队长继续前进并拔出刺刀刺死了日军1名士官及数名士兵。这时从草丛中跳出1名日军士兵,用刺刀将小队长刺倒。战斗变得越发激烈,数分钟后小队长苏醒,尽全力爬向碉堡,起身带着数枚手榴弹跳入碉堡中。

日军也孤注一掷与苏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双方人员伤亡都很大。战斗持续到下午结束。随后,苏军又集中兵力攻下了五顶山日军阵地。

最终苏军将日军消灭,解放了富锦,并全部占领了要塞区域。

第五节　苏军进驻富锦

苏军攻下富锦后,其主力部队继续向西挺进,解放集贤、佳木斯。留守部队以达拉秀克少校为司令员,成立了红军卫戍司令部,负责城防。

东北抗日联军将领刘雁来曾过江去苏联,在苏军任上尉,此次他随军回富锦,在红军司令部任副司令员。留守部队从12日起打扫战场,将日伪战俘集中在江北煤场统一看管;将所有日本妇女、儿童集中在放送局(现第三小学院内),派兵摧毁所有日军工事;并将“战利品”和工厂的机器、民船、发电设备、大豆、面粉等运回苏联;监视并防范日伪政权的残余势力搞策反活动。

第十二章　苏军攻克海拉尔要塞

第一节　苏军的进攻部署

1945年8月9日,苏日战争打响,海拉尔要塞所面对的是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左翼集团即多兵种合成的第36集团军。该集团军是当地“土著”部队,在整个苏德战争期间均在后贝加尔地区按兵未动。对日开战前该集团军编制较小,只有3个步兵师,其他专业技术兵种也很少。为增强该集团军的进攻打击力量,1945年春,迅速为其增编了4个步兵师,并明显加强了其编成内的炮兵、骑兵、迫击炮兵、通信兵、工程兵、后勤保障兵等分队。随后又于1945年7月,从西方苏德战场将刚刚因捷克布拉格和德国柏林战役中的卓越功绩而同时获得列宁勋章、金星奖章和苏联英雄称号的原白俄罗斯方面军第28合成集团军司令员卢钦斯基中将及其参谋长罗加切夫斯基中将一起调到第36集团军替换

原领导。

经过改编加强的第36集团军编成是：

司令员为中将卢钦斯基；副司令员为少将福明柯；军事委员为少将什马年科和少将祖多夫；参谋长为中将罗加切夫斯基；步兵第2军军长为中将洛帕京（下属第103、275、292师）；步兵第86军军长为少将列武年科夫（下属步兵第94、210师）；另有步兵第293、298师属何军建制不详。属第36集团军指挥的部队还有：第31、32筑垒守备队、独立坦克第205旅（坦克86辆）、独立坦克第33、35营（每营坦克28辆），第68、69独立装甲列车，榴弹炮第259团，加农炮第267、1233团，大威力榴弹炮1146团，反坦克歼击炮第1912团，近卫火箭第32团，迫击炮第176、177、190团，高炮第7师（第465、474、602、632团），独立高炮第120、405营，工程兵第68旅等。此外，空军第12集团军还专门指定1个轰炸机师（81架）在相应的战斗机、驱逐机及侦察机护卫协同下，配合第36集团军作战行动。

第36集团军在对日作战方面划分为3个作战区域，其右翼为集团军副司令福明柯少将指挥的步兵第293、298师和2个机炮旅、迫击炮团、榴弹炮团、工程兵团以及独立坦克营等部队，是集团军的进攻作战的辅助突击方向，担任满洲里、扎赉诺尔方向的突击。集团军的主要突击方向是中部，即由额尔古纳河上游的旧粗鲁海图等5个渡口向海拉尔要塞进攻，由步兵第86军军长列武年科夫少将指挥的第94、210师、独立坦克第205旅等部队担任主攻，并预定在10日内歼灭要塞守军，解放海拉尔。集团的左翼也是辅助突击方向，由步兵第2军军长洛帕京中将指挥第103、292师及其他配属部队，由旧粗鲁海图渡河后向东取道三河、那吉布拉格向牙克石、免渡河及大兴安岭方面开展突击。

集团军司令部初期随中路的第86军行动，第2军所属步兵第275师为集团军预备队。待集团军先遣支队打开通道，第86军主力部队在海拉尔站稳阵脚后，集团军司令部将率预备队第275师及此前随同先遣支队行动的独立坦克第205旅等部队向牙克石及其以东大兴安岭一线开进。

为策应第36集团军向海拉尔的进攻，后贝加尔方面军还从第39集团军所属步兵第94军中抽调第221、358师由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诺门罕、将军庙一带向海拉尔方向推进。

第二节　苏军先遣支队突入海拉尔

8月9日零时20分，第36集团军开始强渡额尔古纳河。先遣队迅速突破日军防线，以水陆两用汽车渡河。凌晨，在额尔古纳河上游的波格丹诺夫卡及其以东的杜罗伊直到旧粗鲁海图（其中方对应一侧是陈巴尔虎旗境内的额尔敦陶勒盖、八大关及今额尔古纳市的黑山头等地）紧急架成5座野战桥梁和筑成2处船只渡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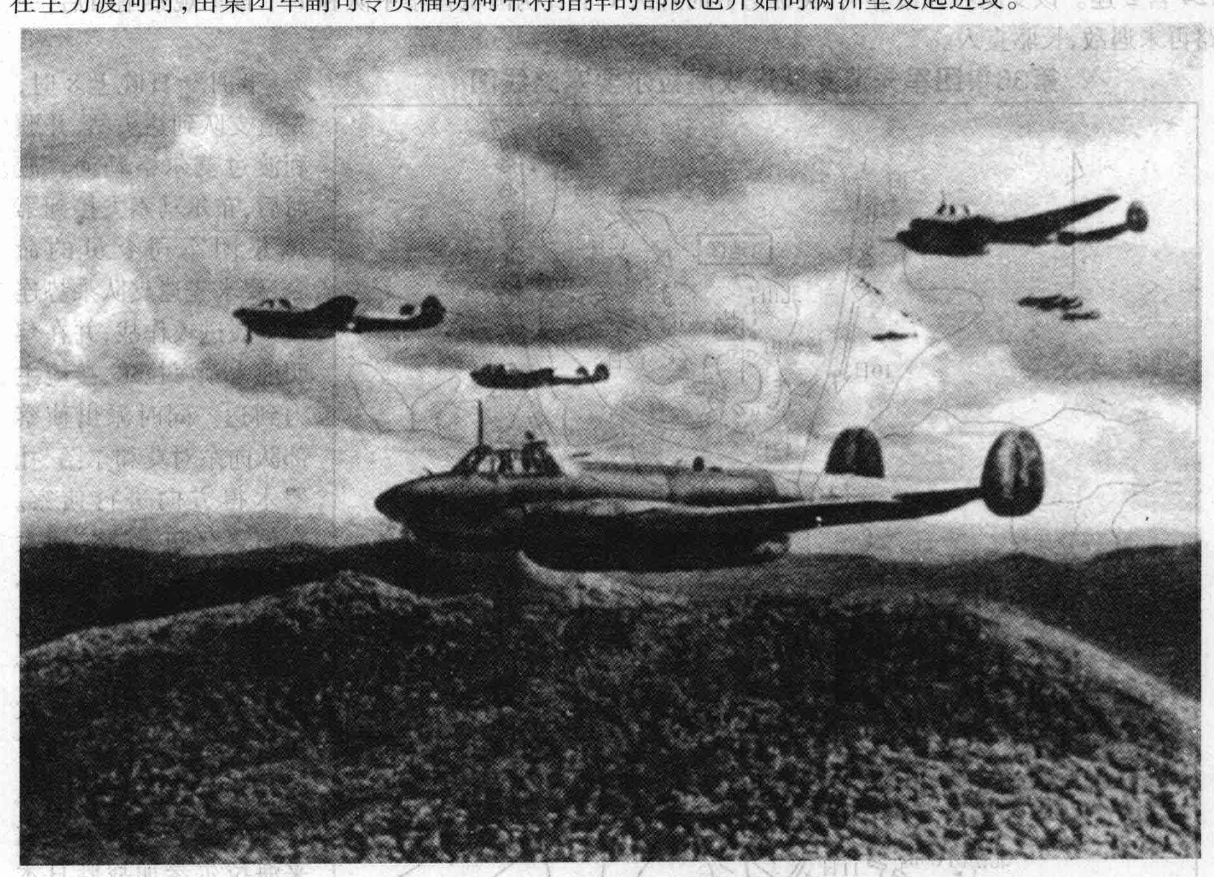




苏军通过野战桥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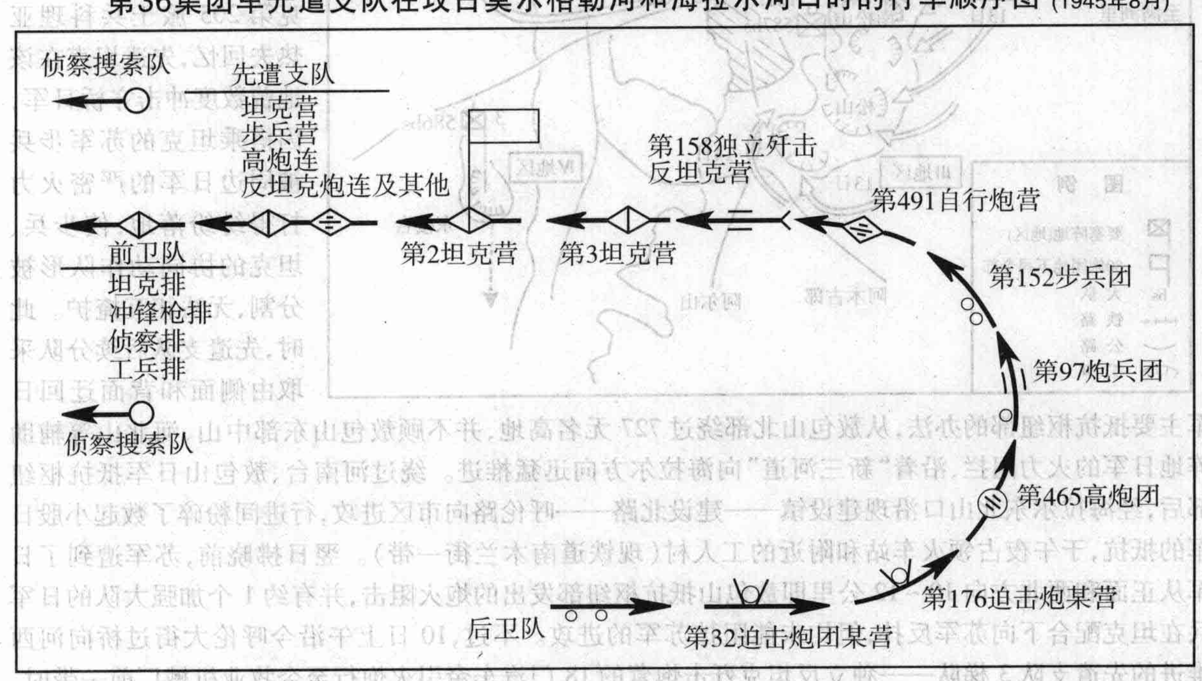
苏军人力牵引火炮

9 日早晨 5 时 30 分,空军第 12 集团军轰炸机某师的十几架轰炸机首次空袭海拉尔。6 时,集团军中路纵队由步兵第 86 军副军长布尔马索夫少将指挥的先遣队已全部渡河,并向海拉尔方向推进。在主力渡河时,由集团军副司令员福明柯中将指挥的部队也开始向满洲里发起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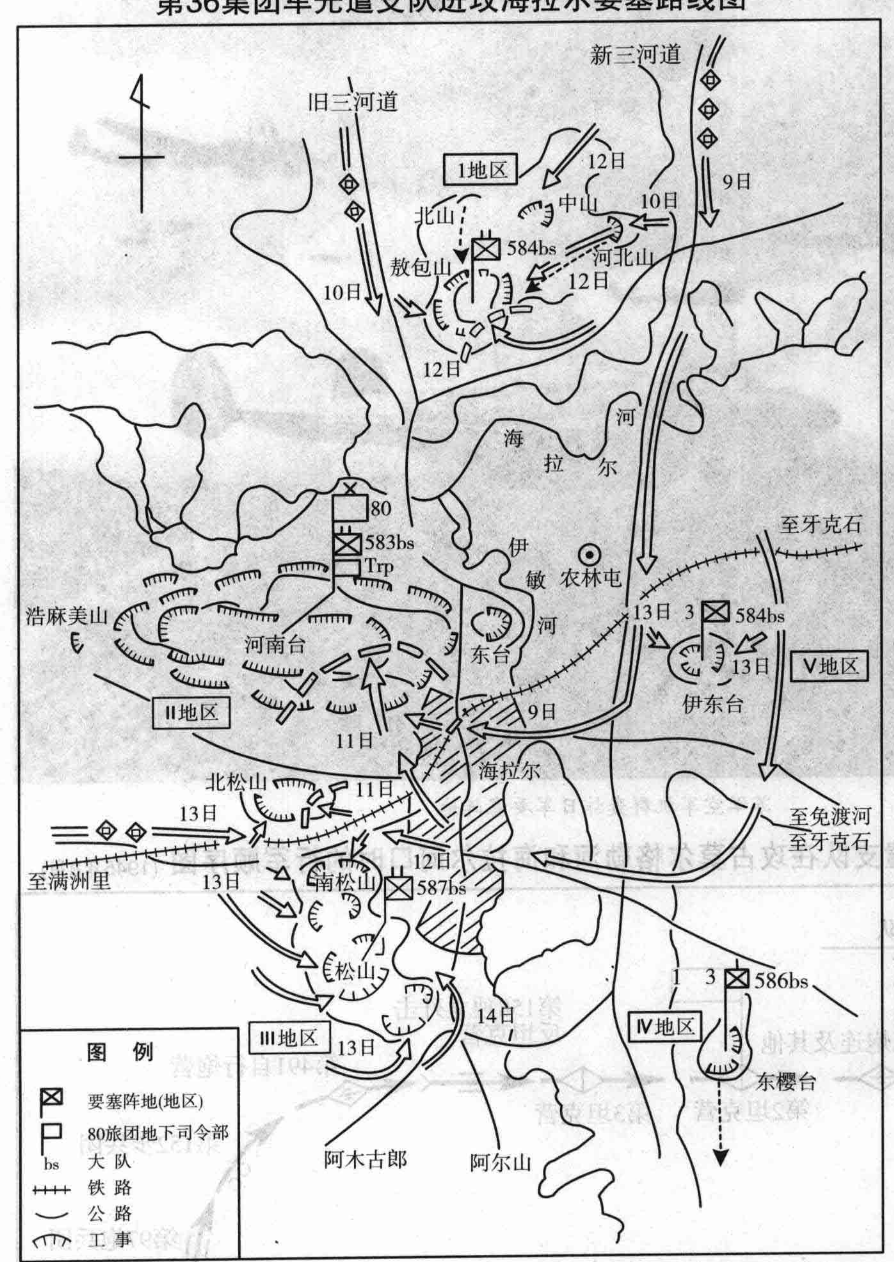
苏军空军机群轰炸日军要塞阵地

第36集团军先遣支队在攻占莫尔格勒河和海拉尔河口时的行军顺序图 (1945年8月)



向海拉尔推进的集团军快速先遣支队的编成为独立坦克第205旅，步兵第94师第152团，自行火炮第491营，独立反坦克歼击炮第176团2营，火箭炮第32团1营，高射炮第465团和工程兵第124营2连。该支队在强渡界河、突破边界时歼灭1个日伪国境警察中队和1个日军观察哨所后，一路再未遇敌，长驱直入。

第36集团军先遣支队进攻海拉尔要塞路线图



8月9日晚上8时，先遣支队到达头站，并顺利渡过莫尔格勒河。渡河后，布尔马索夫接到第36集团军司令员的命令，要求先遣支队乘势连夜开展进攻作战，并在黎明前占领海拉尔，接应主力到达。同时派出侦察部队向东对莫和尔图、扎罗木得方向进行侦察。在侦察获知海拉尔河大桥只有日军1个加强小队守卫时，迅速发起攻击，仅用几十分钟，便于晚上9时30分占领大桥，全歼守桥日军近百人。苏军也伤亡数十人。据2005年9月2日应邀来海拉尔参加战胜日本60周年庆典的原苏军坦克第205旅士兵科理亚热夫回忆，先遣坦克在该地曾数度冲击守桥日军，因搭乘坦克的苏军步兵被周边日军的严密火力打得纷纷落地，使步兵、坦克的协同动作队形被分割，无法相互掩护。此时，先遣支队后续分队采取由侧面和背面迂回日军主要抵抗枢纽部的办法，从敖包山北部绕过727无名高地，并不顾敖包山东部中山、河北山等辅助阵地日军的火力阻拦，沿着“新三河道”向海拉尔方向迅猛推进。绕过河南台、敖包山日军抵抗枢纽部后，经海拉尔东北山口沿现建设镇——建设北路——呼伦路向市区进攻，行进间粉碎了数起小股日军的抵抗，于午夜占领火车站和附近的工人村（现铁道南木兰街一带）。翌日拂晓前，苏军遭到了日军从正面和西北方向10～12公里即敖包山抵抗枢纽部发出的炮火阻击，并有约1个加强大队的日军兵在坦克配合下向苏军反扑，但均未能阻挡苏军的进攻。不过，10日上午沿今呼伦大街过桥向河西推进的先遣支队3梯队——独立反坦克歼击炮营的18门汽车牵引火炮行至今牧业机械厂前一带时，

突遭日军河南台阵地火炮猛烈急袭,使苏军近三分之一的火炮、车辆被毁伤,数十人伤亡。苏军反击后将日军火力压制下去。与此同时,苏军步兵第152团从市南面迂回,一路粉碎了日军的猛烈抵抗,于10日清晨占领了市南郊和东郊。炮兵第97团官兵在9日夜由敖包山东北迂回前进中,击毁日军土木结构火力点10个,永备火力点3个,机枪火力点14个,其他火力支撑点5个,击毁日军仓库4座,共消灭日军100余人。

10日晨,苏军炮兵第97团和坦克第205旅、独立反坦克第158营等部队共同攻击日军河南台阵地,虽未攻克,但摧毁日军土木结构火力点22个,永备火力点3个,其他火力发射点40个,建筑物5座,迫击炮阵地1个,歼灭日军300余人。



苏军进攻海拉尔要塞

10日下午,因日军守备部队大都进入海拉尔要塞阵地,市区内除小股日军阻击而发生几起小型战斗外,几乎没有发生巷战,苏军便占领了整个市区。在先遣支队突入海拉尔,站稳脚跟,与要塞各阵地日军转入对峙作战后,集团军为加快后续主力部队的到达,果断决定将各部队汽车集中使用,将主力步兵第94师作为第一梯队全部突击快速运到海拉尔。该师于8月10日晚上10时由西路的"旧三河道"强行突破日军敖包山和河南台及其辅助阵地"东台"的火力封锁,经由今北出口突入海拉尔市区,与先遣支队会师。11日上午,第36集团军司令部和第86军少将军长列武年科夫的军部以及二梯队第201师也相继到达。集团军和第86军司令部均设置在今建设镇小孤山东北处。

苏军主力由第94师少将师长扎马哈耶夫奉命从先遣支队长布尔马索夫手中接过了攻击海拉尔要塞阵地的指挥权,先遣队则向牙克石方向攻击前进。

第三节　日军的烧杀与破坏

8月9日凌晨4时15分，驻海拉尔关东军独立混成第80旅团即接到第119师团关于苏军“全面入侵”，部队应立即紧急集合的命令。4时30分各部队“非常呼集”，部署各项应变措施。5时30分，苏军轰炸机群首次空袭海拉尔要塞兵营和其他军事设施、交通枢纽以及重要机关后，海拉尔关东宪兵队本队和特务机关以及伪兴安北省国家保安局等单位，即接到上司命令，要求警特人员立即出动，按照早在1938年根据伪满洲国国家保安局制定的《战时有害分子判定要领》建立的《第三种要视察人名簿》，将预定到时逮捕扣押的对象，全部予以搜捕“归案”，并按“要领”规定适时作出紧急处置。在该《第三种要视察人名簿》中，根据人员的不同情况区分为五类，其中的“甲类”属于“严重处分者”，所谓“严重处分”即予以杀掉。

据此，在伪省警务厅、市国境警察队本队、省国家保安局、关东军特别警备大队（不久前由原特务机关、宪兵队改编而成）的协同行动下，于当日早8时左右首先将当时在海拉尔家中的年龄在18～45岁的男性苏联公民和无国籍俄罗斯人中政治上有反满抗日亲苏情绪者，全部拘捕。涉嫌人员中除苏侨米罗维奇等二三人闻风逃跑外，共拘捕18人。

当晚，连同此前在押未结的当地居民中的政治案犯以及被捕获在押的苏联情报人员等共90多人，其中已知名的在押中国人有从王爷庙抓来的韩桂林等4名有反满抗日言行的“国事犯”，一起押到伪省警务厅（今市歌舞团）后院空地上用战刀予以砍杀，有的砍头，有的腰斩。与此同时，伪第10军管区军法处监狱还押着一批待判决的政治犯（伪满时不论军民，凡涉及触犯《军事机密保护法》《国境地带保护法》等案情的一律由军法处实行“军法审判”），人数不详，在伪军法处于当晚撤逃前也全部烧死在狱中。

另外，当时在铁道北司法监狱还押着一批有“散布流言蜚语”等轻微反满抗日言行而被判五年以下徒刑就地执行者，当日中午时分伪警正赶来点名提人准备拉出行刑时，警报突然响起，苏军机群当日最大规模的空袭开始，日伪警察迅速四散奔逃，因空袭持续时间较长，日伪警察再未回来。在押人员王庆昌、刘开玉、吴学忠、“郭老西子”还有“刘瓦匠”等十多人当晚被监狱伙夫张根喜、韩廷福两人打开牢门，砸开镣铐，将他们放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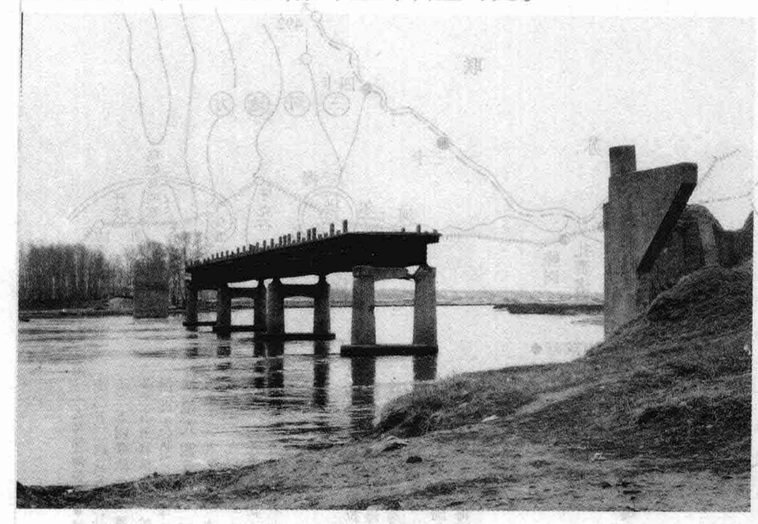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日军也部署了关于如何在苏军逼进海拉尔要塞之前紧急处置市区内兵营、仓库、医院、桥梁等重要目标，防止其落入苏军之手的事项。各部队以中队为单位，成立了5人组成的“烧却处理班”。

当晚10点左右，当苏军突破日军河南台阵地，从行进中歼灭日军守桥小队，夺取了横跨海拉尔河的农林桥进入海拉尔东北郊后，日军各“烧却处理班”同时行动，海拉尔四周各营区立即升起腾腾的浓烟烈火，迅速连成一片。几个部队弹药库中未能运出的多余弹药也被引爆。和东山下兵器厂建在同一院内的日军兵站弹药库，弹药储量极大，被引爆的弹药火焰冲天，响声震耳。东山下日军汽车修配厂油库的几个大型油罐遇火



日军烧毁营房

后，像巨型炸弹似的发出隆隆响声，带着火光向上冲起几十米高。伪第10军管区机关、直属部队、陆军医院和设在南屯的骑兵第50、51团营房也同时被点燃。还有一部分日军“烧却班”人员窜进市区街道，将一些非军用设施也一起烧掉。从今胜利大街的伪“市长公馆”（2层小楼，今成吉思汗广场靠小河处）、“满洲赤十字病院”（今市检察院附近）到河西桥头街的“满洲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今民航站）、“满洲电业”（今蓝天大酒店南）、“满洲映画馆”（今河西文化活动中心）、“兴安北省官吏会馆”及“消费组合”（今贝尔娱都）、“慰安所”、“兵寮”，以及中央大街的电报电话大楼、“满洲中央银行分行”（今工商银行海拉尔区支行）、日本人开的“鱼菜组合”等几家商店、洋行全被大火烧毁。当夜海市“火烧连营”，满天红光，数十里外明显可见。


日军炸断的伊敏桥

在苏军已进入市区正向铁路车站方向推进时，日军又引燃了电厂发电组上安装的大当量炸药，因导火线受潮失效而未能炸成。市区北部的呼伦桥，可能是由于苏军快速、突然的出现而打乱了日军“烧却处理班”的行动时间表，因而使该桥未等日本人爆破而被苏军抢占。次日凌晨，日军为阻止苏军先遣支队南路部队从南部进入市区，派出爆破班将伊敏桥（后被称为“断桥”）西端炸毁。敖包山下的海拉尔河大铁桥，据说是日军想晚炸一两天，等北部分驻三河街的3个日军中队及上库力一带的开拓团撤回后再炸，结果也在第二天凌晨被苏军抢占，使日军未能实现炸桥计划。

第四节　苏军初攻要塞

苏军第86军所属的步兵第94师和210师相继抵达海拉尔后，进行了数小时的休整并对日军要塞各阵地布防情况做了进一步侦察。

海拉尔要塞日军主要守备部队是独立混成第80旅团，下辖第583～587共5个步兵大队，另外旅团直属的还有挺进大队、炮兵大队、辎重队、工兵队、通信队等，满编时应为9 000人左右。但因缺编，实际配备约7 000～7 500人，其中有2个中队驻扎赉诺尔，2个中队驻三河，2个中队派赴乌奴耳修建工事，还有2个小队于9日晨紧急派赴新巴尔虎右翼旗和新巴尔虎左翼旗将军庙一带进行侦察未归等。当时第80旅团在海拉尔全部兵力仅约5 300人左右。为增强要塞守备兵力，由驻海拉尔日军各部队和其他方面抽调划归第80旅团统一指挥的兵力约2 000余人，其构成为：

1. 步兵第119师团第255联队留守队370人。
2. 步兵第119师团第253联队留守队330人。
3. 由关东宪兵队和特务机关刚改编成的关东军特别警备队第606大队约360人。
4. 第4军直属独立迫击炮第17大队约400人。
5. 开战当天坐火车到海拉尔尚未进行新兵集训的朝鲜人补充兵员2个中队约300～400人。
6. 开战当天由海拉尔“日本在乡军人会”会长坂水梧郎召集的历年日本退伍军人约500人。
7. 伪兴安北省警务厅日伪警官约150人。

8. 关东军独立坦克第16联队在海拉尔留守分队约1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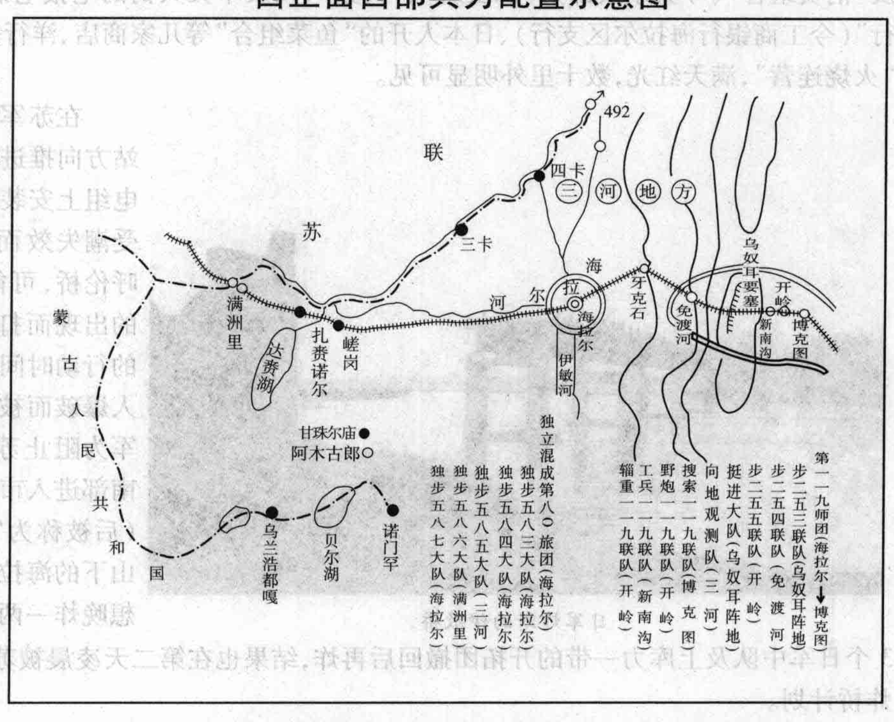
9. 航空兵某飞行训练中队的空、地勤和场站人员约150人。

10. 伪新巴尔虎左翼旗国境警察队退入海拉尔松山阵地的日籍警察34人。

11. 第18野货厂(2646部队)和兵器厂少量留守人员。

12. 关东军情报部某分队数十人。

西正面西部兵力配置示意图



在上述日军兵力中，约一半以上即4 000人左右和半数以上火炮都集中配置在第80旅团战时指挥部所在地河南台阵地。其兵力除第80旅团直属的步兵第583大队全部、第585大队一部、挺进大队大部、工兵队和辎重队、炮兵大队大部外，还有配属的迫击炮第17大队主力、第119师团第253联队330人、第255联队270人、新兵2个中队和伪省警务厅人员等。其兵力火炮之所以如此重点配置，除是要塞指挥中心之外，该阵地范围也最大，东西跨度近5公里，要塞的最大地下工事和绝大多数的特级火力点均在此阵地。

要塞其余兵力，则根据各阵地的战略位置和重要程度也做了相应部署。

敖包山阵地：以第584大队为主力，配属兵力有炮兵大队1个小队，迫击炮1个中队，挺进大队1个小队，第255联队1个中队，第119师团干部候补生一部及通信兵一部，共计约1 200人左右。

松山阵地：以步兵第587大队(竹井部队)为主力，配属有旅团挺进大队3中队一部，炮兵大队1个中队(井川队)，迫击炮第17大队1个中队，特警第606大队一部，关东军情报部所属分队一部，新巴尔虎左翼旗国境警察一部，共计约1 300人左右。

东樱台阵地：以步兵第586大队的2个步兵中队、1个重机枪中队为主力，配有旅团挺进大队第1中队某小队、通信队一部，迫击炮第17大队一部，共计约650人左右。

伊东台阵地：这个阵地的地区守备队在1944年底前已撤出，由第119师团代管。1945年春新组建的独混第80旅团第585大队本应驻防此处，但为突出重点，该大队大部被调往河南台阵地，只留其第3中队(高野队)驻守，配属部队有迫击炮第17大队1个中队，旅团挺进大队某中队一部，第18野货场一部，另有临时召集的“在乡军人”500人，共计约800人左右。

根据上述情况，苏军主力部队经认真准备，周密部署，于8月11日下午2时在第36集团军司令员中将卢钦斯基坐镇监督下，由步兵第86军军长列武年科夫指挥步兵第94、210师和其他配属部队，在空军轰炸机和驱逐机的密切协同配合下，对日军敖包山、河南台(含北松山)、松山及伊东台各阵地同时展开猛烈攻击。苏军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果敢，因而取得许多重要战果。当天第94师第9团在攻打敖包山战斗中，连续击毁15个永久性火力点和25个混凝钢帽堡，打掉1个指挥所，歼灭部分日军。第210师第644团在攻打伊东台战斗中，击毁一批工事，攻占日军两段堑壕，消灭一批日军。但尽管

苏军攻势凶猛，日军却不顾一切地拼命凭险顽抗，基本上将苏军挡在各阵地外围的反坦克壕以外，使战事处于僵持不下的胶着状态。8 月 11 日早晨6 时，日军2 架战斗机飞临海拉尔上空，沿四周的5 个阵地盘旋侦察两周，遭到分布各处的苏军地面高射武器的密集火力射击。日机穿越火网时机身曾多次迸射火星，而后仓皇逃去。上午 10 时左右，有几架苏军飞机降落在东山机场。日军伊东台阵地组成多个“肉弹”敢死队，隐蔽接近机场，用手榴弹、汽油燃烧瓶轮番对苏机进行突然袭击，结果烧毁苏军通信联络机 1 架，另 1 架也受到一定程度损伤。接到报警后，苏国第 94 师预备队的 1 个步兵连和 1 个迫击炮排迅速赶到东山机场，消灭日军 100 多人，缴获步枪 80 余支，机枪 2 挺，救出苏军飞机 2 架，飞行员 3 人。

8 月 11 日夜，由第 36 集团军副军长少将福明柯指挥的以步兵第 293 师为主的右路纵队在攻占满洲里—扎赉诺尔后，一路直插海拉尔，这样，苏军从北、西两路完成了对海拉尔要塞的全面合围。另一方面，后贝加尔方面军第 39 集团军步兵第 94 军的第 221、358 师也从南路将军庙、诺门罕方向迂回到锡尼河、南屯一带。围歼战持续进行到 8 月 13 日，苏军已在要塞各阵地的反坦克壕内与日军展开阵地争夺战。



苏军坦克部队通过呼伦贝尔草原奔向大兴安岭

第五节　苏军总攻要塞

鉴于连续 3 天猛烈攻打，虽使日军遭到沉重打击，但要塞仍未被攻克。第 36 集团军司令员决定重新组成多兵种配合的强大战役集群，务求尽快歼灭海拉尔要塞的全部日军。

参加这一战役集群的苏军包括步兵第 94、293、210 师、机炮第 1、2 旅加农炮团、榴弹炮团、迫击炮团、大威力榴弹炮以及 2 个独立坦克营和航空兵部队。此外，还得到紧急调来的方面军预备队 1 个炮兵师的助同配合。一场更加猛烈的歼灭战全面展开，战况异常惨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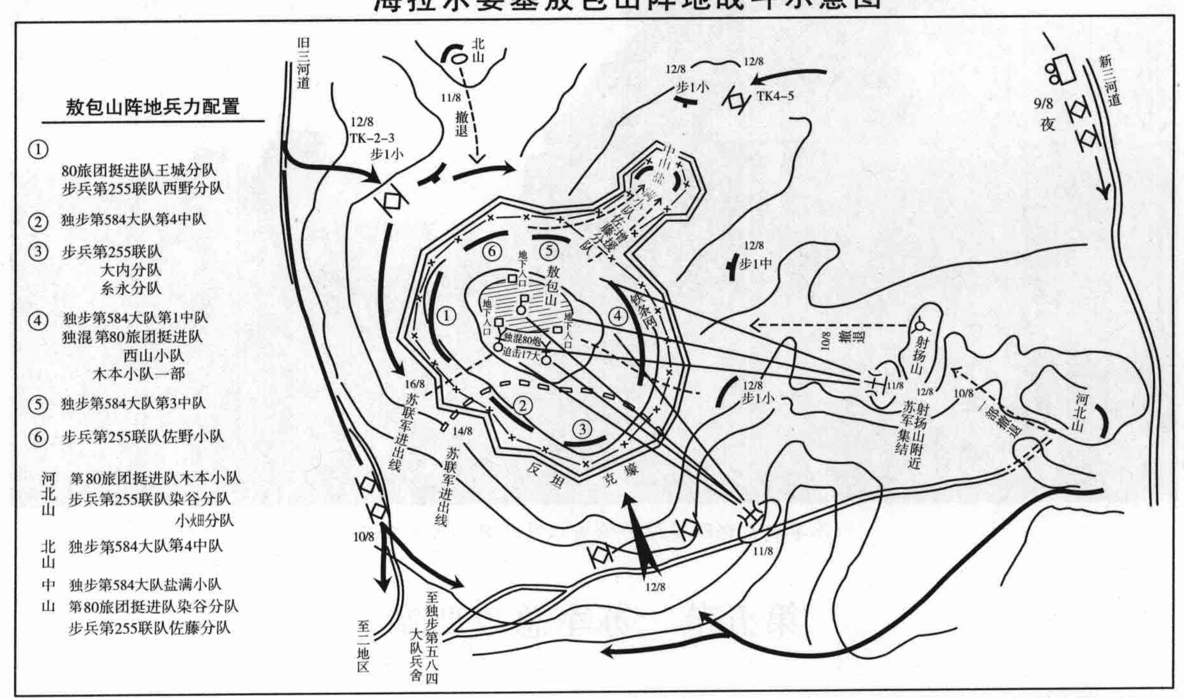
敖包山主峰阵地因设有数层反坦克壕和铁刺网，核心阵地周围部署了三道环形防御阵地，防守严密。日军利用工事的多层次配置和地上地下工事联通的优势，死守硬拼，一时难以攻破。后经反复冲杀，直至13日才被全线突破，开始了阵地内的争夺战。日军仍节节抵抗，拒不投降。经过双方白刃厮杀，日军溃败，残敌钻入地下工事死守。敖包山主峰阵地日军第584大队760余人，战死260余人，阵亡率达34.2%。其余死守地道中。配属于该阵地的119师团253联队留守队官兵60人，战死40人，阵亡率高达65.3%。驻守该阵地附属的河北山阵地的1个加强小队约100人，全员覆灭。日军第584大队长竹中虎臣少佐于8月13日敖包山外围被突破后，亲自作“肉弹”带炸药包扑向苏军坦克，与坦克同归于尽。8月14日，在河北山阵地，苏军1辆轻型坦克掉入反坦克壕进退不得，日军一等兵神野用2颗手榴弹将苏军坦克手炸死1名，炸伤1名。

苏军运用强击组强击永备火力发射点时的战斗队形(1945)

敌人
侦察和障碍排除小组
工兵(3–5人)
自动枪手(任警戒5–7人)
步兵班及喷火器手
封锁小组
步兵班
突击小组
工兵　自动枪手
火力小组
152自行火炮

图例
反坦克炮　迫击炮　喷火器
反坦克火炮　重机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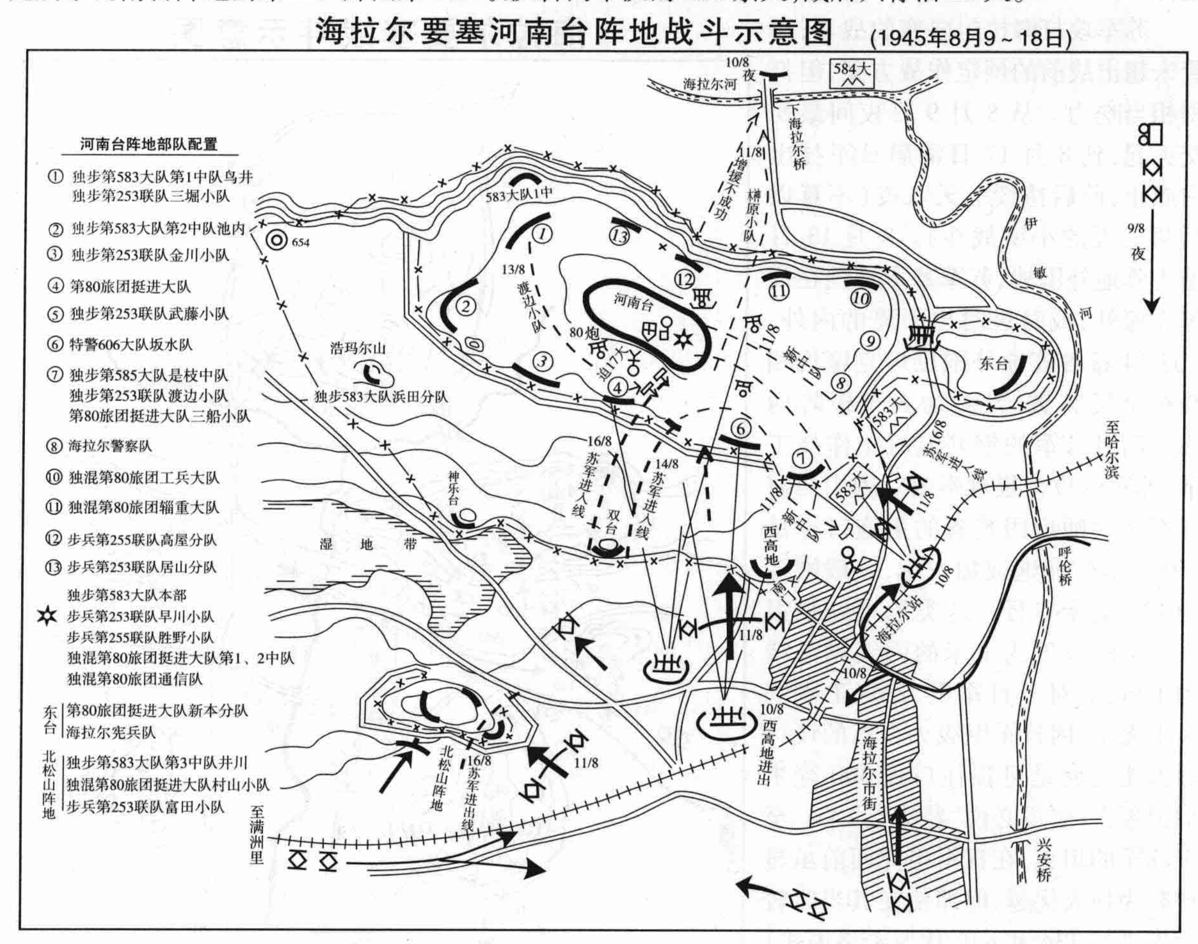
海拉尔要塞敖包山阵地战斗示意图



在日军兵力配备最强、且为指挥部所在的河南台阵地战斗更为激烈。苏军利用该阵地西部地形较平坦的特点先从背后发起攻击，而后又从西南部、南部和东部实行多路夹击。但由于日军得到第三阵地的炮火配合，苏军的坦克进攻也一度受阻。日军步兵顽强抵抗，有的苏军坦克被日军炸药包、地雷或集束手榴弹炸毁。在河南台、松山阵地有约10辆坦克被击毁、击伤。但终因苏军坦克部队强大，炮火猛烈，经反复争夺，彻底摧毁了日军地面火力点，迫使日军转入地下工事，成为“瓮中之鳖”。苏

军一面肃清地面残敌，一面用大量炸药、爆破筒、集束手榴弹、汽油等各种爆破燃烧手段破坏日军地下工事的出入口，想迫使其投降。并利用日军俘虏喊话劝降，但龟缩洞内的日军死不就范。在河南台阵地攻防争夺战过程中，配属于该阵地的第119师团第253联队330名官兵中，大部战死，同时配属于该阵地的第119师团第255联队的270名官兵也大部阵亡，这两部分官兵的阵亡率均高达60%以上。配属于河南台阵地的第119师团第253联队吉冈中队的200余人，战后只存活20人。

海拉尔要塞河南台阵地战斗示意图（1945年8月9～18日）



在东樱台阵地，由于苏军未向其发动正面攻击，又因该阵地位处伊敏河东，距敖包山、河南台、松山阵地较远，防守的1个日军大队又无远程火器参与对其他阵地的火力支援，只能坐观其他阵地的争夺战。到12日深夜，大队指挥官按照日军“作战要领”规定，决定放弃阵地向南撤逃。撤逃途中一路大部被歼，只有极少数突围出击。一路被苏军追击，最后在海拉尔东南约25公里的尖山沟一带被全歼，日军遗尸遍野，战后此地被附近居民称为“死日本子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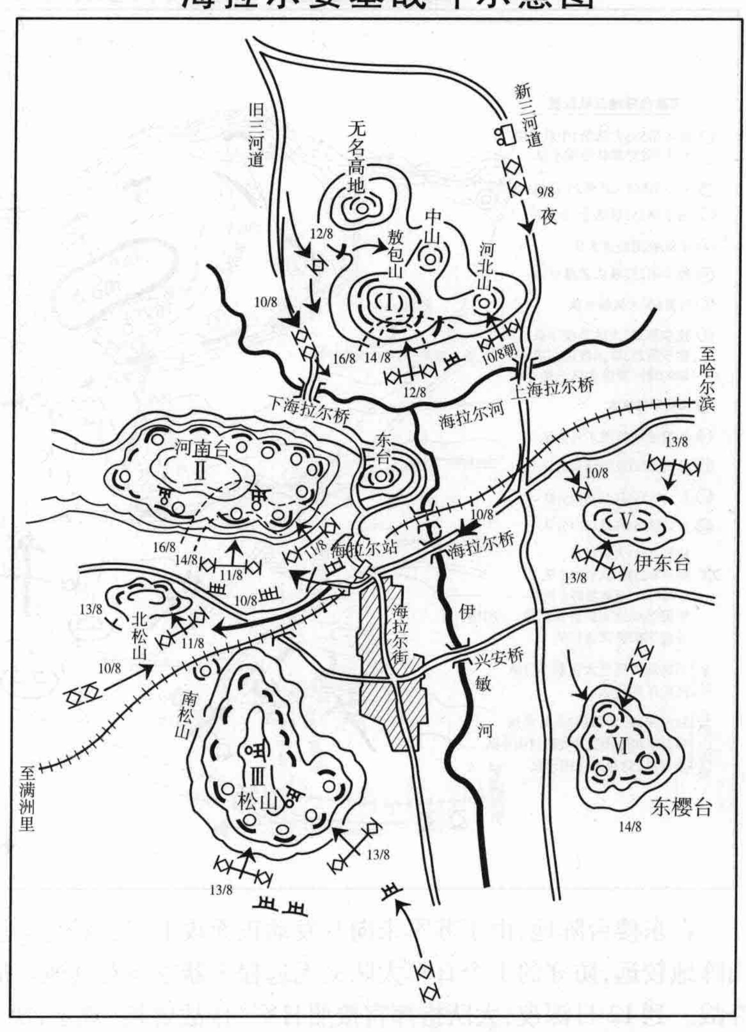
在伊东台阵地，日军有1个加强大队。当苏军步兵第644团对其攻击时，遭到猛烈抵抗，经过激烈拼杀，苏军攻克碉堡和两道堑壕，歼敌50余人，许多日军四散溃逃，但仍有少数残敌潜伏于纵深阵地，伺机继续抵抗。因一直未得到第119师团的命令，未擅自行动，等待了一天。

在这场总攻歼灭战中，一方猛攻，一方死守，双方打得都很顽强。日军此时的唯一优势是依托坚固设防的永久性工事，获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利。但苏军却在兵力武器装备上占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截至8月14日苏军展开最后一轮攻击战止，日军在各阵地上的残余兵员总共已不超过6 000人，其重装备大致是坦克约1个中队（不超过9辆），山炮1个大队12门，15厘米加农炮和10厘米榴弹炮等重炮约5门，迫击炮1个大队28门，即全部中口径（不含大队所属的步兵炮或速射炮）火炮约45门。航空兵有1个飞行训练中队，有5架旧飞机，其中只有两架能起飞，苏军首次空袭海拉尔

市后，这 2 架飞机即匆匆飞离海拉尔市。而苏军方面投入此战役的总兵力达 3 万人以上，各种中口径以上火炮 450 门以上，坦克 50 余辆，苏日双方兵力、装备的对比大致为：人员 4∶1，坦克 5∶1，火炮 10∶1，而制空权则百分之百地掌握在苏军手中，苏军机群动辄二三十架临空，而日军航空兵却 1 架也起不来，甚至连 1 门高射炮都没有。在总攻海拉尔要塞的过程中，苏军航空兵部队配合地面部队连续进行 5 天共几百架次的战斗飞行，将成百吨炸弹投在日军阵地上，强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

苏军攻打海拉尔要塞的战斗，尽管未超出战前的预定作战方案，但打得相当吃力。从 8 月 9 日夜间最初交火起，到 8 月 17 日清晨日军挂出白旗止，前后持续七天八夜（不算以后两三天的小型战斗）。8 月 13 日前为阵地外围战，苏军基本被挡在反坦克壕外，或时进时出于壕的内外。8 月 14 日各阵地外围反坦克壕均相继被全线突破，发展为大规模阵内战。面对日军的钢筋混凝土作战工事，苏军的攻击很难奏效。因为当时苏军步兵师炮团装备的重炮口径是 150 毫米榴弹炮或加农炮，一般则多为 122 毫米口径。这类炮可勉强轰击日军的厚度为 1 米的丙级钢混结构工事，而对于日军甲、乙级工事则束手无策，因日军甲级火力点的设计耐弹能力就是可顶住口径 300 毫米炮弹轰击，更不必说“特火点”了。至于苏军的坦克，在日军坦克面前虽显得颇为强大优越，但即使在其当时较为先进的 T34 和 KB（伏罗希洛夫式）坦克上，所装备火炮的口径也只有 85 毫米口径，这只能对付日军的丁级火力点（厚 0.6 米，耐弹力 75～80 毫米）。故苏军攻破日军工事多采取在严密火力封锁掩护下，由工兵挖掘掩体悄悄接近，而后以大当量炸药进行爆破。许多工兵在迫近土工作业的途中便阵亡。在海拉尔要塞攻坚战中，苏军竟出现 7 个舍身炸敌堡的英雄人物，足见攻克日军工事的艰难程度。

海拉尔要塞战斗示意图



苏军为此胜利付出了大量生命和鲜血的沉重代价，计牺牲官兵 1 101 人。其中军官 145 人，内有上校 1 名①，少校 1 名，大尉 12 名，上尉 25 名，中尉 43 名，少尉 35 名，准尉 28 名。阵亡烈士名单均刻在海拉尔区小孤山的苏军烈士公墓上。伤员数字未查明，但据当年苏方公布的在远东对日作战伤亡总数为 32 000 人，其中阵亡 8 219 人，即阵亡人数和负伤人员约为 1∶4 的比例。据此估算，苏军在海拉尔作战中的伤员不下 4 000 人之多，伤亡总数约 5 000 人左右。

① 牺牲时为中校，后追授为上校。

第六节　苏军的英勇表现

苏联红军在攻克海拉尔要塞的战斗中付出了重大代价。红军将士表现了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涌现了许多动人事迹和壮烈牺牲的英雄人物。8 月 9 日晚，苏军坦克第 205 旅战士布里亚特族共产党员英诺肯季·巴托罗夫，在河南台阵地与日军的战斗中，用手榴弹封锁了日军两个永久性工事的射击孔，保障了分队的前进。但这时发现仍有日军机枪在射击，挡住了分队前进道路。巴托罗夫再次爬向新的火力点，可是身边的手榴弹已经用尽，于是，他站起来，毅然扑向射击孔，用身体堵住了日军的枪眼。进攻的道路打开了，这位"马特罗索夫"式的英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8 月 18 日，就在日军投降的当天，个别阵地上的残余日军仍在拼死抵抗，碉堡以及其他永久性火力点的枪眼里不断向进攻的苏军吐出火舌。苏军某部上等兵、共青团员约希夫·罗马诺维奇·布利巴在决定分队进攻行动成败的千钧一发之刻，义无反顾地扑向日军火力点，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日军枪眼。

在要塞决战中，苏军战士中有 6 名共青团员建立了用胸膛堵住敌人枪眼的"马特罗索夫"式的不朽功勋。

在进攻行动中，连排级指挥员和共产党员都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高呼着："同志们，跟我来！"的口号，带头冲在队伍的最前面，所以他们的牺牲比例比较高。在海拉尔战役阵亡的约1 100名官兵中，就有尉级以上军官 145 人，占总数的 13% 以上，明显超过每百名官兵中的官兵正常比例关系。步兵第 210 师第 644 团 3 营党小组长戈姆波利斯基中尉，在强攻日军伊东台阵地时，机智果敢，在战斗关键时刻，连长中弹牺牲，戈姆波利斯基挺身而出，接替连长指挥，高呼"同志们前进！为连长报仇！"全连奋起猛攻，消灭 50 多名敌人，占领了伊东台阵地。在同一个步兵第 644 团的 8 连，率突击队带头冲锋的连长被日军狙击手击中身亡，连队因失去指挥，一时不知所措。但战士们突然听到他们熟悉的一位上士的响亮声音："同志们，听从我的指挥！"共产党员、上士兹洛宾主动承担起在战斗中的指挥责任。尽管他本人在带队突击中也中弹负伤，但他咬紧牙关，不顾伤痛，坚持带队胜利完成突击任务，消灭了对面的一股敌军，占领了阵地。

当一些阵地的外围工事被突破，发展为阵内战时，双方短兵相接，常展开反复的白刃厮杀。苏军在这种场合所表现出的敢于刺刀见红的大无畏精神，给日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军独立混成第 80 旅旅团司令官野村登龟江曾用望远镜亲眼目睹了这种场面。他被俘后在接受苏军讯问时说："……包围要塞的苏军部队，从四面八方同时齐声呐喊着发起冲击，枪炮声震耳欲聋，旅团和各大队阵地的通信联系立即中断，我被震得什么也听不见，弄得一塌糊涂……"又说："你们的红军士兵发起突击时也不开枪，而是一跃而起，端起装有枪刺的步枪，挺起胸膛照直朝我们冲来，我们的士兵就怕这个……"①

第七节　日军投降

根据 1945 年 7 月初关东军总部修订的《对苏持久防御作战》方针和作战要领，步兵第 119 师师团长盐泽清宣中将于同年 7 月 20 日给第 80 旅团下达的命令中，要求该旅团在要塞防御守备作战中要坚持到最后一兵一卒，必须与阵地共存亡。因此，野村登龟江在旅团军官会议上传达有关精神时，也向部属强调指出："要誓死为天皇陛下战斗到一息尚存！"开战当天出发进入阵地前，要求官兵整理好

① 苏军审讯野村登龟江笔录，俄文，存赤塔军事博物馆，郑乃东译。

私物，剪下并包装好个人遗发、遗爪（日本人临死前的习俗），写好遗书，向部队长行诀别礼并相互诀别，祝愿武运长久。总之，对官兵进行了一系列“肉弹挺身”的敢死队教育。这种反动的忠君报国的欺骗宣传，无疑对维持日军官兵的精神支柱、增强战斗士气起了一定作用。所以，日军从战斗开始后以劣势装备对苏军进行顽抗，使苏军主力部队前后组织了两次大规模攻势作战。但直到8月15日从广播中收听到日本天皇关于无条件投降的声明和16日关东军总部关于无条件“停战”的谈话前，日军只有不超过三四百名官兵是在不同情况下零星被俘或小批投降的。

野村登龟江指挥自己的这支队伍一面拼死抵抗，一面祈求天照大神保佑。但又明明感到全军覆没的命运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末日马上就要来临时，于8月15日收听到了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但由于同第119师团以及关东军总部的通信联络中断，野村未敢下达投降命令。16日下午，旅团通信队长板垣少佐又将关东军司令部宣布投降的广播记录交给野村，野村决定再等一天。这天，河南台、敖包山以及其他阵地全部被苏军突破，战斗情况全面发展为阵内战。苏军直接逼到野村所在的地下工事几百米处，或者用火炮直接瞄准轰击，或者用炸药、汽油将工事爆破。16日夜，野村紧急召开河南台阵地各部队长会议，讨论下步行动。会上，主张“玉碎”和“谨遵圣旨”的人各持己见。野村采纳参谋长意见，决定投降。想立即用电话或电台通知各阵地部队挂出白旗投降，同时派出军使与苏军联络，但旅团参谋长原情大佐主张为求稳妥起见，可通知各阵地翌晨挂出白旗，到时核实各阵地已落实投降部署后再派出军使联络。野村首肯了此建议，决定军使由参谋长原情大佐、旅团副官古川中佐和翻译3人组成。17日上午8时，经观察，远近各处日军阵地均已挂出白旗，苏军在经过一阵猛烈射击，日军未作任何抵抗进击，因而战场呈现一派沉寂景象后，原情大佐等手持白旗出发，受到前沿苏军的友好礼貌接待，并当即将原情等护送到苏军的一个团部，在这里日军军使被解除武装，蒙上眼睛，分乘2辆吉普车，行程近1个小时，被送往苏军前线指挥部。在苏军司令员的帐篷内，双方就日军投降事宜进行了洽谈。苏方要求日方立即返回，在限定时间内准备好日军部队番号、编制、装备、防务部署、官兵名册、库存军火物资及其他有关文档资料，由野村登龟江旅团长亲自携同前来交接，同时命令各部队就地解除武装向当面苏军投降，日军一一照办。17日下午，日军独混第80旅团长野村登龟江少将遵命报到，当即被软禁于苏军前线指挥部旁的一个临时架设的帐篷中。原情参谋长则协同苏军落实各阵地日军投降事宜。

从18日上午起，敖包山、河南台阵地遵照命令陆续缴械，到18日日落前共有3 827名日军官兵投降就俘。其余除东樱台阵地官兵此前已于8月12日夜自行放弃阵地向大兴安岭方面逃跑并随后在途中被苏军全歼外，剩下的松山、伊东台阵地则因与旅团联系中断，未接到投降命令而继续顽抗。如18日苏军前往伊东台阵地受降时遭到日军猛烈反击，苏军无奈强行攻打，就在这天中午突击日军碉堡时苏军步兵第644团上等兵布里巴在海拉尔战役中最后一个展现了舍身炸敌堡的英雄壮举。由于宣布投降后一些日军阵地仍在顽抗，苏军仍在遭受伤亡，苏军代表对第80旅团参谋长原情大佐大发脾气，责令其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兑现投降决定。经反复交涉，松山阵地守军于18日夜投降，伊东台阵地19日又抵抗一天，到当日午夜才放下武器。

关东军驻海拉尔独混第80旅团还在满洲里——扎赉诺尔以及额尔古纳河边界一带派有一些分队，前者称之为“向界视察队”，后者称为“三河守备队”，另外还向乌奴耳派去2个步兵中队抢修二线作战工事，上述各部队也都遭到歼灭性打击：

一、驻满洲里一线的视察队，相当于步兵1个大队，开战当天被击毙百余人，被俘约400人，其余四五百人奋力逃出重围撤向海拉尔，但一路被尾追堵截，不断伤亡，到达海拉尔日军阵地的仅有10余人，进入河南台阵地地下坑道中，日军主力投降时他们仍藏在洞内。后经第80旅团副官古川中佐带领苏军进入洞中通过传声筒喊话劝降，并以10分钟内再不出洞即将坑道炸毁相威胁，但他们仍拒不出洞投降，古川中佐向洞内日军说：“我是旅团副官古川中佐，是代表司令官来宣布投降命令的。”但洞内的日军以为是苏军欺骗他们，这时有一个日军士官认出了是古川，才率10余名由扎赉诺尔逃来

的残兵打开铁门出洞投降。

二、三河守备队是由第119师第254联队和独混第80旅团第585大队共同出兵编成的，相当于1个大队，总兵力约1 000人左右，由少佐队长指挥，下有小川、波村等中队。开战后其分驻界河前沿的分队即被歼灭或击溃，其驻后方三河的守备队本部官兵考虑若沿三河——海拉尔公路后撤，途中势必陷入苏军重围而被歼，遂决定护送当地日本开拓团、居留民和地方官署人员由三河向东，穿越渺无人烟的林海莽原，横越大兴安岭。途中在今额尔古纳市境内上乌尔根附近受到苏军一支小分队的追击，日军在村边高地草丛中设下伏兵，一场伏击战使双方各伤亡数十人，苏军阵亡12人，葬于今三河镇宝石山上，立有纪念碑。该股日军后于9月11日经950公里行军到达大兴安岭东麓的莫力达瓦旗马当浅村，次日到达旗所在地布西（今尼尔基镇），在旗公署庭院解除武器，由嫩江东岸的讷河苏军派来1名中尉作为军使前来受降。

三、派驻乌奴耳的部队中，有1个中村中队，开战时分散部署于乌奴耳阵地的“中村山”一带。其下属的1个由田代少尉指挥的小队，与上级失去了联系。8月18日日军各部队先后投降后，该小队尚毫无所知。8月23日田代率部向博克图移动，在补充食品时突与苏军遭遇，当即被全歼。其所属中队的其他小队或被全歼或投降就俘。

第十三章　苏军攻克阿尔山要塞

第一节　苏军的进攻部署

根据1936年3月12日签订的《苏、蒙互助议定书》，苏军第36摩托化步兵师于1937年9月进驻蒙古。1939年春、夏诺门罕战争期间，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驻蒙苏军也日益增多，并由原来的1个师，先后扩编升格为第57特别军和第1集团军，诺门罕战争停战后，苏军也一直继续驻留下来。苏德战争后期，驻蒙的苏军第1集团军改编为第17集团军，以阿尔山、五岔沟一线为重点，分驻蒙古各地，与日军对峙。

中蒙边界属于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的主要作战区域。该方面军共有第36、39、17、53共4个合成集团军，另有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以及配属的空军第12集团军（下辖轰炸航空兵2个军4个师，2个独立轰炸机师，2个独立强击机师，3个独立歼击机师，2个独立运输机师，1个独立侦察机团，1个独立通信联络机团等，总计编有1 037架飞机）。

后贝加尔方面军进攻正面的约2 300公里国境线，大体上被分为3个战略进攻方向，其中2个是辅助突击方向，即一是其左翼的第36集团军由满洲里和额尔古纳河上中游黑山头以北出击，攻克海拉尔和乌奴耳一带要塞阵地后，越过大兴安岭，攻向齐齐哈尔方向；二是由蒙古赛音山达（二连西北）及其以东的达里冈嘎出击的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其矛头指向张家口和多伦方向；而从阿尔山——五岔沟起向西到蒙古边境的尤格兹尔庙一带的约350公里国境正面则是方面军主要突击方向，其锋芒直指伪满政权和关东军的心脏——长春、沈阳，而后占领旅大及整个辽东半岛。这里集中了方面军的主要突击力量：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合成第39、17、53各集团军，还有方面军预备队——步兵第317、227师，第111坦克师和第201坦克旅以及高炮和反坦克炮部队等。这里集中了方面军步兵师的54%，坦克、自行炮、火箭炮的73%，火炮（含迫击炮）的62%。后贝加尔方面军各集团军中除第36、第17集团军和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中的蒙军部队外，其余都是刚刚由苏德西部战场直接调来的饱经战火锻炼的部队。例如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第53集团军以及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中的苏军部队，都是5月下旬由捷克的布拉格一带调来的，而第39集团军则是从德国东普鲁士地区调入的。正是第

39 集团军作为后贝加尔方面军中央突击方向的左路纵队，从蒙古人民共和国东部突出部位，对阿尔山——五岔沟一线发起了进攻。

第 39 集团军在当时苏军远东地区 17 个多兵种合成的陆军集团军中，无论在兵力上还是在装备上，可以说都是第一流的。司令员为上将柳德罗科夫；军事委员为少将鲍伊科和少将佐林；参谋长为少将西米诺夫斯基。其编成内包括：

近卫步兵第 5 军，军长为中将别祖格雷伊；政治部主任为上校舒金。下辖近卫步兵第 17、19、91 师，独立第 44 坦克旅及高炮、自行炮、迫击炮等独立团或独立营等。

步兵第 94 军，军长为少将波波夫；政治部主任为少将索尔金。下辖步兵第 124、221、358 师，独立第 28 坦克旅及军直独立高炮，自行炮、迫击炮团等部队。

步兵第 113 军，军长为中将奥列舍夫；政治部主任为上校雷巴宁。下辖步兵第 192、338、262 师，独立第 206 坦克旅和军直其他部队。

突破炮兵第 5 军，军长为炮兵少将阿列克谢耶夫；政治部主任为上校乌拉索夫。下辖独立第 139 炮兵旅，独立第 55 歼击反坦克炮旅，2 个火箭炮旅，独立第 61 坦克师，独立第 17 高炮师。

为增强该集团军对日军要塞地域的进攻突破能力，后贝加尔方面军还从方面军所属的空军第 12 集团军中专门指定 1 个歼击飞行师（欠 1 个团）随同其展开作战行动。另外，还从方面军预备队中派遣近卫突破炮兵第 3 师参与此方向的作战行动，直接配合 39 集团军作战。

这样，即使不算方面军配属增强的各种部队，仅 39 集团军本身直辖的部队就有 3 个步兵军，9 个步兵师，1 个坦克师，1 个炮兵军，3 个独立坦克旅，1 个独立高炮师，2 个独立炮兵旅，2 个火箭炮旅以及各步兵军直属特种兵独立团等。总计拥有官兵约 9 万人左右，有坦克、自行炮 502 辆（门），70 毫米以上各种火炮、迫击炮 1 500 门以上。从东德调运该集团军的兵员、坦克、火炮、车辆、辎重以及其他军用物资共占用 110 列铁路编组列车，按每昼夜发出 4 组列车，就需整整 1 个月才能全部运送完毕。

第二节　日军的兵力配置与部署

阿尔山——五岔沟地区国境阵地均进驻了守备队，且守备队在编制上也颇具规模，例如阿尔山守备队配有步兵 10 个中队，炮兵约 4 个中队，工兵约 1.5 个中队，总兵员近 3 000 人，相当于驻瑷珲的第 6 国境守备队（兵员 3 000 人）而远多于第 2（绥芬河）、第 3（半截河）、第 6（霍尔莫津）、第 7（黑河）各国境守备队（其兵员均各为1 500人）。1944 年 6 月，驻阿尔山——五岔沟地区的关东军第 3 方面军直辖的阿尔山驻屯队被扩编为新组建的关东军步兵第 107 师团。

1945 年 6 月 14 日，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在长春召开了由所属各方面军和军司令官参加的作战会议。会上传达了大本营“大陆命第 1339 号、1440 号”命令，其中第 1440 号命令要求关东军总司令官“以命令附件《满、鲜方面对苏防御作战计划要领》为依据，进行对苏防卫作战之准备。”据此，关东军步兵第 107 师团将本师团分散驻防阿尔山、第伯斯、索伦等地，同时抽调各部队人员集中到五岔沟地区对原设阵地进行突击扩充和加固。

第 107 师团的师团长为安部孝一中将，参谋长河濑繁太大佐。师团下辖第 90、177、178 三个步兵联队，还有炮兵、工兵、通信、辎重、搜索 5 个联队和师团直属其他分队。根据 1944 年 2 月日军新定各级部队编制标准，步兵师团兵员应为 14 205 人，配军马 2 908 匹，汽车 113 台。步兵联队编制为3 667 人。炮兵联队一般配有山（野）炮 36 门。另外，每个步兵联队还分别配有 1 个由 6 门山（野）炮编成的炮兵中队。这样，全师团拥有的 70 毫米以上火炮共约 54 门。第 107 师团守备的国境线东北自罕达盖起，西南到五岔沟以西的望远山附近，全长约 90 余公里。在 1945 年 7 月，第 107 师团集中所属各部队突击抢修五岔沟阵地前，国境一线的守备任务全部由师团所属的步兵第 90 联队负责，联队本

队及所辖第2大队(每大队官兵编制名额约1 100余人,辖步兵中队3个,重机枪中队1个,步兵炮小队1个)驻阿尔山;第1大队驻伊尔施;第3大队驻五岔沟。第90联队沿国境一线从北到南共设有12个监视哨,由其第1、第2大队的指定中队分兵驻守,每个监视哨由1名见习士官领导,下配士兵15人左右,即1个分队编制。这些监视哨从北向南依次是:1. 武勇山,2. 伏龙山(以上2哨属1中队);3. 北镇山,4. 三角山(以上2哨属2中队);5. 神武山,6. 十胜山(以上2哨属3中队)。7. 双胜岭,8. 飞付山(以上2哨属5中队);9. 胜山,10伏敌山,11. 必胜山,12. 望远山(以上4哨属6中队)。这些监视哨一般距后方的联队本部为15~25公里左右,距所属中队和大队则近一些。他们日夜监视侦察国界对面的苏蒙军动态并随时将有关重要信息按规定用电话报告中队或大队。

第三节 苏军发起闪电式进攻

1945年7月5日,关东军制订了最后一份对苏军的防御作战计划。其中在作战任务中虽然提到确保长春至大连一线以东,长春至图们一线一以南之地区,但在作战任务一节中则又明确要求"争取在朝鲜东部之山区和沿牡丹江流域以西之山区与小兴安岭、大兴安岭、齐齐哈尔至四平之外地带,利用地形及设施,进行抵抗以消灭苏军。为了阻止和迟滞苏军的前进,有些地区要战斗至最后并与阵地共存亡"。据此,驻守大兴安岭南麓阿尔山——五岔沟"主要国境阵地"的日军第107师团,显然是应该利用大兴安岭地形及设施,进行"有力抵抗"及"战斗至最后并与阵地共存亡"的。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苏军沿伪满东、西、北边境三个方面同时发起势如破竹、锐不可当的闪电式进攻。尤其是在西部正面,苏军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和第39集团军庞大的坦克部队、摩托化步兵,在多路轰炸、强击航空兵的密切协同掩护下,从西南面迂回绕越阿尔山——五岔沟国境阵地,呈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态势,日夜兼程向前推进。其主攻方向直指长春、沈阳。第39集团军主力部队作为西正面突击集团的一部分,为了达成进攻战略的突然性,并从战略进攻方向上欺骗和迷惑日军,绕越阿尔山要塞阵地后,从蒙古东部突出部边境西南未经炮火准备,便径直突入锡林郭勒盟境内人烟稀少牧区,渡过乌拉根高勒河后,向东南纵深地区白城子——阿尔山铁路沿线长驱直入。按该集团军的作战部署,其先期目标是在几天内突破大兴安岭,多路穿插,以主力一部攻占索伦车站,在索伦一线将日军第107师团退路切断,并迅速将其围歼。与此同时,主力另一部则沿铁路线直扑驻守白城子的日军第117师团。

第39集团军按其进攻轴线将其主力第61坦克师、近卫步兵第5军的3个步兵师、步兵第113军的3个步兵师及大量配属部队,从五岔沟西南方向按梯次部署,呈一列纵队向东南纵深方向高速推进。而集团军的另一支劲旅,即步兵第94军所属的3个步兵师等部队,则被安排协同西南方向主力部队从西正面北部和东北部方向,对日军实行正面突击或侧翼压缩合围。其中的步兵第124师和坦克第206旅从西、北部沿国境正面的筑垒发起进攻,而第94军的步兵第221师和358师则从阿尔山东部海拉尔方向迂回和进行辅助性突击,协同北部苏军第36集团军阻止海拉尔要塞日军向大兴安岭方向突围退却。

按照苏军集团军进攻作战行动序列的惯例,第39集团军和各步兵军、步兵师,都分别组成了不同规模的包括坦克、自行炮、装甲车、各种地面和对空火炮以及步兵、工兵等多兵种合成、机动性能好、火力强、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各级先遣支队。例如集团军的先遣支队由第61坦克师(坦克164台)、步兵第113军、近卫步兵第5军下属的坦克第206旅、44旅(各配坦克86台)和加强配备的炮兵、工兵以及各步兵军6个步兵师的一梯队部队等,其兵员总数和重火力装备等都远远高于1个普通常规步兵师。各步兵师的先遣队是由1个摩托化(汽车)步兵营,1个自行炮营,1个歼击反坦克炮营,1个迫击炮营和通信等其他专业兵种分队组成。这样1个步兵师的先遣队在机动能力、火力强度方面也远

比1个普通步兵团强得多。先遣队一般拥有兵员1 300余人,配轻、重机枪45挺,各种口径火炮24门,火箭发射车8台以及口径为76毫米的履带式机引自行炮13门。这些先遣部队的主要任务是随时清除歼灭前进途中的"拦路虎"——日军小股部队,以确保本级主力部队顺畅无阻地向纵深地区高速推进。

8月9日零时10分,第39集团军按照远东苏军的统一部署,在阿尔山要塞的西正面相继派出集团军以及各军的先遣支队和各侦察小分队,在夜幕掩护下悄无声息地越过国境插入敌后。凌晨4时30分集团军主力按梯次部署相继开动。早晨6时苏军机群便相继以十几架到几十架的不同规模,一波接一波地反复轰炸冲击阿尔山、五岔沟、索伦、王爷庙等铁路沿线各重要城镇车站。



苏军翻越大兴安岭森林进攻日军



苏军翻越大兴安岭森林进攻日军



苏军翻越大兴安岭森林进攻日军



苏军翻越大兴安岭森林进攻日军

而日军第107师团方面,似乎直到9日清晨苏军第一波机群来势汹汹地飞临头顶,横冲直撞地投弹扫射时,才真正感到一场数月来一直为之突击准备的恶战已经无可挽回地开始了。据战后日本有关史料称①,时任日军第107师团长的安部孝一中将,于开战前日的8月8日,为勘察确定本师团第178联队拟新建的军营兵舍地址问题,在第178联队长等官佐陪同下,由五岔沟出发沿铁路线向东南

① 日本满ソ殉难者慰灵显彰会编:《满ソ殉难记》,第230页。

奔向索伦、第伯斯一带，当晚宿于索伦。9日拂晓，伴随着飞机马达的轰鸣声，索伦突然受到十几架苏军战机的突袭。安部情知形势有变，便当机立断，放下正在做的事情，立即带领其随员钻进汽车，沿着大兴安岭连绵起伏的崎岖山路，也顾不上途中可能随时受到苏机的空中袭击，一路开足油门，于当日午前赶回五岔沟。安部孝一下车还未及稍稍休息，苏军六七架战机便在上午11时左右首次光临五岔沟地区，一番猛烈轰炸扫射后离去。事不宜迟，安部连忙召集下属各部队长，紧急部署对苏防卫作战计划。其主要应对措施有：

1. 全师团各部队立即停止施工、军训等平时活动，转入紧急作战状态。

2. 此前分散配置驻防的国境一线监视哨等分队，立即收拢集结，以中队为单位向所属大队本部靠拢，并就近进入大队指定的既设阵地，迎击苏军进攻。

3. 步兵第178联队整建制调往五岔沟北部布阵。

4. 令仍驻防后方第伯斯一带的师团炮兵联队留守官兵及全部火炮火速开往五岔沟进入既设阵地。

5. 火速集中军官、下士官及军队属官的家属以及军营附近其他日侨，安排火车专列，将其疏散到奉天（沈阳）以南。

6. 师团司令部立即移驻五岔沟阵地中央一个叫雄叫山的尚未完成的洞窟。

此时，在第107师团步兵第90联队驻地的阿尔山地区，则又是一番景象。该联队开战前负责从罕达盖到五岔沟西北望远山国境一线全部国境监视哨的驻防值勤，部队分布情况是联队本部和第2大队一部驻守阿尔山；第1大队本部和重机枪中队以及步兵第4中队驻防伊尔施，其余步兵第1、2、3中队按从北到南顺序，从第1到第6哨所各自驻守2个国境监视哨。步兵第2大队的第5、6中队则承担自第7到第12号的其余6个国境监视哨。步兵第3大队的第7中队已被先行调去五岔沟修筑工事，余部也在阿尔山待命。

驻防伊尔施的步兵第1大队长荒井初雄少佐和驻防阿尔山的步兵第2大队长田中少佐，于8月9日凌晨得知开战后，分别于上午命令各监视哨立即全部撤回。结果到当日傍晚或入夜后，国境一线12个国境监视哨的5个步兵中队官兵，绝大部分安全返回所属原中队。只有第1大队第2中队的北镇山哨所的中尾秀夫见习士官在正午时分打来电话说正受到苏军围攻，其后即无音信，分队全员覆没。其北邻伏龙山哨所也只有4人安全归队，其余人员阵亡。还有第2大队第5中队驻守的8号飞伏山哨所撤退中有2人阵亡。

8月9日傍晚，第90联队本部连同就近留守的所辖各部队，全部转移到阿尔山以东约10余公里的乌呼尔特山腹地既设要塞阵地，分别进驻各自防卫作战阵地，一面继续收容集结从前线分散撤回的官兵。到这时，整个第107师团实际上已形成相互割裂脱节的三个集群，其中两个是位于前方并东西相距五六十公里的阿尔山、五岔沟集群，一个是位于距五岔沟近百公里的第107师团在索伦一带的后方留守人员集群。

第四节 日军奉命紧急退却

当苏军从西正面全面发起进攻后，关东军负责西正面防卫的第3方面军司令官后宫淳大将，基于阿尔山、五岔沟、白城子、通辽、郑家屯、赤峰这一带地域广阔，守备兵力太少，又大都无险可守等情况，决定紧急变更作战部署，收缩战场。将中长路以西地区的部队，大部撤至中长路沿线的长春、四平、沈阳、辽阳地区，由驻长春的第30军和刚刚由郑家屯撤至沈阳的第44军分别指挥，欲与苏军在中长路以西的就近地区进行决战，以保护这一带的工业、军事、政治、交通要地及众多的日本侨民。

因此，8月10日午后，正当第107师团长安部孝一在五岔沟阵地师团司令部洞窟中绞尽脑汁、惶惶不可终日地苦思冥想如何坚守阵地击溃进犯苏军时，突然接到其顶头上司——第44军司令官本乡

义夫中将"迅速向新京方向撤退，进入第30军司令官的指挥下"的命令。考虑到自开战以来已过去30多个小时，而据上级通报和前线侦察所见，苏军装甲机械化部队早已通过未设防地域昼夜兼程地向内地纵深开进，其先头部队估计已突入境内百余公里，师团沿铁路线向白城子方向撤退途中有被苏军先头部队截击的可能，但集结部队、处理善后都需要一定时间，且从行军安全考虑也以梯次后撤为宜。故安部孝一决定先从阿尔山和五岔沟地区各抽1个步兵大队作为先遣部队，令其分别连夜向索伦和王爷庙（乌兰浩特）开进，以掩护师团主力退路。

从五岔沟阵地抽调担任后撤前卫的1个步兵大队（番号不详）被要求以急行军速度先行徒步沿铁路线南下，先期目标是与留守在索伦、第伯斯一带的本师团其他部队会合，共同扼守控制附近有利地形，并等待师团下步指示。

从阿尔山阵地派出的先遣队，是以大队长端田重士大尉为首的步兵第90联队第3大队。该大队被指定先行撤至王爷庙待命，因阿尔山车站是铁路终点站，到兴安站距离300多公里，从附近的乌呼尔特阵地到车站还有约20公里，路程较远。考虑当时铁路列车尚在维持正常运行，该大队决定赶在8月12日清晨利用铁路列车南下。由于该大队的第7中队此前已调往五岔沟修筑工事，因此大队编成内仅有剩余的步兵第8、第9中队和第3（重）机枪中队和大队步兵炮小队，此外还带有数十名住院伤病员，总计官兵约700余人，占用8节铁路客车车厢，还有6节装满弹药和军需辎重的货车车厢。这是在日军占领下由阿尔山站开出的最后一列混合列车，搭乘这列火车同行的还有劳工400人，"勤劳奉仕"归来的学生约300人等。

待上述两支分别由阿尔山和五岔沟先行后撤的部队出发后，安部孝一命令师团挺进大队和师团炮兵联队野炮第3大队全体官兵留在五岔沟阵地，担任师团后卫部队，掩护师团主力后撤。而师团在五岔沟地区的其他部队，包括步兵第177联队、第178联队、炮兵联队、工兵联队、辎重联队的大部，全部随师团司令部一起于8月12日晚向兴安方面进发。安部孝一同时电令滞留阿尔山阵地的第90联队主力，在撤退途中应在13日午后到达五岔沟地区，与师团留守该地的挺进大队、野炮大队等会合，共同承担后卫任务，以确保师团主力顺利南撤。

滞留阿尔山地区的第90联队本部及下属各部队，根据师团长的要求，决定分作3个梯队，于8月12日傍晚相继离开乌呼尔特阵地向五岔沟方面转移。行军序列是：

第1梯队——各大队行李班

第2梯队——第90联队本部及第1大队

第3梯队——第2大队及联队直属炮兵中队

第107师团就这样还未经与苏军正面交火，就奉命从刚刚布防就绪的阿尔山和五岔沟阵地全面撤退了。

第五节　日军受到围追堵截

第107师团的撤退行动虽然看起来还算周到、妥善、井然有序，但也有几处重大失误，一是行动时间太晚，失去先机，以致步步被动，处处挨打，难以甩掉苏军；二是情报侦察工作不够得力，对苏军行动路线缺乏准确判断，成为而后接二连三的隐患，最终撤退计划失败。

在8月11日晚第107师团从五岔沟阵地派出第一支南撤的前卫部队时，不仅苏军的装甲机械化先遣支队已经从翼侧绕过五岔沟地区，而且其后续的各主力师也以相距一二十公里的间隔络绎不绝地向铁路沿线迂回、压缩、包抄。

从第107师团分批由边境阵地撤退后，各梯队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沿途不同地点遭到苏军强有力的拦截、打击，并且每次都遭到惨败。撤退途中的各部日军以及留守后方的驻防日军，从8月11日晚

到8月15日止的几天中，和苏军进行过如下战斗：

1.8月11日晚，第107师团第一支奉命由五岔沟地区向索伦方向后撤担任前卫的某大队（约1 000人左右），沿铁路线急行军前进，当前出约60余公里接近明水车站时，突然被从门特沟里迂回过来的一支苏军部队迎头拦住。苏军抢先占领火车站和明水东山等有利地势，向日军展开猛烈攻击。日军被迫爬上西山拼死顽抗。战斗十分激烈，持续近一昼夜，日军伤亡400余人后溃不成军，除部分官兵丢盔卸甲地突出重围侥幸逃回索伦日军留守部队营区外，多数在四散奔逃中不知所终。此役苏军仅阵亡30余人。

2.第二支奉第107师团长命令先行向王爷庙方向后撤的部队，是从阿尔山车站于8月12日上午7时乘火车出发的步兵第90联队第3大队。列车一路顺风于当日下午开进大石寨车站，离其行军目的地已不到80公里。机车停车加水时，发现车站附近的芒罕营子一带有苏军先头部队10余辆坦克正急速朝大石寨车站方向驶来。未等日军作出反应，坦克便向列车进行猛烈轰击，刹那间车头被击毁，列车被炸翻，货车上堆积如山的弹药连续发生爆炸，燃起冲天大火。日军跳出车厢，就地占领车站东山头，垂死挣扎，双方展开了一场持续近3个小时的恶战。参战苏军系某师先遣队的一部，共有坦克20余辆，步兵300多人，战斗结果，日军几乎全部被歼灭，苏军也遭到一定程度损失。可悲的是与日军搭乘同一列车而来的无辜劳工和学生，也受到严重伤亡。

由于日军通信不畅，各部失去联系，上述两场惨败战例，第107师团长安部孝一未能及时得到消息。

3.8月11日下午2时，苏军某部先头部队400余人，坦克10余辆，由明水车站向索伦开进。当行至索伦镇境内丰林大坝时，遭到预先占据盘山道有利地形日军的猛烈火力阻击，苏军也全力以赴地展开强大反击。战斗中日军从附近的第伯斯车站紧急派炮兵等增援部队，并以10余门火炮投入阻击战。激战一直持续了约7个小时，最终日军仍未能顶住苏军的连续猛烈攻击而放弃盘山道阵地向南联丰屯溃逃。苏军乘胜追击，共歼灭日军350多人，击毁火炮10余门，汽车7辆。

4.8月11日日落后，日军第107师团开始收拢集结主力部队，在师团长安部孝一统率下向白城子方向撤退。但因部队行动缓慢，到12日拂晓才走出20余公里到达绿水车站附近。又因途中不断遭到苏军机群的俯冲轰炸扫射，队伍不得不随时疏散隐蔽，当天傍晚才又走出20余公里汇聚于西口车站附近。此时先行部队报告，苏军装甲机械化的先头部队已将前方索伦、第伯斯、大石寨等铁路沿线的4个地点切断，第107师团最早派出的各先遣队以及召回途中的炮兵部队、师团后撤主力部队的一梯队——辎重联队，在沿途到处受到拦截、围歼，普遍受到重大伤亡，余者四处溃散，部队东撤已无路可去。安部孝一为打开行军退路，突破苏军的封锁包围线，于13日拂晓在西口北方谷地集结兵力，以步兵第178联队作为左侧第一线，于当日下午4时下达攻击令，各主力部队同时向大和村南北的苏军发动全面反攻，并由炮兵部队予以掩护支援。但苏军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以失败而告终。日军仍不死心，经过一番休整，不顾重大伤亡，于14日拂晓趁着浓雾再次发起攻击，最终仍被击退。步兵第178联队脱离师团主力，穿过苏军防守阵地间隙，迂回到苏军右侧，继续东进。

第107师团主力的残兵败将，两天来左冲右突，始终是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根本无法按指定路线撤退。无奈决定向北方蛤蟆沟子方向迂回东进，终于逃脱被苏军包围聚歼的厄运，但也付出了数百人的伤亡，并被迫丢弃了20余门火炮，使师团炮兵联队主力受到毁灭性打击。

5.8月12日傍晚驻守阿尔山阵地的第90联队主力分成3个梯队向师团司令部所在地五岔沟阵地转移，前2个梯队均于8月13日午后平安抵达目的地，担任后卫的第3梯队（以步兵第2大队为基干）行抵距五岔沟仅10余公里的牛汾台车站附近时，突与苏军一部遭遇，经一两个小时的激烈交火冲杀，日军伤亡过半，达五六百人之多，各中队均失去联络，也顾不上死伤者，各自逃离战场，向五岔沟方向逃去，后来这些逃离人员才多半重新与主力会合。第90联队主力抵达五岔沟阵地前夜，第107师团长安部孝一已率主力东撤 。只有师团挺进大队和炮兵联队的第3大队仍在此留守待命。步兵第90联队长早田正义少佐在此接到师团长电令，将师团残留在五岔沟的上述部队合并指挥，作为师

团后卫部队统一后撤。8 月 13 日深夜,第 90 联队由五岔沟东撤途经西口车站附近时,突然受到苏军第 39 集团军近卫步兵第 5 军先遣支队的急袭,激战瞬间爆发。日军在每个中队都组成由敢死队员编成的几个“特攻班”,利用夜幕掩护对苏军坦克实行攻击爆破,但大多“全员玉碎”而不见成效。次日从上午 8 时到下午 6 时一直持续战斗。日军在苏军的坦克、火炮的轰击和空中机群的轮番轰炸扫射下只有勉强应战,官兵死伤累累。该联队第 7 中队近 200 名官兵此时幸存者仅剩 20 余名。在山上指挥战斗的第 90 联队长早田少佐深感内疚,一度欲摔碎一刻也不离身的上级长官恩赐的怀表后自杀以身谢罪,被人劝阻,决定忍痛继续指挥战斗,争取摆脱困境。当晚天空浓云密布,转眼又暴雨倾盆,早田少佐率领以第 90 联队为基干形成的师团后卫梯队残部,冒雨突围成功,于 14 日午后疲惫不堪地到达索伦西北山谷地区,与师团主力汇合。也就在这一天午夜,正在索伦西山面对优势苏军的围歼而走投无路、束手无策的第 107 师团参谋长河濑繁太大佐在马上用手枪自决。

6. 苏第 39 集团军后卫梯队步兵第 94 军在战役开始时,曾派出步兵第 221、358 两个师绕越阿尔山、伊尔施东北地区,配合攻打海拉尔要塞的苏第 36 集团军行动,以阻断海拉尔日军突围南逃并与阿尔山地区日军会合的企图。结果,苏第 221 步兵师的先遣队于 8 月 11 日午夜直达距海拉尔仅 50 公里的乌兰哈尔嘎那(今鄂温克旗西苏木)一带,未发现有日军行动。恰在此时,奉命由海拉尔向大兴安岭南撤的伪第 10 军管区所属部队 1 000 余人,于 8 月 11 日上午,在司令官郭文林中将、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少将的组织指挥下,发动反日武装暴动,杀死军内全部“日系”军官,并委托伪索伦旗长色仁(精通俄语的布里亚特人)向苏军联系投诚。苏军第 221 师在将该部伪军缴械受降后,随即与第 358 师一起奉调向东南穿越大兴安岭塔尔气山口再奔正南与第 94 军军部会合。第 221 师在回师过程中,于 8 月 13 日在阿尔山东北密林中顺便歼灭突围窜逃的日军数百人。后该师于 8 月 16 日在索伦西北堵截日军第 117 师团,作战中又 6 次粉碎日军从小队直到中队规模的反击行动,打死打伤数以百计的日军。

7. 8 月 12 日上午,苏军步兵第 94 军 124 师先遣部队在坦克第 206 旅某分队的协同下,试图从行进中冲入日军第 107 师团驻兵重镇索伦(伪喜扎嘎尔旗所在地),但因遭到预先占领阵地工事日军的顽强阻击,苏军被击退。当日下午苏军重新组织力量,第 124 师和坦克第 206 旅从西部,第 39 集团军先遣支队近卫步兵第 5 军第 17 师、第 91 师和第 61 坦克师从南部,协同发起强有力的进攻,苏空军轰炸机和强击机也轮番出动,密切配合地面作战。这是开战以来第 39 集团军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对日军地空协同的大兵团攻坚战役。结果,经过仅 1 个小时的猛攻,日军防线便全部崩溃,苏军胜利解放索伦。据苏方资料,此役计毙伤俘日军 3 000 人以上。在此期间,关东军总部为打击白城子以西的苏军装甲机械化集群,迟滞其前进,并掩护本军第 107、117 等师团的顺利后撤,命令第 2 航空军第 101 教导飞行团自 8 月 12 日起向白城子以西地区正在向纵深开进的苏军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部队以及第 39 集团军先遣支队的第 61 坦克师发动多次空中攻击,其中 14 日出动各式战斗机和轻轰炸机 29 架,15 日出动各式战机 39 架。据日方战报,14 日战果为炸毁苏军坦克 35 辆,15 日则炸伤苏军停放地面的飞机 2 架,炸毁坦克、汽车 135 辆,杀伤人员 500 名和一批军马。

8. 苏军攻占索伦后,第 39 集团军近卫步兵第 5 军先遣支队和后续各主力师,沿铁路线继续转向东南追击残敌。在第伯斯车站附近以短促有力的决定性打击,一举歼灭日军约 1 个大队,并占领车站。

9. 8 月 25～26 日,日军第 107 师团主力在西口一带分散突围北上,经蛤蟆沟东撤后,与主力失去联系的一股日军约近 300 人,经内蒙古扎赉特旗窜入景星县管内的嫩江西岸某村,搜寻食物充饥,因未搜到足够的食物,有的日军还提出用枪支弹药进行交换,结果在村民拿出食物同意交换时,日军士兵又出尔反尔,争吵中一日军士兵被村民打死,枪被缴下,另一日兵负伤逃出后追上去往邻村(相距一二公里)的日军主力。这股日军立即重返村内逐户搜查并大开杀戒,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杀光该村后又扑向邻村进行疯狂屠杀。结果相邻两村的数十户近 200 口居民中,仅有不足 10 人因藏匿及时,或虽多处负伤但却侥幸活了下来。在日军对手无寸铁的村民大肆进行血腥屠杀期间,1 名村民骑马飞快向昂昂溪车站附近的苏军报告。驻昂昂溪苏军第 36 集团军某部立即出动约两三百名官兵

乘水陆两用汽车、装甲车、载重汽车等火速赶往现场，遭到隐藏各处的日军伏击，遭遇战持续了1个多小时，苏军跳下车来，与日军反复拼杀肉搏，白刃相接，连随同行动的苏军女卫生兵也持械参战，战况十分惨烈。最后日军两三百人被全歼，苏军也有近100人牺牲，另有数十人负伤。现仍保存完好的昂昂溪车站对面的苏军烈士陵园便是为纪念在那次歼灭日军第107师团残部战斗中光荣牺牲的苏军第36集团军某部官兵而修建的。

第六节　第107师团的结局

8月15日晚，当日军第107师团主力在西口车站西部趁夜幕突破苏军重围向北部蛤蟆沟子一带转移时，战争形势业已发生决定性转变，当天中午日本裕仁天皇广播了“停战诏书”，但第107师团长对此却一无所知。同时，在师团参谋长“自决”后，司令部书记官怕一旦失败，电报密码本落入敌手，而将其烧掉，致使重要的军事情报信息均无法上传下达。师团主力在难以忍受的饥饿、冷冻、劳累以至伤痛的情况下，避开铁路、公路，沿着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一路向东而去。两三天后师团长安部孝一才通过师团通信队的无线机收听到关于关东军总部下达的停止战斗、向苏军交出武器的命令以及伪满皇帝退位的广播报道。但安部觉得这些消息暂时还不能得到证实，故持有怀疑态度，仍旧率部继续东进。在穿过神山走到离扎赉特旗首府音德尔约60公里的蒙古村落好斯台附近时遇上苏军一支小股部队（可能是221师先遣支队的小分队），在离日军不很远处不近不离地与日军齐头并进，连续多日跟踪。随后苏军主力师也赶到，同时苏军侦察机也不间断地从空中对日军第107师团进行监控。到8月28日，日军先头部队摆脱苏军跟踪，进入音德尔，傍晚主力也大致到齐，连分头突围而于途中失去联系、消息不明的第178联队残部也找到了。官兵彼此都是破衣烂衫，蓬头垢面，面黄肌瘦的模样。

苏军对第107师团之所以多日来实行地空跟踪监控、围而不打，可能是由于关东军总部已电令各地部队停战缴械，该师团投降已是势所必然迟早之事。故苏军似乎不愿再为此本可不战而胜的行动再流血牺牲。

早已投降多日、只留有善后工作班子的长春关东军总部，从苏军通报中才得知十几天前已失去联络的第107师团的所在位置。根据苏军的要求，派出总部参谋药袋少佐、土田少佐以及翻译森川少佐3人，在苏军代表诺维柯夫少校等五六名官兵的陪同下，从长春乘坐苏军美制道格拉斯型运输机飞往扎赉特旗一带搜索无果而归。第二天又改乘荷兰制日伪民航飞机继续搜索，先是在好斯台一带发现苏军行军纵队，继而在音德尔附近发现安部师团。飞机在两次低空散布传单后，经侦察地形强行着陆，首先召见安部师团长。随后安部师团长立即将各部队长召集到1户民家，传达了天皇停战诏书和关东军总部停战命令等所有文件和传单，并宣读了关东军总司令官对第107师团的赏词。师团长还当即向各部队长下达了自己的停战令。同时，根据苏军代表的要求，由日军派出一辆插有白旗、红旗和日本国旗的卡车同苏军代表一起，立即出发同就近苏军取得联系。卡车走出不很远便迎面遇到1名苏军军官单人骑马而来，原来是苏军第221师先头部队的1名团长。经与诺维柯夫少校等商定，两军就地停火待命，同时指定地点由两军师团长会晤谈判。日军卡车完成联络使命后重返师团复命。安部师团长在进行必要准备后，由师团参谋沟井和副官等人陪同驱车前往指定地点与苏军谈判。苏军第221师长库什纳连科少将已提前到达，并在旷野上临时搭建了作为谈判会场的帐篷，还准备了简陋的桌、椅。据安部回忆，当时苏军师长并未以盛气凌人的胜利者姿态出现，而是以礼貌得体的军人礼节和外交绅士风度，首先将稍好的椅子让给军衔比自己高一级的安部中将。谈判开始后苏军师长简要地提出了停战条件：“日军迅速集结，将武器、弹药、装备等集中一处，列出明细，并将部队番号、官兵名单等一并造册，于次日向苏军正式办理移交。军官军衔、佩刀可以保留。”

8月31日双方代表举行了日军第107师团缴械投降仪式。随后以安部孝一中将为首的第107师团残部共8 018名被押往齐齐哈尔附近小民屯的苏军战俘营。至此，经过20天的激战、苦斗，107师团原有13 160名官兵中，有5 142名死亡或失踪。

日军在阿尔山的第107师团的悲惨结局，可以说从战争一开始就是注定了的。

第一，双方实力相差悬殊，无法匹敌。在此列表对双方实力作个粗略比较：

	苏　方	日　方	苏日对比
参战部队	第39集团军3个军9个步兵师，1个坦克师，3个坦克旅等	步兵第107师团	
总兵力	约90 000人	13 160人外加伪军约2 000人	6～7：1
坦克装甲车	500余台	0	500：0
各种火炮	约1 500门以上	不超过70门	20：1

制空权则为苏军机群所绝对掌握，日军航空兵不敢正面迎战强大的苏军航空兵，只是在最初的几天内利用夜幕、黄昏、拂晓和阴天悄悄进行出击。

第二，苏军采取绕越要塞阵地以装甲机械化部队高速推进方法截断了日军退路，使奉命后退日军被拦成数截，到处挨打，完全丧失了主动权。

第七节　苏军的英勇表现

苏军对阿尔山要塞及纵深地区日军第107师团的突击围歼战，虽然从一开始就处于压倒性的绝对优势，但日军为了突围逃生，还是困兽犹斗般地不惜一切，不遗余力，像个输红眼的赌徒孤注一掷地殊死拼搏，使苏军的胜利也来之不易。在双方反复的拼杀中，苏军付出了数以百计官兵的鲜血和生命。苏军官兵在战斗中机智果敢、英勇无畏，出现了多名舍身炸敌堡的"马特罗索夫"式英雄人物，大批官兵荣获国家颁发的各种勋章、奖章。数个团级以上部队荣获近卫部队集体荣誉称号。

第39集团军各部队在8月10～14日围歼第107师团的历次战斗中，曾有17名士兵主动申请担任炸毁封锁正面前沿地区日军钢筋混凝土或土木结构火力点的爆破突击手任务。

8月12日上午，苏军第94军第124师和独立坦克第206旅从行进中冲击索伦对面日军时，坦克纵队刚刚抵进索伦，日军便从钢筋水泥碉堡和临时构筑的土木结构火力点，以密集炮火展开凶猛反击。于是，苏军坦克展开战斗队形，冲锋枪手成散兵线展开。苏军坦克兵以精确的射击压制无名高地上的日军永备火力点，迫使日军火力显著减弱。苏军各进攻分队乘势迅速跃起展开冲击。但刚一接近高地，日军火力点又复活了。苏军一些士兵被击中，纷纷倒地，进攻行动被迫暂行中止。此时，苏军共青团员谢洛诺索夫征得指挥员允许，抓上几枚手榴弹，一鼓作气爬向日军火力点，连续准确地投入4枚手榴弹，日军机枪不响了。苏军步兵紧跟坦克再次进行冲击。但刹那间日军机枪又吼叫起来。谢洛诺索夫身上已再没有手榴弹，于是他猛地挺身扑向前去，用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日军碉堡的射击孔，进攻的道路终于被打开了，这位可敬的"马特罗索夫"式英雄也英勇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攻克索伦战役中，苏近卫步兵第5军第279近卫步兵团有78人受到团嘉奖，55人受到师嘉奖。从下述一例，可以看出这些受嘉奖人员的英勇表现：

近卫步兵第279团1营重机枪连射手格里果里耶夫在攻克索伦战斗中，他独自一人用机枪击毙日军士兵12人，打掉2个日军火力点，自己也被打伤，但坚持不下火线。其他受奖官兵的战斗表现也大同小异。

在同一场战斗中，近卫步兵第19师第54近卫团某营第3重机枪连首次参加实战的18岁新兵、共青团员科拉斯诺夫在与日军对射中击毙20余人，自己也身负重伤，但仍坚持战斗，直到不省人事被

战友抬下后为止。科拉斯诺夫为此受到集团军的嘉奖。

近卫步兵第5军第17师炮兵团长瓦西利耶夫上校从一开始就参加本师的先遣支队,他英勇无畏地指挥战斗,身先士卒亲临火线。在部队进抵王爷庙近郊时,他乘坐的1辆自行火炮车停在一片玉米地边,瓦西利耶夫第一个跳下炮车,举起望远镜向市区方向观察,不料几个藏在玉米地里的日军敢死队员突然从他身后扑了上来,瓦西利耶夫正聚精会神从镜中观察,尚未反应过来,便被日军敢死队员用匕首刺死。苏军自行火炮驾驶员随即驾车猛追这几个日军,并将他们用履带碾死,虽当即为烈士复了仇,但已无助于挽救其生命。鉴于其在作战中一贯表现出的娴熟指挥艺术和身先士卒的英勇果敢的大无畏战斗精神,战后被追授终生苏联国家最高荣誉称号——苏联英雄。同时,按惯例被授予金星勋章和列宁勋章各1枚,成为第39集团军中唯一获此殊荣的人物。

第十四章　苏军攻克乌奴耳要塞

第一节　日军的战前部署

1945年8月9日上午,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在满洲里边境地区及额尔古纳河对岸发动对日军东北地区西正面的全面攻击后,驻守在海拉尔的日军第119师团司令官盐泽清宣中将决定将留守部队撤往乌奴耳要塞区域防守。此前于1945年5月第119师团主力各联队已开赴大兴安岭的乌奴耳要塞区构筑阵地。

8月9日,日军第119师团驻海拉尔各联队留守官兵奉命突击处理善后事宜,随后以联队为单位组成临时编队,傍晚前开赴乌奴耳要塞。其中步兵第253、255联队还奉命各拨出2~3个步兵中队共约800人划归海拉尔要塞独立混成第80旅团指挥。步兵第255联队留守官兵的临时编队在焚毁联队营房后匆忙撤出,该编队由第255联队通信中队长中野大尉统一指挥,全员官兵约600人左右,编内包括该联队全部留守官兵和少量其他联队残留人员。其行军序列为:第119师团辎重联队的某小队,第255联队第3大队各中队(机枪中队除外);联队炮中队,第2大队重机中队,联队速射炮中队;第3大队机枪中队和步兵炮小队;第1大队各步兵中队和所属机枪中队、步兵炮小队;联队行李班和通信中队及联队本部骑兵小队;狩野少尉为首的后卫侦察分队。正是这支由留守官兵临时编成的“中野队”,后来在撤退途中成为日军第119师团唯一一支与苏军战斗中几乎全员覆灭的部队。

8月10日,苏联后贝加尔方面军先遣突击部队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已抵达大兴安岭西麓。经集团军司令员坦克兵上将克拉夫钦科重新部署,坦克集团军分三路前进。中路是近卫坦克第5军,属第一梯队;左路是近卫机械化第9军的摩托化步兵,属第二梯队;右路是机械化第7军的摩托化步兵,属第三梯队。当晚11时,近卫坦克第5军的先头部队抵达查干达坂山口。

第二节　大兴安岭隧道排雷

8月11日,日军第119师团第254联队第2大队驻防在牙克石以东卓山1号和2号阵地的2个不满编的步兵中队,在山本及须藤少尉指挥下向进攻的苏军发起反击。此时日军已无法阻挡苏军的强大进攻,经双方短促激战,须藤少尉以下多数官兵被击毙。在即将遭到围歼时,被及时赶到的第254联队第2大队长谷大尉率部解围,向东北部的小杉阵地溃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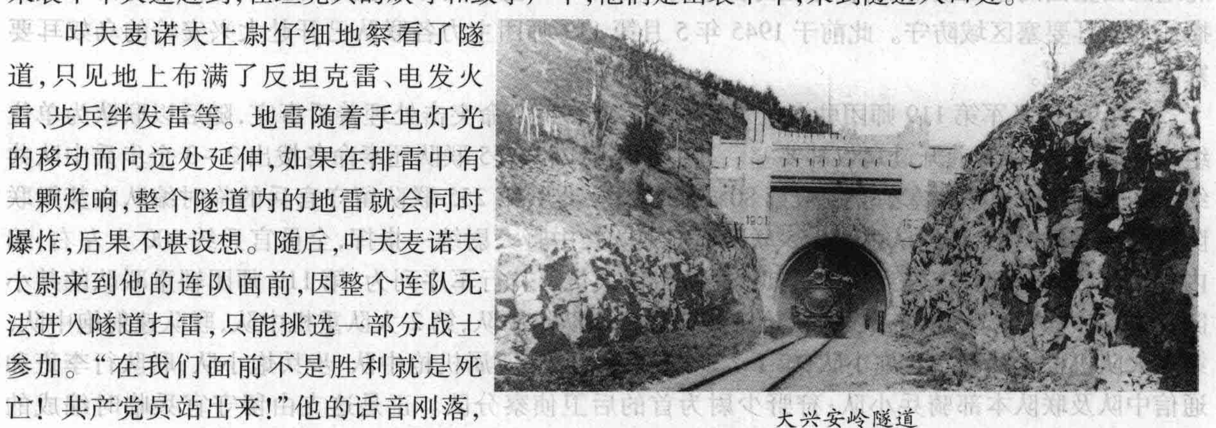
苏军坦克行进在大兴安岭



苏军坦克行进在大兴安岭

11 日晚，苏军近卫坦克第 5 军先头部队已经抵达大兴安岭铁路隧道。兴安岭隧道是中东铁路较大的建筑工程之一，位于今滨洲线 561 公里 262 米，海拔 972.6 米，线路标高 920 ~ 960 米，隧道全长 3 077.2米，宽 8 米，高 7 米。当近卫坦克第 5 军第 1 辆坦克刚开到洞口，就听见"轰"的一声巨响，坦克被埋设的地雷炸毁。原来，日军第 119 师团工兵大队从隧道入口直至隧道内共埋设了 1 537 颗地雷。近卫坦克第 5 军司令员萨维利耶夫中将来到隧道口察看实情后，立即通过无线电台向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司令员克拉夫钦科上将报告，请求派工兵连支援。随后，工兵连长叶夫麦诺夫上尉率连队乘装甲车火速赶到，在坦克兵的欢呼和鼓掌声中，他们走出装甲车，来到隧道入口处。

叶夫麦诺夫上尉仔细地察看了隧道，只见地上布满了反坦克雷、电发火雷、步兵绊发雷等。地雷随着手电灯光的移动而向远处延伸，如果在排雷中有一颗炸响，整个隧道内的地雷就会同时爆炸，后果不堪设想。随后，叶夫麦诺夫大尉来到他的连队面前，因整个连队无法进入隧道扫雷，只能挑选一部分战士参加。"在我们面前不是胜利就是死亡！共产党员站出来！"他的话音刚落，一大排战士站到了他的面前。他挑选了 37 名战士，带着他们进入隧道排雷。



大兴安岭隧道

在叶夫麦诺夫的带领下，37 名工兵趴在地上，用自己的双手将地雷一颗一颗地取出来传到洞外。这需要十分小心，丝毫大意不得，为此许多工兵都累晕过去了。醒来后，又继续排雷。他们平均每小时排除 192 颗地雷，共用 8 小时便排除了 1 537 颗地雷。

障碍排除了，道路畅通了，当叶夫麦诺夫上尉被战士搀扶着从洞里走出来到萨维利耶夫中将面前时，将军紧紧拥抱住上尉，热泪夺眶而出："谢谢你，孩子，苏联人民感谢你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感谢你们。"将军呜咽着说。随后萨维利耶夫将军下令："同志们，出发！"数千辆坦克发动起来，骑压着铁道线路，浩浩荡荡地穿过隧道。

第三节　日苏军交战

8 月 12 日晚，日军第 119 师团第 255 联队战时编成的"中野队"在行抵免渡河附近时，到驻免渡河的第 254 联队兵营补充给养，而此时苏军已进驻免渡河，双方随即发生短促混战。"中野队"在被

击毙21人、负伤数十人后迅速撤出战斗，慌忙向东逃去。担任后卫侦察的狩野少尉在苏军的追击中被击毙。

8月13日夜，驻防乌奴耳要塞的日军第119师团第254联队第2大队组成以日边伍长为首的18人分队，在免渡河南部“深夜桥”边准备炸毁该桥，阻止苏军前进时，结果被苏军击毙17人。随后第254联队又派出“特攻队”将该桥炸毁。

8月14日晨，在苏军第36集团军先遣支队独立坦克第205旅等装甲机械化部队向乌奴耳以东、铁路北侧的严山要塞阵地挺进时，驻守该地域的日军第254联队第2大队因没有摧毁坦克的重火器，为阻击苏军，便分批派出携带炸药包的“肉弹迫近敢死队”轮番出击，但均遭到失败。其中一次由分队天野军曹以下10人出击，结果8死2伤。



苏军进攻大兴安岭日军阵地

8月15日晨，苏军步兵约40人在3辆坦克的掩护下，对乌奴耳东北部的昆独山(二道梁子)南麓日军步兵第254联队第2大队所属的中队阵地进行冲击，经过激战，苏军被迫撤退。

15日中午，日军第119师团司令官盐泽清宣中将从电台广播中收听到日本天皇的《终战诏书》，当即决定“谨遵圣旨”，待关东军总部命令下达后就地停战。

15日下午3时，驻守在开岭北部虎山阵地的日军步兵第254联队第3大队第7中队派出由8名士兵组成的“肉迫攻击班”，对从山下通过向东行驶的苏军坦克进行爆破袭击，遭到苏军的猛烈反击，无一人生还。

8月16日下午4时，驻守在伊列克得北部大蛇山南坡阵地的日军步兵第254联队第3大队第7中队的某小队，在与苏军交战中被击溃，兵员多数被歼灭。与此同时，驻守在伊列克得北部中村山阵地的日军第254联队第3大队第7中队的2个主力小队约100人左右，在与苏军激战中被全歼。

日军第119师团第255联队战时编成的“中野队”在8月12日晚与苏军遭遇并迅速撤出战斗后，一路向东快速行军，但因所属兵员原本就多是老弱病残人员，加上一路劳累、饥渴，体力渐渐不支，先后有约150人掉队，其余约450余人仍由中野带队行军。因队中携行物资装备多，且目标大，行动不

便,为快速前进,中野队长决定将不便带走的车辆、火炮、文档、被服装具等毁弃甩掉。一路穿越人迹罕至的深山密林,终于在8月17日下午3时到达第119师团指定的第255联队第2大队第5中队的据点,与本部联队的部分官兵会合。并在此获悉,部队已接到停战令,准备去博克图集结,下步情况不明。因此地距联队本部驻地尚有4~5小时行程,中野队长在安排全队人员就餐后,稍事休息即乘夜出发,以便将全队尽快带到联队本部复命。但该中队上山后走出不到四五公里,全队人员因连日披星戴月行军,均感到筋疲力尽。为此中野队长下令就地休息数小时。18日拂晓继续行军,上午8时左右走下山谷,列队行进在笸山(位于博克图西南博林线铁路42公里石门子站西北约二三十公里处的今乌山村一带)的河谷湿地上。突然在前方数百米外发现一支身份不明的大部队。由于当天多云雾,能见度很差,无法判定敌友。又因确信此处是本联队友军防区,而放松了警戒。结果瞬间招致对方出其不意地猛烈袭击。原来这是一支苏军大部队在此通过,苏军人数众多,居高临下,并拥有火炮等重火器,打得日军"中野队"措手不及,抱头鼠窜,各自逃散。苏军乘胜一路追杀,不到1小时"中野队"便横尸遍野,中野大尉等以下官兵几乎全军覆灭。据战后查证,侥幸逃出者仅有军曹高森直、伍长岛塚真吾等16人。



苏军坦克部队穿越大兴安岭

第四节 日军投降

8月16日下午,日军第119师团司令部接到关东军总部下达的停战集结、放下武器的投降命令。司令官盐泽清宣中将当即向各联队传达,同时命令各联队在各自阵地前竖起用日俄两种文字书写的"战争已终结"等语句的标牌。16日晚,盐泽清宣派出联络官手举白旗向苏军交涉,请求立即就地停火,各自后撤1公里,允许各阵地日军转移到博克图集结整顿后自行解除武装,等候苏军前来受降。但苏军代表概不考虑日军建议,声称其部队任务是迅速占领哈尔滨,并且只能不间断的持续进攻,片刻不能在途中停留。日军只能立即就地投降,不得转移。但同意日军第119师团就近由前沿指挥部撤到博克图准备有关交接资料,统一指挥各部就地投降。盐泽清宣为讨好并取信苏军,还派人为苏军

送去一批清酒，表示慰问。但狡猾的盐泽清宣在此要了个金蝉脱壳的花招：他只是命令驻防要塞前方的步兵第254联队等部分主力就地投降，而自己则带着师团司令部幕僚和步兵第253联队等其他主力部队连夜匆匆搭上一列火车越过博克图并于18日抵达齐齐哈尔。8月17日，当苏军部队进入博克图时，见盐泽清宣师团长不辞而别，遂立即派出1支摩托化步兵团紧随盐泽列车之后向前追击。故在新南沟、博克图一带就地集结投降的日军第119师团各部仅有6 000余人，为该师团编制定员的半数左右。其余官兵则由盐泽清宣师团长带领，于8月19日在齐齐哈尔向随后开进齐齐哈尔的苏军先遣支队投降，终未逃出被俘的命运。

第十五章　苏军清理战场

苏联军队从1945年8月9日零时开始对驻守在东北的关东军发起全线总攻，并在极短的时间内消灭了近百万日军，解放了整个东北。至8月22日，东北的日军主力已停止了有组织的抵抗。

硝烟散尽，东北各要塞阵地上呈现眼前的是恐怖的战争景象：正开始腐烂的数万具双方军人尸体，横三竖四地倒卧在山丘上，间或有腹部胀得圆圆的倒毙军马，扭曲着脖颈，四蹄朝天仰卧在干涸的血滩上。一些被击毁的坦克、汽车和火炮的残骸仍留置原地。交战时期日军甚至苏军自己遗弃的枪支弹药也几乎随处可见。各阵地反坦克壕外的地雷封锁区，有许多地雷还照原样埋在地下，随时可能踩响，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个别漏网的日军散兵仍藏匿在工事中拒绝就俘。这些都是战后立即摆在苏军面前的另一项任务——清理战场。

第一节　海拉尔要塞

海拉尔要塞被苏军攻克后，海拉尔苏军司令部立即组织士兵和日军战俘清理战场。在8月的骄阳下，如不及时掩埋或采取防腐杀菌措施，那成千具已开始腐烂的尸体将可能引发疫病。苏军主要收集清理各阵地遗弃的武器装备，用日俘将尚暴尸荒野的日军阵亡官兵遗体，利用就近的战壕、散兵坑、炸弹坑等低洼地势予以埋掉。对苏军阵亡官兵遗体则就近集中作药物消毒防腐处理，不久即运往小孤山公墓合葬。

苏军清理运回各阵地上被日军击毁而又有修复可能的坦克、车辆、火炮等装备，而对于严重损毁无修复价值的则遗弃原地未动。战后人们曾在河南台、敖包山阵地等地发现苏军遗弃的坦克残骸。

日军投降当时各阵地周围还有大量地雷仍埋在地下。日军投降后苏军立即着手扫雷工作，每天都有若干工兵分队携带扫雷器械进行地毯式排查探寻，排除并引爆了数以百计的地雷。



苏军扫雷

炸毁日军阵地上的各种永久性工事。此项工作是和扫雷同时进行的，历时1个多月，进行得相当彻底。要塞的5个核心阵地、一批

辅助阵地和远郊的外围阵地，总数达500个以上的大小碉堡、火力点、地下掩蔽部、仓库、指挥观测所全部被炸毁。敖包山、河南台阵地地下工事的洞口也大多被炸毁，致使地下通道被堵。

销毁从各日军阵地、营区收缴清理上来的各种炮弹、手榴弹、炸药和其他弹药。9月上旬，苏军在日军兵器厂一带曾大规模地集中进行过两次销毁工作。

第二节　绥芬河要塞

天长山要塞被苏军攻克后，绥芬河苏军司令部立即组织士兵和大批民工清理战场。时值8月，天气异常炎热，绥芬河的天长山、靖国山和鹿鸣台的808高地及观月台的武藏山、顺天山等要塞阵地上，由于激战惨烈，双方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卧在土崩瓦解的阵地上，有的已超过两昼夜，尸体开始腐烂，发出难闻的尸臭味，被击毁和遗弃的轻重武器随处可见，还有许多苏军遗留的枪支弹药及生活用品，特别是位于反坦克壕外围封锁交通要道的大量地雷尚未清除，随时可能踏响，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

苏军调动、指挥民工义务清理战场。民工拿着板镐、铁锹、叉子、二齿钩子，按照苏军的吩咐，将日军尸体就地拖进弹坑、堑壕进行掩埋。将苏军军官的尸体抬下山，集中埋在天长山南部山脚下的一个大坑里。苏军士兵的尸体集中几处炮弹坑里埋葬。散落在阵地各处的枪支弹药收集起来，集中用马车运下山，一些被击毁的重武器，也相继在1个月内运下山，连同在兵营及城内日伪军、警、宪、特的遗留物资，全部运回苏联。苏军动员十几名青年民工，用了近1个月时间，义务将埋在天长山南部山脚下的苏军军官尸体挖出来，装进几个临时棺材里，运回国内安葬。

随后，苏军开始集中兵力，将绥芬河要塞各阵地钢筋混凝土工事全部用炸药炸毁。对兵营及各种附属设施及军需物资、粮食包括房盖铁一律拆下运回苏联，搬不走的建筑物一律毁掉。

与此同时，工程兵专门进行扫雷工作，凡是能够探测到的地雷全部清除，连同搜集的各种日军炮弹，分批进行销毁深埋。

伴随着战场的清理、清除，苏军绥芬河司令部于8月14日下午发布公告，勒令日伪军警宪特人员到司令部报到备案，同时，指令绥芬河东街居民临时迁移到阜宁镇居住。随即苏军在绥芬河城内展开了全面搜查。凡是日伪财产，一律收缴。对日军1938年11月修筑的7 514米“北大营”至火车站的军用铁路线，动员民工全部拆除。次年春，又将全长93公里的绥宁铁路（绥阳至三岔口）全部拆除，并将桥梁、隧道全部炸毁，车辆、钢轨等全部运往苏联。

1946年5月1日，苏军留守部队回国前，又将战时未炸毁的日军要塞工事逐一进行破坏，保存完好的地下工事没有几处，只在绥芬河的山田台、清光台和鹿鸣台的东望山、十八盘山及观月台的武藏山地下工事相对完整的遗留下来。

其他各要塞也在苏军的指挥下，开展了类似海拉尔、绥芬河的战场清理工作。

第十六章　对日军俘虏的管理

战争开始后，随着苏军的不断进攻，东北日军各要塞区域被逐个攻破，日军战俘也日益增多。为便于战俘管理，苏军在各要塞地区都设立了战俘收容所、收容营。现以当时苏军在海拉尔、黑河地区的日军战俘管理为例进行介绍。

第一节　海拉尔地区战俘管理

据海拉尔通用机械厂退休工人,原被俘伪警刘禄回忆,他是8月9日凌晨在额尔古纳河边的伪陈巴尔虎旗国境警察队呼列图小队被俘的。8月15日经"新三河道"押送到海拉尔,一行10人被关进原日本人林兼仓库"打牛房"(屠宰车间,今元盛食品厂西边的屠宰车间)。"打牛房"面积很大,长30多米,宽10余米,他们这批伪警俘虏挤在一角,是苏军在海拉尔设置的第一个临时战俘营。

8月16日,先后又有约三四百名被俘的日军官兵也被送进"打牛房"关了起来。这批日军中军衔最高的是个中尉,士兵大多数是朝鲜人。8月17日,这个临时战俘营搬迁到今尼尔基路北端东侧的"大土围子"(原日军兵器厂、弹药库)里。8月18日中午又有一个长长的日军俘虏纵队,从河西被押送过来,足有两三千人。这些日俘被关在"土围子"西南角靠围墙不太远的一片木板房里。

战俘营中仍沿用日军原有的大队、中队、小队、分队等组织管理模式,逐级进行管理。战俘以中队为单位自办伙食,向苏军战俘营当局领取主、副食品。粮食、豆油、干菜都是在苏军带领下到原日军东山大库(第18野战货场,2646部队)提取,土豆、大头菜、大萝卜等则到原由日军自行经营的菜地去收获挖取。俘虏们每周都杀牛改善生活。在卫生保健方面,战俘营内设有卫生所,有保健医生对伤病战俘随时进行诊断医治。因战俘营内无澡堂,被俘官兵又无换洗衣服,为防止疫病流行,战俘营管理人员要求战俘经常用冷水自行擦洗净身,并定期派来用汽车拖载的高温蒸汽消毒车,将战俘内外衣全部收走装进消毒车内杀菌消毒 。

苏军看押人员只负责外部警戒,对日俘内部日常生活一般不进行干预。人们甚至看到苏军押解人员在护送日军去劳动作业现场途中,列队行进的日俘尽管略显出无精打采的样子,但仍踏着行进节拍齐唱他们的《爱国进行曲》《爱马进军歌》《啊,战友!》等日军队列歌曲,苏军押送官兵也不予理睬。

日俘在被关押期间,基本上是为苏军提供各项劳务,主要有:

1. 战争刚一结束,苏军便提出一批日俘,分别到各阵地搜寻失踪官兵,并就地掩埋尚暴尸荒野的日军阵亡官兵。

2. 修建小孤山苏军阵亡烈士公墓。该公墓工程较大,在相对高度为20余米的小孤山顶,平整出一块约20×50米的大片平地,开挖出深达10余米的24个合葬墓坑。而后从海拉尔要塞各阵地运回总数达1 100余具的阵亡苏军官兵遗体,再一一从小孤山下抬送到山顶,按预定墓位分别入殓封墓,再修建平台围栏、纪念碑、带护栏的上下山100多个阶梯通道等。此项工程在9月末竣工。

3. 修建市内的苏军烈士纪念塔。此项工程也曾动用数以百计的日俘,参加从平整场地到河滩附近挖筛和装运河流沙、石,搅拌混凝土,搬运各种工料等杂活。

4. 投入秋收。在今呼伦路北侧和其他一些地方,曾有大片日军进行自给性生产的菜地,种植有土豆、大头菜、大萝卜等秋菜。此时正进入收获季节,日俘在苏军看押下进行这些秋收劳动。

5. 为苏军装运战利品。日军在海拉尔设有兵站基地和军用仓库,除被日军焚毁的外,也剩下了不少未被烧掉的物资,尤其是东山大库。开战当夜10时左右日军大肆纵火时,苏军先遣支队南路部队已从今建设镇以东向东山大库方向逼近,日军"烧却班"已来不及按预定计划完成全部任务,只烧了几个小库,便匆匆逃去,故仓库物资大部得以保留下来。该库区物资种类较多,从人员、马匹和兵器的装具到主食、副食、饲料、干草等应有尽有,而且数量较大,每次开进货车日伪俘虏便轮流出工装运,前后持续一个多月。其他日军营区一切被苏军认为可用的东西,也由日俘出工装运。

1945年10月末,苏军先后派来两个长长的闷罐专列,直接开到战俘营院内的铁路专用线,分两次将日俘运往苏联。

第二节 黑河地区战俘管理

在黑河地区,除西岗子原日军第135旅团俘虏被集中押往孙吴外,余下的黑河地区日军俘虏均被关押在南岗(原日军宿舍)战俘收容所。1945年9~10月,苏军将伪黑河省及内地的一部分日本战俘经黑河押送苏联。当年入冬后,由于饥饿、劳累、疾病等原因,有千人以上日军战俘死于苏联,苏联政府随后又将数千名老弱伤残的日军俘虏分期分批遣返黑河,每人分给45斤粮食,交中方押管。

黑河地区行政办事处先后在南岗、火车站、东大营及伪营林公署等处,设日军俘虏第一、第二收容所及日军俘虏第一、第二诊疗所。1946年4月,分散在其他收容所的日军俘虏全部移居到南岗收容所,由瑷珲县民政科管理。

当时,人民民主政权刚刚建立,条件异常艰苦,在政府工作人员和自治军战士都吃不饱、穿不暖的情况下,仍对日军俘虏给予照顾。1946年2月6日,黑河地区行政办事处《为接收日军俘虏食粮配给由》的训令中令瑷珲县长:"红军交付日军俘虏之当时,与该县商讨之结果,对于食粮之不足及木料供给由县方负责……令仰该县如左记数量分配发给,切切此令"。

收容所名称	收容人员数	品　名	每日每人定量	每日总员定量	一个月合计
日军俘虏第一诊疗所	330	杂谷食盐	1斤	330斤 20斤	9 900斤 600斤
南岗日军俘虏第一收容所	160	杂　谷	1斤	160斤	4 800斤

因日俘中患病者较多,1946年6月12日瑷珲县民政科给黑河和平医院院长发出公函,指出:"现在日俘虏患病者已达140余人,事关国际问题,不能不予以考虑……"

和平医院在库存药品不足,亟待补充的情况下,拨给南岗日俘收容所6 520元的药品,并指派日本医师北村一夫专为日俘医疗。

为加强对日本俘虏的管理,1946年4月,瑷珲县政府还制定了《暂行日俘虏收容所事务处理规程》。

1946年3月12日,日俘赖田幸三郎等8人、成吉美之等5人、林吉博等5人分别去长春、北安、孙吴办理回国筹备事宜。3月28日,将第一批日本俘虏1 000名送往北安;4月9日又送去第二批计1 500名,余下700名。

1946年6月20日夜,剩余的700名日俘暴动,夺枪将看守班的几名战士打死后逃跑。随后,有的被抓住予以处决,少数跑到山上当了土匪。日俘收容所就此撤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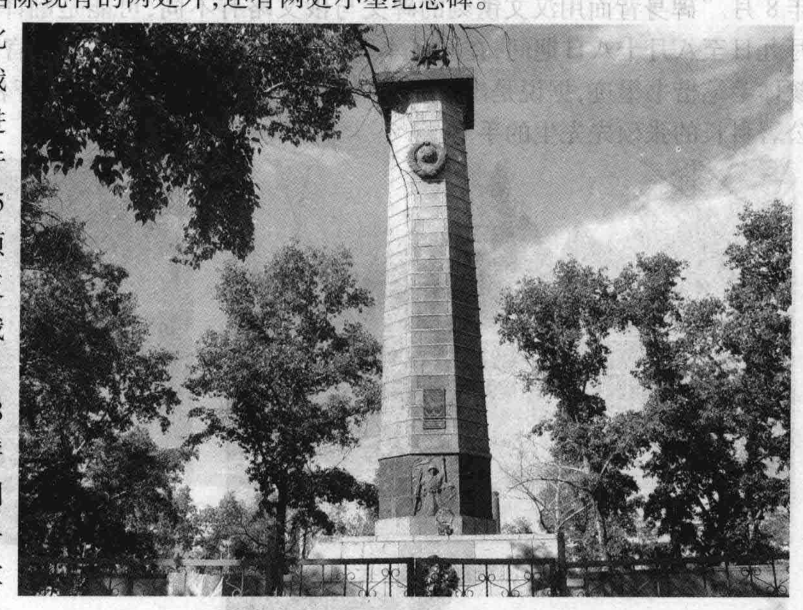
第十七章 苏军建立纪念碑塔

战争结束后,为纪念在战场上光荣牺牲的苏联官兵,各要塞地区和东北黑龙江、吉林、辽宁省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兴安盟和呼伦贝尔市都修筑了纪念碑、塔、墓园、陵园,以永远铭记苏联红军战胜日本侵略者、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丰功伟绩。共计117个,其中友谊纪念碑17个,烈士纪念碑(塔)57个,烈士陵园7个,烈士墓园38个。其中黑龙江省最多,纪念碑10个,烈士碑38个,陵园1个,墓园25个,计74个;吉林省纪念碑4个,烈士碑4个,墓园5个,计13个;辽宁省纪念碑3个,烈士碑6个,陵园3个,墓园5个,计17个;内蒙古东部区烈士碑9个,陵园3个,墓园5个,计17个。

第一节　海拉尔要塞

在海拉尔要塞地区，由于大批阵亡官兵遗体急待安置处理，故苏军的纪念碑、塔修建工作动手较早，抓得也较紧，小孤山合葬墓的遗体入殓、封墓在9月初即已完成，并随即转入碑、塔修建工程。

当年海拉尔的苏军纪念碑、塔除现有的两处外，还有两处小型纪念碑。



海拉尔巴尔虎西路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

一处是在今呼伦桥东侧路北紧靠路基下，该处是日伪时期白俄伪军别石柯夫支队的营区，苏军进驻后一支几百人的小部队驻防于原白俄伪军营房。纪念碑高约2.5~3米，木结构，四角方锥形，碑顶竖一红星，碑身涂以绿油漆，正反两面都用红色油漆写有印刷体俄文字母。纪念碑是由苏军官兵自行动手建造的。此碑是为纪念8月10日晨苏军先遣支队乘车沿呼伦路上桥向车站一带开进时，遭到日军从敖包山和河南台阵地炮击而阵亡的官兵。此次炮击使苏军车队中有数辆汽车被击毁，同时隐蔽在日本开拓团汽车学校（也有人称其为省交通学校，在今啤酒厂对面处）的一支小股日军部队也乘机进行偷袭，使苏军遭到一些伤亡，人数约一二十人。此碑在1946年春苏军撤退后不久便被破坏无遗。

另一处是在西山铁路客车厂附近的铁路干线北侧，是砖芯混凝土结构的小碑，碑高不超过3米，碑顶也缀以红星，碑身刻有俄文字母，内容不详。这里是当时苏军坦克从背后利用平缓地形对日军河南台阵地发动突袭的主要通道，其西侧是河南台阵地的辅助阵地北松山。激战中这一带曾有数辆苏军坦克被击毁，是为纪念阵亡的坦克兵而设。此碑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尚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捣毁北松山下俄侨公墓（“毛子坟”）时一起被捣毁，痕迹皆无。

现存的两处苏军烈士纪念碑塔，一直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妥善保护，曾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维护修葺。现不仅成为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基地，且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兴起，作为历史文物也成为不可多得的参观旅游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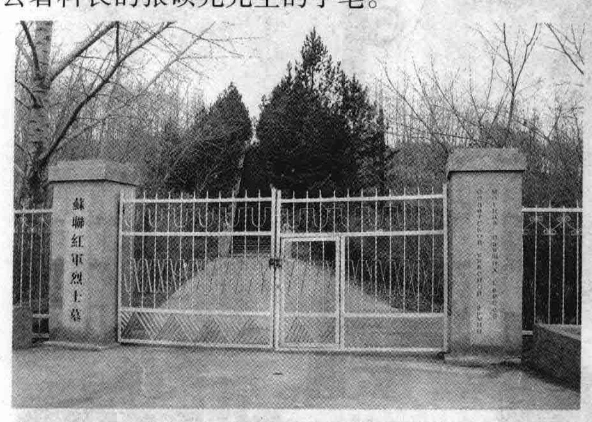
位于市中心今巴尔虎东路路北、朝阳路以东的苏军烈士纪念塔，习惯上也称苏军烈士陵园。原为海拉尔公园，占地面积很大，约达15 000平方米以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建汽车大修厂，从其东部割占很大一块。2002年夏撤盟设市过程中，根据新的城市规划，将原有的封闭栅栏向塔身近旁收缩，原封闭的大片园区开放为街头广场。

纪念塔总高16.25米，底座高2米，分3层，从地面到底座平台有14个台阶。塔身为八棱形，顶端有一颗金星，塔身由花岗岩砌成，从上到下周身按等距用铁箍围起加固。塔基有5块1.00×1.50米的铜板浮雕，上面表现的是步兵、坦克兵、炮兵和航空兵的战斗场面。塔身正面上端镶有金色苏联国徽一枚，塔基背面镌刻有“为苏联的荣誉和胜利而在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的字样。塔基南北两侧刻有以上校普什卡了夫为首的27名阵亡官兵的姓名、军衔和出生年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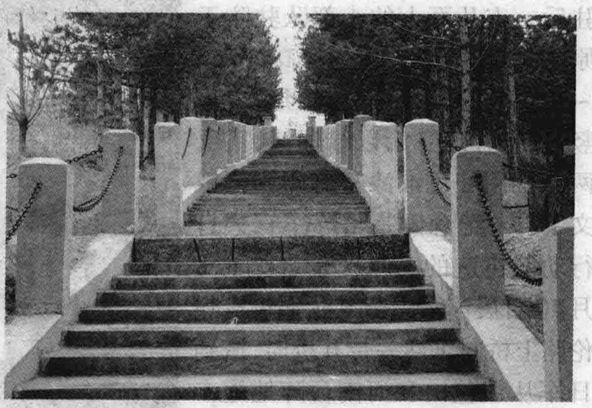
位于市区东郊建设镇的小孤山苏军烈士陵园，是个大型合葬公墓。这里安葬着1 100余名阵亡苏

军官兵。陵园占地15 400平方米,周长为728延长米,用石头水泥墙垛和铁栏围起。陵园的正中是烈士纪念碑,碑的东西两侧有烈士合葬墓24个(其中在纪念碑近旁的4个是军官合葬墓),每个上面钉一块1.00×1.50米的铜板,上面刻着烈士的军衔、姓名、出生年月等。

纪念碑约3米多高,矗立在约60厘米高的两层底座上。塔身基座很大,上部大幅收缩,呈等腰四面体锥形,顶端竖立一颗红星。塔身正面用俄文镌刻着:“这里安葬着1945年8.9~8.18期间在为解放海拉尔而同日本军国主义的战斗中光荣牺牲的烈士们。祖国不会忘记你们。后贝加尔战线,1945年8月。”碑身背面用汉文镌刻的碑文与俄文略有不同,可能是翻译问题。其碑文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至八月十八日期间,在同日本军国主义战斗中阵亡的赤军官兵永垂不朽”。碑身汉文用的是颜体毛笔楷书墨迹,据说是出自原伪兴安北省第二国民高等学校著名国文教师、时任海拉尔临时自治公署科长的张硕先先生的手笔。



海拉尔小孤山苏联红军烈士墓



烈士墓地台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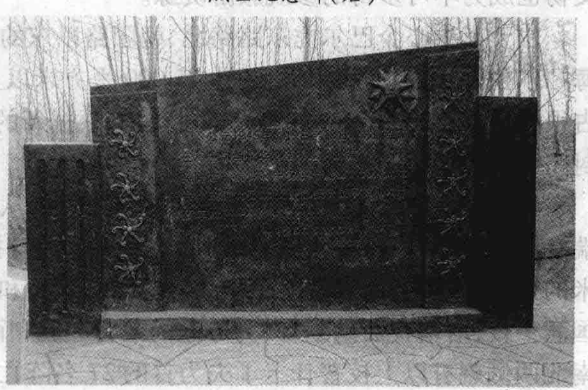
烈士纪念碑(前)



烈士纪念碑(后)



烈士墓地(右)



烈士墓志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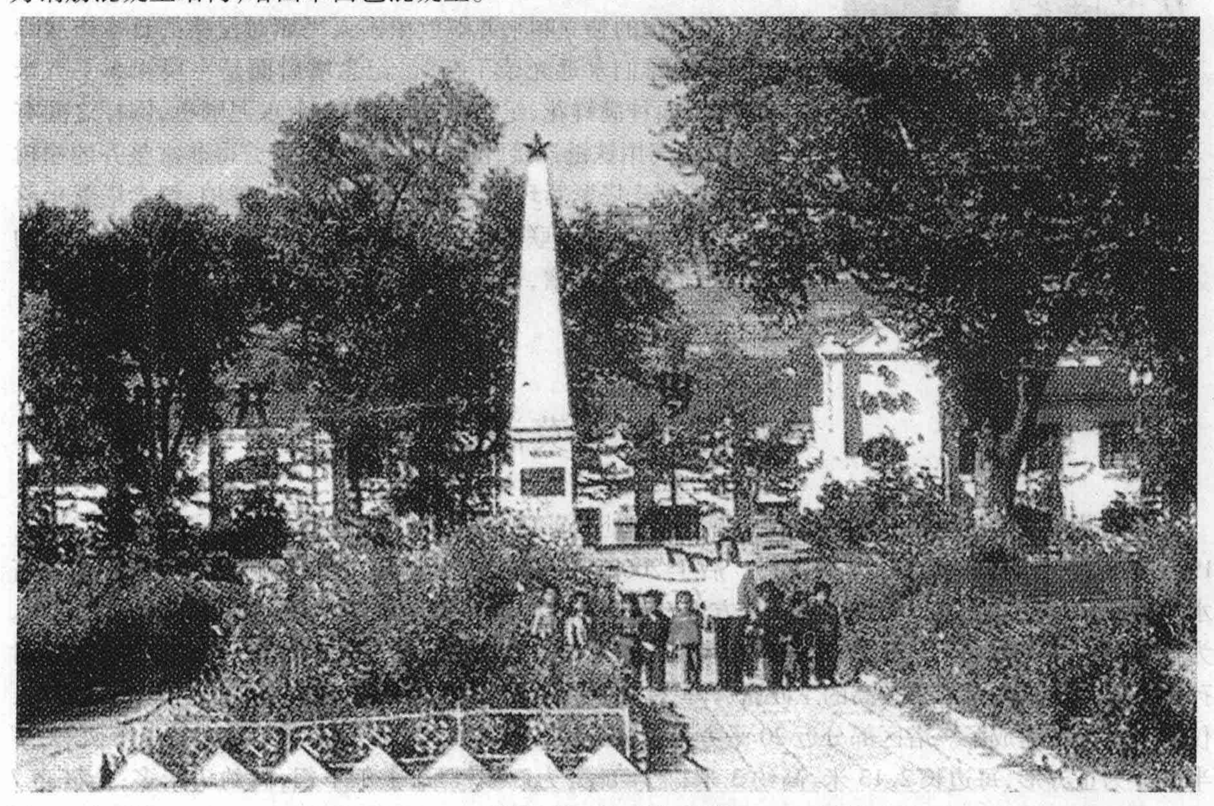
第二节 绥芬河要塞

1945年9月,绥芬河苏军司令部启运苏军军官尸体当天,在绥芬河治安维持会参与下,动员十几名青年义务出工,在火车站前小广场兴建苏联红军纪念塔。同年10月落成,由司令部主持奠基仪式。

苏联红军纪念塔基础深3.5米,宽4米,为"十"字形基础,由毛石混凝土砌筑。地面基座为二层,一层6×6米,二层3×3米。塔身由两部分组成,下部为长方体,上部为方锥体。由青砖砌筑而成,混凝土罩面,粉饰白石灰。塔高13.1米。塔尖竖立一枚红五星,塔身下部竖方体南北两面各嵌一枚混凝土五角星,涂上红油漆;两枚五角星上部阳刻"1945"字样;东西两面分别在凹陷部位镶嵌两块黄铜板,东面一块阴刻俄文,西面一块阴刻中文,碑文为:"把我们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苏联红军万岁!"

苏联老兵和中国青年敬献的花圈

1981年混凝土塔面脱落,修缮时改为水刷石面。2001年10月15日,此纪念塔拆除,按原样原尺寸重建于天长山西南部,为钢挂大理石结构,纪念文字改为黑色大理石阴刻。在基座北侧嵌有一块黑色大理石碑,上书"重建苏联纪念碑记"。2005年5月,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又将此碑在原址后侧20米处重建,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塔面罩白色混凝土。



绥芬河苏联红军纪念塔

第三节 黑河要塞

黑河地区有两座苏联红军烈士塔，一处在黑河市区的黑龙江边，一处在西岗子镇。由于历史的原因，黑河修建苏军纪念塔要晚于其他各地。1946年苏军撤离黑河后，日伪残余部队变成政治土匪，对黑河新成立的人民民主政权形成极大威胁，曾一度攻进黑河市区。至1947年冬，才彻底肃清匪患，民主政权得以巩固。为了缅怀苏联红军的英雄业绩，1949年，黑河人民政府在王肃公园北端建立了苏军烈士纪念塔。王肃公园建在黑龙江畔，苏军纪念塔离江堤仅有10米，塔高8米，砖混结构；塔座1.7米，四周用黑色大理石镶嵌，其余部分为水刷石。塔正面（朝北）用鲜红中文书写“苏联红军烈士塔”，塔座正面用俄文、东西两面用中文写到“壹仟九百四拾五年八月九日至九月三日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独立和平并解放中国人民而对侵略的日本作战尊贵牺牲的英雄们永远光荣不朽”。纪念塔后面是一块4.5平方米的花坛，上面种满鲜花，纪念塔外圈有23个水泥围栏，围栏之间有1.5米的距离用铁链连接，围栏外面是一道修剪得非常整齐的榆树墙，将苏军烈士塔紧紧环抱。公园到处是古树苍柏，纪念塔就坐落在一片翠绿之中。苏联红军纪念塔自修建以后，始终得到有效的管理和维护，几经修缮，每到清明时节，总有人来此敬献鲜花。



黑河苏联红军烈士塔



黑河市西岗子镇苏联红军烈士塔

第四节 霍尔莫津要塞

在孙吴县境内有两处苏联红军纪念碑塔：一处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位于孙吴镇火车站前，1945年8月16日动工修建，27日落成。后于2002年迁至孙吴公园南山脚下。全碑为塔形，用砖石水泥砌筑。塔和墓区占地面积约140平方米。苏联红军在解放孙吴的战斗中牺牲了300多名官兵。为缅怀烈士的国际主义精神，决定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塔的设计图由苏联红军司令部提供，由当时孙吴县土木建筑技术水平较高的工匠张秀峰、徐恩昌等人负责施工，每天有30余名民工运料和施工，仅用十几天就建成了。塔区部分近20平方米，两层塔基为正方形，边长1.2米。塔身分上下两层，下半部分为正方形，每边长2.13米，高约3米；上半部分为四棱锥形，上细下粗，高约3米多；全塔高7米。双层塔身通体洁白，塔尖镶嵌着一颗鲜红的五角星。塔身正中部雕刻着碑文，正面是俄文，两侧

是中文楷书，镌刻着："为社会主义的祖国击退日本与解放中国人民而战殁之英雄其伟大荣誉千古不朽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至十八日。"在塔身即将建成时，苏军驻孙吴司令部用汽车、马车从四面八方的阵地和战壕中，将烈士的遗体搜集运回，在塔座后陵墓区安葬。当时用的是苏式六楞齐头棺木下葬入殓。每个墓区安葬2~5位烈士遗体。墓前都立有一块小碑，上面用俄文写着烈士的姓名、职务。墓区内植有松树、杨树。

另一处纪念碑为苏军女坦克手纪念碑，位于孙吴县东南25号公路大桥路左侧约500米处。1946年春修建。碑高2.5米，碑身用砖、水泥筑造。形状和苏联烈士纪念碑大体相同，规格比其略小，碑的正面浮雕有苏军MT34型坦克。1945年8月12日从胜山要塞败退下来的关东军第268联队第2大队长平间少佐率残部向西南方向撤退，14日凌晨与苏军坦克部队遭遇，1名苏军女坦克手牺牲。孙吴人民为纪念女坦克手，专门修建了一座纪念碑，以永远纪念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献身的苏军女坦克手。

第五节　东宁要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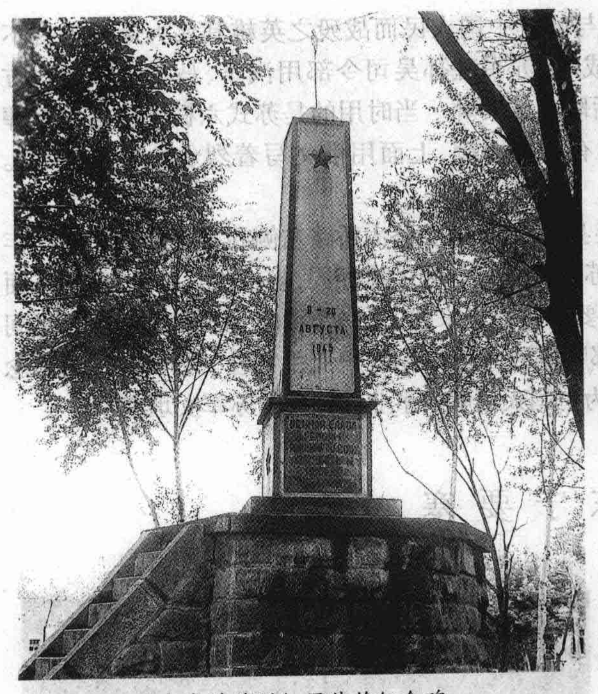
1945年11月，在东宁三岔口镇西山顶部，苏联红军修建了苏联红军纪念碑。碑由4部分组成：底座是五角星形，台阶4阶，碑文高110厘米，碑高3米，碑顶有五角星。同时在东宁镇中华路南转盘道建一座纪念塔。底座是六角菱形，底座与碑座距长3.2米，角距5.2米；碑座是六角菱形，高1.1米；角距1.8米；碑文座高0.2米，宽1.5米；碑文塔高1米，宽0.9米。碑高3米，上宽0.7米，下宽0.8米；碑文为"为我们祖国的荣誉和胜利而牺牲的英雄永垂不朽"。2005年8月，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在城市改造中将此碑迁至东宁要塞勋山阵地重建。



东宁三岔口镇西山苏联红军纪念碑



东宁镇苏联红军回国纪念门（凯旋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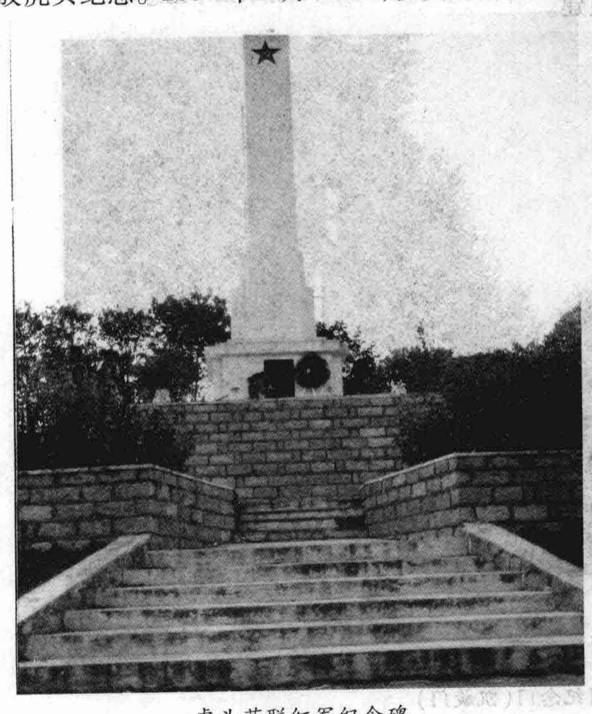
东宁镇苏联红军英雄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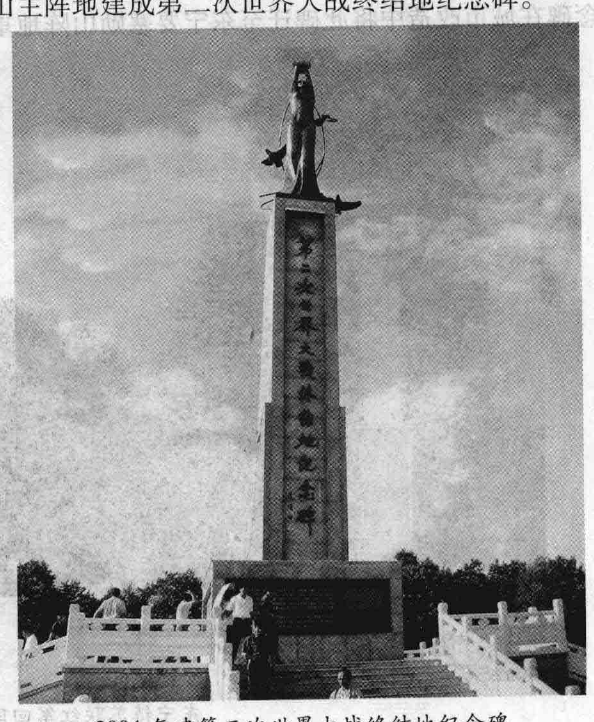


2005 年建的东宁勋山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第六节 虎头要塞

1945 年 10 月，为纪念攻克虎头要塞战役，驻虎头苏军司令部和虎头镇居民，在位于虎头镇北 2 公里处的虎东山上建起一座高 9.7 米、上窄下宽的梯形纪念碑。银白色的塔尖缀有镰刀、斧头相辉映的红五星，碑上镶嵌铸铁俄文译为：光荣归于苏联斯大林元帅远东第 1 方面军摧毁要塞，驱除日寇解放虎头纪念。2004 年 8 月 15 日，在虎头要塞猛虎山主阵地建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碑。


虎头苏联红军纪念碑



2004 年建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碑

第七节　庙岭要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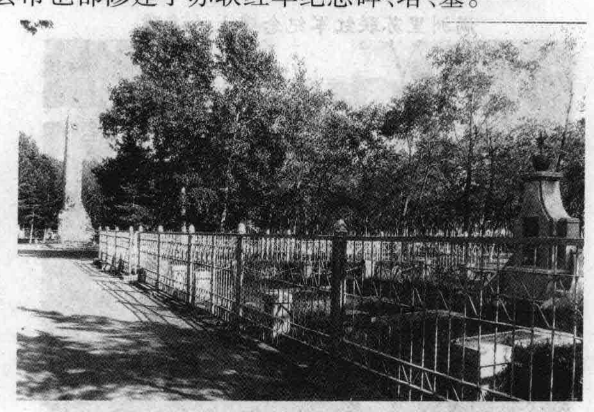
1945年8月，苏联红军解放伪东安市后，在密山镇东安大街东转盘（今密山市委门前）中间建一座高6.03米、方形砖砌、水泥沙浆罩面的纪念塔。塔体分为三部分，即塔底座、中部、塔顶。纪念塔的主体是用红砖、水泥沙浆砌筑，外表是用水泥素灰即水刷石处理。塔的南北两面下节1米处凹入3厘米，上镶着铁板铸写的碑文，南面为俄文，北面为汉文，其内容均为："苏联斯大林元帅之光荣远东第一线军队歼灭侵略者东亚之日本及解放东安市纪念日。一九四五年八月"。

第八节　其他苏军纪念碑、塔、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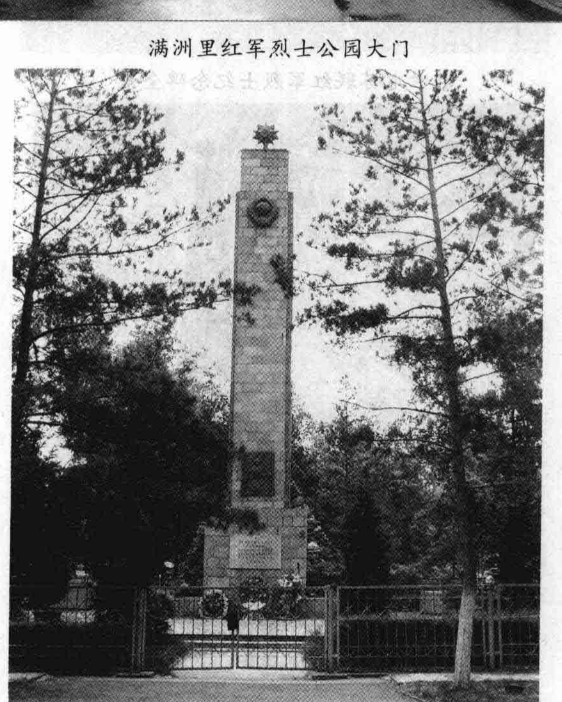
除前述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塔、墓外，在珲春、半截河、富锦、索伦等要塞区及其东北的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等东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区部分旗县市也都修建了苏联红军纪念碑、塔、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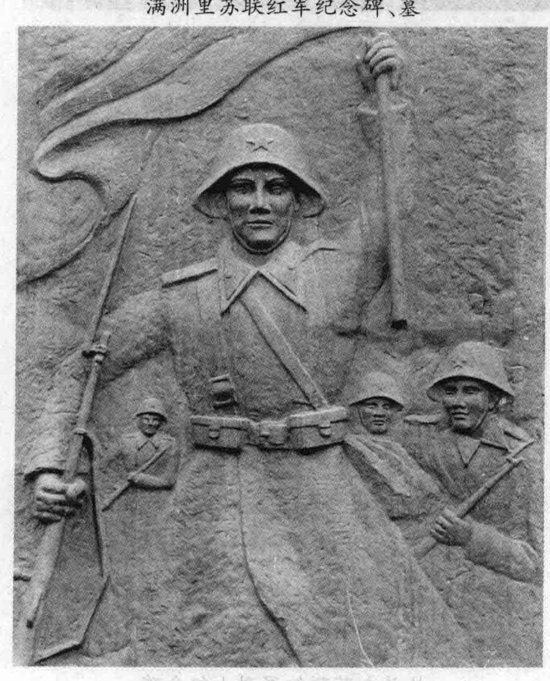
满洲里红军烈士公园大门



满洲里苏联红军纪念碑、墓



满洲里苏联红军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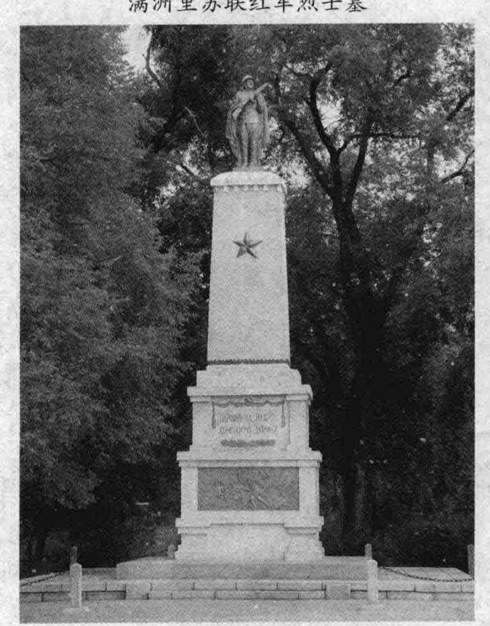
满洲里苏联红军纪念碑上的浮雕


满洲里苏联红军纪念碑上的浮雕


满洲里苏联红军烈士墓


满洲里苏联红军烈士墓


扎兰屯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全景


扎兰屯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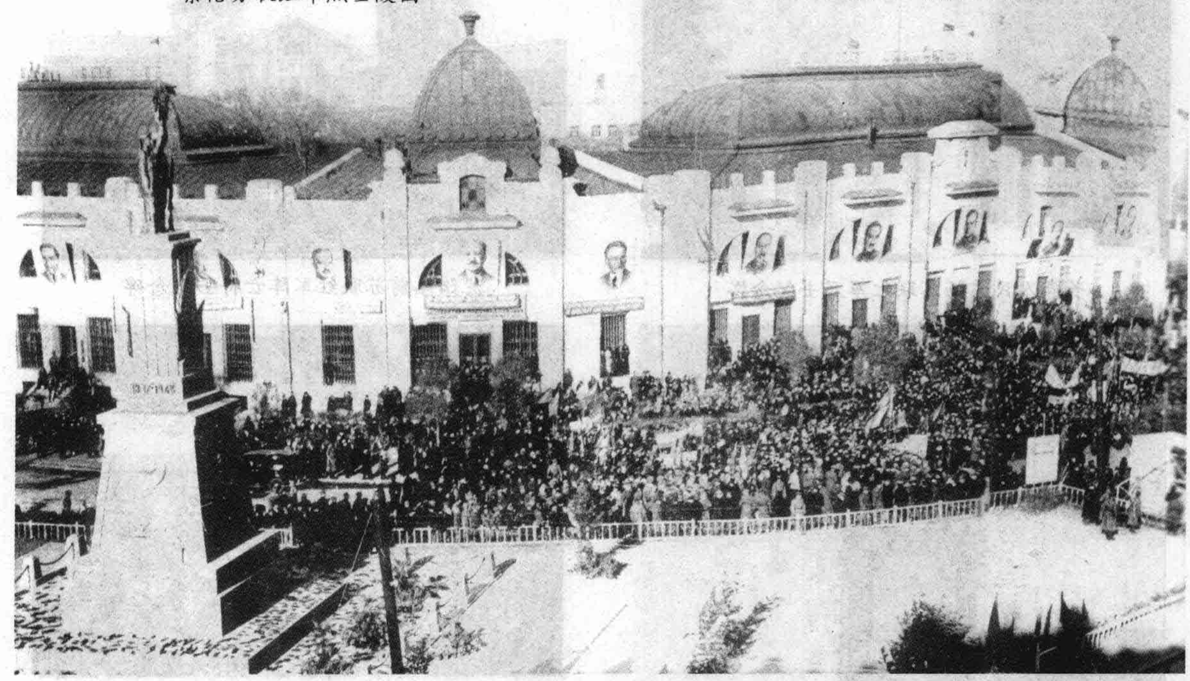

索伦苏联红军纪念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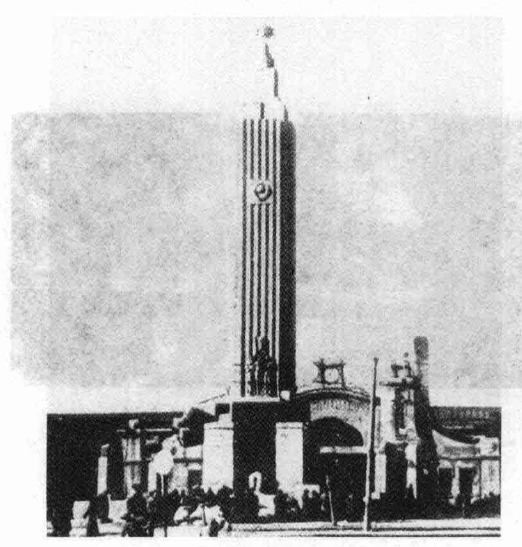
索伦苏联红军烈士陵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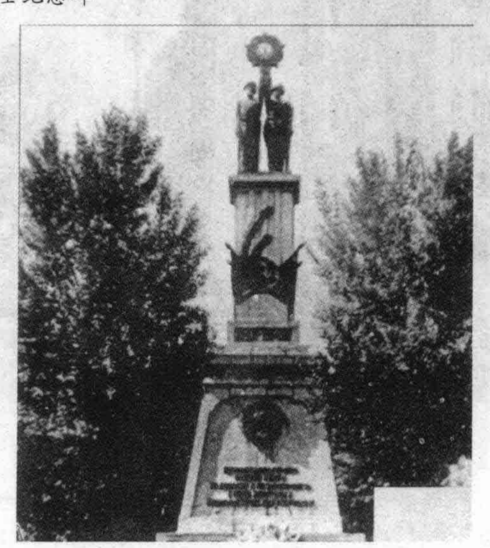
哈尔滨苏联红军烈士陵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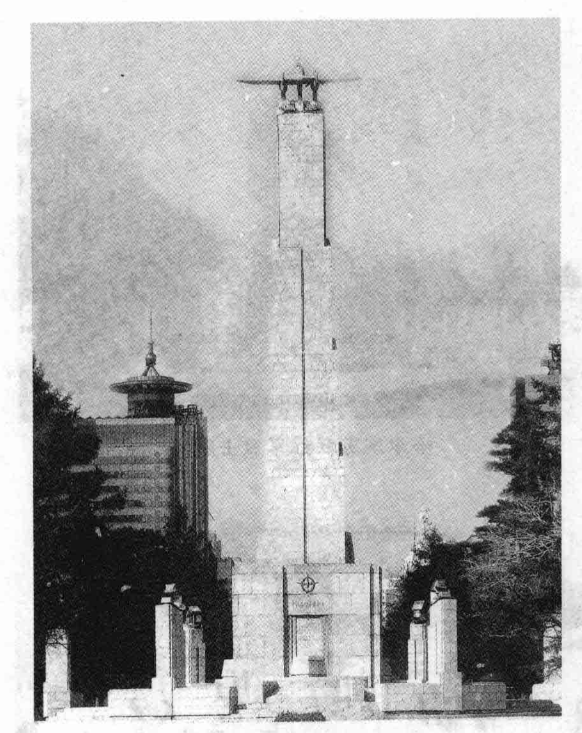
哈尔滨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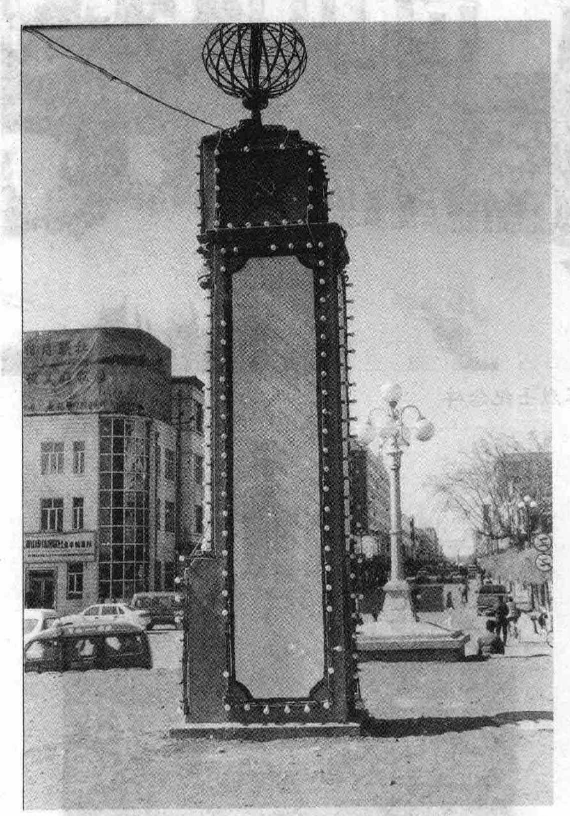
哈尔滨苏联红军英雄纪念碑



哈尔滨苏联英雄纪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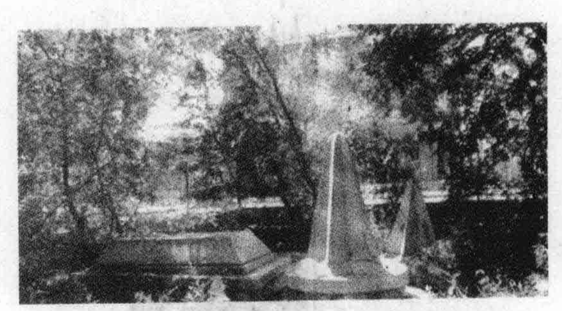

长春人民广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


沈阳站前苏联红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密山苏联红军烈士碑



黑河西岗子烈士墓


乌兰浩特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

黑龙江省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塔、墓情况表

位置	碑、塔	墓	备注
哈尔滨市火车站前	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纪念塔		失存
哈尔滨市东方剧场前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		
哈尔滨市西大直街	中苏共管长春铁路纪念塔		失存
哈尔滨市文化公园		苏军烈士墓	墓110盔,烈士人数不详
虎林市虎东山	苏联红军解放虎头纪念塔		
绥芬河市开长山西	苏联红军纪念碑		
林口县火车站前	苏军解放林口纪念碑		
东宁县三岔口西山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		
东宁县勋山	苏联英雄纪念碑		2004年由东宁移建
东宁县东宁镇	苏联红军回国纪念门		(现已拆除)
穆棱市东山		苏联红军烈士墓	墓1盔,失存
穆棱市穆棱矿区	苏联红军纪念碑		
穆棱市	苏联红军纪念碑		
密山市街中心	苏联红军纪念碑		
牡丹江市铁岭河镇	苏联坦克英雄碑		红军女烈士1人
牡丹江市铁山河镇	苏联红军无名烈士纪念碑		纪念烈士1人
牡丹江市北山公园	苏联红军烈士墓碑		
牡丹江市火车站前	苏联红军烈士墓碑		
牡丹江市南湖公园	苏联红军解放东北纪念塔		失存
佳木斯市西林公园	苏联红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纪念烈士35人
佳木斯市连江口镇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佳木斯市		苏军烈士墓	墓1盔
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苏军飞行员烈士纪念碑	苏军烈士陵园	纪念烈士126人;墓16盔,烈士126人
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		失存
黑河市王肃公园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		纪念烈士22人
鹤岗矿务局院内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孙吴县东郊25号公路桥畔	苏联红军坦克兵烈士纪念碑	苏军烈士墓	墓1盔
孙吴县站前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军烈士墓	纪念烈士70余人;墓9盔,烈士70人
抚远县西山	苏联海军英雄烈士纪念碑		纪念烈士27人
瑷珲区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军烈士墓	失存;墓3盔
瑷珲区西岗子镇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克山县西门外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军烈士墓	纪念烈士2人;墓2盔
五大连池市龙镇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军烈士墓	墓1盔
五大连池市城西南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军烈士墓	纪念烈士3人;墓3盔
宝清县城西门外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		失存
宝清县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军烈士墓	墓1盔
通河县城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军烈士墓	墓1盔

位　置	碑、塔	墓	备　注
方正县城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军烈士墓	纪念烈士4人
五常县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碑失存;墓5盔,失存
依兰县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军烈士墓	墓1盔,烈士9人
同江县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军烈士墓	墓1盔
绥宾县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军烈士墓	纪念烈士2人;墓1盔
勃利县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纪念烈士1人
安达市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纪念烈士1人
汤原县鹤立东站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富裕县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军烈士墓	墓9盔
北安市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纪念烈士6人
逊克县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军烈士墓	失存;墓1盔
富锦市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军烈士墓	墓1盔
鸡西市		苏军烈士墓	墓2盔,失存
阿城县		苏军烈士墓	墓2盔,失存
呼兰县南大营		苏军烈士墓	墓12盔,失存
集贤县		苏军烈士墓	墓1盔
尚志市		苏军烈士墓	墓1盔
萝北县		苏军烈士墓	墓2盔
延寿县		苏军烈士墓	墓1盔,烈士9人

吉林省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塔、墓情况表

位　置	碑、塔	墓	备　注
龙井市龙井镇	东北解放纪念塔		
图们市中心	东北解放纪念塔		
汪清县汪清镇	东北解放纪念塔		
汪清县罗子沟山上	东北解放纪念塔		
长春市人民广场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		纪念烈士14人
吉林市火车站前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		失存
通榆县瞻榆镇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军烈士墓	纪念烈士3人;墓7盔,烈士7人
通榆县开通镇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军烈士墓	纪念烈士3人;墓3盔,烈士3人
洮南市区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		
松原市宁江区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		纪念烈士2人
桦甸市欧梨沟		苏军烈士墓	墓2盔
珲春市桃源洞		苏军烈士墓	墓2盔
白城市洮北区		苏军烈士墓	墓16盔,烈士16人

辽宁省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塔、墓情况表

位　置	碑、塔	墓	备　注
大连市旅顺口区	中办友谊纪念塔、苏军胜利塔、旅顺解放塔、苏军烈士纪念塔	苏军烈士陵园	苏军烈士纪念塔烈士 2 030 人；墓 1 323 盔，纪念军人 1 408 人，家属 622 人。
沈阳市火车站前	苏联红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大连市金州区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	苏军烈士陵园	纪念烈士 634 人；墓 522 盔(含家属墓)
大连市甘井子区夏家河子		苏军烈士墓	墓 25 盔，失存
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		苏军烈士墓	墓 1 盔，失存
沈阳市于洪区		苏军烈士陵园	烈士 154 人
康平县关斌街		苏军烈士墓	墓 1 盔

内蒙古东部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塔、墓情况表

位　置	碑、塔	墓	备　注
乌兰浩特市内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	苏军烈士墓	纪念烈士 146 人；墓 4 盔，烈士 146 人
科右前旗索伦镇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	苏军烈士墓	纪念烈士 450 人；墓 18 盔，烈士 450 人
海拉尔区巴尔虎东路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	苏军烈士陵园	
海拉尔区小孤山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军烈士墓	纪念烈士 1 101 人；墓 24 盔，烈士 1 130 人
牙克石市头道街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塔		纪念烈士 42 人
满洲里市头道街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军烈士陵园	墓 6 盔
扎兰屯市吊桥公园内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军烈士墓	纪念烈士 5 人；墓 5 盔
鄂温克旗巴彦托海镇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军烈士墓	纪念烈士 6 人；墓 6 盔
额尔古纳市三河回族乡	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	苏军烈士墓	纪念烈士 12 人；墓 12 盔

第十八章　牺牲的苏联红军

苏联红军在进攻中国东北地区日军的战役中，共伤亡 3.2 万余人，其中伤 22 264 人，牺牲 1 万余人①。在攻克日军要塞的战斗中，东宁、海拉尔等要塞牺牲苏军官兵最多，都在 1 000 人以上，虎头、阿尔山、霍尔莫津、黑河、瑷珲、绥芬河等要塞都在 500 人左右。现将有记载的资料予以记述。②

第一节　攻克虎头要塞牺牲的苏军

在苏军进攻虎头要塞的战斗中，苏军共伤亡 2 000 余人，其中在苏联伊曼市苏军烈士陵园中有记录的牺牲官兵姓名者共 493 名，其中少校 1 名，大尉 2 名，上尉 10 名，中尉 20 名，少尉 11 名，上士 54 名，中

① 《1941～1945 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史》，第五卷。

② 本章记述的名单中，□为原文缺字，〈 〉内的字为正字。

士49名,下士49名,军士长7名,上等兵56名,列兵232名,无军衔2名。

少　校

巴达洛夫·尼·伊

大　尉

普罗塔索夫·乌·斯

普其岑·尼·勒

上　尉

巴楚拉·尼·阿

勃伦斯基·阿·莫

卡里格伊捷宁·乌·米

科里亚根·乌·乌

库尔甘斯基·伊·德

帕尔霍面柯·阿·斯

雷洛夫·阿·尼

萨甫谦柯·德·菲

茨甘柯夫·耶·德

舍金根·斯·阿

中　尉

阿尼基耶夫·乌·伊

巴什马柯夫·格·特

布斯金·尼·斯

瓦列耶夫·科·乌

瓦西里丘克·格·普

戈列罗夫·米·阿

格鲁宁·阿·伊

卡里宁·尼·尼

利普钱斯基·菲·特

米赫年柯·阿·莫

帕宁·伊·莫

皮卡洛夫·斯·亚

列里尤克·尼·尼

雷巴克·格·莫

雷柯甫斯基·阿·普

萨穆错夫·伊·伊

斯米尔诺夫·菲·普

沙嘎耶夫·阿·德

什利亚普尼柯夫

尤什柯夫·阿·科

少　尉

阿尔黑列耶夫·尼·普

巴克拉诺夫·伊·伊

扎乌拉仁·斯·耶

科列索夫·尔·阿

梅沙宁·特·乌

尼古拉耶夫·伊·尼

奥帕林·阿·阿

谢尔辛巴耶夫·勃·斯

沙波瓦洛夫·伊·阿

尤金·阿·特

云目阿柯夫·阿·伊

上　士

安得列耶夫·阿·科

阿尼卡舍夫·斯·德

阿尔罕格里斯基·尼·尼

阿什哈诺夫·格·伊

巴拉诺夫·伊·德

巴尔苏柯夫·菲·普

波贝里·特·伊

波格达什金·伊·斯

嘎尔马什·米·廉

嘎尔申·阿·伊

格鲁什柯夫·菲·菲

格列其什尼柯夫·米·尼

捷面丘克·斯·德

叶甫列莫夫·斯·乌

日格洛夫·米·普

扎维列夫·乌·□

伊万诺夫·伊·米

(女)　卡莉娜·阿·亚

科柯列夫·伊·伊

科萨列夫

科斯金·德·莫

库茨聂错夫·伊·勒

库里洛夫·特·阿

梅鲁阿·斯·斯

米霍维奇·尼·阿

莫托林

聂日鲁特钦柯·莫·乌

奥勃拉热伊·伊·尼

帕什柯夫·阿·伊

彼特罗夫·尼·菲

皮萨列甫斯基·普·尔

波诺马寥夫·乌·勒

普拉乌金·勒·尼

普罗霍连柯·格·伊

拉斯卡佐夫·乌·格

萨丘柯夫·普·科

斯基尔柯

斯捷布诺夫·科·耶

苏金·伊·阿

塔巴卡耶夫·菲·阿

塔巴奇尼柯夫·莫·斯

季霍诺夫·伊·阿

图皮钦·德·菲

乌萨谦柯·尼·伊

法乌捷耶夫·尔·尼

菲多索夫·耶·格

霍林·尼·格

霍勒根·阿·普

霍赫洛夫·伊·克

秦天仪

绍甫林·尼·普

舒宾·伊·莫

舍尔巴柯夫·阿·特

尤什柯夫·普·伊

中　士

阿巴库莫夫·耶·尼

巴拉诺夫·菲·普

别良采夫·阿·乌

别尔久金·尔·亚

布勒德斯柯·莫·菲

维叶列沙科·德·阿

维斯年柯·阿·阿

沃伦错夫·乌·柯

关洽连柯·德·尼

多罗什金·尼·菲

叶金·米·尼

叶果罗夫·伊·□

仁格里·阿·普

扎伊卡·伊·亚

扎维列夫·尼·□

季莫维奇·乌·伊
伊瓦先柯·阿·米
伊乌列夫·乌·阿
伊格纳托夫·米·伊
凯卡罗多夫·普·阿
卡里斯金
科留其尼柯夫·阿·阿
科洛梅耶茨·米·伊
科斯特尔金·耶·斯
科拉比维恩·伊·普
库尔马诺夫·勃·阿
库尔斯阔伊·尼·特
库切里亚维·伊·伊
库奇马·斯·□
列列特·尼·科
鲁克林·阿·普
柳比莫夫·伊·乌
波塔特夫·兹·伊
普延尼柯夫·乌·阿
桑达洛夫·菲·伊
萨乌拉·特·格
谢捷利尼柯夫·普·伊
希捷里尼柯夫·伊·伊
斯莫古诺夫·莫·菲
霍波托夫·格·亚
沙里克·伊·伊
什吉塔·莫·莫
舒瓦钦·莫·格
亚果金·德·莫
亚果金·尼·普
亚库什柯·尼·科
别捷里尼柯夫·莫·伊
别特连柯·阿·阿
谢希·莫·科

下 士

波贝列夫·米·伊
波恩达列夫·尼·斯
波亚尔斯基赫·伊·尼
布尔那柯夫·阿·乌
布尔米斯托夫
布谦柯夫·阿·乌
瓦日宁·阿·伊
嘎利亚莫夫·兹·格
盖拉斯金·乌·伊
捷维亚托夫
德米特罗夫·阿·□
叶列欣
叶列面柯·乌·格
叶罗奇金·阿·米
热阿里柯夫
儒尔巴
儒尔根·阿·格
扎采宾·伊·德
捷勒柯夫·伊·阿
斯谢列夫·尼·伊
科兹洛夫斯基·阿·乌
科裴特采夫·斯·普
科拉斯诺夫·伊·□
列米耶舍夫
马克扎诺夫·科·□
乌克西面柯·乌·伊
梅德维捷夫·乌·□
梅德维捷夫·特·耶
米钦·伊·□
米海洛夫·阿·科
莫伊谢耶夫
奥尔洛夫·乌·尼
别尔米诺夫·斯·伊
普拉沙得诺夫
普拉霍特牛克·阿·莫
波克拉申柯·莫·斯
列舍特尼亚克·尼·斯
罗金·普·莫
鲁布寥夫·普·伊
鲁利亚柯夫
萨甫罗诺夫·斯·阿
斯列普错夫·尼·普
斯米尔诺夫·普·乌
斯特里若克
塔谦柯
吉莫菲耶夫·斯·□
霍达特斯基
茨甘柯夫·阿·奥
舒瓦林·菲·阿

军士长

嘎因采夫·阿·斯
达尼洛夫·伊·特
季那都林·乌·格
马尔特年柯·普·莫
尼古拉耶夫·格·□
谢笛诺夫·科·莫
斯米尔诺夫·尼·尼

上等兵

毕里洛·尼·格
波罗金·阿·阿
勃罗夫金·乌·伊
瓦尔拉莫夫·普·阿
瓦西里耶夫·阿·拉
沃若夫·伊·伊
嘎勒金·阿·格
嘎雷什金·尼·阿
果勒波罗基科·德·德
格林柯·伊·菲
格尔申柯·菲·格
格里果里耶夫·米·伊
顿科夫·乌·□
久久金·米·菲
卡兹纳柯夫·乌·伊
卡里宁·尼·普
卡里宁·伊·米
卡舍瓦罗夫·斯·耶
科里莫契金·乌·斯
科洛契柯夫·乌·伊
科兹里钦·乌·特
科诺年柯·阿·伊
科鲁果维赫·阿·特
柳比莫夫·伊·斯
马里采夫·斯·斯
米黑耶夫·伊·菲
莫洛黑恩·伊·乌
莫其亚根·莫·菲
穆尔金·乌·乌
穆采特·乌·科
那果尔诺夫·德·伊
奴尔米罕巴托夫
帕伊维恩·伊·尼

帕诺夫·伊·乌
彼特罗夫·伊·莫
罗曼诺夫·斯·阿
萨甫罗诺夫·乌·斯
谢列兹涅夫·科·阿
谢里亚维恩
索罗金·阿·乌
特聂奇内·阿·尼
乌钦·阿·尼
菲里波夫·普·菲
福罗洛夫·阿·伊
哈比布林·阿·□
哈必布·乌·阿
茨谦柯·德·□
切钦·勒·斯
沙拉霍夫·科·莫
舍别列夫·菲·尼
什柯里内·伊·普
什洛帕克·普·格
什特嘎舍夫·乌·特
什特嘎诺夫·乌·特
舍尔巴柯夫·斯·特
亚雷金·阿·伊

列 兵

阿勃拉莫夫·特·弗
阿勃罗希金·阿·阿
阿库林·勃·阿
阿廖诺夫·尼·科
亚历山大罗夫·乌·□
阿廖什金·亚·科
安得列耶夫·格·阿
阿尼基耶夫·伊·德
安托诺夫·尼·阿
安托诺夫·普·阿
阿尔扎马斯基·乌·□
阿发那希耶夫·伊·普
阿列斯金·菲·伊
巴巴什金·乌·伊
巴丹丘克·乌·科
巴洛夫·阿·莫
巴拉诺夫·斯·伊
巴斯雷柯·格·莫

别德尼亚柯夫·菲·科
别林斯基·特·阿
别雷·普·斯
别列亚耶夫·乌·乌
别尔久金·尼·尼
别列佐夫斯基·乌·乌
波恩达列夫斯基·乌·伊
勃列斯托夫
勃罗甫柯·米·伊
布卡·伊·米
布尔柯夫
瓦列尼柯·普·阿
瓦西里丘克·阿·德
维叶捷宁·乌·伊
维叶列尤金·德·科
沃多皮亚诺夫·菲·格
沃罗热伊金·乌·斯
乌拉吉米罗夫·格·乌
乌拉登错夫·阿·菲
维斯鲁波夫·普·米
嘎乌里洛夫·乌·尼
戈尔巴乔夫·伊·耶
戈尔巴乔夫·斯·奥
果尔什柯夫·伊·普
戈拉得尼耶夫
格列布聂夫·尔·乌
格里沙耶夫·尼·乌
格里果里耶夫·伊·米
古巴里·斯·伊
古巴里
达尼洛夫·乌·伊
捷恩谦柯·伊·普
捷里亚宾·伊·阿
多维多夫·伊·乌
得多夫·尼·奥
耶乌列甫斯基·尔·阿
叶甫谢甫耶夫
叶甫修金·伊·阿
叶斯巴洛夫·耶·伊
叶菲面柯·米·□
日古纳耶夫·耶·斯
扎伊卡

扎留吉诺夫·尔·格
捷恩根·特·伊
伊万诺夫·菲·伊
伊万诺维奇·尼·斯
伊德里索夫·科·什
伊日布拉托夫·赫·□
伊久木斯基·阿·乌
卡得罗夫·勒·尼
卡扎柯夫·尼·米
卡里斯金
卡拉西·米·米
卡拉谢夫·乌·伊
卡拉柯佐夫·阿·乌
卡尔平斯基·阿·伊
卡尔波夫·普·阿
卡尔波夫·乌·格
卡希莫夫·特·□
科伊别列夫·菲·乌
科伊列耶夫·尼·乌
基里洛夫·尼·伊
基斯利岑·伊·米
祁丰·普·乌
祁冶诺夫·阿·菲
克里莫夫·乌·伊
科留斯·乌·科
科金·尼·特
科兹洛夫·尼·伊
科兹洛夫
科兹洛夫·斯·乌
科洛斯柯夫·伊·科
科勒托奇欣·普·米
科内申·伊·亚
科勒钦·阿·勒
科马罗夫·伊·莫
科木列耶夫·莫·阿
科尔久克·乌·莫
科罗维恩·阿·伊
科斯久柯夫·斯·普
科切达什维里·普·□
科拉甫钦克·勒·格
科拉维耶茨·阿·普
库兹米切夫·德·菲

库列舍夫·阿·莫
库拉耶夫·阿·阿
库尔巴托夫·阿·特
库尔达耶夫·阿·普
库尔卡洛夫·伊·亚
库什聂尔·阿·亚
拉瓦利·乌·普
拉得根·伊·莫
列别金斯基·阿·阿
列甫谦克·尼·阿
列修柯夫·莫·伊
利欣·伊·阿
利特维诺夫·阿·耶
鲁赫钦·阿·普
马约罗夫·尼·德
马里诺夫·乌·普
马斯拉柯夫·尼·伊
马舒其柯夫·莫·斯
梅德维德斯基·特·伊
梅钦·乌·菲
梅列什尼柯
梅赫那耶夫·普·乌
米里尼钦柯·斯·乌
米尼木林·赫·莫
米特里亚什金·莫·特
米黑耶夫·伊·斯
米基林·伊·格
莫洛菲耶夫·科·莫
莫罗佐夫·亚·菲
穆拉伊钦·伊·科
那果维茨恩·阿·伊
那索诺夫
聂克拉索夫·阿·菲
聂克拉索夫·德·特
聂马舍甫斯基·勃·阿
尼基钦·阿·德
诺沃肖洛夫·阿·科
诺沃肖洛夫·阿·普
诺沃谢里采夫·特·乌
奥古尔采夫·乌·乌
帕乌洛夫·尼·赫
帕勒根·普·乌

潘根·乌·伊
潘丘黑恩·勒·尼
帕尔洽伊肯·普·特
帕尔菲诺夫
帕霍莫夫·阿·格
别尔米金·伊·科
别罗夫·耶·德
别特里克·阿·普
裴西克·普·乌
普利萨克·斯·菲
普拉嘎特寥夫·乌·尔
波别坚斯基·伊·菲
波特都布内·乌·菲
波列亚柯夫·斯·阿
波诺马寥夫·亚·伊
波波夫·斯·伊
波波夫·阿·伊
波索霍夫·伊·克
波斯托勒·莫·乌
波塔特夫·乌·斯
普里马索夫·菲·菲
普雷什金·乌·德
普罗霍罗夫·乌·特
拉得日瓦耶夫·阿·伊
拉兹沃道夫·尤·乌
罗果里·科·德
罗什柯夫·米·伊
罗留克·菲·伊
罗西斯基·伊·□
萨维奇·斯·伊
萨沃斯钦·莫·莫
萨穆伊洛夫·伊·耶
斯维奇尼柯夫·普·伊
斯维里道夫·尼·莫
谢笛诺夫·斯·格
谢尔盖耶夫·阿·科
斯索夫·乌·伊
希乌什金·格·莫
希多罗夫
希马诺夫·乌·伊
希尼亚柯夫·伊·格
希连柯·阿·格

斯莫特罗夫·乌·科
索柯洛夫·莫·菲
索洛维约夫·阿·德
索勒达特金·勒·乌
索洛坚柯·乌·伊
索普罗莫德沃·阿·特
索罗金·普·乌
斯塔罗维罗夫·阿·勃
斯捷边柯夫·莫·普
斯捷帕谦柯·德·勒
苏勒塔诺夫·科·莫
塔巴诺夫·尼·莫
塔面谦柯
塔列夫·斯·乌
塔什特帕诺夫·阿·斯
捷尔诺维特·科·斯
季莫申柯·阿·伊
季申柯·乌·普
特里古勃夫·斯·□
特里什金·乌·伊
特罗菲莫夫·阿·莫
特罗申
图卡吉诺夫·斯·□
乌嘎林·格·格
乌拉诺夫·伊·菲
乌霍比托夫·斯·乌
菲洛诺夫
佛金·尼·普
黑斯马都林·阿·莫
霍德谦柯·尼·亚
霍特聂克·德·菲
赫拉布雷赫·乌·伊
赫里亚亚宁·德·莫
查尔果罗特采夫·阿·耶
茨布佐夫·亚·耶
切库诺夫·尼·莫
切斯诺柯夫·阿·普
契尔柯夫·莫·乌
沙拉波夫·伊·斯
什亚诺夫·尼·乌
绍黑恩·伊·阿
什帕尔托夫·莫·斯

舒拉耶夫·莫·阿
尤金
亚古金·耶·阿
亚基莫夫·阿·普
无军衔
班金·尼·科
沃勒柯夫·阿·普

第二节　攻克海拉尔要塞牺牲的苏军

在苏军攻克海拉尔要塞的战斗中，共牺牲苏军官兵1 101人。

在苏联红军烈士陵园的烈士名单有21名，包括在小孤山烈士墓园的1101名之内。其中最高军衔的布什卡了夫·尼·伊在小孤山烈士墓上雕刻在墓碑上的是“中校”，在巴尔虎东路烈士陵园中雕刻的是“上校”，应为同一人，是战后追授的军衔。

海拉尔区巴尔虎东路苏联红军烈士陵园烈士名单

陵园中有苏军官兵21人名单，其中上校1名，少校1名，大尉3名，上尉3名，中尉5名，准尉2名，上士1名，中士1名，下士1名，战士3名，共计21名。

上　校
布什卡了夫·尼·伊
少　校
别斯克洛吾内·克·亚
大　尉
鲁奇宁·沃·伊
斯洛月次·阿·斜
吴迪洛夫·斜·别
上　尉
别洛保洛吉考·阿·德
布雷列夫·米·子
米少夫·阿·格
中　尉
班杜列斯特·亚·别
包勒得了夫·迪·瓦
库列少夫·尼·扎
子也列宁·别·也
结米道夫·阿·阿
准　尉
高洛结也夫·别·特
达尼洛夫·克·斜
上　士
卡扎考夫·别·佛
中　士
加米道维奇·尼·尼
下　士
顾查穷·伊·伊
战　士
沃斯克列斜尼斯给·阿·斜
考英果尔□夫·尼·别
克□□果夫·沃·伊

海拉尔建设办事小孤山苏联红军烈士墓名单

小孤山苏联红军烈士墓园墓碑上刻有1 101名苏军官兵名单，其中中校1名，少校1名，大尉9名，上尉25名，中尉42名，少尉35名，准尉27名，上士88名，中士129名，下士108名，上等兵75名，战士562名。

中　校
布什卡了夫·尼·伊
少　校
别斯克洛吾内·克·亚
大　尉
米得月诺夫·瓦·米
比古佐夫·阿·伊
杜鲁巴果夫·别·格吉
斯洛月次·阿·斜
给利劳夫·依·非
保劳维考夫·阿·伊
吴迪洛夫·斜·别
鲁奇宁·沃·伊
别列日尔达也夫·拉·斜
上　尉
□足木内·□·抗
哈劳利斯给·斜·伊
考热吾尼果夫·格·阿
沙非〈津〉·也·斜
叶宁·伊·阿
波别夫·阿·别
卡扎前考·尼·阿
亚洛斯拉吾侧夫·斜·非
达拉索夫·拉·伊
次月特考夫·阿·斜
堪考夫·阿·别
何利斯金·非·迪
尼给全·阿
迪半提利也夫·别·伊
尼考拉也夫·拉·斯
吴瓦洛大·瓦·依
别德林·瓦·阿
高高列夫·阿·瓦
沃依诺夫·米·尼
别洛保洛吉考·阿·德
给达也夫·克·米
瓦诺夫·非·伊
安道诺夫·尼·伊
沙早诺夫·米·瓦
伊子尤木前考·米·尼
中　尉
拉扎了夫·尼·克

斯米尔诺夫·格·伊
喜左夫·伊·尼
沙利尼果夫·伊·非
□和·伊·尼
鲁卡诺夫·瓦·依
结尼斯前考·非·伊
扎结洛·沃·伊
别洛格鲁多夫·尼·斜
亚诺福斯给·伊
给巴尔舍·格·阿
盖杜考夫·沃·非
给尼斯其考夫·尼·伊
子也牛克·斜·沃
灭叶给诺夫·沃·米
查列夫·尼·阿
扎木子也劳夫·斜·阿
克拉亚利尼考夫·斜·伊
格拉特考夫·阿·尼
结米道夫·阿·阿
巴祥杜也夫·尼·米
克留伊考夫·伊·斜
罗马诺夫·伊·斜
沙亚毫夫·阿·非
道劳宁·克·伊
格列也尼果夫·沃·格
租保夫·阿·沃
保勒得了夫·迪·瓦
罗满侧夫·伊·米
尼给佛洛天·沃·也
阿和沃道夫·达
班杜列斯特·亚·别
子勒哈劳夫·□
保伊考·尼·依
别尔米诺夫·保·伊
子也列宁·别·也
沙提舍夫·伊·亚
道尔毛扎考夫·尼·瓦
祖也夫·迪·格
库列少夫·尼·扎
史且得林·伊·阿
毛斯克维舍·斯·阿

少　尉

热阿尔考夫·非·伊
索洛道吾尼克·伊·克
布洛很·阿·也
秋巴果夫·格·伊
提道夫·伊·沃
斯巴诺夫·沃·克
贺列布尼果夫·阿·斜
沃利尼前考·尼·子
敖得利侧夫·别·阿
克拉斯诺利也夫·格·斜
巴布肯·伊·非
伊巴道夫·沃·别
马新考·米·伊
再考夫·非·克
伊古木诺夫·伊·沃
库德俩少夫·伊·米
史留少夫·斜·别
拉林·阿·拉
毛克劳夫·伊·亚
索别根·伊·格
色达林·伊
非道洛夫·沃·拉
宽得拉申·伊·吉
结木前考·沃·非
格利巴诺夫·伊·斜
雷考夫·吉·伊
上嘎劳夫·阿·茨
斜尔丢考夫·伊·亚
卡尔达少夫·沃·伊
斜尔格也夫·尼·米
沃得日结夫·沃·伊
列敖尼结夫·阿·米
甫什铁因·斜·米
罗木雷诺夫·别·沃
伊万草夫·尼·别

准　尉

飞洛诺夫·斜·伊
布拉肯·伊·伊
那给彬·依·格
古林·伊·斜
占肯·阿·伊
道布雷宁·尼·也
喜道洛夫·伊·非
别特连考·伊·沃
盖达劳夫·非·米
伊斯宽迪洛夫·米·罗
尼哈金·非·伊
□利根·阿·伊
米海洛夫·沃·瓦
里提文采夫·阿·伊
保利先考·伊·尼
沃利考夫·米·吾
布尔拉克·别·沃
考利尼前考·斯·伊
再采夫·瓦·伊
考斯塔了夫·格·尼
如伊莫夫·阿·米
道劳好夫·沃·亚
也米火夫·阿·迪
非利诺夫·斯·伊
福奴杜索夫·斜·阿
敖扫肯·阿·斯
喜尼涅·斜·沃

上　士

嘎俩嘎·米·别
特拉别子尼
考夫·斜·非
达尔怕□夫·米·米
胡斯□特金诺夫·沙
哈达□夫·沃·格
阿列福也夫·拉·米
卡塔马也夫·米·也
也洛非也夫·阿·伊
波保夫·伊·别
库连考夫·阿·拉
库尔巴道夫·尼·非
伊沙也夫·斜·别
考劳索夫·斜·沃
列敖尼吉也夫·格·格
阿尼亚莫夫·伊·阿
沃利高夫·沃·阿
保利索夫·沃·克
特劳非肯·米·瓦
□子合·克·别

非道洛夫·别·尼
卡尔达留克·斜·尼
沙木索诺夫·伊·伊
沙木斜夫·拉·伊
斯毛林·伊·非
别吾左夫·尼·非
保尔哈道夫·尼·亚
高列洛夫·尼·伊
结尼·米·迪
考斯捏了夫·阿·别
安德利牙尼且夫·阿·沃
斯达诺沃夫·沃·伊
□鲁德诺夫·别·沃
道米果夫·伊·迪
尤尔卡索夫·伊·科
别洛夫·格·尼
日哈了夫·沃·阿
卡列依哈·阿·别
沃拉先考·斜·别
哈斯利层·扎·尼
尼库林·尼·阿
别〈穷〉吾索夫·阿·别
特劳什琴·沃·斜
舍福肯·格·别
巴达图·米·亚
布言肯·别·阿
杜鲁法诺夫·别·沃
罗马诺夫·米·克
阿佛品·尼·斜
别洛夫·阿·非
巴肯·伊·阿
高洛什很·尼·阿
也沃利牙诺夫·阿·斜
库斯道夫·米·斜
考列斯尼考夫·阿·伊
米海洛夫·格·阿
米拉少夫·阿·阿
诺〈结〉考夫·斜·非
敖吾次诺夫·迪·斜
甫拉道诺夫·尼·阿
(鲁)电考·非·阿
斯米尼米□·吉·非〈果〉

汉诺夫·尼·哈
佛民诺夫·沃·克
波保夫·斜·沃
考劳〈因〉考夫·拉·非
嘎里福林·亚·□
早劳达列夫·非·米
道米劳夫·伊·迪
库任·伏·吾

中士

贝尔考夫·依·吉
史且格洛夫·格·阿
格劳申·尼·吉
舍书考夫·斜·阿
甫洛申·克·非
斯维亚道夫·非·吉
道布劳美斯洛夫·别·瓦
保舍诺夫·非·尼
考且道夫·米·格
雷布肯·阿·依
吴苏巴也夫·比
米金·格·别
巴雷舍夫·阿·非
贺拉莫夫·尼·斜
斯米尔诺夫·伊·沃
瓦西里也夫·米·克
且米亚肯·米·吉
结米特鲁克·伊·克
布洛夫·伊·斜
喜尔道嘎列也夫·伊·
高尔什考夫·沃·瓦
马霄根·沃·米
别特申·瓦·阿
道尔嘎申·伊·尼
敖沙肯·迪·米
史洛给和·斜·拉
瓦尔佛劳灭也夫·格·沃
别吉诺夫·尼·格
喜道洛夫·亚·伊
瓦□波夫·米·子
月穷□衣·阿·阿
阿尔结灭也夫·格·阿
且尔维亚考夫·尼·阿

保〈贤〉提了夫·伊·伊
别克结米洛夫·迪
别特洛夫·阿·尼
马特月也夫·别·伊
马利果夫·塔·阿
卡迪洛夫·沃·克
也灭利牙诺夫·米·米
布提文·格·别
□尼·尼·非
潘□鲁中·伊·非
斯米尔诺夫·沃
扎哈诺夫·米·伊
别尔米牙果夫·沃·依
且列内□·阿·尼
也若夫·也·别
考布牙少夫·米
皮斯库诺夫·沃·伊
列舍道夫·沃·米
杜什考夫斯哈·格·非
卡诺夫·沃·阿
〈满〉德格·比·斜
且考道夫·沃·别
沙别牙肯·沃·比
喜道洛娃·巴·娃
卡丢任斯给·别·非
卡扎考夫·票·非
洛诺夫·别·瓦
热木斯给·伊·保
吴肯提肯·尼·沃
史金·格·克
劳伯特肯·尼·格
巴拉少夫·斜·格
吉毫诺夫·阿·罗
克利莫福·阿·斜
米劳夫·阿·拉
马斯洛夫·沃·别
福连见吉什特因·保·别
给斜了夫·阿·别
啥俩·别·别
结米道维奇·尼·尼
〈嘎〉迪米由克·尼·斜
沃劳什劳夫·迪·斜

日列什洛夫·沃·尼
保思达列次·格·申
里毫也夫·斜·列
丹嘎诺夫·米·伊
格拉西莫夫·克·吉
巴库洛夫·米·别
阿列克斜也夫·非·迪
宽斯且诺夫·伊·斜
瓦尔达也夫·尼·斜
子达卡早夫·阿·非
卡扎尼侧夫·别·瓦
别列瓦洛夫·克·伊
那拉巴尔金·伊·米
穆拉道夫·尼
斯米尔诺夫·阿·伊
非道劳夫·伊·格
迪米特洛夫·米·米
也吾斜也夫·伊·亚
伊瓦什考·尼·斜
别林斯给·伊·吉
波鲁艾克道夫·沃·米
斜了得肯·亚·伊
史库洛夫·尼□考
劳文·克·阿
斯达诺沃夫·沃·伊
高留诺夫·斜·尼
道劳甫侧夫·别·别
迪亚考夫·非·伊
尼苦列维·沃·尼
敖布好夫·票·瓦
别利琴·伊·别
也尔少夫·拉·斜
波诺马了夫·阿·沃
吉郝诺夫·拉·拉
伊古木诺夫·迪·斯
毛孔诺夫·尼·克
达尼洛夫·别·拉
伊沙考夫·票·米
库乐金·也·瓦
保其考夫·伊·阿
库斯道夫·非·伊
考卡林·阿·伊

嘎利波夫·米·哈
卡扎考夫·伊·阿
达舍也夫·保·迪
保利索夫·拉·米
伊格那夫考·伊·克
杜尔拉果夫·伊·别
布巴也夫·伊·别
考道夫·伊·别
再尼也夫·米
库那克巴也夫·克
斯别喜吾采夫·伊
嘎尔马也夫·奇·格

下士

也果洛夫·沃·也
□考夫·沃·迪
达拉索夫·米·非
史克□尔·非·也
鲍子尼果夫·米·迪
史什肯·亚·克
舍巴勒考夫·阿·依
李品斯给·伊·亚
秋金·伊·尼
黑利前考·克·非
伊拉林·米·格
阿那西也夫·阿·别
秋利果夫·阿·勒
俩尼·别·非
劳马什肯·□
达前考夫·阿·非
阿列克山得洛夫·阿·格
且尔内利·格·口
斜尔任考·斜·依
保日尼考夫·非·米
古查穷·伊·伊
敖克鲁根·格·别
嘎保夫·沃·非
别劳子要洛夫·格·斜
达尼林·尼·阿
也吾斯达福也夫·伊·也
甫涅夫·非·尼
克俩琴·伊·伊
纳吾莫夫·阿·斜

法提好夫·尼
克结林·米·伊
伊瓦诺夫·别·斜
哈非洛夫·迪·伊
考那瓦洛夫·阿·阿
舍列舍夫·非·吉
也日诺夫·阿·克
热烈维其·阿·米
鲁布草夫·米
迪牙前考·伊·别
潘前考·阿·瓦
甫连考夫·斜·吉
扎鲁彬·阿·尼
鲁扎诺夫·伊·沃
斯达利其肯·尼·格
果瓦洛夫·瓦·伊
布利扎特伊·伊·别
扎哈洛夫·阿·也
米也□考左沃夫·克·尼
考尼前考·别·米
古谢夫·尼·别
瓦尔〈费〉佛洛灭也夫·非·别
考劳特果夫·斜·克
史月次·阿·尼
巴利秋高夫·别·别
诺维新斯给·沃·敖
沙莫依洛夫·沃·米
子月列夫·尼·别
高俩其肯·斜·非
安特洛申考·别·吉
达巴考夫·克·沃
哈洛夫·米·沃
阿列克山得洛夫·伊·米
也米利祥诺夫·沃·阿
段斯考伊·别·也
别尔米亚考夫·伊·迪
拜奴给也夫·阿
夏尔金·伊·也
波保夫·伊·斜
木德留·沃·非
特利法诺夫·尼·米
达尼洛夫·非·阿

怕彬·伊·克
古突·米·伊
伊瓦诺夫·阿·也
沙拉毫夫·米·也
且尔年也夫·非·格
尤子田洛夫·斜·尼
伊瓦诺夫·瓦·米亚
得利很斯给·尼·尼
叶尔莫拉也夫·斜·斜
迪米提利也夫·阿
巴利苏诺夫·阿·尼
格拉迪考夫·斜·迪
考福道因考·沃·尼
郝秋面·尼·斜
甫尔前考夫·非·非
莫恰洛夫·别·别
吴啥果夫·伊·斜
茹尔芭·尼·伊
史且尔巴果夫·米·沃
沃史考福斯给·米·别
秋古洛夫·阿·阿
巴尔杜也夫·沃·斜
亚书特肯·别·拉
巴拉肯·别·亚
也劳非也夫·阿·伊
拉劳其肯·尼·别
纳吾莫夫·阿·别
别斜得诺夫·阿·伊
安道纳夫·别·格
保达诺夫·阿·尼
索巴什纪果夫·格·迪
喜到劳夫·斜·拉
结列吾草夫·米·别
德劳子得考夫·米·伊
那尔秋克·非
斯特列利尼果夫·斜·尼
史劳诺索夫·阿·沃

近卫军上等兵

库利克·米·克
怕利其果夫·迪·伊
别特洛夫·格·米
马克洛食夫·伊·伊
也吾道给莫夫·非·阿
卡拉什尼果夫·迪·保
阿列直斜也夫·斯·斯
米给了夫·阿·伊
别特洛夫·沃·亚
吴巴马索夫·米·别
卡给林·别·伊
喜道劳夫·斯·格
巴克雷考夫·别·伊
列文斯给·斯·别
敖布火夫·阿·米
秋沙果夫·阿
吴利言诺夫·阿·阿

上等兵

拉林·米·沃
阿合米特嘎列也夫·尼·斜
保斯达列夫·非·尼
迪米提力也夫·米·亚
库甫列牙诺夫·伊·尼
米那也夫·别·米
马卡洛夫·阿·米
斜良肯·米·伊·
舒利莫夫·伊·伊
波保·斜·米
别特洛夫·阿·也
扎布洛夫·尼·也
列别结夫·阿·阿
安道诺夫·保·尼
敖吾金·尼·伊
考诺别也夫·格·斜
巴和瓦劳夫·别·瓦
布拉日考夫·尼·尼
迪利穆哈米道夫·沃
史且巴勒考夫·保·布
达也夫·迪·阿
马拉非也夫·非·伊
马斯考了夫·伊·非
诺维考夫·别·阿
巴彬·吉·迪
沃尔根诺夫·沃·沃
斯皮利道诺夫·伊·别
亚考远考·斜·伊
苏沙诺夫·伊·西
斯结列好夫·格·斜
且列木内和·保·伊
鲁和劳夫·格·非
卡甫斯金·阿·保
阿伊利莫夫·克·阿
沃洛布约夫·沃·尼
也利斜也夫·阿·克
再侧夫·沃·尼
库子涅草夫·伊·非
库子涅草夫·沃·非
米亚斯尼考夫·克·非
保比果夫·米·伊
波洛提尼果夫·沃·格
甫劳考皮也夫·也·子
索特尼果夫·阿·尼
吾哈考夫·米·伊
非敖年道夫·阿·尼
哈依列索夫·尼·哈
且列才内和·尼·伊
且别了夫·格·斜
安道诺夫·巴
吉道夫·伊·格
库子尼·也·阿
穆拉少夫·阿·吉
沙佛诺夫·格·阿
查列夫·别·米
沙伊特嘎利也夫·克·斜
给利洛夫·保·米
卡斯库诺夫·票·米
阿嘎波夫·尼·伊
史且提尼考夫·非·阿
阿嘎佛诺夫·阿·斯
布利巴·沃·别
库尔巴诺夭·瓦·格
如尔肯·也·瓦
卡甫斯金·票·票
卡琴·非·米
鲁西诺夫·别·伊
沃洛布约夫·阿·伊
道勒斯提合·伊·别
拜占·阿·米

高尔迪因考·迪·非
斯皮林·尼·克
郝东生·格·尼
吴斯父热宁·格·阿
布伊洛夫·保·瓦

战　士

伊瓦诺夫·尼·格
伊瓦诺夫·格·佛
安道诺夫·尼·别
米德月诺夫·阿·别
保巴留肯·米·勒
斯□丹肯·□·哈
阿列克申斯给·依·米
马念考·伊·阿
嘎列莫夫·格·格
杜洛夫·别·德
布兰考夫·阿·阿
道尔根侧夫·也·伊
苏洛电肯·阿·也
杜□也夫·德·亚
也勒申·伊·伊
也佛什肯·阿·依
哈利福林·色·非
非拉特肯·阿·米
那日彬·伊·格
米就申·依·非
扎鲁彬·依·非
菲道洛夫·阿·里
库尔□巴也夫·阿
哈皮洛夫·色·巴
巴尔沙也夫·沃·格
巴什卡道夫·瓦·阿
马列吾且夫·阿·尼
巴尔马特诺夫·□·瓦
菲道洛夫·□·阿
法申·克·别
菲道托夫·尼·也
哈拉波伸牙诺夫·斜·阿
德劳子道夫·尼·尼
结了德·瓦·伊
丽什索夫·别·阿·
甫洛牛巨夫·别·也

巴甫舍夫·格·哈
杜德□·沃·沃
杜尔诺夫·阿·格
马毛格巴也夫·巴
甫列依马克·米·迪
舍列夫·德·也
亚马也夫·斜·别
□拉扎诺夫·沃·沃
嘎利亚洛夫·伊
库甫利牙诺夫·伊·阿
敖考洛考夫·阿·尼
马林·依·非
达劳根·斜·阿
列敖诺夫克·尼
瓦斜也夫·阿·也
且尔卡申·米
阿维洛夫·非·非
结列结也夫·尼·也
非利莫诺夫·伊·阿
再侧夫·阿·亚
道勒高洛夫·沃·伊
达利波夫·米·格
列敖诺夫·拉·沃
卡俩肯·阿·也
马雷和·阿·伊
阿库洛夫·尼·斜
别特洛夫·克·拉
也□利牙诺夫·沃·谢
卡尔品考·阿·伊
且斯尼前考·伊·阿
苏毫卜依·尼·斜
比利达也夫·格·米
也沃利牙诺夫·伊·米
考勒巴沙·依·别
□尼考夫·格·米
瓦什前考·尼·别
劳保夫·非·阿
喜西莫夫·尼·伊
马克劳波洛夫·沃·格
巴吾洛夫·尼·依
迪米提列维奇·别·非
尼马也夫·别

木利提巴也夫·巴·热
布雷且夫·阿·沃
波瓦俩也夫·尼·尼
哈木拉也夫·沙·哈
纳金·阿·斜
哈利福科·拉·哈
□保夫·沃·阿
沙瓦结也夫·格·非
安吉品·格·别
阿吾结也夫·米·沃
舒斯道夫·沃·尼
瓦利也夫·伊·阿
道吾斯加克·沃·亚
库子错夫·尼·非
考斯金·伊·别
瓦洛宁·阿·阿
伊什果夫·克·格
拉考夫·阿·斜
米就考夫·阿·阿
次布林·伊·阿
保格达诺夫·伊·伊
史灭了夫·别·伊
结鲁列考夫·沃·阿
马□□也夫·尼·非
福□劳夫·沃·迪
卡拉侨夫·米·阿
捏那舍夫·格·瓦
高斯结夫·格·别
给其林·阿·阿
巴好莫夫·尼·伊
保洛什前考·瓦·依
吴得拉吉也夫·□·米
就就尼克·伊·克
飞利波夫·伊·斜
喜给达·米·尼
布斯根·伊·格
阿连扎波夫·敖·拉
古鲁好福前考·阿·迪
苏利果诺夫·也达
尔日也夫·格·拉
喜布草夫·亚·别
米尼亚考夫·尼·格

道尔日也夫·拉·格
阿布拉毛央·尼·伊
沙福洛诺夫·非·罗
斯特洛也夫·克·阿
瓦西利也夫·格·沃
沙伯尔巴也维奇·尤·斜
杜鲁番诺夫·瓦·非
迪亚其考福给·阿·迪
奴□马哈诺夫·阿□
沙以特马哈诺夫·□
就考夫·别·伊
阿诺尔巴也夫·克
敖给且夫·米·克
索非吾洛夫·扎·格
亚给莫夫·尼·伊
扎考毛任·瓦·伊
马卡洛夫·伊·依
马就申考·阿·斜
哈和马利夫·亚·哈
巴索夫·尼·也
结民·别·伊
列斯尼前考·瓦·非
波沃很·米·非
聂非道夫·尼·阿
库维亚洛夫·米·伊
斯尼亚特考夫·沃·米
舍哈布舍诺夫·扎·非
扎别林·别·伊
列干特·瓦·伊
卜肯·别·和
哈拉波夫·米·迪
沃洛诺夫·伊·斜
卡道什尼果夫·伊·尼
苏尔且诺夫·克
扎给洛夫·格·扎
别劳布洛道夫·沃·尼
布劳哈·尼·阿
道劳维和·沃·沃
沙考夫·尼·克
阿松嘎也夫·非·哈
考诺申考·米·别
阿诺什肯·米·阿

穆新·尼·米
道尔热也夫·迪·罗
足也夫·尼·沃
沃勒考夫·沃·尼
吴斯果夫·阿·非
吴金·另·迪
哈米·沃·伊
考子劳夫·阿·别
莫甫斜夫·阿·伊
那杜林·别·也
索劳肯·尼·阿
索斯宁·米·沃
沙哈洛夫·尼·米
高劳远考·伊·别
结聂舍夫·也·斜
甫拉斯牛克·尼·伊
史世肯·别·斜
巴杜林·别·阿
啥尔杜洛夫·尼·尼
伦哈果夫·米·斜
吉道夫·沃·非
拉吴林结夫·沃·别
嘎利莫夫·扎·敖
扎鲁彬·尼·克
给斜了夫·沃·米
特拉福肯·伊·也
库特·沃·米
巴好莫夫·别·伊
斯洛瓦特斯给·斜·尼
鲁布宁·别·也
巴木巴洛夫·巴·阿
沙道保夫·别·克
沙利考夫·瓦·别
斯卡诺·米
索洛吾药夫·斜·格
史日草夫·别·阿
阿日尔肯·沃·非
瓦西利也夫·尼·非
日林·克·别
啥和马尔道夫·伊·非
别斯结列道夫·德
列表很·保·非

阿道里申·克·尼
别俩也夫·尼·尼
保留舍得沃尔斯给·阿·米
阿杜沃也夫·也·阿
阿布迪好迪拉·保
保不达考夫·拉·伊
瓦西利也夫·尼·沃
古沙果夫·克·伊
格利高利也夫·别·非
道勒嘎诺索夫·阿·伊
迪亚考诺·伊·也
叶高劳夫·瓦·瓦
也非而考·阿·阿
茹其考夫·尼·伊
日尔考夫·格·阿
子也恩考夫·阿·也
扎列波夫·伊·也
伊瓦诺夫·米·沃
库茨波夫·沃·斜
考尔尼劳夫·伊·克
考子劳吾斯给·伊·尼
穆金·阿·米
奈胶诺夫·伊·米
纳得米道夫·格·伊
敖维诺夫·迪·阿
波利史秋果夫·也·别
甫洛考皮也夫·别·别
保波夫·别·伊
怕吾洛夫·尼·阿
鲁沙考吾斯给·伊·别
索劳肯·格·伊
斯拉斯提和·伊·格
苏沃洛夫·沃·亚
杜杜洛夫·克·别
史甫林·也·沃
舒道夫·阿·也
阿尔日阿诺福期给·克·格
阿木给布亚肯·别·斜
吴哈考夫·也·迪
巴达也夫·阿
代尼果夫·格·拉
波俩考夫·沃·阿

波得日结夫·阿
考诺诺夫·拉·子
考日阿好夫·非·迪
列库劳夫·阿
考利也夫·子
伊万考维奇·别·伊
德加拉日茨·别·沃
嘎扎道夫·格
瓦拉维因·斜·迪
沃拉索夫·吉·米
布列得涅夫·米·斜□
甫雷特考夫·米·非
考维果夫·尼·非
道卡列夫·伊·亚
舒利热尼考·沃·非
阿诺索夫·伊·伊
古斜利尼果夫·非·吉
伊瓦诺夫·阿·尼
奴拉林·阿
波利斯给·克·米
斜苗诺夫·尼·尼
吴沙见考·瓦·格
别劳夫·伊·克
拉吾利申·沃·亚
古鲁好夫·迪·克
斜列得肯·别·阿
别特洛夫·阿·沃
子月了夫·沃·斜
库星·斜·□别
吴其果夫·迪·斜
别俩也夫·伊·阿
吴尔苏·别·格
也尔莫林·尼·伊
维诺格拉道夫·沃·别
列米舍福斯给·亚·阿
斯杜吊内·迪·伊
道里也夫·伊·阿
达达尼尔果夫·伊·阿
布吉克·沃·伊
考莫高尔采夫·伊·伊
恰班·米·格
米嘎也夫·伊·瓦

共司传果夫·克·斜
雷加很·沃·非
沃拉索夫·克·尼
阿斯杜也夫·拉·非
卡扎林诺夫·沃·阿
穆金·非·金
斜尔肯·伊·拉
吉道夫·米·非
杜列吾斯给·沃·非
吉好诺夫·瓦·斜
道勒马且夫·伊·格
吴斯肯别考夫·尤·吴
阿尔就很·伊·伊
依瓦诺夫·斯·吉
卡不洛夫·若·克
考瓦克福斯该·别·别
李斯考福·米·斜
列别结夫·阿·斯
尼卡诺劳夫·别·阿
巴尔风结夫·斯·别
道卡了夫·米·斜
杜尔克别考夫·卡
吾什马也夫·沃·米
秋林·米·阿
布拉根·米·沃
别俩肯·尼·伊
克利沃洛道夫·斯·伊
聂沃林·别·伊
斜苗诺夫·伊·格
且列木内和·尼·也
沙尔根·尼·非
考勒马达诺夫·米
诺维考夫·斜·别
道劳非也夫·尼·子
巴道列夫·伊·尼
沃连结夫·阿·别
扫持尼果夫·瓦·阿
喜甫考夫·别·伊
克利舍夫·斯·伊
舍列高夫·尼·格
斯克列甫尼果夫·伊·沃
保布考夫·米·沃

考木列夫·伊·阿
波劳瓦诺夫·阿·非
巴克拉诺夫·尼·伊
毛那别考夫·□·也
沙菲因·尼·伊
斯莫利果夫·尼·也
沙勒提果夫·阿·别
沙劳肯·格·伊
巴吾洛夫·尼·阿
哈不考夫·伊·米
阿列克山得洛夫·沃·瓦
啥达洛夫·非·格
也尔马考夫·米·米
马雷肯·别·非
舍沃道夫·瓦·保
卡哈洛夫·亚·瓦
波怕沃洛夫·尼·扎
奇怕拉也夫·阿·斯
考瓦连考·瓦·克
飞拉好夫·格·非
阿尼肯·伊·伊
达尼洛夫·格·瓦
别俩考夫·格·沃
茨□俩·瓦·也
巴热诺夫·米·尼
怕杜好夫·瓦·阿
波高列勒考·阿·阿
库利果夫·迪·迪
□考培道夫·尼·米
苏子达了夫·阿·米
西考吾了夫·迪·斯
甫路达劳夫·伊·别
达早夫·斯·斯
斯且前考·米·伊
列吾道夫·伊·伊
克俩沃早·沃·伊
古沙考夫·别·瓦
道勒沙诺夫·格
热阿林·瓦·迪
结尼索夫·迪·阿
波得亚布伦斯给·伊·阿
保恩达了夫·伊·斜

散尼考夫·伊·瓦
也拉根·阿·伊
格拉得舍夫·罗·阿
卡哈吾洛夫·伊·非
也尔少夫·米·亚
哈兰琴·阿
祖也夫·尼·伊
维索考斯·尼·米
杜斯纳沃也夫·克
索洛肯·尼·别
哈洛夫·□
子月列夫·伊·阿
列瓦少夫·阿·斜
□尔诺克·非·格
高雷舍夫·阿·斜
结列吾草夫·□
卡路根·别
迪考拉乔夫·米·阿
嘎吾留什肯·伊·斜
非林·迪·尼
再采夫·格·米
甫达林·沃·斯
敖利杜也夫·伊·尼
达勒马道夫·米·罗
嘎米肯·伊·阿
飞利波夫·非·尼
史马考全·伊·别
久俩果夫·阿·瓦
马卡洛夫·伊·阿
索劳吾约夫·敖·瓦
达为道夫·迪·别
别子·□
巴日尼马也夫·保
马利采夫·米·拉
别特洛夫·吉·尼
巴宁·斯·扎
瓦嘎诺夫·伊·非
道木斯给·瓦·尼
巴也夫·阿·斯
且格利根·斯·斯
尤什克为奇·阿·沃
哈给穆林·阿·胡

库早吾其考夫·伊·别
扎布洛金·伊·格
别子结涅日内·格·非
敖扫肯·尼·阿
安地品·阿·别
安吉皮也夫·米
帕拉莫诺夫·米·吉
子连考·米·阿
吾斯吉诺夫·非·亚
给亲·给·亚
斯克利甫尼前考·尼·吉
卡拉毛夫·亚
伊莉姻·伊·非
郝采也夫·斜·格
道培特夫·别·非
道劳非也夫·迪·伊
保乐道夫·斯·也
伊沃列夫·米·非
卡占侧夫·亚·沃
沙给杜林·阿·斯
粗甫利克·伊·阿
巴吉也夫·伊·尼
穆给莫道夫·尼
雷考夫·伊·瓦
□库洛夫·尼·阿
沙拉郝夫·克·非
甫劳特尼考夫·米·米
考斯因考·格·米
波俩考夫·沃·迪
苇路怕夫·阿·非
卡利诺夫·尼·斯
伊万尼果夫·伊·伊
舍斯达果夫·沃·阿
沃利尼果夫·别·洛
马卡日果夫·拉·扎
杜巴也夫·拉·保
沙文·阿·非
奴利也夫·何·何
给利前考·米·阿
皮也阿连考·米·非
道甫提舍夫·吉
伊瓦诺夫·瓦·保

保布达诺夫·沃·格
保高日也夫·子·别
班史且也夫·子·非
伊瓦诺夫·伊·斜
尼考拉也夫·亚·尼
结结林·瓦·阿
日尔胡申·伊·非
那扎洛夫·别·罗
别俩也夫·尼·瓦
结尼·沃·米
□□·米·阿
沃那达诺夫·保·别
马什尼果夫·迪·也
嘎勒肯·也·也
达拉斯肯·格·伊
甫洛提尼果夫·别·伊
沃劳吉考·阿·米
吴索夫·非·米
库子涅草夫·尼·伊
别列道米琴·拉·瓦
高劳得尼考夫·米·伊
米特列前考·阿·伊
劳巴乔夫·也·瓦
别特达诺夫·米·米
保高金斜·米
巴吾洛夫·别
拉和利草夫·别·格
喜道劳夫·伊·斯
飞留果夫·□
亚高洛夫·别·瓦
也列沃也夫·沃·瓦
阿早洛夫·阿·瓦
嘎林斯给·别·别
巴杜林·格·阿
巴克拉任考·迪·亚
马利克·格·别
皮样考夫·尼
马克毛夫·沃·伊
给利劳夫·□
结结林·别·别
阿公给洛夫·吉
也劳沃伊·米·格

阿尼西莫夫·别·尼
别列次给·米·瓦
伯利申·别·尼
保利诺夫·沃·米
保其卡了夫·别
边肯·沃·尼
格拉斯前考·阿·也
巴诺夫·别·格
考什卡了夫·保·非
别特洛夫·尼·沃
怕斯提宁·非·吾
别特连考·沃·格
敖其洛夫·保·米
班肯·沃·罗
米洛诺夫·别·也
阿斯卡洛夫·啥·格
马特哈诺夫·阿·尼
路巴牛克·拉·米
杜道夫·米·米
热木劳考夫·非·斜
李提文侧夫·别·阿
贺列诺夫·尼·伊
布什拉考夫·斜·非
沃系卡道夫·沃·也
伊吾利夫·沃·□
结连考·伊·非
汉西敖金诺夫·伊·保
马哈诺夫·别·伊
也尔少夫·尼·阿
穆斯且考夫·米
非加肯·□·□
考劳布考夫·米·伊
伊瓦诺夫·保·伊
嘎利次给·伊·非
马俩波夫·米·保
马劳毛夫·米·伊
德沃和列前斯给·沃·沃
道尔给和·伊·吉
考尔木什肯·米·非
路给内和·尼·迪
日尔高俩斯·尼·瓦
斜了德肯·米·伊
克留考夫·拉·阿
敖路布尼其内·伊·格
伊道为金·沃·阿
尼库里奇·伊·阿
特利佛诺夫·米·格
沃劳言考·米·罗
斯劳保加克·伊·阿
哈民·尼·伊
阿尔吉布亚肯·别
劳扎克·伊·米
道尔给和·□·□
阿克什也夫·□·□
卡尔波夫·□·□
列沃牛克·□·□
别子日尔和尼和·阿·伊
史日次·尼·伊
那吾莫夫·伊·非
哈兰达·米·米
诺沃斜利采夫·沃·格
考甫草夫·吉·非
班尼果夫·阿·阿
且尔卡索夫·格·斜

第三节　攻克满洲里牺牲的苏军

在苏联红军进攻满洲里日军的战斗中，苏军共牺牲官兵72人，其中少校1名，大尉2名，上尉2名，中尉8名，少尉2名，准尉1名，上士7名，中士6名，下士12名，上等兵6名，战士25名。

少　校

多洛波夫·阿·依

大　尉

米季尼柯·格·费
库哈尔钦·费·夫

上　尉

达拉谢维奇·波·斯
图米谢·阿·阿

中　尉

安多宁柯·费·费
柯大莫奇克·费斯
加里宁·阿·克
马图谢维奇·阿·费
米特洛友尼柯·费·斯
谢尔巴柯夫·费·阿
柯尔苏诺夫·阿·费
格列津

少　尉

列扎诺夫·依·斯
柯马洛夫·巴·夫

准　尉

彼切尼钦·波·阿

上　士

彼巧也夫·格·阿
布锦·恩·依
拉卡列夫·夫·阿
扎诺洛夫·赫
维尔柯夫·阿·费
巴格大诺夫·恩·费
依万诺夫·阿·莫

中　士

昔赫里斯拉莫·斯
列斯柯·波
巴鲁宁·波·特
左林·格·勒
彼列也夫·斯·斯
舒尔柯夫·德·恩

下　士

都得津·阿·阿
郭尔洛夫·阿·耶
玻谢列夫·恩·阿
奥费钦尼柯夫·恩·费

奥费钦尼柯夫·阿·费
卡卡乌洛夫·格·费
乌马特卡列夫·日
柯格津·斯·斯
柯洛温柯·阿·依
拉马左诺夫·得·赫
维加津·费·柯
巴梁斯基·波·夫

上等兵

巴拉诗柯·阿·波
格洛莫夫·柯·波
彼特洛夫·费,波
阿莫少夫·莫·依
波沁柯夫·费·莫
拉扎列夫·依·特

战 士

如拉费列夫·□·莫
莫列津·恩·阿
波洛多波波夫·恩·恩
沙莫依洛夫·依·阿
谢尔纠柯夫·费·特
巴洛沃克·格·□
亚林·斯·波·□
沙莫尔·莫·斯
费拉索夫·莫·恩
柯鲁包夫·勒·波
日斯奈·阿·格
彼列耶夫斯基·夫·亚
库斯捏左夫·莫·阿
阿费图火夫·莫·柯
格尔布诺夫·勒·夫
卡洛宾柯·依·费
安得列也夫·费·依
格拉得基·阿·勒
松图林·费·格
巴沙拉耶夫·恩·波
柯斯津阿·斯
巴尔日斯基·格·依
沙巴津·赫·特
尼基津·阿·斯阿
列亭·夫·柯

第四节　攻克扎兰屯牺牲的苏军

在苏军进攻扎兰屯与日军的战斗中,共牺牲5名官兵,其中少校1名,少尉1名,上士1名,战士2名。

少 校

挠云果夫·思·特

少 尉

结列卜洛夫·依·非

上 士

伊万诺夫·得·依

战 士

索贝达道夫·思·乌
欧尼申果夫

第八编
要塞的调查研究与保护利用

第一章 要塞的调查研究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关东军修筑在中苏、中蒙边境上的各种要塞工事，从未有人对其进行过全面的调查测量工作。由于当时日军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修筑的，战败时又将有关要塞的图纸、资料尽数销毁，因此这些被荒草淹没、深埋地下的军事要塞的历史真相鲜为人知。1980年以后，随着中日两国关系邦交正常化，不断有一些原日本关东军老兵到中国东北旅游观光，同时带着复杂的心情到他们曾经驻扎的地方故地重游，并带来了一些他们撰写的回忆文章及有关书籍。一些驻守要塞的日军老兵组织团体及关东军国境要塞遗迹研究会等从事要塞的研究。同时，一些中国史学工作者也陆续将他们收存和整理的有关要塞的资料公布于世。20世纪90年代初，中日两国史学工作者还联合考察了中苏边境上的日军要塞阵地，至此揭开了中日两国史学工作者深入调查中苏、中蒙边境日军要塞遗迹的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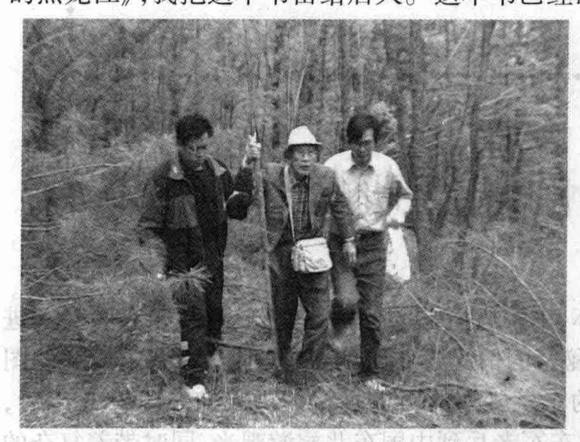
第一节 要塞调查研究机构与队伍

一、日本方面

二战结束后，在日本民间，一些原驻要塞的日军老兵纷纷以各自的驻地名命名成立了瑷珲会、东宁会、虎头会、海拉尔会等许多组织，长年坚持从事要塞的研究，并撰写回忆录，收集史料，绘制驻守地地图，组团到要塞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出版各类书籍。一位叫金井的老兵，自中日恢复邦交后，曾60次到中国访问，其中18次到他当年驻守的东宁要塞阵地考察。1999年他在东宁勋山要塞立下了一块中日友好碑，并捐献了100棵樱花树，建立了中日友好园——樱花园。冈崎哲夫是曾驻守在虎头要塞的1名老兵，1945年8月他死里逃生，回国后积极参加虎头会的活动，并多次带着儿女到虎头要塞及其他要塞考察，


冈崎哲夫（右二）率团参加中日虎头要塞考察

撰写了《战尘之心》《秘录·虎头要塞》等一系列著作。2001 年他病故前,多次告诫儿女记住父辈给中国造成的灾难,永远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并让儿子冈崎久弥继续从事要塞研究。近几年,冈崎久弥多次来要塞进行考察。小林静雄是曾参加诺门罕战争的老兵,1938 年应召到中国东北,被编入海拉尔第 8 国境守备队任炮兵部队机枪手。次年参加诺门罕战争,1941 年他回到国内。80 年代末他开始从事诺门罕战争的研究,1999 年出版了 40 余万字的《七星北斗——一个日本老兵的回忆录》。随后又开始从事要塞研究和写作,他曾先后 6 次到要塞地区实地考察,2002 年 5 月,他在妻子儿女的极力反对之下,特聘 1 名日本写真师到牡丹江以东地区进行要塞阵地考察和拍摄。他说:"我已 85 岁了,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实地考察,回国后我将把 10 多年从事要塞研究的资料写成书,书名暂时叫《遥远的黑龙江》,我把这本书留给后人。"这本书已经出版发行。



小林静雄(中)在周艾民(右)、陈云来陪同下考察绥芬河要塞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于 1969 年和 1974 年编辑出版的《战史丛书·关东军》(1)(2)中,对关东军在中国东北边境地带修筑要塞的缘起、布局、规模、种类、要塞守备队的组建、武器配系以及最后毁灭等,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记述,并配发了一些示意图。但对关东军如何征骗、役使、残害要塞劳工以及对边境要塞地区的法西斯统治等,则完全回避。

"满洲史研究会"成立于 1981 年 10 月,研究会成员有浅田乔二、小林英夫、吉田裕、山田朗、风间秀人、田中恒次郎、饭冢靖、君岛和彦、高桥泰隆、疋田康行等 10 人。他们于 1986 年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の满洲支配》,中译本名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统治》。该书在第四章"军事统治(2)日中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时期"中,以一节的篇幅记述了关东军与苏联远东军的扩军竞争、国境阵地的开辟与国际纠纷、"关特演"和对外侵略军事力量的崩溃等,对关东军在东北边境地区修筑要塞进行了概括性的记述。

日本"关东军国境要塞遗迹研究会"成立于 1993 年,并与黑龙江省革命博物馆长期合作,对虎头、东宁、瑷珲、黑河、霍尔莫津、绥芬河、海拉尔、乌奴耳等地的要塞进行调查和研究。1995 年 7 月出版了日文版的《苏满国境·虎头要塞》。该书是中日两国学者共同对虎头要塞所进行的一次全面调查的研究成果。2001 年日本六一书店出版了菊池实主编的《苏满国境关东军国境要塞遗迹群的研究》。同年菊池实又编辑出版了《苏满国境·关东军要塞的现状——来自日中共同调查》。本书一开始就明确地提出了"为什么说对战争遗迹的调查研究是必要的"问题。作者说,对于"满洲国"时期的历史事实,大部分日本人是不知道的,现在也不清楚。他们调查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日本的战争实况告诉日本民众,使日本民众了解当时的事实真相。2002 年 6 月十菱骏武和菊池实编辑出版了《调查·战争遗迹的事典》,将东宁、虎头和北部、西部的要塞遗迹纳入《事典》。多年来,以菊池实为代表的"关东军国境要塞遗迹研究会",是与中国学者合作进行调查、研究的学术团体,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向日本民众揭示了关东军要塞的史实。



日本学者部分研究成果

由"日中平和调查团"编辑的日文版《海拉尔·沉默的大地》一书于 2000 年 8 月出版发行,该书对海拉尔地区的地理环境、要塞的修筑、守备队的组建及细菌部队、化学部队都进行了记述,并配发了

一些照片，对要塞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

日本和平人士冈崎哲夫逝世后，他的儿子冈崎久弥子承父业，继续对虎头要塞及其他要塞的研究，除多次考察虎头要塞外，2005年5月考察了海拉尔要塞，并取得较多成果。


冈崎久弥（右）率团考察虎头要塞


冈崎久弥（右）率团考察虎头要塞

二、中国方面

在中国专门研究要塞的机构有黑龙江省革命博物馆和虎林县文化局联合成立的“虎头要塞研究中心”、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东宁县政府的“侵华日军中苏边境防线暨东宁要塞群遗址研究会”及“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侵华日军要塞研究所”（由原海拉尔的“侵华日军中苏边境要塞研究中心”改建）等。“绥芬河东亚文化研究会”也在调查、研究日军要塞的问题。

对要塞进行调查、研究的队伍中，有国家机关公务员、文博工作者、专业史学工作者和业余文史工作者。

在中国的学术界，对关东军要塞的调查研究，最早始于1992年4月，由黑龙江省革命博物馆与虎林县文化局组成的虎头要塞遗迹调查团，对虎头要塞的地下军事设施进行踏查，寻访有关知情证人。同时，在黑龙江省革命博物馆成立了虎头要塞研究中心，正式着手对虎头要塞的研究。当虎头要塞调查研究的初步成果公开发表后，不仅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的注意，中央和地方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道；特别是日本媒体对虎头要塞的报道，引起日本的一些学者，特别是在虎头要塞当过兵的冈崎哲夫等人的关心。遂于1993年开始了中日学者对关东军要塞的共同调查研究工作。2001年由日本学者菊池实等人编著、六一书房出版的《苏满国境关东军国境要塞遗迹群的研究》一书，就是与黑龙江省革命博物馆共同调查完成的。书中反映了对要塞进行调查研究的最新成果。这部书的特点是采取“战迹考古”的方式，对日军要塞地上和地下的遗存进行调查和测绘，同时对修筑要塞的有关文件、地理环境、历史环境、要塞构造、用材以及有关人员的证言等都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整理和记录。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侵华日军要塞研究所于2005年8月成立，所址设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所长徐占江，副所长金成民、赵玉霞。该所主要负责组织国内外相关专家学者进行侵华日军要塞的研究，与相关研究团体建立业务联系，组织召开学术研讨会议，编辑出版学术研究成果等。

第二节　要塞调查研究活动

一、实地考察

（一）中日联合考察

东北烈士纪念馆会同侵华日军老兵及日本研究学者于1993年开始对侵华日军边境要塞遗址联合考察，通过十余年的考察活动，对边境要塞遗址的整体状况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获得了丰富的第

一手资料，包括大量图片、重要军事设施的实测图及相关数据、文物和一些佐证材料，并陆续发表了一些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对侵华日军边境要塞及相关课题的深入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通过展览的形式实现了科研成果的社会普及，达到了揭示日军侵华罪证和教育公众的目的。现将东北烈士纪念馆单独和中日考察团联合考察及相关情况记述如下：

1993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3 日，东北烈士纪念馆会同虎林县文管所与侵华日军老兵冈崎哲夫及专家学者一行 18 人共同组成中日联合虎头要塞学术调查团，对虎头要塞遗址进行实地踏查，此次考察成果显著，考察报告《旧日本关东军虎头要塞遗址》发表于《北方文物》1995 年第 1 期。



虎头要塞中日联合学术考察日方团长为冈崎哲夫

1993 年 5 月，东北烈士纪念馆翻译出版了侵华日军老兵冈崎哲夫著《日苏虎头决战秘录——关东军虎头要塞失陷纪实》一书，揭示了虎头要塞鲜为人知的历史。



冈崎哲夫的著作《日苏虎头决战秘录——关东军虎头要塞失陷纪实》

1994 年 5 月 24 日至 6 月初，东北烈士纪念馆考察团一行 10 人，对乌苏里江沿线日军侵华罪证遗址进行为期 18 天的考察，重点考察了珲春、东宁、绥芬河、鸡东、密山等，此次考察的重要成果是在东宁县老城子沟北山经试掘确认劳工坟一处。考察报告《对日本关东军"满"苏国境阵地的初步考察与研究》发表于《北方文物》1995 年第 3 期。

1997 年 4 月 26 日至 5 月 4 日，东北烈士纪念馆会同虎林县文管所与日本冈崎哲夫等 11 名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第二次中日联合虎头要塞遗址学术调查团，对虎头虎东山、虎啸山、猛虎山等处要塞遗址进行实地踏查，获得了翔实的数据资料，举行了学术讨论会，并达成虎头要塞文物及有关文献赴日展出的意向。

1999 年 4 月 30 日至 5 月 4 日，东北烈士纪念馆会同孙吴县文管所与日本群马县埋藏文化财调查事业团团长菊池实等一行 10 余名专家学者共同组成中日联合黑龙江边境要塞遗址考察团，对孙吴、黑河、瑷珲整个北部正面边境展开了踏查活动，通过实地踏查、遗址测量和绘图、文物征集、资料调研、学术交流等，取得了比较重要的科研成果，《中苏边境部分侵华日军军事防线遗址的考察报告》发表于《北方文物》2001 年第 3 期。

2000 年 4 月下旬，东北烈士纪念馆会同东宁县文管所与日本学者菊池实等人共同组成中日联合侵华日军东宁边境要塞遗址考察团，对勋山、胜哄山要塞和劳工坟遗址进行实地踏查，并举行了相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2002 年 4 月 26 日至 5 月 3 日，东北烈士纪念馆会同绥芬河文化局与日本学者菊池实等一行 10 余人组成中日联合侵华日军绥芬河边境要塞考察团，考察了绥芬河天长山、驼峰山等处要塞遗址，举行了绥芬河要塞学术论证会，取得了一定的科研成果。

2002 年 8 月，东北烈士纪念馆推出《中苏边境侵华日军军事要塞罪证展》临时展览。该展览于 2003 年 1 月赴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巡展，同年 8 月，赴日本京都参加第 29 届"为了和平战争遗迹展"，并在日本长野、山梨、大分等地进行了为期 1 个月的巡展。

2004 年 8 月末，东北烈士纪念馆会同海拉尔侵华日军中苏边境要塞研究中心与日本专家学者菊

池实等一行9人组成中日联合侵华日军海拉尔要塞遗址学术考察团，考察了海拉尔北山、敖包山、乌奴耳等处要塞及诺门罕战争遗址，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二）中方考察

1. 东 宁

东宁要塞的保护开发，不仅在新闻界引起反响，也引起了国内史学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要塞先后接待了东北三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北方六省一市文博专家、北京市文博系统的专家等，到东宁要塞进行实地考察。最初的东宁要塞遗迹考察组是在东宁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织的，人武部政委韩茂才为考察组组长。1998年7月东宁要塞管理委员会成立后，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亲自抓，加强了对要塞的工作领导力度，使要塞大规模的考察、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从此开始。1999年7月，县委书记宁铁夫得知在大肚川草帽顶子有一处日军秘密地下洞没有找到时，便亲自参加考察组实地考察。知情者是在当地当过劳工的贾满顺，由于他年岁大不便走路，乡政府特地绑了个滑竿抬着贾满顺上山，乡政府的支持极大地鼓舞了考察组的热情。考察组在要塞考察期间，得到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省文化厅文物处、东北烈士纪念馆等单位领导及专家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也多次到东宁要塞考察和论证，为研究东宁要塞提供了大量的历史资料。



侵华日军中苏防线东宁要塞群国际论证会

2000年5月1～4日，以东宁县人民政府和黑龙江省革命博物馆的名义邀请中外专家学者，中央、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新闻工作者共51人，对东宁要塞群进行为期4天的考察。这次大型的联合考察活动，由县委副书记赵连钧亲自部署，提出了“把要塞的研究工作推向世界”的目标。活动的内容有：召开了“东宁县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5周年大会”；考察了大肚川的对头山日军露天仓库遗址、老城子沟的劳工坟、麻达山地下要塞和地面工事、榴弹炮台遗址、三角山、马魂碑、东西缸窑沟地面炮阵地、反坦克壕、高射炮阵地遗址及胜哄山地下要塞；参观了勋山要塞陈列馆；采访了幸存的要塞劳工和“慰安妇”；在勋山要塞区内的“国际和平林”场地植树等。在此期间有24家新闻单位记者采访报道了中、日、俄联合考察活动。此次活动创造了东宁县文物保护、考察宣传工作的规模之最。

2000年9月，黑龙江省政协文史委、黑龙江大学、中国北部边疆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会联合举办“抗战胜利55周年学术研讨会”，20多位专家学者对东宁要塞群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对要塞的历史价值、战略位置、军事功能及劳工、“慰安妇”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研讨。


步平先生（右三）采访慰安妇李光子

2000年10月，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步平带领历史所专家及日籍、美籍留学生6人，对东宁要塞群主要遗址进行了为期4天的考察，并采访了当年的劳工和“慰安妇”。日籍留学生押见真帆小姐回国后，在日本东海教育研究所发行的月刊“望星”杂志上，连续三期发表了3万多字的考察见闻，并配发了考察照片。

2002年8月，在日本侵华战争71周年之际，在东宁召开了“侵华日军中苏边境防线筑垒地域与

殖民统治问题研讨会”。



侵华日军中苏边境筑垒地域与殖民统治研讨会

从2003年3月末开始，在国家、省、市文物主管部门的支持下，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派出专人与东宁县文物管理所共同对东宁要塞群勋山、胜哄山、朝日山、236高地、三角山、麻达山、409高地共7处遗址的地形、地貌、地表植被、地上地下工事的重点遗迹进行详细的调查、测量，并获得一些新的发现，征集、采集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文物。

2005年8月31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由中国二战史研讨会、东宁县人民政府精心组织下，召开了“中国·东宁要塞研讨会”，邀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记者等90余人参加会议。与会人员在实地考察了东宁胜哄山、勋山要塞后，围绕东宁的要塞历史、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及东宁是二战终结地等内容进行了研讨，特别对东宁要塞的历史地位、要塞劳工和二战最后一战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论证。

2. 绥芬河要塞

由民间学者周艾民、陈云来为代表的绥芬河东亚文化研究会，于1984年开始对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3处要塞进行实地踏查、测绘、考证研究工作。最初，是陪同东宁要塞老兵、观月台要塞老兵及有关开拓团员深入要塞地区进行考察，并获得部分要塞阵地示意图及回忆性战史资料。多年来，周艾民又相继陪同牡丹江重炮联队幸存老兵、观月会成员、海拉尔要塞老兵对绥芬河要塞群进行了几次踏查，获得了许多第一手资料。



2005年8月中国·东宁要塞研讨会

1996年后，绥芬河东亚文化研究会联合其他学者，对尚未踏查的绥芬河要塞群阵地洞口进行拉网式探寻，并对阵地中日文名称、标高等一一核对，随后开始寻访要塞劳工及知情人。

2002年，绥芬河东亚文化研究会向东北烈士纪念馆及日本群马县埋藏文化财调查事业团建议邀请中日联合考察绥芬河要塞群，协调后由官方实施考察，并召开了学术研讨会。随后几年，东亚文化研究会坚持对要塞进行踏查研究，并先后3次集资对天长山要塞进行物探和钻探，取得了地下通道分布及走向的物探结果。2004年，周艾民和陈云来还自费到河北等地寻访东宁暴动的43名特殊劳工，行程2万余公里，终于寻找到了幸存者张思问老人，取得诸多重要成果。


2003年11月周艾民、陈云来赴河北等地行程万里寻访战俘劳工

3. 虎林、海拉尔、孙吴、黑河

虎林市文管所在所长孙永林的带领下，多年来对虎头要塞进行了考察，取得了诸多考察成果。

海拉尔在徐占江的主持下，组织呼伦贝尔军分区、民族博物馆、海拉尔铁路分局、海拉尔市旅游局等单位10余次对海拉尔要塞和巴彦汗、谢尔塔拉野战阵地进行多次考察，并取得一定的考察成果。

孙吴、黑河的民间学者杨柏林、吕杰、赵江等人多年来坚持对霍尔莫津、瑷珲、黑河、法别拉要塞进行考察，不断取得新的成果。

4. 侵华日军中苏边境要塞研究中心

侵华日军中苏边境要塞研究中心于2002年3月在哈尔滨市成立，中心设在内蒙古海拉尔市。中

心主任由徐占江担任，李茂杰任顾问。研究中心的成员多数为非专业史学工作者，是在一线自愿研究要塞的“民间学者”。



侵华日军要塞研究中心于2002年3月2日在哈尔滨成立时与会人员合影



与会人员在研讨

研究中心成立以后，决定编著一部全面记述日本关东军国境要塞的专著——《日本关东军要塞》，并首先组织力量对各要塞进行考察。

从2002年6月组织力量考察海拉尔要塞后，先后又考察了吉林省的珲春要塞，黑龙江省的东宁、绥芬河、观月台、鹿鸣台、半截河、庙岭、虎头、凤翔、富锦、霍尔莫津、瑷珲、黑河、法别拉及内蒙古自治区的乌奴耳、阿尔山等地。2002～2005年，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对各要塞都进行了数次实地考察，采取GPS定位、实地测绘、照相、摄像等方法，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考察资料和数据，为编纂《关东军要塞》专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侵华日军要塞研究所

2005年8月，设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的“侵华日军中苏边境要塞研究中心”改称“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侵华日军要塞研究所”，作为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机构开展研究工作。

二、学术交流

(一)东　宁

2000年5月1～4日，以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大学、黑龙江省革命博物馆、日本群马县埋藏文化财调查事业团和东宁县人民政府的名义共同举办了“侵华日军中苏防线暨东宁要塞群国际论证会”。前来的日方客人、专家共有12人，其中有考古专家、大学讲师、医务工作者、在校大学生等；俄罗斯的专家学者10多人；国内的专家学者17人，包括黑龙江省社科院、黑龙江大学、黑龙江省革命博物馆、吉林省革命博物馆、“731”罪证陈列馆、黑龙江省文化厅文物处、绥芬河博物馆等单位。在国际论证会上有中、日、俄8名专家发表了考察、研究的观点和结论，通过了“会议纪要”，成立了“侵华日军中苏边境防线暨东宁要塞群遗址国际研究理事会”。

通过此次学术交流活动，增进了东宁县与国内著名研究专家和日本专家的相互了解，并建立了联系。与东宁县保持长期的资料与成果交流关系的专家，来自黑、吉、辽3省社科院、《东北沦陷史研究》杂志社等其他相关的文物、文史和社科研究部门，还有日本ABC企画委员会山边悠喜子女士、日本群马县的菊池实先生、日本ICR株式会社和今井昭治先生、日本大阪府保险医学会的竹内治一先生等。日本京都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坂部晶子小姐曾3次来东宁考察，经常把其发现的最新资料寄给东宁县文物管理所，对东宁要塞群遗址的深入研究工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2000年9月，黑龙江省政协文史委、黑龙江大学、中国北部边疆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了“抗战胜利55周年学术研讨会”，20多位专家学者对东宁要塞的战略位置、军事功能及劳工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研讨，使东宁要塞遗址的历史价值更加充分地得以展示，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打下基础。


半截河要塞小鹿台阵地考察(拄拐者为向导纪林)


在庙岭要塞华山地下工事考察


在海拉尔要塞考察

在绥芬河要塞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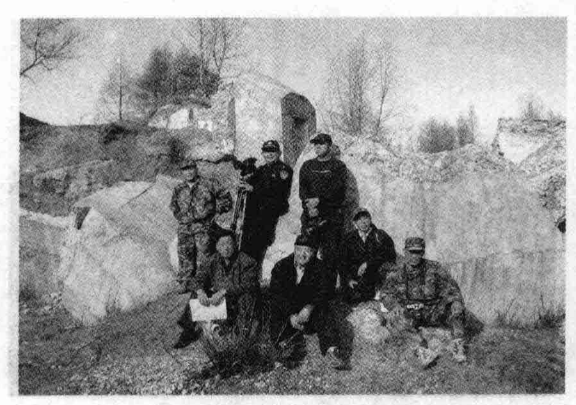

在法别拉要塞考察


在霍尔莫津要塞毛兰屯野战阵地冒雪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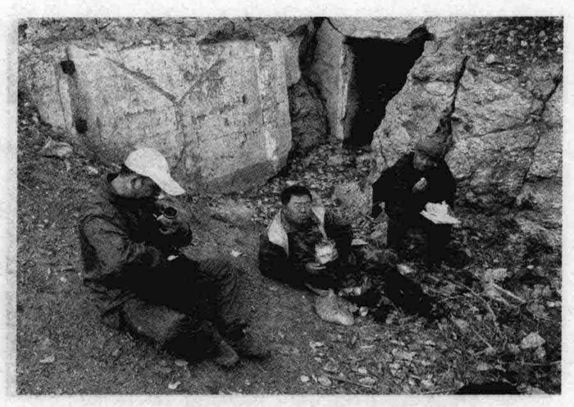


在孙吴县731部队673支队遗址考察


徐占江在富锦市访问富锦要塞知情人马玉新



在黑河要塞丸山阵地考察



在海拉尔要塞敖包山阵地考察时野外午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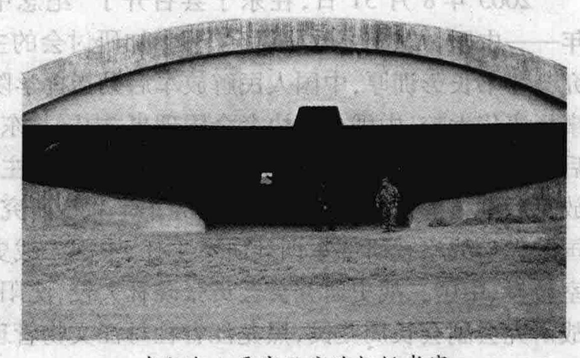
在虎头要塞41厘米榴弹炮阵地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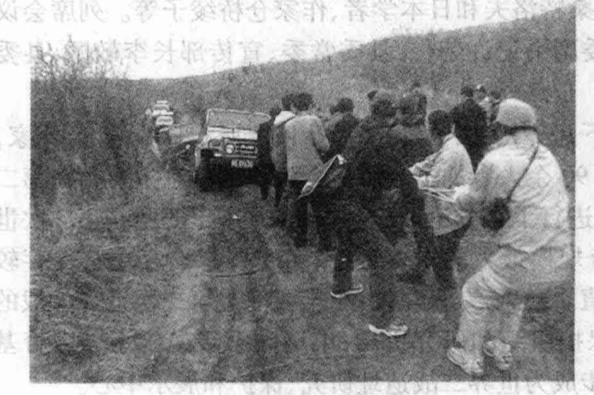
在黑河要塞黑龙江边



在海拉尔要塞巴彦汗野战阵地考察



在阿尔山要塞五岔沟机场考察



在绥芬河要塞考察



在霍尔莫津要塞考察





在乌奴耳要塞考察倒木拦住去路



李茂杰与徐占江研究书稿

2001 年 8 月，东宁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宋吉庆应东北地区中日关系研究会的邀请，参加了“九一八”事变 70 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宋吉庆所长将东宁要塞近几年在开发、保护、利用及研究工作取得进展的情况，向参加会议的东北地区及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进行了汇报、交流和研讨，征得了与会专家对东宁要塞今后保护、利用与研究等方面问题的指导，通过此次会议与国内外相关的专家建立联系，从而使东宁要塞的研究工作推向了更宽的研究领域。

2002 年 8 月，根据要塞研究的需要，东宁县重新调整了“侵华日军东宁要塞研究会”成员，并到哈尔滨市与研究会主要领导共同探讨了下一步研究会工作的重点，并在民政部门办理了研究会的注册登记。在“九一八”侵华战争 71 周年之际，在东宁召开了“侵华日军中苏边境防线筑垒地域与殖民统治问题研讨会”，邀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记者等 20 多人。东宁要塞研究会会长、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步平副院长亲临会议进行指导。通过两天的会议，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东宁要塞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合理化的建议，对要塞研究利用的历史价值进行了充分讨论。

2005 年 8 月 31 日，在东宁县召开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中国·东宁要塞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主要人员有：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二战史研究会秘书长彭训厚，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学术研究部理论室副研究员、中国二战史研究会理事杨庆华大校，中俄友好协会全国理事、中国与东亚经贸合作洽谈会秘书长孙惠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学术研究部世界军事后勤研究室主任、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徐克洲大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学术研究部世界军事后勤研究室研究员、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王通信大校，中国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军训教研室主任、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杨阳大校，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战略教研室教授、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张晓林大校，沈阳炮兵学院军事共同教研室教授张志强，黑龙江省抗战研究会副会长周艾民，黑龙江省牡丹江文物管理站站长陶刚，黑龙江省抗战研究会理事、原东宁县武装部政委韩茂才，黑龙江省抗战研究会理事、东宁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宋吉庆以及俄罗斯联邦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高杰夫，俄罗斯远东大学教授阿列克桑特洛夫和日本学者、作家仓桥绫子等。列席会议的有东宁县委书记陈殿运，县政府县长孙永先，县委副书记许荣仁，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李敬国，县委常委、65911 部队政委吕晓东等。

此次研讨会在中国二战史研究会的精心组织下，国内二战史研究专家，俄罗斯和日本学者、作家，前苏联红军老战士代表及国家、省市各大媒体记者 9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议题就东宁要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地位及保护、利用的现实意义进行了充分论证。会议认为：东宁要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战场；东宁要塞是二战期间亚洲综合规模最大的军事要塞；东宁要塞遗存现状保存较好；东宁要塞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保护和利用价值。会后，专家建议：东宁要塞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战场，应加强保护、研究及利用；进一步健全保护组织和研究机构；申请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争取纳入黑龙江省东部地区红色旅游线路，逐步成为世界二战遗址研究、保护和展示中心。



2005 年 8 月东宁要塞研讨会代表合影

（二）东北烈士纪念馆

从 1993 年开始，东北烈士纪念馆在同日本学者联合考察活动中多次召开学术研讨会，进行交流，取得了较好效果。

（三）侵华日军中苏边境要塞研究中心

从 2002 年 3 月 2 日研究中心成立后，先后 10 余次利用各种机会召开学术研讨会，就要塞考察活动中的收获交流看法，对要塞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复进行探讨，取得共识。这些学术研讨和交流，促进了要塞研究的深入开展。



在绥芬河召开的评审会



在哈尔滨召开的要塞研讨会

三、研究成果

2000 年 5 月 4 日，在东宁县成功举办了“侵华日军中苏防线暨东宁要塞群国际论证会”。会后黑龙江省革命博物馆将与日方联合考察的结果，经过找寻有关资料，整理出了“中苏边境部分侵华日军军事防线遗址的考察报告”，并发表在《北方文物》2001 年第三期上。日本群马县埋藏文化财调查事业团，将考察的结果，测绘、拍摄的实物资料，采访当时历史见证人的口述材料，经过与掌握的历史资料相对照，将深入研究的最终结果于 2001 年出版了日文版《苏满国境关东军国境要塞遗迹群的研究》一书。

2000～2002 年，东宁县要塞管委会、县文物管理所密切与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沈阳军区专业作家张正隆先生合作，先后出版了《残害劳工》（张凤鸣、王敬荣著）、《东宁要塞》（高晓燕主编，王敬荣、韩茂才、宋吉庆副主编）、《日之完》（张正隆著）三部反映东宁要塞调查、开发、研究方面的

书籍，推动了东宁要塞研究工作的深入。三部书籍的出版密切了与国内、国际学者的交流，扩大了宣传面，提升了东宁要塞历史的价值和广泛知名度。东宁县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还相继在《近代史资料》《东北沦陷史研究》《中国文物报》《牡丹江日报》及日本《ABC 企画委员会通讯》等杂志发表史料性论文、通讯 10 多篇。

2004 年 4 月，东宁要塞管委会主任韩茂才编著的《要塞风云》一书，由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发行。同年，《东北沦陷史研究》杂志专集刊发了周艾民、陈云来先生征访调查发生在 1943 年 9 月 11 日 20 时东宁县三岔口以南 13 公里的勋山要塞附近 43 名“特殊工人”集体暴动外逃事件的长篇调查报告及相关资料。

2004 年 8 月，黑龙江省抗战研究会副会长周艾民编著的《“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侵华日军伪满洲国境要塞群实录》一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 32 万字，大 32 开。作者在踏查各处要塞的基础上，结合大量中外史料，首次对关东军的国境要塞进行了综合性记述。同年，作者还单独以《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三大要塞群》为题发表了一篇论文，刊载于《东北沦陷史研究》杂志第一期。

宋吉庆、毕玉芬、孙芹编著的《东宁要塞阵地群》于 2005 年 7 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 30 万字，大 32 开本；陈云来、周艾民编著的《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要塞阵地群》于 2005 年 12 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 35 万字，大 32 开本。



出版的部分要塞研究成果



出版的部分要塞研究成果

宿伟东编著的《侵华日军东宁要塞揭秘》于 2005 年 8 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 15 万字，大 32 开本，介绍了东宁要塞军事工事的规模、分布、遗址现状等。作者以踏查要塞时拍摄的大量照片随文插入书中，使本书具有更大的震撼力和引起读者的注意力，使每张照片都成为日军侵华战争的一个罪证。

杨柏林编著的《孙吴蒙尘岁月》和赵玉霞编著的《侵华日军在呼伦贝尔进行的细菌毒气战》作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系列丛书和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于 2005 年 8 月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孙吴蒙尘岁月》16 万字，大 32 开本。该书从不同侧面，全面、翔实地记述了从 1932 年日本关东军侵入孙吴县至 1945 年 8 月日军战败的历史，揭露了日本关东军的战争罪行。尤其是用丰富的史料，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军界中广为流传的“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孙吴”的北正面“军都”建设进行了诠释，道出了日本关东军重兵盘踞孙吴、伺机进犯苏联的狂妄野心。书中对关东军霍尔莫津要塞及其相关的日军细菌毒气战、要塞劳工、要塞慰安妇、要塞开拓团、抗联袭击日军、日军溃败等都进行了描述，揭示了孙吴历史上那段最为悲惨的蒙尘岁月。《侵华日军在呼伦贝尔进行的细菌毒气战》15 万字，大 32 开本，该书翔实地记述了日军在呼伦贝尔地区进行的细菌毒气战，首次较全面地记述了日军在诺门罕战争中进行细菌战的过程。

2005年8月，以周艾民先生为主在哈尔滨和东宁县举办了以侵华日军要塞为主题的展览，即“东方马其诺防线——侵华日军伪满国境要塞图片展览”，展出了照片300余幅，并由《财富人生》杂志出版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特刊》，特刊共分10个部分，刊登照片200余幅。展览和特刊首次集中将日军要塞大量罪证史料、图片、遗物公开，有力地揭露了侵华日军的罪行。



2005年8月在东宁举办的展览

第二章 要塞的保护利用

第一节 要塞保护

一、东宁要塞

以东宁县委、县政府为首的地方各级组织，近年来为东宁要塞群遗址的保护、发掘与利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益，同时也极大提高了东宁地区的知名度。

1998年6月10日，东宁县人民政府以东政发〔1998〕31号文件，将“东宁要塞群遗址”、“东宁劳工坟遗址”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从此要塞遗址的保护工作纳入了政府的工作日程。随后又成立了“东宁要塞管理委员会”，下设考察论证组、宣传报道组、资料收集组、对外联络组、国保申报组、遗址开发组等。县委宣传部、人武部、旅游局、档案局、交通局、文物所及三岔口镇政府等10多个部局参加了要塞考察、论证、宣传、保护、开发工作。

1999年5月，东宁县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文物保护、征集工作会议”，在会上县委副书记作了题为“充分认识文物保护工作在名城建设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开创文物保护工作的新局面”的报告，调整了东宁县文物保护委员会成员，下发了“东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古代、近现代文化遗址保护和文物征集工作的通知”。县总工会、县妇联、县教委、共青团县委联合向全县各界群众发出“关于保护、捐献文物的倡议书”。县委、县政府联合发出“关于征集侵华日军罪证遗物的通知”。



东宁要塞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为进一步保护和利用这些文物资源，在县委第十二次党代会上，将要塞的保护、开发利用列入了发展规划，决定将要塞建成旅游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同时又成立了要塞开发领导小组，将要塞的保护开发纳入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领导小组成立后，在全县各方面的支持下，从1998年11月至1999年6月，开始利用农民的农闲时间，通过“两工一车”（义务工、建勤工、农用义务车），投入工时6 000多个，车工200多个，清理土石方5 000立方米，清理了保存现状较好的勋山要塞。在县文物部门的指导下，清理出炮弹、手雷、火炮零件、电缆、工具、生活用具等300多件；清理地下巷道1 163延长米，大小房间21处、446平方米，使地上、地下结构相互连通。对危险地段进行防护，基本具备了对外开放的条件。同时投入资金上百万

元，架设电力线路1.1公里，修筑简易公路3公里，上山考察人行路2公里，停车场5 000平方米，活动广场2 500平方米，并在地下要塞的一个仓库内，建立了“东宁要塞陈列馆”。东宁要塞群勋山遗址地下陈列馆于1999年6月18日向社会开放。

《侵华日军东宁要塞群遗址保护规划》，于2003年3月开始在东宁县政府、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东宁县文物管理所共同努力下，组织了10余名专业人员在平时工作基础上对遗址集中实地勘察、复查和测绘，此后进行了室内资料整理和研究，于2003年11月形成了规划初稿，2004年1月14日东宁县政府主持召开了相关部门专家参加的规划论证会，会后按专家意见对规划进行了局部的调整修改，并增设了部分内容。同年5月15日完成送审稿，后经黑龙江省文化厅分别于5月20日和10月22日两次组织省文博专家进行论证和补充修改，最终于同年11月按黑龙江省文化厅批复意见完成定稿。同年12月经东宁县政府正式公布实施。

《侵华日军东宁要塞群遗址保护规划》期限为十五年，分近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规划的目标是达到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准，建成黑龙江省东部地区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

与此同时，东宁县政府还成立了“东宁要塞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领导小组”，成立了县、乡、村保护网络，重新勘测，重新规划，建筑保护标志，埋设保护界标，整理了30多万字的保护档案。在此期间还多次到黑龙江省文化厅和国家文物局汇报情况，先后邀请各级文物专家来东宁考察，征求专家们对东宁要塞群遗址保护、开发、利用的意见。2005年7月，东宁要塞被中央宣传部批准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006年5月，侵华日军东北要塞（东宁县、虎林市、孙吴县境内的东宁、虎头、霍尔莫津要塞）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虎头要塞

虎头要塞遗址是在中国最东部边境最早发现和最早进行挖掘清理的日军要塞。要塞阵地分布广，规模宏大。有效地保护好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证的遗存，不仅对揭露日军侵华罪恶具有实证作用，而且是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的极好教材。

1990年，虎头镇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保护日军侵华军事设施的通知》，将虎头要塞列为镇文物保护单位。同年虎林市政府和黑龙江省政府分别将虎头要塞列为市、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被国家文物局列为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1991年，黑龙江省革命博物馆和虎林市文物管理所联合成立了“虎头要塞遗址研究工作站”，对要塞进行了调查、测量和清理发掘工作。

1993年，虎林市人民政府发布文件，公布了虎头要塞遗址的保护范围。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为依据，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为前提，将虎头要塞遗址划分为四级保护区：特别保护区，由地面和地下遗迹范围外延30米；重点保护区，由特别保护区外延50米；一般保护区，由重点保护区外延10米；建设控制地带，由一般保护区外延300～1 500米。并在保护范围内封闭了2个采石场，1个沙场，有效制止了挖山采石，杜绝了人为危害的现象。

1995～1997年，虎林市文物管理所清理挖掘、加固虎东山地下工程300延长米，清理出日军遗物30余种200多件。对虎东山地下工事整体有了初步了解。

1996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虎林市政府正式公布实施了《虎头要塞遗址保护规划》。对要塞整个遗址进行保护维修；对虎东山地下工事实行对外开放，接待旅游参观。

1998年5～11月，虎林市文物管理所对要塞主阵地猛虎山地下工事进行大规模保护和清理加固，清理通道总长900延长米，修理加固拱顶300延长米，清理出日军遗物200余件。

1999年6月，虎林市文物管理所对虎头要塞“亚洲第一炮”炮台遗址进行清理和保护。

1999～2000年，虎林市政府、虎头镇政府及虎林市文物管理所联合在要塞遗址群核心部位建成了与地下工事相通的“侵华日军虎头要塞遗址博物馆”。

近几年,国家、省、市先后投资,对虎头要塞进行了更加细致、深入的保护、利用,使其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基地,对推动地方经济也起到重要作用。

三、霍尔莫津要塞

2003年以来,随着国家林业资源的保护、利用,孙吴县政府决定,将位于胜山林区的霍尔莫津要塞阵地交由林业部门管理、保护和开发。几年来的工作实践和成果说明,这是一条非常正确的文物保护措施。至2005年,要塞阵地遗址归属在文博部门,而实践在林业部门。林业部门管理要塞阵地遗址后,首先在景区外部建立了大型石雕石碑——“国家级遗址森林公园——胜山要塞”,在景区内建成了一栋集办公、接待、展示、餐饮于一体的综合性楼房,在二道河上建起了两座铁桥,并整修了约15公里的进山和山内通往各个景点的通道。二是清理文物、遗址遗迹,清理出警备中队和6间地下兵舍、10处炮台遗址、5条通道及6间大中型地下指挥中心办公场所,清理挖掘长约300米的要塞地下通道,同时对水源地、水泵房和医院遗址也进行了清理保护。建立了3座人工栈桥,发掘整理了众多文物。在现有的林地间补栽了松树和柳树,建立了沙棘园区,并用胜山泉水开辟了人工养鱼池。通过林业部门对霍尔莫津要塞的不断建设,达到了要塞遗址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目的。


胜山要塞遗迹国家森林公园接待处

霍尔莫津(胜山)要塞已与林业部门积极合作,建设要塞遗迹森林公园,已被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森林公园。2004年11月,国家林业局批准孙吴霍尔莫津(胜山)要塞为国家级森林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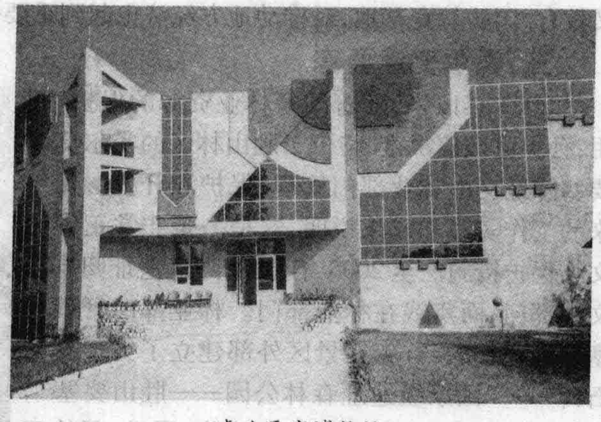
四、其他要塞

海拉尔、黑河、阿尔山等地对海拉尔要塞河南台(北山)阵地、黑河要塞北门镇阵地、阿尔山要塞南兴安花炮台阵地都进行了清理和保护工作。1994、1996年海拉尔要塞河南台(北山)阵地被批准为海拉尔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黑河要塞北门镇阵地于1992年11月被黑河市文管会批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被黑龙江省省委批准为“省级国防教育基地”,2001年被省委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3年3月12日,阿尔山市人民政府批准阿尔山要塞南兴安花炮台阵地遗址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节　要塞利用

随着广大侵华日军要塞研究人员对要塞调查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爱国主义教育及旅游工作的需要,各地政府也十分重视要塞遗址的开发与保护,并多方筹措资金,陆续清理出部分要塞地下工事供游人参观。在继续挖掘、清理要塞的同时,各要塞区也相应建立了“要塞文物陈列馆”、“展览馆”及“博物馆”等场馆。各馆所藏战争遗物十分丰富,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日本关东军在要塞区域一带的军事活动,尤其是较全面地揭露了关东军对要塞劳工、要塞慰安妇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各要塞区逐步成为对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的基地,有的同时成为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景区。

一、虎头要塞遗址博物馆


虎头要塞博物馆

虎头要塞遗址博物馆馆舍主体建筑面积1 800平方米，由五部分组成，分为序厅、第一展厅、第二展厅、影视厅和文物库房。内部展示主要以与虎头要塞相关的文物和文献为主，同时辅以其他现代展示手段，采取馆舍与遗址、地上与地下相结合的手段进行展示。第一厅主要展示地下要塞断面示意图、历史照片、主阵地猛虎山地下工事沙盘及实物等，其中有日军使用的武器弹药、生活用品、医疗用品、伪满时期奴化教育使用的书籍、颁发的奖章等；第二展厅主要展示苏联红军进攻虎头要塞景观画、大型浮雕——“劳工的血和泪”及日军下达的密令文件、劳工使用的工具、其他文物等。

虎头要塞遗址已被定为省级重点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东宁要塞陈列馆

（一）东宁要塞群勋山遗址地下陈列馆

1999年6月18日，东宁要塞勋山遗址陈列馆向社会公众开放。该馆位于勋山地下要塞的一个仓库内。陈列馆以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实物深刻揭露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陈列馆共分六部分内容：“日军侵华罪证”、“亚洲最大的军事要塞”、“苦难的劳工”、“抗日烽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战场”、“让历史呼唤和平”。共展出日伪时期日军遗留下来的罪证遗物400件，照片216幅，资料22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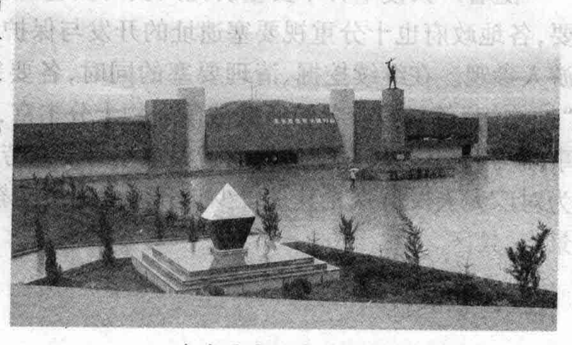

张万年为东宁要塞题词



东宁要塞陈列馆

（二）东宁要塞历史陈列馆

2005年10月18日，坐落在东宁县三岔口镇、中俄界河瑚布图河左岸、勋山要塞遗址旁的东宁要塞历史陈列馆落成开馆。该馆占地1.5万平方米，由1万多平方米的大理石广场、4 000平方米的绿地和1 100平方米的馆舍组成。在广场的中心竖立的是“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和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德生题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战场”纪念碑，在广场左侧是“劳工殉难”纪念碑，右侧是“抗联英雄”纪念碑。可供上万人在此集会开展活动。


东宁要塞历史陈列馆

新陈列馆是在原地下陈列馆的基础上，增加近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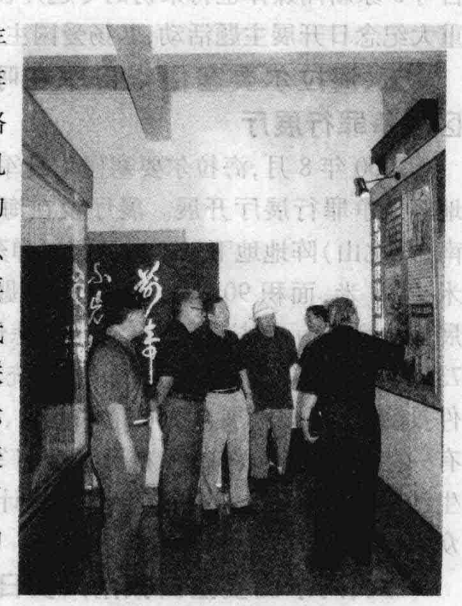
年收集考察整理的最新文物和资料等建成的，同时又增加了近几年征集的珍贵藏品充实馆藏。由“日本侵华罪恶史略”、“亚洲最大军事要塞”、“苦难劳工”、“抗日斗争”、“苏军出兵东北”、“二战终结”、“成就与展望”六部分组成。展出历史照片和最新考察照片325幅，其中有部分照片为俄罗斯驻华大使馆最新提供。展出实物500多件，其中有日军使用的武器弹药、下达的密令文件、颁发的奖章、生活用品、伪满社会奴化教育使用的教材、宣传品及中国劳工使用的工具、抗日联军和苏联红军使用的武器及用品等。在主厅还有大型浮雕和部分场景。

新馆的落成，实现了遗址展、陈列展和活动中心有机的结合，对要塞遗址的保护、文物展藏，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国防教育、历史唯物史观教育，推动旅游业的发展以及拉动县域经济方面将发挥特殊的重要作用。年接待参观人次在8～10万人。

三、孙吴县日本侵华罪证陈列馆

1983年8月，孙吴县日本侵华罪证陈列馆建成开馆。后于1993、2003年经两次改造重建，扩大了展区面积，使展区内容更加充实，促进了孙吴地方史的研究，从而形成了有队伍、有内容、有教材、有活动、有基地、有载体的展馆。

孙吴县日本侵华罪证陈列馆是集中展示关东军自1932年入侵孙吴以来，选择逊别拉河边的荒原进行大规模建设，几年之内修铁路、建军营20万间，构筑要塞、野战阵地、仓库、公路桥梁、堤坝与水利设施等，并派驻军、警、宪、特，建立伪政府机构及731细菌部队孙吴支队，从而使孙吴迅速成为“北正面”的军都。现展厅内容分为前言、“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成立、关东军的孙吴驻军、军警宪特的白色恐怖、血泪慰安妇、胜山要塞——黑暗的筑垒、673细菌支队及流行性出血热、日军化学武器在孙吴、苦难的劳工、开拓——掠夺、神道与东洋文化、抗联三路军三支队活动、关东军溃败日本投降共12个单元。展示形式多样，包括珍贵的资料图片300幅、中外文稿100件、图表地图30件、艺术作品10件及文物实物200件。同时还馆藏了一大批文史资料，现馆内有《孙吴文史资料》1～5辑，《可爱的孙吴》《蒙尘的岁月——日军入侵孙吴大地》《孙吴抗战历史》《孙吴地方史料》等文史专著10余种50余万字，《孙吴作证》《不能忘却的历史》《孙吴日军毒气战》《劳工志录》《噩梦醒来》等8幅表现日军入侵孙吴历史的照片，《关东军北方军都——孙吴》《孙吴化学武器》《胜山要塞》等大型画册3部，使陈列馆成为集收藏、研究、教育功能于一身的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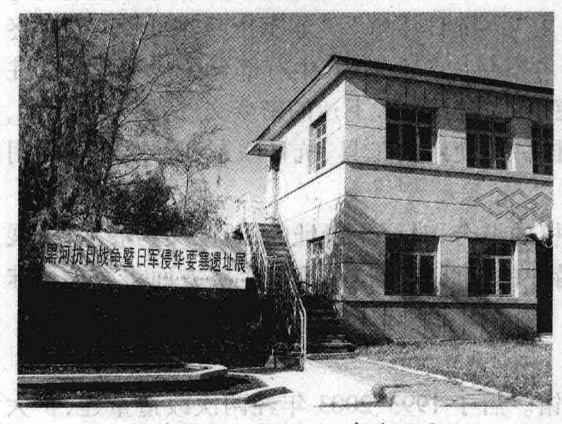
孙吴县侵华日军罪证展馆

至2005年，陈列馆共接待观众10万余人。接待中国国内、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内外团体100多个，其中有日本“人骨问题研究会”、“ABC企画委员会”、西田胜等15所日本大学的教授、《读卖新闻》、“KBC”电视台、各地方报记者、日本知名作家，当年日本驻孙吴老兵中村龙夫、米村正一，日本和平人士山边悠喜子、小川根津子，台湾大学地理教授丘树屏，俄罗斯、香港等地人士以及中央电视台、黑龙江和哈尔滨电视台等新闻记者均来孙吴胜山采访、制片。日本“人骨问题研究会”及“ABC企画委员会”等民间团体已向孙吴寄发简报100多期；新闻、文史、文化及企业界人士与孙吴相关部门建立了联系，并提供有关资料400余份。目前，孙吴县日本侵华罪证陈列馆已被评为全国文博系统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四、黑河要塞北门镇侵华日军地下工事遗址展览馆

1992年，黑河八一O电台在吕杰先生的努力下，将电台后山的北门镇原侵华日军地下工事遗址进行开发，并于当年推出了黑河市“北门镇侵华日军地下工事遗址展”。该遗址于同年11月被黑河

市文管会批准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北门镇侵华日军地下工事遗址展馆

1999年，黑河八一O电台在原遗址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处展览馆，展馆面积300平方米，共分7个部分，展出图片、资料180余幅，实物60余件，从而使遗址与展馆相结合，更全面、翔实地揭露当年关东军给黑河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年该展馆被中共黑龙江省委批准为“省级国防教育基地”；2001年被黑龙江省委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999～2005年，“黑河抗日战争暨侵华日军要塞遗址展”取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每年接待国内参观者几千人，接待日本老兵旅游团组十几个，各地电台、电视台都曾做过较详细的报道。其中日本大阪电视台等3家新闻媒体也将采访的专题片在日本播放。同时八一O电台每年都在“八一五”、“九一八”等重大纪念日开展主题活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五、海拉尔要塞侵华日军在呼伦贝尔地区战争罪行展厅

2000年8月，海拉尔要塞侵华日军在呼伦贝尔地区战争罪行展厅开展。展厅设在海拉尔要塞河南台（北山）阵地地下工事的一间原弹药库内，长30米，宽3米，面积90平方米，展厅主题为“勿忘”。展板内容分为：海拉尔要塞、劳工的悲惨遭遇、日军731部队海拉尔支队罪行、日军残酷统治、日军无条件投降5个部分，展出100余张照片、4张地图，并有一些历史档案、图书资料及部分日军武器弹药、生活用品等实物。2000～2005年累计接待中外观众30余万人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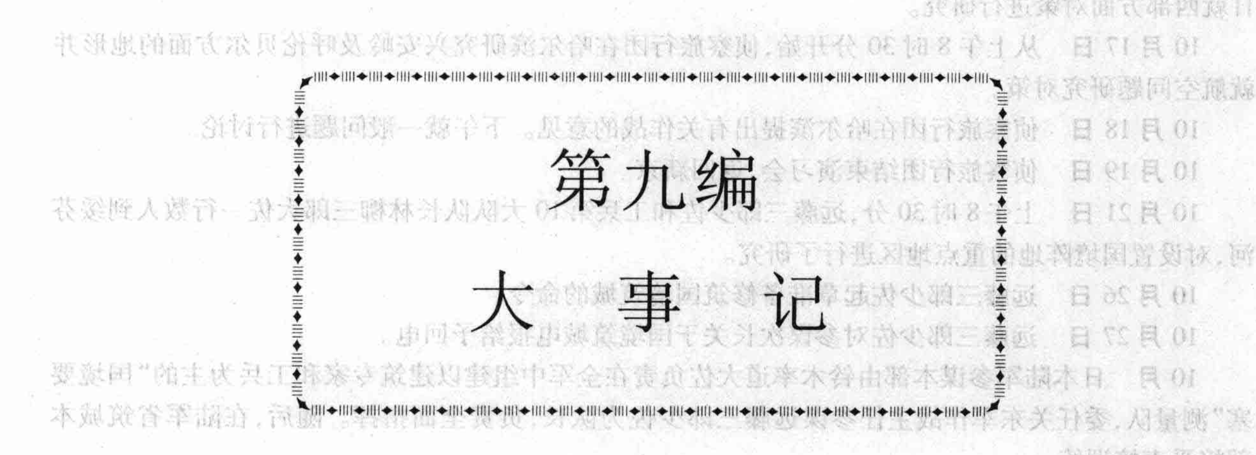
海拉尔要塞地下工事内的“勿忘”展厅

六、阿尔山要塞白狼南兴安日军堡垒《铁证》展厅

2003年8月，阿尔山市白狼林业局在南兴安铁路隧道日军堡垒内的《铁证》展厅开展。

日军守护隧道的堡垒建筑面积600余平方米，共5层，里面有执勤室、宿舍、卫生间、仓库、浴池、发电室等，林业局在1、2层设置了展厅。展板内容分为8部分：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建立伪兴安南省、修筑白阿铁路线、修建军事要塞、劳工的苦难、法西斯统治、反抗和斗争、诺门罕战争、日军的覆灭，共有119张照片、5张地图及部分实物。2003～2005年，已接待国内外观众6万人次。


阿尔山白狼南兴安隧道日军堡垒内的“铁证”展厅



第九编

大 事 记

1933 年

2 月 黑河特务机关长宫崎义一大尉向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提交了一份关于苏联从 1932 年夏季开始修筑国境阵地、军事工事、兵力部署、火力配备的详细报告,引起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高度重视。

9 月 30 日 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远藤三郎少佐在新京车站迎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铃木率道大佐为首的侦察旅行团。下午与关东军作战参谋石本中佐、平田少佐就侦察演习、视察中苏边境地区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10 月 1 日 以铃木率道为首的侦察旅行团于上午从新京出发到哈尔滨,视察中苏国境。对在国境地带修筑军事要塞做前期工作。

10 月 3 日 以铃木率道为首的侦察旅行团分成甲班与乙班,乙班去牡丹江,甲班在哈尔滨研究对敌情的判断和对苏联军队的作战要领。

10 月 4 日 侦察旅行团预定上午 8 时出发,致铃木率道大佐的密码电报到达,由于翻译需要时间,故 11 时从哈尔滨出发,下午 1 时到达牡丹江,听取有关东部国境附近的兵要地志的说明。

10 月 5 日 因有小雨,故暂时停止飞行侦察,上午依照空中照片对地形进行一般的观察,下午就东部国境附近的作战指导进行研究。

10 月 6 日 上午 10 时,铃木率道大佐带领侦察旅行团在远藤三郎少佐等陪同下,从牡丹江乘飞机到绥芬河、东宁等地侦察苏联国境阵地。

10 月 7 日 侦察旅行团继续在国境附近侦察,当日返回哈尔滨。

10 月 8 日 侦察旅行团全天在哈尔滨研究东部方面作战的问题,下午 6 时结束。

10 月 9 日 侦察旅行团全天在哈尔滨研究东部国境方面部署的对策。

10 月 10 日 侦察旅行团兵分两路,一路对黑河方面进行侦察,另一路在哈尔滨停留。

10 月 11 日 侦察旅行团乘飞机越过小兴安岭到奇克、黑龙江沿岸侦察。看到从武市(苏境布拉戈维申斯克)沿岸急速筑城的情况,超过侦察旅行团对武市及黑河的预想,感到震惊。

10 月 12 日 侦察旅行团研究有关修改编制后的兵力问题。

10 月 13 日 侦察旅行团就兵力问题,向关东军第一课高级参谋冢田攻大佐阐明意见。

10 月 14 日 侦察旅行团在远藤三郎少佐等陪同下,分乘 3 架飞机到海拉尔,到达后观察附近地形的一般情况。

10 月 15 日 侦察旅行团从奈拉木图(三河)附近侦察国境线,随后到达满洲里。在满洲里特务机关听取国境附近军情。后去呼伦湖、甘珠尔庙等地视察,当日返回海拉尔。

10 月 16 日 侦察旅行团从海拉尔机场出发,去索伦、王爷庙、哈尔滨。就此飞机侦察结束。当

日就西部方面对策进行研究。

10月17日 从上午8时30分开始,侦察旅行团在哈尔滨研究兴安岭及呼伦贝尔方面的地形并就航空问题研究对策。

10月18日 侦察旅行团在哈尔滨提出有关作战的意见。下午就一般问题进行讨论。

10月19日 侦察旅行团结束演习会,返回新京。

10月21日 上午8时30分,远藤三郎少佐和工兵第10大队队长林柳三郎大佐一行数人到绥芬河,对设置国境阵地的重点地区进行了研究。

10月26日 远藤三郎少佐起草准备修筑国境筑城的命令。

10月27日 远藤三郎少佐对参谋次长关于国境筑城电报给予回电。

10月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由铃木率道大佐负责在全军中组建以建筑专家和工兵为主的"国境要塞"测量队,委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远藤三郎少佐为队长,负责全面指挥。随后,在陆军省筑城本部接受直接训练。

11月2日 远藤三郎少佐起草关于要塞建设的计划。

11月3日 远藤三郎少佐乘飞机去珲春方面,一面侦察中苏国境波谢特湾,一面沿国境北上侦察东宁附近正在增加的苏军阵地。然后到绥芬河进行侦察。11时在珲春着陆,访问派遣队,听取珲春附近的情况,观察地形。

11月15日 以远藤三郎少佐为首的测量队在关东军总部集中,分赴各地开展国境要塞测量工作。

▲ 关东军司令部召开专门会议,对国境阵地构筑、备炮及其他有关事项进行了基本研究。

12月1日 远藤三郎少佐接到关于国境筑城的指示。

12月2日 远藤三郎少佐起草筑城计划立案要领。

12月3日 远藤三郎少佐起草筑城计划要领、国内防卫计划、兵要地志资源调查的要求事项。

12月4日 上午7时,远藤三郎少佐迎接中央部派遣的筑城要员,与工兵第10大队林柳三郎大佐讲述关于实施筑城的问题。

12月14日 远藤三郎少佐与驻朝鲜军矢野参谋及林柳三郎大佐一行研究有关筑城问题。

12月15日 远藤三郎少佐就研究筑城问题,向林柳三郎大佐陈述意见。

12月19日 远藤三郎少佐与林柳三郎大佐起草指示,并联系准备去东宁。

12月20日 上午8时20分,远藤三郎少佐乘飞机从新京出发至东宁,在郭亮船口高地上,看见侦察中的林柳三郎大佐一行,着陆后乘马登上高地。

12月21日 8时30分,远藤三郎少佐送林柳三郎大佐一行侦察绥芬河阵地。

12月22日 远藤三郎少佐办理筑城材料调集的手续,编写东宁附近阵地的中期报告。

12月26日 铃木率道课长与远藤三郎少佐商谈有关筑城问题。

12月 关东军派出大批专业技术官兵,冒着严寒对中苏边境进行重点踏查、测绘、制订国境阵地工事设置方案。

1934年

1月11日 远藤三郎少佐与铃木率道大佐讨论关于东宁阵地的文件及关于骑兵旅团位置的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1月13日 远藤三郎少佐收到林柳三郎大佐的侦察报告。

1月14日 下午,远藤三郎少佐给林柳三郎侦察班发出筑城实施方针的命令。

1月29日 远藤三郎少佐收到林柳三郎大佐关于呼伦贝尔方面筑城的报告。

2月23日 远藤三郎少佐一行乘飞机到达通河、佳木斯、富锦。对富锦有广大的平原感到惊讶。

前往筑城阵地侦察,在桥本少佐的引导下视察同江北方合流点附近的阵地,后对苏军阵地摄制影片,向南方迂回到达岛的西端,在当地保持距地面四五十米的高度,继续向黑龙江上方飞行,打开机窗摄制影片时,遭到苏军的枪击,有一发子弹击破机窗的销子。

2月24日 远藤三郎少佐从哈尔滨乘飞机前往北部国境的黑河,踏查黑河阵地,后在特务机关听取汇报,并侦察苏联红军阵地。夜,听取林柳三郎大佐关于阵地构成要领的说明。

2月25日 上午11时30分,远藤三郎少佐乘飞机视察瑷珲及霍尔莫津附近阵地,下午2时30分到达哈尔滨市。

2月26日 远藤三郎少佐从哈尔滨乘飞机去新京,同时发出解散林柳三郎侦察班的命令。国境要塞测量队正式编入关东军,成为关东军新成立的筑城部的核心力量。

3月3日 关东军司令部菱刈隆大将发出关于改变军队部署的"关作命第575号命令",其中第4条规定:"骑兵集团长任西地区防卫司令官,主力位于海拉尔附近"。

3月17日 下午4时,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大将签发了"关作命第577号命令"关于关东军迅速铺设轻便铁路的命令,该命令主要任务是在"绥芬河至东宁"修筑每日平均运输能力为100吨的轻便铁路。其铺设目的主要是为修筑国境要塞阵地。

3月 以茂木谦之助少将为旅团长的关东军骑兵第4旅团进驻海拉尔,并与已驻此地的骑兵第1旅团一起组成骑兵集团,由笠井中将担任集团长。

4月14日 远藤三郎少佐起草给关东军测量队的训示,就黑河兵营问题与河崎中佐进行商议,然后就铁路敷设一事与铁道联队长商议等。

5月5日 远藤三郎少佐研究有关实施筑城事项。

5月12日 上午8时,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大将签发"关作命第589号命令"——关东军关于在国境地带东宁、绥芬河、平阳镇、海拉尔负责修筑阵地的命令。同时,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中将,根据菱刈隆司令官的命令,签发了"关于修筑阵地和轻便铁路所需民工、器材、经费等问题的指示"。在具体训示的同时,特别勒令"绥芬河至东宁"、"梨树镇至半截河"的两条轻便铁路必须在"本月之内"和"6月内"完成,其目的是不能影响国境要塞阵地的修筑。

5月下旬 第3师团门胁勋工兵少佐和另外1名工程技术人员到达绥芬河,按日军大本营审定的设计图纸,靖国山、天长山、地久山阵地工事开工。

▲ 第16师团岩仲工兵少佐率14名技术人员到达海拉尔,按日军大本营审定的设计图纸,海拉尔要塞敖包山阵地开工。

5月 三岔口至绥芬河红花岭的轻便铁路通车,专供军队使用。

6月1日 远藤三郎少佐对筑城要员发出训示。

6月15日 上午,远藤三郎少佐在第2师团司令部(长春)商议有关筑城问题。

6月19日 远藤三郎少佐就有关筑城与铁路的经费问题与铁道联队长及藤野少佐(时任关东军司令部附,筑城班)进行协议。

6月 根据"关作命第589号"命令,东宁、绥芬河、半截河、海拉尔国境阵地正式开始修筑,属中苏、中蒙国境阵地第一期工程。其工程责任将校军官:东宁——细谷刚三郎少佐等2人;绥芬河——门胁勋少佐等2人;半截河——小林藏吉少佐等2人;海拉尔——岩仲少佐等2人。

▲ 绥芬河至三岔口93公里轻便铁路完工并通车。轨距0.76米,由28吨机车牵引4~5节车辆,只供军用。

7月19日 铃木率道大佐等一行于凌晨3时抵达海拉尔,在办事处听取工事的说明。然后到安包山阵地视察工事现场,比预期进展快。

7月20日 上午8时起铃木率道大佐一行视察敖包山阵地,下午1时30分从海拉尔乘飞机于3时30分到达齐齐哈尔市。

7月21日 铃木率道大佐一行由齐齐哈尔经哈尔滨、牡丹江于下午2时到达东宁，由细谷刚三郎少佐（负责东宁要塞工事的将校）及大队长迎接视察东宁工事现场，晚在东宁旅馆与细谷刚三郎少佐就有关细节进行商议。

7月22日 铃木率道大佐一行从上午7时出发，视察轻便铁道，接着到达半截河阵地前，从空中视察工事状况。由于找不到着陆场，不得不在平阳镇降落。上午11时出发到绥芬河，在工事现场视察。

7月23日 上午9时30分，铃木率道大佐一行在绥芬河838高地进行侦察，下午2时45分到达哈尔滨。

7月24日 铃木率道大佐一行由哈尔滨到达新京。

7月29日 远藤三郎少佐整理有关筑城文件。

8月2日 上午，远藤三郎少佐对第7师团的将校就苏军阵地与战法进行说明，然后与臼井少佐商议筑城事宜。

8月3日 上午，远藤三郎少佐就筑城配备的火炮问题与早川（重炮兵学校）、臼井少佐进行商议，并对筑城费的分配问题进行协商。

8月4日 上午，远藤三郎少佐就有关筑城费的问题与军政部进行交涉，后决定委托中央银行管理。

8月8日 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中将就修建国境阵地签发“关参发第1153号”《关于修筑费预算分配数额的通牒》，伪满洲国政府在军政部经常预算中列入900万元，而用于国境筑城费用总计616.6万元，全部由伪满洲国支付。其中东宁107.3万元，绥芬河107.4万元，半截河67.4万元，海拉尔138.6万元，备炮费（含运输费）102.7万元，备炮以外的运输费81万元，侦察费7.2万元，临时工费2.2万元，其他2.8万元。

▲ 第3师团下田参谋与远藤三郎少佐就筑城问题进行说明。

8月10日 下午，远藤三郎少佐研究国境附近苏军阵地，并将机密图书送交河边中佐（河边虎四郎中佐是远藤三郎少佐的继任者）。

10月 日伪当局为阵亡的日军官兵在海拉尔西山松林中修建的“忠魂碑”落成。

12月1日 关东军司令部发出“关作命第626号命令”，将伪满洲国全境改划为九个防卫地区，海拉尔及兴安北省全境为西北防卫地区，司令官由骑兵集团长担任。

12月 在驻守在孙吴的日军士兵中发现不明原因的疫病，时称“孙吴热”。

▲ 伪满洲国政府支付“国境筑城”费用617万元。

1935年

3月26日 满洲里绥芬河铁路同全线一起改宽轨为准轨，与苏联断绝了交通联系。

6月 由于海拉尔日军要塞工程的全面开工，根据日军要求，海拉尔日伪当局将日军划定的军事禁区内及靠近禁区的一些居民村、屯，如铁道北的西山街、大锯场街等居民全部强制迁出。

7月30日 日伪制定《保甲制度三年计划》，宣布三年内在东北各县实行保甲制度。

秋 日本关东军司令官，驻伪满洲国全权大使南次郎乘飞机去东宁视察。

12月27日 日军中央本部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指示关东军司令部修订《满洲国军指导要纲》。

同年 关东军868部队进驻绥芬河北部观月台一带，分别驻守鸟青山、大石砬子；229部队驻绥芬河天长山及地久山。

▲ 在1935年，中苏、中蒙边境纠纷发生了176起，比过去两年零七个月发生的总数152起还要多。而且自年初以来所发生的边境纠纷都带有武装冲突的性质。

▲ 伪满洲国政府支付“国境筑城”费用800万元，比上年增加183万元。

▲ 日军抓来大批劳工及战俘，强迫他们在各要塞阵地修筑工事及公路、铁路、机场等设施。

1936 年

1月16日 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中将依据“关作命第749号命令”，发出有关彻底加强筑城工事安全保密工作的指示。

3月1日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签发“关参一发第524号”关于特别军事地域规定文件的命令。共4章18条，旨在加强控制特别地域地区。同时发布关于特别军事地域规定的说明书，共11条，加以解释说明。

▲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签发“关参一发第542号”特别军事地域及禁止航空区域决定文件。

▲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签发“关参一发第543号关于许可出入特别军事建筑物文件”的命令。命令得以经常出入特别军事建筑物者为：关东军参谋长、副参谋长、关东军第1课参谋、第1课第3特别班主管将校（以上出入各建筑物）、建筑物管理者、筑城守备队及其直属长官并该长官职务上所需的随从者、直接从事工事实施及掩护者（以上出入有关建筑物）。

3月23日 日苏断交，日军用车皮和土石封堵绥芬河站东部通往苏境的第3号隧道。

4月9日 在绥芬河北部观月台边境附近再次发生武装冲突，日军河口中尉被击毙，另有5人下落不明。

5月1日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签发“关参一发第976号”关于特别军事地域、禁止航空区域内飞行文件等命令。

5月12日 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签发“关参一发第1078号”关于呈报特别军事地域规程文件的通报。

6月 关东军在绥芬河西部阜宁镇北部下甸子建成军民两用飞机场，占地31 200平方米，每周三、四、六有直达长春的小型客邮班机往来。

▲ 日本修订了《帝国国防方针》，其主要内容是：加强在满洲的战备，以苏军为第一作战对象，以苏联作为日本的第一敌国而进行战争准备。因此，对苏作战方案的研究，在占领了中国东北以后，已由守势作战方案转为攻势作战方案。参谋本部对苏作战计划是要求关东军利用在“满洲”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首先在东西两个方向击破乌苏里方面的苏军，继而击破东北面阿穆尔州方面及西面大兴安岭方面的苏军主力。因此，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兵力配备，以及铁道、道路、筑垒机场等设施，主要先在东正面开始重点实施。

8月 日本首相、陆相、海相、藏相、外相五相会议制定了北攻苏联、南攻南洋诸岛的《国策基准》。

8月10日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拟订《满洲国第二期经济建设要纲》。

8月25日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签发“关作命第878号”《陆满密缀》第十一号命令，旨在伪满洲国境要地实施新的筑城工事及部队的调整。

9月 关东军将汽车约1小队分配给工兵第1联队，汽车约半小队分配给工兵第9联队。

▲ 第1、第9师团长派遣工兵第1、第9联队到东宁。9月上旬第9联队到位，9月中旬第1联队到位。

▲ 第12师团长将工兵约2小队，独立混成第1旅团长将工兵约1小队，独立混成第11旅团长将工兵约1中队派遣到东宁，分配给东宁工兵第1联队。

10月18日 日本陆军次长向陆军技术本部长、陆军兵工厂长官、陆军筑城本部长官发出命令：“在满洲筑城方面，如果关东军申请提供技术事项的援助，可予以方便。”

10月20日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签发“关作命第923号”。

10 月 23 日 伪满洲国召开公路会议，通过《国道建设五年计划》。决定从 1937 年开始，在五年内共投入 6 200 万元修筑所谓"产区开发线路，维持治安线路、国防线路"，总计 13 200 公里，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掠夺东北资源，统治和镇压东北人民，加强所谓"国防"，准备"对苏开战前哨战"提供了平战结合的交通条件。

11 月 5 日 伪满洲国发表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大纲，即第一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11 月 16 日 关东军司令部签发了"关作命第 747 号"命令，严格规定了"筑城工事"，"彻底秘密保持"的十几条规定。20 日，关东军总参谋长西尾寿造中将又下达了同号命令的补充"军机保护"命令，进一步从防止苏联间谍机构和谍报人员及其内部防范等方面作了强制性规定。

11 月 20 日 伪满洲国决定下一年度国防分担费为 1.95 亿元。

12 月 24 日 伪满洲国公布《国境地带法》，规定对居住在"国境"地带内的年满 14 岁以上者，要呈报警察官署领取《居住证明书》，旅行或移动时要携带居住证明书，"国境"地带外来居住人如欲到"国境"地带内旅行，应申请警察官署，领取旅行许可证书；地带外居住人如欲移住地带内者，要有民政部大臣或蒙政部大臣的许可。28 日，又公布了《国境地带法实行规则》。

同年 伪满洲国政府支付"国境筑城"费用 1 000 万元，比上年增加 200 万元。

1937 年

1 月 20 日 在与苏联接壤的东北部边界，日军与苏军发生军事冲突，苏联的格罗捷阔沃至绥芬河间铁路联络一时中断。

5 月 20 日 伪满洲国兵在大黑河附近扣留苏联汽艇，逮捕艇上人员。日军与苏军第三次在观月台边境附近发生武装冲突。

5 月 26 日 日军与苏军在绥芬河北部附近发生武装冲突。

6 月 3 日 日军与苏军在东宁县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

6 月上旬 日军第 8 师团第 31 联队奉命从牡丹江掖河移驻绥芬河，加强国境守备。主力驻屯寒葱河，第 1 大队派驻绥芬河北部。

6 月 19 日 日伪军与苏军在黑龙江乾岔子岛上发生武装冲突。7 月 3 日，日伪军又炮击驻乾岔子、柴哈拉两小岛上的苏军舰艇部队，苏军炮舰 1 艘被击沉，1 艘受伤。

7 月 关东军司令部周密地制定了《昭和十二——十六年度满洲国战争准备指导计划》，其中，加强伪满洲国国防建设是一重要部分。

▲ 日本关东军在黑龙江省孙吴县制造"平顶树机场事件"。为日本关东军修筑平顶树机场的中国劳工共 2 000 多人，因反抗日本宪兵无故打死 1 名中国劳工而举行罢工，遭到日本关东军的血腥镇压。被残杀的中国劳工 250 多人，其中 6 人被马活活拖死。

冬 120 名中国劳工，在日军押送下，从东宁徒步来到绥芬河地区，经过一天一夜到达绥芬河，仅剩下 40 多人，途中冻死 70 多人。

11 月 关东军临时作业队在胜哄山阵地安装了 24 厘米榴弹炮 2 门，30 厘米榴弹炮 1 门。

12 月 1 日 密山至虎林间铁路竣工并开始通车营业。

12 月 13 日 伪满洲国公布《军机保护法》《军审判法》《军刑法》等法令，同时宣布废除《国境保护法》和《测量限制法》。在《军机保护法》中规定，凡是"指定为军机特别地域"，以及军用港湾、堡垒炮台等均属于军机保护范围；对于所有"探知"或"泄露"军事机密者，都要处以包括无期徒刑在内的各种徒刑，从而加紧了对东北各族人民，特别是边境地区抗日军民的镇压。

12 月 14 日 伪满洲国公布《满洲劳工协会法》。据此在 1938 年 1 月 7 日正式设立的满洲劳工

协会是一个特殊的财团法人,资本共400万元,由伪满洲国政府、满铁大东公司、满洲土建协会、昭和制钢所、满炭各单位共同出资。理事长重藤千秋,理事鉴页次郎 、佐佐木雄哉等。协会本部设在新京,同时在奉天、徐州、承德、安东、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吉林、牡丹江、大连设有支部,支部下设若干个“出张所”。这样该协会便垄断了伪满洲国劳务各方面的业务,诸如斡旋劳动者募集供应、劳动者运输、劳动市场的经营管理、劳动者的训练和经营所谓保护设施、有关劳务的各项调查等。

12月27日 伪满洲国将沿中苏边境的虎林、密山、东宁、穆棱、萝北、绥滨、同江、抚远、饶河、珲春各县列为军事机密特别地区。

12月 根据关东军在中苏国境修建军事要塞的第一期统一规划,中苏、中蒙国境第一期第一阶段工程完工,包括第1国境阵地(东宁)、第2国境阵地(绥芬河)、第3国境阵地(半截河)、第5国境阵地(霍尔莫津)、第6国境阵地(瑷珲)、第7国境阵地(黑河)、第8国境阵地(海拉尔),其中“永久阵地”32处,“混凝土结构的重要部位”即地下工事、弹药库、炮位、机枪座等永久性工事123处,“一般阵地”15处。

▲ 关东军第12师团进驻东宁。

▲ 孙吴至奇克公路开始修建,1938年竣工。建设孙吴辰清军用机场。开始在孙吴北山建设268、269、279联队兵营及阵地。

▲ 伪满洲国在绥芬河扩建发电厂厂房1 975平方米,落成后6 000千瓦发电机开始发电,主要供应绥芬河要塞各地、二道岗子及东宁驻军用电和绥芬河居民用电。

▲ 伪满洲国政府支付“国境筑城”费用1 500万元,比上年增加500万元。

▲ 关东军要塞第一期第一阶段工程结束。各要塞开始贯彻执行关东军有关彻底加强筑城工事安全保密工作的指示。

1938年

1月16日 伪满洲国政府决定拨给伪三江省治安肃正经费230万元,其中151.2万元作为修筑以佳木斯为中心的“警备国防道路”费用。

1月 关东军司令部制定《关于在国境方面国境建设的主要事项》,其主要内容是加强国境方面的国防建设,完善各种军事设施,重点规定了在中苏国境秘密构筑军事筑垒阵地,并指明依据日“满”共同防卫的观点,作为对苏作战的一环,使之与增加在伪满洲国的军备、开发产业、五年计划的措施相适应。

▲ 河田末三郎中将出任关东军筑城部长,主持了伪满洲国国境筑城阵地的高峰期建设。1942年8月调离。

▲ 关东军要塞第一期第二阶段工程启动,开始修筑珲春、鹿鸣台、观月台、庙岭、法别拉要塞阵地。

2月26日 伪满洲国公布《国家总动员法》,规定在战时或事变之际,日伪政府可统制运用整个伪满洲国的财力、物力、人力。该法自5月11日起实行。

2月 关东军制定了《关于在国境方面国防建设的重要事项》。

2月14日 关东军组建第1~8国境守备队,分别进驻东宁、绥芬河、半截河、虎头、霍尔莫津、瑷珲、黑河、海拉尔要塞阵地。

3月10日 伪满洲国公布《防卫法》,从4月1日起实行。4月14日,又发布了《防卫法施行令》。

3月下旬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长石井四郎少将到海拉尔视察关东军陆军医院,并亲自指示将医院的病理室及试验室在原设计基础上扩大两倍。

3月下旬 开始兴建绥宁(绥西至东宁91公里)、兴宁(汪清县新兴镇至东宁镇216公里)两条铁路,全长307公里。

3月 伪满洲国总务厅制定《东满"振兴"工作要纲》,在伪牡丹江省等地修筑道路和通讯设施,建立"集团部落",加强军事镇压和经济掠夺,确立了对苏战争基地建设的基本方针和战略。

4月1日 伪满洲国治安部将参谋司所属的国境监视队(约2 000名)改编为国境警察队,并移交警务司管辖,该国境警察队分别设于伪间岛省珲春,牡丹江省东宁、密山、绥芬河、平阳镇、虎林、饶河,黑龙江省呼玛、逊河,三江省抚远、同江、绥滨、萝北和兴安北省海拉尔等地。首次以伪满洲国政府行为加强国境地区治安管理,形成军、宪、警三位一体的"防卫"体系。

6月19日 东北抗联第1路军总司令杨靖宇指挥第1军教导团及第2师共700多人,分别夜袭日伪通缉线路土口子隧道工程现场,第1、第12老岭河桥梁工地及阳岔工程分区日本今井组,击毙持枪抵抗的敌人9名(其中日本警卫人员8名),俘虏了日本工程师竹内、小林等人,解放了中国劳工700多人。此次袭击使日伪损失达20万日元。24日,杨靖宇指挥所部再次夜袭土口子隧道工程,以及设在东岗的辑安工程分区和伪军骑兵第5团团部。抗联第1军顺利攻入土口子工地,又解救了250名中国劳工,其中不少人当场参加了东北抗联。日本工人福间一夫投向抗联,参加抗联第1军并随军转战,1940年末在东宁县二道沟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光荣牺牲。

7月15日 日军与苏军在伪间岛省珲春张鼓峰一带发生武装冲突,后演变为局部战争,战争结果以日军失败而告终。8月11日,日苏双方达成停火协议。

▲ 以小松原道太郎中将为师团长的关东军步兵第23师团进驻海拉尔,随后关东军兵站部队如野战仓库、兵器厂、被服厂、医院等大批部队或军事单位也陆续进驻海拉尔。

8月 关东军陆军航空兵第2飞行集团所属第12飞行团第24飞行战队(团级)进驻海拉尔。战队配有战斗机22架(缺编)。

冬 郭亮船口(庙沟)阵地安装30厘米榴弹炮2门,勾玉(麻达山)阵地安装30厘米榴弹炮3门,东绥阵地安装24厘米榴弹炮2门,胜哄山阵地安装30厘米榴弹炮(短型)1门。至此东宁国境阵地共有11门重炮对准苏联"扶桑台"。

12月1日 伪满洲国公布《劳动统治法》共24条。

▲ 伪满洲国制定《国境警察队官制》,将东宁、密山、虎林、饶河、抚远、同江、萝北、珲春县及黑河省的警察正式改编为国境警察队。

12月10日 关东军要求国境地区各机关团体即协和青少年团、协和义勇奉公队、军人后援会、赤十字社及医院、国防妇人会等,以协和会工作为中心并由关东军派军官进行所谓指导,对重点边境进行全面军事化统治。重点地区分为甲、乙、丙三级。甲级有牡丹江、虎林、东宁、穆棱、黑河、呼玛、孙吴、奇克、逊河等县市;乙级有间岛省(特别是珲春县)、兴安北省(特别是海拉尔);丙级有佳木斯市、富锦、宝清、饶河等县。同时又提出,在所有边境县官署所在地设立防卫委员会。

12月25日 伪满洲国召开所谓国境建设会议。关东军代表、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各部次长、协和会重要头目以及各特殊会社董事等均到会,会上研究了"国境地方以国防为中心之各种问题。"

同年 伪满洲国政府支付"国境筑城"费用1 500万元,同上年持平。

▲ 关东军第11师团进驻密山。

▲ 关东军第1师团进驻孙吴,师团长为片冈薰中将。

1939年

1月30日 伪满洲国公布《劳动统治法施行法规》共53条。

3月17日 伪满洲国制定《劳动者指纹事物处理规程》等文件,用以加强对东北民众的军事法西斯统治。

3月22日 伪满洲国决定支出"国境建设预备费"111万元。

4月8日 伪满洲国正式宣布所谓三大国策: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开拓移民、北边振兴即国境建设,以配合日本的侵略战争。

4月11日 伪满洲国政府制定《国境建设实施基本纲要》,以配合关东军对苏作战。

4月15日 伪满洲国政府发表《关于北边振兴之声明》,宣布所谓的北边振兴三年计划总预算为10亿元,其中由伪满洲国政府分担2亿元,特殊会社分担2亿元,满铁分担6亿元,用以在伪牡丹江、东安、三江、黑河、间岛、北安、兴安北省与苏联接壤地带实施国防建设工程,包括修筑交通、通讯和军事设施;移入日本移民;开发农、林、牧、矿业;储备军用物资等。此前,在本月8日召开的伪满洲国国务院会议上,已通过北边振兴事业公债法,决定在三年内分期发行北边振兴公债2亿元。

5月4日 在新巴尔虎左旗的诺门罕布尔德地区爆发日本关东军对苏蒙军的诺门罕战争。

6月1日 伪满洲国开始实施"北边振兴五年计划"。同时,对北边地区部分行政区进行调整。除新设置东安省和北安省外,撤销凤山县,并入通河县;以汤原、萝北两县一部分,新设鹤立县;以勃利县南部、密山县和穆棱县之一部,新设林口县;以穆棱县、东宁县一部新设绥阳县;嫩江县之一部划入瑷珲县;额尔古纳右旗之一部划入漠河县。重点强化了国境"军都"的建设和统治。

7月25日 伪满洲国发布实施《防卫令》,此令规定,各地防卫司令可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发出必要的防卫命令,实际上授予各地防卫司令以更大的动用武力的权力。

8月5日 伪满洲国在总理官邸召开"北边振兴工作汇报会"。对北边振兴工作的各个方面(包括铁道、公路、通讯、航空、治水、发电、都市计划及给水、开拓、劳力、物资筹措、保险设施等),由主管人员作了详细汇报。这是日伪统治者为加强实施所谓北边振兴工作而采取的推进措施,其中许多方面直接关系到国境要塞阵地的修筑以及附属设施工程。

8月 关东军第6军在海拉尔组建,司令官为荻州立兵中将。

▲ 抗联7军第1师及第5军第3师各一部袭击了日伪在虎林县、黑嘴子西北修筑的地下军火库,解放劳工200余人,其中100余人参加了抗联队伍。

▲ 日本开拓团进入东宁县狼洞沟(今团结村)和绥阳县的土城子。

9月3日 英法等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首相阿部以谈话的形式表明日本不会介入欧战,伪满洲国政府表示与日本采取同一态度。而背地里却积极准备对苏作战,秘密加紧对国境战略基地的建设。

9月15日 日本外相和苏联外长在莫斯科会谈,签订诺门罕战争停战协定。两国共同声明,定于16日午前2时停战。双方为解决国境问题,成立各派2名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就实施日苏停战协定进行正式现地交涉。至此,结束了历时135天的诺门罕战争。日军试探性进攻苏联的军事图谋以失败而告终。

10月 驻孙吴日军又发现了病因不明的热性病,病名为"孙吴热",后统一称为"流行性出血热"。

同年 伪满洲国政府支付"国境筑城"费用2 000万元,比上年增加500万元。

▲ 本年末完成关东军要塞第一期第二阶段工程:第9国境阵地(五家子)永久阵地1处,混凝土结构重要部位7处,一般阵地3处;第10国境阵地(鹿鸣台)永久阵地5处,混凝土结构重要部位4处;第11国境阵地(观月台)永久阵地3处,混凝土结构重点部位7处;第12国境阵地(庙岭)永久阵地1处,一般野战阵地1处;第13国境阵地(法别拉)永久阵地3处,混凝土结构重要部位10处,一般野战阵地3处。

▲ 关东军将孙吴以北至黑河沿江地区划为"特别军事区",严格控制居民出入。

1940 年

▲ 关东军要塞第二期工程开始启动。

3 月 1 日　伪满洲国宣布实行《暂时户籍法要纲》,通过对户籍的管理,加强对人口的控制。

3 月　原伪兴安北警备军改编为第 10 军管区,司令官仍由原兴安北警备军司令官乌尔金担任,驻地不变。只是将原编成内骑兵第 1、第 2 团撤销,保留骑兵第 7、第 8 团和独立步兵营以及司令部直属的机关、部队,总兵力约 2 000 人。

4 月 11 日　伪满洲国公布《国兵法》和《国兵法实行令》,从 4 月 15 日开始实行。规定年满 19 岁的男子都有服兵役三年的义务。

4 月 13 日　伪满洲国政府发布将募兵制改为义务兵役制的征兵制度。

4 月 22 日　伪满洲国制定北边振兴五年计划。

7 月 10 日　伪满洲国将伪间岛省的珲春,牡丹江省的东宁、绥阳、穆棱,东安省的饶河、绥滨、萝北、富锦、鹤立(不含鹤立沙河以南),黑河省和兴安北省全部,划为执行《军机保护法》的甲号地区。

7 月　伪满洲国劳工协会从 7 月开始在锦州、安东、热河三省募集劳工,运往工矿和军事工程地区,强制服劳役。

▲ 日伪当局为追悼诺门罕战争中战死的亡灵,强制海拉尔市民为设"忠灵塔"捐资,并为建塔工程"勤劳奉仕"(义务劳动)。

▲ 在海拉尔修建了日本的"神社"和日本佛教寺庙"西本原寺"。

8 月　在海拉尔东南部约 30 公里的巴彦汗地区修筑军事的劳工 20 余人逃跑,在木哈吉地区被日军抓住,全部当场杀害。

▲ 关东军化学部在呼伦贝尔草原上进行了撒播 30 吨氢氰酸的大规模实验,实验结果造成 2 公里之内所有实验动物均死亡,4 公里内马匹也死亡。

12 月 2 日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以哈尔滨平房为本部,新增设牡丹江支队(海林)、林口支队(林口)、孙吴支队(孙吴)和海拉尔支队(海拉尔),配合本部从事细菌研究。至此,在中国东北基本形成了准备细菌战的基地网。

同年　伪满洲国政府支付"国境筑城"费用 3 000 万元,比上年增加 1 000 万元。其中从伪满洲国国费(临时筑城费)中支出 1 824 万元。其余近 1 200 万元从临时军费中支出。

▲ 第 12 国境要塞(庙岭)附近 5 个阵地完工。

▲ 伪满洲国珲春——东宁——绥芬河"国道"竣工。

▲ 在富锦、兴山和大兴安岭南麓的阿尔山设置阵地守备队,次年在阿尔山东南的五岔沟设置阵地守备队。

1941 年

1 月 5 日　日本扩充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及牡丹江等领事馆,撤销驻绥芬河、海拉尔、东宁等领事馆出张所。

3 月　关东军航空兵第 5 飞行集团决定,由第 9 飞行集团从驻海拉尔的第 24 飞行战队和第 12 飞行团驻齐齐哈尔的第 11 飞行战队各抽 1 个飞行中队,编入第 13 飞行团的第 87 飞行战队,调到东部边境牡丹江一带。驻海拉尔的航空兵改为独立飞行中队。

4 月 6 日　为解决"国防建设对劳动力的需要",伪满洲国决定在华北招募劳工,并在北平与华北

伪政权签订了《赴满苦力募集协定》,协定规定河北应对伪满洲国所需劳动力予以全面协助。

5月15日　关东军参谋部第2课内设特别班,亦称特殊情报部。该部随即在海拉尔东山上设立了基层队,其任务是无线电监听录音,破译密码,对发报台测向、定位,确定苏军指挥机关位置。

7月2日　日本大本营御前会议提出《适应形式演变帝国国策纲要》,规定对苏联"要秘密贮备采用武力","德苏交战的进程如对帝国有利,则实行武力解决北方问题"。遂于7日和16日,陆军省先后两次下达对苏进攻准备的动员令,在日本国内进行征召和动员,将大批兵力调往中国东北。为掩人耳目,日本大本营将这次军事集结称为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还指令伪满洲国也要做好准备,搜刮总价值达5亿元以上的战略物资,强行征募大批劳工,在极恶劣的条件下修筑铁路、军用公路和其他军事设施。8月9日又决定放弃年内进攻苏联的企图,将战略重点正式转向"南方"。

7月7日　日本陆军省下达动员令,在北"满"进行"关东军特别大演习"。同时,强征20万人修筑工事。

7月　关东军将设在哈尔滨平房的防疫给水部队改为"满洲第731部队",将牡丹江支队改为"满洲第643部队",林口支队改为"满洲第162部队",孙吴支队改为"满洲第673部队",海拉尔支队改为"满洲第543部队"。

夏　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胞弟溥杰,从新京乘专机抵达绥芬河,视察天长山国境阵地。

秋　东宁重炮兵联队(390)在东宁暖泉子沟组建,是由关东军特设炮兵队原封不动的编入。

11月16日　伪满洲国追加军事预算38亿元。

12月27日　伪满洲国治安部和民生部发布严厉控制工人的《关于劳动人指纹事务处理规程的训令》和《关于制定暂时劳动登录规则事务办理细则的训令》。

12月　据伪满洲国调查,本年日伪当局征调一般劳工为192万人,特种劳工23.3万余人,共215.3万人。

同年　伪满洲国政府支付"国境筑城"费用3 500万元,比上年增加500万元。

▲　本年度完成第8国境要塞附近13个阵地、第14国境要塞附近4个阵地的修筑。

▲　日军第57师团由日本本土移驻黑河。

1942年

2月　日本陆军本部将九O式24厘米加农列车炮由日本本土秘密运抵虎头要塞,并进行安装。

3月13日　日军大本营决定:调整战略部署,增编新部队及指挥机关,加强对苏联的战备,确保战略上的主动。

3月　日本陆军本部将试制的41厘米大口径榴弹炮由日本本土秘密运抵虎头要塞猛虎山主阵地。

▲　被抽调去东南亚和太平洋战争的南方军中的关东部队开始陆续返回中国东北。

4月　伪满洲国公布修改后的《治安维持法》,勒令边境村屯居民内迁。距边境5公里内为戒严区。在各边境城镇的进城路口设"问检所"。

▲　满洲第731部队与516化学部队在海拉尔郊区的草原上共同进行了人体实验,使用了大约100人左右的俘虏。

4月25日　关东军制订出年内的研究性和检阅性的演习计划。随之,开始了大规模的战备演习训练和启动17项演习与研究项目。

5月25日　第2国境守备队绥芬河天长山核心阵地驻屯步兵队军营公园建成,步兵联队长平贺又男题写"楠公园"碑文。"楠公园"占地约12万平方米。

6月4日 伪满洲国建立“国民勤劳奉公制度”,并于29日由民生部发布《关于勤劳奉公义务人选定要纲》《国民勤劳奉公制创设要纲》,规定21~23岁未服兵役之男子三年内要服12个月的无偿劳役,并决定变成勤劳奉公队,设专门机构管理,协和会协助。

7月 关东军根据大本营的指示,组建了新的部队和指挥机关。

8月初 日伪强征数万劳工,开始修筑黑河——佳木斯、东宁——虎林等边界公路,总长约100多公里,造成大批劳工死亡。

8月 关东军驻海拉尔第6军司令部在海拉尔东南部约30公里的巴彦汗野战阵地一带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驻海拉尔关东军第23师团所属部队、军直属各部队、伪第10军管区所属部队和航空兵、坦克兵均参加演习。

▲ 关东军的兵力达到14个步兵师团和一些特种部队。

▲ 第9国境守备队新编后于秋季转入第2方面军、第2军两个司令部的绝对国防圈区域,并隶属其下;第5、6、7、8、13国境守备队也一同归第2方面军管辖。

9月18日 伪满洲国颁布《国民勤劳奉公法》。

9月 根据同年4月关东军总司令部关于年内对苏作战研究和检阅性计划的部署,第6军司令部配合关东军参谋部、情报部和特殊情报队,并组织下属部队的各情报单位,在海拉尔北部靠近边境地区三河一带进行了一般情报演练。

10月20日 伪满洲国公布《国境取缔法》及其施行规则,对国境线内居住者严加管制,发给国境居住证明书。将牡丹江的东宁、绥阳、穆棱3县列为国境特别地区。

12月8日 伪满洲国在全国开展所谓“协和必胜飞机献纳运动”,逼迫人民群众捐款为日军购置战机,支援“大东亚圣战”。伪兴安北省在年末即突击完成捐款定额,所捐购的飞机被定名为“呼伦贝尔”号。

同年 伪满洲国政府支付“国境筑城”费用3 500万元,同上年持平。

1943年

2月中旬 以驻海拉尔关东军第23师团1个联队为基干,在海拉尔附近举行严冬条件下的诸兵种联合演习。参加演习部队均配有单兵滑雪板和马(驼)拉雪橇。

6月28日 晚,经由奉山线输送1 516名特殊工人的火车经过新民至奉天时,逃走147人。其中死亡13人,被捕11人,其余成功逃跑。

9月11日 晚,驻东宁满洲570部队使役中的“特殊工人”共43名在石门子碱厂沟袭击监视卫兵和卫兵所,打死日军2名,打伤6名,暴动逃跑。在日军追击中,2名特殊工人被打死,10人被捕后遭杀害,其余31人成功逃到苏联境内。

9月 第2、3、10、11国境守备队转入第20军并隶属其下。同年底第2国境守备队从第20军转入第1方面军第5军。

▲ 日军开始从关东军抽调部队到太平洋战场。

11月25日 伪满洲国国务院根据《国境取缔法》,将珲春、密山、虎林3县划为“特别地区”。

同年 伪满洲国政府支付“国境筑城”费用4 500万元,比上年增加1 000万元。

▲ 本年度完成第4国境要塞附近3个阵地和第13国境要塞附近5个阵地及其他3个阵地的修筑。

▲ 关东军要塞修筑开始在岩石地带修筑新式的阵地,即被称为“坑道式地下编成”。打通岩石构筑坑道或配套阵地。在各个正面的地下工事中都构筑了高级指挥部。

1944年

2～3月　是日本大本营从关东军抽调地面部队去太平洋战场和中国其他战场的第一个高潮期，关东军兵力减少到“关特演”时期的40%。

4月　海拉尔日伪当局逼迫市民再次为日军捐购一架战斗机，命名为“海拉尔”号，并在西山机场为该架战机举行命名和升空剪彩仪式。

6月13日　组建关东军第107师团，驻守索伦，师团长安部孝一中将；组建关东军富锦驻屯队，担任富锦阵地守备任务；组建第14国境守备队，担任凤翔要塞的守备任务。

6月　阿尔山驻屯队被整编到新组建的关东军第107师团。

7月15日　野战重炮第22联队（万鹿沟）调往菲律宾。

7月18日　关东军第8师团（绥阳）调往菲律宾。

7月20日　驻海拉尔关东军野战重炮兵第23联队被调往太平洋战场。

7月24日　关东军第1师团（孙吴）调往菲律宾。

▲　驻海拉尔的满洲第543部队在海拉尔以南150公里的辉河一带进行了细菌实验，造成240多人死亡。

8月　关东军地面部队被抽调出现第二个高潮期，精锐师团大部被抽调，航空兵力基本抽空。

9月18日　日军大本营向关东军及朝鲜下达了“对苏全面持久作战计划”，将过去的对苏“攻势”作战改为“持久”作战。

10月11日　由第8国境守备队和留守在海拉尔的第23师团1个大队基础上组建第119师团，同时在海拉尔组建关东军独立野炮第13大队和迫击炮第17大队；由留守在孙吴的第1师团1个大队基础上组建独立混成第73旅团；由留守在勃利的战车第2旅团1个大队基础上组建独立战车第1旅团。

10月23日　关东军驻海拉尔第23师团被调往菲律宾。

12月1日　关东军总司令部对东北地区“在乡军人”发出征召令：“凡45岁以下的男性一律征召入伍”。命令到达后，在24小时内离职入营。

12月22日　关东军第12师团（东宁）调往台湾。

同年　伪满洲国政府支付“国境筑城”费用1.1亿元，比上年增加6 500万元。

▲　在大兴安岭地区乌奴耳一带，开始修建可容纳3个师团的大规模要塞。该要塞是关东军筑城史上规模最大者，后由于资材和人员不足，未及完成就战败投降。

▲　驻孙吴的满洲673部队开始培训细菌战骨干人员。

▲　关东军要塞第二期工程竣工，共修筑17处要塞阵地和一批野战阵地。

1945年

1月　关东军要塞第三期工程启动。要使全满洲国要塞化，重点是构筑通化的双重阵地，伪满洲国内地二线和主要城市的防卫筑城，以及富锦、海拉尔、牙克石等野战阵地建设、乌奴耳要塞则以更大规模进行续建。

2月11日　美苏双方达成协议，并由苏、美、英三国首脑达成协议，共同签署了《雅尔塔协定》，即《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协定》。

2月26日　在第13国境守备队和留守在黑河第57师团余部的基础上组建关东军第125师团；

在第12国境守备队和第25师团余部的基础上组建第126师团；在第9国境守备队的基础上组建第127师团；组建独立混成第80旅团，代替原第8国境守备队担任海拉尔要塞的守备任务。

2月　苏联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开始调整远东部队高级指挥员。

3月10日　隶属于关东军直辖第4军，代号为“松风”的123师团（又称15200部队）在孙吴编成，其人员以独立混成第73旅团为基干编成。

3月20日　虎头第4国境守备队司令部编入122师团，司令部调往掖河（今宁安）。原所辖第1地区队主力编入该师团第265联队，驻守掖河；第2地区队主力编入该师团第266联队，驻守穆棱；第3地区队的一部编入该师团第267联队，驻守桦林；炮兵主力编入野炮兵第124联队，工兵主力编入工兵第122联队。第4国境守备队建制撤销。

3月31日　驻守在黑河的第57师团和驻守在密山的第11师团调往日本本土。

▲　关东军整编组成122、123、124、125、126、127、128七个步兵师团，和第77、78、79、80四个独立混成旅团。

4月5日　苏联宣布废除1941年苏日双方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

4月30日　苏第39集团军从莫斯科转运至后贝加尔的指定地点。53集团军也调到远东，加入后贝加尔方面军。

5月30日　日本大本营拟订《满鲜方面对苏作战计划要领》，并向关东军下达新的对苏作战要点，“击溃入侵满洲之敌，确保京图线以南，京大线以东要地，以利于坚持全面作战。”命令关东军进入战争状态。

5月　关东军对战线执行了缩小的新防卫政策，命令将东宁第一陆军病院后退，移驻到伪间岛省龙井城。

▲　德国法西斯战败投降。

▲　驻海拉尔关东军第119师团，奉第4军命令，各联队除少数工作无法脱身者及病弱人员留守兵营外，其余官兵均抽调到乌奴耳至伊列克得一带大兴安岭地区构筑作战阵地。同时，担任海拉尔要塞守备任务的独立混成第80旅团也抽调独立585大队所属2个中队到乌奴耳一带构筑二线阵地。

▲　伪第10军管区奉日军命令，抽调第50骑兵团的3个连去红花尔基地域、第51骑兵团的1个连去莫和尔图一带构筑阵地，另派1个连到新左旗阿木古郎接管一个原由日军防卫的阵地。

▲　苏联西伯利亚的铁路线全部归远东苏军总部使用。

6月4日　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抵达大连满铁总裁官邸，召集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中国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强调《满朝方面对苏作战计划要领》，再次明确关东军的作战要领。

6月14日　山男乙三在新京召集各方面军司令官、军司令官参加的兵团长会议、传达大本营的战略意图，研究制订作战方案。

6月下旬　关东军动员3万伪满洲国军和勤劳奉仕队，并强征一批劳工，在通化一带抢筑防御阵地工程。

6月27日　苏联最高统帅部对将要发动的“远东战役”确定了战略目标。

7月10日　关东军下令彻底动员所有在中国东北的“在乡军人”入伍。在乡军人约40万人中有25万人被动员起来编入各部队。

▲　在虎头要塞以原第4国境守备队第3地区队主力为基干，从关东军第1方面军第5军所属各部队调入约600名日军，重新编成满洲第15国境守备队，守备队长由原第4国境守备队第3地区队队长西胁武大佐担任。下辖步兵队、炮兵队、工兵队，共10个中队，总兵力1 400人，是战前唯一冠以守备队名称的队伍。

7月17日　下午5时10分，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德国柏林南部波茨坦市郊巴贝尔斯贝格镇会

晤,史称“波茨坦会议”,主要研究对日作战问题。

7 月 18 日 日本将伪满洲国划分成南满、北满、东满、兴安、锦热 5 个战区,准备在最坏的情况下实行“自战自治”体制。

7 月 26 日 波茨坦会议以宣言形式,发表美、英、中促使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该公告有 13 项内容,中心点是敦促日本帝国投降。

7 月 30 日 由第 1、第 10 国境守备队和第 2 国境守备队的一部组建独立混成第 132 旅团;由第 14 国境守备队、富锦驻屯队和独立混成第 78 旅团组建第 134 师团;在第 2 国境守备队大部、第 4 国境守备队主力、第 46 兵站警备队和独立混成第 77 旅团的基础上组建第 135 师团;在第 5、第 6、第 7 国境守备队的基础上组建独立混成第 135、第 136 旅团。

▲ 关东军新入伍者与老兵共合编成 8 个师团、9 个独立混成旅团,分别是第 134、135、136、137、138、139、148、149 师团和独立混成第 130、131、132、133、134、135、136、137 旅团、独立战车第 9 旅团及 5 个炮兵联队。

4 ~7 月 75 万苏联红军全部集结在远东,兵力增加到 157.7 万人,部队所需的物资储备也宣告完成。

▲ 苏军最高统帅部命令,正式组建远东军总司令部。

▲ 根据苏联远东军部的命令,中国抗联国际第 88 旅团将随同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参加解放东北的战斗。

8 月 3 日 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员华西列夫斯基通过电话向斯大林详细报告进攻准备已经完成。

8 月 8 日 下午 5 时,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宣读了苏联对日本的宣战书。

▲ 东北抗联国际第 88 旅 50 余人,在苏境内双城子军用机场,分乘 4 架运输机,空降到牡丹江地区执行侦察和潜伏任务。

8 月 9 日 零时后,苏联 158 万红军和太平洋舰队以及红旗阿穆尔河舰队在远东最高统帅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指挥下,向中国东北的东、北、西各部边境和朝鲜北部以及库页岛南部地区总长 4 000 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发起总攻。

8 月 9 日 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

▲ 伪满洲国军政要员在关东军的监视下召开紧急御前会议,关东军准备放弃新京,以图守住所谓“东边道防线”。

8 月 14 日 10 时 45 分,日本天皇裕仁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决定向盟军投降,并发布《停战诏书》。

8 月 15 日 12 时,日本电台广播裕仁的《停战诏书》,中、苏、美、英同时公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8 月 18 日 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正式下达停止战斗行动、解除武装的命令。

8 月 19 日 11 时,苏军快速部队 250 人空降沈阳机场,溥仪在机场被俘虏,午后 3 时押往苏联。

8 月 20 日 苏后贝加尔方面军近卫坦克第 6 集团军先遣快速支队 200 人空降至长春机场。日本关东军总部及各部队集结向苏军缴械投降。

8 月 26 日 日军固守东宁胜哄山要塞的第 783 联队 901 人投降。同日,虎头要塞残部全部被歼灭,至此,东北全境日军停止战斗行动,并被解除武装。

9 月 2 日 在日本东京湾停泊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日本向盟国投降签字仪式,宣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附 录

一、《日本关东军要塞》编纂人员

（一）《日本关东军要塞》主编简介

徐占江

徐占江，男，汉族，副编审。1951年11月18日出生于吉林省前郭县。1968年7月从满洲里下乡到呼伦贝尔草原新巴尔虎右旗当知青。1974年10月至1977年7月在齐齐哈尔师院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在呼伦贝尔盟委任秘书，在档案局和地方史志办公室从事地方史志研究。1987年任呼伦贝尔盟史志办副主任，领导呼盟地区首轮修志，并任《呼伦贝尔盟志》主编。现任呼伦贝尔市委办公厅《呼伦贝尔市要览》编辑部主编；呼伦贝尔市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会会长、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侵华日军要塞研究所所长、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诺门罕战争研究所所长。主编或与他人合著的作品有：《呼伦贝尔盟志》《呼伦湖志》《诺门罕战争》《边城满洲里》《呼伦贝尔旅游》《草原明珠海拉尔》《呼伦贝尔市情》《呼伦贝尔年鉴》《呼伦贝尔市要览》《呼伦贝尔投资环境》《呼伦贝尔办事指南》等。2002年3月发起组织《日本关东军要塞》课题组，前后历经5年多的时间，作为课题负责人率领课题组全体成员，自费对关东军在我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的17处要塞进行了深入实地调查，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组织各方面力量完成了《日本关东军要塞》的撰写，并在哈尔滨社会科学院的帮助下出版面世，填补了国内外此类课题研究的一项空白。

李茂杰

李茂杰，1936年生，辽宁省义县人。1961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东北沦陷史总编室副主编、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主要著述：合著有《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东北沦陷十四年大事编年》；主编有《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中卷、《关东军文件集》《伪满宫廷秘录》；著述有《伪满洲国》《关东军、溥仪与伪满傀儡政权机构》；大型历史文献电视片《不能忘记的历史》《东北抗日烽火》；翻译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在国内、日本、美国发表史学论文70多篇。在《日本关东军要塞》课题组中任顾问、主编，同徐占江一起主持了课题组的活动和书稿撰写。

(二)《日本关东军要塞》副主编简介

李秉刚

李秉刚,男,汉族,1948 年生于辽宁海城,1975 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历史系,现为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1980 年参加东北三省《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开始从事东北地方历史研究;2002 年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日本在东北奴役中国劳工实证调查研究》等课题,并主持开发了《中国二战劳工网》网站。2002 年参加《日本关东军要塞》课题组后,实地踏查了 17 处要塞阵地,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尤其是要塞劳工的情况。主要成果有:《辽宁人民抗日斗争简史》《万人坑——千万冤魂在呼唤》(专著);《中华英烈碑文选》《日本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编著)《日本奴役中国劳工罪行图证》(主编)等。

周艾民

周艾民,男,汉族,1956 年 3 月出生于山东省牟平。大学本科毕业,就读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进修于北京鲁迅文学院文艺理论班。定居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历任中学教师、营业员、锅炉工、企业工会主席、地方史志编辑、政策研究员、经济研究员、专业编剧、市长秘书、外贸企业经理、高新技术企业董事长等。著有《艾民小说集》、散文集《界河的梦》、长篇小说《百年旗镇》和纪实文学《"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天使嘎丽娅》《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要塞阵地群》等作品,公开发表文字 350 万字。现为绥芬河市政协委员、牡丹江市政协委员、绥芬河市工商联副会长、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抗日战争史研究会副会长、黑龙江省 WTO 研究促进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调查研究关东军要塞,自费考察,获取了大量资料。2004 年与陈云来行程万余公里,自费去河北省等地调查 43 名战俘劳工在东宁要塞暴动事件,取得重大发现,找到幸存战俘劳工张世间,解开了这个历史谜团。多年来对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要塞进行了深入研究,成果颇丰。

宋吉庆

宋吉庆,男,汉族,1953 年 11 月生于黑龙江省东宁县,现任东宁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大专学历,馆员。1996 年开始从事文物保护、要塞遗址调查和研究工作。多年来对关东军 17 处要塞遗址进行踏查与研究,整理了《东宁要塞群遗址》《劳工坟遗址》等文物遗址档案,完成《东宁要塞群遗址保护规划》。在《东北沦陷史研究》《中国文物报》《北方文物》等报刊发表论文十余篇,与高晓燕等人合作出版了《东宁要塞》,与毕玉芬、孙芹等人合作出版了《东宁要塞阵地群》。尤其是在东宁要塞的调查研究和开发利用保护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日本关东军要塞》课题组中任副主编,参与了实地踏查,绘制了十几幅示意图,并参与了书稿的终审。

郑乃东

郑乃东,男,1933 年 1 月 6 日生于内蒙古海拉尔,祖籍山东省日照。1949 年 5 月参加工作,初中毕业。中共党员,退休前为原呼伦贝尔盟公安处法研室主任(副处级侦察员)。曾主编《呼伦贝尔盟公安志》。曾为海拉尔政协编辑的《海拉尔文史资料》、呼盟史志办编辑的《呼伦贝尔史志资料》等书刊及呼伦贝尔日报《杂话呼伦贝尔》专栏撰写许多史志文章,并曾在北京《海外文摘》杂志上发表《蒋经国的转正报告》俄译汉文稿。后以海拉尔历史研究会副主任身份参与编审出版《海拉尔历史风云

录》工作。2002 年 3 月参加《日本关东军要塞》课题组。

孙永林

孙永林,男,汉族,副研究员,黑龙江省虎林市人,1947 年 3 月 15 日出生。曾经当过中学教员、市图书馆馆长、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函授专修科毕业。十余年来,数百次踏查虎头要塞各阵地,参与测量、发掘等工作,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拍摄照片数千张,测绘地图数十张。参与了虎头要塞博物馆的立项、建馆布展等工作,并与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老兵、要塞研究工作者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曾发表《试论文献利用》《虎头要塞虎东山地下工事清理报告》等论文十几篇。

杨柏林

杨柏林,男,汉族,1936 年生于黑龙江省孙吴县,16 岁参加革命即从事宣教工作,历任宣传部干事,文化馆员,广播站编辑、播音员,广播电视局、县科协、文联、宣传部、统战部、县政协干部。数十年潜心研究孙吴伪满历史,尤其是对霍尔莫津要塞阵地及修筑要塞的劳工、要塞慰安妇、开拓团等方面的研究颇为深入,积累了大量资料。设计并布展了"孙吴县日本侵华罪证陈列馆",设计 20 余座(册)小型展览馆及大型画册,出版有《孙吴蒙尘岁月》。

吕杰

吕杰,男,汉族,1955 年生于黑龙江省黑河市。曾任黑河八一 O 台党支部书记,高级政工师,大专学历。下乡当过知青,参加过人民解放军,当过人民教师。1992 年,开始从事关东军黑河、瑷珲、法别拉要塞的调查研究工作。同年将黑河八一 O 台后山的原日军地下工事遗址进行开发,并于当年推出了黑河市"北门镇侵华日军地下工事遗址展"。1999 年,在八一 O 台二楼建 300 余平方米的展览馆,同年展览馆被黑龙江省委批准为"省级国防教育基地",2001 年被黑龙江省委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十余年里,数十次实地踏查了黑河、瑷珲、法别拉要塞阵地,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2005 年,完成了十五集系列电视纪录片《大江作证》的策划和撰稿,其中第一部六集纪录片《要塞探秘》在黑河市播出后,还在省台四频道和省农垦学院电视频道播出。

赵玉霞

赵玉霞,女,汉族,1973 年 10 月 1 日出生于内蒙古牙克石市乌尔旗汉镇。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本科自考毕业。现任中共呼伦贝尔市委办公厅《呼伦贝尔市要览》编辑部副主编。从 2000 年开始从事东北沦陷史和北方民族史、蒙古史及呼伦贝尔地方史志的研究。在东北沦陷史研究中,重点研究方向为侵华日军要塞、侵华日军细菌和毒气战、日本移民开拓团、日军慰安妇、劳工、远东战役等。参与了历时 5 年的关东军 17 处要塞和巴彦汗毒气实验场的调查与研究,是该课题组中唯一的女性。主要作品有《侵华日军在呼伦贝尔进行的细菌毒气战》(专著)、《呼伦贝尔市情》《呼伦贝尔市要览》《呼伦贝尔旅游》《草原明珠海拉尔》(副主编);主要论文有《呼伦贝尔地区日本开拓团初探》《侵华日军倚重的海拉尔要塞》《抗日爱国将领吴德林》《加强博物馆建设,促进旅游业发展》《古代呼伦贝尔巾帼英雄——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古代呼伦贝尔女杰——成吉思汗的夫人孛儿帖》《二战时期世界上最大的巴彦汗毒气实验场》等 30 余篇。

陈云来

陈云来,男,汉族,1963 年 6 月出生于黑龙江省伊春。大学本科毕业,先后就读于伊春市教育学

院历史专业，黑龙江省委党校中文专业。历任伊春市乌伊岭区广电局编辑、绥芬河电视台记者、新闻部主任、专题部主任，现任绥芬河广播电视台副台长。现为牡丹江市广播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抗日战争史研究会常务理事。多年从事伪满国境要塞阵地和要塞战俘劳工、要塞慰安妇的调查研究，曾在《东北十四年沦陷史研究》杂志、《北方文学》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和纪实文学；同时出任电视专题片、纪录片《为了难以忘却的历史》《战俘劳工在哪里》《天使嘎丽娅》的策划、编导，其《和平天使嘎丽娅》被译成俄语在莫斯科 HTV 电视台播出，还相继在美国、加拿大、日本、台湾、香港等华语电视台播出，并获黑龙江省广播电视学会一等奖、黑龙江省政府新闻奖一等奖。

赵 江

赵江，男，汉族，1960 年生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大专学历，1978 年 12 月在孙吴县林业局参加工作，历任系统工会、行政、林产外经贸、林业经营管理、林业科研、大果沙棘技术服务等负责工作。从 2000 年开始，赵江受命从事孙吴县日本关东军霍尔莫津要塞(胜山要塞)第 5 国境守备队的遗迹研究与开发工作。从 2002 年 3 月起参加《日本关东军要塞》课题组，同杨柏林先生一起承担孙吴县境内霍尔莫津要塞的全面调查、资料整理、稿件撰写工作。直接参与胜山要塞国家级森林遗迹公园发展规划的设计、可行成果的编写，多次进京、上省，聘请专家，审批规划，争取资金，终于在 2004 年孙吴胜山要塞获国家林业部门批准为国家级森林遗迹公园。之后即全身心地投入公园建设与遗迹开发、史学研究工作。目前，要塞区内已建设楼房一座，供管理人员和游人使用。新修道路十多公里，修桥两座，开发日军仓库、兵舍营房、炮位、通道、阵地、地下工事数十处，并设立了永久标识。多次被评为省、市、县级模范人物。

白志伟

白志伟，男，汉族，1956 年 12 月 17 日出生于内蒙古牙克石市。1974 年入伍，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连陆军学院。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呼伦贝尔军分区军事志编辑部副主编。代表作《呼伦贝尔军事志》(公元前 200 年至公元 2000 年专志，任总纂)。有 9 篇论文被《军事学术》登载。先后参与了关东军要塞和内蒙古呼伦贝尔巴彦汗地区日军毒气实验场、诺门罕战场中国部分的调查与研究。

(三)参与《日本关东军要塞》工作人员名录

(以编章先后为序)

第一编 总 述

撰 稿 徐占江 郑乃东 赵玉霞 闫景全

制 图 徐占江 郑乃东

第二编 日军要塞

第一章 珲春要塞

撰 稿 徐占江 赵玉霞 闫景全

摄 影 徐占江 宋吉庆

考 察 徐占江 李茂杰 李秉刚 宋吉庆 赵玉霞 高嵩峰 董彦斌

第二章 东宁要塞

撰 稿 宋吉庆 毕玉芬 孙 芹 张景辉

摄　影　宋吉庆
制　图　宋吉庆　毕玉芬　孙　芹　张景辉
考　察　宋吉庆　毕玉芬　孙　芹　张景辉

第三章　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要塞

撰　稿　周艾民　陈云来
摄　影　周艾民　陈云来
制　图　周艾民　陈云来　陈小宁　戴　璐
考　察　周艾民　陈云来　陈小宁　戴　璐

第四章　虎头要塞

撰　稿　孙永林　胡德久　喻胜林　刘颖军　胡秀华
摄　影　孙永林
制　图　孙永林　丁　柏　喻胜林
测　量　孙永林　胡德久　喻胜林　丁　柏　刘颖军　陈大骞
考　察　孙永林　胡德久　喻胜林　丁　柏　刘颖军　陈大骞

第五章　半截河、庙岭要塞

撰　稿　徐占江　赵玉霞　华玉峰　郝洪波
摄　影　徐占江　白志伟　刘向岗　华玉峰
考　察　徐占江　李茂杰　李秉刚　宋吉庆　赵玉霞
　　　　高嵩峰　白志伟　刘向岗　华玉峰　郝洪波
制　图　徐占江

第六章　霍尔莫津要塞

撰　稿　徐占江　杨柏林　赵　江　郑乃东　闫景全　王福华
摄　影　杨柏林　赵　江　徐占江　王福华
考　察　杨柏林　赵　江　徐占江　李茂杰　白志伟　赵玉霞
　　　　宋吉庆　郑乃东　王福华　郭维福　高玉莹
制　图　宋吉庆　郑乃东

第七章　瑷珲、黑河、法别拉要塞

撰　稿　吕　杰
摄　影　吕　杰　徐占江　王福华　钟承志　孙殿奇
校　审　曹　英　赵玉霞（黑河）
考　察　钟承志　孙殿奇　胡　光　吕兆锴　徐占江
　　　　李茂杰　宋吉庆　郑乃东　王福华　赵玉霞
制　图　吕　杰　宋吉庆　郑乃东

第八章　富锦、凤翔要塞

撰　稿　徐占江　闫景全　赵玉霞
摄　影　白志伟　徐占江　刘向岗
考　察　徐占江　李秉刚　白志伟　刘向岗　马玉新
制　图　马玉新　徐占江

第九章　海拉尔要塞

撰　稿　徐占江　郑乃东　王福华　赵玉霞　闫景全
摄　影　徐占江　白志伟　刘向岗　王福华　李成义

制　图　王福华　郑乃东　白志伟

考　察　徐占江　郑乃东　王福华　李成义　白志伟　刘向岗

赵玉霞　宁珊珊　宓　强　葛　亮　王卓顺　夏德兴

张国峰　殷焕良　哈　达　奥　奇　肖演艺　赵小宇

马　明　张描姝　高　娃　李秀梅　李　彬

第十章　阿尔山要塞

撰　稿　徐占江　白志伟　赵玉霞　闫景全　王　文

摄　影　徐占江　白志伟　王　文　邹玲玲

制　图　徐占江　白志伟　王　文

考　察　徐占江　白志伟　李秉刚　高嵩峰　叶德生

王　文　邹玲玲　赵方华

第十一章　乌奴耳要塞

撰　稿　徐占江　赵玉霞　白志伟

摄　影　徐占江　白志伟

制　图　徐占江　王树明

考　察　徐占江　李秉刚　白志伟　高嵩峰　王树明　赵天赤

第三编　修筑要塞的劳工

撰　稿　李秉刚　高嵩峰

摄　影　李秉刚

第四编　强化要塞区的殖民统治

撰　稿　郑乃东　徐占江

第五编　日本开拓团与要塞慰安妇

撰　稿　郑乃东　徐占江　赵玉霞　闫景全

第六编　要塞区的细菌毒气战

撰　稿　赵玉霞

第七编　苏联红军攻克日军要塞

撰　稿　徐占江　郑乃东　闫景全　王福华　赵玉霞　宋吉庆

周艾民　陈云来　孙永林　杨柏林　赵　江　吕　杰

摄　影　徐占江　王福华　宋吉庆　周艾民　陈云来

吕　杰　赵玉霞(黑河)　华玉峰

第八编　要塞的调查研究与保护利用

撰　稿　徐占江　闫景全　宋吉庆　周艾民　陈云来

孙永林　吕　杰　杨柏林　赵　江　王　文

李云桥　胡凤斌　华玉峰

摄　影　孙永林　宋吉庆　周艾民　杨柏林　吕　杰

徐占江　白志伟　邹玲玲　陈云来　华玉峰

第九编　大事记

撰　稿　郑乃东　徐占江　闫景全　赵玉霞　王福华

李秉刚　宋吉庆　孙永林　周艾民　吕　杰

杨柏林　华玉峰

二、《日本关东军要塞》参考书目

田志和著:《对日寇最后一战》,长春出版社,2005年7月。
张志强主编:《伪满洲国的“照片内参”》,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2月。
傅大中著:《伪满洲国军简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12月。
孙邦主编:《伪满军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
王希亮著:《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统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
汪宇燕、何明编著:《苏联出兵东北始末》,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
孙继武、郑敏主编:《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调查与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1月。
苏智良著:《慰安妇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3月。
周艾民著:《天使嘎丽娅》,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
周艾民著:《“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8月。
宋吉庆、毕玉芬、孙芹著:《东宁要塞阵地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
陈云来、周艾民著:《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要塞阵地群》,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
韩茂才著:《要塞风云》,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4年4月。
王承礼等主编:《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上、中、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7月。
高晓燕等主编:《东宁要塞》,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
赵玉霞编著:《侵华日军在呼伦贝尔进行的细菌毒气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杨柏林编著:《孙吴蒙尘岁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
王辅著:《日军侵华战争》(1~4),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
柳风著:《百万日军亡命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7月。
霍燎原等主编:《日伪宪兵与警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
梅桑榆著:《日军铁蹄下的中国战俘与劳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8月。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编:《关东军文件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
孔令波等主编:《东北抗日联军》(上、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
王国栋编译:《日本细菌战战犯伯力审判实录》,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
刘邦厚主编:《血沃关东十四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
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韩国挺身队研究会编:《被掠往侵略战场的慰安妇》,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1月。
东北烈士纪念馆编:《历史的瞬间—苏联红军在东北》,人民出版社、欧亚出版社,2005年4月。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策划:《胜利的回忆》,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4月。
林声主编《“九一八”事变图志》、马越山主编《“九一八”事变实录》、谭译主编《“九一八”抗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
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
王秉忠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大事编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
孙玉玲、赵东辉主编:《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
李茂杰、孙继英主编:《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中),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
步平、辛培林主编:《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
沈阳军区司令部情报部编:《1945年苏军远东战役资料汇编》,1976年12月。

东宁县志办公室编:《东宁县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 3 月。

孟宪章等编:《苏联出兵东北》,中国大百科全书,1995 年 6 月

徐焰编:《北国狂飙》,沈阳出版社,1995 年 10 月。

姜念东等著:《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年 10 月。

绥芬河市志编委会编:《绥芬河市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 6 月。

虎林县志编纂委员会:《虎林县志》,中国人事出版社,1992 年 10 月。

〔苏〕安东诺夫等著:《满洲之战》,东北书店印行,1949 年。

〔苏〕扎哈罗夫著:《结局》,上海出版社。

〔苏〕别洛鲍罗多夫著:《突向哈尔滨》,军事出版社。

〔苏〕列夫・卢宾什捷音著:《在满洲的山岗上》,俄联邦教育部国家儿童文学出版社,1948 年。

〔苏〕弗诺特钦科著:《远东的胜利》,辽宁人民出版社,1979 年 2 月。

〔日〕小林静雄著:《遥远的黑龙江》,友朋书院,2003 年 2 月。

〔日〕林濑守保著:《私の从军中国战线》写真集,日本机关纸出版社,1987 年 12 月。

〔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著〔关东军(1)(2)〕,朝云新闻社,1983 年。

〔日〕石门子会、东宁满铁会合著:《关东军东宁战绩》,平成六年三月。

〔日〕战友会著:《东宁二０七会十年史》,平成七年八月。

〔日〕东宁报国农场会编:《东宁报国农场会》,平成八年。

〔日〕佐藤和正编:《最后的关东军》,白金书房出版,1972 年。

〔日〕满洲第 137 部队战友会编:《满洲第 137 部队志》,鹿岛孔出版社,昭和六十二年。

〔日〕仓桥凌子著:《宪兵父亲留下的遗言》,株式会社高文研,2002 年 6 月。

〔日〕日本全国虎头会编:《苏满国境虎头要塞战记》,1997 年 11 月。

〔日〕日中共同学术和平调查团日方编辑委员会编:《虎头要塞——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激战地》,青木书店,1995 年 7 月。

〔日〕冈崎哲夫著、肖炳龙译:《日苏虎头决战秘录——关东军虎头要塞失陷纪实》,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 年 5 月。

〔日〕《满洲の纪录》,集英社出版,1995 年 8 月。

〔日〕菊 池 实等编:《战争遗迹の事典》,柏书房,2002 年 6 月。

〔日〕日中共同学术平和调查团日本侧编集委员会编:《ソ满国境虎头要塞》,青木书店,1995 年 7 月。

〔日〕日中平和调查团编:《沈默の大地》,风媒社,2000 年 8 月。

〔日〕满ソ殉难者慰灵颙彰会:《满ソ殉难记》,1980 年。

〔日〕楳本舍三著、高书会、袁韶莹译:《关东军秘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年。

〔日〕岛田俊彦著、李汝松译:《日本关东军覆灭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年。

〔日〕森村诚一著、祖秉和、唐亚明译:《食人魔窟:第一部——日本关东军细菌战部队的恐怖内幕》,群众出版社,1982 年。

〔日〕天田达也、仓谷三男四郎编:《陆军火炮写真集》——明治、大正、昭和火炮精粹,平成 12 年 3 月。

〔日〕浅田乔二、小林英夫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统治》,1994 年。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会编、步平等译:《满洲国史》,1990 年 9 月。

〔日〕林 三郎编著:《关东军和苏联远东军》,吉林人民出版社,1979 年 1 月。

三、《日本关东军要塞》编纂始末

徐占江

《日本关东军要塞》编纂缘起

1967年9月，我还是一个16岁的中学生，当时家住满洲里市。自小喜欢军事，梦想当一个兵。听说海拉尔北山有日本人修的山洞，时值"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无事可做，便坐火车到了海拉尔。北山离车站很近，走了将近1公里，真的看到了裸露着的混凝土洞口。顺着台阶走下，点上了蜡烛照亮，走了70余个台阶到了洞里的通道，前方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黑暗，阴森森的，很吓人，不敢再往里走，顺原路仓惶返回，这就是在海拉尔北山（后知此山日本人称"河南台"）山洞探险留给我的第一个记忆。

1968年7月，我从满洲里到新巴尔虎右旗赛汉塔拉苏木上山下乡。在辽阔的草原上放羊，脑海里还时常闪现进入海拉尔北山的山洞探险的经历。羊儿在吃草，我躺在草地上仰望蓝天，问号不时出现：日本人为什么要修这些山洞？这些山洞里都是什么样子？1974年10月，进入齐齐哈尔师范学院中文系学习。我曾到图书馆去查阅这方面的史料，但查不到。1977年8月毕业回到了呼伦贝尔不久，便开始了呼伦贝尔历史的研究工作。1987年，在主编《呼伦贝尔盟志》时，为做好《军事志》的编纂，曾对北山的山洞进行踏查，但因条件所限只做了初步的工作，在志书里做了大概的记述。1999年，海拉尔市政府对北山日军工事进行开发，建设旅游景区，我应聘为其进行设计。因此对地上、地下工事进行了踏查，对日军工事有了一定的了解。

2001年9月，我到哈尔滨参加东北中日关系研究协会举办的年会。会后我随十几个代表到东宁要塞考察。在东宁要塞勋山阵地，通过考察地上、地下工事和了解劳工、慰安妇等史实，我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海拉尔要塞同东宁要塞的日军工事一齐在脑海里闪现，一个念头出现了——我要组织力量写一部揭去日本关东军要塞神秘面纱的专著，要用我们的劳动去解开这历史之谜。当我返程路经绥芬河市时，正值绥芬河电视台播出再现绥芬河要塞历史和现状的专题片——《为了难以忘却的历史》，我的心又一次被震撼，更加坚定了我完成这部专著的决心。

回到海拉尔，我便开始联络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的专家学者及各要塞所在地的要塞研究人员。我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回应。大家都很愿意联合起来，共同攻关，完成这一专著。

2002年3月2～3日，在哈尔滨祥麟宾馆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吉林省长春的东北沦陷史总编室副主编李茂杰、绥芬河东北亚研究会会长周艾民、东宁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宋吉庆、黑河市八一O台支部书记吕杰、孙吴县林业局赵江、虎林市文物管理所喻胜林、海拉尔呼伦贝尔市委办公厅徐占江、赵玉霞；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辛培林所长、研究员高晓燕，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研究所所长金成民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会议就组成课题组对关东军要塞进行实地调查、编纂《日本关东军要塞》一书进行了热烈发言。大家一致认为：

1. 我们要怀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精神来参与这项具有十分重要现实和历史意义的工作，一定要高起点、高立意、高水平，把《日本关东军要塞》一书做成精品和传世之作。

2. 这个课题组的成员多为民间学者组成，没有经费来源，所有调查研究活动均为自费进行。我们

要正视这种现实,克服各种困难,把这项工作做好。

由李茂杰做课题组顾问,指导课题组的工作;徐占江做本书主编,主持课题组的各项工作的开展;各成员负责所在地要塞的调查研究和编纂书稿的工作:杨柏林、赵江负责霍尔莫津要塞,吕杰负责瑷珲、黑河、法别拉要塞,孙永林负责虎头要塞,徐占江、郑乃东、赵玉霞、白志伟负责海拉尔要塞,周艾民、陈云来负责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要塞。无专人调查和撰稿的要塞由徐占江负责组织力量调研和撰稿。

就这样,一个以业余史学工作者为主,并有专业史学工作者参与的团队形成了,他们以高昂的士气和不可动摇的决心走向了关东军要塞调查研究与专著撰写的漫漫征途。

调查研究与撰写书稿

2002年4月,由徐占江编写了《日本关东军要塞》一书的编纂方案、行文规则及全书的篇目。于2002年6月22~26日在海拉尔召开了第二次课题组成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茂杰、李秉刚、周艾民、宋吉庆、吕杰、胡德久、徐占江、赵玉霞、郑乃东。会议讨论修订了《日本关东军要塞》的编纂方案、行文规则及篇目,并考察了海拉尔要塞。对下一步的工作进行了认真讨论和部署。

2002年9月18~19日,课题组成员参加了在东宁召开的《侵华日军中苏边境筑垒地域与殖民统治研讨会》,同时召开座谈会,研究书稿编写和考察活动的相关问题,并考察了东宁要塞。参加会议的有:李茂杰、李秉刚、高嵩峰(辽宁省委党校)、周艾民、宋吉庆、吕杰、徐占江、赵玉霞。会后于9月20~27日对珲春、虎头、庙岭、半截河要塞进行了考察。参加考察活动的有:李茂杰、李秉刚、高嵩峰、宋吉庆、陈云来、徐占江、赵玉霞、董彦斌。虎林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孙永林及喻胜林等人参加了虎头要塞的考察;密山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华玉峰参加了庙岭要塞的考察;鸡东县文物管理所所长郝洪波参加了半截河要塞的考察。

2002年5月和9月,绥芬河周艾民、陈云来等人自费招标地质勘探队,对天长山阵地等进行物探,寻找被炸毁的地下工事,取得一些重要成果。

2002年10月23日,徐占江、李秉刚、高嵩峰等人考察了乌奴耳要塞;10月25~27日,徐占江、李秉刚、高嵩峰、邹玲玲考察了阿尔山要塞,阿尔山市的叶德生、鞠浩等人参加了考察。

2003年2月28日至3月1日,徐占江组织了呼伦贝尔军分区、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海拉尔武装部、海拉尔铁路分局、海拉尔旅行社等单位共25人分成4组对海拉尔要塞的河南台阵地的地下工事进行了全面考察和测量,做出地下工事通道、房间照片一册100余页,地下工事通道和房间的测量数据及测绘图一套。

2003年3月31日,在绥芬河市召开了课题组全体会议。会议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讨论了《海拉尔要塞》部分初稿,并以此作为样稿,供各地撰稿时参考。4月1日,与会者考察了绥芬河要塞。参加会议和考察活动的有:李茂杰、徐占江、李秉刚、周艾民、陈云来、宋吉庆、吕杰、孙永林、赵江、华玉峰、郝洪波、白志伟、刘向岗(呼伦贝尔军分区)等。

2003年4月2~12日,由徐占江、李秉刚、白志伟、刘向岗组成的考察组考察了东宁、半截河、庙岭、虎头、富锦、凤翔要塞。各要塞所在地的宋吉庆、郝洪波、华玉峰、孙永林、马玉新及饶河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杨玉才等人陪同考察。

此次考察由于有呼伦贝尔军分区的白志伟和刘向岗参加,他们丰富的军事知识,使我们的考察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对半截河的杏山阵地、小鹿台阵地的考察,获取了新的数据和摄影资料;对庙岭、虎头、饶河、富锦、凤翔等地的考察也使我们对这些要塞和阵地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2003年10月29~31日,李茂杰、徐占江、赵玉霞赴黑河孙吴县考察,先后考察了黑河要塞的金

山(北门镇)阵地和丸山阵地及霍尔莫津要塞的胜山阵地。吕杰、杨柏林、赵江等参与考察。

从2003年4月至2004年为各撰稿人撰稿时间,期间仍有一些较重要的考察活动。

2003年11月,周艾民、陈云来自费到河北等省市寻找在东宁要塞暴动的战俘劳工幸存者,行程2万里,耗资数万元,费尽千辛万苦,征访了70余人,终于找到了幸存者张世问,解开了这个历史谜团,更为一些战俘明确了身份,为落实政策提供了有力证据。

2004年9~10月,海拉尔徐占江、白志伟、郑乃东、王福华、赵玉霞、李成义、宁珊珊等多次到海拉尔要塞的5个阵地和谢尔塔拉、巴彦汗野战阵地及巴彦汗毒气实验场进行考察。

2004年10月18~22日,徐占江、宋吉庆、郑乃东、王福华、吕杰、孙殿起、孙国田(大庆市摄影家)等人考察了瑷珲、黑河、法别拉要塞,此次考察收获颇丰,测量了瑷珲要塞南山阵地的地下工事和黑河的金山、丸山、高山等地面、地下工事及法别拉要塞的地面、地下工事,获取了大量数据。

2004年10月23~26日,徐占江、宋吉庆、郑乃东、王福华、杨柏林、赵江、郭维福等人考察了霍尔莫津要塞阵地,测量了胜山阵地指挥部、仓库、炮阵地和花见山"特仓"阵地,尤其是考察和测量了毛兰屯野战阵地,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2005年5月20~21日,徐占江、赵江再一次考察霍尔莫津要塞,重点考察了清澄山炮阵地,并获取了各阵地的大量数据和资料。

2005年6月9~10日,徐占江、白志伟、李方元、王树明等人考察了乌奴耳要塞,测量了地下工事、炮阵地、线形防御工事及水井、蓄水池、劳工棚、指挥所等。

2005年6月11~13日,徐占江、白志伟、李方元、王文、叶德生等考察了阿尔山要塞,重点考察测量了白狼花炮台指挥所、营房、发电室、仓库、水井和兴安南隧道守护堡垒及五岔沟飞机场等。

除上述较集中的考察活动外,要塞各分课题组则开展了无法统计的考察、测量等活动。

绥芬河要塞分课题组在周艾民带领下,多年来数百次深入要塞阵地进行考察和测量及物探,结合史料逐一核对名称、地点、工事,并进行摄像、摄影、绘图,形成了一整套要塞的详细影像和文字资料,为高质量撰写书稿打下了重要基础。

虎头和东宁要塞的孙永林、宋吉庆都是当地文物管理所的所长,他们结合专业工作,多年如一日地对要塞进行调查研究,实地踏查、摄影、测量、绘图,做出了突出成绩。

黑河的吕杰、孙吴的杨柏林和赵江及海拉尔的徐占江、郑乃东、王福华、白志伟、赵玉霞、李成义等人十余年来数十次考察要塞阵地,获取了大量影像、测量数据等资料。

书稿撰写工作虽然进度不一,但各分课题组都尽自己所能在努力工作。至2004年末,海拉尔、黑河、绥芬河、东宁要塞及李秉刚撰写的"修筑要塞的劳工"已交上较完整的书稿,虎头、霍尔莫津、庙岭要塞交上部分初稿,珲春、富锦、半截河、阿尔山、乌奴耳要塞还没有动手写。2004年12月31日在哈尔滨召开了书稿撰写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李茂杰、徐占江、李秉刚、宋吉庆、周艾民、陈云来、杨柏林、赵江、孙永林、郑乃东。会议分析了书稿撰写形势,提出了保证质量、加快进度的要求,并确定由徐占江负责未完成稿件的撰写、部分初稿的补充及加强业务指导。已交上的稿件要进行修改,补充完善。

2005年3月12~13日,在哈尔滨召开了书稿研讨会,研讨了书稿的《总述》部分,并对下一步撰稿工作进一步提出了要求。

2005年6月,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决定将本书纳入重点课题。

2006年1月书稿主体部分完成,将经编辑后的稿件返回各撰稿人复审修改,并将全书交李茂杰审阅,同时聘请赤峰范郁森对书稿进行文字把关校订,送辽宁省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滕建华、参谋刘成立等人从军事角度给与把关审阅,珲春要塞部分寄给珲春边防某团司令部参谋王师锐审阅。

2006年3月20日,徐占江赴长春听取李茂杰的审稿意见,并将各位撰稿人、审稿人的意见汇总,从2006年4月起,全面修改书稿和补充相关内容。2006年8~10月将修定的书稿再次交撰稿人周艾民、陈云来、宋吉庆、杨柏林、赵江、孙永林、吕杰和华玉峰、王文等人审定。2006年12月21日和23

日，李茂杰和宋吉庆先后到海拉尔，对全书进行审定。根据各方面的意见，由徐占江对全书进行统一修改、定稿，于2006年12月31日交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本书委会领导终审同意，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特别能战斗的团队

《日本关东军要塞》从2002年3月启动课题，到2006年12月31日交付出版社出版，用将近5年的时间，依靠我们这支特别能战斗的团队和在许多单位、热心人的支持和帮助才完成了这部巨著。

在我们这支团队里，上有70余岁高龄老者，下有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精神及自甘寂寞、淡泊名利、勇于奉献的素质和修养，时时刻刻激励、鼓舞自己去克服各种困难，完成《日本关东军要塞》一书的编纂和出版工作。

李茂杰：这是位德高望重的专家，《东北沦陷史研究》副主编。他是研究东北沦陷史的著名学者和领军人物。在课题组里，他既是一位核心人物，指导大家实地调查研究和编纂书稿；又是一位实战人物，他不顾70岁高龄亲自爬高山、下地洞参与要塞遗址的实地踏查；他既付出辛劳审阅书稿，又善于协调解决课题组遇到的难题。在考察珲春要塞小五家子阵地时，由于连日疲劳考察和行走过急，心脏病突发，险些发生不幸；在审阅初稿时，正值2006年春节，他放弃了假日休息，起早贪黑审阅书稿，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2006年末终审书稿时，又不顾严寒专程从长春赶赴冰天雪地的海拉尔，一天只睡几个小时，工作了5天，终审了书稿，保证了本书的质量。他用自己的心血和辛劳，同徐占江一起主编完成了《日本关东军要塞》的编纂出版工作。

李秉刚：这是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他是辽宁省委党校的教授，在课题组里，他没有教授的架子，同课题组里的业余要塞研究者一起摸爬滚打，实地踏查了关东军的17处要塞及其他地区的军事工事，获取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课题组里，他主攻"修筑要塞的劳工"分课题，足迹踏遍东北各地相关县市，又远赴海南、上海、北京、石家庄等数十个地区征访劳工、知情者和查阅档案资料，并主动提供搜集到的与其他分课题相关的资料和图片。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谦和善解人意的风范受到课题组成员的尊崇。他按课题组的要求，最早交了初稿，并认真修改，终于高质量完成了撰稿任务。

周艾民：这是位民营企业家、作家，住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多年从事要塞调查和研究，20余年里踏查过关东军17处要塞和其他阵地，著有首次披露关东军要塞的《东方马其诺防线大揭秘》。对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和东宁等要塞数百次进行踏查、测量和物探等，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并有多篇论文等作品发表。2003年同陈云来一起自费到河北省等地寻访东宁43名暴动战俘幸存者，行程万余公里，终于找到了43名战俘幸存者之一张世问，解开了这一历史之谜。出资举办了2004年3月课题组的绥芬河书稿评审会议。2005年8月举办了关东军要塞的展览，在哈尔滨和东宁展出。与陈云来撰写了本书第二编第三章《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要塞》，周艾民是本章的摄影和制图。2005年同陈云来合作出版了专著《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要塞阵地群》。参与了本书部分书稿的审读，并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

宋吉庆：黑龙江省东宁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是课题组里一位颇具威望的实干家。他参与了课题组召开的所有会议和组织的考察活动，认真完成了所承担的《东宁要塞》的撰稿任务及照片、图的提供。他多次参加要塞的踏查、测量工作，尤其是在考察霍尔莫津、黑河、瑷珲、法别拉、珲春等要塞中，承担和完成了测量和制图任务，受到大家的好评。参与了本书的多次评审会议，认真审读书稿。尤其是2006年12月23～26日冒着严寒从东宁到海拉尔参加本书的终审工作，日以继夜地审读书稿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对保证本书质量起到了重大作用。

孙永林：黑龙江省虎林市文物管理所所长，虎头要塞博物馆馆长。多年来一直从事虎头要塞的调

查和研究及开发保护工作。认真完成了承担的《虎头要塞》的撰稿和照片、图的提供任务。对前去虎头要塞进行考察的课题组成员给予了热情接待，使他们顺利完成了任务。在他的领导下，虎头要塞的研究达到了一定的深度，积累了大量的照片和各种平面图、示意图及文字资料。与日本、俄罗斯等国要塞研究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参与了虎头要塞博物馆的立项和建设工作，使之成为全国第一个要塞博物馆。

杨柏林：黑龙江省孙吴县委退休干部。一直从事霍尔莫津（胜山）要塞的调查研究和开发保护工作。几十年矢志不渝，设计建成了侵华日军在孙吴罪行展馆，著有《孙吴蒙尘岁月》等专著。他不顾年迈体弱多病，数十次对胜山阵地及日军其他设施遗址进行踏查和测量，获取大量第一手资料。除自己热心于要塞研究工作外，还大力培养和扶持了一些年轻人投身到要塞研究事业中来。多次接待了课题组到孙吴县的考察，并对前来孙吴进行要塞宣传的新闻媒体给予大力支持，无偿提供各种资料，受到了高度赞扬和好评。

郑乃东：退休前是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副处级侦察员，一直爱好文史，对呼伦贝尔沦陷史颇有研究。1993年退休后全部精力投入到文史研究上。2002年3月参加《日本关东军要塞》课题组，数十次参加对海拉尔要塞的考察，参加了课题组对黑河、瑷珲、法别拉、霍尔莫津要塞的踏察，多次参加书稿研讨会。参与撰写了《日本关东军要塞》书中的《总述》《海拉尔要塞》《苏联红军攻克关东军要塞》等编章中的部分内容。他虽然已年过70岁，但仍像年轻人一样参与课题组的活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就在他病逝前的十几天，还数次参加了对海拉尔要塞的考察和测量工作。

吕杰：黑河市八一O台党支部书记。他从1992年起开始对黑河、瑷珲、法别拉要塞进行调查研究，数十次对这3处要塞进行踏查、测量、摄像，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完成了这3处要塞的撰稿任务。1992年将关东军黑河要塞金山阵地（北门镇）地下工事遗址进行开发，供游人参观，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1999年在八一O台二楼建起300平方米的展览馆。就在他身患绝症之际，仍坚持修改书稿，上山考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赵玉霞：呼伦贝尔市委办公厅《呼伦贝尔市要览》编辑部副主编。她是课题组里唯一的一位女性。2002年3月同课题组负责人、主编徐占江一起筹备召开了首次课题组成员会议。此后便承担起了课题组的行政事务管理、档案资料搜集整理、书稿撰写和校对等书稿编辑业务。参加了课题组对珲春、虎头、东宁、绥芬河、半截河、庙岭、黑河、霍尔莫津、海拉尔等要塞的考察。她像男同志一样爬高山、钻山洞、做记录、搞测量，并负责课题组考察活动的后勤服务。尤其是从2004年起，在负责书稿的撰写和编校工作中，协助主编做了大量的默默无闻的工作，以第一读者身份4遍通读了全书，对保证书稿的质量做出了突出贡献。

赵江：黑龙江省孙吴县林业局干部。从2000年开始对位于孙吴县境内的霍尔莫津要塞（胜山要塞）进行调查研究与开展保护利用开发工作。2002年参加《日本关东军要塞》课题组，同杨柏林一起参与对霍尔莫津要塞的调查活动和资料搜集整理、稿件撰写工作。多次参与课题组组织的考察活动，为课题组的考察活动提供了多方面的便利条件，保证了考察活动的顺利进行。

陈云来：绥芬河电视台副台长。多年来一直从事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要塞的调查研究工作。多次赴俄罗斯进行征访，获取许多重要资料。2003年同周艾民一起对在东宁要塞暴动的战俘劳工进行寻访，行程万余公里，终于寻访到了战俘劳工幸存者张世问，解开了这个历史谜团。与数十名日本老兵和友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受到他们的尊重。参与了课题组对东宁、虎头、庙岭、半截河、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等要塞的考察活动，充分发挥其特长，对各要塞阵地进行了摄像，获取大量第一手声像资料，对要塞的研究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同周艾民一起完成了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要塞的撰稿任务。

白志伟：呼伦贝尔军分区军事志主编。作为一名军人，在课题组的考察、测量、摄影、撰稿等工作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用娴熟的军事知识从军事工程的专业角度,指导课题组对要塞的考察和研究,使课题组的工作质量不断提高。参加了东宁、绥芬河、鹿鸣台、观月台、虎头、庙岭、半截河、黑河、瑷珲、法别拉、霍尔莫津、凤翔、富锦、海拉尔、乌奴耳、阿尔山要塞的考察,获取了大量第一手摄影及文字资料,为课题组撰写书稿奠定了重要基础。

华玉峰:密山市文物管理所所长,在3次考察庙岭要塞的活动中,都积极、认真做准备,尽自己的能力为课题组提供便利条件,保证了庙岭要塞考察工作的顺利进行。他还认真地完成了庙岭要塞有关资料的提供工作,撰写了庙岭要塞的部分书稿,参与了课题组的部分要塞考察和书稿评审工作及研讨会议。

郝洪波:鸡东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在3次考察半截河要塞的活动中,都积极参与,为课题组的考察活动提供多方面的支持。提供了有关半截河要塞的部分资料,参加了部分要塞的考察和书稿评审及研讨会议。

王文:阿尔山文物管理所所长,在课题组2次阿尔山要塞的考察活动中都积极参加,并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为阿尔山要塞撰写了部分稿件,提供了有关资料,参加了课题组的书稿评审和课题研讨会议。

刘向岗:呼伦贝尔军分区史志办主任。参与了课题组组织的多次考察研讨活动。先后参加了绥芬河、东宁、虎头、半截河、庙岭、凤翔、富锦、海拉尔要塞的考察,并为课题组的活动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除了上述人员外,《日本关东军要塞》编辑部的工作人员王福华、李成义、闫景全、曹艳茹、邹玲玲、宁珊珊都做了大量书稿编辑校对、制图、排版等工作。他们经常放弃节假日的休息而为本书的早日高质量地出版而加班加点工作。对书稿的反复修改、要塞的考察、照片的选择、地图的绘制,都尽心尽力地去做,他们用心血和汗水使这部巨著面世。还有各地参与此项工作的高嵩峰、叶德生、刘成立、王师锐、毕玉芬、孙芹、张景辉、陈小宁、戴璐、胡德久、喻胜林、刘颖军、胡秀华、丁柏、陈大骞、郭维福、钟承志、孙殿奇、胡光、吕兆锴、曹英、赵玉霞(黑河)、马玉新、宓强、葛亮、王卓顺、夏德兴、张国峰、殷焕良、哈达、奥奇、肖演艺、赵小宇、马明、张描姝、高娃、李秀梅、李彬、赵方华、王树明、赵天赤、李云桥、胡凤斌、王玉梓、丁万勇、任献义、徐钧、吕长江、赵虹、杨玉琴、孙成、杨波等。可以说,《日本关东军要塞》是众人智慧的结晶,是许多人共同付出心血汗水写成的。

难以忘怀的人和事

在主持《日本关东军要塞》课题的调查研究和书稿撰写、编辑、排版、校对、出版的过程中,我每一天都被许多的人和事感动着,永远不能忘怀。

金成民:这是位著名的日军细菌毒气战研究的专家,虽然年轻,但却研究成果颇丰,名气很大,在国内外都具较大影响。数次去日本跨国取证,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实为对日军侵华史研究的一大贡献。从2002年3月起,一直关注和支持日本关东军要塞研究工作,为我们提供指导性意见和相关信息及许多资料。尤其是为本书细菌毒气的内容提供了资料和照片、地图等,并对书稿进行了认真的审读,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协调各方关系,亲自去出版社洽谈出书事宜,为本书的出版面世做出了重要贡献。

范郁森:是我多年的志友,在编修地方志工作中相识、相知、相交。已有十几年的交情。自知笔力不足,精力和能力有限,只好将150多万字的书稿端给远在赤峰的"铁笔"范公,求他斧正。他业务繁忙,难得抽暇,但仍满口应允。当时正值2005年春节,他放弃了休息,每天早3点起床审稿,晚上干到半夜。历时20余天,终将每页都有圈点和改错的书稿退寄给我。阅后大为感动,仿佛看到了他深夜

灯光下劳碌的身影。"铁笔"使书稿质量大大提升,我也底气十足了。

滕建华:辽宁省军区副参谋长,是一位筑城专家,军事业务精熟而又有一副热心肠。求他审阅书稿和出任本书的军事顾问、访谈作者,他都欣然应允并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提出的修改意见使本书增色不少,专文《访谈录》则更是高屋建瓴,从军事专家的角度和在现代战争的视点下审视关东军要塞,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成为本书的"导读"之作和"点睛"之笔。

纪林:他是鸡东县四排村的一位普通农民。当我们去半截河要塞小鹿台阵地考察时,找到了他当向导,然而因腿伤他还拄着双拐。听说我们的意图后,他二话没说,就跟随我们上了山。他是个"跑山"的人,对小鹿台熟悉得很。在他的"向导"下,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考察任务。当我们结束工作在一起合影时,他被我们让到了中间。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心里充满着感激和感动。

汤向进:现任内蒙古军区巴彦淖尔军分区司令员。在他任原呼伦贝尔军分区参谋长时,对我们课题组的工作从精神到经济上给与了大力支持和帮助,他鼓励我们,一定要坚持把这个课题搞好,这是件有利于民族的大事。他派人、派车参加考察活动,并在经费上给予资助。正是这种支持和帮助,才使我们的课题研究和书稿撰写有了不竭的动力。

我还清楚地记得,2002 年 9 月在珲春要塞考察时,是珲春的边防团在有演习任务的繁忙情况下,为我们安排了车辆和陪同考察人员,吃住在部队,无偿解决了食宿问题。在长达 4 天的考察活动中,我们切实感受到了在亲人解放军身边的温馨与幸福。驻萝北县凤翔的边防某团和驻黑河西岗子的边防某团当课题组在凤翔要塞、瑷珲要塞考察时,他们都派出参谋和熟悉情况的战士当向导,爬高山、下地洞;驻西岗子边防团的领导还以盛宴款待我们课题组全体成员。虽然这些边防团当年的团领导和陪同的参谋们可能已离开部队,但当年的感动和感谢以及他们的音容笑貌都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我还记得牙克石市乌奴耳镇的党委书记赵天赤,他对乌奴耳要塞情有独钟,想早些开发服务于地方经济建设。他热情接待我们,并亲自当向导,保证了几次考察活动的顺利进行。王树明是乌奴耳林业局的职工,20 多年的"跑山人",对乌奴耳要塞各阵地的情况非常熟悉。他几次为我们当向导,爬高山、钻地洞,如数家珍般地向我们介绍情况,绘制地图。叶德生是阿尔山市的动物检疫干部,但他热衷于阿尔山要塞的调查研究和文物收藏。十几年来跑遍了阿尔山要塞的各个阵地,搜集收藏了日军武器、生活用品等 300 余件。3 次为课题组担任向导,凭着他对阵地的熟悉,使考察任务顺利完成。

更令我不能忘记的是哈尔滨电视台的编导咸明哲,他在拍摄要塞的专题片时与课题组密切合作,为我们提供了三次聚首哈尔滨、研究探讨要塞问题的机会和条件。

当我们课题组在孙吴县考察期间,曾得到了县委德爱勤副书记和宣传部部长张进来、副部长沈强及县政府副县长韩义明等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县林业局的领导也为考察工作提供了交通工具、向导等多方面的便利条件。呼伦贝尔市博物馆馆长赵越对课题组的工作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派人、派车参与了海拉尔要塞的考察。日本国的山边悠喜子、冈崎久弥、菊池实、小林静雄、青木茂、天田达也等朋友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

我们永远牢记着下列单位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东北沦陷史》编委会,辽宁省委党校地方党史研究所,孙吴县委和县政府及档案局、林业局、文物管理所,黑河市八一O台,虎头市文物管理所,东宁县文物管理所,密山市文物管理所和林业局,鸡东县文物管理所和林业局,富锦市林业局防火办和档案局,绥芬河市电视台、阿尔山市文物管理所和旅游局、乌奴耳镇党委和政府,呼伦贝尔市委办公厅、呼伦贝尔民族博物馆、呼伦贝尔军分区、海拉尔铁路分局武装部(人防办)、海拉尔市武装部和人防办、呼伦贝尔市人防办、海拉尔旅行社等。日本国 ABC 企划委员会及要塞研究机构和团体。

多年来,课题组的成员们在各自所在地的要塞调查研究过程中,付出了极大的辛劳。要塞阵地多位于边境高山峻岭地区,山高林密无人烟,交通不便行路难。但他们克服了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为了自己钟爱和追求的崇高事业,忘我地努力工作着。因为是自费考察,课题组的各位成员吃的是最简单的饭菜,有时就是馒头、面包、咸菜、矿泉水;坐的是租来的 212 越野吉普车,路途遥远而颠簸,几层

裤子都磨破了，还时常陷车，品尝推车之苦是常事；住的是最便宜的房间，“不管是什么床，反正睡着了都一样！”大家这样安慰自己。要塞阵地考察的最佳时间是春天树木刚刚返青之时，然而也正是蜱虫（草爬子）活动最猖獗之际。蜱虫稍比臭虫大些，叮入人体不肯放口，直到撑死为止，更可怕的是它能传染森林脑炎，死亡率特高。从山上考察下来，脖子、头发和身体的各部位都可以发现几个、十几个、几十个蜱虫，甚至它还叮到考察人员的生殖器和肚脐里，令人谈“虫”色变，不寒而栗。有的要塞阵地地下工事破坏严重，只能爬进去探个究竟。大块废墟摇摇欲坠，钢筋支翘，头被刮破缝上几针，摔倒了爬起来，再大困难险阻也挡不住大家的前进步伐。

考察活动一结束便开始了繁忙的室内作业——撰写书稿、绘制地图。各位撰稿人白天要忙单位的工作，只好挑灯夜战，无数个披星戴月的不眠之夜和熬红的眼睛、消瘦的身躯，换取了书稿的一天天增厚，字数的一天天增加。编辑部的同志们从编辑书稿开始，字斟句酌，配图置照；校对从唱校开始，纵然口干舌燥嗓眼冒烟也不敢有半点疏忽；听取意见，反复修改，不厌其烦；母亲顾不上孩子，年轻人放弃了与恋人的约会，加班加点，日以继夜，从初稿的稿纸到终审定稿的打印稿整整装了 3 个大编织袋。

然而，最令我们头疼的是最终成果如何面世？数次向北京某研究中心申报课题，都被告之无望；想争取一些企业的赞助也无果而终。2005 年 5 月，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的鲍海春院长、李宏君副院长率团来呼伦贝尔考察巴彦汗毒气实验场，了解到了我们的困境，决定把此书纳入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他们资助出版费用。在他们的支持指导下，《日本关东军要塞》书稿编辑工作健康顺利发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韩妙丽、韩丽老师对本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也极为重视，多次审阅书稿，提出修改意见。这些都是本书得以出版面世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经过五年多的艰苦跋涉和拼搏努力，《日本关东军要塞》终于出版面世了。然而我们深知目标的实现和任务的完成，只是我们课题组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关东军要塞还有许多未解之谜，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调查和研究。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对日本关东军要塞的调查研究就不会停止。在过去课题组和“侵华日军要塞研究中心”基础上，于 2005 年 8 月成立了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侵华日军要塞研究所。有国家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做依托，关东军要塞的调查研究工作将会更好地开展下去，我愿意和我的同仁们一起，同国内外有识之士团结奋斗，把关东军要塞的调查研究工作不断向前推进，不断取得新成果，为人类的和平事业、构建和谐世界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2006 年 12 月 31 日